

凤凰周刊文丛

The Brothers of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Republic of Cuba

社會主義國家的兄弟們

古巴

凤凰周刊编



凤凰周刊文丛

The Brothers of Socialist Countries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社會主義國家的兄弟們

越南

凤凰周刊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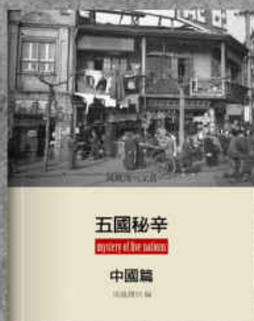


凤凰周刊文丛

North Korea Patient

朝鮮病人

凤凰周刊编



五國秘辛

mystery of five nations

中國篇

凤凰周刊编



五國秘辛

mystery of five nations

蘇聯篇

凤凰周刊编



五國秘辛

mystery of five nations

韓國篇

凤凰周刊编



五國秘辛

mystery of five nations

日本篇

凤凰周刊编



五國秘辛

mystery of five nations

德國篇

凤凰周刊编



凤凰周刊文丛

Turbulence in the Third World

動蕩的第三世界

凤凰周刊编



凤凰周刊文丛

America Now

美國大事

凤凰周刊编

香港凤凰周刊文丛系列

国事机密档

（全10册）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香港凤凰周刊文丛系列

国事机密档

（全10册）

总目录

香港凤凰周刊文丛系列——五国秘辛·德国篇

香港凤凰周刊文丛系列——五国秘辛·韩国篇

香港凤凰周刊文丛系列——五国秘辛·日本篇

香港凤凰周刊文丛系列——五国秘辛·苏联篇

香港凤凰周刊文丛系列——五国秘辛·中国篇

香港凤凰周刊文丛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们 古巴

香港凤凰周刊文丛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们 越南

香港凤凰周刊文丛系列——美国大事

香港凤凰周刊文丛系列——朝鲜病人

香港凤凰周刊文丛系列——动荡的第三世界



五國秘辛

mystery of five nations

德國篇

凤凰周刊 编

Table of Contents

被过分美化的德国二战反省

纳粹种族主义的纠结

华沙起义，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二战瞬间

我们这个星球的浩劫与创痛

版权信息

五国秘辛·德国篇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凤凰周刊》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2016©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2016

本书版权为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所有。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TCFP-N00007208-20160304

最后修订：2016年08月09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被过分美化的德国二战反省

日本学者指出，德国战后在历史认识、整肃纳粹人士以及对外赔偿中都存在问题，无论是官方和非官方的反思都有不足之处，现在的报道多数忽略了这些方面，过于强调正面细节。

记者 / 林子敬

“早在8月15日前一个多月，日本国内舆论就开始议论历史认识问题。毕竟明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今年算是一个前哨战，政府的表态很可能直接关系到明年（的立场）。”在“终战纪念日”前夕，日本《朝日新闻》前社论编辑口光如此表示。

相比之下，中国国内从年初就一直在批判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离经叛道”。7月，在安倍政权重新审查1993年“河野谈话”的妥当性后，中韩两国“结盟”抨击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问题。长久以来，中国舆论与学术圈一直拿同为二战“轴心国”的德国与日本做对比，赞扬德国彻底反省二战的同时，批判日本战后反省的缺失成为一种固定范式。

中国对德国战后反省的赞扬与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所做的相类似。当时以《朝日新闻》为首，日本媒体大力称赞德国在战后对于二战的反省，认为德国政府已经充分谢罪，希望日本政治家能够学习。但在2000年以后，赞扬之声在日本的主流媒体上逐渐销声匿迹，许多人认识到，德国对于战争的反省也并不全面。“人们只接触到了部分事实，或者存在断章取义的情况。事实上，德国对二战的反思还有很多有待商榷之处。”口说。



1970年12月7日，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的著名“一跪”，震惊世界。不过根据《什么是战争责任？没有被清算的德国的过去》一书介绍，此举虽然引起全球瞩目，但波兰在当时的新闻管制下却没有报道此事，勃兰特回国后也饱受国内舆论批评。

纳粹：被严厉制裁的虚像

“时至今日，在日本仍会听到‘德国追究纳粹犯罪不设时效’的说法，以此赞扬德国反思二战罪行是如何彻底。事实上，这是错误的理解。至少德国在法律上根本没有关于‘纳粹犯罪’的定义，更不可能有上述说法。”口表示，人们关于战后德国严厉制裁纳粹分子只有一种粗浅印象。

德国历史学者洛夫·史泰宁格著有《德国史 1945-1961》，其中对

东西德处理纳粹分子有清晰的描述。当时德国被盟军分割占领，东德声势浩大地驱逐了前纳粹相关人员。但是对于战争受害以及对犹太人的屠杀，东德政府以“资本主义体制的矛盾表现”为由，采取和本国（社会主义国家）无关的立场。

“西德在盟军占领当初借由占领军之手驱逐纳粹，但在占领后期，政府目标转为让相关人士尽早恢复名誉、归复原职。”史泰宁格在书中写到这一幕，为此当时政府还颁发了《非纳粹证明书》，来洗刷一个人在纳粹时代的污点。

1949年5月，德国联邦政府宣布成立。在阿登纳政权下不到一年，占领军时期被革职的15万前纳粹公职人员中大多数都回到了政府岗位。1951年开始运作的西德外交部中，公务员有2/3是前纳粹党员。究其原因，截至1945年纳粹党解散时党员大约有850万人，范围囊括官僚、政治家以及企业经营者等社会核心成员。在如此庞大的基数下，追究纳粹责任成为相当不受欢迎的政策。

司法机构重新运转后，德国于1946年在国内对纳粹行为进行审判。然而，最终被判有罪的纳粹不过6000人左右，而且很多只是处以罚款等轻刑，整体受罚的纳粹党员只占总数的0.06%。

后来德国议会在制定《刑事免除法》时，从“纳粹时代从犹太人商店抢夺商品”和“战后在黑市因为饥饿而抢夺面包”，到“纳粹时代为了避免遭受迫害而使用伪名”和“战后为了逃避盟军对战犯的追究而使用伪名”等，均被免罪。

唯一没有时效的是谋杀罪。但无论是否是纳粹所为，德国对谋杀罪一直采取不设时效的立场，纳粹被审判时也只是被认定为普通的刑事犯罪，与英美对于杀人罪没有时效属于同等性质。德国现行法律对于“种族灭绝罪”也没有设定时效，但这里存在一个“陷阱”——该罪名在纳粹时代并不存在。强行用在纳粹身上会被抨击为刑法的追溯适用，有损民主主义法治中的“法律不追溯过往”原则。

“没有污点”的国防军神话

“几年前我去德国时，目睹到二战时的逃兵以及拒绝服兵役的人抗议政府不给他们发抚恤金以及养老金。”自媒体大象公会主编黄章晋对本刊记者回忆起这一幕。对德国历史颇为关注的他说道：“相比之下，二战时参战的军人一直是德国最受尊敬的群体。”

德国联邦政府一贯对联合国的战犯审判表示否定，认为是法律的追

溯过往。二战后德国并没有缔结《和平条约》，因此跟日本不一样，德国官方的“正史”并没有接受盟军对于战犯的审判。相比来说，政府将战争犯罪与纳粹对犹太人迫害切分开，“洗白”国防军在二战的战争行为，认为德国军队是与战争犯罪无缘的“绿色国防军”。

1952年12月3日阿登纳首相在军队的名誉恢复演说中表示：“我希望以联邦政府之名宣布，德国军人拥有传统的高贵之名，我们在陆、海、空领域经历过荣耀的战斗，我们民族所有士兵的功绩都被承认。即使近年来我们的军队被诽谤中伤，德国军人的名声以及伟大的功绩现在更是保护着民族的命脉，今后也确定会继续存续。”

史泰宁格在书中则总结了“德国的国防军神话”的三个内涵，第一是德国军队从属于国家元首的希特勒，并不负有战争责任；第二是国防军所进行的终究只是通常的战争行为，和战争犯罪无缘，残虐行为是纳粹亲卫队干的；第三是国防军清廉正直，与渎职无缘。

此外，被认定为甲级战犯的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的葬礼由德国联邦海军主办，念悼词的人是后任海军总司令官、同为甲级战犯的邓尼茨。当时被认定为犯罪组织的柏林亲卫队上级大将的约瑟夫·迪特里希的盛大葬礼也由德国国防军主办。

1956年，联邦德国对于那些在纳粹迫害下的牺牲者进行补偿，制定了《联邦补偿法》，对象大部分是德国国民以及当时的德国国民，但是对补偿对象的选择却能够清晰反映出西德官方对待纳粹时代军人的态度。同年，西德宣布共产党非法化，对于“动摇自由民主主义秩序根干”的共产党受害者，政府拒绝给予抚恤金。相比之下，那些没有被问罪的前纳粹党员或者被盟军认定为有罪的纳粹党员，被认为不是“德国法律意义上的罪犯”，所以也给他们发放补偿以及养老金。



19 43年4月19日，波兰华沙，犹太人爆发反纳粹起义。图中持枪男子名为约瑟夫·布鲁克齐，在华沙贫民窟担任看守，被犹太人誉为“杀人鬼”。战时德军犯下无数罪行，但德国在反省历史时将罪过归结于少数“纳粹分子”，德国士兵仍然“光荣”和“高洁”。

此外，对于同性恋、拒绝服兵役等在纳粹时代不被认同并且受到迫害的人，也不在接受赔偿的对象之内。直到1988年新的纲要制定后，才扩大补偿的对象。但是仍有部分人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获得政府认定。

“基本可以认定的是，德国将二战中的‘种族灭绝罪’和‘战争罪’加以区别，一般只承认前者。”黄章晋说，“如此才能解释战后德国官方对待军队的态度，要知道，他们本来是战争犯罪的实施者。”

“德国人的忏悔类似于同情”

1996年，美国前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丹尼尔·戈德哈根在《乐意遵从希特勒意旨的死刑执行者们》一书中指出，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是那些特定的狂热集团分子所为，德国所谓的普通人在自己的意志下也认同并实施了战争犯罪。该论点绝非新颖，但却被德国媒体批判“其让德国人披上集团犯罪的大衣”。

“德国一直强调对屠杀犹太人的忏悔，但在忏悔时其实已经置身事外，大多认为是希特勒和少数纳粹亲卫队的恶性。相比之下，德国人的忏悔更类似于同情。”日本仲正昌树在《日本和德国：两种战后思想》一书中如此写道。

1972年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在犹太人墓碑前跪下引起世界瞩

目，“一跪泯恩仇”成为德国反省历史的美谈。然而，前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木佐芳男在《什么是战争责任？没有被清算的德国的过去》一书中指出，勃兰特“一跪”后，他回国发表的电视演说中提及“战后德国人从旧东部领地被放逐，即便有任何道理，此行都不能被正当化”，用以批判波兰方面的加害行为。

直到现在，德国历代总理和总统都会访问波兰、以色列和波罗的海三国，在牺牲者的墓碑前对纳粹的犯罪行为进行谢罪。与此同时，对于东中欧国家加害战后德国人的行为，德国政府也不遗余力地进行谴责。200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70周年纪念仪式上，德国总理默克尔承认当年德国开战“招致了没有终点的苦难”，但是对于战后其他国家驱逐旧德国领地的德国人表示抗议，认为其他国家也应该正视这些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1985年5月8日，他在二战结束40周年纪念日上发表演说，谈到“无论老少、有罪与否，我们全员都必须继承过去，对过去负责”，引发坊间一片称赞。

但事实上，魏茨泽克的父亲当年参与将法国犹太人送往奥辛维斯集中营等行动，犯下了人道主义罪行，但魏茨泽克在其回忆录中表示，父亲的罪状只是领导了侵略战争，丝毫没有言及父亲对人道主义的犯罪。在发动战争方面，他认为父亲的行为是对波兰等国家的侵略，但是对苏联则是自卫。他还写道：“关于侵略战争，任何一个国家都做过，不能只批判德国一家。”

欧洲战后赔偿仍存争议

“德国自西德时代以来，光对犹太人屠杀的个人赔偿就已经支出600亿美元，相比之下，日本对亚洲国家支付的赔偿和准赔偿才60亿美元。”口表示，这是日本媒体过去经常用来做历史对比的数据。

不能否定，德国对犹太人迫害问题上已经付出代价，但在针对战争行为的赔偿问题上又是另一回事。战后西德政府基本上以德国没有统一为理由推托国家赔偿。在国际条约中，德国签字认可其他国家可以征收过去德国政府和军队的财产。因此，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德国认为已经两清。

然而，当时西德和英美等西方阵营国家的确签订了涉及赔偿的条约和协定，但是波兰和捷克等苏联阵营国家并没有类似的法律或者条约。为此，德国主张的“已经解决”充其量只是政府见解，法律根据并不明确。

1998年，当年被德国迫害的美国劳工团体发起赔偿诉讼，以此为导火索在美国发展成为抵制德货的运动。为此，德国联邦议会和德国企业在2000年设立了“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以补偿那些被强制联动的受害者。该基金的总额高达100亿马克，德国企业和国家各出一半。不过德国政府保持一贯的立场，认为“赔偿请求权的问题已经解决”，这样的基金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补偿”。德国官方的说法是，该赔偿针对的是纳粹犯罪而不是战争犯罪，为此德国对于那些城市的破坏等通常战争犯罪的受害者并不给予补偿。

直到现在，关于战争犯罪的赔偿仍然是德国和东欧国家发生口角的问题。2004年9月，波兰议会曾经催促政府尽快向德国索取战后赔偿一事，议会在赔偿请求的决议认定德军当年在波兰首都华沙造成的损害额为350亿美元，德国对波兰总共应该赔偿6400亿美元。面对这笔巨额款项，德国政府最终选择无视。

此外，在请求权上波兰也与捷克不同。波兰在1953年曾经在苏联的“控制”下宣布放弃对德国的请求权，虽然事后称苏联并没有将“代领”的赔款分给波兰。相比之下，捷克政府从来没有宣布过放弃索取赔偿权，现在捷克仍在为此要求德国进行赔偿，但是德国以“请求权问题已经解决”而不予回应。

“欧洲在二战历史问题上并非和和美美。德国战后在历史认识、整肃纳粹人士以及对外赔偿中都存在问题，无论是官方和非官方的反思都有不足之处。现在的报道多数忽略了这些方面，过于强调正面细节。”口说：“当然，日本也不能因为德国的反思不足而让自身有理由不去反思，虽然这种想法仍是过于理想的。”

编辑 段宇宏

猜你喜欢



点此阅读

希特勒失败前如何评价日本和中国?

纳粹种族主义的纠结

文/ 程映虹

1945年初，战争失败的结局对于德国只是时间问题，希特勒在内部谈话时不再避讳这个可能性。那年2月的一次内部讲话中，他在战败的背景下谈未来世界，涉及中日的短短讲话内容值得在今天回味，毕竟反映希特勒晚期思想的材料很有限。

“照我看来，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过去从来不是种族意义上的低等民族。他们都属于古老的文化，我得坦率承认他们的传统要比我们的优越。他们完全有理由为此骄傲，就像我们为自己的文化而骄傲一样。我甚至相信，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坚持的对自己种族的骄傲，我不但更容易理解，而且更会认为理当如此……日本将永远是我们的朋友和盟友。这场战争使得我们对日本有了更高的评价，对它更加尊敬……共同的命运将永远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胜利还是毁灭。如果宿命选择首先毁灭我们，我很难想象俄国人还会恪守他们对日本人许下的‘亚洲人团结一致’的诺言……我相信，日本人、中国人和伊斯兰民族将永远比法国这样的民族离我们更近，尽管我们和那个民族血脉相连……”

斯大林说“我自己也是亚洲人”

这段大而化之的议论中，只有“我很难想象俄国人还会恪守他们对日本人许下的‘亚洲人团结一致’的诺言”，涉及一个具体的史实。

1940年德国横扫欧陆，英伦三岛孤悬海外，全世界都屏息静气，看希特勒下一步如何动作。尽管苏联和德国在1939年8月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那个条约的前提——一个强大的英法阵营已经不存在了。苏联对此当然心中有数，为了避免成为德日意三国轴心的下一个目标而全力展开对日亲善外交。日本方面，主张首先向英美开战的一方主导了决策，为此也要稳住苏联。

1941年春天，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访问柏林后来到苏联，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日关系虽然只有20年，但已有两次重大冲突。1920年，日军曾作为协约国成员国侵入苏俄西伯利亚地区；1938年日本侵入苏联控制的蒙古国。两次冲突中，日军均遭败绩，这也是为何日本军方放弃北进的历史原因。在这样的历史阴影下，苏联方面全力为日苏谈判营造气氛。斯大林亲自出席招待松冈的宴会，杯盏交错之际，他对松冈说：“我自己也是亚洲人。”

斯大林这话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向日本示好。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中，整个世界就是分为英美为主的西方和日本代表的亚洲之间的文明、文化的冲突，日本要把亚洲人团结起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斯大林的意思是:虽然我们俄国人看上去是白人，但高加索地区在历史和文化上都和亚洲有关，我就是出生在那里，西方人也一向把俄国人看作是落后的亚洲人（列宁甚至被西方人称为鞑靼人），整个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和文化就是在欧亚之间模棱两可的。

斯大林这话不但是和日本套近乎，还有离间德日同盟之嫌。德国人获悉后对日本人非常不爽，《戈培尔日记》对此有记载，希特勒在会见松冈之后曾说日本人看上去就鬼祟、欺诈，四年后希特勒在上述那次讲话中又旧事重提。

更进一步说，斯大林的所谓“亚洲人”云云，点了德日关系的死穴。纳粹意识形态独尊以日耳曼人为代表的雅利安人，而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又把整个西方白人世界置于世界历史罪恶的一端。德日关系始终在双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政治军事同盟关系中寻找平衡。日本驻德大使在纳粹上台后一再要德国方面明确日本民族在纳粹种族主义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其结果是相互之间形成官方语言中的“政治正确性”：德国方面用外交语言对日本宣称，所谓“非雅利安种族”原则上特指犹太人(这也是为了给纳粹政权和世界其他国家例如中国维持正常的外交关系)，而劣等种族专指那些完全由混血而成的民族；日本方面则注意在官方场合不笼统谴责“白人”世界。

希特勒对日本的复杂感情

希特勒上述这番话表示他完全懂得苏日中立对于双方都是政治权宜，一旦时移世易，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所以他相信，一旦德国失败，苏联绝不会恪守对日中立的诺言。就在他说上面这番话后两个月，苏方知会日本说条约五年期将满且苏方无意续签，为后来出兵中国东北清除了《国际法》障碍。

但希特勒这番话的主要意思是对日本在战争中的表现的高度评价，这是对《我的奋斗》中对日本的看法的重大修正。《我的奋斗》中多次提到日本，主要围绕两个问题。

第一是有关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希特勒认为一次大战前西方出于对日本现代化成功的承认，接纳它成为帝国主义俱乐部成员。但德意志帝国一战后被西方的阴谋和犹太人的出卖而搞垮，日本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和犹太资本集团的下一个牺牲品，受到西方战后新秩序的压制和排

济。

第二是有关日本在他所谓的种族世界中的地位。希特勒把世界各民族划为文化的创造者、承担者(或传播者)和破坏者这三类，只有雅利安人才是创造者，又以日耳曼人为最优秀，而日本被挑出来作为文化承担者的样板。希特勒说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俄国的消息就让少年时的他震惊和兴奋，因为这证明了斯拉夫民族的劣等。他认为日本并不仅仅是移植了西方技术，而是把雅利安人的成果内在化了，但这个外在的源泉一旦枯竭，日本在科学和技术上的成功也将很快枯萎。当然，纳粹高层有人对日本民族的种族地位比希特勒的评价要高，甚至认为日本的武士阶层也是雅利安人的后裔，但总的来说没有改变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日本的定位。



1941年3月26日，德国柏林，希特勒会见前来访问的日本著名鹰派外相松冈洋右。

尽管德日成了同盟，但对这个非雅利安民族，希特勒在心里还是视为二等种族。当时在德国和日本之间有很多人员来往甚至移民，难免出现通婚，尤其是在相当级别的精英人士中。按照纳粹严格限制和非雅利安人通婚的规定，这样的结婚申请要由希特勒本人批准。希特勒就关照有关部门，相关申请先拖它个一年半载再交给他，给当事人造成不会被

批准的印象，然后他再拒绝。日本驻德国大使有时会为一个这样的申请动用外交渠道。珍珠港事件后，希特勒为纯种的日本人让杂种的美国人吃了苦头而高兴，但又为日本军队迅速击溃英国在东南亚的大军、尤其是轻易攻占其政治经济中心新加坡而叹息。

希特勒一向看重大英帝国，视它为雅利安人在德意志崛起前的优秀代表。在这个意义上，他也肯定美国的成功在于它是大英帝国的产儿，只不过后来杂种化了。希特勒甚至打算在击败苏联后，要仿效英帝国统治印度的方法来治理俄罗斯，把俄罗斯变成德国的印度。他认为德国和英国之所以成为敌人，是因为犹太人窃取了英国的金融和政治权力。

然而到了1945年2月，从文章开头引述的这段话来看，日本在希特勒的心目中的地位完全改变了，从第二等种族即文化的承担者一跃而为最优秀的种族，即文化的创造者，甚至比日耳曼人还要优秀。这样的说法，暂且不论在《我的奋斗》成书的1920年代，即使到了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也是很难想象的。这说明日本在二战中的表现迫使希特勒至少在一定的公开场合修正了《我的奋斗》对世界种族的划分，把一个非雅利安种族置于和雅利安人同等的地位。

希特勒长期忽略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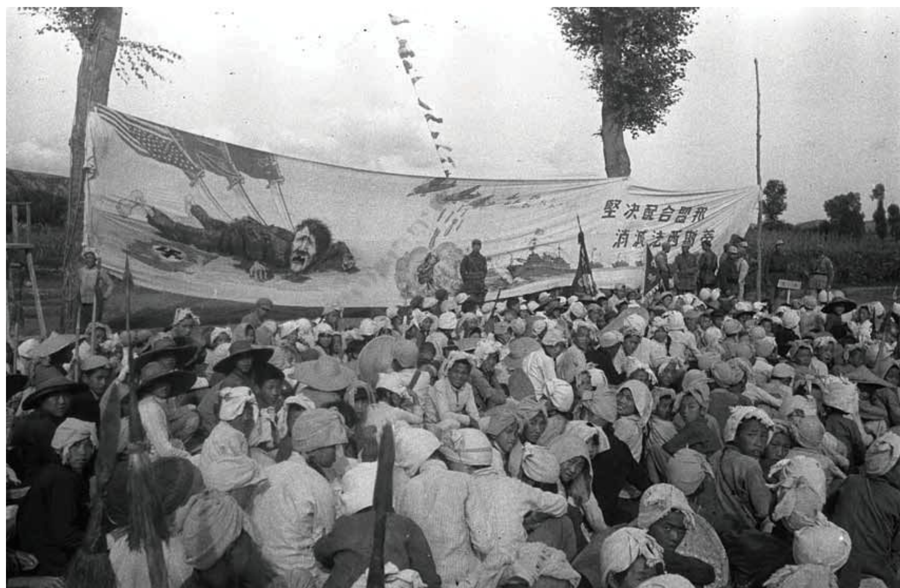
和日本相比，中国基本在早期希特勒的世界历史视野外，至少在《我的奋斗》中是如此。全书只有一处提到中国，原文是这样的：

“除非我们接受一个难以想象的谬见，否则，我们不会相信一个黑人或者是中国人——就算举个例子吧——能通过学习德文甚至使用德文或者进而投票给某个德国政党而变为一个德国人。那样一种日耳曼化其实是非日耳曼化，这一点我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世界从来就不懂。”

希特勒这话，是针对西方国家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对移民问题的态度。当时奥地利的德裔政治家认为可以通过教育把境内大量斯拉夫人融入以德裔为主的民族国家，即所谓的“日耳曼化”。希特勒认为这完全不可能，这样一种日耳曼化只会降低日耳曼人的种族品质。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下，他提到了中国。尽管我们还不能因为这段话把中国人和当时普遍被认为毫无历史和文化可言的黑人放在一起，就认为希特勒蔑视中国，但至少可以说希特勒对中国人不会有很积极的评价，这和他对日本的评论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魏玛时期开始，德国和中国维持了友好关系。凡尔赛体系下，德国从对外贸易到军事训练都受到很大限制，但德中关系不受这种限制，所以德国国防军把训练中国军队作为自己训练不足的某种替补。国民政

府的中央军在1930年代接受的基本是德国式训练和装备，直到1941年德日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和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转为美式训练和装备。两国友好背景下，希特勒的公开言论当然不可能公然贬低中国，他会见中国外交官时也一定会逢场作戏地恭维一下中国。但《我的奋斗》多次再版，从来没有对中国的地位有过任何明确的说法。我们无法知道在他的三类种族中，中国究竟属于哪一种，虽然可以肯定不会是第一种。



1944年，延安，一场关于打倒法西斯的集会。

然而在1945年初这次坦率的内部讲话中，希特勒竟然把中国——当时是德国的敌国和日本相提并论，明确说中国人也是优秀种族，甚至比德国更优秀，这应该说是很不寻常的。虽然世人并不具体了解希特勒为什么忽然把中国放到他的种族世界金字塔的顶端，但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唯一可能的历史的合理想象，就是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艰苦卓绝的精神使他刮目相看，这就和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独立和几个大国作战一样让他佩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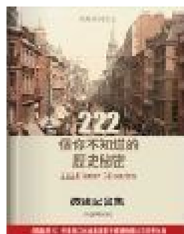
世界上很多僵硬狭窄的意识形态和宗教教条，都有类似的在现实面前不得不做出某种“修正主义”姿态的历史，并出现变种。这个简短的“修正主义”版本中，至少德意志种族已不再独霸最优秀种族的地位，一些原来被他认为第二流甚至不入流的民族，现在可以和德意志平起平坐。最终，种族云云可能并不是德国区分敌友的最重要标准。

那么，区分敌友的标准是什么呢？希特勒没有继续发挥。但他这段话中始终有一个没有出现的主角，这就是西方。德国、俄国、日本、中国、伊斯兰世界，所有这些国家和文明都是在“西方”这个巨大阴影的笼

罩下被希特勒评论的。但是，“西方”——至少就英国和法国而言——和德国是同属雅利安人种的。那么，如果把种族因素排除出去，纳粹理论中剩下的就是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些“西方意识形态”的憎恶了。

编辑 陈祥 段宇宏

猜你喜欢



点此阅读

华沙起义，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文/ 李星

“经历无情镇压反对者的暴戾政权后，如今的幸存者能与当年罪犯的后代握手，充分说明了和解的可能性。”德国驻波兰大使鲁道夫·尼科尔，2015年4月向两名波兰抵抗战士授予了联邦功勋十字，表彰他们在华沙起义中的贡献。

大使还表示，2014年柏林举行了华沙起义70周年纪念展，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在致辞时指出，这场起义不是如过去某些人批判的“集体自杀”，而是对懦弱与恐惧的胜利，这种胜利往往比军事上的胜败更为长久。

1944年8月1日下午，钟敲五点后，占领波兰首都华沙5年的德军突然发现离奇一幕：城市变成了一个炽热大火炉，波兰人全从街头神秘消失，德国人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射击。十五分钟内，全城百万居民卷入了战斗。

城外的苏军坐视不管，缺少外援的起义组织——波兰“国家军”苦苦支撑，经过2个月的艰苦战斗后被德军镇压，有“北方巴黎”美称的华沙市也毁于一旦。这就是二战历史上著名的一幕悲剧——华沙起义。

定性：“由错误路线和资产阶级领导的失败运动”

华沙起义前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派出的精干小分队已紧随苏军进入波兰境内。这支小分队的指挥，就是后来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头子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将军。他们的任务，是一俟苏军解放波兰某地，便对本地“敌对势力”——尤其是国家军予以诱捕、缴械、解散等。

此打击下，1945年初国家军的组织已经是支离破碎。不久，面对苏军占领波兰的既成事实，国家军宣告解散。

波兰国家军并非一个反共组织，而是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内部成员来源广泛，包括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民族主义者和农民。国家军解散后，部分成员倒向了苏方，部分人拿起武器成为反苏游击队员，大部分战士出于厌战而解甲归田。然而，苏联并不认为国家军的威胁就此消失了。



华沙起义时，两位波兰战士正在街头打巷战。

首先，国家军的大部分军官参加过一战和波苏战争，斯大林曾在1920年的华沙之战中被波军挫败，因此他对战前波兰军队的军官有着忌惮和报复心理，卡廷事件是这种心理的另一证明。

其次，苏联已将战后波兰视为禁脔，计划“给波兰这头奶牛套上苏维埃的马鞍”，即按照自己的面貌进行格式化。这意味着要打碎波兰原先的社会结构，消除战前社会的凝结核。按照这样的操作标准，波兰国家军作为一支全国性的组织力量，具有潜在危险性，必然和波兰天主教会一样成为重点打击对象。未来的波共总书记哥穆尔卡就曾表示：“国家军的军人是敌对分子，必须被毫不留情地去除”。

战争结束时，约6万国家军前成员被捕，其中5万人被送往苏联劳动营。在战后波兰的第一轮大清洗中，国家军前成员几乎被从波兰人民军中扫除殆尽。军队外的国家军成员，也被指控为隐藏武器、建立秘密反革命组织、进行暗杀和隐蔽的破坏活动。大规模的逮捕，带来的是大规模的关押。很多国家军成员，在人满为患、地处荒僻和缺少基本生存保障的监狱中意外发现，自己与之前的敌人——德国法西斯被关在一起。更为奇妙的是，彼此罪名相同，即搞“法西斯主义”。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国家军被定性为“一小撮权欲熏心的冒险家与罪犯”，华沙起义也成了“由错误路线和资产阶级领导的失败运动”。对于牺牲的上万名国家军将士、二十多万华沙市民，波兰政府没有修建任何纪念设施。

苦衷："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战斗"

波兰对前国家军成员的大规模逮捕和肉体消灭，随着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结束而告一段落。

1956年的大赦释放了三万多名前国家军成员，此时很多人已经饱尝了十年铁窗风味。苏共二十大后，波兰当局对国家军的姿态逐渐有所松动，在宣传时注意将国家军的"下层爱国官兵"与"以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为首的国内政客，米科拉伊奇克为首的流亡政府"分开，适度颂扬前者的英勇，而认为后者要为这场大悲剧负责。



一位叫安东尼·图勒迦的青年骑着德国人的摩托车在街道上，背后是市政厅。

苏联外交史著作也改变了全盘否定的立场，认为华沙起义是反动派进行的"毫无意义"的冒险和政治赌博，但与反动派的意图相反，起义变成了全民参加的反希特勒行动；同时，苏军尽一切可能帮助了起义的华沙居民。

伴随着文化界的暂时“解冻”，波兰导演安杰伊·瓦伊达首次打破了题材禁忌。他于1957年拍摄了著名影片《下水道》，讲述华沙起义失败后国家军战士在下水道逃亡的故事。整部片子有大段场景是在被毁灭的华沙城区和下水道实景拍摄，逃亡环境肮脏黑暗，国家军战士或死或叛或被俘，基调十分压抑。

值得一提的是，片尾一对恋人逃到维斯图拉河边的下水道尽头，发现出口被铁栏杆封住。奄奄一息的战士只能无力地眺望着对岸的蓝天草地。其父死于卡廷森林、二战时本人参加过国家军的导演，在接受访谈时对结尾隐晦表示：“这是一部只有波兰人才能看懂的电影”，“朋友就在河边，可是他们不过来”。

不过，此时对于国家军的总体定性仍然是“法西斯分子”。1962年官方编写出版的《波兰简史》，给国家军扣了几大罪状：“挑起了一场兄弟残杀的斗争来反对波兰工人党和人民近卫军”、“向希特勒分子出卖了许多工人活动家”、“编制黑名单并煽动反动宣传”、“对苏联诽谤”等等。1984年，波兰部长会议主席雅鲁泽尔斯基称华沙起义是爱国行为，但强调是敌对势力在利用青年的爱国心去以卵击石，以谋取政治私利，正如今日的某些敌对势力在利用青年反对现政权一般。同时，许多国家军成员仍然身陷囹圄，波兰安全机关直到1989年之前仍对众多前国家军成员持续保持内部监控。

总的来说，战后的苏联和波兰官方都对华沙起义、卡廷事件、苏德瓜分波兰等历史事件讳莫如深，除了偶尔驳斥西方“造谣污蔑”等少数例外情形，在宣传、历史研究等领域均有意回避，这些历史事件因此被称为两国历史上的“空白点”。如苏联拍摄于1970年代初的战争巨片《解放》，全片共5集长达8个多小时，未提及华沙起义。第三集以1944年夏苏军和波兰人民军渡过布格河、进入苏联承认的波兰国境内结尾；第四集片头直接跳到1945年1月苏军发起维斯图拉河-奥德河战役，充分说明了“空白点”的敏感性。

但这些“空白点”作为波兰民族感情的承载物，一直以口传的形式默默传承在民间。新华社前驻华沙首席记者谢文清回忆，1950年代中期他与波兰中下层民众闲聊时，大家都在谈论华沙起义中苏联见死不救、苏联在卡廷处决波兰军官等苏联“黑材料”。团结工会等团体兴起时，其成员曾讲述过他们受到国家军前辈奋战故事的激励，并收到过国家军老战士群体的捐款。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存续的四十余年间，“地下波兰”对历史的解读与传承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

作为“另一个波兰”，战后侨居英国的波兰流亡政府也对这段历史有

着自己的解读。由于英国承认了波兰人民共和国，并移交流亡政府侨居的波兰大使馆，无家可归的流亡政府只能选择搬入波兰总统在伦敦的私宅办公。承认波兰流亡政府的国家只剩下梵蒂冈、爱尔兰和西班牙这三个天主教国家。

不过，波兰流亡政府获得了侨居西方的五十万波兰流亡者的效忠。战后，选择归化英国的波兰人就有十多万人，他们在1950年代中期成为英国第二大族裔。波兰流亡政府不断出版流亡者著作，维系着战前波兰的文化。直到1980年代末，这一政府的8名内阁成员仍然每两周召开一次会议。


工厂工人们自制起义用的冲锋枪。

被宿敌压迫、又被盟友抛弃的孤独感和异乡感，一直缠绕着这些无家可归的波兰人。曾是波兰外交官、后出走西方的作家米沃什，在其名作《被禁锢的头脑》中对华沙起义的评价，代表了他们的心声："这是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战斗。一个巨人在河对岸等着另一个巨人去除掉苍蝇。最终，苍蝇被一个巨人杀死，不久之后，这个巨人又被另一个更有耐心的巨人除掉了。"

平反："与社会情绪没完没了地对着干是不行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变革之风吹到了东欧。1985年，苏波两党首脑会晤时提出要"解释波苏关系中的某些方面"。1987年4月21日，戈尔巴乔夫与雅鲁泽尔斯基发表了合作宣言，提出要清除两国关系中的空白点。此后，双方共同成立了学者联合委员会，进行历史调查。

波兰统一工人党选择这么做的动机是，民间对华沙起义的记忆与波共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差异太大，这是造成波共"儿子党"形象不得波兰民心的重要原因，对华沙起义重新评价有助于恢复声望。雅鲁泽尔斯基回

忆这段历史时说到，此前波兰似乎存在一种公约，即我们同东部邻居的关系问题和历史上那些不光彩的篇章，都是不能谈的，但“与社会情绪没完没了地对着干是不行的”。

政治气氛的松动，使本来隐藏在人们心中的话语抬头了。1988年，华沙起义44周年之际，波兰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杜拉钦斯基的谈话，对苏联在华沙起义中的行为提出了一系列疑问，波兰各大报刊上纷纷发表了他对苏联的指责。翌年起，波兰法院陆续宣告撤销对前国家军成员的一系列不公正判决。



一队德军俘虏被抓获，被拘押在市政厅院子里。

1990年，莱赫·瓦文萨以压倒性多数当选战后波兰首任民选总统，波兰从此进入第三共和国时期。瓦文萨拒绝从雅鲁泽尔斯基处接受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国玺，而是选择由伦敦流亡政府最后一任总统乘专机将波兰共和国法统的象征——国玺、总统印信与绶带、总统旗帜和1935年《波兰宪法》原本送回华沙，交到瓦文萨手中。

鉴于波兰共和国已经“复国”，存续了近60年的伦敦流亡政府宣告自行解散。“地下波兰”与“另一个波兰”自此合一。1992年，波兰共和国总统瓦文萨签署法令，承认伦敦流亡政府颁布的全部勋章，以及伦敦流亡政府总统的前总统地位。1989年，新政府在华沙修建了华沙起义纪念碑，并命名了华沙起义广场。

1994年，波兰政府首次在战后举行了隆重的华沙起义纪念活动。2004年7月31日，即起义60周年前夕，华沙起义博物馆在长期筹建后正式开馆。开馆仪式上，作为加入北约与欧盟以回归欧洲的象征，波兰共

和国的总统布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和美国、德国等盟友的代表并肩站在一起。巧合的是，科莫罗夫斯基总统与起义总指挥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还有着亲戚关系。



华沙市民们在街头填充沙袋修筑街垒。


街头的路障和战壕。

回顾一个国都的毁灭

二战爆发于波兰，又以重新安排波兰而结束。波兰流亡政府与盟国6年间紧密合作，为二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不列颠之战中，德军损失战机的七分之一是由占英军飞行员总数10%的波兰飞行员击落。在北非，波兰旅曾在漫漫黄沙中与非洲军团激战。在意大利，当英、美、新西兰军队轮番进攻不利时，是波兰军团最终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德军精锐死守的卡西诺山修道院。在诺曼底，来自波兰喀尔巴阡山的龙骑兵和枪骑兵们驾驶“谢尔曼”坦克纵横驰骋。荷兰阿纳姆，波兰伞兵旅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英勇奋战。此外，波兰军事情报部门战前对“英格玛”密码机的破解工作，为盟国破译德军最机密军事情报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帮助。

这一过程中，波兰付出了国民死亡五分之一、首都华沙被彻底夷为

平地的代价。这种损失程度，在参战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若中国遭受波兰那般惨重牺牲，将失去1亿人口。

1944年，随着德军在各战场节节败退，伦敦流亡政府授权国家军在适当时候发动大暴动，以加速解放祖国。1944年7月下旬，苏军发动的夏季攻势将德军逼退至华沙东郊的维斯图拉河，莫斯科电台开始直接向华沙人民呼吁“行动时刻到来了”，号召华沙市民拿起武器，将华沙变为战场。

7月31日，当国家军领导人得知苏军坦克已突至华沙郊外，决定次日下午5时发动代号为“风暴”的华沙总起义，抢在苏军之前在华沙建立起独立的波兰政权。战斗打响后，发电厂等多处要地落入国家军手中，德军缩至各个坚固支撑点苦斗。起义军极其缺乏武器弹药，而预定从德军手中夺取武器的计划实施不顺利，因此急需外界增援。

接下来的事情出乎意料，苏军立刻勒兵不前，电台也保持了缄默。由于斯大林不同意英美飞机在苏联境内降落，盟国对起义军进行空投的重型轰炸机必须从意大利南部的巴里起飞，飞机折损率高，大多数物资还落入德军手中。

直到起义者孤军奋战6个星期后，苏军才在英美的一再抗议下派出波-2轻型飞机对华沙进行空投，有限的空投物资往往未装降落伞，武器装备大多摔坏而无法使用。苏军麾下的波兰人民军第一步兵师指挥官贝林格强烈要求率部渡河援助起义的同胞，他未经苏军批准就派遣4个营渡过维斯图拉河后，因缺乏火力和后勤支援，孤军伤亡惨重，只有不到1/3的官兵撤回东岸。贝林格被苏军解职，遣送回莫斯科从事军事学院工作。



护士贾妮娜带着女儿在医院照顾受伤的起义者。

德军摸到苏军底牌后，迅速出动包括“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在内的重兵增援华沙。起义军只能使用少量轻武器甚至棍棒、砖块，对拥有飞机、坦克与重炮的优势敌人战斗。之前德国人实施严格的粮食配给制，缺乏粮食的起义军用未脱壳的谷物做成“口水汤”，以此当作标准配置。10月2日晚，奋战了63天的国家军弹尽粮绝且伤亡万余人，指挥官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在得到德军将给予起义军战斗人员待遇的允诺后，率部向德军投降。

出于报复，希特勒下令将华沙从地图上抹去。靠炸药和火焰喷射器，德军有条不紊地摧毁了华沙城区85%以上的面积。全城百万居民在起义中死亡20万人，其中极大比例是德军滥杀无辜，其余居民被强制驱赶出城。

电影《钢琴师》的主人公原型瓦迪斯瓦夫·斯皮尔曼回忆，苏军进入华沙后，他在一座路障边看到了一具小巧的女孩骸骨，头骨上还残留着长长的金发。骸骨边有一支锈迹斑斑的卡宾枪，左臂骨上还戴着白红相间的国旗章，上面的AK（即国家军）字样已被子弹打得残缺不全。也许，这具骸骨正是迭遭打击、却始终不灭的国家军英魂的象征。

编辑 段宇宏



1939年9月1日拂晓，德军出动大批飞机轰炸波兰重要军事目标，地面部队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发动全线进攻，数千门大炮向波兰境内的目标猛烈开火。在德军的迅猛攻击下，波兰军队迅速溃败。不到1个月的时间，一个拥有3400万人口、100多万军队的国家就这样灭亡了。图为入侵波兰期间，德国空军的车辆穿过城镇，车上印着标语：英格兰有伞，我们有力量。（供图/东方IC）



1940年5月10日德军闪击西欧诸国，荷兰在战争爆发5天后投降、比利时坚持了18天投降，而与德国的军事力量本在伯仲之间的法国仅仅抵抗了43天就兵败投降了。德军的节节胜利令全民族的狂欢攀上巅峰，1940年6月，征服了西欧国家的德军参战部队回国后，德国政府在柏林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图为德国儿童和民众向凯旋的军人欢呼致敬。



1945年4月18日，一个美国士兵被射杀后，他的战友端着枪四处寻找朝他开枪的狙击手，投降的德军士兵正从他的身边跑过。这是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镜头中一个瞬间。只要战争没有结束，面对面的杀戮与仇恨始终存在，这样的场面在二战中比比皆是（供图/东方IC）。



上图是西线盟军在向德国本土进军途中，从被破坏的桥梁上过河。盟军从法国诺曼底登陆后，历经半年多的苦战，虽有挫折却始终牢牢掌握着战场主动权，解放了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后，终于打开了西部壁垒进入了德国境内。希特勒企图在西线取得决定性军事胜利，迫使盟军谈判的企图在1945年初彻底破产，胜利的日子即将来临。

1945年4月，气势如虹的苏军坦克洪流向着柏林席卷而去，很快就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踩在脚下。攻打柏林的最后一役即将开始，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暴政即将被消灭。



战斗结束后，坦克上的苏军士兵慵懒而轻松，钢琴声飘荡在硝烟尚未散尽的大地上，刚刚还紧握枪炮的手指，现在却气定神闲地弹奏起了钢琴曲。此刻还有什么能比音乐更美妙的？这一曲，是凯歌，也是法西斯的丧钟，战争的幸存者们，来高歌一曲吧！（供图/Sipa）



猜你喜欢

《凤凰周刊》文丛系列

《权力之海——全球政治人物脸谱》

全套两册



点此阅读

我们这个星球的浩劫与创痛

撰文/夏榆

20世纪，对于这个星球来说，或许算不上很特殊。但对于生活在不远处的我们而言，却遍布浩劫与创痛的记忆。那时，历史究竟该如何撰写？是要渐渐遗忘，还是永远铭记？



“我不知道月亮上是不是住着人，如果有，他们一定把地球当成他们的疯人院。”

写过黑色幽默小说《五号屠场》的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尼古特，引述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话讽喻他想象的地球。这个讽喻也适用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格局。

1944年12月，在美军服役的冯尼古特在某次战役中被德军俘虏，送到德累斯顿当劳工，德累斯顿到处是刻录着欧洲传统文化的古建筑，没有驻军和军事工业，成为战争中德国难民云集的地方。1945年2月13日至14日，美英空军对这座不设防的城市进行了狂轰滥炸，投下以燃烧弹为主的三千吨炸药，杀死13.5万余平民，是广岛原子弹轰炸人数的两倍。这一场人类大灾难，将这座欧洲最美丽的文化古城变为废墟。其时，冯尼古特身处德累斯顿屠宰场地下库房，幸免于难，见证了“欧洲历史上最大的杀戮”。24年之后，冯尼古特写出《五号屠场》。

现在我们站在时间的彼岸，遥望往昔散存于世界各地的战争遗迹，那是对我们的星球曾经有过的浩劫真相的永久保存。这些战争遗迹告诉我们，世界曾经有过怎样的疯狂和暴行，有过怎样的血腥和杀戮，也有过怎样艰苦卓绝的抵抗，这些战争遗迹作为历史遗存是对世界永久的警示。



●在匈牙利的多瑙河堤岸上，一双双各式各样的铁鞋散放着。这是雕塑家乌埃尔·久洛的作品，纪念在此被枪杀的犹太人。因当时物资匮乏，刽子手们在行刑时会脱下犹太人的鞋，拿去交易，这便是铁鞋雕塑的由来。供图/东方IC

被修改的灾难史

生活在当世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20世纪的历史，很难理解那些大规模的战争和杀戮。

随着各种世纪性档案的解密，人们看到更多的历史真相，当年以正义之名发动的战争，可能只是基于某种族群的利益争夺，世界性的杀伐和征战也只是始于独裁者称霸的狂想。在人们发现德国纳粹在波兰制造

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同时，又发现苏联红军在乌克兰制造的卡廷大屠杀的遗址，它们同时陈列在1989年之后实现制度转型的波兰，当年领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领袖斯大林也是卡廷大屠杀的直接策动者。而前苏联红军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解放者，同时也是卡廷大屠杀的制造者。革命带来杀戮，整肃运动带来灾难性的清洗，历史就是这么诡谲。

“一千年会过去，而我们的罪行仍会被记忆”。汉斯·弗兰克博士，纳粹占领期的波兰军事首领，在等候被处绞刑时如是说。然而，随着人类生活进入21世纪，纳粹的罪行就已经被遗忘，或被无视。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2005年12月14日发表讲话，称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是神话，他说：“今天，他们已经制造了一个名为大屠杀的神话，并把它置于真主、信仰和先知之上。”其时据美联社报道，内贾德的演讲一出，世界舆论哗然，德国外交部当天迅速做出反应，称对内贾德的言论感到“震惊和无法接受”。

对“大屠杀神话”的质疑并不始于当今。《真有六百万人死去了吗？—最终的真相》是一本讲述纳粹集中营的书，作者奥斯汀·阿普，费城拉撒勒学院的前英语教授，他在书中详细讲解道：“大屠杀就从来不曾发生过。杀人者没有杀人，牺牲者也没有死去。六百万人行骗，用捏造的尸体向德国人民要坚挺的马克。”

美籍波兰裔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是最早对大屠杀神话作出反应的诗人之一。1990年代，结束流亡回到波兰的米沃什一直定居在古城克拉克夫，而他的定居之城就紧邻奥斯维辛集中营。米沃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授奖演说《我的诗始终都是清醒的》，他谈到在欧洲风起的“大屠杀神话”说：“我们这个由于大众传播媒体不断急遽增加而变得一年小似一年的星球，正在经历着一项无法界定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特点乃是不肯记忆。”“今天，我们的四周充斥着关于过去的种种独撰—种种违背常识，违背基本善恶观的杜撰。在用各种文字写成的书中，有百余部否认曾经发生过‘纳粹大屠杀’，并宣称它是犹太宣传机构捏造出来的。人既然可能丧心病狂到这样的地步，那么永久丧失记忆又怎么会是不可能的呢？”

“人们不断地修改‘大屠杀’一词的涵义，好使它渐渐地完全只隶属于犹太人的历史—仿佛大屠杀的受害者当中并没有包括好几百名波兰人、俄国人、乌克兰人及其他国籍的战俘似的。诗人感到不可名状的焦虑，因为这件事情给了他一种对不久将来的预感：到了那个时候，历史将会缩小到只变成电视上出现过的东西，至于事情的真相会因为过于复杂，所以就算没有被完全销毁，也会被埋葬在档案间里。”

保存记忆，反抗遗忘

如今我们很难切身体验过去时代的创痛与噩梦，只有借助书籍和影像接近往昔。

所幸的是经历战争的血腥和残酷岁月的人们，他们履行自己作为见证者的道义责任，将亲身经历的惨痛书写成世纪经典，也更深刻地反省世纪性的杀戮和迫害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奥斯维辛不仅是一个政治事实，而且是一个文化事实，一个历史的和文明的组成部分，是人类非理性的蔑视与仇恨的顶点。”　　美国作家、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伊利·威塞尔（Elie　WieseL）如是说。1945年，在消灭了600万犹太人的牺牲的火焰所留下来的灰烬上，坐着17岁的威塞尔。1928年9月30日，威塞尔生于罗马尼亚喀尔巴阡山脉的锡盖特镇。他和他的三个姐妹在一个安宁的家庭中长大，这个家庭牢牢地建立在犹太传统和犹太宗教之上。当匈牙利犹太人开始遭到驱逐时，威塞尔才14岁。他的家乡锡盖特当时已被匈牙利占领，这个镇子的犹太居民被用那种惯常的羞辱方式装进货车，转运到奥斯维辛。在那里，他看到他的母亲和妹妹被送进了毒气室。后来，他的父亲被转运到布痕瓦尔德时死去。

威塞尔坐在奥斯维辛留下的灰烬之上，那里的风暴和烈焰曾恐吓过他的生活。所有的东西都被毁灭了，他的家庭被消灭了，他的姐妹中还有两个活着，但他当时并不知道。他无家可归，没有祖国，甚至他作为一个人的身份也成问题—他当时是A7713号囚犯，他如同一艘沉船上的水手，站在燃烧过的海岸上，没有希望，没有未来。只有赤裸露的记忆保留着。

威塞尔在死亡营中的时光于1945年春天在布痕瓦尔德结束，囚徒们被美国军队所解放。与一组其他犹太儿童一样，他被送到法国，他在法国的逗留半是恢复健康，半是学习。

威塞尔活了下来，他终于明白活下去的背后还有着一个目的：他要成为一个证人，一个传递叙述所发生的一切的人。这样死者将不会白死，或者将会汲取教训。

威塞尔保持了十年的沉默。1958年他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夜晚》，这是他集中营经历的回忆。“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必须记录下每个故事、每次遭遇。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必须作为目击者。这也是那些死

者的愿望，死者的遗愿”，威塞尔谈及他的写作初衷时说。

威塞尔成为一个讲述犹太人和人类在大屠杀中所受苦难的著名演讲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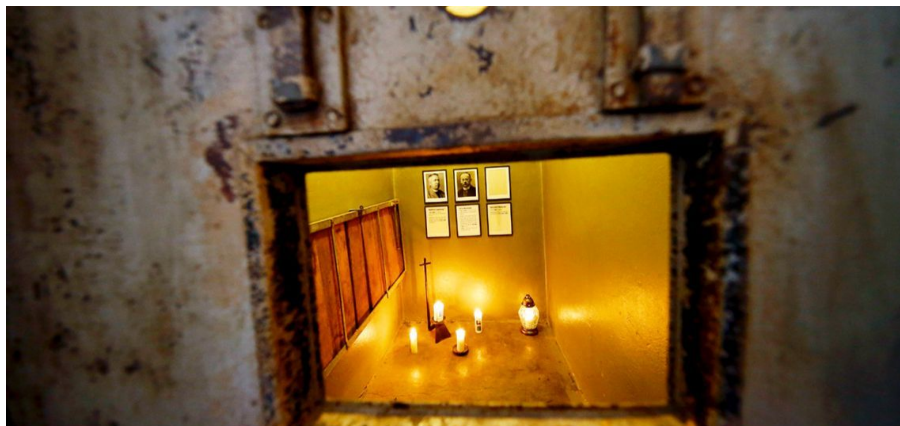
1982年，威塞尔出版包括《黑夜的遗产：伊利·威塞尔作品集》，《走出沉默王国》在内的26部篇幅巨大的书，他的著作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威塞尔在加入美国籍后担任纽约州立大学的名誉教授，此外还任波士顿大学人文学教授。他是美国总统倡议发起的美国大屠杀委员会的主席。

从大屠杀经历中幸存下来的威塞尔成为一个“人类观念和宽广的人道主义的强有力的发言人。”1986年，威塞尔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该年12月的颁奖典礼仪式上，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埃吉尔·奥尔维克在演讲中说：“伊利·威塞尔不仅仅是一位幸存下来的人,他也体现着战胜者的精神,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他从惨烈的羞辱中爬出来,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精神领袖和向导中的一位。在一个世界上仍然存在着恐惧、压迫和种族歧视的时代，我们有这样的向导至关重要。”

威塞尔用自己毕生的心血尝试，尝试保持记忆鲜活，尝试与那些健忘者斗争。

“因为如果我们忘记，我们就有罪，如果我们忘记，我们就是帮凶。”

威塞尔尝试过，但这并不容易。因为在他周围的人们拒绝倾听，而那些倾听者也拒绝相信，那些相信了的人也不能理解。死亡营里的经历向人类的理解力提出了挑战。他没有放弃，如同人类的一个信使，他向世界传达大屠杀的真相，吁求世界公理和正义。“我发誓无论何时何地当人类遭受苦难和羞辱时，我永远也不会保持沉默。我们必须总是参与。中立只会帮助压迫者，永远也不会帮助受害者。沉默鼓励折磨者，永远不会鼓励受折磨者”，威塞尔说。



• 德国魏玛布亨瓦尔德集中营的囚室里，点着纪念的灯。供图/CFP



• 美国作家、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伊利·威塞尔（Elie WieseL），在华盛顿美国大屠杀纪念馆讲话。他是集中营的幸存者，曾在上图中的布亨瓦尔德生活。供图/东方IC



• 左图 2015年4月12日，波兰华沙，人们身着二战军服纪念卡廷大屠杀75周年。供图/Sipa



• 右图 2013年10月21日，白俄罗斯明斯克，民众参与明斯克犹太人大屠杀70周年纪念仪式。1941-1944年纳粹德国占领期间，白俄罗斯地区内有多达80万名犹太人被杀害。供图/东方IC

幸存者的恐惧

1945年 1 月，当苏联红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时，营内的幸存者仅有7000多人，其中包括130名儿童。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是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那些儿童中的一个，他称自己为“奥斯威辛灵魂的代言人”。1944年，凯尔泰斯14岁时被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后又转到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直到1945年被苏军解放。1946年开始记者生涯，1953年成为自由撰稿人，著有自传体小说《命运无常》以及《惨败》、《寻踪者》等，200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005年2月举办的柏林电影节上，一部匈牙利影片《命运无常》再一次使人们的目光聚集到凯尔泰斯身上。由他亲自改编的这部电影和小说一样，主题的表述令人感到震惊：集中营里也有幸福。“这是大屠杀神话的一个悖论。当我们谈起幸福的时候，读者根本无法想象，这是一种他无法理解的幸福。但是集中营里确实存在某种形式的幸福：当我们感受到一缕阳光的温暖，当一轮绚丽的朝阳出现在集中营的上空，这是一种植物性的幸福；能获准平躺下来，不被殴打；能获准吃饭，不感到饥饿难耐。”

《命运无常》是凯尔泰斯出版的自传小说，从构思到脱稿历经15年，1975年才得以出版。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柯韦什的犹太少年，

二战中被关进了集中营。在这个他无力抗拒，也无法改变命运的环境里，面对强权，面对生死，少年以独特的视角审视着周围的一切。对他来说，集中营也是人的生存空间，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一切本该如此。甚至还能感到片刻的愉悦。这样的描写，比起直接展示焚尸炉和堆积如山的尸骨更令人心悸，它的震撼之处在于，这个单纯的少年体验世界的方式：恐惧怎样一步一步地袭击他，而他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地适应这种恐惧，学着接受这个世界。

2005年4月，凯尔泰斯在接受法国《读书》杂志对其专访时说："集中营没有幸存者。我们都是集中营永久的囚徒。一个人要想活着离开集中营就必须穿过地狱。"

"我听到有人说我写'奥斯维辛'这个话题已经太迟，已经不合适宜；说我应该早讲这个话题，至少应该在十年以前云云，然而近来，我再次震惊地意识到，其实任何东西都引不起我真正的兴趣，唯有'奥斯维辛的神话'。只要我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总会想到奥斯威辛。无论我在思考什么，总要思考奥斯维辛。即便我所讲的（从表面上看）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实际讲的还是奥斯维辛。为什么说奥斯维辛是'创伤'？并不是因为六百万人惨遭屠杀，而是因为，六百万人在当时能够被屠杀；真正使人震惊的是什么？是对他们的屠杀吗？不是，是对他们死亡的漠然无知。那些不能从历史中发现更多东西的人会被遗弃，他们的民众也会被遗弃。"

凯尔泰斯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感谢奥斯维辛，而且还要感谢从奥斯威辛幸存下来的人。另外，也要感谢那些要求、甚至逼迫我们讲述一切的人，因为他们想听到、想知道奥斯维辛的所作所为。"

20世纪的中心事件

20世纪充满骇人听闻的历史，而现代人有幸生活在冷战结束的时代，告别铁幕，远离大规模的杀戮，如今人们更有能力以非暴力形式推进社会变革，以更文明的方式使国家更新。

然而对于已逝的历史的态度，反映一个国家的智识程度。波兰是个保护历史记忆的国度，在它的首都华沙，到处可见当年的战争遗迹。一堵墙，一条街道，一座教堂，包括市政大楼和民居，都能看到记载战争遗迹的铜制铭牌。

对战争的反省不只发生在被侵略国，也发生在发动侵略的国家。1971年10月，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该年度和平奖授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威利·勃兰特，以表彰他所制定的与德国战时敌方东欧实行和解

的政策。他代表德国人民，通过谈判，与苏联和波兰对话，其时世界注意到勃兰特访问华沙时面对受难者纪念碑下跪的动人场景。

2005年5月10日，位于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落成。纪念馆是为600万遭德国纳粹屠杀的犹太人所建。它由2711块水泥基座组成。这座纪念馆由美国建筑师彼得·艾斯曼设计，耗资约3500万美元，坐落于柏林市中心靠近勃兰登堡门的地方，占地约2万平方米。纪念馆的地上部分是一个庞大的迷宫，由2711块灰色的巨形水泥基座组成，最高的水泥基座达4.7米，最低的不到半米。各个水泥基座以不同的角度微微倾斜，其间地面高低不平，凭吊者行走在其间如同行进在巨大的水泥基座的迷宫。德国犹太人联合会主席Paul Spiegel说：“此纪念碑为对抗遗忘最重要的象征。”柏林犹太博物馆（Judisches Musenm Berlin）位于柏林第五大道和92街交界处，是犹太人历史与生活的纪录，博物馆对20世纪“大屠杀”的历史也多有呈现，它使人们穿越时间进入历史的烟尘之中。

“大屠杀是20世纪的中心事件，也许也是所有世纪的。”

以色列作家伊戈尔·施瓦茨旅行时，都要带着从集中营焚尸炉取来的石块。一个赭色硬牛皮缝制的矩形小包。包很精美。打开里边是一个银色的锡质首饰盒，但盒里放着的不是首饰，而是一块从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的焚尸炉上抠下来的硬币大小的红色石块。施瓦茨的四位祖父母都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随着焚尸炉的火焰成为灰烬。施瓦茨的父母当时还小，和成千上万的儿童一起，被关在集中营阴暗的监牢里，战后获救。

1954年施瓦茨生于以色列，他是希伯来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本·古里安大学犹太和以色列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和希伯来文学系主任。施瓦茨的父母都是匈牙利人，在布加勒斯特被捕。父亲先被关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战争快要结束时又被送往德国达豪集中营。母亲也一样，14岁就被关到集中营里。集中营解放以后，他们结婚了。但25岁以前，施瓦茨很少关注大屠杀历史，从来没看过大屠杀电影。“在我的家里，父母亲很少提集中营的事，最要命的是我也不想听，因为我们生长在一个新的国家，我们应该强悍幸福地生活，我一点也不想听关于大屠杀的事情，对我来说那些事情非常不愉快。后来我父母去世了，他们经历的大屠杀历史我了解得就更少了。”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就有否定大屠杀历史的潮流，诸如大屠杀从来没有发生过、杀人者从来没有杀人、牺牲者也没有牺牲。对于这样的言论，施瓦茨表达他的质疑：“是我把我的祖父母杀害了吗？

是我把他们放在焚尸炉里吗？是我把我的父母在儿童时期就关进集中营里吗？没有大屠杀，当年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300万人哪儿去了？那些关在别的集中营里的几百万人哪儿去了？这些人为什么都消失了？”

施瓦茨在接受访问时说：“苦难的历史会使人对任何东西都不相信，怀疑一切，也仇恨一切。没有奥斯维辛的经历，一个人建立自己的生活就很容易。但是有了这一切以后，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艰难，他们的一生都将带着这种灾难的烙印。这种经历是一场摆脱不掉的噩梦。我觉得，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生活在噩梦里的国家，没有一刻和平。噩梦，在思想中，又在现实里。”

如今施瓦茨是“大屠杀文化”的研究者，这个工作持续使他的思想发生改变的是1973年爆发的赎罪日战争。18岁时他到军队服役，参加了那次战争，他的许多朋友在战争中死去，但他们并没有打赢。在以前的战争中，以色列人很容易就战胜了阿拉伯人，但赎罪日战争基本上是失败的。这场战争让他感受到了二战时期大屠杀牺牲者的痛苦。这灾难促使他反省战争和大屠杀带给人类的影响。施瓦茨的研究并不孤独，如今“大屠杀历史”已经成为世界性课 题。

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奥斯维辛集中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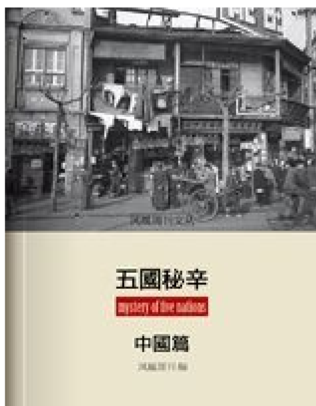
2005年11月1日，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2006年1月26日，第61届联合国大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决议，谴责任何否定纳粹大屠杀历史事实的做法。决议表示“毫无保留地谴责任何否定纳粹大屠杀的做法”，“要求所有成员国毫无保留地拒绝任何全盘否定或部分否定纳粹大屠杀历史事实的做法”。



• 位于柏林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巨型水泥墩丛林，能让参观者体会到70年前的孤独与无望。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博物馆为德国所建，告诫德国民众牢记纳粹暴政和苦难，决不让纳粹罪恶重演。供图/东方IC

五国秘辛系列其他篇





五國秘辛

mystery of five nations

韓國篇



五國秘辛

mystery of five nations

日本篇



五國秘辛

mystery of five nations

蘇聯篇



五國秘辛

mystery of five nations

韓國篇

凤凰周刊 编

Table of Contents

朴槿惠之父朴正熙遇刺之谜

电影《暗杀》背后的韩国抗战史

洛杉矶种族暴乱中的韩裔

解密韩国特种部队

韩国慰安妇海外宣传战

版权信息

五国秘辛·韩国篇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凤凰周刊》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2016©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2016

本书版权为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所有。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TCFP-N00007211-20160304

最后修订：2016年08月09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朴槿惠之父朴正熙遇刺之谜

遇刺身亡之前，朴正熙曾经遭遇过两次暗杀却毫发未损，最后反而是自己的亲信金载圭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文 / 巫解

2013年2月25日，韩国总统府邸青瓦台迎来了它的新主人，新当选的总统朴槿惠。朴槿惠对于青瓦台并不陌生，9岁时她第一次走进这座典雅的建筑，度过了18年的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

期间，她失去了双亲。1979年11月21日，27岁的朴槿惠怀着晦暗的心情搬离了青瓦台。约一个月前，她的父亲，曾经连续担任五届总统的朴正熙，在宫井洞韩国中央情报部的二楼餐厅遇刺身亡。她的母亲陆英修，死于早前的另一次暗杀。

在韩国，朴正熙是一位富于争议的前总统。他出身于军人，通过发动军事政变登上政治舞台，连续统治韩国长达18年之久。在朴正熙执掌韩国的18年间，韩国以“经济高速增长”著称于世，他一手缔造了经济增长的“汉江奇迹”。

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时，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100美元；到他遇刺身亡的1979年，这个数字已经被刷新为1745美元。2004年6月，韩国盖洛普公司做了一次名为“韩国人最喜欢的历届总统”的调查，朴正熙以48%的支持率名列榜首。

刺杀朴正熙的不是别人，是跟随他多年的铁杆亲信——时任中央情报部部长的金载圭。金载圭为什么要杀朴正熙？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的韩国社会又发生了什么？朴正熙18年的总统之路是如何铸就的？

最后的晚餐

1979年10月26日下午5点多，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又稍稍整理了一下摞成堆的材料，正准备下班。对他来说，这本是普通的一天，他也正在普通地度过着。突然，秘书进来通知他，刚刚接到电话，朴正熙总统要前来和他共进晚餐。

金载圭眉头略微一皱，让秘书在二楼的餐厅安排了一个房间。此时，他知道，这原本普通的一天可能要起变化了。

6点5分，朴正熙的专车开到了中央情报部的门口。金载圭早就等候

在那里。但金载圭迎接到的，不仅是总统，还有一个他厌恶的人——总统的卫队长车智澈。

金载圭和车智澈的矛盾由来已久。



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后，参加他葬礼的女儿朴槿惠。

当时，朴正熙身边有四大心腹，分别是陆军参谋部参谋总长郑升和、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总统秘书室秘书长金桂元、中央警卫室总统卫队长车智澈。这四大心腹掌控的四个部门，各司其职，共同支撑着朴正熙的统治。

但最近一段时间，车智澈却异军突起，在朴正熙面前的地位不断攀升，把其他三人远远抛在了身后。原本，车智澈只是负责总统安全工作的卫队长，但随着朴正熙的宠信，他插手的领域越来越多，以致有时金载圭想见朴正熙一面，都会因为车智澈的从中作梗而不得。更过分的是，车智澈还经常在朴正熙面前说金载圭的坏话。金载圭在厌恶车智澈之余，对于自己部长的位子也产生了危机感，于是对朴正熙也有了怨言，抱怨他对车智澈偏听偏信。

朴正熙对于金、车二人的芥蒂早就有所耳闻，他也一直想找机会帮二人解开这个疙瘩。这次晚宴，正是个好机会。但事与愿违，谁都没想到事态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奔而去。

当晚，在座的还有总统秘书长金桂元。他和金载圭一样，也对车智澈有所不满。不过，与金载圭不同的是，他一直引而不发。

一开始，大家推杯换盏，气氛还算融洽，但很快，傲慢的车智澈就把话题引到了正在爆发的工人游行上面。

由于国际油价暴涨，韩国国内物价随之飞涨，通货膨胀严重。经济恶化的后果是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失业严重。十天前，釜山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不久后，马山也发生了此类事件。朴正熙派金载圭镇压，但金载圭对此似乎并不热心。他是政府中的“温和派”，希望以劝诱为主，对于“强硬派”车智澈所主张的镇压颇有微词。因此，示威游行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车智澈的话，点到了金载圭的痛处，也引发了朴正熙对金载圭的不满。很快，酒宴变成了对金载圭的批判大会。看着车智澈不依不饶的嘴脸和朴正熙满脸的不快，金载圭怒火升腾，只是没有发作。

7点左右，金载圭借故离席，来到二楼的办公室，从抽屉里取出一支西德造的手枪，这支手枪可以连续发射七颗子弹。他掂了掂手枪，把它插进了裤袋。回到酒席之前，他对门口外自己的亲信说，“一会儿屋里枪响，你们就把外面的总统卫兵全都干掉。”

回到酒席之上，金载圭像个没事儿人一样继续吃吃喝喝，刚才的不快似乎一扫而光。但正当大家酒酣脑热之际，他突然拔枪而起，对准车智澈，同时朝着朴正熙说，“阁下，您带着这样的废物能把政治搞好吗？”





由韩国新国家党提供给路透社的照片，一张不明拍摄年份的朴槿惠与朴正熙合影。

话音刚落，枪声响起。由于车智澈的闪躲，子弹没有击中他的要害，但把他的手腕打穿了。他急忙往外逃跑。朴正熙刚要发作，金载圭枪口转向，朝着他的胸口就是一枪。朴正熙没有任何躲闪，应声倒地。

此时，门外的总统卫兵也全被干掉。

金载圭又追上逃窜的车智澈，对着他的胸口连发两枪。这一次，车智澈没能躲过，身子一软倒在了血泊中。解决掉车智澈后，金载圭返回餐厅，看到朴正熙尚未断气，他一不做二不休，对着朴正熙的脑袋又补

了一枪。

整个过程，仅仅几分钟时间。在座的总统秘书长金桂元，显然不是金载圭的枪杀目标，因此他得以安然逃脱。

事后，金载圭很快被捕。

难解之谜

朴正熙遇刺后的第二天凌晨，韩国政府立即宣布：除观光胜地济州岛外，全国实施戒严。戒严司令正是朴正熙生前的亲信之一，陆军参谋部参谋总长郑升和。控制住局面后，戒严司令部立即成立了一个“调查总部”，专门负责调查朴正熙遇刺事件。但这个部门并没有调查出事件的最终真相，仅仅在发布了三份前后矛盾的报告后，调查行动就戛然而止，从此杳无音讯。

这三份报告，为刺杀事件找到了三个不同的“真相”。但不能确定哪个才是真正的“真相”，又或者，真相其实并不在这三份报告之中。

第一份报告称，朴正熙被误杀。金载圭开枪的原因是，他与车智澈发生了偶然的争吵，情急之中，他掏枪射击，杀死了车智澈，同时误杀了朴正熙。

第二份报告则显示，金载圭预谋已久。他感到自己已经不被朴正熙信任，情报部长的位子岌岌可危，于是杀了他。

第三份报告又换了说法：金载圭杀死朴正熙是企图发动政变，推翻朴正熙的政权。

这三份各说各话的报告，除了一致认为凶手是金载圭之外，就没有任何交集了。

有一种说法认为，是由于朴正熙打算撤掉金载圭中央情报部部长的位子，金载圭才铤而走险的。据说，之前金载圭拿到了一盘录音带，这盘录音带是朴正熙和车智澈在车上的对话。录音显示，车智澈向朴正熙报告，金载圭在总统官邸青瓦台秘密安设了窃听装置，朴正熙听闻后勃然大怒，声称要撤掉金载圭。

这个说法似乎暗合了第二份报告的内容。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人支持了金载圭的行动。因为当时的美国政府对于朴正熙的独裁政治十分不满，希望他改变执政方式，但朴正熙坚持己见，绝不改弦更张。而就在金载圭刺杀朴正熙的前几天，美国中

央情报局驻韩国分局局长恰好与他有过一次会面。这种巧合给了人们广阔的猜测空间。金载圭在受审时也声称，“我的身后有美国”。但这一切，也仅仅是猜测，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证明美国人卷入了这次刺杀行动。

在这种种猜测之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朴正熙的统治在当时确实遇到了危机。如前面所述，经济的滑坡以及朴正熙高压的执政方式，引发了民众的不满，釜山等地先后爆发了学生、工人示威游行。而反对党也趁机快速崛起，与示威群众一起，成为反对朴正熙的强大力量。

面对外部的巨大压力，朴正熙的心腹集团也发生了分化。其中，陆军参谋部参谋总长郑升和、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总统秘书室秘书长金桂元，都主张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反对派，只有中央警卫室总统卫队长车智澈坚决支持朴正熙，主张强硬镇压。这种分化，也可看做朴正熙遇刺的一个隐秘注脚。

斯人已逝，真相难寻。耐人寻味的是，就在遇刺的两个多月之前，朴正熙曾在青瓦台的办公室里写下一幅中国书法赠给他的女儿朴槿惠。

这幅书法写的是：身与名俱没，江河万古流。

另外两次遇刺

其实，朴正熙在遇刺身亡之前，还曾经遭遇过两次暗杀。不过，诡异的是，这两次来自外部力量的刺杀并没有伤到朴正熙的一根毫毛，反而是自己的亲信金载圭，给了他致命的一击。这让人唏嘘不已。

朴正熙遭遇的第一次刺杀发生在1968年1月21日。

当时，朝鲜与韩国之间局势紧张，双方都展开了疯狂的间谍与刺杀行动。为了刺杀朴正熙，朝鲜政府在第124军部队的第六基地，秘密训练了一支精锐的特工部队，人数仅有31人。为了达到实战训练的效果，朝鲜人还在元山港复制了一处与韩国总统府邸青瓦台完全相同的建筑，让31名特工在里面反复模拟刺杀行动。

1968年1月21日深夜，31名特工队员秘密穿过重重防御的非军事区，经过长达五天的山中跋涉，来到了距离青瓦台仅仅几百米的汉城（今首尔）市北岳山路。

但就在此时，身穿韩国军服、乔装成韩国军人的朝鲜特工却露出了马脚。让他们暴露身份的，是他们脚上穿的黑色胶鞋。因为这种胶鞋并不是韩国军人的装备，而是朝鲜军人的标配。韩国的巡逻警察发现这个

秘密后，立即上前盘问，朝鲜特工感觉暴露后，立即端起冲锋枪开火。恰好此时有一辆公共汽车经过，朝鲜特工就向汽车投掷了手榴弹，致使多人死伤，场面迅速混乱。

很快，后援的大队韩国军警赶到，双方发生激烈枪战。最终，击毙28人，生擒1人，其余两人成功逃脱。在逃脱的两人中，其中一人腹部中弹，但他用手将流出体外的肠子塞回体内，然后用手捂住伤口，竟然躲过韩军数万人的重重围捕，成功逃回了朝鲜。这个人，就是现任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的朴载庆。

朴正熙的第二次遇刺发生在1974年8月15日。正是在这次刺杀中，朴正熙的夫人，也就是朴槿惠的母亲陆英修，不幸中弹身亡。

这一天，是韩国的光复节。光复节是韩国的国庆日，纪念1945年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当时，在汉城国家剧院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朴正熙正在发表演讲，忽然，侨居日本的韩国人文世光从人群中起身，沿着通道快速跑向主席台，朝着朴正熙拔枪射击。但子弹射偏了，毫发无损的朴正熙迅速躲到了讲台后面。文世光继续射击，这一次，子弹击中了主席台上的总统夫人陆英修。总统的随从人员立即抬起陆英修，将她送往医院。不幸的是，经过近6个小时的抢救，陆英修还是不治身亡。

之后，文世光被总统警卫擒住。而朴正熙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坚持把演讲讲完，然后才赶往夫人所在的医院，一直陪在她的身边，直至她离世。

陆英修去世后，朴正熙并没有续弦，在一些必要的社交场合下，他选择让自己的女儿朴槿惠代行“第一夫人”的部分职责。

编辑 段宇宏

猜你喜欢

《凤凰周刊》文丛系列

《权力之海——全球政治人物脸谱》

全套两册



点此阅读

小国的愤怒

电影《暗杀》背后的韩国抗战史

文/ 王戡

化装成新娘的韩国独立军战士，联合伪装成日军少尉的雇佣枪手，在婚礼上打死日本将军和卖国商人，完成了暗杀任务。2015年9月中旬，以1930年代抗日斗争为背景的韩国电影《暗杀》在中国大陆上映，夹在《碟中谍5》和《港》两部十亿级大片之间，虽然票房平平，却意外获得不俗的口碑。

《暗杀》在表面上是一部用全智贤、李政宰、河正宇等一线明星支撑起来的动作大片，但在华丽表象的背后，是对角色塑造和背景设定的精雕细琢。剧中主角往返东北、上海和汉城，并非只是为了渲染场面的商业化噱头，而是对当年韩人抗日志士经历的再现。



“你以为你是李奉昌、尹奉吉吗？”

虹口公园是上海日本租界的地标，这一天尤其热闹。日军第9师团等部在公园西侧的体育场举行阅兵仪式，一队队戎装整齐的军人陆续通过司令台，接受在沪日本军政要员的检阅。前来观礼的日本侨民摩肩接踵、人声鼎沸。

接近正午，分列式进行完毕，全场正齐唱日本国歌。突然，一个“行军水壶形的怪物”被扔到了台上，仅仅两三秒后，爆炸掀翻了司令台，不少人被抛到空中，又坠落地面。方才披挂整齐的大人物变成衣衫不整的血人，有的被炸断了腿，有的满脸血污，还有的已经停止呼吸。台下的军警很快抓住了行凶者——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他被打昏之前一直在喊着什么，但是没有人能听得懂。

这不是电影中的场面，而是发生在1932年4月29日的一次袭击，一

场韩国抗日志士对日本军政要员的暗杀。执行者是25岁的尹奉吉，策划者则是流亡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金九。

导演崔东勋将《暗杀》故事设定在虹口公园事件一年后，金九和另一位韩人抗日运动元勋金元凤联手，派遣安沃允、黄德三和秋尚沃三人行刺朝鲜驻屯军司令官川口真守。历史上，金九确曾派遣李德柱等人回国刺杀日本朝鲜总督，但未成功。时任朝鲜总督宇垣一成日后官至首相，朝鲜军司令官川岛义之中将也在一年多后升任陆军大臣。



现实中，尹奉吉的成绩比屏幕虚构故事更加出色。当着数千日本军人和侨民的面，年初刚刚指挥上海之役取得胜利的白川义则大将，以及上海居留民团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河端贞次被炸身亡，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和驻华公使重光葵各丢了一条腿，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失去了一个眼球。

影片中处处可见这场暗杀的影响。金九用于藏钥匙的照片，便是尹奉吉行动前拍摄的遗照。安沃允等三人出发前，也像尹奉吉一样在太极旗前悬挂誓言、手持炸弹拍照留影。故事进展到1945年日本投降，外相重光葵登上“密苏里”舰签署投降文书时，导演还让观看新闻影片的韩人指出“他在上海被爱国志士尹奉吉投掷的炸弹炸伤，因此拖着伤残的腿登上了‘密苏里’号战舰”。

这不是韩人在1932年实施的第一次暗杀。影片中，雇佣杀手“夏威夷手枪”决定参与暗杀川口时，他的助手问道“少爷你以为你是李奉昌、尹奉吉吗？”排在尹奉吉之前的李奉昌，便是另一场暗杀的主角，他的目

标是日本天皇裕仁。

1932年1月8日中午，裕仁一行在东京代代木练兵场阅兵完毕、返回皇宫途中，于樱田门外遭到袭击。两枚手榴弹在队列前部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的马车左后轮处爆炸，一名近卫骑兵受伤。掷弹者正是李奉昌，他发现目标失误，抽出随身携带的太极旗挥舞，高呼着“大韩独立万岁”在现场被捕。



李奉昌



尹奉吉

这场暗杀的策划者也是金九。李奉昌曾给日本人做养子，但始终怀抱光复祖国之心。1930年底，他到上海参加反日运动，扬言“我去年在

东京时，碰到天皇去扫墓，他们让行人跪伏在地。我伏在路边就想，这时候如果我有一颗炸弹，一定可以杀死他”。其他志士因他流利的日语和日本式的生活习惯深感怀疑，只有金九相信他的真心，赞同他的壮志，并准备费用和炸弹助他踏上征途。事实证明，金九没有看走眼。

李奉昌、尹奉吉之外，金九还曾派遣崔兴植、柳相根等人刺杀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白贞基、元心昌等人也曾筹划刺杀接替重光葵的驻华公使有吉明，都以失败告终。

韩人为何在1932年之后屡屡组织暗杀?金九有过说明，“当时日寇破坏中韩两个民族间的感情，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日军利用侨居中国东北的朝鲜人与当地人的冲突，强占当地人土地，并扬言朝鲜人被杀），于是在朝鲜发生了屠杀，仁川、平壤、汉城、元山等地，一些无赖韩人受日本人唆使，见中国人就杀”。加上“九·一八”事变后一批韩籍浪人与日本人狼狈为奸、四处作恶，导致中国各界对韩人都抱有恶感，为了提振精神、恢复名誉，金九才决定组织暗杀和破坏工作。虹口公园事件后，金九投书上海各大报，宣称“余之武器为几杆手枪与几枚炸弹。余继续奋斗，并在余国未恢复前决不终止”。

出发之前，李奉昌特意前往临时政府成员安恭根的家中宣誓，安恭根是1909年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最小的弟弟。对深知自己将一去不归的刺客而言，能对着先烈安重根的家人宣誓，是此生最大的荣誉。然而无论成败，这些刺客之后的命运都和安重根相同，被逮捕、审判、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至于全身而退或者痛快地当场战死，只是电影中的情景。

抗日武装斗争的兴落

韩人抗日的方式并非只有暗杀。

影片女主角安沃允是“李青天韩国独立军第3小队的狙击手”，助手“速射炮”秋尚沃则是“新兴武官学校”最后一届毕业生。这些组织，代表了韩人抗日运动的另一面——武装斗争。

李青天在1940年9月出任中国政府支持的“韩国光复军”总司令后，曾撰文称“韩国光复军这个名称，骤看起来，好像是初次听见的新名词。其实，自1907年8月1日韩国国防军被日寇强迫解散之后，韩人对之称为义兵运动，也叫光复运动”，以此表示光复军的历史源远流长。安重根便自称义兵中将，但手下没有半个兵。

义兵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日军镇压，使韩人抗日斗争的重心转移到

了中国东北地区。“新兴武官学校”源自1912年设立于吉林柳河韩人聚居地的“新兴讲习所”，1920年4月改为武官学校。该校有2100多名毕业生，抛弃家业从事抗日运动的青年，像影片中秋尚沃一样写血书宣誓的不在少数。李青天曾任教官、校长，金元凤也是该校的早期学生。

《暗杀》中提到“金佐镇将军取得青山里战役的胜利”，以及之后日军的屠杀都发生在1920年。这年夏天，活动在中韩边境地区的韩人抗日武装已经有十多支队伍，共2900多人，拥有2600多支枪，频繁对中韩边境日本军政机构发动袭击。

韩人的活动自然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1920年10月，日本驻珲春领事馆遭到土匪袭击，11名日本人被杀。日军声称有“不逞韩人武装”参与其中，无视中国政府的抗议，出兵中韩边境地区“清剿”。青山里战役，便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抵抗战斗的总称。

据韩人回忆，从10月20日到26日，韩人抗日武装毙伤日军1500多人。这个数字恐怕过于夸大，毕竟缴获只有“机枪4挺、步枪53支、马枪31支、弹药5000发”而已。而且，7天的战斗未能击退日军，韩人聚居地遭到血洗。如影片提到，“27天里就有3769条生命死去”。在珲春、延吉、和龙、汪清四县，5000人被逮捕，近3000所房屋、学校和教堂被烧毁。

叛徒廉硕晋在影片中痛陈，“韩国独立党、韩国革命党、朝鲜革命党、义烈团、高丽共产党，三十几个独立团体斗来争去，各自都有不同的现金来源，所以没法联合起来，全都是垃圾”。党团组织尚且如此，涉及人员、枪械的武装团体更是复杂。

1920年12日，北满的十多支抗日队伍曾联合组建“大韩独立军团”。一年后便瓦解分裂。1922年8月，南满的8个团体也组成了“统一府”，很快又分裂成义军府、大韩军民府。1920年代中期，形成“参议府”、“正义府”、“新民府”三个军政集团，并且承认服从上海临时政府的指挥，但未及商议统一又各自分裂。安沃允所在的韩国独立军，是从新民府分裂出来的“革新议会”经过多次演变形成的。

日军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占领中国东北全境，直接出手打击韩人抗日武装。很多韩人参加抗日义勇军与中国兄弟并肩作战。艰苦的战斗中，也有人像廉硕晋一样丧失信心，投降日军，其中还包括“朝鲜革命军”的总司令金浩石。1940年，崔庸健、金日成等人率部随抗联第一路军退入苏联，标志着韩人武装抗日斗争的结束。

两位光复运动巨头的恩怨

2015年9月4日，前一天还在北京参加阅兵的韩国总统朴槿惠抵达上海，出席“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重新开放仪式”，并在致辞中感谢上海市政府为此做出的努力。对中国观众而言，“上海有个韩国临时政府”并不是新鲜事，十年前红遍中国的韩剧《浪漫满屋》开篇，被骗到上海旅游的女主角宋慧乔便专门参观了这里。

《暗杀》中，金元凤在杭州找到了临时政府和金九，并非导演搞错了地方。虹口公园事件后，临时政府为躲避日本人报复，先后在杭州、镇江和南京之间迁徙。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随中国国民政府迁往重庆。



金九

金九和金元凤是韩人反日斗争的代表人物，两人相差22岁，却有颇为相似的早年经历。他们都出身农家，在青年时代就选择为祖国摆脱日本欺凌侵略而斗争，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暗杀的道路。

青年时代的金九并非影片中斯文温厚的老人。据他自述，早在1897年21岁时，他就为了报日本人杀害国王李熙的王妃闵妃之仇，截杀了日军中尉田土壤亮，后来又因参与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策划暗杀朝鲜总督寺内寿一等事多次坐牢，在1919年逃到了中国上海。同年，21岁的金元凤在中国吉林组织了以暗杀为手段的反日团体“朝鲜义烈团”，九年间实施了23次暗杀活动，但收效甚微。

1920年代后期，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金九所在的上海临时政府靠向各地韩人募捐、发行公债和征收“忠义金”、“爱国金”维持，经常陷入困境。连被选为临时政府大总统的李承晚，也以前往美国华盛顿参加

太平洋会议的名义一走了之。

金九原任临时政府警务局长，负责警务和锄奸任务，据他回忆，“当时对于犯罪者的处分，不是劝诫释放，就是死刑而已”。他的亲信警卫韩泰奎曾受日本人收买提供情报，之后杀死试图举报的情人逃回韩国，颇有几分影片中警卫队长廉硕晋的影子。

因为前辈的退缩和放弃，信念坚定的金九逐渐成为内务总长、国务领乃至政府主席。但没钱的时候，只能在上海租界担任公共电汽车查票员的韩人同胞家中轮换着吃饭，晚上睡在临时政府的办公室里，自诩为“乞丐中的高级乞丐”。直到虹口公园事件，临时政府才引起国民党方面的重视而得到了支持和资助。

金元凤和中国方面走得更近。1926年，深感暗杀徒劳无功的金元凤停止了义烈团的活动，带领18名同志前往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军官。基于这一层关系，他在1930年代和黄埔系秘密组织“力行社”搭上关系。在滕杰、干国勋等力行社骨干的支持下，金元凤以军委会干部训练班的名义开办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培养一百多名韩籍学生，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朝鲜民族革命党”，成为韩人青年中的一杆旗帜。

国民党中人评价，金元凤“坚忍沉毅、不怕挫折、不怕困难、埋头苦干精神为其他韩国革命者所望尘莫及”，但是“为人有大志而无远见，对人好施小惠以求取其政治目的……往往因弄小手段而忘却目的”。同一时期，金元凤与中共也有接触，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于1937年一度加入朝鲜共产党。

《暗杀》安排金九和金元凤在1933年共同谋划暗杀，实际上两人要到1939年才携手行动。这年5月，二人发表共同宣言，承认“我们二人一直在海外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不间断的斗争”，但“未能做到团结统一”，“从目前中华民族为取得最后胜利而实现民族大团结的教训中，痛感我们过去所犯的种种过错”，宣布“为了完成神圣的朝鲜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今后我们要齐心协力”。



2015年9月4日，韩国总统朴槿惠访问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出席旧址重新开放仪式。

事违人愿，两人并未因为宣言而立即合作。金元凤的麾下，是黄埔系协助组建的“朝鲜义勇队”，在前线配合中国军队进行对敌宣传、情报收集和俘虏审讯。金九背后有国民党中央党部支持，组织了“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却因军方阻碍而无法上前线。金九希望明确临时政府所属的韩国光复军，是与中国军队平等的同盟军。金元凤却率先表示，朝鲜义勇队是参加中国抗战的志愿军，使国民党有借口回绝金九的提案。

影片中，金元凤在日本投降后依然闷闷不乐，为的是祭奠死去的暗杀志士。历史上的他同样郁闷，原因却大不相同。1941年，金元凤下令将义勇队主力开赴华北，一是为了回避国民党关于义勇队与光复军合并的要求；二是试图发动华北韩人加入以壮大实力。谁料，北上的义勇队与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组织的朝鲜青年抗日联合会融为一体，形成以八路军炮兵团长、韩人武亭为总司令的朝鲜义勇军。只剩下十几名队员和300多名家属的金元凤无力对抗金九，在国民党的强令下率部并入临时政府，担任光复军副总司令。

抗战胜利后，两人终于分道扬镳。金九回到汉城，因临时政府不被美方承认，选择以议会的方式继续从政。这位组织多次暗杀的老人陷入了命运的轮回，1949年6月24日，被一名反对他政治立场的陆军少尉暗杀。金元凤前往平壤加入了金日成政权，他的消失更具有时代色彩——1958年11月之后，政坛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被清洗了。

编辑 陈祥

猜你喜欢



点此阅读

洛杉矶种族暴乱中的韩裔

一件小事很快演变成种族骚乱，韩裔商店遭遇大规模劫掠，他们迅速武装起来自卫，直到国民警卫队赶到，短短几十个小时给“天使之城”蒙上巨大的阴影。

文 / 张安

1992年4月末，“天使之城”洛杉矶发生了一场大暴乱，短短数日，54人身亡，2328人受伤，1000多栋建筑被毁，财产损失达8亿多美元，从直升机上俯瞰整座城市，各处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仿佛正在经历一场战争。

暴乱起源于1991年3月3日深夜，25岁的黑人青年罗德尼·金因在加州210公路飙车而被警察追捕，在山路高速路与奥斯本大道交汇处，金被警察截了下来。高大、健壮的金下车后，没有乖乖接受检查，却借着酒劲甩倒四名警察，被电棍击倒后，又爬起来朝警察鲍威尔撞去。情急之下，鲍威尔抽出警棍，连同另外两名警察，凶狠地朝金打去，金被打翻在地，警察并没有住手，一直打到金求饶为止。

谁也不知道，这一切都被摄影爱好者乔治·霍利德偷拍了下来，次日，他将录像带送到电视台，电视台却将金拒捕的内容删去，留下了警察打人的片段。录像一经播出，全美各大电视台纷纷转播，公众怒不可遏。随后，4名警察被起诉。经过长达一年的审判，1992年4月29日下午3点，陪审团（共12人，其中白人有10名）宣布，并未发现警察劳伦斯·鲍威尔、西泰斯·库恩犯有攻击罪，他们二人连同另外两名警察被无罪释放。出人意料的判决激起了民愤，就连市长也批评判决不公。


1992年4月29日，洛杉矶街头，穿戴防暴装备的警察与愤怒的人群对峙。

没有警察的洛杉矶

谁也没有预料到一场大暴乱即将来临，“所有处于权威地位的人都认为会有一两个人被定罪，没人料到会成这样。”记者卢卡农说。混乱首先在最穷的南中央区发生了。

下午5点25分，在佛罗伦萨和诺曼底街相交处，有司机报案称遭到石头袭击。据时任《纽约时报》摄影师的巴特·巴塞罗尼奥讲：“我就把车停在这儿，然后步行走过那个拐角，当时警察正在逮捕肇事者。”他还回忆道：“我没想到现场一片混乱，一群警察正在和肇事者扭打，我数了一下，在这个十字路口大约有25名警察，在那边还停着14辆巡逻车。”

5点40分，警局局长达利尔·盖特宣布：“如果有市民扰乱治安，我们一定会干预。”

“这些人非常非常愤怒，地上到处都是石头和瓶子，我能听到人们在喊叫，我还听到一个人说，让他们全都挨枪子儿，现场情况相当可怕。”巴特回忆起那个可怕的下午时说道，他本人在试图驾车逃离这块愤怒之地时，被一块大石头砸碎汽车玻璃，砸伤了头部。

混乱迅速升级为骚乱，然而南中央区的警察却在此时撤退了，警队副队长迈克尔·莫林事后解释道：“我们没有防毒面罩、没有防弹背心，也没有头盔盾牌，更没有弹药，什么都没有。”警方组成了一条战斗防线，但却是在拿生命冒险，所以莫林命令警察们立即撤退。愤怒的市民对着开走的警车大声辱骂。

“也许从那个十字路口撤出来是个错误的决定，但在当时这也是唯一合理的选择，因为无论在人员上还是装备上，我们都没有准备好。”莫林说。没有了警察，南中央区彻底失控。

18点46分，卡车司机雷杰纳德·丹尼被截下，暴徒对他连踢带打，一名黑人青年甚至举起重物朝他头部猛砸去，致使他身受重伤倒地不起。“太可怕了，现场没有警察，他们不会来这儿，这是一场蓄意谋杀，快告诉洛杉矶警局，封锁佛罗伦萨大道和诺曼底大街！”当时的现场直播如此说道。

几个小时后，洛杉矶城变成了一片火海，佛蒙特、曼彻斯特等城区冒出滚滚浓烟，火光照亮了整个夜空。

抢劫到处都是，没有警察来管，这刺激了那些还待在家里的人。“许多人原本都是相当正派的人，但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你可以随便进出食品杂货店，偷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时，也就跟着参与进来。”盖特局长说道。毫无疑问，洛杉矶市的秩序已被大火烧得灰飞烟灭。

晚上8点钟，洛杉矶全城共接到15起火灾报告，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着火点又扩大到原先的30倍。然而，4名消防员却遭到枪击，身受重伤。

晚上10点钟，一直守在警局外围的愤怒群众，沿着大街走向了市政厅，沿途点燃了树木和警车。11点06分，市长布拉德利宣布洛杉矶市进入“紧急状态”。一夜之间，洛杉矶警局的警察从750人扩大到1000人，然而他们只是固守在警局门口。

“有很多人批评说，我们没有及时做好处理这个暴乱的准备。”盖特局长说，“我在1965年的瓦特斯暴乱后写了典型事例，以及应对骚乱的控制计划。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而且这份计划就其本身来说是很容易执行的，并且能够处理很多情况，但是在这次事件中，坦白地说，在初期，我们并没有按照计划行事。”

然而前警队队长莫林却认为计划太笼统了，“这本战术指南只是一份文件，在一些非常情况下会给你提供一些好的指导思想。”

针对莫林撤出南中央区一事，盖特说：“我感到震惊，我根本不相信洛杉矶警察部门不能对这种情况作出反应，真的无法相信。”



1992年**5**月**1**日，洛杉矶韩国人聚居区内，手持自动武器自卫的韩裔。

莫林解释说，“在那条街道上，我们缺乏计划，缺乏装备，缺乏援助，我们没得选。”

盖特指出，警察在撤退后并没有马上重组，“直到今天，那都是我见到过的执法部门做的最丢脸的事，我们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处理这件事。”

实际上，盖特本人也难辞其咎，他也承认了这一点。当晚6点30分，盖特正在参加一个政治活动，目的在于反对市长给予警局局长设定任职期限的提案，8点15分才返回总部，在乘坐直升机返回的途中，出现在他面前的洛杉矶已经是一片火海。“我不该去那儿，现在想想，真不该去那里。”盖特和市长也没有互通信息，事实上，暴乱发生后，俩人就再没说过话。布拉德利对媒体说：“不可以，我们不能容忍几个野蛮的警察去毒打一个守法公民”，他要求盖特下台，盖特拒绝下台。“从那刻起，我们之间的关系确实变得非常冷淡。”盖特回忆道。

没有融合的文化

在这场暴乱中，许多黑人店主在自家商店门前竖起木板，上面写着“黑人店铺”，这为他们避免了不少冲击。然而，韩国城遭受到了严重冲击，一些店铺被完全烧毁，一些店铺被彻底洗劫。

最初，有许多韩国移民躲进韩国城，之后，韩语广播电台召集志愿者保卫家园，驱逐暴徒，许多人被武装起来，他们手中持有各种各样的武器，小件儿有手枪、冲锋枪，大件儿有霰弹枪、半自动步枪。

韩国店主们，手持各种枪械，或在屋前巡逻，或在屋顶凝视那些冒着浓烟的街道。一名李姓店主对《洛杉矶时报》讲，他们为了驱散人群，朝天上和地下打了500发子弹，零星的射击不管用。

在一家名叫“奥林匹克”的折扣店前，大约有28名韩国人护卫，每个人手里都持枪，屋顶有一人怀里抱着冲锋枪在来回走动，门前不远处还陈着一长排铁栅栏，侧翼则横停着汽车作围墙。记者问到其中一名保卫者，他说，店主并不在这里，在这里的仅是一些朋友和警察（韩裔警察）。记者又问，你们有什么困难吗？他微笑地答道：“NO,we have not any trouble all.”

然而在韩国城里的一条街上，许多店铺已被抢得面目全非，《目击者新闻》的记者追着采访这些不同肤色、不同性别却同样满抱“赃物”的抢劫者，有人简单答两句，有人一口一个不知道。在一家名叫“Auties House”的店前，两名持手枪的韩国人保护着这片区域，他们毫无畏惧，神情镇定，主动出击，甚至追着暴徒开枪，手枪啪啪地响个不停，没有朝天打，没有朝地打，他们不是在吓唬人。而躲在他们身后的人，无论白人还是韩裔，皆因为他们的勇敢而安然无恙。

事后调查，韩国店主们共打死4名抢劫者，尽最大能力保卫了家园，他们一直坚守到国民警卫队到来。在国民警卫队进城后，另有一些韩国移民自发组织起来，在街上和平游行，高呼：“不要暴力！不要暴力！”

作为克林顿总统的种族问题顾问，第二代韩裔美国人安杰拉认为，在南中央区，黑人和韩国人在文化上有很大不同，她讲道：“在这个国家，说话时应该直视对方的眼睛，尤其是当你不会说英语的时候。”

当韩国店主认为顾客行为不端时，他们基本上会采取两种方式对待，忽略顾客，或者怒气冲冲。韩国店主认为忽视行为不端的非裔顾客是合理的，他们会想：“一个人如果不尊重我，那么他就是不值得给予关注的。”由于韩国店主非常重视顾客的行为端正与否，有时候，他们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商人，他们会直接和顾客对抗。曾有店主说：“如果顾客说脏话，不尊重我，那我怎么能微笑面对他呢？”

被韩国店主完全忽视，这对于住在南中央区的非裔顾客来说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他们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受害者”意识。被他人忽视，

尤其是被商人，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他们在韩国店铺前抗议："这不是文化差异，微笑是通用的！"、"他们在这儿叫我们'黑鬼'！"

进入90年代，韩国人在南中央区已拥有超过1000家店铺，然而这里的失业率却居高不下，"他们会想，这些人是谁，他们甚至不会说英语，但却拥有自己的商店，他们在这里做生意，却把我们看作低等公民。"安杰拉说。

"韩国人在这里做生意，他们从来不会在社区雇人，而是从他们本国雇人，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连英语也不会说，他们的文化也和黑人文化不一样，黑人觉得受到威胁，并感到歧视。"当地黑人牧师塞西尔·莫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他还提到："过去在黑人和韩国人沟通这方面，人们所作出的努力非常少，彼此之间成见很深。"

就在罗德尼·金被打前不久，黑人女孩儿娜塔莎·哈林斯因在韩国店铺偷橙汁被发现，与韩裔女店主起了口角，随后被开枪射杀，1991年10月，这名女店主被判故意杀人罪，但后来又得到缓期执行，这引起非裔的强烈不满。

"人们说娜塔莎的案子不公正，我们忍了，现在就看看金的案子会是什么结果。"安杰拉描述道。"现在看看律师会怎么辩护，警察还会怎么辩护，从播出的录像来看，这回对白人警察判罪是理所应当的，因此人们会想，我们终于会看到某种程度上的正义了。"牧师讲道。

就这样，当陪审团宣布警察无罪时，人们被彻底激怒了，韩国城首当其冲。暴乱中，1800多家韩国店铺遭到抢掠，经济损失达4亿多美元，有1名韩国人在与抢劫者的枪战中被打死。

警察应对不力和种族矛盾并非是洛杉矶暴乱发生的全部原因，媒体的煽风点火、警局里的种族比例，同样是重要因素。

就2011年8月伦敦发生的大骚乱来看，洛杉矶暴乱的经验教训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编辑 段宇宏

猜你喜欢



点此阅读

真实的“太阳后裔”

解密韩国特种部队

特约撰稿／ 田聿

近来，军事题材的韩剧《太阳的后裔》风靡中国，成为一部“现象级”文化作品，许多大陆观众为剧中帅气的韩国特种兵所倾倒。该剧虚构了一个名为OURCQ的国家，由于陷入内乱，在该国政府的申请下，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进驻，其中韩国作为重要的出兵国，派遣了隶属特战司的太白部队。

真实的韩国特战司，是大韩民国陆军特战司令部（ROKASWC）的简称，其行动格言是“鬼魅般地接近、闪电般地打击、烟雾般地消失”。作为该国最具攻击力的部队，它下辖数个旅级特战单位，并负责各种非常规作战及敌后侦察任务，在与朝鲜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武装摩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那么，艺术加工之外，韩国到底拥有怎样的特种部队？这些“军中骄子”在韩国海外军事行动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美军的重要触角

受“韩流”文化影响，许多人觉得那些充满“韩国风味”的特种兵具备自己的作战特点，然而论编制、训练乃至行头，韩国特战司上上下下充斥着“山寨货，混搭风”。

据韩国《先驱经济》披露，朝鲜战争期间，为满足美军远东司令部（FEC）情报参谋部（G2）的任务需要，韩国将陆军本部情报特遣队（HID）、海军水下爆破部队（UDU）和空军情报部队（AISU）等特殊任务单位尽数交给美方使用，并接受美国全套特种战训练。

1958年，韩国陆军成立特战司，对麾下不同性质的特战单位进行统一管理，直属陆军本部，总部就设在汉城（今首尔）松坡区。韩国特战司无论工作方式还是业务管理都严重依赖美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每年都要无偿向美军输送大量人员，充当“北派特工”，渗透朝鲜进行刺探或破坏活动。

曾在特战司服役的韩国人李济桥向韩国《新东亚》月刊透露，他在1958年被秘密送到日本佐世堡的摩尔训练营，作为美军绝密的第4499部队一员接受残酷训练。该部队共有42人，曾在1958-1960年多次经海路渗透到朝鲜江原道、咸镜南道等军事要塞。可以说，当时的韩国特种

部队是美国在亚太进行军事活动的重要触角和工具。

和朝鲜受西方封锁、只能自力更生发展特种部队不同，韩国可以轻松地接触海外先进技术和文化，在特种部队领域也是如此。上世纪60年代，美国电影《超人》风靡世界，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也受到感染，提到要在韩军中建立“超人部队”。结果韩国陆海空三军互相攀比，纷纷成立相关部队，其主要任务除了刺探情报和破坏朝鲜设施外，又多出一项“对朝鲜渗透活动予以报复惩戒”。

当时朝韩互派的渗透人员在活动方式上存在差异——朝鲜武工队往往潜入韩国腹地开展行动，而韩国“超人工作队”多以5-10人为单位，集中破坏“三八线”附近的朝鲜各军团、师级指挥部。然而，由于这种破坏行动缺乏组织性，韩国“超人”经常被当作炮灰，送过“三八线”后往往面对自生自灭的局面。韩国电影《实尾岛》就反映过这类“超人部队”的悲情状态。

70年代，韩国政府感到杂乱无章的“超人部队”徒费国帑，效益不彰，于是把多数特种部队归并到特战司麾下，以形成有效的特战能力。但在整合过程中，韩国人全套照搬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做法，相关作业文本更是译成韩文直接受用。

对韩军情况深有研究的前日本陆上自卫官平城弘道曾直言，韩国自建新型特战武力，主要针对特定作战对象（即朝鲜），理应突出“地域化”和“民族性”，但韩军当权者却无条件接受美军有关特战手册，包括野战手册（F.M）、技术手册（T.M），应用多年后也不做改动，实在说不过去。“以日本陆自为例，即便是常规兵种，当初在成立时虽然沿用美军手册，但过了两三年后就开始起草自己的手册，为手册赋予自卫队编号，建立起日本自卫队的典、范、令，这样才能实现战术思想的消化吸收。”

海外行动重视面子

目前，韩国陆军特战司下辖7个特战旅和3个独立特战营，分布于韩国各地。其基本作战单位队是特攻小队，配备4名军官，小队长是一名少校，其余3名军官均为尉级军官，小队有约20名作战人员，外加一些人事、作战、信息、军需和输送等后勤人员。

韩国特战司训练虽严，但模仿之气甚重。美国《商业内幕》杂志曾报道，韩国特战司下属的第707特战营公布了士兵进行近战训练的视频，美国老特种兵在观看视频后评价道：“他们学得太像了，以至于我们完全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例如，当一名韩军特种兵用右手持微型

冲锋枪开火时，左手突然拔出手枪（绑在左腿上），两枪同时开火，这是美国特种兵常用的近距离加强火力手法。但美国专家注意到，韩国人是在充斥着障碍物的狭窄楼道里采取瞬间拔枪动作，美军反倒不会如此鲁莽。



2010年1月14日，韩国特种部队士兵在位于仁川的军营进行演练，不久后他们将被派到黎巴嫩执行联合国的维和任务。

有知情者称，特战司从普通部队中挑选优秀人才，士兵为了晋升往往展开激烈的竞争——一旦成为特攻小队的军官，就能拉近自己与青瓦台的距离，未来的仕途自然不可限量。当然，特战司的待遇也不错，除了正常的津贴外，每个月还能领到数额不等的任务补贴。

随着韩国国力逐步增长，派兵海外、彰显国威也成为青瓦台乐意去做的事情。早在上世纪60年代，韩国在美国提供大笔经援的前提下，向越南战场轮派了十余万名军人，除了提高作战技能，也展示了实力。

21世纪后，韩国更把海外派兵作为重要的外交内容，目的之一是确立韩国作为朝鲜半岛“唯一法统”的地位，进一步压缩朝鲜的外交空间。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韩国应美国所请，派出由特战司组织的“宰桐部队”前往伊拉克。在当地，韩军一方面与抵抗组织进行拉锯战，一方面为了避免伤亡，开展一系列“民事作战”。据报道，美韩部队向伊拉克人分发援助物资时，美军往往是拉着援助物资到了村庄后，不管对方是谁，一股脑分下去，结果并没有达到援助效果；韩国军队则先访问村里长老，将援助物资交到他的手上，再将援助物资分发下去。韩军认为，分发援助物资时请了解情况的当事人介入其中，可将混乱状况减少到最低限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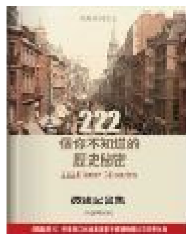
曾与韩军共同执行过维和任务的一位中国军官透露，韩国维和军人素质普遍较高，许多部队都冠以“战斗”之名，绝不在别国军人面前“露怯”。长期受到美韩军事同盟的影响，韩军英语水平普遍不低，也方便他们向外军宣传自己。更重要的是，无论什么场合，韩军都竭力向外军或任务区民众宣传本民族的文化，例如在联合国维和部队司令部组织的聚会上，韩国军人往往是表演欲最强的一拨，甚至教别国军人关于韩国宴会的“小贴士”——席间敬酒要用右手拿酒瓶、左手托瓶底，然后鞠躬致祝辞，最后倒酒，且要连干三杯等。

在韩军看来，到海外参加维和行动是向国际展示本国军队良好形象的大好机会，所以每名维和官兵都经过层层选拔，身材、仪容都是考察的重点，搞得言谈举止间都有“韩星”派头。更有意思的是，韩国维和官兵寝室里，摆满爽肤水、润肤霜、精华液、防晒油等专业护肤用品。

据悉，普通韩国士兵一个月的津贴大约在8万韩元左右（约合700元人民币），但衣食住行是免费的，连香烟都由军队供给。一名韩国士官透露，大部分韩国军人都是“90后”，追求时尚的他们正值青春年华，却要在封闭的环境当中当兵，很多人担心皮肤会变得粗糙，因此会注意保养。“这里大部分军人都至少使用两到三种特制护肤品，国内的一些战友甚至在放假外出时戴假发，来掩盖在军营中理的一头短发。”

编辑 漆菲

猜你喜欢



点此阅读

韩国慰安妇海外宣传战

韩国官方和民间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抗议活动，其程度是随着日韩外交气候而波动的。尤其每当有日本政客在公开场合质疑慰安妇历史时，韩国上下必定掀起新一波的抗议高潮。

特约撰稿员 / 陈祥

7月30日，向全世界揭发二战时期日军强征慰安妇充当日军性奴暴行的“慰安妇少女像”在美国加州洛杉矶附近的格伦代尔中央图书馆前的一个公园正式揭幕。这也是“慰安妇少女像”首次在海外“落户”。此前3月，格伦代尔市市议会就通过该议案。7月9日，市议会以4比1的投票率通过表决。在外界看来，这是韩国要求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道歉的宣传战之重大胜利。

“我很佩服韩国人，他们以各种创新的方式在美国、韩国乃至全世界纪念慰安妇，进而要求日本承认战争罪行，这值得中国人借鉴。韩国人能团结华裔影响美国众议院通过慰安妇决议案，而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对慰安妇问题立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

日韩移民的美国战场

位于格伦代尔市的这座纪念碑对韩国人来说并不陌生，这尊韩国少女铜像名为“和平少女像”，与设立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的慰安妇少女像一模一样。在韩国人团体“加州韩美论坛”的牵头下，当地韩裔为铜像募捐了3万美元的维护费用。

有意思的是，7月9日举行的落户听证会上，有80多位当地日裔居民参加，超过了参会总人数的一半。他们多是二代日裔，对设立慰安妇纪念碑表示了强烈反对。日裔群情激昂，发表了许多尖锐的言论：“日军慰安妇问题纯属历史捏造”“慰安妇就是卖淫女”“为何美国城市要纪念娼妓”“格伦代尔应该退出干涉韩日外交问题”“不要受韩国的贿赂展开反日宣传”……格伦代尔市政府办公室也收到了几十封愤怒的抗议电子邮件，多数来自日裔群体。

当地的日裔女性一致认为“这些卖淫女比日本军官挣的钱还要多”，并以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也曾征用过韩国慰安妇为由，指责韩裔小题大做。相较民众的愤慨，日本官员则显得相对谨慎。日本政府驻洛杉矶领事馆发言人Takehiko Wajima向美国《时代》杂志评论道：“慰安妇不应该被政治化，并且逐渐演变为一个外交问题。”

作为反对方，当天有20多位韩裔居民参与了会议，他们却多以沉默来应对日裔的反击。韩裔团体相信，日裔的抱团示威，是由于前时事通讯社驻洛杉矶记者后藤英彦在当地日本社区新闻上号召“大家一起要求撤除慰安妇雕像”所致。格伦代尔友好城市委员长Alex Woo强调：“设立纪念碑目的不是为了惩罚日本，而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和平及和解，是一种约定。”

美国韩裔高调纪念韩国慰安妇，并不局限于格伦代尔市。2012年5月，美国新泽西州小城帕利塞德斯帕尔克市市议会议长李钟哲宣布，将在美国22个地区设立日军慰安妇纪念碑。就在10天前，4名日本自民党议员访问了该市，要求撤除该市于2010年设立的慰安妇纪念碑。

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韩裔占该市人口数的51.5%。就算对慰安妇历史一无所知，市政府也不敢得罪韩裔这一大票仓。市长詹姆斯·罗通多当场回绝了日方的要求称：“纪念碑是由市当局经过详细的资料调查、确认了事实关系之后，由美国市民捐款竖立起来的，我们并没有拆除它或修改碑文的计划。”日方马上起身离开，愤愤地扔下一句：“今天只是个开始。”

在自民党议员前来游说前，日本驻美国纽约总领事广木重之造访了该市，并以在市内建设樱花路、增设图书馆、推进青少年交流项目来说服市长拆除慰安妇纪念碑。然而，詹姆斯·罗通多在随后的记者见面会上仍旧明确表示不会接受日本的意见，并称“慰安妇追悼碑对防止战争和人权侵害重现的教育有重要意义，未来也不会屈服于一再要求拆除的压力”。

今年3月，新泽西州卑尔根县也竖立起慰安妇纪念碑。7月，86岁的慰安妇李玉善被邀请来述说当年的悲苦故事。老人在演讲中向听众们展示了当年日军留在身上的两道刀疤，触目惊心的往事和物证对后人来说，无疑是一场极佳的教育。

不断更新的纪念形式

2013年5月，纽约曼哈顿街头人行道边上的广告牌出现了招募慰安妇的广告。前后面分别印有西方和东方女性的照片，用英文和中文写有“招募慰安妇”广告词，并有包含相关网站和照片信息的二维码。照片中两位女性来自荷兰和台湾，为美军将其从慰安所解救后所摄。

这是韩国女性艺术家李昌珍的作品，作为纽约市交通局推进的城市艺术事业计划之一，展出时间达一个月。“策划此次活动的目的是，告诉世人作为日军性奴隶的20万亚洲慰安妇问题就是通过刊登这种骗人的报

纸广告开始的。”李昌珍坦言。

2012年3月28日，《纽约时报》A版11面刊登了整版广告，上面是慰安妇老奶奶在游行示威的场面。广告上标注着“她们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日军慰安妇的受害者”。广告进一步解释道：“这些老奶奶自1992年1月至今，每周三都会聚在首尔日本大使馆前示威，示威次数已达1000余次。但是日本政府至今毫无道歉、赔偿之意。”

该广告由诚信女子大学客座教授徐敬德设计，韩国著名歌手金章勋全额出资完成。徐敬德曾设计过“独岛（日本称竹岛）和东海广告”，被称为“韩国第一宣传专家”。徐敬德在制作纪录片《对不起，独岛！》时认识了金章勋，之后两人合作默契，并借助海外韩裔和留学生的帮助，在全世界30多个城市张贴慰安妇海报。

徐敬德的广告设计无疑具有国际眼光。2012年5月29日，《纽约时报》上刊载了他设计的整版慰安妇广告，同样的广告于2012年10月出现在纽约时代广场上。广告内容呈现方式巧妙，他选用了1971年德国总理勃兰特跪倒在波兰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下的照片，配标题“你还记得吗？”对美国人而言，慰安妇问题显得陌生，但对勃兰特在华沙的一跪以及背后的纳粹屠犹历史，则清楚多了。韩国人试图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西方，日军征用他国妇女做慰安妇，跟纳粹的大屠杀是同性质的。

卑尔根县的慰安妇纪念碑，也完美遵循了这一宣传方式。碑上刻有“悼念二战时被强迫充当日军性奴隶的来自韩国、中国大陆、台湾、菲律宾、荷兰、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数十万女性和少女”。此碑还和一系列全世界人权受害者纪念碑修建在一起，如死于纳粹的犹太人、死于奴隶制的黑人等。

除了设立纪念碑、纪念像外，目前纽约市还在拟建世界首条的慰安妇追思街。这并不是新建一条道路，而是由市议会通过街道改名案。此事的推动者是华裔市议员Peter Koo，也获得了韩裔的积极响应。

除用建筑物来纪念慰安妇以外，韩国人不断让在世的慰安妇来到美国进行演讲。2007年，79岁的李容秀老人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里对着1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回忆往昔。老人的演讲自然赢得了满堂喝彩，因为比起对民主、人权和生命的枯燥解说，非常时期遭受人道主义灾难的故事是最容易吸引和打动受众的。

此前的2011年12月，韩国人干脆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面前设立了一个慰安妇少女像。这位13岁的少女笔直坐立在地上，双手握拳放膝盖上，凝视着马路对面的日本使馆。

不过，在韩国所有类似纪念形式中，最常见的还属示威游行。一直向慰安妇提供援助的“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下称“挺队协”）于2011年12月14日举行了第1000次抗议活动，上述少女像正是这场活动的产物。具有煽动效应的是，韩国警察甚至会在雨天为使馆前的少女像打伞。

无望解决的历史包袱

韩国官方和民间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抗议活动，其程度是随着日韩外交气候而波动的。尤其每当有日本政客在公开场合质疑慰安妇历史时，韩国上下必定掀起新一波的抗议高潮。

日本政客最近一次捅了慰安妇问题的“马蜂窝”，是大阪市市长桥下彻在2013年5月的言论。桥下彻的观点大致包括：“枪林弹雨中精神高度紧张的强者集团需要慰安妇制度，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为什么只有日军慰安妇是问题”“没有证据表明日军强征慰安妇”等。苏智良认为，这些明显是胡说八道，因为慰安妇这样的战争罪行是非常清楚的。

桥下彻的这番言论除了引起国际纠纷外，也使其所在的维新会支持率降至5%，也直接导致此次参院选举战绩不佳。维新会创始人之一的石原慎太郎宣称，桥下彻应该为给党造成的损失道歉。

不过据7月27日共同社报道，在东京都内召开执行干部会议上，桥下表明了辞意，但受到其他与会者的挽留，最终同意留任。

除了政客否认历史的发言外，日本民间近几年里发生了两次观感较强的行为。今年“三·一独立运动”（即1919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朝鲜半岛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纪念日前一天，日本某反韩派摇滚乐队制作了歌词中含有侮辱慰安妇内容的唱片，并将CD寄给慰安妇居住的京畿道光州分享之家。此前的2011年，有日本人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前的慰安妇少女像前放置木桩进行抗议，2012年也曾有日本人在“挺队协”和独岛研究会所在地前设置木桩，木桩上文字内容无外乎是：“慰安妇不是性奴”“竹岛是日本的”。

相比上述行为，持友好意愿的日本民间人士也备受关注。日本著名动画导演宫崎骏日前在接受韩国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早应该处理好慰安妇问题，并应当向韩国和中国谢罪。此前宫崎骏刚完成5年来的新作《起风了》，预计9月在韩国上映。

2001年，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了“挺队协”编写的《被掠往侵略战场的慰安妇》一书，该书由34位韩国慰安妇的口述构成。这批韩国慰安妇都

是被以介绍到日本或中国东北去工作为由被骗入军营，或者是直接被抓去当慰安妇。作为二等公民，她们的待遇和工作环境比来自日本的慰安妇恶劣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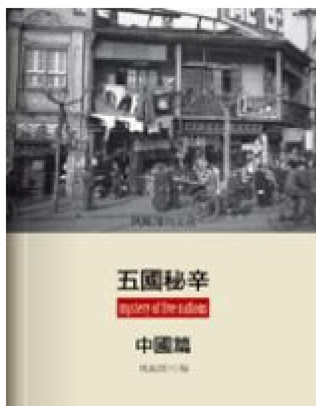
而今，年迈的慰安妇正逐年凋零。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曾表示："如果现在健在的63位慰安妇去世，将无法解开头绪。"

7月12日，首尔市议会通过《首尔特别市关于支援日本帝国主义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的条例案》。条例案规定，首尔市将从2014年起每月向日军慰安妇受害者提供7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830元）的生活补贴，并在其死亡时支付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480元）的赙仪。条例案还明确规定，在首尔市市长的认可之下，首尔市政府对有关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的纪念和宣传项目提供支持。

慰安妇、独岛在内的争议是当时的韩国朴正熙政府急于和日本恢复外交时留下的"包袱"，双方均为了现实利益而予以回避。如今韩国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罪行、公开道歉，并给予法律赔偿，日本则以1965年两国建交时签署的《日韩请求权协定》已解决完日据时期的问题为由予以拒绝。面对目前急欲修宪而奔向"正常国家"的日本政府，韩国若想在慰安妇问题上得到满意答复，恐怕更加艰难。

（实习生张心对此文亦有贡献）

五国秘辛系列其他篇





五國秘辛

德國篇



五國秘辛

日本篇



五國秘辛

蘇聯篇



五國秘辛

mystery of five nations

日本篇

凤凰周刊 编

Table of Contents

日本新闻宣传反转战时舆论

甲午战前的日本海军之途

最后的“鬼子兵”离世

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始末

日本战前经济危机及其后果

东条英机最后的日子

版权信息

五国秘辛·日本篇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凤凰周刊》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2016©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2016

本书版权为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所有。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TCFP-N00007209-20160304

最后修订：2016年08月09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甲午战争：中国如何输在笔杆子上

日本新闻宣传反转战时舆论

特约撰稿员 / 张子宇

1889年2月11日，日本东京举行了盛大的明治宪法颁布典礼。典礼上有一群特殊的客人，是当时10家报社的代表。作为新闻界的代表，他们见证了日本历史上、也是东亚地区主要国家史上首部宪法的颁布，并与首次作为现代国家国民的民众一起，参与了明治社会的建设。这时距离中日甲午战争，尚有五年。

彼时的日本在综合国力上离当时的清朝尚有差距，但对待媒体和新闻的态度全然不同。其在媒体发展、利用舆论对国内外进行影响方面，也迈向新的阶段。这个变化，也给之后的甲午战争带来特殊的影响。

战争假新闻严重误导清政府

1894年7月25日和28日，中日两国的海陆军先后在丰岛海域与朝鲜的牙山交战，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清军两战皆负。牙山之战中，尽管清军聂士成部失利，但8月16日出版的中国《点石斋画报》却将其描述为“中方大胜”，让民间为之振奋。

在丰岛海战中，由于清朝“济远”号等谎报击沉了日本军舰，朝廷上下一度亢奋不已，报刊争相报道。《上海新闻画报》甚至刊载了“倭舰摧沉图”，渲染丰岛海战大捷的战事。之后9月15日平壤之战，1.5万清军对阵1万日军，对峙过程中清军将领左宝贵战死，主将叶志超临战逃跑，一路狂奔越过鸭绿江，导致全军溃败。但叶志超却讳败报捷，导致从官方到民间又是一片喝彩。

这些假新闻成为轻敌、自大情绪的助燃剂。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只是撮尔东夷小国，打中国犹如“螳臂当车”。《字林沪报》在当年8月22日刊发的《审机》一文中甚至列出作战计划称，“中国海军应将日军围困在朝鲜，然后另派一支劲旅偷袭日本。若日军回撤，则可尾随追之而歼灭。”

除了中国人，一些在华的外国人同样表示乐观。曾在北洋水师任职的英水师提督琅威理在《万国公报》的专访中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海军不仅足以战胜日本，即使打西方大国也绰绰有余。”这些有刻意说好话嫌疑的“他山之言”，显然没有起到攻玉的效果。

事实上，尽管清政府没有现代媒体观念，但当时媒体言论还是极为大胆的，“本馆接奉电音”、“政论”、“西电译要”、“窥日要言”等媒体纷纷开设专栏，密集报道战事。有媒体甚至建言，让光绪皇帝御驾亲征。《字林沪报》10月8日发文《恭拟圣主亲征议》，要求光绪效仿宋真宗亲征契丹。文章认为，当下最要紧的是，皇帝需御驾亲征，“亲统六师，东征日本”，甚至一鼓作气，直捣日本老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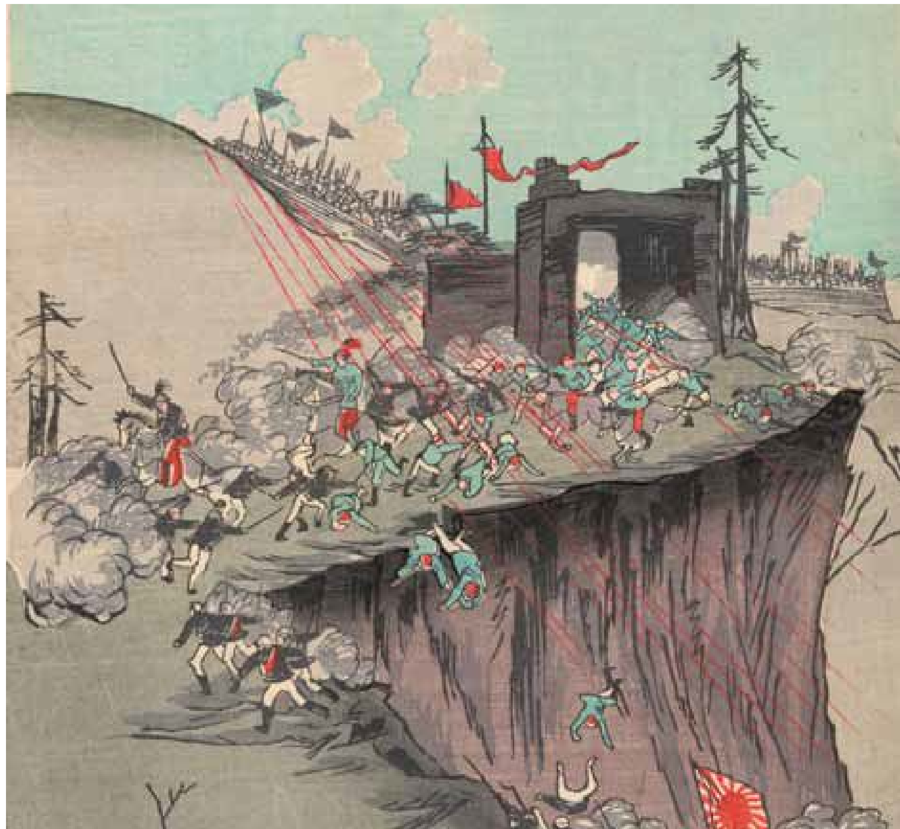
然而，各种假新闻和轻率的评论，极大误导了民众对战况的了解，成为事后笑柄。随着清军在海陆两线的节节败退被披露，这些报道也沦为了国际丑闻，导致国际信誉一落千丈。

与此相比，日本政府则在舆论方面大做工作。丰岛海战中，由于日本击沉的运输船“高升”号是英国船只，一时间引发了外交纷争，造成英国对日发难。时任日本驻英国大使青木周藏对此进行了强力公关，成功让舆论反转。8月6日的《泰晤士报》刊登了国际法权威、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的意见：“许多英国报纸的愚蠢社论仍然充满‘海盗行为’、‘不宣而战’、‘对英国国旗的侮辱’、‘严惩日本军官’等浮躁文字，实在不可想象。”

另外，日本政府还在英国媒体的有偿版面刊登自己的主张。据悉，当时的价格为2000日元到606英镑不等。对于这一行为，国内有说法称是贿赂。不过事实上，当时的纸媒都有有偿版面，私人与机构可以花钱刊登文章，与广告无异。唯一的区别是，日本花钱做了这种政治宣传广告，清政府却完全没有意识。

最终，“‘高升号’事件”不但没有让日英关系恶化，最终英国海事法庭裁定“日本政府不负责，日本军舰行为正当”，反而向清政府索赔4.6万英镑。该事件后来成为国际法历史的一个经典判例，也是日本近现代史上国际公关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在当时的清朝，也有媒体对朝廷进行诸多抨击，例如北洋海军的建设问题。《字林沪报》9月30日的文章批评通商大臣不敢申请造船，并抨击当权者认为造船是乱花钱的错误言论。10月5日，在清军陆地战场节节败退之际，文章痛斥指挥者无能，“于此可知诸统将之实无能焉”。


日本画家笔下的平壤之战。平壤之战是甲午战争宣战后的首次战役，也是中日两国陆军第一次大兵团作战，对整个战局影响深远。

但这些行为仅仅是中国传统文人清流派的翻版。媒体如果不能对战况实情进行采访，也就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更不可能发挥舆论作用。但当时的中国媒体既不能随军采访，也不能采访官员与将领。

日本强力宣传反转战时舆论

相比来说，开战伊始，日军混成第九旅团到达朝鲜京城附近驻屯地之初，驻京城日本公使馆武官即按照日军大本营指示，派遣数名报社通讯员从事战地采访活动。随着战事扩大、海外出征军陆续增加，日本国内报社派出记者、通讯员的数量也越来越多。8月，日军大本营公布新闻记者从军规则，规定记者从军必须办理从军愿手续、交付从军许可证、在出航和归朝时须向有关部门报告等。随军记者在战地高等司令部监督将校的管理下，从事战地采访报道活动。

整个战争期间，日本国内有66家新闻社，总计派遣了114人赴前线报道。按照日本第二军规定，随军记者必须着统一服装、不携带武器，持长枪棍，携带皮包、水壶、望远镜等，左臂系白色袖标，并由军兵站

部统一派遣。在大河剧《坂上之云》中，有明治时代著名诗人正冈子规当从军记者的经历，剧中也披露了日本军方同样试图控制和打压新闻自由报道的行为。

此外，日本政府还批准从军画师11人，照相师4人。当代研究甲午战争的非文字资料，不少来自这些人的作品。还有来自民间的报道者，如当时著名摄影家龟井兹明，就自费组成摄影队，拍摄了大量战争实况照片，之后还出版了《日清战争从军写真贴》。1896年，小川一真写真制版所应用从美国引进的写真铜版印刷技术，为博文馆出版社成功印刷发行了数部反映甲午战争题材的影集及画册，包括《日清战争写真贴》。

除了本国新闻记者，日本还允许外国武官随军观战、外国新闻记者随军采访。9月6日，根据欧美诸国要求，日军发布外国人随军规则，限定人员必须来自中立国家，在保证履行申请手续、限制人员、严守军事机密等义务条件下，由外务省受理审批。日方还批准了7名列强海陆军武官作为战场观察员，且允许德、俄、法、美各国海军军舰在事前通知日本海军的情况下，可以接近中日两国交战海域进行观战。

战争期间日本军方批准的外国随军记者共17人，来自《纽约世界报》、《伦敦时报》、《黑白画报》等当时西方知名媒体。采访过程中，日方虽然对从军媒体做出诸多限制，但是相比过去，透明度大大增加。反观清政府，不仅不允许国内外记者采访，甚至有两名西方记者因为错误进入到中方阵地却被砍头，引起外交风波。

这种先进的舆论与公关理念，给日本带来诸多好处。西方媒体的报道很快倾向日本。当时的美国《先驱报》称，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亚特兰大《先进报》则认为，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与进步。当时美国民众有一种说法，将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对日本人很有认同感。

1894年12月20日，《纽约世界报》刊载了美国随军记者克里曼的长篇通讯《日军大屠杀》。因为这篇报道，世界才知道旅顺大屠杀的存在。讽刺的是，这一正义的揭露是来自日方随军记者的报道。危机面前，日本一面指责克里曼的报道是失实的，请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到现场调查；一面说清军如何残暴，并称，清军将一些日军战俘进行斩首和虐待。结果，舆论最后仍转向对日有利的一面。

由于早前丰岛海战大捷、牙山大捷等一类假消息的出现，清朝早已

失去舆论公信力。当两国消息发生冲突时，外国舆论大多选择相信日方的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克里曼在之前曾经大量发表了赞扬日军文明的文章，但对于旅顺大屠杀的揭露，体现了他作为新闻人的良知。与此相反，除了少数有良知的日本知识分子外，大量日本媒体及海外留学生、侨民等，掀起“爱国热潮”，猛烈围攻克里曼。从一些细节如日本刀剑的使用入手，指责他撒谎。这显示了明治时代的日本社会，已经出现在“爱国”面前丧失基本道义的现象。在这一现象面前，自由民权等也就沦为了空话。

整场战争中，日方多次进行自身乃文明之师的公关活动，包括邀请西方记者探视战俘营，展现日方救治、善待清军战俘的情况；厚葬自杀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对其灵柩待之以极高的军礼，这些都赢得了西方社会的好感。

日本的战时舆论观如何形成

对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舆论观，中国学者宗泽亚在《清日战争》一书中写道：“（日本）政府启动了国家所有的宣传机器，通过媒体机能的运作，宣传本国的开战立场，主张战争的正当性，向国际社会做出开放战争的姿态，试图赢得欧美列强的理解和支持。”日本首任内阁首相伊藤博文相信，利用媒体攻势取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就等于拿下战争一半的胜利。最终，日本的舆论战达到了预期目的，让国际社会认同了明治军队的文明和维新政府的言论。

由于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大多在海外留学游历，因而理解媒体在西方社会的角色。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就常常询问工作人员：“国内外报纸之评论如何？乞来电。”日本驻其他国家的公使也积极收集当地的舆论信息并及时汇报。

甲午战争中，日方传奇间谍宗方小太郎曾受明治天皇的青睐。他可谓一名公关天才，甚至利用中国明清革代的遗留民族矛盾，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宣传基调。日本在辽东半岛登陆后，开始四处张贴他起草的告示，题目就是《开诚忠告十八省豪杰》。其中用娴熟、工整的汉语宣扬日本是为了“帮助中国汉人对抗满洲统治者”。宗方小太郎后来还创立了《汉报》等媒体。

在明治宪法中，已包含有新闻自由、著作印刷自由在内的言论，这与当时日本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情况密切相关。从幕末时代开始，日本的社会精英就开始向世界广求知识。之后自由民权运动的兴盛又使报纸

及新闻自由最终从“探国民之实情、知世间之真相”的“望远镜”发展成为人们争取权利的武器。“言论自由”这一观念最初引入日本时，并不被日本政治精英视为确保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手段，相反被视做用来“保证全社会（政府与人民）调和”；可以“缓和人情、睁开双眼、看他人所长”，为了“帮助人们交流”、“一国文明之发展、汇集众人之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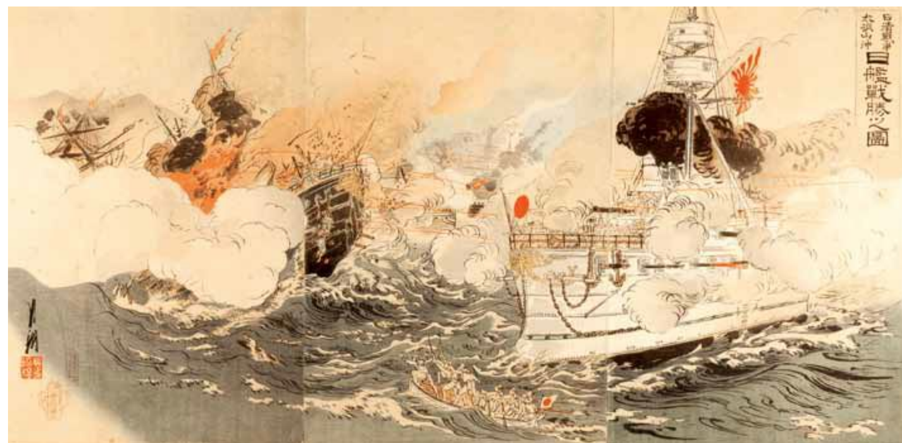
与此相比，尽管中国近代媒体从鸦片战争后开始发芽，也拥有一批如《申报》、《新闻报》、《万国公报》、《字林沪报》等言论开放的报纸，但是整个社会对新闻和舆论的理解与日本仍然有差距，这才导致甲午战争最终不但在战场上输了，在笔杆子上也输了。

编辑 漆菲

甲午战前的日本海军之途

明治维新与大清洋务运动差不多同期展开，清朝只是用钱买回了一批先进的舰船，而日本不仅着力于硬件建设，还建立起了近现代海军体系。

特约撰稿员 / 章骞



1891年7月14日上午，日本的横滨港停泊着十余艘挂着满旗的军舰，其中最为醒目的便是两艘黑色侧舷、白色建筑、蜡黄色的桅杆与烟囱的所谓维多利亚式涂装，艉旗杆上则飘扬着黄龙旗的巨舰。这两艘巨舰便是来访的北洋水师“定远”与“镇远”号铁甲舰。随同来访的还有4艘巡洋舰。来访舰侧旁有6艘接待的日本舰只，其中最大的是依然挂着帆缆，显得老态龙钟的装甲舰“扶桑”号，其他5艘虽为较新的巡洋舰，但与威风凛凛的清舰相比，却显得单薄多了。

在多艘飘扬着黄龙旗的小汽艇载着日本皇族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及首相松方正义等大约500多显贵和新闻记者驶向“定远”号，北洋水师丁汝昌提督、驻日钦差大臣李经方与各舰管带在舷门口迎候。甲板上军乐队高奏礼乐，还准备了柠檬水、冰块、各式各样的卷烟等，人们在舰上的军官引导下遍访全舰，舰上还举办了盛大的西餐立食宴会对来宾进行款待。

当时北洋舰队正值巅峰时期，这次访问后，日本国内有人感到震撼“卷舌而不安”者，更多的人则异口同声地呼吁要奋起扩展自己的海军。巨大的“定远”给日本带来的压力却化作了强大的动力……

明治海军基础的奠定

推动日本走向近代化国家之路的，便是一股来自海上的力量。

1853年美国佩里海军准将率4艘战舰闯入日本东京湾的浦贺，日本漫长的锁国政策终于被打破。由于与列强的军队发生冲突并进行了一系列外交交涉之后，幕府一方面对于来自海外的侵略存有危机感，另一方面则在世界发展潮流的冲击下开始觉醒。从1854年起，日本在荷兰的指导下，开始采购军舰并在长崎设立海军传习所，加紧建设海洋防务、发展近代化海军。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虽继承了幕府的海上发展方针，然而因政局的变化造成了国内局势不稳，并发生了戊辰战争、宫古湾之战等战乱。到了1869年，明治政府基本完成全国统一后，海军发展也得以继续进行。

难能可贵的是，日本很早就开始从体制入手实施改革，应对近代化的潮流。在清廷内还在进行“体用”之争时，日本却以“百事一新”为口号，直接看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体系，走上文明开化之路。在戊辰战争刚刚结束的1869年7月8日，明治政府就改定官制，新设了兵部省，首任兵部卿为嘉彰亲王，兵部大辅（副大臣）则是在军事上具有非凡卓识的大村益次郎。他认识到了仅依靠武士阶层是无法建成近代化军队的，于是积极推行废刀令和征兵制度，建立新式军队。然而此举触怒了武士阶层，大村也在9月遭袭击而亡。不过这个方针还是得到了大村实质上的继任者山县有朋的贯彻，并确立了海军师法英国，陆军首先师从法国，普法战争法军惨败后，则转从德国的改革方针。终于在1873年1月10日成功地推行了征兵制，确立了日本建立近代军队的基础。当然，海军由于技术性要高得多，因此采用的是以征兵制为基础、以志愿兵为重点的兵役制度，这样既保障了具有充足的兵员供应，又能确保获得优秀的骨干力量，为日本海军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一期间，海军教育也开始在日本兴办起来，首先，明治政府将位于东京筑地的军舰教授所改为海军操练所，开始根据英国模式从1873年11月起进行海军军官的培育。这也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最早的海军教育。第二年还派遣了两名海军教练所的学生乘坐英国军舰进行实习，又招聘英国海军军官在横滨港的“龙骧”舰上对各舰的官兵进行炮术操练指导。为了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在横须贺造船厂之中，技术学校也被设置了起来。

1871年7月14日废藩设县令的颁布，使日本在国家体制上完成了转型。于是，过去隶属于各藩的，自造或者购自外国的舰船全部收归政府，并以此为核心，成了日本近代海军发展基础。

相比之下，海军发展的基础却始终没有在清朝建立起来。清朝搞洋务不过是幻想存中学之体而取西学之用，因此到头来还是舍本求末，裱糊门庭而已。清朝是在一个没有建立近代国家的基础上从事海军建设，形成的不过是一个个利益集团，而不是国家的海军。北洋水师在御敌之际，国内其他力量则在袖手旁观、品头论足、吹毛求疵、幸灾乐祸。“广丙”管带程璧光在战败后向日方提出索取“广丙”的请求，理由是该舰隶属于广东水师而不是北洋水师。这件令人啼笑皆非的轶事，也许可以算是一个缩影。

早期造舰计划及其财源

由于日本从各藩收取的舰艇大多陈旧不堪，接替大村担任兵部大辅的前原一诚曾在1870年5月提出了最早的海军军备计划，这个计划设想在20年内建造200艘军舰、20艘运输船，预计耗资4500万日元，在1872年日本施行金银双重本位制下，1日元相当于黄金1.5克，而1877年日本的国家预算也不过4800万日元，可见这个计划是无法被当时的财政状况所允许的。

而下一个海军计划的制定则要等到日本海军省成立以后。在1872年1月13日兵部省曾向三条实美太政大臣（当时相当于首相的官位）提出了：“海军和陆军的情况迥然不同，其官员不可兼任，须将两种军职分开。故奏请批准废除兵部省，分别设置海军省和陆军省”的报告。这个提案很快获准，在2月28日，兵部省便被分成了陆军省和海军省，只是当时陆、海军卿都暂缺了一年多，直到1873年6月8日才任命山县有朋为陆军卿，12月25日任命胜海舟为海军卿。

海军省成立之后，日本拥有小型铁甲舰2艘、铁骨木质舰1艘，加上其他木质小舰，仅仅只有17艘军舰，共计143832吨。这些船中大多早已陈旧，几乎不堪使用。由于这一年日本借机牡丹社事件发动了侵台战役，于是感到了军舰的不足，因此便向英国订购了几艘当时较为先进的舰艇，有3777吨的中央炮郭铁甲舰“扶桑”号和2艘2284吨的铁骨木质轻巡航舰“金刚”号和“比睿”号。这三艘舰在1878年到达日本，成了当时日本的主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1873年到1876年自行建造了一艘897吨的三桅蒸汽炮舰“清辉”号，此后在1875年到1878年又建成一艘“天城”号，1877年到1880年再完成一艘“磐城”号，此后接连不断地建造，这意味着日本开始拥有了自己的造舰能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不惜工本地加以扶植，这和鼠目寸光地因成本过高而放弃怠于自制舰船，一味地依赖于外购的清政府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因为如此，原本并不落后的

清朝造船业与蒸蒸日上的日本相比，显得那么的萧条，造成日后巨大差距的原因正在于此。

由于拥有了一定的造船能力，日本海军省在海军卿胜海舟的主导下又一次重新审定新的造舰计划，准备建造铁甲舰26艘、大型舰只14艘、中型舰只32艘、小型舰只16艘、运输船16艘，共计104艘，计划在18年完成，但是这项计划还是没有得到内阁会议的首肯。

毕竟日本当时的财政状况非常紧张，为了确保陆海军的整备财源，日本政府在1873年12月设定了家禄税，并规定陆海军武官以及驻外人员等敕任官员必须将自己的俸禄的10%，奏任官员则必须将5%奉献出来。而从1874年起，明治天皇则在每年在宫中费用中，提交3.3万日元充当陆海军军费。

“定远”带来的冲击

然而，到了此时，遥远的德国伏尔铿船厂中建造的两艘7000吨级的铁甲舰，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两艘舰便是清朝政府向德国订购的“定远”和“镇远”舰。



18世纪90年代初，日本长崎军港。

早在1876年，日本就借口军舰“云扬”号遭到炮击而派遣5艘军舰逼迫朝鲜签署《江华岛条约》，开始对朝鲜进行渗透和掠夺，不过由于朝鲜当时是清朝的藩属，因此日本的渗透不但引起了朝鲜的抵触，还在朝鲜半岛埋下了中日两国冲突的种子。1882年7月在朝鲜京城的壬午兵变以及1884年12月的甲申事变，便可以说是代表性的事件。因此，就在壬午兵变爆发后，日本海军卿川村纯义感到了“东洋形势已非昔比”，便于1882年11月重新提出建造军舰的计划。

如上文所述，“定远”和“镇远”两艘当时东亚最大的铁甲舰恰好在此时出现了，日本当时最大的舰艇便是“扶桑”号，而大多数舰船还是铁骨木质，还不存在可以打破定远级装甲的火炮。因此川村的提案立即得到了右大臣岩仓具视的赞同，他立即向天皇呈送奏疏，主张“应断然增税，以扩大海军经费”。明治天皇也立即下诏执行，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更是对大藏卿松方正义进行指示，提出了从1883年起，连续8年将酿造业、烟草业等的税收用作陆海军军费，经费总额达2400万日元。同时，为了筹划新舰建造费，日本海军省从1883年开始，在通常用于舰艇建造的专项预算以外，每年支出333万日元，投入军舰的建造。

1885年12月，日本再次改革政体，废太政官制而改内阁官制，任命伊藤博文担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海军省的主官相应也改为海军大臣，由西乡从道首任之。西乡基本继承了川村的既定方针，他下令从1886年6月起又开始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日元，新造舰艇54艘共66300吨，这就是所谓第一期军备扩充计划。

在这个计划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便是所谓的“三景舰”，这三艘4278吨的海防舰是法国著名的舰船设计大师白易劳所设计，以日本三大景点而命名。舰上装备一门单装的320毫米的巨炮，目的就是专门为打破“定远”和“镇远”两舰装甲。

不过，这三艘舰上主炮事实上极难运用，而且舰体没有装甲防护，因此其效用还存在非常巨大的疑问。当时日本的舰政局长佐双左仲提出了以问世不久的速射炮作为舰艇武装的设想，并在造舰方针上也倒向英国式的设计风格，采用以快制胜的思想来对抗北洋水师的铁甲舰。这一思想的典型产物便是著名的“吉野”号巡洋舰。这艘巡洋舰是日本在1893年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的，排水量为4150吨，装备152毫米速射炮4门、120毫米速射炮8门、47毫米速射炮22门、360毫米鱼雷发射管5具，航速达22.5节，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军舰。以“吉野”号为首，加上“浪速”、“高千穗”以及“秋津洲”这四艘大于3000吨的新式巡洋舰，日军建立了在日后黄海海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第一游击舰队。

第一期扩军计划充实了第一线舰艇的同时，日本海军省也发现了军港等海军设施依然极为落后，于是，明治天皇在1887年3月14日再次从内库拨款30万日元作为海防补助费使用，并下诏表达自己扩展海防的信念。于是为海防捐款的风潮竞相展开，到9月底，捐款总额竟然达到了103.8万日元，这些捐款和天皇的赐金全部用于扩充海军军备。

庞大的造舰计划带来巨大财政压力，因此引发诸多政治问题，此后的内阁会议压缩或者否决了多次的造舰计划。于是，明治天皇在1893年

2月10日，将各国务大臣、各枢密顾问官以及两院议长召到宫中，提出了6年内自己将每年从内库中拨出相当于皇室经费的1/10（约30万日元）全部用于造舰，并要求文武官员也减薪一成纳为造舰经费。此举引起了巨大震动，甚至有些议员们提出献出薪俸的1/4用作造舰经费，众议院立即再次审议并修订了预算案，决定从1893年到1899年度共拨出1808.2520万日元的造舰经费，并得到了贵族院的同意。据此，决定建造“富士”、“八岛”、“明石”和“宫古”4舰。其中“富士”与“八岛”为新型的12000吨级战列舰，如果这两艘舰一旦完成，将全面压倒“定远”和“镇远”号，不过这两舰直到甲午后的1897年才服役。



1886年，随北洋水师访问日本长崎的镇远舰。

当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1艘、雷击舰24艘，总排水量为61373吨，正在建造的军舰6艘、雷击舰2艘，计333495吨。虽然可压倒“定远”号的战列舰尚未完工，但是“吉野”等各种新型舰艇已经陆续入列，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此时已经基本完成了海军的组织建设，镇守府和军令部等机构也相继设立，常备舰队已经编成，日本海军已经孕育成了一支近代化的力量。

海军各种制度的完善

海军是一个近代化的组织，而舰船不过是构成这一组织的一部分肌体，而真正的骨骼则是海军制度。日本海军自从草创以来，便非常敏锐地察觉到西方卓有成效的制度才是他们力量的源泉，因此日本海军在发展的同时，不断在完善海军的制度。为给舰队提供一个管理与后勤中心，日本海军在1876年将原有的提督府加以改善，成立了东海、西海两个镇守府，分别管辖东西两方面的舰队。

到了1886年4月，随着内阁官制在前一年的实施，海军条例也被通过，根据这个条例，首先，军队的管理与指挥需要军政和军令两个方面。战时部队的指挥和平时的各种战备、训练等均由军令机关负责，实行一元化领导是不合适的。而日本海军草创以来军令军政体系始终处于一元状态，这个条例明确了将军令部门独立而出的规定。由于就海军军令部门的归属问题与参谋本部发生了不少冲突，因此到了1893年5月19日海军军令部条例颁布后，海军军令部门不用比较敏感的“海军参谋部”，而以“海军军令部”的形式独立了。

这项条例中，还规定了五个海军区的划分，并颁布了镇守府官制，初步建成了横须贺、吴以及佐世保这三个镇守府。这个制度的完善使得日本海军可以在对付外敌的行动时没有后顾之忧，并对稳定当时编成的常备舰队的后方起了重大作用。

所谓常备舰队，便是指能够独立达成预定战略任务的部队，与用于保护港口的小规模舰队是有区别的。这种带有攻击风格的舰队1889年7月29日宣告成立，由海军少将井上良馨任舰队司令长官。常备舰队成立以后，不断吸收新造舰队进行训练，使得战术水平日益提高，而且也为1894年7月19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最终编成具有日本海军象征意义的联合舰队打下了基础。

与此相比，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军事变革，主要针对的是武器装备，对于教育训练方式也有触及，而军事制度变革基本未实行。北洋水师的编制还是完全套用绿营体系，比如同型舰编在被分在左右翼，这样便无法进行统一指挥，影响战斗力的正常发挥。

任何事业的顺利实施离不开人才培养，尤其是骨干力量的培养。前面已经提及，从幕府时代开始到明治时代起，日本就在东京筑地开办了海军操练所，而后又将其改名海军兵学寮，并根据新规定选拔了15名15到19岁的少年生、29名20到25岁的成年学生入学。1873年7月，英国海军少校道格拉斯曾率领一个由军官6名、士官12名、水兵16名组成的34人教官团来到日本，重新制定了海军兵学寮的规章制度，使全部教育纳入正轨。1875年完成学业的学生还乘坐“筑波”号舰远航到旧金山，这样开创了远洋航海训练的先河并形成了沿袭至今的传统。1876年起兵学寮改名为海军兵学校，又在1888年8月1日将校址从筑地迁到广岛县著名的江田岛。

在同一年，为了对海军军官进行深造，还创设了海军大学。而且对于炮术、鱼雷术等这些原来只是在训练舰上实施的课程，从1893年起，也可能在新建的海军炮术练习所以及海军水雷术练习所进行彻底训练。

这一系列的教育，到了1882年以后，已经不需要借助外国人教师，日本自己的海军教育已经完全得以自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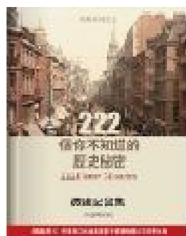
从1870年起日本开始有计划地派遣学员前往海外留学，截至1887年，派出留学生和舰上实习人数大致如下：英国25名，美国21名，法国6名，德国1名，英舰5名，美舰3名，德舰8名。他们之中，在德舰上实习过的山本权兵卫、留学英国泰晤士河畔的商船学校的东乡平八郎、在美国亚洲舰队旗舰上学习航海技术的坪井航三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9世纪70年代，清朝和日本同时在欧洲进行考察之时，清朝官员主要咨询船炮机器，而日本则着眼于军事学校教育，德国首相俾斯麦便发出了“日本将兴、清朝将衰”的预言。清朝当时也有船政学堂，也曾派遣留学生和聘请洋员，然而，这些重金培养的学员却未曾得到重用，北洋水师的管带中还有十余年不变的奇怪现象，若无因死亡或者辞职者而发生职位空缺便几乎没有人事变动，这必然会导致士气的低落以及规则的靡乱。

自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爆发，可谓是日本海军发展最为生机勃勃的时期。虽然这期间日本海军的实力并不强大，然而一个近代化海军的体系，却在这三十年不到的短时期内已经基本上建设完毕，而后日本海军的腾飞，享受的便是其丰硕的成果。而对此，上至明治天皇，下至由维新的风暴中涌现出来的诸多贤达之士的努力固然是根本因素，而从某种意义而言，“定远”舰那巨大的身影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存在感。

编辑 段宇宏

猜你喜欢



点此阅读

最后的“鬼子兵”离世

日本投降后，小野田拒不相信，在丛林中不断骚扰袭击近30年，给菲律宾军民造成了超过130人的伤亡，直到上司来向他宣读投降命令。

记者 / 陈祥

1974年3月9日，菲律宾卢邦岛上空的太阳刚落山，一个身影迅速窜向一顶帐篷。帐篷里的人已等了一天，双方相见时，这身影突然站直并高喊“小野田上尉前来接受命令。”对方旋即向他宣布命令停止作战。身影纹丝不动，表示服从。

接受投降命令的人，是旧日本陆军上尉小野田宽郎，他已经在卢邦岛上呆了29年。前来劝降的人，是日本探险家铃木纪夫，以及宫崎县一家书店的老板谷口义美，谷口曾是小野田的上司。

2014年1月16日，传奇人物小野田在东京的一家医院里去世，终年91岁。

不相信日本战败

1942年，20岁的小野田在武汉加入日本陆军，之前他在驻华的日本商社工作。他不久后就被派回国，接着被送入培训特工的陆军中野学校。谁能预料，在校学到的敌后游击战技能，助他在森林里生存了29年。

毕业后，小野田被分配到第14方面军第8师团，他的职位很独特，实际的上级是师团长。1944年12月，上尉小野田接到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指挥卢邦岛的游击战。司令部参谋告诉他做好最坏的打算，即美军占领日本本土，但日本政府将迁移到中国东三省继续战斗，关东军将在本土失守后的三至五年内反攻。

卢邦岛是一个南北长27公里、东西宽20公里的小岛，它扼守着进入军事重镇马尼拉湾的海路，上有居民万余人。1945年1月9日，美军开始吕宋岛登陆战，直到2月28日，美军才来收拾卢邦岛。对进攻者而言，卢邦岛上的战斗不费吹灰之力，美军面对的是200余名只配备了步枪和手榴弹的日本官兵。

战斗很快结束，22名日军编成多个小组潜入山林准备长期游击战，小野田带着3名士兵分成一组。日本投降后，第14方面军司令山下奉文

签署的投降命令被散布到岛上，日军纷纷下山，只剩下小野田一组人。奉命组织敌后战斗的小野田坚信，日本没有输掉战争。



1974年3月，菲律宾卢邦岛，走出丛林投降的小野田宽郎。

1950年秋季，一艘日本机帆船的残骸漂到卢邦岛岸边，他判断日军在中国大陆发起反攻。越战爆发，经常从卢邦岛上空飞过的美军重型轰炸机编队，使小野田误以为日军在法属印度支那半岛发起反攻。机群规模越大，他判断战事越激烈。最终，他虚构出的战局是中国东北的日本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成为军事同盟，爪哇和苏门答腊也站在日本一边，印度在钱德拉·鲍斯领导下得独立并对日友好。

对搜索队留下的日文报刊、传单，他一概当做美军的宣传手段。他有台缴获的收音机可以接收日语广播，但依然笃信广播是美国的骗术。小野田记录他30年里遭受93次围剿，菲律宾空军的记录是133次。1949年9月，赤津勇一背着众人偷偷下山投降。1954年5月，岛田庄一中弹死亡。1972年10月，小冢金七在纵火时被警察击毙。小冢金七的死惊动了日本国内，但小野田面对接踵而至的日本搜索团不为所动。

1974年2月，年轻的日本探险家铃木纪夫找到了小野田，但不能说服他投降。小野田坚持要有上司的命令，由于执行的是秘密行动，内心存疑的小野田不敢说出上级是师团长横山中将，而说成是14方面军参谋部情报别班班长谷口义美少佐。3月9日，谷口义美来到岛上，向小野田

宣读投降命令。小野田29年的游击生涯终于结束，期间他和其他残余日军给菲律宾军民造成了超过130人的伤亡。

3月10日，一场特殊的投降仪式在岛上的菲律宾空军雷达基地举行。菲律宾军民并没有将小野田当作战俘，而是视为一个传奇色彩浓郁的英雄。村民夹道欢送、挥手致敬；整齐列队的菲律宾军队举枪欢迎他。这个基地建成于美军登陆十年后，小野田曾一直计划在反攻之日占领它。当他向菲律宾空军司令双手递上军刀以示投降时，对方用手轻碰后就还给他。

回日本后充满争议

全日本的新闻人物“英雄小野田”一踏上羽田机场，就出席了记者见面会。他的回答里见不到对战争的忏悔和反思，并称：在年轻气盛时能全身心地投入战斗是一种幸福；30年来他只想着完成任务，无暇顾及儿女情长；通过报纸和广播获知日本复兴的时局，使他怀着喜悦的心情战斗；战友小冢之死加重了他的复仇意志。

对此，日本左翼人士将其视为“军国主义的亡灵”。他们认为，此乃执政的自由民主党抓住千载难逢的军国主义教育机会，让大和魂、军人楷模死灰复燃。

小野田住院检查身体期间收到大量信件，包括攻击他的言论，如“踩着两个部下性命回来的人，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应该自决”，甚至威胁“包围军国主义的亡灵，炸掉国立医院”。小野田觉得，在这些信件中看到了日本社会的缩影。

住院期间，田中角荣内阁送来100万日元的慰问金，他直截了当捐献给了靖国神社，再次引起轩然大波。小野田认为这跟军国主义没牵扯，他只想为亡故的战友尽一份力，只有向战友道歉才能减轻内心负担。他完成夙愿，即走访战友家中、祭拜靖国神社，他的灵牌曾两次入社。

尽管小野田身体健康，但30年的荒野独居生活对他融入战后社会造成不小障碍。在日本生活7个月后，他就移民巴西。日本人在上世纪初就有移民巴西的传统，他得到了众多日裔的帮助。小野田通过稿费和贷款，买下一个514公顷的牧场，最初有250头牛。由于他在卢邦岛上长期捕牛为生，熟悉牛的习性，遂得以在牧场经营上发挥才智。结婚，事业有成，他在人际关系简单的自然环境中才逐渐适应战后的和平生活。

在巴西，小野田用推土机铲倒树木，用多把步枪、手枪打猎和守护

土地，像牛仔一样骑马巡逻。小野田关心日本，他靠当地的日文报纸来了解日本新闻。1980年11月，川崎发生高考落榜生杀父母事件，他开始思索如何让日本孩子坚强面对生活和困难，“为了祖国而希望培养出健全的日本国民”。为此，1984年他在富士山下创立“自然塾”，在野营中教青少年野外生存技能。1992年他在福岛县开办“小野田自然塾”，将此视为人生最后的工作，故重回日本居住。

小野田在日本一直是名人，除了《战斗、求生、卢邦岛30年》、《决不投降：我的三十年战争》、《我的巴西人生》等多本回忆录外，日本社会有众多关于他的著作。2005年8月13日，日本富士电视台播出一集电视剧《过迟归国实录：小野田少尉》，以纪念停战60年。

小野田多次回到卢邦岛，还向一所当地学校捐款1万美元。2004年，因他借牧场供巴西空军训练，以及传奇性的军人履历，巴西军方授予他圣多斯·杜蒙勋章。1995年是二战结束50周年，日本国内发生了阪神大地震、奥姆真理教用毒气袭击东京地铁，他在灾难面前对生命、对安平生活有了很多感慨。

小野田一直坚信日本开战是“正义”的，他虽承认过自己30年的游击战毫无意义，但一直无法接受无条件投降的事实，更是无法理解日本战后宪法对军事行动的种种束缚。他被视为旧日本残留右翼人物的代表，晚年再次回日本后常参加右翼的活动，并在旧日军歌声里老泪纵横。“军人就是服从命令，在不违反国际法律的状况下，我没有责任，”他经常这么说。

李光辉：真正的“最后鬼子兵”

小野田并非最后一个缴枪的日本军人，就在他投降一个月后，日本人在印尼莫罗泰岛上找到了一个仍在抵抗的日本军人，他叫中村辉夫。生于1919年的中村辉夫，其实是台湾的阿美族人，在战时加入了高砂义勇队。中村辉夫的本族姓名叫史尼育唔，汉名李光辉。

自幼生活于热带丛林里的台湾原住民，在丛林战上具有常人难及的天赋。热带丛林作战环境艰苦，往往病死人数多于阵亡人数。日本看中这点，于1942年开始招募原住民成立高砂义勇队，去参加南洋丛林作战。1944年5月28日，李光辉在高雄港登船告别故乡，一去31年，直到1975年1月8日回乡。

李光辉被编入辉第2游击队，立即被送到了莫罗泰岛。1944年9月，美澳联军登陆莫罗泰。日军防守兵力薄弱，一触即溃。残兵冲入丛林，做长期游击战准备。日军方在1945年11月23日宣布李光辉战死。

莫罗泰岛成为了盟军的一个空军基地，分布在岛上的多数日军在战后一年里陆续投降。在1956年3月，有3名日本兵、5名台湾兵投降。而李光辉一直坚守在密林深处，在30年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他采集野果、开垦土地种红薯，捕猎对象从鱼到野猪都有，偶尔他会出山去偷农作物。期间，得益于语言相通，他得到了一个岛民的帮助，主要是物资救济。

该岛民在去世前把此秘密告诉了儿子，儿子则在外说漏嘴，于是全岛军民都知道了有日本兵活着。1974年11月，原辉第2游击队指挥官川岛威伸率遗骸收集团登岛，遂获知李光辉的踪迹，并找到了他。李光辉在半信半疑中重回人世，先回到日本，后决定返乡。已经改嫁的妻子离婚与他破镜重圆，他收到了台湾和日本政府的100万日元慰问金。但他不会说汉语，同时在生活上暴饮暴食、与邻里的关系不佳。1981年，他因肺癌去世，临终前希望带着儿子去日本游玩。

国际社会不会在战后还将中国东北、台湾、朝鲜人视为日本人，故“最后日本兵”的称号落在了小野田身上。虽然在80年代和90年代，还不时从菲律宾传出发现日本老兵的新闻，但这些传闻或者被证伪，或者是该老兵早已放下武器并改名换姓生活在当地社会里。

那些成名的“老鬼子”

太平洋诸岛的残留日军还有很多，当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断有衣衫褴褛的日本兵从曾经激战过的太平洋岛屿上冒出来。规模最大的投降是1948年1月，200名日军在棉兰老岛上向菲律宾军队投降。知名度高的残留老兵故事，除了上述两位外，还有塞班岛上的大场荣大尉及以下47人、关岛的横井庄一军曹。

2011年上映的日本电影《太平洋的奇迹：被称为狐狸的男人》，再现了大场荣部队的故事。塞班岛战役里，大场荣是第18联队的卫生队长，负责医疗。美军攻克全岛后，日军残兵发起了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自杀性冲锋，大场荣被认为亡于这次玉碎进攻。实际上，他带领46名军人掩护200多名平民躲入山林深处。



日本电影《太平洋的奇迹：被称为狐狸的男人》海报。

他们在维持生存的同时，并未停止对美军的游击战。当得知平民在美军拘留营里获得优待后，他让进山的平民投降，军人则坚持作战。稍受骚扰的美军，给他取绰号“狐狸”。最终，日军第9混成旅团长官使用已经消亡了的陆军参谋本部和大本营的名义，向大场荣部队下达投降命令。1945年12月1日，46人排着整齐队列并高唱军歌《步兵的本领》，走出森林向美军投降。大场荣把军刀交给了美陆战队库尔吉斯中校。

大场荣回国后与妻子儿子团聚，他在1952年进入丸荣产业株式会社，任执行董事一直到1992年，他一度还当选为爱知县蒲郡市的议员，在1992年去世。陆战队员唐·钟斯曾参加过对大场荣部队的清剿，在战后拜访旧日对手，于1982年出版畅销的纪实文学《大场：塞班岛最后的武士1944-1945》。钟斯请求库尔吉斯归还军刀，对方欣然答应，此刀成为大场荣家族的传家宝。2011年，大场荣与妻子在战争期间的书信和明信片，被一群专业的志愿者小组整理出版，名为《大场荣与峰子于战火中的情信》。

29师团38步兵联队的横井庄一军曹，被称为“关岛野人”。关岛之战结束后，他与2名士兵潜伏在丛林里，后为缩小目标不被发现，他们三人分散行动但保持联系。两位战友先后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从1964年起，形单影孤的他仍决定坚守到援军到来时。对于美军的传单，他相信这只是心理战手段。最终，他几乎成为了野人。1972年1月24日，身体羸弱的他被两个猎人发现、制服并交给美军。

在羽田机场落地后，他告诉新闻界的第一句话是："我心中有愧，但我还是回来了。"此语在当年大获流行，国民们热情欢迎他，NHK（日本放送协会）为他制作了专访节目《横井庄一归来》，收视率火爆。横井庄一很快融入了日新月异的战后日本社会，他在回国当年就结婚。他在国内巡回讲演自己的野人生活，还参加了1974年的参议院选举，但失败。横井庄一于1997年去世，2006年妻子将自家改成横井庄一纪念馆并对外开放，馆中除了陈列他在丛林里使用过的生活器具外，还建了他藏身洞的复原品。当年，他就是穴居在地洞里，昼伏夜出。

众多的日本兵在战后拒不投降，首先跟日本人当年的战争观念有关，全社会视投降为奇耻大辱，人一旦投降，回国后将生不如死。其次，跟太平洋战场的环境有关，岛屿四面环海，大小不一的岛屿上多覆盖着热带雨林，没有严寒且食物获取相对容易，这适合残留日军以野人的生活习惯生存下来。

编辑 段宇宏

猜你喜欢



点此阅读

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始末

国共双方对待日本战犯的“以德报怨”或“宽大政策”，都是对待中日关系的务实选择，也同样收取了丰厚的回报。

文 / 王戡

1947年4月26日11时许，一名身穿草绿色呢制日本军服的矮胖男子被士兵架下汽车，拖入南京东郊雨花台刑场，面朝中华门方向按跪在地上。11时30分，行刑士兵向该男子脑后开枪，子弹从面部射出，人倒地身亡。四周围观的市民欢呼雀跃、掌声雷动。这是一场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决，死者是前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被认定为南京大屠杀首犯的谷寿夫。次日《中央日报》评论“此不可一世之杀人魔王，神色黯然，重临旧地，获得其应得的报应”。



图为部分日本战犯。

2014年7月4日起，中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在网上刊布45名于1956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日本战犯供词。这些人罪行累累，同样堪称魔王，却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在当年，这是“鉴于日本投降后10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的决定。如今发布供词，则是为了“揭露日本侵华期间的反人道、反人类、反人民暴行”，谴责“日本安倍内阁上台以后，公然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美化对外侵略和殖民历史”的行为，更被媒体认为是中日紧张局势升级的表现。其实，战后中国审判与处理日本战犯的整个过程，都与国际环境、尤其是中日关系息息相关。

天皇曾是头号战犯

中国政府着手追究日本战争罪行始于1942年。这年1月，被德国占领的九个欧洲国家在英国伦敦签署惩治德国暴行宣言，与会的中国驻荷兰公使（随荷兰政府驻伦敦）金问泗深受触动，提出应当以同一原则惩治日本在华暴行，并向国民政府外交部进行了汇报。以此为开端，国民政府、军委会各部门和各战区、各省政府开始搜集、调查日本战争暴行的工作。1942年8月，外交部致函新华日报社，请其就报道的山东清河日军暴行提供资料。

1944年5月，同盟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在重庆设立远东-太平洋分会，成员包括中、美、英、澳、荷等11个国家，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担任主席，负责调查日本战争罪行，向设在伦敦的总会提交战犯名单。6月，军令部以日军各部队作战经过和部队长名单为基础，拿出了《侵（华）战（争）以来敌国主要罪犯调查表》。作为初步调查成果，该表对战争罪行的描述十分简单，名列第一位的日本天皇裕仁，罪行只有四个字“侵华罪魁”。

日本投降后，同盟国决定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甲级战争罪犯，乙级、丙级战犯则交各国军事法庭自行审判。因此，确定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的日本甲级战犯名单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问题。1945年9月，行政院召集外交部、司法行政部，军委会军令部、政治部，中央党部秘书处、宣传部、远东-太平洋分会等讨论日本战犯问题，之后专门组建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负责调查和提出战犯名单。

中国各界强烈要求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立法院院长孙科、前外交部长宋子文等都表示应当废除天皇制度。但是，蒋介石对此并不认同，他决心“本仁爱宽大以德报怨之精神，建立中日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并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日本的国体应当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

因此，当美国将天皇排除在战犯名单之外，中国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1945年9月底，行政院提出了包括134名军事战犯和48名政治战犯的初步名单，包括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日本首相和陆军大臣、外务大臣、大藏大臣，以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为首的师团长以上级别军事主官，但天皇已被排除在外。

军政各界对这份名单意见不一。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制造九一八之一班日军阀实不可恕，我应即开单提出，其余不必多罗织”，王宠惠和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等也各有看法。经过一个多月的折冲，最终形成了20人的名单，经蒋介石亲自审定，确定其中12人作为第一批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逮捕审判的甲级战犯，此后又确定22人作为第二批甲级战犯。这其中，除近卫文自杀外，均被缉拿归案。

与此同时，确定乙级、丙级战犯名单，以进行逮捕、引渡、审判的工作也在同时进行。1947年，国民政府在1945年9月初步确定战犯名单的基础上，公布了共261人的重要战犯名单，涵盖了甲级和乙级战犯。除了军事、政治战犯外，还包括主张侵华的政治社团头目，如神武会主持人菊池武夫；鼓吹侵华的报社主笔，如《东京日日新闻》的吉冈文六、《外交时报》半泽玉城，以及日本产业株式会社社长鲇川义介、兴中公司总裁十河信二、伪华北开发公司总裁津岛寿一等经济、文化、政治领域的战犯。

丙级战犯名单的确定以民间指控为主。据司法行政部报告，截至1946年10月就收到敌人罪行案件171152件。上海地方法院从1945年11月1日开始受理检举控告，原拟12月31日截止，但因登记人络绎不绝，到次年4月30日才结束登记，共受理案件13208件。但是，民间检控的案件多数只有罪行，其他证据、信息一概缺失，难以继续追究。如司法行政部已经受理的案件107040件中，有三分之二没有犯罪人的姓名。

处决日本战犯人数：**110**人

在确定战犯名单的同时，逮捕和审判战犯的工作也陆续展开。1946年2月，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成立。上海、北平、沈阳、武汉、广州、徐州、济南、太原、台北这九座城市也分别成立隶属当地军事机关的军事法庭，陆续开始对日本战犯进行逮捕和审判。

虽然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在遣返投降日军的同时，严令各战区、各港口运输司令部逮捕查扣被检控的战犯，但是，战后接收的混乱和日本投降前对相关证据的销毁，使一批原本经过调查可以确定的战犯成为漏网之鱼。同时，《同盟国互相解递战事罪犯及其他战事违法人犯公约草

案》又要求引渡战犯必须提出该犯之罪证，使检控材料缺失的中国战犯审判工作更加举步维艰。

对南京大屠杀战犯的逮捕和审判颇具代表性。当时的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已被列为甲级战犯，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等已经死亡，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第9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等则因退役等缘故未被逮捕。最后被引渡到庭的，仅有第6师团师团长的谷寿夫等数人。

引渡谷寿夫时，东京盟军总部曾担心其人是否能在中国受到“公平审判”。为了有效追究罪责及审判公正，南京军事法庭的检察官连日搜集材料、传讯证人、制作证词，甚至挖掘了5处坟墓，检验尸骨上百具，以确定被屠杀者的死因和身份。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成立了“南京市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向各行业收集证据并进行鉴定。南京市民也踊跃提供各种人证、物证，一份后来被列为“南字第一号”的关键证据，来历最为传奇。

大屠杀后不久，南京华东照相馆的伙计罗瑾发现，一名日军少尉送来冲洗的照片充斥屠杀国人的场面，便私下多冲洗了一套收藏。后来，他迫于生计考入汪伪警卫旅交通电讯集训队，仍将放有照片的相册带在身边。一次，日本教官到集训队营房检查，罗瑾将相册藏在厕所边泥墙内，事后却不见踪影。罗瑾以为相册被发现，急忙离队逃亡。其实，相册是被如厕的同队学员吴旋捡走的。吴旋看后意识到相册的作用，便将其珍藏起来，直到抗战胜利后提交给了南京市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12日到20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审判前日本军政人员城野宏等8名战犯。图为日本战犯城野宏（左图）与大野泰治（右图）在法庭上陈述意见。

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励志社大礼堂审

判谷寿夫，到场观众两千余人，王宠惠和外交部长王世杰都到场听审，场外围观者也有数百人。法庭上宪兵森严，审判席前摆放着作为证据的被害者头骨。庭上，检察官以集体屠杀、屠杀、强奸、破坏财产、抢劫五项内容起诉谷寿夫。曾赴东京作证指控松井石根的红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到场陈述所睹日军烧杀、强奸、抢劫行为及红字会收敛遗骨情形，法医潘英才说明第6师团进攻路线上发现的遗骨多为枪伤或铁器所击致死，证人金陵大学外籍教授贝德士、史迈士和被害人家属姚家隆、被害人陈二姑娘分别陈述所见所历事实经过。当京字第一号证据等血淋淋的照片、影像资料呈上时，谷寿夫也“慌乱不能自持”。虽然谷寿夫百般否认，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治军严格未有暴行”辩护，但并未为法庭所采信。

1947年3月10日，南京军事法庭审判长石美瑜以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罪证确凿，判处死刑，驳回申请复审。一个半月后，在南京雨花台刑场上演了本文开头一幕。

对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罪行的中、下级军官的追究，原本应当是军事审判中的重要部分，但限于证据缺失，仅将当时日本报纸刊载屠杀中国人照片的第6师团中队长田中军吉和“百人斩”竞赛的两位当事人——第16师团炮兵小队长向井敏明、大队副官野田毅等三人引渡到庭。这三人在法庭上坚决否认媒体报道的行为。田中军吉称这张照片中他穿着夏装，而南京战役发生在冬季，不能作为证据。向井敏明、野田毅辩称“百人斩”是他们吹牛和记者编造的产物，目的是回日本后容易讨到老婆，但均被检察官一一驳回。三人最终被法庭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押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据统计，除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33名战犯外，国民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共颁布战犯名单15批，共列战犯1575名。实际拘留战犯1111名（包括已列入名单战犯82名，人民控诉经军事法庭受理之战犯1029名）、嫌疑犯2104名。经过审判，共有16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41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10人被判处死刑，其他为无罪、不起诉、不受理、非战犯或未结案人员。

死刑犯除谷寿夫外，还有另一位南京大屠杀参与者、前香港总督矶谷廉介大将，以及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第130师团师团长近藤新八中将、第92旅团旅团长平野仪一少将、台湾步兵第2联队长田中透少将等5名将官，其他则多为杀害民众或破坏地下组织的宪兵，如常熟宪兵队队长米村春喜中佐等，还有被越南华侨指控的岘港宪兵队特高课长

田岛信雄等3人。以前山东督军张宗昌胞弟“张宗援”名义在山东组织伪军的日本浪人伊达顺之助也被判处死刑，和他一样属于“其他”的死刑日本战犯共有35名。

“以德报怨”与“宽大政策”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工作最为后人诟病的一点，是释放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

抗战胜利之初，负责受降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提出“现在我国境内当有日军一百零九万人，如骤将冈村列入罪犯公开发表，对于缴械事宜恐有影响”，参谋总长陈诚也曾要求蒋介石宽恕冈村。因此，冈村虽被列入战犯名单，却始终未被拘留。直到1949年1月，南京军事法庭以“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国际公法之行为，依法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冈村宁次被判决无罪后，中共方面曾严厉表示反对，要求将其重新逮捕。正在运作与中共和谈的代总统李宗仁也曾下了逮捕令，但在汤恩伯等人的掩护下，冈村已经搭乘轮船回国。其他被关押服刑的日本战犯，包括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中将、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少将等人在内，也于1949年1月被运往日本继续关押。随后，他们因减刑、有期徒刑期满、保外就医等原因陆续被释放。1952年4月，台北当局与日本国签订了停战和约，4个月后在日本巢鸭监狱关押的剩余88名中国军事法庭判决的战犯全部被释放。

在1949年前，中共对国民党政府的战犯审判及其“以德报怨”政策持负面评价，多次发表社论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审判结果是“第二次卖国”。在抗战胜利之初，中共也曾在其控制区内审判、处决了一批日本战犯。如1945年9月，晋察冀边区政府以特务罪名处决了石灰公司经理小林德、宪兵准尉井上久男等9名被捕的日本人。在中共控制的东北九省，也逮捕处决了伪满政权中的日系官吏，如三江省次长手岛明义、通化省次长菅原达郎、安东省次长渡边兰治及副市长、副县长等20余人。

但随着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中共对处理日本战犯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49年后，中共关押着两批日本战犯。一批是苏联于1950年7月移交的969名关东军官兵和伪满官吏；另一批则是国共战争期间俘虏的140名被阎锡山留用的日本残留军人及相关人员。中国政府在太原、抚顺、哈尔滨等地设置战犯管理所关押这些战犯。

在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开始处理这批日本战犯，并将其视为打通中日间关系的重要渠道。1954年11月，中国红十字会访日代表团在日本

发表了战犯名单，此时还有1069人在押，另外40人因病死亡。到1956年准备对在押战犯进行审判时，又有7人死亡，其中包括策划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和协助阎锡山留用驻山西日军的河本大作。

1956年4月25日，中国向苏联送交了关于处理日本战犯问题的备忘录，说明“中国检察机关为做好审判的准备工作,对这批战争犯罪分子的罪行,进行了必要的侦讯和调查。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完毕”。但由于调查中存在“证据不全”、“主要靠自供与互相检举的材料”问题，最终确定了“多数战犯还是要释放”和对起诉审判的战犯“只判有期徒刑，不判死刑”的政策。

1956年6月9日到7月20日，沈阳、太原两地军事法庭开始对在押战犯进行审判，其中，属关东军系统的师团长铃木启久、藤田茂以下8人，属伪满系统的武部六藏以下28人，属山西残留日军的城野宏以下9人被判处11年到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这也是近期公布45份战犯供词的来源。其他1017人免予起诉，立即释放。而这45人除第39师团师团长佐佐木真之助死于狱中外，其余到1964年已经全部释放。

其实，国共双方对待日本战犯的“以德报怨”或“宽大政策”，都是对待中日关系的务实选择，也同样收取了丰厚的回报。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在冈村宁次的推动下，大批旧日军军官前往台湾培训国民党军军官，并参与了兵役制度和动员体制的建立，使国民党政权获得了对抗大陆的人力资本。在日本政坛也形成了一股“亲台派”势力，为国民党政权与日本政府的往来，特别是“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之后的双方关系出了不少力。而被大陆新政权释放的日本战犯，也组成了以藤田茂为首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为打开冷战僵局及日后“中日关系正常化”进行了持久的努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中日关系紧张之时，都会看到这群老人为中国奔走和游说的身影。

编辑 段宇宏

经济腾飞后折翼的东瀛

日本战前经济危机及其后果

文／晴岚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皇太子嘉仁即位，取易经“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之意，改元“大正”。彼时之日本，通过两次战争豪赌，已经获得了丰厚回报，作为英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友， 融入了以大英帝国为核心的国际融资与贸易体系，坐享帝国上世纪极盛期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的秩序红利。

与政治军事上的夺目成绩相比，日本经济发展仍然步履维艰，缓慢的内部资本积累使重工业部门尚未脱离萌芽阶段，对外贸易中日本所能供应的纺织品与杂货拓展市场十分艰难，有限的外汇收入应付外债也时常捉襟见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犹如天佑神助，令日本经济从乡间小道驶上了高速公路，但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对日本造成了巨大冲击，给它的政治、经济蒙上了厚厚的阴影，也对东亚乃至世界的政经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奇迹

交战国战时需求及列强商品退出东亚市场后留下的广阔空间，使日本对外贸易局面发生魔术般变化，净出口自1915年起转为巨额盈余，其后连年暴增，在最高峰的1917年，净出口占其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0.9%的惊人水平。商船队规模由战前的7.8万吨，增至1918年的51.3万吨，总吨位攀升至世界第三，也为日本带来了巨额海运费收入。

与后世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相同，国际市场空间与剩余劳动力结合促成了外贸爆发，而贸易部门的发展产生就业机会并积累大量资金，进而为国内消费与投资奠定基础，进口来源的断绝，也刺激重化工业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投资年均增速达到惊人的26.5%。

日本的巨额贸易顺差一直延续至1919年，利用经常收支上积累的盈余，日本一举由违约在即的重债国，转变为净债权国，官方外汇储备在1919年末达到了21.8亿日元，相当于当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

随着世界大战的落幕，战后日本向何处去？作为既有国际体系最大受益者之一，日本政界对与英美协调尚有着清醒的认识，其战后外交取

向，是在合作的基础上，依靠自身新晋大国地位，寻求有利于己的东亚战后国际秩序。 这一目标随着战后日本跻身国联五大常任理事国，并在华盛顿和会上获得列强对其西太平洋新占领地的确认而基本实现。

在日本社会内部，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市民阶层壮大，民智渐开，面对财阀等权贵阶层的种种特权与收入分配的悬殊差距，社会下层不满情绪滋长，1918年，因物价上涨导致规模空前的城市平民“米骚动”；另一方面，日本的发展“奇迹”令部分知识分子醉心不已，开始寻找有别于传统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解释，这种从一开始就步入歧途的自我塑造尝试，内嵌着与外部世界冲突的结构性因素。



1920年代后期东京银座，画面中能见到开业不久的松屋百货公司，这是当时日本最豪华的百货公司之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悬殊。

1918年10月，大川周明创立文化沙龙老壮会，成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原点。

经济上，战时出口热的退潮势所难免，英美资本重返亚太后，日本外贸增长明显减速，仅以中国市场为例，随着民国与英美贸易的恢复，战后日本在中国贸易中所占份额由1919年的36%下降到1921年的22%。 旺盛的国内投资则使进口居高不下，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使日本贸易收支于1919年转为赤字，赤字规模其后更连年扩大。（值得一提的是，对外贸易的这一变迁绝非日本特例，由于比较优势的变化，一国贸易大量盈余的状态很难长期维持，本世纪的中国经济也走过了相似轨迹，其一般贸易自2009年后即转入赤字状态。 ）

为维持景气，1918年上台的政友会内阁推出了大手笔财政刺激计划，当贸易红利渐衰，出口导向向内需拉动的转型似乎顺理成章，处于城市化初期的日本经济搭配充裕政府财力，投资拉动的空间看起来也无限广阔。

漫长的20年代

1920年，美国恢复战时中止的金本位货币制，由此导致的通货紧缩使美国经济陷入短暂萧条，由于日本出口对于美国市场的高度依存，这一冲击向日本国内快速传导，东京、大阪股市暴跌，一度暂停交易达30天，这次危机后，日本社会一战以来延续的亢奋气氛为之一变，贯穿整个20年代的慢性萧条拉开了帷幕。

20年代日本依然成功维持了宏观指标的强劲，十年间，GDP增速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这一时期拉动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是国内投资，其中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财阀企业又一马当先，这类企业占据着各种有利可图的资源性、垄断性行业，依靠关联银行的特殊关照，其获取信贷资源远较一般企业容易。

然而投资拉动的问题在于其所能提供的迂回空间有限，新形成的生产能力最终要顺着产业链条依靠下游市场消化，一旦外部需求放缓，则必将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这正是20年代初日本经济面临的挑战。除企业产能过剩，地方政府投资也快速膨胀，地方财政支出占比，由1910年代末的30%，增加至1920年代末的50%。

面对经济见顶，调整自然是一种共识，不过刚刚经历高速增长期的社会，从上到下对于经济下行事实上都抱有一种叶公好龙的态度，历届政党内阁均不愿承受泡沫破裂的政治代价，只能采取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拖延政策，等待外部需求好转。

大量僵尸化企业依靠关联银行维系运转，企业所积累的不良资产也逐渐转化成银行部门的庞大呆坏账。投资与信贷的自体循环造成日本银行业存贷比持续紧张，吸储困难之下，不得不日益依赖同业拆借市场融资，借短放长造成明显的期限错配，进一步放大了潜在风险。

面对严峻局面，日本央行成了疲于奔命的裱糊匠，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银推出震灾特别融通窗口，为受灾企业提供定向货币宽松，避免信用链条断裂，然而这一渠道很快演变为变相的全面放水，这种为刚性兑付背书的行为，进一步助长了投机行为。直至1927年当央行试图收紧票据贴现条件，却使两家主要银行的坏账暴露，一举爆发战前日本最严重的银行危机。

投资率的不断增长必然压缩消费率，投资泡沫滚动的同时，企业盈利能力反而持续恶化，吸纳新增劳动力的能力下降， 20年代后半期，隐性危机的后果开始在社会层面显现，据1926年统计，当时薪俸为生家庭中，有80%入不敷出，同期，大学与专门学校毕业生也出现严峻的就业问题，“毕业即失业”成为普遍现象，至20年代末期就业率已不足40%。中间阶层生活状况恶化，青年人口向上流动的难度增大，与此同时，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必然导致收入分配向资本的过度倾斜，20年代日本基尼系数直线上升，一度达到0.6的超高水平，贫富差距日益悬殊。

魔瓶开启

长期经济危机必然对社会产生冲击。

1921年，发生了退伍军人朝日平吾刺杀大财阀安田善次郎，并随后自杀的爆炸性事件，在朝日所写的遗书《死亡呐喊》中，集中表现了底层日本青年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奸商安田虽积巨富，却不尽富豪责任，无视国家社会。因而加以天诛以为世之警示”。

面对社会矛盾激化，日本国内各权力集团对改革的必要性有直觉认识，却对改革方向缺乏共识，明治维新以来政坛前台的几大势力，军头、政党、重臣，由于其行政经验的积累，行为方式逐步向主流世界趋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传统实权集团事实上成为最重要的开明派力量。

然而传统实权集团保守的施政无法解决隐性危机对社会消耗，其民意基础在20年代被极大削弱，而组成明治体制的其他边缘集团，尤其是宫廷、华族和军部内反长州势力，则有意识地开始在军国主义中寻找理论依据和政策出路。



1929-1931年，日本政府将日元贬值。这一举措让日本纺织品在出口市场上取代了英国纺织品成为了第一。丰田公司便是当时以纺织起家。

1919年，长期参与同盟会地下活动的浪人北一辉目睹五四运动，理想幻灭之下于上海闭关四十余天，炮制出日后军国主义夺权的总纲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他以一种强烈的受害思维解读日本与列强间的利益折冲，将国际事务上的野蛮视为大国崛起标志，将践踏国际体系视为强国特权。这部逻辑混乱的大杂烩，在日本国内却反响强烈，北一辉也一跃成为新时代思想教父。 回国后的北一辉，很快与大川周明合流，将老壮会改组为政治色彩更加鲜明的犹存社，着力向少壮军人和大学生群体扩散其思想。

1923年起，宫内省在原皇居内旧中央气象台遗址设立了社会教育研究所教育部（大学寮），负责该机构日常事务的，恰恰是大川周明创建的行地社，这一平台也自然成为上层权贵与底层投机者各取所需的拍卖会场。

20年代隐性危机导致的阶层固化与贫富差距，使大量日本青年成为法西斯思潮的追随者，坚信“英美鬼畜”害怕神国日本崛起，破坏日本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建设，拉拢中国等周边国家形成对日本的ABCD（美英中荷）环形战略包围圈，国内的乱象也是鼓吹民主自由的国贼败坏的，这样简单直白的阴谋论对底层青年表现出十足的吸引力，成为转移青年不满情绪的最佳廉价娱乐。

庞大的粉丝群体也是一棵摇钱树，例如北一辉这位“意见领袖”， 凭

借其影响力四处勒索财阀与官僚，形成一门日进斗金的舆论水军生意，名气和财力，又得以帮助他进一步跻身上流社会圈子，寻找更大政治投机的机会。忽悠底层群众的在野“思想家”，与寻求理论工具和社会基础的上层权贵相结合，通过拨弄民意将会爆发出巨大的盲动力量。

脱轨

1929年，新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终于做出“金解禁”决策，恢复中止多年的金本位体制，相当于断然实施紧缩性政策，其背景是日本投资泡沫已经滚动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除内部紧缩外，滨口内阁对外试图继续确保与英美协调的外交路线，以换取贸易与融资空间，1930年“伦敦条约”的签订就是这一努力的体现。

然而，国内极端思潮的壮大，已经注定了这次改革的失败，恰好发生在此时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使“金解禁”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日本经济的各种内在矛盾一举表面化，1929-1931年，形成了日本现代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从“金解禁”开始到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由于对日本经济的极度悲观预期，资本外逃现象失控，1930-1931年黄金流出合计达8亿日元以上。同期推断城市人口失业率已高达15%-20%，原有政治经济体制濒临崩溃，蠢蠢欲动的各路政治势力嗅到权力摇动的气息，如同猛兽般扑了上来。

1930年，滨口内阁顶着国内重重压力，强行签订“伦敦条约”，成为刺激极端势力暴走的催化剂，海军谈判代表财部彪返回东京时，一下火车便收到了自杀建议书，1930年底的日本，弥漫着狂躁而恐怖的气氛。

1930年11月14日，滨口遇刺重伤，并最终因伤势复发于次年8月不治，滨口雄幸之死及随后发生的“9·18”事变，标志着开明派匡正国家道路的最后努力宣告失败，惶恐不安的各大财阀转而大力资助极端势力，军国主义全面掌权的前景已告明朗。

战前日本的经验再次证明，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后发国家在适当条件下，可以成功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过程加速吸收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发展成果，在短时间内改变社会面貌。

然而其后日本发展道路的脱轨，也显示出高速增长期的结束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意味着潜在的社会风险，前期形成既有利益格局的强大惯性，往往通过保守的治理使经济泡沫持续期被人为拉长，直至将政策工

具的腾挪空间消耗殆尽，慢性危机的代价必然在社会层面得到反映，然而后发国家落后的社会结构恰恰决定了其内部承受经济波动的能力不足，这使鼓噪民意对外转移危机成为有诱惑力的选项。

一旦挑唆民意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随后的进程往往将超出所有当事者的控制，这一点已经被太多历史教训所证明。讽刺的是，在1945年日本紧张的停战活动中，宫廷集团又一次成为主导力量奔走于幕后，一如其在20年代培养极端派的热情，始作俑者，最终也尝到了骑虎难下的苦涩滋味。

编辑 段宇宏

猜你喜欢



点此阅读

东条英机最后的日子

狂热军人的政变失败后，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切腹自杀，随后揭开将领自杀高潮。

当军官们纷纷劝东条自杀时，他说：“活着比死幸运，还是让我稍微考虑考虑。”

记者/ 陈祥

1945年8月15日被称为“日本最长的一天”。为阻止天皇“终战诏书”录音的发布，以陆军近卫师团参谋、东条英机的女婿古贺秀正少佐为首的一小撮战争狂人，在前一天发动了兵变。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的态度直接决定了政变成败，得不到更多支持的政变很快被扑灭，古贺在绝望中切腹并开枪自杀。

阿南惟几在8月15日黎明切腹，揭开了自杀高潮。这一天，多名军政要员先后自杀，将级军官就有十余人。

多人自杀的消息传开后，大家相信身负战争责任的东条英机也应该自杀，一些从外地归来的校级军官纷纷劝他自杀。“活着比死幸运，还是让我稍微考虑考虑。”东条英机拒绝了。但当东条英机在9月11日面对美军入门逮捕时，他以手枪自杀，而非日本传统的剖腹方式，更具戏剧性的是自杀失败了。一时间，东条英机沦为日本社会茶余饭后的一大笑柄。

“你有三个儿子，却一个也没有战死”

秘书官广桥真光在战后来到东条英机家里照顾他，广桥劝东条英机把家里的佩刀和天皇赐物藏匿起来，将家属疏散到外地。8月27日，东条英机送四个女儿回妻子的娘家九州田川市，家里只剩下妻子、女佣、日本宪兵和警察。后顾之忧去除后，东条英机开始敞开心扉告诉广桥：“要说战争责任，那就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好了，为了国家我将做出最后的献身，至于同盟国军所说的战争罪犯，我完全不能接受。”时值纽伦堡审判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许多纳粹要人胆战心惊等待盟军检察官的弹劾，兔死狐悲，东条英机不免忧虑不安。尤其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墨索里尼尸体被倒吊的照片，更是忧心忡忡感叹：“我不想让我的尸体被糟蹋得这么难看。”

9月初，茫然若失的次子回家向父亲建议：“让我们一起用自杀来了结。”父亲当即制止儿子的自杀念头：“我的事你们别管，今后日本的建

设还需要你们年轻人。不能去死，如果真想死的话，那就再等待三年，这期间如果还没有改变你们的想法，那就去死好了。”

与此同时，战败时尚在陆军士官学校上学的三子也回家找过父亲。天皇宣布投降，对这个正准备在陆军里大展宏图的热血青年而言，无异于天崩地裂，他终日啼哭。“今后还要为日本的建设献身嘛！”父亲不断安慰和劝导这个沉浸于绝望中无法自拔的年轻人。



1948年12月23日，东条英机在东京接受审判。

麦克阿瑟宣布接管日本后，愤怒群众纷纷写信给东条英机，因为他们不再惧怕遭军部势力的报复。“因为你，我儿子才死的。”“用剖腹自杀来向国民谢罪吧。”“趁早自杀吧。”……类似问责纷至沓来。“你有三个儿子，却一个也没有战死，难道不是这样吗？”一封战争寡妇的来信最让

东条英机坐立不安。他读完后有气无力辩解，大儿子是伪满的警官，二儿子是飞机专家，故他俩未被征召入伍，而三儿子尚在就读军官学校。

多少日本家庭在侵略战争中失去儿子，但战争罪犯东条英机的三个儿子在战争结束时安然无恙，他们必然饱受社会舆论的攻击。事实上，东条英机的长子与父亲关系一直不合，而东条英机也对他敬而远之。“我从来没有沾过父亲的光，现在战争结束了，却说我们是东条的儿子、孙子，受人欺侮。”长子在战后满腹牢骚，“是什么造化让我生在东条家？”

“时刻终于到来了。”东条英机闻知自己名字列在即将被逮捕的战争责任者名单之首时哀叹。9月5日到9月10日，他陷入一生中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刻，是按照1941年初以自己陆相名义签发的《战阵训》自杀，还是作为战争罪犯接受盟军的审判，他迟迟不能下决定。“活着就不能接受被俘虏囚禁的侮辱”，《战阵训》这么训诫日本陆军，它强化否决了被俘投降观念，它和武士道精神一起被视为日军“玉碎”行为的推手。

知道自己来日不多的东条英机，偷偷写了遗书，并托人找地位最显赫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德富苏峰修改。遗书由400字的《告英美各国人民书》、480字的《告日本同胞书》、400字的《告日本青年书》组成。三篇文章折射了东条英机死不悔改的立场，他仍然鼓吹战争的责任在于美国，日本是神国也是不灭之国。写遗书的同时，东条英机计划好自杀方式，把子弹射向心脏。他向邻居医生请教了心脏的准确位置，对方用木炭在东条英机胸口画了一个圈，让东条英机牢记。

9月10日，两个美国记者来到东条英机家里采访，他们围住了刚从陆军省汽车下车的东条英机。东条英机说完“败军之将不言兵”后，便闭口不言。坚持不懈的美国记者还是撬开了东条英机之口，他坐在院子里接受了采访。记者透露盟军最高司令部将在2至3天内逮捕战争责任者的情报，并问他该由谁来背负挑起太平洋战争的责任。“你们是胜利者，现在你们可以确定谁应该负责，但五百年、一千年以后，历史学家也许将做出不同的判断。”东条英机顽固狡辩。

谈话气氛颇为轻松，东条英机给记者留下了不同于“日本的希特勒”、“东方的拿破仑”等既往宣传中的印象。“有时是钢铁般的冷酷，有时是发自内心的笑，谈话是在气氛不断变化中进行的。”记者的稿件居然对这个战争罪犯充满了好感。专注于昭和史研究的保阪正康则认为东条英机“在失掉了地位后的今天，他只不过是一个过分谨慎而怯懦的人，怀着恐惧的心情呆立在这些敌国记者的面前。”

“我一定要拍苍蝇趴在东条前额的样子”

9月11日下午1时刚过，许多吉普车抵达东条家门口，30多个执枪的美国宪兵下车。消息灵通的美国记者们也蜂拥而至，他们徘徊在东条家周围，有人直接走入院子，在玻璃窗前窥视屋里。被逮捕的时刻终于来临，东条英机已事先命令妻子东条胜子和女仆去亲戚家躲避，但胜子不愿离开，她向邻居医生说明了情况，得以允许戴着草帽在医生家院子里假装除草，随时注意自家动向。

东条英机最后检查了一遍家中长年使用的写字台、座椅、文件柜。待客的茶几上放着他的遗书、两把手枪、一柄短刀；房间的一角叠放着一套佩有大将肩章和六枚勋章绶带的军服，下面还有三把佩刀。

美军在临近下午4点才开始行动，两辆高级军官使用的吉普车在东条家门口停下，宪兵队长保尔·克劳斯中校开始敲门，所有美军端起枪支。东条英机穿着短袖开襟衬衫，把已故女婿留下的手枪放到茶几上，打开客厅窗户问：“你们有逮捕证明吗？”一个宪兵给他出示了文件证明，东条英机看完后允诺：“马上就给你们开门。”东条英机坐在客厅沙发上，身为左撇子的他用左手握手枪对准胸口的圆圈，一声枪响。

宪兵和记者们迅速冲进房子，赫然见到血流如注的东条英机躺在沙发上。正在隔壁院子里的胜子则开始合掌祈祷，祝愿丈夫能像一个军人那样死去。克劳斯中校对手下喊道：“停止射击。”与此同时，手枪从东条英机手中滑落在地。

由于枪的后坐力，子弹射偏了。等待东条英机咽气的过程中，美国摄影师们不断摆弄他的肢体，就像对待人体模型一样。“把东条的头稍往右移点……就这样……很好……请您移开一点好么？我想拍一张东条拿着手枪的样子……能帮忙把枪压紧在他手里么？……这只苍蝇又来了……我一定要拍苍蝇趴在东条前额的样子”。随着闪光灯此起彼伏，摄影师们忙得不可开交。

除了东条英机外，只有一个日本人在场，他是《朝日新闻》的记者长谷川幸雄，因美国记者请他做向导找寻东条家。他跟在克劳斯身后钻进客厅，凝视这位曾经显赫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据他的描述，东条英机面色苍白，满脸汗水，血像泉水似地从胸口涌出，滴落在地板上。长谷川替美国记者翻译了东条英机的低声呻吟，东条英机反复模糊念叨“但愿一枪就死”。“大东亚战争是合理正义的，我等待着历史的审判。”因痛苦而面部狰狞的东条英机断断续续吐出这句话，成为记者们的记录重点。



美军攻击东条英机的宣传海报。

1956年8月的《文艺春秋》，刊登了长谷川的回忆文章《东条自杀目睹记》。长谷川首次公布东条英机所说的话。“但愿一枪就死，可遗憾的是仍需要时间。”“大东亚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对国民和大东亚民族却是悲惨的。”“我不想在法庭上站在胜利者面前接受审判，宁愿等待历史的正确批判。曾想剖腹自杀，可往往是失败的。”“天皇陛下万岁。死后也要做个护国之鬼，以尽最后之忠诚。”

为了抢到独家新闻，记者克拉克·李和哈里·布伦迪奇试图加速东条英机的死亡。李给同事打电话时，周围的记者同仁误报东条英机已死，于是李通知同事快速发布这一消息。待李亲自确认东条英机一息尚存时，电话机前排起了长队，他已无时间更正之前的错误信息。李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以一己之力改变新闻事实，他叫上布伦迪奇一起翻动东条英机的肢体，以加速对方死亡。事与愿违，他俩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抢救了东条英机，他们希望通过加速伤口出血，但翻动肢体的动作使得东条

英机免于死于肺部充血。

身处如此一个历史性场面，美国人纷纷顺手牵羊拿走很多小器物作为纪念品，如毛笔、文件柜里的小摆设、手枪等。有人用手帕沾了东条英机的鲜血，有人从他浸满血的马裤上整齐剪下一角。据克拉克·李回忆，他看见一个摄影师从窗外伸进一只手，沿着窗台摸索到一个皮制手枪套、一把武士道刀，摄影师将刀插入裤腿里，一瘸一拐往外走，宪兵拦住了他并警告："走得不错，但是请奉还！"

当记者们仓促记录完新闻报道、拍完照片后，他们都在等待东条英机咽气。美军很快就反应过来，开始有条不紊抢救东条英机，有人熟练地给他试脉搏，有人用绷带包扎，美军医生随后赶到。东条英机很快被送到横滨的美国陆军临时医院，美军自然不希望他如此便宜地死去，因为他将成为受审的主角。通过美国士兵的输血，东条英机被救活了，输血本身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9月11日深夜，美军确诊东条英机的伤情：子弹从第六与第七根肋骨之间穿越，稍偏离心脏，未造成致命伤。第8集团军司令罗伯特·艾克尔伯格中将去医院看望了东条英机，东条英机表示为美军添麻烦了。"你是说今天晚上还是过去几年添麻烦？"对方反问。

对于东条英机的自杀未遂，盟军最高司令部思虑再三，只发表一则简短的声明："根据遗书的内容，是为拒绝审判而自杀。"

"这个黄皮肤的杂种连用刀自杀的胆量都没有"

新闻主角没有死亡，李、布伦迪奇在内的很多美国记者顿觉失望，他们咒骂东条英机是个懦夫、胆小鬼。9月12日的《纽约时报》的《东条》一文讽刺道："这个黄皮肤的杂种连用刀自杀的胆量都没有。"

自杀未遂的东条英机不仅在美国媒体中遭鄙视和讽刺，更是受尽日本民众的白眼。国民们将其视为失败者和伪君子，因为他没有身体力行自己当初对全国军民的教诲——宁死不屈。美联社在东条英机自杀当天发表的报道，名为《日本民众痛恨他，因为他居然连自杀都失败了》。很快，日本社会以"那个笨蛋"来称呼东条英机。

国民对"那个笨蛋"的怒火，燃及他的孙子。1945年的暑假结束后，刚进入小学三年级的东条英机长子的儿子回到学校，就进入一个被敌视的氛围。"我不想当东条英机孙子的老师。"一位老师冰冷扔下一句话。还有一位老师教育学生："东条同学的爷爷是一个比小偷还坏的人。"没有一个班级愿意接收他，孩子只好独自在操场上玩耍，他有时爬上旗杆

向教室内张望。

11月的《生活》杂志报道，正在大森监狱里的东条已经倒霉到被其他战时同僚排斥，别人拒绝和他一起散步、下围棋、进餐甚至谈话。《纽约时报》在12月报道，“没用的东条”已经同“巧克力”、“香烟”、“吉普车”等词一起进入日本人有限的英语词汇中，成为日本社会最流行的英语用词。

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实行绞刑，33分钟后结束。两辆蒙有篷布的美军卡车悄悄驶出巢鸭监狱，直奔横滨市西区的久保山火葬场。美军秘密火化这七具尸体，然后将骨灰从飞机上投掷入大海。之所以这么做，美军担忧这些骨灰被人拿走当做“圣物”，继续鼓励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一个美军士兵在火化过程中喊了句“一号，东条”，立即遭上司军官斥骂，军方要求禁止区分7具棺材里分别躺着谁。

最终事实证明，美军的担忧是徒然的，战后的日本社会十分反感东条英机在内的战争罪犯们。不过，小矶国昭的律师三文字正平想方设法搜寻7人的骨灰，他最终通过火葬场场长飞田和附近寺庙兴禅院住持市川义雄搜集到一部分。寒冷的冬夜里，两人用火铲从无主遗骨存放处一堆闪着青白色光芒的新鲜骨灰里铲走一部分。

1949年5月3日，三文字正平将骨灰带到热海市的松井石根家，东条胜子也等候在这里。这些骨灰被藏到热海市伊豆山上的兴亚观音寺里。

1952年，东条英机的遗书被美国合众社记者赫普莱特发表在《中央公论》杂志上。“东条无责任论的内容充分表明了他根本不谈结果，仅宣扬‘公理正义在我’，一直到战败后还要对国民下命令，对青年施加教训。”法学家戒能通孝在同期杂志里附上评论，他的观点代表了战后日本社会普遍的看法。

“七士之碑”的揭幕仪式在1959年4月17日公开举行。不过，“七士之碑”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长期寂寥，直到它在1971年12月12日被一个极左组织“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炸毁，才闻名全国。碎块很快被从德国进口的黏合剂完美修复，而东条英机的历史形象依然没有被“翻案”，他至今仍然是作为反面人物而深入人心。

东条胜子在1983年夏天去世，时年94岁，日本各大报纸的讣告栏目都印上了“东条胜子”的名字。“她的后半生是忌惮世人眼神与评价的几十年。”作家猪濑直树评价。三个月后，东条家的老宅被拆除。

编辑 段宇宏

五国秘辛系列其他篇



五國秘辛

中國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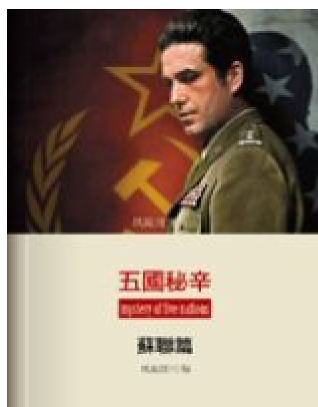
五國秘辛

韓國篇



五國秘辛

德國篇


五國秘辛
蘇聯篇



五國秘辛

mystery of five nations

蘇聯篇

凤凰周刊 编

Table of Contents

序言

苏联领导人如何接触群众

苏联缘何三年连逝三任总书记

解密《猎杀红色十月》原型事件

解密二战苏联百万伪军

撬动冷战格局的顶级间谍

一本苏联史学杂志的兴衰

现代物理学如何在苏联活下来

版权信息

五国秘辛·苏联篇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凤凰周刊》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2016©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2016

本书版权为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所有。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TCFP-N00007207-20160304

最后修订：2016年08月09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序言

解密曾经世界大国。

1922年12月30日，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苏联成立，1991年12月25日解体。

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和人口第三多的国家。

这个曾经的世界大国尚有许多秘密令世人探究。

苏联领导人如何接触群众

特约撰稿员 / 方亮

斯大林遇刺后变老实

苏联领袖斯大林1929年在保镖保护下漫步于莫斯科的那张照片非常知名。这张照片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因为那时这位领袖人物时常在克里姆林宫外走动，有时甚至不带保镖。

列夫·托尔斯泰回忆起布尔什维克政权刚刚占领莫斯科的那些年月如此写道：“在克里姆林宫乃至整个莫斯科，到处都是从四面八方涌入的外地人，到处都在因房子问题而爆发争夺。”正如托翁所言，房子成为稀缺资源，而克里姆林宫自然被新政权所看中，上千名里面的“原住民”遭到驱逐。1918年列宁刚到莫斯科时住进了“民族饭店”，随后便搬进了克里姆林宫。他自然要求其他战友也搬进来，斯大林、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等主要领导人都陆续搬了进来。其中，位于克里姆林宫西北翼波杰什内宫内豪华的一号房被列宁特意留给了他的情人伊涅萨·阿尔曼德。1920年，阿尔曼德患霍乱去世，房子空了下来，被悲痛的列宁指定给了斯大林居住。

自那之后斯大林就每天步行穿过克里姆林宫和红场，沿库伊贝舍夫路（现为伊尔因卡路）到其位于老广场4号楼五层的办公室上班。那段时间留下了不少斯大林与其他领导人一同漫步于莫斯科大街上的照片。那时对克里姆林宫和领导人们的安保工作远不似现在这样严密，所以平民与领袖们“亲密接触”的事情也就时有发生。

斯大林近臣莫洛托夫在上世纪70年代末回忆过这样一件事。

在一个风雪弥漫的天气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雪地里慢慢走着，他们一个保镖都没有带。斯大林穿着貂皮大衣，脚蹬毡靴，头戴护耳皮

帽，没有人可以凭外表认出他。突然，一个乞丐靠了过来，朝斯大林乞求道："好心的先生，可怜可怜我吧！"斯大林从兜里掏出十卢布递给他，继续向前走。不料那个乞丐却在后面偷偷骂了一句："该死的资本家！"

斯大林听到这句话，侧脸对莫洛托夫说道："理解我们的人民吧！给少了，不好。给多了，还是不好！"

斯大林总是如此暴露在外，持续了十多年，苏联高层逐渐开始对此担心，尤其在斯大林成为政治核心之后。1930年10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决定，斯大林必须停止在莫斯科城内到处逛的行为。但是，斯大林对这一要求充耳不闻。直到他的安保负责人将1931年11月16日发生的一起意外事件的材料递到他手上，他才老实下来。



1930年7月1日，斯大林（左）与谢尔盖·基洛夫步行前往参加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那天凌晨3点35分，斯大林带着保镖走在库伊贝舍夫路上。一位路人认出斯大林，欲掏枪刺杀，但被保镖制止并被制服。整个过程斯大林都没有发觉。

后来查明，行刺者是受雇于英国情报部门的白俄分子普拉东诺夫·别京。

这份材料中最后写着领导集体的再一次集体决议，要求斯大林不要再步行外出。最后则是莫洛托夫、卡纲诺维奇、加里宁、库伊贝舍夫和雷科夫的联合署名。

自那之后，斯大林再也没有随便往外跑。1932年2月，斯大林将办公室搬到克里姆林宫，其住处离办公室很近。一年后，他又搬到沃雷恩斯基的别墅中，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加上安保工作愈发严格，所以普通人基本上再无缘近距离接触斯大林。

一些文献档案中还是记载了几次例外。比如1933年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在斯大林格勒乘坐敞篷车从高处俯瞰一家拖拉机厂，结果被人们发现。当人们兴奋地向斯大林跑来时，他赶忙下令驶离。尽管如此，当地人还是把这个消息传开了。大家都盼望着斯大林的视察，结果斯大林却没有出现，以至于工人和市民们非常失望甚至开始抱怨。

“大清洗”之后，人们更无缘近距离看到斯大林。1947年的一段小插曲被认为是斯大林生前最后一次与老百姓接触。那年8月，斯大林决定坐汽车而非火车去南方做一次旅行。安保部门做了周密的计划。天气炎热导致轮胎过热。在一段不见行人的路上斯大林命令更换轮胎，然后他带着几个保镖信步向前走去，命令车子换好轮胎后赶上来。走了一小段路后，斯大林遇到了三个年轻人，他们也在给车换胎。三人看到斯大林后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而斯大林和保镖则直接走了过去。过后三人回过神来，拥抱在一起，庆幸自己如此近地见到了斯大林本人。

当时斯大林的保镖弗拉西克向学者们原原本本讲述了这件趣事。

在此之前的一次“亲密接触”，发生于莫斯科大剧院。当时有一场演出观众爆棚，而斯大林竟也不请自到地莅临现场。但他是在包间中观看演出，只是在剧院外走出车子时才被部分观众从楼上看到了。一个女孩子看到斯大林后激动地告诉了老师。而经历过“大清洗”的老师则惊恐地告诫她不要声张。老师的小心在孩子内心留下了恐惧。在那之后很长时间孩子都不敢提起这件事，哪怕对家人。直到20年后，她才对自己的女儿说起了这件事，若干年后又对研究历史的女婿讲起这件事，这才让这小段历史被记载下来。

赫鲁晓夫遇“拦轿喊冤”

继任苏共总书记的赫鲁晓夫也很喜欢在莫斯科城里晃悠，而且还带着家人。其子谢尔盖回忆称：“爸爸经常带着我和妈妈散步，一般还叫上格里高利·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一家。两位父亲走在前面，两位母亲紧跟着，我和格里高利·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的两个孩子走在最后。”

当然，保镖们就在旁保护，而且尽量不打扰两家人。赫鲁晓夫非常不喜欢保镖们的打扰。他曾经多次训斥保镖们，称他们是“不让群众走近

的无用之人”。他还曾缩减安保部门编制。

所以保镖们尽量不打扰赫鲁晓夫。好在他带家人散步一般都在晚上，而且不走远。借着天黑，没有人认出他和马林科夫。

赫鲁晓夫喜欢和普通民众接触，但前提是由他主动接触，而非民众主动他被动应对。



1961年8月7日，赫鲁晓夫在参观某集体农场时与农妇交谈。

他还曾对保镖回忆起他与妻子在新年夜跑到大街上的往事。当时，在列宁大街上有行人喊道：“看呐！好像是赫鲁晓夫！”他们两个只得快步离开，未曾遇到麻烦。讲述这件事时，赫鲁晓夫未曾说明当时是否有保镖保护。

曾担任赫鲁晓夫保镖的谢尔盖·科罗廖夫回忆了这样一件事。1961年的一天，度假中的赫鲁晓夫遇到三个“拦轿喊冤”的平民。他们不知从哪里得知赫鲁晓夫驾到的消息，准备好控告地方政府官员滥权的材料，找到赫鲁晓夫后便递了上去。赫鲁晓夫被吓了一跳，他先把那三个人骂了一顿，然后让随从保管好那些材料，最后命保镖把他们抓了起来。三人被关进了地方警局，第二天被释放。他们的案子是否被处理则不得而知。

赫鲁晓夫时代，专门处理中央领导人信件的系统一直在运转，但由于十分低效，一直不被人信任。百姓谋求向领导人传递信息时会倾向于

采取这种“拦轿喊冤”的方式。

赫鲁晓夫在中亚也遇到过同样的事情。一个小女孩在他视察过程中递上来一封信。保镖将其拦住，赫鲁晓夫则喝退了保安，接过了信，小心收好。

曾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谢尔盖·伊格纳托夫也曾遇到同样的事情。其保镖回顾这一事件时已经记不起具体时间。伊格纳托夫经常到其位于祖巴罗沃的别墅度假。而别墅与最近的公路间只有一条小路相连。一天晚上，伊格纳托夫的车在这条小路上慢慢行驶，突然一个年轻人跳了出来，拦住了车子，举着双手，手里捏着两封信。

路很窄，伊格纳托夫的保镖被迫停下了车，走出车厢，用枪指着年轻人，将信从他手中接了过来。保镖问道：“小伙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回答说，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确认安全后，伊格纳托夫也走了出来，表情严峻地接过那两封信。两封信上各写着“致伊格纳托夫”和“致福尔采娃（另一位苏共领导人）”。伊格纳托夫将给自己的信收好，而将给福尔采娃的信还给年轻人：“给福尔采娃的信你自己送给她。”然后，他们钻进车内，驶离。

前面说过，赫鲁晓夫喜欢与民众交流，前提是他主动。比如这一次。

在伏尔加格勒，赫鲁晓夫和保镖们路遇一群流浪的茨冈人（吉普赛人）。赫鲁晓夫命令停车，他来到这群惊讶的茨冈人中间，问道：“你们谁是头儿？”然后对头头说道：“你们想不想定居下来？想不想工作？我们给你们建一个村子，给你们盖房子，让你们工作，安定下来生活，好不好？”

茨冈人当然表示同意。在地方政府的努力下，这群人真的有了自己的村子、房子和工作。但是，村子没几天就空了，茨冈人跑得无影无踪。

在掌权的最后几年，70多岁的赫鲁晓夫曾回到自己出生的小村子。他和村民们一起吃饭、聊天。他记性很好，仍能叫出许多人的名字，尽管已多年不见。他认出两个年轻的姑娘，称见过她们小时候的样子，还准确地指出了她们住哪两间房子。叙述此事的保镖认为，或许是这两个姑娘跟父母很像，但还是说明赫鲁晓夫记性极好。

当见到一位老太婆时，赫鲁晓夫激动地跑上去拥抱了她，大声说道：“哦，我的未婚妻！当年我向你求婚，但你却没有答应。你那时是不

是嫌我太穷？”老太太激动地回答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咱们没有缘分啊！”



1974年6月30日，尼克松访问苏联时，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在河边散步，身边未见贴身保镖。

勃列日涅夫巧妙控制舆论

依靠与勃列日涅夫女儿结婚官至内务部副部长的尤里·丘尔巴诺夫回忆道，在1969年遇刺前，勃列日涅夫特别喜欢脱离安保措施与民众接触，经常在莫斯科城内闲逛。当有人提醒他安全问题时，他还反问：“谁会找我麻烦？”曾担任其保镖的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回忆了其中一次。

那是在勃列日涅夫当上总书记以后。那时他身体已经不太灵便，还总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里，烟不离手。医生建议他多走动。有一天，他突然决定到外面走走，而且还要步行。他们从阿尔巴特大街走到库图佐夫街——他和家人过去住过的街道。如果坐车，那不过是一分钟的车程，普通人即使步行也不会走很久，但是身体已经不听使唤的勃列日涅夫却走了很久。而且他还要求车子先回去，不必等自己。

他们也是天黑后才出门，所以基本没人认出勃列日涅夫。那段路他走了好久。第二天早晨醒来后，他对一名保镖说：“我昨天真想建议找个小花园坐一下，太累了！”

实际上，上世纪6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没当总书记之前，他常常带着一个保镖在莫斯科城内散步。而且，那时他的身体条件还好，散步并不

费劲。但步入最高权位之后，他的身体就开始变差，散步也开始变成愈发困难的事情。1969年那次刺杀之后，他不敢随便散步了，身体缺少了这种锻炼，更加每况愈下。

值得一提的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苏联时，美苏两国最高领导人曾突然一同出现在莫斯科河畔，让那里休闲度假的人们吃了一惊。这也是勃列日涅夫为数不多的与民同乐场面之一。

1982年勃列日涅夫视察塔什干时发生的那场意外，也是他与民众“亲密接触”时发生的。那年3月23日，勃列日涅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当时总书记的身体已经很差，为了不让他太劳累，安保人员决定取消最后一项活动——对当地飞机制造厂的视察。制造厂方面闻听这个决定后就将安保措施取消了，但勃列日涅夫却突然坚持要到飞机制造厂视察，而且马上就去，根本不管安保措施是否已经恢复。

当时负责保护勃列日涅夫的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回忆称，他们来到飞机建造车间，直接进入参观，而大门却没有及时关上，数千名工人涌入车间内欲亲眼目睹勃列日涅夫真容。当时车间内人满为患，梅德韦杰夫用“密密麻麻的蚂蚁”来形容地面上、脚手架上和建造平台上的人群。勃列日涅夫进入车间后就直接钻进了一架正在建造的位于建造平台上的飞机内参观，而外面的人则在不断寻找总书记，甚至平台上也挤满了人。保镖们为了维持秩序不得不用力向外推人群。

平台上的人实在太多了，超过了平台所能承受的重量，以至于一些结构已经开始断裂，即刻就要垮塌。勃列日涅夫听到断裂的声音，从飞机里钻了出来。也就在这时，平台塌了下来。保镖们急忙寻找总书记，最终在跌落的人群中找到了他。当时他被垮塌的木制平台压在下面，耳朵受伤，锁骨断裂。此外，还有数十名工人也受了伤，尽管都不算太重。在那之后，勃列日涅夫的手臂一直不太灵便。

尽管受了伤，勃列日涅夫第二天还是坚持参加了活动。但是，随后在莫斯科他不得不从诸种事务中脱身出来，安心养伤。那时候的苏联民众已经习惯了勃列日涅夫每天出现在电视新闻中。那几天总书记消失了，民众开始惶恐，流言四起，有人说他重病，甚至有人说总书记已经去世。

为了破除谣言，勃列日涅夫和安保部门想了一个主意：既然勃列日涅夫的死讯是通过民众的口口相传传播的，那么就用同样的方法破除谣言好了。当时负责勃列日涅夫安保工作的维克托·涅姆什科夫回忆了整件事情。他们同勃列日涅夫选了距离库图佐夫大街不远的一家商店，于某

日18点进入里面。在保镖的保护下，勃列日涅夫在蔬菜和水果柜台旁走了几个来回。商店里人不多也不少，但还没有人发现这位大人物。这个柜台的服务员也在忙别的事情。勃列日涅夫走近服务员问道："请问有核桃么？"服务员头也不抬地答道："都在架子上，自己看！"勃列日涅夫又走了走，又向这位服务员问了同样的问题。服务员不耐烦地抬起头，当她发现问她话的这个人的时候，惊呆了，然后吓得赶紧跑开了。

这时，商店里已经有人发现了勃列日涅夫的到来。商店经理也赶紧走了出来，向勃列日涅夫问好。总书记与经理聊了几句就带人离开了。自然，这件事情马上被传播开来，总书记去世的谣言不攻自破。

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还曾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1981年，这位总书记在克里米亚半岛度假。一位普通女性千方百计要接近总书记，想通过直接向其讲述遭遇的方式获取一些帮助。这个女人曾嫁给一位军官，并与其育有一女；但与军官离婚后，她生活困窘，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固定住所，只能靠打零工过活，女儿也找不到工作。

她得知勃列日涅夫造访的传言后就想办法住到了离总书记别墅不远的地方。在一个晚上，她偷偷下水向总书记的别墅游过去。选择晚上是为了躲开水上的岗哨。然后，她在离勃列日涅夫别墅不远的海面上一直呆到早上5点，并且一直背对海岸。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岸上的探照灯发现她，她的黑色衣服在夜色中构成了一种伪装。

5点后，她向海岸游去，最终见到了勃列日涅夫的保镖。保镖将她的话原原本本地讲给了勃列日涅夫听。很快，她分到了房子，有了工作，女儿的问题也解决了。

第二年，这个女人又想见勃列日涅夫。这次，她没有大费周章，而是直接从大门进入。她还是没有见到总书记，但其要求又被满足了。第三次，她又想故技重施，但这一次被拒绝了。

戈尔巴乔夫的烦恼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当政时，国家即将或已经实施选票民主政治，他们自然开始更多的亲近百姓。保镖们感到很头疼，因为这两位领导人都喜欢突然命令停车，同路边的百姓交谈几句。保镖们都会想方设法拖延或干脆阻止他们这么做。



1987年4月8日，戈尔巴乔夫访问布拉格时，走到民众中间与当地人交谈。

同勃列日涅夫受伤那次的经历一样，两人也时常会引起混乱。比如戈尔巴乔夫造访布拉格时走到民众中间，人群朝他涌来，保镖们奋力维持秩序。一名保镖事后发现，他大衣三颗纽扣只剩下一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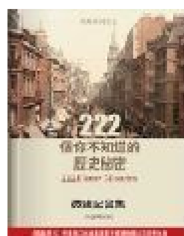
戈尔巴乔夫起初很喜欢步行上班，就像早期的斯大林一样。他常常只带几名保镖，有时甚至只带助手。一开始，他的政策广受欢迎时，他特别喜欢这样做。人们对他十分热情，纷纷与他握手打招呼。但后来，人们不再热情对待他了，因为他的政策已经受到质疑。有时，他们在与人们打过招呼后会听到对方偷偷骂道："妈的，看，戈尔巴乔夫！"

一次，戈尔巴乔夫叫住了几个人，与他们交流。他们都低着头不愿说话。戈尔巴乔夫问道："你们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对方其中一人抬起头回答道："您的健康！先生！"

叶利钦与民众交流也很多，但会使用一些小方法。他的助手弗拉基米尔·舍甫琴科介绍说，叶利钦有时会在人们涌来看他的时候大声说："或者你们不再拥挤，或者我现在走人"。人们这时候往往也就不再拥挤了。

编辑 段宇宏

猜你喜欢



点此阅读

苏联缘何三年连逝三任总书记

勃列日涅夫病重到连完成简单礼节性职责也越来越困难了，但既得利益阶层仍然坚持要他担当哪怕形式上的国家元首。

特约撰稿员 / 谌旭彬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不足　3年的时间里，苏联人连续安葬了三任总书记、三任国家元首。放眼世界近现代史，可谓一大奇观。回溯此种政治奇景之由来，可窥见苏联解体前的政治体制疲态。

勃列日涅夫成就“在册权贵”

1964年，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斗争中下台，由此开启了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时代。按苏联学者布尔拉茨基的说法，勃氏之所以当上总书记，乃是因为“他的肤浅本身成了长处”，“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

不独布尔拉茨基如此认为，历史学家罗·梅德韦杰夫，对勃氏也有相似评价：“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身居极为重要的政治职位……但是，作为一个大人物，他是那么平庸；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那么缺乏才气。”“他是个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很弱的人，这正是他与所有前任的不同之处。”

为个人权位之巩固计，“平庸”的勃氏，选择以“稳定”为其施政方针。此种“稳定”，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不再制造波及全社会的动荡，不再搞运动；二是竭力维持干部体系的常态化、人情化。后者，是勃氏能够安坐总书记之位至死的关键。

欲理解此一关键，须回溯至斯大林时代所打造的“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所谓“官职等级名录”制度，简言之，即只要能够成为该“名录”中相应等级中的一员，即能享受相应等级的特权生活，如免费占有别墅、占有专车、免费休疗养、免费特供、免费子女特教培养等等。进入“名录”的官员，构成了苏联干部群体的核心。

“官职等级名录”，实际上是一种特权腐败。斯氏赤裸裸搞此种制度，其目的，乃在以权术控制党内高干：一方面，这些列名“官职等级名录”的高干们，享受着斯氏所赐予的奢靡物质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又承受着斯氏的高压秘密政治所带来的恐怖，在斯氏的严密控制下，他们很难利用自己的权力谋求到任何“私有化”财产。换言之，高干们若欲维系

其奢靡生活，除完全依附于斯大林之外，别无他途。



1982年11月15日，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送葬仪式。

以高尔基为例。为驯服此人，斯大林曾指示克格勃头目亚戈达为高氏提供尽可能优越的物质生活——高氏不但有金碧辉煌的别墅，有多达四五十人的服务团队，有出行的专列，乃至于连其所吸之烟、别墅周围所种之花，亦系亚戈达投其所好，专门从欧洲订购而来。作为回报，高氏曾一度在书信中称呼斯大林为“主人”；而当高氏在1934年夏末表现得“不够好”时，他申请前往意大利过冬的特权，即被驳回。

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但取消了高级干部们的“红色钱袋”——由斯大林每月用大信封秘密向高干们发放巨额钱款的一种陋习——而且还施行新的“干部轮换制”和“任期制”，由此开罪了列名“官职等级名录”中的诸多党内高级干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充分吸取赫氏下台的历史教训，诚如布尔拉茨基所言：“他首先关心的是取消赫鲁晓夫的一些激进的主张。干部轮换的主张悄然无声地消失了。他提出了求稳的口号——每个机关工作人员的美好理想。”勃氏在事实上恢复了苏联的“领导干部终身制”。

此种“求稳”模式的结果，是将斯大林时代的“官职等级名录”升级成了“在册权贵”。斯氏的高压控制已然消失，赫氏的“干部轮换制”、“任期制”也形同废除，列名“官职等级名录”的高级干部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度”：既不必担心丢掉职务即丢掉所有特权，更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实现对物欲的“自我满足”。

高干们曾经必须牢牢地依附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如今情形逆转，“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必须选择与“在册权贵”互相依附。正如学者

亚·维·菲利波夫所言："勃列日涅夫掌握国家权柄，正是党的官僚们的安排"，而"党的官僚们"，正试图从"服务阶层"变成"完全控制这个政权的独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

这一"独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即所谓的"在册权贵"，其具体数量，据俄罗斯学者统计，至少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计不少于300万。这些人，构成了勃列日涅夫的统治基础。

对这些"在册权贵"们的奢靡生活，叶利钦在《我的自述》有长篇细致的描述。叶利钦说：

"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你若失去这些东西，便会感到痛苦、委屈……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你)购买'克里姆林宫贡品'只需花它的一半价钱就行了，送到这儿来的都是精选过的商品。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休假时，你可以挑选南方任何一个地方，那儿都有专门的别墅。……有趣的是，这一切都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所有最好的东西——别墅、特供物品、与外隔绝的特供场所——全都属于这一制度。……大量的财富分配给职位，谁占据这个职位便可享用财富。"

诚如叶利钦所言，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的勃列日涅夫，确实"进入了共产主义"，他"几乎拥有世界上各种品牌的名车"。因勃氏个人在物欲上的奢靡，当时曾衍生出这样一则广为流传的政治笑话：

勃列日涅夫去家乡接他年迈的母亲来莫斯科。豪华的轿车、柴可夫斯基的唱片，使他母亲感到很惊讶。到克里姆林宫后，勃列日涅夫让母亲参观自己宽敞的公寓——精美的家具、地毯、名画、瓷器、银器、晶质玻璃制品，这些大部分都是以前沙皇的珍藏。当勃列日涅夫问母亲感觉如何时，他母亲既惊讶又恐惧，不知所措。很长时间后，他母亲流着眼泪说道："孩子啊，共产党来了，那你可怎么办呢？"

勃氏如此，上行下效之风可想而知。对泛滥成灾的党内贪腐，勃氏有自己独特的"哲学"认知："你们不懂得生活。谁也不能只靠工资过日子。我记得年轻时在中等技术学校学习，我们给车皮卸货挣外快。我们当时是怎么干的呢？从车皮上卸下的东西中，每搬运三个麻袋或箱子，就自己留一个。国内所有的人都是这么生活的。"

"在册权贵"不许勃列日涅夫辞职

斯大林时代，高级干部们既没有生命安全，也没有职务安全；赫鲁晓夫时代，高级干部们获得了生命安全，但没有职务安全；勃列日涅夫时代，高级干部们终于既有生命安全，也有职务安全，“天堂”降临了。

一如格·阿·阿尔巴托夫在他所撰写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所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党内干部们“负责的岗位都成了终身的岗位，而官僚们成为不可代替的人。很多州委书记、部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占据自己的职务达15-20年之久。”党内高干们还想出了“一套很高超的保护十分无能的官员的办法”：

“如果发现州委书记在本州应届选举中有可能落选，就把他调回到苏共中央组织部担任视察员职务，两三年之后又推荐他(实际上是任命他)到另一个州去担任州委书记。不称职的部长从一个部调到另一个部，或者‘为他’建立某个新的部。为完全垮掉的干部寻找或建立清闲但待遇优厚的职务，往往派到某个国家当大使(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谁如遭失宠，往往派去担任此种工作)。”

1982年，安德罗波夫曾调查过苏联边疆区书记梅杜诺夫的贪腐问题。安德罗波夫建议“提起刑事起诉，将梅杜诺夫逮捕法办”，但勃列日涅夫却说：“尤拉，不能这样做。他是一个那么大的党组织的领导人，人们信任他，跟随他前进，而现在我们却要将他法办？他们边疆区的事业也进展顺利。我们会因一个不诚实的人而玷污整个好端端的边疆区……暂且把他调动一下，在新单位看看他的表现，再做处理。”勃氏的建议是：“随便什么部门都可以，当个副部长什么的。”



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们出席前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葬礼，面对话筒者为新任总书记契尔年科，不到一年后，他也将病逝。

因贪恋此种生命与职务的双重“安全感”，“在册权贵”们愿意勃列日涅夫在总书记宝座上呆得越久越好。早在1969年-1970年间，勃氏的健康已出现严重问题。1974年，苏联国外情报局局长克留奇科夫被勃氏首次召见，就发现他已是“一个十足的病人”，“当同我问候时，他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并且好长一会儿都喘不过气来，随后便直接栽倒在沙发上。1976年初，甚至出现了临床死亡现象。最后执政的6年里，更是频繁发生心肌梗塞以及中风，乃至于连最基本的念演讲稿的能力都丧失了。

“但正如罗·梅德韦杰夫所言：即便勃列日涅夫病重到“连完成简单的礼节性职责也越来越困难了，他已不能理解周围发生的事了。他身边那许多腐化透顶、贪污成性的权势人物，仍然极力让勃列日涅夫哪怕是只作为形式上的国家元首，不时地在人前露露面。他们简直是牵着他走来走去。”

1976年，神情常现呆滞、记忆严重丧失，连说话都感困难的勃氏，不堪重负，曾试图辞职，“但是他周围的人都要扶着他，哪怕他已不能思考，也不让他从总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因为这是一种共同的需要。”

因是之故，神智不清的勃氏，晚年在外交场合频出洋相。如1980年6月，勃氏访问哈萨克斯坦，因神志不清，在招待会上“忘记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为什么来到这里”，刚落座就离开，留下诸多哈萨克斯坦政要面面相觑——如果了解至1981年年底的时候，勃氏的亲朋好友在苏共中央已大约占据了100个左右的席位，则更不难理解，为何神智不清的勃氏，必须将苏共总书记的位子坐到死为止。

克里姆林宫：老人之家

勃列日涅夫“十八年稳定”的结果，是造就了一架无比苍老的统治机器。到1980年，苏联关键机构的大部分干部都已超过了70岁，“政治局70岁以上的人比60岁和60岁以下的人多六倍，部长会议主席团则多四倍。”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后产生的14名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70岁；8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平均年龄66岁；10名中央书记，平均年龄近69岁。故而，苏联民间当时，广泛流传着许多讽刺老人治国的政治笑话。譬如：

问：世界上最有趣的老人之家在哪里？

答：克里姆林宫。

问：有40颗牙齿和4条腿的是什么？

答：鳄鱼。

问：那有4颗牙齿和40条腿的是什么？



1985年3月10日，莫斯科，在街道上列队送别契尔年科的人群。

答：苏共政治局。

勃列日涅夫在1982年11月去世，接替他的，是老态龙钟、病入膏肓、69岁的安德罗波夫。较之勃列日涅夫，出身克格勃的安氏有一些变革的欲望，如取消“克林姆林宫津贴”，所以迄今仍有俄国学者坚持认为，安氏之死系被利益集团“操纵死亡”。但不可否认的是，早在接任苏共总书记之前，安氏就已经重病缠身。对于自己的时日无多，安氏本人亦有预感，他曾在孔采沃医院里作诗庆生，如此写道：

“哦！至高无上的神用手/为我指定了悲哀的道路起点/起点就在这里，在医院里，/它简短的称呼就是心肌梗塞。//这是一条每走一步都不知去向的路/在这条路上心脏受着考验/引导我们‘通过荆棘走向胜利’/也许一下子就可去见祖宗。”

此诗犹如预言。安氏在总书记之位上仅一年有余，即于1984年2月去世。接替安氏的，是更加老态龙钟、病入膏肓、73岁的契尔年科。据政治局委员乌斯季诺夫对克里姆林宫医生叶·伊·恰佐夫披露，他之所以提名契尔年科，是因为契氏有着“体弱多病，而且性格软弱、容易妥协和不坚持原则”等诸多“优点”。这些“优点”决定了他不可能采取任何不利

于“在册权贵”的改革措施。正如恰佐夫所理解的那般：

“（契尔年科）未必能和掌管军事工业集团的、不屈不挠和坚定强硬的乌斯季诺夫相对抗。此外，参与这场交易的其他人也都清楚，在多病的契尔年科之下，他们不仅能继续巩固自己的地位，而且会获得安德罗波夫领导时期不曾有过的更大的独立性，对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来说尤其如此。”

而就契尔年科本人而言，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为谋求坐上总书记之位，一直在试图努力掩饰自己的病情，P·A·梅德维杰夫说：

“他早就有严重的健康问题，不过他一直精心地隐瞒着罢了。他常常受到令他窒息的咳嗽的折磨，他极容易感冒。早在70年代，契尔年科就在上衣口袋里带着装有医用烟雾剂的进口微型吸入器，他不时地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拿到嘴边吸几下。……1982年3月初，契尔年科主持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次重要全会，可是到了3月中旬他就病倒了，……他的病久拖不愈，因此1982年4月22日为纪念列宁诞辰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代表苏共中央作报告的已经不是契尔年科，而是安德罗波夫。”

但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契尔年科的“衰老多病”，反倒成了他问鼎总书记宝座的“优势”。1985年3月，契氏去世。而在即将到来的苏联解体之命运中，“在册权贵”们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编辑 段宇宏

猜你喜欢



点此阅读

苏联警戒号反潜舰兵变始末

解密《猎杀红色十月》原型事件

文/ 李星

1975年11月9日上午，波罗的海的里加湾外热闹异常。苏联空军前线轰炸航空兵团18架雅克-28战斗轰炸机组成攻击队形，分多批次飞抵，轰炸海面目标。被攻击对象是一艘军舰，它熟练地进行机动，以规避来自空中的盘旋攻击，舰艉在波涛上划出长长的白线。

这幅惊心动魄场景，既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幻想小说的开头，也不是一次军事演习，而是真枪实弹的军事行动。更为奇特的是，被苏联空军锁定的是一艘苏联海军现役大型反潜舰警戒号，因为它已成为一艘叛舰。

兵变的领导者是警戒号的政治副舰长，即西方世界俗称“政委”的瓦列里·米哈伊罗维奇·萨布林海军少校。他计划推翻腐败的、官僚化的勃列日涅夫当局，在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建立新政权。换言之，他想以官方意识形态的名义，向苏维埃国家机器宣战。

美国冷战作家汤姆·克兰西从萨布林与警戒号的事件中得到灵感，写作畅销小说《猎杀红色十月》，后来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曾一度风靡全球。



瓦列里·米哈伊罗维奇·萨布林海军少校

十月革命节次日的短暂政变

夺取警戒号是实现“远大目标”的第一步，萨布林接下来计划开着“革命”军舰取道波罗的海与涅瓦河，前往俄国十月革命的摇篮——列宁格勒，停靠在已经成为水上博物馆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之侧。

届时，他将通过广播电视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呼吁，宣告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腐败丛生、贿赂公行、欺骗充斥，国家已经被盗卖一空，社会主义祖国面临严重的威胁。他进而将号召全国展开罢工，直至苏联政府取消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1975年11月8日晚7时左右，十月革命节次日，萨布林通过一种不流血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政变。他声称有些军官需要纪律约束，将舰长波图利内海军中校诱至位于甲板下位置最深处的第二声呐室。舰长进入房间后，意外地发现房间空空如也，并没有违纪军官等待处分，只有几本书。正在舰长纳闷之际，舱门被砰地关上了，萨布林在门外加了自己事前从商店买的挂锁，并让水兵亚历山大·沙因持枪在门口看守。这名刚刚年满20岁的水兵素来敬仰萨布林，主动加入兵变。

萨布林随后召开全体军官会议，舰上大多数军官出席。他向到场的16名军官讲述了自己的主张和计划，并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西洋棋棋子：愿意参加兵变的，可以选择白子；不愿意参加的，选择黑子，并进入禁闭室，一旦兵变失败，后者不至于受牵连。8名军官选择了参加行动，其他人进入禁闭室。



警戒号反潜舰的成员合影，前排左起第四位为萨布林。

晚间10时许，萨布林在上层后甲板召集全体水兵，舰上165名水兵中有150人到齐，他们伫立在11月的寒风中听政治副舰长的讲话。令众人惊讶的是，出席的军官只有萨布林一人。他抨击勃列日涅夫及其班子背叛了党和十月革命的理想，愚弄和剥削苏联人民，将国家带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些人必须为这一切负责。

“有时你花了几乎半生时间等待，就是为了某一时刻。”萨布林在前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这一时刻到了，为获得支持，萨布林谎称已有数十个军事单位同意一起行动，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正在等待警戒号发出的信号。

船上水兵大多出身集体农庄或者工厂，年纪在18-20岁之间，他们没有怀疑萨布林的言辞。无论是入伍前还是入伍后，这一代人早就切身体会到特权阶级的跋扈、工农生活的艰难、军队的腐朽。但在苏联社会中，他们从未见到官方人士敢于公开说出真相，更难以想象一个负有政治监视职责的政治副舰长挺身而出。

一名水兵回忆道：“当萨布林问道‘你们是否同意？’时，我们都完全

知道，他所说的事情是危险的，但却是一个值得一试的目标……他穿过队列，站在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面前，问‘你呢？’，你会听到每个人都在说‘是’或者‘我同意’”。水兵沙因的记忆是，听完演讲后舰上陷入了热烈气氛，仿佛一个节日里大家都在热烈谈论，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人那样生活。

萨布林原先的计划是待天亮后行动，一个突发事件让行动提前。近午夜时分，舰上的一名军官、该舰共青团书记弗尔索夫，通过系缆出逃至附近停泊的潜艇，报告了警戒号上发生的惊人事件。由于苏联军队素有节日期间狂饮滥醉的传统，加上弗尔索夫的汇报内容令人难以置信，最初听他报告的军官们无不怀疑此人是灌饱了伏特加后产生奇思妙想，故未迅速采取行动扭转局面。

发现有人跳船逃跑，萨布林立即下令起锚开船。眼睁睁看着警戒号擅自出海，苏联波罗的海舰队这才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层层上报至苏共中央。从睡梦中被叫醒的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下达了命令：阻止它或击沉它！

波罗的海舰队的半数水面舰船大举出动追击警戒号，海军航空兵的图-16轰炸机也接到出击的命令。或许是飞机所携带的苏联第一代巡航导弹制导效果不佳，或许是海军飞行员不愿轰炸一艘己方军舰，海军飞机均未攻击，带弹返航。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对海军失去信任，命令空军去执行攻击任务。驻扎在波罗的海沿岸的苏联空军侦察机与战斗轰炸机，纷纷起飞搜寻该舰，遂发生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追逐中，警戒号的后甲板被飞机投下的一枚炸弹击中，船舵被卡死，只能无力地兜着圈子。与此同时，舰长波图利内被忠于他的水兵解救，他冲到驾驶室，开枪打伤萨布林腿部，夺回军舰的控制权。

一场“革命”告一段落，唯一的流血者是萨布林。据一位在机场迎接战机返航的空军中校目击，完成关键一击的空军上尉落地时，显得极为消沉。该飞行员因精准的轰炸被授予一枚勋章，但他从未佩戴过。

两份版本的事实调查报告

警戒号尚未被押回港内，对兵变的事实调查就开始了。

苏联的“事实”，分为内部掌握和对外公布的两个版本。内部事实的特征是，官僚机构会在不伤害本部门利益的前提下，对某个事件在真实基础上加以适当修饰后上报，即俗语所称的“酒里掺水”。对外公布的事实，则是以宣传需求为导向、以虚构为基础，适当点缀真实素材加以编

造以求逼真，即“水里掺酒”。



警戒号反潜舰兵变事件曾轰动西方世界。

在内部版本中，一般来说，官僚阶梯中越接近下层，所上报的情况就越接近于实情。克格勃审讯员奥列格·杜博罗斯基上尉得出结论：“萨布林完全不知道怎么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他的打算非常天真，孩子气十足。”这一结论是客观的，即便警戒号到达目的地，萨布林成功通过电视向全国发送了“革命”演讲，那么会发生他设想的全国革命吗？答案是：不可能。

1970年代苏联政府的社会控制力，显然不是1917年的沙皇政府或临时政府能望其项背的。萨布林的“革命手段”，更像是从苏联宣传影片《列宁在十月》、《战舰波将金号》中得到的灵感，充满不切实际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却不值职业革命家一嗤。

他没有意识到，1917年的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是当时诸多政治势力中组织性最接近于军队、行动意志最为强烈的“职业革命家集团”。同时，它特别重视在一切组织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为夺取政权服务。用列宁的原话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继续坚决利用一切‘合法机会’，从黑帮杜马讲坛，到任何一个戒酒协会都要加以利用，来进行坚持不懈的有计划的工作……”

以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在写给国防部的报告中对“内部事实”进行进一步修正：先极力缩小参与兵变的舰上人员规模，宣称只有2名军官投向萨布林一边；同时表示萨布林所说的军队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只不过是一些众所周知的社会弊病，不足为怪。

针对这一事件，此报告开出颇具勃列日涅夫风味的整改措施：由苏

军总政治部制定措施改善军人的政治教育工作，研究修改高等院校军官培训大纲，使军人积极而有进取性地捍卫共产主义道德与苏联现实，并对事故责任者加强追责机制等等。当然，必不可少的是，“已采取了杜绝走漏消息的措施”。有一点是明确的，调查委员会并未发现存在一个叛乱的组织，也“并未发现认为萨布林想把军舰开往瑞典的论点的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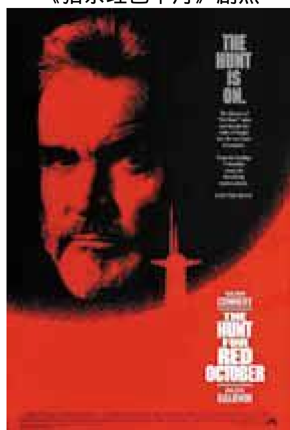
随后进行的审判和对外报道，则是“水里掺酒”的典范。苏联宣传部门先是公开否认发生兵变，并将一艘靶舰在短时间内拖到了轰炸发生地，宣称发生的是一场“打靶”演习。但由于事件发生在交通繁忙的公海上，实在无法彻底掩人耳目，苏联又私下放风称萨布林要驾舰叛逃资本主义的瑞典，并宣称他有精神分裂症状等。对于苏联高层来说，尽管出现叛逃事件并不光彩，但如果外界知道了事情的真实原因，后果更是不堪设想。考虑到萨布林兵变的本意，说他要叛逃堪称真相的反义词。

苏联的宣传举措在国外颇为成功，如《华盛顿邮报》此后即按叛逃事件报道此事。或许，萨布林的真实动机实在超出了西方社会一般人士的理解力与想象力。

1976年7月进行的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判中，法官与宣传部门统一口径，给萨布林扣上了“背叛祖国分子”、“擅自驾驶大型反潜舰离开里加港开往瑞典方向”等罪名。严格说来，开往瑞典方向在字面上倒也符合“客观事实”。由于里加湾北面有岛屿阻隔，不能通航，开往列宁格勒的出港船只，都必须先向西面的瑞典哥德兰岛航行一段，再急转向东北方的斯德哥尔摩驶去，随后再向东前往列宁格勒。警戒号尚未完成第一段航程，旅途就戛然而止。因此，观察到警戒号初始航向的西方情报机关，在冷战结束前一直相信该舰最终目的地是哥德兰岛。



《猎杀红色十月》剧照



《猎杀红色十月》海报

萨布林案受重视的程度大大超过一般的叛国案，在案件侦查、起诉与审判期间，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不断向苏共中央报告进程。在写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他宣称被告萨布林和沙因完全承认原告起诉的罪名，并对所犯罪行的详情供认不讳。实际情况是，萨布林与沙因都拒绝承认自己叛国和违反军人誓言，甚至不惜付出沉重代价——萨布林的妻子去探监时，惊恐地发现丈夫的牙齿被打掉了一块。

从叛国者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列宁主义者”

1939年，萨布林出生于一个俄苏海军世家，其祖父是沙俄海军军官，父亲是红海军的上校。如家庭期望那样，他进入位于列宁格勒的伏龙芝高等海军学院学习，在海军的阶梯中努力攀爬。

与海军同袍不同的是，萨布林身上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始终不渝地保持着自幼受到的意识形态熏陶。1970年，他收到军校同学们赠送的新年礼物《资本论》后，不但通读全书，还在书的边角处做了密密麻麻的笔记。他能信口引用此书的篇章与警句，能指出这一内容在书中的位置，而当时连一般政工干部都很少能读毕全书。萨布林发自内心深信，共产主义最终要在未来取得胜利。因此，他非常不理解苏联当局为何如此缺乏自信，以至于对苏联社会的弊端三缄其口。

从列宁军事政治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政治副舰长，被分发到刚建成服役的警戒号上。随着勃列日涅夫逐渐走向衰老，不理政事，苏联这台国家机器中的弊端如以权谋私、营私舞弊、缺乏法治、官僚主义、商品短缺等问题开始越来越引起社会不满。人们的态度大体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犬儒，即缩进自己的私人空间，只追求物质生活；第二种是成为自由主义倾向的持不同政见者；第三种则是举起列宁主义大旗，反对“背叛”革命理想的现政权。萨布林显然不是“革命”路上的独行者，早在1969年就有一名陆军少尉试图开枪行刺勃列日涅夫，意图让意识形态更保守僵化的苏斯洛夫上台接班。

在查清兵变的真实原因，发现幕后并不存在一个组织之后，克里姆林宫直接下达了对萨布林的判决指示。对于背叛祖国罪，量刑一般是15年，但来自最上层的指令是判处死刑，立即枪决。萨布林在临刑前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中，附上他手绘的两幅图画。在第一幅画上，堂·吉诃德正挺枪向风车刺去，下一张图则是这位英勇的“骑士”折枪坠马。看来，萨布林对自己的事业和命运已有清醒认识。

他的“桑丘”沙因，被判处了8年有期徒刑，其中2年在监狱监禁，6年在劳改营中度过。不过，极端审慎的政府还是将沙因在监狱中关押足足五年半，直至认为他的“危险性”不至于传染其他囚犯，才将他送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服完剩余刑期。此外，积极参加兵变的数十名军官、准尉和水兵，或被开除、或遭降职，有些人回乡后一直遭到克格勃监视。对于其余人员，官方也采取了类似防疫的处理，全部调离本舰。为消除事变影响，警戒号被跨过三大洋“流放”至海参崴。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重新审查了苏联时期的政治案件。1998年，针对萨布林是否应被定罪，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再次举行审判。结果认定萨布林和沙因的行为不构成叛国，其罪名应为“滥用职权”即扣押本舰舰长，因此撤销原判决，改判萨布林十年有期徒刑，其家属被认定为“政治迫害的受害者”。推崇列宁主义的萨布林不惜“以身相殉”，成为了国际互联网上左派网站的怀念对象，他被赞誉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列宁

主义者”。

在太平洋服役多年后，名舰警戒号于2002年退役，随即报废后被卖到中国。在江苏靖江的拆船厂，它和其他来自太平洋舰队、布满铁锈的旧军舰一起，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被拆成废铁。

最终，警戒号的事迹以一种萨布林绝对预料不到的方式获得了重生：美国军事作家汤姆·克兰西因看到西方关于警戒号的报道而触发了灵感，于1984年写下了小说《猎杀红色十月》，描述苏联海军的一艘军舰叛逃西方，并在北大西洋上与围追堵截的苏军海空力量展开了扣人心弦的周旋。小说中，起事军舰型号被换成了“台风”级弹道导弹核潜艇。

该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被里根总统称赞为“无法放下”的“完美故事”。此后，原著被改编成畅销战棋与电子游戏，1990年被好莱坞搬上银幕，由老牌男星肖恩·康纳利担纲主演，成为闻名遐迩的冷战架空题材影片。萨布林原先设想用于打响十月革命第二炮的“革命”军舰，最终以投奔美国的形象存留于大众文化之中，这无疑是命运对他开的又一个巨大玩笑。

编辑 陈祥 段宇宏

解密二战苏联百万伪军

弗拉索夫的俄罗斯“解放运动”闹剧

文/ 阎滨

“在东普鲁士，在离我几步的地方，沿路边押送着三个被俘的弗拉索夫分子，公路上正好轰隆轰隆地开过一辆T-34坦克。突然一个俘虏挣脱出来，纵身一跳，像燕子飞似的扑到了坦克下面。坦克闪了一下，但履带的边缘还是把他轧了。被轧坏的人还在扭动，鲜红的血沫流到了嘴唇上。他宁愿像士兵一样死去，而不愿在刑讯室给吊死。”

《古拉格群岛》一书中，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回忆第一次注意到弗拉索夫分子的场景，他当时是苏军炮兵部队军官。后来，因言获罪的他在劳改营里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服刑人员，从革命前的有产阶级、旧政权分子等革命对象，到苏联社会的政治犯、刑事犯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他发现只有弗拉索夫分子从不唉声叹气。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群体，他们从不期待宽恕和大赦。能活着走进劳改营者已经是幸运儿了，只要苏军士兵在战场上听到德军及其仆从军俘虏们清楚说出一句俄国话，往往将对方视为弗拉索夫分子而就地枪毙。实际上，这些认贼作父者固然反布尔什维克体制，但他们也反西方寡头资本主义，鼓吹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东正教信仰，是个极为复杂的历

史群体。

形形色色的苏联伪军

战争的最初6个月内，德军始料不及地俘虏了400万苏军。东线战场的第一个冬天，设在露天大草原的临时战俘营，不过是用铁丝网将成千上万名战俘圈起来，他们露天而息、食不果腹。被饿死外，很多战俘被德国人用火车拉离苏联，被直接送进了设在波兰等地的集中营。

如在奥斯维辛，他们被成批送进毒气室，或被用于各种活体医学实验，或因苦役劳动而大批饿死、病死、累死。二战中共有570万苏军被俘，370万人死于德军看押中。其中约50万人是被直接处决的，只因身份是犹太人或共产党员，或者在文盲众多的苏军士兵中看上去像知识分子。



苏联伪军“俄罗斯解放军”的领袖弗拉索夫，正在视察部下并发表演讲，他身高1.9米。

但从1942年开始，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审讯德军战俘时吃惊发现，参加德军的苏联平民甚至前红军士兵的数量越来越多。一些人是志愿加入德军的，更多人被从战俘营招募去弥补德军日益匮乏的人力，这些人被称为希维人（Hiwis，德语“志愿者”的缩写）。

一开始，苏军战俘们选择加入德军多半是为获得一点食物，或者逃避被送进集中营的命运。最早一批戴上Hiwis袖章的苏军战俘，主要从事厨师、司机，或挖掘工事、搬运物资等苦力劳动。不久，更多的苏军

战俘直接换上德军军服，拿起武器和同胞作战。

德军伤亡不断加剧，人力危机日益严重，东线德军愈发离不开数量剧增的希维人。“我们曾经拼命与之战斗的‘野兽’，现在竟与我们朝夕相处地生活在一起。我们不得不利用苏军战俘来弥补人力不足，很多战俘甚至当上了炮手。”德国第6集团军参谋长格罗斯库特上校曾写道，该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全军覆没。到1942年底，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战斗的德军就包括7万多名苏军战俘，占该地区德军兵力的近五分之一，相当数量希维人和德军一起战斗到最后一刻。



1943年，在一个德国国防军军官陪同下，弗拉索夫正在检阅苏联伪军，俄罗斯解放军当时尚未组建。部队着德军军服，戴德军钢盔，使用德式装具，但武器很杂乱。

伪军数量变大，很大程度上因苏联政府以过于激进的政策对待落入敌手的自己人，斯大林认为军人与外界的任何接触都可能削弱他们对苏维埃的忠诚。当斯大林将不幸被俘者与主动投敌者不加区分视为叛国者时，战俘们就没动力继续效忠苏联，他们甚至认为加入德军不失为反抗斯大林统治的一条出路。苏军战俘和劳工们尤其震惊于德国农业的高效、农村的富足整洁，因此产生了对苏联体制的失望。

此外，很多对斯大林统治不满的少数民族如哥萨克人、波罗的海三国的人、乌克兰人、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斯坦和一些穆斯林小民族，出于民族独立的动机选择为德军而战。他们汇聚成一支成分复杂、动机各异的伪军队伍。至1943年中期，超过100万各路苏联伪军在为德军战斗，还有越来越多的苏军战俘选择为德军当劳工，

即“东方劳工”。1944年中期，劳工数达到了顶峰75万人，“东方劳工”遍布从北极到北非的各个德占区。

从苏军新星到傀儡首脑

越来越多的德国军官认识到东线的唯一取胜希望，就是充当“解放者”，把俄国人从斯大林统治下“解救”出来。德军高层情报机构早在1941年秋得出结论，纳粹单凭武力根本不可能取得对苏战争的胜利，除非能将侵略战争变成另一次俄国内战。

为便于管理，德国在1942年底计划将松散的苏联各路伪军统一划入一个部门。当时，伪军分布在东线的100多个德国师里。德国在被俘的苏军高级将领中努力寻找一位有分量、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希望此人足以号召统领整个苏联伪军，进而有效整合、动员苏联沦陷区的军民与资源为德国服务，战后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亲德政府。1942年夏天，这个人物出现了，他便是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

1900年，弗拉索夫生于下诺夫戈罗德省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曾是沙皇的禁卫骑兵。弗拉索夫生于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读完小学的他因革命爆发而未能读完中学，1919年春参加红军，后成为一名职业军人并步步登高。1938年，弗拉索夫被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参与抗战，表现优异，1939年底回国前夕受蒋介石以金表相赠。

年轻的弗拉索夫与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无甚瓜葛，成为大清洗后被火箭般提拔的新生干部。他先被任命为师长，次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为填补被清洗者留下的空缺，斯大林突击提拔了一大批人，他们多数是庸才，弗拉索夫却和朱可夫等人类似，属于这个群体中的少数拔尖者。



1944年**6**月，诺曼底前线，向美军投降的苏联伪军。**1942**年**1**月，德国国防军开始在苏联少数民族中招募志愿兵，组建“东方军团”，以营为编制，安置到德军各部队内，他们因此被称为“东方营”。

苏德战争初期，弗拉索夫因表现优异而声名鹊起，很快晋升军长、集团军司令。弗拉索夫的部队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做出重要贡献，《真理报》将他与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等日后声名显赫的年轻将领们列在一起，做了大幅报道。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弗拉索夫的名字响彻全国。

1942年初，弗拉索夫晋升为方面军副司令，被斯大林派到形势极端紧张的列宁格勒外围沃尔霍夫地区去“救火”。在这片人迹罕至的沼泽地里，他的部队经历了四个月饥饿和死亡的折磨，斯大林禁止他们撤退。1942年7月，全军覆没，弗拉索夫被德军俘虏后进入高级军官战俘营。这个营地的管理者，即未来密谋刺杀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伯爵，弗拉索夫受到了德军地下反对派的庇护。

早在弗拉索夫结束中国的使命回国后，他被家乡极端贫困的现实所震惊，皇权思想浓厚的父亲向他抱怨集体农庄制度下的农村“今不如昔”。他那出身富农的岳父母，则是镇压富农运动的受害者。弗拉索夫表面上被迫和他们断绝关系，暗中一直帮助对方。

对苏联体制早有不满情绪的他，一旦沦为战俘，非常清楚自己的命运已从斯大林的宠儿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当德军内一批希望挑动苏联

内战的军官找到他，询问他是否对从事反苏维埃政治运动有兴趣时，双方一拍即合。1942年秋，德国宣告这位全苏尽人皆知的青年将领已投身自己的怀抱，即将扛起俄罗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旗。

与此同时，纳粹高层内部已正式否决了一批德军军官极力主张建立俄国民族武装的方案，仍坚持原定的东方殖民计划。事实上，弗拉索夫一开始就在从事一项得不到纳粹最高层支持的事业。

俄罗斯民族“解放运动”闹剧

庇护弗拉索夫的德国军官们试图尽可能帮助他，他们筹划以弗拉索夫的名义发布了所谓“斯摩棱斯克宣言”，即以一个名义上坐落于斯摩棱斯克，但当时并不存在的俄罗斯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名义，宣称英美资本家与布尔什维克签订了秘密议定书并图谋掠夺俄罗斯的资源，驱使俄国人民为其卖命。德国发动战争的目的，被美化为追求一个“没有资本家和布尔什维克的新欧洲”。

宣言共列出了三个目标和十三条原则，许诺给予一切民主自由、释放政治犯并恢复宗教自由、取消集体农庄和强迫劳动、恢复工商业和经济自由等。宣言最后以俄罗斯委员会主席弗拉索夫的署名结尾。

德军在占领区和前线大量散发这份宣言，引起很大反响。占领区的民众开始对这个虚假的委员会及其“领袖”弗拉索夫产生了幻想，大批苏军士兵拿着传单悄悄跑向德军一侧。为了让占领区民众相信俄罗斯解放运动的存在，德军安排弗拉索夫到各地发表演说。他的几次旅行鼓舞了占领区民众，促成了此“解放运动”的真正诞生。

闻知此事的希特勒大发雷霆，他严令关于弗拉索夫的一切行动只限于宣传，不得有实质性行动，永远不许建立任何形式的独立和统一的俄罗斯军队，德国只需要俄国人当劳动力。已经建立的各类伪军，只能被打散并配置在从苏德前线到大西洋沿岸的各处德国占领区，充当马前卒、炮灰。

1943年，希特勒下令解除大批俄罗斯志愿部队的武装，把众多的希维人送去挖煤，后更改命令，把志愿部队调往大西洋防线去对付西方盟国的军队。刚刚燃起一点苗头的俄罗斯“解放运动”便迅速偃旗息鼓。相反，斯大林在1943年敏锐抓住了俄罗斯民族主义大旗，悄悄收敛先前严苛的意识形态枷锁，如恢复了象征沙皇军队传统的肩章、允许东正教会活动、解散共产国际。弗拉索夫明白自己被德国人耍弄了，但开弓已无回头箭。

直到1944年下半年，纳粹在同盟国东西两线夹击下大势已去，才病急乱投医想到闲置了一年多的弗拉索夫。当年9月，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正式批准组建俄罗斯解放军（ROA）。11月，“俄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挂牌成立，在布拉格发表“布拉格宣言”，猛烈抨击“布尔什维克、以英美寡头们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期待与德国的“光荣和平”。弗拉索夫终于获得了真正实践抱负的行动机会，但为时已晚，苏军已解放了全部国土，多数人都明白纳粹败局已定。

弗拉索夫的旗帜，对苏联各少数民族独立运动也缺乏吸引力。乌克兰民族独立领袖班杰拉，就拒绝与他结盟；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各民族，把弗拉索夫看作大俄罗斯主义分子，不愿受其控制；哥萨克部队直接拒绝接受其领导。即使在德国占领区内对参加俄罗斯解放军有兴趣的大批战俘和劳工，要把他们从各自劳动岗位上抽走也不容易。

直到1945年2月，俄罗斯解放军才凑出一个师的人数，遂宣告第1师正式成军，第2师开始组建。但此时连弗拉索夫也确信纳粹已接近灭亡，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

战争最后时刻，为了挽救即将覆灭的命运，各路俄罗斯伪军纷纷投奔弗拉索夫，俄罗斯解放军短期内膨胀到10万人。1945年4月底，捷克斯洛伐克爆发武装起义，纳粹派俄罗斯解放军去镇压。弗拉索夫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战场倒戈也许能让西方盟国放他们一条生路。1945年5月5日，俄罗斯解放军向布拉格的德军开火，随同起义者一道解放了这座城市。

欧洲的战事结束后，弗拉索夫全军向英美盟军投降。然而根据雅尔塔协议的约定，盟军必须无条件地把俘虏到的一切苏联公民强制遣返回苏联。弗拉索夫及其部下被遣送回国，经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判决，弗拉索夫和他的助手们在次年3月被绞死。而几十万的普通“弗拉索夫分子”不乏大量无辜者，他们根本没参加过任何伪军，他们只是不幸被俘的军人，或者是被德军强抓做劳工的平民，一概被扣上“弗拉索夫分子”帽子，战争残酷如斯。

编辑 陈祥

猜你喜欢

《凤凰周刊》文丛系列

《权力之海——全球政治人物脸谱》

全套两册



点此阅读

撬动冷战格局的顶级间谍

惊险程度有如影视剧，波兰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上校，理查德·库克林斯基曾在冷战期间向中情局发去1200万字的秘密情报。

文 / 李星

冷战背景的电影一直是近年来东欧国家的热门题材。波兰2014年上映的《华沙谍影》（Jack Strong）即属于该类型影片中的佳作，上映后取得了不俗反响。

该片取景时得到了波兰总参谋部的配合，并广泛采取了波兰国家档案馆和中情局档案馆的真实历史素材。它讲述冷战期间，波兰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上校理查德·库克林斯基，向“铁幕”那一面的中情局发送了超过1200万字的华约秘密情报，部分绝密情报连许多华约高级将领也不知晓。

“最有价值的情报人员”

1985年，在里根与戈尔巴乔夫首次会晤的雷克雅未克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向戈尔巴乔夫一行展示了苏联指挥系统及地下指挥部的精确示意图。温伯格警告苏联人，一旦开战，苏联的指挥系统就会迅速被美国导弹摧毁，失去指挥系统的军队即便装备再精良也难有作为。这一招让苏联领导人呆如木鸡，它有力改善了美国在冷战中的战略地位。

库克林斯基是此图的绘制者，他认为，掌握了这些关键信息的美国可在开战时以斩首行动摧毁苏联的指挥中枢，从而不必动用核武器攻击东欧。为此，他连这些地下工事的深度和规模、通讯线路、容纳人数、负责人的姓名、工事水泥的厚度、摧毁它们需要多少当量的武器，都一一列出来。

库克林斯基曾担任波兰人民军总参谋部战略防御计划处处长、作战部副部长，这些都是涉及战略决策的极敏感岗位，相当于华约总司令同波兰军队最高首脑之间的联络官。尤其是在作战部任职时，波兰武装部队和华约司令部的一切重要文件在传达给波军各单位主官之前，都需经由他分发。在这些顶层岗位上，他的视野甚至要比一般的军区或军种将官深广得多。



《华沙谍影》（**Jack Strong**）海报

得益于工作岗位的重要性，库克林斯基在十年间提供了58000余页的文件，其中绝大多数为俄文。内容包括：华约的动员方案；驻东欧苏军的情况；苏制T-72坦克等200多种新武器的详尽参数；规避美国侦察卫星的技术；华约1971至1985年间三个五年计划的战略目标以及东欧各国必须配合完成的任务；华约进攻西欧的几种详尽方案，特别是波军进攻西德和丹麦的方案；对西欧的占领计划等。最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之一，就是温伯格抛向戈尔巴乔夫的图纸。中情局局长迈克尔·海登评价说，库克林斯基使美国得以洞悉华约的决策机制，他独自提供的情报与其他来源的零碎情报不同，不是一块两块拼图，而是直接展示了一幅完整的画面。

冷战中，波兰前后有数十位军官叛逃西方，其中不乏将官。但足以改变美苏战略、撬动冷战格局的，库克林斯基是第一人。他发出的情报不仅直接影响了美苏会谈和波兰军管政策，对冷战走向的战略影响更是难以估量。因为他提供的情报同其他情报来源相佐证，使美国清晰了解到苏联的真实战略全貌，也有助于美国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重新调整在欧洲的相关战略和军事部署。

因此，他的情报只有美国正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中情局局长等极少数高层才有资格过目。里根时代的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称库克林斯基为“从海参崴到易北河之间最有价值的情报人员”。里根总统和凯西也因其特殊贡献，向他授予过勋章。

更令人惊叹的是，库克林斯基在提供情报的过程中没有收过一分钱

酬劳。在他出逃后，波兰军事检察院对他进行严密调查，没能发现他有任何收受外国情报机关金钱的证据。他自愿做情报来源的动机并非求财，而是“爱国”——他寄希望于借助美国之力，从苏联的控制下拯救自己的祖国。卡特时代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因此称库克林斯基为“北约组织的第一位波兰军官”。

曾有顺畅仕途

1930年6月13日，库克林斯基出生在华沙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工人家庭，是布热津斯基的同乡。其时的波兰第二共和国处于毕苏斯基元帅治下，在他9岁时，德军入侵波兰。库克林斯基的父亲参加了国家军组织的抵抗运动，后不幸落入盖世太保之手，死于德国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库克林斯基在16岁时参加了波兰人民军，此时斯大林已帮助成立了“波兰人民共和国”，但尚在东欧诸国中暂时维持了联合政府的表象，还未对这些国家推行全盘苏化政策。于是，库克林斯基不是在军旗或国旗下进行入伍宣誓，而是按照传统礼仪在天主教堂祭坛前台阶上宣誓的，誓言尚未包括忠于苏联或波兰人民政权的内容。他在军校学习时，军校也没有开过政治课。

1948年，斯大林下令波兰工人党和社会党合并成立统一工人党，同时在波兰军队里推行清洗。出身自战前波兰军队、国家军、流亡波兰政府军队的军官，几乎全被赶出军队，库克林斯基因父亲的经历险遭清洗。但由于他年纪尚轻、并且已经表现出优异的军官素养，因此被重新接纳加入了军队。在接受军官委任时，给他授衔的居然是一位酒气熏天、穿着波兰军服的苏联军官，这大大刺痛了库克林斯基的民族自尊心。

库克林斯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调入总参谋部后，因工作勤奋、聪敏内敛、待人和善，深得上司和同事的好感。特别是他记忆力惊人，非常擅于画图，因此很受几任总参谋长的器重。这几任总参谋长里包括后来成为国防部部长、乃至波兰部长会议主席的雅鲁泽尔斯基，此人曾称赞库克林斯基是总参谋部“最聪明、最能干的军官，非常适合在总参谋长身边工作”。另一位副总参谋长基什查克将军也曾向上级写书面报告，称赞库克林斯基是“总参谋部中最出色的军官”。

上升的大门向库克林斯基敞开了，1968年他参与制定了华约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作战计划，此后被派往越南参加监督停战的国际委员会，回国后被选送到苏军最高学府——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深造……在苏式体制中，能不断得到出国的“美差”，是通得过内部审查、政治上受

高度信任的标志，留苏经历则又给他的晋升天平增加了一块砝码。可以说，只要他顺流进取，将军一职是指日可待。



理查德·库克林斯基

一切为了波兰的利益

库克林斯基学成回国后深受重用，不仅经常陪同雅鲁泽尔斯基出访，还先后担任了波兰人民军总参谋部战略防御计划处处长、作战部副部长。仕途顺遂并未给他带来心灵上的满足，相反，1968年9月，波军参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多瑙河”行动，使他痛切地认识到自己的军队、国家毫无自主性，苏联一手挑选的本国党政领导人为了讨好莫斯科，不惜在自己的邻国背后插上一刀；而一旦对苏联人产生反抗念头，布拉格的命运也有可能有朝一日在华沙重演。

1970年波兰北部沿海城市爆发了“十二月事件”，当地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来抗议肉价上涨，遭到了波兰军队和民兵的武力镇压。库克林斯基的一个朋友正是平暴部队的团长，曾接到向工人射击的命令。

更重要的是，工作性质使库克林斯基了解到，苏联将因古巴危机而从加勒比撤回的中程导弹部署在了波兰领土上，并且正在制定进攻西欧的作战计划。在了解到苏联这一计划后，他彻夜难眠。他认识到，一旦发生大战，成为300万华约部队和无数技术装备主要通道的波兰必然成为主战场。面对占优势的华约常规力量，面临生死存亡危机的西方国家很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反击，这后果对于具有千年历史的波兰民族来说将是毁灭性的。

其实在波兰军队中，反对为苏联的意图火中取栗、希望利用美国压制苏联野心、捍卫波兰独立者并不少。库克林斯基曾在1970年试探性地和上司博莱斯瓦夫·霍哈中将谈过这个话题，但霍哈将军在抱怨“有人要将波兰当作原子试验场”之后，未敢与他深谈。

于是，在担忧民族命运、希望借美国之力赢得独立的爱国心驱动下，库克林斯基决定自己行动。在1970年代初，他和美国情报人员取得了联系，开始主动向美方提供自己所了解的苏联和华约情报。

逃亡美国，身后哀荣

1981年，苏联人通过在梵蒂冈的内线发现波兰总参谋部存在泄密，开始逐步缩小怀疑圈。库克林斯基感觉到自己身边的网正在收紧，就向中情局人员发出了预先约定好的信号。秘密网络迅速行动起来，他和妻子、两个儿子很快就逃出了波兰，被接到了美国，出逃细节至今没有确切的说法。

出逃前夕，他发出了最后几份波兰在苏联的压力下即将实施军管、准备将团结工会领导人一网打尽的情报。在11月2日发出的最后一份情报的结尾，他写道："自由波兰万岁！为一切被压迫民族带来自由的团结工会万岁！"这几句话正是支撑他抛弃锦绣前程、渡过如履薄冰般日日夜夜的动力。



2004年6月19日，波兰首席军事牧师莱谢克主持库克林斯基的葬礼。

在库克林斯基出逃后，暴怒的苏联与波兰情报机关曾经想把他绑架

回国后进行公审。在这一企图多次失败后，1984年华沙的一家军事法庭秘密开庭，缺席判处他死刑并没收全部财产。

逃亡美国的库克林斯基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受到了终身严密保护，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家庭从此进入了安全的净土。长期潜伏在中情局的克格勃“鼹鼠”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就曾接到莫斯科的指令，要打探他的化名和行踪。在1994年，悲剧发生了，在相隔半年的时间内，他的次子和长子都非正常死亡：次子博格丹在佛罗里达驾船时失踪，当时风平浪静，博格丹和另一同行者都具有丰富的航海经验，所驾船只上却没有逃生痕迹，也未发出求救信号，两人遗体至今下落不明；长子瓦尔德马当时已是法学博士，被一辆无牌大卡车撞击身亡，卡车司机弃车逃逸，但车内居然没有发现任何指纹。

老来丧子，对库克林斯基是巨大的打击。此外，在他的同胞中，无论是忠于前政权的老兵，还是波兰共和国第一任民选总统瓦文萨都将他看成是叛徒，对他大加抨击。堪可告慰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波兰人认为他是拯救了国家、民族的英雄。在波兰共和国以本国90%的民意支持率加入北约前夕，经过重新审查，这位“北约的第一位波兰军官”被宣布无罪，所没收财产予以归还。

华沙军事检察院公布的理由是“他的活动是出于更高的需要，是为了有效地保卫波兰免遭核武器的打击。他从事情报活动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波兰的利益”。而根据波兰刑法典第23条第1款，如果是为了避免公共利益和个人受到最直接的危险而采取避险活动，这种措施又是无法用其他方法取代的，且被挽救的损失大大超过牺牲的价值，其活动不构成犯罪。这实际上承认了库克林斯基是服从更高的民族自由、存亡而做出看似“叛国”的抉择，恰恰是爱国之举。

库克林斯基表示欢迎这一结果，但也苦涩地表示这对自己来说，只有象征意义了。此后，他多次重返故国访问，并先后被克拉科夫、格但斯克等波兰城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2004年2月11日，垂垂老矣的库克林斯基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去世，中情局为他在天主教堂举行了追思弥撒。数月后，他的遗体被归葬华沙的波乌斯基军人公墓，长眠于他长子的墓碑之侧。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国家公墓所葬的均为19世纪以来为国牺牲的波军将士。同年，波兰总统追授库克林斯基将军军衔。

编辑 陈祥 段宇宏

一本苏联史学杂志的兴衰

“每年定期出版6期，每期15印张，每期发行1万份，纸张的来源由

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负责。”苏共中央书记处于1954年5月确立出版《历史档案》杂志的决定。

文/ 徐元宫（中国政法大学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理事）

“斯大林的去世在社会上引发了颇为矛盾的情绪：一方面，似乎永远都被奉若神灵的领袖的离去引起了人们的惊慌失措、痛惜和悲恸，很多人号啕大哭；另一方面，斯大林的去世又消解了国家所面临的恐惧。”俄罗斯学者瑙莫夫这样描述斯大林的去世给整个苏联所造成的影响。

1956年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在苏联国内外引发了剧烈震动，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等地引发了大规模群众骚乱甚至流血事件，在国外则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些事件和国内外对秘密报告的剧烈反应，让新任苏联领导人感到疑惧和担忧，本来就在斯大林模式框架内打转转的他们，便在一定程度上迟滞甚至暂停了刚刚开启的调整和革新进程。因此，斯大林去世后的整个苏联既有“解冻”的一面，又存在着重新封冻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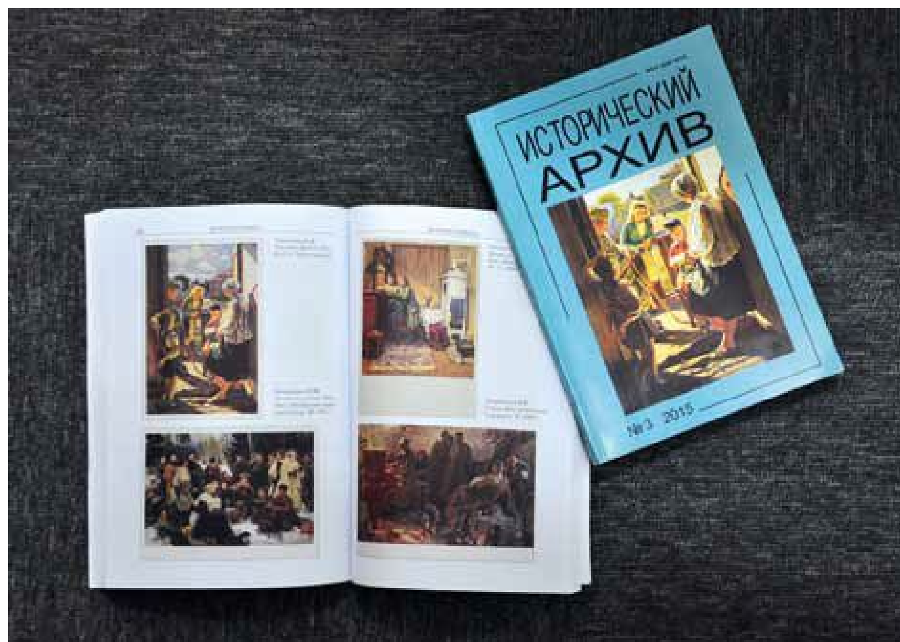
如此背景下，一份苏联史学期刊《历史档案》杂志问世又停刊，其命运深深印刻了斯大林去世后特定历史时期苏联政治、社会生活的特点，更是时代的一个缩影。

《历史档案》杂志问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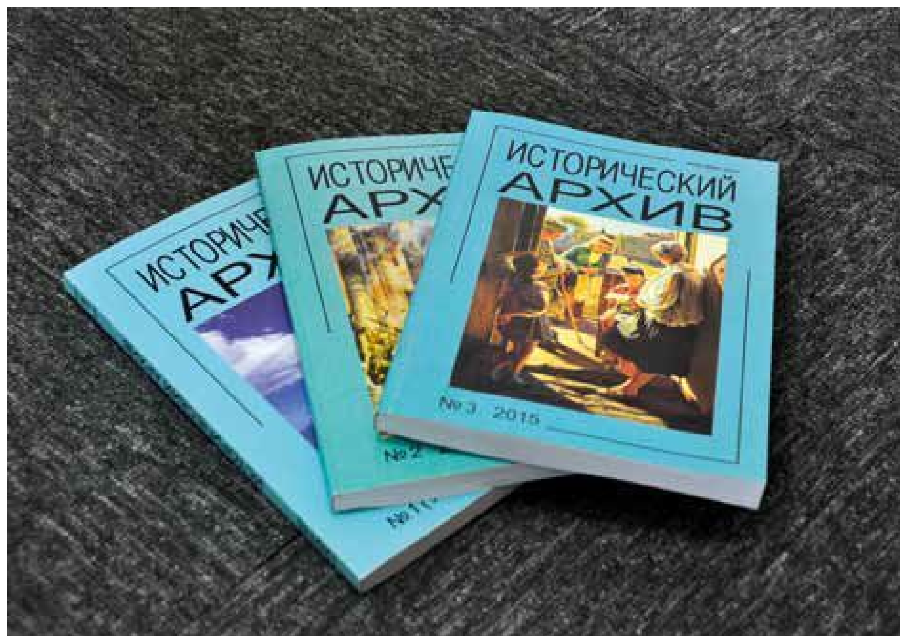
1953年10月28日，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给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呈交了一份报告，请求批准创办一份杂志《苏联档案》。

“1941年，由于开始了伟大卫国战争，1922年和1923年创刊的刊物《红色档案》和《档案工作》停止出版了。《红色档案》是苏联惟一的一份刊登历史档案文件的杂志，很受苏联学者、党和苏维埃活动分子的欢迎。《档案工作》杂志发表了如何确保文件文献资料的完整无损以及科学地实际利用苏联国家档案馆的文件问题方面的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文章和学术著作。现在，我们感到在报刊上系统地阐述所有这些问题是

极端必要的。为此目的，苏联内务部认为，以《苏联档案》的名称恢复出版惟一用于发表苏联社会史、俄国革命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史、俄国军事史方面的文件……以及档案管理问题方面的材料的杂志是适宜的”。如此，“将会使苏联研究工作者、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能够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更广泛地利用历史资料，并且对苏联科学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有助于揭露形形色色的歪曲历史事实的资产阶级伪造历史者”，“同时，这将有可能改善保存和利用文件资料的组织工作”，此外，“出版上述杂志对于在人民民主国家推广苏联档案事业的经验也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请求苏共中央“准许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和苏联内务部中央档案管理总局的参与下出版《苏联档案》杂志”。



上下图为近期的《历史档案》杂志，杂志由徐元宫提供。上图中左侧杂志的内页有四张图，依照从左页到右页，每一页从上往下的顺序，主题分别是远方的来信、战后小憩、女孩们、奏鸣曲。摄影 陈祥



同年12月11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通过决议：“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决定：向领导机关申请恢复出版杂志《历史档案》，与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联合出版此杂志，以便保证定期刊登苏联历史方面的历史文件。”

12月15日，苏共中央经济与史学部主任鲁缅采夫和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克鲁日科夫，联名给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呈交了一份报告，陈述道：“由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和苏联科学院联合出版的专题文件汇编，出版次数极其稀少，不能代替专门的杂志。编纂和出版专题汇编需要大量的时间，并且要吸引研究这个狭窄问题的著名专家来参加这项工作。即便如此，也并非总能够完成”。因此，“我们认为可以支持苏联内务部和苏联科学院关于出版《苏联档案》杂志的建议。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奥比奇金也同意这一建议”。

1954年2月29日，苏联内务部中央档案管理总局副局长穆萨托夫、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代所长西多罗夫和奥比奇金联名给波斯佩洛夫呈交一份报告，再次陈述请求批准创办《历史档案》杂志（此后的档案文件中都将杂志名称叫做《历史档案》了）理由，还对杂志的日常出版、印刷及杂志编委会的组成人员提出意见：“苏联内务部中央档案管理总局、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和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认为，《历史档案》杂志的出版应当由三个组织提供保障，但是杂志将是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正式机关刊物，将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印刷。杂志将每年定

期出版6期，每期15印张，印数15000份，每份15卢布为宜。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所作的初步预算，《历史档案》杂志的出版每年可盈利132250卢布。”杂志编辑委员会由穆萨托夫等12人组成。

同年4月26日，苏联科学院副院长、院士K.B.奥斯特罗维佳诺夫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代理总学术秘书、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H.M.西萨基扬，联名给克鲁日科夫呈交一份报告，表示苏联科学院支持三个部门出版《历史档案》的报告，同时特意建议“批准历史学博士、莫斯科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基础图书馆馆长顺科夫兼任该杂志的责任主编”，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之前的人选。

根据档案文件来看，克鲁日科夫接受了苏联科学院关于杂志主编人选的意见，并且直接将苏联科学院的上述意见转呈给了苏共中央。1954年5月1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终于作出了关于出版《历史档案》杂志的决定：“每年定期出版6期，每期15印张，每期发行1万份，纸张的来源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负责”，“批准顺科夫同志为《历史档案》杂志主编”。从1955年起，《历史档案》杂志正式出版。这份喜讯，主要是三个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首先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解冻”的大背景使然；其次是苏联社会、特别是苏联史学界和广大知识分子对于这份杂志的出版有着强烈的期待和迫切的现实需求；最后，是苏联政界有识之士的推动。

主编受到“警告处分”

1957年夏天，《历史档案》杂志因为发表了“不适合发表的”档案文件而获罪。

7月23日，苏共中央科学、高校和中小学部副部长库金等人呈交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详述了《历史档案》杂志所犯的“愚蠢的错误”：1957年第3期刊发的关于1942—1943年库班游击队运动的文件专辑中，有一些资料“可能会被资产阶级报刊用来诽谤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游击队运动”，因为其中“一份游击队队长的报告说：‘……他们（游击队小组）炸毁了敌人的载有伤员和有生力量的列车。’”，“在阿普谢隆斯克区党委书记向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所作的关于游击队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战斗行动的书面报告中指出：‘12月份，在迈科普—阿普谢隆斯克公路上，行驶的车队中有两辆载重量7吨的汽车被击毁，车上73名德国士兵和军官被击毙。汽车连同车上挤得满满的死尸及伤兵均被烧掉。只有两个士兵跑掉……1943年1月，窄轨铁路的一列火车被炸毁，炸死14人，有7人在逃跑时被打死，有6名伤兵被打死，另外还俘虏了1名列兵和1名上等兵。’”，“刊登这些文件的本期杂志共计出版发行了4400份，有636

份寄到国外，其中67份寄到资本主义国家（13份寄到西德，14份寄到美国）”。

报告认为杂志编委会成员谢佩列娃及杂志主编顺科夫“在准备这些材料的过程中表现出不负责任的态度”，建议必须给予顺科夫、伊夫尼茨基和谢佩列娃警告处分，并且将杂志所犯错误通报各科学和社会政治杂志的全体编辑人员，采取措施停止公开出售《历史档案》杂志第3期。



1961年10月1日，莫斯科街头，一群人驻足观望报刊亭里的外国报纸和杂志。连同《历史档案》在内的报刊书籍，为刚走出斯大林时代紧张气氛的苏联人民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精神食粮。

8月2日，苏共中央书记处给予三人“警告处分”。此后，《历史档案》杂志小心翼翼，所发表的文件都务必经过极其严格的报送审查程序，不经批准绝对不敢发表。比如，1958年下半年顺科夫呈报苏共中央书记福尔采娃，请求批准全文发表列宁关于1919年10到11月彼得格勒防御的4封电报，这些电报“说明了弗·伊·列宁直接领导保卫城市的作用”。苏斯洛夫签下批示：“我认为是不合适的。M.苏斯洛夫”。苏共中央意识形态、文化和国际政党联络事务委员会便于1958年11月19日作出决定，认定《历史档案》杂志发表列宁的上述4封电报“是不合适的”。该委员会的这份“决定”上有如下文字：“苏斯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福尔采娃——赞成”。

1960年5月11日，杂志主编易人。同一天，苏共中央科学、高校和中小学部呈交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由于顺科夫已被选为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副学术秘书，根据他个人的请求而解除他担任的该杂志主编职务”，“苏联科学院请求苏共中央批准丘加耶夫为《历史档案》杂志主

编”。同年5月17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更换《历史档案》主编的决定，丘加耶夫出任《历史档案》杂志新主编。

停刊拉锯战

1961年1月4日，苏共中央意识形态、文化和国际政党联络事务委员会下达了《关于审查亏损的历史杂志的决定》。它宣布对“那些发行量不大且又亏损的历史杂志”进行审查，“对其中某些杂志要合并或停止出版”。

1961年3月3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给苏共中央呈交了一份报告，认为“关闭或者合并一些历史杂志是不合适的”，理由是：“在历史科学领域，世界各国都走明显的专业化的路子。近代和现代历史学家绝不会订阅考古学或者古代史杂志，反之亦然。我们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和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我们这里每一个专业的杂志不超过一种。关闭它们之中的某种杂志只能使我们庞大的学者、高校和中小学教师队伍失去系统的材料、学术文章和科学专业的信息，增加某些历史领域的科学讨论和发展的困难。而且，这也会给我们在国外的意识形态斗争、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作的宣传、我们同敌对的意识形态和歪曲历史的现象的斗争带来极大的危害”，“关闭某些专业性很强的历史杂志，只能意味着对历史科学整个部门的宣传及意识形态斗争的打击”。

然而，苏共中央书记处还是于1961年5月16日通过并下达了《关于历史类杂志的决定》，该决定宣布：“为了消除某些历史杂志上的选题重复现象和减少出版这些杂志的费用，现决定自1962年1月起停止出版《历史科学》、《历史档案》和《世界文化史通报》等杂志，同时决定这些杂志的选题将被列入继续出版的杂志的选题计划。”这份文件上写有如下文字：“苏斯洛夫同志——赞成”。

根据解密档案文件，还在官方下达停刊决定前，苏联学术界和广大知识分子就对“关闭或者合并一些历史杂志”持反对意见。苏共中央的停刊决定正式下达后，反对意见更是不断提交到苏共中央。1961年7月1日，老资格党务活动家叶连娜·斯塔索娃亲自给苏斯洛夫写信，希望他采取措施保留杂志，提醒注意“该杂志要寄到国外150份，尽管不算多”，但“在研究要不要继续出版这个杂志的时候应该记住这一点”，“把杂志寄往国外当然有宣传作用并能使各兄弟党改善自己的工作”。叶连娜·斯塔索娃还随信寄去了两位党的老干部寄给她本人的信件，他俩请求帮助保留《历史档案》杂志。

1961年7月6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萨莫鲁科夫，也

给苏斯洛夫本人发　　一封信，陈述了《历史档案》杂志的价值和作用：“这本新杂志在其存在的7年间发表了大量极其重要的材料，其中包括有关列宁的活动、苏共党史、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史、伟大卫国战争史等方面的文件。现在，这些材料对于任何一个研究人员来说都是绝对不能没有的”，“不仅专业学术出版物，就连我国的报纸如《真理报》、《共青团真理报》、《经济报》等也都使用该杂志发表的材料”，“现在，约有40个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和机关订阅《历史档案》杂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停止出版该杂志是不正确的”，“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组织请求苏共中央重新审议就此问题已经通过的决议”。

同一天，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赫沃斯托克、苏联部长会议档案总局局长别洛夫、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马特科夫斯基三人，联名给苏斯洛夫写信，“请求苏共中央保留这一宝贵的定期出版物，因为它是任何其他出版物所不能替代的”。

1961年12月28日，苏共中央科学、高校和中小学部副部长库金也给苏共中央呈交了一份报告，指出：“注意到《历史档案》杂志的科学和政治意义”以及“它是惟一的一份专门用于发表历史党务文件的杂志这一情况”，“苏共中央科学、高校和中小学部认为，支持斯塔索娃同志、古别利曼同志和卡塔尼扬同志以及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部长会议档案总局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关于继续出版《历史档案》杂志的请求是适宜的”。

1962年1月4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继续出版＜历史档案＞杂志的决定》，决定宣布：“拟部分修改苏共中央1961年5月16日‘关于历史类杂志’的决定，认为可以继续出版《历史档案》杂志。”

“自1963年1月起停刊”

1962年11月4日，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给苏共中央呈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认定《历史档案》杂志1962年第2期发表“此前鲜为人知的材料：‘К.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В.И.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的通信（1902—1917年）节选’和С.С.波多利斯基写的前言”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波多利斯基同志挑选发表的信件突出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之间本来并不太大的分歧，波多利斯基同志竭力使这些信件具有艺术思想对立的意义”，“波多利斯基同志指责伟大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保守，不理解创新探索”，“文章的作者违背事实，把梅耶尔霍利德称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艺术革新中的亲密战友，此人与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不同，他当时在舞台艺术上坚持形式主义的原则”。

该报告认定《历史档案》杂志发表上述材料，“特别是C.波多利斯基歪曲荣获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的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历史的文章引起了苏联演艺界的强烈抗议”，“必须向《历史档案》杂志主编丘加耶夫同志指出他和编委会不负责任的态度。”

苏共中央书记处迅即作出了《关于＜历史档案＞杂志的错误的决定》，认定《历史档案》杂志编委会“犯了严重的错误”，“必须向《历史档案》杂志主编丘加耶夫同志指出杂志编委会在选择发表材料时所表现出的不负责的态度”，“责成《历史档案》杂志编委会采取措施改进杂志的内容，杜绝类似错误发生。”

1962年11月12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并下达了《关于＜历史档案＞停刊的决定》：“《历史档案》杂志自1963年1月起停刊。”

解密档案文件表明，这份杂志的命运，与苏共高层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等人的态度密切相关。多份有关该杂志问题的档案文件上都有苏斯洛夫签署的意见或者署名，杂志的命运直接受制于苏共高层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解读苏斯洛夫及其职能：“苏斯洛夫向我作了汇报，他主管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这些问题上离开苏斯洛夫还真不行。”

1992年，停刊30年的《历史档案》杂志得以重新出版，至今都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广大学界朋友深爱的史学读物之一。

编辑 陈祥

猜你喜欢



点此阅读

现代物理学如何在苏联活下来

在现代物理学即将显示威力的前夜，苏联对它的意识形态大批判选择了错误的时间和对象，最终以失败收场，与生物学在苏联的遭遇形成了鲜明对比。

文/ 方亮

物理学从18世纪起进入俄罗斯历史，日后为苏联领导人们孵化出核武器，改变了俄国历史进程。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莫斯科大学作为这门学科在俄最重要的学府，1755年建立时将它设置在哲学系下。这凸显出俄罗斯人在看待物理学问时几乎与生俱来的哲学视角。既如此，当布尔什维克建政初期哲学问题成了意识形态问题，而现代物理学两大支柱量子物理和相对论也触及到了哲学层面，这门学科难免面临生存问题。

作为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的物理

20世纪初，量子物理学和相对论在西方引发理论革命，彻底改变了物理学发展走向。而原本在相关理论研究中可以与欧洲比肩的俄国物理学（尼古拉·乌莫夫的能通量研究、彼得·列别杰夫的光压效应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日后10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成果也证明了俄国物理研习传统之深厚）却开始经历布尔什维克建政后的意识形态考验。

布尔什维克建政后，“共产主义科学院”、“工人系”、“红色教授学院”先后建立，对旧知识分子进行压制并以政治更可靠的红色专家、工人知识分子取而代之，“改造”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而与此同时，列宁奉行吸收旧知识分子参加国家建设的政策，到20年代末时甚至已经组建了超过1000家科研机构，使得这场运动虽阻滞了物理学的发展，却不足以摧毁它。

由于只要年满16岁就可以进大学读书且无需提交任何学习能力证明，作为俄国物理学中枢的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1933年更名为物理系）人满为患，1922年该系学生人数达到1.35万人，成了莫大第一大系，学生数量占比超50%。这虽使得教学工作在有限的资源下运转艰难，却也成了一种“繁荣”，见证着布尔什维克对物理的重视。

而当布尔什维克们开始关心物理学的哲学属性，真正的考验才到来。

整个20年代，布尔什维克忙着占领学术阵地，随之而来自然是对学术问题的意识形态探讨。像围绕哲学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召开各种讨论会

议一样，围绕物理问题的讨论也开始热络起来。电流、熵、惯性、宇宙论、相对论，这些都成为探讨的对象。红色科技工作者们想要知道，这些知识与辩证唯物主义是否统一。

如此这般的政治背景，对象却又是复杂的物理学，领袖的判断作为一种教条自然是最容易被掌握的。

马赫主义首先成了靶子，而这是拜列宁所赐。

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于19世纪70年代创造出经验批判主义，认为作为世界第一性的东西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而是感觉经验。物质、运动、规律都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是人们生活中有用的假设。列宁在1909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它进行了批判，指出其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实质。这种判断在日后的这些探讨中像公理一般不容置疑。

西德康斯坦茨大学哲学系博士格雷翁·沃尔斯特曾指出，由于列宁崇高的政治地位，很少有俄国学者有足够的学术自由和勇气阐述自己对马赫主义的认识，“如果列宁还活着，他很可能会对自己的书由偶然的政治论战著作预料不到地变成了声望极高的认识论经典著作而感到惊愕。”

列宁从未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任何意见，但由于后者曾明言自己发现相对论是受到了马赫主义的启发，所以相对论也在这场大讨论中广受攻击。

莫斯科大学物理学教授瓦西里·叶戈尔申在1931年3月19日莫斯科召开的一次共产主义物理学家会议上指出，相对论使得时间、空间和物质性都遭到质疑，它让唯心主义兴盛起来。给出该论前，他大段援引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马赫主义为桥梁，达成了对相对论的批判。

被布尔什维克们视为信条的无神论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最基本的出发点，所以任何对客观存在的“否认”"都无法被接受。

量子物理学也因同样的逻辑遭到批判。这门学问发现，粒子运动的路径会受到观测者影响，这似乎就否定了粒子观测路径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更改的判断。量子物理学创始人之一玻尔因此认为，任何一种基本量子现象，只在其被记录之后才是一种现象。而在观察发生之前，没有任何物理量是客观存在的。

如此“公然”地“否认”客观存在，否定因果论，量子物理学自然会在

苏联受到批判。红色物理学家们认为，玻尔意欲用物理学来消灭马克思主义。

1929年4月8-13日，第二届全苏马克思列宁主义科研机构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当时在对科学进行哲学解释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哲学家阿布拉姆·德波林面对300多名与会代表指出，自然知识领域出现了唯心主义倾向，它贬低人类理性，在神灵信仰和科学方法间寻求统一。他着重指出，这种倾向在物理学中的体现就是马赫主义。

另一位著名学者奥托·施米特则更直接，他批判了西方哲学家们从相对论中总结出的唯心主义判断，还称："我们的很多学者立场非常不坚定，如果有人从量子物理学中总结出了反对因果论的东西，那么他们立即会予以接受。"

1931年联共（布）中央决议称，要在自然科学和哲学领域"对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无情批判"。所以，在这10年中，这样的讨论会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召开，苏联红色物理学家们颇有将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逐出物理学的架势。

徒劳的理论创造

这种批判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对《苏联大百科全书》相关内容进行批判时，"可能性"、"象征"这样的字眼都被认为有唯心主义嫌疑，还被写进了批判会议决议里。除了爱因斯坦，玻尔、薛定谔等外国物理学家及雅科夫·弗兰格尔、阿布拉姆·约费这样在相对论研究中的俄国先驱以及伊戈尔·塔姆、列夫·兰道这两位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学者，都被扣上了唯心主义或马赫主义的"罪名"。许多极端者不再停留于只批判某种学说，只要缺少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反资本主义唯心论的内容，不论著作还是学者，都会被他们认为是大逆不道。

停留于批判是不够的，批判者们终究要建立一套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物理学体系。上文提到的瓦西里·叶戈尔申是最早做此尝试的学者之一。这位教授说："布尔什维克物理学家们不可以一个兜里装着党的路线、文件，另一个兜里却揣着资本主义物理学说"。

他投身于新理论的创建中去，但其建树却非常散碎、杂乱。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先得到其关心。比如，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法国物理学家路易·维克多·德布罗意（Louis Victor de Broglie）这个名字被其注意。叶戈尔申认为，"de"这个象征着其贵族身份的前缀应该被去除，因为译出它与阶级斗争原则相悖，今后这位物理学家的名字缩短为"布罗意"即可。

基于同样的逻辑，苏格兰数学家、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开尔文勋爵这个名字中，“勋爵”一词也被他要求去掉。

他尝试编写一本物理学教科书，并表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同时期的论述以及中央文件中所有有关物理学的表述，都将在其中得到引用。

他列出八章学习内容。但是，从能量守恒和转化的规律到机械运动，再到对声、光、电的研究，其基本内容与通行的物理学并无不同。他重新表述了牛顿定律，却与原版无大区别。同其他一些教材编写者一样，叶戈尔申也认为旧物理学中“力”这个概念很容易导向“上帝之力”这一神学叙述，但他却也未能给出更加恰当的概念对其加以指代。他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加入了《资本主义物理是如何告别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物理走入困境》这种意识形态色彩极强的内容。此外，他坚决拒绝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

最终，编写马克思主义物理学教材的尝试无一成功。



主导原子弹开发工程的苏联核物理学家伊格尔·库尔恰托夫（前排右一）与列宁格勒物理研究所的同事合影。

谁才是唯物主义者？

这种生硬的理论再造不过是对原有的物理学进行“翻译”，本来就是多此一举。更何况这些红色物理学家们并未提供实质的理论“增量”，而且他们还生生抛弃了作为现代物理学两大支柱的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

叶戈尔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物理学将主要以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二书为依据。这显然是又犯了沃尔斯特所说的“将政治论战著作当作认识论经典”的错误。

从20世纪末到30年代，整个苏联陷入了“大转折”的政治浪潮中，对重工业、农业集体化的全力坚持带动着意识形态上的狂热。这种在自然科学中的“走火入魔”其来有自。

1929年4月的全苏马克思列宁主义科研机构大会虽然是一次充斥着意识形态激情的大会，却在最后的决议中给出了非常客观的表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有着极强的优势，但在自然科学领域却未有显著建树，这就是为什么在自然科学领域证明辩证唯物主义才格外困难。

列宁曾言，只有当你用关于人类所创造的那些财富的知识来丰富你的头脑的时候，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所以，苏联物理学若要达到自己的哲学目标，仍需以人类已有的物理学成就为基础。如果是反对相对论等理论，那也应作出让人信服的实验。红色物理学家中的一派“机械论派”（坚持机械物理学而反对相对论的几位物理学家，代表人物阿尔卡季·季米里亚泽夫）沿着这个思路走了下去，但他们用的反证依据却是西方学者在做的“以太漂流实验”。先不说这个实验始终未能推翻相对论，单单引用它这个事实就凸显出红色物理学家们的无力与无奈。

恰如这场批判运动的另一位主将，哲学家亚历山大·马克西莫夫指出的那样，批判者队伍缺少一流的物理学家，这让运动进行得很是艰难。日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伊戈尔·塔姆指出，大部分在苏联物理学领域工作的马克思哲学代表们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都一无所知，他们的物理知识最多达到了上个世纪或本世纪初的水准，而最近30年恰是物理学发展最为迅速的时代。

讽刺的是，那些一流的学者们，也就是作为反对运动矛头所指的旧物理学家们却恰恰完成了红色物理学家们未能做到的事情。

在整场批判运动中，约费、弗兰格尔、塔姆这些物理学家都一直在维护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弗兰格尔在1931年的一次会议上宣称：“辩证法方法无权谋求科学领导地位”。1934年的另一次会议上，他表示：“在哲学领域，我不是小孩子。我从列宁、恩格斯著作中读到的那些内容不足以取代我原有的方法论观点。这就是我的观点，我绝不放弃它。”

弗兰格尔的观点可谓开宗明义，毫不妥协，以鲜明立场保护现代物理学。也就是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据理力争，才让支持现代物理学的立场在1936年苏联科学院大会等会议上占据上风。当然，这里面也有红色物理学家们理论素养太差的缘故。

但另有几位学者决定另辟蹊径，他们干脆转而论证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并不相悖，以此来保全它们。

弗拉基米尔·福克就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他和塔姆等俄国物理学家与玻尔过从甚密，在大名鼎鼎的哥本哈根学派中组成了一支俄罗斯力量。在他看来，如果物理学需要一件哲学外衣，那么几乎每一位物理学家都偏好自己能够接受或喜好的那一件。牛顿用“上帝之力”来解释自己的理论，而爱因斯坦则把自己的理论与马赫主义联系在一起。在福克看来，这些哲学解释与其说是理论与哲学内涵的内在联系，不如说是学者自身的偏好。而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解释它们，则也都是解释得通的。

另一位在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物理学家列夫·兰道则详细地按照唯物主义描述了量子物理学的微观世界，他着重强调，电磁场是一种物质。

这是一种对现代物理学进行唯物主义叙述的尝试。最终，它结出了果实，尼古拉·布哈林决定对这群捍卫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学者们予以支持。

1931年，布哈林率领苏联代表团赴伦敦参加世界科学大会。代表团中的物理学家鲍里斯·戈森发表了一篇报告，从另一个层面来为物理学的唯物主义解释作出了贡献。

戈森称，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为一个新的经济秩序铺平了道路，而这个秩序需要新技术，进而召唤一个新的物理学。而牛顿提出的三定律及其光学研究为日后的弹道学、力学和流体静力学提供了基础，满足了上述召唤。这个论述另辟蹊径地表明，牛顿的理论是从客观世界中来的，是符合唯物主义的。

戈森的论述是当时那批苏联物理学家唯物主义话语体系的一种概括和集成。结果，它在西方世界引起不小的反响。因为西方一直强调科学家内在因素对科学产生过程的影响，而忽视外在因素。戈森的报告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这也对日后科学学（解释科学产生、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从客观上来讲，这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对世界科学进步作出的贡献，似乎与马赫启发爱因斯坦异曲同工。而戈森也为现代物理学的唯物主义解释作出了贡献。

红色物理学家们专业素养不足而主要的物理学者们都倾力维护现代物理学、后者开始从唯物主义视角来解释现代物理学，这两个因素成了现代物理学在苏联屡遭批判却始终未被消灭的重要原因。虽然大批判取得了些许“成果”，比如兰道、福克身陷囹圄，戈森暴毙狱中；但约费、弗兰格尔、塔姆等学者却得以保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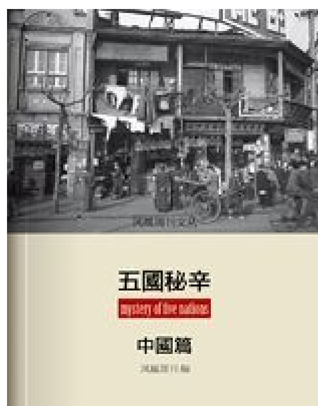
而现代物理学最终活下来的最重要的因素显然来自于外部。1938年，核裂变成功，各国都意识到以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为基础的现代物理学对政治、军事的直接影响，于是都开始重视物理学的发展。而苏联也不例外，约费等学者被重用，物理学研究及其开发项目回到了学者们手中，几乎完全摆脱了意识形态乃至政治阻碍。

1949年3月，红色物理学家们曾试图组织一场“全苏物理学大会”，在战后继续对现代物理学发难，结果被高层叫停。从日后的回忆材料看，原子弹成了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护身符"。

苏联对物理学的意识形态大批判选择了一个错误时间和对象，非得在现代物理学即将显示威力的前夜对其宣战，失败几乎是必然的，这显然同生物学在苏联的遭遇形成了鲜明对比。

编辑 段宇宏

五国秘辛系列其他篇





五國秘辛

mystery of five nations

韓國篇



五國秘辛

mystery of five nations

德國篇



五國秘辛

mystery of five nations

日本篇



凤凰周刊文丛

五國秘辛

mystery of five nations

中國篇

凤凰周刊 编

Table of Contents

清帝退位诏书的百年疑云

1903，晚清时局中的创业潮

历史漩涡中的真实庆亲王

中国传统宗族的救济功能

毛时代的计划生育

袁世凯变卖清宫大内瓷器真相

刘文辉办教育真相

版权信息

五国秘辛·中国篇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凤凰周刊》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2016©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2016

本书版权为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所有。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TCFP-N00007210-20160304

最后修订：2016年08月09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清帝退位诏书的百年疑云

这份350字的退位诏书，颁布至今已有103年，但围绕这份诏书，依然有众多的疑点：退位诏书究竟是谁起草的？先后有几个版本？经过谁的修改？

文 / 刘江华

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清廷颁布“退位诏书”：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这份350字的退位诏书，颁布至今已有103年，但围绕这份诏书，依然有众多的疑点：退位诏书究竟是谁起草的？先后有几个版本？经过谁的修改？“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中的“袁世凯以全权”是不是袁世凯擅自加上的？



清廷为何同意颁布退位诏书？

同意颁布退位诏书，意味着清廷接受了南方民军提出的建立共和政府的主张。

在1911年12月3日正式停战、议和之前，经日本商人、俄国领事敖康夫等牵线，清廷和民军已经在私下进行接触，试探对方主张。道员刘承恩就是受袁世凯派遣、前去武汉与黎元洪接触的清廷官员。在11月22日的一份电报中，刘承恩说“党代表提议建立民主，将我政府另置一地保全、安富尊荣，与宪命之意不合，故难就议”（《军机处电报档》）。由此可知，早在10月初，民军就已经有清室退位、另置一地保全的方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军的优待方案变得更加具体。12月14日起，南北双方代表从武汉转移到上海继续谈判。12月13日离开武汉之前，外务部司员曾宗鉴给外务部发电报，其中就提到，“在鄂议四条：一推翻满清；二优礼皇室；三厚待满人；四统一各省”（《电报档》）。“优礼皇室”和“厚待满人”这两条，已经具有后来优待皇室条件的雏形了。

尽管如此，直到11月底，清帝是否逊位，还没有定论。虽然清廷于12月28日正式下旨，同意召集国会公决君主、民主问题，但直到1912年1月24日，清廷的主张还是召开国会以决定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没想退位。一个明显的证据，这天，隆裕太后下“国会选举办法暨开会地点可酌量办理”懿旨。为此，第二天，袁世凯专门上折汇报国会地点拟选天津、青岛、汉口三地及议员代表分配的新方案。

但是仅仅过了4天，清廷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1月29日，隆裕太后主持召开第五次御前会议，决定撰拟宣布共和诏旨。2月3日，隆裕太后发布谕旨：授袁世凯全权与民军商酌优待条件。

清廷态度为何突然发生了巨大转变？史书一般认为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宗社党领袖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使得宗社党不敢再坚持抵抗；二是段祺瑞等带有“兵谏”性质的联名上书，逼迫清廷就范。

但看来，过去的史家夸大了彭家珍暗杀良弼的作用。从良弼死后的待遇来看，他在清廷并不受重视。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的同时，还颁发了两道和赐恤有关的谕旨：第一道是给予四川总督端方同时遇害的弟弟端锦赐谥；第二道是不给良弼赐谥。

赐谥是朝廷对死者褒奖的一种重要手段。端锦生前的官衔只是河南候补知府，为四品官；良弼为副都统，属正二品。官阶低的端锦被准赐谥、官阶高的良弼却没有获准，足以表明清廷对良弼之死并不是十分重视。

2月3日授袁世凯全权与民军磋商优待条件的懿旨中，有“前据岑春煊袁树勋等暨出使大臣陆征祥等统兵大员段祺瑞等电请速定共和国体以免生灵涂炭”等语，但岑春煊的《为开国会决定政体事宜陈述己见事》电报在1月9日已发，清廷断不会拖至一个月后才重新予以考虑，在此只是托词而已。

促使隆裕太后接受共和的真正原因，是段祺瑞的“兵谏”：

“1月25日，段祺瑞以湖广总督名义向内阁发去《为感懿旨公决政体及各将领来言请战事》的电报，奏言“迩来各将领不时来言人民进步非共和不可，……昨闻恭王、泽公阻挠共和，多愤愤不平，要求代表各路统将亦来联衔，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电报所说的恭王、泽公阻挠共和，是指在御前会议上恭亲王溥伟、镇国公载泽反对共和的言论。

紧接着，第二天，1月26日，段祺瑞又联合姜桂题、张勋等46位将领，联名致电内阁转奏，“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1月27日，南方谈判总代表伍廷芳通知袁世凯，“如阴历本月十一日上午八时以前，仍未得清廷宣布共和确报，则前交优待条件全行作废。”阴历十二月十一即1月29日。段祺瑞的奏电和通电，以及伍廷芳的最后通牒，直接导致隆裕太后被迫同意共和，于1月29日主持召开第五

次御前会议，决定撰拟宣布共和诏旨。

宣布共和诏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退位诏书。从那时到今天，关于它的种种传闻，不少至今尚难确定。



退位诏书。

退位诏书究竟有几个版本？

一种说法是洪述祖起草了退位诏书。

时为袁世凯侍从武官的唐在礼，曾于1912年2月12日抵乾清宫，见证隆裕太后移交退位诏书过程。他回忆说：谈到退位诏书，我们总以为是袁世凯幕下专拟奏稿的文案阮中枢所草拟的，因为当时所有重要的奏章，甚至是谕旨，几乎都是出自阮的手笔，后来听说最早的退位诏书是直隶候补道员洪述祖所拟的。洪是内政大臣赵秉钧的亲信秘书，夤缘赵而得到袁的赏识。那个诏书，是洪到袁的私邸去听袁面授要义而后着意撰写的，以停战议宪为要旨，说明“但求于中国土地人民多所保全，无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余与皇帝均乐观厥成”，并未明诏退位。洪述祖是著名电影导演洪深的父亲。在轰动一时的“刺杀宋教仁”案件中，洪述祖受袁世凯、赵秉钧等指使，策划组织，1919年被判处绞刑。

据其给赵凤竹的信，那份诏书，在9月初就已经写就。唐在礼文后还附录了洪述祖版退位诏书的原文，两厢比较，和后来的退位诏书毫无相同之处。但可以说，它是武昌首义之后出现的最早的退位诏书。

另一种说法是梁士诒起草了退位诏书。

《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2月6日给希拉姆的信中说到退位诏书，“这道谕旨正由梁士诒草拟中，昨天他还同我磋商这件事。他认为在十天之内不可能颁发……”2月9日，莫里循又在信中告诉希拉姆，“梁士诒，邮传部长，正在撰写退位诏书”。梁士诒当时确实负责南、北之间重要细节的讨论，但1939年由凤冈及门弟子编定的《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中明确说，“退位诏书是清一代最后结束，原文系由南中将稿电来，该稿为张謇手笔，后经袁左右增加授彼全权一笔而发表。”

第三种说法是张锡銮起草退位诏书。

1936年10月，曾经跟随梁士诒、阮忠枢等人在袁世凯内阁担任文案幕僚的叶恭绰，在袁世凯、梁士诒、阮忠枢等人相继离世的情况下，在《越风》半月刊第20期发表《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一文。其中说，逊位诏书，张锡銮（吴禄贞被刺后出任山西巡抚）早就叫人拟了一稿，大家认为冗长，不满意，交给他修正，他觉得为时还早，就密藏在衣袋中。拖到1912年2月7日前后，他正准备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謇、赵凤昌所拟）。这点，在唐在礼的回忆中也得到印证，“其后张锡銮也找人拟过一稿交叶恭绰修正，叶迟迟未动笔。”

第四种说法是华世奎、阮忠枢、徐世昌起草。

1912年2月6日，天津《大公报》消息，退位诏书的草案于2月2日呈进，执笔者为华世奎、阮忠枢。次日，又有消息称，“此一诏书是隆裕太后命徐世昌起草的，昨已将草案交袁内阁校阅，袁以此次皇上退出政权，断非历代亡国可比，等将来颁诏时，拟由内阁撰定，请旨颁布。”

第五种说法认为张元奇起草，徐世昌修改。

逊位诏书颁布10天后，上海《申报》于2月22日以《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为标题报道说：“此次宣布共和，清谕系由前清学部次官张元奇拟稿，由徐世昌删订润色，于廿五日早九钟前清后升养心殿后，由袁世凯君进呈。”张竞生《南北议和见闻录》也说：“退位各诏，系学部副大臣张元奇拟稿进呈，清太后交世续、徐世昌斟酌，经徐世昌删订润色，然后盖用御宝。”依据“清学部次官”推断，这里的张元奇，应该是“张元济”之误。张元济，年轻时曾积极参与戊戌变法，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得以发展壮大的。

此外，还有袁世凯起草说等版本，时为新疆布政使的王树在自订年谱《陶庐老人随年录》中说：“其逊位之诏皆袁世凯所拟也。”

而流传最广的，是前清状元张謇起草说。唐在礼就回忆，“传闻最盛的是南方张季直与赵竹君所拟之稿，用电报传至京，后经汪衮甫、徐世昌等修改。”张季直，即张謇，辛亥革命期间常住上海赵凤昌（字竹君）家，而汪衮甫即时为民政部左丞、为袁世凯掌文案的汪荣宝。

张謇去世（1926年8月）之后，他的儿子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传记》初稿中谈到“不久内阁即日逊位的复电，来到我父的手中”时，摘录引用的内阁复电中，有“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等内容，和最终版退位诏书相比，虽然还有很多文字的不同，但意思已颇为相近。

胡汉民读到传记初稿后，于1930年2月18日给为该传记题写书名的谭延去信，明确表示退位诏书是张謇所写的，“清允退位，所谓内阁复电，实出季直先生手。”胡汉民还说，是他请张謇起草的退位诏书。在其自传中，胡汉民再次重申了此说法，“清帝溥仪退位之宣言，由张謇起草，交唐绍仪电京使发之”。

张孝若在张謇的传记中还说，起草诏书的原稿现存在赵凤昌先生处。

赵凤昌，字竹君，曾为张之洞幕府，晚号惜阴主人，其居所惜阴堂曾为南北和谈场所，期间往来众多的南北双方关键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唐绍仪、伍廷芳等等。他的儿子赵尊岳在《惜阴堂辛亥革命记》中说，退位诏书是张謇应其父赵凤昌所请而起草的，“张初笑谢，以为不可，终于著笔，就其案头八行横笺，不具首尾，书数百字，文甚朴雅。先公以为可用，亟电京师。不出所料，北方前拟数诏，均不中体，袁正患无策，得之大事称许，一字不易，仅加由袁世凯办理一语颁行之。”赵尊岳也承认，张謇的手稿在他们家还保存了好些年，“张手稿存‘惜阴堂’有年，某年《申报》国庆增刊，嘱余记辛亥事，因影印以存其真，惟张谱失载其事。”

退位诏书究竟出自何人之手？

上述各种说法中或细节存在错误，或引述不够具体，种种原因导致目前关于退位诏书究竟是谁所起草，尚无确凿无疑的结论。

洪述祖版太早，和最后版本毫无关联；张锡銮版，叶恭绰尚未动笔修改。此二说可以搁置不谈。莫里循的梁士诒起草说，本身就为梁士诒所否认，自不足信。《申报》2月22日的张元奇起草说，其中写到“于廿五日早九钟前清后升养心殿后，由袁世凯君进呈”，这明显是不谙史实的信口开河，因为无论是清宫档案还是各种当事人的回忆，隆裕太后交退

位诏书的场所是在乾清宫而非养心殿，而且袁世凯并未到场。

至于张謇起草说，虽然目前得到最广泛的认可，但尚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更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原稿尚未发现，且无论是张謇的信札、日记还是后人编订的张謇年谱，对此都没有记载。笔者曾先后去过位于江苏南通常乐镇的张謇故里和位于南通市区张謇所创办的南通博物苑，两处对张謇的介绍中，都没有提及其曾起草清帝退位诏书一事。

赵尊岳所说的曾经将张謇此手稿的影印版发表于《申报》，但至今未在《申报》找到。而且，他还说，“胡汉民初不知其事，以为别出他手，至孝若传记及影印本出，始爽然自愧失言矣。”而按胡汉民自己的说法，是他请张謇起草的退位诏书。果真如此，胡汉民岂能不知此事？并且，胡汉民和赵凤昌都说是自己请张謇起草的，岂不互相矛盾？

和退位诏书起草者是谁尚难确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退位诏书颁布之前，袁世凯曾亲笔进行了六处修改。

2013年7月，由骆宝善、刘路生夫妇主编的《袁世凯全集》出版。这套煌煌36卷、定价2.68万元的《袁世凯全集》，无疑收录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袁世凯文稿及相关史料。

据此版《袁世凯全集》，我们看到最终版退位诏书在公布之前，至少还有5个不同的修改稿，其中的一版，袁世凯亲笔作了6处修改。

修改第一稿中的大部分文句，和最终版在文字上有很大的差异，起笔为“前经降旨，召集国会，将国体付诸公决”，此外说到退位原因之一，是“转瞬春耕，长此兵连祸结，四民失业，盗贼起，荼毒生灵，岂牧民者所忍漠视”，但一些关键内容已然确定，比如“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比如“著授袁世凯以全权，筹办共和立宪事宜”。

最终版退位诏书结语“岂不懿欤”历来为人称道，叶恭绰评论，“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盖舍此四字，无可收煞也。”我们发现，修改第二稿删去了部分文字，但末尾即有此四字，而且文中出现了“应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样的关键词句。

在修改第二稿的右侧空白处，有两行与内文修改笔迹相同的旁批，写道：“略声出民军发起之功，袁为资政院所举。”于是，修改第三稿的开头改为“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文中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字句。但关于临时共和政府组织，和第二稿相比，“与民军”三个字前

移了，成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这，意味着是由袁世凯和民军共同组织临时政府。

《袁世凯全集》中还收录了张謇南通家藏的退位诏书。此版退位诏书和第三稿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一、没授予袁世凯全权而是“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二、结尾不是“岂不懿欤”而是“岂不懿哉”。

袁世凯的手批版，则是在修改第三稿的基础上的。其一，是将“今全国人民心理倾向共和”改为“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加了一个“多”字，更为准确；其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暨完全领土，悉行付畀国民，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一句，改“悉行付畀国民”为“公诸全国”，而将“完全领土”四字移后至“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之后。更为关键的是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一句，改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把“与民军”三字后移。

最终公布的退位诏书，完全遵照袁世凯的修改版。这也意味着，袁世凯手批版即为退位诏书的最终修改版。

从上述对退位诏书的各种修改稿的简要叙述，我们还可以得知：

赵尊岳的记述有不实之处。他说，“不出所料，北方前拟数诏，均不中体，袁正患无策，得之大事称许，一字不易，仅加由袁世凯办理一语颁行之。”退位诏书显然经过多番修改，而非一字不易，第一、第二稿的开头，和最终版更是差异明显。

张謇家藏版退位诏书并非张謇执笔的原稿或副本。因为家藏版中，像“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显然是袁世凯修改稿的笔意，“组成民主立宪政治”的表述也和民军主张共和的宗旨相悖。

胡汉民在自传中的表述有误。他说，“乃于最末加‘授袁世凯全权’一语，袁殆自认为取得政权于满洲，而作此狡狯也。先生（孙中山）见之，则大怒责其不当；而袁与唐诿之清廷，且以其为遗言之性质，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正之理。”但由上我们得知，修改第二稿即有“应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而非最后才窜入。

更为关键的是，在退位诏书正式颁布前一天，即2月11日，袁世凯曾给孙文、黎元洪、伍廷芳等去电，发去退位诏书全文。与此同时，还另电告知“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也就是说，如果民军方面对此退位诏书有异议，

完全有时间在12日颁布之前再进行磋商和修改。换言之，退位诏书的最终版，孙文及民军方面当时是认可的。

袁世凯手批清帝逊位诏书的原件，据骆宝善先生介绍，他是经过一个台湾学者的提示，在日本找到的。

而根据唐在礼的回忆，他们从隆裕太后那里拿到退位诏书之后，就前往袁世凯当时所住的位于石大人胡同的外交大楼，在那儿举行了隆重的接授诏书仪式。袁世凯“略为鞠躬双手接过，随即将诏书打开，但并未宣读，就慢慢地把它放在大帖架上陈列起来。”这道诏书原件，后被内阁中书张朝墉收藏。张殁后，由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以很少的钱购得，如今保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馆《复兴之路》展览说明中如此介绍，“此诏书1975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现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前往一观。

编辑 段宇宏

猜你喜欢



点此阅读

1903，晚清时局中的创业潮

创业在当年可不见得有多么光耀门楣，但是，当官对任何人绝对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好事。官衔，就是晚清最有效的“创业孵化器”。

文 孙骁骥

对中国的创业者而言，“黄金时代”不仅是人人言创业的今天。早在百余年前，在新旧时代交汇的晚清，创业者们就迎来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创业潮。

与此前任何一个时代比较，清末的创业者都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彼时，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概念逐渐为国人所熟知，有心往商海里扑腾几下的弄潮儿，在小打小闹的“经商”和“做买卖”之外有了属于他们的更高目标——办公司和做实业。

官衔是最有效的“创业孵化器”

清朝子民们能够在法律意义上自由地办公司、创业，还是发生在20世纪初的事。

1903年4月，深为庚子事变惊惧的朝廷宣布成立商部。上谕称：“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并敦促载振、袁世凯、伍廷芳等大臣着手“提倡工艺，鼓舞商情”之事宜。

虽然决心要“鼓舞商情”，但朝廷仍旧担心国内那些本小胆也小的商人不敢放开手脚创业，于是又补充规定说，“凡商人出资营业，自一万元以至八万元以上”的，分别发给七品至九品的“奖牌顶戴”。“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立经营，或集合公司，其确有成效者，即各从优奖励。果有一厂一局，所用资本数逾千万，所用工人至数千名者，尤当破格优奖，即爵赏亦所不惜。”



1900年，上海繁荣街道一景，后面的洋房位于法租界内。外来的巨大冲击刺激了中国商业发展，遂有晚清创业潮。

在清政府紧接着颁布的《奖励公司章程》中，白纸黑字写着：政府将依照公司创办人集资的多寡来进行奖励。“奖品”是象征社会身份的大大小小官职品衔和顶戴。

据史料记载，当时集股5000万元以上者，准授予商部头等顾问，头品顶戴，准其子孙世袭商部四等顾问，三代而止。集股4000万元以上，准授予商部头等顾问官，其子孙三代世袭商部头等议员……即使仅仅集股50万元的商人，也可以获准授予五等议员加七品顶戴。

只要能迅速激励人们投身民族工商事业，清廷连背上“卖官鬻爵”的恶名似乎也不在乎了。为何要如此不惜代价大肆鼓励创业？这说明当时一般民众不敢创业、不愿经商。创业门槛过高，商人地位过低，这让创业一直都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历史上商人不受待见，并非一天两天。按照传统的“四民论”说法，商人们在这个因循守旧的国度一直排在“士”、“农”、“工”这三个阶层之下，历来被社会公认为最无道德、最低贱的人群之一。

即使到了明代这个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皇帝朱元璋为了“重本折末”，依然对商贾阶层制定了歧视性的规定：“今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你看，商业阶层连穿衣服这种生活基本需求都要受种种歧视，何况其他。人们在如此恶劣的歧视性环境之下怎么可能安心经商呢？

与“商”的低贱相对，令整个中国社会趋之若鹜的是权力的中心——“官”。

官员对于商人而言，永远是需要他们毫无底线地去“伺候”、“孝敬”的主人，商业阶层本身，则始终是位居于一种低贱的奴仆地位。明末的《士商要览》，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一部“商书”，里边明确地写着一条“是官当敬”的原则：“官无大小，皆受命于朝廷，权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辱慢”。商人奉行的这些金科玉律一直延续到了晚清。

惯于自轻自慢的商人们“敬官”之因，并不在于官员们在道德上值得尊敬，而仅是因为“盖尝为卑为降，实吾民之职份也”。学者余英时曾对此愤愤不平地说：专制的官僚系统犹如天罗地网，岂是商人的力量所能突破？

因此，清政府要想吸引时人投资办公司、拉人马搞创业，最佳途径莫过于直接给予创业者行政级别。让原本最“低贱”的人，获得最“高贵”的身份。创业这事，在当年可不见得有多么光耀门楣，但是，当官，头上有顶戴花翎，这对任何人都绝对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好事。官衔，就是晚清最有效的“创业孵化器”。

普通人在晚清创业究竟有多难

不过，奖励归奖励，即使清末的创业者们迈入了“官”的序列，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轻松开办企业。

大清国的各种生意历来都是由衙门管控，尤其是重要行业，需要政府特许方可经营。如无特许，则会被视为异端。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早就为近代公司定下了“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由商人“自立条议，悦服众商”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官督商办”。不过，李中堂简单的一句话并没能说清楚诸多细节问题。一份创业计划书，究竟要怎么才能变成一家公司，当时并没有专业的政府机构和法律来管这件事。

于是，一个1903年以前的创业者只好带着他的计划书先后呈报当地巡抚、布政使、筹饷局，每一个衙门的大员都很难沟通。在漫长的等待后，计划书必须上报更高一级的省布政使等政府人员，转了一大圈，宝贵的时间不知耗去了多久。投资人恐怕谁也等不了这么长时间，早就拿着钱退股离场了。再说，办企业需要疏通这层层森严的政府关系，一般人哪有能力打点？因此，这“官督商办”，说穿了也算是“官督官办”。商人，在其中只有跑腿、打杂、四处帮忙拉投资的份儿。一个字：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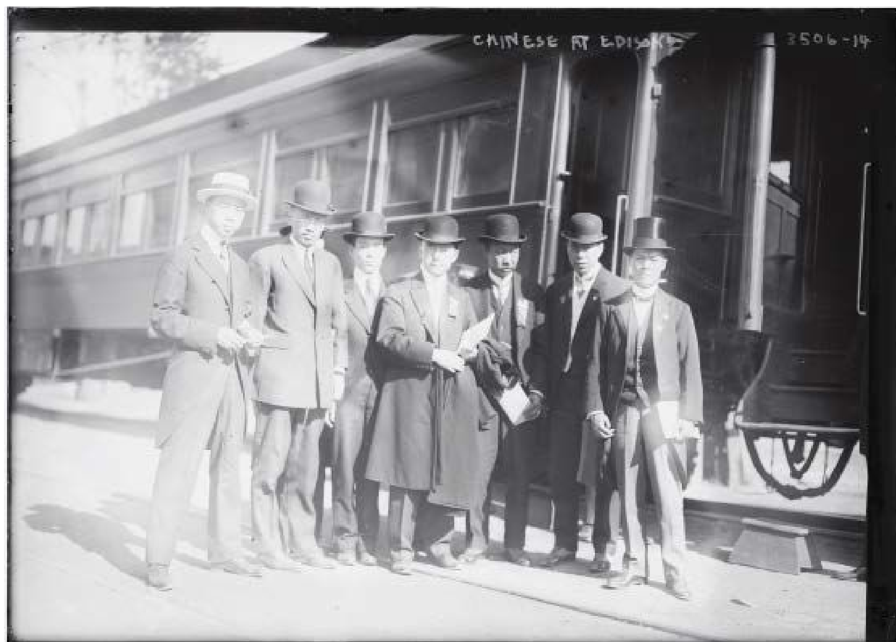
数一数晚清的企业名录，军工、轮船、铁路、矿业占了大头儿，这一批企业，便是中国最早的国企。我们熟知的国企之弊，当时的官办企业一样没落下。晚清学者钟天纬在《扩充商务十条》里就大骂官办企业：“工匠浮滥，且皆执业以媒喜，而赏罚不行，勤惰无别，亦谁肯舍逸

就劳，以干众嫉。每制成一器，价比外洋尤昂，而复草率不精，形模徒具，往往取笑洋人，旋生狎侮。如此虽百年，终无生色。”

自洋务运动以来，清政府决心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之“用”，但学了几十年，国内的普通人竟然连创个业也是困难重重，不免让人心寒。而官办企业那低下的效率、十分有限的业务范围，实在很难满足大清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中体西用”里边的“中体”倒是一直在坚持，但这“西用”，怕是连皮毛也未学到家。当时的知识分子看在眼里，不免频有吐槽。

在《盛世危言》里，郑观应就把当时主流的“官督商办”形容为“名曰保商实为剥商”的吃人老虎。他说，如果任由这条老虎横行下去，民间哪里还有半点创业经商的热情。毕竟，这摇摇欲坠的清帝国终究得靠民营经济的繁荣才能续命。

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把企业经营权交还私人，鼓励民间创业。这就需要设定现代商律商法，让一家民营公司从成立到运营都有规章可依。郑观应曾服务于晚清最大“国企”之一的轮船招商局，能有此番鼓励民间创业的言论，想必是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对官企弊病的感悟。



1915年5月30日，一个中国赴美考察的商业代表团在一辆火车前合影。火车将带领他们去托马斯·爱迪生位于新泽西州西橙市卢埃林公园的家。晚清的创业热潮催生了一代中国工商业者，他们将继续奋斗于随后的民国时代。

鼓励创业是为了“取之于商”

1903年10 月，商部成立后不久，远在上海的《申报》发表了一篇遥相呼应的社论，道出了朝廷鼓励创业、实行“重商”政策的出发点——“取于商”。文章把“恤商”、“保商”和“重商”之间的联系与分野，做了非常有意思的论述，正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其中微妙的意义：

“中外未经通商以前，中国宽大治民，未始无保商之政。然当时所谓保商者，惟求不苛取于民耳。而今则时事日非，时局日变，仅不苛取于商，尚不足尽保商之要。况自咸同以来，军事日繁，库储日绌，取于商者日多，今更赔款累累，欲不取于商而不可，欲不苛取商而亦不可。既欲苛取于商，而犹欲言保商，不亦戛戛乎难哉？然时异势殊，向虽不苛取于商，而视商甚轻，……今虽苛取于商，而视商实重。”

有句俗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庚子后背上了巨款债务的朝廷终于意识到，“商业”这只羊已经被他们忽视、弃置太久。就如何把羊养肥这件事来说，这个国家长期缺乏一种制度上的保障，以至于当政治危亡、有需求于商业的助力时，才猛然发现身边这只羸弱的羊羔身上既无奶水也无羊毛，实在是难以利用，可谓一种“欲苛取于商，而商不待”的尴尬。

成立商部的同年，当进出口统计数据被户部上报到中央时，情况很不乐观。清国向西方各国出口的货值虽然达到了两亿一千多两白银，但进口货值却高达三亿两千多万两，相抵之后还亏了一亿一千多万两白银。白银外流、债务催逼，当政者怎么可能不心急火燎，速图整改？

就像一位曾经德高望重的老者，如今必须从字母表的第一行重新学起，这事实令人尴尬、无奈，同时也别无选择。

无奈尴尬之余，求成心切的朝廷一刻不停地在催促法律专家伍廷芳等人赶快制定新式《公司律》。朝廷实在是等不及了。一方面，他们想从法律上给予素遭轻视的商人更高的地位，并以此规范清国商业活动中令外国人极度厌恶的“苟图私利，彼此相欺，巧者亏逃，拙者受累”之流氓无赖气息。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要给民间的创业者们打开一条不依附官府、独立创业的路径。当时流行的说法，管这叫“实业救国”。

这场商业的体制性改革，也开启了晚清最后数年一系列制度改革的序幕。

汉学家费正清对清末的商业改革解读道：“这道劝诫性的上谕承认了国家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商、绅、官，已形成一个新的绅商社会阶层，但此时尚未形成一个具明显独立意识的资产阶级。他们仍然缺乏一个完全的统一目的，并且对传统的乡土和宗族关系仍承担着强烈的义务。”

诚如费正清所言，这略显匆忙的改革不可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根底，但至少，民间创业与官办公司在法律上被一视同仁。创业者们注册公司可以直接呈报给商部受理，且有一部规范的《公司律》可依，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名不正言不顺地跟层层官僚打交道。

在鼓励创业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实施之后，民间创业大潮来临了吗？据统计，到1911年清政府垮台以前，全国的华资企业两千三百余个，这相当于1900年的4.5倍，年增长率高达14%以上。清政府的鼓励创业之策似乎行之有效。恰恰也是这段时期民间创业的高增长率，不知不觉中培养出了大批撼动清朝统治基础的人群——民族资产阶级。

编辑 陈祥

历史漩涡中的真实庆亲王

作为大清最后一位铁帽子王，年轻时代的奕升迁迅速。倒不是因为攀附上慈禧这棵大树，主要原因是在当时宗室中举目皆是纨绔的情况下，他办事认真勤快，尤为突出。

文／刘江华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二十六，光绪、慈禧去世不久，清廷发布谕旨，封奕为亲王世袭罔替——奕因此完成了从辅国将军到世袭罔替亲王的“十级跳”，也成为清朝最后一位铁帽子王。

奕，生于道光十八年（1838）二月二十九，祖父永为高宗弘历（即乾隆皇帝）第十七子，封庆亲王；父亲绵性为永第六子，袭爵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在清朝十二等级爵位中属第八等。奕为绵性第一子，按照清代减一等袭封的制度，他本可以袭爵第九等的镇国将军。但事有凑巧，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奕的五伯父绵悌辞世，诏命12岁的奕过继为绵悌嗣子。虽然绵悌曾为第七等的不入八分镇国公，但死前因坐事已被降为镇国将军。如此一来，奕只能袭爵为第十等的辅国将军。

庆亲王一支，此时已被边缘化：永因行为不端，死后赐谥为“僖”（按照谥法，“僖”非善谥，指有过、小心等）；奕年少时，袭本支郡王爵的奕采因“服中纳妾”被查处，父亲绵性借机行贿以袭王爵，被发觉后贬往盛京戍边，副都统职位被革。家中丑事不断，生父远戍盛京，奕少年时，家中贫困异常，“几不能自存”。或许，正是落魄光景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得后来的奕对财富如此醉心。

咸丰二年（1852）正月，以兼奉伯父庆良郡王绵祭祀，奕被赏给贝子衔。从辅国将军到贝子，3年间，跨越了5级，应该说这是一次相当大的飞跃。《清实录》中奕的第一份差事，是咸丰八年以贝子身份带领侍卫十员代表皇帝前往祭奠礼部尚书徐泽醇。咸丰十一年，24岁的奕成为咸丰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意味着，这位年轻的宗室贝勒从此进入了皇室的圈子。



庆亲王

奕缘何得以升迁？

咸丰年间奕命运的转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奕善书写会画画，帮慈禧的弟弟桂祥给慈禧写信，由此夤缘慈禧。但从咸丰二年奕即连越5级晋为贝子、咸丰九年出任镶黄旗汉军副都统的史实看，奕的提拔更多是因为咸丰，而非慈禧。毕竟，当时，慈禧只是一贵妃，咸丰健在的情况下，她没有多少干政的机会。

奕的升迁，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年轻时办事认真，这点在举目皆是纨绔的宗室里，尤为突出。同治二年（1863），奕受命前往守护清东陵，并负责看护当时暂厝东陵附近隆福寺的咸丰灵柩。清东陵在河北遵化，距北京120公里，在当时可谓寂寞荒凉。但奕在东陵的工作，可以说是兢兢业业——为了给咸丰陵墓种树，他于同治二年十二月上折奏请户部银两，但户部推说此项银两归直隶总督划拨。最后奕不依不饶，多次上折，才促成直隶拨款。从同治二年到光绪五年（1880），十多年间，尽管奕已升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但始终兼任守护东陵的职务。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光绪五年二月，奕在隆福寺暂安殿值班期间得病，上折请假。为此，朝廷才赏假20天，派灵桂前去替班。

光绪十一年九月，慈禧派醇亲王奕总理海军事务，同时让奕、李鸿章会同办理。时为庆郡王的奕，看来对海军事务颇为上心——内务府挪用了海军衙门不下银十万两。由于是皇室所用，多年来，无论是奕还是李鸿章，都视若不见。光绪十五年，奕等上折催要。这年六月，刚刚亲政的光绪皇帝下令，让内务府迅速还清以往所欠的九万两和今年应还之款。

年轻时的奕，也多少有些莽撞和激情。光绪十年三月十七，奕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这意味着，他从此前只负责皇室内部事务中解脱出来，首次参与国家政务的管理。这一转变，无疑扩大了他的仕途空间。

奕之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直由恭亲王奕兼管。这年三月十三，慈禧为了削减奕势力，借口中法越南战事不力，开去奕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令其家居养病。就在此时，上任仅七天的奕，在二十四上了他平生最为出格的一次奏折——请求以军机大臣兼管总理衙门，折中“设立总理衙门以来，恭亲王军机大臣兼管已二十余年”等为恭亲王回护的字句，被翁同在日记中评为“意在恭邸而不敢显言”。此折一上，慈禧果然十分不高兴——批评奏折“语多失当、迹近要挟”。虽然只是对奕等上折八人“传旨申饬”，相当于现在的通报批评，但显然把他吓得够呛。此后，奕再无此类出格事情，而是始终站在慈禧阵营——不论是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变法，还是光绪二十六年的义和团运动期间。这样的立场，更是确保了他在仕途上的一路升迁。

奕担任过哪些职务？

咸丰九年十一月出任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意味着奕有了第一个实缺职务。奕属镶蓝旗，在满洲八旗中属最末一级，副都统为正二品，虽然汉八旗地位低于蒙古八旗和满洲八旗，但奕没有经过其他职位历练而直接出任，表明咸丰对其的信任和赏识。

从此，奕开始了其在八旗中的完整历练——清朝满洲、蒙古、汉军共24旗，根据清宫档案的记载，从咸丰九年（1859）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这40年间，奕先后出任和兼署过11旗的都统，其中包括地位最高的满洲上三旗中镶黄旗、正黄旗的都统，成为宗室中少有的熟悉军队之人。

也因此，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光绪推行戊戌变法时，当朝廷根据顺天府府尹胡、出使大臣伍廷芳的奏请准备参照西法精练陆军时，就派奕负责训练八旗骁骑营。当时的谕旨中，对奕的评价为“向来办事认真、熟谙

武备”。光绪二十年，中日两国在朝鲜开战。总兵卫汝贵临阵脱逃，清军陷于被动。在此情势下，庆亲王奕曾于八月奏请统带劲旅关征战。但光绪以其“总理海军，兼管各项差使，责任繁重，且夙夜在公，趋承左右，未便远赴军营”，没有同意奕所请。

除了八旗都统外，奕还出任过哪些职位？根据《清实录》，除像办理咸丰、同治、光绪、慈禧丧仪以及同治大婚册封副使、慈禧六十寿辰办理大臣等临时性差使之外，奕至少还先后出任过25个皇室内廷和政府外朝的职位，如御前大臣、宗人府宗令、总理海军衙门大臣、管理陆军部事务大臣、军机大臣等等。也就是说，宣统三年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前，除了总督、巡抚之类的管理地方事务职位，奕在内廷和中央机关算得上拥有较为完备的从政履历。在这些职务当中，有不少是同时兼管的——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奕升任军机大臣后，以“任重事繁”为由，上折请求辞去兼差。后经慈禧同意而辞去的，就有御前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等9个之多。

奕负责过的差事中，有一项可谓今人所熟知，那就是建立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四年筹建京师大学堂时，奕就负责建设京师大学堂工程事务。大学堂建设期间，正是奕的奏请，光绪下令内务府修葺地安门内马神庙地方空闲府第，作为大学堂暂时开办之所。

围绕奕的那些褒贬

1917年，移居天津的奕病殁。他的家人上折请谥。溥仪说：“是丧吾大清者，何谥为？”数请，乃谥曰“密”。据谥法考，追补前过曰“密”。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如此定义奕，“庆王就是以办理卖国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的奕”。随着《我的前半生》的流布，溥仪对奕的这一评价也广为人知。

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因受御史江春霖等参劾，奕上折请辞。时为监国摄政王的载沣没有批准，反而下旨对奕给予高度评价——既追叙其促成与八国联军的和谈使朝局转危为安、“厥功尤伟”，又赞扬其在光绪、慈禧接连驾崩时“决疑定计”，稳定朝野。

两份前后矛盾的谕旨，哪一份说的才是真正的奕呢？在《清实录》中，对奕的公开评价，有过多次：

最早的一次，出现在光绪五年二月，奕的亲生父亲绵性病故，清廷决定赏还其生前被革的副都统衔。个中原因，是因为奕工作勤慎，“奕在御前大臣上行走有年，尚属勤慎”。光绪三十二年，朝廷公布三年一次的官员政绩考察结果，其中评价奕为“谨沈忠纯，力持大体，竭诚筹划，悉

协机宜”——此类考察并非全部是走过场，比如宣统元年的考察中，民政部右侍郎赵秉钧就因为声名平常被勒令“原品休致”，也就是按原级别退休。而在那次考察中，奕被评为“谨慎忠纯、勋劳懋着、竭诚筹划，悉协机宜”。

通读清廷对奕的历次评语，频见“老成谋国”、“谨慎忠纯”、“勤劳”、“认真”之语，这些多为评价其工作态度的，但客观而言，较少有对其工作能力的评价。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奕此人，办事尚属谨慎认真，但能力一般。

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朝廷筹设官立银行，掌广东道监察御史蒋式奏请亲贵将钱存入官立银行，同时参劾奕在英国汇丰银行有大额存款。蒋式原折，目前在清宫档案中未见，但《清史稿》有如此记载，“户部设立银行，招商入股。臣风闻上年十一月庆亲王奕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奕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钜款。请命将此款提交官立银行入股。”

蒋式此折一出，关于奕“细大不捐，门庭如市”的说法不胫而走、流传至今。三月二十五日，清廷下旨派左都御史清锐、户部尚书鹿传霖带领蒋式前往汇丰银行确查。而据后来的奏报：汇丰银行答复，银行往来账目，从来不给外人查看；问汇丰银行和庆亲王有无往来，回答是从未见过；而蒋式自己也承认消息“得之传闻”。应该说，这次调查是很不深入的。最后的处置结果，是让蒋式回“原衙门行走”，奕则照旧当差。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奕被任命为军机大臣，进入清朝权力中心。但不久，奕即遭到为官生涯中的第一次被参劾。此后的弹劾，交章迭起，虽难以统计确数，但肯定不少。仅御史江春霖自己的统计，他在光绪朝就先后8次上折参劾奕。



慈禧同奕劻的三女儿四女儿及李莲英等在中海乘平底船。摄于**1903-1904**年。摄影 勋龄

众多的参折，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参劾奕任用私人、徇情枉法的。如光绪二十九年，朝廷惩处办理广西军务贻误人员，广西巡抚王之春被革职，提督苏元春交刑部治罪。八月，御史王乃徵奏参王文昭、奕向两广总督岑春煊去信，分别为自己的姻亲汤寿铭和希贤说情，使得二人非但没有被治罪，反而得以留办军务。再如光绪三十三年九月新任湖北按察使梁鼎芬，上折奏劾徐世昌夤缘贿赂奕载振父子，从而获得东三省总督一职。还有宣统二年正月，御史江春霖上折直言奕为老奸，批评奕任用私人、排斥异己，其中提到像“江苏巡抚宝、陕西巡抚恩寿、山东巡抚孙宝琦则其亲家，山西布政使志森则其侄婿，浙江盐运使衡吉则其邸内旧人，直隶总督陈夔龙则其干女婿，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朱纶则其子载振之干儿”，并说袁世凯与载振结拜兄弟等。

二是参劾奕大肆收受贿赂的。像蒋式除了前文所说的参劾奕将120万两存入汇丰银行外，早在光绪二十九年就曾上折，批评“奕素有好货之名，入直枢廷以来，收受外省由票号汇寄之款闻已不下四十万两，……贿赂公行，门庭若市”，甚至透露俄罗斯人为了能在中国获得更多利益，持外交经费500万两来京献给奕，“该亲王亦复收受，诚不解何以丧心病

狂至于此极。”还有，光绪三十二年，掌户科给事中陈田上折奏参袁世凯跋扈、奕庸臣将引藩镇之祸。其中说，“臣闻袁世凯之初交通奕也，山东巡抚、前直隶布政使杨士骧为之居间，行贿赂十万金。”此后，奕为了袁世凯办事方便，力荐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为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奕自知无才，不敢担当，惟袁世凯之言是从。”

众多的参折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御史赵启霖之折。赵启霖奏新授黑龙江巡抚段芝贵为了讨好奕及其子载振，买歌伎杨翠喜献给载振；此外，段芝贵还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处筹措银10万两，送给庆亲王作为寿礼。二十五折上当天，清廷即下旨免段芝贵新授的黑龙江巡抚一职和原来的布政使衔，并让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查。四月初五，载沣、孙家鼐上奏了调查结果——歌伎杨翠喜为兵部候补郎中王益孙于二月初十在天津以3500元所买，现正在其家内服役；王竹林与段芝贵并无往来，所办商会年终入款只有七千余元；商会其他商董也证明佐证，给段芝贵措十万金之款不但未见而且未闻。

但关于此案的内情，民间却有另外的版本：慈禧下旨调查后，奕父子赶忙向袁世凯求援。袁世凯派心腹连夜将杨翠喜从北京送至天津，又派人威胁利诱王益孙自认为杨翠喜夫婿，同时让王益孙在包括《正宗爱国报》等京津报纸上刊登启事，驳斥“杨翠喜已由某大员献与某贵胄”的谣言。此外，又嘱商会王竹林不可承认与段芝贵有经济往来。于是，赃证俱销，无迹可循。

此案在当时轰动一时，载沣和孙家鼐并没有亲赴天津，而是派正红旗满洲印务参领恩志、内阁侍读润昌前往调查。案件结束后，载沣等还将十七本证人证言、商会账簿以及杨翠喜卖身契等咨送军机处备查，以昭慎重。应该说，有如此之多的证言、证据，载沣等的调查更符合事实真相。

受此事件影响，时为农工商部尚书的载振，被迫于四月初六请辞包括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一切差使。不仅载振上折，奕还“面奏、再三吁恳”慈禧同意载振辞职。五月，奕本人也作出姿态，请辞军机大臣要差。慈禧同意了载振的辞职，但挽留了奕，并以“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并不详加访察，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为由，将御史赵启霖革职。

如同赵启霖此折的命运一样，众多对奕的参劾，统统都被清廷认为“空言妄议”、“风闻奏事”、“臆度之辞”等等。上折的御史或被革职，或被传旨申饬，或被勒令回原衙门行走，而奕，始终屹立不倒。言辞最激烈的一次，是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载沣刚刚出任摄政王不久，掌户

科给事中陈田再次上折，直言袁世凯不可留任军机大臣的六大理由，批评奕违背亲王禁止交通百官的祖训结交袁世凯。此折上后，载沣于当日下旨，解除袁世凯一切职务，令其“回籍养疴”；而对奕，则没有任何处置。

关于奕传闻之真伪

将奕戏称为“老庆记公司”的说法，在奕当政时即有。奕是否真的将120万两存入汇丰银行虽难以凿实，但其家资丰厚也是毋庸赘言。宣统三年二月初一，奕第八女嫁给度支部大臣绍英长子，绍英的后人马延玉说，自己曾听祖母说，奕所送嫁妆，囊括了女儿过门后的各种生活用品，少说也过百抬，其中还有一张紫檀木大床！

还有一点应该说明的是，把钱存入外国银行，不仅奕如此，也是晚清其他高官的惯例——据《那桐日记》，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十，时为外务部会办大臣、步军统领的那桐，就到华俄银行存款。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九，他主管的工巡总局，就将公款银5万两存入日本正金银行，年息为五厘五。

奕是否整天忙于请客和被请呢？由于奕本人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详细的情形已无从考证，但据在那桐所赴的应酬中，确实有不少是奕或其子载振出面邀请的。而且，整日忙于应酬的，并不仅仅是奕——据《那桐日记》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记载，除去正月走亲访友较为特殊不计，其余11个月，那桐的应酬为152场，最多的二月份，“赴约”高达24次，几乎日日不空；中午已有一约、晚上再赴约的情况也时常出现；而且，像九月份，应酬玩乐到深夜“子初”才回家的情形就有5次。请那桐前去赴约的，有奕及其子载振，也有李鸿章、袁世凯、徐世昌等等；娱乐的方式，除了喝酒，还有听戏、听清音、看洋影（即电影）、看舞会等等；应酬的地点不乏高档场所，六国饭店、庆王府、颐年殿、东来顺等等，都留下过那桐玩乐的身影；设局应酬的名义，有生日寿宴，有升官贺宴，有娶妻、嫁女、添丁，甚至还有赏菊之约、同年之约等等。

奕是否曾将麻将引入紫禁城、手把手进行推广并派小老婆进宫陪慈禧打牌呢？清宫档案中，一时难以找到这方面的史料。但有一点可资佐证，那就是故宫所藏的慈禧合影中，经常出现奕的三女儿和四女儿，尤其是四女儿的身影。

溥仪将奕评为“丧吾大清者”。但其实，葬送大清的，主要并不是奕，而是慈禧、咸丰等。奕的贪腐，某种程度上是慈禧所纵容的。以崇

文门正监督一职为例，光绪十七年，奕已出任过一次。这是京城“第一肥缺”，和、慈禧的弟弟桂祥等先后出任过。一般认为，此缺一年可贪墨至少十万两。也正是为了防止过分贪腐，设计为一年一任命。而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开始，奕连续三年出任崇文门正监督一职。或许，这是慈禧为了酬答奕在庚子议和中的功劳而有意为之，但又何尝不是视“一年一任命”制度为具文、纵容奕贪腐呢？这点，慈禧难逃其咎。再比如，奕热衷吃喝玩乐、喜欢听戏，可是从咸丰到慈禧再到隆裕，哪一个不喜欢听戏呢？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占北京，咸丰逃至承德避暑山庄后几乎每天都要听戏，甚至纡尊降贵亲自动笔修改戏词；无论是慈禧还是隆裕，除寿辰、年节外，每月初一、十五召戏班听戏几乎是雷打不动的节目。

从这个意义上看，奕的所作所为自然是对大清的一种伤害。

编辑 段宇宏

猜你喜欢



点此阅读

中国传统宗族的救济功能

特约撰稿员 / 吴钩

青年时代的胡适留学海外，受西方个人主义社会风尚的感染，忍不住在日记中吐槽起中国的宗族传统来：

“吾国之家族制，实亦有大害，以其养成一种依赖性也。吾国家庭，父母视子妇如一种养老存款 (old age pension)，以为子妇必须养亲，此一种依赖性也。子妇视父母遗产为固有，此又一依赖性也。甚至兄弟相倚依，以为兄弟有相助之责。再甚至一族一党，三亲六戚，无不相传依。一人成佛，一族飞升，一子成名，六亲聚咬之，如蚁之附骨，不以为耻而以为当然，此何等奴性！真亡国之根也！”

胡适一家全靠宗族赞助

20世纪初叶，五四运动前后，从吐槽传统文化乃至从深挖国民劣根性的角度思考中国问题，是当时中国公知圈的时髦思潮。胡适也未能免俗。但胡适这么说，却有“过河拆桥”之嫌，因为他的父亲胡铁花，即是“吾国之家族制”的受惠人，如果没有宗族的赞助，胡铁花大概过不上体面的士人生活。

胡适祖籍为安徽绩溪县，世代以经营小本钱的茶叶生意为业。据《胡适口述自传》，胡铁花从小就帮着家人打理茶叶店，由于“十分聪颖，早为其有志为学的伯父所赏识。他认为有这样资质的青年子侄，实在不应该在一个小茶叶店里埋没了。所以父亲被家中长辈特地选出，让他专心读书，以便参加科举。”胡铁花因此成了一名读书人，后来他到北京另图发展，也是由一位经商致富的族伯资助了一百银元——按他儿子胡适的标准，这应该是“依赖性”乃至“奴性”的表现吧。

历史上的徽商最重宗族情谊与科举功名。徽商在外经商，不管走得多远，赚到钱财必寄回故乡修宗祠、建族学，让族中子弟有一个读书入仕的机会。绩溪胡氏也应该设有自己的族学。可惜胡铁花入学未久，便爆发太平军乱，皖南恰是重灾区，到处都是“焚掠、屠杀、饥荒”。待到战乱平息，胡门一族已从原来的六千多口人，锐减为一千多口人，宗祠也毁于战火。胡铁花是一位对宗族怀有深情的旧式文人，面对被战火摧毁的家园，他决心重建宗族。经过十一年筹备，终于募捐到银元一万多元，并于1876年重新修建了胡氏宗祠，编纂了胡氏宗谱。值得指出的是，胡氏家族得以重建家园，全赖宗族力量的支持，那些在外经商的绩溪胡氏族人，踊跃捐款，“他们的汇款也救活了家人，并助其重建家园于

大难之后”。



2013年7月25日，在怀海义庄内上爱国主义教育课的小学生。

胡铁花是这项家园重建工程的规划者和执行人，看得出他是将重修宗祠当成人生的骄傲来看待的，后来他在回忆录中，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记述重建胡氏宗祠的经过。这位敦厚的父亲，大概想不到他的儿子胡适多年后居然成为宗族传统的掘墓人之一。

与胡适差不多同时代的钱穆先生，对宗族传统则始终持“同情与理解”的态度，他说，“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我相信钱穆先生是基于真实的人生经验而得出这个结论的，因为他本人便是宗族传统中“人道观念”的受益者。

钱穆出生的七房桥钱家，是苏南无锡的百年望族。祖上曾经划拨族产，设立三所义庄，作为族人的赈济基金，其中以怀海义庄最大。钱穆在回忆录《八十忆双亲》中记述说，怀海义庄的产业原本由富有的三房轮管，其他人不得过问，因而族中贫民得不到救济，出现了“老死者无以葬，幼小者无以教，婚嫁之赀无所从出，有欲出外就业，亦乏赀遣”的情况。

钱穆的父亲钱承沛是贫苦孤儿出身，“特痛悯同宅中孤儿寡妇”，又想到“祖宗置此义庄，本为子孙救灾恤贫”，因此向富三房提出怀海义庄“理当开放，务为拯恤”的要求。但不获同情，屡商不洽，钱承沛便将富三房告上了县衙门。经知县调解，二房某叔父被委托为怀海义庄的新管理人。钱承沛则协助二房叔父打理义庄，订立义庄的抚恤救济条款，“自此五世同堂一宅，幼有养，老有归，皆得赖祖宗庇荫，粗衣淡食无忧，一宅欢然，而无伤义庄之赀产”。

但钱穆十二岁时，父亲钱承沛不幸去世。族人前来吊唁，见钱家孤儿寡母，生活艰困，便提出按照钱氏例规，“领取怀海义庄之抚恤”。钱穆母亲是有志之人，推辞不受，族亲说：“义庄抚养孤寡，乃符合列祖列宗遗意。且五世同堂一门，孤寡受抚恤者何限？二嫂独不受，此诸家怀念往昔，何以自安？”钱穆一家遂接受怀海义庄的接济。正是靠着义庄救济，钱穆“一家生活，虽极贫苦枯寂”，但毕竟温饱无忧，钱穆兄弟还能入学读书。

数年后，钱穆的兄长钱挚从常州府中学堂师范班毕业，回到七房桥，呼吁钱氏宗族拨出阖族三个义庄的一部分资产，创立一所新式小学。这所小学叫“钱氏私立又新小学校”，是公益性学校：凡七房桥钱氏子弟中的适龄儿童，皆可入学，当然是免费的，办学经费出自钱氏义庄。钱挚当校长，另聘两位老师，一文一理，教授经学、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科目。

民国十七年（1928年），未及不惑之年的钱挚突然病逝，此时儿子钱伟长才十六岁。后来钱伟长成了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被誉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失怙之后，钱伟长能够度过人生难关，完成学业，应该感谢叔父钱穆所说的宗族传统之“人道观念”。晚年钱伟长在他的《八十自述》中回忆说：

“进入苏州高中才一个月，传来父亲中年39岁早逝的噩耗，全家遭到极大的困难，遗有一弟二妹，三个月后，母亲又生下了遗腹七妹，一家六口，无隔日之粮，父亲又无积蓄，除一柜中国书外别无长物。幸有父叔老师华倩朔先生慷慨允住进黄石弄华宅余房，免租十年；并得七房桥族人出面交涉，由钱氏怀海义庄长年捐供救济粮，孤寡免于饥饿。四叔（指钱穆）除每月供给母亲六元家用补助外，并全力资助我上完高中。这样使我一生中度过了第一个生活难关。”

从少年钱穆与少年钱伟长的家事，我们可以看出来，依托于义庄的组织与机制，七房桥钱氏宗族实现了对族中孤寡贫困人家的制度性救济。今天，我们在无锡还能够找到怀海义庄的建筑物，不过已经成为文物单位与旅游景点，参观还要收门票。

宗族公益首创于北宋

以宗族义庄为代表的实体性公益组织与制度化救济机制，首创于北宋的范氏义庄，迄至民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北宋皇元年（1049年），60岁的范仲淹到杭州任太守，因为杭州与他原籍苏州相去不远，“遂过姑苏，与亲族会”。通过与苏州范氏族亲

的会商，范仲淹决定为家乡族人做两件事情，一是续修范氏族谱，二是创立范氏义庄。

宋代官员俸禄优厚，范仲淹宦游多年，又生活俭朴，因此一生颇多积蓄。他将全部个人积蓄都捐献出来，在苏州购置良田千亩，作为范氏义庄的公益基金；又订立十三条规矩，作为范氏义庄的运行制度。

这十三条规矩主要对苏州范氏族人可以从义庄收益中获得哪些权利作出了明晰的规定。我将它们概括归纳了一下，范氏族人的收益权包括：

一、口粮：五岁以上的族人，不分男女，每口每月给白米三斗。

二、衣料：成年族人每人每年给冬衣衣料一匹，十岁以下、五岁以上的儿童各给半匹。

三、婚姻补助：族人嫁女，给钱三十贯；女儿若改嫁，给钱二十贯；族人娶媳妇，给钱二十贯，二婚不给钱。

四、丧葬费：族人身亡，按其辈份大小，给予二贯至二十五贯的安葬费。

五、路费：族人参加科举，或者外出赴任，给予路费补助。

六、倘若乡亲、姻亲、亲戚陷于贫窘，或遇饥荒不能度日，诸房共同核实后，可用义庄粮米“量行济助”。

范氏义庄成立、运行三年后，范仲淹便逝世了。他的儿子范纯仁兄弟继承父志，也将所得俸禄捐给义庄，将义庄田产扩至三千亩。又“随事立规”，续订了二十八条规矩，完善了范氏义庄的制度。

这二十八条规矩主要对义庄的管理机制以及范氏族人的责任作出了规定。如果说范仲淹首订的十三条规矩是“权利法案”的话，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规矩便相当于“责任法案”。这里我择其要介绍若干条：

一、义庄的田产须租给外姓人耕种，范氏族人不得租佃义田。

二、义庄不得典买范氏族人的田土。

三、义庄不得为牟取暴利，将资产用于放高利贷。

四、范氏族人不得在规矩外“妄乞特支”义庄的钱粮。

五、范氏族人不得将义庄的义宅舍屋“私相兑赁质当”。

六、义庄的一切公事，听从掌管人依规处置，即使是族长也不得侵扰干预掌管人之权。

七、掌管人有独立之权，但须接受宗族监督。族人若发现掌管人有欺弊情事，可请诸人到范仲淹牌位前讲理，由族众裁断，或“申官理断”。

八、若遇有规矩所载不尽事理，由掌管人与族人共议，商定新规矩，并向范仲淹牌位申明。若未申明范仲淹牌位，不得仅凭族人文字便擅自施行。

义庄规矩经历次修订、增补，“关防益密”，确保了义庄得以长久运转。自范仲淹创立，范氏义庄一直维持到民国时期，有效运行了900年，即便是改朝换代的变故与烽烟四起的战乱，也莫能摧毁，成为中国历史上维持时间最长的NGO。

当然，说范氏义庄是NGO，可能有一些朋友会不同意，因为义庄具有封闭性，其福利只能为同族之人分享，外人则无权染指。范仲淹设义庄，初衷也是出于收族、恤族：“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

但范氏义庄在实际运作中，还是惠及了范氏宗族之外的乡亲与亲戚，就如义庄规矩所言：乡亲、姻亲、亲戚若贫窘不能度日，也可以得到范氏义庄的救济。钱穆先生说，“中国人的人道观念，却另有其根本，便是中国人的‘家族观念’。”范氏义庄可为此话作一生动注脚。


安徽绩溪胡氏宗祠外景。

其实传统中国的义庄，也并非只有族内福利一种模式，还有一种跨宗族的救济模式，以创建于南宋明州（今宁波）的“乡曲义庄”为典范。乡曲，意为乡亲。顾名思义，乡曲义庄便是为赈济乡亲而设立的义庄。

南宋淳熙—绍熙年间（1190年前后），赋闲在家的明州士绅沈焕因见“乡间有丧不时举，女孤不嫁者，念无以助”，而“随时拯恤，其惠有限”，深切意识到，明州需要成立一个实体性的公益组织，创建制度性的救济机制。

沈焕便找他的朋友、也是明州望族的史浩、汪大猷商议：何不仿效姑苏范氏义庄，创设乡曲义庄，以周济家乡的贫困士人？沈焕的提议立即得到史浩、汪大猷的赞同，“二公欣然意合，果于集事”，汪大猷率先捐献二十亩田产，充作乡曲义庄的启动资金，然后又向众人募捐，募集到三百亩义田，明州政府也给予资助，划拨了二百亩官田给义庄。

明州乡曲义庄成立四年，史浩与沈焕便先后去世了，义庄的筹备与早期运作，基本上由汪大猷主持、操劳。义庄的严密制度便是汪大猷一手制订出来的，按照制度，义庄“推爵齿之高而有才力者提其纲”，即选举一位德高望重之人，担任义庄的领袖；“又择仕而家食者一人，司其出纳及庄之事”，再推选一位居乡士绅负责义庄的日常出纳；“凡仕族有亲丧之不能举、孤女之不能嫁者，投牒于郡，参稽得实，以次而授”，明州的读书人家，如果生活贫困，无力举办红白喜事，可以向明州政府提出救济申请，由政府核实，即可获得义庄的救助。政府并不插手义庄的日常管理，只是充当监督人与公证人的角色。

明州乡曲义庄维持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到元末时仍在有效运行。

民国时义庄仍然活跃

范仲淹开创的义庄，以固定的族产作为可永久生息的基金；族产之产权归阖族所有，任何个人（包括族长）均无权私自处分；族产之收益（如田租、利息）必须用于族人福利或作族内救济金；义庄的运转有一套严密的制度给予约束和规范。这样的宗族救济模式，突破了过去的随意性赈恤，实现了救济组织的实体化、救济机制的制度化。

因此，范氏义庄问世之后，很快便成为宗族救济的典范，为士绅家族所纷纷效仿，尤以江南为盛——“吴中士大夫多仿而为之”。一份调查材料显示：20 世纪初，江南吴县有64所义庄，除了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还有1所设立于16 世纪，3所设立于17 世纪，10所设立于18 世纪，43所设立于19 世纪，5所设立于20 世纪，1所创立时间未详。常熟县有义庄90 所，其中35所成立于19 世纪后半期，5所成立于20 世纪初。可以说，太平军乱平息之后的19世纪下半叶，是江南义庄的快速生长期。

很多义庄到了民国时期还很活跃，比如无锡钱氏宗族的怀海义庄。七房桥钱家人才辈出，至少走出了六位院士，包括国学大师钱穆、“力学之父”钱伟长、环保学家钱易、经济学家钱俊瑞、物理学家钱临照和工程力学家钱令希，蜚声海内外。钱氏这一惊人的家族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不归功于传统宗族组织的福利—救济机制。钱氏祖训要求子孙后人：“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因而，钱氏宗族置有义庄、学田、族学等族内公益组织。正因为有宗族提供赈济与福利，钱氏族中的贫家子弟才得以免于匮乏，才能够将心力专注于读书。

有些家族尽管不立“义庄”之名，但运用族产设立公益基金的思路，还是借鉴自义庄模式。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湖南老人萧一湘老先生，曾经撰文介绍了民国时湘南常宁县的各类宗族公益基金，当地人称为“公堂”：祭祖有“清明公堂”；救荒有“积谷公堂”；助学有“崇文公堂”、“文昌公堂”等；社会公益有“茶亭公堂”、“渡桥公堂”等；文娱活动有“春灯公堂”、“狮子公堂”等；协助社会治安有“弭盗公堂”，等等。

这些宗族公益基金除了用于族内救济与族人福利，也造福于地方社会，比如“茶亭公堂”修建的茶亭，便为社会公众所共享。据民国湘南的贺氏族谱记载，“（贺族在）河洲五里许之凉水洞，建立茶亭，耗国币400余元，另腴田3亩，施给茶水，永便行人。又凉水洞亭者，路通祁、衡康衢要地，游宾络绎，往往冬寒夏暑、夜雨霜晨，到此极为局促，尤以粤东盐贩为最难。凉水亭建，诸难解焉。”

清末至民国之时，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中，科举罢，学校兴，国家要求各地创办新式学校，推行义务教育，以适应时代要求。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历史进程中，宗族及其公益基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当时政府财政窘迫，无力建设太多学校，便要求将各宗族私有之族产提充区立小学的经费，但能自办学校的宗族可免提充。于是，各地宗族纷纷利用原有族产，创办学校。钱穆兄长钱挚创办的“钱氏私立又新小学校”，便是这类新式族学。

在民国的湖南常宁县，除了县城两所小学是县立学校之外，东南西北四乡的四所学校是士绅与各族联合创办的，其余的学校基本上也是宗族办起来的。大的宗族，由于族产雄厚，可以给入学读书的本族子弟很多赞助，包括提供学杂费、伙食费；小族的适龄儿童，若本族未设学校，也可以到大族设立的学校读书。可以说，如果没有族学支撑，民国的新式教育根本就不可能蓬勃展开。

然而，也是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传统宗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先是，宗族制度包括其救济机制被举国的激进公知吐槽；随后，宗族组织包括其族产，被汹涌的时代洪流冲毁。但吊诡的是，那些有志于摧毁宗族传统、建设美丽新世界的人，并未能创立任何一种比义庄或者乡曲义庄更有生命力、更有救济力的民间公益组织。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修订的《常宁崔氏五修族谱》前言，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民闭关思想一与欧美文化相接触，烈风迅雷，何止一瞬千里。故急进者，恒矫枉过正，对我国固有之伦理建设、社会基础，施以怀疑疾恶态度，毁之犹感不力，弃之犹恐不速，凡言宗族者、忠厚廉耻者，皆视为封建意识，思想落后，讳莫如深。然前人成法，有可弃者，亦有可存者；有随时代变迁而殁与扬弃者，亦有万古不变永为人类之指南与桥梁者，吾人当具备冷静理智与目光，予以适当之选择。”

——这段话，放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毫不过时。

编辑 段宇宏

毛时代的计划生育

在彻底的计划经济时代，人口自然不能幸免于被“计划”的名单之外，区别仅在于，是计划增长，还是计划减少。

特约撰稿员 / 邱天仁

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多数人对计划生育的印象是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其实，出于对“计划”的热衷，中国的人口政策在毛时代无论鼓励生育还是控制生育，都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至迟在70年代初期，计划生育已经悄然铺开。

计划生育政策发端于1957年

中共建政之初，对中国的人口状况尚无一个基本的了解。在1949年后的几年中，连全国的人口数量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此前国民政府时期的人口数据是4.75亿，而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几次讲话中，也沿用了这个数字，称中国人口是4.7亿。既然连人口数字都不准确，那么对人口结构、人口分布和变化趋势也不可能有所认识，也就谈不上任何规划。

出于“发展生产”的动机，以及受苏联相关政策的影响，这一时期在人口生育方面的主要思路是鼓励生育。无论城乡，在生产、生活物资的分配上都倾向于子女较多的家庭。

由于鼓励生育，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受到了严格的限制。1953年初，卫生部通知海关：“查避孕药与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同年，卫生部又批复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并抄送全国卫生机关和中国医药公司，重申对节育药具的制造和销售应予以登记并严加管理。

在此类政策的激励和保护下，从1950年到1953年，中国大陆生育率达到37‰，出现了一个生育高峰。1954年11月，以1953年6月30日为标准时间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布，大陆总人口为5.8亿。人口的高速增长，使得政府对人口形势有了新的认识，相关政策思路也开始发生改变。周恩来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中说，中国老百姓“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一个大负担”。

1957年，马寅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著名文章《新人口论》，力主控制生育。民间一直存在一种说法，认为当时马寅初主张控制生育，但毛泽东反对并否决了他的意见，以致本可以早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耽

误了机会，这种说法实际上并没有确实的根据。



1960年，因三年自然灾害影响，中国出生率明显降低，图中医院的育婴篮出现了空置的现象。

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公开讲话支持“节育”：“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1957年，毛又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部分“右派”的“人口论”确实遭到了批判，但马寅初并非最核心的批判目标。从1957年至1959年，《人民日报》仅发表了三篇涉及批评马寅初的文章。这三篇文章中，只有署名“权仲”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点了马寅初的名字，其他两篇未直接点名。三篇文章的批判重点都不是马寅初。这期间，马寅初仍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出席各种国事活动。

在“大跃进”的几年中，毛泽东的人口观念确实发生了变化，也曾说“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这也是“人口论”被批判的原因之一。不过，60年代以后，毛的想法又重新回归。事实上，无论是50年代中期的生育政策转变，或是60年代计划生育体系的初步构建，还是70年代的全面展开，背后都不可能没有毛泽东的支持与首肯。

1957年10月25日，根据中央指示和毛泽东讲话精神制定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正式公布，其中第29条规定，“除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行节制

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以官方文件确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大方向。

这一时期所谓计划生育政策，重点在避孕、节育措施的宣传上，且主要是基于自愿。1953年，政务院指示卫生部对群众的节育实行帮助和指导，并批准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指出国家提倡避孕，但不许做大的流产手术，做节育手术要经有关部门批准。到1957年，卫生部又取消了对人工流产手术的限制。在政策宣传和器械、药物保障的基础上，50年代中后期，全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出现回落。

“大跃进”时期的官方舆论风向发生了转变，但这对实际的计划生育工作的展开，并没有造成特别大的影响。这是因为紧随“大跃进”而来的是“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大幅降低了出生率，1961年全国出生率为14.33‰，不到1958年的一半。

60年代，计生框架初步建立

1962年开始，此前受大饥荒影响的出生率大幅度回弹，1963年甚至达到43.6‰。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重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

1963年10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计划生育问题，提出了降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目标，要求“中央和地方都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方面的工作”。

从1963年起，各省市的计划生育委员会（或名为“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等）陆续成立。1964年1月15日，国务院召集有关部委、群众团体、解放军总政治部开会，会后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周恩来提名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任该委员会主任。

与此同时，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以城市为重点逐步开展起来。上海市1957-1969年上半年，有17.5万多名育龄夫妇做了绝育手术，在全市191万育龄夫妇中占9.1%。1964年，上海市人口出生率为20.6‰，自然增长率为14.5‰，比1963年少生9.95多万人。在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下，城市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有了明显下降，从1964年开始低于农村，而且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截至“文革”前夕，中国大陆的一整套计划生育系统已经初具雏形。不过，这一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与后来的计划生育仍有较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主要在城市展开。1964年上半年以前，重点在城市，农村只有一些点。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才在部分省市农村有较大面积的开展。而当时中国农村占了全国约4/5的人口，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对全国总体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减少作用仍不太明显，1966年全国出生率为35.21‰，仍高于1957年的水平。

二是整体强度不大，强制性很弱。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内容仍是避孕与节育宣传，倡导“自愿节育”。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张翼认为：60年代前期的“计划生育”，在本质上是“服务性的避孕宣传和节育指导”，类似于西方各国的家庭计划。在196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还曾一再强调，要“严防乱提口号、订指标、搞竞赛”等错误做法。虽然周恩来的讲话中，也隐约指出了一个长远控制目标——“在20世纪内，使人口净增率降到1%以下”，但这一时期的所谓计划生育工作，无论覆盖面还是强度都不能与后来的计划生育工作同日而语。

“连人口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

在“文革”开始的前几年中，全国出生率仍在下降，但趋势不明显。同时人口总量的高速增加仍在持续，1966-1970年5年间总人口增加超过1亿。这是由于“文革”前期各级党政机关都受到冲击，地方计划生育机构或被“革命委员会”取消，或名存实亡。不过，自1969年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开始，提倡节育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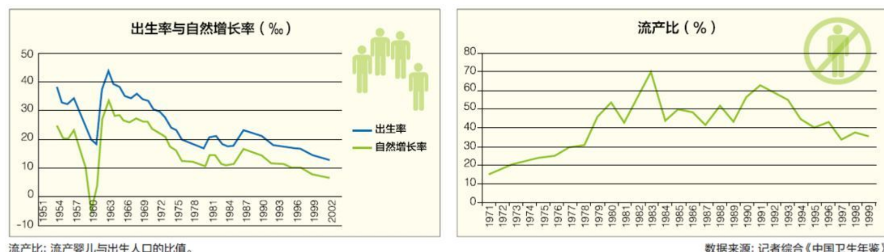
重提计划生育的仍是周恩来。1970年，周恩来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批评了把计划生育和卫生运动放在一起的做法。他说：“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

1971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这一报告是中国整个计划生育工作的真正起点。《报告》提出，要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在城市降低到10‰左右，在农村降低到15‰以下，并将此目标纳入“四五”规划。从此，计划生育真正成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计划”生育。政府开始通过逐级下达的层层指标，严格控制人口出生。

要执行这样较为严格的生育控制，非有强大的执行机构不可。从

1969年开始到1973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计划生育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已经陆续恢复，并不断向基层延伸。到1978年，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指出“县以上……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精干得力的工作班子，人员列入行政编制。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并要求在公社、街道配备计划生育专职干部。

中国不同时期的人口增长与流产比



同时，全国各级政府对计划生育的资金投入也明显增加。1971年全国的计划生育投入为5971万元，且全部为各地方出资。中央从1973年开始投入，到1978年，全国计划生育投入资金17252万元，是1971年的近3倍。

相比60年代，此时的计划生育已向农村全面铺开，70年代全国农村生育率的下降特别明显，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由6.01降至2.97。当时农村仍是口粮与工分挂钩的计划体制，家庭粮食全仰赖政府，农民很难有力量和勇气去违反有关生育政策。不仅如此，推行计划生育还被看做一项政治任务，甚至有“计划生育领域的阶级斗争”的说法，不响应计划生育政策或没有晚婚晚育的人，会被贴上“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关计划生育的指示学得不好”的标签，而遭到政治攻击和打击。

到1978年，一套完整的计划生育机构和运作模式已经建立。相比80年代，这一时期的生育控制仍有一点宽松。当时主要有两条口号。一是“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以后、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是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是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二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最理想”。

计划生育与人工流产

人工流产是计划生育绕不开的话题。尽管它可能不算是计划生育工作最核心的部分，但却一直具有最强的争议性。

1950年发布的《机关干部妇女打胎限制办法》曾规定：为保障母体

安全和下一代生命，禁止非法打胎，除了个别情况且需申报批准。到了50年代中后期，围绕绝育、堕胎及人工流产等问题，社会上还进行过公开的论争，主要争论点在于“人工流产是否应合法化”。以马寅初、陈达为代表，对堕胎和人工流产持反对意见。而另一派以邵力子为代表，则完全拥护人工流产。

除了马寅初等经济学者从伦理角度反对以外，更多的医学专家，包括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等，从生理角度也提出了反对——人工流产手术具有危险性，同时也不是控制生育的根本办法。但最终卫生部仍然放宽了对晚期人流的限制，这被部分专家认为是不尊重和不信任科学家的意见的表现，可见当时的舆论风向。

但此后，这一话题不再有争论，人工流产逐渐成为了计划生育的常规手段之一。不过60年代的计划生育集中在城市，且强度不大，因此总体规模有限。直到70年代计划生育在全国大范围铺开后，人工流产手术数量才随之大幅提高。由于当时农村医疗条件较差，医护人员水平也有限，手术存在很大风险，1974年2月9日，卫生部发出一道《关于认真抓好节育手术质量的通知》，要求基层计生人员严格控制“中期引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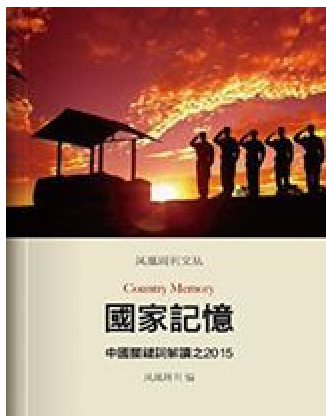
从70年代以来，大陆官方媒体还不断发文，说服民众参与人工流产。《人民日报》曾发表文章《草药引产 简便安全》，文中一位吃草药成功引产的孕妇现身说法：“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医护同志向我介绍用中草药引产的方法，既简便又安全。我听了，才放心。果然，用这种方法引产，不到八个小时就生出来了……而我回来不久，就能参加生产劳动，秋收大忙季节，我照样刈禾、挑谷，干重活，身体也很好。”

更著名的是1982年发表在《人口与经济》杂志第3期上的署名吴珊珊的文章《人工流产、引产是否道德？》。文中说：“衡量人工流产、引产是否道德的标准是什么呢……凡是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合乎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就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的。因此，把人工流产、引产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视为不道德的说法是错。”

直到90年代中期，随着生育率和生育意愿的不断降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人工流产数量开始下降。尽管强制引产造成的惨剧仍时有听闻，但实际上总体规模早已远不如前。2007年，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时说：“人工流产是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并不把人工流产作为计划生育的手段。”

编辑 郑褚

猜你喜欢



点此阅读

袁世凯变卖清宫大内瓷器真相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欲平息“叛乱”必用兵，打仗却是最烧钱的事，当时国库存银仅数百万两，要平定武昌兵变，至少需要千万两，外借洋款不成，内帑银又告罄，只得打起大内瓷器的主意。

特约撰稿员 / 刘江华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迟至二十一日（10月12日）接到湖广总督瑞的电报才知此事，并迅即于当日发布谕旨，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南下镇压。考虑武汉三镇毗邻长江，又加派萨镇冰的海军和程允和的长江水师开赴武昌，由荫昌统一指挥。

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荫昌所带部队从北京出发。与此同时，清廷下令掌管全国财政的度支部负责筹饷。

武昌起义之时，清廷财政状况究竟如何？陆军大臣荫昌的一份手谕透露了秘密。

打仗无疑是一项烧钱的事业。因此出发前，荫昌先去拜会度支大臣载泽。很明显，商谈的结果让荫昌十分失望。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荫昌给下属写了一份手谕，说现在国库的存银只有数百万两，但他估计，要想平定武昌兵变，至少需银上千万两。

对比雍正、乾隆时期大清国库四五千万两的存银，此时的大清国可以说是够穷的了。

近来有一种说法，宣统时期，清朝的经济实力当时在全世界也名列前茅。确实，大清财政收入不少——根据《清史稿·食货志》的记载，宣统二年，度支部公布宣统三年的财政预算，全年收入预计为约银2.97亿两。

但支出浩繁导致财政缺口相当大——宣统三年的财政赤字预算是4400多万两，宣统四年也达到4300多万两。财政紧张，导致像东三省地区，官员只发九成工资，而占官员收入大头的养廉银，则只能按六成发放。

武昌起义之后，各地以增兵防剿为理由，纷纷向中央要钱，如九月初九（10月30日），江西巡抚冯汝请拨百万新币；九月初十（10月31

日），安徽巡抚朱家宝请拨50万两。但“库款奇绌”的度支部一律答复为“万难筹拨”。

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荫昌拜会载泽时，后者当时就告诉荫昌，度支部正准备向外国银行借款作为军费。同时，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纷纷要钱防备起义的严峻现实，清廷也真心希望早日把钱借到。

清廷借洋款四处碰壁

清廷最初计划先借银500万两。按照清廷的设想，借洋款应该不是难事，因为也就在不到半年之前的5月，外国银行刚刚与清廷签了协议——借款600 万镑。而且，这次借款，还是外国银行主动或者说逼迫清政府借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09年6月，张之洞代表清廷与英、德、法三国签订借款合同。当时的合同规定，三国平摊，借给清政府550万镑，用以修筑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

550万镑是什么概念呢？当时英镑和白银的汇率比大约为1:8，也就是说，此笔贷款折合成白银不低于4400万两。



袁世凯

此合同草签之后，由于铁路建设在当时是高回报项目，美国政府不肯放过此“肥肉”，便向清政府抗议并要求加入借款阵营。如此一来，三国借款变成了四国借款，借款额度也增加到600万镑，折合银4800万两。

经此事件，清政府自然有理由相信，区区500万两借款应当是手到擒来的。但向外国银行借款的设想最终落空——因为武昌起义之后，经美国动议，英法日德等西方各国曾有保持中立之说，也就是既不支持清廷，也不支持民军。

为什么呢？原来，当时想向外国银行借款的，不仅是清政府，还有武昌的民军政府。1911年12月12日，代表袁世凯南下与民军谈判的唐绍仪就报告：民军政府准备以苏沪铁路作为抵押，向美国借款700万元；又想以浙江盐税作抵押借款800万元；此外还有以招商局轮船作抵押向日本公司商借白银1000万两等设想。

但这些动议都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而且，由于美国的反对，其他各国也向大清关上了借款的大门。根据当时大清驻英公使刘麟的转述，英国政府规定，无论是清廷还是民军，要向英国银行借款，须同时得到清廷、民军双方同意。英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英国在华人员和财产的安全，以免得罪一方而招致不测。但清廷和民军此时正处于交战状态，岂能同意对方借款？

为了能借到钱，清廷当时甚至想到了所罗门这样的小国，但最终也没成功。12月29日，驻美国使馆代办容揆报告清外务部，他与前驻美大臣亲自出马，多次和所罗门政府商量借款之事。所罗门虽愿意借，但害怕美国指责，不敢借款给清政府。

外求不成，只好内顾。财政山穷水尽的清政府开始另想他辙。变卖大内瓷器以充军费，就是其中一条。

以往的史书，大多只记载袁世凯请求变卖大内瓷器一事，但是否变卖等后续进展，则语焉不详，以致不少人直接就给袁世凯扣上了盗卖大内瓷器的帽子。历史真相究竟如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解开了这一谜团。

袁世凯提出变卖大内瓷器充军费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荫昌受命南下督师。时隔两天，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清廷便起用袁世凯，任命其为湖广总督，节制湖北兵马和各路援军。

但袁世凯并未立即答应出山，他先以旧伤“足疾未愈”、又新添“左臂时作剧痛”为由婉拒，继而又向清廷提出八项要求。得到满足之后，才于八月三十日（10月21日）正式出山。

袁世凯所提的八项条件之一，是筹措银三四百万两作为军费。为了表示对袁世凯的支持，隆裕太后先于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拨内帑银20万两交袁世凯赈济湖北灾民，又于九月初六日（10月27日），拨内帑银100万两给袁世凯作为军费。

但面对各省、各处纷纷伸出要钱的“手”，支撑财政数月之后，隆裕太后再也无能为力。九月十三日（11月3日），直隶总督陈夔龙以“津地重要，市面银根奇紧”为由，请求朝廷颁借内帑银100万两。度支部就表示难以答应，“未敢再行渎请”。宣统三年，清宫档案中关于颁发内帑银的最后一项记载，是十月初一（11月21日）隆裕太后用内帑银，给所有禁卫军、左右翼巡警、武卫左军各项兵丁著每名赏银一两，总数估计应

该也就几千两。从上百万两的大手笔到只赏一两，看来，慈禧积攒下来的宫中私房钱，已被隆裕花得差不多了。

外借洋款不成，内帑银又告罄。如此一来，清廷财政“库空如洗、军饷无着”的局面，愈发严重。这样的状况，直到九月十九日（11月9日）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也无改善。

无奈之下，十一月十一日（11月30日），袁世凯、绍英（时为署度支大臣，相当于代理财政部长）奏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出售，以救目前之急。

盛京大内就是今天的沈阳故宫，从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开始，直到1644年顺治入关迁都北京，将近20年的时间，一直作为大金和大清的都城；热河行宫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自康熙朝起就成为清代皇帝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究竟是谁向袁世凯等作的如此建议，目前已不可考。为何选中这两地呢？首先是它们不如紫禁城那样引人瞩目，另一方面这两地“旧存上等瓷器多件，均属希世奇珍、全球罕见”。

大内藏品均是列祖列宗所遗留，在以祖宗家法为重的封建时代，按理说自应妥善保管。但变卖大内藏品，甚至是变卖瓷器，在清朝历史上，袁世凯并非第一人。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1809年1月21日），经嘉庆同意后，内务府广储司就曾发出公告，招商变卖大内圆琢瓷器15万件、头号高丽纸20万张。公告中就说，有意竞标者，先将价银交到广储司银库后，然后再到仓库领取物件。咸丰三年五六月间，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咸丰帝还下令将宫中三口金钟熔化，制成金条、银条后变卖。根据负责此事的恭亲王奕事后的报告，整个熔铸工作自六月初六日开工，至十二月初七日竣工，统共实得金三万二千四百九十七两九钱。

赵尔巽估价盛京大内藏品值三千万两

按照袁世凯的设想，获准后通知东三省总督、热河都统并派妥员前往盛京和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清点大内瓷器，再运至京城变卖。

十一月十一日（11月30日）上折，第二天，袁世凯接见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北京的代表，告知隆裕太后已经批准变卖盛京大内瓷器的计划，并表示由于他本人远在北京不易办理，希望赵尔巽在沈阳大力襄助。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赵尔巽全宗案卷》，赵尔巽在京城的代表将此消息发电报告知赵尔巽的时间是“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八点二十五分”。由此可知，当天早朝隆裕太后一批准此项变卖，早朝结束，袁世凯就见了赵尔巽在京城代表。袁世凯当时变卖大内瓷器心情之迫切，可

见一斑。

十一月十七日（1912年1月5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就此事第一次电奏内阁，提出将瓷器运送到京困难不少，希望在沈阳进行登记和变卖等工作。在电报中，赵尔巽还说，盛京所存大件瓷器并不多，即使全部变卖了，也筹不到多少钱，进而提出将其他宝物也变卖的建议，“别项宝物亦祈奏准变价，或大款方能有济”。从电报中可知，赵尔巽此时已经派人开始查验盛京大内藏品，而且查验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袁世凯在奏折中所说的大件瓷器，还包括其他藏品。而电报最后的“并乞示朱司使”表明，此时袁世凯已指定人员（即朱司使）代表清廷和他负责盛京大内瓷器的变卖工作。

大内瓷器不多，这可能让袁世凯深感失望。但接下来的一封电报估计会让袁世凯喜出望外。它也表明，赵尔巽积极进行变卖准备，已经开始清点和估值。

十一月二十一日（1912年1月9日），赵尔巽进一步报告了盛京大内所存宝物的数量和价值——数量超过万件，价值3000万两左右。由于东三省是满清龙兴之地，盛京大内自然藏有众多见证清朝创业以来之什器御物；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全国罕见、不易寻得的书籍等。尤为贵重的，还有如爱新觉罗氏佩剑、乾隆皇上所遗之石砚等。根据赵尔巽的估算，价值应在3000万两左右。为了变卖方便，赵尔巽还让人编写了一部藏品目录。在这份电报中，他还卖关子说“宝物一部，今尚秘不发表”。

这封电报译出时间为“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从信末尾“深望交涉司少注意焉”可推知，变卖大内瓷器一事由当时负责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交涉司”牵头。这与十一月十七日赵尔巽发给清廷相关电报中提到的“朱司使”刚好吻合。同时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出面有意购买此批藏品的多是外国人。

清帝逊位，袁世凯叫停买卖

获悉清廷要变卖大内藏品后，外国商人十分感兴趣。

第一个表示出购买意向的，是法国商人李那儿。在法国驻沈阳总领事贝铎的陪同下，宣统三年十二月初，李那儿亲自到沈阳故宫参观查验，并请贝铎从中说项。

李那儿不愧是精明的商家，虽然时间仓促，未能仔细验看，但他还是统计出沈阳故宫所藏各种瓷器约有十万零三千件。根据十二月初七日

贝铎给赵尔巽的信函，李那儿表示愿出价40万两，将此批瓷器尽数购买。同时提出，如果双方同意成交，等瓷器运到天津交割完毕后，立即在天津付款。


1973年，法国摄影师镜头下的沈阳故宫一角。

接踵而来的法国商人魏武达的准备工作明显不如李那儿，他没能统计出沈阳故宫所藏瓷器的数量，只好转而请赵尔巽将瓷器逐件开列详单以便开价。不过，魏武达同样表示要将这批瓷器全部购买。

前文已述及，赵尔巽对这批瓷器等大内藏品的估价是3000万两，而法国商人只肯给40万两。这种过于露骨的趁火打劫行径，让赵尔巽无法接受，于是他复电拒绝，“惟李君所开瓷器价值相差太巨，未能允售”。至于魏武达想要藏品清单的要求，赵尔巽则予以满足，给贝铎送去了沈阳故宫所藏瓷器清单——也就是他此前在给清廷的电报中卖关子“今尚秘不发表”的宝物。

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世凯出任临时总统，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原来主张变卖瓷器的袁世凯立即转而反对售卖这批瓷器。

刚刚担任临时总统第四天，日理万机的袁世凯即追问沈阳故宫这批藏品的下落。在听说有人想私下将这批藏品卖给外国人的消息后，二十九日下午一点十五分，袁世凯给赵尔巽发去紧急电报，表示“此事关系甚巨”，要求赵尔巽迅速查明究竟有无其事并立即回复。

腊月二十九日，举国正在忙于中国一年中最隆重的春节，袁世凯在此时追问沈阳故宫藏品的情况，可见此事之紧急与重要。接到袁世凯的电报，赵尔巽不敢怠慢。当晚，七点十一分，给予了回复，表示如此重

大的事情，谁敢自作主张就卖给外国人，“安有私人敢主？外人从何至受？”同时，赵尔巽要求袁世凯告知要私下卖这批瓷器的“有人”究竟是谁，以便追查。

得到赵尔巽并无此事的答复后，袁世凯在除夕夜回电表示，既然没有此事，那就不再追究了。袁世凯的这封电报旁边，还标注：“宣统四年正月初一日下午十一点五十分，北京来电”——看来，由于正值除夕，工作人员放假了，袁世凯三十日的电报赵尔巽直到正月初一晚上十一点多才收到。

发电追问沈阳故宫藏品下落，或许只是精于权术的袁世凯试探赵尔巽的虚晃一枪。但袁世凯的追查意味着叫停了关于大内瓷器的买卖。不晓内情的美国人，还继续打着购买的念头。一九一二年三月初二日（1912年4月19日），美国驻奉天（即现沈阳）总领事给赵尔巽写信，说远在日本的美国驻日大使欧布赍获悉盛京大内的皇宫宝器要变价出售的消息，如今欧布赍奉命要从日本调驻意大利，离任之际，他也想买这批瓷器。

和法国商人尽数购买的大手笔相比，欧布赍的胃口要小许多，他只希望赵尔巽能帮忙留意，拣出两三件上好瓷器。袁世凯已经不准售卖这批瓷器成了赵尔巽拒绝美国人的最佳理由，他明确告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变卖宝器的计划现在已经作罢。

之后，沈阳方面变卖大内瓷器的工作再无下文。

承德避暑山庄是否也进行了类似的清点工作，目前没有查到相关档案。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这批《赵尔巽全宗案卷》至少说明一点：简单而武断地将袁世凯定为大内瓷器盗卖者，并不准确。身为大清内阁总理时，袁世凯“崽卖爷田心不痛”，提出售卖大内瓷器；摇身变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就主动叫停售卖大内瓷器。其实，不论是昔日的晚清还是斯时的民国，财政依旧还是那个紧张的财政，人依旧还是那个人，身份的改变却带来截然不同的政策。个中的反差，令人深思。但无论如何，这些无价之宝没有流出国外，总是值得庆幸的。

编辑 段宇宏

猜你喜欢



点此阅读

刘文辉办教育真相

“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这样的段子广为流传，使得民国时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近年来已成“军阀重教典范”，真实的历史却与宣传出来的光鲜形象颇有差距。

文 / 谌旭彬

近年来，刘文辉本该盖棺论定的政治形象，却忽然璀璨起来，成了“民国军阀重视教育”的典范。这种突变，须归功于刘在西康省主席任上的一句名言——“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被重新“发掘”。一批纪录片人整理了民国电影人孙明经1939年拍摄的一组关于西康的纪实镜头，制成影片《世纪长镜头：电影胶片的记忆》，于2004年在央视《见证》栏目连续播出。其中提到：

在民国政治人物中，四川军阀刘文辉，至多不过是二流人物。终其军阀生涯，除将鸦片生意做得格外红火外，于治业上实在乏善可陈。其政治立场，亦颇多可议之处。最典型者，莫如上世纪四十年代，刘任西康省主席，为巩固个人割据，一再阻扰中央政府对康藏公路的勘探与修筑。浑不顾中央拟筑印藏-康藏公路，一者，乃是为增辟国际交通线以维系抗战前途——其时，滇越、滇缅两条国际交通线已被日军截断；二者，乃是为削弱英国在西藏的存在，强化中央对西藏的影响。

“也许是有意为之，孙明经拍下了一组有趣的照片：简陋的县政府和豪华的学堂。当年县长赴任时，带着刘文辉的口令：政府建设不得好于当地的学堂，否则就地免职。”

其后，纸媒的跟进大致雷同，但在细节上变得更为具体。譬如：“1939年，影视教育大师孙明经摄制纪录片《西康》，他曾惊讶地发现，西康校舍大多坚固宽敞，相比之下，政府机构破烂不堪。在影片中，孙老师使用对比剪辑手法，突化了这个特点。此外，他还拍摄了大量图片，其中两幅颇具深意。其一是德格县小学生合影，背后是高大气派的校舍，即使今天看，一点也不寒酸。其二是义敦县长站在县政府门前，县政府不是大楼，而是石头垒起来的平房，为了防止倒塌，两条长长的原木支撑着它的前脸。如果不是孙老师做了注释，今人很难相信，这是西康省十分重要的政府机构。孙老师问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答：‘刘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阿忆/主编：《翻阅日历》2008年第7期）

时值“民国范儿”盛行，此类段子且有历史影像为证，更增可信度，

遂流传开来，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今日，凡谈民国教育者，“县长就地正法”的段子，几成绕不开的“信史”。

教育经费挪用严重

但“信史”不信。单就孙明经所摄照片而言，其解读已属失实。所谓义敦县“简陋的县政府”，孙注明该照片拍摄于1939年11月——揆诸史料：义敦县衙门1918年被藏军彻底焚毁，该县亦被撤销，直到1939年才实质性复治。该年7月，刘文辉所部一营到达义敦，开始修筑县府，期间因地方实力派对义敦复治采取抵制态度，屡生武力冲突，直到12月，县府才基本修造完毕，义敦才正式复县——换言之，所谓“简陋的县政府”，不过是临时办公点。至于和“简陋的县政府”形成鲜明对比的德格县“豪华的学堂”，其“高大气派的校舍”，实乃著名的德格土司官寨。

自1927年统治康区，至1939年西康建省，再至1949年率部投诚，刘文辉统治西康长达20余年。虽然刘一再对外宣传如何重视“边疆教育”，但其在教育上的投入，却始终少得可怜。1943年，西康省教育厅厅长程其保向中央报告：

“本省教育经费，仅占‘省经费’总额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依三十二年预算，为五百万元）；社教经费更属微末，举本年为例，全年仅二十三万一千二百一十二元四角，仅占教育经费的百分之四强，其中由中央补助者，有五千二百元，由省款补助者，为一千五百六十四元，余皆系县地方款项支给。明年度预算略有增加，惟为数甚微，一时尚难达到预期目的。”



西康省越县民族小学的儿童利用课外时间打乒乓球。

抗战时期，一省教育经费，包括三大块：省经费、县经费、中央教育部拨经费。其中“省经费”，即每年省预算划归教育的部分。程其保该报告，实际上乃是含蓄向中央指出：西康全省实际可用教育经费，仅相当于预算中的“省经费”的25%-30%，大量的教育经费被挪用——1943年预算，“省经费”本该是500万元（查西康省财政厅官方文件《建省后之西康财政》，1943年西康全省“教育文化预算”为677万元，约占当年西康政府总支出的7.7%，与程其保所言吻合），但程能够拿到的教育经费，包括“县经费”、“中央教育部拨经费”在内，却不足150万元。所谓刘文辉重视教育，不过如此。

玩宣传的“两把好手”

一个长年挪用教育经费至巨的军阀，因留存在旧影像中的只言片语，反成后世最知名的“军阀重教”典范，“宣传”二字，功莫大焉。论宣传，刘文辉可算民国军阀之翘楚，尤其重视拉拢知识分子。据其自述：“抗日战争期间……我同知识界的进步朋友，联系日益广泛，关系亦日益密切。”为营造舆论优势，刘并纠合一批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秘密性的政治团体”，名曰“唯民社”，“由刘文辉为社长，李相符管组织，马哲民管宣传，邵石痴管财务；社的经费由刘文辉负责筹措。”其宗旨“主要是通过文化工作去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斗争”，“先后办有《唯民周刊》、《大学月刊》、《青年园地》（半月刊）、《民众时报》（日报）、《华西晚报》……在成渝两地出版。……此外，还在重庆办了‘文治出版社’，在成都开了‘大学书店’……”（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

具体到西康事务。1938年春，刘曾亲至中央政府所在地武汉，热邀学术界、文化界人士赴康考察，遂有该年夏“西康科学考察团”之成立。西康1939年建省后，类似邀请尤多。据曾受邀的文化人张央回忆：“我们成立的《浅草》文学社和崇尚‘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学会得到了刘文辉200元钱的资助，我们一半寄去成都川大三立学会出刊三期论史说文，评论西康时政的《三立双月刊》；一半留无锡出刊了三期追求民主、渴望自由、怀念康区的《浅草文艺》。”所谓“追求民主、渴望自由、怀念康区”，正是刘之所愿。大学文学社尤在其延揽范畴之内，余者可想而知。

“县长就地正法”之说的源头孙明经，亦是影像宣传领域的佼佼者。孙当时就职的金陵大学理学院，抗战期间，长年承接宣传影片的代摄事务。据其《代摄影片章程》，除摄影机及摄影人薪金外，委托人“应担任影片材料及其他一切费用”，且影片中，一般亦不出现“经济合作机关”的

名称。较知名的业务，如受长沙锦华丽湘绣公司委托，摄有《湘绣与纸伞》，受烟台仁立实业公司委托，摄有《地毯工业》，受国民政府实业部委托，摄有《竹器》等。

1939年7月，孙受邀参加“川康科学考察团”，该团的公开资助者乃“中英庚款管理委员会”。但考察团仅运作了三个月，即因“粮食缺乏、物价奇昂”，原定10万预算已“不敷甚巨”，而中途撤回。唯孙明经“自己花钱买了五匹马，雇了一位藏族向导，带上全部器材胶片，独自踏上了甘孜之后的行程”。此举耗资之巨，自不必言。“县长就地正法”一节，正拍摄于这段时间。1942年孙明经在华西坝公映其西康系列影片，“请求重映者如雪片飞来”，其后，刘文辉亲往金陵大学电影部参观，并邀请孙明经再次入康拍摄。1944年，孙明经率团队二进西康，但并无任何影像资料传世。其时，西康之境，已遍地罂粟。

编辑 段宇宏

五国秘辛系列其他篇





五國秘辛

日本篇



五國秘辛

蘇聯篇



凤凰周刊文丛

The Brothers of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Republic of Cuba

社會主義國家的兄弟們
古巴

凤凰周刊 编

目录

【长路漫漫：古巴慢改革】

古巴：慢，长的更新

生于古巴

在古巴，上网卡藏在内裤里

古巴公共舆论逐渐松绑

罗马教皇为何“High翻”古巴

【大门开启：走出去的古巴】

美古破冰：门打开了，闯关尚难

雅妮：闻名美国的古巴博客大V

苏联、东欧曾仿制可口可乐

【“分”与“和”：中古关系向前看】

五十年前中古缘何分裂？

古巴“红色经典”登陆大陆

投资古巴？中国企业仍在观望

【从历史中走来：古巴的前世与今生】

古巴：废墟曾经辉煌

走出历史的古巴

革命前传：古巴的殖民历史

“红色的切”：世纪偶像制造

电影揭开古巴神秘面纱
【独家记忆：在古巴行走】
哈瓦那：冻结在胶囊里的时光
圣地亚哥：古巴革命的背影
特立尼达：苦与甜的迹忆
智慧谷：为全世界种植甜蜜
推开关塔那摩地狱之门
经典作家的古巴时光

版权信息

五国秘辛·中国篇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凤凰周刊》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2016©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2016

本书版权为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所有。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TCFP-N00007218-20160304

最后修订：2016年09月20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长路漫漫：古巴慢改革】

古巴：慢，长的更新

“更新”，而不是“改革”。古巴小心翼翼地选择表达变革的词汇。“更新”在古巴的语境中，似乎只是困难时期的暂时妥协，预示着一旦困难过去了，政策或许会反复。尽管改革之路步伐缓慢，但这已经是这个国家在历史上走得最远的一次。

记者／吴如加（发自哈瓦那）



1994年9月13日，古巴人搭乘救生筏从佛罗里达海峡进入美国。古巴自19 9 4年起废除了潜逃者的禁令，为所有想离开古巴的国民打开了水上的大门。约31,0 0 0名古巴人当年夏天被美国船只拦截，创造了自1980年马列尔港偷渡事件(12万古巴移民)以来最大的偷渡浪潮。1994年的“筏民者”危机导致美国对古巴政策的转变，美国政府一年内为2万名古巴移民办理了签证。如今，古巴仍有人乘救生筏离国，只是数量大为减少。

“我们正在不急也不慢地前进，用全面综合的方法保证胜利。”——2016年4月16日，古巴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哈瓦那会议中心开幕，古共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下称劳尔）在会上这样描述正在进行的变革。

继今年3月下旬美国总统奥巴马作为88年来首位在任总统访问古巴之后，古巴又一次为世界舆论所瞩目。

“古巴永远不会允许使用‘休克疗法’！”劳尔向代表们保证，“所谓‘休克疗法’被频繁地用于损害社会最谦卑阶层的利益。”

劳尔称，他注意到，对于近年来私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古共党内有一些人表达了“真诚的担忧”，认为这将成为资本主义在古巴复辟的第一步。

“我有义务告诉大家，这个目的决不会实现。”劳尔再一次保证：“私营企业将在明确的限制范围内发展，成为国家经济结构的补充。”

“我们不会坐视中间商为自肥而肆无忌惮地抬高价格。”劳尔说，“承认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当损害群众的事情出现时，党和政府会袖手旁观。”

否定了快速变革的可能性之后，劳尔转过头来批评那些有“怀旧情绪”的人——有人认为，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还存在的时代，古巴人的生活水平要好得多。

“过时的思维”是改革的最大障碍，劳尔指出。

为期4天的古共七大为古巴制订了2016年至2021年的规划，共计268条指导方针。

不过，这些指导方针大部分实际上是古共六大时就已通过的改革举措——31条原封不动，193条在修改之后沿用，只有44条是新增的。

5年前召开的古共六大曾被视为古巴改革的新起点。在2011年4月的那次大会上，通过了《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313项改革措施，涵盖了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劳尔曾在当年称：“更新”经济模式不是一朝一夕、一年两年能完成的事，至少需要5年时间。

如今5年已过，古共六大《纲要》提出的313条政策措施，迄今只完成了21%，77%正在执行中，2%尚未开始实施。许多“更新”都未达到预期效果，国营部门的裁员计划面临巨大阻力、货币并轨遥遥无期、对外商投资仍存在诸多限制。

古巴经济学家雨果·庞斯就此解释：“我们在谈的是一个很复杂的改革……这些改革都是从基础开始实验。不能说有些改革措施未完成，而应该说‘正在执行中’。”

古巴官方更愿意使用“更新”一词而不是“改革”（与之类似的是，越南使用“革新”一词，也避免使用“改革”）。“多年前古巴革命胜利时，我们实施了彻底的改革。现在，社会主义模式不需要改革，只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更新。”古共机关报《格拉玛报》社长拉萨罗·巴雷多解释为什么官方不愿使用“改革”一词。

在古共七大的闭幕式上，古巴革命的象征，菲德尔·卡斯特罗（下称菲德尔）身着蓝色运动服，在西装革履的弟弟劳尔身边坐下。相比于身体尚且硬朗的劳尔，菲德尔步履缓慢，清瘦而苍老。他已经很久未出席党的公开活动了，但仍时时关注着古巴的变化。

没有人知道今年的新规划能走多远。古巴政府对改革保持着极为谨慎的态度。3年前，劳尔就曾敦促古巴人民“抵制那些坚持要求古巴加快改革步伐的压力”。

不过尽管步伐缓慢，这已经是古巴在历史上走得最远的一次。

为了克服1990年的问题

按照雨果·庞斯的说法：“2010年开始的改革是为了克服从1990年就存在的问题。”

安娜是那个年代的见证者，她的家在哈瓦那的马列贡（Malecón），这是一条面朝墨西哥湾的滨海大道，在西语中，马列贡是“堤岸”之意。

它从殖民时代竖着巨炮的西班牙要塞，经过飘扬着星条旗的美国使馆，再一路延伸到苏式建筑林立的新城。在哈瓦那，24小时开放的室内场所几乎不存在，马列贡成了哈瓦那市民全天候的社交中心。孩童在此嬉戏，情侣在此幽会，老人在此垂钓。街头艺人们唱着古巴独立英雄何塞·马蒂的诗：“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来自棕榈生长的地方”。



国营市场内，一名销售员在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画像下等待着顾客。国营市场内的食材价格便宜，但种类稀少，且不时断货。图中各类食物的价格如下：

小香蕉	每磅 2 比索
大香蕉	每磅 3 比索
西红柿	每磅 12 比索
黄瓜	每磅 4 比索
番石榴	每磅 4 比索
黑豆	每磅 12 比索
马兰加	每磅 5 比索
豆角	每磅 5 比索
茄子	每磅 5 比索
椰子	每个 5 比索

注：1 元人民币约等于 3.65 比索
1 磅约等于 0.45 公斤

在恶劣的天气里，墨西哥湾的巨浪呼啸着漫过大堤，某些路段因为海水淹过路面过半米而封闭，一些紧邻马列贡的民宅里也会涌入海水，居民们喘着粗气把一楼的冰箱搬到二楼。

1994年，古巴发生了被称为“筏民者”危机的偷渡潮，成千上万的古巴人利用木筏、橡皮艇和其他自制的简易载具，漂划向90英里外的美国佛罗里达，安娜和母亲在马列贡见证了这一幕。

偷渡潮的背后，是古巴巨大的危机：苏联解体前夕，古巴事实上失去了最大的靠山和金主。

历史上，古巴曾长期依赖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在苏东剧变前，古巴与苏东国家的贸易占外贸总额的85%。1988—1989年度古巴出口的商品中，63%的糖、73%的镍、95%的酸性水果和100%的电器零配件是出口到苏东国家的；进口的商品中，有63%的食品、86%的原料、98%的燃料、80%的机器设备、约75%的制成品来自经互会国家。

戈尔巴乔夫新政之后，苏联和东欧减少了对古巴的援助。苏东剧变之后，古巴经济更是陷入停滞，1990年8月，古巴政府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发生了“筏民者”危机。

“当那个大国在一天之内崩溃时，我们国家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我们陷于孤立无援。我们的糖失去了所有的市场，我们得不到粮食、燃料，乃至于为死者举行宗教葬礼所需的木材。美国加强了禁运，我们的市场和基本供应的来源都瞬间消失，国民卡路里和蛋白质的消费减少了几乎一半。”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在接受法国著名记者拉莫内采访时感叹。

作为卡斯特罗的忠实拥护者，安娜一家从没有想过要逃。当然也有客观原因，安娜认为：“太冒险了，又不一定能到达。”不少冒险者死在了海上。

日复一日的玉米汤和每天18个小时的停电并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谈起“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那段日子，安娜说，“就算有钱，在商店也买不到东西。”

由于缺乏燃料，古巴的邮政系统基本瘫痪，困境中的古巴人甚至一度使用信鸽代替航空邮政。同时，哈瓦那街头的汽车数量锐减，为解决交通出行问题，古巴政府从中国进口了大量“凤凰”“永久”，退回自行车时代。

直到2005年3月，菲德尔才宣布节制消费的“特殊阶段”结束，此时古巴已经在拉美找到了可靠的新伙伴：查韦斯治下的委内瑞拉为古巴提供了新的廉价石油。



周末，一个人流涌动的大型商场，成为了哈瓦那市民休闲娱乐的去处。这样的大型商场在古巴十分罕见。摄于2016年3月20日。

计划下的匮乏

深夜的哈瓦那街头，一位外国游客正试图用火柴点燃手里的烟。这种由古巴火柴公司生产供应的火柴，劣质、短小、脆弱，划擦时力道太轻难出火花，力道稍大则容易折断。当外国人接连划断数根火柴而不得其法时，一旁好心的古巴人忍不住上前帮忙，他轻轻一划，那火花便魔术一样在他手中诞生了。

火柴盒上印着一句口号：“我们计算一切。”

“特殊阶段”的结束，并没有结束这个国家的匮乏。作为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古巴至今保留购货本制度，人们可以用极其低廉的价格从特定的商店里买到一些生活必需品。过去本子上还有炼乳、啤酒、香烟、雪茄、黄油，甚至小孩子的玩具。即便无人抽烟的家庭，也能得到4包香烟的供应。每个月的特定日子，总能看到古巴人推着小车，到指定的店里，为全家人领取当月的口粮。

不过，随着一部分私营经济的开放，购货本上的东西越来越少，现在本子上的配给品仅够人们半个月所需，剩下的半个月，人们只能以市

场价格去街上购买东西了。

逐步取消购货本这一苏联时代遗物，是古巴“更新”进程的一部分。劳尔在古共六大报告中说，“许多古巴人以为社会主义就是免费的福利和补贴，把社会主义当作了平均主义，我们当中还有不少人把购货本当作一项社会成就，认为它该一直存在下去。”

劳尔承认，凭购货本低价计划供应日用必需品的制度，已经成为政府财政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必须予以取消，但不会一下子马上取消。

“每一年都会去掉一些产品，这个本子越来越空，慢慢就会消失掉，或许只要两三年，取决于古巴的经济发展。”哈瓦那教育大学历史教授恩里克·拉玛称。

目前古巴的官方货币是比索，但还有另一种货币CUC更为通用。CUC的全称则为可兑换比索，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外汇券，但其在古巴经济中的强势地位远非当年中国的外汇券可比。CUC的流行某种意义上也是古巴计划经济失败的印证。

1993年，古巴屈于现实，通过美元合法化的法令。尽管美元早已在黑市上大量流通。2004年，古巴再次禁止美元流通，人们必须将美元兑换成CUC之后才能在古巴消费。原本只限游客消费使用的CUC，由此成为与比索并行的强势货币，1CUC约可兑换24至25比索，美元与CUC的汇率接近1:1，但是美元兑换CUC时须收取10%的惩罚性税款和3%的兑换费。惩罚税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元黑市的猖獗。

2013年，古巴政府曾提出要在18个月内统一货币，但没有实现。直至现在，CUC仍然是古巴的强势货币。

两种货币并行，造就了古巴独特的经济现象。古巴街头的商店分为CUC商店和比索商店，CUC商店中的商品售价昂贵，种类丰富，还有许多进口商品。而比索商店，类似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的百货柜台，整面货架上零星摆着几件商品，肥皂、毛巾等等，但价格极为便宜。

双轨制下，大部分古巴人的工资和当地商品都是以比索计算，而CUC则主要在旅游相关行业、外贸和高档商店及消费场所中使用。货币双轨制还造成了一个问题，家里有美国亲戚，以及从事旅游、餐饮、服务等可以接触到外国人的古巴人有更多的机会获得CUC。而多数在国营部门工作的古巴人，则每个月继续领着比索工资。

根据古巴官方2016年的最新口径，全国的平均工资为743比索，即

约等于30美元。菲德尔曾透露，自己每月的工资是30美元。

“我们大部分人不只有一个工作，我们给政府工作之外，还有自己的工作。”安娜说。在古巴，许多人下班之后另有兼职，仅靠国营部门的工资在哈瓦那度日艰难。很多古巴人甚至买不起坐便器，缺少坐圈的马桶颇为常见。商店里，马桶和坐圈分开出售，最便宜的马桶需要60CUC，而坐圈则是12CUC。为了省钱，许多古巴人只买马桶不买坐圈。

“坐圈不是必需的东西，是奢侈品，有钱人才有。”一位古巴姑娘说。实际上连自来水也并非每家每户都有，在老城区的一些地段，没有铺设自来水管道，人们需要依靠水车运水。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的家人在游览哈瓦那老城时，跨过一处水塘。摄于2016年3月20日。哈瓦那老城保留了大量殖民时代和巴蒂斯塔时代的老建筑，但许多已年久失修。

曲折的改革之路

“No esfacil。”——什么都不容易。古巴人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再漫长的匮乏和困难，似乎都能安然度过。

但实际上，三十多年来，古巴从未停止过探索。一次次的“更新”与“纠偏”运动，构成了古巴反复曲折的改革史。

1980年代初期，古巴便曾推行过有限的改革措施，允许农民自由市场的存在，开设农副产品贸易市场、减少物价补贴等。1982年，古巴颁布了第一部《外国投资法》，首次表达了对外资在古巴设立合资企业的

欢迎态度。

得益于这一系列有限的宽松和开放政策，1980年代前五年，古巴的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7.3%，超过原计划的5%，其中工业生产年均增长8.8%，是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5年。

但这种增长带来了隐忧，菲德尔认为，古巴出现了新的资本家，形成了一个富人阶层，长此以往将影响国内政局稳定。于是自1986年5月起，古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宣布关闭农民自由市场，恢复国家统购统销制度。

1985年至1989年间，古巴经济停滞不前，社会生产总值仅增长0.4%。随后的苏东剧变，给古巴经济造成了空前危机。1991年10月，古共召开“四大”，提出“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菲德尔在开幕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古巴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正在广泛地实行开放，广泛地对外资实行开放。”

这次大会之后，古巴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以及对个体经济的松绑。1992年2月，古巴政府对1982年外资法进行了修改，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同年7月，新宪法明确合资企业是古巴经济中的一种所有制形式。1993年，古巴政府宣布私人持有美元合法化，同年，古巴政府允许在125个行业中建立个体和合资企业。

在这一时期，个体户得到了大发展。到了1995年，古巴个体户数量增加至21万人。1997年古共“五大”以后，古巴逐步走出经济困境，古巴政府转而加大征税力度，增加税收种类。

21世纪初，古巴经济状况进一步好转，政府便愈发加强了对个体户的控制和管理，不再发放新的营业执照，在高额税赋和缺乏原料的双重压力之下，许多店铺纷纷停业。至2009年底，个体户数量锐减至14.3万。

这个习惯了平等的国家，无法容忍经济自由化可能带来的财富集中。古巴的领导者们，作为参加过革命的第一代人，长期以来对市场和私有制抱有怀疑和敌视态度，这也是自1980年代以来，古巴改革几经起落的原因之一。

彷徨一直持续到2006年7月，菲德尔因肠胃出血住院，他将国家最高权力交给他的弟弟劳尔。2008年2月，劳尔正式接替哥哥，成为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

关于这一对兄弟，有一则流传已久的故事，来自一位前古共官员——1990年代中期，在一次接待中国高层来访者的酒宴上，劳尔提到了中国经济的成功，并且认为古巴可以向中国学习许多。菲德尔同样盛赞了中国的成功，但却在随后强调道："中国是中国，古巴是古巴"。

尽管古巴官方极力塑造劳尔与菲德尔的一致性，而讳言他们的不同点，通过对比兄弟二人的演讲，仍可发现不同的治理思路。

2005年11月，菲德尔在哈瓦那大学，发表了任内最后一次关于国家政策的长时间演讲。彼时，古巴的经济正在好转。那个用于描述贯穿了整个90年代的经济危机的名词——"和平年代的特殊阶段"——被停止使用了。旅游业在复兴，镍矿的价格上涨，近海石油的发现带来了更多希望，委内瑞拉的援助接连不断，中国等国家愿意提供贷款。古巴似乎已经出现了转机。

在演讲中，菲德尔对未来表示担忧，"革命的进程是不可逆的吗？"他问所有人，也问自己。"当老兵们凋零，让位于新一代的领导者，到时候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做？"

回顾苏联的失败，菲德尔指出了内部的政治危险，"革命可能毁于我们自己犯下的错误"。而他口中的内部危险，包括古巴人为了生活而不得不求助的黑市。菲德尔提到了不平等，他没有把其归罪于畸形的工资结构或货币双轨制，而认为黑车司机的高收入、国企中顺手牵羊的行为，以及黑市贸易才是不平等的根源。"守财奴""自私鬼"，菲德尔说，"这个国家里有多少窃贼？"

2007年7月26日，在接替兄长的工作之后，劳尔发表了第一次政策演讲。他感慨，古巴工人的工资已无法满足其需求，这使得"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无法贯彻。由此导致了"社会无纪律"——偷窃和黑市贸易等现象——"难以根除"。

在2008年7月的国民大会上，劳尔说："要让工人们感觉到他们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不能仅仅依靠理论解释——我们已经这样做了48年。重要的是，要让他的收入对得起他的付出。"


一位古巴人坐在自己家里抽烟，身后的墙上贴满了国旗、古巴领导人和革命战士的画像。

逼出来的“更新”

劳尔接手的，是一个低效、贫瘠的国家。

2008年，古巴遭三次飓风横扫，直接损失达100亿美元，那一年古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仅有608.06亿美元。比起飓风，对古巴经济打击更大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外国游客减少，全球油价暴跌，陷入财政危机的委内瑞拉大幅减少援助。而古巴的主要出口产品——镍矿价格也大幅下跌。僵化的计划体制弊端日益凸显，2009年至2012年，古巴的GDP年均增长率仅为2.3%，远低于1994—2008年的4.6%。

相对于菲德尔，劳尔被外界认为是务实的领导者，他曾经长期执掌的武装部队，是古巴政府中最有效率的部门。接班之后，他虽未推出激烈的改革措施，但逐步放松了对一些领域的管制。上台伊始，劳尔首先放开了对古巴人购买家用电器的限制。这一消息宣布之后，大量古巴人涌进商店里，抢购过去只能在黑市上见到的电脑、微波炉、DVD播放机，乃至电动摩托。

十几天后，对私人购买手机的限制也放开了。尽管买得起的多是款式陈旧的功能机，但人们仍趋之若鹜。侨居国外的古巴人，也纷纷为国内的亲友带来了最新的iPhone和iPad。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2010年以来，古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更

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新举措，对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领域进行松绑，力度之大，前所未见。

菲德尔的理念中，私人创业被视为一个权宜之计，是一种必要的恶。但经济改革无法离开对私营经济的开放。

“古巴私营部门的增长对于财政平衡、生产力和就业率的提高显得如此重要，因此成为了整个改革进程的领军者。如果古巴私营部门的增长无法持续，则改革难有实质进展。”古巴研究中心主席菲利普·彼得斯（Philip Peters）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一个庞大的私营部门可让政府更加从容地开展在国营部门的裁员计划，降低政府的财政支出，并且增加政府的税收来源，从而使提高国营部门的工人工资成为可能。”

个体经济的经营活动范围从178项增加到目前的近200项，允许原国有理发店、美容店、饭店、出租车、公共厕所承包给个人经营，并且放宽了对雇佣劳动力的限制。国家不再是唯一的雇主。

哈瓦那教育大学历史教授恩里克·拉玛说道，“我们犯过一个错误，我们曾认为只要国营的就可以发展经济，实际上国营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限制了经济的发展，餐饮、手工业等一些职业可以交给个体户经营。”

农业改革是另一项重要的举措。古巴的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国营农场效率低下，一份2007年的数据显示，古巴670万公顷的农业耕地中，国有农场占有75%，其中有45%被闲置，长满了杂草。古巴还是拉美唯一一个宰牛触犯刑法的国家，食用牛肉非常奢侈，但这并不能阻止牛的数量从2007年的700万头减少到2011年的400万头。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成了当务之急。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古巴最近几年推行土地所有制改革，超过一百万公顷的农田实现私有化。政府开始长期、无偿将国有土地借给个体农户和独立生产合作社。到了2010年，古巴41%的耕地由私人耕作，他们创造了71%的农业产出。改革进一步提高了个体农户的数量。

但在一个实行计划经济长达半个世纪的国家里，私营领域的开放并非没有阻力。如菲利普·彼得斯所述，“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为自己设立的每项目标几乎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挑战，那就是抛弃—抛弃延续了50年的习惯和做法，抛弃对经济活动肆意计划与指导的冲动，抛弃对私人经济领域事无巨细的干涉，抛弃对市场的厌恶，抛弃对个人进取心和个体经营者的污蔑。”

为了打消人们对于政策反复的顾虑，2010年8月，劳尔在第七届古巴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说：“我们在个体部门的扩大和灵活化方面已经迈出和即将迈出的步伐是深思熟虑和认真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保证，这绝不会再有倒退。”

2011年11月，从革命初期就被禁止的房地产买卖解禁。长期以来，古巴民众对这一禁令深感不满，此前，古巴政府只允许民众换房，手续繁琐。许多人历经多年也难寻交换条件适合的房源，而有些人则是经历过五六次换房，才终于入住心仪的居所。

一年后，古巴民众被允许从国营商店购买新旧摩托车、小汽车、越野车和卡车等。半个世纪以来只有老爷车的古巴街头，出现了起亚、现代等新车。

除了经济层面，古巴的社会氛围在改革之后也逐渐宽松。



人们聚集在哈瓦那最火的夜店“香格里拉”，参加古巴最受欢迎的歌星**L e o n i To r r e s**的个人演唱会，摄于**2015**年**10**月**14**日。**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革命军从马埃斯特腊山杀出，赶走了将古巴当作娱乐场的外国人。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能让古巴人如此纵情的场所便不存在了。随着古巴近年来的开放，哈瓦那的夜晚再次被喧嚣的酒吧和荷尔蒙点亮。

劳尔接管政权之后，官方对批评性舆论更加容忍。2008年3月，每周五的《格拉玛报》上开辟专门版面用于刊登群众来信，其中包括对政府工作的批评。美国学者马丁·德米特洛夫的研究发现，非批评性来信比例逐年下滑至2014年的18%，而批评性的来信则占了80%以上。2008年来信中歌颂党和政府的尚有11%，2014年只剩2.4%，而反映和揭露生活日用品短缺和劣质社会服务的来信从25%增长到58%。编辑对来信

的评语和反馈也从第一年的2.4%增长到2014年的57%。

西班牙《起义报》于2015年10月30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古巴的政权派别、社会阶层和经济变革方针》的文章，文章引用古巴一些著名学者的看法，认为古巴目前对经济方针主要分三派：一派认为改革是暂时的“让步”，是“战术性的让步”，他们害怕失去革命的成果，这一派主要是当政人士和老一代的民众，是“亲苏派”；另一派是“经济主义派”，他们赞同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主张经济自由化，强调经济效益。这一派主要有企业家、经济学家和个体劳动者；第三派是极左派，他们主张建设自治社会主义，不要政府管理，由劳动者自行直接管理。

改革毕竟得到了广大古巴人的支持，无论是对私人创业的开放，还是取消古巴人出国的政府审查。许多古巴人对改革的不满，主要是希望加快进度。

先富起来的人

54岁的西蒙总是一个人背着包，拎着购物袋走在23街上。每天，他都要在这条路上往返数次，一遍又一遍地路过那些排着长队买冰激凌的同胞。

背包和袋子里装满了各种食材和酒水，他是一家私营餐厅的老板，也是餐厅的采购员。私营餐厅的大量出现，是古巴经济改革带来的最显著变化。

一年前，西蒙开起了自己的餐厅。在这个没有批发市场、没有供应商和物流的国家，一切食材都是靠自己在街上采购，然后徒步搬运回餐厅。

西蒙向往财富，崇尚个人奋斗，带着一种天生的资本主义精神。他是古巴最早富起来的人之一。1990年代的特殊阶段，西蒙便在哈瓦那的一家合资酒店中担任经理。为外国人打工，使得他在古巴最困难的时期，也过得比一般人好得多。

西蒙不认可1959年的革命，这在古巴人中显得有些异类，“革命之前很穷，革命之后更穷了，遇到很多困难，物资缺乏。我是个特例，跟着外国人赚得比较多，但这不是革命的功劳，是靠自己的努力。”

西蒙的房子坐落在哈瓦那的中心贝达多区，那是一座高层居民楼，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这在哈瓦那可算是很新的楼房。古巴不存在房地产开发市场，哈瓦那市区极少新建房屋，多亏了出国的人源源不断，在

没有新建房屋的情况下，满足了人们部分购房需求。

“书上说的不对，资本家只是另外一种生活，另一种想法，没有什么不好。我最近6个月赚了很多钱，这不只是我自己赚了钱，我还用钱购买了东西、雇佣员工，这让很多其他人也赚了钱。”西蒙说，“所有人都赚钱了，这是一种进步。”

“在古巴，钱是最大的问题。当你发现你的工资买不起市场上的东西时，你就想要赚更多钱。”阿方索说，24岁的他曾经是国家交通部门口的保安，现在是一名个体户。

官方统计，古巴有47万个体户，而真实数目很可能远大于此，因为还有许多像阿方索这样为了逃税而没有登记申请执照的个体户。

阿方索身兼四职：制作羊皮包、泥水匠、开出租车，还帮岳父经营民宿。一个月下来的收入约两三百CUC，这在人均收入不到30CUC的古巴，已属富有。

阿方索在学校学的是信息技术专业，“我很懂这个，也很喜欢。但是国家分配的工作工资很低。”

除了个体户，外企或合资企业也是许多古巴人梦寐以求的工作。“我问过一个外企，他们那里的保安，最低工资是一个月154CUC。”阿方索说。任何能接触到外国人的行业，薪酬都要比体制内丰厚得多。

所有人都希望加入赚CUC的大军。然而要进入外企并不容易。外资、合资企业不能直接雇佣古巴人，一切招聘都需要经过古巴外企服务局的人才库，外资企业可以请求他们推荐人选，也可以主动提名，由其进行背景审查，并最终决定是否批准。

“有一个名单，需要排队，什么时候有了空缺的职位才能轮到。因为大家知道工资高，所以都会找自己认识的人，很多人好几个月都收不到消息。和在使馆工作一个道理，工资高，但很难进。”阿方索说。

工资的发放也必须经过外企服务局。合资企业支付美元给外企服务局，外企服务局转而向雇员们支付古巴比索。譬如一位经理级别的雇员，雇主须向外企服务局支付800美元，但雇员拿到手的，可能只有800比索。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合资公司会“非法”另外给古巴雇员发一份CUC工资。这种桌面下的交易，在2007年12月被合法化，合资企业被要求必须保留工资记录，而雇员则必须为此交税。

奥菲莉娅是一家外资公司在古巴代表处的经理，她的工作地点在哈瓦那西郊的富人区。这里和哈瓦那老城有很大区别，道路更平整，路边的植被显然经过了人工修剪和打理，一座座宽敞明亮的独栋房屋分列道路两旁，一如西方国家祥和的小镇。

这里还有古巴难得一见的超市，虽然不大，但里面有不少进口商品，来自西班牙、中国。雀巢、品客等品牌，都可在货架上看见。在此购物的人群，多是当地合资企业或驻外代表处里的外国人，也有一些为合资企业工作的古巴人。

奥菲莉娅每个月能拿到1000CUC左右的工资，公司还为她配了手机和专车。她并不为古巴近年来出现的贫富分化担心，“每个人都不一样，就算双胞胎也不一样，存在差异是正常现象。”

奥菲莉娅希望人们可以在这个国家进行“真正的投资”，“就像在中国一样，而不仅只是开一个小餐馆、咖啡厅，这样对经济的帮助很有限。少一些控制，多给年轻人一点信任。最重要的是改变。”

美国人来了

“在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结束之后，英雄的越南人民向我们请教如何种咖啡，我们的人过去了，教导他们并且传授我们的种植经验。今天，越南是世界第二大咖啡出口国。于是一个越南官员问他的古巴同志：‘不久之前，你们才教会我们种咖啡，而现在你们却要向我们买咖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那个古巴人怎么回答的，我猜他肯定会说：‘这都要怪美国佬的封锁’。”

2010年12月的国民大会上，劳尔讽刺了那些把古巴的困难全都归结于美国封锁的论调。

尽管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相互隔绝，美国在古巴的印记仍然随处可见，哈瓦那街头的多数建筑都是美古友好时期的遗存，连国会大厦都是仿照美国国会山的样式建造。1959年革命前的巴蒂斯塔专政时期，两国签有军事互助条约，是美国在拉美的亲密伙伴。

如今对巴蒂斯塔时代的看法将古巴人分为了两个群体，这位独裁者执政时，美国资本在古巴大行其道，社会贫富悬殊。但当时的古巴在多项社会经济指标上领先拉美诸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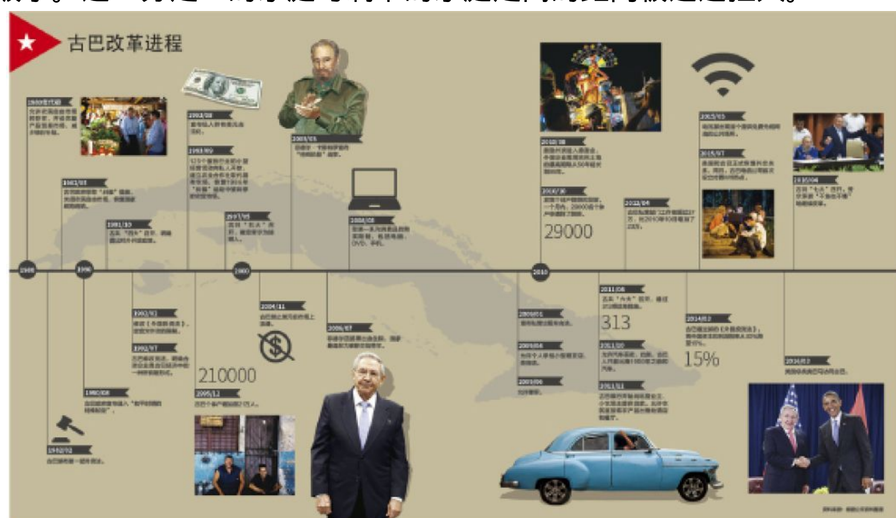
“大部分人，那些穷人和工人，他们没有自己的财产，革命胜利之后政府给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还有免费的医疗，他们是得到好处的一

群人；另外一种是富人，那些做生意的有钱人，但他们都已经走了，去了美国，他们没带走的东西都被没收了。”33岁的调酒师路易斯说。

当年领导革命胜利的菲德尔并不像其他某些共产国家的领袖那样，热衷于在国内树立自己的个人崇拜。在古巴，禁止用活着的人命名街道，或者为他们竖立雕像。尽管如此，古巴人对菲德尔的热爱仍旧毋庸置疑。当然，那些不喜欢菲德尔的人大多已经跑到了美国。如今在美国有200万古巴人，只有1100万人口的古巴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海外人口占比最多的国家。

古巴有着世界上最反美的政府和最亲美的人民。古巴人并不讨厌美国，即便在古巴本土也是如此。古巴革命与随之而来的美国制裁，都试图切断这两个国家间的纽带。但事实证明这是徒劳的，因为三分之一的古巴家庭在美国都有亲人。1993年，当古巴政府允许私人持有外汇之后，这些能收到亲人的美元汇款的家庭迅速改善了处境。100美元对一个在迈阿密打工的古巴人而言，并不算多，却足以支撑一个古巴家庭数月的开支。

古巴人半个世纪努力建设的平等社会，在美元流入的一瞬间就被打破了。这三分之一的家庭与剩下的家庭之间的距离被迅速拉大。



美国大使馆紧邻着马列贡大道，在美古尚未建交时，这里曾是美国驻古巴利益代办处。这栋大楼在美古断交之后一直是古巴宣传战的靶子，古巴政府经常在代办处外组织反帝集会和游行。代办处一直沉默以对，直到小布什总统执政的2006年，代办处突然在顶楼架设了一座巨型电子屏幕，不时播放反古信息。而当古巴人在代办处前组织反美集会时，电子屏幕上则显示出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们是自愿来集会游行，我

们尊重你们；如果你们是被迫来的，我们同情你们。”

这座电子屏幕激怒了菲德尔，代办处前的广场上一夜间竖起了138根旗杆，挂上黑色的旗帜，以期遮住那座电子屏幕。138由2006减1868得来,正是在1868年，古巴爆发了第一次独立战争。

那座电子屏幕在2009年奥巴马执政时被关闭了，而随着美古关系回暖，138根旗杆也早已空空荡荡，只剩猛烈的海风吹得它们吱吱作响。

在旗杆丛林的另一面，两堵墙上还刻着菲德尔·卡斯特罗曾说过的话，意译应该是：“为祖国毋宁死！胜利属于我们！”但前半句话如果直译成中文则有些怪诞：“祖国或者死亡”。

如今，等待办理美国签证的古巴人每天在这座大楼外排成长龙，队伍甚至一直延伸到两个街区之外，周边临街的住户中，不少人做起了协助办理签证的业务，如代填申请表或拍摄证件照。

“几乎所有古巴人都看美剧，在电视上也播美国电影、音乐和动画片。”路易斯说，“在八九十年代不可能这样，那时电视里一直放的是苏联的节目。”

2016年3月20日，奥巴马抵达古巴，成为美古两国于1961年断交之后，第一位踏上古巴领土的美国总统。自奥巴马上台之后，两国关系逐步解冻，奥巴马解除了大量针对古巴的制裁和限制措施。

无论革命之前或之后，古巴从未摆脱在经济上对他国的依赖。“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以前依靠苏联，现在依靠委内瑞拉。之前有段时间大家很担心，如果马杜罗没有被选上，那古巴的能源怎么办？公交车的汽油都没有。”路易斯说。

近年来，古巴主要依靠的国家委内瑞拉和俄罗斯都陷入了经济困境，开拓新的外交局面对古巴愈发重要。因此，美国人伸出的橄榄枝，古巴没有理由拒绝。

“我们跟美国人做斗争，至今已经有50多年了。”74岁的佩德罗中校感慨道。他出生于一个革命世家，19世纪时，他的祖父便在起义军中与西班牙人作战，佩德罗则在15岁时参加了推翻巴蒂斯塔的革命，后来，他又经历了美国支持古巴流亡者入侵的猪湾事件。

“当时我在一个空军基地，六架飞机被雇佣军毁坏了，我们有一个战士牺牲了，死之前他用自己的血在墙上写下了菲德尔的名字。”

尽管那场战争已经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但佩德罗仍对美国充满了警惕，对于美古建交，他认为：“这是另一场战争。美国人不会允许离他们90海里以外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知道这里有很多问题，比如食物、交通、住房，人们总想去经济条件更好的地方。我们应该教育好年轻人，国家培养了他们，给了他们教育。他们是这个国家的青年，不能为了汽车和房子背叛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党。”中校说。

不满足的新一代

1月27日，是古巴独立英雄何塞·马蒂163周年诞辰纪念日，哈瓦那照例有一场数万人的火炬游行。《格拉玛报》称，这场游行也是献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90岁生日礼物。人们最初收到通知，游行将于晚上八点半开始，事实证明游行和古巴几乎所有的事情一样不守时，直到夜间10点，活动才徐徐展开。

年轻人们站在哈瓦那大学的台阶上，摩肩接踵，手里拿着简陋的火炬。游行开始前，古巴大学生联合会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这场游行是青年给马蒂的忠诚献礼！成千上万的学生是菲德尔战斗精神、不朽的革命的继承者！”

“自由古巴万岁！”“拉美团结万岁！”“菲德尔万岁！”“劳尔万岁！”

山呼海啸声中，人们举着火炬从台阶上往下涌。

口号之外，这更像是一场群众性的狂欢节。街口竖着巨型喇叭，播放着摇滚乐，漂亮姑娘骑在男伴的肩上，欢呼，前行。“感情也是科学的一种成分。”一个人举着这样的标语。

在政治游行中表达忠诚与狂热的是年轻人，在街头抱怨国家现状的也是年轻人。

在过去20年中，由于古巴经济发展缓慢，人们普遍工资微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带着对未来的失望，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离开了祖国。每年有超过3万人移民海外，自从1990年来已经有近60万人出走，相当于古巴现在人口的5%。古巴的劳动人口因此在2010年出现了首次下降。

“很多古巴人的期望，就是离开这个国家。他们相信离开这个国家之后，自己在经济上会过得更好。”阿方索说。

恩里克·拉玛教授则强调古巴面临的困境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去墨西哥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贫穷——没有教育和医疗，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古巴的贫穷不是拉丁美洲的那种贫穷。古巴的贫穷是每个家庭的收入有限；扩建房子没有钱，没有车；不能每年买新衣服、新鞋子。而在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贫穷是指没有食物和人权。我知道古巴是个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做的事就是尽量把财富分配得更平均。我们有住房和交通问题，但是没有人流浪街头。”

但年轻人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想要更好的物质条件。“年轻人希望能买到生活必需品，希望拿到的工资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能买房子，够吃饭、穿衣服，就像80年代苏联还没有解体的时候那样。”调酒师路易斯说。

2005年12月，时任外交部长的费利佩·佩雷斯·罗克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我们面临着一个挑战，比起在革命之初热情参与下乡扫盲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们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他们有更高的期许。”佩雷斯坦承，年轻人们已经对关于国家成就的老套说教感到厌烦，“听着，别再来这儿喋喋不休地谈论医疗和教育了”，他模仿着年轻人的口吻说道。

劳尔为年轻人的减少而担忧，但他同时也理解新一代人的选择。2006年7月2日，《格拉玛报》上发表文章：“（劳尔）认识到，今天的青年们要求更高，因为他们能力更强，受过更好的教育，修养更高，尤其是，他们更具批评精神。他明白，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恰恰相反，他认为，每一代人都需要其独特的驱动力与价值观。同时，他相信，在今天，没有一个人会仅仅因为我们告诉他‘你的父辈和祖辈经历过怎样的艰苦时光’而成为一名革命者。”

如今年轻的一代古巴人，在他们小学时都曾宣誓“要成为切·格瓦拉那样的人。”但他们再也不是萨特在1960年时见到的那些年轻人了。那年，萨特访问了革命后沸腾的古巴。岛上狂热的民众、充满朝气的革命领袖，让萨特以为自己看到了人类的未来。这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此年轻，菲德尔·卡斯特罗34岁、格瓦拉32岁、劳尔卡斯特罗只有28岁，其他领导者则很少超过30岁。

回国之后，萨特在《法兰西晚报》上发表文章，称“古巴人必须赢得胜利，不然我们就将失去一切，甚至希望。”

彼时，年轻的菲德尔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他曾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提到：“共产主义的人不能用鼓励人的个人主义的欲望和野心来培养。如果我们失败的话，如果我们是因为相信人能够变得更好而失败的话，

那么就让我们失败好了。但我们永不放弃对人的这种信念！”

“现在的人和六七十年代的人想法不同。现在的人想要电冰箱，而不是一张劳动模范的奖状。”路易斯说。

格瓦拉在留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说道，当他们长大成人时，那时已经是世纪末。如果那时他还活着的话，他将在两种情况下和他们在一起：要么共同拿着武器和帝国主义战斗，要么就和他们一块坐着宇宙飞船向着月亮飞去。

在古巴，几乎没有人不爱切·格瓦拉，即便今天的古巴年轻人热衷于赚钱与物质享受，他们也一样爱格瓦拉，不同的人从他身上看见了不同的希望。

“如果切还活着，他可能会更早地进行经济改革。改革是人民的需求所推动的，世界在改变。如果切还活着的话，他也会调整自己的想法。”路易斯说。

“那些不喜欢菲德尔的人，也爱着切。他为我们的自由而战。”安娜说，“人们觉得切不会喜欢现在的古巴。就像反对政府的说唱艺人在歌里唱道：‘切，我将继续追随你，不像他们那样。你们曾在一起战斗，但菲德尔忘了你的理想’。”

卡斯特罗的告别

1959年1月2日，11岁的弗斯特用他那好奇的双眼见证着历史，整座城市都在沸腾，革命者乘着坦克进入了哈瓦那。那是一群来自马埃斯特腊山的大胡子，小弗斯特早已熟知他们的名字：菲德尔、劳尔、切·格瓦拉、卡米洛，还有阿尔梅达。他曾听见大人们在独裁高压下怀着渴望窃窃私语，在那压低的声音里，这些名字反复出现。

半个世纪后，小弗斯特成了一名老画家，人们叫他“加勒比的毕加索”。他的工作室位于哈瓦那西郊一个名为Jamanitas的小渔村。这里的墙上满是弗斯特的画，其中一幅是他为纪念“格拉玛”号登陆所作的。

1956年10月10日，流亡墨西哥的菲德尔、劳尔、切·格瓦拉等82名革命者乘坐格拉玛号从墨西哥前往古巴开展游击战，登陆后遭到政府军围剿，只有12人幸存。革命胜利之后，“格拉玛”号成为古巴革命的象征。

画上的革命者并不是1956年的形象，而是11岁的小弗斯特眼中看

到的样子。

那个似乎能永远激昂的大胡子菲德尔，如今已经年近90岁，人们已经很难在公开场合见到他。但他在这个岛国的崇高地位并没有减弱。这种忠诚的源头，包含了古巴人对平均主义和国家尊严的认同，以及对免费教育和医疗的热爱。

“最重要的部分，教育和医疗，国家都承担了。”一位哈瓦那大学的黑人学生说，“在革命之前，不可能在学校里看到我这个肤色的人，有钱人才能上得起学。”

直到21世纪，菲德尔仍然坚持：“有些人曾认为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重大历史性错误之一。”

但当古巴面临困境之时，即便是最坚强的菲德尔也不得不做出改变。外国人重新回到了古巴，对于那些并不富裕的欧美游客而言，古巴就像东南亚一样，是一个旅游的理想去处。23街的一家国营杂货店里，女售货员转身取货时，一位外国男人对着她的臀部，一边摆胯一边发出了下流的赞美。

酒吧、夜总会、色情表演、娼妓，这些巴蒂斯塔时代令革命者憎恶的象征，如今在哈瓦那遍地开花。

从菲德尔在1993年的一段讲话中，人们可以看出这位革命者对旅游业的开放多么不甘。他在袭击蒙卡达兵营4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无奈而坦率地承认：“我们本来宁可对旅游业的依赖更小一些，在20多年中，古巴革命一直在为支持国家旅游业的发展而努力奋斗……但现在的形势却迫使我们创办一种可以令外国人享受的旅游业，以获取可以帮我们解决其他问题的外汇——那些比旅游业更加紧迫的问题……这些措施中有一些令人感到不愉快，我们不喜欢它们，我们已经对平等习以为常了，当我们看到有人享受某种特权时，我们会感到非常痛苦。”

这种对比产生的“特权”是显而易见的：古巴人几乎吃不起海鲜，古巴渔民打捞上来的龙虾大多供给了外国游客；当卖淫活动被警察发现，受罚的只有古巴妓女，外国嫖客则无须担心；昂贵的上网费大部分古巴人承担不起，网卡“黄牛”们的顾客大都是外国人；所有能接触到外国人的行业都比体制内的工作赚得多。

在外国游客几乎必定游览的马列贡长堤上，画着一幅切·格瓦拉的涂鸦，眼神依旧睥睨一切，边上写着他对后人的警告——“不要让帝国主义钻了任何一点空子”，这句话摘自他在联合国的一次演讲。

外国人也带来了另一种可能，古巴人现在可以在微薄的薪资之外，容易地赚更多钱改善生活。商店的货架虽然仍显空旷，但已比“特殊阶段”好得多，在可预见的未来，商品还会越来越多。

“我不喜欢资本主义，我喜欢公平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大。古巴为公平而斗争，努力不让人变成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我还是喜欢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我说的不是共产主义，因为它从来没存在过。”画家弗斯特说。

但他承认：“在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很难。”他对中国寄予厚望，坚信中国将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胜出，“80年代的那种社会主义赢不了，跟美国人竞争的唯一方式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没有其他办法。”

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格拉玛”号上的年轻人中，切·格瓦拉早已死去，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被印在世界各地的T恤衫上。年迈的卡斯特罗兄弟，仍然掌握着这个国家的命运。

4月19日，古共七大闭幕式上，全体代表起立向已经很少露面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革命领袖致意，场内掌声雷鸣，代表们高呼：“菲德尔！菲德尔！菲德尔！”

劳尔说：“基于残酷的生命法则，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最后一次由历史一代来领导。”以古巴的速度，改革仍旧漫长，在这次会议上，人们甚至为古巴草拟了2030年的远景规划，但“格拉玛”号上的幸存者们，恐怕很难看到其实现的那一天。

菲德尔曾经在这里无数次发表激情洋溢、动辄长达数小时的演讲。这一次，他以告别的口吻对众人说道：“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大厅里发言。”

“我很快就90岁了，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很快我就会和所有人一样，面临每个人都会等来的那一天。”

这个年迈的大胡子深情地回忆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当时他还是哈瓦那大学的一名法律系学生。“那时我只有20岁。”他说，“热爱体育和登山，对苏维埃联盟充满了信心。”（实习生刘瑞祺、侯雪琪、赵乾对本文亦有贡献）

生于古巴

每个古巴人都有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

记者／吴如加（发自哈瓦那）

“我们喜欢穿好看的衣服。不管吃饱不吃饱，衣服要穿好。这很重要。”古巴姑娘安娜说。

古巴人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很难在他们脸上看见忧愁，他们总是嘻嘻哈哈，载歌载舞。他们一边说着No esfacil（什么都不容易），一边一有机会就给自己找乐。

古巴人的乐观还体现在哈瓦那的城市气质，这是一座充满色彩的城市，鲜艳得不像一个计划经济下的国家。人们喜欢为自己的房子刷上各种明亮的涂料。在服饰的选择上，人们也更偏好鲜艳与时尚。

生活中的点滴进展，都能为他们带来无穷欢乐，尽管这些进展往往需要漫长等待。

古巴人并不着急，即便在最大的城市哈瓦那，也难见紧张的节奏。每天4点之后，许多商店便已打烊，人们在夜里很难买到东西。巴蒂斯塔时期的国会大厦已经进入翻修工程的第4年，尚未完工。人们不紧不慢地做着每一件事。

排队是古巴生活中的常见景致，买上网卡需要排队，买土豆需要排队，买冰激凌也需要排队，而售货员习惯了慢节奏，人们在柜台和窗口前排着长龙，售货员们在聊天、调情、打电话。

改革缓慢，生活不易。在这个尚未摆脱匮乏和低效的国家，人们习以为常，每个古巴人都有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



哈瓦那市内的一座加油站，摄于2 015年8月16日。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燃料问题长期困扰着古巴，198 8年至1989年，古巴进口的燃料98%来自经互会国家。苏联解体之后，古巴失去了燃料供给，大部分车辆因此无法发动。20 0 0年10月30日，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签订能源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委内瑞拉以优惠价格每天向古巴提供5. 3万桶原油，古巴则每年向委内瑞拉提供医疗方面的支持。尽管当前国际油价走低，委内瑞拉国内面临经济困难，但仍坚持向古巴提供原油。

医生法比奥

一副键盘和鼠标，是最后所需的配件。装上它们之后，34岁的眼科医生法比奥，终于成功开启了他的电脑。这台电脑是法比奥一个配件一个配件攒出来的，从第一个配件到手，到成功开机，法比奥等待了5年。

“一年买一个配件，偶尔别人送我一个配件。”法比奥说，一台电脑需要500至600CUC，如果节约一些的话，足够一个古巴家庭一整年的开销。

“古巴有两种经济，一种是国家经济，一种是街头经济。本子上大米一磅价格是0.4比索，在街上大米每磅5比索。”法比奥说。

通常情况下，培养一名法比奥这样的眼科医生需要10年时间，而外科医生则需要13年。古巴目前仍实行免费教育，因此，法比奥在漫长学习生涯中，几乎不需要自己掏钱。

不过，硬币还有另一面——长期以来，法比奥的月工资只有600比索，即25CUC。对于哈瓦那的出租车司机而言，这只是从机场接一趟外国人到市区的价钱。“买什么都不够。”法比奥说。

从小法比奥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医生。“在古巴，当医生不是为了赚钱或者成为富人。我喜欢治病救人。”在现实压力下，他的许多同事纷纷转行当了出租车司机，或者做起了其他更赚钱的行当。

法比奥的运气不错，作为古巴经济改革的一部分，2014年3月，古巴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当年6月起“大幅度提高”古巴医生和护士等医疗工作者的工资，增幅从67%到187%不等。

一年多之后，2015年7月，改革的春风徐徐吹到了法比奥身上。他的工资从600比索涨到了1600比索，约等于64CUC。这在古巴的国有部门中，已经属于高收入阶层，但仍不足以让法比奥过上没有忧患的生活。

“只是比以前好点，还是不够用。买鞋子不够，吃的肉也不够。”

许多个体经营者富了起来，法比奥意识到了时代的变化，他决心要保持自己最初的价值观，“当医生是为了救死扶伤，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变成富人。我喜欢当医生，感觉很好。”

只是有些时候，这样的决心并非总是坚定，当谈及他那些下海的同行时，他坦承，如果没有去年的那一次涨薪，“如果我有了孩子，又能找到赚CUC的工作，我也会去的。”毕竟，这是一个变化中的国家。

古巴的医疗常为人们所乐道，至少在拉美国家，古巴的医疗水平颇有口碑。大量优秀的医生是古巴重要的外交资源，法比奥曾被派往委内瑞拉参与“奇迹计划”，他在那里免费帮助300多名委内瑞拉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古巴约有5万名法比奥这样的医疗工作者在海外工作，为古巴换来了大量外汇和廉价石油。

在古巴国内，几乎所有的医疗都是免费提供的，这在一个欠发达国家殊为不易。对此，古巴姑娘安娜满怀感激，她不理解那些讨厌菲德尔的年轻人，“他们只看到了别人怎么生活，但是他们不珍惜自己国家拥有的东西。我们有免费的教育和医疗，他们得到了却不知珍惜。在古巴，再穷的人也有房子住，有医生看，有书读，有购货本。他们没有想过，如果自己去了别的地方，失去了这些保障会怎样。”

对此，安娜有自己的体验，20岁那年她曾作为交换生到中国学习中文。第一个冬天，她就生病了。“我去看病，我去的时候以为可以直接去找大夫。我坐在他面前，他问我有没有挂号。”

安娜感到意外，她知道在中国医疗并非免费，“但我以为可以先看

病再交钱，因为我很不舒服。这让我觉得他们首先要的是钱，而不关心我的身体，在古巴不是这样的。”

古巴的医疗体系并非无可挑剔。为了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古巴实行三级诊疗制度。普通病痛可在最初级的家庭诊所中就诊，家庭诊所中无法处置的病症则前往二级医院就诊，若遇上疑难杂症，则可至最高级别的医院或专门的研究所治疗。如果严格按照程序逐级就诊的话，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最高级别的医院只会接收那些病情最复杂的患者。

这很难解释，为何这个国家最好的医院里也人满为患。据一位医生透露，在高级医院里的病人，大多与医院工作人员存在一定裙带关系。只要医生点头，即便病情并不严重，也可以直接前来就诊。

因此，古巴人向医生送礼的情况非常普遍。在这个尚且淳朴同时并不富裕的社会里，直接送钱的情况很少见，多数礼品并不贵重，主要是日用品，如肥皂、牙膏、果汁一类。有些医生下班时，手里会拎着两袋五花八门的礼品。

古巴医生的素质在拉美已属前列，但古巴的医疗环境并不尽如人意。一位医生讲述了一件他印象颇深的事，他曾经在本该无菌的手术室里看到了一只苍蝇，而第二天这里就将进行一台重要的手术。而类似情况，在古巴并不罕见。



哈瓦那的一家餐厅，摄于2016年3月17日。私人餐厅的大量涌现是古巴改革最直观的后果，改革之后，私营餐厅的座位限制从12-20增长到50；不允许提供牛肉和贝类的限制被取消。

退伍军人安德烈

退伍军人安德烈等待了14年，终于可以在古巴再次买到汽油，重新发动了自己的阿根廷产菲亚特汽车。14年里，为了防止汽车报废，他每天都会走到屋檐下，把这辆菲亚特发动一次。

“1977年，我在苏联学习航海工程，在列宁格勒。”安德烈说完，突然又想起什么，“噢，现在它改了名字，已经和列宁没有关系了。这是苏联人民自己的决定，但是戈尔巴乔夫负有责任，他的新政就像毒药，摧毁了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错误。”

在古巴，像安德烈这样，在苏联或东欧有留学或长期工作经历的人很多。彼时，安德烈是古巴武装部的一名中校。今年55岁的他已经退休，成了一名出租车司机。或许是因为军人出身，他格外守时，这在古巴是难得的品质。

如今，哈瓦那的街道上已经出现了许多新车，起亚、现代、标志等品牌可谓常见，国营出租车也多是崭新。但老爷车依然随处可见。这些可怜的车子从上个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一直服役至今。

1492年，当哥伦布踏上古巴的海岸时，他留下了一句令古巴人世代自豪的话：“这是人类眼睛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地方。”

现实中的哈瓦那街头并没有那么浪漫，这些行驶缓慢的老爷车，一发动起来便吱吱作响，发动机发出巨大噪音，像肺结核病人用力而艰难的咳嗽声，不知是因为老旧的发动机还是因为廉价的燃料，这些车子驶过时，总是伴随着滚滚黑烟。

这些被压榨了半个世纪的车子，随时可能在路上抛锚，修车是古巴司机们的必备技能。他们对车的保养很有一套，他们知道从哪里可以搞来早已停产的配件，“开车怎么能不会修车呢？”他们说。

安德烈的车处于一个尴尬的状态，它既不是可以取悦外国游客的老爷车，也不是质量更好的新车，那是一辆35年车龄的阿根廷产菲亚特，看起来和苏联产的拉达很相似，换用拉达的零部件也没有任何问题。在质量上和老爷车一样需要经常维修，在外观上则缺乏美感，略显呆板。

这辆菲亚特继承自他的叔叔，一名医生。在古巴日子尚好的年代，医生得到国家的良好照顾，他们可以用低廉的价格购买汽车。

安德烈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典型的正直守法者。他每个月准时全额上缴购买柴油的发票，接受政府的审查，以便自己能依法纳税。

2014年1月8日起，古巴实施出租车管理新规，古巴出租车公司的司机可以与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由国企员工变为个体经营者。



哈瓦那老城的一位老爷车司机，摄于2015年1月16日。半个世纪以来，这些老爷车一直承担着古巴街头的客运任务，直到2011年10月，古巴政府才开放了汽车买卖。但老爷车仍然是街头运输的主力。黑车司机的收入普遍高于体制内的教授、医生。

时代在变化，安德烈依旧相信精神激励比物质激励更重要。他向乘客收取的费用几乎是私营司机里最低的，即便慷慨的乘客愿意支付更多报酬，他也不接受。“我从武装部退休时有二十多个勋章，这都是精神激励，几乎没有什么物质，我感觉很自豪。”

出于一种社会主义道德洁癖，安德烈鄙视黑市贸易，认为黑市商人不劳而获，“他们应该受到惩罚。”他宣称自己从来不去黑市上买东西，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就像一些古巴人所说的：“没有人能逃过它，几乎所有人都从黑市上买东西。”

“多亏了菲德尔。”这是安德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即便是在古巴最困难的“特殊阶段”，他也没有失去信心。

当时在武装部工作的安德烈参与了从中国采购自行车的计划。“武装部买了自行车，然后分给人民。当时的交通工具就是中国的自行车，去哪里都骑自行车，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没有零件修车，也没有燃油。”他回忆道。

“这展示了古巴人民的坚强，即便没有水电和食物。”他补充，“多亏了菲德尔的领导，他向人民讲话。我们一直对革命有信心，菲德尔和

我们说得很清楚，早晚会渡过难关。人民坚持了下来。”

从1989年开始，安德烈的菲亚特便失去了燃油。他不知道何年何月燃油才会重新出现在这个国家。他把车子停在自己的屋檐下，悉心保养，偶尔换个零件，每日去发动一次车子，以免发动机沉睡日久，再也无法醒来。他在一次次的发动中，等待着燃油。这一等便从1990年等到了2004年。



哈瓦那贝达多区的一个农贸市场中，墙上写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对革命的定义：革命是在历史的某一刻，改变所有应该改变的，是完全的自由和平等，是得到人的待遇和把其他人像人一样对待，是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摄于**2016**年**1**月。



哈瓦那的午后，一家国营商店外，儿童们在嬉戏。每个月的特定日子，古巴人会拿着购货本，

来到这样的商店，购买低价供应的生活必需品。近年来，购货本上的东西越来越少，随着私营经济的逐步开放，这一苏联时代的遗物终将彻底消失。摄于2016年2月。

安德烈为自己感到一些骄傲，他日复一日的保养终于有了成效。2004年，当古巴可以重新买到燃油的时候，停歇了14年的车子顺利发动。他还为车子换了轮胎，并重新刷漆。

在14年的等待中，他坚称自己从未有片刻难过。他并非爱车之人，“革命以前，我的父母是穷人，他们从未拥有汽车。汽车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劳动工具。”

安德烈有两个女儿，他对当下古巴年轻人思想的自由化倾向颇感担忧。他强调人们应该把对革命的热爱传递给子女。“我感谢古巴革命，我的父母都是穷人，多亏了革命我才有上学的机会。”

和许多古巴人一样，安德烈在美国有许多亲人。“我有十几个家人在美国，这两个国家不应该敌对。”

但安德烈从来没有产生过离开古巴的想法，“在这里生，在这里死，这里是我的土地。”



哈瓦那西郊的一个超级市场，周边坐落着许多合资企业和外国代表处。商品价格昂贵，购物者多是外国人和上述企业中的古巴雇员，超市中有不少进口商品，雀巢、品客等品牌均有售。虽然货架仍显空旷，但在古巴已属难得一见。摄于2016年2月。

资本主义餐厅

路易斯身上的阿迪达斯外套已经穿了10年，好在古巴几乎没有冬

天，“一年就穿一两次。”这是某年生日时朋友送他的礼物。在商店里，这件衣服的价格大概等于当时他的六个月工资。

10年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路易斯的老板，一直试图复辟家族上百年“资本主义餐饮”生意传统的费尔南多，等待了整整42年，终于等到了古巴政策松绑，开了一家餐厅。

与路易斯类似，许多衣服在古巴人身上停留的时间都超过了10年。人们从二手商店里买衣服，但是质量参差不齐，“若想买到质量好一点的衣服，你就得在里面有朋友。”路易斯说。

比索商店里只卖古巴国内生产的衣服，价格便宜，质量极差，款式也很糟糕。如果想要更好的衣服，就得去CUC商店里找了。

路易斯在大学里的专业是传媒，而现在他是一名私营餐厅的调酒师。他曾经尝试着当一名记者，可是每月工资只有15CUC。“有些记者赚得多一点，40、50、60CUC都有，但在古巴，你就是赚100CUC也生活不好。”

“在我家乡的那个省，15CUC必须和父母一起住才能维持生活。在哈瓦那这个大城市，当记者更维持不了生计，我只能换一个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路易斯从家乡来到哈瓦那，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私营餐厅里当厨师，每月能赚150CUC。他指了指脚上的鞋，“这双鞋60CUC，是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买的，现在买不起了。”

路易斯最终选择离开那家给他开了大价钱的餐厅，他解释道：“那是一家资本主义的餐厅，老板随便辞退员工，每天工作时间很长。”



哈瓦那的一个农贸市场外，古巴独立英雄何塞·马蒂的雕像。1993年，古巴恢复了在1986年“纠偏”运动中被叫停的农贸市场。2011年，古巴政府允许农民直接将农产品出售给酒店和餐厅。摄于2016年1月。



维尼亚莱的一个种植园里，一位古巴农民站在烤房的烟叶前。维尼亚莱位于古巴西部的比那尔德里奥省，是古巴的两大雪茄生产地之一。摄于2015年1月26日。



古巴东部的圣地亚哥，一位芭蕾舞演员在社区里表演。东部地区集中了古巴最贫穷的省份，因美古关系缓和而洋溢于哈瓦那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这一地区并不存在。摄于2015年3月12日。

现在的路易斯还是在一家私营餐厅工作，每月收入75至100CUC不等，比过去少多了，但“老板是个好人”。

在古巴，当人们谈论资本主义的时候，他们谈论的更多是关于道德及待人处事的方式，而非一个与财产权有关的概念。人们不会把一个有钱人叫做“资本主义者”或“资本家”，但如果一个人有钱又遭人抱怨，那么他就是一个“资本家”。

费尔南多是路易斯口中这家“资本主义餐厅”的老板。餐饮是其家族世代相传的事业。1835年，费尔南多的祖先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迁徙至古巴，他们用骡车把自己制作的清淡食品和甜点运到山区贩卖，家族生意一直延续至革命之后的1968年。

在这一年的3月13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演讲中向他的人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发展摊贩呢？”

他历数小贩的罪恶：从不把自己和革命相结合，从不参加革命组织；从不参加义务劳动；剥削被雇佣者。然后他自己下了结论：“我们必须消灭所有私人商业的形式！”

几乎是一夜之间，57000多个私人产业被没收。

费尔南多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对美食的热爱，“一生都想为家族开一个餐厅。”

上世纪90年代的“特殊阶段”期间，古巴政府曾经对个体私营经济有过短暂松绑，个体经营者数量迅速扩大，但私营餐厅仍存在许多限制，“很多产品不能卖，比如海鲜和牛肉，雇员只能是自己家里人”。

正当费尔南多已经开始筹钱，准备实现家族梦想之际，政府又收紧了个体营业执照的发放。无奈，费尔南多开始了新一轮等待。

2010年，政策再次出现松绑。彼时费尔南多正在为一家合资酒店工作，有鉴于上一次的教训，得知消息之后，他决定抓住机会，立刻提出了辞职。

“决定很快，不希望重蹈90年代的覆辙。”

费尔南多将自家的车库改成了餐厅，随后餐厅进一步扩大规模，连客厅也纳入其中，直至现在，费尔南多原来居住的房屋已经全部被改造成了餐厅。“以前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小的咖啡馆。”

政府对雇员的限制已经放宽，费尔南多的餐厅里雇员数量从最初的4人，发展至今已有33个固定员工、12个临时工。但是，对私营餐厅规模的限制仍然存在，譬如只允许摆放50张椅子，为了摆放更多的椅子，费尔南多只能申请2张执照。同时，连锁店形式也是不允许的。

古巴没有批发市场，这令费尔南多非常困扰，70%的食材是通过市场价从街头小贩手里购买的，因此成本很高。同时，这些食材的持续供应往往也无法保证，费尔南多不得不经常调整菜单，“写上那些容易买到的东西，那些时有时无的东西会一次性买很多储存起来，比如，牛肉、奶酪、冰激凌、火腿、啤酒。”

税收的负担同样很重，“从2010年到现在加了5次税，一次比一次高。雇用工人也要交税。每卖出一个比索的东西，我只能赚其中的6分钱（1比索＝100分），销售额中的30%要交税，60%多是食材和人工的成本。”

尽管如此，费尔南多给雇员开的工资普遍高于其他餐厅。他不愿透露具体数额，“如果被财政部的人知道了，税就会更高。”费尔南多承认，他上报给政府的雇员工资很少，但付给雇员的实际工资则很高。“如果公开的话，他们发现我给雇员发这么高的工资，就会知道我撒谎了，觉得我赚了很多钱，然后税就会提高。他们从来不考虑人道问题。”

费尔南多认为高工资首先是对雇员的一种尊重，他不希望餐厅员工的流动性太大。另一个更现实的考虑便是“高薪养廉”，“大家更忠诚，不

会偷东西。”

这是费尔南多在国营餐厅工作30年的经验总结，国营餐厅的员工每个月只有12到20CUC的收入，“服务员不关心生意，不搭理顾客，也不尊重顾客。所有人都从餐厅里偷东西，因为他们的工资不够买吃的。”

这不仅是国营餐厅的问题，国家控制的方方面面都是如此，所得与付出不成正比，人们只好各行其是。以交通为例，一些哈瓦那的司机并不在国营加油站加油，而是购买黑市上的汽油，他们将车停在一座不起眼的小屋旁，下车进屋，出来时便带着一桶汽油。而这些黑油多是公交系统的员工偷出来的。

既然是公家的东西，顺手牵羊也就成了常态，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有自己的办法。哈瓦那兴盛的雪茄黑市，便是仰赖雪茄厂工人们经年累月地“薅羊毛”。有人偷出盒子，有人偷出烟叶，有人偷出标签，有经验的卷烟工人再出人力，众人携手，凑成一盒，廉价售卖，外观上和国营店卖的雪茄一模一样，只是质量参差不齐。

更高的工资意味着更高的劳动和付出。“17个。”费尔南多指着天花板一角的监控摄像头说，“一共有17个。这样就可以看到员工的一举一动，防止菜上得太慢。”

在国营餐厅里，就餐的人坐下许久，服务员也未必会递上菜单，拿到菜单之后许久，服务员却迟迟不来点菜，上菜的时间十分漫长，就餐结束之后，等待结账的过程也非常考验耐心。

在这个人人习惯了慢节奏的国家，费尔南多不得不采用这种带有“资本主义剥削色彩”的方式，在自己的领地里提高一些效率。

“所有人都觉得我是有钱人，但是我连车都没有。希望政府不要认为我拥有这个餐厅就是个百万富翁了。经营一家餐厅需要牺牲很多，工作量很大，睡眠很少，我很累。工作量和收入不成正比。”

近半个世纪的等待之后，费尔南多终于实现了家族的梦想。但他仍在等待，等待古巴出现批发市场。“我在为未来工作。”费尔南多并不指望现阶段能赚大钱，“维持生计，维持住我的品牌。将来食材的供应跟上了就可以赚得更多。”

他相信上个世纪90年代的收紧政策不会再出现了，“就像其他国家一样，政府只需要掌握重要的领域。很多国有的东西会慢慢变成私有的。”他不能理解“政府怎么可能引导一个小小的咖啡厅呢？”

私人餐厅会经营得比国营餐厅更好，费尔南多坚信这一点。“100%确定。”他更正道，“不，150%。”



星期五的夜晚，人们爬上哈瓦那临街的房顶，观看英国滚石乐队的演唱会。古巴政府曾经对英美乐队极其厌恶，这是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乐队在古巴的首场演出，也是1959年古巴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演唱会。许多古巴人从其他省份专程赶来。就像滚石乐队那句脍炙人口的歌词：“Finally, the times are changing”（时代终将变化）。摄于2016年3月25日。

老爷车司机拉戈斯

曾经战斗在安哥拉的古巴世界革命战士拉戈斯，踩了14年的人力车，终于攒够了钱，买足了修好外祖父留下的老爷车所需的全部零件。如今，他终于可以既开老爷车拉客，也蹬三轮车拉客了。

拉戈斯看不起那些拼装出来的老爷车。在他看来，老爷车的收藏价值与其原装零部件保存完好程度密切相关，那些连复古的车身都是后来人用钢板拼接起来的东西，根本不算老爷车。

拉戈斯的傲慢来自于他车库里那辆白色的菲亚特1200，他的外祖父在1957年买下了这辆车，产自意大利。

如今游客日增，在马列贡，不时可见一辆辆敞篷雪佛兰载着欧美客人呼啸而过。古巴人突然发现，拥有一辆老爷车可以带来丰厚的收入。老爷车的价格随之飙涨。

相传，哈瓦那民间组织——老爷车俱乐部的会员们，过去每周六都会开着自己的老爷车到马列贡聚会。“确实有这样的组织，但现在很少活

动了。”一位在哈瓦那老城揽客的老爷车司机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赚钱，没有时间。”



奥尔金省，人们在火车上聊天打发时间。车外，一位农民骑马驻足铁道旁。早在19世纪中期，古巴就已成为拉美地区第一个铺设铁路网的国家。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用铁路连接起哈瓦那和其他蔗糖产地。目前古巴铁路总长14838公里，其中一半以上为甘蔗运输专线，而电气化铁路只有147公里。客运列车行驶速度极慢，平均时速只有29. 5公里，且车厢破旧，卫生条件很差。摄于2015年3月23日。

像拉戈斯这样拥有原装车的人不多。“很多人想买我的车，出价20000CUC，我不想卖。”

拉戈斯的年纪比他的车小，他于1964年出生于东部的奥连特省，母亲是个庄园主的女儿，父亲是在庄园里种咖啡的劳工。

“外祖父所有的孩子都在庄园里工作，爸爸和妈妈相爱了，爸爸把妈妈带走了。”

根据古巴法律，拉戈斯在他17岁那年去登记服兵役。等待他的是一场远在另一片大陆的战争。“没有告别，登记完毕，拉上车就去安哥拉打仗了。”

因为登记服兵役之后音讯全无，“我的母亲一直哭，她说自己的孩子一定是被送到安哥拉战场了。”

直到四五个月后，拉戈斯才从安哥拉寄出第一封家书。“当时年龄很小，那个地方完全不一样。我从没有拿过武器，非常害怕，听到第一声枪响就吓得把手里的武器都扔了，后来又捡起来。”

残酷的安哥拉给拉戈斯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很多死人，都是年轻的战友。”弹片在拉戈斯的背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当年中弹之后，他全身出汗，“以为自己这么年轻就要死了”。

从安哥拉回来之后，拉戈斯又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在经互会工作。苏联解体之后，他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奥连特省。

他为国家服务了一生，现在他要开始为自己过活了。拉戈斯回国时正值“特殊阶段”，“奥连特比所有地方都更差，没有水，没有肥皂，什么都缺，人们把香蕉皮磨碎了吃。”最困难的时期，拉戈斯和他的哥哥靠钓鱼养活了全家人。“连续吃了两三年的鱼。连油都没有。”

拉戈斯的外祖父80年代初过世，这辆车被交到了拉戈斯的表兄弟手里，但一直被闲置，“他们是领导，有自己的车。”

当拉戈斯再次见到这辆白色菲亚特时，它已经被闲置了十几年，静静地趴在停车场里积灰，“没有人管，连轮胎都不见了。”2000年，拉戈斯来到哈瓦那，作为直系亲属从表兄弟手里继承外祖父的老爷车。

拉戈斯相信外祖父的菲亚特在未来能带来不菲的财富。为了让它重新上路，他开始了漫长的修车生涯。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买很多不同的零件，很难找，没有便宜的，最贵的就是轮胎，每个要300美元”。他在哈瓦那靠踩人力三轮车拉客为生，存下来的钱全部投入老爷车的维修工程。“拉外国人可以赚得多一些，拉古巴人只够吃饭。2004年，政府不允许人力三轮车拉外国人了，外国人只能坐三轮摩托。如果被发现拉外国人会被罚1500比索，这个禁令2014年才取消。”

拉戈斯花了14年的时间，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购入、安装、维修，“整个车都拆开了，不能用的零件就用拉达车的零件代替。朋友帮我修好了发动机，没有收钱。”

2014年，拉戈斯总算可以开着外祖父在半个世纪之前买的车，改善自己的生活了。“带着游客去革命广场转一圈就有30CUC。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可以转4圈。”

拉戈斯至今也还未申请出租车执照，这意味着，他开着菲亚特拉客时，要注意躲避警察。一旦不慎被捉，就要重新考驾照了。

但拉戈斯不愿浪费任何一个能赚钱的日子。因此他一直保留着自己的三轮车执照，“警察来了，我就换三轮车出去赚钱。”

这让拉戈斯的生活充满了画面感。前一天，他穿着休闲西装，戴着

墨镜，在马列贡的海风里，开着一辆拉风的老爷车。次日，他换上一件脏背心，肩上搭着一条擦汗的毛巾，在哈瓦那老城的街道上踩着一辆三轮车。（实习生刘瑞祺、侯雪琪、赵乾对本文亦有贡献）

在古巴，上网卡藏在内裤里

即使连不上网，古巴人照样能刷美剧、上“淘宝”。腐败的国营电信公司、倒卖上网卡的法外之徒，信使、“包裹”与“喧嚣”，共同组成古巴人魔幻的互联网世界。

记者 / 吴如加（发自哈瓦那）

“在这里，没有人投降。”

2015年3月，哈瓦那出现了首个提供免费无线网络的公共场所，Wifi密码就是这句革命口号。在此之前，互联网是一项特权，被给予几个特定人群：医生、官员、工程师、大学教授，还有外国游客。

这个由一名古巴雕刻艺术家自费设立的Wifi热点，最多只能满足几十人同时上网，网速通常很慢。同年7月，国营电信公司才首次在古巴设立付费Wifi热点。昂贵的上网费用使大多数人望而却步。

在古巴，官方试图控制一切的努力在当下显得不合时宜，却又难以舍弃。和计划经济下的所有国家一样，这样的控制通常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一切新生和稀缺的事物，都伴随着国营部门的腐败与地下经济的繁荣。

腐败的国营电信公司、倒卖上网卡的黑市商人，以及靠原始手段传递海量信息的“信使”，共同构建了这个国家独特的互联网生态。



人们在哈瓦那市区街头，利用公共Wi f i热点上网，摄于2016年3月16日。在古巴全国有35个这样的W i f i热点，由古巴国营电信公司在2015年7月之后设立。每小时的上网费用是2美元，如果从“黄牛”手中购买上网卡，每小时的价钱是3美元。目前，古巴政府仍禁止个人安装家庭网络。能够自由访问互联网的古巴人只占全国人口的5%。

法外之徒

自由哈瓦那酒店矗立在繁华的23街上已经58年了。它的前身是1958年3月开业的希尔顿大酒店，当时这座26层大楼是拉丁美洲最高最大的酒店，赌场、酒吧、游泳池、娱乐中心、游乐场，应有尽有，成为巴蒂斯塔政权末期的奢华象征。

仅仅8个月之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起义军便攻入了哈瓦那，这座酒店成了他们的临时指挥部。又过了一年，在美古关系急剧恶化的背景下，古巴将所有美国投资的酒店收归国有，其中就包括这家酒店，从此它更名为自由哈瓦那酒店。其中2324号房间一度成了菲德尔的私人办公室，许多抨击美国的演讲都出自这里。

1966年，菲德尔在这里对82个来自亚非拉的代表团——其中大部分是各国的游击队、地下党成员——高喊：“三大洲的游击队员们，联合起来”。

半个世纪后，35岁的巴布罗就站在这座凝聚了古巴革命历史的大楼下，向每个看起来像外国人的路过者兜售上网卡。

“Internet Card？”他声音不大，却能准确地传递到每个潜在顾客的

耳中。如果路过的人长着一张亚洲面孔，他还会说一句“你好”或“konni qi wa”（日语的“你好”——编者注），尽管他从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不管对方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从自由哈瓦那酒店出发，沿着23街，很快就会到达海边的马列贡大道。这条1公里左右的路段是巴布罗的世界，他游走在看不见的Wifi信号中，赚取生计。

因往来呼啸的老爷车而显得聒噪的大道两旁，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坐在路边的花坛或台阶上，低头看着手中的电子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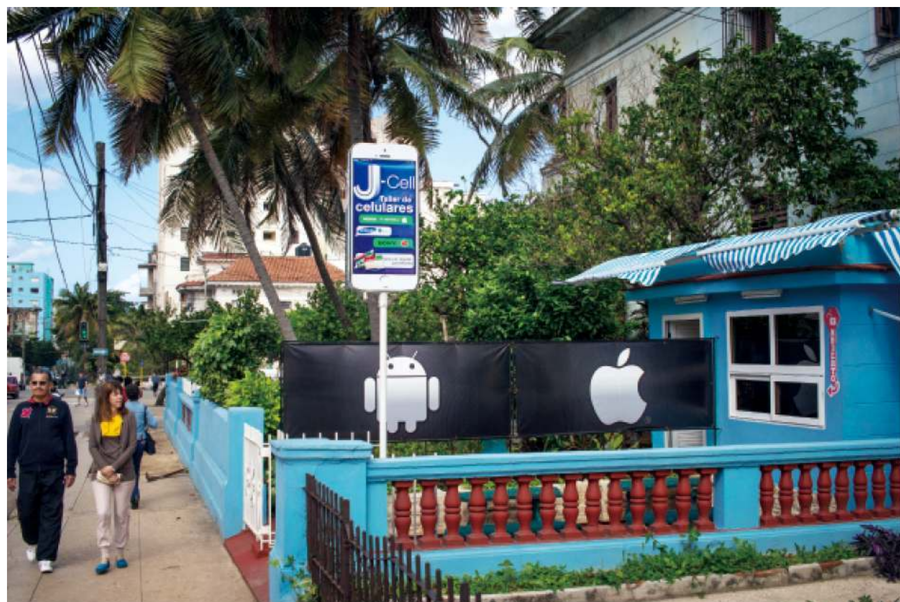
到目前为止，古巴政府仍禁止个人安装家庭网络。能够自由访问互联网的古巴人只占全国人口的5%。在街边的热点成了人们上网的主要途径。

对于大多数古巴人而言，互联网是一个新鲜的奢侈品。在1100万人口的古巴，只有35个公共Wifi热点。而想上网的用户需要购买古巴唯一的电信公司ETECSA发售的上网卡，官方价格是每小时2美元，相当于一个古巴普通家庭全天的开销。

ETECSA作为这个市场唯一的垄断者，其网点数量十分有限。运营公共Wifi热点并不是这家国营公司唯一的业务，它还同时出售手机、电话卡，运营固话通信。所有人，无论来办理什么业务，都排在同一条队伍中，这条队伍通常会延伸到网点外头，未必很长，却往往需要排一两个小时。至于排到柜台前，还有没有上网卡，就得看运气了，售罄是常有的事。

人们还有另一个选择——去找巴布罗这样的“黄牛”。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容易找到的黑市，在ETECSA网点门口排队的人们只要侧过脸，5米之外，就有“黄牛”在叫卖，只不过价格比网点里更贵，每小时3CUC。



哈瓦那街头的一家手机服务店，摄于2016年1月。20 08年3月，古巴取消了对手机的购买限制。古巴一直是西半球手机拥有率最低的国家。过去，只有政府官员、国企工作人员和外国人能享受到移动通信服务。普通民众只能通过其在国外的朋友，以“外国人”身份在国内注册一台手机。大部分古巴民众只能买得起样式陈旧的功能机，也有人用着亲友从国外带回来的苹果手机。

在网点，每个人限购3张卡，但巴布罗的内裤里却藏了厚厚一叠。和古巴所有的国营部门一样，电信网点也存在顺手牵羊的情况。有“黄牛”坦承，那些把卡卖给了他们的人，往往有亲戚在ETECSA里工作。人们也曾看见网点的工作人员将大量上网卡，通过第三者转交给“黄牛”。

但巴布罗在网点里没有朋友，他解释道，这些卡是他从不同的网点分别买来的，“比如每天五六点卖完卡，就赶在电信公司关门前一个小时再去买卡，一个网点没有就去别的网点，如果哈瓦那没有，就去郊区买，到处找。第二天拿这些卡去卖。”

他不否认他还有另外一个货源，有人会以2.3CUC的价格将卡出售给他。但他不知道这些人的卡是从哪儿来的。“就像有人卖的东西比市场价便宜，你会问他从哪儿搞来的吗？”

巴布罗的“黄牛”生涯始自去年11月，在此期间他曾经被警察抓住过一次。“警察骑着自行车过来，看见你正在卖卡，就会来查身份证，搜身。”巴布罗被罚了1500比索，大约60CUC，这意味着好几天都白干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女人比男人安全。”他感慨。做“黄牛”的女人会把卡藏在乳沟里，而警察不会搜那里。

巴布罗对靠此营生并未感到不妥，“很多事都需要冒险，冒险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吃想吃的、贵的东西，可以买10CUC、15CUC的衣服。”他每个月能赚110CUC，在古巴，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收入了。

许多古巴人对他所从事的行当嗤之以鼻。对此，巴布罗泰然处之，“我不理会那些人的评论。古巴从1959年革命胜利以来都没有什么变化。救死扶伤的医生，他们二三十年来一直拿着很低的工资。我的阿姨教书多年，许多学生考上大学成了医生和工程师，她每个月赚300比索。这很不公平。卖卡和卖面包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为了维持生计，给家里的孩子买吃的。”

“相比那些在夜里抢人项链的勾当，卖卡要好得多。我宁愿只吃不夹肉的面包，也不愿意去抢别人。”

巴布罗的一生，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一生。读高中时，他为了照顾患病的母亲而辍学。从那时起他便常去国营农场里偷水果，然后在街头倒卖。除了偷来的水果，他还倒卖过香水、甜点、除汗剂、杯子等。当时的古巴禁止私自贩卖东西，被警察抓住时，他只能求饶。“当时年龄小，我跟警察说，我妈妈病了，我要维持生计，警察就不管我了。”

倒货生涯一直持续到巴布罗被关进监狱。2002年，他在舞厅外与人斗殴，双方都受了伤，各自在医院缝了几针。他为此在监狱里呆了13年，2014年才重获自由。“监狱的条件很糟，犯人们互相打架，狱警对犯人差别对待，对有钱的人好，对没钱的不好。”

无法判断巴布罗是否对这段历史有所隐瞒，因为这样的刑罚重得让人惊讶。根据古巴刑法，故意伤人的刑期是1至8年，而故意伤人致死的刑期则是4至10年。一位哈瓦那大学法学院的学生表示，如果一个人在监狱呆了13年，那么他可能还犯有其他前科。

刚出狱时，巴布罗游荡在马列贡，做着无证导游的生意，看见外国人便上去搭讪。“带他们去教堂、景点和海明威的故居。他们会给我一点钱。”除此之外，如果巴布罗把这些外国人带到特定的餐厅里，老板还会按每个人头5CUC给予他回扣。

同时，巴布罗还兼任“皮条客”的角色，他为游客物色合适的女孩。“床伴”，这是巴布罗的用词。一般游客会给他10至30CUC作为中介费。不过，“皮条客”的生意没持续太久，巴布罗就放弃了。“有些游客喝多了会打女孩。”他说，“我觉得这样不好，毕竟我也是古巴人。”

他脱去外套，身上只穿着一件背心，文身爬满了他裸露的肌肤。在

他的一只手臂上，文着一个硕大显眼的英文单词：Outlaw。

信使，“包裹”与“喧嚣”

在美古建交之前，年轻的调酒师路易斯经常往美国办事处去。“那里提供免费上网，给那些反革命分子。但那也不是简单的事，很多人想去那儿上网，你得提前打电话问那里面有没有空位，还得申请。我有认识的朋友在那儿。”

考虑到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路易斯的邻居总劝他不要去那儿上网，但是兼职做导游的路易斯需要在网上查询一些资料。“这是职业需要。”他说，“我既不反对政府，也不支持政府，我去那里只是为了蹭网。”

在古巴上网，除了购买上网卡，也可以在国营电信公司注册一个账号，直接往里充钱即可。“我注册了一个，我在国外的朋友可以给我充值。充的钱不够用的时候，才买卡。”路易斯说。

昂贵的网络催生了许多生意。一些有笔记本电脑的年轻人，会把电脑带到公共热点处，以2CUC一小时的官方价格登陆Wifi，然后在电脑上开启热点分流，再将热点密码卖给其他想上网的人，一个小时卖1CUC。

一台电脑往往可以分流十几台手机，而成本只需要2CUC，这无疑是一门好生意。在公共Wifi覆盖的地方，这样的私人热点很多。有的热点直接命名为“快来，只要1CUC”。

当然，分流那么多人之后，网速就成了问题。通常只能看看facebook和whatsup（类似微信），但顾客仍旧络绎不绝。

另一项生意就是“包裹”服务，由于古巴网速仍停留在拨号上网阶段，网速奇慢无比，而且网费昂贵，几乎无法提供下载或在线视频观看。于是便有人专门搜集整理了各类互联网新闻、图片、美剧、电影，用人传人的方式，通过移动硬盘，向广大客户提供此类服务。

目前这项服务已经日趋成熟，每周都有1000G的更新包，热门图片、经典电影、电脑游戏、纪录片、报纸、杂志，应有尽有，连最新的美剧剧集也能第一时间跟进，并且附带一个名为“字幕”的文件夹，提供西语字幕。

“包裹”里甚至还有古巴版的“淘宝”，这是一个名叫“Revolico”（喧嚣）的网站。它一开张就被屏蔽了，在通常情况下，古巴人只能离线访

问它。

就像“包裹”里的其他内容一样，Revolico上的内容每周更新，人们可以在上面找到成百上千的商品，从汽车轮胎到房屋租赁。人们通过卖家留在上面的联系方式，线下联系，当面交易。Revolico也因此成了古巴最受欢迎、也最为知名的黑市。

每周，“信使”们都会将包裹送货上门，让顾客拷贝。“他们一天送两家，早上7点到下午3点照顾一个客户，3点之后把盘给另一个客户，第二天再去取。”24岁的个体户阿方索说，他是“包裹”的忠实用户。

路易斯钟爱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的节目，“我不看带字幕的版本，因为我想学习英语。”

没有人知道“信使”的网络有多大，但只要一天之内，“包裹”的内容就会传遍古巴的每个角落。

这样的服务，每周只需要1美元。由于古巴的网速无法承担如此海量的内容下载，人们猜测，“包裹”里的内容来自迈阿密的入境者，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走私——带着移动硬盘经过海关，运送到这个对信息充满渴望的岛上。

对于这项处于灰色地带的互联网服务，政府至今未采取强硬措施。这道古巴的独特景观，得益于该国滞后的互联网生态。当未来网络服务普及时，依靠人力运作的“包裹”业务将不可避免地消失，而美古建交正在加快这一进程。

奥巴马在访问古巴之际向媒体透露：“谷歌已经与古巴达成协议，将开始为古巴人提供更多宽带和Wifi接入服务。改变将从这里开始，我认为劳尔·卡斯特罗肯定理解这一点。”

谷歌古巴业务负责人布莱特·珀尔姆特亦表示，谷歌正在与古巴电信公司ETECSA合作，展示谷歌产品，“我们希望这些努力能够帮助古巴人访问更多网页，找到更多信息”，珀尔姆特说。

路易斯一直以来的梦想便是建立一个自己的博客，“写一些关于体育和古巴现状的文章。”昂贵的网络是他最大的障碍。“现在的网络状况不允许。当我告诉外国人古巴的网每个小时两美元，他们都很惊讶。”（实习生刘瑞祺、侯雪琪、赵乾对本文亦有贡献）

古巴公共舆论逐渐松绑

国际学者在美讨论古巴改革

特约撰稿 / 程映虹

2015年4月底，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图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联合拉美研究中心，组织了名为“中国与古巴在后革命时代的治理”的国际学术会议。

这次会议恰逢美古就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举行谈判时刻，也是劳尔·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经济和社会改革加速之际。这个趋势在美古关系正常化以后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古巴和中国在经济改革和社会治理上有什么相似和不同，都是非常吸引人的话题。其中关于古巴公共舆论的讨论更成为会议重点。

无独有偶，就在不久前，古巴通过允许本国民众在两个在线论坛上质询政策、放开昔日禁忌话题——选举制度和公民社会的决定。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这一迹象表明，一丝“公开化”的曙光已照到这个加勒比岛国上。

政府对公共舆论逐步容忍

古巴的媒体和公共舆论长期受到政府严格管控，但近十年来，随着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2008年后全面接管党政权力，官方对公共舆论的容忍度逐步上升。上述会议主办方负责人、图良大学亚洲研究主任马丁·德米特洛夫在他提交的论文中研究了古巴党报《格拉玛报》刊登群众来信的情况，对这个趋势做了分析。

2008年3月中旬，《格拉玛报》周五版开始增加一倍版面用来报道文化和体育内容，但备受关注的是用一版来刊登群众来信，包括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和建议。这在古巴革命后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因为《格拉玛报》从来是由政府向群众单方面灌输的工具，即使有读者来信也都是配合官方的宣传。这个变化立刻受到坊间欢迎，两个月后增加到两个版。很快，在哈瓦那的街头巷尾人们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格拉玛报》现在有看头了，但都在那两版读者来信上面。”

德米特洛夫抽取了2008年和2014年的读者来信，发现一开始读者来信中非批评性的占了40%，但这个比例逐年下降——到2014年只占18%，批评性占到80%以上。2008年刊登的来信中完全是歌颂党和政府的占11%，2014年只有2.4%，而反映和揭露生活日用品短缺和劣质社

会服务的来信从25%增长到58%。编辑对来信的评语和反馈也从第一年的2.4%增长到2014年的57%，足以显示对公共舆论的重视。从2008年至今，这个专刊已经出版了370多期，官方并没有任何关闭或缩减的迹象，也没有限制任何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当然不涉及大政方针和政府合法性）。德米特洛夫认为，这两个版面已经成为古巴环境下公共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古巴政府对公共舆论的容忍反映在2013年9月的一起公共事件中。当时，哈瓦那一个著名的流行歌曲表演团队在电视实况转播的演出中突然修改了一首歌的歌词，发表了如下的宣言：“我想要得到资讯自由去表达我的观点。我想要直接投票选举国务委员会主席，而不是通过另外的方式。我既不想成为军人也不想当异议分子（意为古巴政治的两极，要么亲政府要么反政府），只是想每个古巴人权利平等。”他们甚至喊出了释放政治犯的口号。但之后古巴政府并没有惩罚他们。



近十年来，随着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2008**年后全面接管党政权力，官方对公共舆论的容忍度逐步上升。图为一名男子在街头看报。

古巴互联网显示超前趋势

尽管古巴的互联网用户仍然是拉美最低的——只有5%的人口有条件上网，但让人不可小视的是，这些互联网用户基本上是古巴的文化和政治精英，与海外有广泛联系。他们对网络的利用基本上集中于其社会性功能，而不是个人消闲，所以这个“极少数”在发挥着远超出在总人口中比例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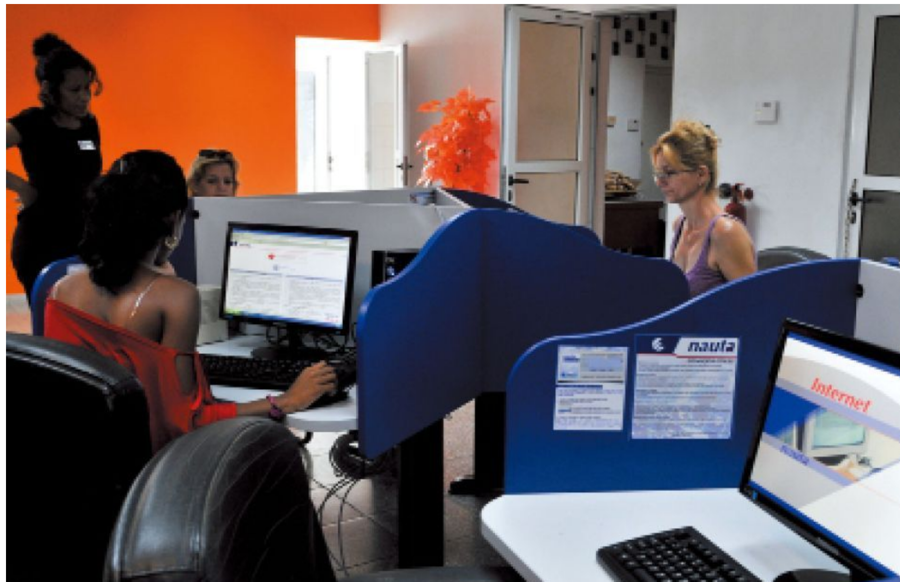
劳尔的继承人、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米格尔·卡内尔在2013年5月的一次重要国务会议上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一厢情愿去禁止某个东西的传播变得不可能了。这是毫无理性的做法。今天在网上广泛传播的新闻有各种来源，有好的有坏的，有被操控的，有真实的也有半真半假的。对它们最糟糕的反应是'这是些什么东西？不要让它们进来'。"

古巴最高领导层对互联网相较开明的看法产生了积极的反响。2013年古巴一下子冒出来118个网吧，2014年增加到150个。很快，古巴手机用户将可以上网。

美国纽约州贝鲁克学院的泰德·汉肯分析了互联网条件下古巴新兴的独立数字媒体的发展状况。他收集了古巴二十家独立的数字媒体的状况，这些媒体包括个人和集体的博客，数据型娱乐、新闻和深度分析性月刊，录像系列，甚至电子日报。比较重要的有《哈瓦那时报》、"论古巴"、"古巴可能"等。它们还把在这些独立媒体上传播的信息储存在CD上向无法享受互联网的古巴人发放，有的则在黑市上出售。他认为，这些独立数字媒体已经建立了社会影响，事实上已经成为古巴正在萌芽的公民社会的先驱。

就在3月，古巴宣布正在制定新选举法，该法将在2018年下届大选举行之前生效。届时，劳尔·卡斯特罗将卸任总统。古巴共产党还定于2016年4月召开党代会，外界认为此次大会为批评政治制度提供了一次机会。

同一时间，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旗下的日报发起了一个有关选举制度的讨论；而在古巴工人联合会的周报Trabajadores 3月发布的论坛中，网民开始讨论有关公民社会的议题。据《金融时报》观察，这两个论坛的大多数参与者都为古巴的政治制度进行了辩护，特别的地方在于，不同的政治观点得到了表达。



2014年11月28日，哈瓦那，古巴一家公司的员工正在使用互联网办公。据悉，在古巴一般ADSL宽带包月价格高达900美元，一般民众无力承担。

古巴互联网和社会舆论之间的互动出现了一种超前趋势：在整个社会互联网的使用还非常有限和原始的情况下，少数独立意见人士已经利用这个通讯工具对社会现象发表看法，发表和传播官方媒体还不能报道的事件，开始发挥一些社会监督功能。去年，古巴哈瓦那大学发生教授和学生集体作弊的丑闻，古巴著名的独立博主卡洛斯·阿尔贝托·佩雷兹在他的博客上对此做了披露，引起广泛关注，后来以官方介入并逮捕了相关人员而结束。

在古巴独立电子媒体的主持人中，有少数人政治色彩比较浓厚，其中的代表者是雅妮·桑切亚兹。她原先是一个历史语言学家，之前在欧洲留学，2007年开设博客。她在博客中自我介绍道，想帮助“建设一个多元化和包容性，可以给所有人提供空间的古巴”。

雅妮的博客主要对新闻针砭时弊，这些感想多半是与官方对古巴社会状况的描绘大相径庭的，并在海外迅速传播。一些西方报社甚至为她开设专栏，随时更新和翻译她的博文。2008年雅妮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当年风云人物，2009年当选不久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还和她通过博客进行交流，说她代表了“有勇气的古巴公民，已经利用互联网来争取表达的自由”。据悉，雅妮前些年活动还时不时受到官方干扰，但这一两年获得了更多自由，甚至可以出国访问。雅妮和丈夫现在办了一家独立的电子版《哈瓦那日报》，成为古巴第一家非官方媒体。

在古经商要担心国有化吗？

与在媒体和文化方面取得的进展相比，古巴政府在经济改革上仍然远远落后于中国，这也是这次会议的一个共识。美国匹兹堡大学卡米洛·米萨·拉戈在他的报告中详尽地列举了中国和古巴在经济改革上的政策和实践差异，尤其对民营经济和外资在古巴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做了详尽分析，也介绍了古巴至今为止仍然严重的物质短缺现象和国营经济效率的低下。米萨·拉戈是古巴移民，也是美国著名的古巴经济和社会问题专家，自上世纪60年代就活跃在古巴研究领域，多年来主编美国《古巴研究》季刊，80年代还有著作在中国出版。

米萨·拉戈指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是因为古巴开展经济改革的时间比中国短，而是因为古巴领导层长期以来对市场和私有制的怀疑和抵制，导致古巴经济改革在总体路线和政策上的徘徊不前。

上述分析也可以从华裔在古巴经商的经历看出来。历史上，古巴华裔在这个加勒比岛国辛勤劳作，尤其是在餐馆、蔬果、洗衣、杂货这些对古巴人和旅游者非常重要的行业当中。但1959年古巴革命后，一些大中型华裔资本首先被国有化；1968年，剩余的小商小贩也被政府没收。华裔古巴人的遭遇，也造成了古巴人民生活的艰难。

如今虽然仍有华裔在古巴开展商业活动，但由于古巴决策层多强调古巴的改革是利用而不是发展私有制，允许市场机制而不是把市场作为最重要的经济要素，使得过去的阴影并未消散。古巴驻华外交和商业机构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各种经济实体去投资，但人们对古巴经济改革究竟能走多远仍有重重疑虑。

大陆《上海侨报》两年前曾采访古巴驻华大使白诗德，当时的题目就是“华人在古巴经商不必担心国有化”。白诗德一方面重复了古巴坚持社会主义国营和计划经济的路线不变，另一方面也强调现在的经济改革是全民讨论的结果，多种经济成分正在古巴共存，中国投资者不必担心他们的资产被国有化。可以想象，只要古巴决策层在私有制和市场化这些重大问题上暧昧的态度没有根本改变，对投资者来说，“被国有化”的担心就始终存在。

不过，随着美国着手与古巴改善关系，似乎给在古巴经商的外国人带来曙光。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5月 2 日访问古巴时承诺，日本将扩大对古巴的官方发展援助（ODA）。而英国一个商务代表团于4月30日说，多家英国企业打算投资古巴，投资额达4亿美元。很多在古巴的外国投资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除名，意味着古巴即将脱离制裁，这无疑对古巴经济有所帮助。

（作者系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罗马教皇为何“High翻”古巴

在一个天主教占压倒优势的国家，又身陷天主教世界的包围，古巴主政者除了和教会合作之外，恐怕没有他路可走。更何况个人意义上，卡斯特罗兄弟和教会之间还有着难以割断的关系。

特约撰稿 / 程映虹

罗马教皇方济各9月下旬访问了古巴，在政府层面受到了极度真诚和不亚于友好国家的元首的礼遇，在坊间更是受到民众自发的欢迎甚至顶礼膜拜。

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不但亲赴机场迎接，还出席了教皇在古巴革命的象征——哈瓦那革命广场举办的弥撒。教皇前往菲德尔·卡斯特罗家中，看望这位不再担任古巴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但仍然发挥重要影响的前领导人，进行了“非常随意和友好”的会谈，并互赠书籍。数万古巴人代表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天主教徒参加了那场弥撒，其盛况让人不禁联想起半个世纪前古巴革命最狂热的时刻——人们在同一地点聆听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演讲。

在一个理论上仍以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要解释这个堪称奇观的现象，还得从天主教在拉美左翼思潮中的地位、卡斯特罗兄弟和天主教会的关系以及教会在古巴对外开放和美古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中的作用说起。

天主教影响拉美左翼

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天主教不但是统治阶级对人民的精神麻醉剂，而且为中世纪的封建制服务，共同构成了前现代的社会秩序。但天主教在拉美殖民主义的历史发展中起的作用却比这个教条化的分析要复杂得多。

在西班牙对拉美殖民统治的开始阶段，天主教确实是殖民统治在毁灭拉美土著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精神帮凶——教会当时把除了天主教以外的所有宗教都看成邪教，并借助殖民统治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来清除。但在确立天主教的至尊地位后，教会很快就和殖民者对土著居民赶尽杀绝的政策发生了冲突，因为教会视拉美为传教之地，土著为待教化的基督徒。

天主教会在拉美的三个主要使团多米尼各派、佛朗西斯派和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在对西班牙殖民者“晓之以理”无效之后，便上告笃信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力促其干预。

1550年由西班牙王室出面安排了一场辩论，论题是“应该如何对待美洲的土著人”。辩论的一方是西班牙著名古典学者塞普尔维达，另一方是多米尼各派的传教士拉斯·卡萨士。塞普尔维达认为，西班牙殖民者在拉美的所作所为基于“文明”的准则，即文明人有权开化野蛮人，而且根据古希腊哲学，人天然就有主奴之分。对此卡萨士反驳说，文明与否不能以欧洲人的标准来定，基督教义视天下所有人为神的造物，所以拉美土著“是我们的兄弟”，应受到平等的对待，不能被奴役。



2015年9月20日，古巴哈瓦那，罗马教皇方济各抵达古巴，开始为期4天的历史性访问，并探望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

卡萨士的观点可谓非常超前，已经蕴含了当今文化多元论和普世性人类价值的想法。那场辩论也包含了后来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相互关系的一些基本观念。在这些天主教士的努力下，西班牙王室废除了把土著作为奴隶来对待的劳工制，甚至有天主教士教这些土著使用欧洲火器来保卫自己。卡萨士说，土著人如果是出于自卫而杀死西班牙人，那是他们的权利。因此这些教士成为西班牙殖民者的眼中钉，有些人则被暗杀。

拉美独立后，天主教会虽然有过和卡迪略寡头政治相勾结的历史，但也有基于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公正的呼吁。后者随着历史的演进日益突出，在拉美政治中被视为反抗资本和权贵的社会底层意识形态，构成拉美独特的政治现象。

上世纪70-80年代兴盛一时的解放神学还把基督教伦理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相结合，取代了曾经由古巴革命所代表的拉美左翼的先锋地位。1980年，言论激进的萨尔瓦多主教奥斯卡·罗米洛被右翼分子暗杀，成为天主教会烈士，一直被拉美左翼纪念。今年5月，罗马教皇方济各对罗米洛“宣福”，意为他的灵魂已经升入天堂，其地位仅次于教会史上少数“圣徒”。

卡斯特罗兄弟与耶稣会

由天主教会在拉美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便可以理解这股被传统马克思主义视为最“反动”的政治和精神力量，为什么会被左翼运动视为同路人。上世纪60年代，卡斯特罗政权持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立场，1961年就规定信教者不得加入古巴共产党，这意味着把他们排除出社会的上升渠道。1968年，卡斯特罗发动古巴模式的大跃进、向共产主义过渡时，他宣布废除圣诞节，代之以全国义务劳动日。此后近30年，古巴天主教会一直受到压制，教会主要人士或是入狱，或是出国。

但到了后冷战时代，古巴政权在国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双重压力下，对教会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1998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邀请教皇保罗二世访问古巴，开启了和天主教会的“握手言和”。保罗二世是苏联东欧解体的推手之一，他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支持可见一斑。对这样一位政治色彩强烈的教皇，卡斯特罗早先访问意大利时出人意料地登门拜访，向他发出访古邀请。为了迎接教皇来访，古巴还恢复了被废除30年的圣诞节，哈瓦那全城一片欢腾。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教会言和的一个现实原因，是为了让古巴不再在拉美清一色的天主教世界中受到孤立，而天主教会在拉美的特殊政治地位也为这个转变铺平了道路。古巴在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论争中大力批判新自由主义，认为它造成世界范围内新的财富分配不均，这和天主教会平均主义和限制财富集中的立场相合。自90年代以来，卡斯特罗也数次强调，天主教在拉美是为穷人服务的宗教。

卡斯特罗兄弟少年时期在天主教会办的学校读书的经历也使得他们在意识形态立场外，对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有着积极评价。他们的父亲19世纪末从西班牙来古巴当兵，参与古巴独立运动后没有回去，而是在最东部的奥连特省创业开办果品农场，成为当地土豪。他不满意本地学校的条件，执意要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送到首都哈瓦那最著名的贝伦学校读书。

贝伦是一所由耶稣会士主办的学校。当时能进这所学校十分不易，

不仅学费昂贵，入学申请还要有教会人士力荐，学生必须严格遵循教规。卡斯特罗父亲于是找到在西班牙的同乡好友、奥连特省天主教会主教西兰特斯写了推荐信，才把儿子们送进这所学校。卡斯特罗兄弟在贝伦学校的经历，使他们对耶稣会士的人品和学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古巴革命后展开大规模的教育革命，旧的教育被完全否定和推翻，但菲德尔·卡斯特罗对耶稣会学校的教士的评价始终是正面的。一些研究菲德尔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他在意识形态及政治上的坚持和耶稣会学校的培养不无关系。

方济各：古美和解的牵线人

作为第三位到访古巴的罗马天主教皇，除了历史和个人因素，方济各在古美和解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增添了其在古巴的影响力。在呼吁古巴领导人向世界开放国家、进一步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让古巴人民享有更多机会的同时，教皇还批评了美国对古巴的制裁，认为其造成古巴的经济困难和民生凋敝。自2013年起，教皇向美古领导人频频呼吁，让他们采取切实步骤，实现关系正常化。教皇甚至介入导致古美之间谈判僵局的"间谍案"，要双方让步、释放囚犯。

由于方济各本人来自拉美，介入美古僵局似乎顺理成章，也给美古双方提供机会，找到一个台阶。除了公开呼吁，方济各还进行了各种私下游说活动。等水到渠成后，美古两国政府对外公布即将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时，彼此才把教皇的公开呼吁和幕后牵线搭桥抬出来，似乎告诉世界这是"看在教皇的面子上"，涵义微妙。

2014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就美古即将展开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发表电视讲话，慎重其事地感谢教皇方济各在古美之间的周旋，这在美国外交史上极为罕见。据美国外交官披露，在美古秘密谈判的过程中，双方甚至直接派代表去梵蒂冈，向教皇汇报谈判进程，讨论存在的问题，然后教皇再从中做双方的工作。

在奥巴马讲话后，梵蒂冈立刻发表声明欢迎美国政府的立场，并告诉世界，就在两个月前，美古两国外交使团在梵蒂冈会面，在教会官员面前就展开谈判的基本条件做最后商讨。而促成那次会谈的，是教皇写给两国领导人的信件。美国外交官说，那封信件对奥巴马政府最后下决心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奥巴马电视讲话后，梵蒂冈也立即公布美古在自己主持下的秘密谈判的细节，对这个"红娘"角色当仁不让。

今年7月，美古两国驻对方代表处正式升级为使馆，两国结束长达54年的外交中断状态。在方济各访问古巴前夕，古巴任命何塞·卡瓦尼亚

斯为该国驻美国大使，这是自1961年来的首位。9月22日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在今年1月16日实施的放松对古制裁措施的基础上，从9月21日起进一步采取促进美国企业对古贸易、旅行和投资的新举措，以落实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对古新政策。而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国甚至可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解除古巴禁运条令投下弃权票。

古巴方面，劳尔·卡斯特罗5月访问俄罗斯后顺道造访梵蒂冈。梵蒂冈之行原来不在日程上，但劳尔表示想去梵蒂冈专程对教皇登门道谢。梵蒂冈特许了这个例外。在和教皇关门谈了50分钟后，劳尔对外发表讲话，大谈教皇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并欢迎教皇于9月访问古巴。然后，劳尔脱离了讲稿，说了几句让外界震惊的话："如果他一直像这样说话，我想我会回到教会，重续过去的祷告的。这绝不是开玩笑。教皇是一个耶稣会士，我自己过去也一直是，我在耶稣会办的学校读书。"

劳尔的这些话立即成为国际舆论头条。毕竟，在一个天主教占压倒优势的国家，又身陷天主教世界的包围，主政者恐怕除了和教会合作之外，没有他路可走。这是古巴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所证明的，更何况个人意义上，卡斯特罗兄弟和教会之间还有着难以割断的关系。

（作者系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大门开启：走出去的古巴】

美古破冰：门打开了，闯关尚难

美古关系破冰是顺应时世的选择，也向世界展现了美国欲彻底告别冷战的姿态，但想真正地改善两国关系，远不止是签署一纸公文那么简单。

特约撰稿员 / 李想

“距离产生美”这句话有时放在国际政治上也很适用，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不免存在分歧，但如果这两个国家还是邻居，分歧就很有可能因为国家安全受威胁而被放大，升级成军事对抗，甚至导致零星交火。亚洲有韩国和朝鲜、印度和巴基斯坦，美洲有美国和古巴。如今韩朝仍旧军事紧张，印巴依然频频交火，美古在去年12月却迈出破冰的重要一步——两国首脑在通电后同意恢复断了50余年的外交关系。

1月15日，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宣布放松对古巴的贸易和旅行限制，算是美国对恢复两国关系的第一步实质性举措。负责西半球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塔·雅各布森也于1月下旬率团访问古巴，讨论详细的恢复外交事宜。对于奥巴马政府的决定，除了部分早期逃离古巴的古巴裔美国人上街抗议之外，大多数两国民众都纷纷叫好：古巴人期待经济复苏，美国商人也觊觎古巴尚未被开发的市场已久，美国民众则迫不及待地想踏上这个以往的“禁忌岛”。美国为何选择此时解冻美古关系？这个看似突兀的外交决定其实有着更深层的考量。而恢复外交关系后的两国又将面临什么挑战？门打开了，如何闯关才更需要美国深思熟虑。



2014年12月17日，一名身着美国星条旗纹样裤子的女人走过哈瓦那街头。当日，美古两国宣布关系正常化。

美古解冻：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持续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对峙，让美古关系成了“世纪死对头”的代名词。1961年的猪湾事件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让双方意识到，这个与自己截然不同的“邻居”会带来多大的安全隐患，后续美国施行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也让两国积怨加深。这样的历史背景让大多数人听到“美古关系解冻”时感到惊讶。但细细想来，美国选择此时恢复外交关系有它的必然性和逻辑可循，亟须改变的拉美政策和奥巴马执政所处的特殊时期，让这个“意料之外”的决定变得“情理之中”。

当多年“堵”的政策失效，美国开始以“疏”的方式治疗两国间的顽疾。奥巴马表示，美国过去对古巴执行的封锁政策被证明是过时的，恢复外交关系是寻求两国关系的新篇章。美国的经济制裁让古巴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并没有完成原本“政权更迭”的目标。而且劳尔·卡斯特罗上台后，古巴开始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都纷纷加大对古巴的投资力度，这增加了古巴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经济话语权。

当古巴努力走向世界，美国的封锁让本国商家丧失了开拓新市场的机会，同时也影响了自身在拉美乃至国际社会的形象。这些迫使美国重新规划其在拉美的战略布局。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哈罗德指出，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

已经在拉丁美洲的盟友中起了反作用，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也因此抵制美洲峰会。在美国因为古巴问题跟拉美各国争吵不休时，中国却加紧与拉美各国展开密切的贸易往来，现已发展成为该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在中国的追赶下，美国希望尽快恢复与拉美各国的关系，保住自己的优势。

对此，奥巴马早就开始行动。早在竞选时，奥巴马就承诺会“选择时间和地点”会见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也表示如果古巴采取措施推行民主并释放所有政治犯，美方会“开启同古巴关系正常化进程”；2009年，奥巴马同意古巴裔美国人返古巴探亲，也提升了他们向古巴汇款的上限；2013年，奥巴马在参加南非前领导人曼德拉的葬礼时与劳尔握手。而在去年12月，古巴释放了被囚禁了15年的美国国际开发署项目承包商格罗斯，两国还交换了四名特工人员。这些行为都为最后的破冰做足了铺垫。

除了渴望改变拉美战略布局的考量，在乌克兰问题和“伊斯兰国”局势上处理不当的“跛脚鸭总统”奥巴马，也想利用美古破冰为自己加分。在共和党愈发极端、两党愈发分裂的今天，共和党控制的“两院”在奥巴马任内没少为难他，从告医改违宪到预算案不过导致政府停摆，议员们让奥巴马还没到“跛脚鸭时期”就成了“跛脚鸭总统”。2014年中期选举共和党的大胜让奥巴马的声望继续下跌，加上即将届满，议员们更没有意愿去迎合他的想法。奥巴马干脆放弃走立法的常规途径，频繁通过行政命令来推行自己认为是正确，但颇受争议的政策，以求留下更多的政治遗产。加上1月13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经济正逐渐复苏（去年11月就业指标“职位空缺”创下14年来新高），奥巴马更有底气在最后两年更果敢地执政，签署多项行政命令（包括去年11月允许数百万非法移民暂时不被遣返的行政命令）。

在外交时机成熟、内政亟须突破的情况下，奥巴马签署了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的行政命令。

未来走向：执行之难 挑战依旧

美国恢复和古巴外交关系出发点固然积极，但在后续执行过程中也必然面临诸多阻力和挑战，能否达到奥巴马期望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奥巴马宣布美古关系破冰是绕过国会的立法程序，利用总统的行政权签署的行政命令。但美国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真正的立法权由国会掌握，总统的行政命令虽然具有与法律几乎同等的地位，但毕竟不是法律，许多涉及经费拨款和人员派遣的具体事项

还是要通过国会批准。

而且，美国对古巴实行贸易封锁已经立法，如果奥巴马后续推行的政策与现存法律有冲突，国会这一关依旧无法避免。现在已有许多共和党议员和少数古巴裔民主党议员公开指责奥巴马“背弃原则”，“掉进卡斯特罗的圈套”，并表示不会同意为建造哈瓦那美国大使馆拨款，也不会通过任何驻古巴大使的提名。这不禁让人质疑国会是否会在两国关系破冰的道路上万般阻挠。

虽然国会长年让奥巴马为难，但在这个问题上，跟奥巴马拧着干的可能性不大。原因之一是美古恢复关系符合大多数选民的利益，而且传统上支持禁运措施的佛罗里达州民意已发生改变，新一代的古巴裔美国人主张放松禁运。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跟总统纠缠太久也只会加强外界对他们只知道无原则“反奥巴马”的印象，对大选也无益。

另一个挑战来自古巴市场的购买力。两国间的贸易限制虽然松绑，但美国商人想在古巴投资依然面临着很大阻力。首先，市场规模大，但古巴人均消费能力不高。苏联的解体让古巴失去了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往以低价向古巴提供10万桶石油的委内瑞拉自身也深陷经济困境，虽然劳尔·卡斯特罗2008年执政后大力推进经济改革，但古巴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据估也仅有1.4%。同时还有一大部分古巴民众在政府上班，挣着低于300美元（约合1864元人民币）的年薪。此外，古巴政府依旧控制着岛上几乎所有最大的商业集团，外资注入的灵活程度还有待观察。这一切都预示着，古巴这片市场虽有，但如何激活可能还需要方法和时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副主任牛海彬则指出，奥巴马政府恢复跟古巴正常外交关系将面临至少两个挑战——来自两国深植的意识形态差异和美洲区域合作现存的不足。

美国政府依旧会强调古巴人权和民主方面的缺陷，但这个并非是古巴改革的优先领域。两国在合作重点上或产生分歧。另一方面，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逝世，巴西的卢拉也离开政坛，这使得拉美地区缺少强势领导人，而巴西、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等区域大国经济形势堪忧，很难提供资源以供地区合作。同时，拉美的地区合作呈现碎片化，有美国参与的美洲峰会也面临领导人更替和重塑地区领导力的挑战。

美古关系破冰是顺应时世的选择，也向世界展现了美国欲彻底告别冷战的姿态，但想真正地改善两国关系，远不止是签署一纸公文那么简单。如何排除国内反对派的阻挠，真正激活古巴的市场购买力，克服意

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投入足够的资源刺激拉美地区的合作，是美国能否真正从美古关系破冰中获利的关键。

雅妮：闻名美国的古巴博客大V

文 / 程映虹

古巴人是当今世界极少数在互联网已经风行的时代还受国家严格保护的国民之一，即使有条件上网，能看到和可以说的也非常珍稀。但在墙外，他们却有一个国际知名的博客大V。她居住在哈瓦那，名字叫雅妮·桑切兹（YOANI SÁNCHEZ），博客名称是“Y一代”http://www.14ymedio.com/blogs/generacion_y/）。她的很多博文发布后都被翻译成十几甚至二十种语言，所以说她是古巴的博客大V一点不夸张。

雅妮的存在已经成了古巴在劳尔改革新政下，对非官方的独立意见宽松政策的象征。



2 0 11年2月9日，在电脑前工作的雅妮·桑切兹。

踩线不越线的政治博客

雅妮的博客说些什么呢？以下就是她7月份的一些博文内容：

“哈瓦那，2014年7月29日。这些天最好不要打开电视。就在此刻，按下电视开关就能把我们抛入官方为乌戈·查维斯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生日所做的雪崩一般的宣传之中。从7月20日到8月13日，令人昏昏欲睡的国家电视节目将充斥着个人崇拜、意识形态的八股和政治滥情。孩子们的合唱团将歌吟‘我们永远的总司令’（注:古巴的领袖颂歌），那些你在街头永远碰不到的人会来和你分享他们所知道的“这些领袖”的生活

逸闻，无休无止的对他们生平经历的介绍将从四面八方轰炸我们。

自由是可以被伪造的，可以被各种虚假的关于人民健康和社会正义的统计数字所取代，但人们总是可以通过行动来戳穿它。对国内和国际问题的公共抗议在我们国家不存在，这就是我们正在忍受的缺乏权利和社会自治的证据。

现实又回来了。回来后看到商店里那些货架时发现物资短缺比四个星期前更严重了。和这样的日子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消息：100多个妇女被关起来了，因为她们身穿白色衣服纪念整整二十年前的13-de-Marzo tugboat事件（1994年7月13日，一艘载有72名古巴偷渡者前往美国的船被发现，当局派出巡逻船拦截后向船上用水枪喷水直到它沉没。事件中有41人淹死，其中有10名儿童）。

哈瓦那，7月3日。昨天公共汽车上，在盛夏的炎热中等车等了很久的两个男人在高声议论他们方才的遭遇。‘这样的事肯定不会发生在塞浦路斯！’其中的一个说。随后，两人的大笑让整个车厢都受到了震动。他们指的是喜剧演员尼尔森·古丁在一个录像节目中的脱口秀。古丁扮演的是一个醉汉，他装疯卖傻，半真半假地发牢骚，说国家媒体老是揭露其他国家的阴暗面，对自己国家的问题闭口不谈。

失业、腐败、经济不景气、社会动荡……这些都发生在塞浦路斯……它们是电视上‘圆桌讨论’节目中分析了好几次的对象。为了强调‘那里是地狱这里是天堂’，电视节目把重点特别放在欧盟国家面临的困难上。花了这么多时间讨论塞浦路斯后，‘啊呀，我不知道我们正生活在塞浦路斯吗！’这句尖刻的话现在已经在街头巷尾传开了。”

这就是雅妮博客中常见的内容，没有外界想象中的更政治化的控诉和揭露，有立场有态度但更有节制。这种节制表现在文字中不像是故意的克制，而更像是一种风格，一种为人，一种“这样的世界本来就是如此”的老成。她用来打动人心的不是激愤和论辩，而常常是有个性的充满黑色幽默的叙述，正是这种叙述让读者更贴近地感受到那个体制下个人的处境。

笔者几年前看她的博客，当时正巧碰上很政治化的题材:卡斯特罗起身离开坐了50年的那把交椅，把它让给弟弟。雅妮在博客中说半夜里朋友打电话告诉她这个消息，她没有任何欣喜，但再也无法入睡，也不能思考:

“我的全部生活都是在这个主席统治下度过的。不但是我的生活，而且是我父母的生活—他们分别出身于1954和1957年。除了这个今天

辞职的人，他们不记得有过任何其他的主席。已经有好几代了，古巴人从来没有机会去表达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来统治自己。今天的古巴人虽然对下一个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还没有选择权，但至少他们确切地知道那个人已经永远离开了那个位置……至于下一个周期是不是又要有50年，他们还不知道。”

这就是雅妮博客中非常踩线的语句了。它们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哈瓦那核心圈里一个共青团出身并从最高领导人的秘书做起，最后上位到被公认为是接班人的后生突然被下课时,一个匿名的高级官员对外媒的叹息：“古巴的政治是一场球赛，但观看的都是盲人。”

雅妮给自己的博客言论定下的规矩是不直接挑战现体制。她不用敏感字眼，回避最高领导人的名字，偶尔提及也是冠以“先生”。

“Y一代”的来历:历史的负担

从互联网的照片上看，30多岁的雅妮长相清秀，神情坚毅。她曾经留学欧洲，专业是历史语言学。她不是没有机会在那里留下来，但2002年她选择回去，决定做一个在古巴说自己想说的话的古巴人。她的博客自我介绍是她想帮助“建设一个多元化和包容性，可以给所有人提供空间的古巴”。

雅妮的姓桑切兹在拉美很常见，就像中国人的张王赵李，但她的名雅妮(YOANI)听上去很怪，既不像西班牙文，也不像拉美土著语言，看上去就像是生造出来的。

这个名字本身有一段历史。

雅妮是“70后”，这一代在古巴被称作“Y”一代，即英文字母中的那个Y。70年代雅妮出生时，苏联是古巴的老大哥，古巴人的吃穿住行没有一样离得开老大哥的援助。为了向老大哥表达景仰，很多古巴人都给他们的子女取一个俄国化的名字，成了一种风气。俄国很多名字都由Y打头，男孩如叶夫根尼、雅可夫、尤里，女孩如叶琳娜、尤里雅、尤娜等等，所以很多古巴父母就把Y拿过来替他们的子女造一个名。雅妮的父母也未能免俗。

雅妮这一代人经历了1989年以后苏东阵营的崩溃，在古巴经济极端困难的状况下长大，但对外部世界情况的了解渐渐超过了他们的长辈，90年代后他们在个性和思想上进入了成熟时期。雅妮给自己的博客起名“Y - 代”，正表明了这一代人的这种集体身份和集体意识。她在博客的自我介绍中也说希望这个博客为这一代人提供一个聚会的空间。

在古巴，私人现在可以开电子邮件账户，但不能在家中收发电邮，而必须到邮电局去，在那里的终端上才能打开自己的电邮账户。至于互联网服务更是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只有在一些政府机构的特定部门和极为有限的学术研究部门才能上网，流览极为有限的海外网站。一些供外国旅游者下榻的旅馆有网吧，但受到严格控制和过滤，而且收费贵得惊人，一个小时的上网费要相当于普通古巴人一个月或者至少是一两个星期的收入。

笔者2010年在哈瓦那住过十多天，只能在旅馆大厅上网，第一天就有两个深刻感受：在古巴上网，一要有钱，二要有耐心。那些有条件上网和在网上建立博客的古巴人中，多数是党政干部和有一定地位的知识分子，出于可以想见的原因，他们在网上发表的言论常常就像是领导人演说的翻版。或者，以他们的名义建立的博客本来就不是他们自己的。

雅妮刚开始登录自己博客的过程很像电影中描绘地下工作者或者间谍的情节。她常常装扮成外国旅客，混入向外国人开放的旅馆，然后进入收费网吧，插入随身带来的磁盘，把事先打好的文件通过电邮传送给自己在海外的朋友，由他们刊布到自己的博客上。

在个人电脑仍然是奢侈品，互联网的使用在技术和财力上受到重重限制的古巴，能够看到雅妮博客的人数非常有限，很多人也只能通过电子邮件得到其内容。但西方媒体对雅妮这样的“Y－代”是非常感兴趣的。雅妮的博客就是她请在国外的朋友注册的，她的博文的翻译和传播全赖海外朋友，一些西方报社的网站为她开设专栏，随时更新和翻译她的博文。



2013年5月30日，古巴哈瓦那，雅妮·桑切兹在3个多月的环球自助游后返回家乡，受到亲友们的欢迎。

与奥巴马线上交流

2008年美国《时代》周刊就评雅妮为当年100位风云人物之一。2009年美国新闻专业的翘楚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给她颁奖，表彰她对拉丁美洲（其实也就是古巴）的报道(其实也就是一些博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雅妮未能前往纽约领奖。但这番周折却使得她的“新闻价值”飙升，当选不久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拨冗和她通过博客进行了长篇交流。

美国总统和古巴公民的这个特殊交谈还是由前者开场的：

感谢你让我有机会和你以及你在古巴和全世界的读者来交流；祝贺你被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授予the Maria Moore Cabot Prize以表彰你对拉丁美洲的报道。你的报道加深了我们对美洲内部关系的了解。你完全配得上这个荣誉。对于你不能前来领奖，我感到很遗憾。

奥巴马说雅妮的博客“为世界了解古巴日常生活的现实提供了一扇珍贵的窗口”，充分说明“有勇气”的古巴公民已经利用互联网来争取表达的自由。奥巴马和雅妮的交流用问答的方式进行，雅妮提问，奥巴马作答。雅妮一共问了七个问题，全部集中于美古关系和美国国内古巴裔选民对美国的古巴政策的影响，基本不涉及敏感的古巴国内政治的内容。奥巴马对这些问题做了详尽的回答，完全是把这场对话看作是就任总统以后对古巴政策的一次重要表态。

自从劳尔·卡斯特罗取代他哥哥后，在实行经济改革的新政同时，对和西方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甚至异议人士总的态度比过去温和，虽然还时不时地发生一些拘捕和扣押事件，包括雅妮自己去年年底的短暂拘留，当时她准备旁听一场涉及一个异议分子的刑事审判。

在这个意义上，雅妮可以说是古巴新政的得益者，也是古巴对外渐渐开放的某种象征。到2012年为止，雅妮的海外旅行准许和护照申请（古巴直到去年对公民海外旅行还有一个先申请准许再申请护照的程序）被拒绝了19次，但去年她忽然得到了护照，前往西班牙参加一个拉美社会转型的会议。

（作者系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苏联、东欧曾仿制可口可乐



美国自由派主观和客观上帮助古巴各反对派武装斗争击败巴蒂斯塔政权后，卡斯特罗很快统一了各路组织，并选择倒向苏联阵营。卡斯特罗的抉择，为他从苏联和东欧换来源源不断的援助，直到冷战结束，失去外界输血的古巴陷入经济绝境中。

苏联曾对古巴人的一个要求颇为头疼，由于美国对古巴实行禁运，古巴要求苏联提供可口可乐。苏联可以制造出战斗机、核潜艇等高尖端设备，却在这种深受全世界欢迎的汽水面前一筹莫展。苏联只好委托捷克试制，捷克人尽了最大努力，但“捷克可乐”从来没成功过。

【“分”与“和”：中古关系向前看】

五十年前中古缘何分裂？

卡斯特罗发起系列行动，想要让中苏停止冷战，使国际共运大团结对付美国。但他不理解的是，在一定意义上，国际共运内部的冲突要比东西方之间的矛盾更难以调和。

文／程映虹

1964年10月18日，星期天，傍晚，中国驻古巴大使王幼平正准备离开办公室，使馆接待员忽然通知他说，卡斯特罗和一位古共中央书记已经从正门进入了大使馆。

王大使立即通知厨师准备晚餐，当他匆匆赶到会客室时，卡斯特罗已经在那儿了。他对王大使说：今天是星期天，我想吃顿中餐。

从1960年底中国和古巴建立外交关系到1964年底，卡斯特罗兄弟、格瓦拉和其他古巴领导人把中国大使馆当作了他们的特别餐馆，经常不请自来。本来哈瓦那的中国城有大量的好餐馆，但古巴革命后的国有化和食品的配给很快就让它们关门了。为了让这些客人吃到正宗的中餐，中方从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店和黑龙江饭店选派了两名厨师到哈瓦那。

这些饭局有时从傍晚延续到深夜甚至黎明。卡斯特罗在游击生涯中养成了昼伏夜出的习惯，他常常把这些饭局变成自己长篇大论的场合。但1964年10月那天他的造访有一个特别的背景:三天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被政变赶下台；两天前，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卡斯特罗首先向中国人祝贺，说中国有了原子弹，世界革命的力量更强大了。然后他说赫鲁晓夫下台了，他是中国和苏联不和的根源，现在他走了，中国和苏联没有理由再进行论战，而是应该和好，共同对付美国。他明确告诉中国大使:请把我的意见转告你们的领导人。

中苏1963年开始正式论战后，夹在中间的古巴日子很不好过。卡斯特罗既要苏联的援助，也要中国的大米，此外他还有世界革命的通盘打算。所以他抓住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爆炸原子弹这个天赐良机，向中国领导人昭示国际共运的大义。

卡斯特罗发起系列行动，想要让中苏停止冷战，使国际共运大团结

对付美国。但他不理解的是，在一定意义上，国际共运内部的冲突要比东西方之间的矛盾更难以调和。他的努力不但没有收到任何成效，反而加快了这个阵营的分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北京和哈瓦那的公开分裂和格瓦拉的被逼出走。



1964年，北京民众与士兵聚集在体育场表示对古巴的支持。

毛泽东面斥拉美共产党代表团

中国领导人接到了古巴使馆发来的消息，但却没有回应。一个月后，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召集了拉美共产党领导人会议，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一是要求国际共产党阵营立即停止论战，二是谴责拉美共产党阵营内的任何派别活动，不管这种活动打的是什么旗号。这两条中，第一条明显说的是中苏论战，第二条是针对中国在拉美共产党和左派阵营内寻找自己的同情者和扩展自己的影响。

开了这个会后，卡斯特罗马上组织了一个由九个拉美共产党组成的代表团，由古共书记罗德里格兹带领，前往莫斯科和北京做说客。1964年12月间，在北京，代表团见到了毛泽东。当时，中国方面没有公布这

次会见。根据近年来有限披露的材料，代表团在中国空手而归，罗德里格兹非常沮丧。但一个源于与会的委内瑞拉共产党代表的信息，披露了代表团和毛泽东会面时双方言语冲突的情况。

会面中，毛泽东对古巴党的立场非常不满。他说古巴党害怕帝国主义和核武器这两个妖魔，它对这两个妖魔的恐惧导致了它对第三个妖魔的妥协，这第三个妖魔就是苏联修正主义。毛泽东这里明显指的是古巴导弹危机。当时乌拉圭共产党代表试图打断毛的话，毛震怒了，说："我代表六亿五千万人讲话，你才代表多少？"

拉美共产党代表团秘访中国失败后不久，1965年2月2日到9日，格瓦拉突然访问中国。当时格瓦拉正在北非访问，同时出席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亚非国家经济会议，他是应卡斯特罗的要求中断访问飞赴北京的，同时前来北京的还有从哈瓦那赶来的古共的两个政治局委员。格瓦拉的这次访问，是卡斯特罗在中苏之间做说客的最后一次努力。

卡斯特罗选择格瓦拉，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欣赏格瓦拉。但对于格瓦拉本人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6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论战中，格瓦拉站在中国一边，认为中国的公社制度和强调革命精神代表了共产主义，而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他甚至把苏联变修的根子挖到了列宁，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在他刚刚参加的亚非经济会议上，他说苏联向亚非拉国家提供援助时还要附上账单，这和资本主义没有区别。

古巴经济在革命两年后就严重下降，党内受苏联经济改革的影响，当时也有一场经济问题的论战，围绕着是否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调节、企业自主权和按劳分配这些问题。格瓦拉是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极左派的代表，他主张用义务劳动和社会军事化来维护革命的纯洁性。

格瓦拉1960年11月时曾经访问过中国，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那次访问对于古巴来说非常成功，正在承受严重经济困难的中方，除了答应每年用大米交换起码五十万吨古巴糖，还允诺在五年内向古巴提供六千万美元的长期无息贷款。周恩来后来对古巴方面说这笔贷款到期如果还不出可以推迟再推迟。格瓦拉在古巴一再称赞这种慷慨，说这等于是不要还，这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但1965年2月格瓦拉对中国的访问却是在阴影下度过的。要他说服中国和苏联和好，这本来就是违背他的意志的，他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中方也清楚他的任务，所以这次他没有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见了他。历史的吊诡是：两年后，当他因发动拉美革命而兵败被俘死

于玻利维亚时，刘和邓在中国已经被当作是走资派甚至中国的赫鲁晓夫被打倒了。据参加接待的中联部干部回忆，格瓦拉那次在华期间面容始终严肃，拒绝了中方安排的外出参观，好像就是在等访问走过场。



1960年代中古交好时期，切·格瓦拉（左三）与劳尔·卡斯特罗（左二）在古巴中国大使馆内。

格瓦拉出走前会见中国大使

格瓦拉那次访华和他使命的失败，与他一个多月后从古巴政治中消失有直接联系。他的亲华反苏立场早已让他成了苏联和古巴关系中的绊脚石，这一点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那两个从哈瓦那飞往北京的古共政治局委员其实是去监视他和中国人的会谈的。格瓦拉在中国待了7天，也是为了等待去北越访问，原来已经安排好了，但胡志明突然前往北越使馆，以安全原因为借口取消了他的访问。这也表现了中苏分裂下国际共运对他这个敏感人物的两难态度。

卡斯特罗虽然想撮合中苏，但由于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远超中国，如果迫不得已只能在中苏之间选一家，那只能选苏联。为了避免这样的摊牌，他做出了很大努力。当中方不但不领情，反而对这样的撮合毫不理睬时，他那自封的拉美革命领导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同时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增大了，尤其在格瓦拉问题上，苏联不能容忍古巴一方面接受大量援助和军事保护，同时却放任自己的领导人如此公开批判苏联。此外，古巴党内在中苏分裂问题上的争论也使得他下最后的决心。



1995年12月1日，北京，古巴总统老卡斯特罗参观长城。

出使中国的任务失败后，格瓦拉回到哈瓦那，低调地过了一个多月，然后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他的名字重现世界报端，是两年多以后在玻利维亚兵败被杀。格瓦拉的出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出走，

和古巴在中苏分裂中的处境又有什么关系？中国驻古巴大使王幼平的回忆可以提供一个重要参考。

王大使说，从1964年6月到1965年3月，他在各种场合下九次见到格瓦拉，最后一次是在1965年3月26日，那是格瓦拉以工业部长身份接见中国纺织代表团，王以大使身份陪同。格瓦拉只和代表团象征性地谈了很短时间，但却把中国大使留下来，在他办公室里作了长谈，这是有点出格的。王大使说，从种种迹象判断，格瓦拉当时在古巴领导层中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但他从来没有对中国外交官披露过任何内情。那次最后的会见中他只是夸奖中国文化和历史，只字不提政治。最后他告诉王大使自己很快就要到古巴东部地区去，可能会消失一阵。

多年后，王大使说他忽然明白那天格瓦拉其实是在自己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找了一个不会引起怀疑的机会和中国大使见面，以那种方式含蓄地向他和中国人告别。作为中国大使，自己成了格瓦拉接见的最后一个外国使节，这是格瓦拉的特意安排。

卡斯特罗和中国摊牌

就在格瓦拉和中国大使会面前十多天，3月13日，卡斯特罗在一个重要的历史纪念日的讲话中第一次批评中国，虽然并没有点中国的名。他说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充满了“拜占庭式的争论”（即无事生非、小题大做的论争），有人在古巴散布自己国家的宣传品，挑拨离间，鼓动分裂。他指的是中国在古巴向党政干部寄送中苏论战的宣传材料。他强调古巴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有自己的看法，不会接受外来的观点。苏联《真理报》很快就转载了卡斯特罗的讲话。不久，劳尔·卡斯特罗在公开讲话中反驳认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这明显指的是中国。

中古关系此后急转直下。9月15日，就在中国大使回国述职、想面陈中央领导寻求改善中古关系的时候，卡斯特罗和古巴总统多铁戈斯突然召见中国驻古代办。他们板着脸，把中方寄到古巴党政干部家中的宣传材料堆在桌子上。卡斯特罗说中国方面不顾古巴的三令五申，继续在古巴散布自己的观点，挑动古巴党内矛盾，这是比美帝国主义更为恶劣的行径。

卡斯特罗把中国和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这当然是中共方面无法接受的。但中方并没有把这场争论公开。毛泽东当时就中古关系有过这么三点指示：第一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意思是说苏联才是争论的对象，古巴还轮不上。第二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意思是尽量挽回。第三是古巴方面如果不公开争论，中方也保持沉默。

那年11月，中古开始了下一年的经贸会谈。大米一直是中方向古巴提供的主要物资，古巴向中方提出：出口25万吨大米。中方过去一直是有求必应，但这次说由于国内经济困难，这个数字难以保证。会谈在这个问题上卡了壳，谈了一个多月都没有进展。这就是中古关系史上的“大米事件”。

就在中古经贸谈判还在继续的时候，1966年1月2日，在古巴革命胜利纪念日的群众大会上，卡斯特罗公开点名批判中国。在展示了新近从苏联得到的坦克和战斗机后，他说古巴革命现在除了美帝和叛逃到迈阿密的古巴“蛆虫”以外，又有了一个新的敌人:中国用减少大米出口来讹诈古巴，加入了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封锁。2月6日，卡斯特罗在另一个群众大会上详细介绍了中国在古巴散发宣传材料和接触党政干部的情况，说中国干涉古巴内政，挑动党内矛盾。

对于卡斯特罗的公开批判，中国方面先是由外贸部发言人作了回应，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中方说自己虽然一直尽量保证满足古巴的需求，但从来没有同意按照古巴方面的要求供应大米，古巴的经济困难怪不到中国头上。相反，中国方面早就向古巴建议实行粮食自给自足，但古巴不听，要按照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分工”去干，用蔗糖换大米，至今不能摆脱殖民地时期造成的单一经济的格局。至于中国方面在古巴散发宣传材料，《人民日报》说，古巴领导人为什么对自己的人民如此缺乏信心呢？

3月13日，在另一次群众大会上，卡斯特罗说中国用削减大米出口向古巴发动了“经济侵略”，要是中国大使馆再在古巴散发材料，“我们就要让他们尝尝我们给美国人尝过的滋味。”他甚至就中国当时盛行的把毛泽东比作红太阳的个人崇拜嘲笑说：“那个人应该去读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是太阳，时间长了也是会熄灭的！”

对卡斯特罗的这次演说，中国方面没有再理会。中古关系从那以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对立和冷淡，一直到90年代初，由于苏联阵营的瓦解，卡斯特罗要寻找新的国际支持者才恢复。

古巴“红色经典”登陆大陆

记者 / 陈祥



对于大陆读者来说，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古巴并不陌生，尤其是古巴共产党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被大陆官方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于上世纪50年代领导古巴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带领古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蒙卡达审判”，是他人生的一个“亮点”。在古巴的国家宣传体系里，这是展现革命家们以法庭作为战场，来挑战巴蒂斯塔政府的英勇故事。因此，由古巴著名女作家玛尔塔·罗哈斯完成的《蒙卡达审判》，自从1960年在新政权时代第一次出版后，便成为古巴的“红色经典”。此后经不断修改，它先后在古巴出版了7个版本。

1952年，古巴前总统、参议员、掌控军队者巴蒂斯塔，通过政变再次上台。他宣布解散议会，废除1940年以来的宪法，对政党政治和街头运动加强控制。古巴民众对这场政变并不在意，因为巴蒂斯塔在曾经的总统任期内有不错的政绩，被他推翻的文官政府则腐败低效。

但作为当时在野党积极活动家的卡斯特罗，认定是巴蒂斯塔的政变粉碎了他的议会道路设想，便改用暴力手段。1953年7月24日，卡斯特罗在老家奥利安特省省府圣地亚哥发动了起义，目标是占领蒙卡塔兵营并抢夺军火库。200余人的起义军只装备以手枪为主的轻武器，他们面对的是1400名正规军，所以只能寄希望于神速顺利的偷袭。但战斗以失败而告终。卡斯特罗方面战死8人，军方死亡13人。

随后，卡斯特罗的队伍分散隐蔽。军队对其进行大搜捕，在山里抓到了卡斯特罗。幸运的是，抓捕卡斯特罗的领队军官是革命的同情者，他将卡斯特罗送到了警察局，而非兵营。这一选择极度重要，绝大多数的义军俘虏被恼羞成怒的军队以私刑处决。

9月21日，古巴政府在圣地亚哥对卡斯特罗进行庭审，国内外的记者挤满了法庭，这反而成为卡斯特罗表现的最佳机会。卡斯特罗拒绝了律师，他获准为自己辩护。当时，卡斯特罗已经成为美国媒体界的宠儿，大家视他为民主、自由的化身，给予丰厚的赞誉。毫无疑问，本就魅力四射的卡斯特罗，在法庭上悲壮、自豪地做出一番陈述以表心中大志，自然成为新闻报道的好素材。

卡斯特罗被判处15年徒刑，不过狱中的物质待遇很不错，他可以持续抽到雪茄，牢房里有厨房设备。更重要的是，他的读书不受限制，囚犯之间可以交往甚至成立了学习小组。最终，他在被关押一年多后，就遇巴蒂斯塔在总统大选后进行的特赦而获释。由此可见，巴蒂斯塔时期的古巴司法系统，尚属完善和独立。

本书作者罗哈斯，最初与《波西米亚》的摄影记者合作报道蒙卡达事件。《波西米亚》杂志社决定采用蒙卡达事件的照片，以推出重磅报道，不过杂志社会面临风险。杂志社老板克韦多找了陆军司令塔韦尼利亚，塔韦尼利亚的儿子是巴蒂斯塔的助手。克韦多辗转表达了要求，他一定会刊登这些照片，如果政府敢关闭他的杂志，他就跑美国去控诉自己遭到政治迫害。最后，杂志如愿刊登照片，图说则由罗哈斯完成，只有一张照片被新闻审查官扣押。

罗哈斯相安无事，她还因此得以为《波西米亚》工作。审判开始后，她参与了法庭旁听并将每天审判记录整理出来，此后她做了大量采访，最后成书。

与大陆的“红色经典”类似，卡斯特罗的辩护词《历史将宣布我无罪》，日后经修改出版，成为党的重要文献，攻打兵营事件随之成为古巴革命最重要的图腾。1959年后的每年7月24日，古巴政府会组织几十

万人的庆典活动，卡斯特罗往往会发表长达五六个小时的讲话。而玛尔塔·罗哈斯，则享受到了应有的殊荣，她于2014年4月来到北京举办新书（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版此书）发布会，古巴大使白诗德出席此会，这是其他作家难以比肩的待遇。

对于大陆读者来说，阅读来自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红色经典”可能会有颇多共通之处；从卡斯特罗身上也能看到红色革命领导人的共性。此外，《蒙卡达审判》或许也能给我们打开一个在国际视野中审视社会主义革命的窗口。

投资古巴？中国企业仍在观望

在诸多中国商人看来，新的投资法向外商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但这些优惠政策能不能落实，不可控。从纸面上到真正执行还有一段距离。

记者/ 吴如加（发自哈瓦那）

当地时间2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社交网站上宣布，他将于3月21日至22日访问古巴。此举将使其成为88年以来首次访问古巴的美国总统。上一位访问古巴的美国总统是柯立芝，那是在1928年。

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成功后不久，古巴政府将美国公民在古巴的产业收归国有，美国随即宣布对古巴实施禁运，这一政策延续至今。在1992年和1996年，美国分别通过《托里切利法修正案》和《赫尔姆斯-伯顿法》，进一步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制裁。

对于大多数古巴人而言，相比于邻国领导人的短暂来访，他们更期待美古关系的“解冻”能够为古巴吸引更多外国投资。如今哈瓦那的西郊，已经设立了许多合资企业以及外国公司的代表处。相比起城区，这里的道路更加平整，房屋也修葺较新，甚至出现了超级市场。虽然许多货架仍然空置，但在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古巴，已属罕见。

能够进入外企在古巴的代表处或合资企业工作，是许多古巴年轻人的梦想。一位经理级别的外企雇员月收入能达到800美元，这在平均工资不到50美元的古巴，无疑诱惑巨大。

一位在哈瓦那工作的年轻人说，“古巴不是一个生产型国家，工资很低，东西却很贵。像电视、电冰箱哪怕衣服，和我们的工资很不匹配。”他指着身上的阿迪达斯外套说，“这件衣服要6个月的工资才能买到。”

“是时候去古巴投资了！”近一年来，类似的国际舆论不断涌现——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投资者正将目光投向古巴这个加勒比海岛国，希望赶在他们的美国对手之前拿到协议。

中国在其中的存在也极为微妙。在美国媒体Quartz看来，对古巴来说，中国是古美关系“融冰”后抗衡美国的保障；对中国来说，与古巴搞好关系有助于其在美国主导的贸易区占据一席之地。2014年，中国和几

个拉丁美洲国家在哈瓦那成立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被认为是美国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的另一个版本。

然而，对于投资古巴，许多了解行情的中国商人却没有这般欣喜，仍抱着谨慎态度。



从纸面到现实尚有距离

“曾有古巴人问我，为什么你们公司不来古巴投资，我说，哪一天77号法令真的能改，真正对投资者有利，我们公司会第一个到。”在中国一家进出口公司供职的外贸商人刘文华如此表示。

如今，他正在一家中国进出口公司供职，由于该公司从事对古巴贸易较早，几乎每个古巴家庭中都能看到该公司的出口产品。“不管是在古巴最好的时候，还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公司从来没有离开过。”尽管在对古贸易方面颇有建树，但是该公司却始终不愿涉足在古巴的投资。

刘文华口中的77号法令，是古巴于1995年颁布的第一部《外国投资法》。苏联解体之后，经济上对苏联存在长期依赖的古巴顿时陷入困境，为了挽救国内经济，引进外资就成了古巴政府在这一特殊时期的重要生存手段。77号法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

2014年3月29日，古巴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举行特别会议，一致通过了新的《外国投资法》，取代存续近20年的77号法令。但刘文华说，“新投资法真的能够落实吗？我们还要观察。”

新的《外国投资法》承诺将外国资本的利润税率从之前的30%减至15%，还许诺如外资与古巴企业建立合资公司，将享受8年免税。8年免税期满后，如合资公司将之前所赚取的利润用于在古巴再投资，可继续享受免税政策。

即便如此，态度与刘文华类似的中国商人和企业仍不在少数。在他们的记忆中，1995年出台的77号法令中，也曾给予外资诸多许诺，但在实际操作中，纸面上的法律往往要打些折扣。

根据77号法令，除了国防、卫生保健和教育外，古巴所有经济部门都向外国资本开放；外国投资者可采用合资企业、国际经济联合体及外国独资公司的形式在古投资；外国独资企业也可购买房地产和在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投资。但在实际操作中，古巴政府往往通过产业政策，对一些领域的投资进行限制。

根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006年出台的《古巴投资与经贸风险分析报告》，古巴的产业政策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政府鼓励的投资行业，包括旅游宾馆、石油勘探与开采、矿业勘探与开采、基础工业、渔业及产品全部出口的项目；二是政府限制的投资行业，主要是批发零售、餐饮娱乐、交通运输、外贸等服务性行业及银行保险等金融业务；三是政府实行部分限制的行业，主要是指以国内市场为主，但系替代进口的项目。

在77号法令中，虽然允许外国投资者成立独资公司，但对独资公司的审批却十分苛刻，必须取得该行业最高领导机构的认可同意，只有关系到古巴特殊经济利益才可能获此批准。目前得到批准设立的独资公司数量极少，其中并没有中国企业。

在合资公司方面，古巴一般以土地使用权、建筑物、现有设备和基础设施入股，而土地上的建筑物与土地使用权价值要由古巴政府批准的专业评估公司评估。在股权上，古巴方面通常坚持要求控股地位，这方面的谈判也异常艰难。

总部位于新疆的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下称“新天集团”）早在1996年便在古巴投资水稻试验农场。早在设立合资公司时，其与古巴方面经历了长达半年的艰苦谈判。当时新天集团要求占51%的股权，古巴方面坚定反对，双方僵持不下。直到时任中国对外贸易合作部部长的吴仪副总理出访古巴，在国家高层的斡旋之下，最终达成协议：双方各占50%股份，管理权归新天集团所有。

77号法令还规定了对投资者的各种保障，诸如外国投资者可随时出

售或转让其全部投资，并可向国外自由汇出利润和资本。但在执行中，同样出现了折扣。一位熟悉古巴情况的新天集团员工透露：“一些中国企业在古巴经营获得利润后，却很难将利润返回到国内。我知道有的企业都清算两年了，之前形成的利润还没能拿回来。”

仅仅出台一部新的法令，并不能打消潜在投资者的疑虑。“就文本而言，新的法令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刘文华说，“但这些优惠政策能不能落实，不可控。从纸面上到真正执行还有一段距离。”

不稳定的投资政策

而在这段距离的背后，也体现了中古之间思维方式的鸿沟。

对古巴而言，这是一场艰难的抉择。社会主义古巴对待外资的态度颇为犹疑，既希望外资能为疲惫的古巴经济注入新动力，又担心外资进入之后难以控制，造成贫富分化，甚至对古巴的经济独立造成威胁。因此，颁布77号法令引进外资后，古巴曾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管制措施以期加强对外资企业的控制，如古巴政府部门坚持保留制定合资企业雇员工资发放标准的权力。

新法的“救急”色彩，令潜在投资者对政策的延续性感到担忧。长年从事与古巴贸易的商人卢建明坦承：“在目前体制下，我不是特别看好（在古巴投资），投资的机会肯定是有的，但政策会不会变，我还是看不透。不管法律怎么写的，当年老卡（菲德尔·卡斯特罗）说不行，谁也不敢说什么。”

这种担忧有部分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古巴政府曾在2000年突然限制外商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又在2008年为解决流动性问题决定冻结一些投资商的账户。

和77号法令一样，新《外国投资法》同样是在古巴经济困难的背景下出台。2010-2013年，古巴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2%-3%之间徘徊，2014年更是低至1.3%，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较为低迷。

因此，古巴经济与计划部部长马里诺·穆里略认为，古巴需要引进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才能推进现行社会经济模式，实现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显然，1995年颁布的77号法令，因为对投资方的限制较多、税率较高，对外资已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新法并不讳言其救古巴经济之急的目的，法案的序言部分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国家在取得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挑战，可以通过外商投

资，获得外部融资、技术和新市场，以及将古巴的产品和服务置于国际价值链上，并对国内工业产生其他积极效果，以此方式对国家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对外商而言，可预期的利润回报是投资的主要驱动力，但古方对此显然缺乏热情。“对于外资，（古巴）特别希望你来，但特别不希望你把在这里赚的钱拿走。古巴是这样一种心态，”卢建明说，“中国企业投资是为了收益，古巴让你投资更多是为了其社会效益，为了就业，为了增产。”

刘文华对此有类似感受，他回忆起一名古方国营企业高管曾对他开玩笑说：“三年以后，我们学会了，你们就可以走了。”

“屡战屡败！”刘文华在描述中企在古巴的投资现状时如此表示。据他透露，中方在古巴的合资企业，时常在分红时面临窘境。“（双方）成立一个合资公司，古方跟中方学习经验，双方共同管理，但到了该分红的时候不分红，”刘文华说，“如果这个框框跳不出来，思路不转变的话，法律写得再漂亮都没有用。”

“古巴商机不少，真正运作起来确实有些麻烦。”一位参与古巴项目的新天集团工作人员告诉《凤凰周刊》。商人卢建明亦坦承：“在古巴投资建立生产型企业的话，肯定会比较麻烦。跟我们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一样，有很多税务、劳务方面的麻烦。”

投资环境尚不理想

除了难以预料的政策变化，古巴的投资环境也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

在卢建明看来，古巴投资环境的主要问题归为四点——没有工业基础、没有加工能力、没有原材料供应、本国又没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计划经济之下，古巴国内缺乏配套产业，也并未孕育出成熟的市场。卢建明说，在古巴投资，很多东西都需要进口。进口后在当地组装加工的话，成本很高。同时，古巴国内重生产、轻销售，“他们认为生产可以增加社会财富，但销售、流通环节没有对社会创造价值”。加之古巴人口较少，国内市场狭小，当地民众消费能力不高，在古投资的企业甚至不能自由销售自己的产品，只能通过古巴官方提供的渠道销售。

“古巴工人不好管。”这种印象同样普遍存在于中方投资者中。由于古巴奉行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管理方式落后，当地雇员的工作效率低

下。新疆青年杂志社下的《新晨》月刊曾报道新天集团开拓古巴过程中的一些轶事。在古巴投资水稻项目时，新天的中方人员发现："我们计划一天播20公顷，实际上一天下来才播4到5公顷。机械手也是将一天可以干完的活拖三四天完成。"

在古巴人的观念之中，鲜有"开除"这一概念。新天曾经试图开除一位临时工，但工人无法理解，于是层层上告，最终在古巴政府部门的协调之下，这位工人才被调往其他农场工作。

商务部研究院拉美贸易专家安宝钧亦在《古巴投资环境与中巴经济合作分析》（2012年）一文中提到，合资企业雇员的招聘和解除劳务合同均由作为中间媒介的古巴金融机构负责，外资企业无法参与管理。这些中介机构往往夸大雇员们的重要性，以便为其获得更多的工资报酬。

根据合同规定，合资企业用美元向中介机构支付雇员们的工资，而中介机构转而向雇员们支付古巴比索。此外，合同还不允许合资企业分配雇员们做他们指定职责以外的工作。

有鉴于此，安宝钧在文中给出的结论是，古巴目前的社会环境尚未适应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方法。

在实际操作中，当一家外国企业物色到合格的古巴雇员时，必须先将雇员的名字提交给外企服务局，由外企服务局做背景审查，决定是否批准其到外企工作。雇主只能提名，而由外企服务局做最后拍板。一部分人会被否决，但否决原因不明。据称，一般不允许夫妻两人都在外企工作。同时，外企服务局也有自己的外企人才库，外资企业也可以请求他们推荐人选。

周锐是一家从事中古贸易的外贸公司负责人，他的公司在古巴设有代表处。和其他外资企业一样，他只能通过古巴政府的外企服务局才能招募古巴雇员。周锐向《凤凰周刊》透露，名义上，古巴雇员的工资通过外企服务局发放。"譬如一位经理级别的雇员，雇主需向外企服务局支付800CUC，但外企服务局支付给古巴雇员时，可能只有800比索。"CUC全称为"可兑换比索"，相当于古巴的外汇券，1CUC可以兑换1美元，却可以兑换24比索。

因此，实际操作中，外资公司会额外给古巴雇员发一份CUC工资。有些雇员是按销售额提成，有些雇员则是拿固定工资。周锐雇佣的古巴籍经理每月工资超过1000CUC，此外，还配了车和手机。对于外国企业来说，这等于支付了双倍工资。"如果严格按照法律，算是非法，但所有外企都这么做，古巴政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周锐说。

种种不利因素，导致古巴在吸引外资的道路上走得并不顺畅。如今距1995年古巴开放外商投资过去20年，但古巴的外国投资却不断下降。目前古巴吸收的外国投资约5亿美元，而在其邻国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这一数字分别为160亿美元和170亿美元。据法国《欧洲时报》报道，目前古巴每年需要20亿-25亿美元的外国投资。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古巴直接投资存量仅为6898万美元，远低于中国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圭亚那、厄瓜多尔等国的投资规模，仅占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及对拉美地区投资存量的0.02%和0.13%。

不过，在古美关系“解冻”的大背景下，前述新天集团工作人员对于古巴的投资前景表示乐观。“如果以后美国取消了对古巴的制裁，古巴的国际经济环境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开放是指日可待的事。”目前，新天集团在古巴的投资项目略有盈利，由于打算继续投资，新天集团还无需面对将利润汇回国内时的种种麻烦。

“古巴是我的第二故乡，大学毕业后，我最好的年华全在古巴度过。所以，不管将来做不做古巴的生意，我都希望它好，”刘文华感慨道，“如果有一天古巴真的能够按照新投资法去执行的话，还是有前景的。但（古巴）对待外国投资者的心态真的需要转变。如果不让外国投资者挣到钱，他们只会来一次走一次。”（应受访者要求，刘文华、卢建明、周锐均为化名）

【从历史中走来：古巴的前世与今生】

古巴：废墟曾经辉煌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古巴似乎是一面穿越时空的镜子，能照见曾经的中国。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张翎曾三次前往古巴，去怀旧，去寻找革命扫荡过的瓦砾，以及渐行渐远的理想。但古巴却并不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缩影般那么简单，它有自身的气质和故事……

撰文/张翎

2010年到2015年间，我去过三趟古巴。面对朋友们的好奇，我一成不变的解释是性价比：用七八百加元的代价，逃离北国的寒冬，享受一整个星期食宿全包的阳光海滩，的确是一桩钱包和身体都感觉舒适的交易。

只是还有一个原因我一直没敢说，怕说了显得矫情。我其实是怀旧去的。我的怀旧，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个旧，那时我刚出生。也不是60年代的那个旧，那个时代让人心惊，我不想去触碰。我怀的那个旧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么短短的三五年。那个三五年里，包围所有人的那道铜墙铁壁裂开了细细一条缝，趴在那条缝里看世界，是一种放大变形了的新奇。那个年代里的我，还有我身边的许多人，都对未来怀抱着一些朦胧的憧憬和希望，你甚至可以把它称之为理想（说到这个词我忍不住羞赧难堪）——尽管后来我很快知道那些玩意儿都是年轻和无知的伴生物。

那几年的时光瞬间即逝，成为了我记忆中永恒的亮点。古巴兴许是如今世界上残存的唯一和那个年代略具相似之处的地方，于是我就一次又一次地走向那里，反复经历着探险，寻求惊讶和失望。对于古巴来说，我至今还处于出发了却尚未真正抵达的状态——我一直还在路上。



鳞次栉比的古老建筑，构成了怀旧的古巴。热情的舞者、缓缓驶过的老爷车，是划过这城市的一抹亮色。

土地：被红与黑同时遗忘的灰色角落

古巴人形容自己国土的形状时，最经常使用的一个意象是鳄鱼。的确，古巴从地图上看像是一条头朝下浮游在佛罗里达海峡、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之间的鳄鱼。这三片水域给予了古巴绵长的海岸线和源源不断的旅游资源——这在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断粮岁月里救了卡斯特罗一命。

这条叫古巴的鳄鱼，在躺着不动的时候就已经得罪了人：它的尾巴几乎扫到了一片打个喷嚏地球就要颤抖一下的国土，这片国土的名字叫美利坚合众国。古巴离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Key West)最近处只有150公里。150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假若你把水域想象成陆地，那是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假若你把想象力如橡皮筋那样地扯开，就能想到一个体力中上乘的汉子骑自行车早上从古巴出发，马不停蹄，天黑就可以抵达佛罗里达。

150公里是个有点小意思的数字，没到这个数字时人还太癫狂，过了这个数字人或许就过于理智，而只有正好在这个数字上时，人才能有些癫狂而又不至于完全丧失理智。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块状似鳄鱼的土地上的人总想驾着各样的船只，冲击一下150公里这条线，因为他们知道过线的机会是一半对一半。我在古巴的三次旅行中很少尝到海鲜，除了在专门对外国人开放的高级餐厅里，后来才知晓，这也是那150公里惹下的麻烦——卡斯特罗政府对出海的渔船控制极严。

我第一次逗留的那个地方叫巴拉德罗（Varadero），它是“鳄鱼”脊柱尾端向海洋延伸出去的一个细长半岛，最宽之处也只有1.2公里。从下榻的宾馆往前走，过一两条街就是海；往后走，过一两条街也是海，我们居住在一个被两片水域夹住的大约两三百米宽的狭窄陆地上。那一个星期里，天一直在耍着小性子，北国的风雪刚刚被我甩在了身后，可是南国的艳阳也并未向我招手。在12℃的风里行走时，身上的夹克衫瞬间感觉薄如蝉翼。风是从两个方向交错而来的，仿佛两边的水域在轮着番叫阵。那时印尼海啸的印象依旧鲜活，任何一丝可疑的声响都会让我生出莫名的惊悚，总觉得这块两三百米宽的陆地还不够海啸轻轻舔上一口。

我们抵达巴拉德罗是在夜里，第二天便是元旦了，我们在古巴睡过了一年。早晨走出门来，吧台的帅小伙们已经在调鸡尾酒了，工作人员正在挂满彩饰的舞台上调试麦克风。昨夜的狂欢尚未睡下，今天的狂欢已经起床，可是我对狂欢兴趣索然。我可以在别的地方轻轻松松地找到比这里更好的酒，更精彩炫亮的歌舞，甚至更细软、洁净的沙滩，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寻找奢侈——奢侈早已移居他乡。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些别的地方所没有的东西，比如说革命的飓风扫过之后的瓦砾；再比如说我的故国在这里留下的痕迹。毕竟，我是听着《美丽的哈瓦那》的音乐长大的，我也是哈瓦那的孩子。

其实在下飞机的第一眼里，我们就已经看见了中国的印记。在机场和涉外宾馆之间穿梭行走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宇通大巴，连门楣上的安全提示都是未经翻译的中文。巴拉德罗的街面上找不到红绿灯。他们用不着，因为街上几乎没有小汽车。偶尔开过一两辆，也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老爷车——那是几十年里西方禁运的直接后果。后来在哈瓦那我们终于看到了车水马龙的场景，却依旧是同样的老爷车，只是颜色漆得光怪陆离。看见宇通巨人般地在缺乏同伴的巴拉德罗街头横冲直撞，不知怎的，我感觉有些扎眼。

我们在宾馆餐厅的厨子眼里，也依稀看到了中国。那是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脸上泛着一层与阳光和炉火相关的红油。据说旅游业是古巴人梦寐以求的高收入行业，我不知道在聘用的过程里是否有“政审”一说，只是我没有在这个女人的脸上找到任何类似于优越感的表情。我用英文问候她，她用西班牙语回应我。即使是涉外宾馆，工作人员也几乎不讲英文。我总觉得这与教育水准无关，这里牵涉的其实是姿态和立场。“Chinos？”她问我们。怕我们听不懂，她又用油腻腻的双手将眼角往上扯了一扯。这是欧美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在他们看来我们个个都是吊眼。这个手势在美国和加拿大会立即被解读成种族歧视，而

在这个女人眼中，我看到的只是善意。我掏出一块硬币塞到她的手里，她收了，并无扭捏之态。女人的手很粗糙，我猜想一天中最耗费她心神的事，大概是怎么把那点少得可怜的肉，做出看上去比实际重量多的菜肴。



古巴街头的堆沙标语："要古巴"，下句是"不要美国佬"。摄影张翎

天还早，街上的人群却已经开始聚集，房屋之间的空地上站着一些喝啤酒弹吉他唱歌的人。孩子们跑来跑去，每一个路口都能发现几条铺开四肢酣睡的狗——它们从未经历过汽车的惊吓。今天是难得的假日。我心想。可是我错了。第二天，第三天，还有以后的每一天，他们几乎天天如此。他们似乎永远不用上班，可以喝着啤酒把一首歌唱到地老天荒。上帝在创造拉丁族裔的时候，兴许在他们的血液中掺进了兴奋剂，这个民族的快乐从来不需要理由。

再走过一条街，我们发现了一家酒吧，门口有个小乐队在唱歌，是典型的加勒比旋风。看见我们走过，乐手好奇地停下手里的沙球——中国人应该不是巴拉德罗街面上的熟面孔。同行的朋友中有一位是接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无法抵御音乐的呼唤，就率先走进了酒吧。话说不通，我们只能傻笑着，各喝各的酒。

突然有人把我们推到了麦克风跟前，我们毫无准备地进入了小合唱的匆匆排练。我们抛出去的第一首歌是《美丽的哈瓦那》。我们唱得很嗨，他们却只是礼貌地微笑着，神情茫然。过了一会儿我们终于意识

到：这首歌是土生土长的国货，没吸吮过加勒比的营养。于是我们又抛出了一首《鸽子》——那是地道的古巴民歌。“当我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可是我们并未在他们脸上呼唤出任何悲伤，他们的表情依旧是一片礼貌的茫然。就在我们准备彻底放弃用歌探路的企图时，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假若这首歌依旧没有得到回应，我已决定给旅行社打电话，求证一下他们带我们来的那个国家是否真是古巴。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我们怯怯地唱出了第一句，很快就有了和声，先是一个，后来是一群，再后来是全体。中文和西班牙文的歌词在按自己的节奏行进，只有唱到副歌时，在那个“英特耐雄纳尔”的节拍上，我们严丝合缝地踩上了彼此的点。人群开始走近，我们围成了一个圆圈，圈子越来越紧，我们开始握手拥抱。对面的一个男人高举着酒瓶，对我们喊了一句话。这是我们抵达古巴以来听到的第一句英文：

“Brother!”他说。

我有些疑惑。在这个每一个有子女录取在哈佛的中国母亲都要写一本育儿心得，每一家略有门脸的中国饭店都在卖百威啤酒的时代里，我们，中国和古巴，还是弟兄吗？

还有，在过去，我们曾经真是弟兄吗？

这个疑问是在后来的一次哈瓦那之旅中凸显出来的，那次我们走进了古巴革命纪念馆。纪念馆气势雄伟，有好几个楼层，里边陈设除了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使用过的旧物，还有大量的历史照片。我在照片里找到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苏维埃农场的康拜因，我甚至发现了胡志明和他的战友们。可是我没有找到毛泽东。我不仅没有找到毛泽东，我甚至没有找到中国的纺织女工或者是在水田里栖息的牛。我身上那点残存的“哈瓦那孩子”的血开始在太阳穴上涌动，我和那位音乐家朋友冲进了纪念馆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坐着三四个工作人员，面对我们所有的“为什么”，他们的回答始终一致：“No English”（“不会说英文”）。他们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和语气都十分平静，我们绝无可能在这堵以不变应万变的铁壁上砸出一丝裂缝。正打算撤退，那位音乐家朋友突然抛出了一个新招：用歌声敲门。我们在古巴的经历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一个真理：语言走不通的路，歌声兴许能。


特立尼达种植园的小火车道上，一位古巴人推着自行车走过。

这一次，他唱的歌我完全陌生。

我们朝着一个理想进军

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为了和平为了繁荣也为了自由

我们一起斗争……

后来他告诉我，这首歌的名字叫《7.26颂歌》。7月26日是古巴革命纪念日。他比我年长几岁，多学过几首歌。

办公室的人都愣住了。他们大概从未听过一个外国人用一种他们完全不熟悉的语言，如此准确而富有激情地演绎完了这样一首属于他们的年代歌曲，直至最后一个节拍。四周一片寂静，只剩下他的声音在大楼的砖缝里钻来钻去，擦出嘤嘤嗡嗡的回声。

歌很长，他唱完了，很久很久，墙壁都还在震颤。

四周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这才发觉门外的走廊和大厅里，到处围满了人。

“我们这么大的时候，就支持古巴……”我的歌唱家朋友指了指膝盖的位置，语无伦次地说，英文被激动撕扯成一床烂棉絮。“可是你们，怎么，怎么可以……”

一位中年妇女从办公桌前站起来，紧紧拥抱我们的歌手。

“我们一定跟馆长转达你的意见”，她说。

她忘了，十分钟前她还不会说英文。

回到车上，我们依旧还没有平静下来，我们开始热烈地讨论起古巴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我们质疑一切是否真有必要——独立之必要，革命之必要，坚持之必要，或者说，妥协之必要。

其实这场争论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它只不过是四年前另一场争论的延续而已。

那次我们去的地方叫圣卢西亚（Santa　Lucia),在“鳄鱼”的上腹部。我们跟着旅游车去附近的卡马圭古城（Camaguey）游览，沿途的景致相对单一，都是些一马平川的绿色农田和偶尔出现的旧农舍。“不要被那些绿油油的颜色忽悠”，导游告诉我们：“那都是毒草。只要地里长着这种植物，其他作物就别想存活。它们蔓延的速度极快，而且不能根除。唯一摆脱它们的方法就是烧荒，要连续烧上三季，之后才可以种植一些生长力旺盛的植物。”

“这里曾经是肥沃的甘蔗林”，导游说:“这里出产的蔗糖，曾经源源不断地送到莫斯科、布达佩斯、布拉格等地，换来石油粮米和日用品。随着东欧的解体，大部分的糖厂关闭，蔗林便沦为荒芜之地。”


在哈瓦那大教堂广场，一位流浪艺人正拿着大提琴走过。

我的心抽得很紧。我心疼，却不完全是为古巴。在这个自然资源如此稀缺的世界上，竟然有千万顷田园如此荒芜着，等待着一把烧山的烈火。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带着这把火进来的，会是美国的百强企业？中国的煤老板？抑或是阿拉伯的石油大亨？

古巴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曾几时，那条“鳄鱼”还是一块被西班牙、英国、美国同时垂涎的肥肉？曾几时，作为美洲第三大都市的哈瓦那，带给过世界怎样纸醉金迷的夜生活？

假如1492年哥伦布未曾发现这条横卧在加勒比海的“鳄鱼”，今天的古巴该会如何？假如1763年英国不曾把短暂获取的古巴主权归还给西班牙，今天的古巴将会如何？假如1896年美国成功地从西班牙手里购买了古巴，今天的古巴又会如何？古巴可以隶属西班牙，可是它不肯。古巴可以隶属英国，可是它没有。古巴有一千个理由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它依旧没有。

原因很简单：这块鳄鱼形的土地上除了甘蔗，也盛产硬汉。硬汉不想仰人鼻息，硬汉想自己做自己的主。可惜硬汉的力量不够。难倒硬汉的不是勇气，而是物资，所以硬汉不得不求人。硬汉搬了美国来打西班

牙，西班牙人走了，美国人却不肯走，硬汉只好搬来苏联赶美国。于是，古巴就陷入了这样一个用依赖来实现独立的怪圈。

我们是在哈瓦那逗留期间听到古巴和美国复交的新闻的。古巴人终于可以过上好一些的日子了，街上那些空空如也的商店里，不久将会被美国黄油和高露洁牙膏填满。可是我却兴奋不起来。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怪圈的终结，还是另一个怪圈的开始。



在古巴圣地亚哥，无数音乐家们习惯到这个小书馆儿聚会。


古巴特立尼达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市图书馆

人：遭遇资本来袭的革命后裔

在古巴街头你经常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人群在排队，有的能看得出所以然，比如排在副食店前的队，大概是在等候凭票供应的新鲜食品。而排在公园门口的，大多是为了一客冰淇淋。排在银行门前的，极有可能是在等着换取可兑换比索——我们自己就排过这样的队。在排队的过程里我们也学会了当地排队的规矩：你需要在人群中找到队尾的那个人。只要得到了那人的认可，你在队伍里的合法性就不会遭受任何质疑。



在古巴，一切个人电子产品都是奢侈。幼儿园的小朋友把纸画的电脑作为玩具。

古巴的货币制度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极为相似，都是双轨制，当地人使用当地比索，而外国人则使用类似于我们当年的外汇券的可兑换比索。这两者之间的汇率差别巨大，后者大约是前者的25倍。可兑换比索的好处不仅仅在差价上，它还能买到当地比索买不到的紧俏物品。所以，银行门前似乎总是排着长队。

偶尔也会有让你猜不出缘由的队列，比方说那天在哈瓦那街头。那支队伍很长，绕着街角转了几个来回。排队的人手里没提篮子和塑料口袋，看不出与购物有明显的关联。我们问了好几个人，才终于明白这些人原来是在等周五的芭蕾舞票，而那天是周日。对一个据说人均月收入只有十来美元的国家来说，这样的队列让人心生敬意。

那天我们是想去哈瓦那大学的——我们对古巴的校园生活充满了好奇。另外，我们也想找一个能上网的地方。古巴的网络只对外国人开放，费用昂贵，且网速极慢，即使在五星级宾馆也很难查询网络信息，我们在古巴的日子里几乎与世隔绝。

在这之前我们去过几家学校，在巴拉德罗，在卡马圭，在哈瓦那，有中小学，也有幼儿园。古巴的涉外政策与当年的中国有相似之处却又不尽然相同：当地人被禁止进入涉外宾馆，而外国人却可以自由出入除了军事基地之外的几乎任何地方，包括黑黢黢空荡荡的食品商店和接近

于贫民窟的老街区，卡斯特罗似乎不怕掀起裤子让你看屁股上的疖子。

我们没有遭到任何拦阻，堂而皇之地闯入了几家学校。校舍大多简陋却很干净，漆成海洋色调的墙壁上，画着各样色彩浓烈的宣传画。教室里的设施很简陋，在一家临街的幼儿园里，我们看见了一台用纸箱子糊成的电脑，黑笔勾勒出来的屏幕和键盘看上去有些潦草。可是孩子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贫穷，他们见到客人老远就主动招呼，神情活泼而纯真，并无经过洗脑教育的儿童脸上特有的刻板和麻木。不知这些从未触碰过真实电脑的孩子们长到大学年龄时，会不会也成为“拇指一族”？

带着这样的好奇，我们走进了哈瓦那大学。校园在山坡上，要走过很多级台阶。那是一座殿堂式的建筑，大门前耸立着几根极有气势的罗马廊柱，台阶和墙面上长满了黑色的寿斑，却依旧看得出曾经的辉煌。正值周末，校园出奇地安静，我们绕着庭院走了几圈，才遇上了两个学生，一男一女，像是恋人。他们看见我们，便热情地走过来打招呼——这是我们第一次遇上主动和我们说英文的人。

他们是历史系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古巴现当代历史。我问他们毕业后想做什么？女生英文水平有限，只是微笑不语。男生思索了片刻，才说他想教书，也想写书，他要告诉大家古巴这些年发生的事，全世界不能只有美国一个声音。

他的肤色白净——那是几代欧洲血液在加勒比基因中的沉淀——衣着得体，英文几乎听不出口音。他让我想起了30年前的自己。那时的我大概也说过诸如此类的豪言壮语，青春和理想相遇是一种赏心悦目的合宜。

假若我就在那一刻离开，我或许可以保持对哈瓦那大学近乎完美的记忆，可是我偏偏决定滞留，于是我亲手毁灭了一桩虽然很小却依旧难得的满足。

当我们走到数学楼前时，我们遇到了另外两个学生。他们见到我们，也主动走过来，热切地操练起英文。他们是数学系的学生，辅修历史。什么年代的历史？当然是古巴现当代历史。

哈瓦那大学还有没有别的历史课程？我暗想。

我问他们业余时间做些什么？篮球还是游泳？我特别挑出这两项运动，是因为它们都不需要太大的花费。他俩的回答却让我惊讶：他们喜欢收集世界各地的货币。“能让我看一眼加拿大纸币吗？”其中的一位小

伙子怯怯地问。

我毫不犹豫地取出了我的钱包，抽出一张印着伊丽莎白女王头像的20元纸币——是塑料纸的新版。他们对着阳光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番，然后还给了我。

他们热情地带领我们参观了校园里的几座雕像和纪念碑，甚至一辆古巴革命中使用过的坦克车。我们的谈话围绕着校园生活渐渐铺展开来。我问他们学费昂贵吗？他们说是政府负担。那伙食费呢？也是政府。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大学年代，那时国家为我们支付学费，我每个月还能拿35元补助。

“只是，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很少，吃到肉”，他们彼此对望了一眼，犹犹豫豫地说。这是两个还在长身体的孩子啊。我的心里生出隐约一丝疼意。

“告诉我哪里可以买到肉，我有可兑换比索，我可以给你们买火腿香肠”，这句话没经过脑子，直接从我的喉咙溜出了舌尖。

“其实，假若你愿意，你可以给钱，我们自己去买”，一个小伙子结结巴巴地说。

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打开钱包，抽出了那张被他们仔细研究过的纸钞。

“假如你愿意，你还可以多给几张”，另一个小伙子扫了一眼我的钱包。

我突然意识到，在我第一次打开钱包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看清了里边的存货。我闻到空气里有一些东西在慢慢变味。“不，我们自己也要用”，先生果断地合上我的钱包，拉着我就往山下走去。我听见了身后“咔嚓咔嚓”的脚步声，是他们追上来了。

我们怎么跑得过他们？喊也没用，校园里没人。我近乎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我睁开眼睛时，他们已经挡在了我们跟前，高大，黝黑，威猛。



美国和古巴关系“破冰”之后，古巴街头的出租车也挂上了古巴和美国两国国旗。

“我们也有一样东西送你，是切·格瓦拉任古巴银行行长时发行的纸币，上面有他的签名，市面上不多见的”，他们说。

下山的路上，我捏着那张印有切·格瓦拉签名的等值于40美分的10比索纸币，默不作声。我突然开始怀疑周遭的一切：那些墙面上的黑斑，那寥寥几个在校园里时隐时现的人影。也许，我在这里看见的一切都不是偶然，它们都是某项精心策划的计划中的一个部分。

“兴许他们，真的是饿……”先生试图安慰我。

我们坐上了出租车，司机对我们的指令心不在焉，他的目光好奇地落在我们拿来作地图用的手机上。这样的目光我们很熟悉。两天前，我们的一位朋友在哈瓦那街上拍照时，身后走过来两个年轻人，顺手将她手中的Iphone“抢”走。我在“抢”字上加了引号，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这个字是否使用得当，因为当我的朋友跑过去和他们交涉时，她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们立刻把手机还给了她，顺便送给她一个几乎有些羞涩的微笑。整个事件的实质因此变得扑朔迷离，我们到现在也无法断定它到底是一个带着小小恶意的玩笑，还是一桩藏着些许幽默的抢劫。



在哈瓦那海明威故居前，一位海明威的粉丝在模仿他

而早在五年前，我们的第一次古巴之旅中，我们就有过一次与Iphone相关的奇遇。在巴拉德罗的一个酒吧里我们碰到了一位穿着和化妆都很大胆的中年女子。据她说她在多伦多市区开着一家高档的意大利餐厅，一年工作358天，剩下的那个星期到古巴度假，年年如此。

那是个早晨，酒吧刚开门不久，她的桌子上却已经堆了四五个空啤酒瓶。她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只Iphone——那时的版本大概还是3，对我们扬了一扬，说古巴真是个好地方，一部破手机,就可以让我过上奇妙无比的七天。她说“奇妙无比”这个词的时候，眉毛朝后挑了一挑，我们这才注意到了她身后坐着一个古巴小伙子。小伙子大概刚从海里游泳回来，棕黑色的肌肤上闪耀着一颗颗晶莹的水珠。他听不懂英文，只是对我们腼腆地微笑着。女人喝完了第6瓶或许是第7瓶啤酒时，便起身离开了酒吧，带着她的Iphone。小伙子尾随着她，两人一前一后地走进了一个房间。我远远看见窗帘轻轻一抖，阳光给挡在了外边。

“这是最新版本的Iphone6 Plus吧？”司机问我们。

“还要跟你说多少遍，我们要去美术馆？”我把手机“咚”的一声扔回了手提包。

我被自己的语气吃了一惊，立刻感到了羞愧。我知道我的火气跟这个满头是汗的中年人毫无关联，他只不过是在一个错误的时刻把车停在了哈瓦那大学门前而已。

太阳已正正地升到了头顶，阳光把一切景致洗刷成一片煞白，街道便再也无法藏匿它的痂疮和皱纹。我对一切突然失去了兴致。

“不去美术馆了，去El Floridita吃饭吧”，我临时改变了主意。

El Floridita是海明威当年常去的一家餐馆。古巴街角的每一家餐馆，都可能钉着一个“海明威曾在此就餐”的铭牌；每一份酒水单上，都可能注明“这是海明威爱喝的酒”。海明威住过的旅馆和农场，早已被开辟成纪念馆，而且还保持着他离开时的大致模样。全世界都知道海明威的巴黎和海明威的西班牙，而海明威生活过将近30年的古巴，却是海明威神话里缺失的一页。

“美国到底怎样，看看海明威的下场就知道。”据说卡斯特罗说过这样的话。的确，海明威在古巴写下了一生的巅峰之作《老人与海》和《丧钟为谁而鸣》，而就在他被外交部强劝回美国的第二年，他在爱达荷州的家中持枪自杀。海明威的价值，大概是这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和古巴唯一达成的一桩共识，也是我这三趟古巴之行中唯一了解清楚了的事实。其余都还是乱线团，需要我在未来的日子里慢慢整理出头绪。

“对不起，天太热了”，我对司机说，算是我的道歉。

“你们的革命广场上为什么只有切·格瓦拉和何塞·马蒂的画像，而没有卡斯特罗？”先生问。

司机沉吟了片刻，才说：“夸奖死人，远比夸活人安全。”

我们忍不住大笑。

2015.8.17.

走出历史的古巴

为什么我们今日依然要谈论古巴？像谈论20世纪70年代怀旧而来的老爷车，一支昂贵的雪茄，一曲动听的爵士乐，一顿精致的加勒比大餐，又或者像谈论老挝、朝鲜和“社会主义”——这一昔日体格庞大、今日不死而正在凋零的老兵？时下，最时髦的怀旧复古风，不在伦敦，不在越南，甚至不在上海和巴黎，新的阵地在古巴。

撰文/刘荣 吴如加

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一家知名民意调查机构发起一场全国性调查，选出了最能描述中南美人的词汇如下：“皮肤黝黑”、“脾气急躁”、“充满激情”、“笃信宗教”、“懒惰”、“迟钝”和“拉丁情人”。而如果将这个描述的对象具体到古巴，恐怕还要被美国人加上“偷渡”、“动荡”、“社会主义”和“落后”。

基于美国对古巴的政治和经济封锁，关于古巴的词汇，长期未能得到更新。直到2015年7月22日，这对宿敌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敌对关系，近百年来持续长久的地缘政治对峙从此谢幕。

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革命样本，古巴是一个成功对抗过西班牙、美国、前苏联三个大国的国家。身处社会主义阵营的古巴，从昔日的革命兄弟，到今日的旅游目的地国，古巴有足够的理由引起我们的关注。而一个置身于势不可挡的变革前夜的古巴，更是让人对它的未来充满无限想象。



在古巴莫罗城堡前，挂有古巴和美国旗帜的帆船正从城堡的灯塔前经过。供图东方IC

拉美血统：穿越历史迷雾

如果没有被封锁的历史，美洲最好的沙滩度假城市，不会是墨西哥坎昆，很可能在圣地亚哥。

古巴漫长的海岸线边，散落着类似圣地亚哥这样大大小小的天然良港。从殖民时代开始，这些港口就成为殖民者的前哨，曾经是西班牙殖民者向美洲大陆贩奴的重要中转站。印第安人、黑人、华人，都在殖民时代抵达古巴。后来，在此基础上，繁荣了古巴持续数百年的种植园经济。

古巴这一名词与海上飓风相关。早在南美热带雨林深处的征战部族反复骚扰这片大地之前，古巴就是一个经常被飓风袭击的海岛。海洋带来的苦难记忆深入古巴的骨髓。因此，抗争也成为一种传统——古巴国徽盾面背后是一根束棒，象征权威；束棒之上是一顶“自由之帽”，表示争取自由、为自由而斗争。

1492年，哥伦布在“地理大发现”时发现了加勒比诸岛中的古巴。它在加勒比的战略位置引起外界的瞩目。1514年，跟随哥伦布到达古巴的西班牙人迭戈·贝拉斯克斯在帕拉达斯河口建立了圣地亚哥城。到了19世纪，完全殖民地化的古巴成为西班牙帝国的“安地列斯珍珠”。

起初，西班牙人抱着寻找黄金的想法，在此屠杀土著。后来西班牙人清楚地意识到在古巴的殖民事业不能单靠开采矿石资源，于是将重点转向了种植业，在海外大肆引入黑人和华人劳工。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殖

民和融合，这一举措甚至改变了古巴的血统。除了西班牙裔的半岛人（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通婚），黑人也成为古巴民族重要的构成主体之一。今天的古巴，白人占64.1%，黑人占9.3%，混血人种占26.6% (主要为黑白混血)。

由于地域和气候的差异，古巴人在人种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从人种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全新的年轻种族：身材高大、匀称、健壮、能歌善舞。西部地区以哈瓦那为代表的人更加内敛和温文尔雅，人种构成也十分多元，包括西班牙人、印第安人、黑人和华人。而生活在炎热地区的东部人以圣地亚哥为代表，更具有南美的原生特质，继承了加勒比人粗犷、勇敢、尚武和不屈的性格，著名的古巴朗姆酒和雪茄都出自这些地区，这里自古也是英雄和革命者的摇篮。

圣地亚哥作为西班牙在古巴最早的殖民城市和外港之一，也是古巴独立的英雄城。19世纪的3次古巴独立战争都是从这里开始。此处流传着塞斯佩德斯、何塞·马蒂和卡斯特罗等古巴英雄的轶事。而他们，分别有着黑人、西班牙人的血统；至于古巴的另一位英雄切·格瓦拉，则直接来自南美的阿根廷。



古巴地图



古巴传奇音乐人康贝·赛甘多（**Compay Segundo**）生前与老朋友埃斯泰罗·伊格莱西亚斯（**Estrello Iglesias**）在乌普曼雪茄厂（**H. Upman**）。

古美关系：砒霜或蜜糖

地缘和经济决定了古巴和美国长达百年的“分分合合”，海明威是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例子。

1928年，居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记者海明威第一次在古巴上岸，过着狩猎、捕鱼和斗牛的生活，并有了两个儿子。那时，古巴政府完全被美国扶持，也是美国和古巴的第一个蜜月期，这个美国式硬汉写了一部《老人与海》，这是他所有作品中唯一一部完全基于古巴历史、古巴生活、古巴性情的古巴之作。

小说中的老人，不仅仅是硬汉海明威自己的写照，更是古巴式硬汉的性情的真实呈现。从海明威生活中离不开的古巴烈酒和古巴雪茄，以及他身体力行的古巴式生存中，都不难想象，他从内心发现自己找到了第二故乡。



在比尼亚莱斯山谷里烟农正在烟田里劳作。

“二战”后，他重返古巴。离去的1958年，正值古巴独立革命发生的前夜。那时，整个美国都在从古巴黯然撤退。回到美国不久后，他在爱荷华的家中开枪自杀。

美国与古巴的关系曾经十分亲密。1898年，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国人就把古巴从西班牙帝国的控制下解放了出来；而此前，古巴人为此战斗了30年。在美西战争中，古巴反抗军与美国人曾经有过合作，那个风靡全球的励志故事《把信送给加西亚》，就是源于此次战争。

西班牙人走了，美国人来了。他们热衷于把在本国行之有效的一套民主程序移植到这个热带岛国。此外，还有财大气粗的美国公司，在许多古巴人眼中，这不过是另一种殖民。尽管这个短暂的共和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政治腐败以及美国的频频干涉和经济垄断让古巴人愈发感到难以忍受。

古巴人会说，哈瓦那一直停留在海明威离开时的样子。他住过的哈瓦那旧区，1982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时光像按下了中止键，那些建筑和生活场景保留了下来。行走在这个时光停滞的地方，从西班牙式样到法国新古典主义风格，从意大利风格到英国特色，从欧洲新古典趣味到古巴当地流行的高顶窄门，俨然一座欧洲建筑的博物馆。

而研究者和旅行者都需要直面一个现实——这些遗产的保存，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美国和古巴将近60年的“关系密切时期”，今天哈瓦那85%

的建筑，都是在那一时期建造或者修复起来的。

在美国帮助下的“舶来品”，还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企业文化和社会建构。古巴的单一种植经济结构在这一时间被打破，一个新的旅游业正蓬勃发展起来，成千上万的北美人来到古巴，定居哈瓦那，建造乡村俱乐部、游艇俱乐部等，与古巴的上流社会和外籍精英打成一片。美国黑帮甚至也渗入了古巴，建立起了性产业。

年轻的古巴人争先恐后地接受美国文化，从各类产品到体育、棒球，从艺术到文化，从建筑到绘画，英语词汇已经和西班牙语相互融合，好莱坞的电影和乡村音乐也在古巴年轻人中流行。

20世纪50年代，美国是古巴糖最大的出口市场，古巴进口商品的76%来自美国，90%的电信、电力设施和服务都由美国公司提供。北美式消费文化风行古巴。古巴富人买美国车——这些上世纪早期出厂的老爷车至今仍留在哈瓦那的大街上，他们还热衷于去纽约和迈阿密购物。中等收入的古巴人也在努力工作，以拥有美国消费品作为良好生活的证明。

古巴独立运动后，古美关系急速恶化。效率低下的计划经济，西方经济禁运带来的经济倒退，使得在海明威的哈瓦那，美丽的建筑也失去了维修的动力。



圣地亚哥的殖民地风格街头风景和老爷车。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旅行者会发现：半个世纪以来，哈瓦那每年有150座殖民时期的建筑倒塌；在哈瓦那中心区和老城区，有历史价值

的欧式漂亮楼房在热带潮湿空气和飓风暴雨中接连倒下。这些建筑的主人们，其中有不少人，很可能是在革命前期逃亡美国，也可能已经作为卡斯特罗政府的反对者而被处决。至于冷战时期，古巴和前苏联亲善期建立起的苏俄式高楼——它们多半有十层左右、钢筋水泥结构，30年楼龄不满，已经彻底地毁坏。

然而现实却是，亲美的巴蒂斯塔政府治下，恰是独立后古巴最为腐败和黑暗的一段时光。而依附型经济则让古巴在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遭受重创。这便是为何卡斯特罗想再造一个新美洲，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不论政治、经济，都摆脱对外国的依赖。

社会主义阵营的“黑马”

革命的古巴像一个时光标本，浓缩了这个星球上人类群体的欲望、野心、苦难和挣扎。寻求民族独立的古巴，起先并未在“姓社还是姓资”的意识形态阵营中站队，它想要的只是“活下来，有尊严”。

“当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带着军队进入哈瓦那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政权会走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全然不知。”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切·格瓦拉是个共产主义者，这没有人怀疑；但卡斯特罗本人则告诉美国记者，他所领导的“七·二六运动”从来没有实行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打算。甚至在革命胜利之后，尽管实行了一系列国有化政策，古巴的领导人仍然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直到1961年春天的“猪湾事件”之后，卡斯特罗才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正式宣布古巴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看起来这似乎是古巴在情急之下的“左转”，但卡斯特罗本人对此并不承认，他宣称自己“早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了”。

古巴独立革命为何最终变成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古巴人会无奈地告诉你，革命，既可能是噩梦和破坏，又可能仅仅是生存之道。

“猪湾事件”之后，古巴无可选择地投向了苏联的怀抱。有了苏联的支持，古巴站在对抗西方阵营的最前线，显得信心十足。

1962年，苏联开始在古巴部署自己的导弹，但是很快，美国侦察机拍摄到了导弹发射架。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被称为“古巴导弹危机”。这是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国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危机虽然仅仅持续了13

天，美苏双方在核弹按钮旁徘徊，最后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该事件至今被认为是人类存亡的最危险时刻，热核战争几乎就要发生。对此，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也持一致看法。而风暴中心的古巴，是生是死，则根本不在大国的考虑范围之内。

此时古巴全国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格瓦拉正在他的野战指挥部里等待着美国人的入侵。只是古巴人没有想到，赫鲁晓夫在没有和他们商量的情况下与美国人做了交易。卡斯特罗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怒不可遏，不停地咒骂赫鲁晓夫出卖了古巴。

尽管如此，古巴人心里清楚，苏联可以给予古巴的，远不止于导弹。在与美国彻底切割之后，古巴依旧没有发展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与革命之前相比，依赖的对象从美国变成了前苏联。

为了保卫这盏“加勒比社会主义明灯”，前苏联连续几十年给予其大规模军援和经济援助，古巴境内长期保留大量前苏联军人和基地。

过度依赖的结果是，1991年前苏联解体后，古巴85%的出口市场瞬间消失，支持国民经济的援助和优惠贸易协定灰飞烟灭。3年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不过，为了制衡美国，俄罗斯人保留了离首都哈瓦那不远的卢尔德斯监听站。而美国人则一直以经济援助为要挟，要求关停这个监听站。2001年，换了人间的俄罗斯，由总理普京决定关停监听站，这一决定让古巴人无法接受。

2013年，为了反制美国和北约的东扩，俄罗斯重新恢复与古巴等拉美国家的外交，开始新一轮“政治联姻”，并免除了90%前苏联时代的古巴债务。2014年，俄罗斯决定重启卢尔德斯监听站。



圣地亚哥是聆听非洲风味古巴音乐、观赏伦巴舞的天堂。



在古巴哈瓦那，人们在美国大使馆前排队，申请前往美国的签证。供图东方IC

古巴的历史

殖民统治时期

◎ 1492 年，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美洲时发现古巴岛。
◎ 1511 年，西班牙征服者远征古巴，古巴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
◎ 16 世纪，征服者从非洲大量输入黑奴，从事种植园劳动。

独立运动时期

◎ 19 世纪初，古巴人民掀起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
◎ 1867 年，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古巴开始要求独立的十年战争。
◎ 1897 年 11 月，西班牙被迫同意古巴自治。

美国占领时期

◎ 1898 年 12 月 10 日，美西签订《巴黎和约》，西班牙把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同时放弃在古巴的一切权利。
◎ 1901 年，在美国军事当局的监督下，古巴召开制宪会议，制定宪法。
◎ 1906 年，古巴爆发反埃斯特拉达·帕尔马政府起义，美国趁机对古巴实行第二次军事占领，建立军政府，直接控制古巴达 3 年之久。
◎ 1933 年 8 月，爆发的反美、反独裁斗争，推翻了马查多·伊·莫拉莱斯政权。
◎ 1952 年 3 月，巴蒂斯塔在美国支持下第二次上台执政。

革命胜利时期

◎ 1959 年 1 月 1 日，起义军进入哈瓦那，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同年 1 月 2 日，宣布成立革命政府。马鲁蒂亚任总统，2 月卡斯特罗出任总理，7 月多尔蒂科斯出任总统。
◎ 1961 年 4 月，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 1976 年，举行公民投票，通过宪法，同年 12 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取消总统制，设立国务委员会。

雅尼私人博客：对自由的向往

2006年，生活在哈瓦那的普通女孩雅妮大概还记得，这一年传奇领袖卡斯特罗因为肠胃炎发作，将权力转移给弟弟劳尔。第二年，雅妮在互联网开博。

在古巴革命独立的几十年来，很多古巴人流亡海外。革命初期逃亡的多为富人和知识精英，接下来大规模逃亡的都是普通古巴人。有91万逃亡的古巴人生活在美国，渐渐入籍成为美国公民。在古巴、苏联结盟的30年里，十分之一的古巴人逃亡海外，甚至不惜自制各种渡海工具投向加勒比海，不少人因此葬身。

然而今日，古巴与美国之间无需相互遥望。自1993年卡斯特罗的适度政策调整后，政治改革展开，对宗教互访也放开了限制。古巴重启了和美洲各国的外交关系，潜在的联系正在加强。尽管互联网的使用没有完全开放，但古巴自由意识的觉醒，已从底层开始。

生于1970年代的雅妮就是这样一个觉醒的普通古巴人。她生在苏联“老大哥”对古巴援助的时代。亲睹了1989年到1991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动荡和惨烈。又曾经留学欧洲，专业是历史语言学。2002年她选择回到古巴，说自己想说的话。她的博客自我介绍是——她想帮助“建设一个多元化和包容性，可以给所有人提供空间的古巴”。

在古巴，外籍客人和本国国民都要接受严格的互联网控制，而且费用高昂，雅妮早期必须要假扮外国游客，进入外国人聚集的收费网吧，通过电邮形式发给自己国外的朋友。

雅妮的博客不用“独裁”或“体制”这种词，回避最高领导人的名字，她如实地呈现古巴的细微变化，消解着“墙”外对古巴的过分夸大或诋毁。她的微茫之声有如一个小小的镜面，折射出变化中的古巴和南美。古巴新政带来的新气象，从对非官方的独立意见的宽容开始。

2008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她为当年100位风云人物之一。这一年，联合国大会第十七次通过投票结果，督促美国解除对古巴的禁运。

在1994年开放旅游业后，除了大批游客的引进，古巴的自由市场经济化范围越来越大，2011年，古巴人终于可以自由买卖房屋和汽车等私人财产，也鼓励市场经济主体的多样化，比如旅游业面向私人餐饮和酒店开放，外资农场和私人合作社也出现在古巴。

今日的旅行者，在古巴街头感觉到的细节更多：喜欢收集车辆的，会发现在长期禁运和物资短缺下，古巴人自给自足，改装制造的能力极强，除了发动机，几乎什么配件都能制造出来，因此四五十年的老爷车也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

2015月7月22日，古巴和美国宣布建交。这一迹象曾在2014年年末

流露过。今日，不管是在哈瓦那还是在圣地亚哥，对美国的反对宣传标语都已经摘掉了，只是在古巴消费，对欧元的态度比对美元的态度显然还是更为宽容，体现在换汇过程中美元要收取高额的手续费上。

民间的互访和移民已将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根据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缩写CBP）的服务，从2014年1月到2015年9月，到美国的古巴人比1994年移民危机时的人还多。总共有36497名古巴人，这个数据代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0%。

一个包裹在血色琥珀里的国家，已经嗅到了开放的空气。

革命前传：古巴的殖民历史

自哥伦布1492年10月27日发现古巴那一刻，也许就注定了这座岛屿近400年被殖民的苦难。无论是西班牙人的疯狂掠夺、英国人的短暂统治，还是美国人的强行介入，都不能磨灭古巴人民的起义和反抗。从印第安酋长阿图埃伊到哈瓦那大学的法律系毕业生菲德尔·卡斯特罗，寻求独立的种子早已种下。

撰文/孟繁勇

在古巴哈瓦那港口不远处，有一座雷尔弗埃查城堡，这是一座两层的方形建筑，灰色石墙上至今保存着古式加农炮，四角棱堡环绕，气势雄浑。若沿梯而上，站在城堡的小阁楼上，会发现这里地理位置绝佳，伴随着港口的海风，哈瓦那整个城市展现在眼前。甚至远方小街巷的行人，都会看到你向他们挥动的双手。

许多人会在城堡前留影，却少人知晓，游人如织之处，恰是西班牙殖民古巴的遗迹：这里曾是西班牙总督的官邸和办事处。虽历尽风雨，斑驳石墙仍无声地诉说着西班牙殖民者的权势，他们所签发的命令，将决定古巴殖民地的命运。

若你有机会临此，当轻触石壁，穿越时光的缝隙之时，便会发现雄伟的堡垒之中，深藏着被殖民者的苦难……



位于圣地亚哥的圣佩德罗德拉罗卡堡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座城堡设计于1673年，1700年建成，是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复合建筑体。城堡根据海角的地势而建，作为防御城堡来抵抗外敌入侵，包括有堡垒、军火库、工事和大炮，是西班牙殖民时期拉丁美洲军事建筑里保存得最完整的一个。

发现古巴

1492年4月17日，西班牙国王同意了哥伦布的书面协议草案。哥伦布提出“作为海洋领主的陛下，委任他（哥伦布）为一切海岛和大陆的司令，这些海岛和大陆是他亲自发现和夺得的，或者是由于他发挥了航海技能而发现的，陛下把哥伦布封为被发现和夺得的海岛、大陆的副王和首席执行者。”作为交换，西班牙国王将得到回报，数目是哥伦布获得的一切商品，无论是黄金、白银、香料或其他货物的十分之九，而哥伦布留下十分之一。

得到国王允许的哥伦布，于当年8月3日启航，率领着庞大的舰队向西而行，开始新航路的远洋。10月27日，哥伦布发现了古巴岛，但他认为这里不过是大陆而已，并没有过多停留。直至1508年，哥伦布再次来到古巴，为了搞清这里究竟是不是大陆，命令其部下迪戈·贝拉斯克斯绕着古巴岛沿线航行，发现这里是一个岛。于是，迪戈·贝拉斯克斯带着300名士兵在巴拉科阿登岛，对这个岛进行勘察，后来他成为西班牙殖民古巴时期的总督。他看到了这里生活着的，是一些瓜纳哈达贝伊人、西博内人、泰伊诺人和太平洋原始部落土著印第安人。

土著人原始的武器，无法抵抗西班牙人的枪炮，于是他们被迫接受条件。哥伦布规定凡14岁以上的印第安土著居民，每年必须四次缴纳一定数量的黄金或者是棉花，作为捐税和贡品，否则便提供无偿劳役，成为古巴被殖民初期所遭受的掠夺苦难的开始。

之后，哥伦布掠夺而来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向西班牙，但国王得到的却很少。于是，哥伦布的权力逐渐被收回，由此开始，西班牙王室取代冒险家们，开始全面征服和殖民统治古巴。

在古巴东部，有一个叫作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地方，这里是西班牙在古巴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统治者叫做尼古拉·德·奥万多。1951年，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开始，殖民运动开始有计划、成规模地扩展至古巴全境。每到一处，西班牙人会将当地的印第安人登记在册，并强行命令当地人劳动，为此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劳动体系，后来成为古巴殖民时期组织生产的固定模式。

因西班牙殖民者的进入，古巴文明本按自己特有的轨迹发展的逻辑被强行打破，史学界将此称为“西班牙的征服打断了他们的任何进度的独立发展。”生活在古巴的居民，都被殖民者按照种族、阶级、原籍、裔系分割开来。古巴人类学家费尔南多·奥拉兹认为：“随他们（指西班牙殖

民者）而来的有大量弹药、帆船、国王、教会等，一场革命性的剧变颠覆了古巴的印第安人，彻底地撕裂了他们原有的制度体系，并毁灭了他们的生活。”

1513年，古巴的土地被宣布为西班牙国王的财产，阿拉贡的斐迪南为此颁布了一项法令，授予未来的拓殖者以权利和义务。于是，来自西班牙的探险者们开始在古巴横行，他们四处寻找财富加以掠夺，在奥连特省找到黄金，在圣地亚哥找到了铜矿。仅殖民统治之后的30年，从古巴运输到西班牙的黄金就达到84000盎司之多。

殖民者不仅带来了疯狂的掠夺和野蛮的屠杀，随着西班牙人不断来到这块新大陆，他们还带来了欧洲的疾病，印第安人也因此在殖民时期人口大量减少。残暴的殖民统治，也引起古巴人民的反抗，起义、独立运动等反殖民斗争，一直在西班牙统治古巴数百年期间不断出现。



出自“阿托卡夫人号”沉船（**Nuestra Senora de Atocha**）的金盘子，边缘上的小凹痕说明它在大西洋的海浪中经受了**350**年的洗礼。**1622**年**8**月，“阿托卡夫人号”护卫舰由**29**艘护航船组成的船队满载着西班牙殖民者从南美洲搜刮来的财宝返回西班牙，却在哈瓦那以及古巴之间的海域遭遇飓风袭击，“阿托卡夫人号”由于载重太大，航行速度最慢，无法逃脱此厄运，连同满船财宝沉入海底。

反抗殖民的岁月

古巴历史记载的第一个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英雄，是印第安酋长阿图埃伊。他反对西班牙人的入侵，并建立了一支由泰诺人组成的抵抗力量。但是因武器相较殖民者的落后，抵抗终被击溃，阿图埃伊被抓获。殖民者煞有其事地审判了他，并且几个以殖民者为主的“法官”，判处他以火刑。

在关于阿图埃伊的传说中，在临刑之前，西班牙人问他还有什么遗言，阿图埃伊要求请一个牧师，为他描绘一下天堂里的情形。牧师来了，向他讲述了天堂美景，阿图埃伊问，西班牙人是否也会去天堂？牧师告诉他，西班牙人中，也有好人。阿图埃伊的回答是，他不愿遇到西班牙人，他们侵占了他的家，并且把男人和女人抓走当作奴隶。如果天堂里有西班牙人，那么他宁肯去地狱。

现在，在阿图埃伊遇难处，为纪念他而竖立了一尊半身雕像，不屈的姿态和坚毅的神情，诉说着这位反抗西班牙殖民英雄的往事，被后世尊称为古巴的国家英雄。

以阿图埃伊为始，西班牙殖民古巴期间，各地不断掀起反抗殖民者的事件，规模较大的则是古巴历次的独立运动。1868年10月10日，来自奥特连省的律师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在德米哈瓜庄园释放黑人奴隶，并将旧式步枪和梭标发给他们，率领这些黑人发动武装起义，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

随后，塞斯佩德斯在雅拉召开起义者大会，告诉所有人，起义的目的在于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开启了第一次古巴独立战争的序幕。这次起义声势浩大，短时期内席卷古巴，所到之处欢迎者众。以至于当时在古巴的法国记者伊帕里特·瓦泰马尔在报道中写道：“起义者领袖塞斯佩德斯能够指望国内一切青年的同情……在古巴没有人能够对起义者所举起的旗帜袖手旁观。”

西班牙殖民者对此采取了残酷的军事镇压，战争持续了十年，直至1878年2月10日，双方签署了《桑洪条约》。条约中规定，古巴必须停止武装斗争，作为条件，西班牙答应在古巴实行政治改革并释放政治犯，而对参加十年战争的奴隶，给他们以自由人的身份。但此时古巴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仍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桑洪条约》的签署，事实上使得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失败，之后殖民者却并未实行任何改革。自1878年至1895年，西班牙统治者与被殖民者的矛盾不断加深，每一个古巴人都知道，他们不会永远忍受殖民

生活。反对殖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在地下悄悄酝酿，直至1895年2月24日，奥连特省的巴亚莫再次点燃了全民起义的导火索，史称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

起义领导者马蒂、戈麦斯和马塞奥等人，号召古巴人“跨上战马，为祖国而战，捐躯在棕榈树下”，为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而战。此后在1892年4月，在纽约成立了古巴革命党，马蒂被选为主席。这也是不同于第一次独立战争之处，古巴由一个政党而非起义领袖的魅力，来领导指挥古巴全民武装起义。

经过长期的地下斗争，在1895年1月29日，马蒂在纽约签署了古巴全国起义的命令。随后，古巴黑人、土生白人、混血种人手执砍刀加入了军队，向殖民者发起进攻。他们在燃烧的甘蔗园的火焰下，向殖民者发出了“独立或死亡”的口号。

独立战争进行到1898年初，起义者几乎解放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西班牙殖民者的统治濒临崩溃。但没有想到的是，在古巴独立战争即将胜利之际，美国政府以保护美国侨民为借口，命令军舰驶往古巴。随着美国军队的介入，形势起了意料不到的变化。



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美国人对当地的剥削非常严重。农业、通讯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被美国公司控制。图为古巴的农业工人。



1898年6月22日，美西战争期间，美国军队在古巴登陆。

美国的介入

美国对古巴的兴趣，是在1821年占领西属佛罗里达之后，美国人突然发现古巴近在咫尺。因条件所限，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希望古巴继续由西班牙统治，甚至认为如果古巴被迫从它与西班牙非自然的联系中分离，那么只能继续由美国统治。

最初，美国的政治家们试图从西班牙手中购买古巴岛，于是，在

1948年，詹姆斯·波尔克总统向西班牙政府出价1亿美元，结果遭到拒绝。美国人并未放弃，1854年又出价1.3亿美元，同时还向西班牙透露，如果拒绝出售，“那么我们将以人类或者神的任何法律，证明我们有能力将它从西班牙手中夺过来。”

西班牙照例回绝，于是，一些美国的军官们则想复制占领墨西哥部分领土的方式“擅自入侵”。一些狂热分子小规模地尝试此法，但均以失败告终。美国等待着机会，1898年2月15日，停泊在古巴哈瓦那港口的美国军舰“缅因号”，突然发生了爆炸，258名美国军人随军舰沉入海底死亡。美国官方调查之后认为，军舰爆炸的原因来自于西班牙的一枚水雷，而西班牙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认为‘缅因号’不是被西班牙人或者古巴人有意识地毁灭的，而是由于船自身内部的爆炸。”

双方各执一辞，谈判无果之后，美国国会发布决议，要求西班牙撤出古巴。当年4月22日，美国海军封锁古巴港口。两天之后，西班牙向美国宣战。美国国会于4月25日，通过了向西班牙宣战的法案，美西战争正式开启，仅仅3个月不到的时间，西班牙以战败告终。

1899年1月1日，殖民统治古巴近400年历史的西班牙撤离了。根据1898年12月的《巴黎和约》，“西班牙放弃对古巴的主权及其他的一切要求”，并且明确了“该岛在西班牙撤出之后，应由美国占领。”美国总统麦金莱任命列奥那多·伍德为军事总督，将古巴分为7个军管区，美国自此统领古巴一切军政要务。

军事占领古巴之后，一位名叫鲁特的律师，被麦金莱选定为负责规划古巴未来发展的人。他同意军事总督伍德所提的古巴人支持美国兼并的观点，如果能够操纵选择确保选定的古巴人获胜，兼并的企图将会实现。3个党派参加了选举，但这次选举令美国人失望，其中两派要求古巴应立即独立，结果是具有独立思想的派别获胜。

此后，麦金莱命令伍德，要求古巴成立制宪会议，并于1901年3月2日签署了《普拉特修正案》。古巴制宪会议以24票对2票否决此法案，美国陆军部长路特却威胁古巴制宪会议的代表说：“修正案一被接受，古巴将可得到一个优惠的商务协定，如不接受，美国军事占领将要继续到修正案被接受为止。”

6月12日，古巴制宪会议最终以15票对14票通过，以一票之差，将《普拉特修正案》作为附件列入古巴宪法，实际上古巴被剥夺了独立和主权。该法案的规定，仍然确保美国对古巴维持着一种殖民控制形式，古巴从此沦为美国附庸。美国实际上取代了西班牙，采取“统治而不兼

并”方法，使形式上独立的古巴处于殖民隶属地位。

直至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哈瓦那大学的法律系毕业生，带着160名青年攻打蒙卡达兵营，发动了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古巴革命，由此拉开了序幕……

（参考书目《古巴史》、《古巴独立史》等）

“红色的切”：世纪偶像制造

切·格瓦拉是古巴的一个传奇、一个偶像、一个符号，作为拉美游击战的英雄、体制的反叛者，他还代表了自由的激情、抵抗的勇气和永不沉沦的精神。那么，他如何成为了“世纪偶像”切·格瓦拉？

撰文/夏榆

1959年，随着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的成功，古巴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菲德尔·卡斯特罗与亲密助手切·格瓦拉同时成为世界瞩目的政治明星。1960年，法国思想家保罗·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娃来到古巴，对这个新兴的革命之地进行考察。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分别接见了他们。格瓦拉的神秘气质给萨特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后在格瓦拉遇难后，萨特给了他极高的赞誉。他称其“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

2010年盛夏，法国著名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来到北京。德布雷身兼多种身份，作家、哲学家、媒介学家、龚古尔文学奖评委。更重要的是，德布雷在青年时期曾参加拉美革命，与格瓦拉共同出没玻利维亚游击战丛林，他是格瓦拉生命最后时刻的见证者。

我应邀赴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中心访问德布雷先生。现场聆听他的演讲，通过他的个人视角回望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的革命风云，回望格瓦拉的人生故事。

1967年4月9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哲学教师雷吉斯·德布雷在玻利维亚米约旁巴镇被政府军逮捕，当年他26岁。被捕时，他正试图保护一支由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安全返回国内，这支游击队在1967年9月到达玻利维亚。在遭受数天的严厉审讯之后，德布雷被秘密关押，玻利维亚政府指控他为游击队领导人之一，他面临被处死或者监禁30年的判决。

2014年9月，德布雷再访中国，讲述格瓦拉的故事，也讲述对世界“革命”的思考。



古巴街头随处可见切·格瓦拉的肖像。

“切的神话”

“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这是格瓦拉激励人心的格言。

1998年，我开始漂流北京的时候，在动物园服装批发城买到一个印有格瓦拉头像剪影的军绿挎包，后来只要出门就会背着这个挎包，醒目地显示着身上的这个左翼倾向；2000年夏天，我坐在北京人艺剧场观看当年飚红的实验话剧《切·格瓦拉》，体内的血液被剧院回荡的激情、具有“革命”色彩的台词点燃，和无数观众沉浸在由异国抵抗者所唤醒的自我激励中；2006年，朋友到古巴游历，带给我一个在哈瓦那街头买到的印有格瓦拉头像剪影的棕色羊皮笔记本。很长时间书包里随身带着这个笔记本。我想在世界上会有很多年轻人使用印有格瓦拉头像剪影的物品，书包、T恤、钱包、笔记本、钥匙链。格瓦拉的头像成为世界非主流文化符号，如同暗号一样使人们彼此亲近。格瓦拉，作为拉美游击战的英雄、体制的反叛者，他代表自由的激情、抵抗的勇气和永不沉沦的精神。

我的书架上有格瓦拉生前记述的《玻利维亚日记》，日记中记录了他的生平和重要时光。

1928年6月14日，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罗萨利奥市。在布宜诺斯艾

利斯大学医学院求学期间和毕业不久，他曾多次周游拉丁美洲，其中包括他早年在《摩托日记》中描述的，他在1952年驾驶一辆诺顿牌摩托车所进行的不可思议的北美环球之游。加勒比海的美丽岛国古巴，不仅在地理上更在文化上，为充满拉丁气质的革命青年提供了理想的新天地。著名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的影片《摩托日记》，讲述了格瓦拉的革命理想的形成与青年时代的拉美旅行相关。1954年，格瓦拉客居危地马拉期间开始投身政治活动，然而他支持的民选政府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格瓦拉随即逃亡墨西哥。

早年格瓦拉在危地马拉和流亡的古巴革命者有过初步的接触，随后又在墨西哥城找到了他们。1955年7月他会见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当即加入了旨在推翻古巴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游击队远征军。古巴人给他起了昵称“切”。随后格瓦拉作为游击队一名随队医生登上“格拉玛号”游艇开始驶向古巴，这支游击队随后在古巴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展了革命武装斗争。几个月后，格瓦拉被菲德尔·卡斯特罗任命为第一位起义军少校司令。他同时负责游击队伤病员和巴蒂斯塔政府军伤病俘虏的治疗工作，在随后的革命战争中格瓦拉功勋卓著。

格瓦拉一生具有传奇性。1959年，独裁者巴蒂斯塔逃离古巴，格瓦拉成为革命新政府中的一名重要领导人，始任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工业司长，继任国家银行行长，后改任工业部部长。格瓦拉还是后来的古巴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之一。除了担任这些职务以外，格瓦拉还是古巴革命政府在国际事务活动中的出色代表，他频繁出席国际会议，在国际论坛发表演讲，他的慷慨激昂和能言善辩令国际瞩目。美国《时代》周刊曾经评选格瓦拉为“世纪偶像”。这与他后来领导的“革命”行动有关。1965年4月格瓦拉离开古巴，继续投身游击战争。最初他领导一支由古巴人组成的游击队赴刚果支持刚果人民的革命斗争。1965年12月，他秘密返回古巴，筹建一支由古巴人组成的游击队前往玻利维亚。格瓦拉的计划是挑战该国的军事独裁政权，最后以燎原之势将革命运动推广至整个拉丁美洲。

1977年，法国著名导演克里斯·马盖拍摄纪录片《红底色的年代》，回顾了弥漫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激情。其中有一个历史细节，格瓦拉要在玻利维亚建立游击军事基地，却被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拒绝。既缺乏当地印第安人的支持，又没有可靠的根据地，格瓦拉的革命实践离其目标越来越远，最后被迫沦为一场冒险。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在游击战斗中负伤，他落入接受过美国训练和操纵的玻利维亚反叛乱部队手中。次日惨遭杀害。随后政府军隐匿了他的尸体。他被砍掉了双手，其尸体和几名战友的尸体一起埋在了玻利维亚中部山区小镇巴耶格兰德

外的飞机跑道附近。

美国作家乔恩·安德森在其所著的《切·格瓦拉传》中深情地写道：

> 切的敌人不愿看到他的墓地受到众人的瞻仰，他们希望他的消失能够终结切的神话。然而，切的神话超越了所有人的控制，越传越广。成千上万的人为他的去世哀悼。诗人和哲学家赞美他，音乐家编曲歌颂他，画家描绘他的英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游击战士们高举他的旗帜奔赴战场。在美国和西欧的年轻人奋起反抗越南战争后的既定秩序、种族歧视和社会正统观念的时候，切叛逆的脸庞成为他们的终极偶像。切的遗骨可能消失了，可是他的精神还活着，切无所不在。



古巴街头随处可见切·格瓦拉的肖像。

“与切在一起”

在格瓦拉遇难43年之后，德布雷讲述了当年他在格瓦拉的玻利维亚游击营地尼阿卡瓦苏的情景。德布雷被捕之前化装成一个墨西哥的新闻记者，他与一个名叫西罗·布斯托斯的阿根廷画家结伴去采访格瓦拉，来到游击队营地。当时有人怀疑他们是特洛伊木马—美国中情局的奸细。因为在他们被捕6个月之后，格瓦拉和他的战友们被捕。

由美国作家乔恩·安德森所著的《切·格瓦拉传记》有两章特写了当时的情景。在传记所附的照片中有一幅是格瓦拉与德布雷、布斯托斯等

人在游击队营地的合影。还有一幅照片是格瓦拉阅读德布雷的著作《革命中的革命》的读书笔记中的一页影印。这些照片在格瓦拉与政府军的作战中失而复得，真实记录了当时的现场，成为具有文献价值的物证。

其时是格瓦拉的游击战最艰苦而磨难丛生的时刻。《切·格瓦拉传》描述了当年的情景：

几天前，玻利维亚警察突袭了营地下方的卡拉米亚庄园。切在回营地的路上传来更多坏消息。政府军回到他们的农场，没收了一头骡子和吉普，抓住了一名正在返回营地的信使。切加紧赶回营地。他回到营地时，发现营地里弥漫着一种失败的情绪。人乱做一团，人心涣散。

德布雷是在那时候见到格瓦拉的。其时他的身份是“一名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和卡斯特罗以及古巴的安全部门关系密切。他积极支持在拉丁美洲推行古巴的革命模式。格瓦拉和德布雷交换了意见，德布雷说他希望留下来参战。可是格瓦拉却说，如果在欧洲开展工作会更好，他会给国际和平斗士伯兰特·罗素写信，请求建立一个国际基金，资助“玻利维亚解放运动”。格瓦拉也接见了西罗·布斯托斯，这位阿根廷画家对其乡村游击战理论是否明智持怀疑态度。格瓦拉对布斯托斯说他的战略目标是夺取阿根廷的政权。

两天后，游击队营地就遭到政府军袭击。一架飞机轰炸了卡拉米亚庄园的周围地区。政府军杀死了15名游击队员，抓获了4名俘虏，其中包括两名“外国人”。格瓦拉的游击事业受到重创，德布雷和布斯托斯想要撤离前线，他们在走进小村姆尤帕姆帕的时候被政府军逮捕。

对德布雷的审判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对于格瓦拉来说，德布雷和布斯托斯被捕是沉重的打击，他们是格瓦拉向外界传递消息的唯一机会。据当时审问德布雷的人说，是德布雷最终证实了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消息。起初，德布雷说他是法国记者，跟游击队没有关系。可是随着审讯越来越严酷，他最终屈服了，承认被称为“拉蒙”的游击队司令实际上就是格瓦拉。



1964年12月，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第19次大会。



哈瓦那以东的度假胜地巴拉德罗出售给游客的印有切·格瓦拉肖像的钱包，最耐人寻味的是，它旁边就是美元图案的钱包。



古巴一位少女家中挂着切·格瓦拉肖像。

审讯员得知布斯托斯是艺术家，他们让他画出游击队员的样子。布斯托斯照做了，还画了游击队在尼阿卡瓦苏营地和窑洞的地图。德布雷和布斯托斯被捕后，格瓦拉和他的战友在丛林中披荆斩棘，长途跋涉，忍受酷热、寒风、大雨，到处寻找食物和水。他们一直寻找后方部队，可是始终没有找到。他们常常迷路，偶尔与政府军的巡逻队交火，哈瓦

那电台是他们了解外面情况的唯一途径。几天后在一次战斗中，格瓦拉身边的人牺牲，他与游击队员失去了联系。

《切·格瓦拉传》记录了那个悲伤的时刻：

切躲在一大块岩石后面，用M-2卡宾枪射击。但是没多久枪管被一颗子弹击中，枪没法再用。他的子弹夹显然已经丢了，他没有武器了。第二枚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腿小腿，第三枚子弹穿过了他的贝雷帽。切的敌人见到了他最后的样子：切躺在地上，他的双手被绑在身后，双脚也被绑。身边是他朋友的尸体，他腿上的伤口在渗血。

1967年10月9日，切·格瓦拉遇害。享年39岁。

1997年，切·格瓦拉的遗骸终于被发现，并运回古巴。

格瓦拉纪念碑矗立在古巴中部的圣塔克拉拉，那是他在革命战争年代赢得重大军事战役胜利的地方。此后每年的10月11日被确立为古巴的“国殇日”。

“两面之词”

切·格瓦拉遇害之后，一场为德布雷辩护的运动在法国巴黎发起。

当年的法国《世界报》刊登了德布雷被捕的消息，也刊登了法国知识界致玻利维亚国家元首巴里昂托斯将军的电报，其形式如同一份请愿书。众多的签名者对德布雷的命运深感忧虑，他们呼吁保障德布雷的安全。在数十名签名者中包括了当时法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有保罗·萨特、玛格丽特·杜拉斯、雅克·拉康、弗朗索瓦丝·萨冈等人，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如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将军也关注德布雷的命运，为他的自由而努力斡旋。

德布雷1940年9月2日出生于巴黎一个律师家庭，16岁时赢得法国文科竞赛奖，18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巴黎高师。他年轻的时候，世界正处在一个非殖民化运动高涨的年代中，法国先从印度退出，接着又在阿尔及利亚面临困境，与此同时，民族独立解放的浪潮波及亚、非、拉三大洲。青年时代的德布雷充满政治激情，部分原因在于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的高足。这位出版过《保卫马克思》的著名理论家，在巴黎高师影响了许多著名的学生，米歇尔·福柯和德布雷都在影响之列，当年探讨革命理论的兴趣是那个年代的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师生的时尚。

德布雷在切·格瓦拉之死中所扮演的角色，使他成为被争议的人。

他回法国后持续不断参与政治活动，且有大量的文学和政治作品问世，经常引起媒体关注。然而有人声称要清算历史，只是一直没有确切的凭据。直到1996年，格瓦拉的长女在阿根廷首都发表谈话说德布雷被捕后可能泄密，遭到当事人的反驳，其中包括当年玻利维亚军方的特工头目，出来作证否认德布雷泄密。2001年，还有人在追究德布雷所谓的历史责任。

德布雷对这一段可疑经历的回答在他大量出版的书籍中，他从不同角度回忆和讲述。

2014年出版的《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是德布雷与中国哲学家赵汀阳的最新对话集。谈到对以往政治激情的反思时他说："一切伟大的民族都需要（或者在他们活力最兴盛的时代曾经需要过）英雄的史诗、民族的传说、传奇的人物、国父（毛泽东、戴高乐、格瓦拉、曼德拉、华盛顿等）。然而革命也常常会在衰老中自我否定，反过来对付自己。反对滥用权力的无政府派起义最终会导致一个更强硬、更集中的政权。法国有过拿破仑，俄国有过斯大林，中国有过毛泽东，罗马有过凯撒。造反的精神最终变为被迫的服从，自发性变化为官僚化，不同政见变成正宗教条，这不是新东西。"

1967年德布雷被捕后，戴高乐将军亲自出面，向玻利维亚政府施加压力，政府相关部门和整个法国以及意大利都出面声援。德布雷的母亲是巴黎市议会的议员，也亲自出面，甚至还去见美国参议员。据说，玻利维亚政府试图通过德布雷的被捕与法国交换军火、工兵营的装备以及训练空军飞行员。结果因为是多方出面，最后玻利维亚政府派军方负责人去巴黎见法国外交部长，被当面训斥。更替总统之后的玻利维亚新政府当中有要员具有左翼倾向，此人与玻利维亚共产党领导人有亲戚关系。最后在各种因素的组合作用下，玻利维亚政府军只好释放德布雷。获释之后，德布雷向法国的相关部门写过感谢信。

从此开始，德布雷更坚定了政治上的共和主义精神（他在哲学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运用极其娴熟）。在他的政治自传《可敬的大人物》中，他表达了对戴高乐总统的敬意。

十年之后，法国总统密特朗任命德布雷为外交事务特别顾问。

多年来德布雷穿梭于政治和思想界，穿梭于哲学和文化研究。青年时代的革命理想，在拉美丛林里与切·格瓦拉亲历游击战，这样的经历使他对世事有更为深入而透彻的理解。

2014年9月德布雷再访中国，此次访问中他再次回忆拉美革命。

再次重温他与切·格瓦拉共同经历的时光，也深省那段岁月带给他的启示。

（本文写作受益于《切·格瓦拉：玻利维亚日记》以及美国作家乔恩·安德森所著《切·格瓦拉》）

四部电影、四个阶层眼中的古巴

电影揭开古巴神秘面纱

几乎每一部古巴出品或以古巴为主角的电影，都从哈瓦那开始。镜头慢摇，目之所及往往都会有一个站在某处楼房天台的视角，或者有些残破的年轻城市。海滨大道旁的海浪总会被岩石敲碎，它们前行的旅程在此处戛然而止，撞碎的水花会飞溅到马路上，仿佛在以这种方式诉说着古巴近代史。

撰文/Heisenberg

处在地球另一边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对我们来说是神秘的。但这种神秘跟我们的邻居朝鲜不同，是另一种形态。在一种可能是最极端的意识形态的交锋下，这里的文化，犹如两个巨大的地球板块猛然撞击，呈现出了让人感概万千的效果。同时，它跟整个世界又有很大的距离感—地理位置上它远离我们，文化位置上它又远离资本主义国家。当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很多国家纷纷改弦更张后，古巴依然在坚持，所以它算得上是老牌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自从古巴革命之后，古巴始终没有停止跟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一直保持着初生时浪漫而又残酷的状态。

所以，古巴是神秘的，神秘而激烈。它时而像是在给我们展示着最本质的自我，时而却又像迷失了方向，在路上不断找寻。

残酷史诗——

社会主义者眼中的古巴成长

诗意的古巴历史，在米哈依尔·卡拉托佐夫上帝视角般的长镜头中游走。《我是古巴》是了解古巴革命史的一个绝佳入口，它不仅叙述了史实，更传达了灵魂。这部电影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古巴革命刚刚胜利，在卡斯特罗的带领下，古巴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卡斯特罗想拍摄一部关于革命的电影，并寻求苏联电影工业的帮助，苏联派卡拉托佐夫来到了古巴。

不过这首“电影诗”在尚未成熟的古巴观众那里并不受欢迎，苏联观众则觉得它的意境太过“清淡”而缺乏革命的气息。此外，在那个意识形态争斗强烈的年代，《我是古巴》上映范围仅限于社会主义国家，也导致它不可能接触到更多观众，故而被雪藏。直到1994年美国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在一场朋友的私人放映会上看到本片并惊呼：如果我们早点看到

这部电影，现在的电影可能就是另一种风貌了！

长镜头在《我是古巴》中的运用，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电影一开始，当画外音以平静的口吻叙述着西班牙殖民者发现古巴，掠夺其资源，书写着“苦涩的甜”的这段历史时，镜头没有中断地跟随一只小木筏，在河道中徐徐前行。河道之上，则是普通古巴民众平凡的生活。

影片的第二部分从古巴的乡村来到了都市，而《我是古巴》中，“城市”就是服务西方侵略者的所在。“我是古巴，为了你，我是赌场，我是酒吧，我是酒店，我是妓院。”在一个顶楼泳池，卡拉托佐夫的镜头俯拍整个城市，这个摇臂镜头最终聚焦到了一个泳衣女郎身上。女郎走向泳池，镜头跟着她，紧接着女郎跳进泳池，这时镜头略晚几秒地跟到了水面上，旋即也潜入了水底。从水面到水下摄影居然连贯成了一个镜头，这对技术的要求很高，类似的长镜头充盈全片，跨越了物与物之间的界限，巧妙的镜头运用延展了观者的视线，也解放了观者的情绪。

《我是古巴》的第三部分，开始于佩德罗老头快乐的希望，最终却以绝望收场。他每天穿梭在自家的甘蔗园中，盼着甘蔗快快长高。值得高兴的是这年天气很好，甘蔗也不负众望地获得丰收。到了收割的季节，老佩德罗带着一双儿女在地里辛勤劳作，甘蔗园里响彻镰刀舞动的声音，如古巴民谣般动听。可是，甘蔗还没收完，地主就来了。地主通知他的这片地还有房子都不再属于他。地主走后，绝望的老佩德罗支开了儿女，用一把火烧了一切。此时，毫不知情的儿女还在村里载歌载舞庆祝，看到两人的高兴模样，村民们都猜测：老佩德罗今年的收成不错。

古巴的历史走到这个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了顶点，革命呼之欲出。电影接下来将镜头对准了一群革命青年，当既得利益者在城里散布卡斯特罗已死的消息，试图打击大家的革命决心之时，这些年轻人也在暗中策划一次行动，试图让民众了解真相。








电影《我是古巴》是了解古巴革命史的一个绝佳入口，这部电影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古巴革命刚刚胜利。卡斯特罗想拍摄一部关于革命的电影，并寻求苏联电影工业的帮助。

低度开发的成熟或腐烂——

中产阶级眼中的古巴成长

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古巴境内的意识形态之争或许是最激烈的。它几乎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而且美国就在家门口。1959年初，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民推翻了美国扶植的巴蒂斯塔政府。经过严密的筹备，两年后美国展开了反扑并占领了长滩和吉隆滩，吉隆滩战役爆发。这场战役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猪湾战役。战争的结果是古巴获胜。

电影《低度开发的回忆》就发生在这场战役前后，男主角是个衣食

无忧的中产阶级花花公子，他把父母和妻子送往了迈阿密，自己却留在了古巴。

由于受到法国新浪潮电影影响，《低度开发的回忆》有着纪录片式的原始感，但这种感觉又可以分成两种层次。讲述革命事件时，本片完全采用了纪录资料片。在故事片中使用资料片是一种常用手法，但如此大篇幅使用还是很少，除了节约拍摄成本，也造成了一种割裂。仿佛这场在古巴街头巷陌发生的革命跟主角毫无关系，甚至完全不像是在同一部电影中。

当然就算导演没有采用如此富有疏离感的手法，男主角跟他周围的世界也是分裂的。哈瓦那的街道上，到处是枪战、游行、抗议人群遭受水枪攻击的场景，而我们的男主角此时却在湖中跟女人缠绵。这种看似"没心没肺"的生活，只是表象。男主角后来坦白：他无法跟这个国家的人民产生联系。这里的人没有能力积累经验和发展，因为喜新厌旧的人民不去思考，只是在追逐，在不断适应每一次危机。这正是男主角为何与环境格格不入的根本原因。他不是留恋旧日的优越生活，而是有意识地拒绝改变，拒绝被集体无意识赶着往前跑。历史的一系列变故后，他愈发对群体性的盲目感到哀伤，便愈加远离周遭的一切。

然而，人不能是孤岛。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古巴取得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一次胜利；而在个体身上，拥有小资情结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男主角，最终迎来了迷惘和空虚。

在这样一个历史变革极其戏剧化的国家，到底是跟随历史潮流热烈地活着更幸运，还是离开历史漩涡清醒地思考更幸福？我们不得而知。甚至，谁又能肯定，热烈了就无法清醒，清醒又何尝不是内心的热烈。就像男主角并不觉得38年的光影让他变得聪明了，而是什么还没经历就烂掉了。就跟古巴的热带水果一样，成熟得快，腐烂得也快。

SOY CUBA

UNA PELÍCULA DE MIKHAIL KALATOZOV





ICAIC



在最美好的时光里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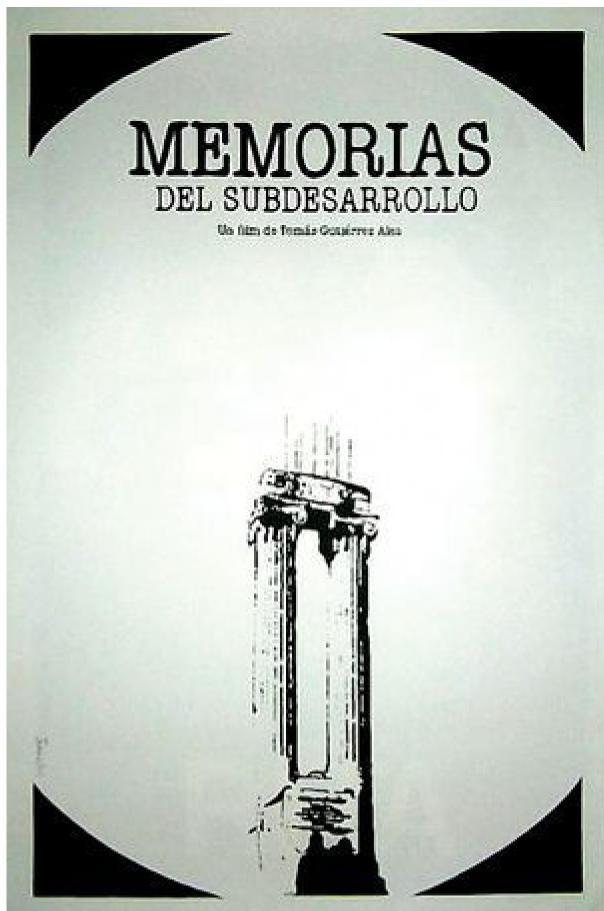
无阶级概念者眼中的古巴成长

除了青春、革命、雪茄，古巴也总是与音乐相连。古巴音乐，歌词述说各种故事，它甚至可以吸引维姆·文德斯跨越大半个地球，来到哈瓦那，探寻它魅力背后的故事。

在非音乐类的本土电影题材里，我们也总能看见古巴音乐的身影。在前文中提到的《我是古巴》兄妹俩在农村市集的载歌载舞的片段中，就有古巴音乐的体现。《古巴万岁》里也有古巴音乐的身影—马露被误认为是一个来表演《小红帽》的学生，结果她将错就错高歌一曲还上了电视。

马露的故事，开始于一场私奔。

这个世界上喜欢让孩子们私奔的导演不止是韦斯·安德森。因为私奔大概是这世上最浪漫的勇敢，而孩子让这件事变得更纯粹，这是纯粹的爱情历险。其实这样的私奔都是童话，只是在《古巴万岁》里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场不带政治色彩的革命。



电影《低度开发的记忆》发生在吉隆滩战役前后，男主角是个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花花公子，他把父母和妻子送往了迈阿密，自己却留在了古巴。

电影《古巴万岁》里主人公马露的故事开始于一场私奔。这场私奔在《古巴万岁》里看起来更像是一场不带政治色彩的革命。

生活在哈瓦那的小姑娘马露的快乐童年就要被强行改变了。她改嫁的母亲要移民了，并且写了一封信寄给远在古巴岛另一端的马露父亲，让他同意自己带马露出国。而马露却想继续留在哈瓦那，于是她跟最要好的朋友热吉托一起，从哈瓦那出发，穿过马坦萨斯、巴拉德罗、特立尼达，最终抵达卡马圭，这条线路几乎横穿整个古巴。两个孩子的理想虽然很渺小、很私人化，但对他们来说其分量跟切·格瓦拉年轻时横穿拉丁美洲无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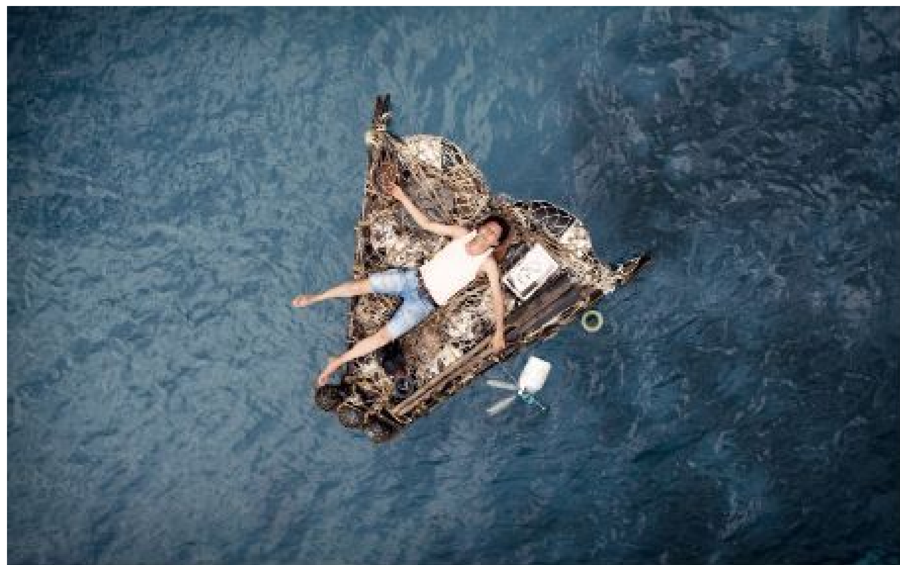
跟韦斯·安德森式的私奔相同的是，马露和热吉托的行李包里也装满了对旅行无用、他们却很在乎的东西，比如奶奶的遗像。不同的是，发生在古巴的这场私奔里有很多社会元素。马露和热吉托来自不同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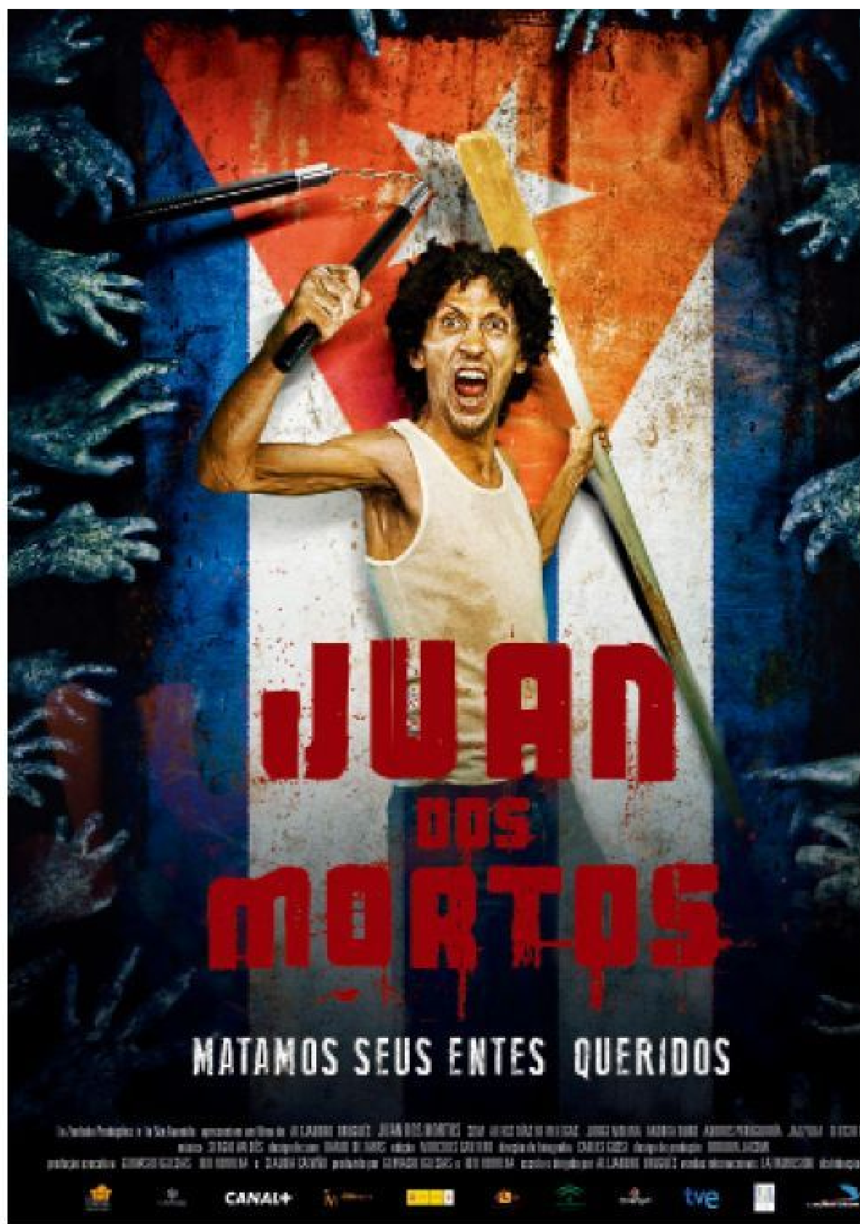
阶层—富有的和贫穷的、信仰“西方”宗教的和信仰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双方家长之间似乎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马露和热吉托一路经过的地点，也带有更多导演对古巴社会的观察和思考。特立尼达这座城市昭示着殖民主义时期的大量遗迹，巴拉德罗也是一座西化非常严重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刻画就像《我是古巴》里展示的城市面貌一样。

在距离目的地不太远的山区，两个小孩意外闯入了一个古巴“驴友”的帐篷。这个自称是地质学家的驴友，看起来却更像为了寻找自我甘愿在年轻时浪迹天涯的人。所以我们似乎有一种预感，他能完全理解这两个孩子的行为，或许还会帮他们一把。一切都跟预期的一样，地质学家载着两个孩子，来到了马露父亲工作的灯塔，孩子们在哈瓦那的亲人也同时赶到。

故事发展到这里，按照以往的观影经验，我们将在励志的情绪中看到“大团圆”的结局。但不要忘记，这是一部古巴电影。浪漫感建立在血雨腥风的革命之上，也就注定了马露和热吉托这场诗意旅行的终点并非“一切问题都解决”。没人被他们的行为感动，没人去重视他们离家出走的情感动机，问题还是问题，争执变成暴力。

或许，也只有他们最终朝向大海的纵身一跃，才能真正化解一切吧！





电影《僵尸胡安》有典型的英美僵尸片特征，然而在细节上却处处体现着古巴范儿。

政治是对世界最简单粗暴的解读——虚无主义者眼中的古巴成长

2011年一部古巴制造横空出世，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影迷的注意。

不过这部电影的类型却显得不是那么古巴—这是一部僵尸片。

《僵尸胡安》有典型的英美僵尸片特征—片名和片名的美术设计明显都受到英国电影《僵尸肖恩》的影响，然而细节上却处处体现着古巴范儿。电影一开始，潜水捕鱼的男主角、男二号，就在聊要不要去迈阿密的事。在暗示自己能够度过僵尸屠城危机（当然戏中角色并无此自觉）时，男主角胡安的对白是："经历过古巴在社会主义征程上面临过的各种艰辛，还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呢？"

说到这儿，似乎僵尸类型代表西方文化，僵尸吃了哈瓦那居民的大脑就像文化侵略。胡安这个"看清美国梦也没啥大不了，古巴才是天堂"的角色，则捍卫了自己的立场。这种解读放在其他国家的电影里可能会过度，但在古巴电影里，它要么是隐喻，要么是对隐喻的嘲讽。

但不要以为主角们说了爱国内容的话，就会以高、大、全的形象出现。比如胡安坐过牢，第一次捞到僵尸还以为自己误杀了人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别让人知道。又如，他前脚去跟前妻告白，后脚就跟邻居瞎搞。如果这还不足以暗示他的政治立场，那么后来社区唱国歌活动时，他的表现则完全明示了他的态度。

这是一群社会边缘人，胡安、粗鲁的男二号、男二号不务正业的儿子、金链壮汉和同性恋——这群主流眼中的边缘人，不近不远地站在人群后面，对这种教条的形式丝毫不感兴趣。这群人是《僵尸胡安》的打怪主力。

他们到底是如何站队的呢？其实他们是一群生活很西式却又不会离开古巴的人，理所当然地觉得美国的月亮更圆。他们没有信仰。胡安隔壁老两口，老头先感染了病毒，在胡安之流怎么也杀不死他时，想到了用老头家的十字架给他驱魔。然而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仪式并没有什么作用，于是胡安用十字架爆了老爷子的头。电影进行到这里，胡安之流刚刚讽刺过唱国歌的，紧接着又嘲弄了信基督的，等于各赏五十大板。

细想来这种讽刺的喜剧效果背后却有颇多心酸。正是因为没有站队、淡漠政治、信仰缺失，胡安才能在其他人打算用游行抗议解决问题时，发现了真正的问题所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种政治形态、宗教思想，它们各不相让。一个企图征服另一个之后还想征服全世界，而这种争斗发生时，人经常要被迫放弃平和的生活并加入战斗。

浪漫和诗意，其实都是残忍无比的字眼。一如《僵尸肖恩》在反思现代都市白领的麻木，《僵尸胡安》也反思了信仰问题—显然两者都为各自国家的时代精神把了一脉。

【独家记忆：在古巴行走】

哈瓦那：冻结在胶囊里的时光

这是一座时间慢流的城市，老爷车、革命的激情、慢悠悠的生活，让人恍然间回到了那段冻结在胶囊里的旧时光。它有殖民时代的印痕，它有革命时期的冒险，它也有摩登时代的时尚……它，就是哈瓦那。

撰文/顾剑

我到古巴的第一站是哈瓦那。

一出机场海关，扑面而来的除了潮湿温暖的空气，还有“70年代”的感觉。机场的设施有些陈旧，宽大的旧式座椅，老式的航班到达显示屏，还有一拥而上的当地人，争相问你需不需要换钱或者乘坐出租车。

好不容易挤出人群，我乘车前往林肯旅馆。它位于市中心靠近海边的位置，是一栋独立的9层大楼。略显破旧的国营旅馆，在历史上却赫赫有名。上世纪50年代，这里是哈瓦那数一数二的高级旅馆。1958年，古巴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期间，林肯旅馆还曾接待过著名阿根廷赛车手卡洛斯·方吉奥，他是早于舒马赫的“五连冠”传奇人物。更奇特的是，方吉奥还在这里被革命党绑架，这近乎盗侠罗宾汉的行为，竟令被绑者很是欣赏。我在旅馆5楼看到了方吉奥曾经住过的房间，墙上挂着他的照片。不知道他20年后与绑架者卡斯特罗“相逢一笑泯恩仇”时，是否还怀念过这里，以及这座城市。

而我在哈瓦那的旅行，却经由这奇特的故事拉开了序幕。



哈瓦那港口，远处是莫罗城堡。

悠然老时光：殖民时代的蓝调

哈瓦那城市的北面和东面都是大海，但风景最美的地方是位于东北角的哈瓦那城堡和港口。热带阳光下的加勒比海，蓝得很通透，港湾里停泊着几只小木船，也被刷成明亮的天蓝色，随着雪白的浪花一漾一漾，让人觉得悠闲又舒适。浪花徐徐推进，一波又一波，拍碎在城市北海岸沿海大道外的防波堤上。远处的山顶是高耸的莫罗城堡，在拱卫海港入口。

1898年，这平静的哈瓦那港却发生了一件极不平静的事。2月15日，当美国海军战列舰“缅因号”在那里抛锚时，突然发生了爆炸，巨大的声响，冲天的火光，震动了整个哈瓦那港。很快，军舰沉没，258名美国水兵因此客死异乡。当时美国跟古巴的殖民地宗主国西班牙关系紧张，尽管20世纪70年代在分析、梳理证据之后确认“缅因号”爆炸只是一个意外，但在1898年，这次爆炸成为美国向西班牙宣战的导火索。

美国对待“缅因号”灾难的态度，夹杂着恐惧、自豪和复仇的激情。一位名叫约翰·布莱克·阿尔金斯的记者1898年4月来到美国曼哈顿，他在《曼彻斯特保卫者》中描绘了美国公众对于这场即将爆发的美西战争的期待：


政府大楼上的切·格瓦拉像，这是哈瓦那的旅游名片。摄影顾剑

美国国旗在所有的街道和窗户上悬挂着。好战的观点和战争简报贴在商店的窗户上。街上行走的男男女女和他们的狗带着美国的徽章或者“支持”字样。自行车装饰着国旗的颜色好像要进行一次奇特的服装展示游行。人们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口号“记住缅因号！”

美西战争以美国大获全胜结束。美国夺取了西班牙在海外的两个重要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美国国旗在哈瓦那飘扬，西班牙总督被美国将军伍德取代。在哈瓦那城堡这片地区，曾经的西班牙总督府，也是后来的美国总督府、首个古巴总统府，如今被辟成博物馆，留待人们参观或怀念。不过，我对参观总督府兴趣索然，注意力却还是被那个日常的哈瓦那所吸引。

古巴或许经济欠发达，但是在海边晒太阳、野餐的人们、在海滩上嬉闹的孩子、在防波堤上垂钓的老翁，都给人安贫乐道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热带气候的关系，就算在哈瓦那这样大都市的海边，人们走路的节奏也是缓慢的，仿佛从几百年前的殖民时代就是如此，也许还会一直像这样慢下去。我也坐在防波堤边发呆，想起木心那首小诗里的几句：“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有些老城，只是保留一个空壳，为游客展示过去的生活，像是一个博物馆，比如卡塔尔的多哈、阿塞拜疆的巴库。但哈瓦那不是这样，人

们居住在旧城那些狭窄的街道中，而殖民时代堂皇宏伟的旧建筑里仍然住着七十二家房客。街巷窄窄的，经常能看到当地人在银行和粮店门外大排长龙。尤其是粮店，往往只有一家门脸，屋子里是柜台，柜台后则堆着面粉之类大包装的食品，墙面货架上疏疏落落地摆放一些面包或蛋糕的制成品。我不由想起小时候凭粮票排队买米买面的日子来。



哈瓦那革命博物馆前的苏联坦克。

街道两旁的建筑，以西班牙殖民时期风格为主。建筑外立面精雕细琢，窗户细长，外有铸铁护窗栏杆。因为户外阳光毒辣，屋子阳面的窗户一般都不会打开，这使得突然走进室内的人们通常眼前一黑，要适应好一会儿。不过，这些旧房子的现状都令人揪心，一方面毕竟国家经济困难，政府没有钱来维护这么多普通楼房，另一方面，古巴又没有私企能承担这项社会责任，这些老楼便只能任由荒废了。不过，古巴政府也选择性地维护了一些更古老的建筑，诸如旧城中心欧洲巴洛克风格的哈瓦那大教堂，西班牙殖民时期修建，有400多年历史。

在哈瓦那大教堂门前那条街上，有一家酒吧，就连白天也聚集了大群的游客在这儿喝酒。这些人，都是跟着大作家海明威来凑热闹的，当年海明威喜欢在这喝一杯Mojito。我也点了一杯Mojito。按照古巴的物价标准，简直贵得离谱：5外汇券比索一杯。要知道，15比索能在家庭旅馆吃到一顿有三只龙虾的晚餐，20比索在旧城区的高级餐馆能享用一顿可口的西班牙美食。

这个酒吧还兼卖革命纪念品，墙上贴着革命时期的招贴画，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到处都是。在酒吧门口，有几位满脸皱纹、瘦小干瘪

的当地老头老太太，叼着巨大的哈瓦那雪茄，游客特别喜欢与他们合影。或许，这里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哈瓦那：革命的纪念品、抽雪茄的老人、海明威的酒等等。

还有一样，也是哈瓦那或者说是古巴的象征——老爷车。很多人以为，古巴街上到处都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爷车，一派复古的情调。其实不然，古巴的确有很多老爷车，但能跑得动的不多了，哈瓦那大街上缓缓驶过的老爷车，一般都是为了招揽游客兜风赚钱的。但这并不妨碍我找个地方静静怀旧，据说哈瓦那有两个看老爷车的最佳去处，一个是城堡前的广场，另一个是新城与旧城交界的国会大厦门前广场。



哈瓦那革命博物馆大厅，也即哈瓦那前总统府。



哈瓦那破败而精致的老楼.



近年，咖啡馆这样的小型商户都有着朝向街道的门脸，所有古巴人都微笑着等待一场真正的改革



哈瓦那国会大厦广场前的老爷出租车。

仍旧是革命的纪念

老城的西南方向是新城区，留有许多与古巴革命相关的遗迹，比如：议会大厦、中央公园、革命博物馆、革命广场、革命纪念碑等等，不胜枚举。

革命博物馆尤为值得一提，这是革命前巴蒂斯塔的总统府。巴蒂斯塔1902年出生在古巴一个甘蔗种植园里，他声称自己血管里流淌着非洲人、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中国人的血液。作为革命领导者、选举产生的总统、军事独裁者和黑手党中腰缠万贯的卫士，他在古巴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印记，只有1959年的革命才最终将他抹去。在那之前，正是在这座建筑中，曾经发生过刺杀巴蒂斯塔总统的事件。当时，一批刺客已经攻进了总统府，巴蒂斯塔利用暗道逃跑，才躲过一劫。今天富丽堂皇的会客大厅悬挂着巨幅古巴国旗，在内阁会议室外面的楼梯走道里，还能看见那场刺杀枪战留下的弹痕。

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有一个被大玻璃罩保护起来的游艇。不用说，这就是在古巴历史上有名的“格拉玛号”游艇。1956年12月2日，卡斯特罗、格瓦拉等82人乘坐它从墨西哥漂洋过海准备登陆古巴，计划以此来引发一场广泛的、全国范围的暴动，进而推翻独裁者。尽管这最终被当作一次最为英勇的史诗般的行动来歌颂，但无法掩饰这是古巴秘密登陆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次。

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缓慢航行的“格拉玛号”比原计划晚了两天才到，多数游击队志愿军因为晕船而萎靡不振。因为晚到，原本在红滩接应船只到达的卡车被迫撤退了。更糟糕的是，“格拉玛号”即将登陆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在到达后的几个小时里，他们遭到了来自空中和陆地的夹击。历经千难万险，登陆10天后，他们才与国内抵抗组织的成员会合。

虽然有一个不幸的开端，但这件名垂拉丁美洲史的重要事件，还是为卡斯特罗带来了好运。短短3年之后，卡斯特罗赢得了革命的胜利。胜利引发的狂热激情，使得卡斯特罗效法早期西班牙征服者的惯用方式，开始了从圣地亚哥到哈瓦那的漫长的全国巡视。从当年的资料片上可以看到，他有时坐着敞篷吉普，有时在一辆坦克上，频繁地停下来向热情的群众招手示意。

1957年1月8日，卡斯特罗抵达了哈瓦那，穿过狂热而兴奋的人群，进入了哥伦比亚兵营。如今，这座曾经最大的兵营已不复存在，但卡斯特罗那堪称神奇的故事却还被传颂着。他在哥伦比亚兵营演讲，向现场的听众们演说革命团结的必要性。这时，一件被所有亲历者铭记的突发事件—两只白色的鸽子飞过来，停在他的肩膀上。有人说，这是一个意想不到但具有积极意义的象征，标志着古巴历史新时代的开启。



哈瓦那大教堂，这是一座西班牙殖民时期的老建筑。



哈瓦那城区的迷人风景。

那时的哈瓦那，是一个喜庆、狂欢的城市。据当时在哈瓦那的意大利出版商贾科莫·菲尔特里内利在书中的描述：这里满是西班牙人、黑人和华人，充满着生机和色彩，“你经常会在这里或者那里碰到那些留着大胡子的游击队员。他们全副武装，带着手枪和冲锋枪，懒洋洋地坐在公共建筑前的大椅子上，防备着敌人的袭击。”

在哈瓦那新城内陆腹地，还有一处古巴革命广场，广场中心形似竹节的建筑是国父何塞·马蒂的纪念碑。纪念碑背后正是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卡斯特罗兄弟的办公室就在那里。

中央委员会不开放参观，连远远地拍照也是被禁止的。于是人们转而拍摄内政部大楼上巨幅的切·格瓦拉画像。这幅画像是哈瓦那的旅游名片，经常出现在各种关于古巴的文章和游记里。

内政部大楼旁边是信息部大楼，其上还有另一幅巨像跟切·格瓦拉遥遥相对。乍看之下，我吓了一跳：难道古巴政府这么痛恨美国，居然于此悬挂“9·11”事件元凶本·拉登的巨幅纪念像？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看上去颇像本·拉登的大胡子，是古巴革命中的另一位英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时，他与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一样，被看作这场革命的象征。但革命成功几个月后，他还来不及更充分地描绘自己的壮丽人生，就不幸早早离开了人世。我发现画像角落有一行西班牙语小字：“Vas Bien, Fidel”，这是西恩富戈斯去世前不久和卡斯特罗通电

话时留下的一小句名言，翻译过来是—“放心，一切都好，菲德尔”。

从革命广场离开的当天夜里，我又去哈瓦那郊外的演艺厅，看了一场上世纪50年代百老汇式的盛大歌舞秀Tropicana。这场歌舞在革命开始之前就曾经蜚声世界，场面宏大，歌舞和灯光设计均属一流，彼时大概要算是“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生活方式。它被保留到今天，让观者好像突然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纽约百老汇。那种歌舞升平、衣香鬓影，令我恍然不知身在何处。在这个穿越的夜里，在这个时光胶囊一样的城市，时间仿佛倒流，我不由得在心里重复了一句西班牙语：

“Vas Bien”——放心，一切都好。

圣地亚哥：古巴革命的背影

名为“圣地亚哥”的城市很多，但唯有古巴的这座，洋溢着革命的浪漫与激情。或许，每一块墓碑下，都是一位革命英雄；每一栋老建筑里，都住着一段令人血脉偾张的往事……

撰文/顾剑

早春三月，无论波士顿还是北京，都还春寒料峭。若这个时间到古巴，却是30℃以上暑热难当的季节。为了躲开今年波士顿创下历史纪录的纷飞大雪，我专门飞到古巴避寒。

圣地亚哥是古巴第二大城市，在狭长的古巴地图的最南端，与首都哈瓦那分据南北。我到达的时候，火红的凤凰花在明晃晃的阳光下绽放，大王棕榈树笔直而挺拔，城市南面铺陈着一望无际的碧蓝海面，而西面的天际线上，则横亘着峰峦叠嶂的马埃斯特腊山脉。

当我每每从旅馆细长的窗口，望向那一隆起伏的曲线，脑海中总会浮现“革命”二字。1868 年，爱国领袖卡洛斯·塞斯佩德斯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亚拉小镇上发表了著名的“亚拉宣言”；1895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从多米尼加率领远征军在马埃斯特腊附近的普拉依达斯登陆；1956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起义军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斗争……

是啊，一线自然天成的山脉尚且引发了诸多的革命联想，那这座城市呢？



圣地亚哥的大街小巷和殖民地风格的楼宇。

公墓里的古巴近代史

一清早，我乘出租车造访古巴最漂亮的公墓——圣伊菲热尼亚公墓。或许有人会忌讳坟墓不吉，其实西方的公墓绿草如茵、宽敞明亮，墓碑的工艺也很精湛，与公园并没多少区别。因此，在欧美旅行时，我一向很爱逛公墓，诸如巴黎的拉雪兹神甫公墓、莫斯科的新处女公墓，

对于懂一点历史的人而言，墓园就是历史。

诚然，圣伊菲热尼亚公墓，也写就了历史。古巴两次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卡洛斯·塞斯佩德斯与何塞·马蒂，以及古巴革命时期很多英雄都被葬在这里。

卡洛斯·塞斯佩德斯对于古巴革命以及这个国家的意义，只需看后人对他的称谓便能明了——“祖国之父”。1868年10月，49岁的塞斯佩德斯将朋友和奴隶集合到自己的德玛西亚瓜庄园，制定了“亚拉宣言”。十天后，他的部队占领了巴亚莫，监禁了西班牙卫戍部队的降兵。他的手下费奥雷多为此写下了后来成为古巴国歌的诗句：

快起来，上战场，巴亚莫的勇士们！

祖国正骄傲地注视着你们，

不要惧怕光荣的牺牲，

为了祖国献身，就是永生！

“为了祖国献身”，在将近一个世纪以来，都是这个国家的一项传统。很快，领袖塞斯佩德斯顺理成章地当选总统，但卷土重来的西班牙正规军接连挫败了政府起义军，由于看不到战争结束和外交上的结局，起义者内部的分歧越来越大，塞斯佩德斯被赶下总统的宝座。1874年2月，55岁的他在一次小冲突中牺牲。毋庸置疑的是，虽然失败，但由他开始的十年战争最终导致了古巴的独立。

从塞斯佩德斯的墓地，踱步到何塞·马蒂的墓地，只需短短的几分钟。象征西班牙殖民时期各省的6根柱子高擎半圆形墓顶，阳光穿过墓顶的六边形天窗，洒在沉思的马蒂雕像上。石棺上是一面古巴国旗，四周鲜花环绕。果然是应了马蒂在诗歌中所写的——“当我长眠在异地，没有祖国，也不是奴隶。我只愿自己的坟墓上，放着一束花，一面旗。”而这诗的前几句是：

普天下的穷人，

我愿与他们共命运。

我是好人，作为好人而死，

我要面向太阳！

我更愿意以诗人的身份来理解马蒂。从老照片上看，他身材矮小，

浓眉大眼，留着八字胡须，总穿着黑色的上衣，系着白色的领带。大部分时间，他作为流亡者居住在美国，坚定地倡导古巴独立。1891年，针对美国的威胁，他写道："我知道这个怪兽，因为我曾生活在它的兽穴中——我的武器只有戴维和弹弓。"在20年的时间里，作为革命活动家、政治理论家的马蒂，不断地为古巴奔走。在一封给女儿的信里，他这样描述自己：

我全副武装，肩扛步枪，皮带上挂着我的砍刀和左轮手枪；一肩悬挂着装有100发子弹的布包，另一肩悬挂着卷成筒形的古巴地图；在我的军用背包里，装有价值50英镑的药品、衣物、我的吊床、一张毛毯和书籍；你的照片挂在我的胸前。

这位刚过不惑之年的政治组织者，或许并不是一名优秀的游击战士。1895年，马蒂率领起义者奔赴古巴东部的奥连特省托河前线。5月5日，他与马塞奥领导的起义军在圣地亚哥附近会师。19日，起义军陷入西班牙人设下的埋伏，马蒂勇敢地骑着一匹白马冲锋陷阵。他先是颈部被一颗子弹击中，坠下马来。受伤的马蒂站起来，继续冲向敌人，再次被子弹击中——马蒂牺牲了，时年42岁。

每半个小时，马蒂墓前都有换岗仪式。对这位浪漫革命者的纪念，几乎遍及全古巴——每个城镇都有一个博物馆，每个学校外面都有一尊白色的半身石膏像。甚至，位于哈瓦那的国际机场也以何塞·马蒂命名。事实上，古巴许多广场和街道的名字也都与这些革命者相关。有些是为了纪念诸如何塞·马蒂这样的19世纪独立战争的英雄，有些则是铭记20世纪50年代古巴革命的风流人物。

圣地亚哥埋葬着古巴独立史上几乎所有名人，是打响古巴革命第一枪的地方。在这座城市漫步街头，我能依稀看见"革命的背影"，浮印得比哈瓦那更加清晰。


革命英雄的墓碑上是基督的雕像，这在古巴很普遍。

“任性”的革命传奇

从国家公墓到圣地亚哥火车站大约有3公里，继续沿着上山的方向步行，很快就可以走到市中心的塞斯佩德斯广场。不出意料，广场中央竖立着塞斯佩德斯的雕像，顺着雕像朝北望去，有一幢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西班牙建筑——这是多么充满戏剧性的一幕——1868年，塞斯佩德斯主导的独立运动胜利，正是在这幢曾经的西班牙总督府里，首次公开发表了独立宣言。91年后，又一位革命领袖出现在这幢小楼的二层阳台，宣布古巴革命胜利。他，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的传奇故事，广为人知。他掌控了古巴政治和历史超过半个世纪，使古巴成为世界舞台中举足轻重的一员。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袭击蒙卡达兵营的行动算是一次重大转折，当时他还只是一个26岁的充满活力的青年。



巴士驶过圣地亚哥安东尼奥·马塞奥革命广场。马塞奥是古巴独立战争军事领导人。



圣地亚哥“卡里布小屋”俱乐部，这里是聆听非洲风味古巴音乐、观赏伦巴舞的天堂

蒙卡达兵营博物馆距离塞斯佩德斯广场不远，只需往东穿过两个广场便到。这是一幢四四方方、有着两层城垛的建筑，外墙上还有坑坑洼洼的弹痕，现在被涂上了带有白色条纹的亮黄色。但这仍然无法遮蔽它曾经的阴沉灰暗。20世纪50年代，作为仅次于哈瓦那哥伦比亚兵营的全国第二大兵营，蒙卡达兵营常被视为高压政府的象征。

1953年7月，卡斯特罗兄弟带领一百多名游击队员试图袭击并占领

这里，同时发动全城的反政府暴动。游击队员们化装成政府军，想坐卡车混进驻军大院，计划突袭政府军宿舍。谁也没想到，由于他们脚上的鞋子没换，在大门口停车检查时被卫兵识破。战斗提前打响，奇袭被迫改成强攻，结果自然是寡不敌众，大部分革命者阵亡或者被处决。卡斯特罗兄弟也因此被捕、判刑，流亡墨西哥。在美国学者理查德·戈特所写的《古巴史》中如此评价这一事件：

这次行动是一次灾难性的失败，就像共产主义者们所形容的那样，是一次毫无准备的政变……但蒙卡达事件是对政权的一次挑战，它奠定了一个革命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将在不到6年的时间内取得政权。它也使得运动领导者的名字传遍了整座海岛。

如今，这座兵营保留了小部分展厅，纪念那次失败的行动，而大部分的建筑，则被改建成学校，不对外开放。我在学校门外，看到课间休息的古巴小学生，居然也戴着红领巾，顿时觉得这个黑皮肤的热带国度变得亲切了。

古巴革命和中国相比，更像城市游击战，或者说，还有点冒险故事的意味。诸如我听到过一个传奇性的革命故事：1953年，革命党人在一级方程式大赛前夕成功绑架了“赛车之王”方吉奥，非常礼貌地给予优待，还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大赛之后又释放了方吉奥。20年后，已经是阿根廷汽车公司老板的方吉奥，还回到古巴和当初绑架他的卡斯特罗把酒言欢。这真令我惊叹——活脱脱就是一个罗宾汉的传奇！

可就是这么不靠谱的战略战术，在古巴还真能奏效。后来，我旅行到古巴中部的圣塔克拉拉城，在城东见到古巴革命又一个传奇纪念地，一块纪念碑兀自矗立在锈迹斑斑的铁轨旁娓娓道来：当年切·格瓦拉率领18名游击队员，只带了轻武器，在此伏击政府的列车。这是一辆有22节车厢的装甲列车。最终，这辆列车以及车上350多名政府军，全部被这19名游击队员俘虏了！这听起来近乎天方夜谭。不过，我想事情发生的时间也许可以解释一切：1958年12月29日。3天以后，1959年1月1日，就是古巴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日子，或许彼时巴蒂斯塔的政府军早已没有任何士气可言了。

从蒙卡达军营打响第一枪的悲剧开端，到圣塔克拉拉铁路之战的喜剧收尾，古巴革命的历史，就是这么“任性”的一段传奇。



只有在法式杜姆巴聚会上，才可以看到辛塔舞。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遗产

社会众生相：革命的背影

尽管圣地亚哥随处可见革命遗迹，但似乎没有太多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个人崇拜。说起来卡斯特罗在古巴掌权半个多世纪，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不仅是他的亲弟弟，还是与他并肩战斗的第一代革命领导人。我在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卡斯特罗的标准像。大概唯一能看到卡斯特罗巨幅画像的地方只有一处，就是当地的古巴共产党党部。

反而倒是切·格瓦拉的头像，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切·格瓦拉受到古巴全民的推崇，地位比卡斯特罗高。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已经去世，不必为现实生活中的政策失误负责，成了一个革命殉道者。古巴乃至全世界的人们，将格瓦拉的头像印在挎包、T恤、帽子上，并不是因为革命的理想，而是因为格瓦拉已经变成了一个大众化的通俗文化符号，代表非主流、叛逆，甚至是“酷”。

我认识几个女生，很迷恋格瓦拉。问她们原因，回答简单而直观：因为他帅！不知道她们是否了解当年格瓦拉的故事？懂得格瓦拉的政治理想、经济政策？而对卡斯特罗而言，当年的革命同事在通俗文化中受欢迎程度远远超出自己，他又该作何感想？

我在古巴更多看到的，却与革命没什么关联，甚至有些背道而驰。

圣地亚哥的旅馆里，常能看见勾搭外国游客的古巴当地女孩，很多人都想方设法要从外国游客手里捞点小钱。一次，我偶尔举起相机拍摄路边的一个建筑，刚刚走过去的一位清洁工老头，居然回过头来找我要1比索。后来有个人更莫名：他看上去像是流浪汉，跟我打招呼说“你好”，非要跟我击一下掌，击完掌之后也是伸手要钱。圣地亚哥街头这些要钱的手段，倒也不难对付，只要打定主意不给钱，不理会，对方也不会纠缠。

当然，古巴不会一直沉浸在过去。虽然酒店和餐馆仍然以国营为主，但如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由政府特许经营的私立家庭旅馆。家庭旅馆的主人本身都是中产阶级，绝对热情可靠。他们很多人也有“海外关系”，言谈间，经常会流露出想培养孩子离开古巴去读书或工作的想法。古巴人也迷韩剧。我在圣地亚哥所住的旅馆，前台有一位漂亮姑娘，有一天她突然问我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得知我是中国人后，她略微有些失望，因为她在电视上看过不少韩剧，想找人聊聊韩剧！

革命，主义，这些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神圣的名词，在今天的世界已经没有多少人在意了。随着大众文化的普及，革命的符号变成了热卖的消费品。这是个平庸的年代，这是个物质的年代，但也正因为如此，这还是个和平繁荣的年代。古巴在这个时代大潮中，也未能幸免，但在这个被外界封锁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度，我想，当年革命模糊的背影还在……

特立尼达：苦与甜的迹忆

在特立尼达，历史不是写在书本里的，而是刻在那些斑驳的彩色建筑、浑圆的鹅卵石街道、永不褪色的标语上。可爱的特立尼达人，虽然行走在历史中，虽然物质匮乏，却用音乐、耐心和创造力，让自己的生活和城市变得甜蜜而美丽。

撰文/李溱 摄影/陈阳

和古巴许多城市一样，特立尼达，也是不大有底气和欧、亚、非那些动辄数千年的城市讨论历史的。1514年，贝拉斯凯斯才在这里建立了定居点，它，成为了古巴的第三座城市。不过，自从建城以来，它一直都是不温不火、慢吞吞地成长，直到19世纪蔗糖业的兴旺，特立尼达才飞速成长为一个处处充满了甜蜜味道的小城。短短的几百年间，特立尼达跟随着峡谷里蔗田的起伏而风起云涌，每一季的花样年华，都没有成为过去，而是留下来，折射出了五光十色。

20世纪50年代，古巴政府为了留住特立尼达的独特记忆，确立了其古巴“国家纪念碑”的地位，并下了限制令，不允许进行新的开发，这也使得特立尼达顺理成章地在1988年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所以，今天的特立尼达，四处撒满了属于某个时期的记忆。当你接近这些记忆的时候，甚至能够听到它们的呼吸声。



在今天这个看起来颜色绚丽的特立尼达，深入进去，还是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窘迫，物质生活上捉襟见肘的匮乏。

城市底片

卡斯特罗，是古巴雪茄绝佳的代言人，他那些抽着雪茄的照片，是古巴的经典一幕。如果你看得足够仔细，就会发现在老卡手中经常出现的雪茄，有着优雅而修长的身形。这是特立尼达为老卡专供的雪茄，它与著名的高斯巴（Cohiba）雪茄是同根兄弟。特立尼达为卡斯特罗特制的旗舰雪茄——Fundadores（创始人的意思），和特立尼达一样美丽，茄衣颜色较淡，甚至带有一点烟叶未成熟时的淡绿色。而特立尼达城的创始人呢？是迭戈·巴拉斯凯斯——哥伦布的爱将，这里是他为西班牙在古巴创建的第三座城市。迭戈·巴拉斯凯斯为特立尼达城“撰写”了毫不含糊的来历，使得这座城与这根雪茄类似——口感丰富、带着土味，骨子里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

特立尼达还有个别名：城市博物馆，这似乎是个近乎于俗气的赞美。但是，当你走在特立尼达的大街小巷，才会意识到这个名称是多么的贴切。不仅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遍布了全城，而且整个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偌大的博物馆，把城市的记忆，都活生生地保存在生活之中。

古巴有很多叫“马约尔广场”的地方。本来嘛，“马约尔”在西班牙语里就是“最大”的意思，自然地，特立尼达的中心，也叫马约尔广场。在这座城市里最大的广场四周，围绕着无数个博物馆，可是在特立尼达，专门去逛博物馆，实在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譬如罗曼蒂克博物馆，收藏了许多波西米亚风格的制品，还有捷克的水晶杯和餐具，很精致，却似乎离特立尼达的内核很遥远。

如果，你舍得离开马约尔广场，走进周边四通八达的小巷子，你会发现无数至今保存完好、仍由普通居民使用的庭院式住宅。沿着那些没有车来车往，如迷宫一般的街道，漫步在寻常百姓生活中，丝毫不逊于参观任何一座博物馆。这些不着痕迹的优雅，都来自于鼎盛时期辉煌的底气。

时至今日，“嗒嗒”的马蹄声还清晰地回响在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马车载满蔬菜、瓜果和人们的期盼，走过一家家的门前。生活的步伐依旧像是过去一样缓慢，面对蜂拥而至、前来朝拜人类文化遗产的游客，它显得从容不迫，看不出城市的脚步有丝毫变化。



马约尔广场是特立尼达的中心，广场上耸立着高大的国王棕榈和城市保护神特尔西科雷女神雕像，这里自然也是游客聚集之地

生活实景

特立尼达的历史，其实并不是这样一直的快乐和轻松，它的欣欣向荣，是建立在蔗田、糖厂、万千奴隶的血汗之上的。独来独往的加勒比海盗也没有放过特立尼达，两次集结令，特立尼达两次沦陷。海盗们掠夺钱财、女人和奴隶，杀死所有有抵抗能力的男人并烧毁了整个城市。特立尼达城的街道，设计得杂乱无章，还有现在路边的隔离墩，依然是一尊尊当年抵御海盗时所使用的铜炮，这些都是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其实，就是在今天这个看起来颜色绚丽的特立尼达，深入进去，还是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窘迫，物质生活上捉襟见肘的匮乏。在街上，很少能够见到随处乱扔的垃圾。或许这和环保并没有关系，是因为在古巴，在特立尼达，能纳入垃圾范畴的东西很少，每个家庭都有变废为宝的精神。我们住的CASA（民宿），算是特立尼达比较富裕的人家，可是用完的牛奶盒子和塑料袋，都被洗得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地晒在后院，准备再一次使用。

清晨的特立尼达，是最美丽的时刻。我们总是舍不得睡懒觉，早起看看日出、四处逛逛，开始一天的行程。有一天，那么的早，连马约尔广场都还没有睡醒，只有执勤的警察。我们向他打听了一些情况，赶着去看日出。准备和他告别之时，那厢迟疑了一下说道：“我有一个5岁的女儿，很可爱，很乖，你们有没有礼物给她呢？”那样地彬彬有礼、那样

地闪烁其辞，弄得我们不好意思起来。“我们只是随意出来走走，没有带礼物呢。可是，如果你不介意，能帮我们买一份礼物给你女儿吗？”他坦然地接过了我们递过去的2个红比索。



提起特立尼达，几乎所有的旅行书籍都会写到，这是一座色彩斑斓的城市，有着五颜六色的房子



马约尔广场是特立尼达最大的广场，当年的豪门大宅，如今已变成了一座座博物馆。

翠西，是我们住的这家CASA的女主人。她丈夫是个乐手，每天都在绿荫环绕的庭院里练习，音乐如同海浪一波又一波地涌来，明亮、温

暖的音色，让人感觉舒服极了。她的奶奶和我们商量晚上吃什么，一只大龙虾只需要8个可兑换比索，我们立即要了一人一份——每人一只完整的龙虾。

晚饭前，我溜到厨房里看老奶奶做饭。雪白的龙虾，带着通红的壳，浇上红红的酱汁，还有用植物油烧得嗞嗞作响的酸橙和香料末。那么大的龙虾啊，冒着腾腾地热气，还没有到口，我们就开始盘算着下一顿还要再吃它！

餐前的沙拉，只有切成丝的紫花椰菜和洋葱，仅淋了些油醋汁，我们也不计较。终于等那大龙虾上来了，费了好大的劲儿切了一块，放到嘴里，立刻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这么美味的东西，竟然被他们做成这样，又老又硬、粗糙的纤维丝丝缕缕地塞到了牙缝里。龙虾肉和酱汁，各自倔强地不肯融合在一起。配饭倒是色彩宜人，白米掺入了黑豆和红色的菜豆，调了金黄的藏红花汁，可是吃了一口，腮帮子都疼了。这半夹生的豆饭咀嚼得真是辛苦。食，还是古巴最乏味的一个环节，原材料的匮乏，使得民以食为天，成为最没有想象力的古巴生活。

面对历史遗留的沉重，面对现实给予的窘迫，特立尼达人却选择了不以为然和尽心尽力，在几近没有选择的物质生活中，离析出一种属于乐观的态度。生活中的艺术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去支持的，在这样贫瘠的生活中，人们并没有余力去营造它们。如果，你认为他们会放弃对美的追求，那么你错了，任何有颜色的、有图案的东西，都会被视为一种美的装饰。塑料工艺品、简陋的画、粗糙的陶器，甚至一小块碎花布，都被认真地看待和收集起来，郑重其事地摆在适当的位置。

特立尼达和古巴其他地方一样，热爱各种鲜艳的颜色。一提起这座小城，几乎所有的旅行书籍都会写到，这是一座色彩斑斓的城，有着五颜六色的房子。是的，在这里，房子有着一切漂亮的颜色：蓝色、橙红、明黄、粉红、翠绿……可你也一定会看得出来，色彩，是这些房子唯一可以不断更新的装饰物。没有精雕细琢的纹饰，没有雕梁画栋的堂皇，只有随手可得的颜料，努力地粉饰出一派锦绣光年。在热带的阳光下，这些颜色被洗练得错落而有层次，加上五颜六色的玻璃和精致的窗户格栅，轻而易举地惊艳了每一个到来的人。

匮乏的物质生活，因为这样一种被珍视的态度和反复的摩挲，生出不一般的柔美，不禁让人由衷地尊重。



特立尼达，罗曼蒂克博物馆。原来是大奴隶主**Borrell**家族的家宅，里面几乎所有的摆设和用具，包括这精美的花瓶都来自遥远的欧洲，带着波西米亚的味道，窗外就是圣弗朗西斯科·阿西斯古修道院的钟塔



特立尼达，城市历史博物馆。有着摩尔式风格的庭院。7世纪，摩尔人来到了伊比利亚半岛，从那时起，西班牙地区出现了穆斯林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融合，之后，摩尔式的建筑风格又随着西班牙殖民者来到了美洲。

咖啡味道

翠西的奶奶，非常努力地把可怜的几样食材尽量做得可口，可尝试了几个晚上以后，我们还是决定放弃CASA的晚餐。不过，每天一大早，翠西奶奶的咖啡香还是能如约唤醒我们。

古巴人喜欢喝咖啡。古巴政府给每个家庭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的本本上，就写着每月每人6盎司咖啡，每盎司0.06比索。有了咖啡那妥帖、安心的味道，粗糙的生活似乎变得细腻起来。

在特立尼达热闹的街道上，我们发现了一家小小的咖啡馆。十多平方米的空间，两人宽的大门，在这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委实不显眼。更何况，除了早上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其他时间大门都紧闭着，我们从它门前路过了好几次，终于发现了其中的乾坤。

这种叫1比索的咖啡馆是单纯到顶点的咖啡馆，除了咖啡，什么都不卖，而且只卖一种咖啡，一个土比索一杯。咖啡用半个拳头大小的白瓷杯子盛着，一口就能饮尽。比起动辄几个、甚至十几个可兑换比索的、向外国游客售卖的咖啡，它更具有古巴的味道——苦涩和甜蜜水乳交融般地在一起，难分难舍，就像生活本身。

一日吃了午饭出来，发现烈日下1比索咖啡馆门前的队伍蜿蜒了二十来米。小小的门口挤满了等待的人，他们不急不躁，相互交谈着什么，其乐融融。等了半晌，门终于开了，里面贴着两侧墙壁一共摆了10张小圆桌。小圆桌真是小，年轻的女孩子可以挤下两个，年纪大的女人或是男人就只能独自坐了。中间仅容一个人的通道，留给了一个年轻的、熟练地穿梭于各个圆桌之间的男侍者。

小小的咖啡馆内，每一个维度都充斥着浓郁的咖啡香。小圆桌上只放了一大玻璃瓶的白糖。这里的咖啡，要加上很多很多的糖，反正特立尼达最常见的就是糖。在黑咖啡里狠狠地放下一大勺子白糖，咖啡一下子溢至杯沿，我意犹未尽，又小心翼翼加了半勺，咖啡微微凸出了杯沿。就着桌子，轻轻地抿了一小口，方才用小铁匙缓缓地搅拌均匀。

咖啡和糖几乎是一比一的浓度，甘冽的苦和浓烈的甜掺和在一起。这么单纯的甜和苦，却让人喝得唏嘘不已、百感交集。

在1比索咖啡馆，我们还看到这样一幕。一个妇女从队伍中走过来，掏出1比索，塞到外国游客手里：去吧，拿去喝杯咖啡吧。或许她认为，没喝上这1比索的咖啡，一定是很苦的生活吧。

智慧谷：为全世界种植甜蜜

在古巴为全世界提供甜蜜的年代里，位于特立尼达城东的洛斯印海尼奥斯谷地（又称智慧谷）也迎来了最甜蜜的日子。山谷的五十多家糖厂为这里的人们引来了南美的白银、非洲的黑奴、欧洲的精美建筑和亡命的加勒比海盗。如今，这一切记忆都保存了下来。

撰文/李溱 摄影/陈阳



特立尼达，罗曼蒂克博物馆。原来是大奴隶主Borrell家族的家宅，里面几乎所有的摆设和用具，包括这精美的花瓶都来自遥远的欧洲，带着波西米亚的味道，窗外就是圣弗朗西斯科·阿西斯古修道院的钟塔

驶向种植园的老爷火车

在特立尼达，有一个只有一个站台的火车站。无意中遇到它的时

候，夕阳将静止的火车拉出了长长的影子，安静、凋零、孤独。古老、黯淡的火车头停在轨道上，如果不是一位老铁路工人给予肯定的回答，我们几乎以为这是一个已经荒芜了的火车站。

老人很是热情，叨叨絮絮地连比带划。我们终于明白了每天早上九点，会有一班火车从这里开往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下午三点钟返回。

看着身边的这个火车头，似乎已经在这里停放了四五十年。一拉绳子，汽笛一声长鸣，有点力不从心，更像是喘气声。难不成就是这老爷火车将要带我们去往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

然而事实更出乎我们的意料，当次日清晨，那列蒸汽小火车喘着粗气，以缓慢地步伐准时出现的时候，我们不止是回到了几十年前，甚至回到了19世纪，回到特立尼达最甜蜜的年代。那时候，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里遍布了100多家大大小小的糖厂，忙碌的机器声、蔗糖的香味、温柔的山风，日日夜夜、缠绵不休。

这列小火车，拖着四面敞风的木车厢，“呜啦啦”向我们迎面开来的一刹那，实在是一个太大的惊喜。等车的人们，抓起相机冲了上去，和它结结实实地打了个照面。

车厢就像敞开的潘多拉盒子，飞出了更多的意外——硬木长凳、宽大的车窗没有玻璃、清凉的风……我们自由自在地在车厢中穿行，那位老铁路工人，抱着吉他径直走来，对着我们唱起了歌。如此古典的待遇，使得这一趟智慧谷之旅，始终像一个醒不过来的梦。

当窗外的绿色越来越浓的时候，蒸汽小火车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浓密的树林和蔗田，几乎是贴着车窗拂过。


今天，甘蔗田里还是有人在辛勤地劳作，田边堆积得小山一般高的甘蔗，并不是拿来讨好游客的工具，而是黑人后代们谋生的手段。


特立尼达蒸汽小火车老式的木制车厢

山谷中的黑人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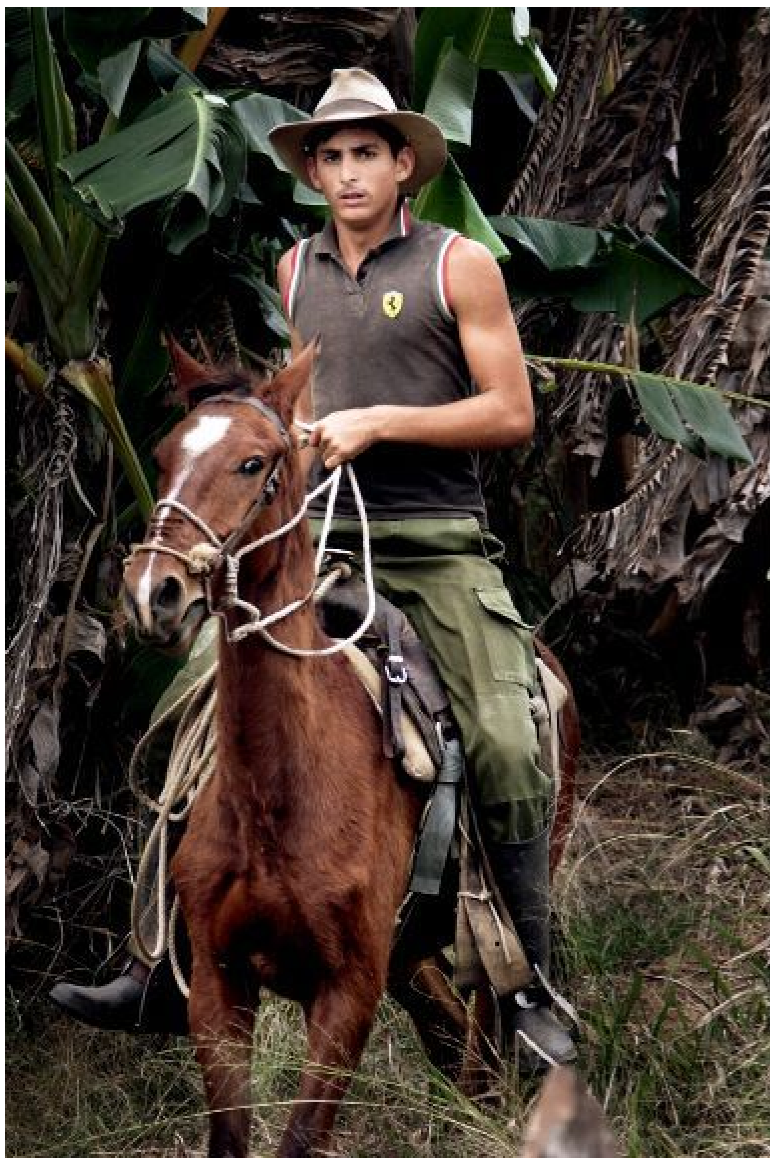
智慧谷本来是一块上百平方公里的山间盆地，土地肥沃。先有了特立尼达城，这里逐渐被开发为上等的甘蔗种植园，榨糖厂也随之兴起。很快地，这片峡谷便成为世界最大的食糖生产地之一。欣欣向荣的经

济，为19世纪的特立尼达城的重建提供了资金。特立尼达市和洛斯印海尼奥斯山谷从诞生之日起就密不可分，所以，1988年，联合国评定世界文化遗产时，索性一股脑儿将山谷和城市捆绑在了一起。

从19世纪开始，蒸汽小火车就每天不爽约地穿行在山谷里，这条铁路，也成了一段甜蜜的记忆。小火车拉着满满的蔗糖，在弥漫着阵阵甜香的甘蔗田里奔驰着，可是对当年被长途贩运到这里，又终日劳作、不得休息的黑人奴隶来说，这个糖厂山谷绝不是一个甜蜜的地方。



莫里诺斯庄园附近的蔗田工人，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是黑人奴隶的后代，不少人还住在那些当年作为奴隶集体宿舍的平房里


在智慧谷，马匹还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蒸汽小火车的第一站，就停在了伊斯纳加庄园，那里有智慧谷的象征—伊斯纳加高塔。建于1840年的伊斯纳加高塔，共有7层、高35米，那清悦、悠扬的钟声曾经是糖厂上下工的标志。它现在是一座观景台，在上面能够看到庄园的全景，当年是用来监视奴隶工作、防范他们逃跑的。高塔之下，一览无余，没有人可以逃脱自己的命运。

再走半个小时，就到达了蒸汽小火车的终点站——莫里诺斯庄园。这里是一个养牛的牧场，甘蔗、牛、烟草，曾经是古巴的三大经济支柱。

今天，这里的大部分居民是黑人奴隶的后代，他们还住在那些昔日作为奴隶集体宿舍的平房里，而奴隶主的庄园早已变成了游客游览的去处……

古巴蔗糖发展历程

有资料显示，古巴蔗糖出口量常年在600万吨以上，居世界第一位。一半以上的耕地种植甘蔗，蔗糖出口收入占外汇收入的80%，成为国民经济的命脉。究其原因，既与这里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更有社会经济因素。

古巴地处北纬20度与北回归线之间，大部分地区属热带雨林气候，这种气候条件特别适合甘蔗生长。古巴又是一个狭长的岛国，海上交通便利。16世纪初，殖民者把甘蔗引入古巴；17世纪，他们从非洲运来大批黑人；18世纪中叶，蔗糖业逐渐超过烟草业和畜牧业；19世纪，在西部红土平原上出现了一批中小型甘蔗种植园。

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向古巴大量投资，兴修一批灌溉设施，使海拔不足100米的低地普遍种植甘蔗，蔗田面积占全国耕地60%以上，大型糖厂也相继建立。由于蔗糖业的不断发展，使古巴经济结构单一化，并造成了对美国的严重依赖。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政府将外资蔗糖企业全部收归国有。为了摆脱单一化的经济结构，古巴政府决定削减蔗糖生产，结果这一决定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古巴政府提出经济发展“相对优势论”，重新确定蔗糖业是古巴经济的发展优势。

今天，甘蔗田里还是有人在辛勤地劳作，田边堆积得小山一般高的甘蔗，并不是拿来讨好游客的工具，而是黑人后代们谋生的手段。你若是走进他们的平房里，他们很愿意在自己的家里请你喝上一杯咖啡，并加上很甜的、自己熬制的土蔗糖。

在伊斯纳加火车站简陋的站台上，我们遇见一位老人，他静静地抽着一个土比索一支的雪茄。岁月的苦难在他脸上刻下太多的纹路，或许他已经对生活漠然，任由世界各地络绎不绝的游人经过他的身边。在不动声色的蒸汽记忆里，智慧谷、特立尼达，乃至整个古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许变化最大的，就是这里的黑人后代—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无论做什么，他们都是自由的。

推开关塔那摩地狱之门

记者亲历古巴禁区

自关塔那摩监狱开设以来，关于这里的各种新闻就屡见报端：虐囚、“烧钱”、关闭争议……这里一直是古巴与美国关系的晴雨表。法国特派记者专程前往关塔那摩，进入这座世界上安全系数最高的监狱，曝光最隐秘的囚犯的日常生活。

撰文/Bernard De La Villardière

摄影/Georges Mérillon-DragonImage

翻译/张蔷

关塔那摩监狱简介

关塔那摩监狱（Guantanamo Bay detention camp）是美国军方于2002年时在古巴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所设置的军事监狱。最初的目的是临时关押拘留者，但美国军方逐渐将这个临时关押拘留者的场所改建成为一个长期使用的监狱。根据美方的说法，该拘留营内所关的都是被俘获的敌方战斗人员，而负责营区运作的单位是关塔那摩联合特遣部队。统计显示，关塔那摩监狱平均每名在押人员每年耗资大约90万美元，可称“全球最昂贵监狱”。



高高的铁栅栏后面是关塔那摩“六号监狱”的入口。这是一个保持高度戒备的世界，任何一点走动都会被拍摄下来。这是一片游离于国际刑法之外的灰色区域。

在这个十月的清晨，看着眼前英式餐馆、高尔夫球场、漂亮的花园和静谧的村庄，置身于关塔那摩的我们仿佛觉得自己来到了法国的泽西岛。前一天晚上，我们把通行证挂在脖子上，在3位穿着米色粗布制服的新闻官的陪伴下，到达了这里。

关塔那摩基地一直是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晴雨表，两国在边境地区驻军的多少反映出双方关系远近的波动。在1962年底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这里还成为美苏冷战的最前线，据说美国当时还在基地部署了核武器以防万一。1995年7月，鉴于古巴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削弱，美国海军在关塔那摩基地进行的舰队训练和维护活动迁到美国本土和波多黎各进行，喧嚣一时的关塔那摩基地几乎回到了一百年前的寂静之中。

踏入禁区

自从我们踏上这个坐落于古巴西南端的禁区的那一刻，新闻官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半步。我们的拍摄必须严格遵守他们提出的条件：尊重每一位访谈者的意愿，不在画面中出现他们的脸庞。我们不可能采访到、甚至都不可能随意碰到一位在押犯人。

关塔那摩和泽西岛的面积一样大，都是118平方公里，但是迎接我们的团队显然不是同一种风格。从迈阿密起飞，经过两个半小时的飞行之后，我们需要自己拖着行李和拍摄设备，一直走到停机坪的尽头，然

后穿过一片有铁栏杆围着的篮球场大小的地方。

军事警察的警犬像X光仪一般检查着我们的行李。美丽的夕阳让这个场景增添了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在关塔那摩度假可能吗？我们在警察的陪同下坐上了一辆校车改造的公交车，随后乘船穿越海湾。这艘船还是越战时留下的。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有些上了年纪的女士。她告诉我说，她和已经退休的丈夫经常离开密歇根的家，来到这里休息。她觉得在这里比在美国安全。

关塔那摩是美国境外最古老的美军基地，坐落在一个与美国没有任何外交关系的国家里。最初，美国和古巴两国商定，由美方向古巴政府交付每年4000美元的租赁费。但是自从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权以来，美国不再向古巴交付租金，而古巴也是几经要求收复土地而未果。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布什政府有了那个奇怪的想法，想在这里建造关押罪犯的监狱的话，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可能要永远被历史遗忘了。



高高的铁栅栏后面是关塔那摩“六号监狱”的入口。这是一个保持高度戒备的世界，任何一点走动都会被拍摄下来。这是一片游离于国际刑法之外的灰色区域。

首先投入运营的是X射线营地。在阿富汗被捕的伊斯兰极端武装组织成员正是在这里被关押了四个月。但是，直到2001年12月28日，关塔那摩监狱才正式成立。在这一天，乔治·布什颁布特令，允许无限期关押犯人。一年以后，关塔那摩共关押了600名犯人。2002年2月，X射线营地投入运营，然而四个月之后就被关闭了。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除去虐囚丑闻，整个X射线营地对美国的国家形象就是一个灾难性的毁灭。尽管“9·11”事件给了美国重重的打击，但是美国还是一意孤行，与

大多数国家背道而行。

不知是过于天真，还是过于厚颜无耻，美军自己曝光了第一批监狱囚犯的照片。这些穿着橘黄色睡衣的囚犯被关押在露天的笼子里，就像家兔棚中的兔子一样。管理人员给他们配备了不透明玻璃做的眼镜，震耳欲聋的耳机，使他们隔绝于世。他们只吃粥糊，就地睡在草席上。关塔那摩成了现代的集中营，这里面甚至关押了未成年人。

也正是为了抹去这样的形象，关塔那摩邀请全球的媒体前来参观。新闻官非常小心谨慎，并没有向我们做过多的介绍。他们时刻注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要求我们严格遵守拍摄要求。“你们可以在监狱里进行跟踪摄影，但是不可以采访犯人。”三位新闻官沉默寡言，每个人的名字都被代号代替：MC1，MC2，MC3。MC的含义是Military Communication，军事联络之意。当我们提出要去参观X射线营地时，他们勉强地笑了笑，算是同意了。我们只能从俯瞰着监狱的小路上拍摄。营地周围长满了藤蔓和野草。在距离观察哨卡几步之遥、距离铁丝网千米远的地方，几处独立的房屋耸立在空旷的土地上。



关塔那摩的犯人们在3000多名监狱工作人员的日夜监视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五号监狱”的一间牢房里摆放着犯人们的用品：放在下面的橘黄色衣服是“令人头疼”的犯人的，放在上面的衣服是“听话”的犯人的。



设有铁栅栏的监狱医院。

匿名采访

X射线营地已经被德尔塔营地取代了。至今这里还关押着172名犯人，其中有93个也门人、二十几个阿富汗人。我们的参观从监狱医院开始。主治医师很乐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绝对不能让他出现在镜头

里，更不能显示他的名字。他害怕在美国的家人遭到报复。

在关塔那摩，已经发生了好几起自杀事件。最让监狱管理层感到害怕的，便是绝食抗议。从2002年年初开始，已经发生了上百起自杀事件，从监狱管理层来说，阻止自杀已经成了反恐行动的一部分。

陆军上校向我们展示了导食管，医护人员在犯人自愿或者不自愿的情况下，把这种管子插到犯人的鼻子里。“做的时候，我们会尽可能温柔一点”，他解释道：“我们使用的是标准的产品，和美国医院是一样的，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管子从鼻子里插进去，一直伸到胃里。“依靠这种食物引导管，病人可以支撑好几个月”，军医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道。

对于他来说，如果说有些人是出于政治目的绝食的话，那么另一些人则是为了“换一换关押的环境”。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尽管国际红十字会的检察官每三个月来检查一次，但是他们的报告非常机密。

在德尔塔营地，监狱被逐一编号。从踏入监狱的那一刻起，管理员就告诉我们不能踏入“七号监狱”，X射线营是它的前身。这里可能关押着“非常危险”、“非常有价值”的犯人。在他们当中，有卡里德· 谢伊克·莫哈迈德（Khalid Sheikh Mohamed），“9·11”的头脑之一。

“七号监狱”坐落于一个非常隐秘的位置，只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和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的成员才可以进入。在这个荒凉的地方，七号监狱非常容易识别。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前去一探究竟，因为狱警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们。

我们随后朝“五号监狱”走去。五号监狱的安全措施同样非常严格。走进监狱，仿佛走进了一个光线晦暗的水泥堡垒。穿过无数的走廊、无数的铁门，我们终于进入了监狱参观的“最精华”的环节：透过玻璃观看在押犯人。因为玻璃材质特殊，他们看不到我们。我们觉得很尴尬，但是我们的交谈对象丝毫没有这种感觉。

首先与我们交谈的是五号监狱的狱长。这里关押的并不是七号监狱“不听话”的犯人；相反，他们非常“听话”。但是，他们脚上还是戴着脚镣。两层牢房之间的楼梯上有一个铁栅栏，栅栏后面站着带武器的狱警。五号监狱的狱长也希望隐去真实姓名，他饶有兴致地向我们介绍在押犯人的权利：“学习阿拉伯语、英语、信息技术……他们还经常玩电子游戏，但是玩得都是一些最简单的游戏，一点都不暴力。”

这些犯人可以每周与家人通一次电话，或者在skype上视频聊天。

接下来，我们在狱警的陪同下，参观了试点牢房。首先是厕所。所有设备都被固定在了墙上，是为了防止犯人们用盥洗设备袭警。一些犯人还会用“体液”骚扰警察。在监狱建立的最初几年，这样的案件发生了上百起。尿液、粪便、精液或者呕吐物，这些都是犯人们表达自己愤怒的方式。

为了挫败这种“游击战”，管理层设计了一种“储物箱”。管理人员有些得意地向我们展示着他们的发明：用一种带滑轮的小盒子把食物和饮料送到犯人那里，尽量避免身体接触。

依然在狱警的陪伴下，我们走出了德尔塔营地。铁栅栏把这个封闭的营地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在铁栅栏的另一边，有长满茂密高草的山丘，有成块的岩石，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攀岩。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大海，但是很遗憾，我们不能把它拍下来，“这可能会引起暴乱和越狱”，一个警察说道。“你害怕敌人的袭击吗？”我们问道。狱警谨慎地思索着这个刁钻的问题。随后，他平静地说道：“不，一点也不。在这里我最害怕的，是发生海地那样的海啸或者地震。”



三千多名工作人员日夜监视着关塔那摩监狱。

事实上，在关塔那摩，最令人害怕的敌人，除了反复无常的地质变化之外，就是“坏心肠”的记者了。直到现在，负责接待我们的管理人员一直对我们保持着戒备，但是态度非常温和。直到我们与监狱总司令丹尼斯·托马斯交谈时，整个气氛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担任狱警已有22年之久。2006年到2008年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

的监狱担任监察官。我跟他谈起了巴格达中央监狱——阿布·格拉伊布监狱的虐囚丑闻，并询问他如何在关塔那摩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我们这一代人无论如何也不希望虐囚丑闻再次发生。我们从中吸取了很多教训。我们的狱警时刻注意维护在押犯人的尊严。”狱长向我们强调，凡是虐待囚犯者，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几个曾经关押在关塔那摩的法国人回国后曾经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监狱对他们进行了“虐待和非法监禁”。有些案子现在还积压在巴黎的法院中。

我们的采访还在继续。“我看到有些犯人脚上戴着脚镣，这是为什么？”狱长的脸僵住了，他答道：“他们在自己的监牢里是享有绝对自由的，但是一旦我们把他们带到外面，比如去就诊、去上课，或者和他们的律师见面，我们必须确保安全。”这一说法与我们之前在五号监狱看到的并不一致：即使在室内，一个在学习的犯人也是脚上戴着镣铐被固定在地面上的。

关闭争议

关塔那摩监狱已经设立了近15年。这里一直是个法律的禁区。联合国数次要求关闭该监狱，但是并没有收到满意的效果。

奥巴马曾经许诺关闭，但是已到他快任期结束，这一诺言实现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为总统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而共和党人并不准备帮助总统实现这一计划。

在关塔那摩关押的犯人中，大多数是2003年之前被收监的。时至今日，这些犯人依然没有受审。3000多名管理人员日夜监视着他们。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监狱。

在离开这个乔治·布什建立的监狱时，我们想起了奥巴马说过的一句话：“关塔那摩可能是证明伊斯兰极端武装组织招募恐怖分子的最好的证据。”

经典作家的古巴时光

撰文/夏榆

“即使印第安人消失不见，甚至所有人类都消失不见，墨西哥湾流也会一直静静地流淌下去”，这是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旅居古巴时写下来的文字。

一生行旅不羁、四海漫游的海明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长期旅居古巴。“他的房子位于哈瓦那近郊的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地区。在房子西南一个外形方正的角落里，有一间特设的工作室，但他偏爱卧室，唯有小说里的角色能驱使他爬上角楼。”1958年，《巴黎评论》记者乔治·普林顿在古巴访问海明威时对他在哈瓦那的居所和工作状态有详尽的描述：“他是个严于律己、自我约束力极强的人，直到晌午时分，他才会拿起圆头手杖离开房子，到泳池边开始每日半英里的游泳。”

作为逝去时代的文学英雄，海明威影响过很多杰出作家。《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声称，海明威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晚年的时候，马尔克斯在巴黎遇到时为美国著名时装模特儿的海明威孙女玛尔戈·海明威，他们一起吃饭。“她滔滔不绝地谈她的祖父，而我则谈我的祖父”，马尔克斯说。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期间马尔克斯向外界讲述当年他初到墨西哥接到朋友的电话被告知：“海明威那老东西前一天早晨7点30分在美国爱达荷州的一个小镇凯特丘姆拿猎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花了”，马尔克斯追忆道：“这件荒唐事如同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留在我的脑海里。”



海明威将古巴看作伊甸园和钓大鱼的天堂。如今，他用一种决不妥协的目光凝视着这个正在转

型的国家以及那些幻想着另一个世界的年轻人。

强悍而脆弱——海明威在古巴

1957年秋天，海明威在古巴的寓所观景庄开始动笔写作《流动的盛宴》。

这是他对青年时期在巴黎生活的回忆。辞去新闻职业、决心从事职业文学写作的海明威饱尝生活的艰辛，经常要忍受饥饿、物质匮乏以及写出的作品被出版机构频繁拒绝。然而他有美好的爱情，有坚定的信念和持久写作的毅力。那段时光艰辛而精进，困顿而甜美。这是海明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三年之后对往昔岁月的追念。在此期间他偶尔回爱达荷州凯彻姆的家，在西班牙旅行时也在写作这本书。1960年春重返古巴观景庄完成初稿，同年秋天返回美国，在凯彻姆他的家中做最后润饰。就在这部回忆录完成的第二年，海明威在他的凯彻姆住所用一支猎枪向头颅开枪自杀了。

“他自杀那天，他的第四任妻子玛丽·威尔士·海明威睡在爱达荷州克川市海明威居所楼上的主卧室里，1961年7月2日早晨她被几声以为是‘抽屉砰砰关上’的声音吵醒”，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后来追忆他的文学榜样海明威。

强悍而脆弱，乐观又绝望，这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显示出来的双重性。1954年是海明威祸福相随的年头，这年，海明威遭遇意外事故的频率达到了最高峰。先是乘坐飞机到东非打猎时，两次遭遇飞机失事，落下脑震荡、脊柱碎裂、烧伤和内伤并被通报死亡。他幸存下来，也因此有了一次独特的读自己讣告的经历。据卡佛回忆，他在少年时看到过晚报刊登的海明威相关消息的新闻照片。“他正满脸笑容地举着一张报纸，那上面登着他的照片和宣布他死讯的通栏标题。”也是在这一年，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05年12月7日，我应邀赴斯德哥尔摩报道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瑞典学院常务秘书斯图尔·艾伦先生相邀参访瑞典学院。艾伦先生作为常务秘书在1987年为俄裔美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和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授过奖。满头银发的老人翔实解说诺奖历史上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奖或者缺席颁奖的作家。

海明威当年因为头部重伤而缺席颁奖典礼，在那次颁奖仪式上，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发表给海明威的授奖词：



一位老人坐在科希玛海边凝视那位与他极为相似的大文豪。



Floridita酒吧被作家海明威看作代基里酒的发源地。图为吧台一角的海明威青铜像。

现在我们大家谈论的正是这样一位先行的作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和他的任何一位美国同道比，海明威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屹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正在寻求准确方式来表达意见的朝气蓬勃的民族。海明威本人也与一般文人迥然不同，他在许多方面表现了戏剧性的气质和鲜明的性格。在他身上，那股勃勃的生机按照它自己特有的方式发展着，没有一点这个时代的悲观色彩和幻灭感。

诺贝尔博物馆与瑞典学院相邻，博物馆陈列着百年历史中获奖者的遗迹—生平影像、书籍影印、手稿、演讲音频。观众走进纪念馆可以通过遥控器，任意选择想要了解的获奖者的情况，戴上耳机就可以听到获奖者的演讲实况。海明威是我热爱的作家，记得当时特意找寻他的文学演讲而未得。现在我手里存有《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和获奖言说》，再次读到瑞典学院常务秘书的授奖词：“人们应该记住，勇气是海明威作品的中心主题—具有勇气的人被置于各种环境中考验、锻炼，以便面对冷酷、残忍的世界，而不抱怨那个伟大而宽容的时代。”人性是复杂的。仿佛是对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做否定式证明，海明威后来生病，患上偏执狂和忧郁症，在接连两次监禁于梅约诊所时，因为接受了电痉挛疗法而失去记忆，最后用猎枪自杀身亡。

海明威生于1899年，可以算作20世纪的同龄人。他这一代人被称为“迷惘的一代”，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是残酷、冷漠和没有意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在幸存者身上留下了烙印，海明威本人也亲历其中，并于19岁在前线身负重伤。他说：“人类莫名地疯狂。让自己陷入最巨大的、致人于死地的大屠杀中，这只有在人类的土地上才会发生。”

海明威的一生有过四次婚姻，其中三次离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意大利当救护车司机并为此负伤，在西班牙内战（1937-1939年）、中国抗日战争（1941年）和欧洲反法西斯战争（1944-1945年）中他作为战地记者表现优异。战后他的个人生活发生逆转，打猎、钓鱼、狩猎旅行、在法国和古巴寄居、斗牛、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最后在爱达荷州自杀，这是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的一生。当我再次阅读海明威，从他的生平轨迹寻访他的生命故事时，遥想他在古巴的岁月，或许就如他所言：“必须天天面对永恒，或者面对缺乏永恒的状况。”

海明威与古巴的关系可谓深长。1940年他在出版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之后，与第二任妻子离婚，同作家玛瑟·盖尔荷恩结婚。次年，他与玛瑟来到中国采访抗日战争，当时还会见了蒋介石与宋美龄；之后旅居古巴，在哈瓦那的瞭望农场住下来。海明威在哈瓦那多有惊人之举，改装私人渔船“皮拉尔号”，追缉古巴近海的德军潜艇；在此期间他以特派记者身份去欧洲采访，在伦敦遭遇车祸，头部负伤。为解放巴黎与游击队一起搜集情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海明威返回古巴。同年与玛瑟·盖尔荷恩离婚。

海明威使用过的打字机和他生前的护照。

海明威使用过的打字机和他生前的护照。

海明威一生都在谈论自杀，在他的有生之年，身体遭到种种重创，就像是和一个看不见的对手进行一场拳击赛之后留下的后遗症。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打猎，还是在创作中上前线打仗，海明威的意识中总抹不

去“杀戮”的念头。他的一生都在狩猎：在非洲猎杀狮子、豹子和大羚羊，在落基山脉搏杀灰斑熊，在怀俄明农州射杀松鸡，在法国射杀鸽子，走到哪里他都会有可杀的猎物。即使在猎杀之后，这些动物仍然没有逃离他的视野。“杀戮”的意识使他饱受争议。

他的传记作者卡洛斯·贝克曾经讲述，在古巴时的某一天，海明威颇费了一番周折，钓到一条重达512磅（约合232公斤）的马林鱼，并将它运回港口，引起公众的一片欢呼。但他对这一切还不满足，大家喝酒庆祝之后的凌晨两三点钟，他又独自回到了码头，借着月色，用滑轮把大鱼吊了起来，当沙袋练习拳击。

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就是讲述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与大鲨鱼搏斗的故事，老人就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以北的海面上捕鱼。《老人与海》的写作，证明海明威是猎手兼博物学家，这部作品塑造了文学史上经典的硬汉形象，成为海明威最具代表性作品。《老人与海》出版于1952年，最初发表于9月1日的《生活》杂志。小说出版后获得批评界一致推崇，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奖并最终助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来好莱坞以重金购得摄制权，由斯宾塞·屈塞主演，拍成电影获得第31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老人与海》原作只有2.7万字，据海明威自述，他曾先后修改此书达200遍之多，可谓千锤百炼，炉火纯青。老渔夫圣地亚哥的状态来自海明威多年来在湾流中钓鱼的经历。他观察、研究海洋生态物候。“大海也同人一样值得描述。这是我的运气好，我见过马林鱼交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在那一片水面上，我见过五十多头抹香鲸的鲸群，有一次我叉住了一头几乎有六十英尺长的鲸鱼，却让它逃走了”，1958年海明威对来访的《巴黎评论》记者说道。

海明威在写作《老人与海》时有一句名言被广为传播：“一个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是《老人与海》的主题，也是海明威的人生信念。然而十年之后，海明威被他自己打败了。

魔幻超现实——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

说到作家与古巴的关系，不能不说到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交往。

1956年的巴黎。在圣米歇尔大酒店，当时还是新闻记者的马尔克斯

与同为新闻记者的朋友普利尼奥·门多萨喝咖啡。其时他们都是具有左翼政治倾向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讨论到当时拉美的政治局势，包括古巴的政治变革。他们认为古巴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小伙子的努力上。“那个固执、莽撞的瘦高个儿的青年，正在墨西哥四处活动”，马尔克斯在他的自述中写道。

马尔克斯1927年3月6日生于哥伦比亚阿拉卡塔卡。少年时因哥伦比亚内战中途辍学。青年时期时任新闻记者的马尔克斯因连载文章揭露被政府美化了的海难而被迫离开哥伦比亚，后任《观察家报》驻欧洲记者，不久该报被哥伦比亚政府查封，他被困在欧洲。同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枯枝败叶》。1959年马尔克斯为古巴通讯社“拉丁社”在波哥大和古巴工作。“拉丁社”由切·格瓦拉领导，同年，马尔克斯应邀参加古巴革命胜利庆典。



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其时，对马尔克斯来说，卡斯特罗的名字并非完全陌生。保守派政府在1948年企图将卡斯特罗和另外几名大学生以某桩凶杀案的嫌疑凶犯逮捕。卡斯特罗在1959年革命成功后，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在加拉加斯美岭区旅馆的阳台上庆祝卡斯特罗的胜利。在马尔克斯看来，古巴革命意味着一个与以往迥异的、具有质的飞跃的唯一运动。“不是资产阶级抑或人们早已熟悉的政治寡头打败一个先前按照顺序篡夺权力的独裁者，而是从山上下来的一些大胡子游击队员领导全体人民夺取了政权。这在整个拉丁美洲引起人们的赞叹、支持和深深地忧虑。”

当年的拉丁美洲，独裁者们像熟透的果子落地一样纷纷垮台。首先是阿根廷的胡安·庇隆，继而是哥伦比亚的罗哈斯·皮尼利亚，随后是委内瑞拉的佩雷斯·希门内斯。后来就轮到古巴的独裁者巴蒂斯塔倒台。同许多拉丁美洲人一样，马尔克斯希望到哈瓦那亲眼看一看那场汹涌澎湃的革命。1959年的春夏之际，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带着简单的行李，被一架由古巴人驾驶的双引擎飞机带往哈瓦那。飞机是革命者从前政府军缴获而来，是一件散发出难以忍受的尿骚味儿的老古董。他们参加报道“真相行动”—由卡斯特罗指挥的对巴蒂斯塔独裁政府的战犯的公开审判。

到达哈瓦那，马尔克斯和他的同行者立即被淹没在旗帜、橄榄绿军服和睡不着觉的人海中。人们没有工夫睡觉，对获得自由的庆祝与欢呼使他们难以入眠。马尔克斯与同伴走遍了哈瓦那，与人交谈，听卡斯特罗面对百万同胞讲话，从而触摸到了古巴革命的脉搏。为了让世界知道革命之后的古巴对独裁者的审判，卡斯特罗请来一些国家的观察员和记者旁听审判。

《马尔克斯传》描述了这次哈瓦那之行：“体育场内人山人海，正中央的四方框架里是身穿蓝色囚服面对法庭的罪犯。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直接面对着被审讯者，因而感觉到一个人死到临头的冷漠和恐惧。戴着手铐的被告惊愕于急切等待将他明正典刑的观众的呼喊、谩骂和笑声，他的眼睛呆滞，一直盯着脚上的意大利皮鞋的尖端，直至黎明时分听到死刑的判决。”这次审判给马尔克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从没直接写过这一审判，然而他从对战犯的审讯、审讯时出示的大量的证据材料中受到启发，构思了他的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

马尔克斯第一次见到卡斯特罗也是在哈瓦那。当时他途径卡马圭市作短暂停留。担任司令官的卡斯特罗在古巴腹地参加几个养鸡场的开工典礼也抵达卡马圭市。到了这里的小机场，饿坏了的司令官命人拿鸡给他吃，可是没有鸡。于是，卡斯特罗就以在美国旅客仍然经过的一个机场没有鸡吃这一弊端为题，发表了冗长而激动人心的演讲。经过他人的引荐，马尔克斯跟卡斯特罗会面握手，简要交谈，说明他的记者身份。

马尔克斯在哈瓦那待过90个日夜。当时的哈瓦那成为一座巨大的街垒，因为毒瘤般的反革命活动天天发生，而且古巴人还得防备着美国即将发动的入侵。马尔克斯所在的拉美通讯社所在的斜街不像街道，更像一条准备战斗的战壕：房上堆着沙袋，地下铺着厚厚的木板，枪支时刻处于伸手可及的位置。“哈瓦那是个不眠之城，犹如整个古巴是个不眠之国。拉美通讯社的工作人员在电传打字机、打字机或者照相机旁边困得要命，却几乎没有工夫打个盹”，《马尔克斯传》的作者达索·萨尔迪瓦

尔写道。

后来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成为密友。据说卡斯特罗拨给马尔克斯一辆奔驰280，在哈瓦那市中心给了他一所带游泳池的房子，里面有4个佣人和1个花匠，还有一条只有极个别接待外宾的宾馆才能安装的国际电话线。据说卡斯特罗和马尔克斯无话不谈，包括倾诉内心的秘密。

“你仔细听着，我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亲密的、以真挚的感情维系的友谊是从文学开始的。1960年我们在拉美通讯社工作的时候，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跟他打过交道。我当时觉得，我们没有多少话可讲。后来我成了著名的作家，他成了举世闻名的政治家，我们双方怀着非常尊敬、友好的心情见了好几次面，不过当时我并不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能超越我们在政治倾向上的亲近。”这是马尔克斯与友人浦里尼奥·门多萨的对话。



马尔克斯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合影。

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拉美文学热潮开始飙袭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就在这一年，马尔克斯与门多萨做过一次长篇对话，对话集《番石榴飘香》也风靡中国。这次对话中，门多萨评论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的关系时说道：和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不同，马尔克斯不热衷意识形态的问题。他和卡斯特罗的友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有着同样的看待现实和理解问题的方式，加以加勒比海地区所特有的共同语言。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密友，但是他和苏联政府官员以及统治共产主义世界的阴郁的官僚没什么交情。如果用许多欧洲知识分子的苛刻

眼光来看待马尔克斯，那么很难在政治上理解他。对于他来说，勃列日涅夫是一回事，而卡斯特罗是另一回事，尽管古巴制度的许多特征来自苏联模式。然而支持军事独裁的拉丁美洲右派对马尔克斯深恶痛绝，把他视为卡斯特罗的代理人。“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钱分给穷人呢？”他的敌人责问他。

在访谈中门多萨向马尔克斯提问：“如果古巴把苏联那一套制度作为自己的样板，那么你说的‘更加公正、更加民主的社会制度’肯定会像在苏联那样受到非议。你难道没有这种顾虑？”马尔克斯回答：“依我看来，古巴革命在经历了最初几场巨大的风暴之后，正在艰难地有时甚至是矛盾的道路上行进，不过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更加民主、更加令我们大家满意的社会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前景。你们始终坚持‘古巴是苏联的卫星’的偏见，而我却不以为然。你只需跟菲德尔·卡斯特罗打一分钟交道，就会知道他不听任何人发号施令。”

1962年，加勒比海地区发生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中程弹道导弹雷神导弹和朱比特导弹，苏联为挽回战略劣势，在古巴部署导弹。这是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国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谈到古巴和美国长期以来的紧张关系，马尔克斯说：

我认为，二十多年来，古巴革命一直处于危急状态，这要归咎于美国所持的不谅解和敌视的态度，他们不能容忍在离佛罗里达九十海里的地方存在这样一个样板。不能责怪苏联，如果没有他们的援助，就不会有今天的古巴革命。只要这种敌意不消除，古巴就只能处在危急状态之中，被迫进行自卫以谋取生存，被排除在它所在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区域之外。哪一天这一切都正常了，我们哪一天才能进行对话。

2014年4月17日，马尔克斯病逝于墨西哥。

2015年7月，美国与古巴恢复自1960年以来断绝的外交关系。

敌对长达五十多年的“宿敌”终于“冰释前嫌”。



凤凰周刊文丛

The Brothers of Socialist Countries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社會主義國家的兄弟們

越南

凤凰周刊 编

目录

【高层动向：越共的麻烦】

越共遭遇空前挑战

越南“经济沙皇”退选真相

越南新领导集体四大看点

越南重判国企贪官

【军事较量：越南的抉择】

越南会买哪些美国武器？

美国欲向越南出售致命武器

越南引进以色列火箭炮盯紧南海？

越南特种兵盯紧南海

【中越关系：“去中国化”带来什么？】

越南正在“去中国化”？

越南“排华”说明书

越南反华暴乱始末

中越关系已走上正确轨道

中越高层领导会晤之后的冷思考

中越低调纪念边界战争35周年

【历史一瞥：越南的那些日子】

越南会安：留住时间的古港

越南土改中的阮氏南悲剧

西贡，最后的日子

麦当劳进入越南引热议

版权信息

五国秘辛·中国篇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凤凰周刊》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2016©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2016

本书版权为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所有。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TCFP-N00007219-20160304

最后修订：2016年09月20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高层动向：越共的麻烦】

十二大后的越南：左右摇摆，领导涣散

越共遭遇空前挑战

特约撰稿／张明亮



2016年1月24日，越南南部城市芹苴的一所公园内，工人正在重新粉刷已故领导人胡志明的雕像。

2016年1月28日，河内市国家会议中心，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下称“越共十二大”）在各方猜测和评论中落幕。此次大会正值越南革新开放30年之际，是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更迭幅度最大的一次。加之近几年来，越南国内外刮起了否定越共政权正当性和存在必要性的旋风，越南与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的互动也更加紧密和复杂，因而此次会议引发了外界舆论激烈的讨论。

越共高层的权力变动较早形成了一条有规律和制度可循的脉络，如今领导越南的四位要员，分别是出任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国会主席的政治局委员，形成了外界通常所说的“四架马车”式格局。这也是越南革新开放后渐趋成型的一种带有越共特色的高层权力分配模式。四位首先要在越共政治局中赢得领先位置，然后到各自岗位上实现对国家的治理。该架构中的权力分配既有来自越南《党章》和《宪法》的文字依据，也有越共政治传统的因素，近年来则越来越受到个人运作能力的影响。

但从越共十二大前后的情况来看，这一格局正遭受越来越大的挑战：党的最高领导层分野日趋清晰可见，平衡之下却显得涣散乏力，对越共的领导地位和力量也形成了事实上的削弱。未来越共所面临的内外挑战，只会比过去五年更多，也更为棘手。

新班子，旧面孔

在党内外、国内外不断施加压力的背景下，越共新班子最终得以顺利出炉。新班子的年龄、学历均上了新台阶。阮富仲连任越共中央总书记，而包括现任国家主席张晋创、政府总理阮晋勇和国会主席阮生雄在内的9名十一届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被新的面孔所替代，新晋政治局委员12名。此外，越南“四驾马车”中终于迎来了女性干将，而且颜值不低。此外，总书记阮富仲与即将出任国家主席的陈大光都是博士，放眼全球也有资格从学历上傲视同僚们了。

越南革新之后，越共高层逐渐形成总书记影响力下滑、总理与国会主席影响力上升的态势。其党委、行政、立法方面虽然不存在外界过分夸大的“自由选举”，却也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制衡色彩。这种独特的模式既不同于朝鲜、古巴等国，又不同于一些威权国家，也迥异于西方。由此，“越式格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自然也有其独特性，值得细致观察。

如今四十多岁的政治局委员的确能体现越共干部年轻化的态势，但留任的“老班长”阮富仲年龄已有71岁。即便如此，他仍然以80%高票再次当选总书记。

单从年龄来看，越共十一届中央政治局中或许最不该留下的就是阮富仲了。作为十一届中央政治局中年龄最大的领导，阮富仲2011年出任总书记时就已超龄。比起十二大前的竞争对手阮晋勇，比起越共近三届总书记，其年龄似乎不适合留任。不过，比起“邻居家”的总书记，阮富仲还算年轻。老挝人民革命党仅在越共明确总书记一周前，确认了新的总书记人选：78岁的新任总书记接任79岁的离任书记。比起再度参选美国总统的希拉里，阮富仲也不算年龄太大；比起越共历史上的另外一些总书记就任时的年龄——如长征和杜梅，阮富仲续任总书记的年龄也不算大。1985年黎笋在越共总书记任上去世后，高龄的长征曾短暂代理总书记。

越共十二大之前，有传言称阮富仲再干两年左右，将由新人选接任总书记。类似模式在越共历史上曾出现过：1996年越共八大上，杜梅也是高龄续任总书记，干了两年后让位给黎可漂；不过接任的黎可漂做了不到一届，就在2001年的九大上挂冠而去。只不过，阮富仲连任总书

记，暂时稳定了越共的替代危机，或者说延缓了危机；但并未解除危机，甚至给下次危机埋下了伏笔。

可能出任国家主席的陈大光算得上是“学霸”：博士学历，教授职称。陈大光的工作经历较为单一，完全在警察队伍工作；从他的公开履历看，似乎并不是警察队伍里的专业人士，而类似于政工性质，这可能为他带来了较为丰富的政治阅历。

国家主席由强力部门人士担任已有先例，曾经的国家主席黎德英是军人出身，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承平时期，警察在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甚至高过军队。陈大光的警察背景也是强力部门，这或许会使他像前辈那样重视意识形态安全。

相比来说，总理一职的“专业程度”较高，基本由之前的副总理来继任。即将卸任的总理阮晋勇2006年就任总理之前，已在副总理位置上干了近十年。越共十二大之前，阮春福是几位副总理中唯一一位政治局委员。尽管十二大之前也传出对阮春福不利的负面消息——如家产问题，但其仍是出任总理的最佳人选。阮晋勇在第二个总理任期（2011-2016）内来过中国，但却不是正式访问；而作为副总理的阮春福则在任期内访问过中国。2015年9月，阮春福作为副总理赴华参加东盟博览会。这种把参加会议与访问中国结合在一起的套路，在阮晋勇第一个总理任期内时常会出现。

谈到阮氏金银，仅有半届政治局委员经历的她，就出任了越共的“四号位”——国会主席。2011年越共十一大时，已传言阮氏金银要进政治局；但其真正“入局”是在2013年1月越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中途。作为女性，能进政治局已算“破例”了。

越南女性的政治地位之低是举世公认的。阮氏金银之前，越南仅有两位女性政治局委员，其中一位是与她同届的从氏放。此外，阮氏金银之前，越南国会主席基本都是国会之外转来的，而她是少有的由国会副主席升任主席一职的人。由于仍在曾经熟悉的领域工作，她或许比前任们更能驾驭国会。

但总的来看，如今的新班子更像是一种“过渡性”安排，这也意味着其不仅要承接之前的所有挑战，还比之前班子多出中途“换将”的难题。

“狼来了”的威胁

去年12月越共十一届十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一位研究越南问题的同行在一次小型研讨会上坦言：到越共十二大召开，会迎来越南“颜色革

命”的窗口期。

越南新一届“四驾马车”

本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

180 名中央委员 20 名候补委员

62 人新被提名

越共十二大召开之前，人事准备工作已经由全国地方党委完成





80% 以80%比例的信任票
获得提名总书记
唯一候选人



阮富仲



陈大光 被提名为国家主席候选人



阮春福 被提名为总理候选人



阮氏金银 被提名为国会主席候选人

实际上，越共曾多次感受过“狼来了”的威胁。每次越共全国代表大会前，对越共执政合法性的争论都会空前活跃。越共中央为抑制“和平演变”的风潮，曾开除过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级别的要员——1990年越共六届八中全会撤销了鼓吹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春柏的一切职务；1999年又将鼓吹自由化和多党制的越共中央委员陈度开除出党。“二陈”都力主放弃越共的执政地位。2005年，还在担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理论工作委员会主席的阮富仲也曾撰文批评越共十大前冲击社会主义制度的“逆流”。

越共十二大前夕，针对越共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谈论空前强烈。大陆官方新华社2016年1月16日刊发的“问答越共十二大新看点”一文，判定十二大前越南党内外否定越共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空前严重，复杂和激烈”；这也是中国国内大部分越南专家的判断。

2013年3月，越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报》发文批评要求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称他们“反党”；当时越南正在进行修宪的咨询活动。越南一些活跃的知识分子提出废除宪法中有关越南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条文。有人接受外媒采访时称：越共应该勇于接受其他政治派别的挑战和竞争，民间起草的宪法草案甚至要求越南军队国家化，“军队首先为人民服务”，党不再指挥枪。这些挑战越共执政地位的言论引发越共中央的警惕，随后《人民报》刊发了批评文章。此前，越南以“颠覆罪”判处了20多人长期监禁，这也是越南近年来最大的政治案件。

这让越共高层警惕性高涨，此次超龄的总书记能留任，年龄与能力上更合适的阮晋勇退出总书记的竞争，可能皆与“颜色革命”的压力有关。十二大期间，这方面的威胁暂时黯淡下去，但底蕴仍在。十二大后，这股火苗很可能比之前烧得更旺。

未来，越共十二届中央能否在党内外的压力下“风雨飘摇”挺过五年，在激烈的党内派系交锋中交棒给第十三届中央，还是让此次十二大成为“绝唱”呢？不论哪种结果，必须面对的事实是，越共的未来五年，很可能“颇不宁静”。

崛起的两“会”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来，越共中央委员会与越南国会也在不断扩充权力：国会越来越像《宪法》里的国会——更多发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功能，中央委员会则越来越像《党章》里的中央委员会。《党章》把五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性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决定越共和越南的大事；国会则是《宪法》圈定的权力机构。

越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几度反转越共政治局的决议，甚至不顾及总书记的建议。

2012年的越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越共高层以不点名的形式严厉批评了阮晋勇，甚至将其写到全会报告中。《人民报》则“帮助”越共完成点名，该报当时发表了一篇评论称“如果总理做错事，一样要接受党的处分”。虽然后来《人民报》表示这是编辑失误，把“总经理”误写成了“总理”，但其中含义不言自明。这也让外界对越共高层的分裂有了更多的猜测空间：总书记在政治局里掌控大局，想对总理“开刀”，操作出对自己

有利的决议。

越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到一个月，阮晋勇再遭打击，越南国会议员杨忠国认为，阮晋勇需要为越南严重的官员贪腐和大量的银行坏账负责并辞职。

对此，阮晋勇在次年5月进行了强势反击，在越共中央政治局的增补选举中，两位阮富仲支持的人选遭到中央委员会的否决，取而代之的是阮晋勇的亲信阮善仁和阮氏金银。据说总书记会后不久公开抱怨，中央委员会把“机会主义者”选进了政治局。由于越共政治局成员较少，外界认为，阮晋勇的派系此时大量进入政治局为自己在越共十二大争权完成了关键性的布局。



2016年1月28日，在越南河内举行的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十二届越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集体亮相。

依据越共《党章》，中央委员会是仅次于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机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再选出政治局和总书记。全国代表大会五年一次，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就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才轮到政治局充当最高领导机构。但实际运作中，之前的中央委员会极少否认或者推翻最高领导人和政治局的决议。十一届越共中央委员会上述之举，事实上削弱了越共总书记和政治局的权势和声望，客观上弱化了越共的影响力。

与之相比，越南国会更早走上“充实权力”之路，近五年来进一步“开疆拓土”：政府官员在国会被质询，并向全国直播；总理也被议员严厉批评。国会还会否定政府的大项目，对领导人进行信任投票。通过《公投法》之后的越南国会在国家大事方面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势必

会弱化越共在国家政治和社会中的角色。

越共中央委员会与越南国会的扩权之举，“空前”但不“绝后”。越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同样可能会像十一届那样反转政治局的决议。不确定的是：越共十二大后越南国会的扩权之路会走多快，以及会走多远？

TPP：“踢”越共“屁屁”

在越共十二大前的准备会议——越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越共高层当时还未对十二大的人事达成共识，却先对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达成共识。

对此，一位越南裔美国学者在《外交家》杂志撰文称：“越南在越共总书记的推动下签署了TPP，答应了美国版本的工会标准。”作者试图表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并非外界认为的那么“亲华”，因为中方一直不满于越共接受TPP标准下的工会形式。

目前越南工会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法律上保障共产党和政府对于工会的领导权。但TPP要“斩断”党和政府伸向工会的那只合法的“手”。越南签署协议后，必须从法律角度确保越南工会的独立性，以及工会组织罢工的权利。



2016年1月26日，越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中，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政府总理阮晋勇、国会主席阮生雄等人依次进行投票。

事实上，如今的越南工会已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比较前卫的工会。工会的自主性之大，在维护工人利益方面之力度，以及同资方博弈之坚

定，都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会所不具备的。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笔者到越南南部胡志明市附近的工业区考察一些台资企业，感受到越南工会的活跃。这其中，不少是从中国广东珠三角迁移到越南的工厂。这些企业选择越南的理由很明确：费用低，可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不过，让企业管理层苦恼的不只是越南员工的低效率——对比于中国大陆的流水线尤其如此，也包括越南的工会制度。据介绍，工会与资方博弈的手段十分丰富，越南工人在工会的支持下，罢工门槛很低；罢工期间，资方不仅不能解雇员工，还得照常发薪水。越南党和政府为保护越南工人的利益，也会从法律角度为工会提供保障。

TPP是越南积极主动加入的多边经济合作架构。名义上虽然是经济领域的协议，却也会直接或间接触及到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事务，因为该协议涉及不少敏感议题——尤其是工会独立性的要求。美国主导的TPP对于成员国的工会有着高标准的要求，包括越南在内的成员国法律必须保障工会的独立性，工会不再是政党或政府的工具。由此看来，TPP势必"倒逼"越南在社会和政治领域进行改革。

中美之间继续选边

外界一贯喜欢用"亲华"和"亲美"来划分阮富仲和阮晋勇，这主要体现在外交领域。越共十二大刚刚结束，阮富仲于1月29日在河内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特使、中联部部长宋涛。宋涛向其转达了习的口信，显示了中方对两党两国关系的重视。

然而，被贴上"亲华"标签的阮富仲，却在去年7月实现了越共总书记的首次访美。那么，连任后的阮富仲还会访美吗？如果访问，会在其任期的哪个时段以及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呢？

从过去经验来看，新任的越共总书记首访一般会去其传统势力范围老挝，外访第二站通常选择中国。外界关心的是：他会访问中国几次，以及会在什么样的氛围下访华？访问能达成怎样的高层共识，能实质性提升中越关系吗？

阮富仲上一个总书记任期内的两次访华，都是在中越关系因南海问题而生龃龉的背景下进行的，访问之后的双边关系也未见到实质性提升。2011年阮富仲作为总书记首次访华前，两国在南沙群岛万安滩海域的"电缆事件"不仅将越共十一大之后的双边关系带入低谷，也给其首次访华蒙上阴影。他在访华期间与中方签署了《指导海上问题原则协议》，尽管事后证明，该协议形同虚设。其访华后，中越关系暂时和缓，直到2014年5月西沙群岛"中建南事件"的爆发。阮富仲在2015年4

月的访华，是在该事件将中越关系拉入低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访问后的中越关系依然在低水平上运行。

相比而言，黎可漂担任越共总书记的时间不长（1997年12月-2001年4月）——甚至没有一个完整任期，作为总书记访华次数也不比阮富仲多，但访华效果却远大过后者。当时黎可漂的访华为越中关系明确定调，并从高层角度推动两国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问题。

而阮富仲2015年的访美之旅则是开创性的，访问后越美关系迅速升温。访美之前，越美关系被认为上升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两国部长级官员往来更加频繁，对双边关系的推动更具实质意义；美国在准军事领域对越南的援助多起来，美国议员对越南的批评声少了，呼吁美国政府加大对越援助的声音变多了。除了这些领域，越共领导层在十二大之前几乎一致通过TPP协议的行为，也是与美国走近的绝佳例子。



2015年10月21日，越南北江省的一家服装厂内，工人务工的情景。目前，纺织服装业成为越南第二大出口产业，美国则是越南的最大纺织品出口市场。

对越南来说，中国可谓“近火”，美国如同“远水”。用“远水”救“近火”，从阮基石执掌越南外交大印的时代就开始力推了。阮基石生不逢时，没有太多机会落实自己的外交理念，但他的儿子范平明却有着明确的想法。范平明现任越南外长，其执政期间越南外交可谓成功地“东海化”了。“东海”是越南对南海的称呼，越南认定其岛礁与水域很大一部分属于越南，却遭到中国的“侵占”。为了抑制中国“侵犯”其海洋权益，越南外交部门几乎全盘集中于“东海”议题和如何牵制中国方面。美国则是越南理想中可以牵制中国的最佳力量。越共十二大之后范平明仍会执导

越南外交，而且作为政治局委员，其对越南外交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

在涉及到越南国家利益的海洋问题上，中越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在越共十一届中央任内，南海问题几乎“绑架”了双边关系。尽管双方多次公开表示“南海问题不是中越关系的全部”，但事实上，南海问题几乎成为双边关系的全部。

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多年来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火伴，但同时也是越南外贸最大的逆差来源地。美国则成为越南在经济领域的“新宠”，TPP协议就是明证之一。如今，美国是越南贸易顺差最多的来源地，也可为越南带来高质量的投资；最为关键的是，美国可以平衡越南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的现状。然而，越南从未像泰国或韩国那样，能同时跟美国和中国保持较为稳健的关系。

“左右逢源”能否为继？

2013年一次学术会议上，当笔者提议中越应当在南沙群岛万安滩海域合作开采油气资源时，在座的越南同行中不少人都在摇头。一位越南学者激动地说：“那里是越南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怎么能同中国合作？”我反问道：“越南已在万安滩附近海域同中国以外的其他外国企业合作了，为什么不能同中国合作呢？”其实还有来不及问的：“中越之间有比不合作更好的出路吗？”

越南在“东海”问题上的立场，不仅妨碍了越南同中国在南海合作的可能性，也不利于稳定越中关系。“东海”及其岛礁对越南的意义，超过以安全与资源为主要范畴的国家利益层面，而上升到凝聚越南民族共识和引发越共执政危机的意识形态层面。此处意识形态同“颜色革命”所对应的意识形态无关。越南党和政府在“东海”问题上回旋的余地已很小，因为任何务实性的妥协都会带来更大的执政危机。而在主权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事实上也堵死了可能的双赢。

万安滩海域曾是中越对峙过的地方，却也是最有合作价值的地方。如果双方高层真能从利益共享、稳定双边关系的大局出发，那么从万安滩海域合作开始，两国海上共同开发与低敏度领域合作就有戏了，双边关系的路子也可能活起来了。

对越共来讲，能助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没有比中国更合适的了。越共的政权本来就是中共“雪中送炭”确立起来的。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巨变后，若没有中国鼎力扛起社会主义的大旗，越南恐怕也抵不住那一波的“颜色革命”（当时叫“和平演变”）。中越关系正常化之后的两

任越共总书记——杜梅与黎可漂，都深谙中共在保卫越南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角色，因此把“同志关系”放置到双边关系的首要位置。此外，稳定的双边关系，对双方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也是最为有利的。



2015年10月7日，夜幕中的胡志明市。如今这里早已成为越南国内经济的推动力量，灯红酒绿，歌舞升平。

从表面来看，如今的越共新班子有利于稳定越南对华关系。总书记阮富仲重视意识形态，且在对华关系上比暂时失势的阮晋勇温和且务实；陈大光与阮春福都在越共十二大前不久访问过中国，阮氏金银之前已是国会对华友好小组的带头者。但这些始终掩盖不了越南对华关系中的诸多“短板”。越南诸多势力在“东海”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与对策，不仅短期内难以改变，还会不断地冲击未来的对华政策。

对越南来讲，在坚定维护越南的海洋权益与稳定越中关系之间，在中美之间，在发展经济与稳定共产党的统治之间，在“颜色革命”之压力与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左右逢源”应该是最佳状态。但理想终归只能期待，现实必须面对：飘摇中召开的越共十二大也并未化解导致其动荡的根源。“摇摆”的缘由和结果都是越南内外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越来越低，越南社会的低烈度动荡在所难免。如此看来，下一个五年或许会成为越南政治社会变化的“窗口期”。

阮晋勇“以退为进”？

越南“经济沙皇”退选真相

特约撰稿／张明亮

“强人”阮晋勇最后一刻确定退出竞逐越共总书记的消息，不仅增加了外界对越南政坛“纸牌屋”的好奇心，也体现出其愈加“无常”的新特点。

自阮晋勇1996年进入越共中央政治局从而进入核心决策层，至今已经20年。此前，他一直是越共总书记候选人中呼声最高、也是最有力的竞争者——无论是资历、实力、形象还是年龄，似乎都好过本已超龄“服役”的越共总书记阮富仲。

然而，两位阮姓大佬的竞争如同马拉松，最终胜出者未必是近乎全程领先的那位。只能说，阮富仲胜在最该赢的阶段。然而，究竟是什么把阮晋勇拉下了马呢？回顾其履历或能发现：在担任总理辉煌的政绩背后，早已埋下导致他远离总书记的非年龄因素。

“经济沙皇”的“硬伤”

对于阮晋勇来说，究竟是经济领域的成就拖累了他，还是失误害了他呢？两者可能都有，也可能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几乎在越共十二大举行的同时，国际机构的报告显示：2015年的越南经济增值率接近7%，是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且是在全球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俄罗斯等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实现高增长的。内需扩大与外资飙升是越南2015年经济高增长的“功臣”，越南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越南个人消费增长9.3%，外商直接投资与2014年相比飙升了17.4%。此外，越南经济的好消息还不止于此，美国彭博社预计，越南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7%，和2015年基本持平；澳新银行集团预估2017年的越南经济仍会是全球增长最快的。

国际机构的评述肯定了越南经济的成就，却未提及作为南越南经济掌舵者——总理阮晋勇的贡献。算上2006年出任总理之前的十年副总理之历练，阮晋勇作为越南经济“掌门人”的时间达20年之久，而越南经济持续的高增长是在他执掌越南的基础上实现的。从这个角度说他是黎笋之后越南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是有道理的。



2016年**1**月**21**日，越南总理阮晋勇抵达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现场。在越共十二大召开期间，这位政治强人退选越共总书记，引发外界激烈讨论。

两场经济危机——一个区域性的与一个全球性的，阮晋勇都曾作为越南主管经济的要员经历过。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已升任越共政治局常委的阮晋勇出任中央经济部部长，算是越共历史上仅有短暂的常委设置。尽管1997年经济危机中由于越南的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受影响较小，但作为主管经济的政府部长，阮晋勇在越南经济领域的角色与地位已经开始确立。

此后20年间，阮晋勇都是越南经济的主要掌舵者之一。1997年9月他出任政府常务副总理，主管领域是经济与金融；长达10年的政府常务副总理一职不仅为其顺理成章出任总理铺平了道路，也使他成为越南经济领域呼风唤雨的重量级人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越南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程度远超过1997年，其遭受的冲击力度也是之前无法比拟的。2008年，阮晋勇作为越南总理已经两年多，其治理下的越南不仅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也为其卸任后的高增长奠定了基础。

当然，越南经济在高增长的风光下也有不少瑕疵。2008年经济危机背景下越南造船业遭遇重大损失，阮晋勇也得为当中的漏洞负责，他本人亦为经济领域的失误检讨过。其在经济领域的“短板”，也屡次成为政治对手攻击的“软肋”。

经济领域为阮晋勇积累的声望与权势，反而成为不利于其追逐总书

记大位的利器。越共总书记的相对弱势几乎成惯例，越南政局与不少政治精英已然受惠于这种格局。阮晋勇未掌握越共“一号位”之前，不仅可以在经济领域呼风唤雨，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也不弱于总书记多少。有人担心，一旦获得越共总书记的位置，阮晋勇再结合已有的经济优势，势必会成为最为集权的人。

可能的“戈尔巴乔夫”

1982年的越共五大开幕式上，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出席越南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当时的阮晋勇还在地方上任职，并不是要员，或许很难有机会作为越共四大代表出席由戈尔巴乔夫参加的会议。目前能看到关于阮晋勇的履历中，仅显示他在1986年越共六大上成为候补中央委员；没能显示他在地方任职的详尽经历。

到了1991年越共七大时，阮晋勇成为中央委员，开启了其政治历程上的“快车道”；而戈尔巴乔夫则成了苏共的“罪人”。不过，在越共十二大前夕，两人终于得以“相遇”：阮晋勇则被认为或成为越南的“戈尔巴乔夫”。

自戈尔巴乔夫引领苏共走入末路后，“苏共之路”在越共内的呼声从未间断过。尽管党外的知识精英阶层从未放弃过肢解越共的努力，但对越共来说，最害怕的是源自党内尤其是高层的变节。越共十二大前，以越南前驻华大使为首的几十位老党员们站出来以公开信的方式要求越共放弃意识形态，放弃社会主义。但这些越共要员同戈尔巴乔夫的区别是：他们还不是党内最高层。

重实效、不受意识形态束缚（或者说不重视意识形态），是阮晋勇被贴上的标签。但这些标签都是出任越共总书记的大忌，这也是阮晋勇被阻止在越共总书记“门槛”外的主要因素之一。

越共因其执政效能，在国内外倍受诟病。被越共赶到海外的越裔人士中有不少坚定的反共者，因为他们不少是越共的受害者。包括阮晋勇的亲家——也是前南越时期出逃的官员。海外越南裔批评越共不民主，国内民众为越共官员的大面积腐败与低效所累；两个群体几乎都一致认为越共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对中国太软弱。随着越共执政地位遭遇挑战，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所面临的压力似乎也越来越大。

正因为如此，越共党内坚守社会主义的力量得到了重视。当危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变强大时，反击的势力也更为有力。他们有些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着坚定信念的人，更多的可能是受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

人。他们中的不少人居于越共的要津，成为党内有票权的人，或是能影响投票的人。

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2016年1月21日，越南总理阮晋勇在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言时，媒体拍摄其讲话的视频画面。

在中文网络世界中，阮晋勇几乎是“坏邻居”中的杰出代表。作为邻国政要，阮晋勇在中国网民的口碑中，可能仅好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

阮晋勇在其第一个总理任期内，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既有正式国事访问，也有到中国参加国际活动并顺访中国部分省市。但第二任期伊始，阮晋勇曾两度到中国参加东盟博览会，但未再顺访其他任何地市。2013年中国总理访越后，作为越南总理的阮晋勇直到卸任也未回访中国。

中越两党、两国高层的紧密互动是两国关系的特色，也是双边关系的保障。相比之下，阮晋勇在越共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僚都曾访问过中国。政治局的“四号位”阮生雄在其国会主席任期快结束时访华，作为越共要员，他还前所未有地向毛泽东主席铜像敬献花篮并参观纪念馆。毛泽东与胡志明一道被中越两党高层共同定性为友好关系的“缔造者和培育者”，中共要员们访越时也必到胡志明陵墓和其故居参观。

与阮晋勇同期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任内更是不止一次到过中国。总书记阮富仲2015年访华的代表团中还有不少政治局委员。阮春福是副总

理中唯一的政治局委员，也是其接任总理的有利条件之一。他在2015年9月到中国参加东盟博览会之际，专程会见了中国总理李克强，还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岐山交流了反腐反贪工作。在大多数政治局同仁们都与中国来往的对比之下，阮晋勇未访华之举，即使不是格格不入，至少也是其政治生涯的一块“短板”。

与此同时，阮晋勇还被贴上“反华”的标签。阮晋勇第二任期内确有不少公开对华强硬的言行。在中越之间最为麻烦的南海问题上，他多次公开强硬表态，甚至暗示越南要像菲律宾那样拿起法律武器同中国斗争。经济上，他力主多元化越南对外经济合作的渠道，弱化越南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与阮富仲以及党内其他看重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同僚们相比，阮晋勇更看重对华博弈中的越南国家利益，而不看重在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同中国的共通性，以及中越关系的稳定性。

但若依此把阮晋勇界定为“反华”，可能过于武断。“亲华”是与“反华”相对的，也是共生的。或者说，越南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亲华派”或者“反华派”，有的只是倾向于不同方式维护越南国家利益的政治精英，他们都是越南的民族主义者。所以，称呼阮晋勇为越南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可能更合适些。对华强硬的手段在维护民族利益方面，可能显得有些简单，反倒不利于真正有效地维护越南的民族利益。中国对越南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方面，还在于中国是“搬不走”的“大邻居”。一个仅以单一方式维护越南利益而不与“大邻居”往来的人，也会被党内大多数认为不适合领导越南。

以退为进的可行性

越共的“纸牌屋”里，阮晋勇在十二大期间放弃了被多个代表团提名的机会，从而退出越共十二届总书记竞选者之列。“拖累”阮晋勇竞争越共总书记职位的，可能还有其他因素——比如遍布天下的阮氏“团队”。他的大儿子阮清谊仅39岁，已出任坚江省书记，也是最年轻的越共中央委员。阮清谊的学历与年龄都符合越南政坛年轻化和高学历化的潮流。但由于是阮晋勇的儿子，自然会被怀疑：升得快靠的是什么？此外，其“90后”次子阮明哲已经是平定省执行委员会委员，是平定最年轻的省委干部。其女阮芳清执掌着投资基金公司“越南资本管理”和证券公司“越南资本证券”。女婿阮宝黄（美国籍）是原南越阮文绍政权内阁副部长、1975年出逃美国的阮邦的儿子。

不过，比这更值得探讨的是阮晋勇未来的政治空间。据英国BBC的推测，阮晋勇引退后，他的亲信陈大光将会担任国家主席、阮春福将会

担任总理。而他的另一亲信——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会副主席的阮氏金银，极有可能担任国会主席。若该布局成功，则阮晋勇退一进三，“四驾马车”占其三，可谓以退为进。

问题是：他是暂时性退出还是彻底淡出政坛？若有“进”的话，会到哪种地步？已经做了两届总理的人，还有什么位置值得去追逐呢？

阮晋勇在越共十二大召开时的年龄是阮富仲第一次就任越共总书记时的年龄。以阮富仲的年龄，不太容易再做完一个总书记任期。传言中十二届中央中途就会“换将”，也可能成为阮晋勇“东山再起”的机会。越共十二大前，越共以《党章》里有“特别情况”而留任“老班长”；既然有了先例，还有什么样的“特别情况”不能出现呢？越共十二大后的越南政坛，可以想象的空间还很大，留给阮晋勇操作的空间也不小。毕竟他才是越南政坛的“无冕之王”。

（作者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越南新领导集体四大看点

从越南新一届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构成来看，南派、北派之分已不那么明显，未来由此造成的政局阻力有可能得以消减。

特约撰稿／ 黄兴球



随着越南新当选的政府总理阮春福宣誓就职仪式的圆满举行，越南新一届国家主要领导集体于4月初尘埃落定——阮富仲担任总书记，陈大光担任国家主席，阮春福担任政府总理，阮氏金银担任国会主席。

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影响力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政治局决定国家大政方针；二是国家主要领导人直接对政治局负责，受国会监督；三是国会的监督力正在逐步加强。此外，越南的国家主要领导人以及各省市地方的领导人都必须是国会代表，否则将无资格参加选举活动，即不是国会代表的人就不能具有被举荐为国家领导人的资格。从这个层面看，越南国家领导人是在国会领导下的一员，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越南宪法赋予国会监督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理的权力。其监督权体现于任期的中期、末期对担任这三个职务的领导人进行信任投票，若“低信任”票超过国会代表总数的2/3，就必须辞职。因此，未来的“中期”信任投票（任期两年半），显得十分关键。如何看待和评价这四位越

南国家主要领导人，也成为近来越南国会和全体人民最为关心的事。

宣誓的门道

2013年越南宪法修改时增加了一条规定："当选之后，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政府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必须宣誓忠诚于祖国、人民和宪法"。据称，增加这条规定是越南历史学会副会长、属同柰省国会代表团的国会代表杨忠国的建议。

今年3月31日，越南国会新任主席阮氏金银宣誓就职；4月2日，越南新任国家主席陈大光宣誓就职；4月6日，越南新任总理阮春福宣誓就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则要等到6月完成选举后宣誓。

一般来说，上述领导人的宣誓仪式在国会主席台举行。主席台中央前段摆上一个宣誓台，礼前由三位护旗手护卫国旗站立于宣誓台之后，礼仪人员将一本红色硬皮、装帧精美的越南《宪法》置于台上。宣誓人从主席台的左侧走到国旗之前，先行一次鞠躬（向国旗），之后登上宣誓台，左手抚按在越南宪法之上，右手掌心朝前向上举起。朗读誓词后，宣誓人右手抚于左胸前再行一鞠躬（向国会全体），礼毕，走向主席台右侧的发言席接着发表就职演说。这期间，乐队演奏越南国歌。

这套宣誓仪式，在越南历史上是没有的。从上述流程来看，总的来说比较简略，花费时间在5分钟左右，加上就职演说，总共10分钟左右。仪式中所用的道具包括《宪法》读本、国旗、宣誓台、国旗护卫队、乐队等。

宣誓词一共两句话，第一句是"绝对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宪法"，连续三个"忠诚"，显示出宣誓的保证力、公信力。前面两个"忠于"不必多言，第三个"忠诚于宪法"值得一提。越南政府上一个任期的重要工作是普及越南宪法知识、修改宪法使之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忠诚于宪法"就要依照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管理国家，不可违宪。突出宪法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是越南国家主要领导人宣誓仪式的一项重要内容。

除了口头上承诺"忠诚于宪法"，宣誓人的左手掌还需按在《宪法》读本之上，口念手抚，于心于体，全面感知宪法的威严。

如果拿这套程序与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相比，越南典礼整体朴素简约、省时省力，不像美国那般豪华精美。美国的典礼由最高法院大法官来主持，越南则由国会主席来主持；美国只有总统、副总统要宣誓，越南则是国会主席、国家主席、总理和最高法院院长都要宣誓。美国总统

的宣誓场合在开放的华盛顿公园，广大民众可以现场聆听新任总统的就职演说；越南的宣誓在封闭的国会大厅，民众可以在电视和广播的直播中听到、看到领导人们的誓言。

总体来看，这套宣誓仪式不仅丰富了越南的政治文化，而且即将带来可以预见的对于宪法的共同尊重和依法治国理念的普遍认同。这对越南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大有裨益。



越南的“党指挥枪”

本次越共“十二大”的选举结果，用阮富仲的话说“是个意外”。已经72岁的他再次当选越共总书记。之所以能跨越年龄障碍，得益于去年10月越共十二届九中全会对于在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年龄的“特别”规定。未来阮富仲是否会任满第二个任期，即到2020年才退休；还是在中途的2018年或者2019年就退休，仍是未知数。五年后，谁是越共总书记的接班人，将成为新的政治难点。

越南四位新上任的国家领导人均从基层工作干起，经历过各级职务的锻炼。他们从地方到省，再到中央机关都工作过，能将基层工作与上层的工作有效结合到治理国家的活动当中。

总理阮春福和国会主席阮氏金银对于经济工作比较熟悉，特别是阮春福经常深入边境、海岛地区的第一线指导工作，熟悉越南民情，对于

越南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现实都能把握。阮氏金银在刚工作时曾从事财政工作，又先后在越南工商部、财政部工作。她到海阳省担任省委书记期间，主抓该省经济工作，富有成效。在担任国会副主席期间，她所分管的国家审计署工作也受到好评。

越南国家主席是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军队、警察）总司令，也是越南国防安全委员会主任。越南共产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是设立在连队以上单位的政治委员会，在国防部设立军党委，国防部长亲任党委书记。越共中央设立的军事委员会中，越共总书记是主任，国防部长为副主任，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理等是委员。

在越南，“党指挥枪”指的是越共中央对于军党委的绝对领导，军党委对于军队系统的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另一支武装力量是公安部队，在公安部设立中央公安党委，由公安部长亲任党委书记，各省市地方的公安系统也都设立党委。此外，越南国会中必有一位副主席来自越南军方，国会还下设国防安全委员会。据宪法规定，越南国会具有“对外宣战的权力”和“全民总动员的权力”，因此国防安全委员会的职责是对可能的战争状态进行评估，以便国会做出正确决定。

不过，越南新一届国家主要领导人都没有从军经历，对于军人的生活没有切身体验。因此，如何建设现代化的军队是新一届领导人需要面对的大问题。

越南国会在2015年底的国家预算审核中，批准了86亿多美元的军费预算，军费同比增长12%。但是，军事现代化不仅仅是钱的问题。目前越南陆军的九大军区和海军的四大军区，要守卫3500公里的海岸线及其近海岛屿及与中国、老挝、柬埔寨接壤的近5000公里的陆地疆界，100万的兵力仍显紧张。不过，与9300万的人口相比，兵民占比达到0.93%，相对不低了，因此再增加兵员数量也不太现实。

2016年3月30日，有越南国会代表对时任国家主席张晋创在任期报告中提到“近400名军官和警官少将”提出质疑：“战争年代只有72位将军，和平年代将军数量反而达到400位，这是为何？”显然，越南军队将多兵不广的问题十分突出。更严重的是，越南军队除了可以用国家预算之外，还可以与普通老百姓营商争利。军队经商问题已是积重难返，可惜越南新的领导集体目前对此问题还不够关注。

本次国会副主席由原越南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杜柏已大将担任，是一步好棋。国会中的军方代表黄玉山已由越南国会免任，杜柏已刚好补上这个空缺。他的军衔高、军事经验丰富，为国会提供有关军事

方面的建议将更有分量，未来国会在军事方面的决策将更为妥当。

个性截然不同

国家主席阮富仲对外的形象一向平易近人。他2011年刚当选总书记时，参加学友聚会，据说是从家走路到聚会的地方，没有车队、随从，更没有警车、封路。从这件小事，可以明白为什么他在今年的选举中再次当选。今年1月20日再次当选时，越南网民对其的评论还是“确实没架子”。

陈大光在民众心目中的印象同样不赖。比如，在去年越南舆论界广泛关注的“裴乔尼事件”中，这位前公安部长处理得当，为人称颂。裴乔尼是一个参加了高考的中学生，原本考上了越南人民公安政治学院，但录取人员在审查她的档案时发现，她已去世的父亲23年前曾因妨碍公务被刑拘，结果决定不予录取，后来她将此事诉诸报端，引发社会广泛讨论。

此事涉及到法律问题、档案管理、培养人才等多个问题。当时陈大光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知道此事后，直接对录取工作进行指导，要求公安部与宁平省公安厅对这个学生的情况进行调查。回国之后，他马上召开会议，听取有关调查情况的报告。最后他指示宁平省公安厅帮助这个学生完善档案，录取她入学。这样的处理，使这个女学生最终如愿进入大学，陈大光也被坊间评价为是一个“为民做主的公安部长”。

阮春福则是个实干家，兼任西北指导委员会主任时，他常去贫穷的越南西北地区奔走；兼反走私委员会主任时，也常到中越边境的越南一方调查。不久前，因南方干旱和海水倒灌引起了土地盐渍问题，他在去年11月亲临南方各省第一线考察，寻找解决办法。就职典礼之后他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提到这是当前必须抓好的大事。

阮氏金银早在当劳动部长时，在回答国会代表质询时就体现出极强的辩驳能力。2014年5月越南爆发反华示威游行，尔后演变为针对中资企业的暴力事件。作为国会副主席的她最先出面表态说“不要做损害国家形象的事”。她还称，目前形势得到初步控制。我们已经向外国企业家寄发了安抚书。但是政府必须做出预报，评价形势，集中于一些顺利的方面进行分析，弄清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何影响，并附有应对形势的具体办法。另一方面，要向工人大力宣传，不允许丑化越南形象的自发行动发生。这无疑给在越南的中资企业吃下一颗定心丸。

对华交往还不够

阮富仲曾经七度访华，在他还不是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就曾以中央理论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参加在中国举办的活动。相对于其他的越南现任国家主要领导人，他到中国的次数是比较多的。当然，他关心的是越南的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因而必须从中国借鉴经验，与中国多有来往是正常且必须的。

相比之下，其他主要领导人虽然访问过中国，但次数并不太多，对中国的了解也非常有限。特别是越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她在2008年以劳动部长的身份到北京参加过残奥会之后，就很少有机会访问中国，直到2015年4月随同阮富仲访华。虽说她在2014年发生反华事件时最早出来表态，但并没有对在事件中遭到祸害的人表示关切和慰问，而她的家乡槟知省就是暴力事件的重镇之一。2011年她被任命为越南国会中的越中议员友好小组主任，但之后她只与中国驻越南大使会谈过两次而已。

因此目前来看，越南新一届国家主要领导人与中国的交往不算成熟、沟通也不太够。“国之交在民相亲”，加强中越两国国家领导人的交往和对话，在利用已有合作机制的同时，增建新的、更为简易的会面交流机制，才可避免误判、促进友谊。

从越南新一届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构成来看，南派、北派之分已不那么明显，未来由此造成的政局阻力有可能得以消减。由于年龄方面的原因，他们在2020年可能都不会继续担任国家领导人，因此培养后备领导人的任务艰巨。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工作经验丰富，对于越南下一个五年社会经济建设大有裨益，因而要实现越共十二大提出的GDP增长6%-7%的目标也是有可能的。

诚然，新一届领导集体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无比复杂，如何审时度势，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作者系浙江工业大学越南研究中心教授）

越南重判国企贪官

从越南船舶工业集团到越南航海总公司，贪腐频发的情况不仅令越南国内怨声载道，还造成国际投资者对越南经济环境的担忧。

特约撰稿员 / 尹鸿伟

2013年12月16日，河内市人民法院对越南航海总公司腐败案件的10名被告进行了初审判决：原越南航海总公司董事长、原交通运输部航海局局长杨志勇；原越南航海总公司总经理、越南交通运输部运输厅副厅长梅文福死刑。其余8名被告也因同样的罪名被判处4至22年不等有期徒刑。

这起腐败案件是2013年11月以来越南审理的第三例“越南央企高层腐败案件”。越南《人民报》12月18日发表评论称：“越南党和国家一直以来始终关心领导和指导预防、打击腐败工作。不管在任何革命阶段里，党和国家都坚定反腐决心。在国家革新、开放及融入国际社会进程中，越南党和国家从未松懈预防和斗争打击官僚主义、腐败、浪费等工作。”

自1986年开始实行经济革新以来，越南遭遇了许多共产党掌权后经历的官员腐败问题。虽然本质上难以避免，但越南清楚这种恶劣问题的后果，并千方百计试图扭转局面。

“杨志勇只是腐败前台”

越南航海总公司的腐败案件，造成国家财产共计3670亿越盾（约2000万美元）的损失。“越南船舶工业集团和越南航海总公司都是规模巨大的国有企业，因此影响深远。但因经济犯罪判处死刑，似乎有点重了。不过杨志勇他们还可以对初审上诉，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越南学者黎明勇说，“事实上越南民间都在议论，杨志勇只是腐败的前台，其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逍遥法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11年12月25日，共有23名船员的越南航海总公司“皇后”号货轮从印度尼西亚装载5.4余万吨镍矿石运往中国，

途中紧急报告船体有18度的倾斜后与外界失去联系，随后台湾、菲律宾和日本等海上救援队伍不停进行海上搜救，但最后仅有船员窦玉雄一人被英国“伦敦勇气”号货船救援生还，被送往新加坡滨海南码头。

各种信息被披露后，与越南航海总公司有关的事件随即曝光。根据越南公安部的调查，该公司曾在2007至2010年从国外购买了73艘货船，大多数都是“二手船”，其中有17艘的使用年限超过15年甚至30年，还没有使用就成为废铁。



2013年12 月16日，越南河内市人民法院审理委员会判处原越南航海总公司董事长、原交通运输部航海局局长杨志勇(前排中)等两人死刑，这是**11**月份以来越南审理的第三例严重腐败案件。

此期间杨志勇正担任越南航海总公司的高层领导，该公司已经严重亏损，另有大约12亿美元至今无法收回。杨志勇还涉嫌以权谋私，并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损失，致使超过10亿美元贷款无法偿还。2012年5月17日，经越南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公安部刑事调查机构将对杨志勇进行逮捕，但其获悉情报后于当日下午潜逃，使到其住处搜查的警察扑空。后来在国际刑警组织和柬埔寨警方的配合下，越南警方于2012年9月4日在柬埔寨将杨志勇抓获。越南媒体称，杨志勇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之前已经不知去向，其位于河内市的四层豪宅也早在两年前出租给他人。

2012年上半年，越南航海总公司持续亏损达1.4万亿余越南盾，占越南国家航运亏损额的一半。公司曾经解释亏损原因除货运需求下降以外，运费长期不断下降也是原因之一。但越南国家审计署发现，越南航海总公司在2010年投资了6720亿越南盾在非核心产业。

截至2012年年末，越南航海总公司短期未清债务为9.3万亿越南盾，而长期未清债务为33.82万亿越南盾。这些债务中有34.55万亿越南盾是由于投资错误引起的，主要是在买卖船、建设海港及船厂方面；除此之外，越南航海总公司还有2070万越南盾的逾期债务。按照越南媒体的计算，该公司目前背负着超过43万亿越南盾（约合20亿美元）的债务总额。

让法治精神生根发芽

如今，越南媒体上最常见的就是关于反腐的报道，相关信息总是占据重要版面，标题也很夺人眼目。近些年落马的高级官员包括政府监察总署前副总监察长陈国仗、贸易部前副部长梅文桑、农业暨农村发展部前副部长阮光河和阮天麟及阮善伦、交通运输部前部长陶庭平、公安部前副部长裴国辉等1.2万余人，2300多人遭严惩。不过在事件之后，越南的腐败歪风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抑制。

前联合国越南经济学者平卡斯曾指出，越南国有企业的经营一直是不透明的，这种情况必须终结。由于越南经济本身正面临官僚主义、基础设施落后、贸易赤字、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等诸多问题，而国有企业的大量亏损使得问题更加复杂。

越南在革新之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100美元，2008年却已实现1000美元的大关。作为共产党执政国家，如何保持政权稳定一直是越南的首要任务，其甚至在政治改革方面作出了许多大胆尝试。早在2002年，越南国会就开始实行质询制度，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党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检查委员会集体提出质询，并且过程进行全国电视直播。在反腐败与反官僚之外，越南还渐渐拥有了更多容纳批评的雅量，即让言论自由和法治精神在国内生根发芽。

虽然政治上的改革效果远非完美，但对于反腐败却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2005年越南出台《反腐败法》，前总理潘文凯2006年6月向国会表示："当前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与官僚作风日盛，在社会中引起民愤与不平，阻碍着民族进步，威胁着国家存亡。作为政府总理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对此感到无比愧疚。"

2012年5月4日，越南中央防治腐败指导委员会办公厅开通反腐败网站。据越南媒体介绍，反腐网会定期发布国家和越共的法律、政策等信息，"成为越共与国家、人民之间反腐斗争的桥梁"。此前，越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阮春福曾透露，近五年有近3000名越共党员因受贿而接受惩罚，他同时也敦促反腐败网站管理人员应及时曝光腐败行为，保护反腐斗士；并要求中央及地方政府、企业和机构积极为反腐网站作出贡献。

越共反腐败求政权稳固

从越南船舶工业集团到越南航海总公司，贪腐频发的情况不仅让越南国内怨声载道，也造成国际投资者对越南经济环境的担忧。有外媒评论称，由于长期以来对国有企业管理不善以及反腐败工作松懈，越南政府希望通过抓捕范青平、杨志勇等干部来缓解国内外的批评之声。

2012年9月7日，越南政府监察总署就公布越南关于实施《联合国反贪污贿赂公约》的国家报告举行通信会议。截至目前，越南已颁布、遵守和全面实施该公约145条规定中的102条；颁布遵守和尚未全面实施145条规定中的29条，尚未颁布和实施该公约的14条规定（主要包括越南已宣布保留或劝告性的规定）。同年11月，越南国会以接近95%的赞成票通过了《反腐败法（修正案）》，要求越南高级官员公开个人财产，即领导干部需要在每年的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将个人财产申报清单在本人所在机关、组织或单位公布。

近几年越南国企贪腐大案频发，也迫使政府加大打击力度。2013年9月，胡志明市城市排水公司、城市公用照明公司、西贡交通工程公司和城市公园与公用绿地公司四家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与总经理共8人被勒令辞职并开除出党。同年11月27日，越南食品技术股份公司的两名领导也因为贪污10.2亿越南盾分别被判处30年和22年有期徒刑。越南监察总署的报告显示，2013年前8个月，该署处理了73起腐败案件，惩处80人，其中36名越南企业、政府机构和部门的负责人被控腐败。

目前，越南的经济状况正处于痛苦的低迷期，曾经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已接近崩溃，并且到处布满废弃的建筑工地。2013年12月18日，《人民报》在题为《决心预防和打击腐败》的评论文章中表示：“预防和打击腐败、浪费的斗争仍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之处，效果欠佳。腐败和浪费仍在许多部门、各级政府和许多领域上严重发生，其范围较广、性质复杂，导致多方面的不良后果，侵蚀人民的信心，成为威胁党和制度存在的重大危机。”

【军事较量：越南的抉择】

越南会买哪些美国武器？

有学者提醒称，美国对越军事关系会将防务合作扩大到更实际的活动和联合演习，但越南需保持谨慎，过分刺激中国将使越南成为地缘政治斗争中的最大输家。

特约撰稿／ 田聿

2016年5月23日，美国与越南领导人在河内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全面解除对越南武器禁运。这被认为是奥巴马在“亚太再平衡”方面留下的最后一份政治遗产，将对南海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尽管美国早在2007年就修改国际武器贸易条例，放宽自1984年开始的对越军事禁运、允许视情况向越南出售非致命武器，但由于两国在人权、历史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美越军贸始终陷入“能卖的不想买，想买的不能卖”的怪圈。因此，国际社会认为，美国彻底开放对越军贸后，双方的军事技术合作关系可能发生质的飞跃。

美越互有算计

据马来西亚《亚洲防务月刊》披露，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并与美国建交后，美国解除对越南的经济制裁，但仍保留与国防有关的禁运规定。1998年，新加坡自动化工程公司试图向越南出售有美国技术专利的200辆M113装甲车，最终被美国封杀。2005年，美国还阻止过北约成员国捷克向越南提供“维拉-E”反隐身雷达。

但近十年来，美国对禁运采取的态度有所软化。2006年，越南国防部首次从一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公司买到一辆新式装甲车。与此同时，越军还以反恐的名义从以色列和克罗地亚购买了一些机枪和狙击步枪。要知道，若不是美国放松禁运的限制，越南想得到这些军火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越南与韩国、德国、印尼、以色列等国达成一系列国防合作协议，为越军的美制武器“翻修”提供了便利。

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和约瑟夫·利伯曼2012年访问河内期间，越南政府曾向他们提交了一份军事装备的“愿望清单”。不过，麦凯恩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他们反对全面取消对越军售限制，除非越南改善

人权记录。同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访问河内，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再次请求美国取消所有军贸禁令，但帕内塔传达了同样的信息。

奥巴马之所以能跨出取消禁令这一步，也与现阶段美越双方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考量相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防学院教授卡尔·塞耶指出，“对越南来说，其正设法使其海空军现代化，积极发展面向南海的联合作战能力，同时力争让规模最大的陆军武器装备实现国内自给，确保在中南半岛方向的‘一强独大’地位；对美国而言，越南的军事意图至少在相当长时间里不会威胁美国的亚太利益，同时，又能与其‘平衡’中国崛起的战略合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越南军事现代化是有利可图的。”



2016年5月23日，越南河内，美国总统奥巴马与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共同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两国领导人回答了关于两国关系和TPP框架下合作的有关问题，特别是奥巴马强调对越南完全解除杀伤性武器禁运。

据塞耶分析，越南人民军最希望得到的当属海岸警戒雷达、海上巡逻机以及作战舰艇的配套武器火控系统等，此外，就是越军仍在沿用的大批美式武器装备的零部件。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5月26日引述一位防务业消息人士的话说，越南正在寻求通过采购来自美国五角大楼“过剩国防产品”计划（EDA）的F-16战斗机以及经过翻新、装备了鱼雷的P-3C“猎户座”海上巡逻机，来改善其防空和海上安全能力。

《防务新闻》获得了一份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起草的非保密的防务业简报。根据这份题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合作计划”的

报告，美国驻河内大使馆“拥有一项依照美国政策目标和利益运作的稳健的安全合作计划，其目的是推动重点在越南安全格局内的关键领域的整合和获取”。

这些领域包括实现空中和海上区域态势感知、提供防范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海上安全保障、执行灾害响应、参与地区应急反应和国际维和行动，以及处理越南战争遗留问题对民间社会的影响等。根据上述报告，越南的目标是通过武器升级获得潜艇战、海上空中封锁、反水面战、反潜战、海上区域态势感知、预警以及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C4ISR）等能力，以强化其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加拿大籍越南裔学者、渥太华大学兼职法学教授卿武德则从战略层面分析称，美国应把握好取消禁令的机会，将越南塑造为可靠的战略伙伴，支持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尤其，在目前的执政党越南共产党以及今后不同政权的领导下，河内长期以来并且始终会对其强大的北方邻国中国感到担忧”。

他还呼吁美国应以军贸为契机，在对越示好的过程中设立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短期方案中，美国将在人权、民主等核心价值观上妥协，从而快速发展一个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能抗衡中国的越南；但在长期目标中，美国仍冀望于越南出现‘和平演变’的迹象。”

预计先期购买6架P-3C

作为越军主体，陆军在维护国内政治稳定、遂行国家防御任务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据俄罗斯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别洛夫少校介绍，越南陆军是有着约35万人的野战部队，他们被编成61个师、50个兵种（特种兵、炮兵、通信兵等）独立团，以及保障部队和分队。尽管越南陆军现役技术武器仍以苏联和中国产品为主，但1975年从南越缴获的大批美式武器仍不在少数。但有消息称，这些技术武器老化严重，50%都有故障或故障隐患。

与越南陆军“大而不强”迥异，得益于投资倾斜，越南海军近年来的发展令人侧目。据英国《简氏战舰年鉴2014-2015》统计，越南海军现役主战装备包括：俄制636型潜艇3艘、玉高级微型潜艇2艘、猎豹型护卫舰2艘、别佳级护卫舰5艘、轻型护卫舰和大型导弹艇9艘、两栖战舰艇36艘、水雷战舰艇13艘、巡逻艇53艘、军辅船23艘，共计146艘。尽管这些舰艇都是从俄罗斯、印度引进的，无论武器规格还是使用习惯都

与美国货大相径庭，但越南海军并未对美国产品关闭市场。

据《防务新闻》报道，越南海军航空兵和岸防部队多次流露出采购美国海上巡逻机、海岸警戒雷达的兴趣，特别是2005年三艘越南军舰得以安装美国诺·格公司英国分部制造的导航雷达，此事至今仍被越军内部津津乐道。

2015年6月，美越签署一份指导两国未来军事合作的愿景声明，越南海军积极寻求从美国优先采购远程反潜巡逻机，计划先期购买6架P-3C反潜巡逻机，如果成交，它们将从美国空军戴维斯·蒙森基地封存的二手机群里抽调。不过翻新后的P-3C作为成熟可靠的多任务平台，依然不可小觑。

目前，越南海军装备的2架EC-225超美洲豹直升机、3架CASA-212-400型海上巡逻机、3架DHC-6水獭-400两栖飞机等西方机型，或多或少都使用了美国公司的零部件。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8月22日，荷兰谢尔德造船厂证实，越南海军斥资5亿欧元向荷兰订购2艘西格玛级护卫舰，这是越南首次从西方国家购买新型水面作战舰艇。据悉，荷兰厂商已为其准备了多种功能模块，包括兼容美国作战指挥系统的模块，一旦美国放开出口，该舰就能选配美国产品。

不过，在塞耶看来，想要进行数额巨大的武器交易还很遥远，“越南不具备进行那种采购的国防预算。它将全身心致力于把6艘先进的基洛级潜艇整合到本国舰队中”，而所有的维护、修理和后勤网络及工人队伍，都将适应苏联或俄罗斯的技术。

至于越南空军，一度因接收南越空军装备，在上世纪70年代末达到1000多架飞机的装备规模。经过80年代柬埔寨战争的消耗，到了20世纪末，越南空军装备的各类飞机下降到550架（库存120余架），美制固定翼机基本停飞，只剩下大批UH-1多用途轻型直升机承担运输、联络和训练任务。

和陆军的需求类似，越南空军同样也希望从美国获得更多零件供应，以维持基本的装备运行。据美国《战略对话》杂志披露，2011年，越南一家公司曾竞购9架原属以色列空军的二手贝尔-212直升机，但遭到美国阻止。贝尔-212是昔日美军主力直升机——UH-1“休伊”的民用版，贝尔-212原本不携带任何武器，但以色列空军曾对一部分从美国购入的贝尔-212进行大规模升级，将其改造为火力强大的多用型武装直升机。在越南千方百计想从海外“淘”二手军事装备的情况下，如今美国只

需将早已退役的武器零件卖给越南，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美越同盟“不太靠谱”

除开装备买卖外，美国深刻影响越南军队的另一个“撒手锏”莫过于人员交流。近年来，越南表示出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大力推动人民军“走出去”，美国也巧妙地利用“维和”这一名义，培养越军参与海外行动的能力，也大力推动越南在南海等方向的“积极举动”。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披露，早在2005年，越南国防部就开始筹备向联合国派遣维和人员行动，但因资金和技术匮乏等因素，实质性动作直到2012年才落实，主要是邀请联合国维和机构在越南设培训中心，或者将本国军人送到国外受训，内容以语言、医疗领域培训为主。在此过程中，美国起到关键作用。《越南快讯》报道，迄今已有200多名军官在美国、欧洲和印度受训，主要集中在工兵和军医部队。

2014年，越南进行有针对性的各项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成立越南维和中心。同年5月27日成立的越南维和中心直属于越南国防部，总部设在河内。其职能是专门负责参谋、管理和组织落实越南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相关事宜。按照联合国标准培训并选派维和人员，并对派遣人员和部队进行协调集中。

今年6月，越南中校陈南岸、莫德重被维和中心选中，首次代表越南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赴南苏丹执行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被越南媒体称为民族“和平大使”的这两名中校都在美国接受过专业培训。越军副总参谋长武文俊曾含蓄表示，这两名军官得到“友好大国”的热情帮助，“他们的英语和专业能力非常突出，完全能够胜任维和工作要求”，这被外界视为向美国表达善意。

对于美越的走近，不少分析也指出，由于越南共产党对美国怀有戒心，美越军事同盟不可能马上火起来。《环球邮报》提到，早在1998年，即美越关系恢复正常三年后，越南国防部发布的一份机密报告就称：“要严防美国利用‘人权’、‘民主’等扰乱越南社会稳定，搞‘和平演变’。”另据一份2009年披露的美国机密档案显示：“越南国防部一名高官曾告诫众多官员，要防美国人挑战越南政府。”

“越南人并非天生怀有反美情绪。之所以处处防着美国人，是因为当年越南被外国人殖民统治的历史教训太深刻了，越南人不希望重蹈覆辙，所以，他们的警惕性很高。”塞耶认为，美国也不愿意向意识形态与本国区别很大的越南出售各种武器。这种互相猜忌的心态，注定美越军

事同盟“不会太靠谱”。

塞耶也提醒称，美国对越军事关系“肯定要将防务合作扩大到更实际的活动和联合演习”，但越南需保持谨慎，“过分刺激中国将使越南成为地缘政治斗争中的最大输家”。

美国欲向越南出售致命武器

为何向越南“示好”？

特约撰稿员 / 黄山伐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不久前向越南频频示好。8月14日，邓普西访问河内，与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杜伯巳上将举行会晤，成为40多年来，第一位访问越南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越南国防部声明称，两国将合力加强军事合作，聚焦海事安全、训练，并克服越战带来的后遗症，而美国先前表示，将最快在9月部分解除对越销售致命武器的禁令。美国《纽约时报》评论称，越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中国接壤的战略位置、将近1亿的人口规模，以及它在南海的漫长海岸线。

《今日美国报》提醒道，邓普西本次访越面临一系列的过往和当前问题。“越南战争以及在越南战争中死亡的5.8万名美国军人，像一个幽灵一样缠绕着所有问题，不断提醒美国想起在战争中的损失。”



2014年8月14日，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右）访问越南，与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杜伯巳共同检阅越南人民军仪仗队。这是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首次访问越南。

越南成为“最重要拉拢对象”

自两国关系1995年正常化以来，美越之间贸易有了很大增长。但由

于美国禁止对越南销售军备，两国军事合作非常有限。1998年，新加坡自动化工程公司试图向越南出售有美国技术专利的200辆M113装甲车，结果被美国封杀。2005年，美国又阻止了北约成员国捷克向越南提供“维拉-E”反隐身雷达。

不过，近年来，美国对越禁运的态度已有所软化。2005年，三艘越南军舰安装了美国诺·格公司英国分公司制造的雷达。次年，越南国防部首次从一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公司买到一辆新式装甲车。除此之外，北约成员国斯洛文尼亚2004年以1800万美元的价格向越军出售了两座浮桥，越南还请芬兰和以色列帮助升级了122、130毫米口径火炮。与此同时，越军以反恐名义，从以色列和克罗地亚购买了一些机枪和狙击步枪。

美越军事关系的走近，早就被触觉敏感的美国军火商所感知到。2009年7月2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到访泰国，在一段电视访问中表示“美国回来了”，“奥巴马总统和我现在对亚洲给予更多的关注”。这番表态在之后举办的2009年亚洲防务展上有所回应——当时美国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锡恩等军火公司公开表示：“只要越南需要，美国武器进入越南没有任何法律问题。”

美国《防务周刊》分析称，在奥巴马提出美国重返东南亚的政策后，越南随即被列为最重要的拉拢对象。“如果能将越南拉进美国的‘防华包围圈’，可在战略层面上限制中国海军的能力，同时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中国部署在西南地区的陆军和空军力量。”

为拉拢越南军方，美国军火商盼望向越南出售那些原先禁止向共产党国家出口的致命武器装备，包括无人侦察机、肩扛式地空导弹、M109自行火炮、GPS导航设备、高速巡逻艇等。俄罗斯“军工复合体”网站认为，一旦美国向越南出口武器开禁，它将在提高越军的信息化水平、监视能力以及对海攻击能力方面发挥作用，可将越军现有作战能力成倍提高。美国亚太问题专家拉塞尔也指出，美国应借助一切力量来牵制中国的发展，不要理会这些力量与美国存在着多么不同的意识形态差异。

谈到取消向越南出售致命武器的禁令的可能性，有专家认为，2007年布什政府修改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允许视情况而定向越南出售非致命武器；地面部队可能用来控制人群的武器和装备仍然受到限制，所有致命武器和许多军事服务仍然禁止向越南出售。奥巴马政府早前也向越南政府明确表示，该国糟糕的人权记录仍然是解禁的重大绊脚石。

2012年1月，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和约瑟夫·利伯曼访问河内期间，越南方面递出一张军事装备的“愿望清单”。当时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除非越南改善人权记录，否则美方仍会反对取消对越军售限制。同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访问河内时也传达了同样的信息。一旦取消禁令，越南最有可能谋求购买海岸雷达、地空导弹和海上巡逻机，此外还有为在越战期间缴获的美国军事装备配备零部件。

美欲通过人民军研究解放军？

美国“全球安全”网站指出，美国与越南展开军事合作，既是经济利益推动的结果，也是出于在外交和军事上制衡中国的考虑。美越合作意味着越南将在军事技术上具备相当能力，这无疑是“约束中国不要过于蛮横对待越南的重要措施”。

在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亚太问题专家沃克·菲茨杰拉德看来，美国积极武装越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想通过越南人民军来研究解放军的战略战术。“要知道，越南人民军是解放军最好的学生。经过上世纪50-70年代的印支半岛战争，越南人民军已将解放军的战略精髓理解得很透彻，作战风格上也与其极为相似。尽管1979年后，中越军方再未有过联系，甚至反目成仇，但双方的战略和战术思想仍有共通之处。因此，对于希望了解解放军作战特点的国家来说，再没有比越南人民军更合适的选择了。”

尽管“对抗中国”这一共同目标促使美越走近，但效果还很难说。加拿大《环球邮报》披露，美越两国确实搞了一些海军联合演习和合作，但从这些演习和合作的内容及规格上可以看出，美越军事同盟的水平仍很“低级”：灭火演习、搜救演习；军事医疗训练合作；一小批越南士兵去美国训练；一小批越南军官去美国得克萨斯州学英语等。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越南问题专家卡尔·塞耶提到，此前有外媒报道，在一次联合演习上，美越两军官兵曾互相交流了“机密信息”。“其实，所谓的‘机密信息’只不过是两国军队的一些菜谱和烹饪知识。可想而知，这种级别的美越军事同盟根本拿中国没办法。”

令中国担心的是，通过与美国结盟，越南能搞到美式先进武器，哪怕获得的只是美式防御性武器。“中国一直警告越南不要玩两面手法。可实际上，美国目前依然拒绝向越军出售任何先进武器。在越方看来，美国是一个吝啬的军事伙伴。”塞耶说。

他还提到，另一个让美越无法完成军售交易的因素是：他们都不想

与中国撕破脸皮。毕竟，如今的中国是美国和越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尽管这两个曾经敌对的国家正在相互示好，但哪一方更有诚意还很难说。美国官员表示，越南坚持要以自己的节奏逐渐改善与美国的军事关系。

不能忽视的是，越南共产党对美国一直怀有戒心。早在1998年，即美越关系恢复正常三年后，越南国防部发布的一份机密报告称："要严防美国利用'人权'、'民主'等扰乱越南社会稳定，搞'和平演变'。"另据一份于2009年被披露的美国机密档案显示："越南国防部一名高官曾告诫众多官员，要防美国人挑战越南政府。"

"越南实际在玩一个'踩鸡蛋'的游戏，"《纽约时报》记者马克·麦克唐纳解释称，"越南就像在两个鸡蛋上跳舞的蜻蜓，而两个鸡蛋就是中国和美国。"在他看来，越南官员在正式宴会上与中国外交官举杯祝酒时，总会用过去的口号称两国"唇齿相依"，可是私下却抱怨中越关系存在着"龋洞和牙龈炎"。"随着加强扩张的中国的崛起，越南有理由更加谨慎。"

按照五角大楼的提法，2020年美国将把六成的海军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美国与新加坡、菲律宾达成新的军事协议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澳大利亚开设新基地，都是该转向的一部分。华盛顿将这些称为"转向"或"再调整"，而北京视之为"遏制"。

在一系列的美国军力"转向"中，越南有望成为其中重要一环。塞耶指出，美国对越军事关系"肯定要将防务合作扩大到更实际的活动和联合演习"，但越南需要保持谨慎，"过分刺激中国的结果是越南将成为地缘政治斗争中的最大输家"。

越南引进以色列火箭炮盯紧南海？

越军为加强南沙防御体系，正加紧引进预警机和潜艇，其中预警机将使越军实现本土和占领岛屿之间雷达低空盲区的无缝衔接，提高对手在南海“控局”的行动成本。

特约撰稿／ 李方

一说起越南人民军，许多人脑海里会浮现出“亚洲版俄军”的印象——从AK-47突击步枪到苏霍伊歼击机，除了东方人的面孔，越军的“俄化程度”比“对俄军购大咖”印军还高。但近年来，随着越南与美国关系改善，美国解除对越致命武器出口禁令，让其他西方军火商快速进入这个新兴市场。

2月25日，美国“防务博客”网站援引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信息称，越南人民军购买了20门以色列多管火箭炮，装备海军岸防炮兵，用于加强越军对南海西部水域的“区域拒止”能力。军事专家称，越南正利用自身独特的地理环境，构筑一种抗衡大国海军的“廉价以陆制海体系”，以色列火箭炮是其中重要一环。

“祖国可以放心的战斗队”

关于这款火箭炮的消息，最早出现在2014年12月。有当地电视台播放海军阅兵式，画面中出现两辆乌克兰生产的KraZ牌重载卡车，可车厢上装载的却是涂成蓝色的火箭炮发射器。

几个月后，越南国防电视频道(QPVN) 播出了“今日国防”节目对越南第四海区第685岸防旅的专访。旅长黎明俊（Le Minh Tuan）大校对着记者的话筒侃侃而谈，旁边是曾惊鸿一瞥的“神秘火箭炮”。接下去的画面中，该旅官兵演示了火箭炮发射定向管的组装、射击诸元装定、施放无人机侦察等环节。最后，越南国防频道的女主持人用了“祖国可以放心的战斗队”的评语，结束了这场报道。

据资深军事专家查证，越方没有透露型号的火箭炮实为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IMI）火箭系统分部（RSD）在2007年开发的模块化多管火箭炮，正式名称为“山猫”。其设计初衷是发展具有高精度、低成本的网络化多管火箭炮，并可发射一系列地地火箭弹甚至巡航导弹，以达到各

种不同的射程。不过，似乎由于经费有限，山猫火箭炮的原装底盘没有出现在越军营地里，各套设施完全处于“简单组合”的状态，发射定向管也以少见的双联装或四联装方式呈现，让人感觉一股浓烈的“游击队”作风。

以色列军火能打进越南市场，十分偶然。上世纪80年代，越南利用原南越政权遗留的大量美式武器换取外汇，特别是向忙于和伊拉克打仗的伊朗出口武器，后者因为反美，其使用的美制武器早就没有零件供应，能有越南这样一个“二道贩子”已然谢天谢地了。尽管当时以色列基于“势力均衡”原则，暗中资助一些军火给伊朗，但仍然反对别国敞开向伊朗售武。于是，以色列政府通过秘密渠道与越南接洽，试图影响河内的决策，越以军事技术合作关系就此搭上线。

1996年美越关系正常化后，西方与越南交往的最大障碍排除，以色列军火商则一马当先。2007年以来，越南向国外供应商敞开国防工业市场的大门，与以色列建立正式的防务合作关系，主要涉及以色列协助越军就地改造老旧的苏制武器、生产光学仪器、橡胶材料等军需品等。根据SIPRI的信息，越南同以色列进行的主要军火贸易包括：三个连的“SPYDER-SR”野战防空系统；与白俄罗斯联手改造越军S-125“伯朝拉河-2T”地空导弹；20门精确制导火箭炮系统；以色列向越南出售加利尔ACE-31/32突击步枪生产线等。

“以陆制海”尚难奏效

当越军第685岸防旅列装以色列远程火箭炮的消息披露后，中方不少人马上将其和南海局势联系起来。要知道该旅属于第四海区，它的防御范围包括被越南占据多年的南沙群岛，越南电视台公开信息显示，第685旅尚部署在本土，但不排除必要时送上南沙岛礁，以便控制更大的水域。

目前，越南在南沙方向累计侵占29座岛礁，并持续强化所占岛礁的防御体系。从设防情况看，越军主要有两种防御手段：一是通过构筑野战和永备工事相结合、战斗和生活设施均具备的面状防御阵地，形成“要地防御”体制；二是通过构筑高脚屋、碉堡等点状防御设施，形成“松散防御”。

越军认为，仅靠其侵占的岛礁防卫力量，战时根本不足以抵抗对手海上编队攻击，其最大的优势是完整南北走向的本土海岸线，和南沙岛礁据点相呼应，构成对对手舰队的夹击之势。越军现行对海作战原则是运用海空集群和岸基对海打击系统遂行协同突击，通常由航空兵集群先

行突击，削弱敌舰艇编队防御；随后是航空兵、岸防兵与舰艇协同的导弹、火箭弹远程攻击波次，每个波次间隔为5-10分钟，导弹攻击持续时间长达两分钟以上，并且都是极短间隔的“导弹齐射”袭击；最后是海军舰艇和航空兵扫荡性补充攻击。

种种迹象来看，此番越军展示的以色列远程火箭炮，和之前曝光的俄制“多棱堡”岸防导弹系统（俄军将其部署到克里米亚）形成“火力搭配”，可对水面舰艇（尤其是登陆船团）构成威胁。值得注意的是，越军为加强南沙防御体系，正加紧引进预警机和潜艇，其中预警机将使越军实现本土和占领岛屿之间雷达低空盲区的无缝衔接，并能将低空监视区向对手海空军“优势控制带”（主要在南海中北部水域）推进，提高对手在南海“控局”的行动成本。







2014年12月，越南电视台播放海军阅兵式，画面中出现两辆乌克兰生产的K r a Z牌重载卡车，可是车厢上装载的却是涂成蓝色的火箭炮发射器。几个月后，越南国防电视频道(QPVN)　播出的“今日国防”节目对该国第四海区第685岸防旅的专访，该旅官兵演示了火箭炮发射定向管的组装、射击诸元装定、施放无人机侦察等环节。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越军在其侵占的南沙岛礁群构筑严密防线，加之越南海空军不断壮大，使得解放军很难在距离本土遥远的南沙海域突破越军防御体系。但这些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因为在越军提升军力的同时，解放军的提升速度更快。

在南海，航空兵的威慑效能决定着中国在该区域具有何种程度的战略控制力。2000年之前，中国海空军在南海遂行攻击使命的主要是歼轰-7、苏-30和轰-6飞机，尽管它们的“名义作战半径”超过1000千米，但由于缺乏完善的空情保障和支援，配套的护航战机航程只能达南沙北部，这导致远程轰炸航空兵的威慑范围面前达到南沙群岛北部，超出这

一范围就转为劣势。进入21世纪后，随着预警机、空中加油机、电子战飞机和远程侦察机陆续服役，这一现象彻底改观，解放军航空兵的攻击能力能迅速抵达南海任意冲突点，这种高效能威慑态势的直接结果是局势控制的主动权完全倒向中国。

在海军舰艇序列中，022型导弹艇是中国在南海重要的海上力量。在航空兵防护海区内，这些小型舰艇有极高的使用效费比。南海舰队在不断增加新型远洋舰艇的同时，022型导弹艇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它能运用在南沙岛礁周围，承担监视、填补低空探测盲区及快速反应作战的使命，由于其配备的导弹射程比越军舰艇同类武器更远，且导弹齐射火力胜出不少，因此是非常有效的前沿威慑武器。

大陆海军近年来的演习表明，022型艇通常采取与大型舰艇混编遂行近海作战，基本原则是大型舰艇为混编群提供中远程区域防空，小型舰艇承担近程防御，舰艇群规模通常为1：4，形成颇具规模的火力打击与防御的“综合体”，尤其是形成极为复杂的电子对抗模式，光编队发射的假目标形态就足以使敌方陷入混乱。而相对于越南海军，中国海军电子战系统具有全面优势。一旦爆发冲突，理论上中国海军在500千米正面上可部署2-4个混编舰群，一次导弹齐射量将达到96-192枚，这种火力突击规模是任何一个南海周边国家海军所无法承受的。

因此有国内专家指出，中国海空军已初步建立有效的南海海空威慑体系，这一体系的兵力规模和技术水平是包括越南在内的南海周边国家望尘莫及的，继而成为中国管控南海军事和防范“突发事态”的有效保证。

越南特种兵盯紧南海

由于与中国的海洋冲突呈现长期化趋势，特别是在传统海军装备发展上难望中国项背，越南海军益发重视特种部队的培养。

特约撰稿员／黃山伐

在5月发生的西沙船只对抗中，中国公务船用水炮“驱散”干扰己方勘探作业越南船只，而越南船只则以“独具特色”的方式进行抗衡，通过投送“蛙人”，向中国勘探船只要经过的区域布撒障碍物。

越南蛙人可以算是越南特种部队的王牌，早在越战时期，美国海军就吃尽他们的苦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更是认为，如果中越南海冲突爆发，那么以蛙人为代表的越南特种部队将是解放军在南海方向难缠的对手。正如越南《人民军队报》之前所报道的那样，特种部队是越军的骄傲，主要用于特定方向的“高技术突击”，但外界对其内情却知者寥寥。

特种伞兵，芽庄开练

在越南国营媒体中，《青年报》颇受外界瞩目，该报在军事新闻上总有自己的“猛料”。今年5月，《青年报》密集探访本国两大特种部队——特种伞兵和海军蛙人特工团苦练“保卫‘东海’（即南海）主权”的本领，强调他们能针对“侵犯越南主权的敌人”执行海上或陆上侦察、破坏行动。

据介绍，每年4月至5月，越南空军（标准称谓应为“防空-空军”）旗下的特种伞兵都会去庆和省（注：越南把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沙岛礁划归该省的“长沙岛县”管辖）海滨城市芽庄举行空降与机动突击演习。

这些空降演习通常在早上5时至7时之间进行，因为越军空降教官认为，“这一时段最适合伞降突击”。《青年报》援引越南空军权威人士的话说，近年来，每轮突击演习都约有900名特种伞兵参加，这似乎反映出越南空军特种伞兵部队的规模。由于大部分航空器掌握在空军手里，因此除了空军的特种伞兵，来自海军的第954特战旅也经常安排充当“蓝军”，与之进行对抗比赛。

需要指出的是，第954旅早年也是越南空军的劲旅，只因南海局势紧张，遂于2013年移归越南海军第二军区指挥，主要任务包括海上侦察与搜索、突袭以及救灾。此外，越南陆军第3军（西原兵团）麾下的第198反恐特战旅也经常来芽庄取经，该旅的官兵既善打山地战（熟谙攀岩越障技巧），还能执行夺岛突袭。

一名越南空军中校透露，演习时，军方要求特种兵准确无误地伞降至芽庄的一片沙滩上——这是为了模拟夺岛行动，因为芽庄的沙滩、风速等条件与南海许多岛礁相似。成功伞降后，官兵们还要在沙滩上快速完成收拢降落伞、整理背包等动作，随后再进行模拟作战演习。

此前英国鱼鹰军事出版社曾透露，越南特种伞兵曾得到过朝鲜的帮助，具有“低空伞降”的能力，因为朝鲜特种兵所追求的“低空跳伞”模式能够有效躲避地面攻击和快速精确占领地面目标。据称，越南空军曾从朝鲜进口特殊降落伞，该伞能在距地面80米高度打开。为强化低空跳伞能力，越南伞兵不光利用直升机和安-2双翼慢速飞机进行训练，还从80米高的铁塔上或同等高度的山上用电缆练习伞降。

水上特工，敢死队员

与空军特种兵相比，越南海军特种兵的历史更为辉煌。越战期间，越共水上特工共炸沉美军和南越军队舰船近1000艘，如今越南海军特种兵的装备更精良，训练也更严酷。目前，知名度最高的越南海军特种部队当属第126水上特工团，它曾在越战中创造过奇袭美国直升机航母“卡德”号的佳绩，目前主要承担对岛屿、军港实施渗透与侦察，从水下偷袭、破坏敌舰等任务。

第126特工团所有成员几乎都能充当蛙人，一名合格的水上特工除精通射术外，还能在海面连续泅渡至少10公里，且游泳时不会发出太大噪音，团内的尖兵甚至可以做到48小时不间断游泳。在深海作战环境中，配备欧洲潜水器材的第126特工团成员能连续潜行1000米以上。

为应对可能爆发的中越南海冲突，第126特工团已开展诸多针对性训练。该团每年都会开赴南沙的越占岛礁，实施为期30-50天的高强度特训，训练的主要内容包括模拟攻击敌方舰艇以及对“敌占岛屿”实施渗透、侦察和突袭。一名第126特工团军官曾对外透露，在南海训练期间，他们要接受避开“潜在敌”的反蛙人电子探测器的训练，还要懂得如何应对敌军饲养的反蛙人动物（如海豚）。为了阻止敌舰派出潜水员拆

弹，越南蛙人可能提前引爆炸弹，即使自己来不及撤离也在所不惜。

除了偷袭敌舰，第126特工团还具备一定的夺岛能力。越南蛙人能长时间潜伏在南海岛礁周边深约50米的海底——为了培养蛙人在水下的方向感，越军教官把他绑在转轮上转动，然后再让他辨别东南西北或上下左右。夜幕降临后，这些蛙人就会浮出水面并登岛实施偷袭。第126特工团的一名军官曾吹嘘："越南蛙人是最精良的'作战机器'。在海上冲突中，他们个个都是敢死队员。"

由于与中国的海洋冲突呈现长期化趋势，特别是在传统海军装备发展上难望中国项背，越南海军愈发重视特种部队的培养。他们从第126特工团抽调技术尖子，组建新的部队。《青年报》曾报道过2005年成立的越南海军第126特种反恐营，名为反制海盗、海上恐怖袭击，实际仍是针对南海方向作战。该营上尉赵丁竹（音）就是从原第126特工团抽调来的，据其介绍："我们的部队同时是一支三栖作战部队，队员们同时掌握了陆上、海上和空中战斗技巧，且大多数队员是神枪手。"他还强调，我们选拔新兵的标准极严，通常每年有100多人申请加入第126反恐营，但其中只有10人能通过为期4个月的残酷选拔训练。

另据越南媒体披露，越南海军陆战队还有一支神秘的M47突击旅，在一次演习中，假想敌部队占领了越南的一座海岛，M47旅的海军陆战队员们将发动突袭夺回该岛。他们会在没有后援的前提下，连续作战数天。目前，M47旅每年会去一次南沙群岛进行训练。



弘扬"打险大胜"精神

据美国《全球安全》披露，越军特种部队成立于1967年3月19日，司令部设在河内直辖市清池镇，越军公开的特种部队番号有第112（驻地在河北市）、115、117特工团，水上特种部队（也称第126团，驻地在海防市），城市特工队（也称M1团，驻地在河内直辖市嘉林机场）等。这些部队平时是团级，战时可迅速扩大到旅级建制。

除了作战单位外，越军特种部队还有参谋部、政治局、后勤局、技术局、特种军官大学、隆安水下作战学校、建和水上突击训练学校等。有军事专家称，越军特种部队现役兵力接近万人，装备以各类轻武器及炸弹、地雷为主。该部队从组织、装备到训练都是特殊化的，他们的作训制服与普通陆军部队没有差异，只是领章图案由陆军“交叉的枪与剑”变为其独有的“炸药包上一柄匕首”。平时特工队深藏于越军常规部队序列中，一旦交战就会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其作战手法灵活，颇有“指挥官匕首”的味道。正如陆军特种部队政委陶文君对越南特种部队的训词：“特别精锐，英勇无敌，智勇双全，打险大胜。”

越南特种部队对官兵要求非常高，所选官兵必须年轻健壮，勇敢无畏并有坚定理想，必须通过另外两名党员介绍才能加入。在战术训练中，越南特种部队全部模拟真实战场环境，全程使用实兵、实弹、实装、实爆。虽然有的设施并不先进，但官兵们开动脑筋，同样能把环境搞得非常逼真，如他们能用乒乓球内装火药制成小炸弹，利用弹弓作发射器实施定点发射，既达到模拟战场枪炮声的效果，又可将危险掌握在可控范围内。越军射击训练也颇为贴近实战。

另外，越南特种部队在实战方面很注重细节。如“寻找敌潜伏窝点”科目中，特工学员会被告知，如果在可疑区域中找到敌人砍树的位置，那么在方圆200-500米范围内，肯定会找到一个敌人的躲藏点。

在“打扫战场”的科目中，越南教官会要求学员对“敌人”的“尸体”搜身检查，在检查过的“尸体”上作标记。虽然是演习，但越南学员必须把“尸体”每个部位都认真地摸到，教官强调：“搜身这个环节很重要，可以避免‘敌人’装死逃脱，甚至对我方人员造成伤害。”

【中越关系："去中国化"带来什么？】

越南正在"去中国化"？

"981钻井平台"事件让一些"亲中"的越共高层和知识分子不得不暂时闭嘴，从目前舆论来看，"去中国化"仍是越南一边倒的主流声音。

记者 / 邱锐



原本正值为年底出口市场做准备的高峰期，2014年8月以来，越南平阳省相平合漆器村却萧条、冷清，全然不见以往的繁华景象。几个小时过去，路边几十家漆器店连一件商品都没卖出去。

平阳省曾是今年5月排华事件的爆发地之一。该村青龙漆器店店主

陈文清叹气道："商品实在卖不动，我只好靠帮人做编织物来补贴家用。"该村雄泰木屐公司经理泰文英雄说，该村的顾客大多来自中国，自从排华事件发生后，中国客商减少得厉害。

越南商人阮文孝在河内有一家旅游保健品商店，以招揽外国游客为主。他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近三个月没有一个中国人来店里买东西；8月情况稍有好转，但对中国游客的销售额也不到往年同期的1/5。现在，他正盼望着即将来临的中国国庆长假，希望"那时中国游客会多一些"。

据阮文孝介绍，中越边境贸易受到的影响更大，双方交易趋于保守。"虽然贸易政策没有变化，但大家都怕两国关系急剧变化，导致资金回笼困难。听说老街河口的交易量只有往年的八成。"

在中越关系进入低谷之际，8月26日，应中方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的特使、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黎鸿英赴华访问。黎鸿英在越共政治局排名第5，是"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事件后与中国接触的最高级别越南官员。其间，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希望使两国在各领域的关系早日重回正轨，稳定发展。

官方《人民日报》海外版8月27日评价称，黎鸿英访华会进一步促进双方相互理解，推动双边关系向"正方向"发展。结合6月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应约访问越南，8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缅甸内比都会见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有国内学者认为，这一系列事件显示出越共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视。

但越南前驻广州总领事杨名颐在接受BBC的采访时指出，此次访问并没有出现转折点式的重大改变。双方间的分歧和问题仍然很多，短时间内根本解决不了。一位接近越南军方高层的人士向《凤凰周刊》记者透露，截至8月底，在黄沙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附近，中越两国海监船与对方渔民仍不时起冲突。由海上争端导致的中越关系裂痕恐怕会继续加深。

与此同时，近几个月来，越南从领导人、国会代表到智库学者、经济专家均提出要减少依附中国经济的方案。据越南《每日快讯》6月16日报道，越南总理阮晋勇高调表示，要在经济上"去中国化"，并提出"要避免过度依附于一个市场，要将此视为目前南海演变环境之中的中心任务"。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28日会见胡志明市企业家时，也要求企业界降低对中国原辅料的依赖。

据路透社7月28日披露，61名越共党员敦促越南中央委员会针对中

国采取法律行动，“摆脱”中国控制。越南驻中国大使的越军退役少将阮重永于9月8日高调发表署名文章，称中国领导人“历来言行不一”，越南不应相信他们，也不应只靠与中国做生意，应该交往更多“世界强国”。

“此前越南的‘去中国化’更多体现在政治、文化等层面，但以‘981钻井平台’事件为标志，这种倾向明确向经济领域转移。”浙江工业大学越南研究中心博士王志刚向《凤凰周刊》记者如是评价。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会议上，国内的越南问题研究学者齐聚一堂，主题正是“南海局势下的中越经贸关系：对抗还是合作”、“越南是否会一边倒”等。

越南国内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也更加激烈。5月以来，已有4位美国议员访问越南，呼吁美国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虽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在访越时表示，美国不强迫任何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在《纽约时报》看来，随着美中在南海上的分歧日益扩大，河内突然对华盛顿变得重要起来。

现实层面，中国连续10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中越2013年贸易额达500亿美元，因而任何干扰都可能会严重损害越南。这也让越南经济“去中国化”成为一个“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的问题。



2014年**5**月**28**日，在中国南海**981**钻井平台附近，中国船只遭遇越南海岸巡逻船（左后）。

中越边境贸易仍保持增长

“假如没有5月的排华事件，中越双边经贸关系可以说是中国与周边地区经贸关系的典范。”王志刚说。

越南自1986年开始推行革新与开放，并不断加强同邻国之间合作。中国作为与其近邻的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且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强大的生产能力，二者“一拍即合”。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两国贸易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态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13年中越双边贸易额达到654.8亿美元，同比增长30%。这一增速在中国与东盟十国的贸易关系中位居前列。

去年中国总理李克强访越期间，双方签署多个合作协议，包括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谅解备忘录、同意开设贸易促进办事处等，还提出在2017年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

虽然部分地区因排华事件出现对华贸易停滞的现象，但据越南媒体7月25日报道，越中边贸指导委员会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中越边境贸易额基本上保持增长势头，月均增长率为4%。其中边境贸易额占越中双向贸易总额的24%。上半年越中边境口岸进出口总额达26.1亿美元，同比增长13%。

近段时间，越南主要出口农林水产品，并从中国进口用于机械设备制造的专用原材料、食品、日用品及电能等。对此，有大陆学者预测，按照中越贸易额现行年均增长31.36%的速度计算，2017年中越贸易额理论上将达到1950 亿美元，远超1000亿美元目标。

投资方面，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越直接投资项目977个，合同总额约70亿美元。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在越南投资建设的龙江和海防两个经贸合作区的完善，中国对越南投资还会继续增长。

不过，在双边贸易关系中，由于产品结构不同——越南在出口原油、橡胶、海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同时从中国进口机械设备、化工品和电子产品等制成品，导致中国对越南一直保有较大顺差。2013年，越南从中国进口商品369亿美元，对中国出口商品总额为132亿美元，对华贸易逆差达237亿美元。截至6月30日，中越贸易顺差已达132亿美元。

“目前来说，中越贸易是一种共赢行为。”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古小松称，全球化时代，两国之间贸易出现顺差与逆差都是很正常的事情。2013年越美双边贸易额约为287亿美元，其中对越贸易顺差达187亿美元。“越南的对华贸易逆差能通过与欧美贸易的顺差得到弥补。在此过程中还解决了当地就业、税收等问题。”

“不把鸡蛋放同一个篮子”

但越方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观点。越南国会议员曾多次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降低对华贸易逆差。越南计划投资部高级顾问、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前院长黎登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对越南的（入侵）远比人们意识到的要更深、触及得更深远、进展得更快。”

今年发生排华事件后，中国政府表示“深切忧虑”，对越方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抗议”，并警告河内“不要试图将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和扩大化”。因担心中越关系影响越南经济，越南主要股指在5月8日下跌了5.9%，为13年最大单日跌幅。该国自上而下则纷纷开始论证在经济上“去中国化”的合理性。

6月初，张晋创在接受越通社专访时呼吁：“有必要尽早改变依赖中国的现状。”在阮晋勇提出经济增长目标之后，也特意要求该国加强经济独立自主，采取各种办法大力发展国内市场，促使进出口市场多样化。据《越南投资评论》报道，越南工贸部官员还建议越南总理出台一项决定，支持配套工业的发展，降低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越南工商会副主席范家足表示，越南正站在几项自由贸易协定和创新经济措施的门槛上，应当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协定，“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7月15日，越南驻中国大使馆前秘书Chu Cong Phung在接受越南网采访时说，在“981钻井平台”事件后，越中关系不可避免走到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阶段。但这次事件给予越南一个良好契机：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从最近领导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不久后，61名越共党员联名向越南共产党党中央发表公开信，催促该党“摆脱”中国控制。信中称：“越南处在危险之中，但也有进行转变的机遇。如果失去这种机遇，我们就是民族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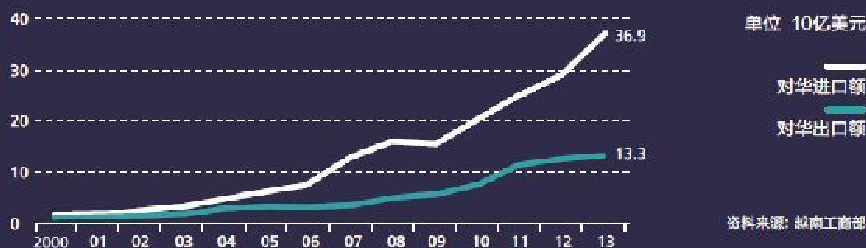
2014年5月10日，越南示威者手举横幅在胡志明市中国领事馆前游行。

经济界人士同样表达了忧虑。“经济手段已经成为北京方面的有力武器。”越南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主任Nguyen Duc Thanh认为，越南应当尽快更改经济模型、发展路径，甚至要转变思维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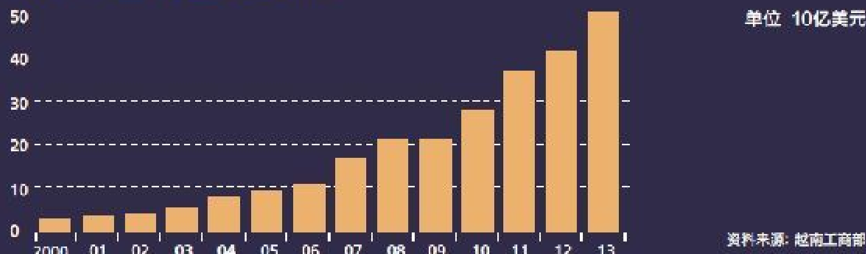
越南工商业协会于7月召集该国经济界人士探讨中越经贸关系走势。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所前主任Le Dang Doanh在会上表示，越南过多地将工程、建筑以及采购项目拱手让予中国人。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人是“贿赂大师”，导致“越南经济更加严重地依赖于中国”。越南金融投资者协会秘书长Nguyen Hong Ha建议，越南应采取更激进的手段阻止越中边境的走私和诈骗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扩大了越中贸易逆差”。他认为，越南擅长生产大米、咖啡和橡胶。“作为生产者，我们很容易能找到更合适的市场和交易对象”。

越南工业协会主席Nguyen Van Thu提到，通过低价策略，2003年至2011年中国承包商包揽了越南大部分工业项目，包括5个化工厂中的4个、62个水泥项目中的49个、27个供热项目中的16个，但“这些项目大多不能按期交工，有的拖了两三年，因为中国提供的材料质量太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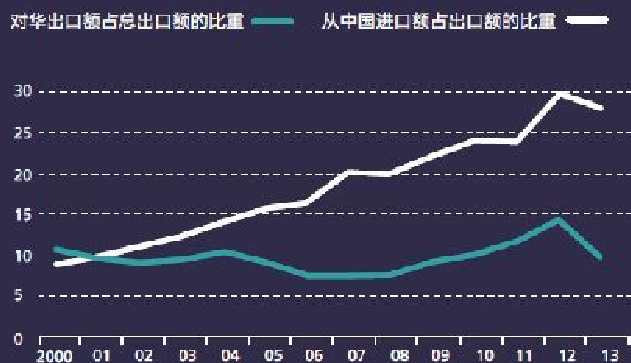
历年中越贸易额



历年中越双边贸易总额



越南对华的进口与出口额在进出口额中的比重



自2000年以来，越南对华出口在总出口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0%的水平，而越南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与劳务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却从2000年初的10%一路上升到2012年的30%。2013年，越南的对华出口在总出口额中占比10.2%，越南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与劳务占全部的进口额的27.6%，略有下降。具体来说，2013年越南从中国进口369亿美元的商品主要是生产中所需的原材料及半成品，越南向中国出口的132亿美元商品主要是农产品与资源性初级产品。

资料来源：越南统计总局



“中国货贴上越南牌再卖”

每天上午8时，广西东兴口岸联检大厅准时“开关”。满载着成箱成袋货物的小船在河岸两侧一字排开，船只不停来往于不足十米宽的北仑河；码头上，头戴尖顶斗笠的男女肩挑手提，熙来攘往。这是中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口岸边民互市贸易的场面。即便受到排华事件的影响，5月以来，该口岸出入境人员就达到27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68%。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越南重大工程招标中不断中标，项目包括热电厂、氮肥厂、水泥厂、铝矿场和铁路设施等。越南工贸部官员解释称，越南接受中国机械设备产品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产品的工艺价格不太高，对越南本地的购买力比较适宜”。

受访的越南人士均认为，即便关系不好，中越经济的纽带也绝不会走向“断裂”。“越南十分清楚中国作为贸易伙伴以及冲突升级后的后果，那样连老百姓买洗脸盆都会成为问题。”越南河内的一名商务人士说。古小松笑言：“中越当年打仗的时候，双方百姓踩着雷区、冒着生命危险都要做生意，何况现在呢？”

旅越华人谢昊鹏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现在河内不少服装店都打出“越南制造”字样，“但那只是个噱头，中国货贴上越南牌之后再卖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最近在接见选民时坦言，南海问题关系到越南的经济发展几率以及如何处理邻国关系，但无论如何，中越两国仍要和平相处。“越南不仅在政治、文化等方面深受中国的影响，在各国经济

相互依存的时代，越南不可能无视中国经济的存在，与中国经济彻底背道而驰。”

不可忽视的还有越南最大的出口产品——手机，其零部件70%要依赖于中国；越南的肥料50%要依赖中国；布匹对中国的依赖度超过40%；机械设备、钢铁对中国的依赖度均超过30%。中国除了是越南最大的原材料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市场，也是越南电力的重要来源。从中国进口的低价电力占越南总供电量的6%。

旅游业一直是越南的支柱产业，2012年占越南GDP的9.4%，总值128亿美元。去年中国游客到访越南接近200万人次，占游客总数的25%。越南交通部副部长范贵肖8月7日向总理阮晋勇提交报告，请求向越南航空运输机构提供支持，原因是排华事件后中国游客大幅减少，越南航空业亏损严重。德新社援引越南交通部报告称，5月中旬至10月，越南与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之间近1500架次航班被取消，预计损失达1.37亿美元。

此外，中国自2002年-2007年向越南提供援助贷款达5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贷款和援助总额的0.6%。但这对于全年GDP不过1500亿美元的越南来说，仍然可观。

“虽然关于‘去中国化’的相关讨论很活跃，但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越南经济及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研究员PHAM SY THANH认为，在国际分工生产日趋发展的情况下，很难构筑完全不依赖其他国家的零件供应链；另一方面，越南本土的基础产业还未成熟，不能起到替代作用，减少对华依赖将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越南若想保持出口竞争力，显而易见，中国是理想的进口对象国。”

在支持“去中国化”的人当中，一些人希望彻底摆脱中国的影响；另一些人则认为，“去中国化”仅是摆脱对某一国家经济的过度依赖，虽然短期内会给国家制造一些麻烦，但长期来看对越南企业不啻为一次机会。

越南学者黎友德撰文称，中资企业的撤资并不足虑，越南可以寻求从第三国如柬埔寨或老挝进口或者通过国内的企业生产出可替代的产品；此外还可趁机增补因中资企业撤资留下的产业空白。也有越南媒体认为，断绝经济关系对中国的损害更大，因为“中国有许多在越南的项目还未完工”、“越南促进了中国西南贫穷省份的发展”。



2014年8月21日，越南河内的一条人行道上，一商贩正在整理产自中国的廉价皮鞋。此前不久，越南副总理阮春福表示要加大打击伪劣和走私商品力度

越南已连续14年成为广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广西与越南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1/3，占其与东盟贸易量的4/5。“中越关系交恶产生的影响，每次都会波及广西。广西政府应当好好思考，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如何打开中国西南部市场。”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越南所研究员胡玲如此表示。

越式实用主义：亲美平衡

在从事越南新闻媒体研究的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易文看来，越南历来奉行实用主义政策，“不会拒绝对它有利的各种行为，尤其是经济行为”。

在经济方面，这种实用主义表现为逐步而非立刻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许多越南人认为，“去中国化”最好的方案是实现市场的多元化——一方面倚重越南国内以及东盟的区内贸易；另一方面积极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和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拓展同其他国家的经贸联系。

对于前者，越南已经开始尝试。越南纤维协会要求会员企业提供来自中国的丝线、布料和染料的采购资料，希望寻找泰国和印度等采购以替代中国。越南还在着手建立数个纺织染色项目。最近，越南五家主要棉纺织企业发布声明，要采取行动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通过购买日

资产品，其中一家棉纺织企业已将中国产品的比例降到20%。

对于后者，TPP可提供的红利正说服越南很多企业重新评估其市场战略。据越南《青年报》报道，在2015年前，越南计划同55个国家和地区签署17项贸易协定。越南工商会主席武进禄认为，签署TPP不仅为越南提供发展机遇，也是摆脱过于依赖中国市场、保证越南经济稳步和平衡发展的机会。

不过，也有怀疑论者警告对TPP要谨慎行事。他们认为TPP对大经济体有利，越南可能很大程度上不能从中受益。

日本是越南2012-2013年最大的外资来源国。目前日本对越直接投资项目合计约2300个，注册资本总额合计约350亿美元。由于一部分越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出现了拒绝中国企业投标的动向，《日本经济新闻》9月1日分析称，这对想拿到基础设施项目订单的其他外国企业是一种利好，虽然有很多意见认为“（日系大型商社）无法做到和中国企业一样低的成本”。

另据路透社9月15日报道，印度同意向越南提供1亿美元的军贸交易出口信贷额度，还将加强同越南的能源合作。越南工商会此前还在河内举行题为“越南与印度在房地产领域的合作”研讨会，向印度企业介绍越南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加强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

越南原先的“亲中派”也开始修复与美国的关系。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在2013年6月访问中国之后，于次月访问美国。今年7月4日，张晋创致贺电庆祝美国国庆日。本港《南华早报》对此评论：“其中的谄媚意味不言而喻。”

7月18日，张晋创在河内会见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其间，呼吁美国解除武器出售和转让的禁令。8月，美国联邦参议院议员麦凯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等人访越的表态让越方倍感安心。9月26日报道，据美国政界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华盛顿方面有意帮助越南强化其监视、防御本国海岸线的能力，并表示有可能向越南出售不装备任何武器的P-3海上巡逻机。

随着2012年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越南将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美国媒体分析，美国会把越南作为下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国家。总统奥巴马已经表示将把越南确立为5个新兴市场之一，以实现2015年对越出口增加一倍。对越南来说，目前美国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能有机会加入TPP，依靠的也是美国的穿针引线。

不过，英国《卫报》提醒，由于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在内的许多军方人士都是越战老兵，加之美国一直对越南人权状况不满，白宫对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仍然“小心翼翼”。



用经济“绑架”对华战略

“总理请求和呼吁每一个越南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以合法的行动捍卫祖国的神圣主权。”在排华事件发生之初，阮晋勇向上百万越南民众发了这样一条短信。但此后不久，他又连发三条短信，号召民众不要参加“非法的示威游行”。

俄勒冈大学越南现代史和越南政治研究学者祥武（Tuong Vu）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此举意味着由于对海上僵局引发的长期经济和政治后果感到担忧，越共内部就如何应对中国的行动展开激烈争论。



2013年4月1日，广西东兴市边贸码头，当地边民正在将从越南进口的货物扛上岸

外界认为，中越南海主权争议之所以在2006年后出现新高潮，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南方干部阮晋勇出任总理”。阮晋勇2006年上任之初，一度被视为继胡志明之后越南最有决断力的领导人之一。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越南经济总体表现不乐观，失业率居高不下。不久前越南放弃2019年第十八届亚洲运动会主办权的理由也是预算有限。

越南河内国立大学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5月发布预测报告称， 2014年越南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将在4.15%-4.88%之间，比之前的预测下调近1个百分点。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则把对越南增长率的预测从6%下调至5.6%。上述数字都低于越南政府此前设定的5.8%的目标。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由于对中国的摩擦及由此引起的排华骚乱不利，阮晋勇的影响力正在减弱。

“如果将越南经济问题‘绑架’到对华战略上来，高调宣传经济去‘中国化’，既可以缓解国内对政府经济政策的批评，也可将经济不好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王志刚说。据易文观察，“981钻井平台”事件让一些“亲中”的越共高层和知识分子不得不暂时闭嘴，“从目前舆论来看，‘去中国化’仍是一边倒的主流声音”。

越南国内关于对华态度的争论仍在继续。6月1日，越共中央政治局发表党内公告，将前段时间发生在越南境内的反华示威活动定性为“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借口，从事的一次违法暴力行动”。阮晋勇在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表示，对越共中央政治局所做关于越南

境内反华示威的公告，他本人“持严重保留意见”，并认为“党的民主决策机制已经出现某些问题”。

7月14日，越南永福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冯光雄率领招商团到吉隆坡招引华商。这是5月爆发排华事件后第一个对外招引华商的越南省级政府招商团。冯光雄表示，“越南政府已从中吸取教训，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以保护外资，外资包括华商可放心前往越南投资。”

但商界的看法更为现实。针对中越关系及越南方面的表态，马中总商会会长拿督黄汉良称，“除非有更好的选择，不然仍会有人愿意去越南投资，我仅希望在地球的概念下大家都能和睦相处，而越南的排华事件也将从此成为历史。”

越南“排华”说明书

记者 / 邱锐

“没有什么比独立自由更可贵的。”越南胡志明墓瞻仰室外的红色花岗岩墙壁上，刻着这样的一句话。这是越南国父胡志明的名言，也是每个越南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然而，在中越关系中，“独立自由”却被部分越南人解读成了另一个词——排华。

历史上的纠葛、边界的纠纷以及被操纵的民族主义，让作为昔日革命盟友的中国被许多越南人称作“海盗”和“侵略者”。许多越南学者愿意引用胡志明说过的一句话来描述两国关系：“越中两国关系,是关系到越南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句话既表明越南重视对华关系，又显示了其对北方邻国心存疑虑。正如越南外交学院外交战略研究所前所长邓庭贵所说，越南对中国是“既爱又恨，既希望又害怕”。

“中秋节灯笼，越南击败中国”，越南年轻人在线网站8月25日以此为题报道称，越南今年的中秋节灯笼市场出现一个重要现象：描绘爱国主义和越南领土领海主题的灯笼热销。

在中国社科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杨丹志看来，民族主义和民族大义成为越共维持合法性，加强党内团结和增强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敌人在用你的钱造子弹”

在东南亚的国家中，越南传统上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在政治制度方面，越南的“革新开放”被认为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模仿之举。上世纪90年代初，越南提出“瞄准广东”的口号，把广东当作追赶目标，甚至研究广东的每一项改革措施，加以模仿。

1991年，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此后20多年，双边关系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解决陆地边界问题、双边贸易额超过500亿美元、中国成为越南人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双方政府也默契地以沉默来纪念发生在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试图淡化那段记忆。但两国政治关系的日渐友好，却掩盖不住越南社会对中国的警惕和敌意。美国研究中越关系的著名学者、弗吉尼亚大学教授

布兰德利·沃马克的话更加直白："与美国相比，越南对于中国的敌意更深。"



2014年5月27日，年轻人走在河内的宣传展板前。这些画有军人的展板，用于展示越南保卫其海域和岛屿的决心。

2009年4月，越南总理阮晋勇收到3000名知识分子的联名信，要求停止由中铅国际参与承包的西原招土矿项目建设。2010年，中越合资530万美元拍摄的大型史诗电视剧《李公蕴：到升龙城之路》在越南被禁播，理由是"中国因素太重"。这部电视剧讲述了越南太祖皇帝的成长历程，原定为河内建都1000周年的献礼作品，但越南影视审查方看后非常不满，认为"将越南太祖皇帝拍成了中国皇帝"。

由于南海争端，近几年来，越南民间举行了数十场反华游行。2011年5月，因"中国巡逻艇破坏越南探油船"，此后十周，河内举行了十次反华游行。当年的越南网络上，一篇名为《爱国日记》的匿名网帖获得惊人浏览量，作者用忧愤的笔调表达了一位越南"爱国愤青"在国家"内忧外患"下的心声，文章号召："敌人正在用你买牙膏和收音机的钱来造子弹，所有有血性的越南人都应联合起来抵制中国货。"

此后的2012年6月、11月、12月，2013年6月，越南的主要城市也

发生多起反华游行，起因均与南海局势相关。

“每次去越南，我们都会发现，当地机场安检对中国人检查得特别仔细，态度也不友好；而我们和越南学者交流时也能感受到，他们特别谨慎，许多问题不愿多说，警惕性很高。”多次到越南进行学术交流的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越南所研究员胡玲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中国侵略”：历史核心议题

有学者坦言，即便中越存在领土争议，也不至于让这个国家，尤其是新生代越南人对华人群体和中国产生如此的敌视和仇恨。其中缘由，与中越之间历史观的差异不无关系。

美国全球安全智库Stratfor地缘政治首席分析员卡普兰在一本关于南海争端专著中提到，越南认为与中国的抗争是越南历史的核心议题。

越南民间流传着一则“黎王还剑”的典故。公元15世纪，越南后黎朝开国君主黎利举兵起义，途经一个湖边时获巨龟赠剑。利用此剑，黎利顺利驱逐来犯的外国军队，创建后黎朝。某日，黎利重返湖边，巨龟骤然浮出湖面将剑索回。而黎利击退的是明朝的军队。

同样，在越南民间，领导越南从三国时期东吴独立的赵贞娘、起兵反唐朝统治的梅叔鸾、五代十国时期大败南汉的杨廷义等历史人物，均被视为保佑平安与风调雨顺的神明加以供奉。意味深长的是，1974年1月入侵中国海域的“李常杰号”“陈庆瑜号”“陈平重号”都是以越南历史上抗华英雄命名的。其中第一艘进犯的“李常杰号”，名字来源于1075年主动入侵北宋邕州的李朝将领李常杰。

在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古小松看来，越南的历史往往被描绘成一部“抗击中国”的“爱国史”，这一点在越南正史中也有所体现。

越南历史学家明峥在《越南史略》（初稿）中写道：“公元前111年，中国统治阶级侵占南越，把南越变为汉朝的一部分并命名为“交趾郡”……当祖国附属于唐朝（7世纪）的时候，统治者强加给我们祖国一个被统治地的名称，那就是安南。从939年起，我国就脱离了中国封建的统治……15世纪初明朝封建统治者侵占我国并企图把它变成中国的一省，但是我国人民跟随黎利起义并取得胜利和独立。”

有媒体曾询问一名越南大学生对中越历史纠葛的看法，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教科书。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侵略和统治越南，对越南人很残暴，而越南民族在反抗中越来越坚强，所

以越南民族是不惧怕任何外来侵略的。”

“在这种民族主义受害者心理之下，反抗就有了一种天然的政治正确。”古小松说。今年发生在越南的一件事让他有些寒心：5月7日是越南奠边府战役胜利60周年纪念日。这场战役发生于1954年，是当时越法战争中的最后一场战役，最终以越方全面胜利告终。“作战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此次活动邀请了墨西哥、老挝、柬埔寨等国代表团参加，为该战役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中国却未列其中。”

涉华报道“放宽尺度”

1998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勒在描述当代越南的《影与风》一书中写道：“越南官方历史绝大多数讲的是抵抗外敌，几乎都是抵抗中国”，“越南担心被中国控制，这种心理跨越任何意识形态分歧，造成了越南人某种敏感的焦虑和警惕。”

这种警惕一旦遭遇现实中的刺激，就会以民族主义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种刺激往往来自舆论。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易文对中越关系正常化之后的越南媒体进行了梳理。她发现，从2011年5月，越南指责中国渔船切断其勘探船只电缆侵犯越主权后，越南媒体特别是该国南部媒体对华不满的报道开始增多。这些报道的内容涉及中国公司承包越南主要大项目，经济学者呼吁警惕中国对越南的经济控制，中国商品假冒伪劣现象严重，中国工程质量低下等。

此次对于“981钻井平台事件”的报道，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越南政府鼓励媒体参观该国在南海所占领的岛礁，采访岛上的渔民、守岛官兵及其家属等。在事件进展过程中，越南官方媒体几乎每天都有相关的报道，主要内容大致包括：国内相关机构主权声明、越方掌握的证据、国际社会支持和中国挑衅行为报道等。

越南电视台是越南政府下辖国营电台。从5月3日起，该台宣称中国在越南“黄沙群岛”“非法”进行海上石油钻井勘探，开始逐步煽动全国的情绪。5月4日，该台采访美国参议员约翰·席德尼·麦凯恩三世。这位美国议员在采访中声称：“中国舰船对越南海警舰船的包围和猛撞行为是猖獗且挑衅的行为。中方要对其图谋改变现状的单方行为承担一切责任。”该台评论道：“中国的行动是没有国际法律依据的无理要求。”

5月10日，越南律师协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越南电视台进行了公开

报道，并把律师协会对中国的抗议放到了晚间新闻的第二条。此后，越南历史科学家协会、佛教协会纷纷召开新闻发布会，煽动全民一起“保卫黄沙群岛”。

“越南电视台绝对是强化了爱国主义的宣传，”杜克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埃德蒙·J·马莱斯基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它通过用一些刺眼的图片展示中国强硬行动，包括撞击越南船只，用水管向其他越南船只喷洒等。受到更严控制的报纸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

从5月2日981平台在南海作业起到5月13日排华事件发生前，在新闻声誉更高、更偏自由派的《青年报》上，抗议中国的文章已达百篇。后者还直接发起和组织了“齐心协力捍卫南海主权”的募捐活动。

今年以来，一些越南媒体甚至打破常规，发表大量关于中越战争的报道。例如，《青年报》刊发了一个关于在西沙群岛之战中，越南海军的“英勇战斗”的系列报道。BBC认为，“此举应当得到了越南高层的授意。”此前，越南总理阮晋勇还参加了一个历史研讨会，这一研讨会主张对1974年和1979年发生的中越战争举行纪念活动。

在如此渲染下，5月13-15日，越南从南部的平阳、同奈、隆安和胡志明市到北部的河静、太平等省市发生了针对华资企业的打砸抢烧事件，导致大批工厂被迫停工，多人伤亡。

体制内现信仰危机

谈及对华态度不断强硬的来源，诸多受访学者提到，它与领导层的政绩合法性有关，而政绩合法性依靠的是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5月23日发表题为“致命的爱国主义”的文章指出，“为了维护执政的合法性。越南共产党几年来一直支持民族主义情绪，把自己的国家描述为中国的牺牲品。”

同时，越南社会对不平等与不公正问题的焦虑正日益增长。因反腐不利，2013年2月起，阮晋勇主持工作的政府反腐指导小组被宣布解散，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并由总书记阮富仲亲自担任主任的中央反腐指导小组开始全面指导反腐工作。

此外，越共也面临着来自体制内部的“信仰危机”。据《纽约时报》报道，一名胡志明市出身的越共老党员与总理顾问曾公开发声“谴责政府”，自称“不再信奉共产主义”，批评当局专政“暴政”的专著也大行其道。

今年开始，越南宪法修正草案面向越南各机关、组织、个人和旅外越南人征集意见。几十名越南知识分子向越南国会主席发出请愿书，要求更多的自由，并改变宪法当中赋予越共主导地位的规定。7月28日，越南共产党60多名老党员向党中央发表公开信，要求越共“废除社会主义的错误道路，转向民族和民主的道路”。

排外“借用中国战术”？

讽刺的是，越南一边通过中国转移本国矛盾，一边却被认为是在“学习”中国的战术。

马莱斯基对5月发生的抗议活动和排华事件进行了系统研究，据他观察，其中几次抗议活动的背景和原因各不相同：

起先在河内的中国大使馆外和几个其他市中心地区发生的和平抗议活动，似乎得到越南领导人的容忍，记者也允许报道；在中部河静省的一家台资工厂里发生了针对中国工人的暴力活动，最初可能是中国移动钻井平台的事件所引发的，但也反映了一种长期压抑的针对外国人的偏见；而在胡志明市周围的南部工业中心平阳省和同奈省的工业区内，一些外资工厂也遭受袭击，波及台商、新加坡乃至越南本土工厂，这背后的动机受到大量争议；而在河静和平阳发生的暴力排外行动缺乏组织、混乱不堪而且来势汹汹，并不是从和平的活动发展而来的。

因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南部工业区发生暴力活动的原因，更多是劳工的不满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而不是西沙群岛的主权问题。

5月14日，越政府官员称，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和“破坏财产”罪名，逮捕600多名“过激分子”。此后，越南官方媒体越通社发表了“越南对逼迫工人进行违法行为和扰乱社会秩序的涉案对象严厉处置决不姑息”的文章，呼吁工人保持克制，决不能听任坏人的挑唆。

对此，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庄礼伟撰文指出：“越南当局既能高效率地把‘群众的爱国运动’迅速动员起来、又能高效率地把‘群众的爱国运动’迅速平息下去，收放自如。”

越南反华暴乱始末

有台商斥责，这次越南的暴力行为或许受到越南政府的默许，否则为何不制止？多位中国企业主则猜测，这次排华事件有着更深刻的政治背景，“或是越南流亡海外的新越党在背后操纵”。

记者／张蕾

9月之后，越南河静省奇英县永昂港的两个码头，等泊的船只每天有15条左右，较之以往的三两条船繁忙了许多。这个四个月前排华暴乱最严重的台塑工地所在处，如今正逐步恢复生机，台塑企业也将迎来10月的全面复工。

暴乱发生后，大多中国企业停工，当地街头变得萧条，诸多越南工人失业。越南政府则提出了赔偿方案：降低进口关税，抵消企业损失。受冲击企业将损失总额上报给越南政府，而当地政府也在逐步核实确认。

虽然自己的企业早就复工生产，但四个月前发生的一幕幕，时常浮现在中国商人李卫华的脑海里，至今仍心有余悸。



2014年5月14日，路人骑摩托车路过越南平阳省一座被放火的工厂门前。在此次暴乱中，反华示威者点燃了数十座工厂。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混乱

5月，热带季风气候的越南已是炎热难耐，李卫华脑袋上有些冒汗。5月13日早上十点左右，他收到几条手机短信，心情如同天气一样烦闷起来。离自己的家具厂25公里之外的平阳省顺平县，头天晚上的工人游行逐渐变成“暴力洗劫”。

尽管有一批订单将要在半个月之后交付，但他还是决定停工以确保安全。这个拥有近200人、年营业额500万美元的家具厂，位于平阳省新渊县的南新渊工业区。

李卫华的工人和干部几乎全部为越南人，这是他为了让企业融入当地而施行的本土化策略之一。当地时间下午1点，厂里的越南工人们关停机器，陆续离开工厂。稍安心的李卫华打算驱车去胡志明市会见客户。

1点50分，连接在手机上的工厂监控系统显示，一群越南人在工厂前聚集。“身披国旗，驾驶摩托车，手拿铁棍，呜呜喊叫”，是李卫华对这群人的第一印象。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以往常出现在胡志明市、河内等大城市的反华游行，这次会从工业区开始，并且蔓延如此之快。

从手机上能看到，闯进他办公室的抗议者先用铁棍敲碎办公室的门玻璃，进去将办公桌上的电脑摔在地上踩踏。随后，他们来到隔壁的办公室，此时有7名越南员工正在整理资料。闯入者用越南语问：“这儿有没有中国人？”李卫华的妻子此刻蜷缩在办公桌下。一名越南员工说：“这里都是越南人。”这些人随即砸了几台电脑后离开。

担心妻子安全的李卫华决定赶回工厂。南新渊工业区的路口充斥着上千名抗议者，他们多为年轻男女，骑着摩托车或者电瓶车，身披国旗。一些摩托车上载着鞋子、电脑、缝纫机等物品匆匆驶过——整个上午，平阳省多个工业区的台资鞋厂、电子厂、自行车厂均被“洗劫”。

此时李卫华接到妻子电话称，抗议者又回来了。他让妻子躲好，决定先去学校接孩子回公寓。这所公寓是李卫华在富人区购买的房产，安保较为森严。李卫华多次向越南警方报警无果后，决定向当地私人警察朋友求助。在朋友的帮助下，妻子带上护照和现金从工厂安全撤出。惊魂未定的一家人连夜赶往柬埔寨，随时准备回国。

午后两点，离李卫华家具厂20公里外的顺安县新加坡工业区内，山东人张涛也焦灼不安。他所在的自行车配件模具厂在中午经历了第一次冲击。抗议的越南人走进车间，让所有工人停工，号召越南工人跟随他

们去游行。此时抗议者第二次闯入工厂，进入办公区域，抡起铁棍打碎所有窗户。三点左右，他们开始抢夺财物。傍晚时分，一些抗议者开始放火泄愤。

张涛及妻儿、他的合伙人共6人躲在工厂一个偏僻的房间内不敢大声说话，他们放弃抵抗，因为“对方人太多，抵抗毫无意义”。直到次日凌晨4点，在警察的护送下，他们才撤出工厂，躲到越南朋友家。5月19日，他把家人送上了飞往国内的航班。

据多位中国企业主和台商描述，从5月13日开始，平阳省大致经历了四轮暴力冲击：第一轮抗议者要求越南工人离开；第二轮，抗议者掉头回来，开始毁坏财物；第三轮，拿走他们认为值钱有用的物品；第四轮，放火焚烧工厂。

这个越南南部的工业重镇汇集了越南最多的工业区和外资企业，尤以台资为甚。这一天，中资、台资以及港资，乃至日韩企业均受到冲击，大多汉字招牌的企业被打砸。

开端

5月13日上午10点，在越南某智能化工程公司上班的苏州人翁才兵从平阳省顺安县的新加坡工业区路过，发现众多越南人聚集到台湾通用鞋厂、日本JC电瓶厂门前，骑着摩托车或电瓶车，身披越南国旗。他预感形势不妙，快步走出工业区。等11点返回时，工业区满目狼藉。

据翁才兵了解，游行是5月12日晚从平阳省新加坡工业区一个台资鞋厂开始的，到了13日早上发展至全厂工人罢工，大批越南工人响应。之后不断有台资和港资工厂的越南员工加入，随后一部分人开始破坏财物。

美的集团在平阳的生产基地也受到冲击。美的集团公共事务部相关人士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称，美的集团越南工厂临时关闭，几十位中国籍员工撤离回国，只留了少数几人处理后续事务；并称，现场未发生纵火事件，无人员伤亡。美的集团在胡志明市的小家电生产基地投资2500万美元，2007年正式投产，具备年产500万-800万台小家电的制造能力。

随后，包括美的、苏泊尔等公司在内的中国家电企业大都启动应急预案，与中国驻越大使馆及当地警方联系，中方人员也迅速撤回国内。



2014年5月14日，消防员刚刚扑灭了一座中国鞋厂的火灾。该鞋厂位于越南平阳省，在暴乱中被数千游行者点燃。

与平阳省相邻的同奈省也受到波及。越南同奈省台商商会会长简智明称，台商远东服装的工厂被抗议者闯入后，带头的游行者要求工厂停工，台商为避免发生冲突配合停工；带头游行者随即要求厂内的越南员工一起上街游行，抗议行动则变成破坏厂房、砸毁办公室、掠夺物资等。

同奈省台企负责人也减少外出，并将厂区中文招牌先卸下、挂上越南国旗。还有台商请来警力于各工业区特定地点巡逻，但依然没能阻止抗议者的过激行为。5月13日晚9时，多位目击者看到，位于同奈省的台资企业乔森家具厂火光冲天，直到深夜11时，依旧没有熄灭。

缘起

16年来，重庆人李卫华从一个在越南企业的打工者，逐步成为一个年营业额600万美元的中小型企业老板，他目睹了越南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走上革新之路后，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他的家具厂也随之发展壮大。

在和越南朋友交往中，他很少提及1977年越南的排华事件。根据史料记载，这次事件中，华裔政府官员被解职、华商被迫停业、华人学校被关闭。当时大批华侨被驱赶出国，越方还强迫每个离开的华侨交纳十二两黄金。1979年中越因为边界争议开战，与此不无关系。

据李卫华观察，中越南海争议让越南民众反华情绪高涨，近几年的

反华游行中，更多是对主权的维护。比如2012年6月，中国设立三沙市，并且计划在南海开发石油，进行国际招标；同年8月，中国在新版护照中把南海划归中国版图。这些事件多次引发河内、胡志明市民众的抗议，但均被越南警方及时制止。

今年5月3日起，大陆“海洋石油981”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赴南海西沙群岛中建岛海域油气勘探。其间越南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多次抗议，称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法》，该地点离越南海岸线约120海里，是越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船队与越南执法船多次追逐甚至冲撞。此后，中国先后出动超过100艘舰船为“海洋石油981”平台护航。

“越南国家级电视台多个频道在每个新闻段，循环播放中国‘侵略’越南领海。”中远集团越南河静钢厂项目部现场负责人何欢说，这些节目的通常套路是，播放中越在南海追逐、互射水炮的画面，随后请越南历史学家解释“南海自古就是越南的领海”，或让法律专家称“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法》，该位置属越南海域”。越南驻美国记者站在白宫前发回报道称，中国的行为已经遭到美国某官员的谴责。

保卫南海的MTV也在越南多个电视台播放，当中不时闪现越南海军和学生、厨师、公务员等行业的人士手挽手、发誓保卫国家领海的画面。

在这股民族主义情绪之下，5月7日，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经济参赞处发布通知，提醒中资企业做好安全防范。通知说，为避免在越的中资机构和人员受当前事态影响，确保企业和人员的安全，要求制定和完善各单位的应急预案，做到心中有数。同时提高中资人员敏感度和行为素质，不要和当地人争论纠缠，避开高风险地带。最后提醒中资人员，如果有突发事件，请与使馆经商处联系。

这则语气平淡的通知没有引起大多数中资企业和员工的警觉，因为“这样的通知每年都要发，没什么特别”。直到5月12日晚上，酝酿已久的反华情绪开始爆发。

蔓延

当李卫华在柬埔寨的酒店里“煎熬”，张涛在朋友家“期待形势好转”时，抗议者的游行已经从南部城市蔓延到北部河静省，其中在台塑的冲突最为激烈。

5月14日早上，中远集团越南河静钢厂项目部现场负责人何欢一如

既往地前往台塑20冶的办公现场商议船舶货物运输安排。这个台湾在越投资最多的钢铁厂位于河静省永昂县奇英镇的永安经济区，距离河内410公里，胡志明市1300公里。2012年开工后，承建台塑施工的分包商包括中国5冶、19冶、20冶、上海宝冶等大型央企。

会议刚开始，台塑正门就被抗议的人群围堵，之后车辆无法进出。会议被迫中断，何欢和同事从后门撤离。下午4点多钟，何欢发现街上不时有消防车、急救车开过。他在事后得知，19冶的工人此时已和越南人发生冲突并有人员伤亡。

根据台塑之后发布的新闻稿，“河静钢铁厂14日发生越南劳工挑衅大陆劳工，最后暴力相向；初步统计无台籍或越籍员工伤亡，大陆劳工有1人中暑死亡、90人受伤，财物损失尚无法估计。”新闻稿说，数百名越南工人纠集罢工，在厂内四处流窜，挑衅攻击承揽商的大陆劳工、砸毁承揽商办公及机具设备，并迅速演变为暴力攻击、纵火、破坏厂房、抢夺财物等不理性行为，范围甚至扩大到厂外承揽商大陆劳工生活区。

8点，何欢接到20冶朋友的电话，称他们被围困在营地内。有中远集团的员工找到越南司机和一个警官朋友，开上越南牌照的汽车，试图去营救。

上千人聚集在营地门口，附近的中国商店已经关门，玻璃破碎一地。抗议者还在打砸LG车牌（中国外商车牌）车辆。他们大声嚷嚷：“中国欺负我们，我们就要教训它！”何欢和同事们“行李都来不及收拾”，连夜由河静转河内到海防。去河内的路上，何欢看到绵延几公里的摩托车车流。三天来，平阳省、胡志明市以及同奈、隆安、河静、太平等省市都发生了针对中资、台资、港资企业的暴力事件。

台塑企业新闻稿称，台塑河静钢铁公司第一时间即通报河静省公安及边防禁止厂外人士进入厂区，并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大陆分包商约束其大陆劳工、紧急撤离员工回到生活区。并称，河静省省长在晚10点亲自到厂，召集边防指挥官、公安厅长等召开紧急应变会议，并指挥驱离厂内暴动工人的行动，至深夜已全部驱离滋事越籍工人。

5月15日凌晨，被围困在台塑工地现场和营地的中冶上千名员工在特警的保护下，转移到台塑生活区内，随后军警把守。由于这个生活区还未完全投入使用，仅有一些简易的床铺和桌子，人们焦灼地等待国内的救援。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中冶）于5月20日晚发布消息称，该公司承建的台塑河静钢厂工地14日受到严重冲击，公司3565名员工生命安全受到

严重伤害和威胁，事件造成130人伤亡，其中重伤23人、死亡4人（其中2人正在做DNA鉴定）。

越南网络媒体《越南快报》援引平阳省社会保险局官员裴友峰的话说，此次暴力事件中，外资在当地的100多家企业不同程度受损，其中12家工厂被完全烧毁，另外10家工厂部分被毁。由于许多工厂被毁或关闭，当地有大约4万名失业者请求政府提供失业补助，另有约2万名失业者获得了一次性失业补偿。

另据报道，近期发生针对外国投资者和企业的暴力事件对当地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平阳省的6万名工人因此失去工作。

自救

留守的中国商人多次拨打大使馆的电话，得到的答复基本是：正在和越方交涉，请注意安全，并展开自救。

江淮汽车越南分公司员工杨俊2002年来到越南。这次自救中，他带领越南军人大校军衔的阮红贵驾驶军车，到每个围困中国商人的工厂跟游行人群交涉。阮红贵说，中国人过来投资发展越南经济，政府行为跟他们无关。5月15日凌晨，近百名中国商人被阮红贵从工厂救出送往安全地带。不过，一些越南宾馆迫于压力，拒绝中国人入住。

尽管中国驻越使馆在14-15日两次发布消息，提醒在越南中资企业和人员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如遭遇突发事件，迅速报告当地公安机关和中国使领馆。但李卫华仍异常纠结，撤还是不撤？他仍在观望官方的态度。

在越南的台商更早等来了台湾当局的指示。台湾增派飞机赴越，5月14日下午3点，满载台商的飞机已降落在桃园机场。一些台商出逃仓促，身无分文，台湾当局先期借钱给台商买机票返回。15日晚，台湾官员参加了留守台商在当地酒店与媒体的见面会，要求台商能撤离的全部撤离，同时要求平阳省和同奈省政府保护台商安全。台湾方面还紧急制作了两万张印有英文与越南文的贴纸，写着“我是台湾人，我来自台湾”，发给在越台商以逃避冲击。

但这显然不起作用。据广西民族大学越南法律研究所所长吴远富解释，在越南的台资工厂数量远远多于陆资、港资企业，且台商在越南形象一贯刻薄，容易成为暴乱所针对的对象。对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企业也受到冲击，吴远富认为，这是越南工人阶级藉此机会表达对社会不

公、政府贪腐、贫富悬殊的不满。

但“台商形象刻薄”的说法并不被越南台湾商会全国总会前会长李天柒认可。李天柒认为，在越台资企业每年都会给越南工人涨工资，也充分尊重越南工人。之所以台资企业损失较大，是因为陆资企业大多在越南北部，而这次事件主要发生在南部。

李天柒斥责，这次越南的暴力行为或许是受到越南政府的默许，否则官方为何不制止？李卫华以及多位中国企业主则猜测，这次排华事件有着更深刻的政治背景，“或是越南流亡海外的新越党在背后操纵”。



暴乱之后，一艘载满中国工人的船只驶离越南港口。

赔偿

翁才兵在5月14日订机票回国，三天后才如愿以偿。平时1000多元的票价此时均为全价5000多元，但是“顾不了这么多了”。飞机在苏州落地时，他悬着的心才稍稍平复。

一些中国商人则开始借道柬埔寨、胡志明、河内回国，另一部分人则聚集在广西凭祥友谊关等地观望。当越南反华情绪慢慢平息，一些人才返回越南。

来自中国外交部的消息称，北京时间5月18日凌晨5时许，中国政府组织的包机从越南河静省飞抵成都双流机场，接回部分在越南受伤的中企人员，并送到成都的医院救治。

黄小英是五冶的员工，从14日开始，她和同事就在台塑的生活区等待救援。尽管他们居住的地方有军警保护，但她依然“不放心”。直到 5月19日，中方派出“紫荆12” 号客轮从越南永安港接回他们，其中包括中冶集团等公司的3553名中企员工。20日下午，客轮抵达海口市秀英港。加上此前抵达的“五指山”号、“铜鼓岭”号和“白石岭”号客轮，中国政府派出的四艘客轮全部平安抵达。

至此，除部分留守人员外，在越南河静省暴力事件中受冲击的3860名中企员工已全部乘包机、包船平安返回国内。

该事件后，越南警方逮捕千余名嫌犯，并对其中700多人提起诉讼。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5月20日晚发表声明，宣布对排华示威中受损外企的一系列补偿措施，包括免税和减免土地租金等。

黄小英回到南宁后，决定不再去越南工作。留在越南的中国商人依然关注官方的最新表态。本来传言5月18日越南全国范围举行反华大游行，后在政府的干预下并未成功。越南县级政府的负责人19日登门慰问中资企业主，并表示今后会保证中国投资者的安全，也会对损失进行赔付，但要等中央的统一安排。28日，中国驻越南使馆经商处发布了《关于继续加强安全防范措施的通知》，要求各驻越中资机构“密切关注当前形势”，“遇紧急事件或者安全问题随时报告”。

在越南南部，据不完全统计，有39家中国大陆企业在骚乱中受损，9家受到直接冲击，两家受间接损失，其余28家受损情况较轻，合计损失约1亿元人民币。截至6月底，该地区有3家中国大陆企业得到保险机构的不完全赔付，合计约22万美元。据新华社消息，中冶各公司直接和间接损失约6.76亿元人民币。其负责人称，6月向河静省有关部门提交了损失清单，7月底前提交证据，越方承诺在8月底前确定损失情况。

8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对越方就5月针对中国企业和工人事件所做工作和表态予以肯定，希望越方切实落实好有关措施。

不过，李卫华对未来仍充满担忧。虽然暴乱结束七天后，他的企业就已复工。但他在和当地人交往时，会尽量避免提及这次事件。对于越南政府提及的赔偿数额，李卫华依然在等待。

中越关系已走上正确轨道

文／齐建国（前驻越南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不久前的8月26日，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特使、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黎鸿英来华访问。中方对此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予以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与之会谈。

按理说，两国高层领导往来是很普通的事情。比如，去年6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就曾访华；10月，李克强总理也曾访问越南。但在“981钻井平台事件”之后、中越关系面临困难时，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派黎鸿英这样高级别的特使访华，实为罕见，其意义非同一般。这标志着中越关系正在转圜，走上了正确轨道。



非主流声音违背越南利益

黎鸿英此行最重要的成果是与中方达成三点共识：一是两党两国领导人将进一步加强对双边关系发展的直接指导，推动两国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二是双方继续深化党际交往，着眼长远恢复并加强国防、经贸、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三是双方同意恪守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认真落实《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

议》，用好中越政府边界谈判机制，寻求双方均能接受的基本和长久解决办法，积极研究和商谈共同开发问题，

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的行动，维护中越关系大局以及南海和平稳定。

在中越关系处于正常化23年来最低谷的背景下，上述共识层次分明，各有侧重：第一个共识着重点在高层，特别是其中“直接指导”，表明两国领导人将亲自过问今后中越关系的发展，凸显两国高层对中越关系的重视程度；第二个共识着重点在务实合作，表明两国将着手恢复多个领域的合作；第三个共识的着重点为解决中越关系中唯一的难题——南海问题指出了方向。这三点共识涵盖了中越关系的基本内容，

表明中越关系开始全面恢复。

不过，越南国内舆论并非铁板一块。在黎鸿英访华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个别官员质疑黎特使此次访华前景，理由是中国不会放弃称霸海洋的野心；还有学者担心，越方会因中方游说而放弃提起国际仲裁。除了对黎鸿英访华持否定态度外，在南海问题上，这些人也经常唱反调。一方面，他们无视中国多年来一直保持克制态度、致力于南海和平稳定的基本事实，并将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动污蔑为“称霸海洋的野心”；另一方面，他们对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毫无兴趣，却热衷于把南海问题提交国际仲裁。尽管这些言论不是主流，但也不可小视。

按照这些人的观点，中越关系只能是对抗、冲击，不可能持续健康向前发展。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违背越南人民利益的。如果按照他们的主张，中越两国就不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分两大历史遗留问题，也不可能给两国边民和北部湾沿湾人民带来切切实实的利益。由此看来，这些人表面上都把自己标榜为“最爱国”，实际上他们的主张和做法都是违背越南人民根本利益的。

除了政治层面，越南少数人也在经济层面主张所谓的“去中国化”，即减缓两国贸易发展，人为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中越两国是山水相邻的邻邦，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相互依存度更高。这是客观经济规律，不是任何行政命令可以改变的。尽管5月发生了由“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事件引发的排华事件，但中越贸易额特别是越南从中国的进口不降反升。

7月底，我去中越边境的凭祥市和龙州县考察，发现6月凭祥与越南的贸易额同比增长达到两位数，其中越南进口同比增长62.61%；而上半年龙州县与越南贸易额达32.8亿美元，其中越南进口同比增长155.44%。而今年1-6月，中越两国贸易额达到361.98亿美元，同比增长22.32%。

早在2001年，越共中央书记处就发布了“主动融入世界和地区经济”的决议，这也让越南经济迎来13年的持续快速发展。由此看来，越南类似的政策不会改变，越中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也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中越关系前景乐观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中越关系的因素不仅涉及中国和越南，同时也来自美国的影响。美越关系日趋密切：首先，美越高层往来频繁。特别是2013年7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应邀访美，两国决定将双方关系提升为全面伙伴关系，12月，美国国务卿克里访越；不久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访越，进一步深化了两国关系。其次，美越经贸合作取得长足进展。美国已连续多年成为越南最大出口市场和顺差来源国，也是连续多年越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再次，敏感领域合作不断扩大。美越双方先后建立了副外长级政治、国防、安全高级别对话和副防长级防务磋商机制。在军事交流上也更趋务实，美国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先后访越，美国军舰也定期访越。此外，双方还签署了核能合作备忘录。

目前来看，今后越美关系还会不断向前发展，因为双方各有所求：美国要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除了加强同亚太五个同盟国的关系，还要寻找新的合作伙伴。越南战略地位重要，美国希望重返过去在越南的金兰湾军事基地，也想把越南打造为新的合作伙伴。同理，越南对美国也有所求，它在经贸、投资、科技甚至在南海问题上，都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和支持。

我认为，越美关系日趋密切是两国双边关系中很正常的事，也是完全能理解的。但是，越美发展不应针对第三国，尤其是中国。越美关系与中越关系应该相向而行，美国应该更多地扮演建设性角色，不要使美越关系的发展对中越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我曾先后四次在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工作，累计长达17年。对中越关系有两点切身感受：其一，中越传统友谊是当年毛泽东和胡志明等老一辈领导人精心培育的，并得到两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发扬光大。尽管天空

中有时会出现一片乌云，甚至乌云弥漫，但友好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举一个印象很深的例子。1982年-1986年，也是我第二次赴越南工作。那时中越关系跌到最低谷，除了外交关系外，全无其他交往。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越南官员进行交涉，你抗议我，我抗议你。1985年的一天，时任中国大使邱力行因病进了河内国际医院，得到全面悉心的治疗。一个越南医生主动问我："你觉得我们的态度和之前有不同吗？"听到我说"没有"后，他很欣慰地说："这就对了，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

其二，只要双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有关共识，以两国根本利益为重，管控好分歧，妥善解决新产生的问题，中越关系一定会不断向前发展。我曾参与中越陆地边界谈判和北部湾划界谈判，分别担任过两个谈判机制的正、副组长。谈判时，双方部分观点对立的程度曾让人绝望，比如在北部湾划界谈判时，越方坚持想得到北部湾更多的面积，这是中方不可接受的。但最终，双方依据公平原则，取得了大体对半分的结果。实践证明，再困难的问题，也是能通过谈判解决的。

当前，中越之间的敏感话题仅剩南海。尽管其相当复杂、双方立场尖锐对立且解决时间漫长，但从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的实践看，这同样是可以通过谈判得到解决的。为了更好地改善中越关系，我认为双方还应该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继续保持高层往来，认真落实"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16字方针，扎实推进两国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其次，切实贯彻"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精神，夯实中越友好的民意基础，确保中越友好事业薪火相传。

最后，用"双轨思路"解决南海问题。一方面通过继续坚持谈判解决南海争议，力争取得双方都能接受的基本和长久解决办法。在谈判解决争议过程中，作为临时性安排，力争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面有所突破。同时加强海上低敏感领域合作，为争议最终解决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则认真落实中国-东盟共同制定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稳步推进"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商谈，管控分歧，妥善处理海上问题，不断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中越高层领导会晤之后的冷思考

黄兴球

浙江工业大学越南研究中心主任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率领越南高级代表团于4月7日-10日访问中国，中国国家领导人以高规格接待该团，会谈结果以《中越联合公报》形式公布。这是自2014年5月中越关系激烈摩擦后，两党两国最高领导的会晤，可谓是风雨之后的彩虹。

此次访问虽有中国多次邀请的传闻，但是仍然被外界认为“来得匆忙”。对于《中越联合公报》中有关陆上工作小组、金融工作小组等细节，被认为越南方面“没有充分准备”，“公报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手中”。如何提升中越关系进入到良好的程度，仍需努力。

应用“他者”观念看待中越关系

要提升中越关系，需要适用“他者”观念。多从对方的角度、立场来

考虑对方的需求，以便开展相关活动，这是中越双方都需要改进的地方。从世界范围看，建立盟友的时代已经过去。世界各国努力建立的“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合作战略伙伴关系”等几种层次不同的合作关系，也都建立在“合作共赢”的原则之下。

越南自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以来，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其外交政策也从“一边倒” 转向“多边化”。在该政策指导下，越南同 123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外派外交机构99个，同时与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自由贸易谈判。早在2001年，越南就与中国达成“全面合作战略伙伴关系”，也是其唯一的一个。从这件事看，越南对中国是非常重视的。反过来看，中方对于越南的重视程度显然不够。越南在2008年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而中国截至目前还在谈判门外。

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一心一意发展国内经济，对于越南这个兄弟关照得并不多。而对于中越贸易的发展，双方缺乏调研和评判，总以为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恰恰由于这一忽略，带来了隐患。越方认为，中国把劣质、假冒产品销售到越南市场，破坏了越南的经济环境并对人民生活造成危害；而中国到越南投资的都是高能耗、低技术、污染大的企业，是有意的行为。

对此，中国的企业家认为，我们到越南投资是为了挣钱，越南计划投资部按照《外国投资法》的规定给中国企业颁发了许可证，如果出问题，越方应该先检讨本国政府的管理办法，而不是事后抱怨中国企业。

从一己角度对他方进行判断往往会事与愿违，导致误判。如何从对方立场、利益出发考虑对方的需求以寻找合作的渠道、方式，应成为中越外交合作的新思路。

民间交往不能靠“举办联欢会”

要提升中越关系，需要“民亲官更要亲”。在中越未来交往中，高级领导人之间须保持经常性会晤，正式访问和非正式访问要同时展开。

目前在高层交往中，越南总理阮晋勇尽管到过中国很多次，却没有一次是正式访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在2012年上任后，高度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相比于中国领导人未来会执政5-10年，越南现任大部分领导人2016年初可能将不在岗位上。但此次越南代表团中的国会副主席阮氏金银、公安部长陈大光，算得上是越共政治局中最年轻的领导，因此未来或担任更

重要的职务。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也会继续担任国家要职。这些承前启后的人物，都将对中越关系起到极大作用。

谈到对越民间交往，不能靠举办多少次联欢会——对于相对不富裕的越南人民来说，那是瞎花钱。中国应该把钱花在为越南人民修桥铺路、建设学校、医院、防治疾病、支持科研机构的科研活动、解决工厂中的技术难题、扶助贫困民众等实际事务上。只有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的行动，才能让越南人民对中国产生亲和感。

在越南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中，中国不要再做朋友离开了才后悔的事，越南也不要因为错搭“顺风车”而失去发展良机。

越方对“一带一路”仍存疑虑

要提升中越关系，需要医治战争“伤痛”。中越在过去65年内发生了三次战争，给双方造成了生命、财产损失，对双方感情的伤害极大。而今要重拾传统友谊，就必须直视这些伤痛，分析战争发生的原因以便汲取教训，保证不再重蹈覆辙。对此，双方历史学者、军事专家、外交官等要坐下来，共同对历史有一个说法，而且有必要对双方战死士兵的家属表示歉意。当前，中越双方对这个话题都采取“鸵鸟”政策，选择避而不谈。但是越拖延越不利于中越关系的提升。今年3月14日，在越南河内、胡志明市仍然有1988年海战死难者家属举办祭祀活动，上街对华表示抗议。如果不去正视，这样的场景每年都要重演，也必然会对中越关系造成恶劣影响。

要提升中越关系，需要做大量的释疑工作。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疑虑是越南要跟着美国以对抗中国。而越南从海洋石油981号钻井平台移驻西沙中建岛附近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又要“侵略”越南了。因此中越双方的“国防合作”若要取得互信，必须明确对方的底线。中国要谅解越南实行自主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友好，越南要理解中国在南海上采取的防守态势不是针对越南的。

越南早在上世纪就在南海各岛屿修建各种建筑物，中国并未提出任何意见。中国目前在自己占有的岛礁上扩建，越南却跟着美国大叫“要保持现状”，要中国停止工程，这明显不公平。越南对于当今美国“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的深度目标并未有深度研判，如同参加TPP一样，轻易跟随美国的步伐不见得会收到好的结果。今年3-4月，美国远程C130运输机和军舰均停靠越南岘港，可见，越南想要更多地偏向美国而远离中国。

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很快提出一系列的战略性构想，如亚投行（AIIB）、“一带一路”。越南对此的领会速度、程度都比较迟缓。如3月28日中方公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越南目前还在翻译文件的状态，要他们评判出对自己国家是否有利尚需时日。

去年以来，笔者在越南参与的多个会议中，越南学者多次询问“这个计划是不是中国要用钱来买越南的什么东西？是不是有什么更深的阴谋？”针对这些问题，如果中方没有具体细致的解释，越南始终会保持怀疑。而对于中国“一带一路”的“阴谋论”，也可能会影响到未来中越两国在这个战略性计划中的合作。

释疑工作需深入历史领域

两国的释疑工作还应该深入到历史领域。在这里要谈的是历史观的问题，而非海上问题。从1972年越南社会科学院发表《越南历史》一书以来，所有的越南历史书（含教科书）都将从汉代到清代发生的中越之间的历史战争写成是中国“侵略”越南。而汉代马援平定“二征”是汉代政府对于自己疆域内的动乱的平叛行动，并不是“侵略”。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中越历史上的战争定性为中国“侵略”越南，也在越南民间种下仇恨的种子。长此下去，越南人民对于中国必然会有恨意。2014年越南国会根据政府的要求批准了对于中小学教科书的修改方案，修改任务在2018年完成。因而希望越南历史工作者根据战争发生的真实情况，如实地描述这些战争，为中越友谊做积极、正面的事情。

释疑工作的加强还体现在一些具体事件中。比如，2013年李克强总理访问越南时签约、2014年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和越南祖国阵线主席共同见证挂牌的在河内师范大学共建孔子学院一事，截至目前仍未能开展工作。据悉，其办公用房装修的经费报告长期未得到批准，使得教学工作未能展开。据来自越南社科院的信息解释，这是因为越方害怕来自中国的文化威胁。以推广汉语、中国文化为主要任务的孔子学院在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越南却不能顺畅开展工作，不能不说其中的误会颇深。

再如，自2014年9月越南社科院某经济学家提出中国公司中标越南90%的招标项目，但是越方认为这些公司的工程进度极为缓慢，造成“越南工业化进程缓慢”。言外之意是中国公司造成越南工业化战略难以实现。到底中国公司所中标承包的工程为何缓慢，是因为合同原因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中国公司与其他国家公司的情况是否比较过？这些数据都还没有调查，越方却已经得出结论了，不能不引起中方注意。

综上所述，中越关系要真正提升到良好阶段尚待时日，这需要双方开展更多的创新性工作，需要更多的合作思路，以及更有深度的共同利益的共谋、共建。

中越低调纪念边界战争35周年

记者 / 王衍

2014年2月17日是中越边界战争爆发35周年。2月16日，越南河内市中心的玉山寺附近有大批示威者聚集，他们头戴红色发带，手持用黑色丝带绑住的白玫瑰，向越南河内市创建者、被视为民族英雄的李太祖（音译）雕像献花。游行期间，他们一会儿高唱越南爱国歌曲，一会儿齐喊“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口号，气势逼人。

整个活动期间，越南警方沿途监视，并劝他们离开。有示威者批评，当他们来到雕像前，发现广场上站满了跳舞者和有氧舞蹈班。他们怀疑当局派人阻扰其示威。

35年前的这一天，中越之间爆发了一场短暂而激烈的边界战争（中方称对越自卫反击战），双方均有伤亡。虽然中越双方已经和解多年，但当年的战争却被划为两国官方心照不宣的敏感地带。随着中越边界战争纪念日的到来，历史上的陆地边界冲突悄然将如今紧张的中越南海争端引向更加微妙的状态。

两国官方约定低调纪念？

就在中越边界战争纪念日前夕，据英国BBC披露，胡志明市报纸《一个世界》在发表了纪念1979年越中边界战争的一系列纪念文章几小时后，这些文章就消失不见了。看似微小的举动，却牵动了越南民间的敏感神经，不少人猜测越南政府正在打压相关纪念活动。

越南共产党宣传部副部长阮世纪对此解释称，当局并没有下令禁止讨论中越边界战争35周年纪念话题，撤稿是报纸自己的决定，“我从未对这件事施加任何影响”。但坊间仍传出消息，这是越共高层下达命令，要求媒体不要大肆报道。越南前驻华大使阮仲永曾告诉法新社：“越南领导人不想谈论这场战争，他们似乎希望否定过去。”

官方的低调克制，激起了更多来自民间的反弹。“今年纪念中越边界战争的网络文章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胡志明市民间举办了大型游行和展览，小型的纪念活动更多。”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越南法律研究所所长吴远富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2014年2月16日，越南河内出现罕见示威，大约一百名示威者在市中心游行，纪念中越边界战争爆发35周年，有示威者扬言要“保家卫国”，又批评越南政府软弱。

此前的1月19日，中越西沙海战40周年时，也有数十人在首都河内举行游行示威活动。越南资深外交家、前越南驻广州总领事杨名夷告诫晚辈：“必等待时机武力夺回黄沙（即中国西沙）！”

2月17日，BBT越南网上大幅登载了题为《1979年边界战争——不能忘记》的文章和历史图片，引起越南网民的热烈讨论。一位名“潮”的网友激愤地表示：“为什么我们忘记了这样一个辉煌的历史？为什么我们30多年后才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面对年轻人对这一段历史的茫然，不少网民呼吁“要让越南年轻人了解民族历史”，还有人提议“应将此次历史事件写入教科书”。

巧合的是，对于这场战争，中国大陆的教科书乃至文艺作品也很少提及。此次35周年纪念日，两边的官方亦缄口不言，只有少数民间活动低调进行。据本港《明报》报道，纪念日当天早上，来自广东、广西、湖南、甘肃等地的3000多名中国老兵，身着当年军服，一同前往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凭祥烈士陵园进行吊唁活动。

活动总指挥、广州老兵曲少炜表示，举行纪念活动的目的除了纪念牺牲的战友，也希望让国人铭记这段历史。“国内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均有记载，但对于中越战争鲜有提及，不少年轻人已经忘却。”

另一位现年55岁的越南老兵吴日灯，曾经参加过这场战争中的高平战役。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看到战争双方的老兵有机会见

面，表达各自的想法和观点，“这对未来几代人来说都是个教训”。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想完成此心愿似乎遥遥无期。虽然目前中越和解多年，但对于当年战争的性质，在官方口径上尚不统一。吴日灯说，他一直认为战争原因是中国“入侵”越南。而中国大陆舆论则一直称当年中国军人进行的是自卫反击，不过由于官方无一人出席纪念活动，使得有些老兵感到疑惑。

“据越南舆论披露，两国高层曾经有过约定，不搞这方面的官方宣传和纪念活动，也尽量压制各自的民间纪念活动，一方面是履行双方的约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执政稳定的需要。”据吴远富解释，越南方面担心的并非只有纪念战争这么简单。“近年来，越南国内民权运动方兴未艾，形式多样，让政府有些疲于应付。目前越南民间反华情绪高涨，其中也反映对越共政府的不满。若任由活动形成声势，很可能一发不可收拾。”

南海争端继续发酵

历史上有关中越边境之战的领土纠纷尚无定论，而现实中，中越两国关于南海主权的争端也不轻松。

2013年10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越南，双方就南海主权争端达成“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协议，并在年底进行具体组建。这一举动被外界视为国家对于中越南海主权争端的首次官方回应，也是“中越关系的重大进展”。然而，一位不具名消息人士向《凤凰周刊》记者透露，“目前该工作组进展甚微，不存在所谓的‘突破’”。

今年1月初，中国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修正案，其中第35条明确规定：“外国人、外国渔船进入本省管辖水域进行渔业生产或者渔业资源调查活动应当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此举招致东南亚国家强烈反弹，越南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也表达抗议。

由于中越边界战争35周年纪念日的到来，越南民间有不少声音将两场“主权之争”联系起来，并有网民在看过当年的历史照片后称：“如果现在我们必须拿起武器，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刻！”

1月13日，越南政府边界委员会前主任陈公轴通过媒体放话，暗示越南政府有可能就南海主权争议向联合国有关机构起诉中国。吴远富透露，“起诉的相关准备工作早就着手进行，现在就是等待一个合适时机。这个时机会是一个有利于越南而非中国的国际形势。”

他还注意到，越南一些前任官员和学者似乎更加急切，声称“愈快愈好，不能再拖了”。越南政府边界委员会前处长黄玉交公开给政府打气：“越南并不孤独，越南有东盟、有国际法，越南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关系不断发展。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有本领。”

拉拢大国，攻守兼备

越南的这份“本领”目前在外交层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南海问题上，越南官方很少直接对中国“呛声”，转而走国际宣传路线。在越南主流媒体上，鲜有南海争端的消息，更多是越南领导人在国内的访问以及经济方面的报道，但英文版的内容则大相径庭——2月18日，越南通讯社英文版在主页最显眼处发表《皇室文件证实越南主权》一文，称在越南阮国王19世纪到20世纪签署的文件中，找到了越南在西沙群岛一带享有主权的证据。

吴远富指出，“为了与中国争夺南海，越南在外交策略上必然要寻求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的支持，但目前来看也不至于走上与他国结盟来抗衡中国的道路，尽管越南持此愿望的人不在少数。在军事上，越南近年来一直在进行进攻和防守兼备的武装准备。”

2月中旬，越南驻美大使阮国强在媒体上发文，回顾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于1994年2月3日宣布取消对越南的贸易禁令，并将此事称为两国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2012年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访问越南时，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曾呼吁美方解除对越武器禁运,并称这是两国“互惠互利的举动”,将推动两国关系的全面正常化,有助于更多美国船只停靠金兰湾。当谈到中国问题时，冯光青相对谨慎。他表示,越南的目标是寻求与中国和美国发展稳定与全面的关系，“越南在发展与一国的关系时,不会影响另一国。”

随着印度将其战略触角伸向南海，越南也开始积极寻求与印度在该区域进行共同合作开发。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2月会见印度驻越南大使时表示，越南重视越印双方传统友谊和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印度的“东向政策”，他强调越南希望和印度共同继续为地区安全做出贡献。

近段时间，越南与印尼防务合作关系也取得积极进展。2013年和2014年年初，越印双方组织的六大高级代表团互访频繁。两国海军还扩大对话机制，增进信息交换，并在多边论坛上加强配合。今年2月13日，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杜伯巳上将访问印尼时表示，越南在其对外政策中一直将发展越印关系放在优先位置。

【历史一瞥：越南的那些日子】

越南会安：留住时间的古港

文/刘



秋盆河发源于1600多米高的越南山区，全长205公里，流至会安已接近出海口。

会安的冬天，晴朗，安静，澄澈的蓝天仅剩几抹白云，阳光有力地照耀着这座海滨小镇，炎热的气温让人几乎忘却昨夜的微寒。这座如今宁静的小镇，曾是历史上著名的东方大港，更是东南亚海洋贸易的枢纽。沧桑历尽数百年，迎来送往万千船，而今繁华不再，却魅力依然。

东西文明 共筑良港

会安位于越南中部广南地区，柴江的入海口处，距岘港约30公里，是古代占婆国的对外贸易港口，古称“大占海口”。在17-18世纪，阮氏统治下的顺化-广南地区是远东重要的海洋贸易区域，东西方各国商人都在这里活动。17世纪初，荷兰人柯恩（Jan Pieterszoon Coen）曾形容广南“具有极为良好的港湾及停泊地”。而会安正是凭靠这种优越的地理优势和资源条件，发展成当时重要的国际港口。

随着港口贸易兴起，会安迎来了各国的商人交易和定居，因此会安的街道建筑透露出多个国家和民族的风格，其中中式与日式建筑最为明显。

整个会安古镇纵横只有四五条街道，走进会安，有时候恍惚觉得走进了江南古镇的一隅，中式建筑到处可见。目光所及，不再是挤在一起的狭瘦的越南彩式洋房，而是和中国建筑极为相似的砖瓦房，一层或两层，坡屋顶，土黄色的墙，商店的老式拼板门更让我回想起童年生活的广州老城区。

会安的家庭小旅馆都很有特色，大概有三四层楼高，门前都有个小花园，摆着几张桌子和椅子供游人发呆。外墙一律是彩色的，蓝的、黄的、绿的，墙外都种了好些花花草草，充满了生活气息。

我住的旅馆就是小镇东边的尽头，柴江的边上。旅馆是两层的洋房，浅黄色外墙，有赭色描花的改良式罗马柱，比会安的大多数住宅显得西化，窗外便是临河的大露台。从幽暗、狭长的内走廊里望去，长方形门洞之外正是露台中央那盆茂密的暗红色盆栽，而露台的护栏外，有猛烈的阳光下如洗的碧空、粼粼的河水，以及对岸红色瓦顶的优雅西洋建筑。

强烈的明暗对比，使走廊外的一切都散发出耀目的眩光，仿佛那尽头是通向纳尼亚王国的魔法衣柜出口。柴江流至此处已经越来越宽了，往东有一片浅浅的沙汀沉积在河中央，长着葱绿的小树和野草，再往河的下游5公里就可以到达南中国海的出海口。此刻，江面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几艘小木船，很难想象，许多年前各国的商船沿着江水停靠在会安的时候，是如何一种热闹和繁华。

古港遗风　而今优雅

会安开埠之后，各国商人纷纷聚集于此开展贸易，最先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然后是暹罗人和马来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也接踵而至。当时的会安商贾云集，百货汇聚，在广南地区的对外贸易独占鳌头，其繁荣大概经历了百余年。

18世纪的越南学者黎贵，在《抚边杂录》中描述当年广东船商前往会安等港埠贸易的情形：“自广州往山南只四日夜余一更，但山南回帆惟贩禹粮一物，顺化亦只胡椒一味。若广南则百货无所不有，诸番不及；凡升华、奠盘、归仁、广义、平康等府及芽庄营所出货物，水陆船马咸凑集于会安，此所以北客多就商贩回唐。曩者货物之盛，盖虽巨舶百只，一时运载，亦不能尽。”

只可惜到了18世纪末，由于河流淤塞，一些西洋大船难以进出港区，便逐步转移到其他港口，会安对外贸易渐趋衰退。与此同时，西山

战火蔓延到整个越南，会安也不能幸免。西山政权规定，西洋商船要停泊到会安北面的海港沱氵曩（岘港），进一步导致会安外贸中心地位的丧失。

曾经的繁华早随年月远去，记忆却留在了这里。纵横交错的街道是会安静静流淌的血脉，古港独有的丰富人文气质就漾溢其中。寺庙、会馆、祠堂、教堂和各种异国建筑都能轻易在这里找到，本来似乎并不相干的建筑，由于几百年前那个国际贸易频繁的显赫时代，拥挤在这片弹丸之地。它们离得那么近，从容相依，甚至共同感染了那在它们本身特质以外的属于会安的温婉气息。



会安的一个老市场门口，卖香蕉的老人。

从会安如今闲适散漫的街道中，似乎很难找到会安古埠作为港口时的繁忙，如今这里依旧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但会安对于他们只是一件保留完好的古董，一座活的博物馆，一篇用实物来记录的故事而已。

首先到来的中国人对会安文化影响至深，小小的会安古城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中式建筑。遍布越南的关帝庙永远是那么气派，中国红的主色调增加了厚重和喜庆，而门口斜插着一排红底黑白双色钩边方旗，让人想起京剧中代表车轿的旗子，加上墙上鲜艳的壁画和门口的大红对联，中国味十足。

越南佛教会的占地不小，门坊和围墙之内绿树掩映，内里的德宝寺为两层的碧瓦飞檐寺庙建筑，屋檐下的几幅佛教故事壁画远远就可以看

到，只是寺庙的天蓝色墙体与常见的佛教建筑不太一样，似乎融入了本地的一些审美元素。广肇会馆是会安一家较大的会馆，高大的中式牌坊之内，青瓦灰墙，门口的双凤石雕和屋瓴上的双龙戏珠雕刻相互呼应，而屋檐下的中越文对照的贺年横幅，则又时刻提醒着人们所在的国度。

日本廊桥在古镇的西头，建于1593年，最初由日本人修建，到了明朝时又由中国人重建，过桥往西便是一条以零售业为主的长街，廊桥两头的淡砖红色石雕门廊分别由猴和狗的石像看守，中间的桥体则是木结构的，如今木头上的红漆早已脱落，灰旧的颜色是岁月的痕迹，只有那檐下鲜亮的红白色日本灯笼似乎历久常新，在夜里它们依然点亮着会安的一隅，但这木板桥上已不再有穿着和服的女人婀娜的背影和木屐敲击的清脆回声了。



会安市的明乡萃先堂，约始建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用以祭祀明乡人的祖先与历代杰出人物。

私人定制 量体裁衣

我们可以从那些古旧建筑中追寻时间的印记，但要了解今天的会安，则必须从裁缝店说起。在街头巷尾林立的特色店铺中，为数最多的不是售卖各式雕贝木筷子的，也不是售卖越南丝绸领带或丝质小手包的，更不是出售色彩浓烈的特色画或者手工纸灯笼的，而是大大小小的裁缝店。会安的裁缝店是越南手工最好而价格最便宜的，据说镇上拥有超过200家裁缝店和超过400个手工裁缝。无论是西装、晚装、时装，还是简简单单的一条休闲棉布裤，都可以在这里量身定做，最快的不到一

天就可以做好。

这里的裁缝店有的很小，不少只有两米见宽的店面，而另一些则有漂亮的玻璃橱窗、沙发大厅，甚至还有讲究的假山和中庭，当然它们的手工价格是迥异的。但无一例外的是店里整齐堆放的一匹匹各色布料，麻、棉雪纺、越南丝、含量不等的羊毛料子，反正即使在那些很小的店里，颜色和布料上的选择依然很多。



会安有许多不易被发现的小街道，里面住着人家，自成格局。



彩色的灯笼历久常新，在夜里点亮着会安的一隅。

在会安定做衣服的很多都是西方游客，对比西方国家高昂的人工费来说，这里的衣服做工算是便宜得出奇，所以定制西装或套装的客人为数不少。但也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中国游客，只是图个新鲜，选择些当地出品布料，如越南丝和棉麻布之类，做成休闲的款式，在旅途中就能直接穿上。尽管会安定制衣服的价格以低廉著称，但是春节期间大批的裁缝、尤其是那些从外地来工作的裁缝，都纷纷返乡过年——就像中国春节返乡潮一样，许多的裁缝店也选择在假期里关门谢客，于是制作衣服的价格也随之上涨了许多。

入夜之后，当天往返的游人和旅游团都已离去，小镇显得更加安静和闲适，一些稍微偏僻的街道上便只剩下了街灯与树影的和弦。而此时，散落在小镇里的一家家咖啡厅和小酒吧的霓虹灯已经亮起，红色纸灯笼的暖光点缀着温婉的夜色，召唤着那些流连在小镇中的异国人。他们的心情与思绪，也许就这样随着啤酒的甘醇滋味瘫软在宽敞的藤椅上。走过浮桥，河对岸的一片小广场上正开着热闹的春节嘉年华，参加的都是当地人，这里没有花巧形式和包装，取而代之的是幸运转盘、射气球和套圈等简单传统的游园项目，当地的青年男女们，正在用不一样的方式度过同样美妙的夜晚。

越南土改中的阮氏南悲剧

特约撰稿员 / 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1953年底的一天，越南北部太原省的大慈县，一个名叫阮氏南的妇女以地主的罪名被枪决，时年47岁。

阮氏南的死，标志着北越开始土改试点。阮氏南是第一个被处死的地主，她特殊的政治身份使得她的死具有极大象征性意义。在她之后，北越从1954年到1956年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土改，成千上万的“地主”被枪决和杀害，更多的被关押和迫害。事实上，越共后来承认，这些受害者中大部分其实是参加了抗日和反法民族主义革命的越盟干部、战士和他们的家属。

阮氏南的悲剧不但是越南革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东南亚革命历史的一部分。越共领导集团当年是怎样判她死刑的，后来又是怎样为她“平反”的，以她的命运为代表的那段历史不但给越南现体制留下了沉重的道义负担。



阮氏南

土改第一个牺牲品

阮氏南是大地主家庭的主妇，现有的资料对她的丈夫没有什么记载，人们所知道的是她实际上主持家族事务。她深受越南爱国主义运动的影响，尤其是爱国主义女作家阮氏庭的影响，在二战后越南的抗法战争中以其家产对越盟（越南独立同盟，即后来的越南劳动党和越共，本文中一般简称越共）的秘密斗争和武装给予了大力支援，捐献出金钱、衣物和食品。在越盟号召人民捐献黄金支持抗法战争时，她拿出了数百两黄金。

她的家当时成为越共领导人和干部战士的庇护所。曾经受过她庇护或者帮助的越共领导人有长征（1942-1956年担任越共总书记或越盟领导人，80年代中期又短暂担任过总书记），范文同（1955-1987年越共政府总理），武元甲（北越抗法和抗美战争最重要的军事领导人，长期担任国防部长），阮志清（北越军事领导人之一，军队总政治部主任），黎德寿（越战后期美越谈判越方代表）以及担任越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黄国越和黎文良等人。

在参加抗法斗争后，阮氏南本人成为越北妇女爱国人士的代表，是越盟领导下的太原省（越共主要根据地之一）妇女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她的两个儿子也参加了抗法斗争，其中一个是越盟军队中著名的351师的团级干部，另一个被送往中国学习。

然而，1953年越共决定在北越开始土改后，阮氏南被抛出来成为必须被清算的“地主”的代表。她对革命和民族独立的贡献被用阴谋论来解释，说成是“用虚伪的表现使得她能够混入革命队伍，对革命从内部进行破坏”。

至今为止，阮氏南当年究竟是怎么被定性的，由谁来定这个性，整个过程外人仍然不是很清楚，因为越共本身对此事也是很忌讳的，有限的披露都是语焉不详。但一般来说，迫于苏联压力“纠左”，越共后来进行检讨，越方的材料想为自己和胡志明开脱，将很多主要责任都推卸到中共土改顾问团身上。

越共领导层中主持土改委员会的是总书记长征（长征原名邓春区，因崇拜“红军长征”而改此名），他比较听从中国顾问团的指导，两方面的意见对整个越共领导层形成强大压力。

根据越南方面的材料，中共土改顾问团1952年抵达北越，准备工作主要是介绍中国经验，训练越南干部（也有相当数量的越南干部被送到中国培训）。越南方面的材料说，中共顾问团有好几百人，一些地方乡

一级都有中国顾问，可见他们对北越土改的指导是非常深入的。

那么越共主要领袖胡志明对阮氏南的问题是什么态度呢？据说胡志明在得到要判处阮氏南死刑的上报后说："那不行。我们不能以枪毙一个妇女来发起这场运动。她过去帮助过我们的干部。她的一个儿子是我们的团级指挥员。"当党内高层被动员形成多数意见时，胡志明说"我服从多数，但我仍然认为杀她是不对的"。

但到了将要对阮氏南执行死刑时，胡志明又一次介入，说"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枪毙一个男的地主来开展土改呢？为什么我们非要杀一个女的地主？"。胡还说，杀一个女人不符合越南传统道德。对胡的这些话，越南方面的材料说中国顾问团的回答是"母老虎和公老虎都要吃人。"于是阮氏南被送上了刑场。

阮氏南的死在越共的宣传中被说成是土改运动的一个重大信号，其意义是：如果连她这样声望崇高，与我们关系亲密的人都可以被枪毙，那么反对运动者都能格杀勿论。

另一个说法对胡志明的形象不是那么有利。裴信（原越共《劳动报》副主编，参加过土改）回忆说，多年后他就阮的问题问过当时在太原省负责土改的黄国越。黄说当他得知阮氏南要被处决时，他去河内请示胡志明，胡志明确实说过上述的话，并答应要介入这个案件，但胡后来什么都没有做。

对阮氏南的"平反"

1956年夏，在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双百"方针的强力影响下，越共开始检讨前几年在土改和干部整风问题上的重大错误。同年9月，越共召开十中全会，由于争论激烈，会议开了两个月。会议承认越共在土改中犯了严重错误，主持土改的总书记长征辞职，中央土改委员会的黄国越和黎文良等人被解职。但他们是代党受过，后来都重返政治舞台。长征始终是越共主要领导人之一。

当时在越共内部从胡志明和长征到其他领导人都认为阮氏南是被错杀的，但很多地位和影响比她低的受害者都被平反或者恢复名誉，而阮氏南的名字始终不在名单上。一直到1987年，越共有关方面才找阮氏南的家属，对他们宣布为阮平反，但没有大张旗鼓地在报刊上公布。

2001年，越共老人武元甲在一份内部文件上写道："阮氏南是一个爱国地主。她在战争期间帮助过我们的军队。阮志清将军和我都在她家

中住过。胡伯伯、长征和黎范龙（黎也是当时土改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都认为杀阮氏南是一个错误。”武元甲意思是说早在1956年越共最高层内部就有共识：阮氏南是冤枉的。但这个共识从来没有公布过。为什么不公布？我想是不是因为如果公布了，这样一个重大案件被推翻，会给整个土改和越共的合法性带来严重冲击？



越南土改中，批斗地主的场景。

但在越南民间，尤其是阮氏南的老家太原省，她的乡誉很好，按照

中国话来说她是一个仗义疏财、急公好义的富人，不但资助独立斗争，对乡里也很照顾。笔者2011年在越南采访时，听越南知识分子说，阮氏南老家的农民已替她建了一座庙，庙中有她的画像，把她作为女神来供奉。

越南独立纪录片制作人阮氏清说，在为阮氏南恢复名誉后，她的坟被掘开，遗骸被重新安葬。在坟墓中人们发现除了她的骸骨外还有两件东西：一粒没有完全腐蚀的子弹头和一个完好的玉手镯。

阮氏南的死是越共政治局1953年关于土改的“五四指示”的直接后果（巧的是1946年中共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向土改转变时第一个重要文件也叫“五四指示”）。这份文件的正式名称是“政治局1953年5月4日关于动员群众中几个特殊问题的指示”，2001年由越南官方披露，其英文版网上流传已久，2010年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的《越南研究》在夏季号上全文刊登。

“五四指示”中第一条是“惩办反动和恶霸地主”，规定“在这个运动中，我们必须处决一定数量的反动和恶霸地主。在目前情况下，处决的地主定在解放区总人口的千分之一。”根据一些越南经济史的著作，北越当时人口约1500万，1953年解放区人口约1000万，次年奠边府战役后法国撤军，越共控制全部越北，平均一下，按照“五四指示”北越大约有1.2万左右“地主”被处决。

北越土改斗争的“扩大化”

阮氏南是北越土改中第一个被开刀的，她的死具有“杀一儆万”的象征性。然而，即使根据越共的政策，这第一个人就杀错了。越共有关土改的政策性文件规定对三种地主必须照顾：即本人和家属参加了独立战争的，拥有土地同时从事工商业的，和捐献了土地和财产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杀阮氏南呢？这首先是因为就整个越共的土改来说，“千分之一”的比例和“三种受照顾的地主”的政策之间是互不相容的。如果这三种地主不能动，那个“千分之一”的比例就要落空。所以，“三种地主”的政策其实是空的，实打实的是那个“千分之一”必须要完成。一千个人中必须要杀一个，拿阮氏南这样对越共有大恩大德的“好地主”开刀，其他人就不在话下了。其次，是越共内部指导和主持土改的那个权力集团要以杀阮氏南树立自己的权威——哪怕是胡志明的反对也不行。

然而更重要的是土改“为什么非要杀人？”这个问题。越共这个文件

的标题是关于“动员群众”。这就是说：杀地主是为了动员群众。这里有三个关键词：土改，杀地主和动员群众。它们之间究竟谁最重要？按理说，如果就是为了耕者有其田，那么把土地分了就可以了，哪怕使用强制和暴力，没有必要杀人，尤其没有必要按比例杀人。但如果“动员群众”是最重要的，那么就必须杀人，尤其是公开杀人，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这样群众就“动员”起来了——交了投名状了。



越南土改中，被批斗致死的地主。

土地改革，让耕者有其田，是世界近现代史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的社会变迁过程，研究现代化的人都知道。但很多国家都不需要杀人来完成土改，只有在特定的“动员体制”下土改才需要杀人，而且按比例杀人。而在这些通过杀人完成土改的体制下，农民后来又失去了当年通过参与杀人得来的土地。很多研究土改的人都把“土改”本身作为这场运动的目的，完全是错置了研究题目。

阮氏南的死揭开了北越土改运动的序幕。从1954年到1956年，整个北越乡村经历了一场“暴风骤雨”，各地的土改委员会成了当地政府，其主要工作就是“发动群众”，即召开斗争大会、控诉大会和公审、枪决等。1956年越共十中全会承认，在土改中被当作地主受迫害的达到约18万人，其中12万多人是被错划成地主的。

这个数字中究竟有多少是被正式处决或者迫害致死的，还难以统计，但可以肯定远不止千分之一。问题还不止是处决，更常见的是对“地主”和其家属的各种酷刑、折磨和羞辱，有的“地主”被处决或关押后，其家属和孩子被活活饿死。其悲惨景象，使得胡志明在党内会议上当众落

泪，有照片为证。

为什么土改会“扩大化”？这是因为反法民族独立斗争席卷了北越各个社会阶层，尤其是社会精英，国家独立的诉求是整个民族的心愿。农村相对富裕的阶层中很多人都参与或支持了抗法斗争，所以真要按照越共那个照顾三种地主的政策，土改根本无法进行。因此“扩大化”就不是什么偶然的错误，而是土改必然的结果。

从1951年到1953年，越共对干部和党员进行“整训”，强化思想教育，对组织完全公开自己的私人生活和社会关系，做到完全服从。正是在内部完成了这样的“规训”，“土改”才得以推行，这是阮氏南悲剧的另一个重要根源。

和完全被驯服的党员干部不同，1956 年11月，越北义安省的农民利用政府“认错”的机会发起暴动。这里是胡志明的老家，30年代初在这个地区发生的“义安 - 河静”暴动造就了越南的“苏维埃”运动。然而恰恰就在这个“群众基础”较好的“老区”，越共推行的“土改”政策令农民积怨甚深。越共被迫调动其军队中的精锐第325师将农民暴动镇压下去。

西贡，最后的日子

“陷落”与“解放”



公路上来自北越的炮火。1975年4月28日，南越士兵与西方记者躲避北越军队的炮击。西贡的“陷落”与“解放”在即。此前的1975年3月，北越已经完全无意维持1973年签订的《巴黎和平协约》表面上的和平，对越南中部高原地带发动大规模攻势。南越总统阮文绍（Nguyen Van Thieu）派遣外交官向华盛顿求援却一无所获。美国议会高票否决了向南越提供进一步援助的提案。之后南越军政系统面临崩溃，北越军队如入无人之境。总统阮文绍也在4月21日坐飞机逃离南越。4月23日，北越军队开始接近并炮轰西贡，难民的恐慌加速蔓延，美军被迫加快撤侨。同日，美国总统福特在华盛顿发表演讲，宣布越战结束。而在西贡，24小时不间断的空运撤离行动进入高潮。

1975年4月底，越南西贡，美国大使馆的院子内外一片混乱。官员们抓紧时间焚烧机密文件和资料。几名厨子和司机狂饮留作给养的葡萄酒。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砍伐院子里高大的树木，以便给直升机着陆腾出地方。大使馆围墙外，成千上万名恐慌的越南人吵吵嚷嚷。不断有人试图越过使馆铁丝网，又不断有美军士兵将他们推出。一些在大使馆内拥有官员朋友的越南人，幸运地跻身使馆围墙内。

这是南越首府西贡最后的日子。大使馆内的美国人按照两年前的一套方案紧急撤离。大批越南人蜂拥而至，希望搭上最后撤离的美军直升机。西贡住着约数百万人，他们中大部分是因为战火才从乡下进城的难民。并非所有的越南人都想离开，但数十万与南越或美国有关联的越南人相信，他们的生命将在共产党到来后受到威胁，因此急于脱身。

打破停火协议的一个月里，北越军队势如破竹，步步逼近西贡城内。4月29日，北越已经对西贡机场进行火箭炮袭击，当时约有8000名

南越公民和400名美国公民在机场等待撤离，两名年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袭击中丧生，他们是死于越战的最后两名美军士兵。火箭炮的攻击并没有摧毁机场，但一名南越飞行员在最后一刻投敌北越，炸毁了尚可使用的机场跑道。

4月30日凌晨3时30分，仍有数百名越南人和1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留在大使馆。也仍有大量越南人在水泥加固的大使馆院内和周围徘徊。美国总统福特下令不再撤离越南人，最后几班直升机只撤离美国人。7时45分，最后一架直升机姗姗来迟，接走了最后11名美国士兵。这架直升机从大使馆屋顶起飞大约一小时后，一辆中国制造的北越坦克闯入了南越总统府的大门。

越战终于结束了。南北越统一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西贡也在日后更名为胡志明市。在美国和灭亡的南越语境中，这是“西贡的陷落”；而在北越和日后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语境中，被称为“西贡的解放”。大批南越人当时未能如愿逃离，作为南越支持者和美国多年的盟友，他们日后可能沦落到被枪毙、监禁或者送进“劳改营”的境地。

撤离西贡的那段痛苦记忆，在美国政府和涉事官员的心中迟迟难以散去。虽然美国总统福特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骄傲地说，在只牺牲了４名美国士兵的情况下，有大约5万名南越人和6000名美国人获救，但他仍不得不痛苦地表示：“这是我一生中最悲哀的日子之一。”在大使馆内中央情报局（CIA）官员的回忆中，撤离时的西贡“整座城市屏住了呼吸”。

通过电视直播，世人目睹了撤离西贡的最后场景：当直升机在那个沉闷的下午出现，准备接走那些预先被挑选者时，人潮蜂拥而至。绝望的越南人涌向大使馆，猛力推挤以便更加靠近铁门与高墙。当他们挤到前头，便开始奋力攀越外墙。面对叫嚣、抗议与辱骂，美国海军陆战队仍设法控制场面。那是美国在越战最后时刻遗留在西贡的一个不甚光鲜的结尾。（曾鼎）


撤离西贡的美国人。**1975**年**4**月**29**日，美国公民登上美国海军“蓝岭号（**Blue Ridge**）”指挥舰，撤离西贡。他们先是通过直升机转移至此，然后坐舰船离开。当日，美联社记者的一则报道这样开头：“十年前，我看着第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来这里援助越南。他们在海滩上受到穿着白色丝袍、戴着花环的漂亮越南女孩的欢迎。十年过去，我看到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引导着美国人离开南越。”

“他们跟**10**年前的年轻人一样看来整洁体面。”这篇报道接着描述：“但是越南人却不一样了。那些没办法挤上直升机的人，还有他们背后的数千名群众，跟试图捍卫直升机降落区的海军陆战队员叫嚣扭打。”


美军运输机在撤离西贡的儿童。**1975**年期间，美国政府在越战结束前几天紧急实施了“婴儿空中撤离行动”（**Operation Babylift**）。**1975**年**4**月，南越败局已定，美国的撤离由原来的备案变为最紧急的任务。**4**月**3**日，福特总统下令解救战争孤儿，开启婴儿空运行动。**3000**多名婴幼儿童随后被撤离 。这次行动以拯救战火中的孤儿为出发点，然而后来的调查证实，被撤离的婴儿

并非全都是孤儿，当中有许多是南越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远离战火，忍痛让孩子被当成孤儿送走。最为不幸的是，婴儿撤离行动之初，一架洛克希德C5运输机在起飞不久后失事，造成机上138人死亡，包括78名婴儿。



频见于当时电视直播画面的撤离主角——直升机。1975年4月30日，停留在西贡美国大使馆天台的直升机。为了防止西贡失守，早在1973年美国国防部就曾秘密策划四个应急撤离方案。“常风行动”（Operation Frequent Wind）是应急撤离的最后方案——纯粹由直升机执行撤离任务，这也是最终得以执行的撤离方案。从4月29日上午，最后的直升机紧急撤离“常风行动”已经开始。美军的重型运输直升机一刻不停地将美国公民与南越难民由大使馆天台送往机场，随后换乘其他直升机抵达在外海等待的舰船。这一过程中，美国大撤侨和南越难民绝境逃亡的惨烈画面通过电视直播传遍世界，战争完结的一刻并不像几位美国总统所承诺的那样带来自由与荣耀，反而颇为狼狈而悲情。



越南人光顾美国大使馆归来。1975年4月29日，一名刚刚“掠夺”完美国大使馆的南越老兵。大批南越民众试图闯进美国大使馆，设法搭上撤离的直升机，也有人希望在混乱中搜罗一点食物和财富。在美国大使馆的军队完全撤离之后，许多西贡民众随即开始了对被舍弃的使馆内部的洗劫。大街上一度涌满了从大使馆往家中搬运东西的民众。他们从美国人的储藏室搜到了满满

大盒的食物，心满意足地拿回家中。这名身有残疾的南越老兵也加入其中，搜罗到了装在瓶瓶罐罐中的食物，一瘸一拐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外海上接纳南越撤离人员的美国舰船。1975年4月29日，美国“蓝岭号”指挥舰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把直升机上的人和货物卸下后，将直升机推进海里，以便给后来的直升机清理出着陆地点，留足空间。成群的直升机载着南越官员和他们的家属、成箱的财物，甚至还有宠物，在美国军舰上着陆。这些撤离的越南人多与美国或者南越政府有密切关系，大部分人教育程度较高且较为富有。这些人可能曾在法国殖民政府和南越政府任职，通晓法语或者英语，可以说是越南殖民地一百年所培养出来的精英阶层。他们的离开使得越南遭受重大的智力损失。



向美国大使馆蜂拥而至的南越民众。1975年4月29日，为了寻求逃离之路，几近疯狂的西贡市民纷纷爬上4米高的美国驻越南大使馆外墙，试图在最后一批美国士兵离开越南前登上飞机与他们一同离开。部分越南人跳到了高墙与铁丝网上，但还是被海军陆战队队员挡下。有数据称，在美国撤离期间，近五万名南越公民搭乘运输机离开西贡，另有约八万人通过其他方式逃离西贡。



北越接管西贡。1975年4月30日，北越的坦克驶过西贡总统府的大门，进入总统府，这标志着南越政权的彻底垮台。30日7时45分，最后一架直升机姗姗来迟，接走了最后11名美国士兵。两小时之后，北越军队的坦克列队开进西贡。同美军直升机救援行动的照片一样，这张坦克入驻的照片也成为西贡“陷落”的代表性画面。北越接管西贡，临时南越政府成立，一年之后，南北越正式统一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西贡也改名为胡志明市。

麦当劳进入越南引热议

有越南网民表示："我们不太在意麦当劳怎么进入越南，也不太计较它与谁在合作，我们更在意的是，麦当劳能不能让越南人除了传统河粉和小吃外多一些选择。"

特约撰稿员 / 伊文元

"只要能够与麦当劳餐厅合个影，就代表已经出过国"——越南人曾经的足迹证明，如今被改变了。2014年2月8日，越南第一家麦当劳在南方胡志明市开业，引发火爆的就餐场面，许多当地民众排队一个多小时等候就餐。

"麦当劳已成为胡志明市新地标和潮人的聚集地，也是越南近期的热门话题。"长期往返于中越之间的商务人士阮海哲说，"这体现了越南年轻人对西方文化的渴望与认同，他们希望能够与西方世界融合。"

麦当劳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有连锁店，其中包括38个亚洲国家。由此，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只有老挝、古巴和朝鲜没有麦当劳。越南一直被西方媒体称为"东南亚模范的资本主义学生"，其变化情况始终吸引着大众的目光。

总理女婿开店

麦当劳于1979年进入新加坡，此后30多年里风靡东南亚，越南却一直是个空白。此时它能够入驻越南，外界认为与合伙人阮宝黄的背景有关，因为他的岳父是越南现任总理阮晋勇。

"众所周知，阮晋勇家族在越南的影响很大。阮宝黄并不止是麦当劳在越南某一地的加盟商，而是整个越南市场的合伙人。"阮海哲说，"不过麦当劳之所以现在才进入越南市场，和它自身的市场考虑有关。要知道，肯德基在数年前就已进驻越南。"

阮宝黄（英文名阮亨利）是越南裔美国人。他于2013年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曾在当地一家麦当劳店打工。十年前，我就梦想有一天能回到越南，然后开一家麦当劳餐厅。多年来，我一直与麦当劳公司接触，现在终于能够实现梦想。"

去年7月19日，官方越南电子新闻网站报道称，经过一年思考与观察越南市场，麦当劳公司2014年将在胡志明市成立首家速食据点。虽然麦当劳进入越南较晚，但拥有9000多万人口的市场潜力仍然庞大，而大多数顾客出生于1975年越战结束以后。

事实上，麦当劳考虑进入越南市场已超过十年，有西方媒体披露，“牛肉供应和可靠的供应链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问题造成了该计划的一再延迟”。麦当劳公司决定进军越南后也对外宣称，阮亨利财力雄厚，富有经营经验，有助于麦当劳在越南市场的发展。2013年8月，首家麦当劳餐厅开始施工。

不过，麦当劳选择越南总理的女婿担任特许经营合伙人，也被外界指责为“变相官商勾结”，批评者认为“必须以越南官方势力做靠山，麦当劳在越南的经营才能畅通无阻”。

阮海哲说：“麦当劳在越南的火爆，得益于越南政府层面上的支持和宣传，这一点肯德基无法与之对比。麦当劳店的开业上了越南《人民报》的头条，甚至还有人将其与中国的庆丰包子铺作比较。”



2014年2月10日，越南国内第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开业后人满为患，平均每天多达２０００人光顾。尽管近年来越南经济增长放缓，传统饮食文化根深蒂固，但很多分析家一致认为，年轻人对快餐的热忱将保障洋快餐的成功。

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资料显示，阮宝黄的父亲曾是被越共推翻的南越阮文绍政权的内阁副部长，1975年被北方打败后出逃美国。阮宝黄1995年毕业于美国哈

佛大学，后来在美国西北大学和罗切斯特大学商业工商管理专业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还出任过高盛在纽约的美国电讯公司的执行官。如今，他已经是一名成功的商人。由于其兼备越南与美国的双重教育与生活背景，往往也被外界用来观察越南与美国饮食文化的交融与撞击。

越南自1986年实现经济革新政策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2012年，越南的年人均收入为1600美元，而居住在城市的民众年人均收入更高，河内市和胡志明市的年人均收入分别为2200美元和3600美元。

新开业的麦当劳位于胡志明市第一郡奠边府路2-6号，24小时全天候营业，占地面积约1300平方米，并提供汽车点餐服务。有媒体探访后表示：餐厅环境高端大气，令人感觉仿佛置身国外，设计风格一点不比国外麦当劳差。除了巨无霸、薯条等传统食品，麦当劳还设计了符合越南人口味的猪肉汉堡。

“由于越南决心追赶全球经济步伐，同时加快城市化的发展，因此以城市居民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麦当劳发展前景相当乐观。”越南华裔学者黎明远表示，历史上许多外来文化都曾经对越南有过影响，因此越南是一个不排外的国家，民众也热爱尝试新口味。“在麦当劳之前，已经有肯德基、侬特利、必胜客和汉堡王等品牌进入越南市场，民众在心态和口味上都受过锻炼，所以只要麦当劳的经营策略得当，肯定能吸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由于麦当劳的到来，越南网民也在外来饮食文化对越南传统文化的冲击展开讨论：一个汉堡需1.2-2.85美元，而大多数越南街头都买得到的传统河粉约1.5美元。黎明远认为，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因素干预，西方的饮食文化肯定会在越南拥有一席之地，但也不会彻底颠覆越南的传统饮食习惯，这不仅仅是经济水平和消费能力的问题，而事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

此外，麦当劳在越南开展的24小时全天营业，以及可以在车内直接购买的“车购通道”快餐服务都是史无前例的，将促使许多越南年轻人传统生活习惯发生改变。但有越南网民表示：“我们不太在意麦当劳怎么进入越南，也不太计较它与谁在合作，我们更在意的是，麦当劳能不能提供更方便、更实惠的食物给越南，让越南人除了传统河粉和小吃外多一些选择。”

引发大国关系讨论

早在1997年，即越南与美国邦交正常化两年之后，肯德基就进驻越南，但当时并没有惊起多少波澜。2014年麦当劳进入越南，被外界视作由于越南近年来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变革，与美国的全方位关系取得进展。

阮海哲说："经过多年的实践，越南的高层政治设计为相互制约，没有哪一方有绝对权力一手遮天，所以越南经济政策的变化是整个政治协商的结果。越南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关系密切，但也是以市场需要为前提。"他认为，在目前的政体下，越美关系的发展更多体现在与越中关系的博弈上，但是由于地缘、政治和历史原因，两者不存在对比性。

2012年麦当劳公司高管在越南考察时曾透露，麦当劳进驻越南市场首先会在胡志明市开1-2家店，而后再向河内发展，长远目标是开设100家店。麦当劳此次在越南拓展依旧采取特许经营模式，即公司在土地和建筑中投资，特许经营者则在商标、装修和设备上投资。按照麦当劳的规定，其海外特许经营许可人的职位利润非常诱人，被选中者的条件非常高，这也是外界屡拿阮宝黄的家庭背景说事的原因。

越南总理阮晋勇自上任后，一直以"改革者"自居，引发了许多非议。其一直因国内经济处理问题不当而备受越南国会及官员阶层指责，而当媒体曝光其家人的工作和财富后，更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也围绕着他。"越南在2013年的修宪中，虽然明确暗示要吸收西方民主经验，但也确定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阮海哲说，"由于经济政策服务于政治体制和越共高层，短期内其经济不存在革命性变化的可能。"

不过，在加拿大籍越南裔学者卿武德看来，美国目前"重返亚太"的政策始终建立在与战略伙伴关系的牢固程度基础之上，而越南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伙伴。"河内长期以来并且始终会对其强大的北方邻国中国感到担忧，因此一直期待与一个大国建立联盟来抗衡中国，无论是冷战时期的苏联还是如今的美国。"

因此，麦当劳进入越南在很多人看来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其所引发关于越南、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话题还会长期延续下去。



凤凰周刊文丛

America Now

美國大事

凤凰周刊 编

目录

2014年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什么？

美国国会报告聚焦大陆军力

美国或再现“空虚的陆军”

美军中的华裔官兵

解读美国2015财年军费预算

中美关系：不误判比信任更重要

美共和党资深众议员意外败选

你不知道的美国政党政治常识

美国不反对中国成为海洋强国

解密第四次习奥会

中国希望美在亚太成为稳定器

中美应以合作来减少分歧

美国民主党中期选举落败背后

美核导弹部队能被治好么

2015年

邓小平访美：封存影像挑开真实历史

美国大事：关于化石燃料的辩论

“赴美产子”的经济账

中国地方政府如何破产？

中美产业链发生逆转？

全程直击最重要出访 习近平9月在美国

习近平的联合国三日

习近平访美的关键一步

习近平9月访美可打95分

美海军靠什么折腾南海？

从博物馆透视美国文化

中美关系：风浪暂归平静

2016年

美军与酒精的“百年战争”

送孩子赴美留学家长应注意什么

为什么美国的小区没有围墙？

美共的“红孩儿们”

版权信息

凤凰周刊文丛系列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凤凰周刊》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2016©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2016
本书版权为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所有。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TCFP-N00007217-20160304
最后修订：2016年 09月17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2014年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什么？

美国政府不会对仅仅提出一个中美关系新口号感兴趣，切实的合作领域与具体的结果才应该是这一新国家关系框架最为重要的特征，而不是简单的定义。只有能够真正达成合作防止冲突，定义新型大国关系才有意义。

韩 磊 (Paul Haenle)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

随着一声巨响中国迈入了蛇年，这一声响并不是中国庆祝农历新年的烟花爆竹声，而是朝鲜第三次核试验的爆炸声。由于试验地点临近中国边境，爆炸带来的震动使很多吉林民众感到担忧。

这次核试验公然藐视中国政府的呼吁，而且十分不合时宜，扰乱了中国领导人庆祝最为重要的传统佳节。这一事件连同2013年其他几大重要事件，凸显出中美两国日益需要在加强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的同时，管理彼此间不可避免的分歧与竞争。

美国寻求“实际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2013年3月，习近平正式当选为中国新一届国家主席，他此后发表了别具特色的讲话，令人联想到四年前刚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习近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许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愿景包括达到中国国内发展目标，即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收入翻一番；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之际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包括在世界舞台上重建中国大国形象。

习近平与其领导团队明白，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中国梦有赖于建立强劲稳定的中美关系。同样，奥巴马政府也相信稳定、合作、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是实现美国国内与外交政策目标的关键之所在。中美两国的经济、金融体系以及贸易的相互依赖程度与日俱增，两国的利益与命运也紧密相连，使得两国领导人有强大动力规避双方对抗与不良竞争。

尽管存在这些现实考虑，但自1500年起，历史上大约出现过15次

新兴大国挑战既有大国的情况，其中11次都导致了破坏稳定的冲突。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飞速发展，使中美两国政府面临这一挑战，即如何在双边相互依存、态势紧张与战略互疑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处理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之间的关系。随着中美都迎来新一届领导层，两国有机会建设性地共同面对这一挑战，并发展出相应战略以防止两国关系陷入困境。

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做出了明智且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决定，于2013年6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非正式会晤。会晤的非正式性也让两位领导人开始建立个人关系，为改善两国关系定下基调，并增进对彼此国内、双边以及全球事务目标的了解。

在这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再次提出构建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的想法。2012年2月，习近平作为中国副主席在访美期间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奥巴马总统积极响应了其建议，并称美国愿意与中国在互惠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合作关系。

美国领导层将这一表态视为一种积极姿态，表达了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愿，但一些中国人却认为奥巴马拒绝了习近平的提议，原因是奥巴马在回应中没有使用“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词汇。但实际上，奥巴马及美国领导层都发出信号，表示他们认为需要认真且积极地致力于实现新型中美合作，而并不是拒绝这一概念。奥巴马政府并不是狭隘地专注于表述新框架的具体用词，而是更想了解两国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加深合作、减少分歧并最终实现中方所提出的新型关系模式。美国表明愿意同中国一道探索这一新概念，只要中方认同这能够进一步扩大两国合作。

2013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发表题为“美国在亚洲的未来”的演说时反复强调，“我们寻求与中国实际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赖斯使用了中国的原话（新型大国关系），但她也增加了一个重要信息——实际建立(operationalize)。

赖斯悉心挑选措辞旨在向中国领导人传递清晰的信息，表明美国有兴趣也有意愿探索习近平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但是赖斯所用的“实际建立”一词意义重大，表明美国的首要关注在于如何将这一概念转变成为能够加深双边合作的实际努力，而不是仅仅为中美关系创造出又一新标签或是新定义。

中美两国如何开展务实合作

那么实际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下面所

提到的四点是这一新型务实合作的核心：

首先，中美两国需要开始积极合作，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一同应对全球挑战。过去，中美两国一直只关注双边事务。然而，如今中美关系的主要挑战与机遇都将来自于两国共同合作应对关键性全球挑战，如核扩散、能源与粮食安全、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中东不稳定、网络安全以及全球金融改革与复苏等。

找到切实可行的方式、建设性地应对全球问题的需求早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就已凸显。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以发表通告的方式总结了两人的讨论，声明中美两国要加深合作，通过不断向朝鲜政府施压来解决核扩散问题，通过商谈减少氢氟碳化物排放的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如果两国能够更加努力合作，为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真正裨益，那么这将是迈向实现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一步。

第二，对于中美两国在一些历史性领域长期存在的分歧，两国领导人不应期待对方的态度会在一夜之间出现转变，如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很多美国政府官员担心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是为了迫使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建立中国势力范围、并使美国按照中国政府的意愿做出调整适应中国的利益。这样的方式不会奏效，而且以此作为出发点讨论新框架只会导致失败。中美两国自1972年发表《联合公报》以来一直在很多问题上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包括台湾问题。但在积极扩大全球问题上的合作这一背景之下，两国领导人能够更好地减少这些长期存在分歧的领域。

第三，中美两国在一些新领域也出现了紧张关系，这加剧了双方互疑，亟须解决。2013年这些问题包括中国通过网络黑客技术刺探美国商业与军事机密，以及南中国海与东海区域领土争端导致的风险（包括中国政府近来宣布的新防空识别区）。如果中美两国之间不在军事上增加透明度与合作，这些问题，尤其是后者，很可能引发两国的军事对抗。我们必须正面应对这些重要问题，不能回避。随着两国大力合作解决现有分歧，我们不应让这些领域的摩擦定义或影响广泛且稳固的中美关系。但是如果想要实现新型大国关系，就必须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并努力减少分歧增加互信。

最后，为了打造可持续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需要让本国民众信服这一关系符合两国利益。要达成这一点，我们应该提炼出一些互利的重要举措，向两国人民公开展示中美合作关系的价值所在。比如，中美两国可以携手根除主要的儿童疾病或传染病；或是合作进行太空探索，如火星探测。因此，我们需要了解中国领导人认为的潜在合作领

域，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国力进行务实的合作项目，才能够向世界展示中美关系所能带来的正能量。

如果中美在减少分歧的同时没能找到具体合作方式，那么中国这一提议的发展将不得而知。我坚信，美国政府不会对仅仅提出一个中美关系新口号感兴趣，切实的合作领域与具体的结果才应该是这一新型国家关系框架最为重要的特征，而不是简单的定义。毕竟，只有能够真正达成合作防止冲突，定义新型大国关系才有意义。

如果我们能够找出互利合作的方式，那么这一提议会给中美双方带来广阔前景。但是2013年的经验表明，打造新型大国关系并不以双方接受其前提而结束，而只是中美合作的开始。如果我们不再纠结这一合作关系的新定义是否有被接受，而是关注探索实现这一新型关系的方式，那么中美两国将能够开创一条历史性道路，通向光明的未来。

美国国会报告聚焦大陆军力

美国国会对中国自主研发武器系统的关切使得相关研究成为“显学”，但由于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原因，美国军方和学术界提供的研究往往出现偏离事实的现象，更无形中加大对中国军备发展的“陌生感”，甚至“恐惧感”。

特约撰稿员 / 雷炎

“中国军事现代化是一部引人入胜的‘超级大片’。”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步成为亚太安全领域的关键因素，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UCESRC）服务研究员汉斯·克里斯滕森如此形容。

11月20日，UCESRC发布新的涉华军力报告，其中涉及多款具有战略意义的解放军“不对称武器”，并强调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该委员会表示乐于见到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是由于美国预算紧缩，很多美国的盟国和友邦越来越怀疑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落实其新承诺。因此UCESRC建议政府应加强亚太盟国的海军与空军能力。这份报告还提及中国的网络攻击、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以及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回应上述报告称，该报告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我们希望这个‘委员会’能改变其冷战思维，少做干扰中美关系发展的事。”他说。

从“撒手锏”看中国军力需求

新报告指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加速进行军事改革，国防支出也呈现出稳步增长态势。中国在其2008年版国防白皮书中表示，它将在2010年之前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在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机械化并使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从而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目标，“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涉及自主研制武器系统的发展—其中某些武器系统所处的研发、采购及部署态势超出美国和其他国家观察人士的预料”。

与之前同类性质的报告有所不同，该报告重点探讨了几种被美国官方分析人士视为“让人出乎意料”的武器平台，包括携带巨浪-2潜基导弹的战略弹道导弹核潜艇、039B型（元级）柴电动力常规攻击潜艇、东风-21D型反舰弹道导弹、携带远程攻陆巡航导弹的轰-6K轰炸机和无人机作战系统，“依照中国军方的定义，它们均属于‘撒手锏’范畴”。

报告还引述美国海军的情报说，预计大陆海军在2020年会拥有342

艘潜艇。因此，报告建议美国国会拨款建造更多战舰，并扩大海军巡弋的区域，以达到国防部的目标，即到2020年将六成的舰艇派驻亚太地区，目前为五成。有本港军事评论员认为，这可能是美国故意的误导，“解放军现役的潜艇大约只有六七十艘，不可能在六年之内突然增加到200多艘”。

对于这份报告，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前海军分析中心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麦德维特认为，尽管解放军距离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其正以“渗透防御”策略作为自己未来几十年军事发展的战略方向，并通过展示“确保摧毁”的实力，阻止外部势力可能对本国追求统一以及维护本国领土主权目标的干涉。他表示，军事现代化已经被中国领导人提升到关系国家重大利益的高度，“美国必须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中国军力发展的问题上”。

美国军界意识到，解放军旨在发展一种“渗透防御”策略（即反介入），按照该策略，在遭遇强大对手时，中国海军将发挥“不对称”的系统优势，利用部署在陆地和大型防空舰上的舰空导弹的掩护，海军水面舰艇、舰载航空兵以及陆基岸防，甚至二炮部队积极采取远程导弹攻击。在水下，具有长时间隐蔽航行能力的中国潜艇则实施布雷、封锁等作战，牵制对方众多兵力。通过卫星导航、电子干扰、信息战等手段，中国海军可以重创或瘫痪敌方舰队。即使是与对手处于交火临界点时，解放军也能利用这种策略向对手传递“确保摧毁”的信息，迫使其“不战而屈人之兵”。

UCESRC认为，他们所关注的上述“撒手锏”就体现了这种保守的策略，可以满足解放军有限的区域作战目标，尤其是在阻止美国航母接近中国沿海时将显得更加有效，至于打造这样一支力量的花费则是“正在崛起的大国”所能够承受的。

谈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报告认为，中国对朝鲜和伊朗的支持表明中国最重视的是本国的利益，而不是地区安全。“中国持续援助朝鲜的主要原因是担心朝鲜政权崩溃，因为朝鲜政权崩溃将会损害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安全利益；中国也是伊朗能源部门的投资大户，并向伊朗出售诸如巡航导弹之类的先进常规武器。”



2 0 1 3 年11月2 1日，中国舟山，中国海军“ 和平方舟”医院船从浙江舟山某军港启航，前往菲律宾灾区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救助任务。

美国对华军事研究困境

美国政府和国会对中国自主研发武器系统的关切使得相关研究成为“显学”，但由于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原因，美国军方和学术界提供的研究往往出现偏离事实的现象，无形中更加大对中国军备发展的“陌生感”甚至“恐惧感”。长期关注UCESRC对华研究的一名不具名军事专家认为，目前美国情报界和学术界在对华军事研究上主要面临以下困境：

首先来自于中国实施的“信息拒止”（或称“战略欺骗”）。中国从多个方面对其军事事务实施保密，并在某些情况下提供虚假或误导信息。近年来，美国官员经常抱怨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缺乏透明度。

其次，美国低估了中国国防工业体系的变化。美国一度将中国国防工业视为臃肿僵化以及缺乏适应能力的体系，但该行业过去10年来的表现对外界的批评作出了有力回应。其研制现代化武器平台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越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水平。

再次，中国政府的决策流程较为模糊，在涉及军事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时更是如此。中国某些自主武器平台的公开展示和测试也明显暴露了其内部协调问题，以及高层存在分歧的可能性。美国各界皆无法全面判断中国领导层将美国视为中国安全根本威胁的程度。中国对这种威胁的认识在近年来被一系列事件所强化，包括1996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以及1999年美国飞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等。

此外，过去20年来，中国将大量资源用于促进自主研发（R&D）能力的增强—要么是通过科学教育、建立国家科研基金以及寻求国外企业的技术转让，要么是使用工业间谍—从而大幅度提高了自主研发高性能武器系统的能力。随着中国对双重用途（即具备商业和军事用途）技术（如电子技术）的了解不断加深，也为其国防工业提供了巨大的交叉利益。

随着对中国公开资料（尤其是专业技术杂志以及相关出版物）的日趋重视，美国逐渐纠正了此前在对中国武器项目进行分析时的部分缺陷，这也有助于加深其对中国决策层的理解。

美国蒂尔公司2009年向UCESRC提交的研究报告表明，在上世纪90年代实施改革之后，中国国防工业体系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国防工业之所以取得了相对进步，最好的解释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全球化生产和研发链，从而使其能够接触到最先进的生产和制造技术知识。”该报告评论称：“其中取得最大进步的莫过于造船和国防电子工业，均得益于中国目前在商业船舶和信息技术制造领域所处的领先地位。”

上世纪90年代，外部分析人士还无法意识到这些因素的存在，但是它们从2005年左右开始产生成效。越来越多的美国军方分析人员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国有军工及相关企业已经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转型。中国政府要求这些企业改进业务流程、优化组织结构、强化激励机制、缩短研发时间、加强质量控制，从而在整体上提高国防工业的生产能力。“虽然该行业仍处于国家严格控制之下，但与20年前相比，它通过体制改革和改进技术已大幅增强了研制现代化武器平台的能力。”该报告总结说。

美国或再现“空虚的陆军”

分析人士认为，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军参与地面作战的可能性降低，越来越多情况下将面临海战、空战、网络战等“非短兵相接”的作战样式。但事实上，美军再次卷入地面作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届时陆军仍将是责无旁贷的骨干力量。

特约撰稿员／萧萧

当前，美国军方喊着“重返亚太”之际，外界认为在这个更强调“快速反应”和“联合作战介入”的时代里，机动性平台密集的美国海军和空军更加吃香，这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筋疲力尽的美国陆军顿感无奈。美国《陆军》杂志评价称，五角大楼已提出“空海一体战”（ASB），以期抗衡一些亚太大国持续成长的“反介入/区域隔离”（A2/AD）作战能力。在ASB构想中，美国海空军被视作绝对主力，倒是陆军成为“只适合打扫战场、维持秩序的落伍之师”。

但美国军事学院分析师罗伯特·M·张伯伦少校认为，随着亚太各国军队日益现代化，美国陆军反倒更加重要。他认为，未来10年亚太将成为美国的“利益核心”，美国陆军则是确保维持亚太军事霸权的关键，“‘重返亚太’军事政策的要害集中在美国如何保卫那些亚太盟友上，即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不是为了进攻，而是提升‘战场强行介入’能力，打消地区大国军事威胁美国盟友的目的”。

陆军维系华盛顿“话语权”

按照张伯伦的说法，美国与亚太主要国家的经济高度融合，之间不存在全面军事摊牌的可能，但要是因第三方发生军事冲突则“另当别论”。张伯伦表示，近年来，亚太军事大国加强海空打击能力建设，若美军真用ASB模式对抗势必遭受惨重损失，若美国改以陆军介入，效果就会好得多——美国陆军的各种火力平台能分散隐蔽部署，其暴露的可能性远低于海军战舰和空军战机，更何况对手的反隐身雷达通常难以找到美军的陆上火力点。另外，美国陆军机动性较强的导弹部队更是对手难以发现和锁定的。因此，美国在亚太采用陆军防御作战更加务实可靠。

无独有偶，不久前，美国陆军上将雷·奥迪尔诺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阐述了美国陆军应对未来亚太冲突的设想。他称，陆军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PACOM，太总部）的力量基石，“全世界的十大陆军（拥有国）中有七个位于亚太”，足以证明美国陆军是“维系华盛顿‘话语权’的工具”。

奥迪尔诺批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前主席艾克·斯凯尔顿漠视陆军价值的言论称：尽管海空军的“非接触作战平台”让人目眩，但这些“垂直打击力量”难以歼灭性制敌。“点穴式打击”是海空军远程打击兵器之长，但由于投射空间大、发射距离远，即使地毯式轰炸也难以达到地面部队流水灌地般的作战效果，况且海空军兵器是防空区外发射和非接触攻击，对小型目标、隐身目标、遮蔽目标，容易出现“找不到、打不到”的攻击死角。因此，陆战场的决定性作用短时间内不会改变，信息化战争依然离不开地面作战，这也是战争的根本目的决定的。奥迪尔诺认为，陆军是捍卫美国在亚太战略利益的“力量支柱”。

“压缩应有一个度”

可是“呼吁归呼吁”，从大局上看，美国陆军基本难逃裁减的宿命。历史上看，每场战争的结束都是美国陆军裁员的开始。明年美军撤离阿富汗后，糟糕的国内经济形势必然逼迫政府下手裁员。一战后美陆军兵力从战时峰值时的370万锐减至1920年的26万；二战后由800万骤减至1950年的59.1万。两次缩减比例均高达93%。

冷战后，美国陆军师级作战单位基本被打破，代之以旅级模块化部队。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结束后，陆军规模则将从伊战峰值时的57万缩减至49万。美国国防部2013年发布的《战略选择与管理评审》透露，陆军将在已压缩的基础上再裁减15%-20%，使兵力规模跌至38万。更有退役海军将领表示，“38万也不是陆军兵力底线，美国现役步兵人数完全可以控制在30万以下。”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奥汉隆认为，如果陆军真的被压缩至上述规模，美国国家利益将不得不依靠一支“自二战以来人数最少的陆军部队”来维护。对一个承担有全球责任的国家来说，如此规模的削减已从“适度”恶化为“过度”。美国在这方面有前车之鉴。二战后由于规模急剧缩减，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军能够率先进入战场的只有“史密斯团级战斗队”，后来事实证明这支兵力不足、训练仓促的部队难敌朝鲜人民军的冲击。

越战结束后，美国再次大量削减陆军，结果产生所谓“空虚的陆军”——不仅规模缩小而且纪律涣散，士兵吸毒、斗殴者比比皆是，训练与战备程度急剧下滑。更糟糕的是，越战后的美军认为精力要集中在打大规模战争上，不重视实施反叛乱作战，导致陆军几乎丧失反叛乱作战能力。奥汉隆认为，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屡屡出现“战场不适应症”，与越战后的裁军战略脱不了干系。

按照目前军费紧缩的形势，陆军规模压缩乃大势所趋。但奥汉隆提醒议员，压缩“要有一个度”。如果为了节省军费而无限制裁减陆军员额，五角大楼将可能因没有足够的陆军部队可供调遣而陷入“死机”。



2 012年5月31日,在阿富汗坎大哈省执行爆破任务的美国陆军士兵。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和阿富汗官员表示，奥巴马政府原定的2013年12月31日最后限期有所动摇，不要求在此之前签订2 014年后在阿富汗保留美军部队的协议。

最佳规模为应对“1＋2”模式

有美军退役将领担忧，如果依照《战略选择与管理评审》进行规模压缩，美国陆军30多万人的规模难以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其国家利益，那时只有一个选择，就是龟缩不出。事实上，很多美军高级将领都倾向美军应避免陷入久拖不决的地面战争。前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反思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时就指出，“如果未来美国国防部长向总统进言，要求向亚洲、中东或非洲派遣一支庞大的美国地面作战部队，那就应检查一下这个人脑子是否有病。”

但历史经验证明，当热点地区出事时，美军不可能置身事外。奥汉隆说：“这种事情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当冲突发生时，我们可能不太想参与其中，但有些人却惦记着我们。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和利益，稳妥起见，最终我们还是选择参与。”

未来美国陆军也将面临同样的选择，要在全球范围内干预冲突，就必须保持足够的数量。

在奥汉隆看来，现在美国陆军虽然拥有高技术含量的武器装备，但要对付战场上难缠的对手，仍需足够数量、训练有素的步兵。“在一些难以避免的战场环境下，再新颖、再高科技的武器也不能替代士兵。”他表示，美国陆军人数在印度、朝鲜、俄罗斯、中国之下，仅排全球第五，

因此“没必要做出太大规模的裁减”，否则后果将是“不可预测”和“危险的”。

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约翰·德尼指出，很多分析人士认为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军参与地面作战的可能性降低，越来越多情况下将面临海战、空战、网络战等“非短兵相接”的作战样式。但事实上，美军再次卷入地面作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局势紧张的朝鲜半岛，动荡不安的中东、中亚等地区，都存在随时爆发大规模战争或小规模冲突的可能。“美军应时刻保有干预其中的能力，届时陆军将是责无旁贷的骨干力量。”

德尼和奥汉隆等学者认为，在削减不可避免的前提下，美国陆军兵力的最佳规模应为42.5万-45万，并能应对“1＋2”模式的战争威胁。所谓“1＋2”模式，即能同时应对一场突发的、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以及两场长期的、中等规模的多国维稳作战。

依照该模式组建的陆军部队拥有两个优势。首先，可满足大多数人削减陆军的要求，并使削减后的陆军既能在危机突发初期及时有效应对，又能保持足够数量的预备队，在危机升级后添派增援力量；其次，规模合理适度且经济实惠。从当前局势判断，未来美国陆军与大国军队交手的几率小之又小，“1＋2”模式将足以保证他们在作战中取胜，或至少坚持到后续力量的到来。据估计，按“1＋2”模式组建的美国陆军现役部队平时可保持在40万上下，相比伊拉克战争峰值时将大大减少，所需的相应军费开支也将大大降低。

对华裔募兵宣传力度加强，华裔参军人数渐长

美军中的华裔官兵

特约撰稿员 / 阎滨

随着中国军事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的持续增长，近年来美国对解放军的重视度越来越高，美国军方对具备汉语能力的人才需求也越来越大。作为解决措施之一，近年来美军对华裔族群加大了募兵宣传力度。华裔美军这个此前并不引人注目的群体逐渐醒目。

美籍华人是全球华人群体的一部分。据2008年美国人口统计数字，2007年美籍华人总数有3538407人，占亚裔美国人口的23.3%，美国总人口的1.2%，高于其他亚裔在美国所占的比例。目前美军中大约有5000名华裔军人。

好男也当兵

中国人素有“好男不当兵”之说，儒家文化重文轻武，认为兵者不祥，当兵在传统中国人观念中并非尊崇的职业。

在美国各族裔中，华人曾长期流离于主流文化之外，饱受排华之苦。和许多在旧大陆有过被压迫经历的民族类似，在新大陆，华人对公共事务多持不信任态度。因此，以勤俭守法闻名的华人，传统上并不热衷于参军服役。

尽管华人是在美国开拓西部的过程中才大批涌入美国的，但华裔参军的历史却能追溯到早前的南北战争时代。据近年的研究，有51名华人曾参加南北战争，他们分别于1861年至1865年，在南北两方的陆海军中服役。其中不少人是搭乘美国往来于远东的商船来到美国。其中40人参加了南北两方的海军，充当战舰上的普通水手、厨师或服务生。其余11人在陆军中参战。1861年，一名以“约翰”为名的华人拖着长辫子加入纽约志愿步兵团，他参加了1863年的葛底斯堡战役(Battle of Gettyburg)，并在这场决战中捐躯。

华裔参军史中最光荣的一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前移居美国的华人，绝大部分来自广东省台山地区。因为战前美国苛刻的排华法案，华人社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几乎没有。因此，大多数华人直到1940年仍然是第一代移民，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履行美国公民责任的热情。

华裔不但积极支援母国抗战，“珍珠港事件”后，也踊跃报名参加美

军，是美国参军人数百分比最高的族裔之一。当年华裔仅占全美人口0.1%，但从军参战者超过2万人，约占全美华人的20%。有人为了入伍甚至按中国传统上报自己的虚岁。他们中有近20%在海外阵亡。

欧洲战场上的华裔军人不多，但在战场上表现不俗。有人通过了苛刻的伞兵选拔，随大名鼎鼎的82空降师参加了西西里、诺曼底、荷兰等一系列战役。更多的华裔军人服役于太平洋战场。史迪威将军来华任职时，麾下就有华裔官兵。甚至还有华裔女飞行员在女子航空勤务飞行队(Women Airforce Service Pilots,WASP)服役。

二战中，得到美军最高等级军事荣誉——“国会荣誉勋章”的魏上尉（Cpt.Francis B.Wai），是一位出生于夏威夷的华裔，他1941年入伍，在美军第41步兵师34团服役，1944年10月在解放菲律宾的战役中阵亡。

二战还诞生了第一位华裔将军戈登·钟云（Gordon Pai'ea Chung-Hoon）。这位拥有华人血统的少将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曾在“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上服役，“珍珠港事件”中“亚利桑那”未能幸免，全舰阵亡1100多名官兵，钟云大难不死，后指挥一艘驱逐舰，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中一系列海战。二战后钟云晋升海军少将，成为美国第一位华裔将军。2004年，美国海军用他的名字命名了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中的第43艘舰（USS Chung-Hoon, DDG-93）。

1943年，美国撤消延续自1882年的《排华法案》，既与中国作为盟国艰苦卓绝的抗战有关，也与华裔在大战中良好的参军服役记录密不可分。

从军履历是财富

今天的美军是一支全志愿兵役的军队。薪酬待遇以世界的标准来看尚算优厚，但以美国普遍的收入水平来衡量，当兵就显得付出多、回报少了。除了经济不景气时期，大多数时间里，美军都为完成征兵员额而头疼。因此，美军为吸引年轻人从军提供了种种优厚条件。

美军最低年薪在3-4万美元上下，随着服役时间增长、级别的提高和具备职业技能的增多（美军以奖金形式鼓励军人学习军队所需各项技能，比如说大多数华裔军人具备汉语能力，就可让他们每月多获得一笔语言奖金），军人获得的薪酬也会稳步提高。额外的野战训练或赴战区服役，还能拿到高额津贴。当完成第一期服役合同退伍后，就可获得军方发放的5万余美元的助学金，这对有志完成大学学业的青年尤为有吸引力。

在美军服役期间，军人还能享有一系列福利，如家属住房免费、享受军方提供的品质不错的医疗服务及低价健康保险、贷款利率优惠等，医疗保险这一项对低收入群体尤其具有吸引力。

在美军中服役，特别是技术密集型的海空军，可免费学到很多专业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帮助年轻人将来谋到很好的职业。此外，对新移民来说，服役的经历相当于打开一扇快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大门，竞选公职或去政府部门应聘时，对竞争者来说，从军履历将是笔宝贵的财富。

美军会根据不同时期的战略重点，调整所需的外语语种。冷战时代美军为了在欧洲对苏作战，就曾鼓励官兵学习挪威语、瑞典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越战中则鼓励官兵学习越语。近年来因反恐战争的需要，以及围绕亚太地区的战略调整，当前美军最急需是阿拉伯语人才，其次是汉语、俄语、波斯语。军队在鼓励官兵自修汉语的同时，也格外加大了对华裔族群的征兵宣传公关力度。

多年来，华裔参军的动机和其他族裔差不多，有人当兵为了学一门技术；有人为了助学金；当然也有很少数的人，是怀着理想主义的动机，为了回馈社会而参军。近年来，中国成为美国第三大移民来源地，在美华裔“绿卡族”众多，参军可以加快入籍的速度，这也成为吸引华裔参军的重要动机，不少来自大陆的第一代移民尽管是独生子女，但可能出于拿助学金的动机或仅仅只是想冒险看世界，而报名参军。

美军在很多方面很先进，值得其他军队学习，但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种种问题，种族歧视这一痼疾就会不时发作。近年见报率较高的华裔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廖梓源（Harry　Lew）自杀案、华裔陆军士兵陈宇晖(Danny　Chen)疑被虐死亡案，均证明，即使奥巴马已两次当选总统，但美国在种族平等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2011年10月13日，纽约，美军华裔士兵陈宇晖出殡时的肖像照。他因不堪军中凌辱，于阿富汗自杀身亡，成为当年见报率极高的新闻之一。

不过客观的说，美军固然曾存在严重种族歧视，但随着战后民权运动的努力和美国社会的自我进化，原本的种族鸿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消弭。以军中高级军官为例，上世纪60年代以前，将军队伍中几乎没有非白人面孔，甚至很少有来自中西部的白人或犹太人、东欧白人、拉丁裔白人。来自南方的白人新教徒，基本垄断了高级军职。越战后，美军实行精英人才管理方式，军官晋升程序更加科学、规范，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出现在高级军官行列中。2013年6月美军的军报《星条旗报》报道，经统计，美军共拥有过65位亚裔将军，其中陆军43人，空军12人，海军7人，海军陆战队1人，军医部门2人。亚裔将军中包括21位华裔将军。

美国陆军中第一位华裔将军、傅履仁少将曾回忆，多年以前，他以上校身份出访英国，一名英国军官对他说："对不起，我无意冒犯，但你这样的身份若在英国一定不可能得到晋升。"这很像第一个黑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在回忆录中说的故事，鲍威尔曾假设，如果当年他父母登上的是去英国的移民船，他可能在英军里当上一名军士长，但几乎没可能当上将军。

2006年，21岁华裔女生刘洁以西点军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并代表全体毕业军官学员从布什总统手中接下毕业证书。刘洁是近年来首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女军官候补生。华裔在美军中的影响力正在稳步提升。值得一提的是，刘洁出生于美国，她的祖父是国民党二级上将刘峙，就是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打得惨败的那位不走运的将军。

美国不再享有互联网特权

专访Paul Rosenzweig：

特约撰稿员／游天龙

Paul Rosenzweig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2005年-2009年，在小布什总统政府期间，他曾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助理副部长，分管包括网络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政策制订事务。

今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将互联网域名管理权让渡给非营利组织ICANN后，对ICANN的治理能力和美国政府此举的真实意图，外界有不少声音表示质疑和批评。Paul Rosenzweig4月24日接受本刊专访，针对这些不同意见一一进行辨析。

“我对ICANN更有信心”

记者：历史上，美国政府曾经牢牢控制互联网域名分配和管理的权力，并且多次击退互联网技术精英和国际社会对这一终极权力的挑战，你认为是什么原因让美国政府现在决定要放手域名管理权？

Paul Rosenzweig：我认为这是一个漫长过程的最后结果，这里面涉及到三件事。第一，最终放弃互联网治理权是美国政府自1997-1998年以来的官方政策，此后十多年里，我们一直朝着这个终极目标前进；第二，互联网已经完全国际化了，全球现有大约27亿网民，而美国2.7亿网民仅占十分之一，由美国政府一家垄断互联网治理显然不现实；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ICANN这个机构的运作已经趋于成熟，ICANN拥有一个独立的理事会，过去五年间他们展现了对互联网越来越强的治理能力，从美国政府手中接管互联网治理权，ICANN已经准备好了。

记者：你和美国政府都认为ICANN已经成熟，但我最近拿到一份关于ICANN的《责任感与透明度报告小组最终报告与建议》。读完这份报告，我觉得ICANN不管机构内部还是权力的运作，都有很多问题，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机构。

Paul Rosenzweig：哦，我觉得这仅是一些人的看法。这里面也许

有一点风险，但如果不选择ICANN，而让美国政府继续控制互联网，对于世界上许多人来说已经越来越难以接受，比如中国和印度。所以，目前情况下，我认为ICANN比其他任何国际机构都有更好的条件去承担责任。

记者：你刚才说到其他国际组织，你觉得联合国怎么样？

Paul　Rosenzweig：在联合国框架下，我们不得不创立一个现在还没有的新组织，而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多边组织，也许需要十年准备才能接管这份工作。而ICANN是一个现成机构，相比其他组织或创建一个新组织，我对ICANN更有信心。我认为美国政府继续干下去也会干得很好，但鉴于有太多国家不信任美国政府，要美国政府放弃这份责任，ICANN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记者：但还是有很多人怀疑ICANN的独立性。鉴于这个组织与美国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美国商务部合同的唯一竞标人，他们认为这次权力移交并不是真的移交，只不过是从一个政府机构转移到一个半政府机构而已。你同意吗？

Paul　Rosenzweig：这些事情都发生ICANN创立初期，现在ICANN在加州、瑞士、土耳其和新加坡都设有办公室，其现任CEO是第一位非美国裔CEO，现在的理事会中，非美国裔占了多数。中国政府如果想要检测其独立性，大可以来实地考察，这实际上只是他们在这场争论中的立场而已。

互联网的核心利益就是开放与独立

记者：最近在巴西圣保罗召开了一个互联网治理的国际会议。既然我们有了ICANN，为什么会在另一个地方有一群不喜欢ICANN的人，召开另一个互联网治理会议呢？

Paul　Rosenzweig：不是啊。ICANN也在巴西，作为公共资讯的一部分。我不认为让更多人参与讨论互联网治理有什么问题。

记者：许多美国人担心权力移交的后果，特别是中、俄等国今后在国际互联网治理中将会扮演什么角色。能说说你的看法吗？

Paul　Rosenzweig：ICANN从美国政府那里独立出来以后，我相信这些国家会更乐意参与到ICANN的运作体系中来，他们都可以参加ICANN的政府顾问委员会。这是一个由主权国家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向ICANN提供建议表达看法。如果中、俄的看法有足够的说服力，就

会成为全体委员会的共识，进而影响ICANN的实际运作。

记者：有些人认为美国政府利用其在国际互联网的主导权，做了一些损害别国国家安全的事情。这次美国政府的退出是对这些担心的一种回应吗？域名管理权怎么和国家安全扯上关系？

Paul Rosenzweig：在我看来，域名管理权不过是在地址簿上登记名字的权力，是纯技术的，和爱德华·斯诺登所揭露的那些事情毫不相干，完全不涉及任何国家安全上的隐患，顶多只有政治上的隐患，如果有人要审查这些名字的话（在美国有些特定名字不能用）。现在这块领域有争议，但这不是国家安全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有人宣称域名管理权和国家安全有关，只是想利用斯诺登事件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样做不对。

记者：斯诺登事件之后，有人认为互联网的开放架构已经完了，主权国家会在虚拟空间构建和现实世界一样的国境线。美国政府在互联网治理上的核心利益就是开放与独立，在世界各国不再信任美国政府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或者ICANN如何实现他们的目标？

Paul Rosenzweig：我认为这正是美国政府要将域名管理权转交出去的原因。域名管理权移交给ICANN以后，那些不信任美国政府的人，不管其看法正确与否，都将没有借口再来指责美国政府。而事实的真相是，不管是谁控制了域名管理权，那些想要控制网民接受哪些信息的政府还会继续这么做。他们把对现状的不满归咎于ICANN，在我看来就不是一个准确的评估。



Paul Rosenzweig教授。


巴西圣保罗全球网络治理大会开幕式上，示威者举起爱德华·斯诺登画像，抗议美国国家安全局操控互联网信息。

美国政府不再享有互联网特权

记者：现在美国政府将权力转交给ICANN，那么以后美国将在互联网治理上扮演什么角色呢？他们将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呢？

Paul Rosenzweig：如果权力移交给ICANN一事进展顺利，美国政府也将在政府顾问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和各国政府一样有发言权。他们不再就域名管理事务上享有特别的权力，这是移交的意义所在。

记者：那么美国政府将如何推动自己的政策呢？

Paul Rosenzweig：我肯定他们会参加委员会的讨论，呼吁建立一个开放、自由、透明的互联网，一个对信息流动限制尽可能少的互联网，一个更能保护隐私权的互联网，这都是美国政府要捍卫的立场。其他国家可以有相反的呼吁，比如，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他们要求对信息流动设置更多的控制，就像上海合作组织之前提议的那样。这就是ICANN日常运作的方式。

记者：那么政府顾问委员会就会成为联合国大会一样，一群人发表看法然后再投票？

Paul Rosenzweig：现在ICANN的运作是基于共识，这和联合国大会不一样。ICANN没有谈判和投票，而是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共识性观点，然后这个观点作为建议提交给ICANN，ICANN的理事会最后说了

算。

记者：如果权力移交不顺利怎么办？假如权力最后落到其他国家或者跨政府机构手中，美国政府到时候会怎么做？有没有备用方案在移交失败之后重新拿回互联网治理权的办法？

Paul Rosenzweig：我不晓得有什么备用方案，我也不认为美国政府在放弃了域名管理权之后有什么办法再拿回来，我从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解读美国2015财年军费预算

美国将实施战后最大幅裁军？

特约撰稿员／阎滨

2013年3月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总额为4956亿美元的2015财年国防预算方案。该方案已获得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还有待国会批准。2015年预算案体现一个“裁”字当先，确定将各军种中人数最多的陆军从目前的52万裁到44万，届时美军总体规模将跌至194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空军重点项目不受影响

美军已从伊拉克完成撤军，虽然美阿之间还没能就美军驻留阿富汗问题最终达成协议，但距兑现奥巴马结束这两场战争的承诺已为时不远。同时，因经济连年不景气，美国政府力推预算紧缩政策。美国国会两党未能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未来十年自动减赤1万亿美元的机制已经生效，根据该机制要求，军费预算将扣减5000亿美元，分摊到每年就是500亿美元，2015年是自动扣减的第一年。因此，这份预算方案既要从“战时预算”回归“战备预算”，又要兼顾预算紧缩与保持军力的双重要求。

在大幅度裁军的同时，还将全面压缩军职和文职人员的人事开支与各项福利津贴，关闭一些军事基地，退役一批武器装备、下马一批现有装备的升级改进计划并削减新式装备的采购数量。如美国空军将在退役全部A-10攻击机、U-2侦察机的同时削减F-35战斗机采购数量，未来5年退役全部“捕食者”无人侦察机；美国海军将大幅削减濒海战斗舰采购数量，从原定52艘砍到32艘；陆军放弃M1A3坦克升级改进计划、放弃OH-58侦察直升机升级计划并将其全部退役。

本轮裁军的重点是陆军和空军，美国海军受影响较小，海军陆战队未受影响。但美国国防部预计，如果2016年自动减赤机制继续生效且国会未追加拨款，美军还将进行深度裁军，届时不但陆军国民警卫队和陆军后备役部队将被裁撤数万，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也将难逃“裁军之斧”：空军将退役从KC-10A加油机到全球鹰Block40无人机的80架各型飞机，缩减无人机运作规模，并在2016至2019年减少采购29架F-35战斗机；海军将降低一批水面舰艇战备程度，同时，如果“乔治·华盛顿”号（CVN73）航母大修和更换核燃料所需的60亿美元经费不能到位，只能将其提前退役，航母战斗群数量将从现有的11支降至10支，同时海军还将考虑暂停未来2年的F-35C采购计划；海军陆战队现有的18.2万人将被

裁减到17.5万人。

最近几年美军连续裁减员额、淘汰老旧，甚至不惜将类似A-10攻击机这样历经战场考验、反响不错的武器装备提前退役，其中既有后“9·11”时代，军队建设回到正轨的“消肿”需求，也因为压缩军费的政治压力较大，在军费支出上被迫有所取舍，好钢用在刀刃上，确保重点军备建设项目不受影响。因此，从美军精心确保的预算项目上，不难揣测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据报道，在2015年军费预算案中，美国将投入超过1500亿美元的军费用于新式武器的研发与改进，主要集中于海空军方面。

美国空军的装备研发受到明显倾斜，下一代的“远程打击轰炸机”(LRS-B)和第六代航空发动机是未来军费的“明星”项目。2月26日，美国空军宣布将于今年秋季公布下一代轰炸机详尽的最终版标书并进行招标。该项目被认为是美国空军在这个十年的三大现代化项目之一。美国空军为了确保这类优先项目，宁肯拆了东墙补西墙，提前退役一些老式装备，腾出资金力保这些“未来之星”。

另两个“明星”项目是下一代空中加油机和F-35战斗机。波音公司正在研发基于波音767客机为基础的新一代加油机KC-46A，旨在全面取代目前的300余架KC-135加油机。F-35战斗机项目已经运作多年，因技术问题频发而超支超时严重。F-35这个当初号称“高性能、低价格的”项目，就像“钓鱼工程”一样让美军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追加投资。

美国还透露正在大力投资研发下一代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被誉为“工业之花”，是一个国家科技、工业综合实力的体现。2月24日，国防部长哈格尔宣布建议国会投资10亿美元研发第六代航空发动机。新发动机可用于下一代战斗机，被称作“自适应发动机”，据称能增加飞行员在不同条件下的操作灵活性，可大幅度提高燃料利用效率并降低维护保养要求。此举表明美国决心在关键技术领域力保其全球领先地位。

美军现有的三军主力装备大多研发于福特-卡特时代并采购于里根时代，冷战的结束使装备换代频率大为减缓，很多现有装备早已超出原来预计的使用寿命。目前，很多革命性技术均处于研发阶段，下一代武器系统端倪已现。现在美军面临的情况类似福特-卡特时代，当年在石油危机和经济“滞涨”时代，军费预算捉襟见肘，只得力保重点研发项目，才使上世纪80年代新一代武器系统全面成熟并亮相于海湾战争。也许未来的军事革命就隐含在现在这些研发项目中。

美国陆军变虚弱了吗

根据新财年预算案的规划，美国陆军将被缩减到70年来的最小规模。很多人怀疑这将降低其战斗力，美国陆军恐难胜任全部作战任务。

从2007年起，美国陆军开始改革其传统的以“师”为中心的编制结构，全军10个作战师被重组为40多个旅，承载历史传统的师级番号将只保留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灵活且独立的合成旅已成为美军的骨干。海湾战争中，传统的美军作战师编制大、装备重，部署缓慢，一个师的全套人马车炮部署到位平均需耗时数月，科索沃战争中美国陆军更是尚未就位，战争就已结束。

美军反思后认为，目前的美军地面部队虽有能力战胜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常规陆军，但未来的局部冲突将急促而剧烈，如果地面部队不能在冲突结束前就立即部署就位，那么再强大也无意义。而且在面临危机时，美军往往仅需部署小规模部队，但传统的师级编制里，从一个师调走一小部分，就会影响其余部分的运作。

当整合为3000-5000人的旅级部队后，高度合成的旅人数少、自我保障能力强、易于快速远程投放，这种编制还能改善作战与后勤部队的编制比例。美军长久以来苦恼于作战的“牙齿”不足而后勤保障的“尾巴”太长，2万人的师要比数千人的旅所需的保障多得多，现在编制缩小，冗余的“尾巴”可适度裁减，自然能节省出不少兵力。

在压缩总体规模的同时，美国陆军还重点研发夜视装备、无人作战系统、网络战装备和远程兵力投放系统，这些新技术不但有助于增强美军快速部署的能力，还能弥补人力的不足。同时，陆军特种部队不减反增，编制规模和预算都得到增强，用于支持特种作战的情报预算也得到相应加强。未来的美国陆军将更轻、更小、装备更多信息化智能作战平台、能更快的到达战区，特战能力、网络战能力和情报搜集处理能力都得到强化，因此，仅因兵力规模减少就质疑美国陆军战斗力削减，恐怕并不明智。

随着亚太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在世界格局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本区各国又长期存在主权争端或对自然资源有不同主张，使地区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美国海军自然备受重视。

3月4日，美国国防部发布了《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在陆空军经历裁减时，海军兵力将保持不变。2015预算中海军分得1252亿美元，仅比上年减少4亿美元。美国海军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未来5年将采购1艘航母、10艘核潜艇、10艘驱逐舰、14艘濒海战斗舰，舰艇总

数预计从291艘增加到309艘。

美国国防部计划继续推行“重视亚洲”战略，到2020年底前，将在太平洋地区部署相当于美国海军六成数量的舰艇，在东南亚和大洋洲强化美军的影响力。美国海军目前在亚太地区有50艘舰艇，预计2020年将增至65艘。曾在越战中发挥重要作用、越战后被冷落多年的关岛也将得到持续强化，部署在那里的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将获得加强。

现代战争早已不是兵力多寡定胜负，在信息时代甚至不是火力强弱决高低。与美军相比，很多欧洲国家乃至海湾富国装备的新式飞机、坦克、军舰并不少，但他们在情报搜集与信息处理能力、兵力与物资快速投放部署能力、装备保养维护能力这些软的方面远逊于美军。

从2015年预算草案看，美军虽有大幅裁减压缩，但瞄准技术前沿且很注意各方面均衡发展。这种做法值得其他国家认真思考。

中美关系：不误判比信任更重要

—专访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

记者 / 王衍

7月初，中美高层在北京举行了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去年6月庄园会晤的一周年之后，南海领土争端和中日关系紧张正成为一种突出表象，不断影响着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在建交35周年之际，正面临着一个复杂而微妙的局面。

作为奥巴马政府倚重的重要智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的几位重量级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在6月末专程从华盛顿飞往北京，与中国高层和智库进行了互动交流。在其访华期间，本刊记者约见了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就中国内政和外交问题进行了讨论。本刊将专访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以飨读者。

美国对华决策存在矛盾

记者："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已经提出了一年多。去年9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布鲁金斯学会做演讲时谈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提到"中国不是要搞所谓的'两国共治'，而是优势互补，各擅所长"。你认为目前中美关系是这样的么？

李成：对于中美关系，一方面，中国不主张两国共治，美国也没有这样讲。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关系正是因为不是G2，所以其互补性也不能夸大。

美国前财政部长及两任总统经济首席顾问劳伦斯·萨默斯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可以想象未来的中美关系，在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方面，这两个国家都做得很好；也可以想象由于各种原因，两个国家都做得很不好。但是很难想象（这两个国家）一个做得好，一个做得不好。"

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中美两国有着多方面的互补性或者说是共存性，都是以对方的成功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和动力，而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记者：中国国内有人说，美国不能接受与中国平等的关系，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最主要的阻碍。你同意么？

李成：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美国是很大的一个概念，对中国的态

度上，美国的政党、精英、利益集团、普通人中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不能一概而论。

的确，美国当然有人会有这种想法，认为不能够跟中国平等，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这其中存在西方对中国的双重担忧，一方面，很多人还认为中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国家。尽管中国的领导人和知识界对这个不以为然，但是西方有些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另一方面，西方又觉得中国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经济强国，而经济强大是以其他国家的衰弱为前提的，所以可能会对中国的崛起有反感。

但是，如果你看美国的民调，很多人已经认为中国不只是平等的经济实体，而是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了。如果中国提出的“中国梦”的实现，不以其他人的恶梦为前提，我想大多数人是能接受的。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能给世界经济带来利益或机会，何乐而不为呢？

记者：在你看来，“新型大国关系”应该具备哪些具体且有操作性的内容？

李成：这个概念里面有两个内容有待充实和发展。第一，谈到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大国关系，那么日本算不算大国？我认为当然算大国。所以问题马上来了，中国想发展新型大国关系，那么如何跟日本处理好关系？

第二，世界的政治体系不只有大国，而是由200多个国家组成的，有很多非常小的国家或者中小型国家。在强调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也要对新型大国关系对中小国家的意义有更详细的阐述，应该提高大国关系互动对小国发展和安全的义务和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希望中国增加对世界责任的同时，也有选择性和矛盾性。其既想要中国在全球气候变暖、防止核武器扩散、对其他国家援助等方面增加义务，但又担心中国因此而迅速扩大影响力，而这可能对美国的影响力造成削弱。

美国并未遏制中国

记者：中日关系和中国南海领土争端是目前外界议论最多的话题，这和美国的亚太战略不无关系。你怎么看美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李成：美国的亚太外交政策是在过去十几年当中逐渐建立的，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定型。

美国对亚太事务的关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意识到亚太经济

和安全的重要性。在未来20年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世界最大的五个新兴国家中，有四个在亚洲（印度、中国、日本、印尼）。另一方面，亚洲地区又是容易爆发危险和冲突的地方，从朝鲜半岛、东海、南海，到印度、巴基斯坦、泰国，乃至伊朗、伊拉克等。基于这两个因素，美国重视亚洲是应该的。

但其重视的目的是不是在遏制中国，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由于目前美国支持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很多人认为美国在遏制中国。我认为，应当把防范和遏制区分开来，美国是在防范中国。如果讲到真正的遏制，首先中国不是那么容易遏制的，而且美国目前跟中国经济的互动和互利、对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开放、与中国领导人的频繁交往、奥巴马政府在军事上减少开支等举措，都不是遏制的举动。

记者：有学者提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前一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重返亚洲的阵势很大，但是现在克里并不如此。

李成：很多中国人也许认为，美国现在在中东、乌克兰等问题上介入过多，手伸得太长了，所以可能顾不了中国，这种顾不了也显示出美国的弱点，正是由于这个弱点，也许中国在很多国际事务当中，尤其是在南海、东海问题上可以更强硬一些。我认为，这个观点本身是非常可怕的。

进一步来讲，如果中国认为这样就可以冒战争的风险，就太危险了。美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日本是它的同盟国，即使没有战争，美国航空母舰也在这里反复巡逻。如果中美因为不可控的因素发生战争，那么对两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重创、地区和世界和平的负面影响不堪设想。

记者：我想中方也不会冒这样的风险。今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强周边外交，5月刚刚在上海举办了亚信峰会，11月又要举办APEC峰会。你怎么看这些举动？

李成：这些信号反映出中国正在看似充满矛盾的外交政策中，探索最有利于自己的定位。一方面中国称自己不当头儿，但同时也在组织很多事务，好像也显示要当头儿的样子。另一方面，中国说自己并不把美国赶出亚太地区作为他的外交政策，也希望美国更多介入亚洲来，但是同时会强调，在亚洲区域的事情应该由亚洲人来解决。

外交政策有矛盾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必须做出一些新姿态来证明，自己不仅没有被孤立，而且与周边国家关系良好。但是在这一点上不应

轻易下结论，一些礼仪性的会议或论坛的成功和失败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成功或失败，我们应该注重整体的变化和趋势。

不误判比信任更为重要

记者：中美两国关系越来越受到第三方（例如中日关系和南海争端）的牵制，你觉得中美两国是否能够运用现有机制解决这一问题？这一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李成：我觉得这个很难做到。脱离了全球和区域性关系来讲中美关系，就好像在真空里面谈两国关系，当然会出现问题。而有时候，大国的外交政策会被他国所误导或牵着鼻子走，比如中国被朝鲜挟持，美国被菲律宾或者日本挟持，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我相信中美两国的决策者不会那么愚蠢，两国的精英和民众仍会有很多冷静的思考和讨论。

在中美关系越来越复杂的今天，两国领导人更需要用冷静和智慧来处理问题，要换位思考，不要误判对方的意图。更多的，应该了解和理解对方所处的政策环境和国内因素，而不是被媒体或者某些部门情绪化的反应所影响。例如中国对日本的情绪，现任或前任官员在媒体上的言论，需要将其放到一个大背景下去分析、考虑他当时说话时的受众是谁，不要听风就是雨。

回顾中美两国建交35年来的历史会发现，很多偶然性的事件会给两国带来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领导人应该把对话的大门打开，通过各种对话机制第一时间进行沟通，从而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记者：现实的情况如何？我们看到有时更多地是一个相反的方向，门正在关上。

李成：现在中美领导人之间有热线电话，但是热线电话可以不接，不接等于没有一样。如果将一个国家领导人见另外一个国家领导视为是给对方很大的待遇，是令人遗憾的。今年4月奥巴马访问日本，似乎有意“绕开”中国，中方显示出不高兴。我个人认为，奥巴马完全没有必要“丢掉”访问中国的机会。要知道，这些访问的象征意义往往与实际意义一样重要。

记者：那怎么看待中美之间的信任赤字问题？

李成：我认为想让中美关系讲信任，要求过高了。两国目前有很多的矛盾，甚至可能会被第三方牵着鼻子走而日趋严峻。谈到信任，就像夫妻关系一样，如果提出互相信任的话题，就说明已经出问题了。其实

时间会解决很多问题，有信任就有信任，没信任你再讲也不信任，多讲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如果降低这样的标准，不谈信任，更多地讲尊重——尊重互相的核心利益、决策背景，加深相互的了解而不误判，显得更为重要。我一直在讲，中美如果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话，不一定是由于利益冲突所驱动，而更多的可能是由于误解、误判所引起的。

具体来说，中美最高领导人要在关键时刻把握住分寸，同时两国外交体系要控制情绪化的表现，知识界和学术界或者智库之间需要有多元性的考虑乃至政策的对话机制，军方交流也继续加强。现在最担心的是突发事件，因此中美如何处理突发事件，不走螺旋桨式的恶性循环，非常关键。

美共和党资深众议员意外败选

如果布拉特教授挑落坎托并非是茶党得势的重要标志的话，斯卡里斯的脱颖而出也能说明茶党势力进一步站稳脚跟。

特约撰稿员 / 刁大明

“我会做完弗吉尼亚第7选区国会众议员的剩余任期。但从7月31日起，我将不再担任多数党领袖。”6月1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二号人物埃里克·坎托宣布了这个意料之中的决定。

这场新闻发布会的前夜，在国会山庄打拼了13载的坎托，在初选中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茶党候选人击败，成为自1899年国会两院正式构架党团领导体系以来，首位因未获得本党提名而无法连任的多数党领袖，引发美国政坛地震。8天后，众议院共和党人通过匿名投票方式顺利选举出了坎托的继任者——三号人物多数党党鞭凯文·麦卡锡，而备受茶党拥戴的史蒂文·斯卡里斯则被选为接替麦卡锡的职位。这一切看似按部就班的洗牌，却暴露出共和党政治前途乃至整个美国政治走向的诸多隐忧。

“替罪羊”坎托

4月24日，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作为共和党多数党领袖的坎托率团访华。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谈时，他可谓神采奕奕。访华期间他颇具战略性地表示，认同中美双方的广泛共同利益，美国国会愿与中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多做努力。这次由坎托率领、9位议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于4月18日从美国本土出发，访问了美军太平洋总部以及日韩两国，刚好与奥巴马亚太之行重叠，大有检视行政当局亚太战略的意味。

事实上，站在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背后多年的坎托早已不甘心充当背景角色，关于新一届国会中博纳退休、坎托接任议长的传闻在华府不绝于耳。从债务上限到政府关门，每次危机中的博纳都会被指责为无法有效整合共和党阵营，坎托则被赋予众望。甚至连博纳一家在佛罗里达海边购置度假别墅的消息，也会被解读为坎托上位的前奏。

但6月10日，坎托跌倒在了迈向新国会的第一个门槛上，毫无名气的学院教授、里根经济学的笃信者戴维·布拉特以55.6%比44.4%的悬殊结果断送了坎托的议长梦。

根据5月底的竞选财务数据显示，坎托自2013年1月以来为了准备

连任已投入了486.7万美元，而布拉特仅开销了12.3万美元。虽然没有研究证据支持财政投入越多就越容易当选，但与坎托的在任者优势相比，挑战者所聚集的有限资源颇有以卵击石之感。对此，美国媒体第一时间给出的分析是，布拉特揪住了坎托推进移民改革的把柄大肆渲染，最终导致了民意的松动和倒戈。

作为国会议员，代表选区利益、制定国家政策，无疑需要在选区和国家层次之间保持平衡，而国会领袖的平衡木技巧更是尤为关键。坎托率团出访亚太的时间段，正是需要下基层的“议员选区服务时间”，而作为领袖的他却撇开选区里士满，造访了地球另一端的北京。如此情形，在坎托那里不是第一次。长期以往，坎托的忽视必然酝酿了民意的疏离。

当平衡木技巧的难度遭遇持续而激烈的民怨时，坎托最终失去了掌控力。按照美国国会研究巨擘理查德·芬诺的说法，选民对国会的看法本来就充满了矛盾与对抗——一方面选民认为国会整体除了党争之外毫无作为，另一方面却觉得自己选出的议员尽职尽责。在反现状、反在任者的茶党思潮的影响下，弗吉尼亚保守派选民对华府在任者充满了愤怒，而挑战者成功地将作为领袖的坎托塑造成了整个国会的代表而非选区的议员，这一策略的效果是致命的。

根据统计，本次初选的投票率高达65.022%，而2012年的数字仅为47.719%。中期选举年的投票率反而高于大选年，足见选举中选民希望更多参与、谋求改变的动机。选民期待改变的是当今国会以及华府无所作为的乱象，而坎托在这场选举中变成了整个国会的“替罪羊”。



共和党领导层洗牌

在宣布辞去领袖职位的记者会上，当被问及如何解释这场意外败选时，坎托的回答是："我觉得还是把政治分析留给你们吧。"这次选举意外及其引发的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的洗牌显然会产生影响，但也是短期内难以判定的。

坎托初选惨败的第二天，博纳特别调整日程、到钟爱的意大利餐厅吃了午饭，但众议院共和党的三号人物麦卡锡却闷闷不乐。虽然事实证明麦卡锡将成为坎托辞职后的最大受益者，但接替坎托的职位或许来得太快了一些。斯卡里斯则对坎托的惨败有备而动，在选举结果出炉当晚，他打给共和党同僚，游说他们支持自己竞争党团领袖。

麦卡锡和斯卡里斯的组合，也是美国国会历史上资历最浅的一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回顾麦卡锡之前的多数党领袖，迪克·阿米、汤姆·迪莱以及坎托从当选到就职都用了10年，博纳也熬了20年。如今麦卡锡只用了不到8年就当上了党内二号人物。而共和党党团的核心层呈现出持续低资历化的趋势，进而其立法导向势必存在更为极端、更少具有稳定与一贯的可能性。

2007年，来自南加州的麦卡锡选入国会众议院，当年坎托已成为党团首席副党鞭，而保罗·瑞恩也当上了预算委员会首席成员。不过，资历的差距丝毫没有妨碍他们的密切互动，三人很快就形成了所谓的"新枪手"势力，为共和党中生代发声。2010年共和党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后，三人获得更大施展空间：坎托和麦卡锡跻身党团领导层，"技术控"瑞恩则坐上了预算委员会主席的宝座。

相比之下，接替麦卡锡的斯卡里斯比麦卡锡闯荡华府的时间更短，但这位2008年当选的路易斯安那人却很快崭露头角。不过他选择了与麦卡锡融入主流派不同的道路，即茶党势力。作为共和党党团内以保守立场著称的"共和党研修委员会"主席，斯卡里斯充当着茶党阵营的急先锋，2013年10月，政府关门危机也是因他拒绝为奥巴马全民医改提供拨款的一条修正案而起的。

谈到麦卡锡和斯卡里斯的共同点，可谓左右逢源的软身段。相比于坎托的贵族气儿，苦孩子出生的麦卡锡在上层路线和群众路线上都能游刃有余。早在2010年，麦卡锡就积极配合博纳完成了《向美国宣誓》的选举战略，进而帮助共和党翻盘。斯卡里斯一方面会坚守茶党立场，另一方面仍能奇迹般地与博纳保持极为良好的互动关系，甚至还会在休会期间与民主党议员推心置腹地聊聊家庭。

如果布拉特教授挑落坎托并非是茶党得势的重要标志的话，斯卡里斯的脱颖而出也能说明茶党势力进一步站稳脚跟。这场星星之火自2010年进入共和党政治以来，始终以长期在任的圈内共和党政治精英作为攻击目标，并在随后的两个选举周期中扮演着搅局者的角色。

2014年选举中，茶党并未如期在初选内战胜更多在任者，目前看最大的新闻就是坎托的落败和密西西比州资深国会参议员萨德·科克恩的悲观选情。不过，如果将视线拉伸到2016年，目前摆在台面上供公众谈论的共和党可能人选却多数贴着茶党标签。随着茶党逐渐上升为共和党的重要主导势力，其政策议程正在蚕食着共和党关于经济、军事以及社会议题的传统。而茶党优势的扩大，极可能导致美国政党政治的新一次剧烈重组。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坎托遭遇抹黑的议题，即移民改革。不可否认，布拉特关于坎托支持移民改革“危及美国国家利益与安全”的说法扮演着“一招制敌”的绝杀角色，这也验证了移民议题在共和党草根阶层中的反对程度之深。

外界普遍认为，奥巴马第二任期极可能推进移民改革，而坎托之后的共和党人想必不会轻易触碰该议题，这就可能造成奥巴马最后两年在分立府会状态下针对移民改革的高烈度对抗。如果未来两年的府会斗争以移民改革为主题展开，其他领域的政策立法也会相应受到挤压，其对外战略与政策领域的所谓“内向化”趋势也会日趋明显。

你不知道的美国政党政治常识

文 / 孙兴杰

美国衰落了吗？这个问题恐怕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尤其是美国两党争斗不断，以至于联邦政府关门十几天。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政府关门歇业，其实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很小，但是在中国媒体上却是广泛关注的焦点，这就是中美之间的差别所在。

中美之间正在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但国人对美国政治的了解，还是难免脸谱化和标签化。一部关于美国政治的常识读本就尤为重要了，笔者手中这本《探访美国政党政治：美国两党精英访谈》就是这样一本不可多得的常识普及读物。以访谈的形式，让美国的政治精英来告诉读者，美国政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常识，是消除误解和神话的一剂良药，美国的民主政治既不是人类的乌托邦，也不是权钱勾结的沼泽地，而是追求个人自由与幸福的一套制度设计。在过去的200多年之中，它经历了挑战（南北战争），也在不断改革，这套试错的机制当下出现了不少问题，但不意味着它就一定要错下去。

两党政治陷入机能障碍

这本访谈录成书于美国两党恶斗的时期，不仅预算案通不过，而且很多关键职位的任命也是一拖再拖，比如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局长、环境保护局局长等。美国两党精英普遍的共识是两党之间的斗争已经太过分了，已经影响到了政治的正常运转。

本来两党政治应该是比较稳定的，要比多党政治更容易协调，但是当两党的政客彼此没有了交流，只是为了斗倒对手而采取不合作的姿态，那两党政治就变成了一场有我无你的搏斗。寻找两党政治的机能障碍，也是这本书的重要主题，这一现象未必说能够打破中国人对美式民主的崇拜，毋宁说让更多的读者认识到美国政党政治的特征和内在逻辑。

两党的恶斗代表着美国政党政治的衰落吗？未必如此。多数受访者都有今不如昔的感觉，上个世纪美国的总统福特与民主党参议员是邻居，两家经常互相送孩子上学，这只是两党合作的一个缩影。现在很难想象奥巴马和共和党议长博纳能够如此亲密合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两党政治已经到了触底反弹的转折点。

一是总统大选中，共和党连输两局，如果共和党继续采取极端的姿态，很可能输掉2016年的总统大选；二是民众对两党之间的恶斗已经厌倦了，新的传播手段出现，大大改变了政治生态，两党都需要复兴自己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如果两党只是为了彼此掐架，那选民可以保持政治冷淡，或者寻找别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于目前的现状，两党精英也都有反思，非常有意思的是，受访者们都在为自己的政党说话，学者可以除外，比如宾州大学的学者拉瑞·巴克尔对美国当下的政党现状进行了反思，而不是指责哪个政党。民主党连续赢得了两次总统大选，还在参议院占据多数席位，奥巴马刚当选时，民主党还占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小布什之后的共和党可以说在选战方面一败涂地。

民主党的受访者认为，共和党只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罔顾美国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民主党算是草根政党，代表了年轻人、少数族裔、妇女等集团的利益，也就获得了这些人的选票。而共和党人则指责民主党的大政府主义侵犯了个人自由，穷人、工会组织等中下层代表着一种民粹的倾向。

两党政治出现机能失调的原因很多，这本书也算是美国政治精英的反思录，归结起来可能有以下这些因素。首先是美国两党政治从原则政治向现实政治转变，什么是原则政治呢？就是按照宪法或者理想的状态，两党之间应该互相合作，互相监督，共同治理国家，但是现实政治却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

这种转变破坏了两党合作的气氛，尤其是在奥巴马上台之后，共和党为了反对而反对。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奥巴马是个黑人总统有不小的关系。共和党人代表着白人男性精英的理念，作为首位黑人总统，的确打破了美国政治的玻璃罩，引起了社会心理的反弹。

半个世纪之前，美国还在种族隔离的泥潭之中，现在美国有了黑人总统，与之相伴的是美国政治地理出现了重大变化。南北战争之后，南方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北方是共和党的基地，这一分野随着民权运动而发生逆转，民主党得到了黑人的支持，而南方白人对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越来越不满。

现在共和党成为小农和大资本家的联盟，而民主党则代表中下层，从地理分布来看，东西两岸是民主党的天下，有技术、有知识的专业人士也支持民主党，而中部地区则是共和党的票仓。

随着选票地理的变化，两党政治渗透了更多的基层、族群色彩，在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也就难以达成妥协。而人口结构的变迁更是加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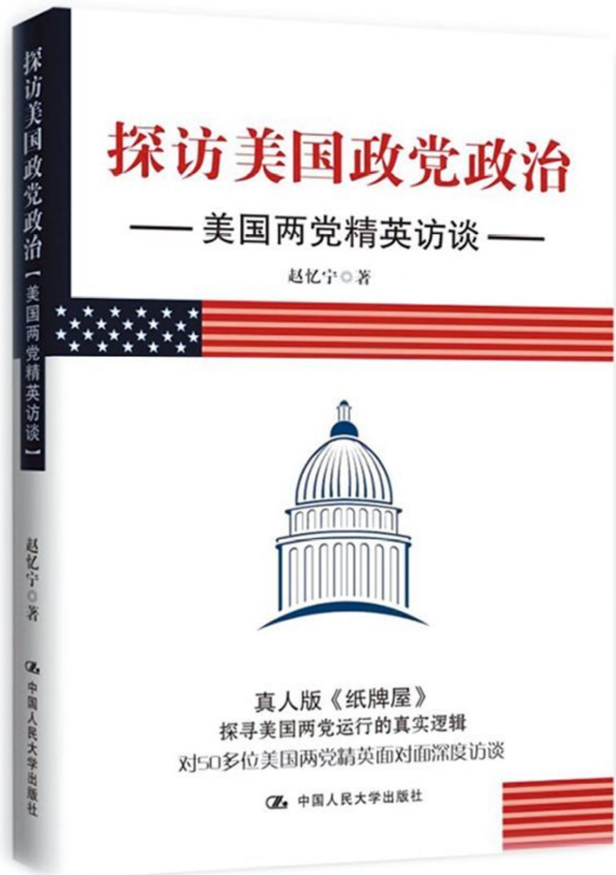
了两党之间的裂痕，拉美裔、非洲裔的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共和党所代表的白人、清教徒以及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意味着选票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会下降。

媒体的多元化使政治观点也日益极端化，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主要是两党中极端派的观点，比如共和党中的茶党分子，只有极端的观点才会引起广泛的关注。选举本身变成一场在媒体上的战斗，竞选费用的大头都花在政治广告上，媒体已经嵌入到美国两党政治的血液之中。

奥巴马赢得大选也是顺应了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通过网络募集资金，也就是“众筹”的模式，既获得了青年一代的选票，也得到了资金。可以预见，得媒体者得选票。

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了发言的机会，政治也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你不关心民众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得不到支持。美国两党的纷争，尤其是在选举期间更是如此。

每个竞选者都需要在3G＋1A的问题上亮明态度。3G就是宗教信仰、同性恋以及枪支，而A则是堕胎问题。文化问题已经变成了划定两党的界线，奥巴马在任期内一直想控制枪支，但是无果而终。两党之间的纷争已经不再是政治原则问题，而是生活政治，这是美国政治过度成熟的结果吗？



政党政治衰落了吗？

政党是现代政治游戏的关键一环，美国的政党可以说独具一格，与“先锋队”式的政党有着很大不同，因此，外人很难理解美国这种为选举而设立的政党。没有党纲、没有稳定的党员、也没有严格的党纪和党组织，相比于其他国家的政党，美国的两党实在有些脆弱。加上最近两党的不合作，关于美国政党政治的衰落之说也就有了更多的依据。

本书中对金钱于美国政党政治的侵蚀讨论得非常多，尤其是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取消了对金钱间接参与政治的界限，理由是保护言论自由。美国选举中有“硬钱”与“软钱”的区别，捐给候选人的钱都是有最高额限制的，其实也是限制富人对选举的操控，此外还有大量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它们可以通过打政治广告的形式参与到选举之中。

因此，美国的选举费用不断攀升，总统选举更是以十亿美元计，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选举是一美元一票，金钱主导了政治。金钱

对政治的渗透的确是个问题，但是仔细考察一下，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奥巴马筹集了数亿美元资金，但多数都是小额的政治捐款，也就是说广大的选民可以参与其中。

另外，相比于美国的经济总量、联邦预算来说，选举的费用并不是太惊人。而且，美国政党的开支非常小，两党的全国委员会也不过只有上百人在工作，日常的运营成本是非常低的，总体来说，竞选有些昂贵，但是政党运行的成本并不高。

从这本访谈录中可以看到美国的政党只是美国政治体系之下的一部分，政党没有主导政治，毋宁说是政治的一个螺丝钉。美国的基本权力架构在三权（立法、行政与司法），媒体扮演了第四权的角色，政党可能算是第五权。

美国的政党只是政治家的工具，且不说两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只是服务于竞选活动，等候选者当选为总统之后，党主席要听命于总统，单单资金的分配就可以看到，两党提供的资金是非常有限的，总统大选的资金主要靠候选者个人筹集。相比其他国家的政党，美国的两党更像皮包公司。两党日常运营过程中，很多人都是兼职的义务劳动者，包括首席财务官并不拿工资。由此可见，美国的政党是多么的“业余”了。

以列宁主义式的政党来比照美国政党，美国的两党的确太不严肃了。但是比照美国的政治传统，当年那些开国元勋们对党派政治保持着戒心，因此，两党连正式的诞生日都没有。这就是美国政党政治的特色，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一个弹性、开放、透明的政党体系，只是民主与自由的工具而已。

美国不反对中国成为海洋强国

——专访《红星照耀太平洋》作者吉原恒淑

记者 / 王衍

“一个国家意图发展海权便意味着永远进攻，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尽管中国一再强调其海洋发展的和平夙愿，然而美国战略界却早已对其定下基调。

如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陆伯彬（Robert Ross）所言，五年前中国的海军还不能跨越西太平洋、不能抵达亚丁湾，不能进行长时间航行，但是现在能经常看到中国的舰船经过钓鱼岛，进入西太平洋；穿越第二岛链，进入南太平洋；在黄岩岛作业，保护靠近越南海域的石油钻井；同时潜艇、导弹和战机等技术能力也大大增强。因此，了解近年来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把握中国海洋战略的基本逻辑，是客观理解并准确预估未来亚太地区秩序的一把钥匙。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兼有台湾和日本血统，研究中国海权多年，外界认为其对中文文献的掌握以及对中国历史现状的理解，远甚一般的“中国问题专家”。据吉原介绍，中国周边海域是如今美国战略界最为关注的区域之一。

9月底，吉原恒淑赴北京推广其中文版新书《红星照耀太平洋——中国崛起与美国海上战略》，其间接受了《凤凰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就美国战略界如何看待中国日益扩张的海洋战略和军事部署、中美在海洋问题上的安全矛盾如何化解进行了探讨。（注：吉原观点仅代表其个人，供读者了解美方视角，不代表本刊立场）

航母可成为中美合作的平台

记者：美国战略界如何看待在近两年中国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

吉原：如果以历史的眼光去看中国，你一定不会对中国想要成为一个海洋强国感到惊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的历程，已经使其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当中，所以需要从一个广阔的角度去理解“海洋强国”战略。

对中国来说，越来越多的（不一定和军事有关的）海外利益，都为中国保护海外公民和其自身利益提出了与日俱增的要求。例如关于中国对公海的商业运输路线的保护，这关系到中国与海外市场的链接；又例如不断发展的渔业，这将成为中国人餐桌上越发重要的一项内容，同时

渔业在很多方面都是重要资源，而这些显然都来源于海洋。另外，海底资源也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之一。中国有合理合法积极追求海外利益的需要，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不认为美国战略界会反对中国成为一个海洋强国。

作为学者，我希望见到中国更清晰的海洋战略。中国目前的目标比较清晰，但如何达到那样的实力，短期、中期以及长期有怎样的目标？又打算用怎样的方式去达成其目标？这些问题仍不清楚，或没有清晰地展现出来。所以我期待着中国领导层能够思考这些问题，也让我们明白中国如何真正成为一个海洋强国。

记者：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受中方邀请参观了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你如何看待中国航母的作用和能力？

吉原：这取决于中国领导层打算如何使用它。航母是一个非常惹眼的平台，它可以作为实力的象征，也可以作为友谊的延伸。

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我也认同航母是一个国家的国威象征，它让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里最后一个拥有航母的国家。但同时，航母也可以参与一系列和平时期的活动，无论是防御海岛还是从维护公海秩序、保证海运线对所有人开放等。中国目前打击海盗的行为也是其中之一。

但航母同时是一个具有模糊性的事物，因为它是一个极具威胁的军事武器，可以控制海权，在南海，乃至台湾或者钓鱼岛出现危机时起到一定作用。虽然我认为在这些方面（航母）能起到的作用非常弱。

谈到操作层面，擅长使用航母的美国花费了几十年时间去掌握如何使用航母并培养相关人才。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我想中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做到，这是一个大挑战，但中国有技术、有耐心，也有资源去做到这些。所以我更把航母视作一个中美两方合作的平台。对我而言，航母项目下一步的进展，也是衡量中国对成为海洋强国到底有多认真的方法。

航空识别区争议背后

记者：根据你对中国的海洋权益和海洋军事的多年研究，现在中国的海洋军事发展如何？

吉原：防御外界介入仍然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特别是海军现代化的一部分。正如我在中文版新书《红星照耀太平洋》序言中说到的，书中

对中国海军的研究已经落伍了，那是4年前中国海军的情况。现在中国海军在反舰巡航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反辐射武器和水下作战等方面越来越强大、质量上更加优越并且数量上也更多。导弹可以从舰艇、潜艇、飞机和陆地上发射，发射的导弹还包括反舰导弹。这恰好形成一个范围圈，而这个圈子很不凑巧地与第二岛链重合了。

近年来，中国海军发展各式各样的平台，部署大量的驱逐舰进行多种任务。有传闻说中国已经建成了巡洋舰。在驱逐舰领域，中国也进行多系列生产，包括护卫舰、潜水艇、快速攻击机等一系列武器，现在还有了航空母舰。

在这种全新发展中，我思考的是，这些装备会如何互动？我的同事、美国海军战略学院战略与政策研究系教授詹姆斯·霍姆斯（注：《红星》一书的另一位作者）认为，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台海危机以来制定的反介入策略像一把雨伞，在这把伞下，中国的武装力量可以顺利运转。这意味着，把美国限制在外，又有了平衡发展的舰队，就算不是全球，起码可以在地区做非常多的事情了。

记者：你如何看待中国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有声音认为，中国将来也会在南海建立同样的识别区。

吉原：我认为中国宣称建立防空识别区是一个海岸国家的权利。它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因为商业飞机需要向中国航空有关当局提交航线信息。关于航空识别区的问题显然在于时机和范围。中国宣布建立防空识别区以及范围时，正值东海局势紧张时期，其中包括钓鱼岛争端，所以国际社会感到惊讶。

防空识别区的建立就是为了保证海岸国家的安全，同时也尊重飞行自由。外国飞机有充分的理由飞越这些区域，无论是出于商业还是军事目的。那么，只要中国尊重外国飞行器的飞行自由，我不认为这会成为一个问题。不过，目前有证据显示中国干涉商业航线。

关于在南海建立防空识别区只是时间问题的辩论，其实质还是要看中国能否按照国际通用标准来操作其防空识别区，当然，如果它覆盖争议区域，那不可避免会产生争议。问题是，中国准备好去做这些舆论上的牺牲吗？又准备把防空识别区设置到怎样的范围？中国也许会扩大其防空识别区，但是现在中国还没有这个能力，不过其终归会有这个能力。



２０１４年6 月２４日，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海口舰抵达夏威夷，参加２０１４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事演习。始于１９７１年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是国际上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联合军演，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参加该演习。

中美应理解规则和对方角色

记者：你曾经说过，如果中美之间发生战争，挑起方一定是中国。你如何理解最近外界所评价的“中国在军事领域对美国态度越来越强硬”？

吉原：美国军事力量已经在亚洲存在了70年，这不是新鲜事；一直以来，中国抗议美国对其进行所谓的监视行动触犯其安全利益，也不是新鲜事。新的改变是，中国正在变得越发强大。

因此，我认为将来会看到更频繁的公海对峙和空中对峙，因而有更多可能产生危机。所以中美双方需要研究出如何合适应对的方式方法。但我要提醒的是，在提高海洋事务的合作时，中美双方应理解规则和对方的角色。

目前中美之间最大的战略分歧在于，中国如何看待外国船只能否在其专属经济区活动。美国关心的是航行自由，其立场是，为了保证全球秩序，保证在这样的秩序下美国能通过其硬实力，不被外部力量阻碍和破坏共识，从而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哪怕这让中国感到不安。

中国则与美国有着巨大的战略鸿沟。从历史层面讲，自1840年开始，对于中国的威胁总是源于海上，中国的百年国耻也始于海上。这导致中国在海上安全方面存在历史性的恐惧以及变得强大的强烈动机。从

现实层面讲，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中国学者提出的历史权利说，即中国在历史上对某些海域存有主权，并没有解决外国船只能否在其专属经济区活动的问题。中国总是对美国或其他国家在周边海域的活动表示不满。

因此，我们需要用平缓的方式解决操作层面上的近海对峙，防止其从一个战术问题变成一个战略问题，最终使两边的战略分歧不断加深。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接下来应当如何处理与美国在南海的矛盾？

吉原：对于美国船只和飞机在中国海域的出现，中国学者总是打比喻说，如果中国的船只在美国西海岸航行会怎样，中国的飞机太靠近美国的国土会怎么样。我的观点是，请自便。

为了维持全球秩序，航行自由是必须的，对于目前的国际秩序来说，要接受这样的代价。事实上，美国已经在展现这一点，我知道有中国的船只在夏威夷附近作业，美国也许不喜欢，但是还是接受。历史上来说，当苏联这么做时，美国也不喜欢，我们用战机进行拦截和监视，但实际上这是用非常职业的方式处理，保持对对方的尊重。而中方有时会偷偷派间谍船去监视一些活动，哪怕有中国海军被邀请参与活动。从美国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随着中国海上实力的增强，中国尝试采取先发优势，在不给美国任何理由去为了盟友进行干涉的情况下进行改变——前进一点再后退一点，但从来不前进太多从而导致局势升级。由于美国不想在领土问题上采取立场，所以上述前进与后退的底线并不属于美国，而属于该地区的盟友们。这也是美国所担忧的。美国希望支持它的盟友，但是美国也不希望盟友采取可能激怒中国的行动。我觉得美国现在处在一种外交战略捆绑中，中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至于中国如何让其海上的邻居感到安定，我认为美国在二战之后的经验可以借鉴，那就是在发展自身硬实力的同时，也通过联合国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构给予其他国家机会，对自己也做出限制。

军事实力较量不是数船只多少

记者：那么，美国会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吉原：在我看来，日本在战略上意义越来越重要。如果美国想要更进一步，除了日本的美军基地，美国部队还能去哪里呢？关岛不够大，

夏威夷又太远了。这样看来，盟友政治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认为首先要确保基地在日本，在那儿通过观察中国的先发优势，才能知道接下来如何进行有效的军事部署；其次是军事力量部署的多样化，美国需要有能力灵活部署各种设施，既有能力回撤到后防，也可以派遣到第一岛链周边。这就是对中国的反介入战略有力的回应。我认为战争就是一个不断互动的竞争。

记者：我知道很多人在比较中华神盾和宙斯盾。你会如何比较目前中美两国的军事实力？

吉原：做军事对比是很困难的，不过我可以用一些框架来思考这个问题。框架的核心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力量，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力量存在，这会让军事实力在目前的状况下，主要服务于中国周边的战略防御。如果仅仅用数字来比较两边实力，如各自有多少舰艇，舰艇有多强大，美国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领先中国。

但更重要的是从战术角度去考虑。即便美国有290艘舰船，但可能同一时间内只有100艘能够被调遣。你需要先定义这些船的状况，然后再算上世界上需要舰船的热点地区，比如朝鲜、波斯湾、克里米亚地区，因为乌克兰和北约同样需要。所以当美国需要分散武装力量时，中国的优势就体现出来，它可以集中兵力在一个地方。这才是真实的比较。当然在某些领域美国仍有优势，比如其有最强大的潜艇战斗群，而这方面中国又特别弱。

美国或许可以在危机发生时搜寻各种力量，但问题是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所以军事实力的比较远较数船只的数量更加复杂。

解密第四次习奥会

这次习奥会不仅再次擦出中美不断博弈的火花，也将中美在亚洲以及全球秩序中的微妙关系带入了新的阶段。

记者 / 王衍

作为“当今世界最根本的基石”，随着11月中旬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访华，中美关系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第四次习奥会的上演，被看做是去年加州“庄园会晤”的“北京后续”。这次会面不仅再次擦出了中美不断博弈的火花，也将中美在亚洲以及全球秩序中的微妙关系带入了新的阶段。

奥巴马获得“最高礼遇”

奥巴马此次亚洲之行在北京停留三天，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并对中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相较于2009年其担任总统以来的首次访华行程，这一次显得更为顺畅。

早在9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访华为奥巴马此行打前站时，一位中方不具名外交官员就向《凤凰周刊》记者透露，赖斯的态度可谓不同寻常的友善。赖斯当时强调，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的“优先考虑”，并称，奥巴马将11月的中国之行视为美中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此次奥巴马访华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欢迎仪式，场面隆重盛大，尽显中方的重视。“此次给予奥巴马的外交礼遇是历届美国访华总统中最高的，堪比当时尼克松访华。”上述外交官员称。然而，相比5年前在国内的风靡程度，如今的奥巴马可谓身陷泥沼。在其出访亚洲前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其所在党派民主党惨败，而在野的共和党7年以来首次赢得国会议员的多数控制。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届任期中，奥巴马的亚洲外交智囊团较之前一任期明显弱化。这在中美战略圈中已经形成共识：相比5年前提出“重返亚太”战略的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现任国务卿克里更倾向于促和中东事务；多位素有“中国通”之称的外交官员接连退换，现任官员无论在处理最近两年剑拔弩张的中日关系还是南海争端，都体现出对亚洲事务的不熟悉。对此，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一度呼吁，“我们需要少谈些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这是美国国内提出的，但并没有采取实际措

施。”

“（目前中美）不会发生太多事情，因为中国已经决定，他们有两年时间来挑战极限、改变既成的事实、给新一届（美国）政府划出一条新的基线。”对于此次习奥会，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位资深亚洲外交官的话如此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此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也表示“习近平不想向奥巴马送上任何大礼，因为他知道奥巴马（未来）无法给予任何回报。”

不过，面对中美复杂多变的双边关系，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认为，双方应看得更为长远，美国应充分利用目前的交流展开对华合作。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他略显担忧地说，“中国不应把期待放在两年之后，谁又知道下一任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如何呢？”

此次奥巴马访华期间，另一亮点是11月10日其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做的主旨发言。当奥巴马提到“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崛起”以及延长中国留学、旅游和商务签证时，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面对早前国内有舆论质疑自己“对华软弱”，奥巴马在18分钟的发言中，极力强势表现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领导力以及未来对亚洲的影响力，“无疑，当美国来到亚洲时，它仍然保有全部承诺。”“美国不仅是到亚洲进行检查，我相信我们会共同分享亚洲的未来。”



2014年11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人其后开始举行小范围会谈，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中美艰难“求同存异”

虽然“中美关系是今日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但两国在亚洲的博弈在此次APEC期间却显露无遗。

在经济领域，11月12日中美宣布在信息技术贸易（ITA）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双方同意大幅削减全球各地电子产品的关税。这项谈判此前僵持了近18个月。这一突破被美国媒体认为很可能是奥巴马访问中国取得的最实在的经济成果。

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机制与美国推进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机制上，中美之间的较量由隐性暗战变得更为激烈。10月8日，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中国发展FTAAP的宏伟抱负；同日，美方在驻华大使馆举行了TPP部长级谈判。10日，奥巴马甫一抵京就举行了另一轮TPP首脑会议。

不过，据日本《读卖新闻》认为，会议声明“各方都在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会议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其潜台词是原定2014年年内取得初步协调的目标已经无法达成，新的目标时间也没有确定。

在安全领域，中日关系出现解冻信号，美国国务卿克里公开表示“美国欢迎并赞赏中日关系目前的进展”；朝鲜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公开表示将与美国共同努力；南海问题上，中美两军建立了信任措施机

制，制定两军在空中和海上遭遇安全行为的规则以及海军水面舰艇接触行为的参考规则；阿富汗问题上，据悉中美阿将召集一个三方对话，推进其安全进程。

亚洲之外，中美也在全球领域寻找更多的合作议题，增加双边关系的良性互动。尤为明显的是气候变化和打击恐怖主义。

10月12日，中美双方在北京发布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奥巴马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议，而且是“中美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在中美公布的减排计划中，美国计划到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较2005年整体下降26%-28%。中方首次正式提出2030年中国碳排放有望达到峰值，并将于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达巍向《凤凰周刊》记者指出，“美国努力推进气候变化与中方合作，中方也希望在与此相关的清洁能源上得到美国的帮助，例如美国可否向中国提供更好的清洁能源技术，未来是否可能向中国出口液化天然气，以帮助中国更少使用煤炭等。”

此次习奥会中，中东反恐问题也是美方重要推进的内容之一。从目前形势来看，一方面，国外恐怖势力关系到中国新疆地区安危，并且也有少量中国青年被极端势力“伊斯兰国”（ISIS）感召而去；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中东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东地区的稳定关乎中国海外利益。长久以来，由于美国始终未将中国新疆地区的东突分子列入其反恐的名单中，中国一直反感美国在反恐行动中的“双重标准”。但在多名受访学者看来，目前中美双方对这一合作是清醒的。

10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中东问题国际会议中，美国中东和平进程特使马丁·因迪克（Martin Indyk）表示，“目前中国向中东派军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因此，中美在中东问题上能做的包括反恐信息互通、中国不要让其公民参与ISIS、以及中方是否有能力帮助国际社会切断ISIS的资金来源。”

在10月12日与奥巴马的会面中，习近平坦言，“中美是各具特色的国家，我们既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又需要妥善处理一些敏感问题。”

在香港问题上，奥巴马强调，可以毫不含糊地说，美国没有介入香港近期的示威活动，并称香港发生的问题，要由香港人及中国人民处理决定。习近平对奥巴马指出，香港发生的占领行动是违法事情，香港政府依法保障社会安全，外国不应干预，并称，香港特区政府亦要保护外国企业。



2013年6月8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会晤开始前，习近平和奥巴马在风光秀丽的庄园内散步，在轻松的气氛中交谈。散步途中，奥巴马将加利福尼亚州红杉木椅赠送给习近平。

“新型大国关系”尚存分歧

和去年6月美国习奥会的“衬衫会面”一样，此次在北京的会面，两人仍然选择了轻松且有意义的方式。11月11日晚，中美领导人在中南海共同夜游，据大陆官方媒体报道，两人在中南海瀛台桥凭栏远眺，并在迎薰亭茶叙畅聊。

相比在加州庄园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这一次习近平选择在中式的亭台楼阁中向奥巴马介绍瀛台历史。他表示，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进道路很重要。

在这次夜谈中，习近平还强调，现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是清楚的，我们不能让它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满足于早期收获，还要继续向前走。“我们要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以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的精神，不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10月12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奥巴马举行长时间会谈后，提出双方要朝着6个重点方向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据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奥巴马回应，美方愿意同中方一道共同为此作出努力。但此前，据记者观察，在中美公布的所有官方消息中，美方从未明确提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据《纽约时报》披露，在今年7月中美官员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曾经警告，如果中美无法找到建立新型关系的方法，可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这个概念从提出到现在快两年了，作为中国首次提出并推动的两国关系的议题，美方还在慢慢适合和接受这一变化。但是，中方显然不希望看到美方对这个概念如此冷淡。”据达巍透露，目前美方已经对此概念有了不同版本的翻译，目前的争议集中在“相比新型，何为旧型”“何为大国”以及“‘新型’一词和‘大国’一词哪个放在前面”等方面。

达巍解释称，这一概念还需要中美双方进行细化，目前美方的疑虑主要源于，一方面担心被一些并不熟悉的概念和内容捆住手脚；另一方面来自于中美文化的差异——中国人习惯先提概念再逐步具体化、细化，而美国人习惯于先进行具体操作再总结归纳概念。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侃如认为，对于中方提倡的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增加合作，美国方面并没有反对，但美国对于中国人一直在说的“大国关系需要尊重每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并不接受，“美国不认同这一点，因为无法确知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什么”。来自华盛顿的一名国际关系学者则称：“中美之间还是少谈核心利益，多谈共同利益。”

中国希望美在亚太成为稳定器

随着美国在亚洲的力量相对减弱，美国也在调整其战略存在，但我不希望出现太大变化。骤然下降或者上升都会造成某种破坏，希望这是一个自然、渐变的过程。

文／达巍（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记者／王衍（采访整理）

近两年来，中国政府对于外交的意识和举动更加积极主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亚信会议以及其他一些具体事宜，都体现了中国主动塑造和推动一些议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的讲话，被一些美国学者解读为“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客观地说，两种表述看起来确实有些相似。但是，我认为他们对习近平的原意有过度解读之处：一来中国没有任何人说过“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样的表述；二来习近平强调“归根结底”，毕竟离开亚洲人自身，亚洲安全肯定无法维护。习近平的表述还是强调亚洲国家在安全问题上要发挥更大、更主动的作用。

中国政府多次公开表示，欢迎美国在东亚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作出的表述。第一，中国知道不能排斥美国，否则可能引起冲突；第二，就算中国想在亚洲排斥美国，也没有这个能力；第三，美国在亚洲存在了这么多年，有一些作用对中国是有建设性的，比如约束盟国；第四，中国不希望美国在亚洲扮演损害中国利益、制衡甚至遏制的角色。所以，我们欢迎美国在东亚存在，但要发挥建设性作用。

目前中美在一些国际机制上共同参与，比如APEC、东亚峰会等；有些机制则不然。例如中国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不包括美国；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也没有邀请中国。但两国都不应反应过度，一方面美国不能逢中必排、中国不能逢美必排；另一方面不能自己没参加某个机制，就说对方要排斥自己。

中国更希望美国在亚洲扮演稳定器的角色，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管理和控制它的盟友，例如日本。但随着美国在亚洲的力量相对减弱，美国也在调整其战略存在，但我不希望出现太大变化。骤然下降或者上升都会造成某种破坏，希望这是一个自然、渐变的过程。

美国人总说其东亚战略的基石是美日同盟，但在东亚，如今最重要

的国家是中国，而中日关系近年来麻烦不断。这是美国东亚战略的内在悖论。美国历届政府都发现，通过美日同盟来同中国打交道是行不通的，必须直接和中国打交道。

中美目前之所以面临诸多困难，在我看来是因为没有共同的目标或者是敌人。如果有，双方就会忍受差异、共同推进实现目标。以中美现在的分量，短期内可能很难有更重要的第三国作为敌人了。某些非国家行为体，比如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倒是有成为共同敌人的可能。

谈及合作，在经济领域，中美正在谈的《双边贸易协定》，美国可以在负面清单问题上对中国显示出一定的灵活性；双边投保协定，如果美国可以对华高科技出口方面解禁或者部分松动，不仅能告诉中方其欢迎中国崛起，也能互利；TPP问题上，美国应该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未来条件许可可以考虑邀请中国加入。

军事领域，中美应该有更多的联演联训；在对台军售、抵近侦察等问题上要有所节制；此外，中美要建立更多的危机管控措施和相互信任措施，例如目前谈的重大军事行动通报机制，以及公海海域海空行为准则。

在全球问题上合作起来障碍也比较小，比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传染疾病等。战略安全领域，要注意维持相对平衡。目前中国很关注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就是出于这个考虑。当然，中方想在安全领域与美国合作，希望美国约束日本和菲律宾在涉海问题上的行为，但这基本上没可能做到。

中美暂时不可调节的矛盾是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不同。因为美国素来是向全世界推广其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中方当然不希望美国干涉其内政，如香港问题。但是美国政府和社会的可控程度不同，政府的行为双方可以讨论，但是中美都不可能控制住美国社会，例如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中美之间的信任问题大家谈论很多，但是光谈没有用。我认为，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低层次的互信，例如双方不会使用核武器、美国相信中国不会轻易抛售美国国债，但需要进一步加强的是信任措施机制或行为准则。虽然目前中美之间有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人文交流机制，但还不够全面或深入。建立信任措施机制是指中美官员以一轨半、二轨形式相对固定（如每个季度）的互访、交流，理性地将双方在某个阶段的行为相互“对表”，从而建立信任。

中美应以合作来减少分歧

至于所谓的不可调和的分歧，我认为很多是人为夸大的。尤其是在价值观问题上，不少人夸大了美中两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同。

文／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记者／王衍（采访整理）

这次的APEC会议给了中国一个世界性的舞台，使其有机会显示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APEC会议后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尤其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让外界对中国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和世界观有了更多了解。这次的习奥会开启了中美关系全方位良性发展的新篇章。

中国举办APEC和亚信等会议体现了其在一个充满挑战的外交决策中如何探索最有利的位置。此前中国领导人在亚信会议上提到“亚洲的事情由亚洲人来办”，但同时中国外交部门也常说欢迎美国参与亚洲事务。对美国而言，并不清楚中国确切的外交政策和走向。

美国深度介入亚洲事务至少70年，在亚洲有很多盟友和极为重要的地域政治和经济利益，美国国内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中国崛起的事实，意识到世界秩序和权力版图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在提醒美国有远见的精英，不能用过去陈旧的思维和观念来看变化中的世界，因为这只会伤害美国自身的利益。因此，任何一个美国领导人，都会维护美国在亚洲的利益。

对于美国如何对待美日同盟和美中关系，我认为，两者美国都会重视，当然美日同盟关系因为是同盟可能会更优先考虑。从目前中国的发展和对美国传递的不确定性态度，使得美国只能这样说和做，而不能把重点只放在与中国的合作上。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美国会不断调整它的亚洲政策。基于此，奥巴马称其为亚太再平衡政策。

在中美建交35年后的今天，全球化的世界格局已与当年的冷战格局有很多不同。全球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核扩散、网络安全、全球流行病等成为共同挑战。所以，可以看到目前中美的共同目标很多。如果要说更具体的共同的敌人，中美是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者。

所以，美国希望推动中美两国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进行合作，

尤其是中东地区，一方面，伊斯兰国（ISIS）的恐怖主义正在威胁全球，另一方面，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直接关系到石油价格波动，这会（更多）影响中国，毕竟中国已经是中东原油最大的进口国。

另外，美国与中国进行合作的，主要还是在经济领域；同时在气候变化领域，美国希望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上做出更多努力，目前中国确实也给予了积极支持。此次中美双方共同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是一个对世界环保事务极为鼓舞人心的文件。

网络安全领域，美国希望推动双方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这一领域关切到整个国家，甚至是全球经济的运营安全。

尽管在全球地区安全秩序问题上，气候变化和反恐领域都极为重要，但如果没有特殊事件，中美两国获益最多的还是经贸领域。中美两国的市场潜力巨大，许多方面互补性较强。美国企业和投资者会在中国日益开放的服务业中广开财路，而中国则将在美国基础设施的发展上大显身手。在科技方面，人们往往强调的是竞争，但合作才是实际发生的事实。

至于所谓的不可调和的分歧，我认为很多是人为夸大的。尤其是在价值观问题上，不少人夸大了美中两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同。我更同意习近平在今年7月美中经济与战略对话时所说的，中美要通过共同的合作来减少分歧。太多地强调分歧，会使双方都忘记共同的利益和共有的价值观。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人文交流机制，还有关于人权和法治的对话都是良性互动和有益交流。我们可以问一个实际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价值观念是越来越近了，还是越来越远了？结论当然是越来越近了。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交流和与世界的对话给中国带来的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寻求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因为寻求共同价值和倡导文化多元不是悖论，而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美国民主党中期选举落败背后

美国2014年中期选举谈及的所有议题都满载着对奥巴马六年执政的不满，以及对其2008年变革承诺迟迟不能兑现的失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期选举民主党的落败，是民意对奥巴马的报复性选择。

特约撰稿员 / 刁大明



2014年11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民主党输掉参议院的选举后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奥巴马并未像2０10年民主党失守众议院时一样自称遭遇“完败”，而表示每个选举结果都只是提供了个“反省”的机会。

2014年11月4日，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其民主党人而言，注定是难熬的一天。按照当晚多家主流媒体确定的结果，共和党人不但在众议院保持并扩大了多数优势，而且还至少以52席的多数优势控制了参议院。在此前的州长选举中，共和党也几近大胜，特别是出人意料地拿下了伊利诺伊、马里兰以及马萨诸塞等民主党传统阵营的州长职位。

“在某些方面我是满意的，但在另一些事情上，我也并不满意。”在10月21日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国会参议员竞选辩论中，民主党人詹妮塔·沙辛如此回答关于奥巴马执政满意度的提问，引来一片哄笑。本次竞选中，深耕政坛22年的沙辛面对的对手是从邻州马萨诸塞迁来不到两年的前任国会参议员斯科特·布朗。然而最终，沙辛仅以52%比48%的微弱优势实现连任。而上述略显勉强的回答，却挽救了她的竞选。

民意对奥巴马的报复

传统意义上，经济与就业等国内议题被认为是美国中期选举的常规

话题，这也受制于国会和各州层次官员的主要关注范围。但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月度就业岗位增长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5.8%的失业率已回落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虽然选民对经济复苏的体感仍需时间，但经济与就业议题作为棘手议题的地位持续弱化。

自7月以来，其他替代议题轮番上阵，从因中美洲地区非法涌入儿童导致的南方边境危机，到中东“伊斯兰国”乱局的应对，再到埃博拉病毒引发的无形恐慌||似乎都在竞选背景下被夸大为国家首要议题，再加之全民医改和移民议题，共同构成本次中期选举的“议题包”。但事实上，所有议题都满载着对奥巴马六年执政的不满以及对其2008年变革承诺迟迟不能兑现的失望。从这个意义上讲，2014年中期选举民主党的落败，是民意对奥巴马的报复性选择。

极度的失望也表现在选举的周期性更迭上。目前已知输掉连任选举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中，有三位是2008年首次当选的，他们分别来自北卡罗来纳、科罗拉多以及阿拉斯加。这些保守或摇摆州之所以能够选出民主党人，很大程度上是搭上了奥巴马变革旋风的所谓“下摆效应”的便车。于是，在本次选举中，这三个席位也受累于奥巴马的颓势，沦为“落水狗”。

在“倒奥”上升为主流气候的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的竞选战略颇为尴尬，很难拿捏与总统保持多大距离才算不疏远本党核心又能迎合民意。更多的民主党人则转向了另一个民主党的王牌——克林顿夫妇。不过，选举结果证明，决绝与变通都没能挽救民主党的厄运。

从希拉里·克林顿选前两个月的行程看，她几乎不是在助选，而是在拉开2016年的初选大幕。11月5日凌晨，被视为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有力竞争者的国会参议员兰德·保罗煞费苦心地在Facebook上贴出了六张希拉里与不同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候选人的合影，题目是“希拉里的失败者”。保罗的总结虽然有些刻薄，但也算客观，这些人都是在希拉里而非奥巴马的全力造势下全军覆没的。讽刺的是，在比尔·克林顿多次返乡造势的情况下，家乡州阿肯色仍旧选出共和党人阿萨·哈钦森出任州长。而这位前任国会众议员正是1998年弹劾克林顿时冲锋陷阵的起诉人之一。

11月5日，美国政治正式步入2016年大选周期。希拉里如何利用好奥巴马的正负资产，事关其冲刺白宫的最后一搏。

“路线之争”后：共和党的挑战

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划分选区后，纽约州面积最大的众议院选区、即第21选区在本次中期选举中迎来了新面孔。现年30岁的共和党人

埃利斯·斯蒂芬尼克凭借其在乔舒亚·博尔顿和保罗·瑞安身边工作所积累的经验而一战成名。这位美国国会历史上最年轻的女议员声称代表着新世代，而其施政目标却有些惊人：废除医改法案、弹劾奥巴马。

但如果将本次选举视为是对奥巴马不满的宣泄，那就意味着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远非由衷。从选举周期看，以共和党斩获的参议院席位为例，基本上要么是2008年奥巴马魅力褪色的结果，要么是保守州长期在位议员卸任后的自然回调。此外，由于茶党势力的搅局，共和党在初选和大选中都面临前所未有的险境。身为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埃里克·坎托被茶党人士在初选中击败，成为自1899年建立党团制度以来的最大闹剧。在大选中，担任了24年国会参议员的帕特·罗伯茨险些栽在独立人士手中。

更为严重的是，奥巴马六年来的“无所作为”，也与共和党人的杯葛脱不了干系。最具历史意义却也最具争议的全民医改完成于第一任期前两年的民主党控制两院时期，其后奥巴马的多数政策议程都在国会搁浅。目前的第113届国会也必定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批准法案数量最少的一届。如果共和党无法在新一届国会或者未来两年中扭转这种困境，民意不满情绪的转向将不期而至。

这种所谓的“路线之争”，在2015年1月新国会开幕之前或随着多数党领导层的确定而偃旗息鼓。但在明年3月15日新一轮债务上限到期时，麦康奈尔们能够成功避免关门危机，必将对共和党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指标意义。随着2016年大选周期的步步紧逼，如何在保持党内平衡的基础上掌舵，也将是麦康奈尔的棘手难题。在处于少数地位时，党内分歧，特别是茶党极端派的呼声可能会被同仇敌忾的气氛所压制；但转为多数党后，如何在机制内驯服茶党，确保其在下次大选中为共和党发挥足够的提振效果，将是共和党面对的新一轮挑战。

未来会加快亚太战略的推进

选举日当晚，民主党阵营发出讯息，白宫将邀请国会两院两党领袖共同商议国家大事，并安排协调未来两年的内政外交议程。奥巴马和共和党多数都希望在未来两年有所作为。总统是为了铸定历史遗产，共和党是为了布局2016。对奥巴马而言，守住全民医改的立法果实、实现移民改革、推进气候与环保议题将是内政方面的主要考虑。但对共和党而言，奥巴马的这些觊觎显然不能照单全收。

在医改议题上，共和党可能转而采取司法或行政方式来将其拖垮，而非大张旗鼓地强烈推翻。毕竟，从选举战略而言，废除奥巴马医改更

像是一个直指白宫的动员口号，在2016年之前完成的话，实在有些浪费了。在移民议题上，同样重视拉美裔激增这一事实的共和党人会在细节上与民主党缠斗。在环境气候议题上，能源利益驱动的共和党人可能较为强烈地阻击奥巴马在立法和行政令上的努力。

相比于国内事务的针锋相对，对外事务上的共识将更易实现。这也就意味着奥巴马可能会在外交上找到更多施展拳脚的空间。与中东事务长期受困于犹太利益团体的现实相比，亚太地区是更大的自由舞台。从这个角度出发，奥巴马势必会持续推进其任期以来的所谓再平衡战略，中美关系自然是重中之重。面对进一步提振国内经济的需要，以及中东、中亚等地区的乱局，奥巴马政府或将倾向于在未来两年建设性地螺旋式地推高中美关系水平。在亚太成为世界中心的时代里，稳定而新型的中美关系，也足以成就奥巴马对政治遗产的期待。

在再平衡战略中，TPP问题明显与国会政治相关，其问题核心是国会是否会给予奥巴马类似克林顿时期“快车道授权”的所谓“贸易促进授权”（TPA）。虽然奥巴马政府多次要求国会给予授权，但包括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在内的多位党内大佬均表示不赞成。共和党获得参议院多数后，新任多数党领袖以及新任财政委员会主席将势必积极推动该授权，但这也需要奥巴马在其他重大立法议题上做出交易或妥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两院无疑将助力奥巴马加快亚太战略的推进。这些细节，要等到被国内政治搞得灰头土脸的奥巴马再次见到中国领导人时，才会更为清晰地得以了解。

美核导弹部队能被治好么

投入巨资整治核导弹部队或许可以在减少丑闻、提高待遇等治标方面收到效果，但如何在地位下降的情况下提升士气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特约撰稿员 / 谢瑞强

核武器可谓是人类武器发展史诞生的一个“怪物”。其具备的超杀能力让自身脱离了简单的武器范畴，成为一个具有“鸦片般魅力”的强有力政治符号，拥有者“上瘾”，未拥有者则千方百计尝试获得。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将核武器运用于实战中的国家，一直非常重视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研制发展。二战结束后，美国逐步将空基核力量扩展为包括海基核力量和陆基核力量在内的“三位一体”核力量。

不过，就在11月14日，递交辞呈前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宣布了一项全面改革计划，考虑投入近百亿美元用于加强军队核力量管理、整顿核部队军纪。此举主要目的在于解决美国陆基核导弹部队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各种问题，以恢复公众对核力量的信心。

丑闻缠身的核导弹部队

陆基核力量是美国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美国空军掌控。目前美军拥有3个陆基核导弹联队，隶属于第20航空队。这几个联队均装备了“民兵”-III洲际导弹，该导弹是美国第一种装备分导式核多弹头的洲际导弹，最大射程达13000千米。冷战结束后，随着“和平卫士”和“侏儒”导弹的下马，“民兵”-III导弹成为美国陆基核导弹部队唯一武器。

据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最新消息显示，美国空军核导弹部队目前拥有450枚“民兵”-III导弹，共配备470枚核弹头。其核弹头数量占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的24.5%，地位仅次于美国海基核力量。可以说，核导弹部队掌握着美国的“国之重器”。但这支部队近年来却成为“麻烦制造者”，频频令美国政府脸上无光。

先是2010年位于蒙大拿州的马尔姆斯特伦空军基地发射人员在考试中出现大面积不及格，今年1月又爆出有90名发射人员在考试中集体作弊。据报道，这支联队接受核弹操作考核时，一些涉案士兵用手机短信互相发送答案，其他涉案士兵知情不报，蓄意隐瞒，变相参与集体作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部队仍在这次考试中被评定为不及格。

据美国媒体披露，2013年10月，负责核弹发射的空军第20军军长凯里被爆访问俄罗斯时当众酗酒，与“可疑女子”调情，而且对接待人员态度粗鲁，事后凯里被免职。

五角大楼今年2月在记者招待会上证实，已发现六个美国导弹基地的11名军官涉嫌吸毒和推销毒品，甚至有3名军官在战略值班时吸食毒品。就在11月，媒体再次爆出美核导弹部队管理混乱的新闻。据俄罗斯第一频道报道，美国3个核导弹基地共用一套装备，只能靠民用快递来传递。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防部对此并非不知情，在经过自行检查后，哈格尔在公布真相时却试图一笑了之。

据调查，失职、违规操作、作风散漫等在核导弹部队早已屡见不鲜。一些官员抱怨，空军核导弹部队的“颓势”正在不断蔓延，美国民众也广泛认为将如此多的核武器交给一个“麻烦制造者”是件危险的事情。

治本之路任重道远

虽然核导弹部队成为美国军方高层的“烫手山芋”，但由于其掌握了众多威力巨大的洲际导弹，因此必须把整肃核导弹部队列为优先考虑的事情，确保这些“国之重器”在既安全又可靠的人手里。

美国国防部明确表示，将投入巨资重振核导弹部队。其中包括为核导弹部队人员提供奖金、填补他们的等级空白、发放核服役奖章、把更多资金投入老旧导弹的现代化改造工作等。国防部期望通过多管齐下的措施解决核导弹部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高核导弹部队成员的士气，恢复民众对核力量的信心。

美核导弹部队之所以逐步沦为“麻烦制造者”，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核导弹部队地位下降是重要原因。

陆基核导弹部队曾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对抗苏联核力量的一张“王牌”，其在“三位一体”核力量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冷战结束后，核危险大大降低，尤其在美国将主要精力倾注于局部战争和反恐战争的背景下，陆基核导弹部队的地位开始逐渐下降。

与此同时，美国内部出现不少“唱衰”陆基核导弹部队的声音。哈格尔在上任前还发表过逐步淘汰核武器的报告，他认为陆基核导弹部队是应最先淘汰的核力量，因为这类武器在核威慑方面“失去了中枢效用”。虽然哈格尔上任后这方面的表态变得谨慎，但其他关于淘汰陆基核导弹部队的声音仍然此起彼伏。

根据美国最新出炉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其计划削减符合该条约统计的146枚战略核弹头和90件发射装置，而陆基核力量被认为是削减的重点对象。有报道称，美国空军计划在2018年前削减50枚“民兵”-III洲际导弹。

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约翰·哈姆雷曾表示，从高层至低层都知道，核力量不再享有优先地位，这种情况下难以保持高昂的士气；加上核导弹部队长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工作压力大且繁重，却因没有实战而缺少“露脸”机会；其非但不能获得作战津贴，还感觉自己快被遗忘，进而出现士气低落、丑闻不断的状况。

受美国衰落、军费削减等因素的影响，陆基核导弹部队恢复昔日荣光已经几无可能，并且其与海基核力量（战略导弹核潜艇部队）的地位差距也越来越大。投入巨资整治核导弹部队或许可以在减少丑闻、提高待遇等治标方面收到效果，但如何在地位下降的情况下提升士气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核导弹部队未来的治本之路任重道远。



2014年8月26日，美国加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导弹维护人员准备从运输车上卸载民兵III洲际弹道导弹。该导弹是美国第三代地地战略核导弹，其突出特点是提高导弹的突防能力和打击硬目标的能力。

2015年

邓小平访美：封存影像挑开真实历史

特约撰稿/陈舒扬



1979年1月29日上午10时，华盛顿白宫南草坪的演讲台上，美国总统卡特和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携各自的夫人站立，卡特面向邓小平，以“副总理先生，我代表我的国家和人民欢迎你来美国”开场。然后，回身朝向观礼嘉宾，称邓小平的访问，是“今年历史性的建交后，我们双方走出的第二步”，并预期“两国建交会促进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气氛。”

不远的媒体席里传出尖锐的呼喊声，据当时在场的《美洲华侨日报》记者陈天璇后来的记述，一名女子举着拳头，大骂“修正！叛徒！”，然后很快被保安人员围颈封嘴、架离现场。马上，在相隔两排的席位上，又一名男子举着袖珍“红宝书”，振臂呼叫“打倒反动派！打倒走资派！”，也很快被架走。

1979年1月29日到2月5日，在万众期待与抗议浪潮中，邓小平开展了历史性的访美行程，这是中美外交史上的重要一页，在长达三十年的敌对和隔绝之后，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出访美国，并在美国掀起一股中国旋风。邓小平此行访问了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顿、西雅图等美国大城市，会见了卡特、尼克松、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美国政要，签

署的协定涵盖科技、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可谓满载而归。从此，中美双边关系步入正轨。

关于这场历史性外交活动，已有不少回忆文章和著作，而近日热映的纪录电影《旋风九日》，则第一次将这段历史搬上了电影银幕。影片通过一系列历史影像资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重现了这一历史过程，揭秘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包括邓小平访美期间遇袭和遭到全程游行示威。影片的导演正是曾执导过重大历史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傅红星，他把这九天讲成了一个“紧张的、有戏剧张力”的故事。

访美之行的时代背景

1月29日那天，白宫鸣放了19响欢迎礼炮，当时懂得外交礼仪的人解释，这是元首级的待遇，不过也有刁钻的媒体称，欢迎元首的礼炮是21响。

邓小平上一次到美国，是1974年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那也是邓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被人们认识。当时中美不通航，邓小平要先飞巴黎，再飞纽约，这离他16岁远渡重洋去法国勤工俭学，隔了半个多世纪。傅红星向《凤凰周刊》讲起这个细节时猜想，“邓小平这一行看了美国，看了巴黎，肯定刺激很大。”

中美政府之间的交往，从中苏交恶的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始。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后来签署《中美联合公报》，此后国务卿基辛格多次与中国交涉，尼克松政府反复向中国领导人承诺，在1976年之前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后来身陷“水门事件”漩涡的尼克松，渐渐放弃这一努力，并在1974年8月就提前辞职；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人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停滞，跟中国忙于国内政治斗争有关。

尼克松下台后，继任的福特总统于1975年12月访华，与毛泽东和邓小平均有会面，并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进行了三次会谈，虽然福特在任期内中美仍未建交，但让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得以保持。几个月后，邓小平因“天安门事件”被撤销一切职务。

“四人帮”粉碎，邓小平1977年7月正式出山后，马上恢复了高考、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提出了要“四个现代化”，党内经历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外交高潮顺势而至。

1978年2月，华盛顿州国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与邓小平会面，主要是为了让中国买更多的波音飞机，邓小平则要他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向

卡特进言，并表示“中美关系如果实现了正常化，华国锋总理抽不出身去，我愿第一个到华盛顿去。”

5月下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来华，带来了卡特愿意推动中美关系的口信，最后双方商定：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同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自7月5日开始商谈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从7月到12月，中美共进行了6次谈判。



同年11月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发言说：“看来美方想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外交部先把对方的具体想法搞清楚，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要加快。”11月27日，他召集有关人等探讨同美国谈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又强调：“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机会。”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同时发布了两条消息：中国和美国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应美国政府邀请将于1979年1月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难以消失的不和谐之声

白宫草坪上的两名示威者，是美国左翼刊物《工人报》的记者，隶属于当时的“革命共产党”，二人被当局依法拘留了24小时，各交了100美元罚款，然后被释放。

然而，这只是邓小平访美期间遭遇的骚乱中的一小部分，贯穿这一期间的抗议示威力量，包括美国从极左到极右的组织，也包括跟台湾有

关的势力。原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在《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一书中，透露了当年安全机构出访前收到了以下情报：

“台湾一高级特务称要在邓访美时‘给一点颜色看看’；在美国的蒋方人员正策划收买‘意大利枪手’企图暗害邓；美国一个极左组织扬言：‘要做一些使邓永远难忘的事’；旅美的亲蒋组织和‘台独’势力准备收买流氓打手，并胁迫一些台湾留学生和侨民在华盛顿等地组织游行示威，进行挑衅。”

据凌云讲述，邓小平2月2日在休斯顿访问，当地政治倾向保守，“户外气氛并不友善”。车队去宇航中心时，路旁约有200多人集结，有华人也有美国人，在旅馆对面马路一侧约有600人集结。

危险的一刻发生在18时，邓小平应邀去西蒙顿市竞技场，从旅馆楼上下到楼下大厅准备出门乘车时，突然有人插到美方警卫前面奔向邓小平，不过及时被警卫制止。事后，美方告知，此人是美国3K党党徒路易斯·比姆。

这一幕的危险，不能当成被刻意渲染夸大，虽然邓小平当时处变不惊、视若无睹，但在离开美国前，为表示感谢，他向拦截住偷袭者的警卫保罗·凯利赠送了一张有自己签名的个人照片。

“极端的激进者对中国改革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指责，因循的保守者对中美建交有难以接受的抗拒感。”陈天璇在解释波士顿和西雅图两个南方城市的不友好气氛时如是表示，事实上在那时的西雅图，“态度保守者多，附和亲台者多”。

即便对大陆政府较为友好的台湾人，也受制于台湾当局的监控，以至于在邓小平接见华人华侨和台湾同胞时，许多人不愿在媒体上留名，也避开拍照。

在电影《旋风九日》里，闹事者的行迹成为叙事线索之一，这些人虽然只是历史的小角色，但却是电影的戏剧推动力的一部分。傅红星去休斯顿警察局查了比姆的档案，还去了他的家乡，得知FBI也在找他。

“他有犯罪嫌疑，因为还没有结案，FBI不方便把相关的东西提供给我们。”傅红星说，“但我们也通过别的渠道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比如他袭击过越南难民营，枪击过警察，可能还有强奸幼女的嫌疑；他参过军，在当地还比较有名。”

傅红星的剧组后来联系上了一名当时组织示威的“头儿”，此人后来

移居到了法国，“我们跟他的助手通上了话，他也不想参加我们的拍摄，他的助手在电话里说他对美国很失望。”傅红星也找到当年台湾学生游行示威的一个组织者，他向记者透露，此人后来当了台湾某县的县长，却因贪污蹲了监狱。

意识形态自然不是邓小平访美想涉及的主题，美国媒体和大众认识到这个来自红色世界的领导人的直率和务实。据资料记载，1月29日的华盛顿国宴上，好莱坞女演员莎莉麦莲对邓说，有个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分子很感激自己从那段种番茄的生活中学到的东西，邓小平很快就失去了耐性，打断她说，“她在撒谎”，然后向她讲述了文革是多么可怕。

但中美关系未曾绕开过意识形态的冲突。在《旋风九日》中，傅红星有意专门提及一笔：2016年将参选美国总统的希拉里，年轻时候的政治偶像是当时极力反对中美建交的共和党人、自由意志主义者戈德华特。“她的政治偶像曾经跟中国的一个‘平’打过交道，她可能未来要跟中国的另一个‘平’打交道。”这是历史的机锋。

一场外交改变世界

几年前，卡特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回忆，在宣布中美建交前的几个小时，“那天夜里我惊醒了三个人。一个是台湾领导人，另一个是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第三个是日本首相。因为我知道他们看到中美之间建立的新联盟都会感到震惊……勃列日涅夫非常生气，威胁终止我们之间的控制核武器的谈判。”

布热津斯基后来披露，中美建交并没有通过国会同意。而为了缓解自己在国内受到的压力，卡特也十分需要邓小平访美期间赢得美国民众的好感。

邓小平无疑做到了。美国媒体对邓小平的总体评价是：刚强有力、语言精辟、直截了当、机智老练。他也在客人面前表现得轻松自如，有时甚至把卡特都带动起来。

1月29日晚上，在华盛顿的肯尼迪艺术中心观看文娱晚会时，邓小平亲吻美国儿童的镜头成功地向美国人传递了他的亲切形象。这发生在最后一个节目——美国儿童齐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之后，这场表演被《华盛顿邮报》揶揄地评价为“毛泽东版本的‘代我问候百老汇’”。事实上，这场文娱晚会并非由官方举办，而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以商业手法运作，公开售票，还有石油公司赞助。

有人统计，访美9天，邓小平出席了近80场会谈、会见活动，参加了约20场宴请或招待会，发表了22次正式讲话，8次会见记者或出席记者招待会。据陈天璇在自己的书中记述，全程追踪邓的记者，至少有800名。

邓小平“三落三起”的故事，被美国媒体大量报道，邓小平似乎很乐意主动跟美国媒体谈起自己的这段经历。

美国媒体也乐于报道邓小平夫人卓琳的“胆色”和气度。白宫欢迎仪式上发生小骚乱后，卓琳当场的反应后来被卡特夫人转述给记者：卓琳非但丝毫不慌乱，还向卡特夫人低声开玩笑，“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卡特夫人对记者说：“她还等着数第三个”。

“邓小平要让全世界看到，跟中国人合作是有好处的，中国人不好战，中国人不是红色魔鬼，中国人都是像我这样的，虽然老了，步伐矫健，很幽默，很直率，很勇敢，该强硬的时候强硬。最重要的是我有梦想，想改变国家，让美国让全世界来帮助我们改变国家；同时他也要中国人看到，美国是可交朋友的。”傅红星说。

三十多年后，电影《旋风九日》与美国大片《复仇者联盟2》同一档期播放，傅红星解释为“政治上、市场上都太契合了，中国的英雄对阵美国英雄，三十多年前邓小平有这种勇气，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勇气，不是PK，是合作。这两部电影放在一块儿，会产生非常有意思的效果。”

让中国从“大病”中恢复

傅红星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经历了物质极其贫乏的时期，他相信人们会对自己这部电影感兴趣，“是因为它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很多人都记得那个年代，当时邓小平要让中国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

邓小平与卡特在白宫会谈中，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包括科学、贸易、航空、海运、交换学生和新闻记者。他的计划是，对外开放以出口创汇为起点，集中扩大商品贸易，同时让外商到中国直接投资办企业，搞加工贸易，他还表达了利用输出石油偿付进口的先进科技设备的构想。

邓小平甚至放出消息说，日本银行已经答应了巨额的贷款，示意想抢占先机的企业抓紧来中国做买卖。在2月3日的媒体早餐会上，邓小平说：“中美贸易不是几百万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甚至几百亿美元。”放在当时，这还是有些夸张。

参观休斯顿的休斯工具公司时，邓小平“对每一件让他观看的产品都详细询问价钱”。后来25套采油器材运往了中国，1981年中国以武汉江汉钻头厂为试点，引进全套钻头制造技术，1990年的时候，该厂公布，这一中美合作项目累计生产和供应了10万多只钻头，用于自用和出口，收获外汇600多万美元。

卡特日后对中国媒体讲述，还在邓小平即将访美前的一天夜里，自己熟睡中被科学顾问的电话吵醒。“我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乱子，他说他正和邓小平在一起，邓小平问是不是能送5000名留学生到美国大学接受教育。我被吵醒了，有些恼火，就说，你让他送10万名留学生好了。然后就挂了电话。”

布热津斯基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次白宫会面，当时卡特总统一直催邓小平更快实现中国公民自由出境甚至移民。总统甚是咄咄逼人，而邓小平却采取迂回态度，但就在某个时刻，邓小平就那么简单地对总统说：‘那好，就明年，我们撤出一千万人，你敢不敢接？’”

陈天璇记述了当时一则“小道消息”：邓小平在表示同意互派记者后，卡特打趣地说：“我必须警告你，美国的新闻记者将会随意报道他们看到的每一件事，而事实上，我想派一万名去。”邓小平笑着说：“那太多了吧。”

在《旋风九日》片尾，傅红星找来柳传志、俞敏洪等多位明星企业家，谈论邓小平访美，他们无一例外地表达感激，讲述邓小平如何改变自己和中国人的命运。比起十多年前让自己一举成名的《周恩来外交风云》，傅红星称《旋风九日》是一部更客观中立、没有掺杂过多个人感情的作品；他也表示一部电影无法讲清楚所有问题，但这一主题无疑重要，因为中美两国联系太紧密了。

美国大事：关于化石燃料的辩论

当前化石燃料在美国引起激烈争论，一场有关环境保护、清洁空气、增进人民健康，同时涉及科技改革、开发新能源、经济发展方向的大辩论正在广泛展开。

文／陈安

浏览当前的美国报刊、网络，你会不时看到文章大标题中有“Fossil Fuels”这个显眼的词语，“化石燃料”或“矿石燃料”是其中文译名。正是这种燃料当前在美国引起激烈争论，一场有关环境保护、清洁空气、增进人民健康，同时涉及科技改革、开发新能源、经济发展方向的大辩论正在广泛展开。

化石燃料是一种碳氢化合物（即“烃”），其中包括我们大量使用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天然资源。这煤、油、气，如今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家家户户的照明、烹饪、气温调节都离不开它们。从世界范围来看，它们更是功能彰显。今年3月《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化石燃料将拯救世界（千真万确）》对其加以赞美，称“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是有问题，但它们带给人类和地球的好处不容争辩。”还称，“化石燃料取代了森林砍伐，挽救了鲸鱼，让我们在较少土地上种植更多食物。它使西方上升到‘伟大的富裕社会’，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在许多政治、经济问题上，《纽约时报》与《华尔街日报》往往有不同倾向性。前者有关化石燃料的专题讨论题目用的是“Beyond Fossil Fuels”，后者说化石燃料的好处“beyond dispute”，两者都用了“beyond”这个介词，可一个说的是化石燃料问题超出化石燃料本身，还涉及环保、空气、健康等许多问题，另一个说的则是化石燃料的好处不在争论范围之内。显然，《纽约时报》要着重讨论化石燃料带来的危害以及除害的途径，《华尔街日报》则称颂化石燃料要使其成为永久的主要能源，一“否”一“保”，反映了目前美国人所持的两种不同态度。

化石燃料如今分别用于三个方面：石油主要用于交通，天然气主要用于供暖，煤炭主要用于发电。当我们开车上下班或出门旅行的时候，当我们冬夜在温暖的房间里上网的时候，我们都会体会到化石燃料带来的好处。然而，当天色阴沉总不见晴空的时候，当漫天雾霾出门需戴口罩的时候，我们便得知化石燃料也带给我们危害。

在钢铁厂、发电厂、炼油厂遍布的地区，在街道、公路、汽车密集的地方，化石燃料的废气散布空中，其中含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烃

和汞，经过光化学反应又形成臭氧，所有这些有毒颗粒物可以组成遮天盖地的雾霾，其毒素往往会使人罹患各种疾病，甚至过早死亡。这种现象同时产生“温室效应”，因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等气体含量增加而使地球表面升温变暖。

匹兹堡的旧貌新颜

美国人有过饱受空气污染之害、力克污染物的漫长经历。笔者曾有《洛杉矶反雾霾之战》一文（见本刊2013年第09期），这里不妨再说一说匹兹堡的今昔。

匹兹堡是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大城，因自然资源丰富，有三条河流在此交汇，又早有铁路与各地相通，所以工业发展较快，1875年便开始生产钢铁，1911年钢产量占全国一半。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匹兹堡一家钢铁公司的钢产量就两倍于苏联全国的钢产量。全市产钢鼎盛时期共有300多家与钢铁生产有关的公司、企业。然而，这个“世界钢都”、“世界工场”就因为大炼钢铁、大烧煤炭，结果成了昏暗的“烟雾之城”、“开盖的工业地狱”。煤炭是匹兹堡的主要能源，钢铁厂、炼油厂烧煤，70多家玻璃厂烧煤，火车、汽船烧煤，家庭烧煤，整个城市烧得乌烟瘴气，空中布满灰黑色烟雾，河流也被工厂废水污染。

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是匹兹堡“最黑暗”时期。由于烟雾笼罩，每天上午10点左右“夜色”就降临全市，就要开街灯。可当时不少人愚昧无知，认为那些从高烟囱中冒出的浓烟是生产力和繁荣的象征，甚至觉得烟雾对人的肺脏、对作物生长都有好处，有些人还居然写诗作词歌颂烟雾，这些现象后来都被传为笑柄，匹兹堡的“黑暗历史”也就成了所有缺少环保的城市的警世故事。英国著名小说家特罗洛普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游览匹兹堡，他的游记写得显然有点刻薄：“匹兹堡无疑是我见过的最黑暗的地方，那里风景如画，连那些不洁之物和不可思议的黑暗也美丽如画。当我伫立观望那些几乎像夜色一样游荡全城的煤烟时，我觉得我先前从未像现在这样爱烟雾和脏物。”

十年前，笔者曾游匹兹堡，见到的已是它的新貌，一个全然不同的匹兹堡。上世纪80年代，由于全美国的“非工业化”，也因与其他国家竞争不力，匹兹堡的钢铁工业日渐凋敝，钢铁厂纷纷倒闭或外迁，高烟囱被拆除，整个城市经济开始转型，转而大力发展电脑科学和生物技术，至90年代便从“钢都”变成了“高科技中心”和“地区医学之都”。整个城市的环境也焕然一新，空气清洁而不再有煤气和烟味，河水干净而不再呈褐色或青色。人们所看到的不再是特罗洛普笔下“黑暗的美丽”，而是阳光、蓝天和白云下面由阿勒格尼河和孟农加希拉河交汇而成的美丽的“金

三角”，三角尖端绿草如茵的公园，喷射200英尺水柱的喷泉；还有散发着浓郁文化气息（而非煤烟味道）的福布斯大道，那里集中着该市著名的大学、博物馆、图书馆、剧院和音乐厅。

匹兹堡的巨变固然是该市政府和人民数十年内努力控制污染、保护环境的成果，而钢厂倒闭、不再大量烧煤，显然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钢铁工业的衰败并未使匹兹堡衰落、破产，却使它另辟蹊径，经济转型，进入了以医疗保健、科技、教育和金融服务为中心的现代化新阶段。在这次关于化石燃料的大辩论中，环保人士以匹兹堡为例，说明我们的环境可因大量烧煤或少烧煤、不烧煤而呈现不同的状态。

对化石燃料爱恨交加

据统计，一所燃煤大工厂每年要烧300万吨煤，产生110万吨二氧化碳。燃煤对空气造成的污染，已引起美国环保人士的充分注意。有人不仅为本国的“煤污染”着急，而且也对美国向亚洲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大宗出口煤炭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表示忧虑。这次大讨论中，《纽约时报》专门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争论煤炭问题的国家为满足中国的需求而出口煤》。

文章说，中国原是煤炭出口国，但由于经济高速发展，现已成了煤炭进口国，全世界每年耗煤60亿吨，中国耗了一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国际长途煤炭出口量因此而激增。美国环保组织“山脉俱乐部”有一“Beyond Coal”(超乎煤炭之上)计划，原打算阻止139家煤厂开业，却因中国需煤而未能达到目的。“山脉俱乐部”发言人感叹说：“我们不想让煤在本地烧，也不想让煤在其他国家烧，出口煤破坏了我们的目的。”

该文作者罗森索尔指出，人们对煤又爱又恨。爱煤的是煤矿、煤厂、煤商老板，因为煤炭交易是赚钱大生意，世界最大煤炭企业“皮博迪能源公司”老板深知此理，公开表示“要向中国输送更大数量的煤”。恨煤的则是环保人士，蒙大拿州一家公司租用州有土地以开采更多煤供应亚洲国家，一家名为“地球司法”的非营利环保律师所立即提出诉讼加以阻挠。华盛顿州考利茨县打算把朗维尤港定为煤炭港，环保组织即刻表示反对，指出州政府已下令禁止开设新的燃煤工厂、并关闭尚存的几家，为何还要建什么煤炭港？

至于中国为何需要美国的煤，文章也加以说明：中国自己的煤质量较差，含杂质较多，美国蒙大拿州、威斯康星州的煤含硫量低，可以多用而不超过污染控制标准；中国的煤产地大多在内地，而工厂大多设于沿海，从北美、澳洲甚至南美海运进口煤反而比较容易。

笔者注意到，中国经济的腾飞使美国媒体加强了关于中国的报道。既然美国向中国大宗出口煤炭这一情况得到关注，那么中国向外国出口过剩钢铁的现象自然也不会被忽视。《华尔街日报》根据该报驻香港、匹兹堡和北京记者提供的情况综合报道说，中国近年来因经济发展放缓，国内钢铁需要量明显减少，故大幅增加钢铁出口。从2014年1月至2015年1月，中国钢铁出口增加63%，高达920万吨，主要出口对象包括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韩国。这一年内对美国出口则增加40%，直接危及美国的钢铁产销，“美国钢铁公司”不得不让6个工厂停工，2015年预计将裁减3500名工人。美国人说，中国在搞“倾销”；韩国人说，中国钢价低，日本的钢质好。



1940年，匹兹堡的钢铁厂排放出的废气，让城市居民不堪呼吸。



2014年9月21日，联合国气候峰会前夕，约40万人走上纽约街头，倡导远离化石燃料，利用可再生能源。

中国既大宗进口煤，又大宗出口钢，美国环保人士因此建议中国的钢都、钢厂能向匹兹堡学习，少烧些煤，少炼些钢，少污染空气，最终甚至不再炼钢，不再烧煤，转向其他经济领域，腾飞于其他发展途径。

对石油污染问题，人们的认识似乎比较一致。2010年4月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大家都还记忆犹新：英国石油公司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导致大面积的原油泄漏，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亚拉巴马等州海岸受到严重污染，大批海鸟、鱼类、海龟和海豚受害死亡。

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地球温度的变热，这一切都告诉人们：不能完全依靠石油，不要到处钻探石油，而要努力以再生性能源取代汽油和柴油。《纽约时报》以醒目标题提醒人们：“给油箱加油得寻找新的途径”。

为减少汽油用量，美国许多城市现采取不少措施，如政府建筑、游览胜地改用风力发电；建造节约能源、空气清洁的“绿色建筑”；规定使用省油而少废气的“混合式”汽车，也即有引擎又有电动马达的车辆；开辟“完备街道”，也即一定有自行车道的街道，鼓励市民骑车上下班。匹茨堡现有一个“自行车匹茨堡”组织，拥有5000多名成员，不仅负责开辟自行车道，而且要在匹茨堡开创“自行车文化”，让更多人认识到选择自行车为交通工具的重要性。

替代能源的新进展

如何少用甚至不用化石燃料？如何开发新能源加以代替？这也是这场大辩论的重要内容。《纽约时报》发表多篇文章介绍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

葡萄牙走在了使用清洁能源这条改革之路的前列，从2005年开始尽量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大力开发风力、水力、太阳能和海波等再生性能源，并取得了重大成果。葡萄牙前总理索克拉茨说：“用清洁能源替代化石燃料，这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我们的经验说明，在很短时期内作出这种改变是完全可能的。”

十年来，葡萄牙政府实行优惠政策鼓励私营企业在风大、水源丰富、阳光充足的地区建造和经营发电厂；对全国高压输电网进行改建，使其适合将清洁能源所发的电输送到城市，2010年这种电在输电网中已占45%，其中一部分还可输给西班牙；同时鼓励民众利用太阳能，在屋顶安装晶体硅组件。偏远城市莫拉由于得到的日照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多，所以现已成为葡萄牙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所在地。2014年两家大型燃煤发电厂被迫关闭。如今，里斯本的时尚酒吧、波尔图的许多工厂、阿尔加维的漂亮度假村，所用电都源自清洁能源。全国性的电动汽车规划也在加快实施，至2011年已建成260多个充电站，待再建1350个后就将形成全国电动车网，街道、公路上就不再有燃油排出的废气。

当然，这种改变要付出代价，如今葡萄牙人每月要交付更多电费。这种改变也会遇到很多困难，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困难都会有。天有不测风云，风有变小的时候，阳光有间歇的时候，冬天雨季水力充足，夏天的水源就可能有限。这就需要新的应对技术。可喜的是，葡萄牙能源传送公司已积累相当丰富的应对经验，能以先进方法精确预报天气，以电脑程序预测各风力、水力和太阳能电站的发电量，并雇用较多调度员，由他们安排将电输往需要的地方。

不少国家愿意效法葡萄牙，据麻省剑桥能源研究所报告，爱尔兰、丹麦、英国、加拿大和巴西都已计划在2025年左右使再生性能源所发的电占总电量的40%以上。美国则比较落后，目前只有5%的电能来自清洁能源。美国的电力公司在政治上左右摇摆，而是否提倡使用清洁能源，要由州政府决定。科罗拉多州立法规定，2020年前30%的能源应是再生性能源，而其邻州犹他几乎无动于衷。肯塔基和西弗吉尼亚是两个煤州，至今没有什么改变现状的计划。大辩论中环保人士都表示了对这种落后状况的焦虑。不过他们也欣喜地知悉，在西弗吉尼亚，已有很多人起来反对一些煤炭公司的山顶探矿找煤行为，要求以建山顶风力发电站来加以抵制。

美国环保人士要大家关注、学习的还有瑞典。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宣布对排放化石燃料废气的工厂、企业课税的国家，可见该国对控制空气污染问题的重视。

如今在瑞典，更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新能源——生物气，也即由有机物发酵产生的可燃气体，克里斯蒂安斯塔市则成了使用生物气的样板。这个有8万人口的城市，不论家庭或商店，现都已不再依靠煤、汽油和天然气御寒，即使在漫长的严冬，也是靠生物气供暖。这里没有足够的风力、水力，整个北欧也没有葡萄牙的强烈阳光，但这里有碎木材、残枝败叶、土豆皮、用过的烹调油、发霉的糕饼、猪肠子、动物粪便等等，这些废物都可利用，都是产制生物气的有用材料。克里斯蒂安斯塔郊区一所大工厂通过生物处理把这些材料转化为生物气，该市居民就用上了由生物气产生的热和电，精炼的生物气还可成为汽车燃料。有个市民说：“这种能源供应非常可靠，我们不必再向中东或挪威买石油了。”

德国也重视生物气的开发，现已有5000多个生物气发电站，大都在私人农场。据美国环保署估计，全美大约有8000个农场可以开办生物气发电站，目前只有150多个，规模也很小，大多只用动物粪便。

争论仍将继续

这场关于化石燃料的辩论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说，我们很快就会耗尽所有的化石燃料，所以要赶紧找新能源；有人则驳斥说，这是杞人忧天，化石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有人主张重新重视核能，建更多核电站；有人则以1979年宾夕法尼亚州三哩岛、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为由表示反对。

有人认为充分利用风力是一个上策，葡萄牙做得到，我们也能做得到；有人却说，全国风力农场要有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三个州加起来那么大的面积才能发挥效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加利福尼亚大学师生上街游行，标语牌上写着“地球母亲说：‘抛弃化石燃料！’”有人警告说，抛弃的结果是工厂关门、公司倒闭，大学就会少挣很多用于学术研究、学生奖学金的钱。

上述《化石燃料将拯救世界（千真万确）》一文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后，编辑部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对文章观点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笔者摘译宾夕法尼亚州读者凯文·希克思的信，以此作为本文结尾：

“化石燃料为创建我们今天的高标准生活确实起了重要作用，它们

也肯定会在我们的未来发挥作用。但现在也不能疏忽有关发展将来可持续利用的燃料的问题。就如煤代替木柴、汽油代替很多煤，如果我们继续下工夫，总有一天汽油也将被某种更好的燃料取代。眼下我们加油时因见油价降低而高兴，可别忘了汽油涨价、供应匮缺的情况还会发生。现在已是研究、创新、作长远考虑的时候了。明天的能源不应该都是化石燃料，也不应该都是再生性能源。应该是两者的组合，加上新技术，使其既经济，又能持续地使用下去。”

“赴美产子”的经济账

赴美产子是中国中产阶级用更低的成本实现了孩子的“美国梦”——富豪们需要用几十万美元的投资才能获得的身份，他们只需要1万美元多一点就可以实现。

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赴美产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据《环球》杂志报道，2007年，中国大陆赴美生子人数在600人左右；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5000人；而到2012年，超过了1万。而来自民间行业组织“母婴管理学会”的数据显示：2013年达2万人，2014年预估达到3万人。而2015年估计会达到5万-6万人。据有媒体统计，赴美生子行业在美国至少能带动1万多人就业。

为什么要赴美产子？原因大致是有以下几点。一是为了逃避计划生育的限制。早几年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违规生二胎所要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就要高达数十万元，而赴美产子的费用则在10万元之内。既然赴美产子费用并不是太高，为什么要缴纳罚款呢？

二是为了让子女有更多的机会。作为全世界目前唯一的霸主，而且至少从目前来看，美国的霸主地位还很难动摇，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资源和良好的工作机会。为了能让子女有着更好的未来，因此很多父母愿意到美国产子。同时还要看到，美国公民在就读大学——尤其是州立大学时有学费优惠。以加州公立大学为例，到了大学阶段，外籍学生一年需交1.2万美元学费，而加州美国人一年只交2000多美元，在美国仅上大学四年的学费就可以节省约30万元人民币。

当然，所有这一切的前提都在于，孩子一经分娩就能成为美国公民，因为美国的国籍取得中认可“出生地原则”，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凡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的人，均为合众国和他们所居住州的公民。”既然赴美生子能够有这么多的好处，成本也不高昂，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其实，要真正了解赴美产子的本质，可能还需要与对外移民结合起来。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近发布的2013年《美国社区调查》数据，2013年，中国取代墨西哥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来源国，印度紧随中国，墨西哥位居第三。数据显示，2013年移民美国的总人数达120.1万，其

中14.7万人来自中国，12.9万人来自印度，12.5万人来自墨西哥。而在2012年统计中，墨西哥以12.5万人排名第一，压过中国12.4万人。

很多人将对外移民称之为国内经济环境越来越差，不过在我看来，这种讨论太简单化，因为最为简单的一个事实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越来越好，但是对外移民的人数却越来越多？唯一的一个解释是，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不是说国内的环境——无论是经济环境还是自然环境越来越糟糕。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无论是经济还是环境，如果持公允之论，环境都是越来越好，而不是像很多人说的那么糟糕。

为什么环境越来越好但对外移民人数会越来越多？其实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和国内移民是异曲同工。现在城市里的居民大约有二分之一是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当乡下人进城后，城里人去哪里？三四线城市的往一二线走，而一线城市的可能就往国外移民。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赴美产子，而不是投资移民？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投资移民的成本高，而且更加具有不确定性。众所周知，成为美国公民最便捷的方式，是找个美国人结婚。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中产阶层而言，这并不是一条可行的路，因为这时候事业有成，已经不需要通过婚姻来入籍。但是投资移民的风险很高，首先是要向美国投资50万美元，同时却要承担投资失败带来的资金不能返还和不能保证入籍的风险。正是因为移民门槛高，要求复杂，所以赴美产子就成为很多人的选择。换句话说，赴美产子是中国中产阶级用更低的成本实现了孩子的“美国梦”——富豪们需要用几十万美元的投资才能获得的身份，他们只需要1万美元多一点就可以实现。

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赴美产子？很简单，这不过是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已。赴美产子在某种程度上和农村的居民到城市就业，农民工从中西部地区到东南沿海地区求职并无二异。唯一的一个不同就是，赴美产子涉及到了国界，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则只是在国界内流动。

美国地方政府破产法律制度的启示

中国地方政府如何破产？

一边是地方政府性债务恶性膨胀，一边是地方财政增速断崖式下跌，地方政府破产已成为中国官方的选项之一。

曾智华/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随着十八大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战略部署，财政部组织了6个省的财政厅，对6个重点领域进行研究。其中，研究制定《地方公债法》和《地方政府破产法》，成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决策机制，也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国家关于地方债管理工作的推进，研究制定《地方政府破产法》，从法律上明确地方政府应承担的债务风险责任，在地方政府资不抵债时，允许地方政府宣告破产，并规定债务重组及债务清偿程序。这在中国历史上尚数首次。

允许地方政府宣告破产，是基于地方债务的大量攀升。根据审计署的公告，截至2013年6月30日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达到10.88万亿元，明显高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合理规模。而且地方持有的负担增信责任或债务可能更多。随着不少地方债进入偿债的高峰期，地方债危机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的困扰将越来越明显。此外，由于很多地方政府依靠出售土地来偿还地方债，随着土地财政的终结，地方债的风险就会日益彰显。

在此情形下，研究并制定“地方政府破产”的相关法律法规，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国际上有这样的先例吗？它们能适用于中国吗？

美国地方政府如何破产

地方政府破产在美国并非新闻，到今天为止，美国至少有800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宣布过破产，有关地方政府破产的事例在日本、英国、德国等地也都真实地发生过。日本已有880多个地方政府曾经宣告破产。《美国破产法》专门在第九章规定了“市政府债务的调整”(CHAPTER 9 - ADJUSTMENT OF DEBTS OF A MUNICIPALITY)，使地方政府通过执行债务调整计划而摆脱债务之苦。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造成1000多个市、郡等地方政府因税收匮乏陷入财务危机，濒临破产。在1937年，为应对大规模的市政府债务危机，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债务偿还标准和地方政府破产程序的法案，并由联邦法院明确破产标准，规定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可以动用其全部税基来保证债务的偿还，这在1946年成为固定永久性的法

规。

破产法理论一般认为，地方政府作为公法人不具备破产能力，如允许地方政府破产，必然会导致社会管理职能瘫痪，社会秩序混乱，甚至发生政治危机与动荡，所以，各国立法通常规定地方政府不适用破产程序。但是美国却不这么认为，依照其理解，一些地方上的市、县政府机构是依照公司法注册成立的，自然应允许其具有破产能力。

换言之，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地方政府就如同一般企业一样，“经营”有好有坏，只要地方政府公共资金的收入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之间出现短缺，就会导致地方政府财务困难，出现债务问题。若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人无法按照相关协议或约定，依照法律的规定向债权人承担资金的清偿义务，理论上便允许其寻求破产制度的保护，即适用破产重整程序。而事实上，地方政府出现财政危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由此美国国会通过慎重考虑后，在《美国破产法》第九章设定了地方政府的相关债务调整程序。

《美国破产法》第九章设置“市政府债务之调整”的基本立法目的是：通过允许无力偿还债务的地方政府申请重整破产保护程序，在保护破产地方政府的资产基础上制定债务调整计划，提供扭转财政困境和财政恢复重建的时间，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合法地延期偿债或调整债务，甚至减免债务，避免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扩大而陷入债务恶性循环，最终得以度过危机，使政府财政获得重生。

近70年来，这一保护制度已经挽救了600多个美国地方政府。由这一基本立法目的还可以派生出两个隐含立法目的:一是强迫地方政府对自己的债权人负责，明确地方政府负债要承担的责任，进而对其自身的服务和行政进行改革，促进政府行为的高效和廉洁。二是使得地方政府债权人的利益获得一种明确的法律保护，使债权债务关系在制度框架下得以解决。

根据美国地方政府破产法，申请破产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必须是地方政府；必须得到州政府的明确许可；必须丧失债务清偿能力；必须为诚实性的申请；必须在破产前与债权人协商。

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形：地方政府与按照同种债务分类的各个债权人组协商，且每一类债务的偿还协议都得到该组债权者过半数的同意，即可获得破产申请资格。地方政府与债权人协商后不能得到过半数同意，但地方政府在此之前的协商是诚恳、善意，而非单方面的，破产法院一般也认定其有破产申请资格。地方政府的债权人过多，双方协商

确实困难或者确定没有协商的可能，破产法院仍可批准地方政府的破产申请。破产管理人一职一般都由破产的地方政府自行担任，只有破产的地方政府出现诸如隐匿财产、欺诈等行为时，破产管理人才改由破产法院指派。

《美国破产法》第九章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债务调整计划书。地方政府对债务调整计划书具有完整的主导权，且在提出破产申请后120天之内具有向破产法院提出申请的专属权利。该计划书应当包括按照同种债务分类对债权人的分组，并说明各组债权人可获得何种清偿。

《美国破产法》第九章对此规定得比较复杂。总结概括如下：如果一项计划得到所有各组的批准，并符合破产法的有关原则，法院就必须批准这项计划；如果这项计划得到某些组的批准，并符合破产法的有关原则，法院也有权批准；如果这项计划未得到任何组的批准，法院就无权批准；此处破产法的有关原则包括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公平对待原则和绝对优先原则。

如果债务调整计划不符合这些原则，则无论它获得多少组的同意，破产法院也无权批准这项计划。债务调整计划书获得批准后，破产法院会监督计划书的初期执行，因为大部分的改组措施都会在这个阶段完成；之后，法院将宣布法院程序的终结，由地方政府独立地按债务调整计划进行整顿，直至破产的消除。

中国地方政府破产的建议

最近影响最大的莫属于2013年8月全美第五大城市、“汽车之城”底特律的破产事件。自金融危机爆发到2011年，约有15个城市申请破产。2012年，美国加州斯托克顿市等三座城市也相继宣布破产。这些事件都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触发了中国地方政府能否破产的争论。

地方政府破产对中国的积极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打破中国地方政府因“资不抵债”而不能宣布破产的传统观念。二是打破“大锅饭”，有助于分清债务归属，划清偿还责任。三是推动政府职能、决策体系和发展思路的改革，改变国内生产总值(GDP)至上的政绩观和发展观。四是增强地方政府的责任心，让地方政府承担相应的发展责任来控制风险扩散。

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政府破产只是地方财政破产，并不等于政府职能破产，更不是说政府消失了。任何地方不允许出现无政府状态。地方政府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进行改组、改选的问题，只能根据宪法、选举法、政府组织法等处理。

鉴于中国的具体情况，中国的地方政府破产制度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以下几点建议值得考虑：

要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法律体系。修改《预算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同时，制定《地方政府债务法》，规范地方政府负债的范围、审核权限、资金投向、偿债责任、危机处理等。

在破产主体资格上，不宜把主体的范围设定得过于宽泛。应主要包括市、县、乡（镇）一级政府，暂不包括省级政府，并且在制度实行之初，应选择几个地区先进行试点，积累经验，以便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和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破产原因上，可参照美国规定，地方政府无法支付到期债务或无法支付将到期债务，便认定其丧失债务清偿能力，构成客观上的破产原因。这一点务必与中国现行《破产法》第2条规定的企业法人破产的原因做好制度上的衔接。

在破产申请上，地方政府和其债权人均有提起破产保护申请的权利，但必须提前告知上级政府并由上级政府出具意见。考虑到地方政府的主体特殊性，在破产申请提出前可要求双方进行必要的协商。鉴于目前中国的政体制度与司法现状，破产申请应由当地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受理，具体由人大常委会管辖，该级人大常委会也可指定特别小组协调此项工作。

在破产程序上，先由地方政府制作债务调整计划书，该债务调整计划至少应包括债务的分类、债务调整的方式以及期限，再经债权人会议通过，最后由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经特殊程序批准。应尽量简化破产程序，要在有利于地方政府摆脱财政危机的同时，兼顾到大多数债权人的利益。

在地方政府自治权上，与美国的联邦制不同，在中国上下级政府之间属于领导关系，反映在破产程序中，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便受到限制，要接受上级政府和当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严格监督。正因为此，中国地方政府破产过程中有别于美国的规定，可以得到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持等的援助，但要规定援助的具体标准和范围等，以防止无条件救助产生的道德风险。

中国纺织企业赴美建厂引热议

中美产业链发生逆转？

特约撰稿 / 李想

来自浙江的纺织企业科尔集团估计怎么也想不到，由于投资2.18亿美元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兰开斯特郡建厂，竟引发国内外关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下滑的热烈讨论。

8月初，美国《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产业链大逆转，中国纱厂登陆美国》的报道，以科尔集团在海外投资建设的这家工厂为例，凸显中国制造由于成本高企，国际竞争力下降。大陆媒体转载时甚至提出“中国制造现在大势已去”、“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论调。

与此同时，财新中国通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最新数值创近六年半来新低，新业务总量和新出口订单重新呈下降趋势，显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持续萎靡。

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工厂从中国迁至东南亚国家时，这些数据无疑加重外界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担忧。这当中，中国日益昂贵的劳动力是造成该现象的主因之一。英国《经济学人》2014年曾对中国各省份的制造业工资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发现工人的平均时薪从2000年的3.4元人民币升至2012年的13元人民币。除了人力涨价,电费、气费和人民币汇率也在不断攀升。三重压力下，许多外企纷纷选择从中国撤厂，转投周边东南亚国家乃至印度、墨西哥等国。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选择在海外建厂。

《纽约时报》指出，中国制造企业对外投资并不少见，但多数是以股权合作或者并购的形式，直接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建厂并不常见。对此，科尔集团办公室主任黄国刚回应称，公司选择在海外建厂是为了应对国内棉纱产业原料和能源成本高企的问题，也为了避开国际上对中国纺织产业设置的贸易壁垒。

中企赴美建厂背后的考虑

最新一份比较中美制造业成本的报告，似乎也印证了“中美产业链出现逆转”的看法。独立国际咨询机构波士顿咨询日前统计了2004-2014年全球前十大贸易出口国的制造业成本变化，其将美国归为“冉冉新星”，中国则是“承受重压”。

报告显示，十年间美国按生产力调整过的工资水平增长不到30%，

但中国涨幅高达187%。此外，十年间中国电价增加了66%，天然气价格增加了138%。相比之下，由于发现庞大的页岩油气库存，美国能源成本下降，虽然目前时薪高达22.32美元，但较高的生产效率和当地政策补贴抵消了多出的工资成本。

对此，有国内学者指出，中国并不是所有生产原料都比美国贵，科尔美国建厂属于纺织行业特例，不能以此就说中美产业链出现了逆转。“凭着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和庞大的市场，中国在多数制造业类别上还是比欧美等发达国家更有竞争力，不应反应过度，唱衰中国制造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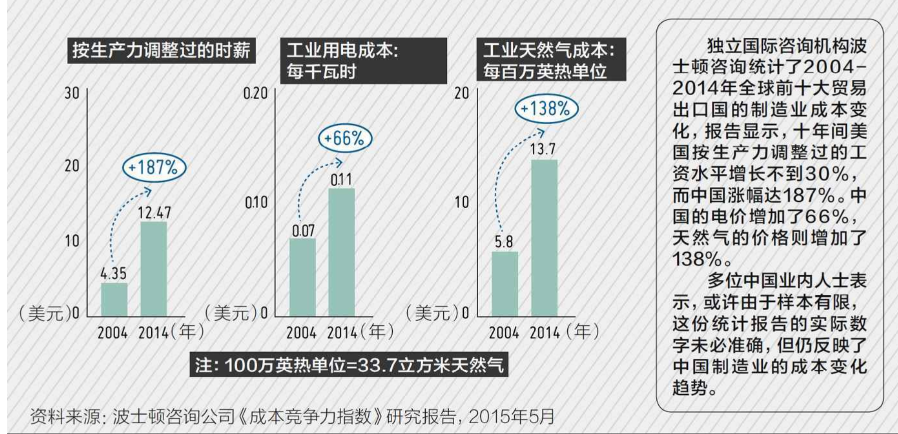
但谈到国内纺织业，中企面临经营困境已多年。出于对国内棉农的保护，中国从2004年开始对进口棉花实行配额制，超过配额的棉花将被征收40%的高额关税。为了稳定生产，国家棉花储备库2011年开始对国内棉花实行临时收储，这些政策导致国内外棉价出现悬差。国内纺织企业只得购买国家收储棉，但往往“价高质次”，不仅影响成品质量，也拉低企业利润。虽然从2014年4月开始，中国过去三年实行的棉花临时收储政策宣告结束，但目前棉花产业的转型、升级仍很艰难，棉花加工行业无序竞争现象严峻。

黄国刚在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科尔集团产业转移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外棉价严重倒挂。

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公布的数据，去年第二季度国内外棉花差价每吨高达5500元。面对这样的差价，即使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也无法弥补原料和电力上的成本差。而且外企下订单时通常以较低的国际棉价为标准，这从一开始就削减了纺织企业在国内生产的利润。而在美国，除了原料成本低廉、工厂机械化程度高，南卡罗来纳州又是产棉大州，具有良好的产业聚集。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则指出，中国纱厂赴美设厂现象对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真正警示不在于“美国制造业回流”，而是国内对上游原料、能源产业的措施不当反而可能伤害下游制造业竞争力，迫其出走。

而且，即便一些中国企业选择赴美建厂，但以此就认为“中美产业链逆转”也并不全面——多数走出去的中企原本在华生产的产品很大一部分就是销往美国，“走出去”不仅能降低供应链成本，还能伺机拓展海外市场。



早在1999年，海尔集团就在南卡罗来纳州凯姆登投资4000万美元建设冰箱生产厂，之后又在新泽西、北卡罗来纳和阿肯色州建造新工厂和物流仓库；运城制版集团2010年在南卡斯巴坦堡建厂；天津石油管道公司在得克萨斯州投资1000万美元设立生产油管和石油钻孔机工厂；浙江省台州富岭塑料有限公司去年投资2100万美元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马可基镇建立一家餐具及厨具工厂，每年节省运输成本近1000万美元，还可以享受中美政府的政策补贴。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签署《制造业促进法案》，降低了外商在美国做生意的成本。在此环境下，美国各州争相推出优惠政策吸引海外投资，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投资。据美国《财富》杂志2010年报道，该法案通过后，美国至少有33个州或县市派出专门代表去中国游说企业来美国投资建厂，并为企业提供具有吸引力的税收优惠政策。南卡州还为当地创造超过10个就业岗位的企业提供每个雇员1500美元的税收减免。

中国制造业亟待升级

从波士顿咨询的报告来看，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制造业处境的确有些尴尬：研发和生产效率还比不上发达国家，人工等低端成本拼不过东南亚。报告指出，虽然中国政府鼓励更多机械化生产，企业也投入了更多成本在购买机器上，但现阶段工厂生产效率的提高还不足以弥补劳动力和能源成本的增长。

2009年耐克公司宣布关闭在中国唯一一家鞋类生产厂后，越来越多的外企选择将工厂撤出中国，或者从沿海地区迁至内陆劳动力更便宜的省市。但《经济学人》的报告显示，结果越来越多的工厂反而将内陆地区的工资水平提升到跟沿海地区差不多，让这些地方也失去对投资的吸引力。

劳动力成本的推高由诸多因素决定：产业升级、更多机器的使用会导致人力成本上涨；中国人口的老龄化造成劳动力短缺、价格上涨；而随着社会法制化发展，企业员工的保障要求也愈发严格，最低工资和社保标准越来越高。

不过，工资提高而迫使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外移也并不是坏事，美国、日本、韩国等都曾因为工资过高而面临“工厂外移”的困境，后来依靠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强竞争力。因此，如果中国借此机会从劳动力密集型转型至技术密集型，从制造业“大国”升级成“强国”，将使国家长远受益。

今年5月，中国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部署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文件指出，中国要在十年内将劳动力密集的低端制造业转型为像机器人、科技、航空航天等的高端产业，创新产业和智能制造是其核心，而工业机器人生产是重头戏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工业机器人的发展。中国进口工业机器人从2000年的380台增加到2013年的3.7万台，并在2013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但与此同时，中国工业机器人密度仍然很低，2013年的密度仅为30台/万名产业工人，仅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

此外，政府在推动机械化生产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因此产生的高失业率。人工智能专家、《机器人时代》一书的作者马丁·福特不久前撰文指出，中国的机械化速度会让人工生产以极快的速度从市场上消失，这个速度可能会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令中国更难达到内需增长的经济目标。

不过，两头夹击下的中国制造仍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经济学人》认为，跟越南等国比，中国有发达的工业集群，形成极佳的供应链；跟欧美等国比，中国劳动力仍廉价，且拥有东南亚整个区域的产业链，即使工厂外迁，也是在巩固以中国为中心的“大工厂”地位。更为关键的是，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随着消费者对产品要求的提高，其市场潜力仍有待挖掘。

美国虽然政治社会稳定，但大规模的产能转移仍不现实。科尔集团在美国开设工厂后，虽然受到行业内外的关注，但效仿者寥寥，“主要还是人力成本太贵。”黄国刚称。

全程直击最重要出访 习近平9月在美国

记者 / 李光 李想（发自西雅图、华盛顿） 特约撰稿 / 卢伊

王传唐一身军装，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旁，摇着中国国旗，不停地往护栏外张望。当地时间9月25日，从早上7点开始，他就在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来。

已经69岁的王传唐说起话来有些吃力，但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进不去白宫南草坪的他，靠着勉强的听力猜测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习近平准备的欢迎仪式进展到了哪一步。“我得等到中午，”他说，“习主席估计能开完记者会”。

跟王传唐一起等待习近平的，还有上千名在美华人华侨。他们都想在最近的地方，见证又一次中美最高领导人的会晤成果。

这是习近平和奥巴马三年内的第五次会晤，但在中美关系最近屡生龃龉的背景下，外界本来并不太看好此次会面，甚至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叫嚣着让奥巴马取消此次接待。然而，越是棘手之时，越考验两国领导人的智慧和耐力。

“这次习近平的访问带来很多正面影响”，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向《凤凰周刊》记者坦言，正因为冲突点的存在，两国首脑的定期会面就显得颇为重要。去年11月北京“习奥会”前夕，两国国内的负面信息更多，但会面效果出乎意料的好，还达成了减排和军事方面的协议。“两国领导人都知道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国家利益，双方的深层利益都是要防止关系破裂。同时两国领导人也要积极地引导国内的舆论，建设友好互信的大环境。”

此次访问期间，习近平通过个性化的演讲和与青年学生的亲切互动，改变了外媒此前对其硬派作风的诠释，表现出亲善、温和的个人形象；也通过《老人与海》《常识》以及被喻为“美国宪政蓝本”的《联邦党人文集》，向外界传递其了解美国文化的一面；还通过与政商领袖的相互倾听和坦率交流，展现了一个现代、开放的领导人形象；更通过对气候变化、野生动物保护等过去中国饱受争议话题的回应，体现出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西雅图的老朋友们

当地时间9月22日上午，《凤凰周刊》记者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打开打车软件Uber时，弹出一条特意翻译成中文的提示：“欢迎习近

平主席一行到访”。这家在中国各地遭遇政策和法律挑战的美国公司，用这一独具匠心的方式，表达其对中国主席访美的欢迎。

这天上午，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及庞大的中国访美代表团乘坐波音747飞机抵达华盛顿州佩恩机场，正式开启其任内对美国为期四天的首次国事访问。

“习近平坐在正中，华盛顿州州长杰伊·英斯利和华盛顿大学代理校长安娜·考斯共同为他斟酒，后排左侧的星巴克CEO霍华德·舒尔茨准备递上咖啡，右侧的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手捧平板电脑，右后方的波音商用飞机首席执行官雷·康纳则等着送上一架波音787飞机模型。”

这是《西雅图时报》9月20日头版刊登的彩色漫画。该报以“华盛顿州张开欢迎双臂”为题刊发文章，用整整三版对习近平访美事宜进行报道。

将西雅图定为首秀第一站并不突兀。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华盛顿州最大出口目的地，而该州最大城市西雅图2014年对华出口额占该州总出口额的23%，并由此为当地创造了约9万个就业机会。西雅图也是中美经贸往来和人文互通的重要门户，除微软和波音公司外，谷歌、亚马逊等大型公司均将总部设在此地；就在去年，中国还凭借10万人的游客访问量成为西雅图最大的海外游客来源地。

西雅图同样有着接待中国领导人的历史传统。早在1993年，江泽民就曾在此会见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2006年胡锦涛访美时同样将西雅图设为首站，并在微软总部同比尔·盖茨会面，凸显出“中国最高领导层向美国高新技术产业释放的巨大诚意”。

习近平抵达西雅图当晚，在市中心的威斯汀酒店出席了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商务理事会举办的欢迎晚宴。晚宴开始前，习近平就外界关心的气候变化、贸易关系、网络安全、改革开放、依法治国、南海争端等重要议题发表演说。

作为访美期间的唯一政策演讲，习近平提到，中美双方应“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他还强调，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此后被国内外引述最多的话是习近平提到的，中国的反腐败“不是

政治斗争，没有‘纸牌屋’”。讲完后，台下笑声和掌声并发，习近平自己也笑了。美剧《纸牌屋》讲述了一个冷血无情的美国国会议员及与他同样野心勃勃的妻子在华盛顿白宫中运作权力的故事。

最接美国地气的发言，当属习近平提及他在青年时代读过《联邦党人文集》、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等著作，也喜欢了解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美国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他还特别提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并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些个性化的表述为其赢得多次掌声。

得以进入晚宴现场的媒体并不多，当地华人报纸《西华报》的出版人吴静雯告诉《凤凰周刊》，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一个”。早在骆家辉1982年竞选华盛顿州众议院议员时吴静雯就与他结识，所以这次，负责西雅图接待事宜的老友提名她作为去接机的三名华人代表之一，并给了她晚宴的入场券。

现场重量级嘉宾云集，美国各地政要也纷纷前往西雅图欢迎习近平。除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吴静雯在现场还遇到另一位“老朋友”——艾奥瓦州的Luca Berrone。“习主席的老朋友”是他印在名片上的唯一头衔。“习主席1985年率团到艾奥瓦考察农业经济时，我是他的导游，和他共处了两个礼拜”，一边说着，Berrone向大家展示出当年的老照片。

吴静雯说，很多美国人觉得中国官员的讲话枯燥无味，充斥着宣传调调，“但习近平的演讲打破传统，风度翩翩，且有实质内容”。习近平演讲后，中美来宾长时间起立鼓掌。吴静雯认为，他展现了一个“现代而开放的”领导人形象。

“习主席没有回避问题，大家关心的每个方面都谈到了。”身旁的一位中国官员与吴静雯交流时称，这次演讲令人耳目一新，很多内容他们也是头一次听到。

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的绿点战略咨询公司CEO唐兴（Daniel B. Wright）对《凤凰周刊》记者坦言，当天的气氛比他想象的要好：一方面，习近平的演讲表明他对美国社会、文化有了解，说明中方是在倾听美国人民、政府和企业所关心的话题的；另一方面，现场有700位美国人，不仅有基辛格这样的老朋友，也有很多新朋友，“整体感觉是大家希望中美关系越来越好”。

“虽然中美现在面临一些现实问题，但美国人民是愿意看到中国越来越好的。”唐兴最后特意强调：“我说的不是客气话。”

时空交错的旅行

当地时间9月23日上午，习近平前往参观波音公司交付中心时，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女士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来到专门从事癌症及致命传染病研究的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参观访问。这是她在此次访美期间唯一单独露面的公开参访活动。据美国《侨报》报道，彭丽媛本次活动由比尔·盖茨和夫人梅琳达·盖茨全程陪同。“第一夫人”的选择一来可以凸显科学创新的重要性，二来可以让大家对科研领域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有更多了解。

23日下午，习近平夫妇来到位于塔科马市的林肯高中，这显然也是习近平此行中最为轻松的行程。他摘下领带，解开领口，以更加平易近人的叔辈形象出现在高中生面前。

时隔22年的故地重游让这位提出“中国梦”的领导人终于在访美心愿单上替自己圆了一回梦。习近平上次到访这座美丽的港口城市还是1993年，那时也参观过林肯中学。当时在这位年轻福州市委书记的推动下，塔科马市和福州市于次年缔结为友好城市。塔科马市市长斯特里克兰说，正是这种时空交错，使得塔科马市在习近平的西雅图之行中“举重若轻”。

林肯高中的橄榄球队员以一场激烈的表演赛迎接中国领导人的到来，喜好体育运动的习近平还欣喜地从学生手中接过印有“1号”标志的球队队服和一只美式橄榄球。

接着习近平夫妇来到教室，当时“华盛顿州年度优秀教师”鲍林（Nathan Bowling）正在授课。在师生们齐声用中文“你好”同习近平夫妇简短问候后，鲍林继续讲述自己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体验与理解。鲍林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这堂课的准备并无太多特别之处：“学生们本来应该学习美国总统的权力运行，我在网上搜索了中国国家主席的职权范围，向学生们对比二者的异同。”

课堂上，学生讨论了各自对中美文化差异以及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习近平则回应了孩子们旺盛的好奇心，阐释中美交流的重要性，提出教育已架起一座将中美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桥梁。同时，习近平也鼓励孩子们有机会多去中国看看，因为“在中国旅行就像一场时间之旅”——中国流传着“两千年看西安，五百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的说法。

离开教室前，习近平微笑着和坐在第一排的学生们一一握手，引起后排学生的尖叫和情不自禁的笑声。一个女生在起身和习近平握手的同

时，还不忘用左手举着手机一直记录这一过程。在此之前，鲍林一度担心学生们会不会因为调皮而制造出一些“国际新闻”，但事实证明他们的表现“非常出色”。

接下来，习近平一行在学校礼堂欣赏了中美两国学生共同演唱的中英文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和《Wonderful World》，前者是彭丽媛1995年发行的代表作之一。表演结束后，习近平走上讲台发表演讲。

坐在台下的美国EE教育执行主任Theo“非常兴奋”，他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习近平离开后，他专门跑到空荡荡的座位前留影。从照片中可看到，校方细心地在椅背上贴了“习主席”和“彭丽媛同志”的中文名牌。

两天后，中方宣布未来三年将资助中美两国共5万名留学生到对方国家学习。美方则宣布将“十万强”计划从美大学延伸至美中小学，争取到2020年实现100万名美国学生学习中文的目标。作为“十万强”计划董事会成员之一，唐兴对此深有感触。他之所以从事中美文化交流的工作，与30年前留学中国的经历有关。“这是一项‘投资将来’的重要举措。目前中美关系面临挑战，但从长远来看，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基础，青年学生则是基础中的基础。两国领导人对此重视颇具眼光。”

9月23日晚，习近平从塔科马赶回拥挤的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组织的欢迎招待会，据说他还专程从北京带来月饼赠送给出席活动的侨界人士。出席晚宴的西雅图儿童医院副院长温志刚向《凤凰周刊》回忆当天的活动时说，习近平先用一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把大家都逗笑了，后来又用一句“悠悠天宁旷，切切故乡情”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令很多人热泪盈眶。

坦率交流征服美企巨头

尽管习近平在西雅图之行中取得积极的回馈，中美合作的分歧与隐忧仍存。面对中美合作的诸多未知数，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曾提出，将科技贸易问题同两国间广泛的经贸谈判捆绑在一起，或许能够缓和现有局势。

毋庸置疑，中美企业家座谈会是此次习近平访美行程中最具分量的经贸活动之一，该会议由中国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姜增伟和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共同牵头主持。9月23日上午，与会者除了习近平外，总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30家中美企业高管齐聚一堂。

此次会议围绕中美合作展开，而这些企业领导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

推动中国领导人改善美国企业在华商业生态，也是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作为主办方之一的保尔森基金会方面的消息称，习近平欢迎更多美国投资人来到中国，除经贸合作外，双方在此次会议中还谈及了包括绿色能源、知识产权保护等话题。《纽约时报》称，这场中美企业家间的圆桌会议气氛“十分亲密”。

唐兴向《凤凰周刊》透露，当天参加会议的好几位CEO都是自己的客户，“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坦率的交流，并不空洞。美方觉得，中方愿意听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立场。”

当天下午，习近平来到位于西雅图北部波音公司最大的装配工厂，登上车间里一架正在为厦门航空公司打造的波音787客机。随后，他告诉波音公司的数百名工人，中国将继续保持全球飞机制造商核心市场的位置，“未来几十年里，中国还需要6000架新飞机”。

互联网合作是此次华盛顿州之行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当天，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和微软公司共同举办的第八届中美互联网行业论坛正式拉开帷幕。知情人表示，中美互联网行业论坛原本只是一个“除少部分人外，几乎没什么人知道的论坛”，今年却因为习近平的到来变得“盛况空前”。

会后，习近平与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用中文愉快互动的场景也抢尽风头。扎克伯格在其个人主页上抒写了同中国领导人见面的感受：“这是我第一次完全用外语同一国领导人进行沟通，这对我个人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能见到习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我深感荣幸。”而据在场记者透露，习近平当时风趣回应道，“中文说得不错！”

华府：艰难中的愉悦交流

西雅图举办的晚宴上，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开玩笑说，“这是比那个华盛顿（指美国首都）更好的华盛顿（指华盛顿州）。”《西雅图时报》也称，“考虑到下一站在华盛顿特区可能面临一些棘手的议题，习近平希望能够在西雅图展现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从此华盛顿到彼华盛顿，5小时航程，习近平的访美行程也从公共外交转入国事访问阶段。跟第一站西雅图重经贸不同，华盛顿讲政治，国务院里有着对中国持偏见的议员，加上最近中美分歧升级，“中美关系达临界点”的观点愈发流行，再加上罗马教皇刚访问华盛顿，整个首都对中国的欢迎程度有所打折。

提出“临界点”说法的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向《凤凰周刊》指出，中美之间的问题在于双方都知道良好的中美关系对自己国家的重

要性，但双方政府的外交政策经常偏离这个大方向，让对方“摸不清意图”，由此降低了双方间的信任。

然而，芮效俭则认为，“中美关系达临界点”的观点并不是在唱衰中美关系，相反更多是出于关切和焦急，“像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在靠近悬崖边，赶紧把他们拉回来”。

外界普遍认为，在这艰难但关键的一站，中美的交锋才刚刚开始。然而，习近平此次白宫之行，成效比外界的猜测要好得多。参加了此间部分活动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告诉《凤凰周刊》，“‘习奥会’的效果远胜预期。”9月24日晚，习近平与奥巴马的私人晚宴及对话未公开，但第二天，习近平称这场3个多小时的对话令他“非常感动”，奥巴马则在另一场合罕见使用“extremely productive”（极具成果）来评价此次对话。

从美国白宫摄影师独家提供给《凤凰周刊》的图集可见，白宫为习近平的到访做了非常温馨、细致的准备。白宫内举办了精彩的演出，习近平还与美国黑人R&B歌手尼欧微笑握手、互动，现场气氛欢快。全程习近平与奥巴马互动频繁，彭丽媛与米歇尔亦有愉悦交流。

Emily和Alex是来自华盛顿东北部育英学校的学生。当问及他们见到习近平夫妇的感受时，两个人羞涩地笑起来。Emily怯怯地回应道，“挺有意思的，主席夫人好美，”Alex则赶紧补了一句“我握了习主席的手”。育英学校一直以中文沉浸式教育方式出名，学生一进校就开始学中文。因为该学校极佳体现了中美文化交流的成果，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时还专门参观过该学校。此次习近平访问期间，学校更派出135名学生参加了欢迎仪式和动物园看熊猫的活动。

这是习近平成为主席后首次在白宫与奥巴马进行会谈，也是第四位中国领导人接受美国国宴规格迎接。奥巴马在白宫玫瑰园鸣21响礼炮欢迎习近平的访问。仪式后，两位中美最高领导人进行会面，会后公布了包含49项合作意向的成果清单。

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C.Bush III)向《凤凰周刊》记者指出，中美在网络安全和南海争端等敏感议题上达成共识对未来双边关系有积极影响。而在两国传统的合作领域，例如环保、文化交流和国际发展，也达成诸多协议。

针对网络安全，双方协议主要聚焦信息共享和打击恶意网络行为。中美同意就恶意网络活动提供信息及协助的请求要及时给予回应，并适当向对方提供调查现状及结果的最新信息。习近平在记者会上还明确表

达了中方将坚决打击恶意网络行为。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专家李侃如对此指出，此次中方的表态很重要，“以前中国只是反复否认相关指控，并强调自己也是网络窃密的受害者，但这次中国保证未来也不会从事此类活动，这是个进展。”

另一个争议点南海问题上，习近平否认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有关建设活动针对任何国家，也表示并未将南海岛礁军事化。这番言论在美国引发讨论，因为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公开提及“非军事化”这个概念。卜睿哲认为，“非军事化是个很重要的表态，它直接回应了美国对中国在南海活动的关切”，但他也表示，这个表态的意义还是要看未来中国怎么定义“军事化”。

此外，美国还将帮助中国国内反腐败工作的展开。美国国土安全部将与中国公安部适时在美举行第二次部级会晤，并开展通过包机遣返中国逃犯和非法移民的合作。人文方面，美方宣布争取到2020年，国内能有100万名学生学习中文。双方还同意加强联合研究，展开建立南极罗斯海海洋保护区的工作。

“习奥会”的成果清单里还有一个亮点，即力争于2016年举办的“首届中美省州立法机关合作论坛”。这种地方性交流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华盛顿和北京惯有的外交姿态，从一个更加微观、务实的角度来推进中美两国合作。

赵修业是中美领袖立法基金会里唯一的中国人，他从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硕士毕业后就一直在基金会工作。2014年进基金会后，赵修业开始着手准备相关资料，并跟中美两方的负责人沟通。最终，他和对外友协合作，预计在2016年举办的“首届中美省州立法机关合作论坛”被作为此次中美会谈的成果，写入合作清单。

除了国家层面的互动，省州级的交流合作其实也同样很有意义。”赵修业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这样的交流更能干实事，也能推进相关项目更快地实施。”

习近平的联合国三日

习近平在联合国的这几天，记者近距离观察，亲身感受其主持国际会议，平衡、沟通、掌控国际关系的技巧，以及在联合国舞台上，中国对世界真实影响力的变化。

记者／王衍（发自纽约联合国总部）

这并不是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首次发言，却是迄今为止，在全球近200个国家领导人齐聚一堂的场合，排在最为黄金的时段，向世界介绍中国。

当地时间9月28日上午11时22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第四位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礼宾官的陪同下，从联合国大会主席台后的金色屏障后面走出时，现场马上安静下来，随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凤凰周刊》记者在现场看到，此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超时的演讲结束后，现场陷入嘈杂和混乱；前一位登台的波兰总统演讲时，台下有听众到处走动和交头接耳。中国领导人的出现，立即扭转了局面，会议再次回到了严肃氛围。

接下来约20分钟的发言中，本刊记者亲历了现场听众前后15次热烈鼓掌——这个纪录甚至超过一贯最受瞩目的奥巴马。

按照联合国不成文的惯例，巴西和美国永远占据联大一般性辩论的前两位，剩下的则每年视情况而定。这次在波兰领导人之后，中国排在第四位，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第二个发言的国家。“虽然不能说排在前面的国家就那么重要，但中国这次肯定做足了功夫，因为谁都希望自家领导人能在黄金时间亮相。”一位谙熟联大流程的不具名外交官对记者如此解释。

在此一周前，《凤凰周刊》记者就来到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为此后的采访做准备。当地时间9月26-2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三天行程中，记者全程跟踪，近距离观察，亲身感受其主持国际会议，平衡、沟通、掌控国际关系的技巧，以及在联合国舞台上，中国对世界真实影响力的变化。

每一句承诺均获喝彩

习近平的此次联合国之旅，始于当地时间9月26日上午、联合国发展峰会的演讲台，这也是他在联合国总部的首次亮相。

联合国的舞台，向来竞争激烈。国家实力是领导人发言的后盾。1974年，邓小平作为第一个登上联合国讲台的中国领导人，向全世界阐述“第三世界”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国家理念时，并非是在专门留给领导人的联大一般性辩论，而只是在核安全问题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及至习近平登上发展峰会演讲台的时候，中国已然成为联合国各大重要场合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在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的主题讲话中，习近平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及在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中的大国担当，并提出中国愿同其他国家一道，开拓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为实现2015年后发展议程做出努力的诚挚信念。

发言中，习近平专注而自信，几乎完全没看演讲稿。在提到南南合作事宜时，全场一再响起掌声。演讲结束后，二三十位国家领导人拥簇在走廊外等待同他握手。“这是此次联合国发展峰会开幕以来，第一次有国家元首排队等待与另一位国家元首握手，”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事后表示。

“Amazing（了不起）”，这是与《凤凰周刊》记者日常交流中谈到中国的发展时，在联合国工作的外交官们大部分都会用到的一个词。联合国发展项目政策与项目支持局的巴巴图得（Babatunde　Omilola）向记者介绍说，“尤其在解决贫困与饥饿问题上，对比同样为人口大国的印度，中国表现突出；目前印度给予世界贫困和饥饿的负担是30%，中国只有8%。”

不少西方外交官是在2008年奥运会后注意到了中国的“颠覆性崛起”，对中国的国际贡献的期望也越来越高。比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讲到的“联合国的挑战是在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时的资金不足”。

此次习近平参加的三次重要会议上，均对这种期待反馈得“掷地有声”：20亿美元的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免除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向联合国妇女署1000万美元的捐款；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凤凰周刊》记者在现场聆听时，上述每句承诺均立即博得满堂喝彩。

上述“大手笔”承诺也引发外媒关注。《华盛顿邮报》认为此举“成功地帮助中国推翻了西方国家此前对中国的诸多责难”，而同日本、美国等国际援助方面的主要竞争国相比，不带附加政治和经济条件的援助承诺也“为中国加分”。

“主持人”习近平

1995年，北京成功举办了第四届联合国妇女大会，这次会议成为联合国妇女行动的一个里程碑。以至于20年后的今年，联合国专门举办“Beijing20”的纪念活动。

值此北京世界妇女峰会召开20周年之际，习近平作为主持人，主持了当地时间9月27日的全球妇女峰会。《凤凰周刊》记者坐在听众席第一排参加了此次峰会，同习近平就座的主席台仅隔一条走廊。

习近平手中的会议锤一声敲下，大会正式开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简单介绍后，习近平首先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就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阐述了中国主张。

当习近平提到“为支持全球妇女事业和联合国妇女署工作，中国将向联合国妇女署捐款1000万美元，用于支持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相关目标”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坐在习近平身旁的潘基文也绽露出了笑容，转头向习近平说，“感谢中国的慷慨相助”。

长达2小时的会议中，习近平主持得灵活而流畅，话语清晰而坚定，让整个会议自然过渡，气氛轻松和谐。一些其他国家领导人发言结束后，习近平会及时称赞，被“点赞”的国家有墨西哥、肯尼亚、巴西和法国等。各国元首接连不断地发言，习近平没有一丝松懈，他时常拿起手中的稿件，回头向身边的工作人员确定会议事宜。

但在会场之外，围绕该议题的氛围则没有那么祥和。就在活动当天，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社交网站Twitter上公开发难，对习近平有关妇女权益的讲话表示质疑。

对此，中国外交部官员回应，中国妇女事业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此前几名女权人士被拘捕是因为她们违反法律而非促进女权。正在纽约的外交部国际合作司司长李军华也表示，一些批评毫无根据，其他则是误导。“我相信，对中国妇女事业最有发言权的是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妇女。”

当习近平在联合国不同场合主持或演讲时，他的夫人彭丽媛的联合国行程也堪称忙碌，一天之内接连出席多个联合国高级会议，并发表两场英文演讲，呼吁全球关爱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关注儿童、尤其是女童的教育问题。彭丽媛健康、积极的形象，端庄、大方的举止以及流利的英文，都令人印象深刻。

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的彭丽媛，9月26

日下午参加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高级别会议时，用流利的英文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提到其父亲为了改变村民不识字的现状，特地开办了一所夜校帮助他们识字，从而使当地妇女开始有能力教育自己的孩子读书写字的教育经历，“多年前，我的父亲通过他自身努力改变了他所在的小村庄，而今天，大家携手努力就能改变世界”。她还坚信自己“教育优先”的“中国梦”，“将不再是一个梦想，而将成为全球每一个妇女都能共享的美好现实”。

“维和峰会”上的超长握手

要问联合国总部大楼中哪里最能代表中国，答案似乎是唯一的——二楼联合国代表休息室中悬挂的巨幅中国长城挂毯。

这幅挂毯，见证了各国联合国代表在这里不为人知的私下交谈，也见证了此次习近平的到访。当地时间9月27日上午，习近平在这里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赠送了新礼物——以中国红为主色调、由景泰蓝工艺烧制而成的“和平尊”。

作为当年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在联合国的分量如今已如这幅挂毯般醒目。当地时间9月28日上午，习近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70届会议一般性辩论会，第四个登上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最高讲台。

受此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超时演说的影响，部分听众离席。但在短短20分钟的演讲中，习近平淡定自若，娓娓阐述中国为世界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历史性贡献，回顾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过程，并呼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联合国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在21世纪更好回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课题。

“中国将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走合作发展的道路”，以此为基础，习近平强调，“中国将坚定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话毕，台下掌声雷动。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突破性支持，成为习近平联合国之行的另一大亮点。安理会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来自于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联合国大厦内的观光区，维和士兵的蓝色钢盔也成为游客最为青睐的合影物件。

习近平在联大发言中特别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

的维和待命部队。”

这样的规模无疑突破中国维和人员数量之最。官方资料显示，目前有3100多名中国维和人员正在世界各地为和平值守。从中国维和的参与性质上，这次宣布的“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也是官方的首次高调回应。

习近平还接受奥巴马的邀请，参加了由50多位国家元首共同出席的“联合国维和领导人峰会”。按照维和人员出兵国人数的排名，习的登台排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埃塞俄比亚等国家领导人之后。

演讲中他提到，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出兵国，已有18位中国军人和警察在维和行动中牺牲。他还用2010年在海地维和行动中殉职的女警察和志虹“一根羽毛”的故事，寄寓中国“以和为贵”的和平观。

发言结束时，上演了特殊一幕：美国总统奥巴马专门起身对习近平长时间握手致意，英国首相卡梅伦在紧随其后的演讲中也特别对中国的贡献表达感谢。

这样的态度和上世纪70年代，中国刚恢复联合国席位时截然不同。“那时整个国际政治氛围以斗争为主，中国也时刻保持着警惕和怀疑。维和任务上，中国认为这是美苏国家的‘把戏’。”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陈健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参与维和，打破了毛时代‘不向海外派遣一兵一卒’的外交政策。”而在2015年，中国维和步兵营首次走出国门，被外界视为是“韬光养晦”政策的突破。

对此，布鲁金斯学会负责外交政策的副会长琼斯（Bruce Jones）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中国的决定是一项重大贡献，“警力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缺口最大的部分，这是创建专门储备力量的第一步”。

（实习生卢伊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美定位之旅：

习近平访美的关键一步

习近平本次历史性访美已迈出了关键一步，接下来就要看正在角逐白宫宝座的美国政治人物们能否负责任地行动起来。

特约撰稿／刁大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我这次访问美国，是为和平而来，为合作而来，我们愿同美方一道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得到更大发展，更多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邓小平历史性访美的36年后，又一位中国国家领导人站到了白宫南草坪的演讲台前，向美国乃至全世界传递着来自东方大国的讯息。

2015年9月22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对美国展开首次国事访问。短短四天的密集行程留下诸多可载入史册的片段，而中国领导人与美国各界务实且坦诚的互动，充分体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作为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习近平的本次访问成功地丰富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势必使中美两国及世界人民获益。

然而，由于总统任期将在15个月后结束，奥巴马正加紧铸定政治遗产，已难以在中美关系等重大议题上做出实质贡献。这就意味着，经历了八年两国关系定位“漂流”之后，中美关系将驶入下一个阶段——2017年上台的美国新政府会如何看待中美关系、会否进一步接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或将是一大变量。

习近平访美的务实之意

今年2月11日，也是农历新年的前一周，习近平应邀与奥巴马通电话，接受了其关于9月对美进行国事访问的邀请。这一在外交惯例意义上宣布颇早的中美高访安排，流露出中美希望及早稳定两国关系、延续“瀛台夜话”良好气氛的强烈意愿。

随后，中美两国高层交流密集铺展开来：美国联邦政府15个内阁级部门中的5位部长与一位常务副部长排队访华。6月23日至24日，中美新一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人文交流磋商以丰硕成果为高访奏响序曲；8月底，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专程来京沟通；作为习近平特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也罕见地于9月9日至12日赴美，就某些敏感议题提前与美方敲定细节。

历时整整七个月的准备，足见中美对彼此的重视程度，也充分印证了当今中美关系本身及其涉及议题的紧迫与复杂。

不可忽视的是，习近平的访问是在美国政坛步入2016年大选周期、对华负面炒作噪音不断的背景下成行的，期间还伴有罗马教皇方济各访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辞职等偶发或突发事态分散公众注意力。在如此微妙的状况下成功访问，凸显了中方切实推进中美关系的态度和胸怀。

从本次访问行程看，虽然貌似延续了“在西海岸谈经贸、在东海岸谈政治”的传统套路，但在细节上显然进行过慎重的战略规划。四天的行程中，多半时间放在了华府之外的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与在华府的高层对话相比，在西雅图的行程更为多样，意在对两国关系多元的主动塑造。

在西雅图，习近平发表了访问中唯一全方位、多层次的“增信释疑”的政策演讲，向全美乃至全世界讲述了“中国梦”引领下的“中国故事”，介绍了中国各方面发展的现状与愿景，解释了反腐败的努力与决心，重申了中国在新常态下持续深化改革、引领世界经济、维护全球和平的责任。在演讲中，习近平传递出包容开放、自信坚定而又不失人情味与幽默感的大国领袖魅力。

在省州长论坛、互联网论坛以及参观波音公司等场合，习近平反复发出强化经贸合作、技术交流、网络对话的明确信号，期待以此将中美两国利益紧密地交织起来。习近平夫妇对林肯中学的访问，则是传达出令美国普通人有感的肺腑之言：中国领导人的访问并非只是“做生意”与“谈政治”，更是来表达13亿多人民的深情厚谊。

如果说华盛顿州的两天多是在稳固并扩展两国关系根基的话，在华府的一天多则充分彰显了中美高层的合作共识以及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默契沟通。换言之，在高度重视奥巴马政府的同时，习近平本次访问的意义被期待足以超越奥巴马任期，对两国关系意义深远。

关于第三次“习奥会”可能带来的“惊喜”，坊间早已期待满满。不过，与去年“瀛台夜话”后的“十年签证”等实惠成果相比，本次49项成果中的大部分似乎对普通公众而言很难立刻“落地开花”。

但实际上，这份成果清单同样能为普通人带来福利：比如更为便利地且有质量地赴美旅游，在影院里欣赏到更多精彩的美国大片及中美合拍片，让孩子有更多机会在上大学之前就赴美交流，使用更为严格而科学的标准控制空气、水体等环境质量，等等。同时，如中美投资协定（BIT）、金融服务、技术与知识产权交流、农业合作、卫生医疗合作、环保与清洁能源合作、反腐合作、省州立法机构交流等需要持续推

进的中长期成果，也将在未来潜移默化中使得两国获益。

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在世界格局、亚太局势以及两国关系意义上都获得了众多共识性成果，比如中美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问题上达成的共识，这些框架性进展势必从根本上引领中美携手前行。

恰恰是少了些许“眼前惊喜”的“习奥会”，或许才真正符合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常态。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的合作空间广阔，分歧同样错综复杂。随着两国关系的深化，一蹴而就的“容易摘的桃子”一定会越来越少，两国在众多议题上保持相向而行地持续推进已是重大成就。基于这一判断，习近平本次访问重在务实，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定位的推进堪称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美关系定位的漂流

在一百年后的国际关系史教科书里，2008年极可能被视为一个“分水岭”年份。其重要意义并非由于美国破天荒地选出了首位非洲裔总统，而是因为这个“上帝选民的国度”爆发了延烧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几乎同时在第29届夏季奥运会上令世界惊艳的中国魅力。

面对太平洋两岸的迥异情形，背负着从“反恐”到“反衰落”使命的奥巴马上台伊始，就启动了一系列针对亚太地区的战略试探。2009年2月15日，国务卿希拉里将上任后的首次外访布局在亚太地区，先后造访了日本、印尼、韩国以及中国。在北京，希拉里得到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等中国高层的接见。在公开报道中，中美双方共识良多，但却未出现6个月前小布什来京出席奥运会时与中国领导人共同重申的“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一说。尔后，踏上回程的希拉里在东京横田空军基地短暂停留时，再次抛出所谓的“巧实力”外交。

所谓的“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即2001年10月上海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上中美高层领导人共同确定的关于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明确定位。虽然当时存在着明显的反恐背景，但这一定位完全符合中美长期战略中非结盟又非敌对的合作关系，一定程度上是1997年“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延续与深化。这一共识性定位有效地管控了当年4月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后的关系波动，为小布什时代的对华政策确定了底色。

虽然民主党人奥巴马一直对共和党前任的内外政策猛烈批评，但在中美关系上，他同样也被期待能够延续小布什的务实作风。2009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提出了中美的“战略再保证”，即美国不会遏制、反而欢迎中国崛起，但中国也应保证维护世界与区域安

全，从而缓解彼此疑虑、扩展合作。不过，这一定位并没有在奥巴马政府内得到广泛认同，随后不了了之。

在希拉里离京9个月后，奥巴马打破美国总统任期第二年访华的传统、于11月15日雨夜中抵达上海，展开国事访问。此后，两国共同发表《中美联合声明》，高度肯定并同意延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并称“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二十一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相比于克林顿和小布什两届政府的高度提炼，这组表述流露出中美两国之间的微妙调整。

面对难得“高开”的中美关系，美国学术界和战略界早在金融危机前就推出各种判断，其中最出名的是所谓的“中美国”(Chimerica)和“G2”。

与强调经济上“共生关系”的前者相比，强调“平等伙伴、中美共管”的“G2”一开始得到了包括布热津斯基、佐利克甚至基辛格等美国战略界重量级人物不同程度的正面回应，奥巴马政府高层也有支持声音；甚至有观点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视为是“G2”的具体体现。不过，由于其概念范畴过于模糊，不但遭受美国国内鹰派保守势力的抨击，也存在引发美国与日本等亚太盟友的矛盾风险。更为重要的是，“G2”虽然实质上欢迎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但其“两国集团”的核心内容并不符合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以及长期奉行的“多极世界”外交理念。2009年5月，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访欧期间明确澄清称，“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

2011年1月14日，希拉里在华府发表演讲时强调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但声称没有“G2”之类的安排。4天之后，胡锦涛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再次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将中美关系定调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共识性定位结合了1997年的“伙伴”和2001年的“合作”，并将“建设性”具体化为“互相尊重、互利共赢”，可谓颇为正面。不久后的2月14日，日本政府公布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低于中国，中国正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同年10月，希拉里在《外交政策》上发表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署名文章，吹响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的“号角”；11月，希拉里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再次喊话：亚太地区将是美国今后外交战略的重心；12月，奥巴马在夏威夷檀香山APEC峰会期间高调确认了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也就是在此次系列会议期间，号称“经济北约”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进入了加速推进期。

2012年开始，中国周边局势风云突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相继

爆发，美国因素如影随形。中美关系中负面的“互疑”成分激增，关于“合作伙伴关系”的正面定位实质上陷入了“漂流”状态。

是年2月1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审时度势地提出“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也是其首次提出旨在实现中美关系新时期再定位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6月，在与奥巴马举行“庄园会晤”期间，已就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再次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将这一概念丰富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不断丰富，“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国领导层在中美关系上的明确主张，并在几乎所有涉美场合被反复重申，一定程度上也得到奥巴马政府的回应。

2013年3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隆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讲时坦言，“美中双方正在构建既有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new model of relations between an existing power and an emerging one）”。此次表态一度被认为是美国一定程度上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信号，即便其讲话重点仍是通过新型关系强化沟通与合作，特别是强化两军关系。而一个月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登普西访华时，虽反复强调强化两军关系，却未提及“新型大国关系”。

2013年11月，接替多尼隆的苏珊·赖斯在乔治城大学的公开演讲中正面承认：“在中国问题上，我们寻求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这就意味着，在亚洲以及其他地区，两国要管控不可避免的竞争，同时在利益交织的议题上深入合作。”这是奥巴马政府高层在公开场合首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完整使用“新型大国关系”一词，但重点仍在避免冲突与强化合作，绕开了“相互尊重”。

虽然美方高层逐渐显现出某种积极回应，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脚步并未就此终止，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甚至上升为两国主要分歧范畴。2013年9、10月间，习近平相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筹建倡议，旨在促进相关区域与国家的互联互通及经济一体化，并且加强中国与其他亚、欧、非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密切合作。然而，这些彰显发展中大国国际担当的建设性举措，却遭遇了美方更多怀疑，直接表现为加速在经济与军事意义上的“再平衡”进程。

2014年5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访美，与登普西

会谈。在记者会上，房峰辉谈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及两军的“新型关系”；登普西虽宣称“基于两军关系的对话加强了了解和合作，并有助于管控分歧、避免误判与冲突”，但并未回应“新型关系”的提法。双方随后在提问环节还就亚太再平衡，东海、南海事务各执立场。

半年后的11月4日，也是奥巴马访华前夕，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关于中美关系的专题演讲时，刻意回避“新型大国关系”，通篇未提“新型”一词。在之后的国务院吹风会上，时任国安会亚洲事务主管的麦艾文强调，“美国不参与‘口号外交’……如果‘新型’意味着更多更好的合作以及防止必然的战略对抗的话，我们认为是有意义的……但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用不用这个说法’，而是‘这个说法意味着什么，其内容是什么’”。

麦艾文的表态，不但阐述了奥巴马政府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也再次暴露出中美两国在这一概念上的分歧所在，即美方认同“不冲突”“不对抗”乃至“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却绝口不提“相互尊重”的“大国”关系。随后，奥巴马第二次访华，在11月12日两国元首共同出席的记者会上，习近平至少三次谈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却没有提及“新型”一词。

本次习近平访美期间，在白宫南草坪欢迎致辞和玫瑰园记者会两个公开场合，习近平多次论及“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却仍旧避免公开使用这一概念。但在9月24日晚的第三次“习奥会”上，奥巴马表示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然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国尤其是美中之间要尽量避免冲突。我相信美中两国有能力管控好分歧。美中之间的竞争应该是建设性的、具有积极意义的。”

这似乎意味着，两国领导人回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逻辑上，为中美关系划出了共识性底线，即“不冲突、不对抗”、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按照美国副总统乔·拜登的说法是，“再过50年，我们的下一代回顾中美这段历史时一定会倍感庆幸，两国领导人在这个关键时候避免了冲突。”

“竞合共处”的中美新常态

“面对崛起的中国，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本应将美国的军事与经济资源聚焦在该地区。然而这一战略并未阻止中国的挑衅，令美国的盟友大失所望。”9月24日，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初选民调中位列前茅的本·卡森在《国家利益》撰文，描述了他的执政愿景：“在我的领导下，美国将与盟友一道，确保社会主义中国做负责任的事情，我们会维护自由市

场与自由人民的利益。”

身为圈外人，卡森的白宫之路可谓渺茫，但其涉华言论却在当今的美国政坛中颇具代表性。今年以来，美国学界、战略界对中美关系的各种热议与争论，一定程度上也旨在为新一届政府准备“政策工具箱”。未来数月，随着两党总统竞选候选人的日渐明朗，偏激与情绪化的涉华言论也会更多地被具体的对华政策宣誓所取代。

虽然民主、共和两党历来在对华事务上有所侧重，但目前就两党政治人物以及分属两党阵营智库的言论看，“亚太再平衡”战略极可能被全面且彻底地加以延续。该战略的推进，也加剧着中美两国互疑的加深。

目前美国决策界已呈现出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失望与焦虑：对中国并未发生如美国所期待般“转型”的失望；认为中国没能担负更大国际责任，或认为中国对现有秩序做出补充的举措在挑战美国主导体系的怀疑；面对中国市场经济日臻成熟、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美国企业无法保持以往超高收益而产生的失落，等等。反观中国，近年来出现了在政治、经济、社会治理、国际领导力等众多角度上唱衰美国的趋势，“中国成为超越美国、建构世界新秩序的大国”等论述此起彼伏。

客观而言，中美两国已逐渐进入所谓的“权力转移”时期，由于两国各自特定的实力对比以及全球化下相互依赖的时代背景，这次转移过程可能颇为漫长，或将贯穿几代人，甚至会超越所谓的“过渡期”而形成中美两国长期“竞合共处”的“过渡性常态”。而处于适应过程中的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达成共识性定位的过程必然要慢于以往、难于以往，甚至毫无历史经验可容借鉴。这也就完全可以解释中美在“新型大国关系”上的你来我往。

奥巴马时代，中美两国在磨合中最终达成关于“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共识，为“新型大国关系”的长期愿景奠定下宽厚而坚实的战略基础。面向未来，需要两国领导人拿出充分的战略耐心与远见，致力于充分而全面地扩展“合作共赢”的空间与实效，以大国姿态处理好彼此分歧，以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国所应有的担当来共同分担国际责任、维护世界秩序与地区安全，从而赢得彼此的“相互尊重”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国尊重。

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本次的历史性访美已迈出了关键一步，接下来就要看正在角逐白宫宝座的美国政治人物们能否负责任地行动起来。

习近平9月访美可打95分

9月24日私人晚宴的很多内容不能公开，但奥巴马第二天用了“extremely productive”（极具成果）来评价，这是非常罕见的。在美国语境中，甚少会用“extremely”这个形容词。

文／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此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美国国内发生着国会议员辞职和教皇访问这些重要的国内外大事，有些中国代表团有准备，有些可能没有准备，但是整体上没有太大干扰，我没有听到周围有人给予负面描述，美国主流媒体的评论也是相对积极的。

在我看来，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来访前美国各界人士整体预期不高，因为当时美中关系暗流潮涌，面临诸多挑战，我对中方设计一些活动的效果态度上也有所保留，比如之前我觉得可能习近平和商界接触过多，但和民间接触较少。但现在来看，这次访问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如果要我打分的话，我会给95分。

中美之间不再有以前冷战时期那样的意识形态冲突，也不是在诸多领域利益冲突，更多的是误解和误判。这次习近平的访美，是在消除这些误解，稳定目前关键时期的中美关系，阻止中美关系的恶化。

最成功的演讲在西雅图

在习近平9月下旬访美的一系列活动中，我参加了他在西雅图和华盛顿的多场访问。其中，我认为最成功的一次，是他在西雅图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其他友好团体欢迎晚宴上的主题演讲。与他在访美期间在华盛顿和纽约的演讲相比，这一关于国内外政策的主题演讲最为全面。

在他访美前，美国商界对中国经济的态度并不乐观，媒体对中国的批评更是铺天盖地。此前我也在中国媒体上讲过，此次习主席访问面临的挑战比当年邓小平访美更困难。在美国商界，主要围绕是否对中国经济有信心、中国市场是开放还是封闭、中美经济是否利益互补三个方面的问题存有疑虑。但是习近平在西雅图的晚宴演讲中，先讲自己的个人成长经历、中国经济的现实、他个人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尊重，甚至一些幽默的故事，然后认真回答了美国各界关于中美关系所关心的主要问题。

在座的美国政商学界700多位听众现场聆听了那场演讲，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演讲有如此大的感召力。结束后的几个酒会上，很多人告诉我，他们对中美关系和习主席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有人甚至猜

想，是不是习的智囊团队里换了撰稿人。对此我不以为然，反而觉得这证明了他的团队为这次访问做了大量优质的准备。

从实质性合作来看，此次中方订购了300架波音飞机，这让很多美国商界人士感到振奋，单凭这一点就让美国商界相信，不需要用过多语言去描述中国经济了，他们对中国重拾信心。另一方面，在西雅图所举办的“中美互联网论坛”，中美各界IT精英云集，也为接下来在华盛顿要谈的中美网络安全问题开了个好头，奠定了合作基础。应该说，西雅图首站就为其接下来的访问定了调。

“习奥会”远胜此前预期

随后在华盛顿的访问中，第一天（当地时间9月24日）晚，习近平与奥巴马在白宫附近的布莱尔国宾馆进行了私人晚宴。这场对话的很多内容不能公开，但奥巴马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时用了“extremely productive”（极具成果）来评价此次“习奥会”，这是非常罕见的。在美国语境中，甚少会用“extremely”这个形容词。

第二天（9月25日）习近平在副总统拜登于国务院举办的午宴演讲中，进行了脱稿评论，我也在场。他说到前一天私人晚宴与奥巴马总统谈了三个多小时，这让他觉得“非常感动”。

从这两个细节可以推想，两位领导人之间一定发生了非常积极的互动。虽然这是外人不可能知道的，但我们能感觉到，两国领导人的关系可以通过多次接触，慢慢消除误解。应该说，华盛顿的“习奥会”比之前的预期好很多，并不像有些媒体说的——西雅图与华盛顿的访问形成一好一坏的反差。白宫南草坪的欢迎仪式上，我个人的感受是，两个人都很轻松。

白宫的国宴是奥巴马政府给予习近平的最高接待礼遇。包括多位美国商业IT精英（如马克·扎克伯格）、布鲁金斯学会我的几位同事（如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斯特罗布·塔尔伯特和高级研究员杰弗里·贝德）等均参加了这次国宴。习近平则展现了他是一个充满信心的领导人，这种信心体现在他很坦诚地讲到中美之间的不同。

通过肢体语言来看，中美领导人相互的尊重和默契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较之以往会见达赖等事件，此次奥巴马明确提到“只有一个中国”，体现了他对中国主权的尊重。

中美舆论回归健康轨道

根据外交部和白宫公布的合作清单，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达成了

诸多共识，建立了交流机制，正如美国媒体评价的，这是中美之间的一种进步。

在这个问题上，我注意到两个细节：一个是美方对于网络安全词汇的描述，美国官方使用了“网络犯罪”（Cyber Crime）一词，而没有使用中国颇为介意的“网络偷盗”（Cyber Theft），这说明美国照顾到中国心理上对“偷盗”一词的忌讳；另一个是这样由最高领导人同意建立的网络安全机制，从某种意义上扫除了前段时间“美国国会起诉5名中国军官”一事的阴影，将两国在这方面的尴尬引导到主动合作的轨道上来。

不过，坦率地讲，网络间谍每个国家都在做，但是关于公司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制度上中国方面确实不如美国健全。当一个公司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知识产品创新和研发后，如果得不到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反而遭遇侵犯和偷窃，这不仅给原本创新的公司带来巨大损失，也违反了职业道德准则和国际贸易规则。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进行知识产权侵犯和偷盗的企业——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企业——都应予以惩罚。

此次访美之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侵犯一事有所制裁，但这并不能简单化理解为损害了习近平的访问成果。我相信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从中方字里行间的表述，中国也表现出愿意配合的姿态。相比之下，这次两国合作突破不太大的是南海方面。但值得高兴的是，这个问题没有在美国媒体上被继续扩大，当地媒体更多还是聚焦在网络安全的合作上。某种程度上，通过习访美的舆论转向，使得中美关系在公众视野上回归到一个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

理解“充满矛盾”的中国领导人

总的来看，“中美关系何处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何处去”，这也是美国国内对华战略展开讨论的重要原因。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习近平，往往更多的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在选择中”的领导人。

在经济改革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主张放开私营经济，使其成为中国经济的驱动力；但同时，他又继续强调中国国企的旗舰作用，对外国IT企业进行严格的互联网控制，这些被西方认为会损害真正的市场经济的活力。

在政治治理上，他一方面依赖用意识形态加强监督、采取政治保守的治理方法；另一方面他又呼吁推动中国智库建设，并优先考虑智库的建议作为国家战略目标。习近平的经济团队也有着诸多西方教育背景的技术专家，他还敦促更多“海归”回国。

今年早些时候，全国人大对外公布了《境外NGO管理法（草案）》，被一些人认为变得闭关自守。但有趣的是，今年6月，习主席高规格地接待了昂山素季这位缅甸反对派领导人。一直以来，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也积极参与国外NGO组织的活动，尤其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亲身参与反吸烟、预防艾滋病和其他公益事业。

对外关系上，习近平频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巩固中俄关系，但在涉及中美关系时，他多次强调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而在一方面提出“亚洲人治理的亚洲”的同时，他也表示“太平洋足够广阔可容纳中国和美国”。朝鲜半岛问题上，目前来看，习近平明确地站在了“反核”的韩国一方，而非朝鲜。

在如此之多的内政外交处理上，都体现了“矛盾”之处，但这恰恰表明习近平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可以很灵活。在我看来，一些所谓的“矛盾”大多源于外界对中国抱有过高而不切实际的期待，比方说怎么能期待中国在三年内迅速成为一个完全的法治国家呢？要知道美英国家用了几十年或几百年时间才完成这个过程。我相信很多矛盾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水到渠成地解决。

所以，习近平访美前，我提出美国应该全面、动态而不是简单化地理解这位“充满矛盾”却拥有智慧和魄力的中国领导人，理解同样充满矛盾、前景多样、飞速发展中的当今中国。习近平的成功访美也再次告诉我们这一理解的重要性。

（采访整理 记者／王衍、李光）

太平洋海军迎来大调整

美海军靠什么折腾南海？

特约撰稿／田剑威

自从美国高举“重返亚太”的旗帜以来，南海无疑成为中美之间的“新热点”。

10月27日，美国派出“拉森”号宙斯盾驱逐舰进入南海，在中国渚碧礁和美济礁附近12海里以内水域巡航，理由是防止这些经填海造地扩大的岛礁影响到“航行自由”。中国驻美国华盛顿大使馆对此做出回应，希望美国不要滥用航行自由权利，将其作为显示自己军事实力的借口。当天傍晚，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还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就此事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如此形势下，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于11月2日访问北京，引发外界关注。虽然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舰南海巡航不在议程单上，但“双方将坦诚探讨和管理分歧”的说法，给外界留下想象空间。

据悉，哈里斯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演讲时称，美军将继续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行使国际法赋予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南海不是例外。但他同时也呼吁中美应建立更密切的军事关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称，看着最近一系列事态发展，感觉好像在看一出自编自导自演的戏。她还表示，奉劝美方切实尊重别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真正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负责任和建设性作用。

对于美方密集的兵力调动，日本《军事研究》分析称，美军主要是反制中国在南海的“快速填海造地运动”，牵制中国建立“南海防空识别区”。“美国在南海问题仍然小心谨慎，免得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拉进一场不属于自己的战争中。”

第七舰队不够，第三舰队来帮

围绕中美因南海可能产生的冲突，《军事研究》特约主笔河津幸英撰写过多篇军力分析报道，他的结论是“中国太近，美国太远”，“天然的距离战斗力属于中国”。其中的依据之一是作为“前沿部署”的美国第七舰队并不具备在南海持久“兴风作浪”的本钱。

根据美国五角大楼官网提供的数据，驻横须贺的美国第七舰队第十五驱逐舰中队（DESRON-15）是现阶段唯一能长期向南海派遣作战舰的力量，它下辖七艘伯克级宙斯盾驱逐舰，即“柯蒂斯·威尔伯”号

（DDG-54）、“约翰·S·麦凯恩”号（DDG-56）、“费兹杰罗”号（DDG-62）、“斯特塞姆”号（DDG-63）、“拉森”号（DDG-82）、“麦坎贝尔”号（DDG-85）和“马斯廷”号（DDG-89）。包括“拉森”号（DDG-82）在内的后三艘属于Flight IIA构型，拥有容纳两架SH-60B或MH-60R直升机的机库，是美国在南海实施持久巡逻乃至追踪中国潜艇动向的骨干。

即便如此，“很难想象中美会在南海爆发失控的武装冲突”，河津幸英指出，“因为这些大吨位主力舰不适合执行长时间的威慑巡航，况且南海密布珊瑚礁，严重限制宙斯盾舰的活动范围。”

因此，为满足五角大楼向南海投入更多军事力量的需求，据美国《军事时报》10月2日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上将决定将原本集结在夏威夷的第三舰队舰艇更多投放到西太平洋水域，尤其加强在具有争议性的南海水域的海空兵力。

太平洋舰队下辖第三、七舰队，整个任务海域面积约2.6亿平方公里，司令部设在夏威夷珍珠港。第三、七舰队是以东经180度（国际日期变更线）为界，第七舰队负责以西直到东经17度的印度洋（不包括波斯湾、亚丁湾、阿拉伯海西北部），第三舰队的区域由此往东，北起北冰洋，南至南极，直到美国西海岸，面积约1.3亿万平方公里。第三舰队指挥部设在洛玛角海军基地，负责东太平洋作战任务以及美国西海岸至阿拉斯加州的防务，同时支援第五、六、七舰队的作战行动。

若以棒球术语来形容，第七舰队是先发投手，第三舰队是中继与后援投手，但按照目前态势发展，第三舰队很可能丢掉中继的角色，直接上场当先发。日本海上自卫队不久前在东京湾举行海上观舰式，该活动向来是由作为前进部署的驻日美国第七舰队司令代表美国海军出席，这回却一反常态地安排第三舰队司令诺拉·泰森中将出席，可谓涵意颇深。

同时，自从2013年开始菲律宾等国炒作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地”以来，美军机舰很少进入经人造扩大的中方岛礁12海里范围内。如今要实施“前进部署”的美国第三舰队，首要任务区就是南海。根据太平洋舰队相关消息，这项计划的用意是要消除行政管理界限，不过该计划目前仍在构想阶段。要知道，同一个任务海区有两个不同番号的部队在活动，却互不隶属另一个部队节制，这在美国海军历史上前所未见——以往任何横跨国际日期变更线西去的美国军舰都须自动向第七舰队报到，接受该舰队司令部所节制。因此今后美国海军会如何运作，外界颇费思量。

美军难以兼顾全球热点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也针对南海未来可能的事端，把三万名陆战队员（约占总兵力的15%）从美国本土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其中将5000余名驻扎日本本土的陆战队员及其家属迁至关岛，冲绳和夏威夷未来分别维持1万人和8800人的驻军，每年向澳大利亚达尔文港轮驻一支陆战队，人数维持在2500人左右。此外，美国美军陆战队会参与更多在印度洋的任务或演习。

上述的兵力调动，是根据美军在2015年3月所公布的“21世纪海上力量联合战略”的精神，即要求美国海军的职能要做到维护全军执行“全球公域进入”（all domain access）。这表明，美国海上部队能自由出入所有海洋、地区和空天领域、网络空间及电磁领域。不过由于资源有限，未来美军活动重点会放在印度洋-东南亚-太平洋地区。

按照计划，美国海军在2020年以前将把总兵力的60%部署在该地区，届时四艘攻击核潜艇会以关岛为基地（目前三艘），最新的DDG-1000朱姆沃尔特级隐形驱逐舰和具有反导能力的伯克级宙斯盾驱逐舰、更多的濒海战斗舰、F-35战斗机及MQ-4C“海神”无人侦察机等兵力也会陆续进驻西太平洋地区。

总的来看，美国只有海军及与其关系亲密的陆战队在亚太方向做出大动作，理应呼应的空军及陆军却没有类似的调动。美国空军和陆军在叙利亚及欧洲都有难以脱身的事务，陆军虽然尝试在亚太有更深入的着墨，但现在还是处于测试阶段，未来亚太陆地事务势必还是由陆战队唱主角。很显然，美军正处于一个拿捏不定的阶段，由于全球事务太多，随着兵力与预算的减少，未来会更加“顾此失彼”。

从逐步加强在中国周边的海空兵力来看，美军战略规划已为今后10-20年的亚太公海区域军事活动埋下伏笔，但中国在维护自身海洋权益，特别是岛礁建设方面不会买美国的账。

本港《亚太防务》杂志称，中美安全关系可区分态势与军力行动掌握两大部分：在态势部分，美军要的是能牵制解放军在南海的动态，而中国希望在维持主权与海洋利益下，不要干扰“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在军事行动部分，不管是美军或解放军，恐怕最想掌握的还是对方水下潜艇或水下无人潜航器的动态。由此看来，解放军只要采取“各打各的”方式，不正面与美国机舰交锋，有规则按规则，没规则警告几声，也不会擦枪走火。待撑到岛礁扩建完工，真正实质掌握的“范围”远比宣布带有敏感性的“规则”更具战略利益。

从博物馆透视美国文化

美国的博物馆业相当发达，无论是管理、馆藏、推广还是服务，都是举世公认最先进的博物馆体系。它们风格各异，主题各不相同，展示出了一个颇为生动的美国形象。

文/韩晗(作家)

在美国，除了学校之外，我去过最多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超市，另一个就是博物馆。

前者是生活所迫，柴米油盐，谁都不能免俗，而后者则是精神追求，大概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爱好使然。在我看来，在博物馆里待上一天，比听几次讲座、读几本书的受益都要大得多。

正因为此，我粗略算了一下，半年时间里，我去了美国二十多个博物馆——当中既有规模庞大的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Princeton University Museum），也有规模极小的北卡格林斯堡博物馆（Greensboro Museum, NC）、革命女儿会博物馆（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Museum）等微型博物馆或专题博物馆。

坦率地说，美国的博物馆业相当发达，无论是管理、馆藏、推广还是服务上，都是举世公认最先进的博物馆体系。但笔者认为，美国的大小博物馆却各有千秋，它们虽然风格各异，主题各不相同，但如果远观，则综合地展示出了一个颇为生动的美国形象，这一点尤其有趣。

不歇业的“鬼城”博物馆

很多人认为，博物馆一定是经济发展卓越地区的产物，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博物馆、音乐厅、图书馆这种“礼乐文化”的产物，势必是先进经济主导下的结果。这一点在东亚新兴经济地区确实体现得比较明显，但是在美国，却不攻自破。

在美国，有一万多家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它们不分贫富、童叟无欺地分布在美国不同的地区，有些地区的博物馆，你单看其精美豪华的建筑，根本不敢想象它所处的城市，早已凋敝废弃，沦为“鬼城”。

众所周知，美国有绵延几千公里的“锈带”，属于曾经的老工业基地，随着产业革命的兴起，这些地方基本上都已经荒弃，当地的中产阶级早已搬离，只剩下一些最穷困的流浪汉、酒鬼与小偷。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美国也不例外。只要某地形成了“鬼城”，其他地方的社会渣滓便纷纷涌向此地，与当地的混混、帮派沆瀣一气，成为了困扰该州的治安毒瘤。

但令人惊奇的是，就在这样的“鬼城”里，博物馆还在营业，甚至有些博物馆犹如教堂一般，还在艰苦地做着文化普及、社会教化的工作。

在美国旅行的一路，我见识过不少这样的“鬼城”，它们分布在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等“锈带”上。当地的商场早已倒闭，橱窗被砸得稀巴烂；餐厅变成了黑人酒鬼们酗酒、赌博的乐园，大有“万户萧疏鬼唱歌”之景；停车场都已经废弃，仅有几辆残破的卡车停在那里，轮胎早已破瘪而车身腐蚀朽烂犹如出土文物；甚至酒店游泳池里杂草丛生，摩天大楼的窗户被水泥全部砌死。凡此种种，触目惊心至极。尽管如此，当地的博物馆仍然开门迎客，而且尽量做到整齐如新，让游客们遗忘掉周围的危险与凋敝。

譬如说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市（Erie），它本与加拿大的多伦多隔湖相望，风景绝佳，堪称秀美之城。但因为工业转型的失败，使其成为了一座令人恐惧、臭名昭彰的“鬼城”，许多美国人都对这座城市望而生畏。但这座城市里的两座博物馆却鼎鼎大名。一座是伊利航运博物馆（Erie Maritime Museum），一座是伊利艺术博物馆（Erie Art Museum），前者是美国少数几个内湖航运博物馆，据说在航运史界颇有声威，收藏了不少造船史、交通史的文物；而后者曾被一家基金会重新拨款装修，据说还拿到了2011年的设计大奖。

我曾在伊利艺术博物馆门前远远地张望了一下，因为博物馆周围躺着好几位醉酒的黑人流浪汉，我实在没有进去的勇气。但这栋楼确实很别致，馆内窗明几净、精致可人，可惜没有一个参观者，而服务员们则在里面安静地等候着参观者的到来。错过这座博物馆，我至今引为憾事。美国的朋友在事后却告诉我，在任何一个危险的城市，博物馆里当然是最安全的。

即使如雪城（Syracuse）艾弗森美术馆（Everson Museum）这样有些残破、老旧的博物馆，仍然会保持每天按时开业、歇业的工作秩序，这尤其让我感动。犹如台下只有一个观众，一流的演员也会完成一场演出，哪怕这座城市成为了“鬼城”，博物馆也照常开门迎客，这种对文化的坚守，让我想到了泰坦尼克号上面临沉船而继续演奏的三位小提琴手，他们是欧美精英主义文化传统的具体反映。而我认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则更需要这种坚守文化的力量。

体格“魁梧”的巨型博物馆

当然，这些处于“鬼城”的博物馆只是美国博物馆的一小部分，其馆藏寥寥，谈不上有多大的艺术价值。要说真正有影响力的博物馆，还是

美国的大博物馆，它们是美国博物馆的主流。在我们去过的“大博物馆”中，又以大都会博物馆与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最具代表性。

大都会博物馆是典型的美国风格，其规模之大犹如一座城堡，藏品丰富，数量惊人，规模比罗马国家博物馆要大数十倍。不得不说是人类在当代造出的奇迹。

这种恢弘巨制，只可能在美国出现，如同美国人的体形，魁梧的壮汉比比皆是。几层楼的场馆，每层楼的展出面积大约有十万平方米，几层楼下来，大约相当于一个村镇的总面积。

更关键的在于，这栋博物馆并非是“国家博物馆”，美国文物可谓微乎其微，这里收藏的是全世界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从古埃及、远古中国一直到今天的装置艺术、后现代艺术等等，总量逾百万件。甚至在埃及都一张难求的纸草档案、泥版文献与动物木乃伊，在中国博物馆都相当罕见的甲骨文龟板、商代青铜器以及被意大利博物馆视为珍宝的古罗马雕塑，在大都会博物馆却数不胜数甚至堆积如山，让参观者目不暇接。

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大都会博物馆有一个埃及文物展室，虽然名为展室，但当中的埃及文物多到根本无法展出，只有堆积其中，有些展示台已经壅塞不堪，连文献的样貌都看不清楚，犹如一个老旧的档案室。这种近似于炫耀的陈列方式，恐怕也只有美国才有。

无独有偶，这种海量的收藏与杂乱的陈列，并非大都会博物馆一家，久负盛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亦是如此。

普林斯顿博物馆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中国文物展厅，当中所展览的青铜器就有几百种。当中不乏国宝级文物，而这些文物却在一个不算大的展室里堆得满满当当，一个青铜尊旁不足十厘米的地方陈列着另一个青铜，确实使人眼花缭乱。

一位对博物馆研究多年的朋友告诉我，与其说他们是陈列展览，倒不如说是展示美国巨大的财力、物力。这些文物当中，不少是美国进行对外战争时掠夺而来，也有是美国的银行家、商业巨头在拍卖会上买来之后赠送给博物馆的，这种动辄上千万美金的大手笔购买，也只有昔日“美国梦”可以做到。而这样的博物馆，也正符合美国这个国家一向喜欢炫耀、展示，以“高大上”为美的风格。

各具特色微型博物馆

在美国，博物馆是一个地区或大学的“标配”。无论是什么样的县城（乃至小镇）或是大学，都会有博物馆，至于馆藏规模如何，则因地而异。但总体来说，博物馆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缺席。

大博物馆有大博物馆的吸引力，同样，小博物馆也有小博物馆的魅力。从整体数量来看，美国仍然以小博物馆居多，这些小博物馆，既有特色文化博物馆，也有地方博物馆。就笔者所见而言，以美国革命女儿会博物馆、北卡格林斯堡博物馆以及威明顿航运博物馆（Wilmington Maritime Museum）印象最为深刻。

革命女儿会博物馆在华盛顿白宫附近，顾名思义，“革命女儿会”是由“美国开国之父的女性后代们”自发组建的一个社团，主要负责全美的女权运动志愿工作，在美国非常有号召力。这个博物馆，主要就是介绍美国女权运动的历史，它虽然是微型馆，却拥有蜚声世界的“美国宪法大厅”与“美国妇女图书馆”——前者是华盛顿最大的音乐厅。

这两个重要的厅堂占去了不少的空间，因此真正供展览的面积并不大，故而革命女儿会博物馆只能陈列主题文物，即18世纪美国妇女运动的一些文献与文物。虽然文物不多，但仅凭这样一些特色的收藏，就足可以使其在全世界妇女研究史上有一席之地。

与革命女儿会博物馆相比，北卡的格林斯堡博物馆显得独辟蹊径。格林斯堡是北卡州一个小城，世界著名牛仔裤品牌瓦朗格勒（Wrangler）就产于此。属于北卡州比较落后的工业区，但格林斯堡博物馆却非常精致、有味道，见证了工业文明曾带给这座城市的辉煌。

这家博物馆规模不大，建造在一栋老别墅里。从二楼开始直到四楼，每一个不同的房间被装饰成18-20世纪不同年代的风格，既有后来仿制的老式蒸汽机车模型、老式电话、电报机与裁剪机等等，也有当时的文献、照片与报纸陈列其中，这种在细微场景下对于历史的还原，系统且生动地展现出了工业革命对格林斯堡的影响，格林斯堡博物馆可以说做到了极致。

威明顿航运博物馆则与其异曲而同工。威明顿是北卡州的海滨城市，靠近大西洋，是殖民者最先登陆的地方，自古航运发达。该博物馆通过改建一个旧船坞，将其扩建，成为一个既有粗犷的水手风格，又有历史感的博物馆。馆内模仿水手的起居室、甲板、图书室建造，展现了航海时代殖民者与原住民在造船、航行、天文等方面的特殊造诣与传奇史话，隔着博物馆即可听到咫尺之遥的大海涛声，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大型博物馆是展示国家财力的符号，而“微型博物馆”才是美国博物馆的主流，它占地面积小、支出成本低，管理起来也相对容易，而且术业有专攻，容易激发游客们的兴趣，也不占用游客们太多的时间，其形态受到美国人的广泛认可。窃以为，这也与美国的国民性有着必然联系，在美国，百科全书式的通才并不多见，企业也以精专为主。譬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只做饮料，苹果公司只生产数码产品就跻身世界500强，这种强调“专业”的精细，从其博物馆上可见一斑。

博物馆后的文化态度

管中可以窥豹，一沙可知世界。同样，在这些博物馆里也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美国。

美国的博物馆无论大小，都是博物馆体系的一分子，整个博物馆体系兼容并蓄，多元化做到极致。博物馆的内涵也千奇百怪，除了上述类型外，还有移民博物馆、间谍博物馆、烟斗博物馆等各种名目的专业博物馆，而场馆建设也各色各样，既有老别墅、旧城堡的“旧屋利用”，也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风格的奇特建筑。

多元化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几百年来的民族融合、移民迁徙，使得美国变成了多元文化的大熔炉，不止博物馆如此，在艺术、文化、音乐等各个领域，多元化都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几百年来形成的多元化，而另一面则是前面所说美国人对于文化的坚守，这两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近年来，随着产业的更新换代与国际经济中心的转移，美国经济开始下行，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美国并未因此放松对文化的投入，即使在“锈带鬼城”里，博物馆的建设仍然没有停止。在许多州，博物馆的预算是单列项，它并不因为州的经济好坏而发生变化，因此，哪怕州政府关门大吉，但不收门票的博物馆依然可以正常运转。

对于文化的坚守，实际上出于一个民族的本能。我们以前有句话叫“再穷不能穷教育”，这句话应当再进行扩充，改为“再穷不能穷文化”。因为文化本身只能坚守，不能放弃，一旦放弃就意味着毁灭，如果文化被毁灭了，重建的代价则不是付出几代人努力与几百年光阴的问题了。

自身民族史短暂，美国人深谙个中滋味，因此对于博物馆的建设，一直是美国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当然，我们可以置喙大都会博物馆里

的馆藏太多太杂，甚至影响观瞻，但我们不可否认，他们对于文物的保护、对于博物馆肯下血本的投资与建设，确实走在世界的前列。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博物馆许多馆藏，都是社会贤达、富豪阔佬临终前将自己的藏品捐赠出来的，这在中国并不多见。美国人不喜欢留遗产，赤条条来，赤条条走，“裸捐”流行了数百年，因此美国博物馆里的藏品总是不断被补充、丰富。透过这些海量捐赠的藏品，亦不难看出美国人乐观、坦率的国民性。

中美关系: 风浪暂归平静

相比于其他热点问题，中国境外NGO管理立法问题其实更反映如今中美关系的深层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分歧，反映出美国国内对中国战略走向的疑虑、担心或说是误判。

达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2015年的中美关系，上半年处于紧张态势中，南海问题、网络议题、美国对华战略的讨论等骤然升温；下半年，尤其是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后，这种紧张气氛有所变化，趋于缓和。

从美国的外交排序来看，中美关系并不是其今年的主要焦点，俄罗斯或“伊斯兰国”这些因素更引起其注意。而从中国外交的视角，尤其2015年下半年，对日、对欧以及与台湾地区的关系都得到了改善和提升，中美矛盾也有所缓和。

2016年美国将迎来新一轮大选，通过“敲打中国”来博取选票是选举季常见的戏码。现在美国学界有关“过去三十多年对华战略是否错了”的讨论还在继续，只是激烈程度有所缓和。如果能保持现在的水平，对未来中美关系的稳定将会有积极作用。

2015年的三个指标

总体来说，2015年的中美关系可以看三个指标：网络安全、南海问题、中国对境外NGO管理立法。

网络安全问题无疑成为中美之间近来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今年上半年无论是美国安全部门还是舆论释放的信号火药味都很浓，“制裁”、“网络战”等说法一度甚嚣尘上。9月习近平访美前，中美高层多次接触，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为中美关系“降温”。最终我们看到，在中美关系的成果单上，中美就网络安全问题建立了新的交流和沟通机制。从这一系列成果上，我们看到了中方为稳定中美关系所做出的让步和努力。建立这些沟通机制有利于避免下一次发生“网络战”，至少可以降低其可能性，毕竟如果谁绕道已有的对话机制擅自行动，是有失公允的。

南海问题上，尽管2015年年底，美国媒体就此问题再度闹得沸沸扬扬，但我的看法没有那么悲观。一方面，美国多年来一直对世界很多海域都进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不仅仅是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以前相对低调、保密，仅由美国国务院每年年底刊出一则报告，宣布这一年其“挑战”国家名单、“挑战”内容，而现在美国军方在南海的行动变高调了。这是一种蓄意炒作。另一方面，南海领域的岛礁扩建工程已

经基本建成，中美接下来有理由、有机会在南海寻求新的稳定。

真正令人担忧的情况是所谓的“菲律宾仲裁案”。2016年如果国际仲裁法庭做出总体有利于菲律宾方面的仲裁，不仅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所打击，也可能给其他“有心人”提供口实和机会，不排除届时南海争议会有升温的可能。

第三个方面是中国境外NGO管理立法问题。相比前两个，该问题其实更反映如今中美关系的深层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分歧，实际上反映美国国内对中国战略走向的疑虑、担心或说是误判。美国方面是把这个问题看做一个风向标，判断中国是否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继续坚持过去几十年的战略方向。这种疑虑或者说过度担忧，正是今年美国对华战略大辩论之下的一个底色。目前这一法律草案还在审议过程中，如何帮助美方更加准确地认识中国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任务。

中美经贸“腾笼换鸟”

2014年被我称作是中美进入二元结构的形成之年，其中一个重要参考标准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标准，中国在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这是200年来非西方国家首次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这个总体结构我认为目前仍然存在。美国现在经济虽然有所好转，GDP增速达到2.5%左右，但这一速度只能说是“不太坏”，并没有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相比之下，中国经济虽然放缓，GDP增幅跌破7%，但接下来几年仍会保持在6%以上。只要在这个水平，就还在追赶美国经济地位。两者的差距仍在逐渐缩小。

如今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顺差创了新高，这也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个大的转变。一直以来，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这几年随着中美经济结构的变化，这块“压舱石”也一直在滚动：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崛起后，美国部分在华企业出于各种原因离开中国，有的回国，有的可能迁移到东南亚其他国家；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在投资和服务业领域都有很大潜力，而中美互联网商业领域合作热度在增加，这是过去前所未有的。总体来看，中美各自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将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一些变化，过去某些合作可能在弱化，但是一些新的合作又会产生，可以说迎来了一个“腾笼换鸟”的变革时期。

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在习近平访美前被赋予很高期待，认为可能出现突破性进展，但最终未能如愿。目前双方仍在进行艰苦谈判，

中美两国则出现了一些“不着急”的声音。我觉得这样从容、稳定的态度反而让人会更有期待，这才是博弈当中应有的态度。

美国在2015年11月着急地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中国来说，像进入了一场长跑。短期内它对中国影响有限，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只有3‰；但长期来看这是一个会触及中国国内经济和国家治理的国际规则，是美国利用其国家治理方面的优势制定出来的，所以它值得我们从游戏规则上去弄懂以及应对它。如果中国一直在TPP之外，可能在其框架下会出现竞争对手，比如那些经济结构与中国相似的东南亚国家，所以中国要抓紧时间推进改革。如果以后美国与欧洲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谈成，对中国产生的压力将更大。

如何助力中美同心圆

总结近两年来中美关系的波折表现，我认为有几点启示值得大家思考：

首先是中美两国的领导核心，即中南海和白宫都希望稳定中美关系：2013年11月-2014年5月，从中国防空识别区问题到美国以网络间谍罪起诉5名中国军人，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但当年11月奥巴马访华前，两国高层不断互动，用各种力量将双边关系拉回到一个良好的气氛上，之后奥巴马的访华也取得了很多成果；2015年上半年，南海问题和网络安全问题再次使得中美关系由平稳陷入僵局，但在9月习近平访美之前，中美双方同样互派特使最终缓和了关系，从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低迷甚至敌对气氛。

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两国最高领导人在推动或稳定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方向上是一致的。

其次，只要双方肯费心思投入更多，中美关系就会变得更稳定。以习近平的访美为例，可以看出来其准备得非常充分，在多个场合准确回应了美方关切的核心问题，对美方的担心和焦虑也进行了有效安抚；习近平在发言中对中美关系进行了定位，说“美国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优先发展方向”，这让中国国内对本国外交的走势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再者，中美舆论也对双边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良好的舆论引导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而不是鼓吹和煽动更多民意向好战和交恶的一头去发展。

中美关系的状态就像是一个同心圆，里面的内核是中美高层的领导

力，外面一圈是围绕两国的各种动态化、延展化的议题。两国关系的稳定则需要依赖于两个圆的稳定。对中国来说，核心领导层对外在议题的决定性影响更大；对美国来说，白宫只是政治体制中的一层，还有国会、法院以及社会组织等，因此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确定性更大。接下来美国国内将进行大选，白宫这个核心领导力必然发生重大更替，从而带来未知变化，我们也就更需要积极努力去推动和维护两国关系。

（采访整理 记者／王衍）

2016年

美军与酒精的“百年战争”

美军不但颁布正式成文法典严惩醉酒、在军人职业教育中告诫酗酒的危害，各军种在历史上长期与酒精也进行了不懈斗争 。

文/ 阎滨

前段时间有消息称，解放军陆军第26集团军军长张岩少将在军部与39集团军的两名老部下喝酒，导致一人死亡。事件发生后，有关人员受到了严肃查处，中国陆军最年轻的军长张岩被撤职，由正军降到副军免职。去年年底，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中，就这一事件做了官方回应。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大校说，“这是一起发生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典型案件。”事件的严肃处理，反映出中共近年来从严治军、从严治官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无独有偶，同一个月，美国海军也有一名少将因为贪杯而被解职。据美国《海军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2015年12月8日，美国海军正式公布了对海军少将戴维·鲍科姆（David Baucom）在2015年4月醉酒、行为不当事件的处理结果。鲍科姆少将被人看到喝醉酒后在一家酒店外裸体游荡，行为严重失检，“与军官和绅士的身份不符”，而受到申斥和解职的惩处。

少将丢官为“杜康”

美国海军军法署总检察长签署的报告显示，鲍科姆少将已有34年军龄，在美国军事运输司令部任负责战略运输物流主任。海军发言人威廉·马克中校告诉记者：“鲍科姆严重醉酒并造成恶劣影响，有损全体美国海军军人的形象。”据调查，鲍科姆是参加全美国防运输协会举办的关于军事运输问题的一个会议期间出事的。

调查报告称，鲍科姆在晚餐中喝了一些金汤力鸡尾酒和红葡萄酒后，又去了一家酒吧纵饮，在两小时内连喝了四杯苏格兰威士忌。随后，他拒绝了一同出席会议的其他官员送其回客房的好意，独自一人跑回下榻酒店。凌晨1:20左右，鲍科姆大闹自己的客房后，又到隔壁几个客房胡闹，后来，他发现自己被反锁到自己的客房外，闹得更加厉害。一位目睹了事件的酒店服务生的证词称，鲍科姆显然是严重醉酒后在撒酒疯，他甚至尿了裤子。四个小时后，两位下榻同一酒店的女住客投诉说鲍科姆裸体在酒店前台晃荡。直到最后，一位军中同事帮他找了一把新钥匙，并将他架回自己的房间，事件才结束。

事发后，鲍科姆试图掩盖自己的过失，他在电子邮件中向上级发出正式报告，解释说自己当时在睡梦中醒来后发现忘了带处方药，头晕的症状加剧，在昏昏沉沉中才离开了自己的客房。但是报告中没有说明处方药的名称、类型或数量。海军在随后展开的正式调查中发现，鲍科姆不是忘了服药，而是严重醉酒后撒酒疯滋事。被解职后，鲍科姆参加了美国空军预防和治疗酒精与药物滥用的项目，相关项目官员证实，经过测试，他并非严重酗酒的酒精依赖患者，否则他受到的处罚将更加严厉。

美军近年“禁酒令”纵览

鲍科姆不是第一个因为醉酒、行为不检而丢官的美国将军，未来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美军因为喝酒滋事的负面新闻一直络绎不绝。近年来，仅中国周边地区的美国驻军就频频闹出和酒精有关的负面新闻，美军也有针对地颁布了一系列禁酒令。

2012 年12月3日，驻日美军宣布，原本只在驻冲绳美军实施的禁酒令扩大至全部驻日基地。此前一周，驻冲绳美军刚宣布，禁止所有驻冲绳美国军事人员在基地外的场所饮酒，基地内酒类销售在每晚10时结束，驻日美军在基地内饮酒不受禁令限制。不过，离开基地的人员须接受酒精测试，以避免醉酒跑出去惹麻烦。

此前，驻日美军因为醉酒而麻烦频发。当年10月，两名美国海军水兵饮酒后在冲绳县强奸并致伤一名日本女子，激起冲绳民众众怒。此后驻冲绳美军下达宵禁令，每晚11时到次日凌晨5时禁止军人离开基地，但是宵禁效果不佳，顶风作案的军中败类仍不时露头。11月2日凌晨，驻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一名士兵再次醉酒滋事，闯入冲绳县一户居民家中，殴打一名13岁男孩并毁坏家具。11月23日，美国海军驻横须贺基地的一名水兵，违反宵禁令，酒后跑到横滨市一家咖啡店里裸体晃荡并随地小便。11月30日，一名美军士兵涉嫌酒驾被逮捕。

有趣的是，驻日美军刚颁布禁酒令两天，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市一些餐饮业主因为店铺生意大受打击，就在12月5日集体向市长请愿，要求市长呼吁解除驻日美军禁酒令。这些饭馆、酒吧老板们告诉市长朝长则男，由于禁酒令，餐饮业销售业绩普遍下降三成，一些酒吧和饭馆因为客人骤减而被迫关门。还有些人说得比较委婉，“担心他们与驻日美兵的友好关系受损”。一位同时经营 4 家餐饮店的老板告诉共同社记者：“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两到三个月，佐世保市九成店铺将关门。”面对餐饮业主们的请愿，市长朝长则男答应将向佐世保美军基地和日本外交部反映这些情况。

驻日美军的这次禁酒令实行了刚半年，美军即宣布自2013年5月31日起，放宽“禁酒令”对基地外饮酒的限制，允许军人每天18时至22时在基地外餐馆等场所饮酒，但饮酒量“不得超过两杯啤酒”。同时，仍旧禁止在酒吧饮酒。直到2014年底，美军认为，鉴于禁酒令实施两年来，“驻日美军士兵的认识不断改善和提高”，正式决定从2014年12月开始，大幅放宽基地外禁酒令的限制。根据新规定，驻日美军除凌晨0时到5时外，在任意时间都可以在基地以外饮酒，并且不再限制饮酒量。同时，只有一定军衔以下的年轻士兵，原则上禁止凌晨0时到5时外出。

驻日美军不安分，驻韩美军也不断爆出酒后滋事的负面新闻。2013年3月17日凌晨3时，在韩国首都首尔弘益大学附近的一家啤酒屋，一名美国陆军第2步兵师的士兵在啤酒屋卫生间滋事，随后还殴打了接警后出动的巡警，韩国巡警的眼镜被打坏，衣服被撕破。次日，驻韩美军第2步兵师师长爱德华·卡顿少将正式发布声明，颁布“禁酒令”，同时取消了全体人员的周末外出许可。声明称：“对于驻韩美军第2师官兵所做不当行为而损害60多年来积累的韩美关系，军方不会坐视不管，美军将与韩国警察和法务部积极合作。”他说，为做好对韩国的防御工作，驻韩美军应获得韩国民众的信赖和尊重。在等待韩方根据韩国法律进行调查和处理的同时，美方也将启动惩戒滋事官兵的相关程序。

为预防少数行为不端的军中败类对韩美公共关系造成的损害，驻韩美军在2014年还公布了《韩国准备适应计划》，规定新到岗的美军士兵30天内不得饮酒。除了30天禁酒期外，还包括限时宵禁禁止离开基地、预防性骚扰等不良行为的防范训练。驻韩美军希望通过这一计划，向驻防韩国的军人传递明确信息，韩国不是美国兵醉酒买春的“欢乐场”。

酒精对军队的威胁

美国是历史上曾实施过极端禁酒令的少数国家之一。1920年1月16日，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正式生效，该修正案禁止在全美境内销售、生产或运输任何酒精饮料。

第十八修正案是禁酒主义的历史高峰。在全美禁酒的时代，美国庞大的酿酒业崩溃了，但巨大的市场需求却不是一纸法令能禁止的，禁酒时代只维持了十四年，期间，非法私人酿酒业因为利润丰厚，吸引来大批有组织犯罪团伙从事这一比传统的赌博、卖淫、贩卖人口、敲诈勒索更有利可图的行当。实施了十四年后，人们才意识到这样的法律其实没有多大用处，执法部门执法成本高昂，禁酒不但使有组织犯罪猖獗，而且外国的走私酒还使美国政府损失大笔税收收入，禁酒的目的却不明显，全国遭到的酒精危害并不比禁酒时代之前有所减缓。1933年，刚上

台的小罗斯福总统签署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正式废止了第十八修正案。

虽然国家禁酒时代成为一段苦涩的历史，但在禁酒主义土壤浓厚的社会环境中，美国军队自然也受到了禁酒主义的巨大影响。美军从军事专业角度认为，与其他原因相比，因酗酒及其造成的后果而毁掉职业生涯的军官可能为数最多。美军对军官醉酒的惩罚要比士兵更重。军官在工作时间醉酒不但要受到军规的惩罚，而且可能严重影响其个人档案。下班时间醉酒，特别是因为喝醉酒而影响工作或任务的完成，也会给个人职业记录抹黑。《陆军军官手册》告诫道："从只在中午喝一杯啤酒，会发展到喝马提尼酒（一种以杜松子酒和苦艾酒调制的烈性鸡尾酒）。请记住，养成一种坏习惯比改掉一种坏习惯容易得多，避免一件坏事比挽回一件坏事更容易。"



《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有三条涉及到了对醉酒行为的惩处。第111条规定了醉酒或者鲁莽驾驶罪，第112条规定了醉酒执勤罪。触犯这两条罪名的军人一律交由军事法庭审判惩处。第134条是"通用罚则"条款，规定了几十种轻微违纪行为及相应惩处标准。其中对因醉酒影响军队声誉、醉酒导致无能力执行任务、在舰艇上饮酒等情形，规定了从不名誉退役并罚没全部薪金到拘役、罚薪等轻重不一的惩罚措施。

美军不但颁布正式成文法典严惩醉酒、在军人职业教育中告诫酗酒的危害，各军种在历史上长期与酒精也进行了不懈斗争。

禁酒"百年战争"

英国皇家海军是全世界现代海军的鼻祖，皇家海军一直按大航海时代的传统惯例，向水兵每日供应朗姆酒，美国海军脱胎于皇家海军，将这一传统一并继承了过去。1794年，美国海军制定了第一份水兵口粮标准，规定每名水兵每天发半品脱（掺水前）朗姆酒以鼓舞士气。

1806年，当时的美国海军只有不到2000名官兵，每年供应的朗姆酒是4.5万加仑。海军经过对比试验后认为，威士忌更加有益于健康，据说，“水兵也更喜欢喝威士忌”。真实的原因是原产加勒比海地区、由甘蔗酿造的朗姆酒在当时运到美国本土后，军方付出的采购成本要比采购美国本土生产的威士忌更贵。此后，美国海军供应的烈酒改为威士忌为主，并向水兵鼓吹喝威士忌的好处。按规定每个水兵每天发两勺（再掺四倍的水）威士忌，不喝酒的水兵每天发3到6美分的伙食补贴代偿。

在海上生活极为艰苦的风帆时代，酗酒和鞭刑被视作海军中孪生的祸种，两者常常是恶性循环。水兵为了排解苦闷喝酒，这使得多数人都有酗酒恶习，结果就是招来鞭笞，而越是生活在鞭子下，就越是渴望从酗酒中寻找刺激。面对严重的酗酒问题，一些人道主义者主张把每天随口粮定额分配的酒类取消，认为这样就能遏止酗酒现象。为了遏制酗酒、应付禁酒主义团体的压力，1842年，海军将每日酒类供应削减到1吉尔（4盎司）。1862年，美国海军（北军）正式规定水兵在军舰上禁止饮酒，并永久废除酒类配给制度，代之以每人每天伙食增加5美分的补贴。

进入20世纪，美国海军迎来禁酒的高潮。根据1862年的禁令，虽然水兵被限制饮用烈酒，但军官们仍可以不受限制地自己买酒在舰上痛饮。1914年，出身南方小城市报纸编辑的美国海军部长约瑟夫·丹尼尔斯认为，在禁酒方面，不应给予军官特权。他在当年7月1日签署第99号通用命令，下令全体海军人员在舰艇上均禁酒。

在此后100年中，美国海军严厉的禁酒令没有多大变化。1933年，美国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颁布，结束为期十四年的全国性禁酒后，海军高层经过认真讨论后，决定继续执行第99号通用命令，舰艇上严禁饮酒，只允许海军人员到岸上的酒馆或俱乐部中饮酒。

有趣的是，1980年，卡特总统时代的海军部长爱德华·伊达尔戈下令放宽了禁酒限制，允许指挥官可以给出海45天以上的海军官兵每人供应两瓶啤酒以鼓舞士气。据海军一位历史学家研究，这是因为部长大人二战期间曾在“企业”号航空母舰上服役期间，一架日本神风自杀飞机冲进航母的升降机，撞毁了舰上搭载的啤酒，年轻的伊达尔戈趁机和其他人偷喝了一点啤酒，有亲身经历的海军部长明白啤酒对经历长期远航后

海军的慰藉。

与海军一百年来严格禁酒相比，陆军的禁酒努力却收效甚微。独立战争爆发后，1775年11月，大陆议会通过了美军第一份全军通行口粮标准，规定每人每天除了应供给1磅牛肉或3/4磅猪肉，或者1磅咸鱼，1磅面包或面粉外，饮料则是1品脱牛奶和1夸特苹果酒（当年殖民地民众喜爱的土酿烈酒）或云杉啤酒（今天加拿大仍流行的一种寒冷地区盛产的啤酒）。美国建国后，每天供应的酒类改为威士忌。

19世纪前期，美国陆军的驻军大多分布在西部边境，军营的日常生活艰苦沉闷、令人沮丧，士兵们军饷微薄还不时会遇到危险，每天的执勤、危险和厌烦之外，除了与每日随口粮下拨的威士忌为伴，就只能到军营附近的酒吧放松一下。在1832年以前，美国陆军给士兵们每天配给威士忌以取悦士兵，1830年的配给量达到72537加仑，耗资22132美元，但随着禁酒运动兴起，1832年，陆军口粮中掺水烈酒被暂时取消，代之以咖啡，到1838年，正式规定威士忌永久取消。



西点军校是那个时代美国陆军禁酒努力遭遇挫折的缩影。校方认为喝酒是比抽烟更不能容忍的违规行为，从1826年起，西点军校规定禁止学员任何时间喝酒。但非法饮酒的事件屡禁不绝。当年西点军校外面有些酒馆，其中最受欢迎的酒馆因店主而得名“本尼·海文斯酒馆”。本尼·海文斯本是一个随军小贩，因为被发现向学员卖酒而被解雇。此后，从

1824年起，他在西点校外开了一家酒馆，并一直开到美国内战结束以后。这家酒馆因为能喝酒、讲故事，而引来不计其数军校学员的光顾，成为西点军校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地方。老板夫妇擅长侃侃而谈，对学员们苦闷生活中的遭遇充满同情，不但慷慨地接受手头拮据的学员们的赊账，也接受学员们偷来的毛毯之类的军用物资顶账。因为被校方发现向学员们售酒且“屡教不改”，本尼夫妇享有全美国独一无二的荣誉——被军方明确禁止踏入西点军校半步。

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本尼酒馆的顾客名册就是一本美国将军们的花名册，后来在南北战争中赫赫有名的双方将领，大都名列其中。南部联邦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就是其中的一个，1825年，戴维斯因为被发现在本尼酒馆中偷偷喝酒还曾被送上军事法庭。

接受最严格管理和训练的陆军军官们尚且不能禁酒，普通士兵好酒的积习就更难遏制了。美国陆军此后再也没有试图推行严厉的禁酒措施。与严格禁酒的美国海军不同，直到20世纪，美国陆军的喝酒文化仍是军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在50年代末参军服役时回忆道，如果一个年轻军官没有在每周五下午军官俱乐部半价优惠时到俱乐部露面，会被别人认为是弱不禁风的娘炮。当年喝杯烈酒只需25美分，军官们每周五下午3点后就跑到军官俱乐部猛灌烈酒，晚上7点后，在乐队的演奏下，军官们开始拥着太太们跳舞，上级军官尤其爱找下级军官确实长得漂亮的太太跳舞，这常常引起争执，经常会遇到校官们在俱乐部外和他们的下属吵架的场面。

脱胎于美国陆军的空军，在酒文化上也继承了陆军的传统，除了空勤人员执行飞行任务时禁酒外，美国空军也没有类似海军那样严厉的禁酒令。

西点军校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祝酒歌》传唱至今，反映了美国陆军对酒精的真实态度，这首歌由一个中尉写于1838年，歌颂当年那家传奇般的本尼·海文斯酒馆：

“来吧，伙计，排成队，给你倒满杯，

我们要尽情歌唱，

部队里不准喝酒，晋升太慢，

所以我们将与本尼·海文斯一起追忆往事。”

2016美国大选激烈开局

这次美国大选最终极可能上演一场老态龙钟的民主党人与多元且年轻化的共和党人之间的对决；政党政治传统定位与形象的对调，也决定了此次大选在美国政治发展史中的节点地位。

特约撰稿／刁大明



2 0 1 6 年1 月2 8日，美国艾奥瓦州得梅因，共和党候选人参加2 0 16 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电视辩论。随着美国两党首场总统预选在艾奥瓦州的举行，美国总统选举的序幕正式拉开。

“我将尽量简短，因为我知道你们中有人着急赶回艾奥瓦。我也曾如此。如果你们需要，待会儿握手时，我给你们一些小提示。”2016年1月12日晚，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其任内最后一份《国情咨文》时，不忘如此调侃将于19天后正式揭幕的总统大选。

坐在国会议事厅里聆听他演讲的四位国会参议员，的确期待在初选首站的艾奥瓦州率先取得优势：其中将近75岁高龄的伯尼·桑德斯、拉美裔共和党人特德·克鲁兹或马尔科·鲁比奥，都将有机会继奥巴马之后再度刷新美国的政治史。

与八年前相比，选民们依旧对美国的社会现状有着诸多不满，热切期待务实的改变真正降临。而与上次选举时“非洲裔与老人”的对决相比，这次美国人可以选择的余地也更为丰富：女性、第二代古巴裔、大嘴的门外汉、高龄的所谓“社会主义者”……足以预见，2017年1月20日入主白宫的新科总统势必不同以往，也或许给美国乃至世界带来不同凡响的开场。

最拥挤的初选鏖战

虽然2016年2月1日艾奥瓦的初选被视为本次总统大选的起点，但早在去年3月23日，随着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克鲁兹的正式参选，已然吹响了“隐形初选”的号角。随后10个月中，民主、共和两党分别由5位和17位参选人投入竞争，堪称有史以来最为拥挤的初选鏖战。

隐形初选即两党参选人关于竞选资源的争夺，如知名度、媒体曝光度、竞选经费以及联邦和各州的组织建设。通过卡位，两党参选人希冀着在初选发令枪响起的那一刻，站在最佳的“赛道”面前。从2016年的态势看，希拉里·克林顿在民主党内的强势存在正遭遇新面孔桑德斯的挑战，而民粹派圈外人唐纳德·特朗普也在2015年7月20日之后持续领跑共和党初选民调，以杰布·布什为代表的传统政治人物则一蹶不振。两党不约而同各自陷入了派系分裂的尴尬境地，建制派与反建制派势如水火。

2月1日的艾奥瓦州党团会议初选及2月9日的新罕布什尔州直接投票初选，被普遍认为具有“风向标”意义。自1972年两党以各州初选结果决定总统提名以来，只有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失手上述两州初选后、在“超级星期二”拿下南方各州才得以险胜提名，其他两党提名人都至少赢得过其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自2008年大选以来，为了平衡地域政治，保守派南方州南卡罗来纳和拉美裔近三成的西南州内华达也被列入2月的初选日程，成为艾、新两州风向标的“续集”。

民主党方面，由于马丁·奥马利在艾奥瓦初选后的退出，只剩下了希拉里、桑德斯的“二人转”，且后者坐拥党内平民主义派拥戴而得以与前者抗衡。艾奥瓦以希拉里微小幅度残胜落幕，新罕布什尔则让桑德斯获得压倒性胜利，从而选情朝着势均力敌的态势发展。虽然希拉里拿下了2月20日的内华达初选，但其优势仍不具备决定性。桑德斯发起的缠斗对原本势在必得的希拉里极为不利。

共和党方面，从来不惧政治不正确的特朗普由于无法得到党内宗教保守派的信任而在艾奥瓦州不敌克鲁兹，与被党内高层精英看好的鲁比奥得到同样数量的代表支持。不过，代表茶党与宗教福音派合流趋势的克鲁兹在温和重商的新罕布什尔失意，特朗普得以大胜。令人颇为意外的是，代表建制派残念而跃居第二的并不是杰布，而是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2月20日，南卡州的初选胜利强化了特朗普的士气，却彻底惊醒了原本位居第四的杰布的白宫梦。三场初选后，共和党仍有五位主要参选人继续厮杀，其中以特朗普、克鲁兹、鲁比奥三人最有可选性，但仍难预测花落谁家。

美国大选主要候选人一览

民主党



希拉里·克林顿

【一句话介绍】一位接受过训练的律师，奥巴马政府前国务卿，代表纽约州的前参议员，还有前第一夫人。

【支持者】绝大多数民主党人。

【优势】一份金灿灿的履历；政策专长（外交和内政）；深厚的筹款根基；民主党所有关键提名选区的坚定支持；（眼下）党内无强劲对手；一支战功卓著的竞选团队；（对于许多事）脸皮厚如犀牛皮；对于超越党派的媒体作怪文化的理解无人可及；参选具有历史意义；令人怀念起咆哮的90年代；她的丈夫。

【不足】一个清晰的提名理由；一个打动人心、哪怕是清楚明了的理念；打赢一场选战的突出技巧；政治表演的天分；持续摆脱数十年来围绕着她的乌烟瘴气和惊悚闹剧的能力；能马上代表未来、摆脱过去的本事。



伯尼·桑德斯

【一句话介绍】桑自诩为社会主义者，1991年到2007年在美国众议院代表佛蒙特州，2007年当选参议员。

【支持者】极左民主党人，社会主义者，带着布鲁克林腔的斗牛迷。

【优势】有条不紊地传递出一套基本民粹主义的经济理念；吸引大量媒体关注的实力；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进步民众的支持；对于挑战希拉里战队的无所畏惧。

【不足】不能轻松自如、平易近人地谈论自己或自己的政策；对于为何21世纪的美国要由一位自诩为社会主义者的人来领导，缺乏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解释；缺乏国安资历；对现况发出了有力批评，但未对未来给出同样有力的愿景。

共和党



唐纳德·特朗普

【一句话介绍】房地产开发商，被辞退的电视节目嘉宾。

【支持者】美国电视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唐纳德·特朗普本人。但共和党其他人士似乎感到恐惧。

【优势】近乎家喻户晓的知名度；激发和煽动美国民众的能力；来自草根的热情拥戴；时下流行的局外者履历和话语；随心所欲登上电视、新闻头条的能量；吸引万众到场的本领；决心；自信。

【不足】政治经验；国安经验；在精英群体中缺乏信誉；详细、连贯的政策观点；民众对他是否全身心地投入选举有很深的疑虑，而他缺乏消除这一疑虑的明确办法。



特德·克鲁兹

【一句话介绍】曾任小布什政府副总检察长，2003年被任命为得克萨斯检察长。

【支持者】死硬的保守派、茶党分子、社会保守分子。

【优势】一张相对新鲜的政治面孔；得克萨斯州副总检察长和国会参议员的经验；因参与茶党运动和联邦政府关门而累积的知名度；对拉美裔选民的吸引力；常春藤名校的学位及与之相配的聪明脑瓜；福音派信徒和虔诚的共和党人的支持；全国民调位列前十；筹款实力。

【不足】提升其全国民调排名的清晰路径；新罕布什尔州的高人气；立法层面的经验；对中间或独立选民的吸引力；赢得大选的几率；共和党实力派的支持；媒体对他的认真对待；上层共和党人中间的声望；跨党派的吸引力；公开场合的幽默感。

共和党



马尔科·卢比奥

【一句话介绍】第二代美国裔古巴人，佛罗里达州众议院前议长。2012年在参议员竞选中，他意外地打败查理·克丽丝州长获得共和党提名，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关注。

【支持者】拥有上层支持，他一直将自己设定为推行干涉主义外交政策的总统候选人。

【优势】一张新鲜的（拉美裔）脸孔；讨喜；吸引人的履历；巡回演讲中的上佳表现，情绪饱满，雄辩滔滔；一个远见卓识、机智灵活的竞选团队；一整套形形色色的政策，整体来看，大概比所有其他候选人都更好地体现了“改革保守主义”的实质与精神。

【不足】全国知名度；一流的筹款实力；全国性立法层面的成就；行政经验；选战磨炼；初期实力；威严不足。

共和党



本·卡尔森

【一句话介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前小儿神经科学领军人物，著名医学家。2013年国家祈祷早餐会上猛烈抨击奥巴马医改后，他成为保守派的民众英雄。

【支持者】尽管共和党内部人士深感厌恶，但基层保守派已将他推到民调顶层。没有任何政治污点。

【优势】透过其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热门节目及写作和公开露面，积累了一批热情的追随者；引人注目的经历以及打动人心的巡回演讲；自由和从容地谈论种族和政治正确的议题；一种举重若轻的风度；一份时下流行的非政客履历。

【不足】行政、立法和政治经验；国安资历；缺乏避免失言、坚守文稿和既定理念的一贯定力；缺乏一套清晰可行的初期策略。



约翰·卡西奇

【一句话介绍】现任俄亥俄州州长，2000年曾参加竞选，但在众议院任共和党预算专家时间不长。曾在雷曼兄弟公司工作。

【支持者】在竞选中他表现出的财政保守真诚超过其他任何人，证明可以赢得蓝领选民，在关键摇摆州取得了两次胜利。

【优势】在所有欲角逐大位的现任州长中，民众支持率最高；2014年连任时在非洲裔选民中以及在其他传统民主党选区中获得显著支持；担任国会议员时收获了联邦预算和国土安全方面的经验；坚定的圣公会信仰；蓝领的成长背景及信誉；从第一天起就准备好了当选总统的笃定信念。

【不足】缺乏初期的全国民调优势；缺乏切实的全国政治运作或筹款运作；缺乏面对政治媒体文化时的信心；缺乏一条获得提名的清晰路径。

截至2016年2月22日，参加竞选的两党主要候选人共有7位

2 位民主党人

5 位共和党人

来源：综合彭博社、《华尔街日报》等媒体

漫长的大选路线图

2016年总统大选的初选程序从2月1日一直持续到6月7日，虽然各州初选采取了差异性制度安排，比如共和党要求在3月15日之前举行初选的各州按比例分配代表，从而为各州选民留下更为宽松的选择余地，但两党极可能在3月1日（第一个“超级星期二”）或者3月15日（第二个“超级星期二”）前后明确最终提名人：前者有包括得克萨斯在内的12个州以及两个属地同时初选，后者包括佛罗里达、俄亥俄等6个州。如果3月无法预先锁定提名，两位或多位参选人间的竞争就可能延烧到7月底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但这种情况过去三十年来颇为鲜见。

不同于以往在8月奥运会开幕式前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016年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被集中安排在7月中下旬，也就彻底避开了里约奥运会的话题热度。地点设置上，民主党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和共和党的俄

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同属所谓“锈蚀地带”（指工业不景气之地），凸显两党对美国经济与就业议题的高度重视。

两党全国代表大会最为重要的任务，即正式确定各自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并由总统候选人提名作为竞选搭档的副总统候选人。目前的推测是，希拉里如果获得提名，极有可能选择前得州圣安东尼奥市市长、现任住房与城市事务部部长的41岁拉美裔政治人物朱利安·卡斯特罗。相比而言，共和党的副手人选还需总统人选更为明朗化。在克鲁兹未获提名的情况下，同为拉美裔的鲁比奥，其次要目标无疑是副总统提名。

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两党候选人将进入近身肉搏的白热化大选阶段。最大看点当属在9月26日、10月9日、10月19日举行的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及10月4日举行的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其中尤以10月19日的辩论受世人瞩目：两党总统人选将在此次辩论中围绕美国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进行全面阐释。

除去这些制度性日程安排外，竞选期间特别是7月底全国代表大会到11月初选举日之间的三个月中，极可能出现类似于以往“十月惊变”的国内外突发状况，从而制造议题、吸引媒体关注、迫使两党候选人表态。国内事务上，如突发的种族冲突事件、涉及争议性社会议题的司法判决乃至是飓风袭击等；对外层面上，如中东事务特别是打击“伊斯兰国”议题以及包括东北亚局势、南海事务等在内的亚太议题等。

历经9个月的竞选历练后，两党候选人将在11月8日正式迎接终极考验，胜出者将于当晚确定。随后的12月19日，在选举日决定了归属的选举人团将在前往华盛顿特区投票，最终在法律意义上认定新当选总统。而从今年11月初到明年1月中旬的两个多月内，新任总统将着手组建权力移交团队，考量行政团队的主要人事安排的同时，也将谋划至少两年的内外政策趋向。

2017年1月20日中午，在椭圆办公室的书桌上留下一封信后，在白宫困守八载的奥巴马将迎来刚刚宣誓就职的新总统，并在继任者的目送下释然离去。至此，2016年大选彻底落幕，美国也就步入一个全新的政治时代。

2016大选的三大看点

此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已如离弦之箭，从目前的选情发展态势看，2016年不但延续以往选举政治漫长且负面抹黑的风格，而且由于桑德斯、特朗普等人的存在平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在风云诡谲的选情背后，仍旧存在窥探美国政治走势的蛛丝马迹。

奥巴马在任期最后一年中有所作为的行为，势必成为牵动选情的重大因素。按照广泛预期及1月12日国情咨文中的口风，奥巴马将在最后11个月全力铸定内政外交遗产。除去坚持提名补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空缺、推进控枪政策、捍卫全民医改与移民新政、实现TPP在国会过关、落实刑事司法改革、关闭关塔纳摩监狱等内部事务之外，强化“亚太再平衡”战略、稳住中东、3月历史性访问古巴等一系列外交行动也塞满了行程表。这些重大动作引导着选战议题的走向，特别是对民主党选情带来或助选或拖累的变数。某种程度上，奥巴马可以算是2016年大选系列剧集的首席编剧。而其本人对希拉里的过早背书也将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助于希拉里有效整合民主党，另一方面却又为共和党提供了把对奥氏的不满引向希拉里的借口。

此外，无论是希拉里还是桑德斯，民主党注定将成为提名史上最为年长的总统候选人。2016年投票日时，希拉里已满69岁，桑德斯也超过了75岁，打破了民主党史上总统提名的年龄纪录。自1828年民主党首次参与总统竞争以来，最年长的提名人即1848年大选中66岁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刘易斯·卡斯；而自1900年到2012年的29次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平均年龄仅为53.1岁。2016年民主党潜在候选人的高龄化与8年前提名奥巴马时的意气风发呈现出鲜明对比，凸显出民主党人在世代更新意义上的空前滞后。民主党的老态极易在对年轻选民的动员上产生困境，进而压低对其至关重要的年轻选民的投票率，无助于守住白宫。

与民主党的老龄化对立的是，共和党的初选简直成了“父与子”的较量——一边是将近70岁的特朗普，另一边是46岁的克鲁兹或者45岁的鲁比奥。在共和党参与总统选举的历史上，参选者年龄差最大的一次是1856年的共和党选举，当时最具竞争力的人选分别是43岁的加州前国会参议员约翰·弗莱蒙特和71岁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迈克林恩，相差28岁。换言之，本次共和党初选的年龄跨度已接近160年来的历史极值。

同时，如果特朗普获得提名，将超过1980年的罗纳德·里根、成为共和党史上最年长的总统候选人；而无论是克鲁兹还是鲁比奥获得提名，也将成为自1944年以来共和党最年轻的总统候选人。如今共和党在总统政治上的年龄跨度，说明其正在经历剧烈代际更迭，相伴而来的也是党内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激烈冲突与转型。这一趋势基本上发端于2009年以后兴起的茶党运动，而鲁比奥与克鲁兹的拉美裔身份也表明共和党正在顺应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加速调整。

总而言之，2016年的美国大选最终极可能上演一场老态龙钟的民主

党人与多元且年轻化的共和党人之间的对决；政党政治传统定位与形象的对调，也决定了此次大选在美国政治发展史中的节点地位。

送孩子赴美留学家长应注意什么

文 / 霍华德·默尔（Howard Moore）

美国佛罗里达州善道泉预备学校

（Saddlebrook Preparatory Academy)霍夫曼网球项目主管

美国当地时间2月17日，引发舆论持续关注的中国留学生校园施虐同学案在洛杉矶高等法院宣判，三名中国留学生被判6年到13年不等的监禁。服刑期满之后三人还将被驱逐出美国。

这个案件一年多来引发了舆论的持续关注。关于青少年留学生群体的生活状态、中美法律差异等方面的问题更是引发了大家的反思。

很多中国家长为了孩子有个好前程，逃脱国内苛刻的应试教育体制，送孩子出国“镀金”。但他们对美国的真实学习生活环境却不甚了解，对孩子能否适应新环境缺乏准确预估，而且近年来中国孩子出国留学呈低龄化趋势。

这些被父母“空降”来美国读书的孩子，俗称“降落伞孩子”，远离父母，平日和父母缺乏交流，孩子也面临着学习成绩、生活、交友等多方面的压力，担心会受到其他同学的嘲笑和欺凌，如果不能适应周边的环境，将处在孤立无援、无人倾诉的局面。孩子留学期间，中国家长更多是关注学习成绩，往往忽视对其心理健康、交友等方面的关心和指导，而这些方面却可能是正处在成长期的孩子最为需要帮助的。

笔者一直十分关注来自亚太地区孩子的教育问题，结合自身实践经验，特提出如下建议：

对准备送孩子来美国读书的父母们，在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前，一定要事先实地考察学校及当地环境，了解学校的规章制度和当地的法律法规。

孩子入读后，要多主动和孩子保持联络，密切关注孩子们的情绪表现。一旦发现不好的苗头，应及时和孩子一起探讨解决方法。比如，很多同学刚来美国，语言关通不过，上课听不懂，作业不会做，考试成绩不及格，这些问题就像大山一样压在孩子的心头，再阳光的孩子也会蔫掉。这时家长应积极和孩子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如聘请家教额外补习等措施，随着成绩的提高，孩子自然就会抬起头来，来自同学的嘲笑也

就会消失。

要坚持和学校老师、校长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确保从校方了解到真实情况。

家长们要和孩子的好朋友建立联系方式，可从侧面了解孩子的动态。有时孩子不愿意向自己的父母或老师吐露心声，但却愿意和同伴分享。通过孩子的好友去了解孩子的行踪、心态，继而开导孩子是一种十分奏效的方法，因为孩子的同伴提供的信息是最具体的，而同伴的开导也是最有效的。

除了在学习和生活上的关心以外，家长们还应该鼓励孩子积极融入美国文化，参加学校各种活动，与其他族裔的同学建立友谊。良好的社交关系是抵御“校园欺凌案”的有效预防措施。面对校园欺凌事件的增多，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地州政府应通过加强立法，遏制校园暴力行为。作为校方，更应该高度重视校园欺凌事件，学校应制定并执行相应的严格措施，要让每一位同学都很清楚：学校绝不容忍一切欺凌行为的存在，以期杜绝欺凌现象的泛滥。

家长们应密切注意孩子出国后是否有以下明显的变化：

- 孩子变得内向，与家长或朋友的交流减少。

- 对课外活动、体育和社交等活动兴趣下降。

- 不再经常使用智能电话、社交网络。

- 睡眠时间增加，食欲下降。

- 脾气变得暴躁、易怒，缺乏耐心。

- 身上出现伤痕，耸肩驼背，低头走路。

- 避免与人目光交流。

- 体重下降。

- 自残。

- 时常谈及轻生及死亡的话题。

如孩子出现有上述现象，家长要有所警觉，应在第一时间内和校方取得联系，了解情况，及早商讨应对措施，以期预防、化解欺凌事件的发生与危害。

“校园欺凌”现象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就其危害性而言，严重的会残忍地毁掉受欺凌孩子的一生，可能给孩子带来永久的阴影和伤痛。而那些欺凌同学的孩子，不但可能面临牢狱之灾，还因为难以完成学业，面临留学生签证被取消、在美国服刑后即遭遣返的后果。人生之帆还未扬起就已搁浅，本带着无限的憧憬和梦想送孩子去读书，却成了不归之路，这是多么让人痛心扼腕的事情。

纪伯伦在《致我们终将远离的子女》中有这样的一段诗句：“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孩子终将是属于明天，属于世界的，而我们的责任是让箭能飞得更远。

（翻译 黄鸿 / Vikki Huang ）

为什么美国的小区没有围墙？

韩晗 散文作家

世界上小区没有围墙的国家并不多，美国是其中之一。

在美国生活过的朋友恐怕都知道，美国许多小区不但没有围墙，更没有保安，这也恰是许多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一点。而且美国许多小区的道路基本上是公共道路，一般来说还有路名，小区内的篮球场和游泳池，也开放给周围的市民使用，这种小区称之为“美式公寓（Apartment）”。

没有围墙的美式公寓

从规模上来说，美式公寓并不逊色于中国的大多数小区，一般都是25栋左右风格相同的三四层小楼房，每栋楼房约住6户左右，一般是一层两户（或是四五十栋小别墅，别墅群就不再叫公寓了，而叫house），它们总体风格与中国的小区别无二致。但有趣的是，美式公寓都没有围墙，甚至连基本的防盗装置都没有，更不设保安、门禁，唯一能辨识的，是公寓的“物业管理处”——一般来说是一栋平房，以及在小区入口矗立着的一面不足5平方米的矮墙，上面写着公寓的名字、电话与门牌号，仅此而已。

而且，与别墅一样，美式公寓一般都在荒郊野外。走出公寓，便是崇山峻岭、断桥河谷、各类公路或羊肠小道。平心而论，这样的环境难以让人觉得安全，而且美式公寓几乎都没有防盗网与防盗门，而多半是简陋的纱窗加木门，一脚就能踹开，这让许多刚来美国的中国人几乎“夜不能寐”。

以笔者生活过的北卡州（North Carolina）为例，当地有数以万计的美式公寓，它们几乎都没有围墙以及任何安保设施，并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北卡州的庙岭（Chapel Hill）、威明顿（Wilmington）、阿西维尔（Asheville）等地，而且面积基本上大小相当。公寓的游泳池、篮球场处于对外开放状态，无人看守，来者随意。

在北卡州、密苏里州与西弗吉尼亚州等地为数不少的美式公寓里，笔者没有发现中国大陆最常见的“地下停车场”。在美国，别墅一般设车库，而公寓则设户外车位。因为美式公寓占地面积大、容积小且入住率低，车位平均利用率在50%左右，这为留出开阔的车行道提供了方便。

值得一提的是，没有围墙的美式公寓，将游泳池、篮球场、车道等看似珍稀的资源一并对外开放，看似颇为大方，但有一样东西则只严格地限于住户使用，那就是垃圾箱。美式公寓垃圾处理，是由公寓物业公司协同当地的垃圾中转站完成的。美国实行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厨余垃圾、纸板、塑料（玻璃）瓶、旧家具必须投放在不同的垃圾桶里，由垃圾中转站统一回收处理，因此清理垃圾是许多美国物业公司最大的一笔支出。这使得不少物业公司会在垃圾桶上标注：本垃圾桶只限于公寓住户使用。

但对于许多“新移民”或是在美国短期工作的中国人而言，一旦发现自己公寓的垃圾桶“爆满”，很可能就会情不自禁地将垃圾放到其他公寓的垃圾桶里（美国许多公寓都是毗邻的）。但这却属于违法行为——若是初犯，很可能被其他公寓物业经理逮个正着并严肃警告，告知下不为例；若是屡教不改，很可能被诉至法院，遭到重罚。

小区治安如何保证？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美式公寓都没有围墙。前文所言之美式公寓，乃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居住小区——它们基本上散落在公路旁，属于我们在网上看到最多的美国屋舍。

与中国城市不同的是，在美国市区里是没有美式公寓的，最繁华的城区只有银行、写字楼、博物馆与政府机构等设施，特别在大都市如里士满、华盛顿与圣路易斯等市区，一到深夜，立刻人去楼空，一片安静。晚上7点之后的美国，几乎可以用“市区万籁俱寂，郊区千家灯火”来形容。

既然美式公寓都设在荒僻无人的郊区，那为何都不设围墙？

要回答这个问题则必须从美式公寓的渊源说起。大多数美式公寓、居民点都是沿公路而存在。在基础设施中，美国最发达的是公路，许多公路早在19世纪中叶的“西进运动”之初就开始修建，当时美国大多数国土尚无人居住。路修好之后，居民们（当中很多是修路工人、矿工等等）为了方便，选择依路而居而非聚居在城区里。

尔后，城市都会渐成气候，遂形成“上班在城里，居住在郊区”这一大多数美国人所青睐的生活方式。因此，美式公寓最大的特征就是“地多人少”，这也是缘何很多中国人去了美国感叹自己是“洋插队”的缘故。许多公寓离农田、玉米地不过举步之遥，放眼望去，感觉回到了19世纪。在这种环境下，你根本不必指望出租车、公交车会出现在你眼前，如果没有私家车，那真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既然“地多人少”，那么，公寓在面积上就可以容许社会车辆通行。许多公寓里有两车道甚至四车道，特别方便社会车辆穿行。而且在美国，有“道路共享”（share road）的文化传统，无论是小区的道路，还是66号国家公路，都是全社会的公共设施。在这样的基础设施条件与文化传统下，美式公寓完全有条件允许社会车辆通行。

其次，因为人力资源昂贵，绝大多数美式公寓没有能力修筑围墙、门禁并雇佣安保、收费人员来限制小区的车辆穿行。

美国的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1/5，因此人力资源最贵，“DIY”之风也随之盛行。美国的男人大多数都是补屋顶、刷油漆、剪花草、掏下水道以及修车的好手。而且超市自助扫码结账、加油站自助加油都是常态，在许多服务行业，空荡荡的房间里看不到一个服务人员。

有围墙、门禁自然就要雇佣安保、收费人员来管理、维护，这种开销一般的公寓绝对承担不起。按照中国小区的标准，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包括保洁员、保安员、物业经理等等需要30余人。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在美国恐怕只有最顶级的公寓才能配备。笔者所居住的公寓，在北卡州已经算是租金最高的公寓之一，整个物业处（包括一位保洁的秘鲁大叔）不过五六人而已，周边其他公寓甚至只有三四人在办公室里负责一些收房租等基本业务。因此，美式公寓如果有围墙、门禁，那所附着的额外人力开支让公寓管理公司根本无力承担。

既然没有围墙，又准许社会车辆穿行，美式公寓岂不是相当不安全？

这个担心，我相信大多数刚来美国的中国人都有。但就笔者亲身体验而言，美国的入室盗窃案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笔者曾外出开会一个月，邮局的一个包裹被放在房间门口二十余天，任凭风吹日晒，竟无人顺手牵羊，这可谓是“路不拾遗”的典范。

但这绝非反映了美国治安好，美国窃贼不多，但劫匪不少，找路人索要钱财的黑人乞丐令你防不胜防。之所以美式公寓对外开放，甚至没有防盗设施，根本原因在于两点：一是美国的持枪合法制度，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有枪，而入室盗劫者一旦被主人开枪击毙，主人是不必承担刑责的；其二，美国联邦法律与许多州的法律，对于入室盗劫者普遍都处以最严厉的刑责，几乎仅次于谋杀与贩毒。打个简单的比喻，在美国入室盗劫，其风险不亚于在中国抢银行，我相信大多数窃贼都不愿意冒此大韪。

因此，不设围墙的美式公寓，是美国特殊的国情、历史与文化所造

成的。它综合地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现状，它只属于美国，并且是美国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

中美居住文化差异

虽然美式公寓反映的是美国的文化，但小区都是人类居住的所在，如果围绕着“美国小区为什么没有围墙”这个话题来讨论，笔者认为，美式公寓给中国小区建设的启示，并非是“有无围墙”那么简单。

窃以为，其核心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借鉴的，是代表工业文明的美式居住文化而非美式公寓这种小区。中国的私家车近年来迅速普及，大型城市的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中国大多数地区基本上进入到了工业文化时代，但人们的居住文化确实还停留在所谓的“农耕时代”，购置房产仍以市区为首选。在这种居住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的城市中心承担着停车、居住、办公等多重职能，给原本拥挤不堪的城市中心带来了严重的负担，小区拥挤、交通拥堵、污染严重、地价高昂。这使得中国许多一线城市市区房价变得高不可攀，甚至超过了纽约曼哈顿、东京涩谷的房价。

与此同时我们应注意到，在中国许多高房价的城市，只要驱车半个小时，房价便下跌许多，若是驱车一个小时，房价几乎是市区的1/3。但即使是会开车且有车的年轻人，大多数仍不愿意买郊区的房子，而执意选择“离单位近”的住宅。

这种选择，在美国显然不可思议。在美国大多数地区（除了纽约、华盛顿与波士顿等特大型城市之外），开车一小时上班几乎是常态。笔者有好几位朋友，上班的工作地点离自己的住宅竟然有两小时左右的车程，他们并未觉得这是一种痛苦，相反，他们非常享受“在路上”的惬意。这也是缘何美国公路旅馆、汽车餐厅与交通广播尤其发达的原因之一，“车轮上的民族”洵非过誉。

笔者浅识，要想有效地改变城市拥堵现象，美国的城市规划与公寓建设当然有值得学习的一面，但其居住文化更值得思考。近年来，中国的私家车、开发区的数量急剧增长，告别传统居住文化的基本条件日益成熟。笔者在美国时，曾与建筑学界的好几位朋友深入探讨过这个问题，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当代中国的城市规划者、新闻媒体应有远见，鼓励年轻人在郊区甚至周围的二三线城市（包括县城）购房，开发商则应沿着高速路修建小区，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市区的拥堵问题。当然，这只是一个理想化的建构。因为在当下中国，还有学区、户籍、医疗等一系列政策性的问题困扰购房者，这更显示出了中美两国小

区的差异并非是“有无围墙”这么简单。

一言以蔽之，拆除小区的围墙容易，但拆除观念、制度上的“围墙”却远非一日之功，这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美共的“红孩儿们”

老一辈美国共产党革命家和领导人的子女们，从小在组织中成长，被称为“裹红色尿布的孩子”，透过他们回忆童年的经历看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历程，令人不胜唏嘘。

文/ 程映虹（特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曾经看过一个录像片，片名叫做《左派的孩子们》，内容是美国共产党老一辈领导人和著名活动家的孩子回忆他们的童年生活。在美共近乎销声匿迹的今天，看看这些左派的孩子们有过什么样的童年，这种童年在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又留下了什么样的影响，很有发人深省之处。

这些人的父母亲是从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活跃在美国左派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如美共总书记尤金·丹尼斯，美共在南加州、波士顿和芝加哥的领导人琼·海雷、萨哈罗夫、霍罗维兹等。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他们的家庭充满了浓厚的政治气氛，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了在家中举行的党的会议、堆到天花板的党的文件、络绎不绝的来客和一夜响到天亮的打字机键盘的声音。

最让他们觉得兴奋的是跟着大人出席那些党的大会，当父母在前台演说和辩论时，孩子们有的半懂不懂地听，有的在后台玩耍，吃东西，在人堆中打打闹闹，很像社区教会举办活动时的情形。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难怪要被称为“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了。

党组织就是社区

这些“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他们生活的环境与众不同，党组织就是他们的社区，父母以外的党员干部都叫叔叔阿姨。美共的成员常常在同一块地方买房子或租房子，在这块地方用党的语言和组织方式创造出一个和外面不同的环境。对于那些和左派格格不入的邻居，他们称自己为“进步人士”，决不暴露自己的美共身份。

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他们把这块地方称作“社区中的社区”。他们相信自己的父母和那些叔叔阿姨们都是世界上最好最善良的人，他们在为穷人谋幸福。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说要有远大的志向，知道世界的未来是属于自己的。

美共芝加哥分部领导人霍罗维兹的儿子回忆说：“我很小就知道将来要把世界改造成我们的家园，把世界变得更好，我们的文化也要占领一切地方”。他跟父亲散步时，父亲指着路牌对他说，这些路名都是开发

这里的地产商的名字，革命后他们要重新给马路起名。于是父亲就让他为每条马路将来应该叫什么而出主意，这成了他们经常的游戏和消遣。

这种“将来的天下是我们的，是党的”的意识在每个“裹红色尿布”的孩子心中都是扎了根的。美共总书记丹尼斯的儿子小丹尼斯回忆说，当年他跟父亲一起参加“五一”节的群众大会，骄傲站在父亲身边，听他那激动人心的演说，看他挥动有力的双臂，再看下面成百上千的群众在跟着欢呼，这时他虽然还小，也不懂父亲究竟在说什么，但只觉得全身充满了力量。很多孩子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参加了政治活动：挨家挨户分发宣传品、敲门为政治活动收集签名。

美共南加州领导人琼·海雷（Dorothy Healey）是个有名的女共产党活动家，聪明、美貌，有很多崇拜者。她儿子回忆说，小时候每次跟妈妈出去，同志们都会开玩笑地说他将来也一定会是个出色的共产党领导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孩子们自然而然地培养起一种“我们”意识。“我们”虽然住在某一块地方，但却另有自己的社区；“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有远大的未来；“我们”甚至自有一套说话的方式和特别的术语。从小就生活在强烈的政治气氛中，懂事起就有鲜明的“我们”身份认同和“得天下”的群体意识，参加那些热热闹闹的政治活动，这些都让这些孩子觉得与众不同、兴奋和骄傲。



1936年6月24日，美国共产党在曼哈顿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场景。

在美亲苏带来的尴尬

当年密切监视美共活动的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埃德加·胡佛曾经说："共产党不是一个政党。共产党是一种生活方式。共产党人是在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的父母都想训练他们的子女成为狂热的共产党人。"他指的就是这些"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们。

但是这种"裹红色尿布"的生活也常常充满了困惑和苦恼这一点他们也从小就已经感觉到了。例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党内的派别斗争错综复杂美共既是共产国际的分部又受苏联直接控制美共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常常面临"站队"和"跟风"的问题，即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要搞清楚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究竟谁当家。是跟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还是服从斯大林弄得不巧就会身败名裂被自己过去的同志视为死敌。

另一个麻烦是必须时刻和苏联摇来摆去的政策保持一致。例如从1933年到1939年8月反法西斯是政治正确的因为苏联当时的外交政策是反法西斯。从1939年9月到1941年5月不反法西斯是政治正确的因为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斯大林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把酒言欢。从1941年6月开始反法西斯又变成政治正确的了因为德国进攻了苏联反法西斯是为了保卫苏联。一切为了苏联，一切听从苏联，一切以苏联的名义，美共似乎完全成了国中之国，是美利坚的苏维埃。每一次这样的脑筋急转弯在美共内部都引起不解和混乱"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们也分享了他们父母的惶恐不安和无所适从。

美共的黄金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当时苏联是美国的盟友保卫苏联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一致很多美共成员觉得可以扬眉吐气地宣传共产主义了。在那个时期美共成员发展到了将近7万人，然而好景不长二次大战结束后冷战开始了美苏成了敌人美共的日子开始变得越来越难过了。到了50年代初美国参议员麦卡锡搞反共扩大化美共党员成为主要对象。大批美共党员除了少数入狱外或是被迫去法庭作证或是宣布退党或者起码丢掉了工作失去了中产阶级的地位只好卖掉房产到低收入家庭居住区去租房子去餐馆打工维持生计。

"裹红色尿布"长大的孩子们也受父母的影响。他们看着自己父母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报纸上看着电视转播他们在法庭上的作证听着那些说美共为苏联利益服务的指控感觉到周围那些充满敌意的眼睛不由得心惊肉跳。很多人回忆说当时正是自己开始交异性朋友的时候而对方常常在父母的反对下和自己断绝来往。最凄惨的是坐火车去监狱探望被关押的父母亲那是他们终身难忘的经历。

许多“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们把他们父母的遭遇看成是在冷战气氛和麦卡锡反苏反共狂热下受的迫害。但是，麦卡锡反共扩大化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在冷战和两大阵营的对立下，可以公开活动的美共确实成了苏联利益的工具是苏联利用美共从事渗透或刺探情报的组织。美共在美国可以公开活动（虽然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它的公开纲领就是拥护苏联，要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实现苏联号召的共产主义，所以它本身就是冷战的一部分。美共的这个性质其实从一开始在共产国际策划下成立时就明确的，不过到了冷战时期更引人注目罢了。

重要的是反苏在美国也决不是美国一小撮右派政客的阴谋或煽动。例如40年代末当美共在纽约举行五一游行时纽约工人举行10万人反游行在数量和气势上远远压倒了美共的游行。一些“裹红色尿布”的孩子回忆说比自己的父母亲被审判和投入监狱更让他们震惊和伤心的是在那些高举反共标语牌的游行队伍中在那些被警察强行隔在大街另一边朝美共的游行集会大声叫骂的人群中绝大多数是蓝领阶层。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校园中他们才听到一些让他们安慰的声音。

“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们对此十分不解因为他们一直被教育说美共是代表了无产阶级利益的而知识分子是中小资产阶级。但在美国的社会现实中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却是反美共的主力军。其实不光是美国工人，美共在美国被认为是最受压迫的黑人中也毫无影响。美共曾经在30年代大危机中企图在黑人中发展成员，黑人激进分子可能对美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感兴趣，但一当美共言归正传，要他们加入组织推翻这个制度建立另一个制度时，他们往往就摇头摆手：伙计，这活儿我们不干，你们好自为之。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黑人主流对种族主义的批判从未发展到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全面否定并让他们加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地步；相反，他们基本是宪制派。马丁·路德·金的美国梦不是一个随他解释的乌托邦，而是要真正实现美国宪法对所有美国人的许诺。



1951年6月20日，美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在纽约被警察带走，当时美共因涉嫌间谍案，大量被调查质询。

放弃与坚持

在遭受了50年代早期的严重挫折后50年代中期美共又受到两次致命的打击。第一次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20年前的“大清洗”这使得很多美共党员丧失了对苏联的信仰；第二次是同一年苏联集团出兵匈牙利，镇压那里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运动。

经过这两次事件后苏联和美共在美国声名扫地很多在麦卡锡“白色恐怖”下坚持下来的美共党员退了党包括一些“裹红色尿布”孩子的父母他们曾经是美共的领导和中坚，追随美共二十多年。他们不但退了党而且换了工作搬了家和原来的朋友及社会关系断绝交往从头开始新生活。

因此对美共和美国左派最大的打击并不是麦卡锡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

上面提到的那个女革命家琼·海雷的人生历程就说明了这一点。海雷的家庭背景是匈牙利的犹太裔，1910年代来到美国。对美国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会知道，世纪之交来自东欧的犹太裔移民是美国左派和美共的主要人力资源，很多著名的活动家都有这个背景。一次大战中他们反战，一次大战后他们拥护苏俄。这个族群的意识形态特征是如此突出，以至美国政府在1919年时将一大批这样的移民（有的来自东欧但不一定是犹太裔）装上轮船送到他们心目中的祖国苏俄。

海雷在政治气氛浓厚的东欧犹太人社区成长，少女时期就辍学参加革命，高中都没念完，可以说是从少先队干起。30年代时，美共在南加州洛杉矶地区的组织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其活动由她组织。1951年在麦卡锡主义时期她被法庭以企图颠覆美国制度的罪名判5年，罚款一万美元。她不服上诉，说自己只是遵照美国宪法中保证的言论自由，从未有任何暴力行动和计划。1957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她的案件作了裁决，推翻地方法庭的判决。

但1956年的两件事加在一起，使得海雷改变了对苏共和美共的看法（海雷的匈牙利背景，沙俄在19世纪的欧洲充当专制主义的宪兵的历史，这些对海雷有一定影响）。此后，虽然她从未声明放弃共产主义立场，但已和美共从貌合神离到分道扬镳，她要做一个独立的党外共产主义者。后来她在60年代兴起的女权运动中重新为自己的政治热情找到了献身对象。

当然也有很多美共干部没有随波逐流。美共总书记丹尼斯在麦卡锡时期被判刑，蹲了五年班房后被释放。他的儿子小丹尼斯回忆说父亲恢复自由后立刻找到党接上了组织关系。但面对面目全非的世界和分崩离析的党组织他再也找不回当年振臂一呼、万众欢腾的感觉整天眉头紧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后来被送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小丹尼斯——那时他已长大成人——看着父亲整天从这面墙踱步到那一面墙。终于有一天，他停下脚步，严肃地要儿子答应他一件事将来一定要做一个共产党人。

目录

《朝鲜病人》特辑 编者按：
金正日神秘访华背后
朝鲜病人
双面朝鲜
朝鲜“陷阱”
朝军枪击中国边民事件
背叛的“血盟”
朝鲜：不是秘密的投资陷阱
中国在朝鲜的存在
朝鲜投资指南
中国原料流入世界冰毒工厂
从麻黄草到康泰克的攻防战
朝鲜毒品攻陷东北
金氏孤儿
沉重的遗产
朝韩如何统一？
六个“脱北者”的朝鲜秘密生活
朝鲜“脱北者”真相
韩国“脱北者”组织全揭秘
31名“脱北者”困局

版权信息

凤凰周刊kindle特辑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凤凰周刊》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2014©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2014
本书版权为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所有。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P-00110177-0052-140530
最后修订：2014年 5月 30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4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www.bookdna.net

纸质版编目数据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ISBN：1810-4770

《朝鲜病人》特辑 编者按：

当朝鲜在中国和越南的同志们分别于七十和八十年代改革后，当古巴也出现变革的迹象后，朝鲜已是经典斯大林体制的最后一块活化石。

朝鲜不单单有计划经济的独特，金氏的世袭体制更是对马列主义东方化的创造性发展。同时，面对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南方同民族政治体，以及处于诸大国间的地缘政治态势，总让集自卑与自傲为一体的朝鲜感到巨大的压力。

严重的自身问题和外部环境，使金家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国内统治-国际交往方式。当面临严重困难时，在国内开放自由市场，让民众自己解决生计，在外交方面降低姿态，以获得援助为目标；当度过了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朝鲜使用限定规模的货币改革，将在自由市场中获利的新阶层全部打回原样，同时在国际上拒绝进一步接触和坚定推行核武计划。

生存比“反复无常”的批评更为现实和重要。

《凤凰周刊》长期关注周边国家和地区，探究其各自的现代化历程、当下的政治经济状况。向中国东北贩毒的双面朝鲜亦在此列；而在宏观政经影响下，脱北者的命运也令人唏嘘。

《朝鲜病人》特辑选择了历年来凤凰周刊关于朝鲜的重量级封面报道，力图为您呈现一个更加饱满的朝鲜形象，以及真实背后的政治与经济逻辑。

金正日神秘访华背后

▫ 记者 漆菲

编者按

金正日此次访华，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寻求中国经济支援，以度时艰的求助之旅。

今天，中国人提到朝鲜，首先想起的是经济极为落后，国民极其贫困，社会极度封闭。

然而，朝鲜这个与中国山水相连、有着鲜血凝成的友谊的邻邦，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人的心目中，曾经是个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国、物质条件和文化发展水平远优于中国的值得羡慕的国家。事实上，那时朝鲜不但各方面发展水平一直领先于中国，即使与今天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的韩国相比，也因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日本留下的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而长期领先。直到1970年代初，韩国发展水平才超越朝鲜，此后每4到5年南北差距就翻一番。

今天的朝鲜，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长期坚持僵硬低效的计划经济、拒绝市场化改革而步入失败国家之列的典型范本。朝鲜极为窘困的社会现状，无疑可以时刻提醒我们，朝鲜的今天曾经是中国的昨天！中国全社会尤需牢记，中国今天正步入富足阶段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市场经济不动摇，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5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举行会谈。

5月2日18时，20多辆挂着大连牌照的高档汽车，从高速路上徐徐驶入中朝边境城市辽宁丹东。同一时间，当地警方和边防部队，开始对丹东火车站进行清场和警戒。此时的丹东市民或许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久久驻扎在此的境外记者明白：这一刻，终于到了。

这一刻，指的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访华之行。在过去的10年里，金正日几乎每隔两三年就要到中国转转，与中国领导人叙叙旧，谈合作。自1997年就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以来，金正日已于2000年、2001年、2004年和2006年4次访华，而每一次来访都属于秘密的非正式出访。

日本记者一度距金正日不到10米

5月1日晚，日本某媒体驻京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中联要关闭几天了。""中联"指的是丹东面向鸭绿江的中联大酒店。一直以来，韩国、日本等国媒体都守候在这家酒店，试图拍摄金正日"过江"的场景。从中朝

友谊桥常常可望见不少摄影机摆放在窗户外面。

据韩国《朝鲜日报》5月3日报道，3日5时15分，一趟17节的神秘列车抵达丹东。说它神秘，是因为这个点不是正常的中朝列车运行时刻。“韩国媒体的报道应该是相当准确的，加挂两节车厢，如果不是元首的车不可能这样。”辽宁省社科院研究所朝韩研究中心主任吕超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3日4时30分，日本富士电视台记者拍摄到这趟专列。在丹东火车站和鸭绿江铁桥周边，200多个警察严阵以待、戒备森严，直至凌晨6时丹东站站前禁止车辆通行。同样，丹东宾馆也在1日到3日清退了所有旅客，市民后来听说金正日将住在那里。

丹东是国外媒体探查朝鲜动向的一个“前哨站”，但凡这里有任何“异常”，都会被外国记者蠡测为金正日来华的前兆。今年1月，英国路透社记者注意到朝鲜加强边境铁路沿线安保的举动，认为是金正日可能访华的信号。3月，韩国记者发现朝鲜新义州发往丹东的主要物资运送车辆基本中断，手机通讯也受到干扰，于是认为这是朝鲜为金正日即将访华而采取的安保措施。

相比媒体，韩国和美国的情报部门靠侦察卫星监视到金正日专列的动向等情况，得出金正日访华的情报。

金正日每次出行前，其中的一辆高档座驾便会先行空运到目的地，这样，金正日一下火车就可以坐上汽车。此前在访俄期间，金正日除乘坐专列外，便是乘坐他自己的奔驰汽车。但此次据韩国媒体报道，金正日抵达丹东后，只停留半个多小时，随后乘坐中国提供的轿车前往大连，轿车中包括奔驰最高级款型“迈巴赫”。

在外媒的紧紧跟随下，金正日的神秘座驾驶向中国东北港口城市大连。当天上午，有人看到一个大型朝鲜代表团进入富丽华大酒店。酒店方面不愿置评，只是说两天内客房全部订满。据韩媒透露，金正日一行租下了大连富丽华酒店西馆的全部306间客房。酒店有关负责人说：“除了宴会厅和会议厅，租下西馆全部客房一天所需费用达30万元左右。”

此次金正日入住的富丽华大酒店属于日资企业，而不是往常的国宾馆。“该酒店并未全面封锁，我们有同事就住在酒店另一区。”日本某驻京记者告诉本刊记者。

据他透露，当时几位日本记者距离金正日不到10米远，更有记者隐蔽在二楼的咖啡厅偷拍，被中国有关部门安保人员发现后遭到扣留。“但

我们觉得他们（扣留）的目的主要是安全考虑，而不是阻止采访，所以态度比较客气。”其中遭到扣留的一名日本记者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不只日本媒体，英美的记者也同样被勒令删除照片和影像。

即便如此，有经验的记者还是在拍照时就迅速将图片传回总部，不过很多是从预先选好的偏僻角落远距离观察和拍摄，拍摄的效果未必理想。

有趣的是，一位该天恰好入住富丽华酒店的日本商人也在大堂看到金正日的队伍，还小声向周围的人求证。“所以，我们觉得金正日有意让外界看到他还很健康，所以并不隐瞒自己的行踪。”该日本记者表示。

金正日在广场欣赏了20分钟夜景

两天后，据朝中社的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前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在大连迎接金正日的到来。3日下午，在李克强、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王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驻朝特命全权大使刘洪才等中央和辽宁省、大连市党政领导干部的陪同下，金正日参观了大连冰山集团、大连机车车辆厂、辽宁渔业集团、大连雪龙产业集团等单位。

新华社在报道中补充：“在参观大连机车车辆公司时，金正日登上两米多高的驾驶室，详细询问机车性能和控制程序。在参观大连雪龙产业集团时，他仔细了解肉牛品种培植和养育成本等情况。他指示朝方随行人员认真研究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做法和经验。”

在视察了大连港和附近造船厂后，金正日到棒棰岛国宾馆与中方官员共进晚餐。20时前后返回富丽华大酒店时，他并没有直接回宾馆，而是在星海广场欣赏了20分钟夜景。

根据境外媒体原先预测，4日晚金正日乘坐专列离开大连后，应该于5日6时抵达北京。但日程突然有所改变，韩媒报道称，金正日先访问了天津才前往北京。路透社5日发布一张新闻照片：在天津火车站，警方拉起了长长的警戒线，清空了车站广场上的车辆与行人，一些乘客纷纷拿起相机拍摄广场里侧的车队，一辆加长加厚的奔驰高档轿车颇为显眼。

14时多，有网民从办公楼高处拍到40多辆汽车高速前行，当中有

10多辆奔驰，估计是金正日去参观天津滨海新区。之后朝中社的报道中也证实了该消息："在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等人的陪同下，金正日同志看到发展成为大规模现代化的天津港。"朝鲜《劳动新闻》在7日的报道中总结："金正日同志行程8000余里，往返中国东北地区，深入了解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在思想感情、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取得的成绩。"

在日本媒体揣测其行踪时，韩国方面正在仔细研究金正日访华的镜头画面，试图评估这位爱穿卡其布军装外套的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外界怀疑金正日曾在2008年有过一次中风。一些人注意到，他走路时拖着一只脚，而且头发也少了。他们提出，这些可能是中风和肾病留下的长期损害的迹象。

"照片上，他看起来憔悴，其标志性的蓬松黑发很稀疏。"一位韩国记者向本刊记者透露，金正日每次来中国都会请类似301医院的医生做身体检查，此次也同样有可能。

《朝鲜日报》驻京记者崔有植这几天也一刻不停。据他和同事们观察，5日15时40分，金正日一行分乘黑色轿车和迷你大巴等30多辆礼仪车抵达钓鱼台国宾馆。他们通过限制普通车辆通行的道路快速行驶。一位目击者告诉他，金正日乘坐的车辆通过长安街10多分钟后抵达了钓鱼台。驶入钓鱼台的车辆车头前挂着朝鲜国旗。

17时20分，金正日一行进入首脑会谈场所—人民大会堂。据悉，当天的活动持续到22时10分，其间举行了欢迎活动和演出、首脑会谈以及晚宴。"两国最高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整整逗留4小时50分钟，"崔有植在报道中补充道，"金正日、胡锦涛、温家宝3人都出生在同一年，是经历同一时代的人。"

"这都是非常破例的举动"

金正日出访时的小心谨慎体现在方方面面。2005年叛逃到韩国的金正日前保镖曾告诉美联社记者，金正日不相信任何人，甚至在旅行时，也不相信任何地方的饮用水。

而据《东亚日报》报道，为防健康状况发生泄漏，金正日在华粪便悉数运回国内。据传，2006年时运输过程中发生意外，2坨粪便被盗。所以这一次中方实施了严密彻底的封锁措施，不让外界获得任何与其健康状况有关的情报。

金正日不坐飞机，只坐专列出访也为人熟知。有外媒曾表示这是因

为他有“恐高症”，但也有人猜测这是一种战略需要。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张琏瑰对此表示，金正日历次访华均是秘密出动，是朝鲜政治文化与实际需要。秘密外交的基本思路是领导人巩固权威，同时从实际需要出发，会造成国际社会的猜测，增加关注度。

5月4日至6日，境外媒体每天要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证实金正日访华的消息。然而，直至6日，姜瑜的回答仍是“目前我还没有可以向各位提供的信息”。不过，姜瑜补充道：“根据以往惯例，如果朝鲜最高领导人来访，有关情况将会适时发布。”

金正日此次来访消息初被曝光后，中国大陆绝大多数媒体“均在等待新华社通稿”。一位媒体人向本刊记者透露，自去年年底开始，有关部门几次批示，涉及朝鲜的新闻一律关闭网络跟帖。吕超也表示，根据以往惯例，中方会按照朝方要求，在金正日访华结束后公布相关消息。



金正日此次访华期间，参观了多家中国企业。

但据近些年一直紧跟朝鲜动向的日本共同社驻京记者介绍，2001年和2004年在金正日访问离开之际双方便发布消息，而2006年由于在归途中途经朝鲜龙川站一小时后，该车站发生了爆炸，朝方认为该爆炸是针对金正日的暗杀企图。所以那次之后是等到金正日回到平壤后才发布消息。“但这次，7日上午他的专列还在沈阳消息就公布了，让我们也很费解。”

5月7日9时，朝鲜中央通讯社率先披露了此次金正日在中国东北进行非正式访问的情况，但并未提及北京首脑会谈。一小时之后，新华社也发出通稿，重点谈到胡锦涛与金正日在北京会面的情况，对东北之行

只提到少许。但过了两天，朝中社也发布了首脑会谈的消息，这被外界解读为“中朝双方在很多必要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韩国YTN电视台也观察到不同于往常之处：此前几次金正日委员长访华，为了确保安全，都是同时有3辆专列出行，而此次只有一辆专列出行。另外，金正日在到达中国境内后，频频走下专列进行考察，这在以往的访华经历中也很少见。乘坐汽车的情况也比此前的几次访问大大增加，特别是在结束天津滨海新区的考察后，没有选择乘坐专列，而是直接乘坐汽车通过高速公路到达北京。“这都是非常破例的举动。”YTN称。

朝鲜《劳动新闻》9日的社论则表示，金正日最近对中国进行的非正式访问令朝鲜人民感到“非常高兴和激动”。这次访问对加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友情和同志式的友谊是一个“具有意义的契机”，同时强有力地显示了朝中友谊的生命力，将极大地鼓舞两国人民在新世纪为不断发展朝中关系而努力。

4次访华伴随革新之路

据吕超介绍，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访华一般都集中在上半年，而且通常都是在朝鲜国内环境和朝鲜对外关系出现波动的时刻。回望金正日的访华路线图，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摸索朝鲜革新之路，几乎成了金正日几次来华的一条主线。1983年金正日首次访华时，在邓小平的建议下视察了深圳，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直观的认识。

2000年5月，应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邀请，金正日对中国进行了非正式访问。这是金正日就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之后的首次出访。金正日那次来华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在中韩1992年建交后，中朝间出现了一些龃龉，直到1999年才实现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2000年6月，朝鲜半岛即将迎来分裂55年来的首次北南首脑会晤，韩国总统金大中将飞抵平壤同金正日就朝鲜半岛和平统一问题举行会谈。

《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认为，金正日在朝韩高峰会晤前夕访问中国，目的是想加强因中韩建交而一度有所疏远的中朝关系。当年，金正日不仅登上天安门城楼，而且还走访了联想集团。在40多分钟的参访过程中，金正日询问了很多有关电脑技术的问题。此后，朝鲜开始加大对IT产业的投入。

2001年1月，金正日对中国进行了为期6天的访问，仅在上海一地就待了4天。其间，金正日带领20多名经济专业人员走访了上海证券交

易所、张江高科技园区、宝钢、上海通用等项目，对上海的飞速发展留下深刻印象。站在上海浦东新区，他感叹道：“今天的参观对我们触动很大，我们不得不思考朝鲜未来的经济该怎么发展。”

访问上海的第二年，金正日采取“7·1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开辟新义州经济特区等部分引进市场经济体制，表现出要改革开放的意向。

2004年4月19日至21日，金正日第三次访问中国时，朝鲜半岛局势又是风生水起。当时正值朝鲜半岛核问题面临严峻考验之际，朝鲜先后采取了承认铀浓缩计划、重启核反应堆、完成废燃料棒再处理等措施，六方会谈进程面临重重阻碍，因此，西方媒体很关心金正日那次访华会不会对朝核问题走向产生积极影响。

一些细心的外国记者注意到，金正日4月19日抵达中国的前一天，时任美国副总统切尼刚刚离开中国。不少分析家纷纷推测，金正日选在这个时候来中国，主要是想通过中方得知美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想法以及下一步谈判的底线。金正日对中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短暂访问，对朝鲜无核化的目标表现出耐心和灵活性，表明要积极参加六方会谈。两个月后，六方会谈第3次会议得以举行。

2006年的访问是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一次，金正日访问了武汉、广州、珠海、深圳等多个城市，参观的单位和企业涉及农业、科技、教育等多个领域。返回北京后，金正日还在胡锦涛主席的陪同下视察了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此访结束后，金正日曾表示：“对中国南方城市快速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这一次，金正日展开他的第5次中国之旅时，英国《金融时报》指出：“金正日抵达中国进行罕见的出访，此举引发外界猜测他正寻求拯救朝鲜死气沉沉的经济，并缓解因一艘韩国军舰沉没而出现的紧张气氛。”

遮掩中的粮食援助与经济合作

在外界看来，金正日执意在这个时间访华，说明朝鲜的状况非常紧迫。4月8日，负责管理金正日统治资金的39号室室长全日春对北京进行了为期6天的访问。据分析，他打此“前站”是为了在金正日访华之前事先同中方协调经济合作相关议题。

吕超则指出，自去年朝鲜核试验以来，中朝关系一度降温。随着温家宝去年10月访问后双方关系才开始恢复。今年年初制定了一些交流项目，比如互派出访、中方援建鸭绿江大桥、经济合作等。

去年11月，朝鲜实行了2002年以来筹划的货币改革，海外人士一致认为，其货币改革是失败的，货币贬值导致市场瘫痪，社会不安情绪也在增长。主导货币改革的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长朴南基被免职似乎是个明证。连一名朝鲜驻京官员都表示："国内经济要崩溃了，通货膨胀太严重了，关键是已经没有物品可以买了。"

据悉，朝鲜货币改革失败，国内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之后，有关部门开放了军队专门为战争期储备的粮食仓库，逐渐把粮食分配给人民，以免大量饥饿者产生。

此时此刻，朝鲜急需来自中国的粮食援助是个不争的事实。5月对朝鲜人的生死来说是个分水岭。英国媒体引述北京外交界的推测，作为金正日的访华礼物，中国将提供10万吨粮食。如果10万吨粮食都是大米，价值将达6000万美元。这一数量相当于朝鲜去年一年从中国进口的粮食(29万吨)总量的1/3。日本分析人士则推测，短缺的不仅是粮食，还有肥料。最保守计算，朝鲜一年至少需要30万吨左右的肥料（等于1-2亿美元）。

除无偿援助之外，在新义州一带建造工业园区、开发罗先港等朝中两国边境地带的经济合作问题也可能会成为主要议题。此前一直是朝鲜美元来源的南北经济合作事业陷入僵局后，朝鲜开始把希望寄托在中方的投资上。朝鲜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作为融资窗口，并让管理统治资金的39号室室长担任理事长，都是出于上述原因。

日本《产经新闻》发表评论文章认为，金正日此次访华可能成为朝鲜改革的契机。"金正日这次首先选择视察大连肯定是为了开发罗先，这也符合中国的预期。"据消息人士透露，朝方一行4日对大连的经济开发区进行了长时间的参观。虽然尚不清楚金正日本人是否在场，但参观者中包括朝鲜劳动党统战部长金养建等负责经济的高官。

金养建被喻为金正日的左膀右臂。除负责朝鲜劳动党的对韩关系外，他还精通对华事务，并担任今年1月成立的"朝鲜大丰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

但一位朝鲜问题专家分析称："拥有正常思维的外国商人不可能看好朝鲜极为封闭的市场。所以朝鲜开始只能依靠中国国有企业来投资矿产等行业，渐进做好市场，然后将其他国家的企业拉拢进来。"

另外，所谓的"接班人问题"也备受关注。据《东亚日报》报道，随着金正日的身体状况频繁出现问题，朝鲜开始着手构建下一代中朝领导人关系。虽然此次金正日行程中并未出现小儿子的身影，但韩国联合通

讯社引用新华社7日的报道称，金正日与胡锦涛举行的会谈上说，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和精心培育的朝鲜和中国的传统友谊，经受了时代风雨的考验，不会因时间推移和世代交替而发生变化。其中的“世代交替”很可能是在暗示朝鲜的“权力继承”。

对外界频频关注中国是否支持这样的世袭制度，吕超认为，朝鲜确立什么样的接班人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中方不会干涉。“中国政府肯定会尊重他们的选择。除非朝鲜确立新接班人后对中方进行通告，如果没有对外公布，我觉得提到这个议题的可能性不大。”

金正日访华犹如一出大戏，吊足了海内外观众的胃口。不过，他的访华不仅仅带来一出令人赏心悦目的朝版《红楼梦》，究竟得到了什么还要在将来见分晓。5月15日到16日，第4次中日韩外长会谈将在韩国的庆州举行；5月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将访华。吕超说：“到时，关于金正日访华的细节，中方会细细向各方解释。”



每天都有无数朝鲜人前往万寿台大纪念碑献花、鞠躬。这也是平壤的新婚夫妇们必不可少的一项婚礼程序。

朝鲜病人

□ 记者 周宇 特约撰稿员 肖克莱提（发自平壤）

尽管朝鲜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之一，但现代科技正使这个国家变得透明起来，在Google Earth上，全世界各种“朝鲜研究爱好者”们正努力把朝鲜每一寸国土上的建筑都标注上用途。

在过去的一年里，金正日同志用一系列惊世骇俗的举动牵动着全球关注：2009年4月导弹危机、5月地下核试验危机、年底货币改革危机，直至2010年3月份枪决前计划财政部部长，再到持续至今的招商引资热。

来自天空和地面的无数双眼睛，几个月前就开始紧密盯着金正日同志何时访问中国。因为金正日将军领导下的朝鲜经济，不但已极度需要输血，他还面临着两件或许耗资巨大的任务：三子金正云的接班问题、父亲金日成100周年诞辰纪念（2012年）。

能拉金正日将军一把，为虚弱的朝鲜输血的，今天只剩下中国。

导致市场休克的货币改革

2009年11月29日下午，朝鲜各地银行及部分官员接到平壤电话，正在流通的货币将在第二天作废。

在罗先特区，全朝鲜著名的罗津市场里熙熙攘攘，这个与平壤商店

的冷冷清清截然相反的市场扩建后，在朝鲜拥有特殊地位。这个下午，人们不知道他们卖出的是商品，收回的将是废纸。

极少数得到消息的人突然开始疯狂购物，尽最大可能花掉手中的朝元。平壤时间下午3时左右，一位当时囤积了约4亿朝元的中国炒汇大户得到消息，他紧急派出全部手下疯狂采购，不问价格，统统买下。下午6时，罗津大市场按时关闭，他未能把手中的钱花完。但他比另一位囤积大量朝元的中国商人幸运，后者第二天早上7时起来才得知货币改革的消息。

货币改革引发了休克式的混乱，从12月14日起，朝鲜各地市场陆续关闭。此前，朝鲜规定了严厉的旧币换新币措施。除了兑换时间的限制，朝鲜政府最初规定每家只能将10万元旧币换成1000元新币。此后上限被调整为100万元旧币，允许存入银行，并不再追查资金来源。根据目前官方汇率，调整后朝鲜家庭可兑换的新币上限折合人民币约594元。

对没有多少余款的普通市民，以及手中只持有外汇、很少拥有朝币的特权阶层和大商人来说，朝鲜货币改革冲击并不大。他们只需要暂时观望，度过混乱即可。但那些维系朝鲜市场运行的小商贩和分销商则血本无归。

一位新义州的朝鲜批发商在银行有1000多万元旧朝币存款，被告知10年以后再来取，否则只能承认约200万元的旧朝币存款。罗先一名袜子和手套批发商，将价值80万元人民币的袜子以旧朝币作价分批给下级批发商和小贩，货款尚未收回，已成废纸。

第二波打击轮到了持有外汇的大商人。韩国权威对朝媒体DailyNK（《今日朝鲜》）12月28日引用“咸镜北道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朝鲜人民保安省12月26日发布朝鲜内阁公告，禁止居民使用和私藏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等外币。

如果个人通过交易获得外币或使用外币，均将被视为非法活动，同时将没收个人拥有的外汇。韩国媒体认为，这是在向以外汇交易为主的朝鲜地下物资黑市和外汇黑市宣战。

DailyNK报道称，朝鲜公开枪毙了平壤市平川区2名涉嫌非法流通外汇的妇女，并驱逐其家属。此外，1月5日还公开枪毙了另外3名妇女，她们在咸镜南道咸兴市兴南区西湖里水产事业所交易得到人民币和美元后，非法使用了这些外汇。

货币改革最初获得了部分国营单位员工的拥护。从12月18日起，朝鲜政府对所有国营农场职工，每户发放了1.4万元新币的“国家奖励金”。以官方汇率，约合350美元，这相当于币改前一般劳动者29年的工资总和。

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朝总联”）的机关报《朝鲜新报》称，货币改革后，朝鲜的矿工、集体农庄的农民成为新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纷纷涌入平壤市内的百货店购买高价商品。



10万人的阿里郎表演无疑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群众艺术，表演中出现的金日成，在朝鲜是近乎神的存在。

但物价随之飙升，人民币对新朝币的黑市汇率在2009年底就迅速飙升了170倍。

由于市场一度关闭以及货币的极度混乱，商人们开始囤积食品，米价暴涨，粮食危机出现。罗津一妇女因不愿出售3缸豆油遭举报。豆油被全部没收，妇女被抓走。

受新朝元剧烈贬值影响，中朝贸易一度停滞。除非朝方能当场支付美元、欧元等外币，否则极少有人愿意卖货，而朝鲜禁止持有和流通外汇的法令更是雪上加霜—这等于切断了朝鲜90%以上的日用品和外来粮食供给。

由于朝鲜多年来无力提供足够的粮食配给，朝鲜人早已习惯通过市场寻找食物。货币改革令市场休克，导致朝鲜人即使手握大把钞票，也无法获得足够食物。

DailyNK2009年12月11日报道，两江道甲山郡甲山邑做面条生意的申某和11岁的大女儿因虚弱死在家中。申某死后，家中还有9千元左右的旧币。按货币改革前的市场价，可以买到4公斤左右大米，但此时显然没有人愿意卖给她。

该媒体另一报道称，两江道丰西郡内浦里一名精神异常、不享受食物配给的父亲吃掉了15岁的女儿。为避免恶性事件再次发生，朝鲜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发放食品。



阿里郎表演中，有一万名穿白色衬衫的朝鲜中小学生，手拿不同颜色的方形纸板，根据指令翻出需要的颜色。而反复出现的手枪图案，无疑是这个国家单一权力的象征。

此前，当地只在1990年代中期的大饥荒时代出现过人吃人事件。DailyNK报道称，1997年，当地有18人因此被判刑。

新一轮粮食危机一直蔓延到3月。2010年3月4日，脱北者团体“NK知识分子连带”称，在咸镜北道富宁郡古茂山站，部分居民欲劫持载有中国大米的火车，与武装护送人员发生冲突，一居民中枪身亡。

货币改革成功打击了朝鲜政府无法控制的市场和商人，但市场瘫痪后，政府显然无力支撑朝鲜人的日常生存消耗。雷霆万钧的货币改革只能草草收场。

1月9日，朝鲜《劳动新闻》报道称，“金正日说，未能贯彻给人民吃‘米饭和肉汤’的金日成首领遗训……目前朝鲜不仅在政治思想方面，而且在军事方面列入强国队伍，但人民生活确实有不足之处”。

韩国最大的报纸《朝鲜日报》将之解读为金正日承认朝鲜经济失

败。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金强一教授则认为，这可以认为是金正日的道歉之言：朝鲜前主席金日成1946年以后，每年谈及“米饭和肉汤”，但在朝鲜60多年一直未能实现。

《朝鲜日报》报道，2月10日，朝鲜总理金英日在平壤人民文化宫向在场的基层干部宣读事先准备好的道歉稿：“事先未能充分做好准备，盲目推行了此次货币改革，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对此深表歉意。”



3月中旬，负责货币改革的朝鲜前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部长朴南基，因“作为大地主的儿子，潜入革命队伍，蓄意置国家经济于死地”，在平壤附近射击场被枪决。外间一度曾怀疑消息真伪，但平壤人士向《凤凰周刊》记者证实了枪决的消息。该人士称，官方宣传朴南基是“南朝鲜派来的间谍，为了把朝鲜经济搞乱”。

朴南基被枪决前，朝鲜已放松市场监控。外汇也再次被允许使用，目前中朝边贸逐渐复苏，朝鲜人又回到了以市场维持生存的局面。但商人们警惕起来，朝币持有者会当天就到黑市兑换人民币，不让朝币过夜。

丧失运转功能的肌体

朝鲜货币改革，是一次试图全面夺回社会资源控制权的尝试。

朝鲜当年为应对大饥荒而默许自由市场存在，但农产品交易市场很快发展成各种消费品无所不包的综合市场，尽管按朝鲜法令，农产品外的交易均为非法，但市场规模却越来越大。

尽管朝鲜自1990年代以来出台了种种“改善”政策，但仍然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原则。工厂企业继续实行党委领导、厂长分工负责为主要内容的“大安工作体系”，合作农场继续实行集体劳动、凭工分进行统一核算的基本管理制度。



但是，计划体制内的工农业生产不见起色，国有经济体犹如浮动在市场暗流上的坚冰，正迅速消融衰竭，掌握在政府手中的社会资源份额越来越少。

朝鲜高度计划经济下的集体劳作普遍低效。在农村，标语和红旗随处可见：山坡上是赞扬金正日将军的巨大标语，农田周围几无例外要插一圈红旗。人们列队扛着铁锹和红旗上班前，通常会先围坐一圈，由带队领导训话。进入农田后，干活者寥寥，多数人或蹲坐休息，或拄着锄头远望。

朝鲜的工地上，常能看见一大群配备了明晃晃西洋乐器的文艺宣传人员，吹吹打打，为一旁干活的人鼓舞士气。

商业会社同样低效。有中方合作者形容朝方会社，“九个领导顶多3个干活的。官太多，社长、副社长下面有组长、副组长，副组长还能领导着小队长、副小队长”。

大陆多本朝鲜经济研究著作普遍认为，朝鲜工厂开工率不到40%。

2009年，朝鲜发动“150天战斗”的生产运动。靠近中国的惠山矿以

超额40%完成生产计划，在《感动世界的150天奇迹》中被反复宣传。由于产量是朝鲜的机密，官方未公布具体产量。但DailyNK援引消息人士称，该矿实际产量每月仅10吨。

1970年代中期，惠山青年铜矿年生产量达1万吨。19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供电恶化，年产量只停留在4千吨左右。一位朝鲜矿产资源研究领域出身的“脱北者”说：“目前朝鲜矿产生产量只停留在80年代的10%左右。”

上下一致的偷窃是生产的大敌。许多工厂设备因零件丢失报废，无法生产。

一名参与朝鲜工厂建设的人士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工厂遭到的偷窃：所有的材料最后都不够，因为被工人们越偷越少。焊条被藏起来，因为三根焊条可以换一包香烟。油漆工人的衣服里都藏着小塑料瓶，一边刷油漆，一边往瓶子里倒。可怕的在后面，突然来了一位高级领导，命令整车拉走贵重零件，因为放在厂里不安全，要拉到更安全的仓库。当然，这些零件再也没有回来过。

生产崩溃使朝鲜几乎不能生产民众日常所需的任何产品。在平壤货品丰富的外汇商店里，除熊胆、高丽参及少量工艺品外，摆放的都是中国商品。而附近专供普通朝鲜人的商场，空荡荡的柜台里只有少量香烟、酒、泡菜、盐等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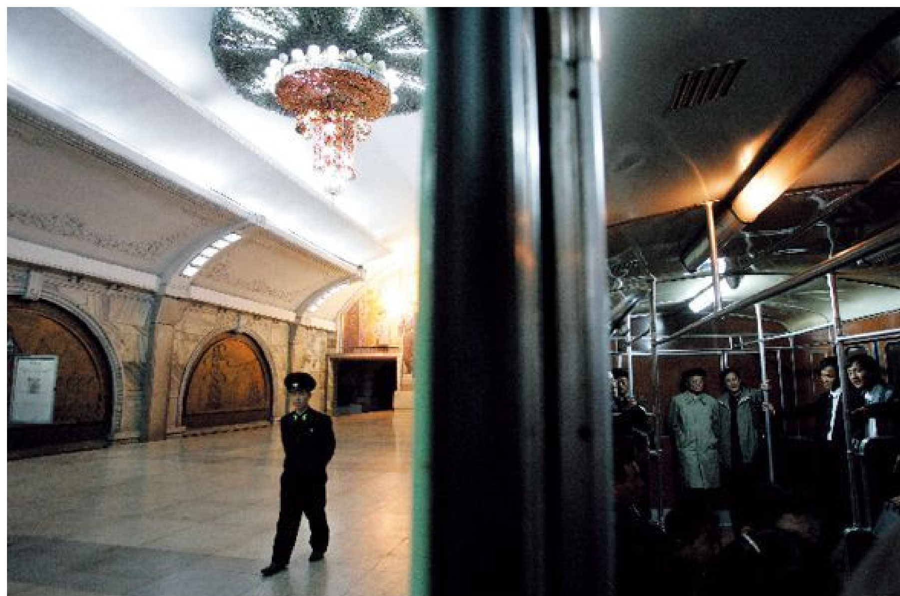
有平壤女士称，卫生巾近年似乎实现了国产化。但这或许是错觉。许多印着朝鲜语、标明朝鲜生产的商品，其实是在中国珲春等地生产的，只不过是用朝鲜文包装。平壤牌香烟，则是中国提供烟丝及辅料，在朝鲜生产。一些貌似朝鲜国产的日式自行车，同样是中国提供零部件，在朝鲜组装。

由于渔船过于破旧且缺少柴油，而且缺乏电力加工冷藏、朝鲜守着世界罕见的8000多公里无污染海岸线，却无力捕捞海产品。一切由中国商人代劳：他们卖给朝鲜人商品，报酬是获得海产品捕捞权，但他们还需要投资购买柴油、发电机、冷库、渔船、运输车辆，甚至修路，海产品运回中国加工后，再卖给朝鲜人。

电力缺乏不但困扰着朝鲜工业生产，也令外来投资者望而却步。黄海南道某生产企业人士称，每天仅有4个小时的供电。一些中国投资者被迫购买发电设备带到朝鲜。亦有中国投资者考虑过从中国买电。但过细的电线、破旧的输电设备以及过高的损耗令买电变得不可能。

在“谷歌地球”的夜间照片上，除了平壤光亮夺目外，整个朝鲜半岛北部几乎一片漆黑。这与周围的日本、韩国、中国沿海地区的灯火通明形成鲜明对比。

即使在平壤，18个区中也只有中区供电充足。其他市区每晚都会停电，路上没有路灯，马路中间的交警配备了闪光的指挥棒。在平壤以外的朝鲜，夜晚唯一明亮的，是大楼正前方被射灯照亮的金日成巨幅画像。



平壤地铁刻意模仿莫斯科地铁的华丽 ，搭乘它的却是一张张质朴的脸。

英国《金融时报》引用鹦鹉螺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Nautilus Institute)所长彼得.海斯(Peter Hayes)的话称：“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垂死者的X光照片。它已时日无多了。”

鹦鹉螺研究所自1992年起开始参与朝鲜的能源计划。该机构数据显示，朝鲜的消费者能源需求从1990年的约1300PJ骤降至2005年的500PJ出头，这是朝鲜工业崩溃的充分反映。（PJ是一种能源消耗度量单位，相当于约3000万千瓦时。）

“北韩民主化网络”发行的消息刊物NKIn&Out2009年5月报道称，电力工业省的两名副科长因为咸镜北道金策市盛津钢铁厂电力供应中断事件而被公开枪决。

报道称：“金正日指示，因为平壤电力不足，要减少盛津钢铁厂的电力供应，优先保障平壤的电力供应。”“于是电力工业省的两位副科长停止了向盛津钢铁厂供应的电力，将电力转到了平壤方面。但正在运行

的高炉停机，铁水凝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两位副科长被逮捕，两天后公开枪决。

韩国银行（Bank of Korea）的数字称，朝鲜GDP在整个1990年代几乎都是负增长，直到1998年后才实现转机。但到2004-2007年间再次由正转负直到-2.3%。2008年有了起色，上升至3.7%。

事实上，朝鲜比韩国经济似乎更具先天优势。朝鲜半岛矿产资源大多集中在北方，据估算，朝鲜矿产价值是韩国的24倍。日本统治时期留下的工业基础也集中在北方，韩国在1970年代才追上朝鲜。

作为世界上最封闭而且形势严峻的经济体之一的朝鲜，30年来其发展远远落后于亚洲其他飞速发展的国家。美国环球透视公司(GI)预测，到2011年，朝鲜GDP约有每年2%的增长。但GI认为朝鲜人均实际GNP（根据实际购买力调整的国民生产总值）依然很低，与津巴布韦、乌兹别克斯坦、孟加拉国、苏丹在同一水平线。

而韩国世宗研究院专家崔尚勋（Choe Sang-Hun）2003年的一篇文章称，朝鲜经济早就被判死刑了，如果没有国际援助及武器和毒品贸易，无法维持。

行将枯竭的外汇血管

在1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经互会”的时代，朝鲜在这个大家庭温暖的怀抱里曾有过滋润的生活，外汇不是问题。

韩国远东问题研究所《北韩全书》的数据称，1945-1970年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援助高达20.43亿美元。

1970年代中期，国际有色金属价格暴跌，而朝鲜需要的机械设备、原油等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其中石油价格飙升130%。朝鲜无法按时偿还西方国家债务，直接影响了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

1981年，前苏联再次向朝鲜提供6.8亿卢布经济援助。1984年金日成的苏东之行，又获得30亿卢布的援助。

这一时期，中国继续向朝鲜提供优惠价格的石油，每年价值4000万美元的焦炭、100吨以上的食品，援建大量工厂。1984年又提供了4亿美元的贷款。

与此同时，朝鲜也在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坚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整个1980年代，朝鲜对外援助约2.6亿美元，援助对象以非洲和中

东为主。

苏联解体对朝鲜打击巨大。俄罗斯取消了各种对朝经济援助，停止了约60%的进出口贸易。1991年朝俄贸易锐减80%以上。此后经互会国家间贸易结算由记账改为美元现汇结算，朝鲜外汇状况更加恶化。

基于脆弱的生产能力，朝鲜可供出口的物品实在不多。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字，1990年以来朝鲜始终存在贸易逆差。2000年后，朝鲜虽然努力出售丰富的矿产资源，但逆差也在不断扩大。

1994年以来，朝鲜进入最困难的苦难行军时期。1995-2003年间，国际社会对朝援助共达29.96亿美元，以粮食和化肥为主。

1990年代以来的经济危机令朝鲜国内财源已近枯竭，只能考虑筹措海外资金输血。但冷战后，朝鲜因外汇储备严重不足被国际金融机构宣布为“丧失外债偿还能力的国家”，失去了获得国际民间商业贷款的能力。“9.11”之后，美国将朝鲜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切断了朝鲜从国际金融机构获取资金的可能性。

雪上加霜的是，2006年7月导弹危机以及10月份的核试验，令其面临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以及国际社会经济、金融双重制裁。2009年5月，朝鲜第二次核试验，立遭更严厉制裁。

在对华贸易中，外汇的严重缺乏使朝鲜不得不选择用人民币代替美元结算。朝鲜从中国进口改用人民币结算将节省有限的外汇，但这令朝鲜无法从对华贸易中获得人民币以外的外汇。2006年丹东地区对朝贸易进口16726万美元，但美元的结算货款只有50万元。

巨额贸易逆差，加上核实验、领导人及高级将领的奢侈生活都需要巨额外汇，朝鲜不得不开发各种创造性的手法来获取外汇。

为此，朝鲜国有贸易企业体系诞生了“外汇创收基地”。基地包括一系列劳动单位，这些单位均被授权生产提供出口的产品来获得外汇。主要劳动力来自军队的新兵，以及只得到微薄工资的当地居民。

美国国会研究处报告认为，朝鲜获得外汇的合法手段包括借款、外国投资、外国援助、海外朝鲜人汇款、向海外提供服务、出口武器等。而非法手段包括假冒硬通货、军事设备或技术的非法出售、销售违禁药品、与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法交易等。

对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的武器出口被认为是朝鲜的主要外汇来源。据美国统计，朝鲜1986-1990年间武器销售收入5亿美元，

占其出口的80%。联合国1718和1874号决议禁止从朝鲜进口所有武器，武器创汇渠道被堵死。

美国反毒品局称，1976年以来在超过20个国家缴获至少50起与朝鲜有关的毒品案件。朝鲜每年生产40吨鸦片，为世界第三大鸦片出口国，第六大海洛因出口国。

美国国会研究处认为，朝鲜每年毒品收入约7100万美元。此外，韩国估计朝鲜每年假币收入为1500万美元，假烟和假药收入为8000万到1亿6千万美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报告认为，上述数字可能被高估。

朝鲜这些传统独门创汇拳头产品，因市场封锁而失效，外汇收入急剧减少。据国际危机集团（ISG）的一份材料，朝鲜走私品例如假冒香烟和毒品等，近来大多已从日本消失，因为中国籍有组织犯罪团体取代了朝鲜同类组织。

国际清算银行获得的报告显示，朝鲜近年曾获得部分商业贷款，但这些奇怪的贷款显然很难继续：韩联社5月4日消息称，朝鲜对外贸易银行因未如期履约偿还台湾银行贷款，被告到纽约法院。

来自西方的官方发展援助和民间对朝鲜的捐助，曾是朝鲜的重要外汇来源，2004年曾达15.296亿美元，但此后就开始一路下滑，2006年最低时只有5960万美元。

朝鲜另一个重要外汇收入来源是金刚山，朝鲜政府每年的金刚山租金收入7200万美元，游客每年还能贡献900万-1亿4000万美元。

此外，朝鲜派往俄罗斯、利比亚、沙特、保加利亚、捷克等国的劳工会带回每年约500万美元汇款。

今天，朝鲜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大宗外汇收入来源几乎全部被切断。

最后一位献血人

尽管想尽办法获取外汇，但与每年都会产生的高达十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相比，上述进账显然还不够。幸好朝鲜还有朝总联、韩国、中国三棵摇钱树。

在日本的朝鲜裔，一直对朝鲜经济贡献巨大。1991年之前朝鲜合营企业中的75%由朝总联投资。

1990年代，每年从日本汇往朝鲜的金额被估计为1600万-4100万美元之间，最多不超过1亿美元。但来自朝总联的大规模汇款在下降。

因为日本经济衰退、2002年金正日承认绑架日本人等不利因素，再加上不断长期对朝鲜汇款输血，朝总联自身经济实力迅速衰落。朝总联下属企业、银行机构纷纷破产。

2007年，东京地方法院判决称，朝总联要偿还破产的信用组合发行的债券共计627亿日元。法院还批准扣押朝总联位于东京市中心的中央本部建筑物。朝总联的地方本部和教育设施等9处设施已经被扣押。

2009年4月导弹危机之后，日本加强了对朝鲜汇款的限制，将对朝鲜汇款的义务报告额度从“超过3000万日元”收缩到“超过1000万日元”，并考虑全面禁止汇款和完全封锁出口。日本这根输血管萎缩了。

来自韩国的人道援助和各种援助，从1991年到2008年间共计33.37亿美元。但在李明博当选韩国总统后，2008年的援助只有1.5936亿美元。在此前的16年间，韩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和其他援助，也高达6.9557亿美元。但同样，2008年比2007年下降接近一半。

由于金大中、卢武铉两届实行对朝巨额援助的“阳光政策”，并未对韩朝关系产生积极作用，朝鲜也未因此停止核步伐，在韩国争议不断的“阳光政策”被终止。

2008年7月11日，一名在金刚山旅游的韩国女游客被朝鲜士兵射杀。韩国暂时扣留了援朝物资，暂停一切人道主义援助磋商，并中断金刚山旅游。这意外地令朝鲜失掉了一大块外汇收入。

2009年底，韩国统一部向国会提交的对朝援助计划高达6160亿韩元（折合5.31亿美元），但至今悬而未决的天安号沉没事件令朝鲜能从韩国拿到的好处变得可疑。

不仅如此，就连联合国的对朝援助项目也出现了“捐助疲惫”。 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宣布，如果无法很快获得更多的捐助，该机构将不得不在今年7月份停止向严重饥荒的朝鲜提供救援物资。

联合国官员担心捐助者已被朝鲜激怒。去年3月，朝鲜将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驱逐出境。朝鲜政府严格限制救援人员的活动范围，要求他们在探访农村前提前报告，并禁止救援队使用自己的讲韩语者。

环顾地球，唯一能给朝鲜稳定援助的，只剩下中国。

吉林省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龙山认为，朝鲜每年物资缺口的一半左右都是中国解决的。除粮食外，朝鲜要求的中国援助从日用消费品到工业原料，无所不包。

陈龙山认为，“朝鲜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而没有崩溃，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不仅没有参加制裁和封锁，而且还对朝鲜提供了大量援助，中国的粮食援助和石油供给可以说已经成了朝鲜的生命补给线”。

中国对朝援助始终是机密。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对中国对朝援助研究后得出结论：从1990年到2005年间，每年估计在1亿美元和2.5亿美元之间。报告指出，中国的对朝官方支持比较稳定，并且是以市场为基础的。

另一被公认的事实是，中国从未间断的援助似乎并未增加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杨文昌等官员和学者2009年曾公开承认这一点。

相关对朝工作人士介绍，中国对朝援助项目都是由商业公司招标后，完全商业运作，并且被计算进入当年的中朝贸易额。这些援助均有明确预算，但考虑到朝鲜建设中极大的贪污、浪费，实际有时远大于公布的预算。

援助数额有限，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就尤显重要。2010年3月，朝鲜欲将鸭绿江上毗邻丹东的黄金坪岛、威化岛租给中国的招商风波成为朝鲜急切的招商愿望的代表事件。

丹东对朝投资研究人士称。朝鲜拿出两个岛招商，确有其事。但朝方无法提供配套政策保证，基础设施为零，令招商成为空谈。

该人士综合来自朝方外贸人士以及朝鲜高层的信息分析，朝鲜如今的招商动作，与其下一个政治动作密切相关：2012年，是金日成诞辰100周年，以及朝鲜要建成强盛社会主义大国的年份。这都要有大批庞大的献礼工程，其中包括平壤10万套住宅工程。这些都需要庞大的资金。

在此背景下，5月3日，金正日万众瞩目地秘密出访北京。尽管金正日访华或有其他议题，但能否再次获得老大哥的“输血”，成为外界猜测的重点。而金正日对大连（罗津港中方投资商创立集团所在地）、天津两大港口城市的访问，亦被普遍解读为想要引进中国资本开放罗津港。

DailyNK引用匿名对朝专家的分析称，“朝鲜想通过朝鲜大丰国际投

资集团引进中国巨大的资本，实际上并不可能……此前金正日访华时一般能得到2亿美元左右的现金援助，从惯例上判断，此次也会得到同一水平的援助。”

《朝鲜日报》仔细分析了大陆中央电视台有关金正日访华的约10分钟电视画面后认为，金正日似乎并不高兴。

金正日在访问中表示：“欢迎中国企业对北韩进行投资。”温家宝说，“中朝经贸合作具有很大潜力，双方要加快边境基础设施建设，探讨新的合作领域和合作方式”。《朝鲜日报》将其解读为，“北韩希望中国能马上对其进行投资，而中方却暗示首先要建设基础设施，并改善制度”。

温家宝的另一句话则被解读为进一步挑战了中国此前对朝鲜百般呵护的底线：“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朝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愿意向朝方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的经验。”《朝鲜日报》引用北京外交界的分析称，这“事实上就是劝北韩进行改革开放”。



在南浦公路边小憩的朝鲜人。平静生活的景象，却并不能给人安定感。

双面朝鲜

□ 记者 周宇 特约撰稿员 洪志先（发自平壤）

处决朝鲜前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部长朴南基的枪声，最终成为朝鲜巨大的地下交易市场重新启动的发令枪。

4月下旬的一天，那个令外界震惊的处决刚过去一个月，朝鲜新义州车站上挤满矮小的朝鲜老妇人。上千人人头攒动，无一例外都像虾米一样弯腰90度，背负着比她们自身大得多的货物包裹，拼命挤上开往平壤的列车。

朝鲜官方为限制市场自由贸易，一度规定50岁以下妇女禁止在一般市场做买卖，至今一个家庭中往往还是由老妇人承担起做生意的重任。中朝边境城市的中国人对这些从丹东或新义州打货的老妇人早已司空见惯，不过，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难免震惊，这些身高不足1.5米、面色如土、身形干瘪、头发蓬散的老妇们，令年老的游客们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中国。

穿行在背着枪的人民军士兵中间，瘦小的背包妇女和她们身上沉重的货物，呈现出朝鲜地下经济的真实一面：在严密控制的计划体制下，市场经济暗潮已然势不可遏。



生活在标语口号下的普通朝鲜民众，极少人知道外面世界的样子。

跟她们同在一列火车上的高等车厢里的北朝鲜女生小樱（化名），则跟这些妇女形成鲜明对比。尚在大学就读的她身着进口名牌风衣和漆皮高跟鞋，面色红润美艳，妆容精致，配戴着苹果绿时装表和妈妈送的20岁生日礼物—一条珀金项链。可以随意用手机打电话的她，并不清楚自己每个月用掉多少话费，因为“爸爸到时间会去充值”。包括轻松的笑容在内，她身上的一切在这个国家都尚属稀缺品。而这只是因为小樱的父亲是时常南下广州、深圳、上海等地的朝鲜商社的领导。

这看似截然不同的两张面孔，交织着朝鲜社会复杂的矛盾和博弈。一方面，它们泄露着这个国家公开的秘密—由上至下，朝鲜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在尽力向境外寻找生机，不是以“地下经济”的方式艰难求生，便是以公开贸易的方式发财致富；另一方面，前者作为市场交易链条最活跃的终端，或许是这个国家最期待市场化改革的人，而后者则作为垄断了“合法交易”资格并得以牟取暴利的既得利益者，却绝不欢迎以市场开放为方向的对内改革。

两张面孔告诉人们：朝鲜其实离市场经济很近，也许近得让人难以想象；但离市场化改革很远，远得同样让人难以想象。

小贩撑起的地下经济

庞大的地下市场，在朝鲜之所以成为可能，以粮食为首的全面短缺是最根本的原因。在曾前往朝鲜考察的俄罗斯教授安德列·兰考夫的描述

中，上世纪90年代朝鲜出现大饥荒，同时失去了前苏联的援助，粮食和物品的国家供应系统崩溃，包括企事业单位普通员工在内的绝大多数朝鲜民众不得不想办法自己寻找食物和收入的来源，集贸市场从此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

如果饥饿是地下市场形成的内因，中国的存在无疑是这个市场迅速发展的重要外因。在朝鲜国内生产多半停滞的情况下，来自中国境内的产品支撑起了近乎整个市场的物资供应。

延边大学朝鲜经济研究专家林今淑教授表示，早在1980年代初，中国兴起经商热时，延边等地居民已开始以探亲形式到朝鲜边境地区从事经商活动，198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当年参与经商的人，今天许多已是朝鲜边境经商的大户。1990年代也是在这些人的带动下，大部分边境地区居民加入经商，在国家停止粮食供给的情况下靠经商收入购买到高价粮食渡过了难关。

随着包括平壤地区在内国家配给的全面紧缺，私下交易的市场很快扩散到从城市到乡村的各个角落。朝鲜西北角的新义州和东北角的罗先特区，作为两个可以获得境外物资的地区，成为最重要的发货地点。新义州到平壤的铁路和公路，以及从罗先特区开往内地的铁路和公路运输，成为朝鲜大地上的两条粗壮的商品输血管道：一些商品在这两个特区交易后，被内地贩子运往朝鲜内地；一些商品只是路过那里，直接由中国运往内地。

商品到了内地之后，又会在地上或地下市场形成完整的完全自发的销售网络。

城里人、农村人都参与交易。在农村的市场上，城里人会带去工业品出售，并买到大米背回平壤；农民们种地、养鸡、养羊、养狗，都用来出售，或者换回他们需要的产品。另一些小贩将货物装在包里，通过贿赂得到行走各地的通行证，以流动的方式偷偷卖货。

在韩国全南大学课题组对滞留在中国的200名朝鲜非法越境者的访谈中，对于“在您的经济生活中，常规部分（工资和配给）和非常规部分（包括副业收入、经商收入、自留地收入）的收入相比，哪部分更大”这一问题，62.5%的人回答“非正规部分的收入要大得多”，17%的人回答“非正规部分的收入要略微多一些”。两者相加，79.5%的人认为非正规收入多于正规收入。



物资匮乏依然困扰朝鲜。在并不丰富的朝鲜商店，许多展示的商品是不出售的。

韩国脱北者团体“好朋友”于2000年对滞留在中国的朝鲜非法越境者的访谈中，对于“目前在朝鲜靠经商来维持生计的家庭大概占几成”这一问题，48.9%的人认为占90%以上，79.5%的人认为占80%以上。

朝鲜人早已无法脱离对市场的依赖，尽管政府对自由市场在不同时期设置了不同障碍，不过人们早已学会用各种方法规避限制，继续做他们的生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08年的报告称，2007年秋，朝鲜政府曾强行规定50岁以下妇女禁止在一般市场交易，但人们让更老的家人去市场做买卖；2008年1月中旬，限制一般市场供应商品的种类，但受管制的市场很快被小巷市场弥补，商人们不断更换交易场所，并贿赂巡查的官员。

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金强一教授认为，朝鲜人现在的市场意识比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成熟得多，因为每个人都不得不靠市场存活。“1982年，中国的报纸还在鼓励人们从商，人们却都不愿意抛弃铁饭碗。但现在的朝鲜不是，每个朝鲜人离开市场都不行。国家机关想用钱也得到市场换。市场经济到了这个份上，想回头已经不可能了。”

小贩们除了撑起了朝鲜的地下贸易，更撑起了朝鲜的地下金融市场。



在鸭绿江边赶羊的朝鲜人民军战士。

由于朝鲜官方金融系统运转能力和信誉度的全面崩溃，朝鲜实际上一直处于金融系统缺位的边缘。

对外，朝鲜的银行存在资本金严重不足，管理水平、运作方式、技术和效率与国际惯例差距太大，不讲信誉、挪用客户资金等各种问题令本地银行根本无法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境外银行也不可能与朝鲜银行建立通汇结算关系。中朝贸易甚至必须通过第三国或地区的银行间接转汇结算，以至结算成本过高。因此人民币等各种外币的地下黑市以及现金交易、私自携带大笔现金出入朝鲜成为必然。

对内，据金强一分析，1990年代中期，朝鲜的金融、法律体系基本上都被破坏了。他观察到，在货币改革之前，旧朝鲜币通常破烂不堪，说明这些货币并未经过银行存取款以及银行对旧币的回收、替换过程。“也就是说，朝鲜的银行除了印钞票，已经失去了其他功能。社会上流动的钱，到不了银行，银行对这些钱毫无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支行《朝鲜经济研究》课题组2008年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中朝贸易中滞留在朝鲜的每年数十亿元人民币，绝大部分都被私藏民间而非存入银行。朝鲜人民币黑市由小到大逐步发展，并形成一定规模，由朝方少数具有雄厚经济实力、在当地颇有社会背景的家族成员操控。其内部职责划分清楚，分工明确。主要集中在市区农贸市场内，交易对象以中朝两方边贸企业为主，主要从事朝元与人民币的现

钞兑换。黑市汇率一般由几个比较大的“黄牛”引导形成。

在“黄牛”的操控下，2002年“7.1改革”之前，黑市汇率是以美元为基础的浮动汇率；此后实行以粮食价格为基础的调整汇率；2003年4月之后，朝鲜大量发行货币，出现通货膨胀并逐渐恶化。人民币汇率呈现急遽攀升态势。

在大陆，不论是官方还是黑市，朝元都是不可兑换货币。朝鲜如果没有人民币黑市，以朝币为基础的贸易根本无法进行。

神秘的朝鲜商社

全民经商之外，全官经商更是朝鲜市场经济蔚为奇观的一面。

朝鲜没有私营企业，所有国营公司都称为商社。商社系统扮演了国家分配系统中最核心的角色，简单说，就是为朝鲜劳动党和金正日政权的正常运行提供了最关键的财政保障。该系统中的大小商社，在中国的大多数省级城市中都很活跃。中朝贸易关系也由此成为平壤的独特生命线。

1992年朝鲜实行“新贸易体制”之后，全国贸易公司由1980年代的39家猛增到100多家。除对外经济委员会外，政务院的其他部门，劳动党中央所属的组织指导部、国际部、干部部等部门以及社会安全部、保健部、人民武力部等纷纷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商社，从事贸易活动。各个道、市行政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也有自己经营的贸易商社。除了党政系统之外，朝鲜人民军也拥有商社。

1998年，朝鲜整顿对外经济体制。废除对外经济委员会，成立贸易省。各道、直辖市只允许保留其管辖的1家贸易公司，其余由贸易省统一管理。朝鲜民族经济合作联合会负责与韩国的贸易、投资合作事项。

当年9月，朝鲜对出口贸易不佳的商社进行整顿，将中央各部管辖的商社以党的部门—大成、人民军部门—美丰、内阁部门—平壤商社等为对象进行整合。朝鲜贸易商社数量由300多家锐减至120多家。

据丹东某对朝贸易研究机构截至2010年4月底获得的朝鲜方面提供的对华贸易企业目录，朝鲜贸易商社超过284家，其中包括朝鲜烽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公司以及烽火总公司，朝鲜大圣第一到第八贸易公司，大成贸易公司，柳京贸易公司，三池渊贸易公司，白马贸易公司等。此外，被统计的能够与中国发生贸易或投资关系的还有合营公司22家、专业公司19家、出口专厂11家。

理论上，朝鲜是一个没有税收的国家，企业和个人收入上缴国家，国家再通过调配和发放工资完成对单位和个人的分配。而这些贸易商社则是通过完成上缴利润指标，以及在重要纪念日“向党中央和领袖献礼”（通常以货物形式）来“上贡”。

现在，朝鲜有很多商社在中国驻站，每个小公司要面对每年5000美元的利润上缴额度。许多商社根本完成不了指标，如果负责人在三年任期内不能完成指标，就得回朝鲜。所以许多人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包括骗中国企业的钱以及给上级领导送钱。

留在中国的好处太多了。部门也许不挣钱，但个人能挣钱。尤其是掌握实权的人物，一旦成为中国商人争相“打点”的对象，甚至可能一夜暴富。而对中国商人而言，和这些商社打交道是最没有信用保障的，因为一切商业往来都要通过关系达成。往往在重金“打点”了关系人物之后，一场生意还是变成骗局，血本无归。

金字塔社会

根据丹东对朝贸易人士观察，朝方商社领导在中国购物颇为奢侈。进一次服装专卖店动辄消费上万元。家中各种家电、电脑一应俱全。他们的孩子如同小樱一样，营养、消费水平甚至超过中国都市里的一般青少年。

在美国国会研究处的报告里，这部分人作为“从事贸易者”，已成为朝鲜社会的新贵，位列朝鲜社会五个阶层里的第二阶层。

该份报告认为，在市场经济浸润多年、市场交易最终取代国家配给成为朝鲜民众主要的生活来源之后，朝鲜的社会阶层开始随之发生改变。

位列第一阶层的是握有军政大权的朝鲜劳动党的干部。他们在一切方面享有特权，强烈维护现有经济体制。他们的收入来自外国投资者和国内非法交易。

第二阶层为从事贸易者。他们能接触到国际资本，尤其是有机会获得硬通货外汇。

第三阶层是有组织的暴徒，他们通过控制不受政府保护的市场从中非法获取保护费。

第四阶层是依赖政府配给的“城里人”。

第五阶层是农民，他们通过出售自己耕种的农产品谋生。

尽管声称追求绝对公平的共产主义，但朝鲜的阶层分化早已不是秘密。不过，不同于配给决定一切的时代—离权力中心越近的人是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越优越的人，现在，有机会离市场越近的人，也越有可能获得暴利和地位。

第一阶层是所谓的“传统贵族”，而这一阶层一旦与市场发生关系，所获最多。曾有新义州安全官员向中方人员打听，能否将其手中50万美元兑换成人民币。而大肆收受进出口商贿赂、瓜分原本应该缴纳的每笔动辄数万元关税的各海关关长，则被认为“一年几百万元人民币根本不是问题”。部分朝鲜官员甚至在中国拥有房产。

平壤外国语大学、平壤旅游学校等有机会和外界打交道的高等院校，成为特权阶层子女聚集的高校。2008年，一名平壤外大的女生曾被中国商人看见戴着价值约10万元人民币的欧米茄手表，并配有手机。一名平壤外大的男生则向熟悉的中方人士抱怨，由于学生中谁家有钱并不是秘密，因此他经常成为教师勒索的对象，每到期末就会有老师找到他说手头紧，要“借”20美元，代价是让他通过考试，“20美元一门课已经成了我们学校的口号”。

持有外币者，可以去平壤的外汇商店和饭店消费。两个人吃上一大桌酒菜，或是购买进口的烟酒以及其他市场看不到的家用电器：装饰性的吊灯，1800到3920朝元；电饭锅，9000朝元；电熨斗，3800朝元（依朝鲜官方汇率，1元人民币约兑14朝元）。

财富已无需隐瞒的另一标志是手机的大量出现。不能与境外通话的朝鲜手机，越来越多地在朝鲜外事人员、干部甚至大学生中使用。

在这里，中国产的中兴手机售价约为160欧元或是120美金不等—手机不得以朝币购买，购买者要么得有外币，要么有足够多的朝币去换成外币。

唯一负责在朝鲜开展3G手机服务的埃及Orascom电信公司于2010年2月3日表示，在朝开展手机业务第一年，3G手机用户已经超过了10万人。该公司预计今后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数百万。从中可以一窥朝鲜“新贵”们的增长速度。

而在第二阶层“从事贸易者”里面，最独特的一道风景，是在朝鲜的华侨。从1980年代起，因为华侨通常在中国境内有亲戚，通晓汉语、朝鲜语，对朝鲜社会、关系了如指掌，能够在两国间自由流动，占尽中朝

贸易先机，遂成为最早与中国发生贸易并悄悄积累财富的人群之一。时至今日，众多华侨已经成为各大边境口岸富甲一方的巨贾。

华侨之外，朝鲜市场上还存在实力较弱的朝鲜人“中间阶层”：在市场中从事中介及批发零售贸易的商人。他们通过贿赂最底层的官员、对市场的了解以及宝贵经验来赚钱。DailyNK2007年文章分析，当时卖面条的个体商人月收入能有5~6万元朝币，与之相对比的是，当时的工人月工资约2000 ~ 3000元朝币。

这部分“中间阶层”已能够吃上米饭和蔬菜，尽管这与成功的华侨尚有天壤之别，但这一收入比在食物方面朝不保夕的朝鲜下层居民已经高出很多。文章认为，如果体制转变，他们也可能有机会发展成为企业家或是巨商。

他们和华侨一起，成为左右市场的两大力量。

被抵触的改革

尽管障碍重重，商品经济在朝鲜毕竟已成无法逆转的潮流。再加上朝鲜半年以来岛屿招租、计划设立新的特区、加大招商力度等各种经济动作不断，令外界再次猜测朝鲜是否会真的改革开放。

2300万人口的巨大市场，并且什么都缺，这样的国家如果能够改革开放，无异于满地都是商机。

然而，中国人民银行《朝鲜经济问题研究》课题组认为，朝鲜改革走向不甚明朗：金正日不太可能像中国领导人否定“文革”那样否定金日成时期确定的政策，“因为那样就等于否定了他自己”。众所周知，朝鲜在公开场合一直坚持其计划经济是正确的，也从未有过“改革开放”的表述。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朝鲜官方宣传中是一直作为修正主义的样本被批判的。

此外，否定以往的经济发展路线和经济体制，也会遭到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先军政治”路线所形成的两大庞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改革很难进行下去。

课题组同时认为，长期的思想禁锢和个人迷信已使朝鲜国民养成了“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突然转向也会使他们感到六神无主、无所适从，容易造成社会的混乱，危机政权稳定。

“先军政治”依然是朝鲜政治的基石。这一理论具体体现为：突出军队地位，视军队为国事中的国事；重大经济项目经常直接由军队来承

担，经常展开“进攻战”、“歼灭战”；保障军费投入，军费高达GNP的25%～30%；倡导军人经商，提高社会凝聚力等。

如此高比例的军费预算支出严重挤占了民需产业所需的资源，不可避免与经济的健康发展形成直接冲突。朝鲜的军需产业由“第二经济委员会”领导实施，根本不接受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和管理，自行决定生产、消费、需求、供给等全部经济计划，权力日趋膨胀。金日成曾说：“第二经济委员会就是第二政务院。”

吉林省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陈龙山认为，在上述体制之下，第二经济部门的势力已越来越大，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相应也越来越大。

另一既得利益群体是朝鲜的重工业部门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产业和企业。朝鲜一直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重工业部门既得利益集团。陈龙山表示，1994～1996年朝鲜曾经提出“农业、轻工业、贸易三大第一主义”的政策，试图改变资源配置的优先顺序，但因为阻力重重而不了了之。

围绕在金正日身边的核心阶层，同样是改革的阻力。DailyNK2007年发文表示，惧怕体制崩溃的核心阶层是支撑朝鲜体制的根干。正是因为有这些支柱，朝鲜才得以挺过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孤立和压迫，即使是在导致数百万人饿死的“苦难行军”中也得以坚守住体制。这一阶层，是遍布劳动党和行政机关、国家安全保卫部、人民保安省、检查、审判等政权机关的在职人员。

金正日政权在对亲信们加强教育、严格“净化”的同时也赋予他们特权，以此来巩固他们的忠心，比如向中央党组织部、宣传部干部们按级别分别配发带有金正日生日号牌“2.16”的从高到低的系列奔驰轿车，为中央党干部和军队要人在平壤市内建最高档次武装警卫配备的公寓区，并由国家供给全套日本产家电、家具、沙发和食品，以及西方文化产品。

这一阶层的显著特点是，他们羡慕韩国的经济发展，却对改革开放抱有反感。由于党务人员不具备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存的技能和心理准备，他们更安分于现在的体制，以维持他们地位和名誉。

传统的既得利益群体之外，新兴的对外贸易商社体系也成长为新的既得利益群体。

美国和平研究所对朝鲜叛逃者的访谈，提供了他们为朝鲜国家贸易

公司（商社）进行商业活动的详细信息。访谈显示，商社在扩张过程中一度失控，因为商社的领导者利用商社的商业渠道和合作资源变得非常强大。于是朝鲜领导人强行减少商社数量，整肃了大部分商社的头目。现有体制保障了目前的商社领导者们垄断了几乎全部的对外贸易，避免了来自民间可能的竞争者，最方便地将巨额财富纳入私囊，仅靠伪造或是通过运作获得进出口许可证他们都能获取现金。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不需要改革。

而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后代们，同样对现有体制万分拥护。许多朝鲜商社领导的孩子曾经在丹东读书。与这一群体密切交往的中国商人发现，尽管见证了中朝两国社会的巨大差异和中国改革开放显而易见的成功，许多孩子却保持了对领袖极高的忠诚度。这些不用服兵役即可上大学的青少年，一边抱怨平壤生活上没有丹东方便，一边认为现有体制是最好的，声称“享受领袖的关怀”，并对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离婚、外遇等问题嗤之以鼻。

在多重掌握着资源和权力的既得利益的交织之下，朝鲜改革开放显得虚无缥缈。

中央党校朝鲜问题专家张琏瑰认为，朝鲜从未进行改革开放，也不可能进行改革开放。朝鲜近期所有的经济动作，仅仅是为了捞取外汇，为朝鲜高层的奢侈品消费和发展导弹、核武器服务。朝鲜的众多商社，也是在军队以及为金正日个人服务的39号室的严密控制之下。

对于此前朝鲜曾经来中国考察改革开放，张琏瑰认为，其动机并不明朗—搜集情报并作为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回国宣传，也是考察的用途之一。

张琏瑰认为，金正日最关心的并非发展经济，而是政权稳定。而只有老百姓依赖国家配给吃饭，政权才是最稳定的。2009年底的货币改革，就是有力的证明：当有人通过市场养活了自己、摆脱了控制的时候，国家会试图取消市场，让人们重新回到体制的怀抱中来。

□ 编辑 黄章晋 涂艳 □ 美编 虎妹



朝鲜大型团体操表演《阿里郎》。

朝鲜“陷阱”

2010年6月4日，3名中国居民遭朝鲜军人枪击致死，虽说此不幸事件只是近些年来中朝边境诸多相似惨剧中的一桩。今天，在中国漫长的国境线上，像朝鲜这样在边境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邻国，并不多见，而它真实地反映了中朝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

在抗美援朝60周年的今天，或许需要国人直面与朝鲜的真实关系，重新思考与朝鲜的相处之道。

60年前，中国倾全国之力抗美援朝，救朝鲜于命悬一线，此后，一直慷慨无私地援助朝鲜。在今天，朝鲜政权的存续和国民的生存，几乎完全仰赖中国的援助。

然而，无论是中国在战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还是此后对朝鲜的巨大援助，朝鲜官方从来都未予以应有的公正评价。中国改革开放迄今，朝鲜一边接受中国援助，一边公开将中国作为反面宣传教材。它不但在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上，投下关键性的反对票，更是在近年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不断大打中国牌，一次次在世界舆论面前将中国政府置于“被告知”或“被同谋”的角色。

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无论像中国这样对待朝鲜，还是像朝鲜这样对待中国的例子，恐怕都难找到第二个。

中国坚持恪守《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同盟义务，坚持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坚持维护有着深厚历史渊源邻邦的友谊和道义。而

朝鲜面对中国的援助、支持和妥协忍让不但不以为然，还以此为资本，不断挑起事端，更使中国承担了巨大的国际道德压力，中国的国家形象屡屡因朝鲜而受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一再作出努力，试图以改革开放的成功范例，劝导朝鲜领导人以民生为念，逐步改革开放，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朝鲜走上改革开放良性循环的道路似已无可能。

回顾当代中国外交史，中国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最后无不以惨痛的失败而告终，而中朝之间，自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后，便无意识形态同路人之谊。

为中国自身安危计，为中国与朝鲜半岛人民世代友好计，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道义责任计，国人当勇于直面真实的中朝关系，做好应对各种可能的心理准备。应当相信中国政府善于总结历史和现实，以面向未来的态度，处理和把握好中朝关系。

我们的相关报道，力图呈现的是真实的朝鲜和真实的中朝关系，或许能为关心朝鲜问题的读者提供参考。



2006年朝鲜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后，中朝关系即进入不稳定阶段。图为持枪的朝鲜人民军士兵。

朝军枪击中国边民事件

2010年6月4日凌晨，辽宁省丹东市居民在从事越境边贸活动时，遭朝鲜军方未经警告的射击，致3人死亡、1人受伤。

6月7日，韩国KBS电视台最先报道朝鲜枪杀中国人事件，并立即引发日韩几乎所有主要媒体的关注。

6月8日，中国外交部证实朝鲜士兵枪杀3名中国人的事件，并罕见地提出抗议。

“辽宁丹东四名居民，在本月4日凌晨，因涉嫌越境从事边境贸易活动，被北韩边防部队开枪射击，造成3死1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表示："事发后，中方高度重视，立即向朝方进行严正交涉。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和处理过程中，相信有关部门会适时发布有关情况。"

枪击事件并非历年来中朝边境间的第一次开火，更非第一起造成中方人员（含大陆军人）死亡的惨案，但却是大陆官方媒体首度置于显要位置的报道。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称："迄今为止，在两国边境地区发生各种民间死亡案件时，中国政府并没有公开证实，采取安静处理的方式。"

"枪击属于自行的行为"

事件的最初报道是由从朝鲜逃到韩国的"脱北者"（偷逃出朝鲜的逃亡者）团体——朝鲜知识分子联盟发布的，韩国《朝鲜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崔有植告诉本刊记者："因为事情发生在丹东，属于经贸交往比较热闹的地区，所以消息很容易传开。"

据其在丹东的朋友介绍，一般来说在中朝边境地区发生各种民间死亡案件时，中国政府从无公开证实，而是私下处理。据韩国KBS称，以丹东为据点的该走私团伙欲从朝鲜新义州走私铜。而自"天安舰事件"以来，朝鲜已经在中朝边境加强了警备。

就这次朝鲜枪杀中国人的动机来说，崔有植认为可能由于朝鲜边境刚刚换防一批边防军，新兵不够了解情况，"看到陌生人闯入，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背后也许有别的原因，但我觉得朝鲜边防部队此次行为或许跟朝鲜中央政府没有联系，属于自行的行为。"

枪击事件发生后，大陆《环球时报》给出的朝鲜方面对枪杀中国人事件的解释是，因为"天安舰事件"朝鲜方面提高戒备，当时中国边民讲朝鲜语，又身穿迷彩服，朝鲜士兵有可能以为是韩国间谍，所以就开了枪。

之后，中朝双方共同派出法医进行尸检，确定死因。朝鲜方面表示愿意慰问和抚恤死伤者家属，同时希望不要因为此事影响中朝关系。

中方提出交涉，要求朝方彻查事件，严惩肇事人员，并妥善处理善后。6月10日，朝边防部门表示，经初步调查此系一起偶发事件。朝方对事件造成中方人员死亡表示悲痛，对死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慰问，将严惩肇事者。朝边防部门将对事件做进一步调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对中方的表态，英国广播公司（BBC）称："中国公开批评其邻国

是极不寻常的。”美国《洛杉矶时报》引述朝鲜知识分子联盟主席Kim Heung Gwang的话说：“北京对朝鲜的公开抗议很罕见，通常都只是私下的道歉或赔款，而朝鲜一般也只对自己人开火。”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研究室主任晋林波认为：“秦刚的话表达了中方的重视，朝鲜也较快表态，中朝关系本质上不会受到多大影响。”崔有植则表示：“现在是敏感时期，中方做法跟过去不一样，显得更加透明和公开。”他也承认，中国在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的问题上非常谨慎，毕竟朝鲜出现任何动荡都会影响中国东北。“这个事情如果不是被韩国媒体炒出来，估计中方多半会压下去。”

枪击事件时有发生

事实上，关于枪击边民走私事件，在中俄边境、俄朝边境甚至许多国家之间的边境都曾发生过。

一位生活在中朝边境的中国边民曾对外界透露，在鸭绿江和入海口一带，利用渔船来走私物品（如铜和小鱿鱼）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打击走私而开枪的事情也不少见。“中朝在边境治安管理、打击犯罪上有协议，不光朝鲜会开枪缉私，中国边防部队也会开枪。一般发现可疑船只，巡逻人员都是先朝天鸣枪示警，命令其停船接受检查，如果嫌疑船不听，才会射击。”

2008年9月，韩国海岸警卫队的一名官员曾向外界透露说，据称一名中国渔民在捕鱼时朝鲜军舰向他的船开火，后被送进医院治疗。而朝鲜军舰开火的原因是这艘中国渔船在朝鲜西部沿岸海域非法捕鱼。但此事未经中朝双方证实。

2008年7月，朝韩边境发生过一起枪击事件。韩国一名赴朝鲜金刚山地区旅游的女游客，于11日清晨误入旅游区附近的朝方军事禁区，遭朝鲜士兵射杀。朝方通报情况说，该游客进入禁区后，朝方士兵向她发出警告，但游客却开始奔跑，朝鲜士兵多次警告不要乱跑未果后，开枪射击。

对“脱北者”，朝鲜方面的处置措施显然强硬果断得多。“从朝鲜逃到中国的士兵也会被射杀，这类擦枪走火的事情时有发生。但在朝韩军事分界线上满是铁丝网和地雷，因此，从朝鲜逃到韩国去的人都要经历多重生死考验。”中国朝鲜－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孙启林表示。

今年3月，据韩国《汉城日报》消息，韩国军方称，几名朝鲜士兵越过朝韩军事分界线，追逐一名叛逃的朝鲜士兵，但是在韩军鸣枪示警

后随即撤退。而当地媒体则报道称，这几名士兵也是试图叛逃到韩国，只是最终仅一人成功。此前曾有报道称，2002年、2008年的4月和10月，有个别朝鲜军人成功叛逃至韩国。

除去这些“走火”行为，中朝边防军也发生过误会和冲突。

尽管如此，在晋林波看来，朝鲜这次行为还是表达出一定的政治含义。因为中朝边境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一直都存在，朝鲜哨兵是否开枪肯定是受到内部行为准则制约，不会随便射杀，“而且他们应该知道是中国船只”。

恶化中朝关系

日本共同社驻京记者对本刊记者分析：“我们认为金正日来华并没有得到多少想要的东西，‘天安舰’问题又逐步升级，所以此次很有可能借机向中国施压。”

今年5月，金正日访华时就表示：“欢迎中国企业对朝鲜进行投资。”温家宝当时回应道：“中朝经贸合作具有很大潜力，双方要加快边境基础设施建设，探讨新的合作领域和合作方式。”换言之，朝鲜希望中国能马上对其进行投资，而中方却暗示对方首先要建设基础设施，并改善制度。共同社记者称，金正日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首脑会谈时，“表情似乎并不高兴”。

事实上，2006年朝鲜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中朝关系即进入不稳定阶段。朝鲜核试后，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使用了最激烈的“悍然”外交辞令。纵然事后中国政府依旧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经济封锁和制裁，但中朝关系一直停留在低谷位置。2009年6月朝鲜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更是直截了当地破坏了中国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期望。

但在许多专家眼中，中国一直以来的谨慎和隐忍，并没有让双边关系受到实质影响。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后，韩国媒体就表示，如果封锁中朝两国物资交流的核心地区丹东，朝鲜就会立刻面临石油和粮食缺乏的困境。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

尽管中朝关系尚不到交恶的局面，但朝鲜问题已经让中国的外交有些疲于奔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即撰文指出，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外交挑战。因为中朝关系属于传统友谊的关系，朝鲜问题往往涉及最高领导层，不管事情的大小，每当发生，高层领导必然卷入或被卷入。

晋林波则表示，如果中朝关系大框架有问题的话，以后再遇到类似问题只会越来越棘手，越来越没有效果。倘若还以1950年代的手法来处理21世纪的中朝关系，大家都会别扭。“中朝关系应该适应新的形势，两个国家的需求和国际环境都在变化，否则不仅保持不了传统友谊，可能连过去的感情都没了。”

□ 编辑　萧方 □ 美编　青年



横跨鸭绿江的这座铁桥不仅把丹东和新义州两个友好城市连接起来，而且它曾在1990年10月被赋予了更具象征性的名字：“中朝友谊桥”。而在它下游的断桥则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背叛的“血盟”

时逢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60年纪念的2010年，金正日访华刚刚获巨额援助，却出现以枪弹相向的开局。无人能预料中朝关系会发生何种变化，但中方长期宣传的“中朝之间是用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官样文章目前依然没有改变。

中朝之间关系，的确系鲜血和汗水铸就，继60年前中国志愿军为保卫朝鲜流下无尽鲜血后，几十年来朝鲜一直不断获得中国的巨额援助。今日，中国不但几乎从不参与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而且提供了几乎维持朝鲜国民生存的绝大部分商品。中国对朝鲜，被外间以“血盟”称之。

不过，中朝之间的“血盟”，更似单方面的“血盟”， 朝鲜对中国人一厢情愿的“友谊”并不买账。60年来，中朝之间龃龉、冲突不断，朝鲜不但刻意与中国拉开距离，在涉中国国家利益的关键时刻，朝鲜经常站在中国的对立面。6月4日朝鲜枪杀中国边民事件，只是血盟关系早已被背叛的一个缩影。

暗战国境线

中朝边境的景观也许只有那些敌对国家戒备森严的国境线可比，在

朝鲜一侧，密布着巡逻士兵和哨所，既防朝鲜人逃走，又防中国人进入。

中国漫长的国境线上，只有中朝一段，民间贸易是在荷枪实弹的警戒下冷冷清清进行。

此次中国边民遭枪杀原因的官方解释，是涉嫌从事非法走私贸易。但对当地人而言，鸭绿江上的中朝走私活动并非秘密，它甚至是维系朝鲜国民得以生存的重要输血来源之一。

据中国对朝商人介绍，许多贸易如果不走私，不贿赂朝鲜海关，实际上就无法进行。而按照朝方法令，针对朝鲜国营会社以外的任何民间贸易实际上是朝鲜禁止的。因此趁着月色在鸭绿江、图们江上的小船上，在朝鲜边防军的枪口下悄悄交易早已成了惯例。此次射杀悲剧，即是由此而来。

据韩联社报道称，此次遭枪击的中国边民，都是丹东相当有名的商人，他们最初是根据朝方生意伙伴的约定前往新义州的，孰料竟遭不幸。

韩国朝鲜日报网7日援引丹东一位朝鲜族居民的话称，此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枪击事件，但多在朝鲜向中国支付铁矿石或水产品等“赔偿”后就不了了之。

此前，韩联社于5月26日的报道称，朝鲜在朝中边境警备队部署迫击炮，并调来远程火箭炮旅团。韩联社引用消息人士的话称：“今年2月，朝鲜在平安北道、咸镜北道等朝中边境地区的边境警备队新编入和实战部署了使用82mm迫击炮的火力支援队。”

朝鲜边境警备队主要负责防止居民越境叛逃，管制非法出入境，之前只配备步枪等小型武器。该人士分析，“82mm迫击炮与60mm迫击炮不同，需要利用车辆进行运载。这次给每个小队配备四门迫击炮，意味着边境警备队具备了相当于步兵部队的火力”。

对中国来说，中朝边境，始终是不安全的区域。最大的麻烦之一，就是从1980年代延续至今的“脱北者”问题。《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从吉林延边财政、公安系统获得的文件显示，1983年至今，约有40万朝鲜“非法移民”进入中国。



平壤市中心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解说员正在介绍朝鲜战争中被缴获和摧毁的联合国军武器。所有的功劳，都被归功于朝鲜人民军。

2004年6月底，新华社发布消息，中朝军方在平壤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人民武装力量部边防合作协议》，约定“为统一全国陆地边界管理模式，理顺边防管理体制，中国政府于2003年9月上旬起将中朝边界防卫任务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上述协议的签署对于继续维护中朝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巩固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防卫任务由武警移交解放军，被认为是中方对“脱北者”等边境问题的高度警惕和对朝鲜的不信任。

关于朝鲜“脱北者”，在毗邻朝鲜的中国边境地区，民间广泛流传着有关朝鲜军人酷刑对待“脱北者”的详尽描述。

曾参与救助“脱北者”的中国朝鲜族人士介绍，为摆脱朝鲜绑架组的追捕，留居中国的朝鲜人相当部分已经南下，分散到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甚至广西贵州等地，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2005年初，《朝鲜日报》称“北韩保卫部的绑架间谍组在豆满江一带进行间谍活动，并自由往返于中国和北韩的边境”，并发表社论《中国应阻止北韩绑架工作组的野蛮恶行》。此前的2000年，帮助“脱北者”的韩国牧师金东植被从中国延边绑架到朝鲜，次年死在朝鲜。



平壤市中心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碑。这是中国入朝旅游团必去的景点之一。

为惩治协助朝鲜绑架“脱北者”的帮凶行为，一些曾涉嫌帮助朝鲜保卫部从中国绑架“脱北者”的中国朝鲜族人，在韩国被司法机关陆续拘捕。2009年8月被拘捕的崔某即涉嫌曾于1999年绑架“脱北者”林氏一家6口，在图们江附近将其送回朝鲜。韩国警察称，作为参与犯罪的奖励，崔某从朝方获得走私二手车、松茸等进出口交易权等便利。

与“脱北者”同时到来的，还有对边境地区治安的威胁。丹东官员介绍，1990年代，经常发生朝鲜人越境犯罪事件。延吉官员介绍，2001-2002年间，朝鲜人越境来抢劫杀人的事件时有发生，边境地区采取了联防制度等措施应对。许多饥饿的朝鲜人到延边各地包括延吉市区乞讨，也曾影响当地治安。

但近年来中朝民间贸易发达，各种生活必需品大量输入朝鲜之后，越境犯罪大幅度减少。

潜伏的犯罪

中朝民间贸易与正常国家间贸易迥然不同。

朝鲜贸易单位背景复杂，朝方贸易人员互相监视，谨言慎行，中国商人进入朝鲜被全天候监控，不得携带任何通讯工具。这使得对朝贸易

始终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一些对朝贸易资深人士不得不保持刻意低调，拒绝任何媒体的接触。

朝鲜同时利用中国的边境城市，悄悄获取联合国禁止的违禁物品。

2009年7月，大连海关宣布，该关日前在公路口岸截获夹藏在水果箱里的走私稀有金属钒65公斤，价值17万元人民币。钒是一种可提高钢硬度、防止其生锈的金属。钒钢合金可用于制造导弹外壳、高速工具、超导磁体、飞机发动机等部件。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挫败了试图偷运这种导弹零部件材料的企图”。

2003年，德国铝管出口未遂案曾轰动世界。这起案件导致一名不知情的德国商人入狱一年。2009年7月，负责这起采购的朝鲜重量级核采购员尹浩镇成为第一个被联合国列入制裁名单的个人。德国海关刑侦局确信这些长2.4米、重100公斤的高强度铝管将被用于制造核武所需的高浓缩铀的离心分离器。尹浩镇在北京招待德国商人夫妇，为获取对方的信任，他称自己只是中间人，更将交货地点选在朝鲜之外的中国东北边境某市。

但对中国边境地区更大的威胁，是被认为来自朝鲜官方的毒品和假币。美国反毒品局称，朝鲜每年生产40吨鸦片，是世界第三大鸦片出口国和第六大海洛因出口国。

韩联社6月8日的报道称，从事贸易工作的一名朝鲜新义州市官员，因涉嫌毒品交易于3月初在中国丹东被逮捕。

与朝鲜接壤的丹东、延吉官员都抱怨，当地是本省毒品重灾区。数年来，延边警方不断破获贩毒大案，显示朝鲜毒品正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2009年初，吉林公安边防总队延边支队1个月内竟破获三起贩毒案件，缴获冰毒2200余克。延边媒体人士介绍，历年来众多贩毒案件中的毒品全部来自朝鲜，但在报道中，朝鲜通常以“边境某国”代替。

不过，在2005年，北京朝阳区检察院毒品专案组向媒体公开点名批评朝鲜：“2005年上半年，朝阳区检察院受理的毒品案件中有3起案件涉嫌跨国贩毒(海洛因和冰毒)，这些案件涉毒数量巨大，每宗交易数量都在1000克以上。犯罪分子通过与朝鲜境内的贩毒分子相勾结，将从朝鲜地下加工厂生产的毒品，通过吉林省延吉市偷运至境内然后再运往全国各地贩卖。”

与毒品交易交织在一起的，则是假币。延边警方多次在毒品案件中发现假币，包括假人民币和假美元。2009年，大陆多地警方网站发出预

警《警惕“朝鲜版”假币流入市场》，因为互联网上大量出现兜售朝鲜版假币的信息。这些信息称，朝鲜版假人民币仿真度远远超过台湾版假人民币。

被误解的“血盟关系”

2010年5月6日，针对金正日访华，韩国《朝鲜日报》称中朝在“对外炫耀‘血盟’”。庆熙大学教授Ju Jae-u表示：“去年中国邀请金正日访问的契机是北中建交60周年，因此金正日此次将进一步强调两国的‘血盟关系’。”

中朝“血盟”关系，也一直是众多大陆民众甚至学者对朝观点的基石。但同期的韩国权威网络新闻报DAILY NK却认为，中朝关系已不是“血盟关系”，中朝关系中只有政治、外交领域的“利害关系”变得重要。因此，韩国媒体报道金正日访中时“确认两国的血盟”云云，实为“误报”。

DAILY NK认为，“6·25”战争（朝鲜战争）时期结下的两国的“血盟关系”，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出现脱离。加之，以1992年韩中建交为决定性契机，中朝两国已过了再也回不来的桥。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时，金正日也没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叛逃到韩国的前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黄长烨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两国事实上清算了‘思想上的同志关系’。”即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契机，中朝在思想上已不是同志关系，而是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领域追求国家利益的利益相关者关系(stake holder)。

实际上，《朝鲜日报》对中朝“血盟”关系的看法亦前后矛盾。2006年，该报发表文章《中北50年血盟不复存在 两国情报战溅起血腥》称，奠定“50年血盟”基础的中国和北韩军部之间正弥漫着异常气流。双方之间出现了绑架并收买情报要员之类的情报战，而且，北韩核试验以后，随时可能把枪口对准中国的危机感和愤怒感在中国军内不断高涨。

2005年10月16日凌晨，五名朝鲜军人侵入延边广坪的一幢别墅，绑架中国情报人员。为保护情报人员，解放军第16集团军炮兵旅72分队的19岁湖南籍军人李亮被朝鲜军人开枪打死。

香港的中国人权信息中心称，2005年中国边防部队与朝鲜军人共发生三次枪战，另两次枪战发生在该炮兵旅的74及81分队。

香港中国人权民主运动情报中心表示：“该事件发生后，中国当局

立即召见了北韩驻北京大使，提出了抗议，并要求对方交出杀害李亮的军人，但遭到了拒绝。因为这件事，两国军队的关系正急剧恶化。”

该事件发生后，中国军部内呼吁应该修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声音逐渐高涨。《亚洲周刊》当年报道说：“多年前，延吉市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被北韩情报当局以30万美元收买，一举瓦解了中国在北韩内部的情报网。之后，中国的对北情报网实际上处于空白状态。”但这些传闻与报道并未得到中国官方的确认。

事实上，所谓的中朝友谊以及朝鲜对志愿军的感谢，作为中国人的一厢情愿，多年来被无限地夸大了。即使是在朝鲜战争期间，中朝关系也并非全是蜜月。

1955年苏联副外长И·库尔久科夫在关于朝鲜和中朝关系的报告中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朝鲜领导同志极少去那里，仅仅进行过几次会晤。”

报告认为，朝鲜同志轻视了中国援助朝鲜的作用和意义，其中包括，低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对抗美国武装干涉者斗争中的作用。在这样一件事中看得更为清楚：在平壤对武装干涉者战争展览馆，12个战功展览厅只给了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其余的展览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的作战行动无关。

库尔久科夫认为，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鲜大使后，一直到1955年1月份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十分显眼的是，周恩来同志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

1951年，金日成开始清洗与中共有历史渊源的干部，清洗到1958年全部结束，朴一禹、金武亭、金科奉等大批与毛泽东、林彪等人关系密切的“延安派”将领被处决，有幸逃亡中国者，金日成不但向中国索要，甚至继续追杀。直到入朝作战志愿军于1958年之前全部撤退回国，追杀才停止。

数十万中国军人长眠朝鲜半岛的惨痛代价，并未换得朝鲜的亲华态度，反而留下两国间激烈的矛盾。在朝鲜政局越来越不稳定的今日，危险逐步加剧。

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和国际研究与战略中心2008年联手发布的报告显示，解放军已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应对半岛局势可能出现的恶化，并有入朝预案。

报告中表示，解放军的研究人员认为，一旦“情况紧急”，中国将首先谋求联合国的授权，以派遣部队进入朝鲜，控制朝鲜的核设施等目标，以防止人道主义灾难。“如果国际社会反应太慢的话”，即使联合国没有授权，解放军也会单方面采取行动。

美国进步中心资深研究员Nina Hachigian2005年文章则认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处于两难。一方面中国肯定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如果中国切断了朝鲜的粮食和燃料供应，朝鲜的经济将会崩溃，甚至会导致朝鲜政权的崩溃。这种结果也会对中国的政治稳定造成影响。“中国停止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将会造成数以百万计的朝鲜难民流离在880英里的中朝边境线上，甚至涌入中国国内。”

Nina Hachigian认为，允许难民大批入境，将会使本来就不甚景气的东北地区局面更加困难。

据相关资料分析，朝鲜数十年来，始终在进行去中国化进程。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更是一直作为“修正主义”的样板被朝鲜官方向民众宣传。与朝鲜一江之隔的东北村民，数十年来收听到的朝鲜广播都在批判中国。在平壤，一些没去过中国的大学生却知道中国有矿难、包“二奶”、婚外恋等不良现象，并相信这是中国走“修正主义”路线的恶果。

中朝“血盟”，显然是对朝鲜最大的误会。这种误会在国际上令中国陷入巨大的被动，时常受到指责。因为被指责向朝鲜遣返“脱北者”，中国驻欧美国家的大使馆多次遭遇人道组织游行示威和抗议。

中央党校朝鲜问题专家张琏瑰认为，过去数年间，朝鲜半岛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朝鲜进行两次核试验，宣布“永远退出六方会谈”和“不受六方会谈文件任何约束”，单方面宣布有中国参加签字的“停战协定”失效，朝鲜半岛进入战争状态，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出现重大对抗事件等，朝鲜事先都未同中国进行必要的沟通。

而在中朝间签署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仍未被宣布失效的情况下，中国负有条约义务。朝鲜在重大问题上不作沟通，令中国被置于被动和难堪境地，甚至使一些中国人产生被挟持的感觉。

此次金正日访华数天之后的5月12日，朝鲜中央通讯社宣布，朝鲜成功获得了核聚变技术。中国政府又一次在国际舆论面前丢脸，充当了又一次“被同谋”、“被告知”的角色，而朝方类似的“栽赃”伎俩再次重现。

朝鲜：不是秘密的投资陷阱

□ 记者 周宇

5月3日访华的金正日，在寻求中国官方援助时，也没有忘记中国的民间资本，再次挥动了招商引资的手帕。

今天，中国不但是朝鲜最大的商品来源国，也是最大的民间投资来源。不过，对那些与朝鲜有过经贸往来的中国商人来说，朝鲜的所谓投资机会，更多时候只是投资陷阱，中国民间资本在朝鲜遭遇的花样翻新的陷阱，早已令他们对招商引资的橄榄枝望而却步。

对中国来说，朝鲜的陷阱效应，远非源源不断的民间资本遭遇沉没。

朝鲜以其地理位置，也通常令人强调其对中国战略缓冲的地缘政治作用。但多年来，朝鲜的极端体制，更对中国东北地区形成了地理隔断效应。它以“贴身防护”的方式，死死扼住中国东北部地区向外发展的路径，将之与近在咫尺的日本、韩国两大经济体隔开。东北外向发展的青春，也被数十年地不断消耗。

朝鲜独特的行为方式，不但给中国毗邻地区制造了强烈的动荡不安，亦令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遭到朝鲜事实上的“外交绑架”，不断蒙受国际上巨大的道德压力和指控。

朝鲜，对中国来说，无论是所谓“兄弟”友谊还是战略意义，也许都只是个“陷阱”。

大力招商所为何来

在丹东市鸭绿江边遥遥可见的朝鲜黄金坪岛和威化岛，一片荒芜中仅见几栋低矮平房，与江这边丹东的高楼大厦对比鲜明。两个月前，这两个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荒岛被朝鲜作为对华招商的重头戏推出，一时曾引起中国商人的轰动性关注。

不过，与之接洽的中方公司却发现，朝鲜官方对配套政策、利润分配、边防出入境问题、旅游问题等必备的基本要件，根本未曾考虑周详。他们只想着签约引资。

几轮谈判下来，中方公司纷纷认为条件不成熟而放弃，最后终于有一家中方企业与朝鲜签约，但今天岛上依然人烟荒芜。

出租开发黄金坪岛和威化岛，是朝鲜近年来对中国招商项目中最大的一个。大批朝鲜商社常年驻扎丹东等地，负责招商。而在中国对朝投资网站上，贴满了各种朝鲜矿石以及落后的工厂的照片，煤炭、有色金属、服装、钢铁等各种招商项目随处可见。这被认为是朝鲜开始改革开放、投资形势一片大好的迹象。

最近的招商动作集中在建材领域和轻工业。朝方曾一次性拿出超过50个招商项目，到丹东的各家中方公司招商。

丹东资深对朝投资人士分析，朝鲜加大招商力度主要是为了筹措资金，更加直接的背景或许是为2012年做准备。朝鲜提出2012年金日成诞辰100周年之际建设成强盛大国，“缺钱”。

“并不是说这一年就要强盛起来。国家有这么一个规划，就是在金日成100周年纪念日，要搞一些重要项目对领袖献礼，包括在平壤修建10万套住宅和新南青年化工企业、电厂建设等一系列项目。”据韩国媒体以及该人士的说法，朝鲜也有打算再拿出几个地区，成立经济特区，但这些依然是为了筹措资金，与改革开放无关。

但朝鲜上述筹措资金的临时性动作在中国并未获得追捧。“朝鲜现在单方面推进是没用的。你拿出的条件让中国人不能盈利，谁去？为什么要拿钱给你？”

不是秘密的投资陷阱

对珲春、丹东等地的中国客商来说，朝鲜作为投资陷阱并不是秘密。欺诈无处不在，手段不断翻新，投资者随时有可能血本无归。本地早期对朝投资企业遭遇的毁灭性打击，不但令丹东等地的商人几乎从不在朝鲜投资，也令朝鲜至今看不到来自中国民间的上规模成功投资项目。

中国人民银行丹东市中心支行高级经济师常万年2008年文章称，1990年至今，丹东对朝投资履行正常核准手续的仅有10家，总投资约合4081.2万美元，中方主要以现有技术、设备、原辅材料等实物投资，现金投资很少。而上述投资情况“不十分理想，前期投资的项目由于种种原因，基本处于半停半开的状态。所谓好一点的项目都是近几年开展的项目”。

据延边大学教授、朝鲜经济专家林今淑《中朝边境贸易的现状及其对边境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一文披露，1990年代上半期，中国从事边境贸易的大部分公司由于朝方不守信用，无法偿还银行借款而倒闭。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朝鲜经济问题研究》课题组称，据统计，朝鲜商社拖欠丹东贸易货款超过2000万美元。为避免损失，丹东出口商发货之前甚至要求朝鲜进口商提供在丹东商业银行的存款证明或现钞，确认有支付能力后再发货，同时收取货款。



朝鲜先锋市街景。

丹东某个与朝方合资生产润滑油的企业，中方出资人作为合资企业的董事长，从1997年投资至今，一直居住在朝鲜。企业一直运营良好，滚动发展总投资已达120万美元。但从2006年起，朝方突然不准董事长进入工厂。起初还对其支付生活费，现在连生活费也停了。

参与诈骗中国企业的，除了朝鲜方面，还有与之配合的丹东等边境城市的对朝贸易中介机构。资深丹东对朝贸易人士介绍，这样的公司在丹东多如牛毛。曾有北京经营蜂蜜的企业向他咨询，有丹东公司声称能将他的蜂蜜卖到朝鲜，不知真实性如何？该人士愤怒地告诉他：“朝鲜人连饭都没吃饱，怎么可能会有钱买你的蜂蜜？”

据业内人士介绍，中介公司一般首先会安排投资方去朝鲜考察，但要投资方支付所有的考察费用，其中包含给朝方人士送礼甚至支付朝方来中国考察的费用。等资金或设备到了朝鲜，投资方就成了对方的鱼肉：如果朝方停止给投资者发放入朝邀请函，不论你在朝鲜有多大的投资，也无法再入朝鲜。投资便成了朝方的囊中之物。

一位在朝鲜投资失败的匿名客商称，他曾在平壤火车站看到许多接人的中国投资者。“好多都说上当了，几乎没有一个不骂的。”


朝鲜罗津海边乡村的水井。


朝鲜罗津红旗纪念碑。

“防不胜防，朝鲜合作方整体都在想着算计你，”该人士称，“因为把你骗到了，他就能给上面交‘忠诚金’，就能升官发财了。然后等下一拨中国人再来投资。”

不过课题组认为，在中国投资人付出昂贵代价之后，近年的投资项目运营状况有明显好转，较为成功的例子包括合资从事滩涂养殖捕捞的朝鲜高丽松永合营会社、从事矿山开采的朝鲜矿选合作会社以及朝鲜胜利圣龙合作会社。

但在中国商人提高警惕之后，朝鲜近年来拖欠货款的方式也在不断翻新。

林今淑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列举了新的诈骗方式：先交预付款诱使发货，等中方发货后拖欠货款；以政府的名义提供付款担保，再拖欠；设法扣留中国运到朝鲜的货物后拖欠；通过频繁调整贸易政策的方式拖欠；频繁调换贸易会社负责人或相关部门负责人，而新上任的负责人又不对之前发生的事件负责，令中方无处追款……此外，一些中国企业以

设备、零件和各种原材料向朝鲜投资，按合同规定，朝鲜只能将生产的产品出口给中方投资企业，但朝方时常背着中国偷偷将该产品出售给其他公司。



鸭绿江上用于中朝贸易的船只，往返于丹东与新义州之间。

被封闭的出海口

与投资矿产相比，对于中国而言，最诱人的显然是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

1858年到1860年，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先后签订，中国失去了黑龙江口至图们江口约100万平方公里的沿海土地，以及对日本海的出海口。

珲春防川，站在高处，天气晴好时可望见图们江口以及仅15公里之外的日本海。入海口上，横跨着朝俄铁路大桥。

被朝俄两国占据的这15公里，断绝了急于振兴的东北北部地区通往日本、韩国的海路。能够获得俄朝两国的支持，令中国货物顺利通过日本海运抵日韩两国或更远的地方，显然是东北三省梦寐以求的愿望。

但60年的“中朝友谊”以及朝鲜最后“输血者”的身份，都未能给中国带来任何帮助。在与朝鲜交涉、谈判耗费了几十年后，中国依然被死死封锁。

理论上，东北通往日本海有三种选择：通过中朝交界的图们江口，前驱15公里，进入日本海；租用俄罗斯的港口；租用朝鲜的罗津港。

1886年签订的《中俄珲春东界约》，明文规定插有中国国旗的船只，可以经由图们江驶入日本海，俄国“不可阻拦”。中国对日本海出海权由此并未完全断绝。

此后，前苏联和解体后的俄罗斯均对此约定予以确认或不否定。中国一直就此展开努力，但来自朝鲜的阻力越来越大，令中国由此出海的可能性逐步丧失。

1991年6月3日，大陆第二次图们江入海科学考察，又一次象征性地行使了中断52年之久的图们江出海权。俄罗斯对此仍无异议。但朝鲜态度模糊起来。

珲春边境官员对大陆媒体称：“（朝鲜）说那条约是你们和俄国签的，要想通航，咱们得商量。那行啊，就坐下来商量呗，可他们说没时间，不跟你商量。”据官员们介绍，朝鲜不仅不愿意坐下来谈，还在图们江里钉了很多木桩，下了很多石头。

1992年中韩建交，中朝边境气氛开始紧张。此后，一切通过图们江口的航行、考察和出海活动全部沉寂。

失去了图们江口，东北地区只能“借港出海”。通往日本海可以利用的港口仅有俄罗斯扎鲁比诺港、波谢特港或是朝鲜的罗津港、先锋港两种选择。上述港口离中国国境线公路运距最远的63公里，最近的仅38公里。但这两个选择对中国都“不舒服”。

根据珲春口岸办2007年文章介绍，扎鲁比诺港有3个泊位，年吞吐量120万吨，目前年实际吞吐量为30～40万吨；波谢特港有3个泊位，年吞吐量为150万吨。

通过上述俄国港口，中国的设备、木片等货物以及集装箱可达韩国束草、日本秋田等地。但由于铁路口岸通而不畅，两国轨距不同需要换装，提高了成本；利用公路口岸走俄港口时，由于俄方金雕公司采取各种借口提高运价，企业难以承受。上述航线时断时续。

朝鲜先锋港为油港，可停靠20～25万吨的油船，年吞吐量在200～300万吨原油。自1970～1980年代以来，先锋港曾最多一年运送200万吨原油，这几年该港基本未用，只运过一次香港的20万吨原油以及两次美国援朝的20万吨重油。

失去出海口，其他港口困难重重之后，同样破旧不堪的朝鲜罗津港反而成为希望的寄托，不断在大陆引发关注。

朝鲜罗津港有13个泊位，但仅有1～3号码头在使用，年吞吐能力400万吨左右的港口，实际年吞吐量仅50～60万吨。

19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获取这个破旧港口的租用权，但屡次失败。

1995年10月，延边现通集团开辟了“延边-罗津-釜山”航线，这是大陆企业利用罗津港的开始。但恶劣的交通成为致命的问题，该公司信誉遭受极大损害。10余年后，交通状况仍未改善。而罗津港设备陈旧以及对车辆的时间管制，经常导致中方无法及时向贸易伙伴交货。

目前，大陆东北地区货物从陆路到大连经渤海、黄海再转于日本海，到达日本新泻的航期约4～12天不等。而从罗津港到新泻的航线距离仅500多海里，10多个小时即可到达。即使是经韩国束草中转再到新泻，航行时间也仅需1天半，航行成本大幅降低。

东北的物资运往南方沿海城市，若通过罗津港运输到同一目的地，能比通过铁路运输节约一半运费，比通过大连港或丹东港运输节省三分之一的运费。罗津港还是通往日本、美国西海岸的最佳通道。

以前东北农产品要先用火车运到大连港或青岛港，再运往日本，造成产品价格过高，缺乏市场竞争力，而通过罗津港运费可减少三分之一。

2010年3月，延边州州长李龙熙透露，一家民营企业（母公司为大连创力集团）已在2008年取得罗津港1号码头10年租用权，延边希望借助这条航线，打通通往日本海的国际通道。这一消息再次引发日韩媒体关注和大陆媒体兴奋。但此后，大陆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记者获准去罗津港实地采访，“才发现，仅凭1号码头的租用就说中国开通了日本海通道实在是言过其实，而且，即使是这一码头的租用，也充满了变数。”

根据记者的实地采访，罗津港现在的3个码头中，1号码头最小，3号码头最大，水深都只有9米左右。整个港口非常冷清。

朝方介绍，租用1号码头的大连创力集团并未与罗津港或罗先市地方政府签合同，而是与一家朝鲜军方公司进行合作。1号码头原先是化肥码头。中国公司做了些改造后，用来将吉林、黑龙江等省的煤运到中国南方。与走大连港相比，能节省1000多公里的铁路运输费用。

文章称，这个码头毕竟太小，且不说作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对日通道，即使单运延边的货物恐怕都不够。文章认为，租码头并不是好办

法，只有将罗津港变成开放式的国际大港，才能真正带动图们江地区的开发。

也就是说，数十年来被寄予厚望的神秘的罗津港，对于中国来说，从一开始就只是个无法实现的出海梦。在朝鲜现有体制下，东北地区只能毫无希望地被封锁在朝鲜半岛之内。

地缘政治陷阱

北京为东北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规划，并投入重金，希望占全国人口8.3%的东北地区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发动机。

2003年中国开始实施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尽管多年苦心经营之下，东北经济发展加快，但与东南沿海相比，依然差距甚远。

事实上，东北所在的图们江流域发展曾经面临多次机会。此前的199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图们江地区国际开发计划。中、俄、朝3国曾经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国际资本，形成了图们江地区开发的第一次热潮。

中国是整个计划中最热心的国家。1992年至1993年间，超过3000家公司在珲春注册，形成建设热潮。但俄罗斯的冷漠、朝鲜的继续封闭，令前来珲春投资的资金迅速撤离，留下的是还没完工的建筑、桥梁和道路。

2005年，拥有大量出海口的辽宁省则提出“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建设，并在连接各沿海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上投入重金。

在没有出海口的吉林，珲春于2008年提出中俄“路、港、关”项目和中朝“路、港、区”项目建设，试图建立中俄、中朝两个自由贸易区。上述设想被纳入国务院《关于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实施意见》。

2009年8月30日，国务院批准了《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意见》要求东北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并提到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和长吉图地区开发开放。

但通道的尽头依然是封闭的朝鲜。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金强一认为，如果朝鲜不打通，长吉图规划的前景值得怀疑。朝鲜的封闭带来的东北开放度不够的问题，也是图们江开发近20年没有明显进展的重要原因。

以2005年为例，没有出海口的黑龙江和吉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分别约为14.04%和14.60%，拥有出海口的辽宁省则为41.42%，而全国平均水平则是64.10%。东北三省经济发展明显陷入了内循环状态，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陷入边缘化的境地。

金强一认为，对东北地区影响最大的是朝鲜半岛局势，令东北地区得不到与日本和韩国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国家的合作发展机会。而朝鲜的未开发状态，事实上把辽宁省的一部分和吉林省的绝大部分边界地带变成了所谓的“死边界”。

边境地区的官员显然希望朝鲜能够尽快开发，令死角变活。匿名延边经贸官员称，他曾和朝鲜方面人士交谈，但对方只是说，朝鲜的事情不能急，要慢慢来。

一个普遍的看法是，朝鲜半岛对中国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保持朝鲜现状似乎能为中国提供某种缓冲或是保护。但金强一驳斥称，政治价值越强调，对中国越不利：“如果说朝鲜是缓冲地带的话，那么就是说韩国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这个缓冲地带是干什么的？”另一方面，朝鲜半岛的分裂和敌对状态是美国驻军韩国的主要理由。结束这一局面，就等于打掉了美国的战略依托，令其失去继续在东北亚军事存在的理由。

金强一建议用地缘经济的概念来弱化地缘政治的概念。“如果朝鲜半岛处于冲突状态下的地缘政治意义弱化或者消失，那么我国将得到不可估量的经济利益，而在目前朝鲜半岛的对峙状态中，我们无论怎样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皆可视为获得了几句有限的发言权，这与我们在朝鲜半岛稳定状态下所能得到的利益形成不对称的巨大反差。”

讽刺的是，美国人似乎比中国人更清楚这一点。美国《大西洋月刊》2007年3月刊载的从美国角度分析朝鲜崩溃后的局势的文章《对朝鲜局势的分析和预测》详细地论述了这一点。作者认为，日本的战略地位会因为北朝鲜的崩溃而大幅度削弱，中国却为此成为最大赢家。“后金家族政权时代的朝鲜半岛可能多多少少处于首尔的控制之下，而中国是韩国现在最大的贸易伙伴，沿着海岸开车，我在韩国港口看到的都是中国的轮船。”

无尽的道德陷阱

朝鲜多年一贯非理性的国家行为，不但使其自身在国际上日益孤立，亦让中国因之蒙羞。

2002年前后，因朝鲜饥荒，大批“脱北者”涌入中国，中国为履行中朝之间的国际义务，一度将“脱北者”直接移送朝鲜边防部队遣返，这些人在朝鲜的悲惨遭遇，使中国一时陷入巨大的人道压力之中。

而“脱北者”在中国强闯外交机构的行为，经境外媒体的镜头公开，也置中国于极为不利的道德困境。

2002年5月8日，5名朝鲜人闯进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但被武警带走。日方指责中方无理进入。事件经过通过视频和照片在世界各大媒体反复出现，不但上升为中日外交纠纷，也给中国国际形象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2002年6月13日，2名朝鲜人闯入韩国驻华使馆领事部，其中一人未遂，被中国警方带走。韩国外交人员与中国警方对峙5个小时，抗议中方人员“无理进入”。

2002年8月26日，7名朝鲜人在中国外交部门外示威，要求给予难民资格时，被守卫拘捕，并被送上两部警车载走。韩国一家电视台拍得的录影片段显示，守卫与这批朝鲜人发生纠缠，其中一名女子曾展示一幅横额，上写“无自由等于死亡”的字样，而另一名男子亦展示了一幅写上“给我自由”的横额。

这段视频成为世界各国描述“邪恶朝鲜”时，几乎必用的经典片花，中国无疑成为被侧目的朝鲜的陪绑者。

“天安舰事件”后，英国TalkTone互联网调查机构针对中国网民的调查显示，对“如果朝韩发生战争，美国支持韩国参战，你觉得中国应该参与么？”这个问题，认为不应该参与战争的为73%，尤其特别的是，在支持哪一方这个选项上，韩国以15%的支持率超过了朝鲜的12%。

而在朝鲜枪杀3名中国公民事件曝光之后，大陆互联网上出现一篇《吁请政府修正对朝政策的公民建议书》，呼吁中国政府调整对朝政策，废除《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结束中朝军事同盟关系、将对朝援助纳入联合国监督之下。信中还提醒：“今天中国对金正日的支持，只会给（未来）统一后的朝鲜留下这样的印象：朝鲜民族长期分离巨大的悲剧，尤其是朝鲜北方2300万人民这些年来的悲惨命运，最大的因素就是中国。”当然，互连网上的这个建议书只是一部分中国国民的立场和意见。



靠近中国丹东的新义州特区，成为朝鲜最主要的中国商品集散地之一。

中国在朝鲜的存在

这里有几乎只对中国开放的2300万人口的市场，这里有占整个朝鲜半岛绝大部分、价值6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看上去，朝鲜似乎将是中国独享的一块大蛋糕。目前，中国商品确实已垄断了朝鲜几乎全部消费品市场。

但中国到底在朝鲜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朝鲜是否真的具备巨大的“战略利益”，值得细细梳理。

“中国支配下的朝鲜经济”

2005年，韩国KBS电视台走访中朝边境，通过大量采访调查以及在朝鲜境内获取的偷拍镜头，制成了在韩日两国反响甚大的纪录片《中国支配下的朝鲜经济》。

片中朝鲜平安南道的南兴市场的偷拍显示，这里琳琅满目的基本生活日用品到水果、调味品、豆类等食品，统统产自中国，仿佛走进中国的市场。这对于被隔绝在朝鲜市场之外的日韩来说，别有一番滋味。

1997年，中朝贸易在朝鲜外贸中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10.6%提高到了30.1%，正式成为朝鲜的主要物资供应国。其中包括朝鲜所需一半

以上的粮食和原油。

中国海关总署的数字显示，2003年，中朝贸易总额10.23亿美元，同比增长38.5%。与此同时，朝韩、朝日贸易额分别下降了3.8%和4.8%。朝鲜对中国贸易依赖度逐步提高。

2005年出版的《朝鲜投资指南》一书认为，朝鲜处于全面短缺经济。日用品90%以上来自中国。

同时，人民币也成为朝鲜结算主导货币。据调查显示，2006年，丹东地区对朝贸易人民币结算占61.7%，其中对朝进口结算比例高达99.7%。

中国人民银行丹东市中心支行2006年调查显示，2006年经丹东贸易口岸贸易活动和非贸易活动流出的人民币现金共计20.68亿元，当年滞留在朝鲜境内的人民币为2.34亿元。分析显示，人民币流速加快，在朝鲜并无生息和投资用途。除少量流通周转外，大部分用于对华贸易进出口结算。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的赵明哲认为，朝鲜不导入市场经济，是担心会导致政治体制崩溃。既不威胁体制又能拯救朝鲜的生存之道只有依靠中国一途。

朝鲜对中国的高度依赖，让一些中国商人产生救世主般的感觉：“我们提供他们百分之百的商品。没有我们在山东、河北、浙江等地组织货源，朝鲜人什么都得不到。”

就连二手电脑以及在医院周边秘密出售的药品，也全部从中国进口。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似乎是一块独享的封闭市场。

但朝鲜在中国的外贸中则显得微不足道：2007年在中国进口国中列64位，低于秘鲁、匈牙利的排位；在中国出口国中列70位，甚至低于刚果、也门。

华侨—独特的纽带

朝鲜目前的开放模式被称为是“蚊帐式开放”：挂起蚊帐，让“空气”（　外国的资金、技术）透进来，却不让“蚊子”（外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思想、价值观、生活方式等）钻进来。

为隔绝“传染”，普通朝鲜人被禁止涉足中朝贸易。尽管有说法称，有些会社由朝鲜有实力的个人控制，但总体而言，普通朝鲜人只能在罗

津、新义州等地做二道贩子—这是他们在商业链条中能够达到的最高位置。



朝鲜官方时常发布金正日视察的照片。这些照片展示了朝鲜国内最优质的物资。

但有一种人则生活在朝鲜严密的管制之外—朝鲜官方似乎没有兴趣去管他们，他们得以在商业链条的所有环节发挥最重要的作用。这些人就是华侨。他们成为中国商品渗入朝鲜市场体系的特殊纽带。

中国商人与朝鲜商社之间互相监视的非正常人际关系，以及层出不穷的欺诈，令一些中国商人不愿与朝鲜人直接做生意。华侨成了最佳中介。

从1980年代起，因为在中国的亲戚关系，华侨就成为最早与中国发生贸易并悄悄积累财富的人群之一。

韩国DailyNK引用一名资产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的华侨的话称，有两次机会令华侨积累了巨额财富。第一次是1985年～1989年间的黄金走私；第二次是1995年～1999年间朝鲜大饥荒的时期。

直至今日，众多华侨已成为各大边境口岸富甲一方的巨贾。吉林集安（对应朝鲜满铺口岸）一名华侨1990年代初期就盖起4层洋楼，并且能令当地道路因为他的洋楼而绕道。罗津的华侨大户，流动资金高达数千万元。他们却羡慕新义州的华侨，认为那才叫“大手”。



朝鲜服装店里单调的色彩和款式与中国大陆1980年代相仿。

华侨通晓汉语、朝鲜语，能够在两国自由流动，同时在两个社会拥有良好的人脉关系，这令他们占尽中朝贸易先机。

一些华侨称，朝鲜或许从心里并未当他们是朝鲜人，这让他们在升学、就业时都有不便。但在华侨富裕之后，身边的朝鲜人也开始跟着沾光：除了平日对朝鲜人的馈赠、帮助，冬日里缺乏暖气的朝鲜人还会涌到华侨温暖的家里过夜。

2007年，DailyNK发表《华侨掌握朝鲜市场　对于金正日是福？是祸？》一文，生于新义州后进入韩国的作者称："朝鲜居民主张，如果没有华侨，市场将会麻痹。"

受访的新义州居民称，华侨是新义州的"第一大款"，他们贴着"福"字，装修豪华的瓦房令人羡慕。"现在在新义州市场上交易的生活必需品，90%左右都是中国产"，而其中的一半以上由华侨们掌握流通。

华侨同时将朝鲜产的海产品、农产品（山野菜、药材）、矿产等卖到中国。尤其是干蛤蚌肉，已经成为朝鲜居民们的重要生存手段。平安南北道沿海地区的居民们每年4月到9月间在沙洲捕捉蛤蚌。卖1公斤干蛤蚌肉可以买10公斤大米，以至于其他地区的居民都赶到此地捕捉蛤蚌。

文章认为，如果华侨们不购入生活必需品、不将朝鲜产品出口到中国，朝鲜市场上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将立即暴涨。华侨的商业活动与朝鲜居民的生活已息息相关。

这对于朝鲜政权未必是好事。华侨除了带来商品，还带来信息。由于边境华侨拥有能收到中国信号的电视、手机，“华侨成为朝鲜信息流通的排头兵”。

2004年4月22日，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火车站发生剧烈爆炸和火车相撞，超过1400人死伤。华侨被认为是爆炸消息的散布者。龙川与丹东直线距离仅10公里。巨大的爆炸两边都能听到，华侨与中国亲人确认平安的电话时，第一时间将爆炸的消息传递了出去。众多报道认为，这是此后金正日下令全面禁止朝鲜国内手机的重要原因。

但华侨正在逐渐流失。一些华侨“大手”富裕之后，逐渐将财富和家人转移到中国。甚至在延吉、图们、丹东等地落户，彻底成为中国人。

中国在朝鲜投资地图

除了对朝鲜市场的垄断，中国还是对朝鲜最大的投资国。在日、韩、欧美与朝鲜经济越来越冷的同时，中国却存在大量对朝投资的民间机构以及大批想去朝鲜投资的商人。

2005年2月在北京举办的“朝鲜投资环境说明会”上，朝方公布目前中国对朝投资企业有120多家。

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发布的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3～2007年中国对朝鲜直接投资流量（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分别是112、1413、650、1106、1840万美元。2003～2007年间各年末中国对朝鲜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分别为117、2174、3104、4555、6713万美元。

数字可见，中国对朝鲜投资一直在缓慢增长，但这一数字对于中国庞大的境外投资来说，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以2007年数字为例，仅占当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流量和总存量的0.074%和0.066%。

边境对朝商贸管理部门人士介绍，朝鲜的国情令上述数字仅能参考。一方面，大量民间小额对朝投资并未在政府部门申报，他们不被计算在上述数字之内，也不受中国政府保护；另一方面，早期民间对朝投资几乎全军覆没，亏损或是早已停止运行，但这些投资中履行了申报手续的部分，如果没有在国内注销，将被不断地累积统计。

大陆民间对朝小额投资，主要集中在水产养殖、服装加工、自行车组装、矿产资源、物流、宾馆、汽车修配、印刷厂等行业。这些投资往往数十万美元即可启动，主要集中在罗先开发区以及部分沿海地区。

国有企业或是国内大型企业对朝投资，则几乎全部集中在矿产领域。由于朝鲜境内糟糕的道路状况，这些矿产投资大多散建在中朝边境。

以吉林省为例，长白县对朝投资的32个项目中，全部是矿山；而延边对朝投资最大项目，是在朝鲜茂山铁矿投资1.3亿元人民币，每年从该矿进口铁矿粉约100万吨。此外，吉林省从朝鲜进口的矿产还包括钼矿砂等。

2005年10月，吉林通钢、延边天池钢铁集团和中钢共同投资70亿元人民币获得朝鲜最大铁矿茂山铁矿50年开采权，预计每年将获得1000万吨铁矿石供应。吉林长白招金矿业与山东招金集团共同投资朝鲜两江道惠山青年铜矿，预计投资2.2亿美元。五矿集团与朝鲜龙登煤矿设立合资企业开发煤矿协议也得到朝方批准。

2005年12月25日，中朝签订《中朝政府间关于海上共同开发石油的协定》，共同开发北朝鲜海（黄海）石油资源。但上述协定内容从未公开，以至于上述项目的具体位置，俄、韩等各国的猜测也各不相同。朝中社和朝鲜平壤电台分别引用唐家璇的话称，“中国和朝鲜有必要在能源领域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有关共同开发原油双边协议的签署证明了两国间关系的紧密和友好”。

中国对朝鲜的矿产投资引起了韩国、美国等国的注意。

美国国会研究处的报告重点提到了7个中国对朝鲜矿业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吉林通钢对朝投资，2007年10月唐山钢铁集团与朝鲜大丰投资集团合作中朝鲜建造年产150万吨钢的炼钢车间的投资意向，中国钢铁集团在朝鲜投资每年产出超过1万吨钼精矿的项目，吉林与惠山青年铜矿，MANP铅矿锌矿以及HOERYONG 金矿电力换矿产的项目，“中朝政府级海洋石油合作项目协定”等。

考虑到中朝双方对能源、矿产合作的刻意低调，以及对朝鲜投资的巨大风险，上述项目中的一些可能仅仅停留在签订意向书或是协议，是否真正执行，不得而知。

朝鲜曾提出“资源换振兴”措施。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朝鲜经济问题研究》课题组认为，这一措施是在朝鲜经济极度困难情况下的无奈之举，所以，朝鲜开放的矿山当中存在富矿少、矿脉分布不利于大规模集中开采的情况。此外，矿产开发投资上，朝鲜的潜规则是不允许“合营”方式，而是鼓励“合作”方式。合作实际上是一种短期借款方式，按照朝方的合作条件计算后，投资者回报不理想。

对朝矿产投资改变了中国从朝鲜进口货物的结构。2005年起，中国从朝鲜进口中海产品比重从原先的50%急速下降到2007年的5.14%，取而代之的是煤炭、铁矿石和钢铁。2007年，中国从朝鲜进口商品中煤炭（17007万美元）占29.15%，铁矿石（16534万美元）占28.3%，钢铁（4536.6万美元）占7.77%。

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中国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为38309万吨，平均每吨88.2美元。按照此平均价格计算，从朝鲜进口的铁矿石约占总进口量的0.49%。这样的份额，对中国庞大的铁矿石需求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暂被隔绝的竞争对手

朝鲜建国后，曾经长期是社会主义阵营援助的宠儿。其中来自苏联的援助最多，1945～1970年间累计达9.63亿美元。中国居第二，为6.14亿美元。

1970年代上半期，朝鲜曾经与西方国家建立密切的经济交往，引进外资高达12.42亿美元。但由于朝鲜经济过渡依赖的铜、铝等有色金属价格暴跌，以及无力消化先进技术和设备，朝鲜未能按时偿还西方债务。

1985年2月，朝鲜第一家合营企业乐园百货店在平壤开业，合作方为日本的朝总联（日本亲朝团体“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的简称）。

此后，欧洲国家和香港等地区都对朝鲜有零星投资。截至1991年，合营企业多达123家，其中正式开业的58家，75%是由朝总联投资，投资领域包括饭店、旅游、金融、商业以及轻工业部门。

但是随着朝核危机的一次次升级，以及朝鲜特工绑架日本人事件被公开等原因，西方世界和在日朝鲜人的投资基本断绝。目前实际在朝鲜大规模投资的，只剩下韩国和中国。

韩国对朝投资巨大，著名者一为朝韩金刚山旅游项目，一为开城工业园开发项目。

金刚山旅游项目曾为朝鲜重要外汇来源，但2008年7月，韩国女游客在金刚山景区遭朝鲜士兵射杀事件后，金刚山旅游项目中断。

韩国投资方现代峨山公司在10年时间里，为金刚山项目共投资1兆3400亿韩元，到2007年前一直亏损。金刚山观光旅游中断后，其1年间的损失额为2647亿9600万韩币。今年4月，朝方没收了韩方在金刚山的

各项资产。

开城工业区的情形与之相若。2009年下半年以及2010年初，朝鲜两次提出要将开城工业园朝鲜工人的工资上涨2倍甚至4倍。开城工业园区三个区共有韩国企业约177家，目前加入开城工业区企业协会的81个企业中，只有18个企业有收益。

除上述两大项目，韩国还在朝鲜其他地区有零星投资。比如韩国邪教组织“统一教”的统一集团分支企业首尔和平汽车，为朝鲜生产绝大多数“国产”汽车，包括和平鸽牌、布谷鸟牌、口哨牌、三千里牌等。由于能源不足，工厂启动率为10%左右，去年在朝鲜的销售量为600台。

除了韩国，朝鲜对其开放投资的友好国家还有俄罗斯、埃及、缅甸、伊朗等国。但这些友好国家往往自顾不暇，譬如俄罗斯，其轻工业品同样要从中国大规模进口，而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缓慢，资金缺乏，也令其不可能对朝大笔投资。

埃及Orascom集团成为屈指可数的在朝鲜经营成功的企业之一。Orascom集团和朝鲜政府分别出资75%和25%，合资成立高丽电信，垄断了朝鲜的手机业务。去年在朝鲜的月营业额达到2600万美元。该集团《2009年业绩报告》显示，第四季度有2.2万人加入高丽电信，截至去年年底朝鲜境内手机用户增加到了91704名。

Orascom集团还承接了平壤最大的烂尾楼—柳京大厦的建设工程，有望在2012年建成营业。

而中国，作为一个从不与朝鲜发生正面冲突，也不受其任何核试验、导弹试射等各种挑衅行为影响的邻国，在朝鲜的贸易和投资获得了最广泛的许可范围，并从未中断。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被严密地隔绝了。

以投资为例，中国可以在朝鲜几乎任何地方投资。而一些韩国企业为了获得在开城以外地区的投资机会，尤其是矿产投资，不得不先在中国与中方合作成立公司，打着中资公司的旗号进入朝鲜。

中国的“独享”地位令韩国开始警惕珍贵的“民族资源”将被中国夺走，媒体也报道“如此下去朝鲜会被中国吞没”。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崔盛根称：“中国为振兴地方经济，正打算将朝鲜作为（东北三省的）资源基地并入中国经济。”

永远做不大的蛋糕

不过，“独享”的地位给中国带来的利益非常有限。2005年的矿产、能源投资高潮之后，大陆对朝投资经历了一系列失败。

遍布朝鲜的矿山，就像是鲜美的蛋糕，想运回中国，却困难重重。

以与吉林省长白县一江之隔的惠山青年铜矿为例。该铜矿位于朝鲜两江道，拥有亚洲第一大型铜矿床，该矿铜矿石品位最高20%，平均达1.6%，初步探测，拥有铜金属储量150万吨，伴生金60吨，银1.6万吨，资源总值约1000亿元人民币。

2007年底，中国企业万向集团与朝鲜采掘工业省合资组建惠中矿业合营公司，共同开发惠山青年铜矿。仅仅两年后，万向集团的惠山铜矿合作开发被中断，中国公司被迫撤离。

据在该合资公司担任管理职务的人士称，公司投入资金已经达1.5亿人民币，按计划一个多月后就能正式生产，却碰到“像开城工业园区那样突然提出大幅提高工资和股份的要求，不得以放弃设备撤出朝鲜”。

2009年10月，惠山青年铜矿作为“150天战斗”成功典范在朝鲜被宣传，它显示了矿山的真正主人是金正日，而非那些倒霉的中国投资者。

类似的“不可能的投资”在其他矿产项目中同样发生：一名沈阳商人对朝鲜某矿投资了上千万元后，还未及采出矿石就被赶出朝鲜，该矿的下一个投资者同样来自中国大陆，同样未能开采出矿石，再下一个来自山东的投资者终于将少量矿石样本运回中国，当然，他也很快离开了。

匿名丹东对朝投资研究人士介绍，朝鲜对于矿业招商似乎带有矛盾心理，缺钱，却又舍不得矿产。该人士曾经操作多个对朝矿产投资项目，均因为各种原因而失败。其中一些是因为遭朝鲜军方阻拦。

矿产之外，中国在朝鲜投资的道路、桥梁、港口也是雷声响了多年，雨点从未落下。不但罗津港建设并未真正启动，流传许久的珲春—罗津港的公路建设依然停留在纸面上，就连东北与朝鲜的新鸭绿江大桥建设，或是图们江大桥加固工程，也是近年刚刚启动。

日韩所担心的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将朝鲜纳入东北市场的局面并未出现。就市场而言，由于朝鲜极权制度、先军政治以及官方对市场经济的敌视和高度防范并无改变的迹象，朝鲜国内2300万人口的大市场始终只能停留在最低水平。尽管由中国商人垄断，但这一蛋糕显然无法做大。

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称，2009年上半年，中国和朝鲜的双边贸易额

为11.2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7%，这是近几年来首次出现的减少现象。对朝贸易管理人士称，考虑到中国持续增长的通货膨胀，实际减少幅度肯定会大得多。丹东资深对朝贸易机构估计，当地对朝贸易量的减少远远不止3.7%，2009年以来，丹东每天对朝货车发货量甚至不到高峰期一家商贸公司的发货量。

“天安舰事件”的持续震荡，看上去将让朝鲜这块中国商人独享的小蛋糕，变得更为单薄。


기업창설승인서

$11,000,000

20년

우와 같이 기업창설을 승인함

2010年1月19日，朝鲜18年来首次批准在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设立南北合作企业。图为企业成立批准文件。

朝鲜投资指南

近年来，朝鲜一直摆出发展经济的姿态。新鸭绿江大桥的即将修建、5月初金正日访华，似乎都释放了有关投资朝鲜的利好消息。但对于投资者来说，比利好消息和姿态更重要的，是对朝鲜的管理机制、基础设施、金融状况、官僚运行规则、腐败程度以及投资风险的了解。

无规则的规则

1983年9月，朝鲜颁布《合营法》。此后，一些西方国家和朝总联开始对朝鲜投资。1991年，朝鲜成立第一个经济特区罗津特区。2002年，朝鲜通过《新义州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成立了新义州特区。此后朝鲜陆续制定涉外经济法规至少38种，包括《外商投资法》、《合作法》，并成立多个机构予以管理。

朝鲜中央级对外经济机构是朝鲜对外经济委员会。1990年成立直属内阁的非政府性质机构“对外经济合作促进委员会”，负责外国投资者的各种资讯，并将问题反馈给内阁。

1996年成立的国际产业开发股份总会是朝鲜第一家股份公司，主要使命是解决朝鲜燃油问题，负责修建罗津港3号码头、改扩建金策、元山、端川等港口，综合开发新义州码头等。

此外，2004年成立朝鲜商业会议所，负责研究和了解市场经济的相

关政策、国际海事、仲裁、金融等方面的规则。

但各种法规、政策和管理机构都不是重点，甚至地方政府也与投资者关系不大。在朝鲜投资的华商，也极少有人能弄清楚朝鲜的上述法规以及不断变动的政策。许多中国投资者并不知道上述管理机构的存在，他们只需要和合作的朝方会社打交道就行，会社可以用自己的背景来负责所有事务。

投资本身不需要任何部门批准，只需要和会社意向一致即可。经营中所需要的进出口配额，也由会社负责。

大陆边境地区对朝经贸官员称，朝鲜尽管有经济管理部门，但基本上不起作用。他们一年会来中国一两次，但很少和对等的大陆经贸部门联系，而是由认识的中国企业负责接待，并带走大量礼品。

法律也是如此，在朝鲜投资基本无法可依。

中国人民银行丹东支行高级经济师常万年文章称，对于与双方签订的合同条约，朝方可以任意更改，无视对方的存在。随意变更其投资单位，不通知中方也不召开董事会。他们可以千方百计阻挠中方人员参与管理，不给中方派员办理常住手续。投资出现问题时，朝方政府基本不管。投资饭店、商场等项目，无论投入多少资金，中方都无法控制，资金经常被挪用，而通过法律手段讨债很难，只能依赖与朝鲜官员的关系。

而朝鲜人对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也不甚了解。比如认为与之签订合同的中国公司都是大公司，而且都像朝鲜一样有政府做后盾。

实际上对于投资者来说，无需熟知上述繁琐的法律，只需要知道一些基本的规定即可：投资者可以在朝鲜的经济特区开办合作、合资和独资企业，但在特区以外的地区投资，必须和朝鲜的会社合作或合资。

在朝鲜投资，必须雇佣朝鲜员工，由朝鲜人掌握销售渠道。在特区以外的地区，投资者甚至无权驾驶汽车。住宿只能是住在指定的涉外宾馆，甚至不能住在自己投资的企业里。在罗先特区以外的地区，随意走动也不允许，尤其是不能进入农村和普通朝鲜人的家里。

即使是在最开放的罗先地区，中国人投资的企业的朝鲜雇员也负责监视中方人员。他们每天汇报中国人的行踪，甚至坚定制止自己的中国老板随意拍照。

关键词：实力和背景

朝鲜合作方的“实力和背景”成为投资朝鲜成败的关键。几乎所有的大陆对朝投资书籍都会强调这一点的重要。

朝鲜目前的会社，分别属于劳动党、人民军、内阁三大系统，他们大多集中在平壤，极少有地方的会社。具体所隶属的单位，则五花八门。最有实力的会社隶属于39号室等核心部门，负责采购各种敏感物品，以及中央领导所需要的奢侈品等。其他会社，有些可能属于环境省、轻工业省、某个博物馆，甚至某个后勤部门。

一些中国投资者对合作方的背景讳莫如深，视为最高机密。另一些投资者坦言，他们也没弄清楚合作者到底是什么背景，以及这种背景的真实性。

在招商之时，投资者想和朝鲜某个领导见面，或是接触某种背景的人士，非常简单。在丹东等地中介的安排下，只要你能支付考察的费用，就能去朝鲜见到。但在真正投资了之后，“背景”就变得复杂了。

《朝鲜投资指南》一书称，朝鲜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其经济运行方式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很大程度上不是以法规和经济规律运行，而是按照领导人的意志决定。朝鲜人士坦言，在朝鲜投资，没有可靠的人际关系几乎寸步难行。对朝投资企业必须首先和朝鲜有关人士建立牢固的关系。“这就增添了不必要的不确定因素。这是中国企业对朝鲜投资的体制性障碍。”

常万年以“险象环生”形容投资过程：“在朝鲜做生意很少是公开透明的，常见的是与高层人士的秘密安排。”

《朝鲜经济问题研究》课题组将有“实力”的公司依次排序为党、军队、内阁三大系统。在平时的经营中，没有靠山，众多的部门和官员都能来欺负你，他们公然索贿，你却不能得罪他们。如果你找到了真正有实力的靠山，把靠山养着，小人物的敲诈就可以避免。

某匿名的珲春对朝贸易商人抱怨，这样做生意其实很累。该商人找过多个靠山，其中一些来自军方。但在关键时刻，大部分靠山被证明并不是真的有“实力”。一番对比之后，该商人终于确定了某个真正有实力的靠山。如果货物被海关扣押，或遇到其他危机，该靠山写封信，或是到现场签个字，就能立即解决问题。

但该商人始终不知道这位靠山的真实背景，只知道他“厉害”。就连靠山写的信是什么内容，商人也无从知晓。但朝鲜官员一看到就会放行。“朝鲜人嘴太严，从来不说。”

不过，无论是靠山还是背景，皆非万能。即使是强悍的“实力”，也未必能在关键时刻挽回损失。丹东对朝投资人士介绍，一名中国投资者在朝鲜被拖欠巨额货款。因为曾对朝鲜“做出巨大贡献”，该投资者得以见到金正日本人，并与金合影，当时金正日亲口承诺他会安排尽快还钱。但时至今日，货款仍未还清，投资者只得卖掉自己在丹东的楼房还贷。

随时做最坏的准备

徐先生在去朝鲜考察投资之时，被告知电力供应没有问题。但投资后，发现每天只有4个小时的供电，这令徐先生投资的矿几乎无法开工。

徐先生曾考虑过各种解决电力问题的方法。想购买发电机自己发电，但买不到足够的柴油，而且成本太高；想从国内买电输送到朝鲜的矿山，被告知即使政策允许，朝鲜的输电系统也无法承载，大部分电力都会消耗在半路上。

徐先生遇到的问题是中国投资者遭遇的普遍困境。如果没有电，几乎没有任何工厂能正常运转。就连一些投资海产捕捞的商人，在朝鲜投资兴建冷库之后，才发现因为电力不足而无法制冷。

和许多投资者一样，吸引徐先生最终决定投资的原因之一是，上一个投资者丢弃了大量设备在当地。这些价值不菲的设备都还可以用，看上去稍作投资，就能产生效益。

但回忆起在朝鲜投资的两年，徐先生至今仍然难以平静。在国内无法想象的各种难题不断出现，效益最终也没有产生。

徐先生购买了生产设备和几台重型卡车送到当地。由于道路太差，重型卡车不到2个月就相继爆胎。爆胎之后徐先生才发现，矿所在的整个道（相当于中国的省），居然没有可以为这样大的轮胎补胎的地方。

争吵随即产生。朝鲜方面指责徐先生购买的卡车质量不好。徐先生则认为，除了路况太差之外，朝鲜的司机和工人素质太差是重要原因。

投资朝鲜之前，徐先生被中介公司告知，朝鲜的工人技术素质一流。但到了朝鲜才发现并非如此，除了集体化生产培养出的极不负责的习惯外，数十年与世隔绝令朝鲜工人对新技术一无所知。声称会开重型卡车的司机，实际上从未见过现代化的卡车。徐先生一台崭新的卡车爆胎是因为行驶中两个轮胎之间嵌入了巨大的石头，直到爆胎也没有人将

石头撬出来。一名修车的工人看不懂千斤顶，还以为千斤顶是进了水，坏了，于是将千斤顶里被认为是“水”的液压油给倒了出来。

工人们干活的热情不高。徐先生对此非常着急却又不能多说，否则工人们会向上反映，闹民族情绪。尽管徐先生为工人们支付远远高于朝鲜工资水平的薪酬，工人们也依然是归国家所有，徐先生并不能支配他们。

徐先生无法在这里用多劳多得来刺激工人们更负责任地工作，也无权开除他们。

平日里，徐先生经常受到敲诈。一名军官提出要将自己的汽车租给徐先生开，每年1万美元。徐先生只得同意。但司机是军官的手下，徐先生无权随时指挥他用车。绝大部分时间，徐先生都不知道车被开到了哪里。

徐先生每次从中国带去给工人们的礼物，也从来不曾分到工人手中。

由于没有任何媒体，没有广播、互联网、手机，徐先生在朝鲜期间，对朝鲜半岛局势和矿产行情一无所知。所有的人都习惯把一切捂着不说。就连厂里发生了什么事，徐先生也未必能知道。

冬天到了，所有的道路、矿山一片冰雪，再加上缺乏电力，开采彻底停了下来。徐先生不得不丢下所有的投资回国。

回国之后，徐先生回想，由于矿区并非在中朝边境，即使被挖了出来，按照当地的交通状况，能否运回中国也是问题。徐先生的一个投资者朋友，成功地在朝鲜开采出来钼矿。但朝方告诉他，政策突然变了，钼矿禁止出口。投资者最终无法将矿石拉走。

对投资朝鲜的生产型企业而言，需要考虑如何将产品带回国。对于贸易企业来说，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将钱带回国。

由于朝币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可兑换货币，甚至没有官方牌价，因此许多投资者在朝鲜所有的作价、收款都以美元或欧元计算，不收朝币。一些涉及零售，不得不收朝币的投资者，则需要到边境的黑市，按照黑市价格将朝币兑换成人民币或其他外币。

徐先生进入朝鲜，一般会带1～2万美元。但是要把这些钱带出朝鲜，需要朝鲜方面开具外汇证，否则不准带走。徐先生只得将美金封死在皮箱的夹层中带走。

对于资金量大的贸易企业来说，问题更加复杂。由于朝鲜银行系统极差的信誉，不论是在丹东还是中国其他地方，没有任何银行在朝鲜设立代理行和账户行关系。两国贸易货款无法进行正常的资金汇划结算。

目前中朝之间贸易通过银行结算的方式，以汇款为主，而国际贸易中最常采用的信用证和托收都没有展开。

在朝鲜的中方贸易机构不愿也不敢将现金存入朝鲜的银行。前述课题组报告提到，辽宁某边贸公司曾经将在朝鲜的数百万美元销售款存入朝鲜银行。提款时被告知“账户已结零”，事后虽然确认此款是被朝方“占用”，但历时3年也未能将款项如数讨还。

于是，暗中夹带、强行闯关成了将现金带出朝鲜的重要方式。丹东边境被发现的最大一笔携入中国的美元现钞为350万美元，人民币现金携入为150万元。

资金进入朝鲜同样需要闯关。大陆人民币限于境内流通，禁止跨境通汇流动，只允许出入境人员携带2万元以下。调查显示，2006年通过丹东口岸以合法、非法携带方式向朝鲜流出人民币30多亿元，流入24亿元，但在公开贸易结算统计中却找不到这些钱。

投，还是不投？

朝鲜毕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中国商人有“零竞争对手”的优势，结构性短缺使得朝鲜看上去遍地都是机会，尤其近年来朝鲜频频发出发展经济和招商引资的信号，面对风险巨大的小蛋糕，投或不投成了一个问题。

丹东资深对朝投资顾问人士称，对任何想要到朝鲜投资的客户，他都会明确告知风险巨大，“投资朝鲜需要巨大资金，忍受长时间亏损才行。甚至需要你自己修路。随便就叫人投资朝鲜，是不负责任”。

曾经到该人士这里咨询朝鲜投资环境的人来自浙江、温州、深圳、重庆、黑龙江、港台等地。北方投资者很少，丹东投资者则一个也没有。

该人士介绍，他接触的投资中，也有一些可能是可以赚钱的，比如转口贸易。有成功的中国投资者在朝鲜生产某种在欧洲受到欢迎的饰品等朝鲜特色产品，然后出口欧洲。

另一个被一些投资机构认为是绝好机会的，是朝鲜为2012年准备的一大批献礼工程。包括10万套住宅建设所需的各种建材和装潢材料，以

及朝鲜农村房屋屋顶安装的彩瓦等。

“只有与朝鲜国家发展方向相符合的投资，才能赚到钱，”另一丹东对朝投资咨询人士称，“朝鲜领导人最近一再强调要发展轻工业，朝鲜轻工业部门招商力度很大。这是机会。”

但上述项目都是以朝鲜国内为产品销售地的，于是都面临一个风险：如果销售对象是朝鲜官方，对方是否愿意付款是个问题。

风险无处不在。了解风险所在，以及如何规避风险，是确定要对朝投资后投资者必须知道的。《朝鲜投资指南》一书列举了一系列风险以及规避方法，包括因朝鲜国际生存环境恶化而产生的风险、通货膨胀风险、汇率风险和外汇管制风险、因自然灾害引发的财产损失能否得到保险公司的赔付风险、经营风险（包括美日的制裁，对朝鲜产商品征收歧视性关税，原产地证明和检验检疫方面的歧视性措施）等。

上述许多风险是不可能完全化解的。投资者能做的，只能是当风险来临时将损失降到最小，比如密切关注半岛局势和朝美关系，防止朝鲜突然实行外汇管制。

如果没有特殊的人际关系，目前朝鲜对小额投资的积极性并不高，但大规模投资风险又太大。该书建议投资额定在20～50万美元比较合适。

该书最后认为，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餐饮业、加工组装行业，将投资与贸易有机结合。比如将在朝鲜生产的部分商品在朝鲜国内销售，条件是获得在朝鲜国内购买某些产品运到中国销售或者在朝鲜领海捕捞海产品等权益。

“鉴于目前朝鲜的国内情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我们认为其他领域的投资应当暂缓进行。”

(实习生肖克莱提、洪志先、黄柯劼对本组稿件亦有贡献）

□ 编辑 涂艳 □ 美编 青年

中国原料流入世界冰毒工厂

□ 记者 夏阳

2011年，中国开始了对冰毒前所未有的严厉打击。

此前，贩卖麻黄碱类药物（亦即冰毒生产原料）的行为均以“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起诉。这是涉毒类案件中较轻的罪名，最高刑囚只有10年，并处有上限罚金。而这一年开始，这一行为开始被判“制造毒品罪”，最高可判死刑，并可没收合法及非法财产。

中国态度的转变，是对国内以冰毒为首的合成毒品泛滥的应对，也与国际压力有关。有着漫长边境线、同时也有世界上最重要的麻黄草生产基地的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冰毒及其原料的主要提供国之一。

中国开始了对冰毒前所未有的严厉打击。

2011年7月29日，北京退休警察解群英因走私感冒药康泰克被判处3年6个月刑期，罚金150万元，成为第一个因走私感冒药被中国处以有期徒刑的人。

解走私到新西兰的康泰克数量共200多箱，从其中提炼出的麻黄碱可制造约50公斤左右的冰毒。康泰克的主要成分—右旋麻黄素，只需要经过两道工序，即可加工出脱氧麻黄素。脱氧麻黄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合成毒品“冰毒”的学名。

此前，在2011年4月，成都市检察机关对贩卖麻黄碱类药物的行为，亦首次以“制造毒品罪”提起公诉。

在2011年前，类似犯罪行为均以“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起诉。“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是涉毒类案件中处罚相对较轻的罪名，最高刑只有10年，并处有上限罚金。而“制造毒品罪”最高可判死刑，并可没收合法及非法财产。

中国态度的转变，与周边国家的压力有关。有着漫长边境线和众多化工产业的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冰毒及其原料的潜在危险提供国之一。在中国吸毒者大多还不认识“冰毒”这种新型毒品的1998年和1999

年，中国已两度被联合国禁毒署列为“冰毒来源国”，与缅甸等毒品大国地位相当。随后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用以管控冰毒及冰毒原料经中国境内流出，最终去掉冰毒来源国的身份。

但时至今日，中国的冰毒原料依然源源不断流向周边国家的冰毒生产者，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在公开场合表示，欧美的冰毒原料都由中国不法分子提供。

为全球提供生产原料的短短十几年内，冰毒占国内毒品市场份额已升至30%，在东北三省，冰毒吸食者已占官方登记在册吸毒人员总量的72% 。

吉林禁毒队人员介绍，这是非常可怕的增长速度。作为罂粟的传统种植国，中国历年禁毒录入数据中，不断叠加的传统毒品数据已经累计至一个庞大数字，但冰毒从出现到蔓延仅十几年时间，便已占到总数的30%。

此次政府设重刑打击冰毒原料，应与中国加强与东盟的缉毒合作以及新西兰长期的要求、协商有关，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冰毒在国内的泛滥，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康泰克“出口”大国

解群英将200箱康泰克药粉装入订制夹层大理石桌面后，混过了新西兰的海关。

北京到奥克兰市的10448公里航程，利用大理石来走私康泰克药粉，是在走私者中间一种较为流行的办法。在进关时，岩石厚度对电子设备的扫描会造成障碍。2010年3月10日，5名中国留学生将康泰克药粉装进茶叶包装后，放入花岗岩托盘邮递到奥克兰。奥警方估计，这批药粉制成冰毒后价值约4000万元人民币。

在新西兰这个人均吸食冰毒最多的国家，每克1000新西兰元（约合5435元人民币）的冰毒，在当地每年交易额与其整个酒业相当。但在当地，制成冰毒的原料却极难找到，包括含有麻黄碱的感冒药亦被列为C类毒品，在中国仅以“处方药”限制购买的康泰克由此成为近年最受欢迎的毒品原料，在新西兰成为抢手货—一小盒零售价为13元的康泰克，到新西兰后可卖到约330元人民币。

走私康泰克的暴利，令新西兰的毒贩和被他们拉下水的中国留学生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除了沙发、大理石，新西兰海关要面对的陷阱

还包括家用电器、自行车车架、电池等各种各样可以阻碍电子扫描设备的物品。

新西兰2009年毒品年度报告指出，在海关截获的毒品中增长最快的是中国感冒药康泰克。此前，从2002年到2008年，新西兰截获的冰毒原料康泰克数量上升了12倍。每年入境约1000万颗，占中国新康泰克总产量的2%。

而新警方和海关估计，他们只截获了非法进口新西兰毒品和毒品原料的20%。



2011年3月22日，北京昌平法院开庭审理解群英等6人非法买卖康泰克一案。

新西兰媒体报道，其冰毒原料中，90%来自中国康泰克。但新西兰仅仅是中国的冰毒原料走私出口目的地之一。

出生上海的墨西哥华裔叶真理早在2006年，令全世界对中国的冰毒原料大为吃惊。

当年5月，墨西哥警方在叶的家中搜出2.07亿美元、20万欧元和15.75万墨西哥比索的堆积如山的现钞。墨西哥全年缉毒与反洗钱行动所缴获的款项，只及这个数字的1/5。

墨西哥警方查明，叶真理成立的制药公司，在此前两年间从中国进口了总计96吨的化学药品，报关时声称这些化学药品将全部用来制造感冒药，然而这些药品最终都被加工成了伪麻黄碱，并卖给了当地的毒贩子。

美国方面则称，叶真理提供给毒贩子的原料足以生产41吨冰毒。两年后，叶真理认罪，并与美国警方配合，墨西哥在美国的冰毒贩卖集团势力几乎被一网打尽，全美范围38个城市共300多名墨籍贩毒人员被逮捕。叶因此被美警方称为“西半球最大伪麻黄碱走私商”。

中国冰毒原料的全球市场，远远不止于此。中国周边的韩国、日本、俄罗斯毒贩，都在源源不断地购买着来自中国的冰毒及原料。2001年，韩国毒贩申玉斗成为中国第一个处死的韩国人；2010年，日本毒贩赤野光信也成为几十年来中国处死的第一个日本人；2009年，英国毒贩什肯·阿克毛成为中国处死的第一名英国毒贩。

据媒体报道，2010年上半年，韩国在国外被收监的毒品犯罪人员有239名，其中在中国收监约90人。

全球毒品中心缅甸，亦将中国作为其主要的原料来源。云南警方截获的数字显示，来自缅甸的需求年年增长：2005年缴获麻黄碱片635.9公斤，2006年升至4.7吨，2007年缴获30.4吨，两年时间即增长至47倍。

全球中转地

中国冰毒的全球网络形成于1990年左右。

其时，1970年代从日本开始兴起的冰毒潮，已在日、韩成为大患——由于不具备种植罂粟的条件，两国毒品市场中，人工合成化学毒品冰毒占到90%。

严重的社会危害令两国先后严厉打击，贩毒集团遂开始产业转移。先后在相邻的香港、台湾等地开始组织生产，再转运到本地出售。随着中国内陆改革开放，坐拥全球最大麻黄草产量的中国，遂成为毒贩首选的冰毒生产地。

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对冰毒完全处于懵懂状态，在国内制冰毒极其“方便”。1990年，山东菏泽市村干部魏忠义与港商达成加工贩卖冰毒的合作协议后，从新疆某医药公司购来麻黄素，找到北京一家化学试剂厂，称“去氧麻黄素是治疗哮喘、止痛药品的中间体”，将会出口香港，便以每公斤400元的加工费与该加工厂签订了5500公斤冰毒加工合同。

当年的生产规模与制毒者的疯狂，可从中国破获的第一起冰毒案一窥：1989年，香港冰毒生产者李秋萍将在香港制贩冰毒的产业转到内地，到1992年案发时，仅3年内就生产了上千公斤冰毒，先后偷运到香

港、日本、菲律宾等地。

受此案影响，1992年8月，中国卫生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对甲基安非他明和麻黄素管理的通知》。其后，原国家医药管理局于1995年颁布了《麻黄素管理规定》。

但这并未使冰毒生产者受到太大影响，一张供应日韩等地的庞大毒品生产网络已经织就。

以地域、民族亲近性为纽带，在中国境内的当地人支持下，中国呈现从四头并进的冰毒生产基地：韩国毒贩进入黑龙江等朝鲜族聚居地、台湾毒贩进入福建、香港毒贩进入广东、缅甸毒贩进入云南，分别建成各自的制贩冰毒基地。

1998年与1999年，联合国禁毒署连续两年将中国列为全球冰毒来源国。1999年，中国大陆共截获冰毒16吨，占世界冰毒截获量的50%。

压力下的管控

压力之下中国开始着力加强管制。

1998年3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麻黄素管理的通知》，规定对麻黄素的生产、经营、运输、使用、出口实行专项管理。

同年12月7日，多部门针对麻黄素类产品的出口问题，出台了相关法规，实行出口管制。其中，麻黄素的报关口岸仅限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四个口岸。中国有关部门还与联合国禁毒机构及有关国家的主管当局，联合建立了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的国际核查制度。

中国禁毒局亦在这一年成立。

在这两项通知的基础上，原国家药品监管局于1999年6月26日发布了《麻黄素管理办法（试行）》，对麻黄素实行国内定点生产、定点经营、凭证购用、凭证运输、一证一次有效等严格的管理制度。

2000年5月，公安部亦开始参与监管，实施麻黄素运输许可证管理。

不断加强管制收到成效，2000年，联合国禁毒署终于摘掉了中国毒品来源国的帽子。

此后，中国持续加强对毒品原料的管控。

国务院于2005年8月颁布了《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2007年11

月，相关部门发文，规定生产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所需原料要年审批量，控制在近三年购用量平均值以下。

不过，随着管控的加强，毒品原料渐渐集中到零售终端。不受限制且麻黄碱含量较高的感冒药成为首选。

数年后，深受其害的新西兰忍无可忍，将全国第三个终身监禁的判例，给了走私康泰克的中国人—解群英本人就曾因走私康泰克于2004年被新西兰法院判处过三年有期徒刑。

2005年初新西兰政府致函中国公安部，并于当年11月在北京开设了海关办事处。

2008年，中国国家药监局发出通知，要求药店销售康泰克、白加黑、百服咛等数十种常用感冒药时，一次不得超过5个最小包装。这一改变应与新西兰的努力有关，奥克兰海关缉毒调查处负责人Bill Perry翌年曾对当地媒体称："这些年来，新西兰坚持不懈地同中国方面就康泰克控制问题进行沟通，现在，中国药店对康泰克的购买数量已经有了限制。"

用十余年时间，中国先后对冰毒原料建立了一系列从生产到流通、使用的全过程管理体系。但这一期间，中国单纯的冰毒中转国身份已经发生改变，集中转国、消费国、出口国与进口国、生产国于一身。

合成毒品在大城市，东部的广东、福建等沿海各省飞速发展，同时东北加入了冰毒大区，一跃成为与云南并列的四大毒品省份，其查获的冰毒数量接近云南。

2011年6月，刘跃进透露："从查获的地下毒品加工厂点看，有2/3以上的省都破获过地下毒品加工厂案件。在国内现在消费的这些合成毒品，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国内自己生产出来的，总体格局是国内生产的比例逐年上升。"

冰毒日益泛滥，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年轻人不断沦为受害者。"90后"吸食者飞速增长，2008年公安机关掌握的"90后"吸毒人员为1.7万人，2009年增至3.7万人，东北三省65%的青少年可以从同伴手中获取冰毒。

青少年滥用毒品的结果，毫不意外地成为引发高犯罪的原因，在广东部分地区查处的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件中，因吸毒诱发的高达80%。

无锡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例显示，制作冰毒的配方已在民间卖到20万

元。如今，这个原料大国各种质量的冰毒多达十几种，主要分为植物冰（白冰，纯冰）和化学合成冰（黄冰）两种。植物冰和纯冰由植物麻黄素生产，分钻石、冰糖、白牙签、黄牙签、水果冰、奶油冰、油冰、大冰砖、小冰砖等冰毒产品，其中以钻石质地最好；而合成麻黄素即为化学冰毒，质地最差。所有种类的冰毒，均有人在互联网上公开出售。



世界禁毒日，中国警方烧毁缉查没收的毒品。

从麻黄草到康泰克的攻防战

尽管大陆不断升级对易制毒原材料的管制，但在涉毒行业的暴利诱惑下，上下游产业链上每个监管环节的从业人员都可能成为被毒品攻克的弱点，防不胜防。

□ 记者 夏阳

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以下简称“阿旗”）天山制药厂的厂区，完全不像一个停产工厂。

8月13日，漂亮的绿化带里，洁净的厂区仿佛一尘不染，尽管已停产数月，所有正式工作人员和数名保安，每天仍然准点上班。

除了保卫人员三班轮换外，数十个监控视频一秒不停地注视着厂区每一个角落。同时，所有库房都在红外线报警系统的监控之下。令这个停产企业不敢有丝毫松懈的原因，是库房里堆存的将近10吨的麻黄草。如果这些原料非法流出，其制成的冰毒，足够供应全球毒品市场数月的消费量。

北纬43-47度之间，是麻黄草最合适的生长区域。其中，中国和印度的天然麻黄素是各类制药公司和地下制毒厂的首选。据记载，相比苏联仅9种麻黄草，日、朝、巴基斯坦和印度各国仅三四个品种且产量很小，中国麻黄草多达十几个品种，产量极丰，是国际上知名的麻黄草主产地。

在中国主产地中，内蒙古的草质最好、产量最多；内蒙古境内，又以赤峰市阿旗的草最好，品种和产量都最多。

阿旗县公安局距离天山制药厂仅3公里路程，“如有意外情况，警察数分钟内就会赶到。”一位保卫人员称。“这里的一克成品，也不能流出去。”制药厂一位员工老古（化名）称。

一克也不能外流

进入制药厂区，需要经过两道大门。

第一道大门临街，任何人可进入。20多米后面有第二道大门，门卫室紧守在第二道大门之前。除了本厂人员外，外人进入这道门，须厂领导批准。

进入门卫室，桌上放着两台警报器，一台为无线报警器，直通阿旗公安局；另一台是红外线警报器，连接着各仓库红外线报警系统。里间是两台视频监视系统：30多个视频窗口上，从厂门外到厂区库房内的各关键区域一览无遗。

“只要有人进入库房，哪怕是领导入库检查，也会马上发出警报，声音比一般警车分贝还要高，这时我们要看监视视频，如果是有人入侵，第一时间按响无线报警器，旗公安局就会赶来。”保卫处人员介绍。

“除了成品库房，我们的半成品库房也有红外线警报系统，生产麻黄素要用到两种易制毒化学品。”老古介绍。

除了门卫处的这一套监控系统，另有一套在办公区内，主要监视成品生产车间，严密监视每个生产环节，“监控到没有死角为止”。

厂区库房的建设亦有严格要求，墙和地面都是50厘米厚的水泥墙。四面的围墙仅在两米高度以上，有因透气而开的小小的窗户，且加了粗近3厘米的钢筋栏，“连鸟儿都不可能飞进来一只”。

库房的门是经公安局认可的防盗门，内外两道每道均有两把锁，由两个人共同看管。

除了对外防范，内部合法流出的漏洞亦在严密控制中。

每年生产之后，厂方须将成品数量上报自治区药监局，再上报全国麻醉药品协会，纳入库存备案。按照规定，产量以克计算，严格精确上报。

销售环节更加严格。首先，购买者通常是医药企业，必须具有麻黄素的使用资质或者承销资质，购买前须先上报本省药监部门核实其生产资质，再核准其用量是否合理，以避免不法分子利用合法渠道多购，之后药监部门给予批复“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购用证明”。购用证明的有效期，一般为三个月。



麻黄草轻易即被偷运出产地，因为“碰到警察，说是优质牧草，他们也认不出来”。

其后，厂家须持批复原件来到天山制药厂，双方谈妥供销事宜后，签订合同。之后执合同，去市公安部门办理准运证。批准时间一般最长为15天。

运送路线亦由警方指定。“途经地点都要经过公安局同意。路线一般要选交通便捷安全的大路，要求尽量走高速，不能随意停留，如非必要避免小路行驶等。”

送货的车辆要采用密封厢小型货车。通常送货时，厂里领导必须陪同押车。除司机外，另有一到两名保安要随同前往。但在送货之前，除领导与司机外，其他人都不知道目的地及具体出发时间。同时，通知对方接货也不会提前太久，多是快到达目的地时才电话通知对方接收。

一名药监工作人员介绍，对易制毒品类、麻醉类、精神类、放射类四大类特殊药品，每笔交易都要进入国家药品电子监管网，以确保如果有违法流出现象，倒查到相关责任企业与责任人。


天山制药厂的厂区安全监控后台。

麻黄草收购战

8月下旬，阿旗的麻黄草已经开始泛黄，再过两个月的霜降时节，就是麻黄草收割的季节。解放前，麻黄草是牧民最好的止咳药物，用麻黄草熬制而成的麻黄膏，“咳嗽时就挖一块吃”。

麻黄草茎高20厘米、粗1毫米。一株长势好的麻黄草，有数十枝可供提炼麻黄素的草茎。在中国大陆众多主产地中，阿旗的麻黄草质量最高，平均300公斤即可提炼1公斤麻黄素。吉林、甘肃、新疆产麻黄草，相比之下要差许多。

对麻黄草的收购及运输，国家同样有严格的管理。

阿旗遍地的麻黄草，谁都能收割，但有收购资质的人极少。按规定，来阿旗收购麻黄草要有中药材收购许可证，而这些证件只对具有资格的生产企业和医药经营公司发放。

每年麻黄草收割前，天山制药厂要经过草原管理局、公安局等部门获得收购许可证后，才能找到当地的合作牧民，出具委托收购手续，由其代为收购。

同时，根据实际需求数量，制药厂再去公安局办理准运证。比如共需500吨，那么制药厂就帮收购者办理比500吨稍多一些重量的准运证。“因为随收随运，不好精确估算，只能多给一点量。”老古解释。

对制药厂来说，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无草可收。曾经遍地都是的麻黄草，如今已日益稀少。1990年代初期，在麻黄草出口高峰期，草原上的牧民为之疯狂，不惜杀鸡取卵、将其连根掘出，对多年生的麻黄草造成巨大伤害。20年后，当年阿旗的百万亩麻黄草，只剩下了10万亩。

“因为没有原料，我们只能停产。前年由于干旱，我们收购的草量很少，只能等到去年收购完之后才一并加工生产，但即便这样，我们今年也只能生产到4月份。”老古说。近年这里每年都会停产，一直等到下年有草可以加工为止。

在资源已日益稀少的情况下，非法收购者还无处不在。政府管控加强的结果是，当地有合法资格的代购者开始唱主角，有能力拿到大批麻黄草的人成为各方争相拉拢的焦点人物。

当地牧民老查干说，卖给麻黄厂是一斤6角钱，还包括运费在内，而卖给外边来的收购者最多可达到2元，还不用包括运费。查干一年最多时能收到数百万斤，如果不惜违法，一个秋天下来，他便是百万富豪。

暴利下，当地真有牧民不怕违法。“我掌握的情况，去年旗里流出去的草，至少有1/3。”按照天山制药厂的产量计算，流出去的草可以制造3吨麻黄素。

“非常简单。晚上8点以后，用小车运到大路上，装进对方开来的密封厢式货车里，钱就到手了。”老查干说，而且也不会有什么风险，晚上走基本没人管，只要出了阿旗，就不会再有什么事—比如在北京碰到警察，说是优质牧草，他们也认不出来。老查干说，旗里私自卖草的人多的是，每个人都有点关系。“一般情况下，被查扣住后，只要打几个电话，大多会被放行。这并不是什么难事，我也能送出去。”

这里非法流出的草，大部分流到河北去了，一小部分留在赤峰。当地人介绍，阿旗最大的“混混”，就是当年靠贩卖麻黄草起家，从当初到处赊欠度日变成了本地富豪，资产数千万，现已经营矿业，并涉足房地产。

已经奄奄一息的制药厂，根本无力与高价抢购的非法收购者竞争，只能依赖当地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干预。前年麻黄草收购数量不足后，天山制药厂加强了对草源代购人的控制，并设置了举报制度—凡是举报私卖麻黄草的人，给予经济奖励，同时将私购者上报旗里相关部门，进行处罚。

举报及惩罚措施出现后，情况有所好转。去年老查干的草一斤也没有流到外地，被举报的后果他很恐惧，“以后就再不能吃这碗饭了”。

但在涉毒行业的暴利诱惑下，仅靠这些处理措施，无法带来根本转变。2011年6月29日，重庆市公安局在垫江县破获的一起非法加工麻黄素案件中，缴获麻黄草 1000余麻袋，并查获制成的麻黄素10.23公斤—提取麻黄素的技术工序不复杂，且基本处于公开状态，麻黄草经过近10小时熬炼，即可分离出麻黄素成分，加以一定的化学原料，即可提取出麻黄素，所需设备非常简单。

高成本的企业监控

尽管麻黄素生产厂家都有类似天山制药厂这样的严格管制，但也都有自己的难处。

上世纪50年代，全国仅有2家麻黄素生产厂，1970年代发展到4家。

1980 - 1990年代，中国麻黄素的外销市场因美国而兴旺。美国是唯一允许使用麻黄素浸膏粉作为食品添加剂和药品的国家，而中国是唯一允许从麻黄草中提麻黄素的国家，中国遂成为美国的主要麻黄素进口国。从1980年代开始，大同及内蒙产的红马牌麻黄素在美国畅销。美国每年进口约800吨麻黄素。最高时中国每年麻黄浸膏粉出口1200吨左右，全部销往美国。美国的进口额占到中国麻黄素产量的80%以上。

正是随着中国麻黄素出口热潮，坐拥百万亩麻黄草的阿旗县政府，于1980年代末牵头组建了天山制药厂。到1990年代末期为止，这家企业一直是当地最大的利税企业，每年出口的麻黄素浸膏粉占到中国出口的一半。当年效益之好，令当地人人眼热，不少公务员都通过关系调入厂里上班。

同期，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刺激下，各地竞相上马麻黄素生产线。蜂拥而上的麻黄草收割，对草原生态造成了巨大破坏。

1998年中国政府开始认识到易制毒药品之患并实行麻黄素管制后，中国共核准生产资格的麻黄素厂有27家，但其时一些并未获得资质的麻黄素厂依然不肯退出。据媒体报道，国内实际生产的厂家约有200多家。这期间，地下冰毒制造者都从这些厂家或多或少拿到过原料，其中某大型制药厂曾被国际刑警调查。

2004年，含有麻黄素的美国减肥药被发现容易导致使用者猝死，这

种减肥药遂被禁止生产。2005年1月，美国开始禁止进口中国麻黄素，这一政策令中国的麻黄素市场瞬间逆转：当年出口由1000吨锐减为300吨。

庞大的出口市场戛然而止后，包括获得“准生证”的27家企业，顿时陷入经营困境，停产转产者居多。

2006年，原来的27家企业只剩下14家还在生产，目前可以全力生产的只有成功研发出合成麻黄素生产技术的内蒙古赤峰制药厂。

然而，赤峰制药厂这项可节约生产成本40%的技术，对于其他已奄奄一息的麻黄素厂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这些国营企业之前在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没有营销意识，缺少系统的国内销售渠道。而合成药品的价格竞争和管制严控下，原有的销售网络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了。

而他们在库房囤积的大量麻黄素，也被地下制毒者们觊觎。“也有来源不明的陌生人打电话到厂里，问没有资质能不能买我们的产品，我们当然不敢答应，马上挂掉电话。”老古说，“现在还活着的麻黄素厂，没法出口又不能让东西流进毒品市场，只有盯紧成品药生产厂家。我们老板最近都想争取到一个成品药的制药项目，以消化自己的原料。”

这些厂家的效益接近触底，管理成本却有增无减。

作为易制毒品药物生产商被严格管制的工厂，失去出口光环后，已成为困难企业，员工由上百人减至十几人。门卫老张与同事三班轮岗，白班一天，一步也不能离岗。夜班更辛苦，要求每小时一次巡逻。按照正常情况，走完库房等重要场所需时超过半小时，等回来后，“仅能喘口气”，便又要再次出发巡逻。冬天的夜间巡逻次数较多，至少要达到10次；夏天一般一夜6－7次。

甚至每个厂领导也都必须轮岗值夜班，以督促保安能每晚上都按时巡逻。“这些已经成为厂里最大的开支。其余工作人员，都是什么时间生产什么时间聘用。每到生产期，大约要聘用100多名临时工人。”

而在生产工艺不能外泄的安全责任要求下，每年停产时，厂里的核心人员还不能放假，也就是即使一年无活可干，每月依然要按时发放工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某已经停产的麻黄素厂便出现过内部人员作案的案例。该厂实行岗位责任制，对每一道工序的原料与产量都要进行登记移交——该名职工于是选择在粗品进入精品车间的输送管道环节下

手，以逃过每道工序之间的验收。

零售环节的疯狂“套购”

尽管从收割、收购麻黄草到制药、售药整个产业链上都有国家设置的层层监控，但在每个环节上的相关工作人员，都可能成为监控链条上的薄弱环节。

朝鲜毒品攻陷东北

大量证据表明，来自朝鲜的毒品，尤其是冰毒，在东三省泛滥成灾。靠近朝鲜的边境地区，更是沦为重灾区。2011年7月，韩国第二大报纸《东亚日报》报道称，中国“发怒了”：2010年中国当局没收的朝鲜产毒品价值达6000万美元。针对朝鲜产毒品，中国开始暗中与韩国调查当局密切合作。

□ 记者 周宇

2011年6月20日，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做客“人民网”谈“中国合成毒品问题”。

刘跃进介绍，合成毒品发生蔓延的重灾区在东北地区。“东三省查获的合成毒品人数要占到所有查获吸食毒品人数的70%以上。”合成毒品是相对鸦片等传统毒品而言化学合成的毒品，冰毒即主要的合成毒品。

既非沿海地区、也非毒品产地的东三省成为重灾区，颇出国人意料。与东三省接壤或邻近的俄罗斯、韩国均为毒品输入地，而非重要产地，只有朝鲜自1990年代以来在大面积种植和制造毒品。大量证据表明，来自朝鲜的毒品，尤其是冰毒，在东三省泛滥成灾。



在一次政府事务国际安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针对朝鲜的毒品、伪造和武器扩散委员会，前朝鲜政府官员正在作证。

靠近朝鲜的边境地区，更是沦为重灾区。新华社曾于2010年报道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已成为毒品主要走私通道、中转站、集散地和消费地。”

中国“发怒了”

2011年7月，韩国第二大报纸《东亚日报》报道称，中国“发怒了”：2010年中国当局没收的朝鲜产毒品价值达6000万美元。针对在中国走私的朝鲜产毒品，中国暗中与韩国调查当局开始密切合作。

《东亚日报》引用韩国政府方面消息称：“这只是被披露的数目而已，实际上在中国内地走私的朝鲜产毒品规模比这个大很多。”

尽管大陆官方一直秘而不宣，但研究者们和相关部门早已意识到了其中的危害。

延边大学法学院崔军勇2010年文章认为，近3-5年间，延边地区吸食的毒品中很大部分来自朝鲜。朝鲜公民携带毒品跨境走私犯罪呈快速上升态势。



2002年7月，台湾海岸警卫队官员展示他们在北部公海的一艘朝鲜军舰上缉获的海洛因。

中朝边境地区除陆地边界线，还有大量以江、河水面为界。冬季冰面可直接行车，夏季枯水期“一步跨”（一步即可跨过对岸的边界）增多，这令中朝跨境贩毒极为便利。此外，中朝边境交通便利、易于逃窜。从近年侦破的涉朝鲜贩毒案件分析， 朝鲜毒品入境地点主要是辽宁

丹东边境、吉林龙井市三合镇辖区边境一带，以及开山屯镇、长白县长白镇等地。

源源不断的毒品，令东北的中朝边境地区首先受害。以与朝鲜联系最为紧密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首府延吉市登记在册吸毒人员从1995年的44人增加到2010年前后的2090人，增长了近47倍。

吸毒人员逐渐低龄化，1996年以前平均年龄40岁左右，如今63%的吸毒者年龄在17-35岁之间，最小的不满14岁。吸毒人员结构全方位扩大。从过去个体经商、闲散人员，到现在的机关干部，甚至扩大到中小学生。

据不完全统计，从事边贸的商人中约有30%人员吸毒。

朝鲜方面毒品供应结构从传统毒品到新型毒品（冰毒为主）的变化，也带来了中朝边境毒品吸食结构的变化。

根据《2006年中国禁毒报告》，两省吸食新型毒品人数在当时已经超过了传统毒品。崔军勇分析，目前来自朝鲜的毒品主要是冰毒，偶尔有鸦片，主要产于朝鲜咸镜北道的清津、咸兴地区。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劣质的甲基苯丙胺（冰毒），走私者称之为“L体”，也就是冰毒残渣，吸食后对人体产生更大副作用。



被击沉的朝鲜间谍船**2002**年**9**月打捞出水时图片。日本国土交通大臣扇千景（**Chikage Ogi**）称，经日本调查，该船被证实与**1998**年涉嫌在中国东海地区走私毒品系同一船只。

这些都对一水相连的延边地区产生叠加的伤害。

1990年代朝鲜大饥荒期间，大量朝鲜饥民逃亡中国，中国方面给予相当的宽容和同情。但逐渐有偷渡者携带毒品到中国。这使得多数中国边民从过去对朝鲜偷渡者的同情、宽容逐渐变成了警惕、不欢迎。

2000年以来，大陆投入巨资，在延边地区边防一线建设大陆制式观察哨（楼），安装大量高科技数字化监控设备。同时有针对性地对边民进行教育。无奈国境线太长，且缺乏天然屏障，始终无法禁绝偷渡与贩毒走私等犯罪。

朝鲜毒品生产转型

1990年代初，朝鲜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催生毒品种植。

有关朝鲜毒品的产量，各方说法不一。河北武警学院边防系讲师孟立君提供的数字称，此时朝鲜要求所有集体农庄划出125英亩土地种植罂粟。

美国反毒品局数据则称，朝鲜每年生产40吨鸦片，是世界第三大鸦片出口国和第六大海洛因出口国。

美国国会调查局2004年的报告《毒品交易和朝鲜》称，最近1－2年，朝鲜每年出口5亿美元的毒品，其中一些收入用于军费等。该报告还透露，朝鲜劳动党第39号室主导毒品交易，而且其流通途径也以政府和企业、外交通道、混入一般装载物中等，变得十分复杂。

与其他毒品产地不同的是，朝鲜的毒品种植和生产，被普遍认为是官方行为：朝鲜几乎没有私人经济，除了官方甚至军方，没有任何个人有能力经营毒品。

韩国最大报纸《朝鲜日报》于2009年引用韩国治安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柳同烈表示："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地区政权崩溃后，北韩（韩国对朝鲜的称呼）为赚取外汇，开始在政权主导下生产毒品。金正日1992年甚至将毒品事业称为'白桔梗事业'加以鼓励。"据推测，朝鲜权力机构每年可通过毒品获得1亿美元收入。

该报道引用韩国有关负责人的话证实，自1997年起，北韩在平北、慈江道、双江道、咸北每个市、郡的合作农场都种植了10町步(1町步约合1公顷)鸦片。这是为赚取外汇的"政策事业"。

曾贩卖过毒品的"逃北者"崔贤植（化名）透露，清津市的"罗南制药厂"制造毒品。一般制造药品的工厂内部都设有毒品制造设备，平南的顺川制药厂也有类似设备。每月共生产约1吨海洛因和冰毒。在毒品制

造工厂里由泰国毒品制造技术人员负责生产。“印有红色狮子顶着球的画面的海洛因包装袋，酷似泰国本地产品。”

尽管获利颇丰，毒品还是不可避免地令朝鲜再次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各国和国际组织都对其高度警惕。

2003年，朝鲜货船“烽遂”号船员因涉嫌走私价值1.5亿澳元的海洛因而在澳大利亚悉尼被捕。澳大利亚政府为警告北韩的国际毒品走私行为，派出空军战机于2006年在公海上击沉了“烽遂”号。2004年6月，2名北韩外交官在埃及因涉嫌从事非法毒品交易而被捕。

毒品贸易均由朝鲜高层控制。《朝鲜日报》报道称，2008年6月，朝鲜保卫司令部要员因为误吸另一高官的含有毒品的特殊香烟，当场中毒昏迷，很快死亡。该报引用韩国对北消息人士表示：“北韩生产毒品已持续20年以上，毒瘾可能已经扩散到军方和党高层人士。但是，必须向最高领导人隐瞒这一事实，这就是北韩的现实。”

在朝鲜内部，吸毒也开始向下层扩散。在韩国的朝鲜流亡媒体DAILYNK，直接将朝鲜称为“毒品共和国”。该媒体访谈的朝鲜咸兴居民称：“你就想在咸兴稍微有点儿钱的人大部分都在吸毒就可以了。搞贸易的人最多。驾驶长途大客或搬运集装箱的司机也很多。甚至保安署的保安员也吸毒。”

由于药品奇缺，很多居民将毒品当做“万能药品”。“咸兴市居民们以为吸食少量毒品还可以治病。感冒引起的发烧或者拉肚子，高血压引起的脸部瘫痪时吸食希洛苯或者药粒（海洛因）效果就很好。都信以为真。”

一位在朝鲜工作数年的中国人向《凤凰周刊》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在朝鲜拉肚子，当地人就用鸦片熬汤当药给他喝。一些朝鲜外贸官员似乎也有销售毒品的压力，曾多次问他能否“带货”去中国。

近年，迫于国际舆论、制裁的巨大压力，朝鲜有计划地缩减了罂粟种植面积，但同时大力发展新型毒品的生产加工，令毒品生产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2005-2007年间中朝边境缴获的不同类型毒品数量变化来看，海洛因从15.88千克下降到3.25千克，冰毒却从13.33千克一跃到了59.87千克。

东北成朝鲜毒品国际中转站

从朝鲜流入的毒品，除了大部分被东北地区本地消费，还有大量流入大陆腹地，以及流向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这使得原本远离毒品的东北地区，成了毒品的国际中转站。

《东亚日报》披露，朝鲜在中国走私毒品有严密渠道，即所谓的“3—3—3制”。在9至10人一组的贩毒团伙中，3名朝鲜人负责将毒品带到朝中边界，之后由3名朝鲜族中国人负责在东北三省运输并交给3名韩国人，他们再把毒品销往韩日。

2006年，辽宁省禁毒总队破获列为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的“4.03”特大跨国走私贩卖冰毒案，摧毁了一个涉及境外及国内多省的毒品走私、贩卖、运输网络。官方报道称，抓获六名犯罪嫌疑人，其中日本籍两人、“境外某国籍”一人、中国籍三人。

根据公安部禁毒局指示，此后，专案组继续加大侦控力度，尤其对日籍毒贩在辽宁的活动情况进行全时空跟踪侦查，最终将准备飞返日本大阪的两名日本毒贩在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抓获。之后专案组发现，该犯罪网罗成员复杂，遍及辽宁、吉林、山东多个城市，长期从事贩毒活动，团伙内部结构紧密，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据日本外务省等统计，截至2009年1月，至少有28名日本人因涉毒被关押在中国境内，仅东北三省目前就有9人在押。

日本之外，韩国也是朝鲜经由东北的毒品受害者。2004年2月，汉城麻浦警署拘留了李某等17人，他们涉嫌通过中国贩毒集团走私价值几百亿韩元的朝鲜产冰毒，并在韩国贩卖。

早在2003年前后，韩国方面就已经注意到，不断有“逃北者”从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一带获得朝鲜产的毒品，再带入韩国贩卖。“由第三国生产的毒品的危害，要由其他两个无辜的邻国出手，这确实无法让人接受。”崔军勇称。

2003年之后，国际上与朝鲜有关的冰毒和海洛因的缉获量总体下降。一些国际报告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替朝鲜“背黑锅”：“考虑到中国犯罪分子与朝鲜毒品生产走私的联系日益密切，有人认为来源于朝鲜的毒品缉获量的减少是因为许多来源于朝鲜的毒品被错误地当成是来源于中国的。”

一个例证是，截至2006年初，日本已经连续三年没有缴获来源于朝鲜的兴奋剂。但是2006年1月，日本警方在横滨，在来自中国大连的轮船上缴获14公斤海洛因，最终被认为来源于朝鲜。

被掩盖的危害

尽管危害甚大，但中国在高调反毒品的同时，对来自朝鲜的毒品向来保持奇怪的沉默。

延边媒体人士介绍，历年来众多贩毒案件中的毒品几乎全部来自朝鲜，但在报道中，朝鲜通常以“边境某国”代替。前述“4.03”特大贩毒案中，被抓获的日本毒贩的国籍被点明，却又有神秘的“境外某国籍”一人的说法。

《东亚日报》认为，中国虽然认为朝鲜产毒品走私案件的增加趋势有危险，但考虑到中朝关系一直没有公开毒品走私问题。

不过，随着贩毒日益猖獗，中国也难以持续替朝鲜掩盖。甚至已出现朝鲜官员在中国贩毒被抓。

韩联社2010年6月报道，从事贸易工作的一名朝鲜新义州官员（林某），因涉嫌毒品交易在丹东被逮捕。韩国媒体引用反人道犯罪调查委员会共同代表Do　Hui-yun的话称，“其间也有北韩的对南工作间谍涉嫌贩毒而被捕的事例，但北韩贸易局干部亲自进行贩毒而被捕，这十分罕见。”

丹东的禁毒支队在逮捕林某过程中查获了2千克冰毒。据悉，林某在从新义州前往丹东时将毒品藏在了泡菜盒里。报道称，林某在中朝贸易方面具有很高的权力。Do　Hui-yun称：“林某被捕，揭露了北韩国家机构参与贩毒这项国际犯罪的事实。”对此，韩国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的确得到上述情报，但中国政府并未给予证实。

国际社会对朝鲜贩毒行为的监督、报道和跟踪使得朝鲜的毒品走私越来越难。结果就是朝鲜的毒品走私不得不和邻国的一些犯罪组织组成公司合作贩毒，尤其是俄罗斯、中国、韩国和日本的犯罪组织。

多个国际报告分析认为，由于合作通常是五五分成，朝鲜的毒品利润减少了一半，因此被迫增加交易量。

面对如此局面，一直照顾“中朝友谊”的中国也被迫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打击。

《东亚日报》于2011年7月披露，中韩之间进行了毒品走私防御工作的秘密协作。有解释称，虽然中国在外交问题上一直庇护着朝鲜，但两国的反毒品协作表明，中国再也不能放任不管威胁着东北三省地区的朝鲜产毒品走私问题了。

该报引用外交消息通报称："中国十分愤怒，中国认为从去年开始朝鲜产毒品问题更加严重。"中国当局在强调毒品防御工作时，虽然没有提到"朝鲜产"这一词，但实际上针对的是朝鲜产毒品。

在朝鲜活动的韩国民间团体"好朋友"则表示，由于朝鲜产的大部分毒品走私到中国，中国一方面严厉打击流入境内的毒品，一方面也要求朝鲜严厉打击国内的制毒贩毒行为。朝鲜并不希望毒品成为两国的外交问题，并于去年秋天捣毁了3个制毒、贩毒团伙。

DAILY报道称，由于朝鲜产毒品大量流入中国，中国政府指认咸兴的兴南制药厂为毒品生产工厂，要求朝鲜政府关闭工厂。据悉朝鲜当局接受了这一要求，部分关闭了兴南制药工厂的实验室和工厂。

事实上，早在2005年，北京朝阳区检察院毒品专案组甚至向媒体公开点名批评朝鲜："2005年上半年，朝阳区检察院受理的毒品案件中有3起案件涉嫌跨国贩毒（海洛因和冰毒），这些案件涉毒数量巨大，每宗交易数量都在1000克以上。犯罪分子通过与朝鲜境内的贩毒分子相勾结，将从朝鲜地下加工厂生产的毒品，通过吉林省延吉市偷运至境内然后再运往全国各地贩卖。"

这一罕见的公开批评，被认为是尽管大陆政府尽量隐忍，执法部门却早已对朝鲜无法容忍。

(实习生汪家玮、姚雪鹏对此文有贡献)



金氏孤儿

□ 记者 黄章晋 周宇 段宇宏

12月20日、21日连续两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分批赴朝鲜大使馆吊唁。此间中国驻朝鲜大使刘洪才夫妇率驻朝鲜大使馆全体馆员前往锦绣山纪念宫，向金正日灵柩敬献的花圈，也是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名义。

在世界各国对是否、如何吊唁金正日犹豫不决之时，中国最高领导层如此高规格吊唁金正日，显示了中国对朝鲜及其继承体制的鼎力支持。

此前中国方面的唁电也是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

尽管与金日成去世时中国高层领导除以集体名义外，还纷纷以个人名义发表唁电或表达哀思相比，此次中国吊唁已经平和了许多，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金正恩继承和领导人地位的明确支持。

“我们相信，朝鲜人民必将继承金正日同志的遗志，紧密团结在朝鲜劳动党的周围，在金正恩同志领导下，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实现朝鲜半岛的持久和平继续前进。”

　　中国已经明确表达支持，但朝鲜国内的局势却复杂得多。金正日突然去世，让来不及全面接管父亲权力的金正恩，猝然站到前台。父亲占据的一大堆职位，没有任何班底的金正恩能否全部揽下？

内阁中，是叔伯甚至爷爷辈重臣环伺，家族中，上有金正日的兄弟姐妹，同辈中有被放逐的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

金正恩这位世界唯一的“80后”元首，能否掌控全世界危机最深重的国家？金正日临终托孤的顾命大臣，是否会同心尽力辅佐？金正恩能否重现父亲的绝对权威？



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和金正恩（第三排右）访问平壤首家大型超市“光复地区商业中心”。这是金正日生前最后一次在媒体曝光。

“我想，你会在2012年看到金正日的某个孩子成为接班人。”

2004年，前苏联驻朝鲜外交官托卡琴科在被问及金正日政权是否稳固时，他无意中的俏皮回答竟变成惊人预言。

2011年12月19日，朝鲜官方在公布金正日两天前去世的消息时，明确宣布金正恩将成为接班人。然而，这位朝鲜第三代领导人的名字，朝鲜普通百姓是2009年才开始隐约听到。作为接班人的必要宣传，还只刚刚开始，通向权力顶峰的历练之路，更是不曾及时展开。

金正日来不及培养接班人便猝然离世，危机四伏的朝鲜，比任何时候都充满悬疑。

“八零后”接班人

准确年龄依然成谜的金正恩，即使按生于1982年的官方说法也未满30岁。他不但是史上最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亦是二战以来最年轻的领导人之一。

据朝鲜官方说法，金正日是于12月17日乘坐列车视察工作期间，因过于劳累引发心脏病而去世。但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元世勋事后透露，根据美国间谍卫星的侦查，金正日死前那段时间，他的专列并未外出，始终停留在金正日21号官邸附近的平壤龙城车站。

尽管外间早已判断金正日健康恶化，但其去世依然让朝鲜猝不及防，以至于拖了两天才正式公布金正日去世的消息。

金正日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只有排名居首的金正恩被冠以“同志”头衔，其他人都只列姓名。这与1994年金日成去世时，金正日担任“治丧委员会委员长”情况相似。

12月22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发表社论，首次正式提及金正日遗训。社论称，金正恩是朝鲜主体革命的伟大继承者，朝鲜党、军队、人民的卓越领导者。“金正恩的领导是继承完成主体革命事业的决定性保障。我们要紧密团结、团结、再团结在伟大的金正恩同志的周围，忠诚地接受他的领导。”

但金正恩第一次单独行使权力，是公布金正日死讯的同时，向全军下达要求停止训练并立即归队的《金正恩大将命令1号》，与乃父金正日在接班之前就以其个人名义下达命令相比，迟了将近20年。

过于年轻的金正恩被匆忙推上接班人大位，是因为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培养失败不得已的结果。金正日刚刚接班第二年的1995年，金正男就被作为接班人培养：24岁被封为大将，27岁负责国家公共安全，继而主管宣传。但其行为过于恣肆放纵，屡在资本主义腐朽世界流连忘返，终因2001年持假护照在日本被逮捕，逐渐丧失接班人地位。

金正男被废时，二子金正哲和三子金正恩年龄尚不足二十岁，而比金正恩年龄略大的金正哲性格被认为过于柔弱，不适合当领导人。这给朝鲜选择接班人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因为金日成与金正日父子年龄只差29岁，而金正日与金正恩的年龄则相差40岁以上。

年轻时好酒的金正日，早早就显示出健康不佳的迹象。培养二子三子做接班人，很可能时间来不及，这也是虽然金正男事故不断，金正日

却迟迟无法确定新的继承人的原因。当金正恩最终被确定接班时，对自己寿命有不祥预期的金正日，已无法让金正恩复制自己当年的培养路线。在金正恩被明确为接班人的两年来，对金正恩偶像化，以及向群臣托孤的速度明显加快。

据韩国统一部的统计，从金正恩正式亮相起，健康状况欠佳的金正日共参加了148次公开活动。金正恩以现场指导的随行人员身份参加了134次。金正日高密度地携子巡视，既是增加金正恩的曝光率，亦是明确托孤，但亦令金正日操劳过度，无疑加速了他的死亡。

据《金融时报》报道，韩国东西大学朝鲜意识形态专家布赖恩•迈尔斯(Brian Myers)表示，官方表述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将是对这位“年轻将军”军事功绩的描写。这就带来了一个战略风险，因为金正恩可能会感到，自己的作为必须要配得上宣传赋予他的军事功绩。

虽然金正恩的真实形象为外界所知仅有一年时间，以致外界误将金正日视察时，将他身边唯一一位体态丰满的年轻人当成了金正恩。但金正恩在注重血统的朝鲜，自有其外形上的独特优势，他的体态比金正日更像爷爷金日成。

朝鲜官方媒体披露，金正恩出生在朝鲜文明圣地白头山的山坡上。这使他与父亲有了关键的相似之处——尽管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记录，金正日实际出生在西伯利亚的哈巴罗夫斯克。

在形象设计上，金正恩的发型都改成了五十年代金日成的发型——如今在朝鲜被称为“年轻”或“雄心壮志”发型。动作上，当金正恩第一次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以左手不动、用右手击掌的方式鼓掌，被认为“和父亲金正日相似”。

在宣传其天才上，朝鲜官方延续了其特有传统：毕业于金日成军事综合大学炮兵学科的金正恩，武的方面不但是炮兵之神、3岁会打枪的神枪手，还是卓越的战略家；文的方面，不但会写诗，还掌握7国外语等。

在权力交接上，2010年9月，从未参与军队的金正恩被授予“人民军大将”称号。军职最终成为金正恩个人权力体系的切入点。此后又迅速为其专设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是金正日），成为军方二把手。从金正恩陪同金正日出席活动看，其中41次(占整体视察30.6%)视察军队和安全机构，所占比率最高。外界分析认为，在极短的时间内，金正恩掌握了国家安全保卫部、人民保安部、军侦察总局等公安机关并获得忠诚。

2010年10月，朝鲜劳动党建党65周年阅兵式上，金正恩排名在金正日和其他3名政治局常委（金永南、崔永林、李英浩）之后。算上未出场的另一名政治局常委赵明禄（已故，前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身任劳动党中央军委会副委员长的金正恩当时排名第六。

一个月后的赵明禄葬礼上，国家葬仪委员会名单上，金正恩排名已紧随金正日之后。而2011年9月建国纪念日上，金正恩则位列金正日、金永南之后。而金正日辞世前视察朝鲜首家大型超市的照片中，紧随其后的三人就是金正恩、金敬姬（金正日的妹妹）和张成泽（金正日妹夫）。托孤之情，溢于言表。

未完成的交接班

当年，金正日接过金日成的权力时，用了20多年的漫长时光。而不到30岁的金正恩，走完这段路，仅用了2年时间。外界对金正恩政权稳定性的怀疑，恰在名义上完成最高权力交接的金正恩，事实上是一个没有任何班底的领袖。



2011年9月11日，金正日携金正恩（右）视察位于平壤的Mokran视频公司。

相比之下，金正日虽然在1994年金日成去世后才正式成为最高领袖，但早在此前的1985年，金日成就在党内高层内部宣称，金正日是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因为此时金正日已完全掌握实权，朝鲜各重要岗位，都已由金正日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人马替换了金日成的人马。

金正日公开被作为接班人培养始于1972年。这年60岁的金日成在组织上早已完成了对党内延安派、莫斯科派、国内派、甲山派的彻底清洗，各要津完全是自己游击队时期的人马，在个人宣传上，系统性地完成了对其家族延续三代人的革命血统的神性塑造。

掌握绝对权威的金日成，其继承权已注定要落在家族手中。1974年，金正日在朝鲜高层内部被明确为接班人，此前位居第六的金日成的弟弟金英柱迅速退出权力舞台。被确定为接班人的金正日，先后主管过宣传部门、组织部门，最后开始接手情报系统和军队系统。其接班顺序，掌握权力先于宣传造势，循序渐进，稳打稳扎。

1975年，朝鲜发起名为“三大革命运动”的建设活动。由金正日一手操办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在朝鲜已有的权力体系之外，又独立地设置了一套平行的权力机构。它构成了金正日的班底。其后，又通过“三大运动领导小组”向各基层权力机构派驻官员，悄然完成了金正日人马的权力布局。

进入1980年代，金日成游击队时代的亲信元老，虽仍居高位，但实权已逐渐掌控在金正日培养的人马手中。这种前代元老占据名义高位的情形，一直延续到2000年之后。

对军权的掌握，则是通过197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朝鲜在军事冲突、政治刺杀、制造爆炸、启动核武器开发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来确立其绝对权威的。与金正恩临时被包装成若干英雄事迹的组织者不同，这些事件的直接指挥者完全是金正日本人。

在父子交接班的过程中，金正日的一项巨大贡献不能不提：金正日主管宣传和文化部门期间，这位热爱文艺的天才亲手将金日成家族塑造成一个连接了民族神性图腾与革命神性图腾的特殊家族。既然金氏是“朝鲜近代史上为国家和民族勇于奉献一切的、最爱国的革命家庭”，自然，其最高权力不但可以传给第二代，还应当往第三代一直传下去。

金日成与金正日的权力交接过程中，唯一使金正日接班不利的因素在于，父子权力相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例，亦与马列主义学说不容。

1980年10月10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对外公开露面的金正日，并未如外界事先猜想直接当选为总书记，而是在会议结束一个月后，在党内悄悄宣布金正日为接班人。

当时东欧国家普遍认为，金正日未能以公开程序接过最高权力，原因在于中国的明确反对。朝鲜党代会前夕，《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虽然所指模糊，但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这不符合马列主义原则。

时移世易，中国对朝鲜的权力交接问题态度已明显有别。据韩国《中央日报》称，金正日去世原因被确定后，朝鲜官方第一时间即将消息通报给中国。对今日的中国来说，朝鲜局势稳定与否，最直接的冲击对象是中国，而朝鲜稳定与否，则视乎金正恩在名义上接班后，能否真正掌握权力。

顾命重臣

曾为金正日培植人马的“三大革命小组”，在金日成逝世后，便基本消失活动。



1982年9月，金正日与父亲金日成试用新型农业机械。

金正日准备培养接班人时，“三大革命小组”又于2001年活跃起来。但它已注定无法发挥金正日当年接班时的神效，因为被确定为接班人的金正男接二连三在国际上丢尽了金正日的脸面，这台一时找不到服务对象的机器便逐渐停止运转。等到金正恩被确定接班时，已时日无多，只能由金正日直接出手帮金正恩打造班底。

近年来，朝鲜高层人事变动，尤其是部分人物异军突起，很容易被解读为是金正日在为金正恩培养班底。以2011年春金正日视察军队时陪同情况看，金正恩、金敬姬（金正日的妹妹，劳动党轻工业部长）、崔龙海（劳动党秘书、金日成的战友崔贤之子）陪同较多。此三人在去年9月均被授予“大将”称号，瞬间与总参谋部作战局长这样的军界元老平起平坐。实际上三人都从未在军队服役过。再加上张成泽，金正日家族成员和近臣将是金正恩的重要依靠对象。

在军队系统，金正日为金正恩继承体制指定了人民武力部长金永春、总参谋长李英浩、总政治局第一副局长金正阁、总政治局组织负责副局长金元鸿、国家安全保卫部副部长禹东侧等为权力精英。地位跃升最快的是李英浩，他不仅晋升为次帅，还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会副委员长和中央委员长。



1988年8月，金正日在茂山开采现场视察，并详细指出应该如何提高铁矿石产量。



1979年3月，金正日视察《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电影拍摄现场。

为让金正恩接班后顾命大臣有所忌惮，金正日不但让金正恩接过自己担任国家安全保卫部部长一职，还对情报机关重新洗牌并大幅提升其地位。国家安全保卫部第一副部长禹东侧和保卫部政治局长金昌涉晋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禹东侧还被提拔上将。

在权力交接之前的重要时刻，情报机关的清洗已成朝鲜常态。为金正恩保驾护航的禹东侧，前任是Ryu Gyeong，在今年被清洗，而曾辅佐金正日登基的原保卫部部长Kim Byung-ha在1983年被彻底清洗。除国

家安全保卫部，人民保安部今年上半年也有重大人事变动。原国防委员会行政局长李明洙接任人民保安部部长。李明洙经常陪同金正日视察，被认为是其重要亲信。至此，两大情报系统或已安插完毕。

截至2011年9月20日，金正恩今年在朝鲜媒体中公开出现了61次。陪同出现最多的是张成泽的51次，其次是李英浩、金正觉（总政治局第一局长）各36次，其后是周奎昌（党机械工业部长，党中央军事委员，32次）和崔龙海（28次）。此外，国家安全保卫部第一副部长禹东侧、保卫司令员金元鸿、人民保安部部长李明洙也时常陪同。

可以说，金正日一年多时间内下了一盘很大的棋：以李英浩、金永春为代表的军方，以金敬姬、张成泽为代表的亲友团，以金永南、崔永林为代表的行政机构，以及一直由金氏父子控制的情报机构——上述力量构成拱卫金正恩的基本盘。

但问题是，这些金正恩的长辈无一是金正恩亲自培养提拔，其忠诚是否有效延及金正恩？尤其是亲贵强人张成泽的几起几落值得玩味。

据日本《每日新闻》12月22日分析，未来朝鲜可能采集体领导，名义上是以金正恩为首，但金正恩必须与其监护人、姑丈张成泽及军方共享权力。《每日新闻》认为，一向和中国关系良好的张成泽统掌军权，也同样掌握了来自中国的粮食援助管道，张成泽将成为朝鲜唯一同时掌握粮食和枪杆子的人物，未来张成泽是否甘愿交出实权令人怀疑。

曾长期掌管过人事组织和政法系统的张成泽，在金正日时代一直被视为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除了其与金正日的亲戚关系外，其大哥张成宇、二哥张成吉均曾在军界掌握过重权。由于张成泽长期担任组织指导部的第一副部长，拥有广泛势力。以至于美国在朝鲜核危机时，曾设想若无法和平解决，不如肉体消灭金正日，建立一个以张成泽和张成吉兄弟为核心权力体制。

或许是美、韩一厢情愿的猜测，或是张成泽本人的桀骜不驯引起金正日疑惧，2003年7月以后，张成泽就从公共视野中彻底消失。内部传言称，张成泽因“宗派问题”和“滥用权力问题”被查处。随后，被认为是张成泽人马的宣传、外贸、安保、体育的负责人相继丢职，被审查的张成泽系列高官大约有80余人。

先帝剪除权臣羽翼，将之贬至远方；新帝恩复其位，以降伏其心。这种传统宫廷政治，在张成泽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主少国疑

按金正日惯例，金正恩正式接任后必须进行一次清洗，所有可能威胁金正恩的人物都必须隔离、调走甚至消灭掉。但29岁的金正恩如非真的是朝鲜宣传中的天才，不但清洗长辈们非其所能，而且他们如今正是金正恩的依靠。

朝鲜体制下，今日高层早已是利益共同体，团结一致维护现有专制体制问题不大。但如果有野心、不愿忠于一个年轻人、不愿再终日生活在被清洗的阴影之下，或是路线斗争，都有可能挑战金正恩的统治地位。由于权力并非金正恩所赐，不同权力集团推出大家都能接受、感到安全的代理人并非没有可能。

虽然金正日为金正恩留下了一个对高层官员严密而叠床架屋的相互监视、制约的体系，但在金正日身后，失去了绝对权威的主人，这一机制是否仍能像以前一样高效运转值得怀疑。韩国统一研究院报告也认为："金正日死后朝鲜有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等权力领导层的变动、居民骚乱和暴动、大屠杀、难民潮等剧变状态。"

统一研究院《统一大计探索研究》报告书中，将金正日世代朝鲜的权力结构划分为：世袭、军队为中心的集体领导体制、军队核心人物力压其他后独揽大权等。报告书还预测："若政治精英之间无法形成权力结构的共识，就很有可能引发剧变。"

报告认为，在权力交接尚未稳定之前，一旦金正日变故，"金正日的直系家属将遭到排挤，很有可能形成以国防委员会为中心的集体领导体制或以党为中心的指挥体系，权力层内部的矛盾和明争暗斗将进一步加剧。"

顾命大臣中，张成泽被认为是最有能力挑战金正恩的人。尽管几次起落，且部属遭清洗，张成泽被认为依然有可靠的亲信班底，如劳动党书记崔龙海、党部长李明洙、平壤市责任书记文耿德、驻华大使池在龙等在2010年的党代会上大举进入中央政治舞台。

据韩国情报当局的了解，目前进驻中国的朝鲜贸易机构，多数负责人都被更换为张成泽系统的人士，从业人员们也正在急于联线张成泽，朝鲜内部的财路显然正集中于张成泽。去年张成泽当上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对于军队内部人脉相对薄弱的他而言，算是找到了扩大影响力的基础。作为劳动党行政部长，他负责对国家保卫部、人民保安省、检察院直接领导。

也有评价认为，张成泽是一个事理分明和冷静的人。叛逃的朝鲜高官黄长烨曾表示："处决第六军团叛乱事件主谋时，是他亲自开枪处决了

军团政委等核心主谋。他是一个细致、冷静的人。”

另一位不得不防的人物是人民武力部长金永春。金正恩就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之后，金永春的权力被架空，但权力欲望强烈的金永春可能会寻找新权力中心，牵制金正恩。甚至有人分析说，张成泽可能和军方联手拥立新领导人。

撇开军界强人不谈，近观金氏家族内部，姑姑金敬姬（劳动党轻工业部部长、大将）也值得一提。据传夫妻俩很早就分居；婚姻虽名存实亡，但政治利益让两人互相牵制。张成泽夫妇到底是金正恩的靠山还是威胁，也难以判断。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刘德海指出，金正恩能否稳定朝鲜内部的政局，关键就是他和目前主管国政的姑姑金敬姬、姑丈张成泽，三方之间的关系。

《每日新闻》则分析称，金正恩为制衡，可能拉拢父亲生前最后枕边人金玉，对抗金敬姬和张成泽。现年47岁的金玉，金正日2008年中风时，她一直守在床边，今年更陪同金正日出访中国和俄罗斯，对金正日的决策有一定的影响力。

弱主强臣，未来朝鲜政治架构如何运行？韩国媒体普遍认为，金正恩也会像当年金正日守孝三年进行“遗训统治”。以所谓“金正日遗训”作为统治基础。果真如此，这三年到底是金正恩的机会，还是竞争对手的机会，还很难说。

目前，金正恩的主要职位仅有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正日生前担任的一大堆职务正等待他逐个拿下：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党总书记、最高司令官、政治局常务委员等。如果不能顺利全部继承，很可能意味着分权的出现。

韩国对朝鲜问题专家郑成长则分析称，如果金正恩能效法金正日当年，将金日成拥戴为“永远的主席”并废除主席职务，金正恩可将金正日拥戴为“永远的国防委员长”并解散国防委员会。如此，金正恩就不必夺取此职，而是强化已经到手的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取而代之。

由于夺取党、政、军所有权力实在路途艰难，尽管至今权力交接平稳，目前更多的分析认为未来集体领导、权力分裂后互相制衡的可能性较大。韩国国家情报院12月20日报告认为，金正恩正式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前，朝鲜将成立以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为中心的过渡统治机构，解决当前的国家大事。

金正恩被确定接班人来得太晚，宣传和造神行动来得太迟，即使今

天，他在朝鲜百姓面前也只算混了一个脸熟。好在，朝鲜普通百姓大多不知道金正日之外的其他领导人，也对金正日家庭的其他成员一无所知。

尽管金正日去世后，朝鲜人民在公开场合，一边熟练地表现得悲痛欲绝，一边熟练地对金正恩表达忠诚，但在私下里，对官方才发起的金正恩造神宣传多有质疑和不屑。或许因为这个如此年轻的“八零后”，实在与神话对不上号。



沉重的遗产

金正恩从父亲那里接受的不仅是权力，更是沉重的负担。对一个年龄不满三十、缺少任何实际历练的年轻人，他面临的危机考验远远多于自己的父亲。

□　记者　周宇　黄章晋

梦想中断

2012年，原本将是朝鲜极为热闹的一年。它不仅是金日成诞辰100周年纪念，也是朝鲜宣布建成“强盛大国”的时间。这两件大事，不但是强化朝鲜体制的催化剂，也成为宣传包装金正恩非凡功勋的素材，因为这些成就最终是在“金正恩的领导下”完成的。

按照朝鲜事前的描述，“强盛大国”除了各种无法用物质或指标衡量的朝鲜式精神口号外，一个最重要的实体性目标是为科技工作者、教师和优秀青年提供总数多达10万套的新住宅。

2010年初，《凤凰周刊》记者赴朝鲜采访时，确实发现平壤市区出现少量崭新的规划整齐的小区。但据韩国对朝网站Daily　NK最新报道，已经建成的住宅项目，除万寿台地区外，其他地区的住宅因建材、水泥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令住户极为不满，民间私下流传各种关于它的讽刺段子。

由于经济持续恶化，“强盛大国”的配套硬件所需的投资实在难以为

继，朝鲜官方自2011年7月起在对外宣传中，已悄悄放弃“强盛大国”字眼，而改为稍显低调的“强盛国家”。即便如此，“强盛国家”在朝鲜宣传机器中出现的频率较以往也大幅度降低。

对经济未见好转、粮食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朝鲜来说，无论是金日成百年纪念的大规模庆典，还是“强盛大国”的宏伟目标，普通老百姓可以分到一份额外福利的机会难得几回。但对朝鲜政府来说，则意味着巨大的花销。以朝鲜目前的处境，这些宏大的愿景或已无力承受。

金正日的突然去世，给朝鲜官方提供了摆脱困境的良好机会，也为金正恩留下了缓冲余地：因为金正恩在为父亲服丧期间，不宜大规模宣传“强盛大国”，借此一切欢庆的铺张活动都可以终止。

严峻的考验

为积累宣传金正恩主政功绩的素材和树立权威，朝鲜近两年来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民间的秩序重整动作。但这些举动不但均遭失败，而且令朝鲜政府遭遇极大的民意反感。

2009年年底推出的货币改革就被普遍认为是准备计入金正恩功劳的一项重大改革。货币改革的实质，是以金融手段进行国民财富再分配的举措。其打击和劫夺的对象，是朝鲜地下经济的参与者，获利者将是在体制内的干部和职工。

由于朝鲜经济多年来实质上已然崩溃，绝大多数居民从计划体制分配到的生活资料已无法维持生计，无力负担国民基本生活所需的朝鲜政府被迫默许地下黑市的存在。今天，除少数特权家庭，绝大部分朝鲜居民的经济生活都卷入地下经济的体系中。

虽未获得官方正式认可，但被默许存在的地下市场经济发展运行到今天，已有相当规模。这意味着朝鲜很大一部分经济体和财富不在政府手中掌控，也使处处缺钱的官方不可能没有想法。如果采取强制征收实物，维持朝鲜人日常生活的地下经济将彻底不存在。理论上，以新币换旧币，银行存款只可限额兑换的方式，不但要温和得多，而且可起到一次均贫富的神效。但在实际操作中，它直接导致朝鲜地下经济休克，国民日常生计无法维系，反而“人为”制造了一场新的饥荒。



2011年10月5日傍晚，平壤市中心某处被灯光照亮的金日成像。

这个精心准备的改革被迫草草收场，甚至令朝鲜高层多年来罕见地被迫向民间道歉。最终，朝鲜前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部长朴南基承担了货币改革失败的罪责——“作为大地主的儿子，潜入革命队伍，蓄意置国家经济于死地”，并在平壤附近射击场被枪决。

货币改革失败后，朝鲜国境警备队突然遭到大规模整肃和严厉清洗——他们纪律涣散使得朝鲜饥民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仅在2011年，就有至少三次以金正恩名义进行的边界审查，此类审查集中于检查边防军。

与此同时，对边境地区居民们的监管体系也被大幅加强。有消息人士向本刊记者介绍，在金正恩的指示下，原来的“五户担当制”被改为“三户担当制”——“相互监督别的家庭的人口是否还在一起生活，一旦有人失踪或出现陌生人，一定要立即申报给保安员、人民班长。”



2011年9月29日，洪水和台风袭击朝鲜黄海南道，该地的合作农场经理出示受损的农作物。

金正恩欧洲的求学经历，一度让外间部分人认为，或许他有较其父更为开明的施政思路，但事实上完全相反。金正恩对边境的严防控管，唯一的收获，就是在民间留下了更为冷酷的印象，这对树立其权威而言或有好处。

被当成金正恩功勋宣传的其他事件，譬如延坪岛炮战，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朝鲜的压力更为紧张，它使得想在外界获得中国之外的援助变得愈发困难。

自货币改革以来，朝鲜各地饿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据外界推测，2012年春，朝鲜的粮食短缺问题将变得再度严峻。官方只能重复将努力实现金日成60年前要让人民吃上米饭喝上肉汤的许诺。

失控的社会

尽管金正恩大幅加强了陆路边界的控制。但脱北者似乎并未减少，海上脱北者创新高。2009年利用海上途径进入韩国的脱北事件只发生了一次(11人)，2010年西海发生了三次(3人)，东海发生了两次(6人)。到2011年11月初，海上脱逃者增至73名。

朝鲜经济的崩溃一个恶果是社会的日渐失控。

首先是居民生存对体制的依赖日益削弱，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从控制严密的体制中游离出来。一旦离开体制，对居民思想观念的控制将变得极为困难。虽然在增强社会控制上，朝鲜政府不断推出亡羊补牢的举

措，但贫困导致基层政权抵抗腐蚀的能力大幅降低。控制力削弱已是无法逆转的趋势。

脱北者本身就是基层政权和军队被腐蚀的产物。对被抓获的越境中国的脱北者，朝鲜以往采取严酷的惩罚措施，但随着脱北者现象益发严重和常态化，惩罚力度大为削弱，普通百姓的恐惧感逐渐降低。

对居民控制力日益削弱带来的一个恶果，则是信息失控。尽管朝鲜国民大部分仍被“冻结”在各自村庄和城市，是举世罕见的信息孤岛。但伴随地下经济的人口流动，官方不喜欢的信息，流动性和传播性愈发增强。通过脱北者，朝鲜百姓多少知道，在这片荒土之外还有一个富足世界。

手机和其他现代传播工具流入朝鲜也极大地增大了信息控制的难度。以往不可想象的朝鲜线民，成为境外媒体和情报机关渗入朝鲜的感官。

民间对政府急剧增长的不满，也日渐公开化。以往朝鲜居民只在私下表达不满，但在如今，遇见民间口头发泄牢骚和不满，负责基层控制的官员都不再像以往如临大敌地将其绳之以法，只是警告其不要乱说，因为大批人被关押将造成沉重的国家负担。货币改革期间民间不满达到顶峰，局部地方发生饥民抢劫运粮车而与押运军人发生冲突的严重事件。有人甚至公开说，金正恩比其父更为歹毒。

官方对金正恩的宣传包装，在民间很难收到成效。刻意模仿爷爷金日成的金正恩，在民间有时被称为“什么都不知道的不懂事的毛孩子”、“肥熊”或“猪”。广播宣传中，金正恩是炮兵天才或“创造出每公顷收获15吨水稻的奇迹”之类的神奇事迹，在民间多半会派生出挖苦讽刺的段子。

《凤凰周刊》记者在朝鲜境内行动高度受限的采访中，能感知在朝鲜民间，抱怨金日成、金正日父子的现象存在良久。近年来，随着朝鲜内外困境的加剧，焚烧金氏家人的照片，悄悄张贴诅咒文字的现象，亦不鲜见。有时，这些零星反体制活动的图像也会被传到境外。

近十年来，朝鲜军人叛逃出走事件明显呈上升趋势，这是最能体现其控制力大幅下降的指针。12月14日，Daily NK引述中朝边境相关人士的话称，11月底8名朝鲜武装军人越境进入中国，其中2人在过江时被朝鲜边防部队打死，另外6人成功逃脱。该相关人士还透露，事发后中国立即加强对当地的盘查，朝鲜方面也派出数十名国家保卫部人员到丹东进行搜捕，并加强对韩国人聚居处的监视。虽然该报道未能拿出任何证

据，但韩国主要媒体都进行了大幅转载。

金正日去世消息传出当天，位于北京的朝鲜餐厅海棠花门口，两个朝鲜服务员抱头痛哭，撕心裂肺的声音大到“像假的一样”。

而从金正日逝世后朝鲜人的反应看，对金家的忠诚度明显下滑。综合韩国媒体报道，朝鲜各地传出的消息显示，与金日成逝世时朝鲜民众当场集体坐地痛哭相比，此次民间相互看眼色、无声哭泣甚至摆摆样子、让孩子们痛哭的情况不胜枚举。

改革无望

由于已无法有效控制信息，朝鲜国民普遍期待朝鲜能有中国一样的改革。但中国式的改革开放，于朝鲜体制而言，完全是个逻辑上的悖论。

就外部环境而言，不断制造紧张的国际气氛，是朝鲜强化其体制和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之一。朝鲜1970年代的军费就已占其财政支出的一半，金正日的“先军政治”将这种畸形体制推至极限。朝鲜经济体系虽注定无法长久维持，但1980年代中期即开始陷入困境，军费占用过多社会资源显然是重要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是成功地先后与西方和苏联缓和了紧张关系，使得迅速降低军费支出成为可能。朝鲜的改革是在外界无形压力下的被动行为，它已失去了改革可以获得外部实质鼓励与配合支持的先机。它的安全压力远非中国当年可比，金正日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拼命搞自己的核武计划，就是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安全问题。

就内部环境而言，改革伴随的是政府对社会强制控制力的降低，而且一旦启动就难以逆转。政府对社会控制力的流逝，必须以民间自发的政治认同来补偿。在中国，是以对历史的拨乱反正，换取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

但权力已在家族内传承三代的朝鲜体制，政治合法性和道德资源全部来源于对血统神性的不断强化，拨乱反正和意识形态的转向意味着否定了神圣血统不容置疑的绝对正确和权威，它会从根本上动摇领导人的合法性。

这种先天不足，造成朝鲜的改革不但不能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反而须强化对全社会的强力控制。自新世纪以来，朝鲜政府有限的几次改革试验，无一例外都是强化而非削弱对社会的强力控制。其改革只能在彻

底封闭式的实验区进行，但朝鲜的经济特区不同与中国之处在于，一开始它就是彻底与国内其他部分完全切断联系的封闭独立体系，而在中国则是嫁接过来的有机体。

对朝鲜改革一度寄予厚望的中国民间资本和韩国资本，在近十年的投资尝试中，终于得出一个一致结论：在朝鲜官方动人的招商引资口号之后，是个吞没一切的陷阱。

按照前苏联专家的看法，朝鲜从来不曾有过苏式的科学计划经济，一直都是典型的运动式命令经济。而父子相承体制，要求接班人尽可能有看得见的经济成就，无疑是在强化运动式经济建设的催化剂。从金日成到金正日，运动式的强度在不断递进，虽然金正恩在短短的接班人培养期也发起过一些类似“奋战150天”的运动，但朝鲜今日已几乎丧失了再搞大规模运动式经济建设的资本。

随着金正恩意外提前接班，合理的逻辑是，只要金正恩不断加强其权威，朝鲜改革的希望越发渺茫。作为一个越发无望的经济体，它对外界的依赖只会越来越严重。

最坏的局面

尽管朝鲜的“太阳”没有了，民间的不满在增强，但目前还看不出民间反抗，甚至发生中东式革命的可能性。金氏王朝遗留的严密社会控制，对信息的严格封锁，仍能发挥作用。

11月中旬，一份以身居韩国的524名脱北者为对象实施的“统一认识”问卷调查中，73.7%的脱北者们都回答称朝鲜居民们会顺应继承体系。与此相反，对于“（金正恩继承体制）把其认识成为很严重的问题，不信任政权”，应答率才25.2%。而且有关三代世袭“朝鲜居民们会理所当然地接受”，应答率也达到了38%。

美国具有保守倾向的智囊机构加图研究所（CATO）研究员班多（Doug　Bandow）曾撰文表示，虽然有人希望出现“朝鲜之春”(Korean spring)，但这种概率不高。朝鲜人口大部分都集中在农村，尽管城市中的精英阶层希望改革，但却不希望革命。

不过，对于失去绝对权威的“共主”之后的朝鲜高层斗争，及其带来的动荡，美、韩、俄等相关国家早已作了推演。

2009年2月，美国外交学会(CFR)报告《为朝鲜的剧变做好准备》设想了三种可能的政权更替局面：

“可控的政权更替”：由张成泽，金正日现任夫人金玉，以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金永南等组成看守政府或是集体领导制，政权平稳交接；“斗争的政权更替”：产生激烈继承权斗争，最终会出现的新政权合法性并非来自金正日家族；“失败的政权更替”：类似于1989年的东欧剧变，但会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今年11月俄罗斯最高权威的国家级研究机构“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研究院（IMEMO）”发布的特别报告中，将朝鲜体制崩溃视为既定事实。报告预测，混乱局面日益恶化，到了2020年以后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朝鲜临时政府诞生，同时对朝鲜军队解除武装并使其走上经济现代化之路，从而使朝鲜进入韩国的控制范围。报告认为，“统一韩国”将为俄罗斯企业和政府参与韩国大规模交通、能源、产业项目提供有利环境。

IMEMO预测，2010年为1万亿美元的韩国GDP到2020年将增至1.7万亿美元，2030年激增至2.3万亿美元，人均GDP将达3万美元。据推算，统一韩国的人口届时将达7600万至7700万。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治学教授林德(Jennifer Lind)和兰德研究所的研究伙伴本尼特(Bruce Bennett)近日在美国《国际安全》发表报告称，假设朝鲜解体，在最好的情况下（即朝鲜不进行抵抗），稳定局势需要30万到40万维和人员。其中，控制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需要约3000至10000人；边防巡逻需要2.8万人；解散朝鲜部队和警察需要4.9万人；还需要7000至10000人准备随时打击反抗势力。尽管研究报告没有谈到这样一个维和机构应该由谁来设立，以及如何设立，但林德表示，韩国无疑将发挥主要作用。

韩国统一研究院曾指出，金正日死后朝鲜有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等权力领导层的变动、居民骚乱和暴动、大屠杀、难民潮等剧变状态。

一旦动荡局面发生，大批难民甚至武装人员涌入中国几乎不可避免，且难以阻挡。再加上可能出现的地方军阀，对中国的影响可想而知。本尼特则表示，中国的介入是有益的。“中国不仅跟朝鲜相邻，还离核开发地区非常近。因此，发生紧急情况时也有可能解决问题。”

“朝鲜的崩溃不仅是东亚地区危机的阶段性扩大，还会引发潜在的人道主义费用。因此就算觉得崩溃的危险性小，但（应对这种情况的）计划还是非常重要的。”林德如此说道。

（实习生窦怡平、邹一姣、徐一斐、顾纯对本文亦有贡献）



2011年2月28日，韩国坡州市的临津阁馆内，游客通过望远镜远眺北方。

朝韩如何统一？

南北分治半个多世纪后，巨大的社会落差，使得朝韩统一，在韩国越来越变成仅仅是政治正确，实际上却令人恐惧的问题。而强人金正日去世，金正恩接班，朝韩统一似乎突然有了可能。但朝韩会如何统一，却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 记者 黄章晋 漆菲 □ 特约撰稿员 陈祥

金正日去世，对韩国的震动远甚于当年金日成去世。一方面，强人金正日去世，无法预测素来行为奇异的朝鲜会有何举动，另一方面，危机四伏的朝鲜随时可能崩溃，朝鲜半岛的统一随时会成为可能。

从期待到恐惧

金正日的突然去世，让很多韩国百姓陷入惊喜与恐惧的纠结之中。恐惧不是因为朝鲜行为不可测，而是因为朝韩统一很可能会突然因为朝鲜崩溃而变成现实。



2009年6月3日，朝鲜板门店，一名朝鲜士兵（中）准备从韩国士兵（右前）看守的共同警备区一侧穿过。

自1945年朝鲜南北分治以来，实现朝鲜半岛的南北统一，曾一直是朝鲜民族共同的热切的梦想。但随着1990年代末，朝鲜困境日益严峻，朝鲜半岛可能会因朝鲜崩溃而实现统一时，朝韩统一问题已由热切的民族感情变成一个现实的国家问题。韩国人的心态出现复杂而明显的分化。

南北分治时遭遇家庭离乱之苦的那一代人，是朝鲜半岛统一的热切支持者。但这个老家在北方的群体，从朝鲜战争结束时的1000万人，已下降到今天100万人。他们的凋零，也改变了韩国社会对南北统一的观念。

年轻一代的韩国人，对南北统一的实际态度，实际上可以解读为何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或恐惧朝韩统一。有韩国市民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表示，韩国半数富人反对朝韩统一，理由是它会彻底拖垮韩国经济。他甚至说："韩国人虽然总是说要实现我们的统一梦想，但韩国人想的并不是这样。其实，韩国人谁都不希望统一。"

即使是支持朝韩统一的受访者也承认，多数韩国人内心里其实是恐惧朝韩统一的。有在华韩国学者对本刊记者表示："我们长久以来南北统一不能实现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金正日执政，而是我们没有做好统一的准备。"

形成今日韩国社会恐惧和反对朝韩统一心理的最重要原因，是高昂

的统一代价。

韩国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在2009年3月的舆论调查显示，韩国有49.4%的人本能地认为统一是“我们的愿望”，但又认为，统一费用是个不应承担的负担。同时，约7成的人认为，假如朝韩统一，会让每个韩国国民每年负担费用达到20万韩元。而据专家分析，这个数字很可能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朝韩统一可能产生的惊人代价，极大程度地抵销了素来以民族情绪炽热著称的韩国人的民族统一热望。它造成人人口头说统一、实际内心惧怕统一的奇怪心理。朝韩统一，实际上在韩国社会多少已变成“政治正确”：所有政治力量都不敢公开宣称反对统一，但也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愿意做一点实质性的准备。

韩国一度积极推行的对北“阳光政策”，在被批评为最终效果是养虎遗患之时，亦有分析认为，它实质上是以维持朝鲜体制的继续存在的方式，来逃避朝韩统一的责任。而“朝鲜半岛逐渐统一”这个提法，其实也可认为是反对和恐惧朝韩统一的折中而含蓄的表达。

对比柏林墙倒塌前的岁月，西德从政府到民间对东德同胞的态度和行为，或可认为，朝鲜长期分治，已在南北造就了截然不同的心理共同体意识，朝鲜南北的心理隔膜要远甚于当年的东、西德。

史上最昂贵的统一

柏林墙倒后，西德不得不花费约1.9万亿美元以融合东德。如果韩国统一北方，其代价将远远超过德国统一。二十年前两德统一时，东德虽远落后于西德，但东德好歹是社会主义阵营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西德人均GDP只是东德的3倍，而今天朝鲜的人均GDP只及韩国的5%，国民贫困程度当世罕见。

最直观的差异，同文同种的两国人民，在身材上基本能一眼判断出。朝鲜人现在平均身高是1.58米，韩国人是1.73米，朝鲜人给世界普遍的印象是瘦削、面有菜色，即便是在作为对外橱窗的平壤。与朝鲜接壤的中国边境地区的公安，验尸时将胖瘦和体格大小作为区分中朝人的主要特征。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学者皮特·贝克估计，要让朝鲜达到韩国标准的80%可能需要在30年时间里花费2-5万亿美元，而韩国的全部经济总量约为1万亿。

统一要花费多少钱，是韩国的热门课题，不同研究机构有不同答案。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的报告认为：统一以后，若想使朝鲜国内人均收入提高至3000美元水平，韩国需在10年间投入1570亿美元；若想提高至7000美元水平，韩国需在15年间投入4710亿美元；若想提高至1万美元，韩国需在18年间投入7065亿美元。



2010年12月28日，首尔，反朝抗议者在驻韩美国使馆附近集会，并焚烧朝鲜领导人的画像。

而韩国统一部的统一成本研究结论是，如果2030年南北统一，第一年韩国最少需投入55兆韩元，最多需投入249兆韩元。要是在往后的将近20年的时间里，每年从国内税金抽取0.8%出来作为资金基础，那么在统一后的第一年韩国至少需要追加投入55兆韩元。

兰德公司在2005年发报告称，根据不同的统一方式，以2003年的购买力计算，朝鲜半岛最终统一需要花费500亿到6700亿美元。三星经济研究院则发表报告称，假设2015年南北统一，韩国在接下来的十几年内需要投入546兆韩元。201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朝鲜半岛问题研究员皮特则预想，韩国需在统一以后的30年内投入2000兆到5000兆韩元。

虽然投入是个天文数字，但这些研究报告基本认定韩国在统一后获得的利益比成本更高。朝鲜半岛的矿产资源主要集中在北方，如石墨和菱镁矿储量居世界前列。新增的两千多万人口和半壁江山，都是无价的财产，人口在成为负担的同时，也是劳动力和消费市场。



2010年12月18日，朝韩军事边界线附近，数名“脱北者”与韩国保守派分子利用气球向朝方境内散发反朝传单。

但东西统一迄今已有20年的德国，若其今天的情形可作参考，则上述推论或显得过于乐观。德国统一时，原本认为西部资本将大举进入东部的预期并未出现。东德原有的工业体系在基本全部废弃后，并未迎来大规模投资，反而使德国东部的就业机会大幅减少，最终使得两德统一的代价远远超过了预期。

汉拿院现象

如果朝鲜南北统一，比朝鲜南北物质鸿沟更难抹平的，会是心理鸿沟。

两德统一20年后，西部人与东部人心灵中的柏林墙仍未完成拆除。在西部人看来，在已为统一付出高昂代价后，东部人还要跑来抢夺就业机会和住房，完全无视西部人的巨大牺牲；在东部人看来，西部人普遍心理上带有令人无法忍受的优越感。在发展机会上，绝大部分东部人认为他们处于劣势，有三分之二的东部人认为他们在西部人眼中是二等公民。

即使在今天，认为东西部人彼此有亲近感的人，也只达到四分之一。对曾经的东德，虽然几乎没有人认为它是个好制度，但却有20%的人怀念东德，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融入的落差。两德统一时，东西分治仅45年，而朝鲜南北分治迄今已有66年。朝鲜南北制度差异远远大于当年德国东西部的制度差异，它远不只是在肉体上将朝鲜民族塑造出一眼可见的南北差别。



2003年10月30日，华盛顿，朝鲜著名叛逃者黄长烨在国会山接受媒体采访。

事实上，南北统一的最大问题，是朝鲜人如何融入韩国制度的问题。但脱北者在历尽千辛万苦抵达韩国时，最初脱离苦海的百感交集，很快就会被无法融入和无法适应韩国社会的焦虑所代替。而脱北者在试图进入韩国社会时，无处不在的歧视、刁难，更是加剧了这个群体的苦闷。

为防范北方间谍渗透，脱北者进入韩国后需经过为期三个月的“隔离审查”，在通过反复严格的审查后，再进入专为脱北者设置的“汉拿院”接受了三个月熟悉韩国社会的“统一教育”，期间无法与家人亲友见面。而韩国工作人员的歧视、粗暴和怀疑，不少人将之视为难以忘怀的精神屈辱。

尽管有汉拿院的教育培训，几乎少有朝鲜人能顺利融入韩国社会，为躲避无所不在的歧视，脱北者通常会努力掩饰自己的口音，在被问及来自哪里时，他们多半会以来自中国搪塞。因为韩国社会对来自朝鲜的脱北者最为歧视。

韩国社会曾以近乎疯狂的热情和诚恳迎接这些逃到“自由祖国”的同胞，脱北者的悲惨遭遇亦让韩国全民一撒热泪。但迥异的制度将朝鲜人与韩国人塑造成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他们难以融入韩国社会，亦将自己

视为“朝鲜人”而非“韩国人”。

快速增长的脱北者群体，很快使韩国人“同情疲劳”，而难以融入韩国的脱北者群体开始日渐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尤其令韩国社会愤怒的是，由于韩国政府对每位脱北者都给予一笔高昂的安家费，它诱发了一大批脱北者铤而走险，专门从事“走私”脱北者，以收取安家费分成的生意。

近年来，进入韩国的脱北者呈加速增长趋势，而韩国政府花费在每位脱北者的费用高达1亿韩元，截至2011年，进入韩国的脱北者数量已高达2万余人，由此成为韩国政府日渐沉重的财政负担。

对那些后来的脱北者，迎接他们的早已不是传说中血肉同胞的慷慨盛情，而是完全被视为异邦人的排挤和羞辱。今日韩国社会不少人公开指责脱北者是“抛弃自己祖国的人”、是“无视韩国生活习惯的异邦人”。今日，韩国政府虽未取消补贴政策，但已不再鼓励朝鲜人逃亡韩国。

而朝韩对立，无疑也严重影响了普通韩国人对脱北者的态度。“天安舰”事件后，有脱北者被韩国年轻人围攻辱骂：“就因为你这样的朝鲜家伙，我们的国民才牺牲。”

每个从朝鲜逃出来的脱北者，都知道韩国与朝鲜之间有如天堂地狱的落差，但韩国这个天堂却不属于朝鲜人。无法融入韩国社会的精神折磨，甚至出现了千辛万苦逃离苦海的脱北者，最后又跑回朝鲜，这或许成为世界上最不可理喻的汉拿院现象。

假如朝韩统一，是朝鲜直接并入韩国式的统一。韩国、朝鲜分治60年造就的国民心灵鸿沟，或许是朝鲜民族悲剧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延续，它或许至少要用同样长的时间才能抹平。

中国的决定性因素

极为脆弱的朝鲜，一旦发生政治动荡，极易出现当年阿尔巴尼亚式的社会秩序瓦解式崩溃。如果不分官民集体大逃亡的阿尔巴尼亚式崩溃出现在朝鲜，那么直接遭遇饥民冲击的，只有中国一家。密布地雷的三八线，是屏蔽韩国免遭朝鲜崩溃冲击的保护带。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自身安危的深切担心，中国政府才在近些年来遭遇巨大道德压力指责，同时又不能真正对朝鲜施加影响时，依然不遗余力地支持朝鲜社会维持正常运转，以避免朝鲜崩溃。

尽管金正恩时代，朝鲜的政治稳定随时会被打破。不论朝鲜内部引

发何种洗牌，朝鲜体制的基本性质决定了，无论是体制内何种力量胜出，他们唯一可依赖的外部力量，只有中国。事实上，朝鲜发生政治动荡后，立即出现韩国主导朝韩统一的可能性很小。

如果朝鲜统治力量出现意外变故，而中国又能有效对其施加影响，或许前途越来越逼仄的朝鲜，对各方来说，都有了走出死胡同的全新转机。首先，它可避免南北直接统一对朝韩社会巨大的震荡冲击，其次，过渡性的朝鲜政权，可以导入中国式改革——以经济改革带动社会转型，这可令将来朝鲜半岛的统一过程更为平滑而有弹性。

当然，朝鲜政局平衡被打破，首先意味着社会震荡，这是谁也不愿看到的，尤其对中国更是如此。虽然中朝两国今日意识形态早已相去甚远，但金正日逝世时，中国官方唁电的规格和态度，远比当年金日成去世时要高。这种差异或许真正的意图在于，中方要向世界各方表明维持朝鲜秩序稳定的决心。

在韩国，人们普遍认为，朝鲜半岛能否统一关键取决于中国态度，其次才取决于南北两边的政治意愿。不少韩国人因此认为，如果金正恩政权崩溃，很可能会是中国主动介入，着力帮助朝鲜恢复和建立秩序，以免社会崩盘的悲剧。朝韩统一不会马上出现。

据西方和本港媒体披露，为防止中朝边境出现大批难民的突然冲击，中国官方近年准备了多套紧急方案，不断筹集物资和专项资金以应急需。无论朝鲜局势如何演进，朝韩统一却是历史趋势所在。朝鲜半岛的统一无疑会深刻改变东北亚地区对抗性的紧张格局。

在中央党校学者张琏瑰看来，对中国来说，哪怕统一后的朝鲜半岛，一定会发展同中国的良好关系。韩国经济发展需要中国这个大市场。它最直接的意义，首先是处于停战状态的朝鲜战争正式终结。而朝鲜这个紧张气氛源头的消失，或将使东北亚地区长期的准军事对抗局势不复存在。

但更普遍的大陆学界看法则是，目前南北统一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中国也远远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

北大学者朱锋向本刊指出，中国目前应该做的事情很重要。第一是要帮助朝鲜平稳过渡，这符合中国的利益；第二，朝鲜在实现平稳过渡后，在金正恩的领导下，能真正给这个国家带来希望和美好的未来，能真正把朝鲜的发展摆在首位。

对域外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来说，朝鲜半岛统一意味着其丧失了

驻扎朝鲜半岛的正当理由。朝鲜战争爆发前，驻扎朝鲜半岛的美国人，含外交人员在内，总数仅有500人，今天驻韩美军数量维持在2万8千人左右。

朝鲜战争停战以来，驻韩美军的处境同样尴尬。韩国统一研究院崔春钦曾透露，美国军营、使馆周围常年有韩国民众示威。为此军营规定，美军士兵只有周日可以出军营。尽管如此，韩国社会常抓住美国大兵的错误不放，比如倾倒有毒物质，渗透到地下等。朝鲜统一后，不但美军丧失驻扎理由，韩国社会的压力也会迫使其撤离。

朝鲜南北统一后，对中国产生不良影响的因素，可能是朝鲜半岛统一后民间可能会因为朝鲜遗产困境，指责中国应负历史责任。但相比今天中国受朝鲜连带，无端背负巨大的道德包袱，并非无法接受。

无论韩国人如何看待朝韩统一，由于其事实上并无主导权，从政府到国民均未做好迎接朝韩统一的精神准备。而金正日突然撒手西去，朝鲜这个危机四伏的国家落到了金正恩手中。朝鲜半岛的未来，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玄机。

（郭舜豪、顾纯对本文亦有贡献）

□ 编辑 漆菲 □ 美编 青年



六个“脱北者”的朝鲜秘密生活

芭芭拉·德米克

《我们最幸福》追溯六名朝鲜人超过15年的生活——他们全是寻常的朝鲜平民—恋爱、养家活口、怀抱野心，以及努力求生。一个接一个，他们终于开始怀疑不属于自己的理想，并寻求新的生活。而我们通过他们的心路历程，走进朝鲜心灵的最深处。

《我们最幸福》追溯六名朝鲜人超过15年的生活—在这长达15年以上的时间里，他们遭遇金日成去世、他的儿子金正日在无人挑战下接掌大权，蔓延全国的大饥荒导致至亲接连饿死，单一社会下无法坦诚相待迫使爱人背弃彼此的“朝鲜式时代”。书中的六名主角—他们全是寻常的朝鲜平民—恋爱、养家活口、怀抱野心，以及努力求生。一个接一个，他们终于开始怀疑不属于自己的理想，并寻求新的生活。而我们通过他们的心路历程，走进朝鲜心灵的最深处。

忍受饥饿成为爱国责任

金日成拥有许多信仰者，书中的主人公之一宋熙锡是其中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她是一个工厂工人，四个孩子的母亲，也是朝鲜的模范公民。父亲的死使宋太太获得“祖国解放战争殉难者”子女的血统。平时，宋太太会滔滔不绝地复咏金日成的语录，就连她的日常对话也充斥着这类格言。尤其在训诫顽劣的孩子时，她会说：“忠诚与孝顺是革命分子应该奉行的最高道德。”

宋太太每天必须工作八个小时，下班后还要再花几个小时在工厂礼堂接受意识形态训练。回家时已经晚上十点半，还要料理全家事务。这

样的生活在某些日子会特别辛苦。例如在每周三早上，她必须提早出门参加社会主义妇女联盟的朝会。星期五晚上，她必须进行自我批评。如此认真的工作态度让宋太太自70年代初便开始担任“人民班长”的职务，“因为她急公好义、有组织力、忠诚而且如韩国人所说的善于察言观色。”除了一般的工作情况记录，宋太太还必须汇报任何可疑的活动。

但哪怕如此谨小慎微，她身边的人还是免不了会出错。某次，宋太太的丈夫长博因为“出言不逊”惹上麻烦。让长博惹上麻烦的节目，内容主要是报道一家专门生产雨季雨鞋的工厂。镜头拍摄一群在生产线前面工作极有效率的工人，旁白除了大力赞扬雨鞋的优良品质外，还提出重重数据佐证这家工厂的惊人产量。

“哼，如果有这么多雨鞋，为什么我的孩子一双都拿不到？”长博一边说，一边放声大笑。丈夫未加思索说出的话，竟为他招来祸事。这段话很快被呈报到人民班，而人民班又上报到公安部……经过这次教训，长博在外人面前说话更谨慎，然而他的想法却也越来越不受羁绊。这股怀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浮上心头。渐渐地，所有的怀疑都凝结成全然的不信任。

一直以来，在国家喉舌机构任职的长博比普通民众更有机会接触各种资讯。在他服务的咸镜北道广播公司，他与同事聆听来自外国媒体未经检查的新闻报道。他们的工作就是对这些新闻进行消毒，然后才能让国内民众聆听。处理新闻时，“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韩国的正面消息都要加以轻描淡写。罢工、灾难、暴动、谋杀，只要不是朝鲜的消息，全都要大篇幅地加以报道。”

长博在广播公司有个可信任的好友，跟他一样越来越怀疑政府。每当酒过三巡之后，他们开始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他们全是骗子！”

每当此时，从小叛逆的大女儿玉熙会偷听父亲与朋友的谈话。她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就已经无法像全国民众一样对金日成充满偶像崇拜：只要放学一回家，玉熙马上扯掉少年先锋队的红领巾。长博发现玉熙偷听时，起初是嘘了她几声想打发她走。最后他放弃了，他要玉熙发誓不能说出去，而后才吐露心中的秘密。

渐渐地，随着国家经济每况愈下，忍受饥饿成为一种爱国责任。平壤街头挂起了新的宣传标语，上面写着：“让我们一天吃两餐。”朝鲜电视台放映了一部纪录片，提到有人因为吃了太多米饭而把胃撑破了。

宋太太日后回忆时，已经记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发生的事——1989年、1990年、1991年——她的配给越来越少。1995年，宋太太与丈夫已将家中绝大多数值钱的东西变卖以换取粮食。在电视机之后，他们卖了家里主要的交通工具，一辆二手的日制脚踏车；接着是缝纫机，宋太太家的衣服都是用这台机器缝补的；长博的手表也卖了；就连他们的结婚礼物，一幅东方山水画，也拿去换了粮食。两房的公寓原本对他们来说相当拥挤，现在所有的杂乱全消失了，墙面几乎空了出来，只剩下金氏父子的肖像。

悲剧并不因人妥协而退避。宋太太的婆婆、丈夫和儿子接连因为饥饿而病死。让宋太太最为痛心的是，儿子在自己眼前病死，因为宋太太最终在买药给儿子治病或买一斤玉米中选择了后者。

十年后，宋太太回想时发现，自己认识的在这段期间死去的清津居民都是些“言行一致、单纯而好心的人”——这些人总是最早丧命。幸运的是，女儿玉熙成为第一批离开朝鲜的人，并依靠在卡拉OK挣的钱接出了母亲和两个妹妹。

黑暗中的爱情

采访过程中，很多“脱北者”都会描述，他们是如何学着去喜欢黑暗。在这块黑洞中央，除了数百万人饿死于饥馑外，还有爱情的存在。其中，朝鲜少女美兰和她男友的故事最为人唏嘘与感慨。被邻居密切监视、出身成分属于“敌对阶级”的前韩国士兵之女、幼儿园教师美兰，以及出身于优渥家庭、就读平壤大学、前程似锦的俊相。他们的爱情持续十年以上，他们的约会不在电影院或餐厅，而是两人比肩在黑暗中不断散步。

他们通常在晚饭后见面。一般俊相会花几个钟头等美兰，也许两到三个小时。但这并不要紧，时间在朝鲜相当缓慢。起初，他们沉默地走着，不久就开始低语，而在走出村子之后，他们放松心情，开始正常地对话。他们一直保持一条手臂的距离，直到确定没有人能认出他们为止。

俊相去平壤读书后，他们唯一联系的方式只有书信。但即使是写信也不是件简单的事。书写用纸相当少。国营商店卖的纸是玉米壳做的，如果写得太用力，纸很容易碎。美兰必须向母亲要钱买几张进口纸。而每一次信件往返几乎一个月。

俊相在平壤的体验，使美兰得以一窥遥远的特权世界。她在聆听时

很难不产生欣羡的念头。美兰看到自己的姊姊们因为父亲的背景而无法进一步发展，她对于自己的未来突然一目了然。当俊相聊着他的大学室友时，她越来越感到难过。

为了安慰美兰，俊相做了一件先前从未做过的事：他亲吻了她。这或许算是一种亲吻。其实俊相只不过用嘴唇轻轻拂过美兰的脸颊，完全未碰触她的嘴，但这已比他们先前的身体接触更为亲密。他们已经认识13年，约会了9年，而他们所做的不过是牵手。

这段恋情最终没能修成正果，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两人出身差距太大，而是因为从来不敢与对方分享自己内心对国家社会的真正想法，以及到最后都不敢吐露彼此有的从这个国家出逃的计划。最后，出身卑微的美兰不告而别，竟先一步逃离朝鲜。后来也成功出逃的俊相，多年后最终虽与美兰在韩国重聚，但此时的美兰早已嫁做人妇。



尊敬领袖与憎恨敌人

在朝鲜的教室里，老师经常演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这首歌的曲调平易，每个朝鲜孩子都会唱，就像《一闪一闪亮晶晶》一样。美兰在学生时代也曾唱过这首歌，而且歌词牢记于心：

我们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我们的家在劳动党的怀抱里。

我们亲如手足。

即使火海靠近我们，甜蜜的孩子

毋庸畏惧，

我们的父亲在这里。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无论他们学习数学、科学、阅读、音乐还是艺术，孩子仍被教导要尊敬领袖与憎恨敌人。

初　阶读本故事里的孩子被毒打、被刺刀捅死、被泼强酸或被丢到井里，而迫害这些孩子的恶棍一定是基督教传教士、日本鬼子或美帝国主义杂碎。在一本受欢迎的读本 里，一名男孩因为拒绝帮美国士兵擦皮

鞋而被活活踢死。插图里的美国士兵，鼻子被画成像啄木鸟一样，如同纳粹德国反犹卡通里的犹太人。

在采访中，所有朝鲜民众都非常清楚地记得，当他们得知金日成去世的消息时，自己身在何处与正在做什么。压抑着90年代创伤的人，会突然极为生动而详细地描述他们当天的作息。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强大的震撼把寻常的时间法则与意识全冻结住了。

金日成的死讯宣布后数小时，朝鲜各地民众全聚集到金日成铜像前表达哀悼之意。根据最常被引用的一份数据显示，朝鲜境内伟大领袖的铜像有三万四千余座，每一座 都有忠诚的民众悲伤哭倒在地。一开始是自发性的悲伤，后来却变调成爱国的责任。十天国丧期间，妇女不许化妆或整理头发。饮酒、跳舞与音乐一律禁止。人民班 记录民众前往铜像凭吊的次数以考察他们的忠诚度。每个人都受到监视。他们不只考察行动，也观察脸部表情与声调，以此来判断民众是否诚恳。还有许多人以自杀 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悲痛。这些人从屋顶一跃而下，还有一些人是绝食而死。

美兰在十天国丧期间，每天要去铜像凭吊两次。在她班上有一名五岁小女孩，哭得十分用力，充分证明她的哀痛，美兰却担心她会体力不支。但之后美兰发现这名女孩 偷偷把口水吐在手上，然后往脸上一抹。原来那不是真的泪水。“我妈告诉我，如果我没哭，我就是个坏孩子。”女孩坦白说。

然而，也有看起来“无动于衷”的人，比如宋太 太的女儿玉熙。当房间里每个人都流泪时，玉熙只觉得内心一片空白，不是悲伤，也不是快乐，或许是有点烦躁。她什么也没法想，她只在乎自己正在哀嚎的肚子。 “好了，我要回家准备午饭了。”她对丈夫说。丈夫对她投以嫌恶的眼光。当玉熙离开房间时，丈夫恨恨地说：“你不是人！”

流浪的燕子

孤儿金赫跟在火车站前徘徊的数百名孩子没有两样。朝鲜人称这些孩子是“流浪的燕子”，他们像企鹅一样聚集起来，在火车站寻找食物碎屑。金赫先逃至蒙古，沿着戈壁沙漠前行，然后搭机至韩国。一路艰辛，其间还得通过韩国政府的“拷问”。

跟许多共产国家一样，朝鲜的孤儿院并未严格限制资格，它们也收容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孤儿院如同寄宿学校，能进入孤儿院等于是一项特权。一开始，金赫所在的孤儿院还能让他和哥哥吃顿饱饭。但到了冬天，粮食停止配给。1996年的前三个月，孤儿院死了27名院童。金赫与

哥哥逃课到镇上找东西吃，他们发现镇上的情况不比孤儿院好。

饥饿使金赫成为了一名猎人。他猎捕大老鼠、小老鼠、青蛙与蝌蚪。当青蛙被猎捕一空时，开始捕捉蚱蜢与蝉……有一次，金赫发现一只友善的小流浪狗，摇着尾巴跟着他走进朋友家的院子。金赫关上门，跟朋友一起将狗抓起来丢进装满水的桶里，然后盖上盖子。这只狗足足挣扎了10分钟才死。他们剥掉它的皮，烤来吃。

值得一提的是，在朝鲜，要沦为无家可归的游民并不是那么容易。朝鲜为了掌握人民行踪，费尽苦心建立了一套制度。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住址与工作岗位，你必须根据 这两项条件才能领到配给——如果你离家出走，你就领不到粮食。然而饥荒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没有粮食配给，就没有理由待在固定的住址。这是第一次，朝鲜人民 可以任意在自己的国家游荡。不过，这是一种危险的生活方式。孩子睡觉时要提防其他帮派偷走他们的少许余粮。此外也流传着许多诡异的故事，提到成年人把孩子 当成猎物。不只用来发泄性欲，也当成食物。金赫听说有人对孩子下毒，杀死孩子，大卸八块吃下肚。

金赫首次渡过图们江是在1997年底。那时是干季，河川水位低，但是河水冰冷。当他在冷风中爬上对岸时，身上的衣服已经结冻，硬得像盔甲一样。之后一段时间，金赫定期穿越边境。通过倒卖商品赚了一些外快，使金赫不再需要偷窃。如果他想吃碗面，他会用自己的钱去买。他买了裤子、T恤、蓝色雪衣与胶底运动鞋，让自己看起来不再像个难民。刚过完16岁生日，金赫还是遭到逮捕。保卫部负责调查政治犯罪的便衣警察把金赫带到市中心的公署。警察殴打金赫的全身除了头部，他们希望他保持清醒。

朝鲜刑法把死刑限制在预谋杀人、叛国、恐怖主义、“反国家活动”与“反人民活动”上，但这些定义太宽松，凡是可能冒犯劳动党的活动都可以包括在内。韩国的“脱北者”提到，90年代，通奸、卖淫、拒捕、妨碍社会秩序都会被处死。金赫刚进劳改营时，惧怕其他犯人就像惧怕卫兵一样。他原以为这关着残忍的杀人犯、令人恐惧的暴力犯与强奸犯。事实上，饥饿的附带效果是生理欲望的减少。劳改营里几乎没有性活动，也很少有斗殴事件。

从劳改营出来后，对金赫而言，朝鲜已无任何眷恋的地方。金赫在中国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找到一间教堂，这间教堂由一名韩国商人维持运作。金赫谎称信仰基督进入 这里。一开始他从内心对基督教存疑，但逐渐地，他的态度开始软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当听到低声诵念祈祷文的字句，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安慰。此刻，金赫口　中说的“我们的父

亲”成了上帝而非金日成，他口中的儿子成了耶稣而非金正日。

“我们在监视你，你休想逃”

另一位怀揣深刻信仰的朝鲜女医师金智恩原本对金日成深信不疑，她不仅服从金日成认为医生要志愿为人民服务，无偿加班、治疗病人，还经常自行上山采药、种棉花，最后却惊觉自己被政府列入监控名单，因而信念开始动摇。

金医师在加班从事义工工作时担任党委书记助理，某次整理文件时，注意到木制档案里面有张人名清单。这些人全是医院员工，每个名字旁边附了评论，说明怀疑他们的 原因。绝大多数都与阶级背景有关——父母或祖父母勤跑教堂，前地主的子女，在日朝鲜家庭，在中国有亲戚的人。由于在中国有亲戚，金医师的名字也在清单上。她感到不可思议，她整个人生几乎没有瑕疵。她天生是个完美主义者，事事要求完全合于标准。她总是第一个自愿从事额外的工作，并且参加额外的精神讲话。

更糟的是，金医师开始怀疑自己的确遭到监视。她发现医院的党部官员总是充满兴趣地看着她。两年后，金医师的怀疑获得证实。有一名国家安全探员突然来医院找她，这个人造访的目的是要调查金医师是否计划逃离朝鲜。“为什么我要离开？”她反问。探员举出几个理由：她在中国有亲戚、她的婚姻破裂、医院停止支薪。“你听好！我们在监视你。你休想逃！”探员临走前恶狠狠地丢下这句话。

金医师当初并没有想过要叛逃到韩国。当她在1999年 渡过图门江时，她唯一的目的是中国。她的计划是根据父亲临终前草草写下的亲戚姓名来找寻亲戚下落。她想，亲戚或多或少会帮她找份工作。她可以吃饱喝足恢复 体力，然后存够钱之后再把儿子接来。尽管曾经遭受痛苦的饥饿以及与劳动党出现龃龉，她仍认为自己对国家有亏欠，因为国家曾资助自己受教育。

但当她到达中国不久后，决心就动摇了。经过一个农院时，金医师看到地上放着一个装了食物的小铁碗。再仔细一看——那是米饭，不仅是白米饭，里面还拌着肉片。金医师已经不记得上次吃白米饭是什么时候的事。当金医师听到狗叫时，一下子全明白了。就在前一刻，金医师还有点希望中国跟朝鲜一样穷，她仍愿意相信自己的国家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但现在她无法否认眼前出现的这一幕：中国的狗吃得比朝鲜的医师好。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金医师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而这些发现加深了她的愤怒，她惊觉自己过去被灌输的全是谎言。她知道的事情每一件都促使她离祖国以及她曾坚守的信念越来越远，直到不可能回头为止。

抵达彼岸，幸福还是恐慌？

初抵韩国的宋太太每天早晨听到电锅的哔哔声，通知早饭已经煮好时，总对这种科技感到惊异。虽然她从抵达这间屋子以来还没出过门，但她觉得自己光是进厨房与打开电视就已像是做了一场巨大的探险。

1999年，韩国在首尔南方50英里之处，开了名为“统一院”的学校。这座中心结合商业学校与过渡之家的功能，教导朝鲜人如何在韩国自力更生。宋太太离开统一院时，有时会因为兴奋而感到晕眩。她看不懂商场外侧屏幕上绝大多数的广告内容。HDTV、MTV、MP3、MP4、XP、BBQ——看起来像是无法破解的密码。但宋太太觉得最神秘的还是韩国人，他们看起来像是另一个种族……最令宋太太震惊的是，她看到男孩与女孩在大街上挽臂而行，甚至接吻。

跟许多“脱北者”一样，金赫兴高采烈的情绪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他曾经待过监狱营，韩国政府很担心“脱北者”中夹带着罪犯，因此遭受的询问特别严厉。之后， 正当他以为自己自由的时候，他又被送到统一院一个月，并一直受到韩国当局的怀疑。这种持续监禁的状态令金赫无法忍受。金赫的个性在朝鲜是障碍，到了韩国也 是一样。他很易怒，容易对权威愤愤不平。金赫的体格也让他受到不利的待遇：他的双腿发育不良，他的头相对于身体显得太大。

金赫也感到很难交到新朋友：如果韩国人同情他，他会觉得对方自以为是；即使他憎恨朝鲜政权，但当韩国人批评朝鲜时，他发现自己总是为朝鲜说话。

同样遭遇挫折也包括金医师。刚到韩国时，金医师被人所骗，她手上的政府津贴几乎虚掷一空。另外，韩国不承认她的医疗资格。如果金医师想走医疗这个行业，她必须从头开始。而由于她年纪太大，无法申请政府的奖学金。2004年，当德米克与金医师再见面时，问她是否后悔来韩国。“如果我知道自己会这样，我就不会来这里。”采访过这么多“脱北者”，金医师是唯一这么说的。

不过几年后，与金医师再度见面时，她完全变了一个人。经过数年与韩国医学委员会争取后，她咬紧牙关于40岁那年开始了四年医学院课

程。毕业之后，她计划继续她的医疗事业，这一次她将以老人医学科作为她的专业。她希望有一天，她能带着老人照护的观念返回清津。

2008年再次见到金赫时，他已经搬到首尔而且在大学念书，他想攻读历史与企业管理两个学位。此时他的身边已有许多朋友，包括一名刚从茂山叛逃过来的表亲。金赫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新来的“脱北者”，这么做也使他的自信提升不少。

宋太太则找了一份管家的工作。她参加专为老年妇女举办的旅行团，足迹踏遍韩国每个角落。她甚至还回到中国——这一次是以观光客的身份。另外，宋太太做了整形手术，好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像白种人。这是韩国经验的极致，而宋太太终于体验到了。（摘编、改写　嘉沐　顾纯）



朝鲜“脱北者”真相

漆菲 李灏

《我们最幸福》的作者——《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芭拉·德米克在接受专访时这样描述朝鲜：人们永远无法理解朝鲜。朝鲜对我而言，就像是一幅拼图一样，也许我已经掌握一些图案，但不足以拼出完整的图画。朝鲜有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从人造卫星拍摄的图片来看，整个东北亚的夜空有一片奇异的黑暗地带。除了一个小光点之外，这片地带的其他地方几乎都呈墨色，就好像是东亚世界热闹光芒中突然凹陷进去的一块黑洞。可想而知，这片地带晚上不点灯，不只不排放二氧化碳，而且还没有光害；站在那里抬头一看，肯定是繁星灿烂。这片地带就是朝鲜了。

《洛杉机时报》记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Demick)用一幅卫星图片作为描写朝鲜的起点。在这里，饥荒夺去了数百万人的性命，贸易活动几乎停止，经济崩溃，人们渐渐习惯于这种安静的没有时间的生活。

上世纪90年代金日成的去世与苏联的瓦解，使西方的朝鲜观察家产生一种共识，认为朝鲜的终结近在咫尺。曾经造访平壤，拍摄过高耸的纪念碑、踢正步的士兵与肤浅社会主义宣传看板的人，都对于朝鲜能够存活到21世纪深感惊讶。“趁它还存在时赶快去看看”，成为旅行社主打的朝鲜旅游广告。

许多朝鲜观察家花了大量时间辩论朝鲜内部的状况将会改善或是恶

化或是将出现任何转变。德米克跟其他只造访平壤几次的人一样，不愿仅以个人的观察对朝鲜的情况妄加评论，因为外国人只能看到朝鲜政府愿意让他们看见的部分。

用德米克的话解释，平壤经常被说成是波腾金村（Potemkinvillage），是一个专为外国人设计的精美玩具。无论走到哪里，总会看见盛妆打扮的可疑人物在各个不可能的地方出现——比如穿着传统服饰的年轻女子，脸颊抹上胭脂，坐在金日成铜像前的水泥长椅上假装看书。德米克最后一次参观平壤时，看见一群穿着崭新制服的军人走到金日成铜像前献花。当他们深深一鞠躬向领袖致敬时，他们的裤管上提的高度刚好让人看见他们没穿袜子。

只要离开平壤，真实的朝鲜就映入眼帘，尽管必须透过客运巴士或快速移动的车窗才能看见。于是，德米克决定采访逃离朝鲜的“脱北者”，希望从他们的回忆中还原朝鲜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她前后访谈了100多名“脱北者”，最后本书中呈现其中六位来自北方城镇清津（朝鲜第三大城市）的“脱北者”的故事。

接受采访时，德米克会强调：我不想谈政治。然而，《我们最幸福》的故事恰恰是这种政治信息的描述：这个国家如何成功地让人民对外部世界一无所悉，以及他们如何使内部政权稳固？她让我们深刻体会到，这个世界中，没有网络，广播与电视只固定在政府频道上，就连表露情感也会遭到惩罚；在这个国家里，告密者受到奖赏，而无心的言论很可能让全家遭殃。

这恰如奥威尔在《1984》中想象的“未来主义”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在宣传海报上才找得到颜色。在描绘金日成的图像时，朝鲜特别使用了鲜艳的海报色彩。伟大的领袖坐在长凳上，对着簇拥在自己身旁穿着明亮衣裳的孩子们露出慈祥的微笑。他的脸庞放射出黄色与橙色的光线：他就是太阳。而红色只保留给无所不在的标语——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对于逃离朝鲜的人来说，要生活在自由世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脱北者”必须在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世界里重新探寻自己。这些“脱北者”初到韩国时，德米克描述道，对于一辈子都由国家为他们做决定的人来说，面对这么多选择，足以让他们完全瘫痪。

对于中国的普通人，感知朝鲜往往是“这么近又那么远”。这些中国几十年前记忆中的“过眼云烟”，却是朝鲜如今的日常生活。关于中国对朝鲜的作用，德米克表示：“中国政府可以努力避免朝鲜社会的分崩离

析，帮助推动朝鲜的改革开放。我看不出，两千多万的朝鲜饥民对中国边境稳定能起到多少有利作用。”她也坦言，希望南北两边关系能够有所改善，从而使“脱北者”早日同他们的家人团聚。“这样更多的朝鲜人不用冒险逃生，也可以在自己的家园里过上更好的生活。”



朝鲜：拼不出完整的图画

凤凰周刊：什么原因令你如此关注朝鲜？

德米克：我总共去过朝鲜十次。其中，三次是去平壤。此外，我驻韩国期间，还多次以记者或游客身份去朝鲜东南海岸的金刚山。

我对朝鲜的关注受第一份工作的影响很大。上世纪90年代，我第一次作为报社的通讯员就驻扎在柏林，随后去了波黑战争中的萨拉热窝，之后是耶路撒冷。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的生存状态令我着迷，我对分裂中的两方都很感兴趣，而对地缘政治格局尚未定型的朝鲜半岛更是如此。2001年我受雇于《洛杉矶时报》后，便开始长期驻扎韩国报道朝鲜局势。

凤凰周刊：这本书的故事引人入胜，当初的写作动机是什么？

德米克：我的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人们永远无法理解朝鲜。朝鲜对我而言，就像是一幅拼图一样，也许我已经掌握一些图案，但不足以拼出完整的图画。朝鲜有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特别高兴能够看到这本书受到这么多读者的喜爱，尤其是年轻读

者。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这个国家的另一面。实际上我生长在一个左翼家庭中，但我仍希望世人能够 了解集权政府统治的面貌。朝鲜不像是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而是一个集权政府。来中国前，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了一年的新闻学课程。我发现，苏联对于大部分学 生而言仅仅是一个集权的符号。而他们对朝鲜从没有任何切实的感受。所以我想为这些学生准备一些讲义，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更加感性地认识朝鲜社会。那些讲义就 是这部书的雏形。

在亚马逊网站上，你会读到这样的读者评论："我对朝鲜一无所知，这本书正是我想要的！"我很高兴能够用这种写作方式，让普通大众而非专家能够清晰地认识朝鲜，同时也给朝鲜社会带来希望。

凤凰周刊：书中的六位"脱北者"均来自朝鲜清津市。为何选择这座外界不太熟悉的城市？你是如何联系并采访这群人的，请谈谈当中遇到的困难。

德米克：我不想在书中描写像平壤、金刚山等我拜访过的地区。人们都说，平壤实际上是朝鲜政府精心修饰过的对外展览橱窗，在平壤的居民也都是精心挑选过的。同时，我也 不想描写一些与中国边境毗邻的城市，因为那里的城市生态受到更多的外来影响而在不断变化。我只想呈现一个普通的朝鲜城市。清津市距离中国边境很远，但有一 条通往中国的铁路线。而且很多的"脱北者"都来自那里。

实际上，同"脱北者"建立联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在韩国采访期间，出人意料的是，我并未受到很多官方的压力。在韩国报道此类新闻有时比在美国还要宽松。不过，朝鲜政府对记者十分敏感，尤其是美国记者，所以有时在朝鲜境内，游客身份可以使我更易接近并采访普通朝鲜人。

韩国有很多政府及民间机构帮助这些"脱北者"融入社会。起先，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给我提供了一份来自清津的"脱北者"名单。我便开始按照名单逐一给他们打电 话。虽然名单上只有少量"脱北者"，但和这些人建立联系后，他们又帮我介绍认识了更多的"脱北者"。这本书只讲述了六位"脱北者"的经历，但我的采访者中 有四五十人都来自清津市。

最初采访时，当我询问他们在朝鲜的住房条件时，他们的回答大多是"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大家都住一样的房子"，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和其他人有何差异。谈到 饥荒时，他们最初会说没什么特别的，我的丈夫饿死了、我的儿子饿死了、我的姐姐饿死了、然后我进了监狱……"脱北者"似乎在讲述一些对他们而言十分平常的 事情，因为在他们周围发

生了太多这样的事情。缺乏比较，令他们难以讲出他们生活的特点。但当我向他们讲述我的住房时，一个纽约附近的中产阶级家庭配备各种 电气化的设备，令普通朝鲜人吃惊不已。而他们所讲述的朝鲜人生活，也令我难以想象。

之后的采访中，我们会采用一些特殊的沟通方式。比如，有时我会先要求他们用图画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生活，房子里都有什么，地板是什么做的，屋顶是什么结构。最 初在不借助韩语翻译的情况下，我就用这种方式同他们进行沟通。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讲述了很多令人着迷的朝鲜生活。而在受访者看过这本书的韩语版后，他们都 笑称这本书将他们无聊的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朝鲜人甚至比韩国人更开放”

凤凰周刊：你刚才提到，朝鲜人的生活也令你难以想象，印象最深的有哪些？

德米克：采访之前有人曾对我说，朝鲜人称美国人为“migou-nom”（音译），意思是“美国杂种”之类的。但是在现实中接触朝鲜人时，我发现他们都很开放，有时甚至比韩国人还要开放。朝鲜人会不停地讲述他们的经历，尤其是 朝鲜女人。即使有些人从未见过美国人，刚开始时他们会有些紧张，但随后他们也会讲述很多，感觉好像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次倾诉的机会。

实际上，很多在韩国的“脱北者”仍然认为自己是朝鲜人。他们不愿说也不认同任何关于金日成的消极言论，但他们会评论金正日。他们会说，金日成是父亲一样的领袖，很多不幸仅仅是他的儿子金正日造成的。

另外，有意思的是，2010年　在为《纽约客》撰写文章时，同一些在中国延吉和图们的朝鲜人接触后，我发现很多在那里的朝鲜人仍然保持着朝鲜劳动党党员的身份。他们并不在中国长住，只是 在靠近边境的几个城市做生意赚钱，再回到朝鲜。这些人并未脱北，他们仍然生活在朝鲜政府的统治下。但这些党员依然十分健谈，即使是对陌生人，他们也会讲很　多。我会对他们坦诚地讲：“我不是来扭曲朝鲜的，我只是一个作家，不想谈政治，只是想了解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吃什么，靠什么养家？”

这些朝鲜人会讲述很多自己的经历，有时甚至会边讲边哭。比如书中美兰与俊相的爱情故事。他们最为打动我的是他们在朝鲜为表达爱

意，亲手为对方书写情书的细 节。没有性，没有手机，在不能相互交流的环境中，他们的爱显得尤为纯真。但当他们都来到韩国，彼此熟悉用手机、互联网联系对方时，他们之间的浪漫被击碎 了。同时，社会地位的转变对他们的爱情也产生影响。在朝鲜俊相属于出身较好的家庭，而美兰则来自一个极普通的朝鲜家庭。然而，当他们到达韩国后，俊相不再 属于特权阶级，但美兰的日子却越来越富裕。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朝鲜、韩国、中国还是美国，恋爱中，似乎还是对男性的要求更高一些。我个人虽然希望他们的爱能修得正果，但回到现实中，美兰的韩国丈夫对她可能更好一些。

凤凰周刊：在你的采访过程中，是否会对“脱北者”所描述细节的真实性产生质疑，如何来验证这些信息？

德米克：对采访内容真实性的验证是必要的。实际上在采访时，还会遇到另外一种情况，当地人会认为我们大老远地从美国赶来，就要提供给我们一个好故事。

写书过程中，我访问了大量来自同一个城市的“脱北者”，这样我就可以比对他们讲述的事情。如果一个“脱北者”告诉我，他亲眼在火车站见到饿死的儿童，他也许 是在夸大其词。但随后，会有六七个采访对象分别向你讲述，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他们都看到儿童饿死的细节。这时我就基本可以判断这个细节的真实性 了。

在开始采访时，我还会告诉采访对象不要夸张描述。同时，也会要求他们提供如他们的邻居是否也看到之类的佐证。此外《纽约客》的编辑审查也十分严格。比如他们会利用交叉检测（Cross-examination）的方式审查报道的真实性。曾有《纽约客》的一名审查人员认为朝鲜人吃青蛙肉的细节难以置信。他问一些朝鲜人在90年代停止供给食用油的情况下怎么可能炸青蛙？补充采访时，这些人告诉他，实际上不是炸，而是用酱油煮。

韩国民众对“脱北者”从崇拜到惊恐

凤凰周刊：从你接触的这些“脱北者”来看，他们到达韩国后能够顺利融入当地社会么？

德米克：对 于大多数在韩国的“脱北者”而言，他们都难以融入新环境，尤其是年轻男性。由于多年饥荒的影响，他们大多身材瘦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朝鲜人要比同龄 的韩国人矮很多。所以当他们来到

韩国以后，会面对诸多生理上的歧视。同时，朝鲜和韩国的教育体制截然不同。朝鲜人在上学时接受了更多的宣传教育，但他们的 科技素养远远落后与韩国。很多人到26岁时都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这种现象在朝鲜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十分普遍，即使你是一名医生，甚至是教授，都没有权利获得外界信息。

在融入社会方面，反倒是年长者表现得更好。因为目前从身形上，他们同韩国老人并无很大差异。不过，年轻“脱北者”中，书中主人公之一金赫的变化最令我吃惊。他不仅戒了酒，还回到了学校，取得了文凭。虽然还在吸烟，但通过工作，金赫正在一步一步地改善自己的生活。

此外，我的采访对象中，有很多人流露出对他们家人的担心。虽然他们身在韩国，但他们仍有很多家人留在了朝鲜。很多时候，“脱北者”要求我不要暴露他们的真实姓名。

凤凰周刊：目前韩国有哪些组织在帮助“脱北者”，情况如何？

德米克：韩 国很多组织都在帮助“脱北者”融入社会。这些组织设计了很多课程，教“脱北者”如何使用互联网、银行系统、交通工具以及驾驶，甚至是语言。实际上，虽然朝 鲜语和韩语本质上是一种语言，但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导致“脱北者”很难理解韩语中大量的外来语，像咖啡、血拼等很多词汇。而从文化接受角度看，很多“脱北 者”更亲近美国而非中国。

汉拿院是韩国政府为帮助“脱北者”设立的学校。在他们进入韩国后，将在这里学习三个月。期间，汉拿院会组织他们参加一些旅行，使“脱北者”熟悉使用各种交通 工具，还教他们使用银行卡等。还有很多的民间组织在帮助幼龄“脱北者”。这些朝鲜儿童在来到韩国前会在中国、越南等地藏匿很长时间，他们一路颠沛流离，在 各个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同龄儿童。

除了帮助“脱北者”融入社会的组织，还有一些组织负责帮助“脱北者”逃离朝鲜。这些组织实际上长期处于地下非法活动状态。也许韩国政府曾秘密地资助过类似的活动，但负责这些脱北活动的大多是一些宗教团体。这些团体大多在中国及蒙古设立活动据点。

此前，“脱北者”一直利用蒙古进入韩国。现在，可能更多借道东南亚国家，比如越南、泰国。有很多的美国读者在这本书出版以后，询问我该如何帮助“脱北者”。 最初联系我的都是一些右翼基督教团体，但现在也有很多美国政治色彩不那么浓厚的民间团体参与其中。但我想说，

我采访，但并不介入帮助“脱北者”逃离朝鲜的 活动。

我在自己的官网上列出了很多正在朝鲜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的国际组织名单。这些组织大部分旨在朝鲜内部改善朝鲜人生存状态，并不鼓励脱北行为。有很多美国和 欧洲的非政府组织在朝鲜进行医疗服务、食品援助。实际上，尽管朝鲜人对美国有诸多不满，但美国则是朝鲜粮食援助的主要国家之一。而且，并不是所有宗教团体 都只在帮助“脱北者”逃离朝鲜，一些大型的基督教和佛教组织也参与到朝鲜国内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在中国境内，我也采访过一些帮助“脱北者”的人。他们大多都是以个人为单位，或者是规模极小的地下组织，有中国的朝鲜族，还有韩国人。他们仅仅是收集一些旧衣物和食物提供给“脱北者”。当然，这些活动规模不大且一直处于地下状态。

凤凰周刊：据你观察，30来韩国国内对待“脱北者”的态度有哪些变化？

德米克：现在，韩国社会对“脱北者”事件表现出的更多的是惊恐。尤其是当他们得知在三八线另一端有超过2000万的朝鲜人，而他们当中有很多亲戚逃离了朝鲜。我感觉，韩国人并不惧怕朝鲜的进攻，他们更担心的是朝鲜政权的分崩离析。那样，他们不得不面对数量庞大的难民，这对国民经济的打击将是难以估量的。

这似乎也能够解释韩国社会舆论对“脱北者”态度的变化。在90代以前，那时少数几个“脱北者”来到韩国时，被人们当做摇滚明星一样崇拜，所有人都想上前和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的一切。但当大批“脱北者”涌现时，韩国人不仅不再愿意走近他们，更是用责备的眼光看待他们。韩国人如同见到蝗虫一般畏惧朝鲜难民。

我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就像当年东德人走向西德，如今大陆人进入香港一样，朝鲜和韩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不一样，有着不同的习俗，“脱北 者”的格格不入是正常现象。政府在其中可以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但在我看来，目前韩国的保守政府已经不太愿意像过去的金大中及卢武铉政府那样积极推动和平 统一活动了。此前，有朝鲜战争时期囚犯试图通过韩国驻中国领事馆前往韩国，但最终被中国方面强制遣返回朝鲜。要知道，他们曾经是战争英雄。涉及“脱北者”的政治丑闻令韩国民主政治对这个话题敬而远之。

中国对“脱北者”政策逐渐软化

凤凰周刊：英国图书奖评委曾评论这本书描写的朝鲜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的现实版。你认为这本书同其他关于朝鲜或者“脱北者”作品有何不同？

德米克：乔治·奥威尔的《1984》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著作。我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能否与之相比。但《1984》是一部小说，而这本书是非虚拟类的纪实文学。

确实，有很多关于“脱北者”的优秀纪录片，跟随镜头我们通常看到的是未经构建过的独立事件。这些事件是由采访对象讲述的，往往缺乏历史纵深，不具备全局视 角。通过这本书，我可以在采访对象讲述的基础上从新构建这些独立事件。把他们所经历的整合起来，就可以向读者展现一段历史的完整过程。毕竟我们不能用现在 的镜头记录下20年前的朝鲜，而那时的朝鲜也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图像资料。

凤凰周刊：书中很少涉及这些“脱北者”对中国的看法。你跟他们的交谈中有所讨论么？

德米克：对于朝鲜而言，中国带来的威胁并不比美国制造的少。毕竟，中朝之间有着很长的边境线。同样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中国边境一边的繁荣对朝鲜的影响很大。大约18个月以前，我到延吉采访“脱北者”，在我看来，延吉同北京相比，只是一个小地方。但在这些朝鲜人看来，延吉如同巴黎一样的繁华。

这本书中介绍的金医生很能代表这些朝鲜人的感受。从小她被灌输中国是一片贫穷落后的土地。当她越过图们江来到中国，并不是在政治上背叛朝鲜，只是因为饥饿。 当她浑身湿漉漉地进入一个农庄时，发现了拌着肉的白米饭，但当她发现这仅仅是这户农民喂狗的食物时，她意识到此时中国的狗都要比朝鲜的医生吃得好。金医生 的信念动摇了，她意识到过去朝鲜宣传的一切都只是谎言。

在采访中，我发现很多朝鲜人可以接受韩国比他们富裕、美国比他们富裕、日本比他们富裕，但当他们越过中朝边境来到延吉，他们难以接受中国也已经变得如此富裕。这就是为什么朝鲜更为惧怕来自中国的威胁。毕竟美国远在千里之遥。

凤凰周刊：金正恩上台后，你如何看待中国未来的对朝政策？对这些“脱北者”会有什么影响？

德米克：我 认为在朝鲜问题上，相比于美国，中国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尤其是在这个特殊时期，金正恩作为新领导人刚刚接任。对于

改革的后果，金正恩不像他的父亲金正日 那样有那么多压力。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十几年来中国帮助推动朝鲜改革的最好时机。如果现在中国仍然仅仅只依靠向朝鲜输送大米，是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朝鲜 大规模饥荒问题。饥荒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边境一侧将很难实现持久稳定。所以我说，中国人对朝鲜问题的政策需要转变。

我认为，中国对“脱北者”的政策正在逐渐软化。事实上，在东北地区有很多儿童，他们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则是逃出来的朝鲜人。过去当地政府不仅不会给这些儿童登记户口，还会强制遣返他们。但现在，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悄悄地给这些“脱北者”家庭子女登记户口。

这些地方政府开始以更为人道的方式对待“脱北者”。有一些因素可能导致这样的微妙转变。毕竟大部分“脱北者”是来自朝鲜的女性，而中国很多地区面临着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困境。另一方面，还有很多50多岁的朝鲜女人，她们仍然是劳动党党员，来到中国做保姆的工作，挣一些钱，然后还会返回朝鲜。当地政府认为，这对边境地区而言已不构成威胁。

甚至有时候，一些地区的中国地方政府更需要这些“脱北者”。中朝边境上的两方在采访中对我讲各种贩卖人口的事情。大部分是走私新娘的例子，即从朝鲜来的女人嫁给东北地区朝鲜族男子。但在他们看来，这些跨境婚姻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是特别重大的事件了。

（实习生顾纯对本文亦有贡献）



韩基督教界在华培训“脱北教士”

韩国“脱北者”组织全揭秘

陈祥 郭哲郡 黄山伐

1998年，42岁的韩国人崔光从韩国总神大学神学院毕业，志愿前往中国秘密传教。他巧妙地伪装了自己的身份，于当年8月踏上赴华传教之路。在第一站吉林省延吉市，崔光遇到受韩国教会秘密资助的9名脱北青年。他与这些“脱北者”一起生活20多天，还说服他们跟自己一起学习《圣经》，追求上帝赐予的“天堂般的生活和幸福”。但其实，崔光真正执行的是韩国基督教总会的方针——将脱北青年全部培养成未来进入朝鲜的传教士。

一直以来，韩国从高层到民间都使出无数解数帮助朝鲜“脱北者”成功抵达彼岸。从传教士到蛇头，不同组织怀揣着不同的目的参与到脱北的过程中，其中的故事隐秘而悲凉。

韩国打造“脱北传教军团”

为了贯彻韩国的统一政策，韩国基督教社团提出所谓的“传教统一”，意在与朝鲜相邻的中国、俄罗斯等国培训“脱北教士”，由他们陆续渗透进朝鲜，帮助更多的“在北同胞”逃离朝鲜，实现朝鲜“体制崩溃”，从而实现“自主统一”。

日前，韩国《新东亚》杂志首度披露韩国基督教界自1998年起派遣

大批传教士辗转于中国延吉、长春、济南、郑州、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之间，搜罗“脱北者”进行秘密培训的事件。其中一些行动被朝鲜国家安全部门察觉，后在中方警力的帮助下，将其设在中国的秘密培训基地一举端掉。

上世纪90年代初，朝鲜进入“苦难行军”时代，经济低迷、粮食短缺造成大量“脱北者”进入中国或经由中国投奔韩国。趁此机会，韩国基督教总会在汉城（今首尔）召开会议，拟定秘密计划，试图通过打造“脱北传教军团”，加速“朝鲜内部决定性改变”。崔光就是这一计划的具体实施者。

崔光抵达中国后，把基督教总会汇给自己的活动经费定期作为生活费发放给“脱北者”，有时还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拿出一部分给他们。随着影响力扩大，崔光开始转战中国东北各地招募“脱北者”甚至是中国朝鲜族学员，开办起教会培训班。他还统一口径，对外一律称“通读班”。培训生活开始，崔光规定了极为苛刻的纪律。他要求学员“脱北者”一律戒烟戒酒，相互之间不分老幼一律使用尊称，从起床到睡觉全天候都要学习诵读《圣经》。

学员们整日静坐，听录音诵读《圣经》，久而久之，他们的身体就像腌制的泡菜要发酵了。有学员因为忍受不了戒烟，经常偷偷跑出去买烟叶过上一把瘾，有些人更趁机逃走。因此，“通读班”第二期培训的53名“脱北者”中，有30人中途离开。其间甚至发生过因老师不给烟酒，学员痛打老师的事情。

在中国秘密传教属于非法行为，崔光等韩国地下传教士最害怕的是中国警察上门查户口，这些人在某个城市不会停留三个月以上。1998-2000年，崔光带领着学员不停地搬家达90次之多。来中国的第一年，由于培训规模逐渐扩大，再加上要经常躲避检查而不停地搬家折腾，除了往返的飞机票钱外，崔光一度只剩下4万韩元（约合200多元人民币）。出于保密需要，崔光一直不敢与其他教会和团体联系。崔光所在的培训点越来越拮据，最后连买大米的钱都没有，他只好从早到晚一个人做祷告。

有一次，他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号召所有学员进行为期四天的禁食。在场的脱北学员问：“禁食干什么？”崔光不愿对学员们撒谎，又不能讲出实情，怕影响学员们继续接受培训的热情。面对崔光的沉默，有些学员变得非常不耐烦，他们把手中的《圣经》砸向崔光，并大喊道：“你说要让我们过上天堂一般的生活，为什么连粮食都保证不了？你这个大骗子！”

好在没过两天，一个由韩国基督教徒领导的“在中同胞教会”执事碰巧来到培训点，看到这番景象，他向崔光承诺说：“保证不再缺粮了。”崔光感动地对学员们说：“这是我们的真诚感动上帝，主给我们带来的福音。快向主祈祷吧！”

从1998年8月至次年4月，崔光培训的第一期“通读班”只毕业了10名学员，除1名是中国朝鲜族外，其余都是“脱北者”。按照崔光的规定，进入“通读班”后，个人名字要对照《圣经》改成另一个名字，因此上述学员的名字并非原来的真名。这些人后来被派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又招募起新的学员。

培训期间，一直有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小鹿岛北成教会等50余个国内教会向崔光提供支援，此外还有匿名的在华韩国及美国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韩国总神大学校长金义焕也曾秘密到过西安，对崔光的工作进行鼓励。很显然，培训“脱北者”传教士的工作绝非一两个人从事的冒险事业，它得到整个韩国基督教界的支持。

崔光的活动后来被朝方察觉，2001年6月11日，崔光所在的西安培训基地被中国警方查获，之后他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这次行动中，中国警方捣毁的韩国基督教团体在华地下培训基地不止西安一处，其在华设立的12个秘密传教基地中有8个被摧毁，但仍有4个未暴露。回国后，崔光仍关注着剩下的培训点的情况，并不断呼吁所谓“民权人士”制造反华声音。

三种组织协助脱北

一般而言，协助脱北的组织大体上分为三类：人权活动家、基督教会以及专门做偷渡生意的组织。平素境外媒体所报道的多为类似崔光这类组织，但实际上前两项常混杂在一起。毕竟人道主义和终极关怀能够让人接受，而赤裸裸的生意则很不光彩。

在人蛇组织里，有很多是曾经的“脱北者”取得韩国国籍后，再回到中国东北，轻车熟路来操弄这门生意。这行业中梦寐以求的VIP客户，是当年被北方掳去未归还的韩国国军战俘或者其直系亲属。因为韩国政府一直为他们保留军籍和薪水，半个世纪过去后已经累积为巨款。

在韩国有30多个公开的“脱北者”组织，但这些组织一般不直接参与“脱北者”的逃离活动，而是在募集资金和制造舆论声势上发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上影响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制定，对下帮助刚来到韩国的“脱北者”开始新的生活。

韩国最有名的“脱北者”组织，是“脱北者同志会”。它于1999年1月26日在韩国统一部登记，同年2月26日成立，早期叛逃韩国的前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黄长烨曾担任名誉会长。其总部在首尔，在京畿道、庆尚南道、全罗地区以及忠清地区等四个地方设有支部。另外，总部还下设“脱北女性同胞协会”。它不仅帮助已经到了韩国的“脱北者”，还在精神和物质上帮助仍困在中国的“脱北者”。

该组织的具体事务，包含为帮助韩国国内“脱北人士”解决生活及工作上的困难、为海外“脱北人士”提供入境帮助、为韩国国内“脱北人士”提供教育服务以及创办名为《望乡》的月刊，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及同情“脱北人士”的处境。

有时一些“脱北者”组织的宣传手法也引起争议。据韩联社报道，2006年12月15日，某“脱北者”团体网站上，一名41岁脱北女A某的裸照被刊登在首页。如果想看这张裸照，就必须支付25美元加入该网站会员。运营该网站的“脱北者”B某称：“尽管有几个介绍脱北难民人权实际情况的网站，但访问这些网站的人特别少。为了引起社会的关注，作为文化事件刊登了裸照。”

韩国作为基督教大国，传教士帮助“脱北者”的案例不在少数。以Durihana宣教会为代表，创设者千基元牧师被人称为“朝鲜难民的辛德勒”。他所建立的逃亡通道网络，被称为“地下铁路”，是模仿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黑人逃亡的“地下铁路”。2002年在中蒙边境被捕前，千基元已经着手策划、实施了超过700名“脱北者”的胜利逃亡。

据“维基解密”韩国网站称，韩国基督教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着手经中朝边境向朝鲜开展“和平渗透”的活动。一个名为“基石”的韩国教会组织秘密在中朝边境的延吉、图们、集安、丹东等地建立训练营帮助训练脱北教徒。教主李朔将收音机等物品经鸭绿江、图们江走私进朝鲜，基石教会印制的500万册《圣经》有时通过鸭绿江上的走私船，有时则通过来往于丹东及新义州间的火车夹带进朝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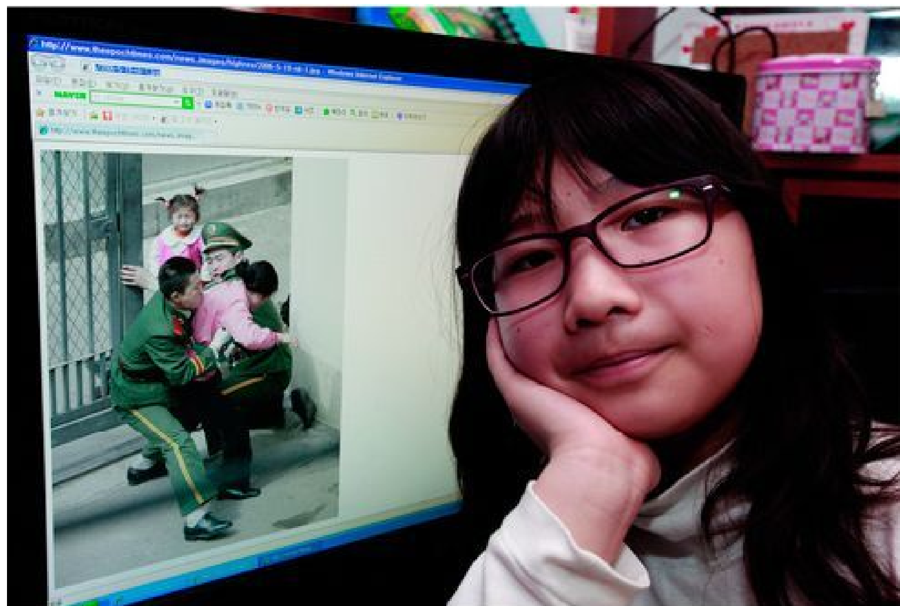
据韩国国家情报院提供的信息，1986年，在朝鲜活动的地下教会共有1500个，其中有500余个都是在基石教会援助和帮教下成立的，它们在秘密传教的同时还策划脱北活动。经调查发现，基石教主李朔本人的背景极不单纯，1968年他成为驻韩美军里的一名“喀秋莎”（即韩籍雇佣兵），并在驻议政府的美军情报部队里工作。李朔坦言，这段经历对他后来开展对朝宣教很有帮助。1996-1997年，李朔甚至间接参与策反前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黄长烨的叛逃。

由于韩国基督教团体不断制造“脱北者”事件，引起朝鲜方面的严重关切。1994年起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下达指示：要求在严厉打击叛国者的同时，对韩国基督教团体在朝鲜周边地区进行的一切培训与宣传行为均视为“间谍行为”并予以坚决打击。

1995年7月9日，韩国外交通商部发言人徐大源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韩国汝夷岛纯福音传教会的传教士安升运在中国延吉失踪。安于1993年6月来到延边，主要从事对“脱北者”的传教培训工作。后来，有消息称安升运是从中国延吉秘密前往朝鲜内部传教时被朝鲜安全部门逮捕，这显示出韩朝地下传教与反传教斗争相当残酷。



2002年5月8日，金韩美一家强行闯入日本驻沈阳领事馆。



2011年12月29日，媒体再次拍摄到金韩美时，她已与普通韩国女孩无异。

“金韩美闯馆”事件轰动一时

2004年12月，韩国政府明确规定了“脱北者”的安家费。政府提供给国内“脱北人士”的安家费包括生活补助金和住房补助金。据悉，单个“脱北人士”能获得339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由2个人组成的脱北家庭共能获得4555万韩元、由3个人组成的脱北家庭共能获得5511万韩元、由4个人组成的脱北家庭共能获得6466万韩元。政府将分20个月定期把安家费发放给“脱北人士”。

不过，这笔钱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成功到达韩国的“脱北者”，以这笔资金作为交易的本钱，托付蛇头将自己在朝鲜的至亲带到身边。或者事先与蛇头约定，以到达韩国后预期领取到的这笔钱作为支付的筹码，谈好价格就上路。为了支付预定的价码，很多“脱北者”抵达韩国后的新生活被弄得焦头烂额。加上蛇头们往往会借助黑社会的力量来要债，更使他们苦不堪言。

另一方面，由于韩国政府发给“脱北者”的钱多来源于韩国纳税人。一旦“脱北者”数目激增，政府为此开销增多，“脱北者”在融入新社会时产生的问题和矛盾也很多，韩国反对的声音逐渐多起来。

金韩美一家的脱北故事一度非常轰动。他们一家五口在2002年5月8日强行闯入日本驻沈阳领事馆，一家人包括捆在妈妈背上的金韩美。他们的挣扎、哭泣、恐惧、悲恸，整个过程通过视频传遍全球。两岁女

孩对着使馆门外的妈妈哭泣的一幕造成震撼人心，使得她的家人也被允许送往韩国。

这一家人的闯馆得到了“自由朝鲜运动联合会”的帮助。一家人先被安排到使馆旁边的旅馆居住，以便熟悉周围的环境，组织者还训练他们如何穿过街道到达领事馆门口而不被便衣警察抓住，同时把他们装扮成衣着亮丽光鲜的韩国家庭。几年后当媒体再次拍摄到金韩美时，她已与普通韩国少女无异。

金韩美一家的成功使得同一时期，韩国驻华使馆接连发生几起闯馆事件。2002年6月，还有“脱北者”闯入加拿大驻华使馆。这些闯馆行径防不胜防，有白天硬闯的，也有在夜幕中悄无声息摸进来的。事发之后，中国方面全面加强了日本领事馆门前的警卫，增加值勤人数，并安装了带刺铁丝网。

除了“闯使馆”，接下来几年，在北京还发生过几起不明身份人员冲闯外国人学校事件，有些人甚至采取暴力手段，威胁中方和外方人员的人身安全。2004年10月26日，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对此表示，“闯馆”和“闯校”活动是由一些外国所谓的宗教、人权组织和个人策划的。中方将依法严惩组织“闯馆”和“闯校”活动的“蛇头”。

蒙古或海路偷渡为更优选择

脱北组织设计从中国到韩国的路线，主要有两条，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一条道路向北，即穿越中蒙边境的茫茫戈壁和少量的草原，这段艰难的路程只能靠两条腿跋涉。鉴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脱北者”需要携带指南针和充足的水。如果是冬季，则要准备好抵御最低达零下40度的严寒。全身上下，从大衣到手套、鞋子都必不可缺。

从集聚地出发前，组织者会带来假的中国身份证稳定“脱北者”的心理。然后，组织者再三叮嘱，就算你们中的一个人给抓住了，其他人必须继续前进。为了不引起外界注意，他们会进行一定装扮，比如穿上较新潮的衣服、带上拉杆箱或双肩背包、女性还会施上粉黛，装作是韩国的旅游团。一行人往往会从延吉坐火车卧铺车厢到达哈尔滨东站，再经过火车和大巴车转乘，来到内蒙古的牙克石市，此地距离边境200公里。继续往西前进，直到距离中蒙边境20公里时，他们再开始步行穿越。

还有一种常见的路线是，从沈阳坐火车到呼和浩特，再转乘火车到二连浩特，下车步行越境。这期间，他们也许会遭到中国边防部队的逮捕，也许在一望无际的不毛之地迷失方向，又用完了水和食物。不幸者从步履蹒跚到迈不出脚步，最终仰卧在原野上，无人地带不受污染的璀璨星空，是他们见到人世的最后一幕。

虽然前途险恶，仍有无数人前赴后继。中蒙边境的这一段，差不多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从卫星地图上看，在中国的一侧见不到蓝色和绿色；靠蒙古边境线内侧，除了河流主干外，还有很多分叉。所以组织者会告诫他们，过了河就安全了。当然，见到突然冒出的俄文数字，则是铁定保险了。

不过，对于没有钱的人来说，蒙古路线才是最佳选择。在美韩等国的压力下，蒙古政府在朝鲜难民问题上采取中立立场，同意朝鲜难民自由选择前往第三国。随着到来的人数增多，蒙古干脆设立朝鲜难民营，“脱北者”经甄别后可获得韩国公民身份。因此，在蒙古被逮捕实际上等于获得一张前往首尔的免费机票，使得蒙古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大转运站，由朝鲜开出的“地下列车”经由此地开往韩国。

另一条道路向南。向南又分叉成两条道，一条是经云南进入缅甸，再进入泰国；另一条是经广西进入越南，继续往南直到柬埔寨。

云南路线的具体操作方式是，从沈阳坐火车到北京，再坐火车去昆明，继续转火车到玉溪，换乘长途汽车经勐腊到勐满或勐龙，然后伺机穿越边境，进入设置在泰国的朝鲜难民营。进入泰国后，只需要向警方自首，后续就一切顺利了。

广西路线则是从沈阳坐火车到北京，转火车到南宁，换长途车经普洱市到凭祥市。有人会进入韩国、泰国、印尼、丹麦等国驻越南领事馆，也有人继续前行，到柬埔寨后找到韩国大使馆。越南与朝鲜在政治体制上有着更亲近的血脉，却与韩国合作，是出于外交利益，让越来越多的韩国资本进入越南。

2004年之前，广西路线是脱北组织首选的东南亚避难路径。越南国内最大的四个“脱北者”避难所都是越南韩侨建立的。2004年7月，468名“脱北者”从胡志明市被空运到韩国。此事动静之大，气得朝鲜召回驻河内大使朴应燮以示抗议，越南再也无法在朝鲜面前掩饰自己的角色。从此以后，越南不得不将避难所的运营者驱逐，同时加强边境控制。

除此之外，也有人从青岛、烟台这些韩国人聚集地出发，走海路到达韩国，他们通常躲在轮船的货舱里。由于这条路风险较低，所以常常

混入冒充“脱北者”的中国朝鲜族，他们希望到韩国去挣更多的钱，享受更好的社会福利。于是，韩国政府不得不在甄别程序中留了一手来识别他们，比如让他们单独唱《金正日将军之歌》。

对于偷渡组织者而言，从中朝边境地区坐吨位不大的船只偷渡到韩国，是最为简短的途径，但此举极不安全。因为小船常常需要趁黑夜偷偷经过朝鲜领海，这一段行驶离海岸线不远，很容易遇上朝鲜的巡逻船只。金顺玉曾是朝鲜艺术学校的学生，2000年5月，怀孕7个月的她在鸭绿江边登上了前往韩国的偷渡船。组织者告诉他们，只需睡一个晚上，天亮睁眼就到仁川。不巧半夜，在甲板下熟睡的她被朝鲜军人登船检查的声音惊醒，给中间人的钱也打了水漂。

同样不实用的还有一条漫长的路线，从珲春附近的中朝俄三国交界处穿越朝俄国境，从俄蒙边境进入蒙古。从地图上看，这等于是绕着中国的公鸡头逆时针走大半圈。全程步行，距离在3000公里以上，比南下路线近不了多少，但后者更多时间是在交通工具上。

由于南下成本相对较高，所以为了赚钱的偷渡组织尽量不选择南下，而是走蒙古，或海路偷渡，抑或假护照加上飞机票。

中国取缔在华脱北组织困局

辽宁省社科院学者吕超，曾多次参与对“脱北者”和“脱北者”组织的课题调查。据他观察，“脱北者”在1990年代末最多。随着饥荒情况好转，目前已逐年减少，人员构成也不大一样。来华的“脱北者”大致有两个目的：一部分是打工挣钱送回国内；另一部分是将中国作为通往韩国的中转站。吕超认为，国外媒体报道说有20多万朝鲜人滞留在中国的说法有些耸人听闻，但估计10多万人是有的。

据吕超介绍，这类数据调查都根据抓到与送回去比例，外加实地考察。不过一般情况下，调查者作为外人到村里，脱北来的女性给人做媳妇，男性在勤勉打工，大家都耷拉脑袋不理你。“没有人会将这个数字供出去，所以很多数据都是不可靠的。”

在高丽大学研究朝鲜问题的一位教授则认为，目前大陆有四类方式来看待脱北问题：第一种是要靠“脱北者”赚钱的，他们唯钱是从；第二种是有主见的，从自己的观点来理解“脱北者”问题；第三种是政府官员，或许了解却不敢说“脱北者”问题；第四种则是在中国的韩国人，但他们有关“脱北者”的信息是片面的，对此熟悉的人少之甚少。

如果说在中国该问题属于“政治敏感”，即便是在韩国也很少见到“脱北者”组织的信息。记者在采访韩国政府研究机构任职的学者时，往往表示此话题不能乱说，但即便隐匿去姓名之后，他们所能提供的也只有在韩国进行公开活动的“脱北者”组织信息，相当于联谊会、帮忙办。参与脱北协助的人多以“安全”为由不愿露面。

中国曾依法取缔很多脱北组织，延边、丹东等地的法制新闻，时常有破获偷渡组织的正面新闻报道。新闻不会显示偷渡者是什么群体，但字里行间能分析出，通常有韩国名字的外籍人员被列入犯罪嫌疑人名单，而且涉案中国人都有朝鲜族常用姓氏。

从个体影响来看，当时闹得比较大的如“李明顺事件”。李明顺是居住在青岛的家庭教会基督徒，在韩国牧师崔奎泰的指示下接待和照顾到达青岛的朝鲜人，并且分批将61人经内蒙古送到外蒙古。因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他被判入狱，有不少声音在网上声援他。

总而言之，只要脱北现象一直存在，出于不同动机的协助组织也将一直存在，即便是让很多中国人都反感的凶狠蛇头们。但对于一心愿意去韩国而不顾一切的“脱北者”，他们何尝不是在心中反复计算得失后才采取的理性经济人行动。



“脱北者”成对朝心理战主力 离间中朝利器

31名“脱北者”困局

吴敏杰

中韩建交20周年之际，中韩两国高层却罕见地就“脱北者”问题公开“斗嘴”。

继韩媒多天报道“中国遣返‘脱北者’”后，2月22日，韩国总统李明博在青瓦台称，“脱北者”并非犯罪分子，中国政府应遵循国际标准处理。而前一天，韩国外交通商部宣称要将“脱北者”问题闹到联合国，寻求国际支持。中国外交部则于21日、22日两度回应，否认“脱北者”是难民，反对将问题政治化、国际化。

位于首尔钟路区孝子洞的驻韩中国大使馆前，一波又一波的韩国“脱北者”人权团体成员和民众继续示威，横幅上用中英韩三种语言写着：“我们爱中国，请中国也爱脱北者”。记者会上，几名“脱北者”女性唱着《故乡的春天》，默默掉下了眼泪。

宣称要“无限期绝食”的韩国自由先进党国会议员朴宣映在中国大使馆对面表示“坚持”，韩国执政党前党首郑梦准也亲临对她进行“鼓励”。

这些举动让“脱北者”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在今年春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热度。

据韩联社提供的不完全统计数字，目前在华“脱北者”大约有20多万。人数众多的“脱北者”不仅给中国造成很大的治安压力，也带来颇为棘手的外交问题。近年来，韩、美、日及欧盟以尊重人权为借口，在处理“脱北者”问题上不断向中国施压，而长期鼓励、怂恿甚至策划朝鲜人“脱北”的韩国，更是想把在华“脱北者”问题作为离间中朝关系的工具。

韩将“脱北者”问题闹上联合国

据报道，2月13日，24名被中国拘捕并面临遣返的“脱北者”中的10人通过朝鲜人权团体向韩国人权委员会求助，从而引发了此次“脱北者”之争。

韩国《东亚日报》2月14日在头版头条刊登题为《31名脱北者在中国被捕，面临送回朝鲜危险》的报道，称中国正处于“严打脱北者”期间，2月8—12日在沈阳、长春、延吉抓获31名“脱北者”。报道还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下令对在金正日去世后试图离开朝鲜的“脱北者”“灭掉三族”，送回后“公开处死”或“终生监禁”。

有对朝人权团体表示，30多名“脱北者”中有9名已经被遣返朝鲜；在沈阳被捕的16名“脱北者”也很快会被遣返朝鲜。朝鲜消息人士透露，随着“脱北者”问题越闹越大，朝鲜当局下令“根除非法越境”，向北方派遣了50多名保卫部人员，目的是逮捕要逃离出境的“脱北者”。

此后数日，一些韩国政客和市民团体频频聚集到中国驻韩大使馆前面示威。在韩国国内，该议题的政治分量也被加重。李明博表态后，外界就此解读说，表明这一问题已被提升至国家外交的层次，这一方面是在间接批评中国，另一方面也表明韩国将在外交上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中央日报》更称，在“脱北者”问题上，韩国政府原来奉行“静默外交”，现在应对更加走向直接。外交部门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此前通过非公开方式请求中国政府“妥善处理”的方法并不奏效，因此改为“正面进攻”。

2月27日，韩国外交通商部多边外交调停官金奉炫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层会议发表主旨演讲呼吁，“脱北者”为了寻找人类的基本权利自由与生存逃离朝鲜，但是他们却遭悲惨逮捕，并面临强制遣返的威胁。他还说，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大会朝鲜人权决议案等敦促各国遵守禁止强制遣返原则，但至今为数众多的“脱北者”已被强制遣返朝鲜。“‘脱北者’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人道主义问题。”

据韩联社报道，这是韩国政府第一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正式提到“脱北者”问题。韩国政府原计划直接针对中国提出发言，但由于担心与中国发生外交摩擦，使用了较为委婉的措辞。

另一方面，美国就此问题做出的一系列回应也十分热情。德国联邦议院和欧洲议会也将就此问题“施压”中国。据《中央日报》报道，针对中国遣返“脱北者”问题，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人权委员会于3月1日举行紧急听证会。除部分专家出席外，两名“脱北者”也将“现身说法”提供“证词”。韩联社则评论说，中国遣返“脱北者”已经成为“华盛顿炙手可热的焦点”。据报道，3月5日，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也会举行听证会，“深入了解”中国遣返“脱北者”问题。

此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的官员在接受韩联社采访时也指出，如果韩国政府决定将“脱北者”问题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讨论，美国将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等相关国际机构，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国家一道，为保护朝鲜难民作出共同努力。

与韩国官方同样关心“脱北者”问题的还有韩国各在野党、“脱北者”声援组织，甚至不同党派代言的演艺界明星。韩国执政党临时党首朴谨惠还写信给中国政府抗议。“绝食示威”的朴宣映则向国会提交了《敦促中国停止遣返脱北者的决议案》，而在该议案上签字的有韩副议长郑义和、前国会议长金炯旿、民主统合党国会议员李洛渊、自由先进党代表沈大平等29名国会议员。

有分析说，这与今年4月即将举行的韩国议会选举及年底的总统大选不无关系。韩国Christian Today于2月22日分析称，基督教市民团体协议会已决定发动基督教选民只将选票投给反对强制遣返“脱北者”的国会议员候选人，而不关心“脱北者”生死的候选人没有资格担任国会议员。

针对韩国的官方声明，中国外交部多次做出正式回应：“脱北者”不是难民，而是因经济原因进入中国境内，是非法入境者。中方一贯根据国内法、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谨慎、妥善处理非法入境朝鲜人问题，符合各方利益和国际惯例。人权理事会不是讨论上述问题的场合。在2月29日的外交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洪磊再次强调，我们希望中国的司法主权得到尊重和维护，也希望有关方面和人员不要再炒作这个问题。

韩拿“脱北者”离间中朝

当然，相关示威活动的主力还是各种在韩“脱北者”团体。这种组织目前在韩国有30多个，其中最著名的包括“朝鲜人权团体联合会”、“朝鲜人民解放战线”和“对朝气球团”等。

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所一不愿透露姓名的朝鲜问题专家向本刊表示，组织、实施对华抗议活动只是“脱北者”团体活动的一部分，形形色色的“脱北者”团体已成为韩对朝心理宣传战的主力，其最重要、最常见的活动之一就是向朝鲜放飞传单。2011年 2 月，朝鲜曾警告要向这些组织长期活动所在的韩国坡州市临津阁及其他施放区进行瞄准射击，但“对朝气球团”还是以公开或非公开方式，用数十个大型气球向朝鲜放飞了数十万张传单、DVD光盘、U盘及美元纸币。不过，据韩国警方透露，由于十余名当地居民来到现场提出强烈抗议，该组织在无奈之下放弃了在该地区散发传单的计划。

为吸引朝鲜人“脱北”，韩国政府原则上接受所有愿意抵韩定居的“脱北者”。韩政府奉行的鼓励脱北政策，让一些朝鲜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各种非法途径逃离祖国。据韩联社2011年年底提供的不完全统计数字，目前在韩“脱北者”达2.3万多人，中国约有20多万人，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等地约有3000余人。

据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所专家透露，“脱北者”进入韩国后会接受一系列审问调查项目，实际上也是一个“洗脑”过程。通过审查程序，韩方也会寻找具有“发展潜力”的“脱北者”，并对其进行“特种培训”，其中个别人会被派到中国来，继续帮助朝鲜人“脱北”。事实上，大量“脱北者”来到中国，与韩方的脱北鼓励政策及一些韩国“特工”的在华活动不无关系。

据这位专家介绍，大量“脱北者”来到中国，已对中国不少地区，尤其是东三省带来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与此同时，面对韩方，甚至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如何处置跑到中国的“脱北者”，也变得非常棘手。

其一，1951年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1967年的《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有关难民的定义侧重于政治因素，其他比如因饥荒而逃出的就不能称之为难民，来到中国的“脱北者”大都出于经济原因，算不上难民，对此中国外交部已做出明确解释。其二，中朝签有领事条约，根据这一具有法律约束性的文件，这些“脱北者”必须被遣返回朝鲜，如果把他们交给韩国，势必会遭到朝鲜的反对。其三，一旦中国松口同意把一些“脱北者”交给韩国，那就会让更多的朝鲜人感觉到，中国可以成为他们脱北的中转站，会鼓励更多的朝鲜人铤而走险。其四，韩国口头上欢迎所有“脱北者”是因为韩国宪法将朝鲜人都视为韩国公

民，但这也是因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在华“脱北者”进入韩国，首尔才敢这样大张旗鼓地做“道义上的好人”。

上述专家表示，对韩国来讲，“脱北者”问题也是把“双刃剑”：鼓动并接收“脱北者”可能会为韩国赢得所谓“尊重人权”的好名声，但此举无疑也将给韩国带来一定的社会负担。加上这些“脱北者”鱼龙混杂，难免会出现名为脱北实为朝鲜当局服务的“假脱北”人员，由此给韩国带来的可能就不仅仅是社会问题了。

久而久之，“脱北者”问题已成为韩国、日本及一些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及离间中朝关系的一种工具。面对种种压力，中国政府能做的事情相对有限：一方面可要求朝鲜善待被遣返的“脱北者”，同时促使朝鲜对外传递有关他们被遣返后的信息，以平息外界对其命运的无端猜测；另一方面是加强边界管理，同时帮助朝鲜发展经济，以减少朝鲜公民“脱北”的动机。



凤凰周刊文丛

Turbulence in the Third World

動蕩的第三世界

凤凰周刊 编

目录

ISIS，恐怖主义新纪元
一场迟到的内战
新月沃土的溃败
伊拉克反恐十年
克里米亚分离始末
普京的克里米亚豪赌
俄罗斯：分离主义制造者
阿拉伯 动荡的新月
中国利益海外困局
央企利比亚10天撤侨大起底
新疆报道、反腐系列、国际要闻更多精彩文章尽在凤凰周刊

版权信息

凤凰周刊第63期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凤凰周刊》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2014©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2014
本书版权为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所有。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P-00110177-0063-140814
最后修订：2014年 08月 14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4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ISIS，恐怖主义新纪元

记者／秦轩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西北380公里之外，是该国第二大城市摩苏尔。2014年6月16日，隶属于“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和支持者们，打起该组织旗帜在摩苏尔所属的尼尼微省政府建筑前游行示威。

一个身着黑袍，裹着黑色缠头的阿拉伯男子，登上清真寺内的高台时一步一停，让人觉得腿脚颇不灵便。当他坐下，唱经声响起。男子从袍子中掏出一把梳子，打理蓄的很长的络腮胡子。

很快，他站了起来。在麦克风前发表演讲：“全天下的穆斯林们，我带来了喜讯并向你们问好。今天，你们可以扬起头来！在真主的庇佑下，你们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哈里发国家，这将还给你们尊严和力量、权利乃至领袖！”

接近十五分钟的演讲中，他的头顶并没有出现神圣的光环，只有一台白色的电风扇嗡嗡作响。虽然演讲中否定了全部西方文明和价值观，但他伸出的右手手腕上，赫然是一块蓝色表盘的欧米茄海马款式手表，

价格约为42000元人民币。

这一天正好是美国独立日。长期以来只有几张模糊照片流传于世的这位男子，于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发表了“建国宣言”。化名巴格达迪的他在自封哈里发的同时，恢复使用真名易卜拉欣。

巴格达迪领导着一个名称诡异的恐怖组织，仿佛从天而降席卷了伊拉克西北部辽阔的领土，速度堪比四大哈里发时期的伊斯兰征服风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他所领导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以下使用英文简称ISIS），还有这块数十年动荡从未平息的土地。

虽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与塔利班试图在阿富汗实现伊斯兰国的目标相比，ISIS显然走得更远，更主张哈里发传统。在伊斯兰世界历史上，哈里发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全世界穆斯林应奉哈里发为领袖。这一身份与其说是神学意义上的领袖地位，不如说更有伊斯兰帝国宗主的意味。

此前，伊斯兰世界最后一任哈里发的封号为奥斯曼土耳其执掌。而在上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解体后，哈里发的封号已被封存了100多年。此次ISIS重新提出哈里发的称号，这种“穿越”的感觉，相当于有东方政治人物提出中国要回到汉唐、日本政治要回到幕府时代。

巴格达迪的演讲中，不仅痛陈“穆斯林世界在失去哈里发之后落败了，他们的国亡了”，更否定了一切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思潮和价值取向，“不信道的人一度攻占穆斯林的土地……散播虚假口号，诸如文明、和平、共存、自由、民主、政教分离、复兴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等”，声称伊斯兰国才是穆斯林的归宿。

“伊斯兰国”一词至少比之前冗长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显得简洁，在中文新闻翻译中，还有“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其英文简写即为ISIL）、“伊拉克与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翻译上的差异各有依据。

西方媒体喜欢使用“黎凡特”（Levant）一词来称呼地中海东岸的世界。该词源自中古法语，本意为“日出之地”；沙姆是古老伊斯兰王朝时期的称谓，至今依然被本地人沿用。10年前，记者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长途汽车站，听到去叙利亚的大巴司机便高喊“沙姆”。

黎凡特和恐怖组织自称的“沙姆”（Sham）同指一个地理范畴，即为包括今日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在内的新月沃土，称之为大叙利亚也不为过。反西方的ISIS抗拒使用黎凡特一词，而ISIS的前身——扎卡维时期的伊拉克基地组织分支更为保守，甚

至回避用伊拉克这个名词，而沿用“两河流域间的沃土”来指代自己活动的地域。

在名词上大费周章并非煞有介事。在ISIS看来，那些西方人使用的名词和他们随手划分的边界一样，将本为一体的阿拉伯世界分割开来。演讲中，巴格达迪说道：“叙利亚不只是叙利亚人的，伊拉克也不只是伊拉克人的。”

ISIS曾发布一段主要用英语旁述的影片，解释伊斯兰国的立国愿景。其中声言要终结英法两国一战中为瓜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中东地盘而达成的“赛克斯—皮科协议”，不仅要消除伊拉克与叙利亚的边界，还要消除约旦、黎巴嫩的边境，并且要“从犹太人手里解放巴勒斯坦”。可以想见，站在ISIS的立场上，受到西方影响的现代中东历史依然从属宗教战争的范畴。

如果说仅在中东“消除边界”就已经显得痴人说梦，那么ISIS的远期目标更让人觉得是天方夜谭。ISIS发言人敦促全体穆斯林向巴格达迪效忠：“随着哈里发的权威扩张，其军队所到之处，所有酋长国、组织、国家、团体的合法性俱将无效。”

ISIS规划着数年后占领西亚、北非、西班牙、中亚、印度次大陆全境乃至中国新疆。ISIS似乎从不害怕树敌众多，在巴格达迪再明晰不过的讲话中，他点名了全世界的许多国家，说道：“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索马里、阿拉伯半岛、高加索、摩洛哥、埃及、伊拉克、印度尼西亚、阿富汗、菲律宾、什叶派伊朗、巴基斯坦、突尼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在东方和西方，穆斯林的权利都被强行剥夺了……你们看到的中非和缅甸，只是他们水深火热的处境的冰山一角。安拉在上，我们要复仇！”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被排在了第一位。巴格达迪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中国以及中国新疆，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并要求中国穆斯林和全世界穆斯林一样向其效忠。

动荡的伊斯兰世界从来不缺乏极端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从塔利班、基地组织到如今的ISIS，三者形成的现实条件与具体诉求不同，但目标一致，即致力于回归早期伊斯兰扩张时期的传统，打破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世界格局，重建神权至上的文明共同体。

2014年7月4日，巴格达迪在发表建国演说。

ISIS宣称要建立从北非到中国新疆的大帝国

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一路走来，不仅规模和声势日渐壮大，ISISI还终于在伊斯兰世界早期倭马亚王朝与阿拔斯王朝的心脏地带——两河流域生根发芽，提出了迄今为止最有野心的政治口号。

在宗教行为上，ISIS具有强烈的瓦哈比教派色彩。这一教派属于逊尼派分支，同样也是基地组织的理论基础。该教派于18世纪出现后和阿拉伯半岛的沙特家族结盟。这一教派比其他逊尼派教派更为苛刻严格。

瓦哈比派认为伊斯兰世界需要净化，需要回归到伊斯兰创教初期的主张，并且认为其他逊尼派的穆斯林并没有完全达到真正穆斯林的标

准。甚至有激进的瓦哈比派主张其他派别的穆斯林同样是异教徒。

ISIS最近毁掉什叶派信徒的圣墓并不是“原创”的行为，1802年信奉瓦哈比教派的沙特家族就曾袭击过。无论对于200年前的瓦哈比教派还是今天的ISIS来说，对什叶派的战斗都是一致的。他们不过是在继续那场自7世纪中叶就开始的教派战争。

1979年的伊朗什叶派伊斯兰革命，不仅仅让一个基于传统神学主张的政权得以成立，还为逊尼派群体起到了示范效应——推翻世俗政权建立神权国家，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革命领导人霍梅尼的传播手段也被30多年后的后来者学去。

霍梅尼当年长期在海外生活，通过那个年代最先进的媒体手段——磁带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保守的ISIS组织，在传播手段上却紧跟时代。宣布“建国”不久，在几大全球社交网络上便出现了打着该组织旗号的诸多账号。大概是为了防止被销号，有些账号的简介中还附上了备用小号的说明。

在这些官方半官方账号之中，ISIS呼唤全世界穆斯林，尤其是ISIS现在匮乏的人才，譬如：工程师、商人甚至律师投奔、“汇集”到哈里发国，将新建立的“伊斯兰国”视为真主应许之地。

ISIS制作的招募志愿者歌曲中，这样唱道：

伊斯兰之国已经建立

让我们扫除一切边界

我们的战车所到之处

犹太拉比必将蒙羞

哦，追求真理的战士，出发吧！

ISIS及其支持者有着娴熟的互联网传播技巧。许多西欧国家的第二代年轻穆斯林移民受到感召，组织支持ISIS的聚会，拿起自制的ISIS旗帜并拍照记录。并将照片发到网上，以壮声势。

从领导人的哈里发封号、组织的名称、建国的愿景、结合社交媒体运作的手段，卡塔尔多哈布鲁金斯学会分析员利斯特认为：“伊斯兰国”是2001年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以来“国际圣战的最大发展”，“标志着恐怖主义新纪元的诞生。”

中东整体局势日益复杂，而伊拉克内部什叶派、逊尼派以及库尔德人的势力盘根错节，很难判断ISIS将走向何方。ISIS的崛起本身即为叙利亚内战的延伸，其能够迅速做大也和美军三年前撤离导致反恐力量的缺失有关。

随着新月沃土的持续溃败，伊拉克的乱局可能如叙利亚内战般旷日费时。只要ISIS未能继续快速扩张，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都不会进行有力度的干预。但ISIS树敌众多又不被国际社会承认，其内部各派系间可能在未来的僵持阶段逐渐发生龃龉，新成立的恐怖主义国度终难有未来。

（实习生席小丹对此文亦有帮助）

一场迟到的内战

ISIS势如破竹的攻势让人们发现：伊拉克原来如此脆弱。仔细考察伊拉克的历史和政治格局，不难发现今日危机的本质是一场推迟爆发的内战。

记者／赵新宇



2013年10月25日，胜利阵线在叙利亚的阿勒颇举行武装游行，呼吁建立严格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不到一年之后，“伊斯兰国”建立。

一群身穿平民服装的人被带上大型货车，运往一处空旷地方。他们双手反绑、面部朝下被迫伏在浅浅的壕沟中，被蒙面枪手逐一枪杀。

即便完全不会阿拉伯语，也能看懂ISIS用一组图片讲述的这个极为恐怖的故事。照片发布于6月15日，ISIS攻占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的故乡提克里特之后。图片描述中声称，被处决的是已投降的伊拉克政府军士兵，总数约有1700人。

惨案不仅震惊了现代文明社会，连同属恐怖主义组织的阿富汗塔利班都劝告ISIS不要“动辄使用暴力”，至于老牌的基地组织，早在今年年初便宣布ISIS“太过极端”而与其断绝关系。

拥有近万武装力量、占据10万平方公里土地、统治数百万人民的

ISIS，已经在恐怖主义历史上登峰造极了，其大发“内战财”也仅仅是两个月内的事情，这两个月内国际社会做出的努力，距离制服这朵恐怖主义的“孽之花”尚有极大距离。伊拉克的内战虽然迟到，但烈度毫无折扣。

摩苏尔的陷落

大约1500名隶属ISIS的恐怖分子，在进占摩苏尔时令兵力为其15倍的政府军闻风而逃。仓皇南遁的伊军留下了大量设施和辎重，曾作为美军在伊拉克北部活动枢纽的摩苏尔国际机场也完整落入ISIS手中——包括停在机场的6架黑鹰直升机。同时，至少2400名囚犯被释放，他们中有很多人从此为ISIS效犬马之劳。

ISIS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恐怖组织。虽然占领了大型炼油厂，但由于缺乏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被周边国家严厉打击的ISIS只能以四分之一的市场价格贱卖原油。尽管如此，据估算每日也有上百万美元的净收益；此外，ISIS建立的“伊斯兰国”还在其控制的领土上征税；在攻克摩苏尔后该组织还直接抢夺了4.3亿美元的现金。

约200万名摩苏尔居民并没有逃离故土——一些在战端挑起时躲开的居民在事后还回到了市区的家里。ISIS占领摩苏尔并没有使他们的日子变难过，反倒有所好转，至少在短期内，居民们的切身感受就是如此：政府军设置的检查站、防爆墙和路障都被清除，行动方便，治安转好，再也不必担心原本每周数次的炸弹袭击或枪击案件——制造这些案件的人掌权了。

占领摩苏尔后，ISIS继续在多处攻城略地。与ISIS顺利进击相伴，政府军在多个城市都擅离职守。ISIS在伊拉克的爆发震惊了全世界，但围绕着这个组织尚有许多谜团。人们大致知道ISIS的来龙去脉，也知道他们长远的野心；但对于这群圣战分子的近期目标、当下策略以及如何作战，都难下定论。

ISIS是什么组织

ISIS的前身是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这个组织似乎天生具备“下山摘桃”的能耐。1989年，它的创始人扎卡维动身去阿富汗“抗击苏联”，但当他到达那里，苏军已经撤走，虽没有参加战斗，扎卡维仍然得到本·拉登赏识，从此步入他的恐怖活动生涯。

美军入侵阿富汗后，扎卡维转移到伊拉克发展，他的圣战组织（Al-Qaida in Iraq，伊拉克基地组织，以下简称AQI）在美伊战争后开

始壮大，吸收了若干伊斯兰叛乱组织。

2006年扎卡维被美军击毙。本·拉登手下的爆破专家马斯里成了组织的实际掌权者。变动并没有打击到AQI的势头，该组织反而在这一年发展至巅峰。当年年底，整个伊拉克北部和西部成为他们的活动范围。

仅一年后，AQI的泛滥暴力激起了包括逊尼派穆斯林在内的普遍愤慨，多个逊尼派武装选择与美军合作对其围剿，美军也大幅加强了对该组织的攻击力度。至2008年6月，AQI在伊拉克已难有立足之地，多名组织高层都被杀死或捕获，美军对马斯里的悬赏金额也从500万降到了区区10万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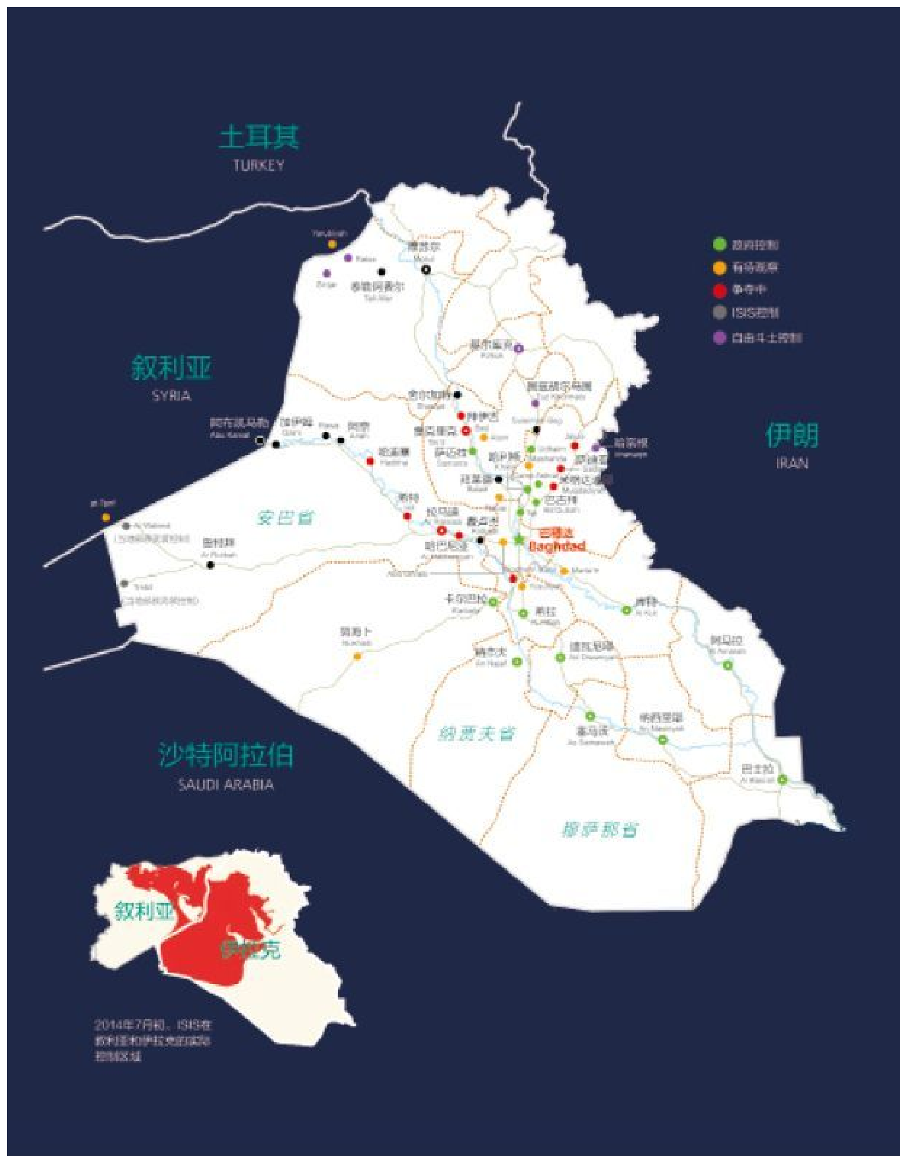
2010年4月，马斯里在一次美伊联合行动中被击毙，组织由巴格达迪接管。根据美军驻伊部队司令奥迪耶诺的说法，截至2010年6月，AQI原有的42个领导人已只剩8人在逃，其他被抓或被杀。谁也没有料到它在此后短短两年内便死灰复燃，且规模很快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美国的撤军确实为恐怖组织提供了喘息和发展空间，从这个角度而言撤军是不负责任的，但更重要的契机是2011年叙利亚内战的爆发。

2013年4月，巴格达迪用音频发布宣言，声称叙利亚胜利阵线的建立、资助都出自AQI，并宣布两个组织将从此合并，称为“伊拉克及沙姆伊斯兰国”，ISIS的称谓便来源于此，沙姆在阿拉伯语中的含义是北边，更具体而言是阿拉伯半岛的北边，即大叙利亚地区。

宣言又一次体现了该组织对摘取他人战斗果实的热衷，它很快被胜利阵线的领导人扎兰尼否认。当年6月，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西里也出面否决了它。巴格达迪拒绝接受扎瓦西里的裁决，坚持要合并胜利阵线。三方经过长期权力斗争，基地组织终于在2014年2月宣布ISIS“太过极端”，并断绝与它的一切联系。

“太过极端”，不只是基地组织与胜利阵线的一套说辞，巴格达迪的行径确实令基地组织及胜利阵线都不忍目睹的地步。ISIS在占领区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动辄大规模实施处决和酷刑，对“穆斯林同胞”也未见手软。

在叙利亚，ISIS几乎不与阿萨德的政府军做任何战斗，政府军也在进攻反对派时“漏掉”它。包括胜利阵线在内的反抗武装在前线作战，ISIS却专注于在后方抢其他反对派的地盘。因此，叙利亚反对派和西方媒体往往猜测ISIS跟阿萨德至少达成了相当程度的默契。



截至7月20日的伊拉克局势

除开在后方捣鬼，ISIS对付其他反对派的手法异常残忍。除暗杀，还公然将俘虏的叙利亚自由军士兵斩首。这些做法都使ISIS在叙利亚成为诸反对派眼里的死对头，诸反对派甚至需要搁置与政府军的对抗来优先除掉它。

ISIS并没有因为招惹众怒而遭到毁灭性打击。与政府军默契配合外加心狠手辣的ISIS占据了叙利亚北部的大片地区。ISIS得到的并非仅有地盘和物资，正如美国前陆军军官道格拉斯·欧利维特分析，“在叙利亚作战数年，要么死，要么变得更强。” ISIS当然是后者，“他们原本就是强

大的恐怖分子，但同时是糟糕的线列步兵，现在他们在后一方面的缺陷已被修补。”

ISIS的作战方式

进入六月没有几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已然一副末世景象——去往国际机场的路上到处是逃难的人群；各国大使馆和国外公司纷纷撤离其人员；唯一欣欣向荣的是私人安保公司。自从ISIS发起了惊天动地的攻势后，首都巴格达的物价全面沸腾。

造成这一切的只是ISIS不足七千人的武装。他们在防御伊军进攻时，会在普通居民住宅设置饵雷；在进攻最大炼油厂的作战中，他们用大型油罐车做自杀性炸弹。不顾敌方全城平民死活的古代围城战法也被ISIS在21世纪启用：6月19日，一群疑似ISIS武装分子，抢劫了向摩苏尔以西的Sinjar县运粮的车队。该县由库尔德武装“自由斗士”占据，庇护着众多躲避战乱的难民。ISISI武装分子要求自由斗士驱离难民，否则就彻底切断一切供给。

ISIS的作战策略异常丰富。6月25日，ISIS占领提克里特东北一处油田。该地本由当地部族民兵把守，ISIS通过袭击部族村庄，迫使民兵退去保护妇孺时，一举占领了油田。调虎离山之计被ISIS应用得相当娴熟。摩苏尔陷落前几天，亦发动过对萨迈拉的袭击。

摩苏尔沦陷并未使伊军汲取教训——也可能是无力作多点防守，他们从叙伊边界的关卡大量撤回兵力用以加强首都及南部的防御，使自己在几日后的幼发拉底河走廊作战中预先进入不利局面。撤兵留下的空虚甚至给叙利亚的反对派都带来了意外收获——6月12日，伊拉克政府军第14师基地留下的装备被胜利阵线和伊斯兰阵线洗劫，悍马车和一些重型装备都被搬到了叙利亚境内。

6月11日，在夺占提克里特、拜伊吉，并对拜伊吉炼油厂发动攻势的同时，ISIS也在巴格达以西两处同伊军交火。ISIS在多个地点同时行动，说明拥有一套流畅管理多个下级单位的命令体系，因此，认为恐怖组织各分支杂乱无章、各自为战的观念恐怕已经过时。

据伊拉克安全及反恐事务专家希沙姆·哈希米分析，ISIS依赖一个有前军官加入的军事委员会策划军事组织和战略安排。他们把自己的武装力量分作两股，一股是有能力实施阵地作战，可强攻要塞的“精英先锋队”；一股是用作潜伏、渗透作战的游击部队。两股力量相辅相成，既可夺取领土，也可管理治安。

从累积至今的战例推断，ISIS的攻击保持着明确的针对性。摩苏尔一战，重点占领了伊军指挥部、政府大楼、机场、警察局和银行；而在幼发拉底河走廊的争夺战中，ISIS懂得占据关键地点以制约伊军自由调遣的能力；对伊拉克安巴省与叙利亚交界处发起的攻击，虽然未能拿下镇中心，却攻占了至关重要的边界关卡，能够让叙利亚的生力军源源不断进入伊拉克。

尽管如此，ISIS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它的终极目标是打破一战后形成的伊拉克、叙利亚的划界，在其控制的区域建立一个伊斯兰国。要达成这一目标，ISIS必须要摧毁现代伊拉克的国家主权。

“政治成熟”的恐怖主义

ISIS在占领摩苏尔后曾颁布了源自严格伊斯兰教法的法令，对不遵守的市民施以私刑；但不到一个星期后却又废除了，并在统治摩苏尔的第一个月表现得异常宽容，仿佛一个正常政府。



2014年7月19日，在伊拉克政府军宣布收复提克里特后半个月内，双方仍然不时交战。政府军士兵站在死亡的ISIS分子身边。通过极端暴力和渗透手段，ISIS在此前席卷了伊拉克北部，大梦初醒的政府军奋起反击。

废除教法后的ISIS没有强迫所有妇女戴上面纱，不再肆意抢劫，甚至没有立即挪用银行里的资金。平民驾车进出摩苏尔也并未受到多少刁难，开往市区的车比由市区开出的车还要多。“我们只是去探亲。”一位驶入自由斗士控制区域的私家车主以一句简短回答向士兵表示他并非难民，车上面带微笑的妻子女儿证明他所言非虚。ISIS为维护统治会进行政策调整，哪怕要在教义方面妥协。

不过，ISIS的到来并非没有带来任何不利影响。水、电和汽油都陷入严重短缺，价格飞涨。ISIS的“善政”也并非面向摩苏尔每一个人，7月5日，当地的什叶派清真寺遭到毁坏，一些文物也因被视作“拜偶像”而遭砸毁。曾为政府军做事的人常被不打招呼地抓走，ISIS还为这类“罪人”举办过大规模忏悔仪式，实现精神征服。至于那些敢于反抗的人，ISIS更是予以立即的肉体消灭。

其实，ISIS并非一定要做二选一，恐怖组织的策略可选项极多。ISIS在夺占提克里特附近一个空军基地后，处决了数百名被俘士兵，并将骇人的画面拍下来，放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当伊军的空袭炸死了ISIS成员，更会集体处决战俘来宣示报复，并有意夸大残忍程度以凸显恫吓威力，比如将处死100多人吹嘘成处死1000多人。

6 月24日，ISIS在摩苏尔阅兵，并将照片放在互联网上。ISIS向人展示的是他们插满黑旗的车队，其中美制装甲车和美制牵引炮显得最为扎眼。与美国大兵的趣味相仿，ISIS成员在阅兵时也邀请了一些儿童登上其车辆，把玩武器，画面备感讽刺。

盘根交错的武装力量

经历三日梦魇般的惨败后，13日起，伊拉克政府军重整旗鼓，在什叶派民兵的协助下开始反击。在萨拉赫丁和迪亚拉两省，伊军的行动较为顺利，夺回数个失地，给以巴格达为中心的“绿区”赢得了一定缓冲。

政府军的复苏与伊拉克什叶派的总动员高度相关。6月13日，伊拉克什叶派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通过其代表发出了声明，号召“全体伊拉克人”站出来抵御ISIS的侵略，保卫自己的国家。

ISIS兵临城下之际，伊拉克总理马利基也对萨迈拉进行了视察，以示他守住圣城的决心。6月12日，萨迈拉的政府军就得到了1000名志愿者的增援，而一支名为“瓦西特火山”的政府军精英部队也于当日调遣抵达圣城，并迅速投入对ISIS的反击。

什叶派的行动绝非局限于萨迈拉一地。在巴格达穆萨纳机场的志愿者招募处，前来登记的数千人排成长队。在卡尔巴拉，因为希望报名参军的人太多，宣布只能接收其中的700人。由于官方武器短缺，不少报名者还自带了装备。招募人数最多的地点是海港城市巴士拉，当地安全部门宣称志愿者组成了一支13000人的地方安保部队，以填补伊军第14师和边防警卫部队调往前线之后的空白。

什叶派志愿者能在短短数日被军事动员，是因为此前的一系列事件

已经为它打下了基础。若干重要什叶派武装，在4月的大选之前就为可能出现的紧张局势而动员起来。而自2013年8月起，为应付安巴省叛乱，总理马利基就开始招募什叶派部族成员加入伊军，并构建起与什叶派民兵并肩作战的联络体系。

然而，这些什叶派武装为现代伊拉克国家带来的并不全是有利因素。显而易见，动员的结果将导致现政府更加宗派主义化，为逊尼派群体带来更大压力。

其实，不依靠什叶派民兵，伊拉克政府武装的实力也未必落于ISIS下风。伊拉克国家武装力量包括隶属国防部的三军，隶属内政部的警察部队、边防警卫部队和设施保卫部队，以及一支由直属总理的反恐局负责的特殊行动部队。虽然伊拉克军队的后勤和情报能力堪忧，且被严重的腐败及宗派主义困扰，但庞大的规模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消耗掉。

库尔德人武装“自由斗士”是伊拉克政府军的一个特殊盟友。虽然追求的是本民族地区的自治与安全，但库尔德人与美军和伊拉克政府军都保持了长期的精诚合作关系。在北部，一些来自自由斗士的库尔德营直接编入了伊拉克政府军，自由斗士的精锐“眼镜蛇部队”在巴格达也部署了三个连。今年6月，当政府军在伊拉克北部一触即溃时，正是自由斗士果断行动，为伊军守住了基尔库克等要地。

自由斗士接管的基尔库克成了伊拉克最为宗派和谐的地方，库尔德人、土库曼人，无论什叶派还是逊尼派，都积极站出来防范ISIS的攻击。自由斗士的士兵为此感到兴奋，“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保卫自己的边界！”信奉基督教的亚述神父对他们表示充分信任。不过，如果北方的混乱局势持续日久，加上伊方宗派主义的成长，双方的伙伴关系能不能维持下去还是一个问题。

讽刺的是，ISIS作为宗教极端组织找到的伙伴却最无关宗教。其最主要盟友是纳格什班底军（简称JRTN），该组织由萨达姆时期的复兴党残余组成，领导人为萨达姆的助手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JRTN选择与ISIS合作显然是因为双方都有共同的敌人，与ISIS不同，JRTN非常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标榜自身只针对伊拉克政府及其武装盟友，不袭击平民。

无论JRTN如何标榜自己的清白，他们参与的“革命”都是由ISIS主导的。JRTN引狼入室的作为很快就让他们遭到了反噬。6月21日，在基尔库克西南边，JRTN与ISIS发生火并，同时还有JRTN的一名高级干部被ISIS逮捕。冲突是由于ISIS试图统一整个叛乱阵营的指挥权导致的。

处境最为尴尬的是逊尼派武装。他们并不希望成为恐怖分子的盟友，也基本无心参与伊拉克北部的乱局，但若伊拉克的宗派主义继续甚嚣尘上，逊尼派武装很可能会面临要么独自面对宗派仇杀，要么为ISIS效劳的两难选择。由于6年前逊尼派武装与美军的精诚合作，大大削弱了ISIS的前身AQI，所以，如果ISIS掌控了局面，同属逊尼派的武装民兵很可能遭遇血腥的清洗。



2014年**6**月**29**日**ISIS**宣布建国后，一名该组织武装分子举起旗帜，拿起全球恐怖分子的标准配备**AK**步枪，走在摩苏尔大街上。

马利基的宗派责任

2013年1月25日，一场名为“星期五绝不撤退”的逊尼派游行示威席卷了伊拉克多个城市。在安巴省城市费卢杰，示威者与伊军士兵发生了致命的冲突。军队为阻止部分示威者前往市区一处示威场地而封锁道路，引起示威人群不满。示威者向士兵投掷石块和矿泉水瓶，甚至纵火焚烧军车。军队一开始鸣枪示警，试图驱散示威人群，而后朝示威者开枪，7名示威者被打死、70余人受伤。作为报复，三名伊军士兵事后遭当地人枪杀。

从此时起，“逊尼派三角”一发不可收拾地走向彻底叛乱。尽管最初的示威发生在“抵抗之城”费卢杰，但抗议本身并不推翻伊拉克的国家认同。示威的对象是伊拉克总理马利基，逊尼派认为马利基在竭力推行宗派主义，其政府指定的反恐法律被用来逮捕和骚扰逊尼派。作为伊拉克公民，逊尼派感到其日益被边缘化。

示威者的观点并无偏颇。伊拉克安巴省的逊尼派民兵是马利基推行

宗派主义的典型受害者。这支名为“拯救伊拉克的国民议会”的武装，又称“觉醒运动”和“伊拉克之子”，多达54000人。由美军资助组建起来，一度连薪水都由美军直接支付，并在剿灭伊拉克基地组织的行动中立下汗马功劳。

2008年，美军撤离计划出台，觉醒运动由伊拉克国防部接管。国防部只吸收其中四分之一成员加入政府军，剩余成员全部失业；而觉醒运动的领袖更是没能得到善终，2009年3月，其领导人之一的阿代尔·马沙哈达尼因挑起部众与政府军之间的武装冲突而被捕，同年11月，他因涉嫌在那次冲突中杀害一名平民女孩而被判处死刑，于2013年1月21日执行完毕。

马利基执政数年内，伊拉克逊尼派上层“涉嫌恐怖主义犯罪”的人越来越多。阿代尔并非其中最响亮的人物，在他被处死前一年多，逊尼派出身的伊拉克副总统哈希米也被指控“策划多起袭击暗杀什叶派官员”，2012年9月，已逃到土耳其的他被缺席判决为恐怖主义罪犯，并判处死刑。

因此，在2007年，时任美国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就向伊拉克议会提出过建议，希望他们选择“更少制造分化、更多促进统一”的人来领导国家，暗示马利基是一个不堪大用的宗派主义分子。马利基则依仗国家主权批评美国人把伊拉克“视作了自己的财产”。

马利基厌恶美国的情绪由来已久。他原本是复兴党统治时期被取缔的伊斯兰达瓦党党员，1979年身份暴露后逃往了叙利亚。此后，马利基在大马士革和德黑兰两地交替居住，并在伊朗与真主党的支持下从事推翻萨达姆的活动。结果，真正成就马利基政治目标的却是美国。萨达姆倒台后，马利基加入了伊拉克临时政府，从事清算前复兴党官员的工作，并由此踏入政坛。

除了处理不好与美国的关系，马利基还眷恋权力。2007年1月，马利基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他希望在2009年结束自己的任期，2010年大选成功后，他食言了。2011年2月，马利基的发言人又出来表态称，总理可不会成为“阿拉伯之春”中的一个死结，他不会再追求第三个任期；结果，2014年4月的大选造成了伊拉克国内紧张局势升级，马利基仍然没有兑现三年前的承诺。

在伊拉克战争后形成的政治格局中：伊拉克总理一职由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担任，议会议长一职由逊尼派担任，而总统一职由库尔德人担任。这一格局若能坚持下去，剿灭ISIS的任务依旧有望实现。

（实习生 席小丹、冯维对此文亦有贡献）



新疆报道、反腐系列、国际要闻更多精彩文章尽在凤凰周刊

凤凰周刊精彩封面故事之——反腐系列报道

2014年23期：朋党周永康（新刊）

2014年20期：徐才厚往事

2014年11期： 谷俊山案大起底

2013年34期：中纪委反腐2013

2013年33期：李春城案余震

2014年04期：内地航运也贪腐“黑洞”

2014年01期：贺国强中央十年

2013年32期：中石油肃贪

凤凰周刊精彩封面故事之—新疆系列报道

2013年15期：新疆极端势力内控报告

2014年15期：暴恐视频流毒新疆

2014年12期：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

2014年08期：昆明暴恐事件内幕

2013年35期：宗教保守思想危机新疆

2013年21期：新疆七月维稳

凤凰周刊精彩封面故事之——宗教系列报道

2014年18期 ：全能神在台湾

2013年35期：宗教保守思想危机新疆

2013年28期：被通缉的“活佛”

2013年31期：东正教在中国

2014年07期：大陆民间宗教管理变局

凤凰周刊精彩封面故事之——国际政治系列报道

2014年16期：大陆再现普京热

2014年17期：印度大选观察

2014年13期：安倍政权在干什么

朝鲜系列0元特刊

2013年07期：朝鲜麻烦

2014年14期：新加坡模式榜样危机

2014年10期：克里米亚豪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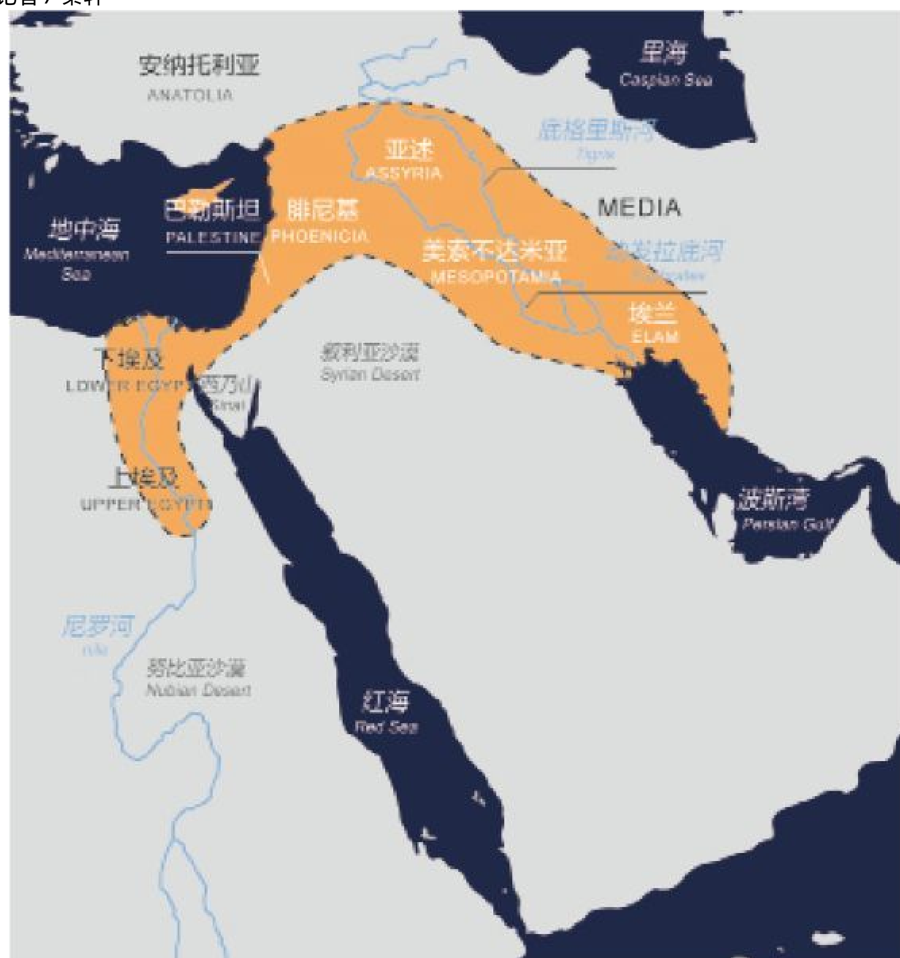
2013年03期：越南 停滞的改革

凤凰周刊更多精彩封面故事

新月沃土的溃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阿拉伯世界从不缺乏政变、冲突和战争，而稳定的政治经济发展，罕与此地有缘。阿拉伯世界建立起的军人世俗专制政权，曾带来过一段相对安定却压抑的时光。不过，三年前的“阿拉伯之春”宣告了新的动荡纪元来临。狂飙猛进的ISIS是溃败的新月沃土上长出的最新怪胎。

记者／秦轩



人类最早成熟的农耕文明，分布在大体成弧形的地带。这片地带在努比亚沙漠北上到地中海南岸，向东延伸，经过西奈抵达亚洲，夹在安纳托利亚半岛和叙利亚沙漠之间，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尼罗河、约旦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为这片土地提供了肥沃的养分。基于其独特的地理禀赋，美国学者为这片土地命名为新月沃土。

对于阿拉伯世界而言，ISIS的建国运动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它不仅标

志着阿拉伯世界世俗化努力再一次遇到严重挫折，作为舞台上主角的ISIS更提出了“穿越”味道十足的政治主张，彻底否定了一切现代元素。

世俗共同体的衰落

阿拉伯世界百年以来建立的国家，绝大多数为现代民族国家或王国。即使是1979年，波斯什叶派穆斯林创建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接受了宪政，治国方略中吸收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此次ISIS希望创建的国家形态则纯以神权确立合法性，希望在21世纪重现奥斯曼哈里发帝国。

该军事团体的名称涉及沙姆和伊拉克，即地中海东岸和两河流域。这一地区加上尼罗河下游的埃及、叙利亚南部的约旦河流域，因形状像月牙并且土地肥沃，被考古学者定义为新月沃土，曾是人类最初发展农业和家畜的地带。

新月沃土和北非地中海南岸、阿拉伯半岛及波斯湾沿岸的海湾国家构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大致轮廓。但近代以来的阿拉伯世界发展中，新月沃土除约旦王国外，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在前现代史上，新月沃土便是阿拉伯文明的中心，伊斯兰时期的各大王朝中心大马士革、巴格达与开罗均在这一地带。

现代新月沃土的国家边界划分，是一战英法干预的结果。本土的权力精英与思想者，则主张建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所谓叙利亚国、埃及国和伊拉克国等等，只是暂时的分裂状态。

在关于国家地理边界的想象上，他们和现在的伊斯兰军区别不大。令人唏嘘地是，百年来，传统精英力求在这片土地上推行世俗化的统治，主张伊斯兰教应停留在指导精神生活的范畴内。与阿拉伯半岛及海湾国家相比，新月沃土原本是阿拉伯世界世俗化努力程度最高的。而今，这片区域却成为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圣战”战场。

局面的产生，自然与“阿拉伯之春”有关。自其3年前爆发以来，在埃及执政30年的僭主穆巴拉克垮台，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国家共识至今未达成，而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陷入长期内战之苦；萨达姆政权虽早在10年前被美军赶下台，但民主制度框架下的新政权，激起了族群教派纷争：权力日渐向什叶派过分倾斜，为逊尼派军事集团的梦想提供刺激和空间。

“阿拉伯之春”之前，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央权力与市民社会间的冲突。僭主政权致力于以国家干预改造社会，聚拢政

治经济资源后，日渐形成一套腐败、僵化的权力结构与利益分配网络。国家机器惯于以安全为理由，以牺牲部分群体利益、权利乃至性命的恐怖治理，维护勉强运行的社会秩序，直至崩溃。持续3年的动荡，不仅从“阿拉伯之春”走到了“阿拉伯之冬”，更消耗了权力曾努力塑造的世俗国家共识和社会耐心。

当权力集团与社会均告疲惫、沮丧乃至绝望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军事集团的兴起理所当然。打破国与国的边界，试图掀起宗教战争7世纪四大哈里发时代伊斯兰最初的荣光，其立场基于原教旨的宗教思想，其主张无视现行的现代民族国家秩序。他们以复兴为名希望重构阿拉伯世界。

此前新月沃土政治理念的基石是世俗化、社会主义加泛阿拉伯主义。为达成这三者，历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付出心血无算。但此时这片土地却出现了渴望重演早期伊斯兰初期扩张的宗教军事集团，堪称痛苦和讽刺。

由此不能不检讨，究竟是什么让新月沃土上的阿拉伯社会和国家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拼凑的共同体

作为西方的近邻和对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沙皇俄国一样，是最早尝试西化的地区。彼时最为激进的西化，没有发生在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地带，而是发生在埃及。

19世纪后半叶，埃及的总督曾说过，埃及从此不是非洲的一部分，而是欧洲的一部分。自默罕默德·阿里以降的历代总督，在尼罗河以东沿岸，传统开罗的南部复制了巴黎的古典建筑及街道。在此后100年这一地区成为埃及世俗精英的聚集地，而其核心地段的解放广场即“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反抗集权的集会空间。

阿里总督及其子嗣的现代化运动为纳赛尔时代的埃及留下足够丰厚的遗产，使后者在产业、人才和文化资源的占有，超过同期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总和。如果没有这场运动，纳赛尔时代的埃及便不会成为其他阿拉伯民族仰望的主体。



阿拉伯之春图解

百余年前，地中海东岸的社会精英以伊斯坦布尔和基督徒地区为跳板接触了现代思想。当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还在过着传统游牧生活时，大马士革、巴格达和贝鲁特的上流精英开始酝酿阿拉伯民族的观念，寻求在奥斯曼帝国中获得更多的自治。

在19世纪后半叶至一战前，土耳其民族主义一度成为伊斯坦布尔的主流，并着手清算其他民族在帝国权力体系中的地位。这自然激起了阿拉伯精英的民族自觉意识。1913年，阿拉伯大会在巴黎召开，这一事件被定义为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起点。问题是，这一大会离民族独立、建立现代阿拉伯民族国家的愿景相去甚远。大会的组织者所期待的，只是奥斯曼帝国的去中心化，实现阿拉伯的联邦自治。此届大会成为阿拉伯贵族与土耳其民族主义势力交换地位的筹码。

而当时阿拉伯上流精英中流行的不光有泛阿拉伯主义的民族认同，亦有区域性认同。埃及有基于数千年前的法老和希腊统治历史资源，可建构埃及民族认同；叙利亚有追溯到腓尼基人的叙利亚认同，时至今日主张叙利亚认同的党派——叙利亚社会民族党依然活跃在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党员数量庞大；黎巴嫩山区的亲罗马基督徒又有独立的打算。相比而言，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的嗓门要小得多。

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独立运动”由英国人在帝国的边缘地带阿拉伯半岛推动。牛津大学的两位精英劳伦斯和“沙漠的女儿”贝尔女士，先后辅佐来自麦地那的王子费萨尔称雄阿拉伯。

1921年，在丘吉尔的统筹下，现代阿拉伯国家划界成形。不过，由于法国的干预，费萨尔王子建立大叙利亚国的努力失败，黎巴嫩国独立。贝尔女士通过亲自勘探和地图上的仓促勾画，决定了今日伊拉克的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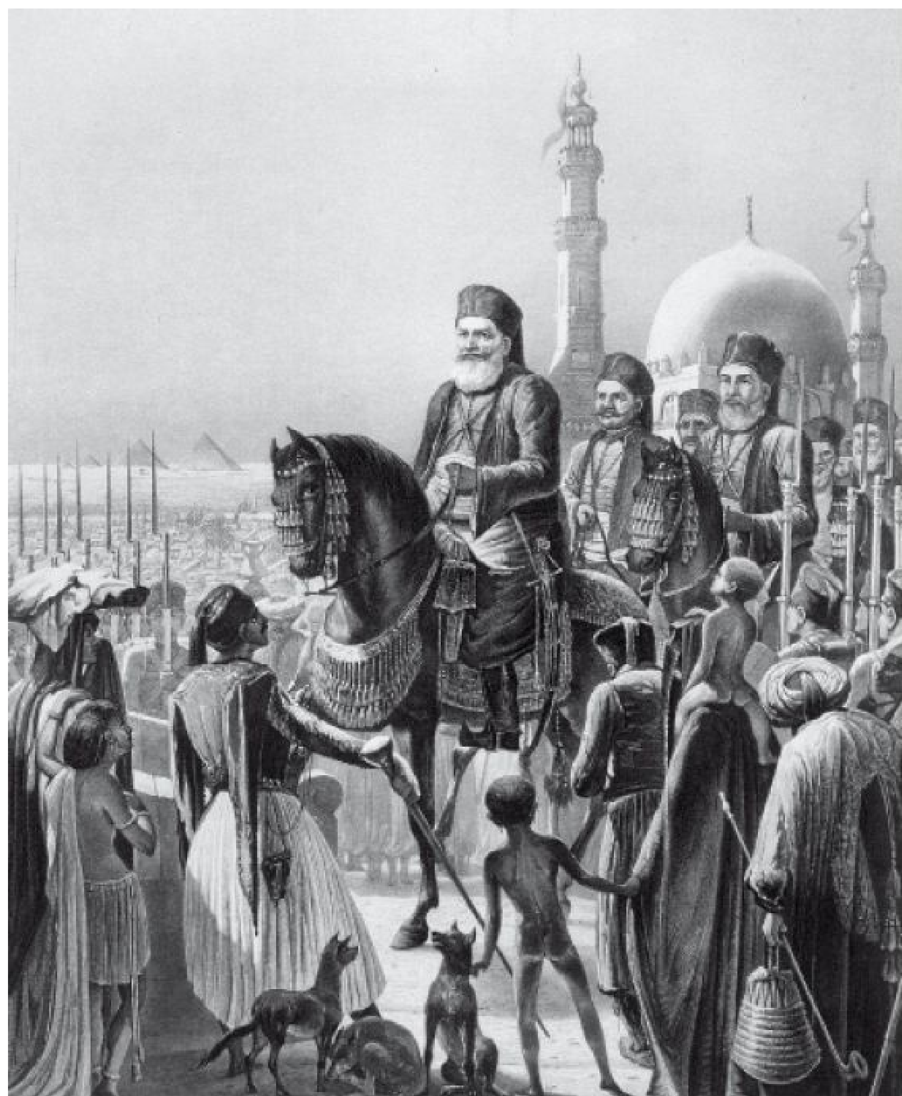
在巴格达，有无冕之王之称的贝尔女士将费萨尔王子引见给伊拉克部族头领及宗教领袖。她所考虑的重点是，费舍尔虽然是逊尼派穆斯林，但来自先知家族，可以为崇尚圣裔血统的什叶派势力接受，至于库尔德人的地位问题不在考虑之内。

某种程度上说，地图划分象征着大英帝国对于现代治理的自信心。伊拉克与叙利亚的边界，以及伊拉克与伊朗的边界，基本呈直线，完全忽略了本土地理与文化禀赋特征。有人对贝尔提出质疑，其答复是反正边界会改变。她显然无法想象，在若干年后伊朗和伊拉克会因为这条在地图上划出的边界，付出上百万生命的代价。

回顾历史，英法列强基于自身战略与石油开采需要划出的格局多遭后世诟病。尤其是扶植以色列的诞生，在地理和思想上成为打入阿拉伯统一的楔子，在激发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同时，也为之造成至今无法逾越的障碍。伊朗前总统内贾德“要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否认纳粹大规模灭绝犹太民族的言论广为人知，而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曾在餐

后吃完新鲜橄榄后吐出核时，对周边的亲信说：早晚有一天，我要像吐出橄榄核那样把犹太人从中东赶走。这并不只是世俗专制和神权共和政体下权力精英的一致想法，在民间也大量存在。

无论如何，当时阿拉伯格局由英法两国主导，与本土上流社会精英、酋长、财阀及阿拉伯贵族合谋，硬生生地框出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盖子，其国家设计并没有考虑一个极为复杂的前现代社会转型的困难，社会内部的格局错位：上流社会接受了西方现代理念，而下层社会保持着帝国臣民的心理状态。当国家的框架确定，社会自行发育生长，现代化波及到整个社会时，权力的重新分配和诸多意想不到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上图 **1841**年，穆罕默德·阿里，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的总督，在同僚的陪同下走在开罗街头。



下图 **3**年前，埃及解放广场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导致穆巴拉克政权垮台。解放广场周边为**19**世纪的埃及总统兴建，完全参照彼时的巴黎街区。

民族国家的巩固

二战结束，阿拉伯民族便开始了一系列挣扎与动荡。在国家内部，共识需磨合而成，权力需要结成体系；而冷战及对以色列的战争构成外部刺激。叙利亚仅在1946-1956年的10年间就有过20个内阁及4份宪法；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亦先后出现数次政变。

政变往往由来自下层社会的军事集团主导。在原有的格局里，军队成为下层平民获取现代组织资源与权力的狭小通道。军队中的平民军官容易对阶层间的巨大差异形成情感上的排斥，又有着强烈的国家荣誉感。当阿以间的战事屡屡以阿拉伯一方失败告一段落时，他们认为有钱有势而又腐败的老派统治者应被驱除，国家需要新一代现代精英统治才有希望。

上世纪50年代，纳赛尔主持的自由军官组织通过政变颠覆旧法鲁克王朝。但法国大革命式的血腥被避免，老国王被驱逐了事。旧政府中的老官僚被清算。

最终获得稳定掌权的一派认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以统一阿拉伯国

家为要务。另一方面，则需要彻底改造阿拉伯社会，使之现代化，只有国家权力才能承担这一重任，由此应当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意味着权力的世俗化。

基于冷战格局和执政理念，使纳赛尔式的改革更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翻版。在政治上，纳赛尔取消党派，消解政治党派生态的竞争，而以国家掌控下的层级代表大会制设立民意表达的空间和渠道。权力日渐集中。

在国家治理上，纳赛尔主持了国家农业用地的改革，通过测绘与丈量土地，将传统模糊的农业地产产权明确，纳入到国家的管理体系之内。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型工程偏好在他身上亦显现无遗。苏联专家指导援建的阿斯旺大坝是其中杰作，改变了尼罗河下游千百年潮汐泛滥的规律。

纳赛尔主张国有企业为主，但没有推行清算改造私有企业的社会运动。其将资源和产业国有化的冲动更多基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立场，而没有接受苏联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

纳赛尔上台不久后，同样信奉泛阿拉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阿拉伯民族复兴党在叙利亚掌握政权，该党派同样主张以国家改造社会，排斥多党制，但在叙利亚并没有跃出议会政治的框架进行激烈革命。

由于担心叙利亚共产党上台带来威胁，叙利亚民族复兴党及部分军官选择与纳赛尔合作，选择两国合并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基础。彼时，纳赛尔因将苏伊士运河成功国有化，成为阿拉伯世界乃至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者的英雄偶像。在泛阿拉伯主义者心目中，纳赛尔仿佛19世纪后期普鲁士的俾斯麦，是完成阿拉伯民族统一大业的最佳人选。

有趣的是，在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阿拉伯权力精英中，对于阿拉伯统一大业倒不那么关心。沙特国王在接管阿拉伯半岛时，甚至曾向英国人抱怨过，自己被来自哈希姆家族的敌人们给包围了。

国家改造社会

纳赛尔以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信奉两点诉求，一是阿拉伯民族需要统一，二是国家权力应集中，以主导改造社会的任务。累积到今天的历史经验表明，这两个诉求具有内在矛盾。无论是纳赛尔还是民族复兴党，都支持一党执政。由该党负责掌管国家权力机关推行对社会的改造。当国家合并以后，即意味着各国的权力核心需要重新凝聚，原有的权力架构解体。除非两个原有的权力架构均告解体，重新洗牌，否则即

变成吞并现象。被吞并一方改造本土社会的诉求必然失望。

1958年，叙利亚与埃及“闪婚”。纳赛尔希望以埃及的一党制改造叙利亚政体，要求叙利亚的民族复兴党自行解散。遗憾的是，解散后的叙利亚政治精英发现，自己在这个新家的中心——开罗中所能做的很少。在叙利亚，他们觉得那些从开罗派来的埃及家伙，各个都以为自己是纳赛尔。叙利亚的资源依附于开罗，但埃及的市场却没有向叙利亚开放。资源匹配的不公、权力体系的消失，导致了“离婚”。

这段“婚姻”只持续了三四年，但达成阿拉伯民族统一的共识依然是阿拉伯权力精英挥之不去的情结。70年代，在卡扎菲的策动下，利比亚、叙利亚与伊拉克又曾有过同样失败的尝试。

若干次联合的失败与对以色列战争的持续战败，几乎扑灭了新月沃土阿拉伯人民决心统一的期望。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三国除了在国旗上保持着统一的基调，实际已分道扬镳。1973年，萨达特以战促和，将埃以冲突画上句号，从此埃及放下泛阿拉伯主义的旗帜，以色列的对外战争也变成叙以冲突、巴以冲突和黎以冲突。

山中无老虎，侯赛因称大王。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接过纳赛尔的大旗，在他治下，伊拉克社会看上去总是处于战备状态。80年代两伊战争爆发，90年代海湾战争，直至2003年伊战溃败。萨达姆的宣传机器总是用军事用语描述政治主张和决策，“油田会战”、“建设攻坚”，颇类似毛时代的中国大陆。



一战前的地图：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早已没有了昔日围困维也纳的气势。北边的俄罗斯从外部侵蚀着它的疆域，欧洲商人则渗透到权力的内部。上层统治者宁可把垄断经营的权力出租给外国的商人以换取贿赂，也不愿扶植本土的商人、企业家发展商业。



牛津大学毕业的劳伦斯以知识、意志力和眼光获得了阿拉伯反抗者最高级的尊敬。他热衷于帮助阿拉伯人建立适合时代的文明秩序，并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现代阿拉伯世界最初的轮廓，为此他不惜与伦敦当局的政客发生冲突。



当哈希姆家族的王子，叙利亚国王费萨尔抵达巴格达时，贝尔女士一边喝咖啡一边向他引见本地的部族首领。作为大英帝国对阿拉伯世界最为熟悉的人之一。她的意志力和智识让身边的男人无法轻视。热爱考古的贝尔女士为伊拉克留下了一座博物馆。博物馆不幸在战火中遭到破坏。

叙利亚则更专注于地中海东岸事务和国内建设。放弃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民族复兴主义的实质已经变成以某一权力集团掌控社会，实施“车同轨，书同文”式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改造固然以现代性为价值取向、为目的，但同时约束了社会精英的表达空间和竞争的生态。由此，国家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同样的现象，国家改造社会的问题日渐显现。官僚化，效率低下，腐败滋生。

至80年代，党派转化为权力的外壳。家族人脉的庇护网络决定权力的分配与流动。埃及的穆巴拉克、叙利亚的阿萨德家族和伊拉克的萨达姆家族长年把持着国家的最高权力。权力的固化及对民间社会的管控同步进行，致力于将生机勃勃的社会凝固为盆景。某种程度上说，除去对外战争，那些年倒是内部社会最为稳定和平的年代。

冷战为统治者带来充足的外援供给和财政补贴，保证专制的大体稳定。美苏争霸年代的消逝，使独裁者在国际安全与军事格局中沦于“准失业”状态。除了石油能源领域，国家亦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渐处下风。虽然迫于外界压力和内在需求，埃及、叙利亚等国均有“改革”的动作，但成效不大。直到突尼斯小贩自焚掀起“阿拉伯之春”，权力与社会的脆弱关系彻底暴露，噩梦开始。

失败的社会

经过长期的战争状态和内部管控，新月沃土的三个大国面目接近。

社会精英依附权力，靠腐败与人脉获得生存寄养；有信念的知识分子逃亡或被关进监狱；权力机器总有一套法外之法，往往以紧急状态为名抓捕危险分子；官吏和警察靠勒索获得收入。敲诈与谎言无时无地不在发生。当权者靠发放近乎免费的大饼收买穷人，却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无计可施。10年前，记者在大马士革的电视节目里已经看到当地喜剧，一名拿帽子遮挡私处的小胡子抱怨说，他拒绝一切中国制造的物品，只好光着。

本地产业被远东的竞争者夺去市场的同时，人口的生产却节节攀高。80年代后期至2010年前后，中东世界人口剧增。在1989-2009年之间，埃及人口增长2800万。叙利亚和伊拉克人口分别增长800万和1000万。人口增长超过50%。远远超过权力所能提供的饭碗。

如果平民不能对僭主俯首称臣，那就靠警察和秘密警察强按下他们的头。记者10年前在大马士革游历，随处可见军人的身影。政府机构前则往往有便衣密探乱逛。巴扎里的每一个商铺都挂着领袖阿萨德父子的头像，教堂里也不例外。此次内战期间，每当叙利亚政府军收复一块失地，领袖头像的宣传海报便会重新“占领街头”。



泛阿拉伯主义者心中的俾斯麦，埃及总统纳赛尔在他的居所。

在这样的社会里，宗教组织几乎是最大限度超脱管制的民间组织，承担着对平民和底层人员的救济功能。当普通人无法从权力资源获取帮助时，他便寻求亲戚或宗教组织的救济。在组织功能之外，宗教与集权者的分歧不仅仅是宗教化还是世俗化的分歧，也有根本的治理冲突。现代集权国家试图将国境内的每一寸土地和人口明确，推行标准化和网格

化管理，而忽略本土生活方式和熟人社会的模糊性。宗教和巴扎却是传统生活方式、本土知识的把持者。

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势力成为反抗极权的中坚力量，似乎也是无可奈何。其他反对派的组织能力和社运的激情无法与宗教相比。甚至，国家越集权，溃败后的反抗越极端，越具有革命性。中间温和派长期贩卖虚假希望以致政治品格遭人诟病，且因温和立场并不选择组织起来，故丧失了在革命后的接盘能力。

宗教革命的力量

无论是在埃及、叙利亚还是伊拉克的各个城市，几乎每个社区都分布着清真寺。在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当局可能因为打压某一派别限制清真寺的兴建，但无法承担与宗教传统整体决裂的风险。

每个星期五信众在清真寺聚集，共同祈祷，再由阿訇宣讲经文和时事。清真寺可以成为组织与社会动员的据点。这使得当社会动荡时，宗教成为最有效的抗拒权力的组织。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那场攻占卡扎菲“皇宫”阿奇奇亚军营的冲锋信号，即依靠皇宫附近一座清真寺发动。在组织的水平上，唯有军队可以与宗教组织抗衡，但世俗取向的阿拉伯国家军队里却没有那么多的“政委”式阿訇，可以发动群众。

1930年代，埃及创立穆斯林兄弟会，以医院和教育起家，日渐成为对阿拉伯世界政治有影响力的宗教社会组织。在1952年埃及自由军官政变中，穆兄会成为军官们在民间最大的支持者。此后，宗教组织滋生繁多，分衍出激进与温和派。二者的共同点均期望于以伊斯兰教义传统作为社会立法基础，分歧在于采取的方法与行动不同。

世俗政权与宗教组织相对抗，时有暴力发生，最惨烈的莫过于1980年代叙利亚官方将穆兄会占据的一座城市彻底推平。而在90年代以来，穆兄会亦出现温和转型的势态，与统治者建立一定默契的“停战”关系。遗憾的是，一年多来的埃及政治史表明，军队与穆兄会总统之间并不能进行有效而得体的对话。

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什叶派宗教势力成为革命的骨干与成果接收人。伊朗创建了将伊斯兰神权与世俗政权结合在一体的体制，也为其他地区的什叶派与逊尼派伊斯兰宗教组织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案例。虽然寄托传统和清真寺组织信众，但伊朗伊斯兰主张与西方现代思想悄悄做了妥协。革命的斗争经验及其后治国方略吸收了列宁-斯大林式的左翼共产主义主张，其建国后的成文宪法与柏拉图式的教权——政权逻辑，也

是伊斯兰世界首创。

相较而言，此次逊尼派伊斯兰极端组织似乎没有学到什叶派对手的优点。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在革命之前已经公布了自己的神学政治体系，看上去似乎可以让一个现代性的官僚与权力机器运转起来，且和国际社会接轨。而“伊斯兰国”应该是什么模样，似乎谁也没说清楚。

而今可以明确的是，无论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社会复兴的梦想，都不能给新月沃土的僭主们提供哄骗民众的法宝。而新的治国思想尚未登场，反极权与动荡激发的能量与原教旨的宗教情绪相结合，人人以宗派、宗族划清界限的日子正在降临。

接下来的问题是：原有的民族国家会否成为僭主们的陪葬品？冷眼旁观且近乎唯一成形稳定的共同体库尔德人是否会宣布独立？历史经验显示，未来难以预测，曾经微小的“蝴蝶”在巴尔干、柏林扇动过改变无数人命运的翅膀，谁知道这股原教旨军事武装是否也会是这样的蝴蝶呢？

（实习生 张蕴慧、席小丹、冯维对此文亦有贡献）

伊拉克反恐十年

伊拉克政府军的溃败到底是不堪一击的铁证，还是有深层次的复杂原因？从2003年英美联军闪电推倒萨达姆政权直至撤军，剿灭恐怖分子的行动为什么无法放开手脚？

记者／陈祥



2003年**4**月**9**日，伊拉克战争开始不到**20**天，美军已经占领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位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爆破兵柯克·达尔林普尔，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望着被炸倒的前独裁者萨达姆雕像。

“美国的做法等于是把手伸进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马蜂窝，指望仅仅用我们的存在就能安抚那些马蜂。”科林·鲍威尔曾对里根时代美国出兵黎巴嫩做出这样的评价。而今，这句话在伊拉克也应验了。

“灾难性的胜利”

2011年圣诞节前十天，留在伊拉克的最后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降下了巴格达机场的国旗。在此前后的一个月，美军进行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复杂的物流活动。在美国陆军准将布拉德利·贝克指挥下，美军关闭了数百个基地，打包数百万件设备，用包括船舶海运、飞机空运、卡车陆运在内的一切手段运回美国或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基地。

此后美军将士的家属，当然会为自己的亲人脱离危险地带而感到高

兴，但伊拉克最高级别的军事官员巴巴基尔·扎巴里中将心情却糟糕至极。在美军进行大搬家的同时，他对听他讲话的每个人都说：美军至少要在伊拉克呆到2020年，到那时他的下属才有能力确保伊拉克的安全。

时光回溯到八年前。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足以进入各国军队教程的闪击战。美英军在空袭的同时开展地面进攻。伊军溃败之快超乎世界的预料。伊拉克战争时联军的规模不及海湾战争的一半，真正耗费的时间却只有海湾战争的一半，决定性的前26天仅有161人阵亡，之后萨达姆政权土崩瓦解。

胜利之快远超预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上将、中央司令部司令汤米·弗兰克斯上将、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一起将惊喜的局势戏谑为“灾难性的胜利”。他们一语成谶，前独裁者萨达姆确实给伊拉克留下一堆糟糕的遗产。

1991年1月13日，时值联军发动空袭前夕，萨达姆将“真主伟大”写入到国旗中央，此举意在争取盟友，但收效甚微。萨达姆领导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以下简称复兴党）是一个世俗性政党，但为克服海湾战争惨败后伊拉克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困境，萨达姆在1993年发起大规模的“信仰运动”。

从此，萨达姆以狂热的穆斯林形象出现，他开始在演讲中大段引用《古兰经》，政府出面大建清真寺，关闭舞厅、酒吧等娱乐场所。1994年，伊斯兰教法进入刑法。萨达姆复兴宗教的种种措施，极大影响了伊拉克社会，为日后反美的极端宗教武装培育了生存土壤。在伊拉克战争开战前数周，伊拉克甚至开始招募全球“圣战”分子，萨达姆给予志愿者们以本国特种部队同样的丰厚薪水。

战争初期，萨达姆敢死队便成为伊拉克非正规军力的核心，它很快吸引数千名来自穆斯林世界、希望与西方决一死战的外国战士。他们来自叙利亚、利比亚、保加利亚、土耳其、突尼斯、埃及、阿联酋、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美军很容易从他们的尸体上捡到形形色色的护照，入境记录显示很多人是从叙利亚过境的。

当美国驻伊最高文职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解散伊军和复兴党后，很多无所事事的前成员加入到了叛乱组织，躲在民众中进行恐怖袭击。而越战经验表明，叛军可以无所顾虑地使用一切手段，而美军在本国媒体监督下，必须尽力避免民众伤亡，意味着被束缚住手脚。最后，在战场上并未占过优势的叛军能成功影响美国选民，使军队撤出战争终结。

2003年8月19日，一辆装满炸药的平板卡车撞进联合国驻巴格达总

部，23名联合国官员在爆炸中身亡。美军曾警告联合国须设置水泥堑壕和大门等保护措施，联合国方面不以为然，还讽刺这般做会跟美军的糟糕形象没两样。于是，惨案后联合国撤出了伊拉克。与此同时，恐怖分子成功使欲参与重建工作的国家和民间组织望而却步。

自2003年起就在伊拉克开展人道主义救治工作的无国界医生组织，曾在暴力袭击频发的2004年面临两难境地，当年9月24日曾表示要坚持驻在伊拉克以尽可能救治更多的平民，但当年11月还是决定撤离。

困境中的美军



2003年3月29日，抱着伊拉克儿童的美国海军一等医护士官理查德?巴奈特。随着战争的进行，伊拉克内陆的平民家庭卷入战火，美军非作战支援部队展开人道主义救援。

在回忆录《已知与未知》里，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指出了美国在伊战中的最大困境：伊拉克和阿富汗是21世纪头两场，也是首次将军事行动在博客、谈话类广播节目和24小时新闻频道上做即时报道的战争。

“我这一代的记者们，总是习惯戴上‘水门事件’或者‘越战’的眼镜看待所有事物。”布什在回忆录《抉择时刻》中抱怨。

国防部长和总统不约而同说出了美军的最大束缚——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将战场直播了。信息传递的扁平化，媒体人更需要急切抢新闻，真相往往是断章取义的局部。

2003年4月，当陆战队在巴格达天堂广场拉倒萨达姆雕像，激起的

伊拉克市民全场欢呼声尚未退去，伊拉克多地已陷入程度不一的治安混乱中。最初，掠夺行为集中在粮店、政府建筑、废弃的政府高官官邸，随后有组织犯罪频现，从抢劫物资进化到敲诈、绑架、暗杀等。

4月9日，美军攻占巴格达，忙于追歼残敌、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查找政府文件、逮捕官员的美军无暇维持治安，于是，举世闻名的伊拉克国家博物馆在权力真空下被暴民洗劫。窃贼们扛着各种藏宝满载而归，博物馆一地狼藉，这画面瞬时在全世界传播开，各国舆论纷纷指责美军纵容暴行、践踏伊斯兰和阿拉伯文明。

“不负责任的报道贻害无穷。”拉姆斯菲尔德愤愤不平地说。博物馆事件只是一个开始，美国将陷入更深的舆论漩涡中。2004年4月初，陆战队进攻叛乱武装集中的费卢杰，美军在战术上完胜，但是舆论战依旧惨遭滑铁卢。费卢杰又名“清真寺之城”，叛乱者在清真寺、学校、医院里筑工事，向美军猛烈开火，每当美军召唤空中火力摧毁一处清真寺，半岛电视台便以惨不忍睹的画面来谴责美军屠杀平民、毁灭宗教。

2004年4月底，位于巴格达的阿布格莱布监狱爆发美军宪兵虐囚事件，这成为美国在伊战中的最大丑闻。这支训练不良、指挥糟劣的陆军预备役宪兵，近乎完全摧毁了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于阿拉伯世界建立起来的信誉。

海湾战争令美国陆军彻底走出了越战阴霾，但陆军的辉煌胜利遮蔽了一些问题。海湾战争其实仅是战术上的胜利，战略上双方成平局，美军只恢复了科威特主权，萨达姆没丧失侵略能力。

1973年7月，德普伊将军接管了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亲手打造新陆军。他在把陆军打造成拥有一流战术的同时，轻视对高级军官的战略思考能力培养，于是，陆军拥有了世上最优秀的营级军官，但缺乏能够理解全局的真正大将。

而德普伊的上级、时任陆军参谋长的艾布拉姆斯曾决定：陆军永远不参加因镇压叛乱而引起的战争。也是在1973年，他取消了陆军军事学院为期5周的“非常规战争”必修课。艾布拉姆斯和德普伊的措施，大大有利于美军抗衡最可能在欧洲爆发的机械化战争，因为苏联是可预见的敌人且双方作战方式固定，却不利于美军适应冷战后出现的新局面。

德普伊的遗产在伊战中充分体现：四个美军师各自采取不同的方式在战斗，外界专业人士评价这是四场相互独立的战争。其中戴维·彼得雷乌斯任师长的101空降师，表现尤其优异，他无视上级规定，擅自与叙利亚政府谈判，请求给摩苏尔供应能源。正是他镇守的生活着10万名前

伊军的北部地区，成为伊拉克局势最稳定的区域。而驻伊美军最高指挥官里卡多·桑切斯则成为无能的代名词。

2007年1月，彼得雷乌斯代替乔治·凯西接任驻伊美军最高指挥官后，进行系列变革，例如先斩后奏收买逊尼派反叛者。从当年6月开始，超过10万逊尼派武装投向新政府，美军伤亡人数逐月下降。

重新武装伊拉克

2003年5月，布雷默解散了伊拉克所有涉及安全、国防、信息和情报的机构及附属组织。同年8月，联军临时占领当局尝试建立新的伊拉克军队。组建新军时规定入伍者的条件：年龄在18至40岁间、在前政府军担任上校以下职务、未在复兴党内担任过高级职务的伊拉克人，并排除前安全情报人员、共和国卫队、秘密警察人员。



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省的什叶派民兵，跳跃起来踢破了写有**ISIS**字样的招牌，以示反恐和保卫家园的决心。**2014**年**6**月**21**日，**ISIS**的攻势凶猛，伊拉克北方什叶派信徒响应教士穆克塔达·萨德尔的号召，武装了起来。

萨达姆时期伊军高级军官以逊尼派为主，旧军队解散后组建新军，军官的结构自然而然贴合各派别占全国人口比例，从多到少依次是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

据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世界军事年鉴·2012》，伊拉克新军有现役部队27.1万人，以陆军为主。新建的陆军有19.4万人，主力是1个装甲师、10个摩托化步兵师、3个轻型步兵师。作为步兵主要武器的坦克、步兵战车、装甲输送车、重炮，苏俄造与欧美制品并存，后者有

取代前者的趋势。伊拉克陆军航空兵的列装计划里有40架米-28武装直升机、24架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这些处于逐架交付中的武装直升机是剿灭叛军的有效武器。

伊拉克最精锐的是全副美械的特种部队及相关支援部队。他们不仅受全套美式训练，还常和美军联合行动，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伊拉克陆军规模虽远不如萨达姆时代，但要击退ISIS的反叛，依然绰绰有余。

能最有效抑制反政府军地面攻击的战机，当属伊拉克政府在ISIS叛军兵临城下的2014年6月底，紧急购买的二手苏-25攻击机和苏-24轰炸机。这两种机型虽早已落后于时代，但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空军曾大量装备，故伊军熟悉使用且不需要培训新人。政府军用廉价、得心应手的苏式战机来镇压既无战斗机又无防空武器的ISIS十分得当。

国防军以外，伊拉克有一支庞大的警察部队用于铲除反政府武装。2003年4月14日，伊拉克警察和美军组成的联合巡逻队首次出现在巴格达，标志着伊拉克警察队伍开始重建。普通警察由伊拉克警察服务机构管理；2006年伊拉克国家警察成立，它招募了很多前复兴党成员、军人，它由警察突击队、公共秩序警察、机械化警察、紧急反应部队合并而成。

伊拉克丢失的是挨着叙利亚的北部、西部国土，也是逊尼派聚集区。当前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拉克军队，镇守在逊尼派的地盘上犹如变相殖民统治，根基不稳。本来政府军时常与逊尼派民兵武装有摩擦，再被久经叙利亚战火考验的ISIS成员们冲击，被赶出逊尼派老巢亦可理解，但由此判断伊拉克新军不堪一击颇显武断。

ISIS虚张声势，号称可以围困巴格达并不日攻克，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ISIS缺乏基本的重型武器。在坦克和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整顿后的伊军立即发起进攻，于6月28日一举夺回提特里克。

6月29日，ISIS宣布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版图横跨叙利亚和伊拉克。外界分析，ISIS只想占领现有的地区以打通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扩大生存空间。接下来，便是伊军反复的扫荡战。无论如何，ISIS在正规战中不是伊军的对手，更何况ISIS是一个连基地组织都要与之划清界限的恐怖组织。

目前，伊朗也加入了反ISIS的“统一战线”来帮助伊拉克马利基政府。据美国匿名官员披露：伊朗从巴格达的达拉希德机场向伊拉克各地派遣无人侦查机，并秘密地向伊拉克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供给以及其他援助。伊朗还在机场部署了通信情报部队，以截取ISIS作战人员与指挥

官之间的电子通讯信息。树敌无数的ISIS，其政治生存空间势必遭到全世界的围剿。

□ 编辑 王家骏 □ 美编 青年

克里米亚分离始末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民意各显现了一次，用一次分裂决了高下。俄收了一块半岛，埋下了隐患的种子，但民众甘愿如此；乌克兰则丢失了领土，换回对欧洲道路的坚持。

特约撰稿员 / 方亮



2014年2月26日，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亲俄与亲乌示威者之间爆发冲突。无限期抗议活动的参与者们高呼："我们要捍卫克里米亚"、"俄罗斯"；另一方则高呼："克里米亚，不是俄罗斯"、"安拉阿克巴尔"。

61岁的谢尔盖·切可夫和62岁的谢尔盖·阿克肖诺夫终于等来俄罗斯"王师"进军克里米亚的这一天。3月21日，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新行政区，切可夫成为该地区的俄联邦委员会议员，阿克肖诺夫则是克里米亚总理和三军统帅。对于他们来说，这几乎是各自人生的最高峰。

就像坚定亲欧并作为主力推动了"二月革命"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一样，在乌克兰境内，切可夫和阿克肖诺夫领导的"俄罗斯统一党"及44岁的根纳季·巴索夫所领导的政党"俄罗斯组"则是亲俄力量的核心。这些年来，这三位政客一直致力于让亲俄势力拓展至克里米亚之外。直到最近，他们终于得偿所愿。

不过，三人的扬眉吐气不过是整场大戏背景下的一段小戏码，普京支持率飙升、俄社会加深分裂、其他伙伴国不满、俄经济背上的包袱等都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悲喜元素。

大戏开启

2月22日，亚努科维奇倒台，乌克兰广场“革命”成功。不管它有多少瑕疵，西方对新政权的承认都证明它已经是一个显著的地缘事实。接下来，全世界都在等待着整场事件中一直沉默不语的普京作出回应。

五天后的清晨，位于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的政府和议会大楼被30多名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占领，成为整场克里米亚独立大戏的开场。然而，只有在西方的新闻稿及人们的私下议论中，才能将这次行动视为普京的回应。至今在对这次事件的严肃描述中，30多名武装分子仍被视为“不明身份者”或“克里米亚当地自卫武装”，尽管各方已然将这群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手榴弹、狙击枪武装起来的人视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发力的先锋。

2月27日，时任克里米亚总理的阿纳托利·莫吉廖夫与武装分子展开谈判，但一无所获，后者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当克里米亚议会议长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夫带着15人的主席团成员未获阻拦地进入这座已经升起俄罗斯国旗的大楼，外界终于嗅出了一点味道。

一周前的2月20日，即“二月革命”的紧要关头，康斯坦丁诺夫就在莫斯科与俄杜马四大党代表以及普京安排在杜马的直接掌控人纳雷什金进行了会面。他当时表示，不排除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的可能。尽管亚努科维奇仍在台上，但倒台的危险已经被外界所预见。

而担任克里米亚议会议员的切可夫和阿克肖诺夫也曾谋求推动议会通过决议，请求俄罗斯对克里米亚进行保护。切可夫当时说：“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自治州，我们的文化、语言都是俄罗斯的。当下，我们也需要由俄罗斯来保护。”

但最终，决议不了了之。这一结果与俄罗斯外交部此前有关俄不会介入乌内部事务的表态一致，也与上述发生于议会大楼的戏码是一致的。

此时亚努科维奇政府已经倒台，切可夫和阿克肖诺夫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克里米亚俄语居民聚集到议会大楼外，呼喊着“拿起所有能找到的武器，聚集到议会大楼外，反击基辅的法西斯政权对我们可能的攻击！我们要迫使议会同意让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议程”。但是，康

斯坦丁诺夫却拒绝在2月26日的特别会议上加入该议程。

于是，辛菲罗波尔的共和国议会大楼外开始聚集越来越多的俄语民众，他们与克里米亚鞑靼人以及当地警察所组成的另一股力量发生冲突，致2人死亡。这更给了切可夫和阿克肖诺夫以理由，他们进一步向康斯坦丁诺夫施压，但得到的却是后者更加坚决的拒绝。这位议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克里米亚议会不会审议脱离乌克兰的议程。

但一切都在2月27日发生了变化。当天，康斯坦丁诺夫带着议会主席团进入被占大楼后不久就放弃了原先的立场，决定举行全民公决，以解决让克里米亚进一步自治及加入俄联邦的问题。同日，议会议员被放进了大楼。进入时他们的手机全部被收走，使得与外界无法联络。不久后，全体议会表决同意了主席团的决定。阿克肖诺夫被任命为克里米亚政府总理，原总理莫吉廖夫被解职。与此同时，有关俄军向克里米亚用兵的消息开始被越来越多地传播出来。

克里米亚加入俄联邦的大戏，就这样开始了。

上下布局



切可夫和阿克肖诺夫是形形色色的亲俄政客中最具影响力的两位，他们下属的“俄罗斯统一党”追求让乌克兰实施联邦制以及与俄一体化。这种立场让他们与乌内部传统亲俄派拉开了距离——因为即便如亚努科维奇这种被广泛认为是俄罗斯代理人的政治人物，也长期坚持与欧盟一体化的路线。正因为这样，该党影响力基本上仅局限于俄语居民占优势的克里米亚，从来不曾在乌克兰最高达拉（议会）获得过席位。2010

年，该党在克里米亚议会选举中也只获得4%的选票。

如此不受欢迎，也与两人狼藉的声名有关。阿克肖诺夫曾因与上世纪90年代克里米亚最著名的黑帮“沙龙帮”有染而受到质疑。2009年，时任克里米亚议会副议长的米哈伊尔·巴哈列夫指称，阿克肖诺夫曾是该帮成员，绰号“高布林”。此事一度闹上法庭，阿克肖诺夫却没能让法官相信自己。

无论是切可夫还是阿克肖诺夫，其在政坛不断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一体化乃至加入俄罗斯的动议，实际上也与他们在本地的商业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涉及到克里米亚商业利益的分割。

在这个被称为苏联“全联盟疗养院”的半岛上，无论是旅游产业还是港口、农业都有着广阔的投资前景，反而俄罗斯商业利益的进入却并不顺利。自亚努科维奇于2010年重新上台，派遣心腹莫吉廖夫出任克里米亚总理，这里先后发生5起地方行政长官被暗杀事件。2010年，新费多罗夫基行政长官被人用冲锋枪杀害；一年后，维谢罗行政长官被猎枪击中心脏身亡；2012年，小玛雅克市市长从一家医院三楼坠亡；2013年，西梅扎行政长官和费奥多西市市长先后被枪杀。伴随着这些神秘暗杀事件，俄罗斯的利益在克里米亚节节后退。而亚努科维奇的长子亚历山大反倒在这里不断坐大，身家据称或达5亿美元。这些都让俄方大小资本家愤愤不平。

这样的局面让莫斯科十分不满。亚努科维奇、莫吉廖夫的倒台自然也为俄罗斯资本进军克里米亚扫平了障碍。有分析人士认为，身处革命漩涡中的亚努科维奇可能曾在向普京求援时承诺，将改变克里米亚的商业利益分配。

在政治高层做下一番布局后，基层行动网络同样不可或缺。就像“二月革命”中与军警做殊死战斗的右翼民族主义战士一样，克里米亚的变天也需要一大批基层战士。在克里米亚议会于2月27日决定将举行全民公决，名为“克里米亚自卫军”的组织一夜之间将克里米亚各方势力联接起来，它的领导方为亲俄党派“俄罗斯组”，主席是根纳季·巴索夫。

身强力壮及有军事经验的年轻人被大量征召进该组织，组成“自卫军”，开始在克里米亚各城市的重要地点、交通枢纽执行保卫及搜查任务。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记者在辛菲罗波尔一处征召点登记成为了一名“自卫军”战士。整个登记过程极为简单，登记后记者直接被送到一处交通关卡执勤。整个关卡由一处小屋子和几个轮胎组成的路障组成，记者接受的任务就是盘查经过的每一辆车，防止可疑分子潜入或潜出。

巴索夫利用的，是“俄罗斯组”在克里米亚的影响以及青年俄罗斯爱国者组织的即有储备。“俄罗斯组”历史较“俄罗斯统一党”更为悠久，却同样难以在克里米亚政治中占据核心位置。但是，其组织能力却在这次行动中派上了用场。有了他们之后，俄罗斯在外交场合可以从容地将控制克里米亚各主要枢纽的武装力量称为“克里米亚自卫军”。当然，这种初级的“自卫军”自然无法解释是如何取得装甲车、冲锋枪、狙击枪等武器装备的。

军队无奈

最能反映克里米亚事态实质的图景，无疑是驻扎在半岛上的乌克兰军营。截至3月22日，克里米亚半岛上的189处乌克兰军营已经升起俄罗斯国旗。仍坚持忠于基辅的寥寥无几。

这其中，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乌克兰第204战术航空旅，在3月22日的“投降”多少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该旅指挥官伊戈尔·马穆丘尔是克里米亚乌军指挥官中对基辅中央指责最多的一位。

自从“自卫军”进入克里米亚，当地乌军一直向基辅中央请示该如何处置当下情势。尽管乌军早已进入战备状态，但他们从代总统图尔钦诺夫那里得到的命令始终是“坚守待命”。图尔钦诺夫会在正式命令外再加一道口头命令：“不许首先开枪，不许挑衅！”基辅临时政府对外一直强调克里米亚的独立为非法行径，但上述命令却凸显了基辅对克里米亚事态的无奈及权宜立场。

马穆丘尔最先对此表达严重不满。他要求图尔钦诺夫发正式命令，不要总口头发号施令。但最终，他等来的却是“自卫军”的装甲车。3月22日，装甲车撞开了他的部队驻地的大门。攻击者动用了４辆BTR-80型装甲车，冲破大门后闯入军营开枪，并使用了声光弹。在这个过程中，一名记者和一名乌克兰军人受了伤。虽然马穆丘尔并未主动投降，却也只能无奈地看着俄罗斯国旗在他的军营内升起。



当地时间**2014**年**3**月**2**日，乌克兰克里米亚辛菲罗波尔市郊外，一位手持俄罗斯国旗的大叔走在前面，给一队俄罗斯陆军步兵带路。

这些天，军营附近的照相馆都在排长队，因为俄军派来了代表团，负责给愿意归顺克里米亚地方政权的乌军士兵做登记。俄《新报》记者在俄军代表团工作现场听到了以下的对话：

一位名叫阿拉的35岁壮硕乌军女兵说："我们每月能拿到470-480美元，你们能拿到700美元吧？"坐在她对面的俄罗斯女兵答道："我们能拿1040美元。"

旁边一位乌军女兵问："家里人不会反对（加入克里米亚）么？"阿拉不在乎地答道："妈妈马上要从乌克兰过来跟我一起生活，她自己选了俄罗斯，这再自然不过了。"

这样的选择在驻克里米亚乌军中一直发生。士兵中甚至流传着有关主动离开驻地回到乌克兰的士兵的遭遇，据说这些士兵被骂成是叛徒，或被瞧不起。这样的传言让当地更多的乌军士兵选择投向克里米亚。实际上，基辅此前消极的做法已经告诉外界，克里米亚已经不在其考虑范围内。因此，此时指责这些士兵是毫无道理的。

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消息，乌克兰代总统图尔钦诺夫3月24日表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已委托国防部撤出乌克兰驻克里米亚军队，同时也将请军人家属撤离克里米亚半岛。但随后乌克兰国防部驻克里米亚新闻发言人弗拉季斯拉夫·谢列兹尼奥夫表示，驻克里米亚的乌克兰军队尚未收到撤离驻地的命令。

随着大部分克里米亚乌军或解散或投诚，克里米亚继在政治和法律上成为了俄罗斯的一部分后，军事上也基本属于俄罗斯了。至于国际社

会承认的问题，已经不是重要因素。

民意冲动

同“二月革命”相比较，可发现克里米亚戏码的异同。在基辅，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同军警鏖战两个多月，终于推翻了亚努科维奇；而在克里米亚，同样的民族主义势力帮助这个半岛加入俄罗斯联邦。前者虽几乎是独力达成目标，但也深俘民意。后者也同样有着强烈地民意支持，这也成为国际上无法完全批判俄罗斯干涉乌内政和侵犯乌主权领土完整的一大原因。

但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外部势力干涉多寡。基辅之事，人们虽可怀疑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组织资金的来源，却无法定论革命背后有西方的插手。而在克里米亚，从两个不受重视的小党派的崛起、之前从未存在过的“自卫军”的出现，到议会在受到武装分子控制后明显的立场转向、多地不明身份武装分子与俄军的相似、俄政府对克里米亚公投的全力支持，都可以显见俄方的直接参与。

不得不承认，上述两场戏码是俄罗斯和西方两大政经板块新一轮碰撞的战场。首场碰撞发生于基辅，它在极大程度上由乌西部民意和右翼民族主义势力一同推动；第二场在克里米亚的碰撞则是俄罗斯自行推动，各方都只能被动地对普京的动作进行应对。

因此，外界总要问一声，普京为何非这样做不可。

或许，去年年末由俄罗斯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做的一次调查可以说明问题。当时普京支持率历史性地降到了30%。很难说这是促使普京在克里米亚用强的最主要因素，但该因素确实有着较强的解释力。普京步入政坛后，历次大手笔都会收到支持率暴涨的效果，比如第二次车臣战争、尤科斯事件、俄格五日战争等。俄格战争中普京果断出兵，之后支持率达到其执政生涯的最高点88%。



2014年3月22日，一队持致命武器的军人在轻型装甲车的掩护下试图接管克里米亚贝尔贝克镇的空军基地。据信,这些没有任何身份识别标识的军人是俄罗斯军人。

眼下俄经济表现疲软，普京的支持率呈缓慢下降，用某种手段对其进行提振自然十分必要。事实证明，收复克里米亚达到了普京的这一目标。虽然国内外不同调查机构给出的问题设置不同，但基本结果是，普京支持率如今已大大超过了50%。

普京及其权力体系在衡量“二月革命”及回应手段时，自会考虑克里米亚在俄罗斯历史中的地位、恢复俄罗斯帝国势力范围这一历史使命等因素，但具体手段的操作则需要具体的动机，支持率恰恰构成了这一动机。对于普京权力体系来说，支持率是该体系可以维系的命脉所在。

收复克里米亚所引发的负面后果普京不可能不了解，但民意却被其精准把握。这就像叶利钦1991年选择背离苏共、1999年他选择接班人时会选择一个克格勃，而非一个青年改革派一样。普京会体察民意构成的大框架，并在这个框架内行事。从这个角度讲，上述战争也都是在体察民意后根据自己的需要所做的决策。

普京的成功不仅体现在支持率的飙升上，更体现在民意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形成了统一战线，与少数反对者对立，甚至达到了对后者进行围剿的地步。

俄上院授权普京向克里米亚出兵后，素来将人权和自由作为首要行事原则的总统人权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裂。该委员会首先发表了一份声明对上院的做法提出了批判。但第二天，委员会内至少一半委员要求撤

销这份声明。

这次事件上，一些俄自由派都支持普京的做法。曾严厉批判普京的戈尔巴乔夫、曾被普京体系惩罚的前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曾被叶利钦惩罚并居于普京体系之外的前议长哈斯布拉托夫都站在了普京一边。

在签署接纳克里米亚命令之前发表的那次重要讲话中，普京使用了“第五纵队”和“民族叛徒”两个词来指代那些不同意收复克里米亚的异议分子。结果，这成了俄政治舆论中的新名词。最新的几次反对普京决策的游行已经遭到广泛的民意打压，游行本身也被命名为“民族叛徒游行”。对于普京来说，这真是“一箭多雕”的好买卖。

接纳克里米亚，看似是普京的决策，毋宁说是俄罗斯民众的选择。如此整齐划一的民意体现，显现了尚未走出后帝国心态的民众对用开疆拓土来彰显大国荣光的方式极为认同。这种情况正好为普京这种民粹政客所利用。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民意各显现了一次，用一次分裂决了高下。俄收了一块半岛，埋下了隐患的种子，但民众甘愿如此；乌克兰则丢失了领土，换回对欧洲道路的坚持。孰是孰非，只能交给历史评判。

普京的克里米亚豪赌

若对抗不断升级、制裁持续加码，这场东斯拉夫地缘政治“大片”，可能除了普京在国内民族主义者中收获声望，没有一个赢家。

记者 / 段宇宏



上图：**2014**年**3**月**21**日，克里姆林宫，在俄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议员的见证下，普京签下“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文件。

下图：**2014**年**3**月**21**日，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当地民众燃放烟火庆祝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



3月21日，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在俄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议员的见证下，普京签下“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文件。在克里米亚，当地民众燃放烟火以示庆祝；俄罗斯支持普京的民众则高喊：“克里米亚回归祖国了！”

克里米亚独立后迅速入俄，西方国家表示抗议，祭出不痛不痒的“制裁”大旗，俄罗斯以各种强硬姿态表示毫不在乎。普京更是宣布，要把工资存入受美国制裁的银行里。

近两个月来，东斯拉夫地缘政治剧《乌克兰不相信眼泪》紧锣密鼓开播，第一季《基辅广场惊魂》和第二季《克里米亚风云》一气播完，令国际社会目不暇接。对大陆民众来说，恐怕不能理解乌克兰的“亲欧”和“亲俄”之争，何以在刹那间演变为克里米亚独立问题。

克里米亚问题由来

克里米亚半岛位于黑海北岸，处于乌克兰最南端，虽然只有2.7万平方公里，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东西方世界重要交汇处，这里驻扎着著名的俄罗斯黑海舰队。克里米亚南端的城市雅尔塔有着非凡的历史地位，二战后到今天，全球的国际政治体系就源自曾在这里召开的雅尔塔会议，深刻影响了十几亿人口、几十个国家的命运。

1954年，为了纪念“俄乌合并”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签订300周年，在时任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推动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一个决议，将克里米亚的管辖权划归乌克兰。很多俄罗斯政客对此事耿耿于怀，前副总统鲁茨科伊评价说，这是赫鲁晓夫“喝高了中暑了”之后的怪诞行为。

1991年12月8日，苏联解体进入倒计时。时任三国领导人——俄罗斯的叶利钦、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的舒什克维奇齐聚白俄罗斯西部别洛韦日森林公园的维斯库利别墅。这里曾是历届苏联领导人避暑的夏宫。一阵酒酣耳热之后，这三位东斯拉夫新崛起的政治黑马决定，既然苏联当年是由这三国创始建立的，那么今天也由这三家来平稳分离，同时建立“独联体”作为维系政经和文化交流的纽带，并签下了《别洛韦日协议》。

克拉夫丘克回基辅后有点提心吊胆，但很快发现，叶利钦已牢牢控制了克格勃和军队，一切疑虑烟消云散。前乌克兰共产党政治局成员、主管意识形态的克拉夫丘克完成华丽转身，在拥抱“民族（主）主义”和“民生主义”力量中崛起，从苏联的拥护者变成批判者，并成为率领

乌克兰走向独立的功臣，从而当选首任总统。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全民公投以确认独立的合法性和支持度，支持独立的总得票率为90%，当时分区得票率为：西部97%、中部95%、东部88%、南部87%、克里米亚54%。12月25日，苏联宣布解体，乌克兰正式获得独立。



1944年5月12日，在塞瓦斯托波尔的苏军士兵庆祝他们将克里米亚半岛上最后的德军士兵击溃。

谈及克里米亚，这里原本是成吉思汗孙子拔都建立的蒙古金帐汗国封地。当时拔都把此地封给自己的十三弟“秃花贴木儿”。后来金帐汗国衰弱，秃花帖木儿的后裔分裂出来建立了“克里米亚汗国”。汗国的统治阶层是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属下民众是突厥系的鞑靼人。沙俄崛起之后经过两次“俄土战争”，1783年最终把克里米亚纳入版图，不断向此地移民。

二战后，斯大林对15个协助过德军的少数民族执行“全民流放”，于是克里米亚鞑靼人近19万被全族流放，苏共大量迁徙俄罗斯裔前来填充。经过几十年“返乡斗争”，回到故乡的鞑靼人却成为少数民族，如今仅占当地人口12%，相比俄罗斯族占了58%，乌克兰族占24%。

乌克兰独立之时，俄裔居民心态很纠结——既想回归俄罗斯，又不愿与乌克兰分开。最后他们发现回归希望不大，过半数人选择独立，尽管其最终支持独立的票数仍为全乌克兰最低。

1992年5月，乌克兰正式独立后不久，在克里米亚分离主义者呼吁下，当地议会一度宣布独立。克里米亚议会还先后通过“克里米亚国家独立法”和“克里米亚共和国宪法”。此后由于乌克兰政府的反对，该宪法被取缔。不过这使克里米亚赢得了更大的自治权，并建立了乌境内唯一一个共和国。当时俄罗斯虽有政客力挺，却仅仅“动口不动手”，克里米亚“独派”最后只好作罢。

直到去年6月，根据乌克兰智库拉祖姆科夫中心所作的问卷，只有31%的克里米亚居民支持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36%的居民持反对意见。但当乌克兰“二月革命”推翻来自东部、被视为“亲俄”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克里米亚坐不住了。当地俄裔民众举着俄罗斯国旗涌向街头，不明身份武装占领共和国议会，将俄国国旗插上大楼屋顶，还有人喊出“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的口号。

应克里米亚总理谢尔盖·阿克谢诺夫的求援呼吁，俄罗斯上议院同意武力干涉，俄军剑指乌克兰，在当地武装配合下实质控制克里米亚。3月6日，克里米亚议会投票通过了独立决议，并在3月16日举行全民公投。公投最终投票率83.1%，96.77%的人选择加入俄罗斯联邦。

西方制裁尚难同心

克里米亚独立并加入俄罗斯，不仅乌克兰拒绝承认，联合国表示关注，西方大国都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抗议。其中加拿大召回驻俄大使，美国则声称要把俄罗斯逐出八国集团。尽管俄罗斯政府表面上满不在乎，但股市指数却重挫10%。

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和西方的关系可用“两难处境”来形容，不过普京应该略占优势。在乌克兰政局和克里米亚问题上，普京政府无非只有两种选择：袖手旁观和豪赌一把。俄罗斯目前的政治体制既不是苏联的斯大林体制，也不是欧美那种高度自由民主的政体，是否为威权体制也值得探讨，更准确地描述应是：不成熟民主体制下，靠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支撑起来的强人政治。

普京以民族主义为旗号，用恢复大国地位换取俄罗斯民众的支持，使其得以长期获得较高支持率，如果对克里米亚袖手旁观，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的声誉将一落千丈，其政治生涯很可能毁于一旦。赌一把虽说可能失败，但如果分寸拿捏得当，支持率将会暴涨，进一步巩固其政府的根基。

西方的制裁目前来看并不激烈，顶多是冻结部分官员的海外账户。有观察人士指出，欧盟和美国就制裁俄罗斯步调有差别，原因是欧洲不

少国家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深，特别是在能源领域，欧盟超过1/4天然气供应依靠俄罗斯。

欧盟是俄罗斯最大的能源贸易伙伴，欧盟约有31%的天然气、27%的石油、24%的煤炭从俄罗斯进口，占了俄罗斯煤炭出口的88%，天然气出口的70%，煤炭出口的50%。能源出口在俄罗斯的GDP中占据30%。

若制裁升级，于欧盟来说，需要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调整能源进口渠道，但短期内不容易实现，否则会造成经济动荡。但据悉，欧盟已经在商讨相关方案。俄罗斯制造业、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落后，在世界上并无竞争力，主要依赖于能源和军火出口，欧盟如真的大幅削减能源进口，俄罗斯将损失惨重。

欧盟国家中，目前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主张采取强硬措施，而德国、法国和英国态度谨慎。而在大西洋彼岸，美国与俄罗斯只占美国贸易额的1%。日本政府表面上跟风与美国一道对俄施压，但在与中韩关系交恶的形势下，日本渴望通过对俄外交解决日俄领土争议。就在不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属于少数“给面子”的西方阵营领导人。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日前也表示，普京今秋访日、日本外相今春访俄的日程“现阶段没有变更”。因此，未来倘若制裁升级，西方国家需要平衡好内部利益，达成共识。

豪赌能否成功？

俄罗斯本来期望克里米亚投入自己怀抱，但日前却一改往日腔调，尊重住民自决，其实会对境内的“分离主义”力量造成鼓励，埋下隐患。有着诸多潜在分离地区的俄罗斯，如果在未来经历严重的政经危机，恐怕会有许多人拿克里米亚来说事，谋求独立。

另一个隐忧是可能使原本对俄心存戒备的东欧诸国强化与西欧关系，加速远离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内，已经有不少人提出警惕俄像对待乌克兰一样对待自己的提醒。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始终坚持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利用此次事件向俄索要更多经济利益并暗中批评普京的做法，都说明了这两个国家对普京决策难以认同。考虑到白、哈是普京着力营建的欧亚联盟的主要成员国，而恰恰是普京花钱让乌克兰倒向欧亚联盟的举动助推了亚努科维奇的倒台，普京发力克里米亚对俄欧亚联盟这一地缘战略的伤害无疑是明显的。

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盟同样面临两难——经济制裁的升级需要时间

和共识，如果俄罗斯加大对中国和中亚国家的能源供给弥补亏空，也有可能使制裁起不到太大效果。

1994年2月，乌克兰与英国、美国、俄罗斯在比利时签署《布达佩斯安保备忘录》，以“弃核”方式换来大国承诺保证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不干涉乌克兰内政。若西方不强化对俄制裁以收到效果，会令乌克兰丧失信任，也可能动摇其他东欧国家对类似承诺的信心。

乌广场“革命”给其带来的是悲喜共存的结果，它丢掉了克里米亚，损失了俄罗斯每年近1亿美元的黑海舰队海军基地租借费，同时加剧东西部两个乌克兰的意识形态对立。乌东部俄化程度较高，俄裔占比例达40%的顿涅茨克等地区也发出欲“脱乌入俄”呼声。与此同时，俄罗斯将可能取消乌克兰进口天然气30%的折扣优惠，这对财政已陷入窘境的乌克兰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未来，俄罗斯将用亲俄的东乌克兰地区来掣肘乌克兰政治。

乌克兰多年来积极运作融入欧盟，但欧盟以“需要深化政治、经济改革”为由将其拒之门外。俄罗斯吞下克里米亚后，乌克兰在入欧方面“因祸得福”，于3月21日与欧盟签下政治经济协议，获得准成员国的资格。

根据历史惯例，就算西方的制裁升级，俄罗斯只要找到应对办法，早晚还得重归于好。但若对抗不断升级、制裁持续加码，这场东斯拉夫地缘政治“大片”，可能除了普京在国内民族主义者中收获声望之外，没有一个赢家。（方亮对本文亦有贡献）

俄罗斯：分离主义制造者

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扶持“独立国家”的同时，其自身也一直为国内的分离主义所困扰。普京使用强硬手段打击国内外“敌人”之时，也把民族仇恨和极端主义播撒到俄罗斯联邦的大地上。

记者／赵新宇



2008年**8**月**9**日，俄格战争期间，俄罗斯北奥塞梯**Dzuarikau**地区的民众将食品和香烟扔给开着坦克准备进驻南奥塞梯冲突区的俄罗斯士兵。

在俄罗斯实际据有克里米亚后，乌克兰西南部的小国摩尔多瓦也承受着难以名状的苦痛。据俄罗斯商业媒体Vedomosti　3月18日报道，其下属的“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下称德涅斯特河沿岸）议员已经向俄罗斯国家杜马提出请求，希望俄方修改相关法案，允许其追随克里米亚的脚步加入俄罗斯联邦。

《华尔街日报》认为，这可能又为俄总统普京提供了一个向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政府施压的武器，同时也能为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南部所有地区提供跳板，俄罗斯的目的是切断乌克兰与黑海的联系并削弱其经济。

克里米亚的骤变让全世界唏嘘不已，但对于俄罗斯而言，只能算故

伎重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制造”了三个不为西方世界承认的“独立国家”——除了德涅斯特河沿岸，还有原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以及阿布哈兹。但讽刺的是，穷尽所有手段打造强权政治的俄罗斯，也一直为其国内的分离主义所困扰。

俄格战争成分离主义标本

2008年8月8日，当全世界聚焦北京奥运会开幕之际，俄罗斯军队进驻格鲁吉亚南奥塞梯自治州，并迅速取得军事胜利。战后，格鲁吉亚政府彻底失去对南奥塞梯及阿布哈兹这两个地区的控制权。

俄方认为，他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南奥塞梯的俄罗斯公民和驻扎在当地的俄罗斯维和部队。单看事件梗概，率先发动军事行动的是格鲁吉亚，他们于8月7日下午进攻南奥塞梯，并于当晚11时45分炮击首府茨欣瓦利。

起先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并没有指责俄方，只是声称回击炮轰格鲁吉亚村庄的南奥塞梯，并表示要恢复当地的“宪法秩序”，待事态升级后他才改口说，进军是因为“得到了俄军入侵的情报”。南奥塞梯方面则感谢俄军将他们从“种族灭绝”的困境中解救了出来。

俄格五日战争后，以瑞士外交官为首的独立国际调查团得出的调查报告对三方都做出指责。报告认为，挑起战争的是格鲁吉亚对茨欣瓦利的炮击行为，这次炮击是南奥塞梯武装与格军之间一系列挑衅的高潮（当时战争的导火索是两名格鲁吉亚维和军人被杀）；对此俄罗斯有权干预，但俄方把战火延伸到南奥塞梯以外的非争议地区，超出了防御的合理范围；此外没有证据表明格方有种族灭绝南奥塞梯的企图，反而南奥塞梯民兵对格鲁吉亚人有种族杀戮行为，俄军未能阻止他们。

这份调查报告虽然不会让牵涉冲突中的任何一方所接受，但它准确描述了此次短暂战争的来龙去脉，也描绘出原苏联地区持续20年的分离与反分离生态——在这些斗争中，民族主义阵营长期唱主角戏，所谓的正当性与人道主义常常被忽略。

俄扶持的境外分离主义

俄格战争让格鲁吉亚的两个地区取得了事实独立地位，一个是以奥塞梯人为主的南奥塞梯，另一个是以阿布哈兹人为主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苏联时期，这两个地区的主要民族都认为自己受到了格当局的政策歧视，如在基础教育中，本民族语言被格鲁吉亚语取代；一些习惯地名被更换；最让他们不能容忍的，是格鲁吉亚人对这两个地区的长期移

民。

上世纪50-70年代，阿布哈兹的民族精英曾三次上书苏联领导人，请求脱离格鲁吉亚，改划为苏共管辖。80年代，随着苏联的高压政策发生松动，南奥塞梯的分离主义也开始活跃起来。1989年，这两个地区的民族矛盾终于升级到正面对抗，并造成流血冲突。

1990年9月20日，南奥塞梯自治州宣布成立忠于苏联的南奥塞梯苏维埃民主共和国。同年12月，格鲁吉亚最高人民委员会宣布该共和国为非法，并决定取消其自治州地位，同时宣布在茨欣瓦利市等地实行紧急状态。次年1月6日，格鲁吉亚军队进入南奥塞梯，当地居民开始向外逃亡，大部分逃向俄罗斯境内的北奥塞梯。1991年两个民族的民兵都向对方民族使用了暴力，造成约1000人死亡。

1992年6月，在俄罗斯的斡旋下，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在索契达成停火协议。7月，由俄罗斯、南奥赛梯、格鲁吉亚三方组成的维和部队进驻冲突地区。不过，格鲁吉亚政府真正控制的只有南奥塞梯的一小部分，其余地区处于“不统、不独、不战”状态，维持长达十年的和平。

阿布哈兹的冲突较南奥塞梯更为激烈。1992年7月，阿最高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取消1978年所通过的自治共和国宪法，废除其当初并入格鲁吉亚的法律依据。紧接着，这个“独立”的共和国立即开始在强力机关、要害部门清除格鲁吉亚人。8月14日，格鲁吉亚政府决定行使主权，出兵平定分离运动。



1992年9日1日，莫斯科总统大酒店，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中）邀请阿布哈兹最高委员会议长阿

尔津巴（左）和格鲁吉亚国务委员会主席谢瓦尔德纳泽赴俄举行和平会谈，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但事后这项协议并未得到遵守，格阿双方冲突持续增多。

阿布哈兹方面一开始处于弱势，但他们很快得到了来自俄罗斯、亚美尼亚和车臣的民间武装援助，这其中还有后来制造数起恐怖袭击事件、被视为车臣恐怖分子头目的沙米尔·巴萨耶夫。在双方的战斗中，格政府军最终溃不成军，不但无法收复对阿布哈兹的主权，连格鲁吉亚人遭到的屠杀也无法阻止。

1993年12月，在俄方努力下，格阿双方签订了一项关于停火的备忘录，局势才趋向缓和。次年5月，3000名俄罗斯军人以独联体维和部队的名义进驻阿布哈兹；9月，在叶利钦主持下，双方在索契就长期停火达成协议。从此，阿布哈兹地区也处于与南奥塞梯相似的状态。由于战局不利，格鲁吉亚政府在这里所控制的区域比南奥塞梯更少。

摩尔多瓦：民族主义角斗场

1990年独立至今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在分离时掌控着摩尔多瓦40%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和90%的电力，尽管其人口仅占摩尔多瓦的17%。走在德涅斯特河沿岸的街道上，甚至能看到醒目的标语：“记住！你不是摩尔多瓦人。”本来就经济滞后的摩尔多瓦，在经受国土分裂对工业发展造成的致命冲击后，还得按时向境内另一块自治领土加告兹拨款，换取其不寻求独立的条约。

观察上述两个剧变时分离之地的国旗，会发现均有着浓重的附庸色彩：摩尔多瓦国旗是在罗马尼亚蓝黄红三色旗上加上了本国国徽，德涅斯特河沿岸的国旗干脆是在苏联国旗的腰部添上了一条绿。国旗的样式反映出这块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延续已久的民族认同之争——大罗马尼亚主义与苏联认同的对抗。

摩尔多瓦曾作为一个臣属于奥斯曼土耳其的自治公国近300年，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俄罗斯的扩张破坏了这种局面，在此建立了一个相对帝国自治的属地比萨拉比亚。俄国爆发革命后，无力保持独立的摩尔多瓦人在1918年11月15日投票决定加入罗马尼亚王国，依靠认同罗马尼亚来抵挡强大的苏联。这种做法一度奏效，保证了摩尔多瓦20年的安稳，甚至让他们看到持续下去的美好愿景：1934年，苏联和罗马尼亚承诺保证互不侵犯主权、互不干涉内政。

然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一纸秘密协议撕碎了摩尔多瓦人的未来。协议的第三条强调了“苏联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纳粹德国则宣布它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中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二战爆发后，苏联于1940

年和1944年两度占领这一地区，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流放、饥馑也在这一时期重重摧残了摩尔多瓦人。

摩尔多瓦人往往认为，他们是被这个见不得光的协议非法并入苏联的。原有的民族意识难以消除，以至于1985年开始复苏的民族主义运动仍将未来与罗马尼亚的统一作为他们的强力主张。他们忽略的现实，是其民族结构早已面目全非：尽管二战前讲罗马尼亚语的人口超过八成，但40多年后只有64%的人口还算得上是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人，另有100多万人是从原苏联地区（主要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移民而来。

1990年春，民族主义政党人民阵线赢得了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次自由的议会选举后，德涅斯特河沿岸的居民加快了与摩尔多瓦分离的步伐。同年9月，他们宣布成立自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1月，德涅斯特河沿岸与摩尔多瓦的有限冲突全面爆发。苏联解体后双方冲突升级，直到1992年3月，原苏联第14近卫军介入冲突，向摩尔多瓦军队开火。此后，自知无力改变局面的摩尔多瓦当局与德涅斯特河沿岸方面达成停火协议。从此，德涅斯特河沿岸就在一支数千人的俄罗斯“维和部队”庇护下保持事实独立至今。

尽管摩尔多瓦的现状是苏联吞并的一个结果，也尽管出现了多次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公投结果，但德涅斯特河沿岸居民并没有那么强的俄国认同。目前摩尔多瓦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这里的人口中各占约三成，在2004年“橙色革命”中，该地区超过90%的乌克兰人都支持尤先科。

普京对外心境的转变

尽管常被指责为偏袒乃至帮助分离主义势力，俄罗斯的策略并不是一以贯之的。对于叶利钦和第一任期的普京而言，更希望的是对独联体国家施加持续影响力。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主任松里公孝曾比喻称，这两位俄罗斯总统曾试图“把沃罗宁（摩尔多瓦总统）放在右边口袋， 把斯米尔诺夫（德左总统）放在左边口袋，力求平衡与两边的关系，使他们都不疏远自己”。

让普京转为热衷蛮横用兵，来自于21世纪发生的两次变局：一是颜色革命后的独联体国家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倒向西方；二是科索沃的独立打破了苏联、南斯拉夫解体时默认的“只有前加盟共和国才能成为合法的独立国家”理念。其间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南奥塞梯，这也被认为是普京对全面亲美的萨卡什维利的一种报复。在俄格战争与克里米亚公投后都拿科索沃质问西方“双重标准”的外交宣传，也显示了俄罗斯对科索沃

独立至今不能平息的恼怒。

在普京就克里米亚问题发表长篇讲话后，俄罗斯《导报》3月21日发表文章称，普京有关克里米亚问题的讲话更像是自白或是高水平的心理分析独白，世界政治史上未曾有过。

“俄罗斯真诚地希望与西方同行对话。我们经常建议在一切关键问题上合作，提高信任水平，希望我们的关系是平等、坦率和真诚的。但我们没有看到回应。相反，我们一次次地受骗，背着我们通过决议，把既成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在普京的自白中，这些话语表达了他内心的屈辱。



1991年**11**月**29**日，鞑靼斯坦共和国启用新国旗，民众表示庆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鞑靼斯坦签署第一个双边分权条约，以条约形式和平划分利益和权限范围。

14年前，普京有着完全不同的表述。2000年3月，普京作为总统候选人在接受英国BBC采访时说，俄罗斯可以成为北约的平等成员，条件是“俄罗斯的利益能够得到考虑，能够成为完全平等的伙伴”。但当美国总统小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于2002年将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7个国家收入北约时，他把这种行为视为背叛。布莱尔在其回忆录中说，“普

京得出结论，美国人不想给他应有的地位”。普京2007年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也坦言，“美国不需要朋友。我们感到，美国需要的是能够受摆布的附庸……”

不过，普京对苏联的看法十年来没有改变，2005年他在国情咨文中称“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是俄罗斯人民的最大悲剧”。最近他重复了这种提法，称“俄罗斯人是世界上最大的被分裂的民族，而克里米亚的俄语居民就像‘一袋土豆’被出卖”。

俄国自身的分离主义困扰

苏联解体后在众多独联体国家出现的分离主义危机，也同样出现在俄罗斯联邦境内。随着境内恐怖主义活动的不断增多，分离主义的噩梦让俄罗斯人苦不堪言。

俄罗斯境内的分离主义运动数车臣和鞑靼斯坦两个自治共和国走得最远。1991年11月2日，刚刚当选车臣总统的杜达耶夫签署一号命令，宣布车臣为“主权国家”，并于次年通过自己的宪法；鞑靼斯坦于同年3月举行关于“国家地位”的全民公决，鞑靼斯坦议会于11月6日通过宪法，宣称其是“主权国家”、“国际法主体”和“建立在条约基础上的俄罗斯联系国”。当其他联邦主体于1992年3月31日签署俄联邦条约后，这两个共和国却成为例外。

由于苏东剧变而出现的分离诉求有如链式反应，隶属俄联邦的诸多自治共和国受到刺激，哪怕并不谋求独立，也纷纷期望扩大特权。一些自治共和国在制定本国新宪法草案时，也往往无视联邦宪法，为自己保留自由退出俄联邦的权利。边疆区和州等联邦主体，也积极效仿自治共和国，争取在经济上实现单干或区域联合，不愿向中央纳税，有的干脆自行升格为俄联邦境内的共和国。

这些地方分离倾向主要出于经济动机，包括鞑靼斯坦也并没有坚定脱离联邦的意图。在中央政权积弱的90年代，叶利钦主要使用怀柔手段对付它们，比如与鞑靼斯坦、巴什科尔特斯坦等共和国签订协议，承诺它们在所有制、财政、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特殊权利，换取这些地区对俄联邦的忠诚；对于图瓦等较为贫穷偏远的联邦主体，则主要许诺财政补贴及基础建设来换取对方信任。

普京上台后不久，地方力量利用国家杜马干涉中央权力的局面被一个意外变化迅速扭转：随着“祖国-全俄罗斯”等中间党派在预选中落后于受克里姆林宫庇护的统一党，见风使舵的地方精英纷纷转投统一党，最终令其在2001年吞并“祖国-全俄罗斯”成为国家杜马第一大党。除了削

弱中央权力的竞争，这一变化给普京带来的最大利好莫过于让地方精英逐步丧失维持地区同盟的必要资源，为普京后来轻易地对地方势力分而治之奠定了基础。

2000年5月，普京连续颁布两个总统令，在俄罗斯境内成立七个联邦区，将89个联邦主体全部划归其中，从而降低地方联邦主体的行政级别；而管理这七个联邦区的区内事务的全权代表，则由总统亲自委任。

紧接着，普京又利用在国家杜马联合共产党得到的优势，通过一系列法案：包括将联邦委员会成员从各联邦主体行政长官和立法机关的领导人兼任，改为由各联邦主体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代表组成；授权总统将违反联邦宪法或有关法律的地方法规提交相关法院审理，并授予国家杜马解散拒不执行法院裁决的地方立法机关的权力；剥夺地方行政长官的刑事豁免权，并授权总统可按规定程序解除行政长官的职务等。

在经济方面，普京首先实现财政收入的集权，明显提高联邦税的数量和比重，使地方预算有赖于中央划拨。此外，他还积极在地区推动所有权的重新分配，扶持与中央关系密切的金融工业集团在地方扩张，削弱地方政府对其所辖区域主要经济资产的控制。

经过2000年的联邦制改革，俄地方精英对中央政权的影响和威胁几乎消失。2004年9月，别斯兰市发生的人质事件更为普京新的整肃行为提供了契机。这次事件后，他改变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方式，取消直接选举，代之以联邦总统提名、地方议会批准。此次改革重挫地方精英的利益，但由于有之前的改革做铺垫，他们已无力抵抗如日中天的普京。



1993年10月1日，时任伊奇克里亚车臣共和国总统、车臣独立运动领袖卡尔·杜达耶夫与支持他的选民合影。俄罗斯当局于次年12月出兵车臣，但是车臣武装一直拒绝放下武器，致使这场内战持续了20个月之久，杜达耶夫在战争中被打死。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遗产

独联体国家层出不穷的分离主义，无论是否发生在俄罗斯境内，都被普遍视为苏联乃至更早的帝俄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19世纪之前，扩张成殖民帝国的俄罗斯早就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对于被吞并的乌克兰、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等地区，帝俄也曾给予过一定特权，容许它们内部自治。但这种宽容往往难以持续，尤其是距莫斯科越近的民族，其自治权利被废除得越快。乌克兰曾被当做帝俄的一个省份，地名和民族名都被废除，当地人更被改称为“小俄罗斯族”。

帝俄的沙文主义在文化、宗教方面暴露得更为彻底。它禁止在公众场合使用波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语言，后来稍有放松，却仍禁止将这些语言以拉丁字母印刷。天主教是帝俄压制的主要对象，当时神学院和天主教堂均被禁止，天主教贵族要缴纳额外税金，天主教农民持有的土地量也受到限制。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帝俄开始检讨其民族政策，开放部分政治权利给少数民族。不过，在还未能做出彻底改变时它就被革命推翻，接替的苏俄政权在民族理念上来了个大转弯——开始鼓吹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乃至民族自决。列宁时期的苏俄不但招收非俄罗斯民族到其领

导岗位，还促进少数民族语言在行政机构、法院、学校和大众媒体中使用。

然而，苏联作为一个在法律上松散的联邦制国家，改变民族政策对列宁而言只是革命形势困难时的权宜之计。接下来的斯大林背离联邦制原则，在政治上打造高度集中的统一体制，应被视为完成了列宁集权设想的过渡。

相比列宁，斯大林的民族观念更偏向沙文主义。他在1913年一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缔造出苏式民族定义，并在1923年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确定为比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更大的威胁。上世纪30年代，大量与此相关的少数民族文化人士遭到清洗，如乌克兰的民间吟游歌手群体“科布扎尔”。语言教育也在此时重新被“俄罗斯化”。1938年，俄语成为苏联学校的必修课；1939年，此前使用拉丁字母表示的少数民族语言又被改回使用西里尔字母（即斯拉夫字母）。

二战后，斯大林对俄罗斯族的推崇变本加厉。当1945年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日来临，斯大林表示“首先向俄罗斯人敬酒”，因为“他们是卫国战争的领导力量”。至于那些被怀疑与德国侵略者合作的民族，如伏尔加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尔梅克人、卡累利阿的芬兰人等，被大量驱逐到中亚和西伯利亚。

这些粗暴政策，以及由帝俄时期延续而来的俄罗斯族移民运动，极大改变了苏联境内不同地区的民族成分，也在这些地方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

斯大林死后，继任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对民族政策做出一定调整，如为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及其干部平反，让被强制流放的一些少数民族重返家园。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并未被检讨。因此，当俄罗斯人在80年代末带头挑战苏联中央权威、索取其国家主权时，苏联各地民族仇恨与分离主义接连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

普京药方的副作用

由于苏联民族和领土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列宁曾在其1914年的文章《再论“民族主义”》中，表达出对欧美国家联邦制度的羡慕，并开始思考特殊条件下联邦制的合理性问题。苏联也曾推行各种不同层级的区域民族自治，无奈的是，这样的自治与其作为高度集权的大国从来都是格格不入的，反而只会持续制造不可小觑的矛盾。

苏联时期的对策是用高压管理将这些矛盾压到地下，但矛盾仿佛涌

动的岩浆，一旦压力减弱，就会迸发出来。解体初期的分离浪潮与民族暴力便是苏联政策的恶果。普京无意将岩浆冷却，他针对分离问题开出的药方无非是苏联政策的翻版：以集权化改革压制地方分离倾向。他的改革也弱化了俄罗斯原本脆弱的民主政治，两次车臣战争即是俄罗斯政治反对力量式微最鲜明的写照。

1994年12月，叶利钦发动第一次车臣战争时，受到从军方到民间的诸多反对，陆军副司令员沃罗比约夫将军不惜以辞职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他认为调动军队攻击本国人民是一种犯罪。其后，俄军在强攻车臣城市时遭受的重大伤亡以及他们造成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被俄国内舆论口诛笔伐。选择战争的叶利钦，也被视为派遣年轻士兵送死并让他们杀害俄罗斯族人的罪人，最终他只得签署停战协议，吞下车臣事实独立的苦果。

然而，三年后发动的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军遭受伤亡数、当地平民的遇难数并不比上次车臣战争少，普京却并没有背上骂名，反倒因此获得如潮的民意支持。“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这样的政治宣传话语，也在此次战争后传遍全球。

政治一元化和对媒体的掌控帮了普京大忙。当他发动此次战争时，军方和政界不再如当年一般出面反对了，反而出现了斯捷帕申这类比普京更为激进的官员。这位内政部长曾公然宣称：“为了赢得战争，不惜牺牲车臣所有男性！”

有新闻研究者对比过俄罗斯同一家媒体——《独立报》对两次车臣战争的报道。第一次车臣战争中，该报记者拍下了疲惫的士兵休息时眼神迷茫的照片，并将这些年轻人不知如何作战、盼望回家的心情传达给读者；到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独立报》拍摄的主要是俄士兵在坦克上向前举枪射击的画面，小伙子们英武有力，精神抖擞。

《独立报》态度转变的背后，是其老板别列佐夫斯基对普京的献媚。2000年大选前，别列佐夫斯基旗下的媒体曾将普京比喻为俄罗斯电视英雄施吉尔里茨，并广为宣传。不过，即便这位传媒大亨如此帮忙，仍不能免于打击。2000年9月，在总统办公厅的命令下，他最终“为了国家利益”放弃了对国家电视一台的控制权。



2010年9月3日，莫斯科郊外，一位俄罗斯男士手捧鲜花，在杜布罗夫卡剧院外悼念一年前劫持人质事件中的遇难者。2009年10月23日，数十名车臣武装分子闯进剧院，将800多名观众和演职人员劫为人质，最后导致130名人质不幸丧生。

在面对车臣各股势力时，普京也并未选择差别化对待。如1997年任车臣总统的马斯哈多夫，此人属于分离主义者中的世俗一派，与瓦哈比派等原教旨主义势力素有矛盾，一度遭到车臣独立运动领导人沙米尔·巴萨耶夫等人的多次暗杀。普京却将他与巴萨耶夫一起列入恐怖分子名单，拒绝和谈请求，直到其身亡。

通过一味打击，俄罗斯虽然顺利恢复了对车臣的控制，却也被层出不穷的暴恐事件骚扰至今。从2002年的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到2013年12月的伏尔加格勒爆炸案，其间只有两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而几乎每次都有几十到上百人无辜遇难。

与此同时，俄罗斯人的极端报复情绪也被激发。2004年，两名俄罗斯人在卡塔尔多哈制造了一次汽车炸弹爆炸案，将涉嫌帮助车臣恐怖组织的前车臣代总统泽利姆汉·扬达尔比耶夫炸死。这两人随之成为首次触犯卡塔尔反恐法律的犯罪嫌疑人。当年年底，卡塔尔同意俄将这二人引渡回国，前提是将被判处终身监禁。然而，当他们在次年1月回到莫斯科时，却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大俄罗斯主义狂热并非只针对车臣人，移民到俄国的亚洲人、非洲人均成为其攻击的对象。2007年，一个名叫Artur Ryno的17岁俄罗斯少年被捕，他与同伙二人涉嫌杀害共37名外国移民，法院认定他对其中19

人的死亡负责。由于是未成年人，他最终被判处做10年苦力。Artur是这些年来臭名昭著的俄罗斯光头党中的一员，其杀人动机是种族主义，或者说是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普京曾于2010年提出俄联邦国族的概念，希望以这种认同来消灭民族冲突、创造民族和谐，但极端分子的暴力并未因此减少。

凭借媒体管制操纵民意、独揽大权的普京使用强硬手段打击他的国内外“敌人”的同时，也把民族仇恨和极端主义播撒到俄罗斯联邦的大地上。与苏联相似，普京也无可避免地依靠和壮大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 编辑 漆菲 □ 美编 青年

阿拉伯 动荡的新月

□ 特约撰稿员 丁大伟



如果你有一个阿拉伯人朋友，你一定会经常听他说起一个常用语：Insha'Allah。

这个阿拉伯人总挂在嘴边的常用语，往往令其他文化的人在与阿拉伯人打交道时极为困惑。

当他希望一件事情成功，他会说Insha'Allah，这时Insha'Allah的意思是“愿真主成全”。

当他答应你赴约，会说一声Insha'Allah，这里Insha'Allah的意思是，如果他能来的话，这是上苍的意思（如果不能来，也是真主或上苍的意思，反正不怪我）。

从地图上看，由北非横跨西亚、中东，一直延伸到波斯湾的阿拉伯世界，像一块土地干裂之后的拼图，被长短不一的笔直线条裁剪成大小不等的22块。这块居于亚欧大陆和非洲大陆腹心的新月地带，总面积约为1400万平方公里，除了盛产石油，还总是与战乱动荡的新闻相连。

但谁也没有想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世界逐渐开始出现独立国家以来，最大的一次政治地震，会从相对最平静的北非开始。

2010年12月17日，26岁的突尼斯水果小贩瓦吉吉在挨了城管人员一个耳光后，羞愤交加，在警察局门口点燃了身上的汽油。这位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自焚的一幕被手机拍下后，很快引发了一场阿拉伯世界的连锁政治地震。

尽管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迅速赶到医院看望瓦吉吉，并在电视中对全国人民公开誓言将推进改革，但他的灭火行动来得太迟，瓦吉吉身上的

火迅速烧毁了他苦心经营23年的基业，并延烧到了隔壁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巴林、利比亚等国，甚至沙特阿拉伯。

全世界在阿拉伯世界突如其来的这场巨变面前屏住了呼吸，没有人知道瓦吉吉引燃的这把火最终会烧到哪里，没有人知道它引发的剧烈震荡，将会对阿拉伯世界乃至全球的政治格局造成怎样的结果，甚至连这场地震内在的动因为何，也众说纷纭。

民主第四波？民生冲击波

当瓦吉吉身上的大火由突尼斯燃向埃及时，不少政治学者根据亨廷顿的《民主第三波》观点总结，将之称为“民主第四波”。

但这个突如其来的“民主第四波”，尽管此前也有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输入和渗透，但整体而言，西方国家对埃及强人穆巴拉克这类坚强的盟友，更多时候着眼于国家利益，甚少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难。所以，在烈火蔓延到埃及，穆巴拉克这位西方国家的盟友的强人地位岌岌可危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看到大势已去之后，才从犹豫不决顺势改口敦促穆巴拉克顺应民意，并称颂阿拉伯人的民主诉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在埃及、突尼斯这些世俗化和开放程度最高的阿拉伯国家，国民对政府的不满，并不明显体现为对民主、自由的诉求，而是集中体现为对腐败、贫富分化、民生等问题的强烈不满。

尤其不能不说的是，最先发生政治地震的突尼斯、埃及等北非国家，其实是阿拉伯世界中制度上光谱上最世俗化而且最自由化的一端，相对而言，海湾地区一些君主专制国家在制度层面上值得诟病的成分远远大于已经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

如果以“民主第四波”论，政治大地震更应当首先出现在君主专制且政教合一的国家。但迄今为止，最稳定的，恰恰是这些国家。民生状况的巨大差异才应当是政治稳定程度的根本原因——海湾一些君主专制国家，巨大的石油资本和财富能保证其国民的民生问题不受外部的剧烈影响，与北非国家情形迥异。

瓦吉吉的自焚能唤起地下涌动的烈火，是因为它唤起了突尼斯年轻人的命运共同感。尽管本·阿里治下的突尼斯曾长期保持较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2007年突尼斯还被评为非洲最具竞争力的国家，甚至2010年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标中，突尼斯的全球第81位还要高于中国的第89位。但表面的数据后面，却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结构性失衡带来的民生困境，

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迅速加剧了结构性失衡的民生困境。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突尼斯传统的制造业和加工业遭受重创，海外投资也相应萎缩，贸易逆差逐步攀升。2010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又令突尼斯经济形势雪上加霜，与欧元挂钩的突尼斯货币第纳尔对美元大幅贬值约10%，支柱产业旅游业也受重创。

相对来说，突尼斯近年来通胀水平在阿拉伯各国中还算比较低，一度只有4%左右，2010年为4.5%，但2010年初以来，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尤其是粮食价格上涨，导致突尼斯居民消费品价格突然大幅增长。根据当地市场粗略估算，面粉、蔬菜等价格上涨幅度一度高达60%。中低收入的老百姓基本温饱问题都受到巨大影响。

相较而言，突尼斯的通胀和物价上涨程度在阿拉伯国家并不算比较高，但其失业率，尤其是大学生失业率却几乎是最高的。

据突尼斯官方统计，近年来该国失业率为14%。而国际中立组织的统计则显示，该国失业率实际超过20%，青年失业率高达27.3%，今年来部分城市地区15-29岁的年轻人，失业率更是高达52%。世界银行近日的报告显示，突尼斯毕业18个月后没工作的年轻人占失业大军的46%。



3月3日,数千人出席利比亚暴乱受害者的葬礼。

年轻人的高失业率是阿拉伯国家的普遍现象，国际劳工组织近日公布数据称，目前已知的年轻人失业率最高的地区是中东和北非，两地的失业率均在24%上下，年轻人的失业率可能是成年失业者的3倍。

人口结构畸形是造成近期北非和中东地区年轻人高失业率的重要原因。据统计，因为极高的生育率，这些地区15－29岁的人口占到了总人

口的最大比例。如突尼斯总人口约1000万，而年龄在25岁以下年轻人比例高达50%以上。像导火索瓦吉吉，就是来自有7个子女的家庭，由寡妇母亲一手带大，而瓦吉吉是这个家庭的长子和顶梁柱。

与此鲜明对照的是，突尼斯对年轻人灵活就业，如小商小贩、临时雇工等方式不仅没有进行鼓励，反而采取很多限制措施。瓦吉吉的命运其实是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典型。

事实上，本刊记者2011年之前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工作时，即能明显感觉到突尼斯、埃及等国社会蕴含巨大的震荡能量，因为埃及、突尼斯这些国家大批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流向南方的乍得、苏丹等国去打工，而在过去，从来只有这些被视为落后地区的年轻人北上打工。

经济之“困”：外向型经济的表象与真相

北非出现剧烈政治地震的国家，虽然直接原因是因为民生困境，但暴露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就是阿拉伯世界经济的脆弱性。金融危机以来的通胀，对各国都有程度不一的冲击，但只有阿拉伯世界这种高度对外依赖的脆弱经济体，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民生问题。

以直接影响民生的居民消费领域为例，无论你走访哪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集贸市场，都不难发现一个基本事实：从传统手工艺制品到日常生活用品；从蛋禽肉类供应到米面食油等食品供应，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需要大量进口。

以食品为例，阿拉伯世界消费的大米，进口自巴基斯坦和泰国；冻鸡，需要从巴西进口；牛肉从荷兰等地进口；水果，来自南非、伊朗和东亚；面粉多是本地加工，但小麦需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如果你要问到这些物品多大比重需要进口时，商贩会答道：“几乎全部。”

由于阿拉伯各国自给能力非常低，国际物价的上涨，便会对各国消费物价产生更加明显和程度更大的影响。亚历山大、开罗等旅游城市，甚至一段时间内各饭店都在菜单中取消了羊肉为原材料的名目。因为羊肉价格几乎成倍上涨。

它在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带来的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就是：原油价格飞速上涨和石油美元收入的增加，各国财政收入和社会财富大量增加的同时，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却停滞，相对贫困和居民生活成本成为油价狂飙之下的普遍性现象。

从数据上看，阿拉伯世界的经济体是高度对外开放的外向型经济

体，据阿拉伯联盟统一委员会的相关统计，阿拉伯国家对外依存度高达82%。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只占很小比重，不超过8%。

它其实更能反映的一个事实是，阿拉伯世界经济体的开放性，是一种不得不为的选择。典型如利比亚，它曾长期奉行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敌对政策，为了政权的稳定性，社会对外开放程度极低，但在以石油为核心的工业领域乃至服务业，却不得不与西方资本合作。

当然，在正常情况下，只要有石油，只要全球经济不发生剧烈波动，一切问题都好解决。因为普遍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甚至阿拉伯人认为，石油是真主赐予的礼物。它曾给阿拉伯世界带来过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短暂春天。



3月7日，阿尔及利亚，数千名辅警集会抗议，要求更高的薪金和更好的工作条件。

过去的二十多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石油需求迅速攀升，原油价格连续上涨。坐拥丰富石油资源的阿拉伯世界得以搭乘全球经济快车，经济快速发展。迪拜、多哈等阿拉伯国家的城市之星，发展之快之繁华，令人印象深刻；沙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更是依赖能源出口，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保障、居民生活水平改善方面取得令人羡慕的发展；苏丹、利比亚、尼日利亚、也门、阿尔及利亚等传统贫穷落后国家，也随着石油资源的发现和开发，继海湾国家之后，取得连续的经济增长和初步的社会财富增长。

以石油资源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提高了各国财政收入水平，也带动了石油产量相对不大的阿拉伯国家的工业、贸易、旅游业的发展。埃及、叙利亚、突尼斯等国都曾有过持续的经济增长。虽然此间巴以和谈

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也爆发了多次战争和武装冲突，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活动也依然存在，但阿拉伯世界总体上，依然取得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阿拉伯世界迎来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春天”。

但短暂的春天却无法掩盖阿拉伯世界在全球化分工之下扮演尴尬角色的基本事实。

石油工业无疑是中东经济发展的命脉。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工业体系中，从石油勘探开发、现代石油技术服务领域到现代石油工业，阿拉伯国家却处于尴尬的边缘化地位：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具有相对独立完善的石油工业体系。

以石油勘探开发为例，整个中东像是一场国际石油巨头的聚会。英美日等国国际石油巨头在中东耕植多年，近年来，印度、马来西亚、中国、澳大利亚等新兴石油巨头也大量涌入，蚕食着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勘探开发作业市场。

当然，在各产油国主导下，各国都成立了具有国有背景的石油企业。比如沙特的阿美石油、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卡塔尔石油公司等。但是，这些企业更像是坐收石油收益或权益的“地主”，而非全球能源工业和现代石油工业的参与者。

在石油技术服务领域，Schlunmberger、Baker Huge、Harliboton，甚至中国的东方地球物理公司、中油测井、长城钻井、中国石油工程建设集团等石油技术与工程服务企业都取得迅猛的业务发展，而这个领域阿拉伯国家企业参与几乎为零。

以石油炼化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石油工业，从技术设计到设备制造，再到运营维修保障，也基本全部是由外国石油公司完成。在国际能源供应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阿拉伯世界，却在国际能源体系分工中，处于边缘化的角色。

经济学有一个名词叫“荷兰病”，系指一国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的衰落的现象，因荷兰1970年代发现北海油田而得名。但真正最严重的“荷兰病”患者，毫无疑问正是中东的伊斯兰世界。

对石油的依赖，并不只是经济上的“荷兰病”，它在阿拉伯世界造成的另外一个恶果，是政治上的。因为石油这种命脉资源天然容易被以国家之名集中掌握，在事实上，它无论是在君主制国家还是在世俗的总统共和制国家，天然会落在几个家族或寡头手中。甚至可以这么说，富含

石油资源的国家，不但财富容易集中，而且会诱发集权。

开放与保守：阿拉伯的另一面

阿拉伯世界经济上的对外高度依存，虽然导致经济缺乏独立性和结构单一，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经济传统和商业法则甚至法律法规的全面渗透。无论是苏丹这样相对落后贫穷，亦或像沙特那样宗教集权特征明显的国家，劳工保护法、税收体系、贸易规则和机制、商业氛围，都和英美法系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很多中资企业的领导人员都曾感叹：“明明是贫穷落后国家，税收和劳动保护方面却同欧美发达国家如此类似。”



2月26日，巴林，反对派领导人哈桑（上排左）会见反政府组织成员。

与一般中国人印象中阿拉伯人形象差异更大的，可能是阿拉伯世界生活方式和观念的高度西方化。

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少数日常生活中绝对普遍的阿拉伯特色外，阿拉伯人习惯上已明显趋向西方化。面包、牛排、热狗、奶酪、意大利粉、通心粉、咖啡茶饮习惯，都与西方主流社会一致。

如果中国人问阿拉伯厨师，西餐和阿拉伯餐饮之间有什么大的不同。他会说：“反正，西餐对我们来说，很容易，只不过羊肉和饼不常见了而已。不像你们中国人日本人做饭，天，太复杂了。”

同样的，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也逐渐被阿拉伯人所接受。大部分阿拉伯人都喜欢好莱坞电影，也喜欢甚至追寻欧美社会的生活方式，甚至欧美民众的环保、民权意识也普遍得到阿拉伯人的认同和接受。

由于西方文化的普遍渗透，阿拉伯人在行为礼仪上更接近西方人，温和礼貌，相对而言，比中国人更注意公共场合的秩序和规则。本刊记者在也门工作时，当地武装人员因不满中方企业雇佣了索马里难民而“打抱不平”，记者在与这些劫持控制了中方工作人员的武装分子交涉时，这些人虽然衣着破烂，但始终举止温文尔雅，对被他们控制的中方人员，只是禁止行动自由，在待遇上却未做任何刁难。

而一般人普遍认为的“文明的冲突”或宗教冲突，在阿拉伯人看来，其实是政治或国家的冲突，而非宗教和文化的冲突。曾有被问及此问题的一个阿拉伯人说：“Will civilization clash? NO,not clash,be clashed!”（文明会发生冲突吗？不，不是冲突，是被冲突）。与其说是文明冲突，不如说是民族对立或者政治操纵。

在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世界，各国都有非伊斯兰教信徒存在。黎巴嫩，超过40%的人（包括阿拉伯人）信仰基督教或其他宗教。在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也门也都存在非伊斯兰宗教信徒，只是比例高低有所不同。在卡塔尔、阿联酋、约旦等海湾国家，外来人口已经在总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根据阿联酋的官方统计，2010年阿联酋全国外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83%，除印度、巴基斯坦外，西方和东亚人等非穆斯林人口大量存在。犹太教人口为数不少。即便是宗教统治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阿联酋，包含非穆斯林信徒的外来人口比重也已经接近30%。

或许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记者在中东中资企业工作时，曾遭遇当地人一次奇特的抗议，他们认为公司雇佣了一批非洲来的基督徒，却未像对待穆斯林一样给他们修建做礼拜用的场所，“这显然是不尊重他们信仰。”

大部分阿拉伯精英阶层，都有西方教育背景，深受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在政治理念、社会发展目标诉求上、社会文化发展上，都极为推崇西方社会模式。即使是受过教育的普通年轻人，也普遍喜欢美国并向往移民美国—“当然，我们也喜欢我们阿拉伯歌曲，而且我还是个穆斯林。”

被英法等国殖民的历史和经济交往，使阿拉伯社会无论城乡，只要受过教育，普遍能说流利的英语，在北非，则还有法语和意大利语。不少中资公司的员工感叹，阿拉伯社会的英语普及程度，很容易让人会去反思，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否有问题。

阿拉伯世界因国家制度的不同，在世俗化程度上有很大区别。一般

来说，北非和中东世俗政权的社会世俗化程度极高，而海湾君主国家的世俗化程度较低。



2月19日，突尼斯示威者在法国大使馆门前抗议。

以世人对阿拉伯世界印象最深的多妻制为例。发生政治动乱的突尼斯是第一个实行一夫一妻制的阿拉伯国家，而且鼓励少育，对不超过4个子女的家庭免征所得税。在埃及，娶2个妻子的男子只占总人数的1%，一夫多妻家庭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娶4个妻子的只占0.03%。摩洛哥虽然存在一夫多妻制，但受新法律的限制。多妻制较高的海湾国家，比例则为8%左右。

对女性的态度，则显示出西方化和保守文化的双重作用。有过丰富跨文化交流经验的人普遍认为，阿拉伯男子远比东亚国家男子更尊重体贴女性，不可能见到粗鲁和出格的举止。即使是穷困地区，也很难看到女性干体力活，更不能接受女性被迫上街乞讨。

即使是在沙特，政府也逐渐放宽女性在政府、法律机构、银行、医院的就业限制，逐渐开始出现女导演、作家，甚至官员。此前无人质疑的宗教警察制度，已逐渐开始遭受争议，甚至出现不少控告宗教警察的案件。

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以迪拜为代表）在经济强劲发展和国际化程度的大幅提高的同时，世俗化程度趋势已经显现。像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埃及等国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西方社会的高度交往，世俗化程度已经远远走在阿拉伯世界的前列。

最能体现出西方意识对阿拉伯社会影响的，也许是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Al Jezeera) 。如果看其英文频道，很难发现它与西方主流媒体具

有根本性的差异。半岛电视台创办者埃米尔.哈马德，曾留学英国，熟悉并推崇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体制。埃米尔是近几十年来为数不少的阿拉伯新一代精英阶层成长、发展轨迹的缩影。

但阿拉伯人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往往会有爱恨交织的纠结。比如很多阿拉伯人会仇恨美国或者批评美国，但很多人却说："我喜欢美国社会，我并不仇恨美国人，但我们讨厌美国在穆斯林的土地上舞弄枪炮指手画脚。"如果给一个普通的阿拉伯人看恐怖袭击的视频或者照片，多数人，是静默的沉思之后说："主啊，不应该这样。"

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在2001年至2007年对超过35个穆斯林国家的民意测验也显示：穆斯林批评或者欢迎一个国家是基于这个国家的政策，而不是他们的文化或者宗教；他们最赞赏的是西方的技术和民主；他们对西方最反感的是西方的道德沦丧和传统价值的崩溃—这个同在美国展开的调查结论一致；多数不希望宗教领袖直接参与宪法的起草和制定，但希望宗教法能成为立法的渊源之一。

我是谁？世俗化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纠结

然而，经过世俗化和西方教育的阿拉伯人，未必全是西方化的阿拉伯人。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不但今天频繁活跃的恐怖分子几乎全数是受过西方式教育出来的人，甚至要追溯现代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源头，无论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还是基地组织，其精神领袖正是早年在美国留学的埃及作家赛义德·库特卜。

9·11事件发生后，贝克特宗教自由基金会在《华盛顿邮报》上以整版篇幅刊登了一则广告，谴责本·拉登及其恐怖组织歪曲伊斯兰教。广告的大字标题是—《奥萨马·本·拉登劫持四架飞机和整个宗教》。



2011年3月9日，“Facebook 2.20运动”成员观看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电视 讲话。

它说的是一个事实，因为伊斯兰世界之外的人，很容易把那些狂热的宗教分子误以为是受传统宗教灌输培养出来的现代文盲，把该地区极端宗教主义、恐怖主义、政治激进势力大量存在归因为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文化传统。

但本刊记者在问及一个阿拉伯朋友如何看待挟持民航客机的9·11恐怖分子时说：“美国的确让我讨厌，但我也讨厌那些人（恐怖主义者），他们喝酒、狂热、暴力、杀戮平民，这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会做的事情。”

其实，当年本·拉登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时期在巴基斯坦建立军事训练基地时，聚集在他身边的那些狂热的圣战者，几乎全数出身于上流社会，均受过高等教育，有些人甚至是西方国家的二代移民。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与传统穆斯林有极大差别。

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基地组织甚少来自宗教势力更保守的海湾国家，一度骨干成员全数来自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埃及。

驱使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成为狂热极端主义者的理念，恰恰不可能是传统乡村未受过教育的文盲，而只能是接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年轻人。用最简单的话概括就是，困扰他们并促使他们成为极端主义者的是一个终极问题：我们是谁？

而这种提问，原本就是一个西方化教育，或者说受西方本身出现的

反现代化文化思潮启发的必然产物。

像赛义德·库特卜系统性地提出，为了拯救穆斯林乃至全人类，必须与西方进行终极决战的理论，恰是在美国留学考察的过程中形成的。而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其他几位精神领袖如毛杜姆和霍梅尼，均对西方现代各种思潮有过系统研究，像毛杜姆和库特卜就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颇为赞赏，认为按照他们的理想改造国家，就必须经济上搞全盘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但他们同时将马克思主义者的无神论视为寇仇，认为它与堕落的资本主义一样，是文明的大敌。

几乎所有非西方民族在被迫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都难免有精英阶层的自问，现代化其实就等于完全西方化，如果彻底西方化，我们又是谁？这个终极问题，很容易使被困扰者掉转过头，走向强烈的国粹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以最极端的反西方化面目出现。而阿拉伯世界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邻居，长期就是西方世界相对的他者，这种现代化之后我是谁的追问和焦虑，自然来得比任何一种文明都更强烈。

如果这股困惑少数精英的思潮与大众在转型社会中的困境结合，则会出现在世俗化和现代化上的大规模倒退。最典型的例子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革命前，巴列维王朝靠丰厚的石油美元，在世俗化和现代化上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但腐败、专制、贫富分化、道德和价值失序，使得社会大多数人群产生了强烈的回到“我们的过去”的情绪。伊朗轰轰烈烈的街头民主运动和起义终于取得大胜，但建立的却是民主的政教合一的制度。

而在埃及的民主化运动中，最大的反对派组织，正是此前埃及世俗政权和西方国家最为担心和忧虑的极端主义组织穆斯林兄弟会，虽然它已在政治主张上放弃了暴力活动，但却坚决主张建立库特卜理想中的严格遵守伊斯兰律法的政教合一国家。之所以在瓦吉吉的火烧到了埃及时，西方国家一时不知道该按照自己一贯标榜宣传的价值观去支持肯定，还是应当支持穆巴拉克，其担心正是由此。

虽然，今天阿拉伯世界的普通老百姓明显缺少这种“我是谁”的文化保种自觉或危机的强烈意识，但却普遍存在担忧。对多数阿拉伯人来说，西方丰富的物质财富、发达的文化无疑具有强大诱惑力，而传统宗教的信仰与向往，仍然是宗教信仰虔诚的归属。一个阿拉伯人说：“先进的东西，我们当然喜欢，但没有人会愿意失去我们的信仰和传统。”也许正是这样的困惑，见证着阿拉伯世界缓慢的“世俗化”转身。

从共和之乱到最后的君主

阿拉伯世界不同时期分别为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殖民统治，不但把阿拉伯国家的地图都变成直线，而且还把这片广阔土地塑造成一个各种政治制度的微缩展览馆。

阿拉伯人自认为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信仰、有共同的历史，但在这片土地上，君主制国家，既有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沙特、阿曼），也有君主立宪制（约旦、科威特、巴林、卡塔尔、摩洛哥），君主制还分联邦制和单一制，而非君主制国家则更为琳琅满目，有共和制（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黎巴嫩、北也门、伊拉克）、社会主义国家（南也门），还有说不清什么制度的利比亚（初级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和制，卡扎菲自称权利属于人民，坚持只用卡扎菲上校头衔）。总之，没有哪个地方的制度光谱有如此丰富。



2月11日，伊朗示威者经过一幅纪念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图片。

造就这种琳琅满目制度奇观的，除了殖民统治因素外，还有种种现代思潮的冲击和洗礼。

一战之前，阿拉伯人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为争取民族独立，以阿拉伯游击队为代表的民族独立运动，在一战时站在了英法协约国一边，当时很多阿拉伯人视之为实现一个统一独立阿拉伯国家的良机。但英法等西方强国对阿拉伯世界的进入，反而加速了阿拉伯世界的四分五裂。英法对阿拉伯世界进行占领和重新划分。

而俄国的十月革命也影响到阿拉伯国家的独立民族运动，甚至在伊斯兰教传统浓厚的部分阿拉伯国家有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运动思潮的影子。于是，一个阿拉伯世界形成了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不同的民族独立运

动，它最终导致二战后，阿拉伯世界分别走上了不同的民族独立国家的道路。

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黎巴嫩、南也门、伊拉克等国独立后采取了“共和制”，这几个阿拉伯国家深受二战前后社会主义运动思潮的强烈影响。不仅出现了“ 共产党”、“阿拉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联盟”等口号和组织，甚至很多国家提出并进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建设。

如埃及领导人纳赛尔宣称埃及选择“自由、公正和富裕的”“阿拉伯社会主义”道路；苏丹在70年代，“社会主义联盟”甚至成为国内唯一的合法政治组织；在阿尔及利亚，布迈丁通过政变上台后，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目标……这些国家，民族独立过程之中和之后，经历了多次从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到共和制和宪政的变革，其间，也多次发生政局动荡。而这种政治动荡，至今仍然延续。

这股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浪潮刺激影响下的民族独立运动，一度想建成统一的大阿拉伯。这些国家一开始均因此站在西方国家的对立面上，但这种想象，在复杂的外部力量和内部矛盾中很快烟消云散，各国先后与西方和解或成为其坚定盟友。而心中还有一念大阿拉伯之梦的，只有“疯子”萨达姆和“疯子”卡扎菲。

而这些革命时致力于建设一个公平平等社会的共和制国家，几乎无一例外走向了革命的反面。

以“模范国家”埃及为例，萨达特时代大幅度开放民主、倡导言论自由、实行多党政治，但反对派大量出现、伊斯兰复兴运动盛行、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也开始出现，萨达特本人被极端宗教分子刺杀，接任的穆巴拉克在几十年的统治期间，同样屡遭谋杀，但长期高压统治，政治经济集权化，社会腐败，经济恶化，民生问题恶化，导致了他这次的下台。至于利比亚、伊拉克、苏丹、阿尔及利亚就更为动荡。

君主制国家同样政治动荡不安，近二十年来，约旦、巴林、摩洛哥等国在王权更迭过程中，也发生过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局面。只是近些年来，得益于丰富的石油资源、强化宗教社会功能、大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社会局势相对稳定。

而沙特，则更多的受到传统宗教和部族势力影响，建立了最独特的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国家。受益于巨额石油收益和强烈的宗教传统影响，能保持住长时间的稳定，但代价却是社会的僵化和落后。

对君主制国家来说，诸“阿拉伯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因为这些国家的制度和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而“阿拉伯社会主义共和国”最大的敌人，则是极端宗教主义运动。极端宗教主义与世俗化强权，是阿拉伯世界内部左右和支配的两股最大思潮。而专制王权国家沙特阿拉伯，在扮演西方国家盟国角色的同时，还是各种极端宗教主义组织最大的赞助商，输出宗教极端主义以瓦解社会主义。

但君主制国家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高等教育的普及、西方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渗入，对君主制国家的固有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冲击。随着世俗化程度和西方化程度的提高，民主政治思潮也逐步开始蔓延。这些君主化国家或多或少的已经开始或者面临民主政治变革。

而下一代王权更迭过程中，能否实现平稳过渡，也将是君主制阿拉伯国家即将面临的挑战。

总体上，无论是具有传统特征的宗教王权国家，或是具有强烈社会革命色彩的阿拉伯国家，在伊斯兰宗教主义复兴的潮流下，大多走向了专制和集权的方向。利比亚、伊拉克、也门、苏丹等共和制国家这种倾向更为强烈。

迄今为止，阿拉伯世界唯一的民主国家，是美国驻军下的伊拉克，虽然其暴力袭击事件持续不断，但因国民的高度的受教育和世俗化程度，在不少阿拉伯人看来却是最有前途的一个。

Insha'Allah，动荡的大地



3月4日，数千名约旦人在安曼举着巨大的国旗示威，要求“制度改革”。

如果你有一个阿拉伯人朋友，你一定会经常听他说起一个常用语：Insha'Allah。

这个阿拉伯人总挂在嘴边的常用语，往往令其他文化的人在与阿拉伯人打交道时极为困惑。

当他希望一件事情成功，他会说Insha'Allah，这时Insha'Allah的意思是“愿真主成全”。

当他答应你赴约，会说一声Insha'Allah，这里Insha'Allah的意思是，如果他能来的话，这是上苍的意思（如果不能来，也是真主或上苍的意思，反正不怪我）。

阿拉伯人对宗教的虔诚、对生活的达观和随遇而安，阿拉伯人意愿和主张的捉摸不透，都可在一句Insha'Allah中体现。

历史上，阿拉伯人取得过极高的文明成就，欧洲文艺复兴时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和哲学、文学的源头是来自伊斯兰世界，甚至远在哥白尼之前，阿拉伯天文学家比鲁尼就提出过日心说。

但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却是全世界拥有财富与文化科技创造力落差最大的地区。

尤其是在海湾地区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国民坐拥巨额财富，完全不用从事任何劳动，全靠国家发放的补贴生活，除宗教外，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而且文盲率甚至超过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国家。在这些国家，仅学生每天五次礼拜需要占用的时间，就使得其不可能有与其他国家可比的正常的教育。

即使是在世俗化程度很高的阿拉伯国家，在中国人看来，阿拉伯人对宗教的虔诚，也使得其整体上特别容易随遇而安，哪怕是贫穷的阿拉伯人，也明显缺少强烈的物质追逐动力。教义上，伊斯兰教主张富人要行善，从道德和价值观上反对赚取利息和追逐财富，靠积极进取赚取财富的观念远较中国人淡漠。

在中国人看来，阿拉伯人只要能维持生计，就会一杯咖啡、一壶阿拉伯水烟，轻松打发掉一天的时间，这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同样，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疯狂挣钱不知疲倦的劳动，居然不需要信仰就可以过活，也是不可思议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非君主制的阿拉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国有

化浪潮，在集权制度下不但便于日后登台的权贵聚敛财富，也消磨瓦解了阿拉伯社会的效率观念和敬业精神，

阿拉伯人这种缺乏进取热心，在全球化时代带来的尴尬是，在阿拉伯世界，绝大部分阿拉伯人从事政府和社会机构、商贸企业、银行、旅游等社会性非技术性工作。重体力和技术性的工作，大都交给了外国人。

如在迪拜，无论是建筑工地、石油企业、厂矿企业中，技术、劳务核心业务工作鲜有本地阿拉伯人参与。这种情况，在埃及、阿尔及利亚、沙特、卡塔尔、利比亚等国家都普遍存在。卡塔尔航空（Qatar Airways）和阿联酋航空(Emirates)是发展最为迅猛的两家世界性航空企业。其员工队伍中，仅在管理层和少量机务飞行人员中，阿拉伯人占有一定比例，除此之外，地勤、保障、技术服务、空乘本地阿拉伯人就业比例极低。

中国人加入全球分工，使阿拉伯人的尴尬地位更加明显，在阿拉伯的集贸市场上，甚至连阿拉伯文化特色的小商品小工艺品，只要是能大规模生产的，几乎全部是来自中国的温州，只有少数非手工制作不可的器皿，阿拉伯工匠还能找到用武之地。

阿拉伯文化中与全球化要求最不适应的，恐怕还是阿拉伯人今天依然普遍的缺乏时间观念、效率观念和守约观念，依然顽强地保留着游牧社会和小农社会的习惯。

阿拉伯人热情承诺后的一句Insha'Allah，会让异类文化的合作伙伴完全不知道这位阿拉伯朋友是否会如约，甚至是否还记得这件事。

阿拉伯人身上这种安于天命的观念，明显不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节奏，也使得整个阿拉伯世界在全球化时代，除了石油之外，完全无法找到自己的定位。

无论是从社会极度分化的贫富差距、观念对立，还是从社会制度构建，阿拉伯世界面临的困境，看上去比任何地区都更多。在不少人看来，喜欢讲Insha'Allah的阿拉伯人，乐意安于天命，一切看真主意愿的阿拉伯人，意味着他们除了在宗教信仰上虔诚、认真外，对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社会的命运缺少持续的热情和耐心。

而它在全世界政治、经济中占有的特殊位置，使得阿拉伯世界依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影响。在外来力量的支配下、挤压下和刺激下，已经持续动荡阵痛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土地，依然蕴藏着巨大的动荡能量。

谁也不知道这一波的震荡会造成何种深远的影响。

Insha'Allah，真主保佑阿拉伯世界。



3月**7**日，阿曼，上百名反政府示威者集会抗议。

▫ 编辑 黄章晋 ▫ 制图 美编 虎妹

中国利益海外困局

海外1.3万家企业、500万名劳务人员，巨大的风险系数，挑战着急于奔走的中国政府与国民。

□ 记者 吴婷 特约撰稿员 汪东亚 丁大伟



在利比亚工作的中国石油工人。

稳定很长时间的中东北非突然动乱，不小心揭开了中国海外资本的庞然版图。战火在风险与保险之间烧出一个巨大级差。如何抹平级差，型塑着一国出走海外的力量。

前途未卜的300亿美金

2011年国人还未闹元宵，黑云已直压中东北非的中企。

元宵过后，黑云成黑烟。2月20日晚12点，中铁11局建设工地利比亚胡穆斯车站，浓烟滚滚。喧嚣声中1台挖机被烧，3台自卸车被烧，1台装载机被烧，1台水车被砸，1台丰田皮卡被烧，活动板房被烧一栋，砖房被烧一栋，胡穆斯维修车间被抢，钢筋场被烧，3个员工个人物品被抢。业主、监理办公室所有物资被抢光。

第二天，30多公里外的中铁11局驻地日立屯，也开始惨遭掠夺。最后被抢走2台挖机，1台推土机，1台装载机，1辆丰田皮卡车，1辆起亚车，4辆自卸车。损坏压路机与挖机各1台，装载机与皮卡车各2台。机械设备配件，桥涵小型机具及发电机全部丢失。项目营地门窗和门全部

损坏，屋里被抢走4台打印机，台式电脑4台，相机1个。个人物品被抢走手机2个，行李箱一个，现金1000元人民币。

在利比亚的75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2月中旬起，其工地和生活营地惨遭洗劫。一些人员，电脑、衣服和现金，无一剩余。据在利比亚工作过的一家中国企业工程师李良了解，抢劫者并不区分国别，见到值钱的，能换钱的，就狂抢，本国人也互相抢。

即使一些个人物品侥幸逃脱，在撤离路上也被拔毛。据中铁员工回述，日立屯的1338名中国工人在向突尼斯边境集结的300公里路程上，随身携带的手机存储卡、U盘、笔记本电脑硬盘等，全部被30多个卡哨没收。

对于这些无可挽回的直接损失和人员撤离费用，商务部下属的《国际商报》报道称，中国在利比亚相关企业的经济损失据统计已达15亿元人民币（约2.28亿美元）。

但这个数据还远没有包括在建工程的潜在损失。中非联合国商会理事、非洲投资网总裁王文明对《凤凰周刊》记者说，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涉及的资金差不多接近190亿美元。现在能估出的都是些直接损失，间接的损失情况，至少还需要两三个月才可评估。

在利比亚的13家中国央企多为基建类。一些民营企业如北京宏福、宁波华丰等，也属于施工性质。而基建项目，因目标巨大，设备较多，往往容易成为骚乱的洗劫对象。

根据公开信息，葛洲坝集团在利比亚项目为7300套房建项目，合同金额8.29亿美元。在葛洲坝集团撤离前，累计完成合同工程量16.8%。意味着有6.9亿美元不知下落。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在利比亚共有工程承包项目2个：5000套住宅项目、水泥厂项目。未完成合同金额约为人民币51.31亿元，换成美元是7.8亿。

中国建筑在利比亚主要承建住宅项目，累计合同额约176亿元，完成合同量近半。也就是至少13亿美元未完成。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在利比亚有在建项目6个，合同总额17.88亿美元。中交集团在利比亚有5个项目，记者汇总信息，发现中交集团的合同总额至少在30亿美元之上。中建总公司在班加西共承接了2万套住房项目的合同，资金总额约为30亿美元。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合

同总金额逾1.5亿美元。

相比上述央企，中国铁建是海外业务合同签约金额成长最快、海外工程最多的上市公司。也因之遭受最大损失。中国铁建公告显示，在利比亚共有3个工程承包项目，合同金额42.37亿美元（合人民币278亿元），目前已完成金额6.86亿美元，未完成合同额35.51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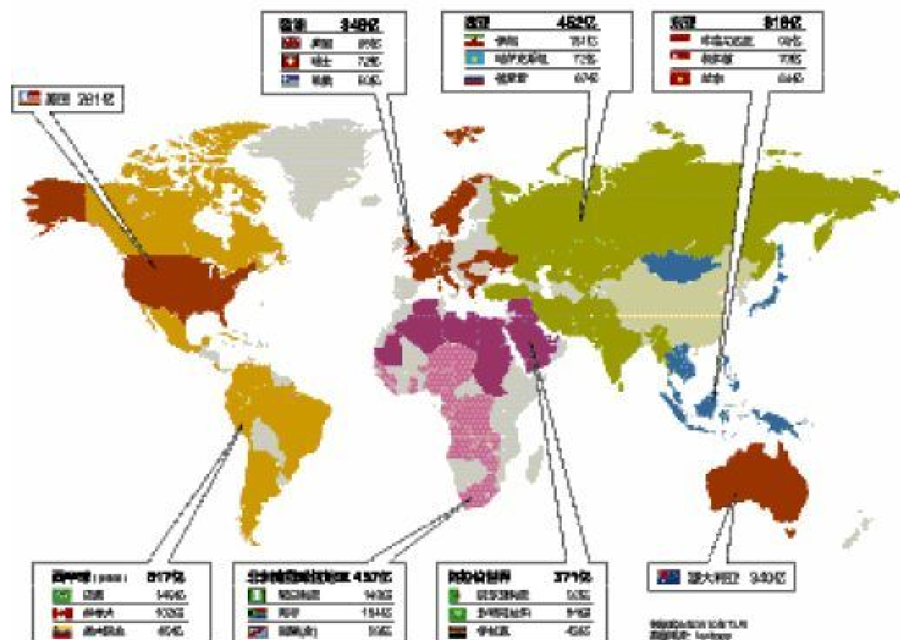
尽管一些项目未公布已完成额，但察看这些项目合同，几乎都是在2008年后签署，完成工期都需要在2012年左右，且集设计、采购、施工、安装为一体，风险一身担。仅这些央企，经粗算，仅未完成的合同额就达七八十亿美元，如果政府变更或者持续动荡，这些未完成的合同和前期成本投入，将打水漂。

在利比亚带队搞设施建设的刘东峰说，“即使新政府很快建立起来，乱局也不可能一下子平定，让你回去也不会再轻易让你继续做工程了。所以动乱之后，算损失应该很好算，账目很好理，只是弥补就没办法了。”

这意味着，2011年基建类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业务面临巨额亏损，股价堪忧。

面临巨额亏蚀的，还不只是四个伊拉克面积的利比亚。尽管埃及、突尼斯的乱局迅速平息，中企损失较少，但利比亚以南的苏丹，已裂变成两个国家。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成员J. Peter Pham，在“China’s African Strate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中分析，在苏丹最大的15家公司中，中国占了13家，并购买了该国50%以上的原油。中国是当地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国。

一位驻苏丹的中国工程师透露，在苏丹地区，中石油获得原油开采权的同时还在当地建设炼油厂。这些前期勘探开采和后期炼制的大量投入，即便在动乱平息后，也将因为基础设施被破坏而不得不重建。而且一直以来，中国能源企业往往把基础设施和输油管道建在了苏丹北部，产油地却多数聚集在南部，随着苏丹分裂，中企不得不在南部再建基础设施和管道，但这又将影响北部地区原有基础设施的利用。



中国在全球投资版图

货币: 美元

而中东世界动荡的蝴蝶效应仍在继续发酵，未有终止之势。沙特这个君主威权国家，也开始剧烈波动。研究中国与中东及邻近地区关系的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约翰·加维尔(John Garver)说：中国已经是沙特最大的石油客户，但问题在于，中国根本没有做好处置这些国家安全的准备，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心理上。

据王文明掌握的情况，在目前已动乱的几个中东北非国家，中国至少有接近300亿美元的业务。

一旦发生损失，更严重的还是人身安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主任汪段泳发现，此次撤离利比亚的外国人中，持美国护照的人只有600人，英国3500人，加拿大1000人，中国是3.6万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大量活动集中于劳动密集型部门，如道路、住房建设和农业。而需要劳动力越多，风险系数也就越大。

利比亚的成功大撤退，展示了中国国家意志的高效运转。但曾在安哥拉工作过的李良告诉记者，那里的中国人不止三万人，还有津巴布韦，也到处是中国人，如果一旦发生危机，撤离成本将极为昂贵。

阿拉伯热土

作为后发展型国家，中国海外拓展所仅有的产业机会和空间地理，往往是欧美不屑或不敢之处。中东与北非，各种机缘下，成为中国资本扩张和企业家精神漂洋过海的模范之地。

联合国2003年取消了对利比亚长达10年的制裁。像30年前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一样，百废待兴。从那时起，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便闻风探险涌入这个有着传奇统治者、女保镖、骆驼、沙漠和帐篷的北非国家。

早在2006年，中国商务部就向国内企业预警，一些进入非洲的企业不重视市场调研，也未向中国驻利比亚有关机构咨询，盲目进入利比亚市场，结果损失惨重。一个典型案例是由温州商人在利比亚筹办的中国贸易中心于2004年开始，至今未能如期开业，参与筹办工作的中国商人还遭遇意外事件，损失达100多万美元。

鉴于利比亚政府部门和企业办事效率不高，一些项目只停留在口头上，消失在等待中。商务部特别建议，中国企业在开始进入利比亚阶段应选择一些“短、平、快”的小项目，不要单纯寄希望于大项目，切忌急于求成。初期进入市场的工程承包类企业可只出劳务，不出资金、设备，而建材、车辆、住房等由主包商供应，工程款根据工程进度按期结算。

但2007年之后，中字头企业也向利比亚吹响了冲锋号。2008年利比亚政府制定基础设施发展规划，计划利用5年时间斥资1500亿第纳尔改善利比亚基础设施。这意味着千亿美元（美元与第纳尔的兑换率约为：1：1.23）的合同在向全世界招手。

据当地人介绍，尽管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市中心的高楼项目多被欧美公司拿下，但利比亚高层谋求多元化合作，不愿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一位在利比亚签下了大单的中国企业老总2007年曾表示，“北部非洲市场前景比较光明，特别是地中海沿岸和欧洲近邻的非洲国家，如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正在经历建筑业繁荣的时期。国家也很富裕。”

而在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在北非工作过的中国水电集团公司普通员工李波（化名）说，中国工程质量高，工期也卡得很严，建得快，适应当地多雨的特点，建得慢的话，碰到雨季拖拖拉拉就一年半载，这使得中国企业在非洲难逢竞争对手。

不过，中国企业的吃苦耐劳、加班加点传统，在中东非洲这片土地

上，有时也带来不满和阻力。

中国东方地球物理公司（英文简称BGP）是一家从事石油天然气勘探的企业，1995年中标中东某项目后，便一头扎进撒哈拉沙漠，没日没夜地大干苦干。经常一身汗水一身泥，终于提前3天完成了资料采集任务。不料优良的地质资料并没有换来甲方的认可，反而招致一本本严厉苛责的备忘录：中国人是一支很差的队伍，坐车不系安全带，天黑后还干活儿，劳保服破了还穿着……总之，BGP在施工中没有能力执行HSE（健康、安全、环保）国际标准。

不过，BGP如今在中东北非的石油勘探和地质资料收集处理领域，市场份额已经高达80%以上，其服务客户几乎涵盖了BP、壳牌、阿美石油等世界性能源巨头。

在强悍的中国人力资源和组织制度优势面前，刘东峰表示，中东北非的基建行业，欧美企业即使拿到项目，也多数是做管理、设计、咨询等高端环节，具体建设转包给发展中国家。

对于中企进入中东北非的过程，据刘东峰了解，民企往往是先去当地找朋友，找有关系有路子的人，也同时拜访中国驻该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帮助和当地政府说上话。

据悉，原先进入中东北非的中国人除了自发开饭馆、卖轻工业品外，主要是一些石油行业下岗工人。中原石油勘探局公司一位海外钻井项目平台经理接受采访时说："上世纪90年代，国内石油行业有大量工人下岗待业，设备也歇着，便逐渐在中东国家开拓业务。"

而一旦央企进军，李良说，这就有政治高度了。一般由使领馆打头阵，双方政府在使馆协调下正式的政治会晤，达成合作框架，然后双方的商业代表团具体洽谈，签订协议（中方一般就是一些大国企，对方主要就是该国政府或者该国的地方政府），再是大国企有一部分项目内部消化，一部分分包给国内的其他企业。

随着国有大型企业挺进亚非拉能源、矿产等大型项目，原先的和后来进去的民企或个体，也迅速向国企们靠拢，由散乱状态过渡到雁字阵型。

李良说，中国企业的工人大量是从国内劳务派遣，虽然可能增加了劳动力成本，但降低了管理成本，雇佣本地人太多，很难管理。

此外，先后在中国路桥集团、华为公司海外业务做过工程师、经理

的刘东峰向本刊记者介绍了一个几乎所有在非洲的中国工程建筑公司都流传的段子：一个工地招了1000个当地人，干了一个月到了发工钱的时候，发完工钱第二天只有不到300人来上班，一问才知道都拿着钱去吃喝玩乐去了，过了三五天，钱花得差不多了，人又陆陆续续地回来上班。所以，对当地人发工钱不是论月的，隔一周或者10天一发钱。另外，当地人信仰宗教，生活态度跟国内不一样，周末不上班，平时也拒绝加班。

事实上，“在利比亚，人均GDP还高于中国五六倍，当地人力成本并不便宜。实际上利比亚一方面缺大规模基础建设的人才，另一方面欧洲殖民历史背景下有时也看不起发展中国家来的人。”王文明说。

翻开中交集团在内地张贴出来的利比亚建筑招聘简章，里面如是声明：“工资：每月结算一次，在次月底汇入国内建行账户；工资实行计件承包制多劳多得，2年收入16万元以上。”

在简章雪片似的分发和鼓舞下，数十万从四川、河南、陕西等省出发的中国建筑工人拿着签证，乘着中国资本这艘大船，赶往中东北非国家。

李波说，这些年来，北非当地人看到黄种人，他们首先会猜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或韩国人。

李波在安哥拉的城市马兰热工作过一年（2008-2009年），据他估计这座城市就大约有20万中国人，大街上开始只有一个中国超市，一年时间就增加到三个。

在利比亚和安哥拉，尽管中国项目金额大，但因进入晚，企业数目相对其他中东非洲国家来说，并不多。

2010年底的数据显示，有1092个中国企业在埃及拓展业务。“在埃及，中国企业二三十年前就进去了，现在有鞋子厂啊，大理石加工厂啊，商品批发中心啊，还有工业园区也建起来了。”王文明说。

在苏丹，王文明一下机场，发现到处都是中国的工人。“在建电站、码头、医院、制药厂、农场，还帮苏丹建立一个从石油开采、冶炼到运输的完整系统。”

记者另从权威渠道获悉，目前苏丹登记在册的中资机构和经营实体有92家。其中，石油系统（中石油、中石化旗下企业）16家，建筑行业企业22家。其经营业务比重，也占苏丹整个中资企业业务经营额比重的

90%以上。

如今，中国海尔集团在约旦、突尼斯、叙利亚等国已分别投资设立家电厂；华为和中兴两家通讯行业企业，几乎在所有的中东北非国家都有分支机构；奇瑞汽车公司已经在伊朗、埃及、约旦等国建立汽车组装生产基地，并开始在中东国家上市。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中国与中东北非更是连为一体。中国超过50%的石油进口来自中东地区，其中沙特阿拉伯占到18%，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据统计，过去3年，中阿经贸总额都超过千亿美元。另外，王文明手头掌握的一个数据是，中国目前在非洲的投资项目已达到上千个，干活的中国人也有100万人。

而如果将视野从中东北非扩大到全球，商务部最新一期的《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0》统计，截至2009年底，大陆1.2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3万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承包工程累计签订合同额5603亿美元，营业额年均增长30%以上。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02万人。

域外生存法则

在政治法律非稳定国度，生存方式如何本身几乎就是一种社会保险机制。

汪段泳一度担忧说，中国企业在国内进行经营，主要是与政府打交道，很少有需要民众参与的环节，到了国外也习惯于延续国内的做法。

事实上，恶劣环境中长大的中国企业，为在海外丛林地带生存，已用了各种招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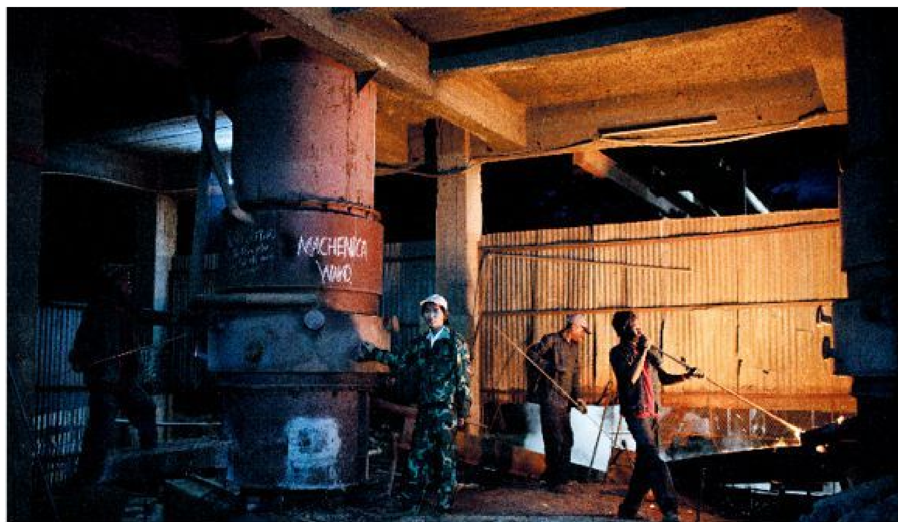
华为驻利比亚公关部长陈天宇说，利比亚实行计划经济，大企业往往相当于是一个政府部门，因而在与当地企业合作中，与政府关系比较紧密。

在利比亚的华为，也去拜访周围的邻居，送一些中国特色的小礼品。每当逢年过节，送年历给他们。如果是当地人的节日，另送相应的礼品给邻居们。由于这些基础，“这次华为撤出来，很多物品都交待给房东，房东也都很乐意帮看管一些东西。”陈天宇说。

面对涌入非洲的企业，中国政府也并非袖手旁观。王文明表示，为了防止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以及防止企业在安全意识上出差错，中国政府是有一些协调的。

此外，利比亚的建筑工程领域，中国政府推动成立中国企业协会，促进企业间互相通气、互通信息。“比方说，中资企业在利比亚已经有75个了，第76个要进入的话，首先要获得企业协会的一个认可，通过这种认可以后各方面就比较顺了。”王文明说。

而中国企业内部，则是充分利用工会、纪委、党组织，将安全意识灌输到每个员工身上。国企的作业班组和民兵基层建设在利比亚动乱中也迅速转化成巡逻队。



赞比亚，中国投资的钢铁厂。

不过，汪段泳提醒，协调好相关利益者，不仅仅是业主和政府，在很多非洲国家，当地的社团、部落、族长，甚至黑恶势力，都属于利益相关者。

刘东峰说，在陌生的环境里需要跟所有的人打好交道，这点中企有体会。非洲国家的警察局、移民局、法院、海关，都需要一一联络，缺了哪个都不行。“比如说，当地物资很缺乏，要从外面进口设备、物资，就要跟海关打交道；工程上要用炸药，要保持治安秩序，就要和警察局，甚至安全局打交道；你要从国内带劳工过去，需要办理移民签证、商务签证，就要跟移民局打交道。如果不活动，他们就很容易找到条款难为你一下，聪明的公司会提前做到位。”

据了解，在非洲和中东的中国企业，虽然不一定有明确的公关部门，但都有专门跑关系的人员，工作内容就是和各方面搞好关系，如定期跟警察局的某个人打交道，在偏远地方作业的，则跟当地的部落或者势力搞好关系。刘东峰介绍，中国路桥集团积累的好案例是，给当地部落捐小学，打水井，通过这种方式相处。

越是大企业，安全需求和资本也就越大。2月份利比亚大撤离期间，国资委在利成立的4个分区指挥中心，之所以分别由中国建筑、中交集团、中国水电和葛洲坝集团负责，据官方报道称，主要是因为这些企业比较了解当地情况，与当地政府以及实力派的人士关系良好。

正是利用在当地以及周边国家的良好合作基础，葛洲坝集团通过多种关系疏通外出道路和港口。撤离中，还联系当地安全局安排警车护送，聘请当地有威望的部族长老协助保护。

而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利比亚项目部更是因善于平时的关系经营和维护，得以超前预警，规避了原子化个体所难以承受的灾难。据大陆官方报道，早在2月8日，四公局利比亚总项目负责人无意间得到当地朋友透露班加西近期可能有较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的情报消息，随后提前储备了一个月的应急生活物资。

2月20日，当为利比亚行政发展中心承建的中交集团苏卢格5000套住房项目部遭受围攻时，中交四公局，除了立即向苏卢格警察局电话报警，同时向平时保持较好关系的一位部落长老寻求帮助。之后，国外利比亚项目部还利用关系，三次与当地军方进行交涉，争取军方保护。

刘东峰说，中国在海外的工程项目习惯建个“工程基地”，这也是积累的经验，便于管理，也好守卫。

正是借助这个“基地”，利比亚当地武装分子多日未能突破中交四局的营地大门。对峙期间，利比亚业主还以个人名义送来半卡车大米、桶装水；营地附近一个住户悄悄送来30袋面粉。

2月25日，当四公局2198名员工撤退前往班加西港口时，还得到当地朋友的引导、保护。并在撤离前，这家央企与当地政府、长老签订了财产保护协议，对所有在建财产进行了清点移交托管。

不过，企业自身所努力编织的纵横交错关系网，显然仍难以对抗利比亚等一些非洲国家的原始特性所隐含的巨大爆炸威力。

有“非洲首富”之称的利比亚，其直来直去的国界线，使100多个桀骜不驯且互相隔绝的部族被划进了境内，在部落之上，也“没有宪法、元首，甚至没有官员”的政治结构。

据传，60年前，当利比亚独立时，在联合国总部内与西方代表餐叙的苏联外交官马立克问：“利比亚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一位法国外交官用餐刀切下几块碎牛排，然后用叉子推到一起说：“瞧，这就是利比

亚。”

这个“人工拼凑的国家”，社会完全按照一套私人和地方的庇护网络进行治理。在隔壁突尼斯和埃及动乱牵引下，凸显的部族力量让表面一体的军队轰然分裂。

对中国企业来说，是第一次碰到这种蝴蝶效应的政治风险。“以前可以预见的最大政治风险是，总统大选年份，这个时候时常要爆发政治危机，引起骚乱。所以，临近大选年份，我们中企就缩减业务，提前赶工期，工地上要储存粮食和水，还要做好随时撤走的准备。”刘东峰说。

政治风险保险

随着海外各种违约纷起，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于平近日忧心表示，当前中国企业被拖欠的海外账款至少超过1,500亿美元，并且每年以150亿美元的规模增长，这不仅限制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一些中小企业甚至陷入发展的困境和生存的危机。

中东北非的乱局，也无端增大了中国输入性通胀风险。其中，国外石油公司的撤离导致利比亚石油出口减少近半。卡扎菲的儿子Seif al-Islam Gaddafi警告说，在这次的内战中，利比亚的石油财富将被“燃尽”。

利比亚动乱对石油期货市场已产生明显冲击，国际油价正处在巨幅波动中。中国一些城市出租车行业正酝酿燃油费提价措施。

在恶化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同时，也在恶化中国海外工程款项的回收可能。因为，利比亚等动乱国家，一旦其财税收入赖以为基础的石油设施遭毁坏，出口锐减，将直接影响其对基建工程款的支付兑现。

要确保在海外的企业利益和人员安全，除了政治方式与军事手段外，也有诸多经济方式的防范空间。

对于工程合同的未来损失，中企撤退前做了一些预案。如中交集团各项目撤退前将所有资料进行复制保存，然后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业主和建立公司提交了临时退场通知，从法律层面为将来的索赔创造了条件。

但据去过利比亚三次的王文明了解，利比亚商业国际化不高，其法律文案不完整。“比方说你来承建，那么利比亚提供的合同就是很简单的两张纸，很多防范措施，甚至包括不可抗力等往往不在合同里头，他们习惯的是，随着工程的实施以后双方再谈条件，再改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从另一角度建议，中国企业今后在海外投资承包项目不应一家独揽，而应与美国、沙特等第三方国家组成合资公司，形成投资结构的多元化，以分散风险。

但据王文明了解，非洲的一些国家并不希望中国企业和欧美企业联手来做项目，“他就是希望要不就跟中国进行合作，要不就跟欧美合作，所以也不是我们一相情愿，想做到就能做到的。”

事实上，降低风险的经济方式，一个越来越流行的国际趋势是实行政治风险保险。

目前，ACE、AIG、丘博及劳合社的Catlin、Hiscox、Liberty等辛迪加这些私营公司，以及安卓、科法斯、裕利安怡等信用保险公司，提供政治风险保险产品。

最有名的是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其通过直接承保各种政治风险，为海外投资家提供经济上的保障。

据了解，MIGA也曾多次来中国，就对外投资政治风险进行讲座，并在2010年年初在北京设立在华业务代表。其担保的范围，包括政府违约、战争和内乱、政府征收、不履行主权财务责任等。但听者众多，从者寥寥。

据悉，美国国际集团(AIG)旗下的美亚保险公司在海外有销售“政治风险保险”，其在内地曾向中国保监会递交产品申请，但这一产品一直未能获批。

“平常，什么人身险，第三险，一般的保险都会上。”刘东峰说，事实上，大型中企通常已习惯当地的一般性偷抢，这些成本已考虑在内，“非洲当地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呢，我所在公司好几次几个推土机消失不见了，工程用料、设备也常常被偷。”

但受访者们都对记者表示，几乎没想过一直较稳定、前景看好的中东北非会发生如此大面积动乱，“没法预测，真来了也没有办法。”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内地也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中国人保)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中信保)承保“政治风险保险”。

王文明说，在政治风险这块，中国公司相对来说更加感性一点，更依赖于经验，缺乏系统化。相比之下，欧美一些专业的风险评估公司积累了大量的国际化开发经验，有一套方法来做综合型评估。

汪段泳直言，中国企业在海外规避风险的方式，是沿用抗日战争时候对付反扫荡留下的方法：把设备深埋，要么找当地百姓托管。

中石油苏丹项目的员工侯福斗介绍，中石油下属一家服务公司就将作业车由当地雇员开到了他家里，然后委托当地人看护。根据内地报道，其他企业也多采取了这种措施。

但受托人自身也存在安全危险，“这些都不是正道，都具有偶然性。”汪段泳说。

如今，随着阿拉伯世界乱局，境内外保险公司已陆续将安哥拉、利比亚等有政治风险国家列为“拒保国”，全球政治风险保险开始涨价。此前，全球政治风险保险每年的保费大约是7－8亿美元。



赞比亚，中国人开办的纺织厂。

不过，中国继续保持自己的避险模式：通过打人情牌，等待着非洲中东机会的再临。

陈天宇说，利比亚出事后西方公司第一时间全都撤走了，而中国人撤得比较晚，后来是中国人在做利比亚网络保障工作。“再包括中国政府反对使用武力等这些态度，他们都感觉现在中国人还是比较不错的，表示以后如果有项目的话也会优先考虑中国，还有俄罗斯企业。”

对于将来，中国企业或将还是会涌向非洲中东，即便面临新政府的变卦。王文明说，中国一个建筑公司往往就有5、6万人。现在大陆很多大的基建接近结束，而很多非洲国家现在其实就相当于中国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水平，其基础设施需要10年、20年去完成。因此，“中国

企业还是要走出去的。因为他们不可能永远动乱下去的，这是产业的国际转移。”

□ 编辑 罗科 □ 制图 美编 虎妹



央企利比亚10天撤侨大起底

与西方企业不同，大陆央企海外安全保护与撤出机制组织程度与社会化程度更高，与政府部门有着良好的沟通渠道，在本次撤侨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 特约撰稿员 赵家鹏



REUTERS
2月26日，中国公民在瓦莱塔格兰德港靠岸后，排队等待下船。

在一个穆斯林占全国人口98%，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中，居然遭遇了有违教义的抢劫，这让杨裕兵至今仍觉得心有余悸。

但当时，杨裕兵无暇思考其中意味，他和他的同事们，正靠墙站成一排，被要求交出手机与现金。无人反抗，这群离家万里之外的工人们知道反抗的后果，谁也不想冒这个险，他们其中有些人甚至刚刚通过互联网跟家中报过平安。

抢劫很快就结束了，持枪者满载而归，营地中也没有伤亡。大难不死，在这个时候却并不值得庆幸，赶紧逃命，成了最重要的事情。

2月19日，利比亚政变开始后的第四天，在东部沿海地区图布鲁克，83名中国建筑技术公司的工人，在营地中被十余名利比亚人持枪抢劫之后，开始寻找出路。

他们在同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进行了联系之后，便开始沿陆路向利比

亚与埃及接壤的边境撤离。在旅馆留宿了两晚后，一行人乘车于21日上午9点多到达了利埃边境检查站。

在利埃边境，83名工人碰到了难题。他们之中有17人来利不到一个月，还没有办理护照，而有4个人护照已经过期。此时，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以最短时间帮他们办理了护照，让他们得以顺利通行。几天之后，杨裕兵在搜狐微博上写下当时场景："埃及和利比亚边境的边检站……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就那么一个门，很冷，风沙很大，聚集了很多很多人。我们算很幸运的，有中国大使馆的帮助，没有多久就过去了。但其他国家那些人就惨了。要是再多等几天，他们吃东西喝水都会成问题，因为那周围什么商店都没有。"

撤侨为60年来最大规模

杨裕兵没有想到，他们是在利3.6万名华人中第一批撤出的人。而就在他们通过大使馆的"绿色通道"进入埃及的同时，万里之外的北京也在忙碌着"铺设"更大范围的"绿色通道"。

21日夜，中央高层就利比亚局势召开紧急会议。22日早6点半，外交部、商务部等领导被叫到国务院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胡锦涛主席与温家宝总理的指示，成立撤侨应急指挥部，由副总理张德江挂帅。

大陆60年来最大规模的撤侨行动由此拉开。从2月22日到3月5日，在撤侨应急指挥部的统协下，外交部、商务部、国防部、国资委、民航局、公安部等部门联合作战，调集海陆空三路人马驰援利比亚及其相邻各国，在当地使领馆的配合下，将全部有回国意愿的35860名大陆公民与2100多名外籍人员安全撤出。

相比于其他国家与地区波折起伏的撤侨过程，大陆的效率令人震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始撤侨之初，国资委即在利成立了4个指挥中心，指定中国建筑、中交集团、中国水电和葛洲坝集团四家央企负责，帮助完成所辖区内的所有中资企业与华侨华人的撤离。

"海外中资机构的有序组织与撤离安排非常关键，"外交学院教授宫少朋对凤凰周刊表示，"此次撤侨，除了领事保护机制起到了作用，央企的有效组织亦是值得总结的经验。"

2月28日，韩国门户网站DAUM的AGORA社区上有自称刚从利比亚撤回的韩国工人发表看法，中国在不到一周时间，从利比亚撤出2万多人，相反，韩国驻利比亚大使却在非常时期返韩"出差"，令其对韩国政府很无奈。

而在西方，加拿大的前几次的撤侨行动被认为是“完全失败”。由于加派往利比亚接收本国侨民的飞机晚点，加侨民不得不自行搭乘交通工具离开，最终加飞机空机返航，也没有搭载他国人员，被媒体批为“冷血”。同样，3月3日，荷兰国防部发布公告称，该国3名士兵在利比亚执行撤侨任务时被当地武装所扣押。针对以上情况，有评论认为，加、荷两国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恰在于缺乏与当地侨民、部族的良好沟通渠道。

熟悉央企事务的知情人士对此评价称，与西方企业不同，大陆央企海外安全保护与撤出机制组织程度与社会化程度更高，与政府部门有着良好的沟通渠道，所以在紧急时刻能够迅速动员，这在本次撤侨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海外央企的撤离原则

杨裕兵的同事施建还记得，2月17日，也就是在抢劫发生的两天之前，公司紧急召开了一个会议。在那次的会议上，他被告知利比亚政变的消息。这距离2月16日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发生数名百民众抗议事件不过一天。

这样紧急召开的会议并不是临时举措。在海外，中资企业与西方企业同样，会应用HSE（健康、安全、环境）管理体系进行管理。对于恐怖与安全事件，会依情况不同分别应用蓝色、黄色、橙色、红色预警。在此之外，跨企业与政企之间亦存在新闻通报机制。一旦安全局面开始出现不稳定，使领馆马上会进行通报，告知当地中资企业做好应对措施。以利比亚为例，新闻报道当地出现小规模示威游行的时候，一般企业就都已经开始重视了。如果出现事件恶化，安全局势愈发紧张，那么公司一般都会酌情放缓工程进度，逐渐减少驻外人员数量，甚至制订撤离方案。

问题是如果撤离方案还未下达实施，抑或局势发展超出了撤离方案预估的范畴，那么该怎么办？杨裕兵们的第一反应是联系大使馆。

大陆驻外使领馆下辖有一个参赞处归商务部领导，但同时它也隶属于使领馆。平常仅作为贸促机构存在，但在突发情况下，该部门即变为一种沟通渠道，上达使领馆与商务部，下则能够收到每一个中资企业员工的信息。据中石油苏丹地区有关负责人透露，在中东北非等安全局势复杂地区，每一个员工都掌握着使领馆的联系方式，一旦出事能够直接打给使领馆。这一次，在利比亚被劫的杨裕兵们也同样是通过这一渠道直接收到了使领馆的火线救助。

有意思的是，此次撤侨，微博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月21日，网

友“开心徐峰”在新浪微博上发出第一条求援信息，称驻地被暴乱分子围攻。该条微博被广泛转载，并在晚些时候被外交部注意到，反馈至领事保护中心。后来证实，该网友来自中铁11局，当地通讯已被切断，只能通过海事卫星网络求助。



2月24日，希腊医务人员帮助中国伤员撤离。



REUTERS

2月24日，从利比亚撤离的中国人，在到达伊拉克利翁端口克里特岛时挥手致意。

据相关知情人向凤凰周刊介绍，之所以还能够通过海事卫星进行网络通讯，是因为海外央企在通信方面一般都有硬性要求，平时要保证网

络和国际海事卫星电话畅通。海事卫星电话的配比数量并没有统一标准，但据了解，出外项目的营地中一般都会有至少两部。在紧急情况下，员工可以借助海事卫星电话上网求助。

另外，为了保证在紧急时刻能够自保或撤离，在营地中一般都会建有应急库房，储存能够维持两个月生存的食品和水，以及足够的柴油。在营地被围困的情况下，这些应急食品和水都会提前发到每位人员手中，这时候每个人要待在自己的房间中，不能外出，任何人敲门，不通报姓名都不能给开门。

对于营地人员的外出，海外央企也都有着严密的规定。虽然各企业内部规定的细节不一，但在中东北非地区，都持守着一条原则，即：严禁一个人开车外出。平常如有人员需要外出，一般来说事先需打报告，报告之中需要写明细节，如目的地、人数多少、有无随行保安、保安是否配枪、通讯设施配备情况等。有海外央企工作经验的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一般来说，除保安外，外出人数最少都是三人，而在吃饭时间则严禁任何人外出。

集体行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确保人员的高效转移，但同时也容易成为打击的目标。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人员伤亡，海外央企往往秉持着三条撤离原则：首先保证生命安全，其次要保护好机密文件与合同文本，最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才会顾及到工程设备和生产生活设施。

以上原则，从此次利比亚的撤侨可见一斑。杨裕兵们没有余力照顾设备与文件，只好轻装简行快速撤离，而其他地区有条件的厂区，则在撤离之前做好了完全的准备，或将工厂大门焊死，或雇佣当地人为之照顾遗留设备，而有关的文件，则由指定好的专人携带，以保安全。

与当地人的关系也是撤离时不得不注意的关节。除了沿途部落需要关照，本公司雇佣的当地人也需要妥善照顾。如若此时存在劳务或法律纠纷，那么中方人员的撤离会非常困难。好在此番走出非洲的行动，顺利高效、有惊无险。

海外安全培训必不可少

在利比亚的大陆企业迅速转移的同时，北非诸国的央企亦在紧张地集结调动。

“时常有武装人员冲击我们营地，上个月刚刚来了一批，被我们的营地保安拦截打退了。”前述中石油苏丹方面负责人对凤凰周刊表示。

据他透露，在苏丹常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引发冲突，而这些小事的背后则连带着复杂难解的部族矛盾。为了在不断冲突的环境中，保证安全同时完成工作，他们只有时常进行安全演练。



REUTERS
2月3日，中国空军伊尔-76降落之后，一名解放军人员走在喀土穆机场停机坪上。

演练的内容包括消防与紧急撤离。在紧急撤离的情况下，演习警报不会事先通知，但警报一旦响起，所有人员必须马上赶去事先指定的地点集合，带上规定配备的食品、水与应急包，登上指定车辆，进行撤离演习。“大概是10分钟的时间，所有人就能集合完毕。”该负责人表示。

苏丹如此，其他身处冲突国家的央企亦进行着这样的演练。据了解，类似的反恐与安全技能演习已经普遍存在于海外央企中。不论是工程师、施工人员，还是厨师、采购，对于每一个海外央企员工来说，如果无法通过相关训练，首先会禁止其赴海外上岗，其次在海外工作期间，也必须经常参加训练与演习，其频率大概是一两个月进行一次。

这样的安全培训最早始自2008年。当时，由于中东安全局势趋紧，中石油开始在大陆开展海外安全培训。与此同时，中石油正好在伊拉克签下了一个大单，以此为契机，海外培训工作全面铺开。颇值得一提的是，培训教官以国内特种兵为主，并配有部分以色列退役特种兵。

自海外安全培训开始之后，虽然在中东北非国家，针对中国人的绑架谋杀事件也时有发生，但跟以前相比，已经降低了许多。前述央企知情人士对此评论道：“在地区冲突持续恶化，海外中国员工不断增多的背景下，这有力地给海外央企的发展提供了安全支撑。”

然而，与冲突为邻，除了内部的机制与标准，央企的海外生存策略亦自有其有别于西方企业的“中国特色”。

央企在海外自成体系

除了经济利益的考量，海外央企也要执行国家层面的义务。因此，在公司化经营的同时，海外央企同使领馆与当地政治势力的联系亦较为频繁紧密。

“以承包方为核心，整个央企在海外自成一套体系，整个体系组织动员能力强，体系内部人员重视情谊，却不易轻信，颇似传统中国社会。”前述央企知情人士对《凤凰周刊》记者如此比喻。

在他看来，这个组织平时是隐形的，类似一个俱乐部，组织企业间的交流、沟通与聚会。但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它则会强力浮出，牵头组织内部人员进行业务与思想培训，颁布相关准则与禁令，疏导冲突事件并在紧急避险中充当领导作用。

不唯央企如此，在该地区，社会局势一旦发生变动，华人中的个体户与私营业主的反应亦相当敏感。对这些人来说，一方面其本身便可能曾是央企员工，辞职下海后与央企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以华人开的饭店为中心，整个华人社群相对集中，在中资企业协会与华人联合会等商会的统协之下，华人间的沟通渠道多样而畅通。

在其之上，则以使领馆为核心，在广泛的中资企业范围内形成了一种沟通交流机制。这种机制在平时也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无形方式存在。

比如，不论是国企还是私营企业的商会，每周或每半个月便会派人来使领馆开会，讨论最近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政经局势。一旦使领馆掌握不稳定情况，那么就要开始进行预警，并要求每一个中资企业向基层传达。根据局势的发展，沟通交流机制会进行相应调整。如局势恶化，那么沟通交流机制会更加频繁起作用，交流可能从一周一次，到两三天一次，再到一天一次，最后甚至可能几个小时举行一次。需要撤离时，使领馆会要求每个公司上报撤离预案，然后再经由沟通交流机制对预案进行协调。

对于华人中的私营业主与个体户来说，应急事件发生后，由于他们人数比例相对较低，且基本都处于治安较好的大城市中，所以安全保障与沟通联系往往不成问题。

因为业务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在融入当地社会的方面，央企华人本身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如此优势也保证了他们能够在社会局势发生变化时掌握主动性，个人及时撤离或者就近寻求使领馆获取援助。“与法国、西班牙等国华人商会不同，在北非中东地区，华人商会与央企的联系更多，华人在生活上的相互沟通更为紧密。”前述央企知情人如此表示。

▫ 编辑 漆菲 ▫ 美编 虎妹



新疆报道、反腐系列、国际要闻更多精彩文章尽在凤凰周刊

凤凰周刊精彩封面故事之——反腐系列报道

2014年23期：朋党周永康（新刊）

2014年20期：徐才厚往事

2014年11期： 谷俊山案大起底

2013年34期：中纪委反腐2013

2013年33期：李春城案余震

2014年04期：内地航运也贪腐“黑洞”

2014年01期：贺国强中央十年

2013年32期：中石油肃贪

凤凰周刊精彩封面故事之—新疆系列报道

2013年15期：新疆极端势力内控报告

2014年15期：暴恐视频流毒新疆

2014年12期：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

2014年08期：昆明暴恐事件内幕

2013年35期：宗教保守思想危机新疆

2013年21期：新疆七月维稳

凤凰周刊精彩封面故事之——宗教系列报道

2014年18期 ：全能神在台湾

2013年35期：宗教保守思想危机新疆

2013年28期：被通缉的“活佛”

2013年31期：东正教在中国

2014年07期：大陆民间宗教管理变局

凤凰周刊精彩封面故事之——国际政治系列报道

2014年16期：大陆再现普京热

2014年17期：印度大选观察

2014年13期：安倍政权在干什么

朝鲜系列0元特刊

2013年07期：朝鲜麻烦

2014年14期：新加坡模式榜样危机

2014年10期：克里米亚豪赌

2013年03期：越南 停滞的改革